中华状元卷

主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山

大唐状元卷

大宋状元卷

山西教育出版社



金声玉振

熔历代皇家试题鼎甲答卷于一炉

人杰地灵

集多元赏析借鉴珍藏价值于一编

ISBN 7-5440-2221-8

9 787544 022217 >

ISBN 7-5440-2221-8

G·1949 定价:46.00元

中华状元卷

大唐状元卷

大宋状元卷

主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山

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状元卷.1,大唐状元卷、大宋状元卷/杨寄林主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11
ISBN 7-5440-2221-8

Ⅰ.中… Ⅱ.杨… Ⅲ.①科举考试—试卷—中国—唐代②科举考试—试卷—中国—宋代 Ⅳ.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349 号

读书中文网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 2 号楼)
山西太原今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27.75
字数:762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46.00 元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中华状元卷编译委员会

学术总顾问　王树民　王炳照

主　　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　山

副 主 编　陶黎明　祁振良　刘锡昂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明元　刘锡昂　祁振良

孙继民　杨倩描　杨寄林

李岩松　李绍平　宋大川

金　山　侯真平　姜慧颖

陶黎明　董文武　蔺瑞生

序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创立，历经唐宋元明清递加因革损益，直到清末才被废除。这一制度旨在选拔官吏，而以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为其特征。在它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吸纳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到封建政权各类各级机构中去，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也改变了官僚队伍的成分结构，提高了施政效能，造就了许多名臣贤相，不仅有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延布，促进了读书上进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其影响所及，近至华夏辽金与西夏等北方民族政权，远达古代朝鲜和越南。

在科举取士中，进士科地位最为重要，日益受到朝野内外的高度重视。朝廷把它视为抡才大典，社会上将它看作鱼跃龙门，而跻身鼎甲即前三名的行列，特别是摘取状元的桂冠，更成为应试者梦寐以求、志在必得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有赖于通过礼部主持的省试，宋以后更须通过皇帝主持的殿试；而通过这两级中央考试，又取决于依题作答的试卷水平；试卷水平则由主考官乃至皇帝基本上依照统一的知识才能标准作出相应的权衡，名次便随之而定，前三名遂即产生。

由于考试内容代有侧重，加上其他多种原因，流传至

今的鼎甲试卷主要是诗赋、经义和殿试对策了。这三类试卷均属中式的典范作品，带有帝王文化的性质与特点。

就诗赋而言，诗为五言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的排律，在平仄、对偶、押韵上都必须符合既定的严密规则，刻意雕琢的倾向便显而易见。反映到内容上，即如《花发上林苑诗》，虽系咏物，也意在歌颂天下太平的盛明景象。至于《龟负图诗》，更直接赞美“君德”与“帝谟”了。这在今天审视起来并不足怪。当然，字锻句炼对掌握写诗的技巧也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

赋为律赋，既上承骈赋，讲究对仗的精切，典故的融化，词藻的华美，更限定韵脚用字，常为八韵。八韵非独注重音律和谐，也框定住全赋需要着力阐扬的义旨所在了。唐代《寅宾出日赋》以“大明在天、恒以时授”为韵，《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日五色赋》以“日丽九重、圣符土德”为韵，北宋《不阵而成功赋》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圜丘象天赋》以“圜丘就阳、上宪天体”为韵，《公生明赋》以“公不偏党、明则生矣”为韵，都分别要求在施政要事、吏治效验、国运帝业、用兵方略、祭祀功能、居官准则等方面特予宣明，而大部分鼎甲试卷对此类义旨也确有生发和申说，显然是胜过试帖诗的。试帖诗与律赋，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雅言”、“官话”(似今普通话)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就经义而言，主要为明清八股文。八股文“不惟陈义，并尚代言，体用排偶。”所陈经文的义理和代替圣贤所立的法言，集中在治身、治心、治国、治天下的原则与方法上，由此凸现了四书五经的主体内容和儒家的理论核

心及其网上纽结，也使理学观点得到强化，起到了统一并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在体用排偶中，更讲究题意的发挥，章法的安排，修辞技巧的运用，境界的开拓，文气的拟设，格调的定立，最终归结到“雅正清真、理法兼备”上来。这正是明清两代最高统治者递加规范的结果。

殿试对策是鼎甲试卷中数量居多又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在朝廷“尽言而不讳”的鼓励下，依照以皇帝名义颁降的策题，由治国指导思想到历史经验总结，从经济、政治领域到军事、文化领域，纵论古今成败得失，指陈朝政弊端，备述当世之务。举凡心法治法、内圣外王之道、文武并用之方、创业守业、大纲万目以及重农课桑、赋税征收、货币流通、救荒治水、整饬吏治、止贪防奢、慎用刑罚、抵御外侮、选将练兵、关防海防、兵饷筹措、军民关系、兴办学校、化导民风、史学体裁、诗文标准等，无一不在论列的范围以内。虽或申明成说，亦有灼然之见，显示出前三名对国家事务的独到见解与处断能力。在论列当中，更闪映出忧国之思与革弊之念，透泻出忠贞之气和济世之志，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这在南宋文天祥、明朝罗伦这两位状元字逾万言的对策中尤显突出。18 岁便夺魁的南宋汪应辰的长篇对策，亦颇成熟。

总起来看，唐至明清的鼎甲试卷作为历代进士考试的最直接的见证，构成了帝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们连接起来，适可从一个侧面考察特定时期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透视封建皇朝的盛衰大势，索验学校教育的状况与水平，探求文风的嬗变轨迹，对日益深入的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都不失为相当重要而又亟待开发的原始文献资料宝库。

唯其如此，杨寄林、宋大川、金山三位学有所成的中年学者，主编了这部《中华状元卷》。在试题、试卷的搜采上，锐意广搜慎择，较之前人的同类汇编或专辑，则得其精要，补其缺略，使唐至明清进士科的概貌与演进情形轩豁呈露。同时配以今译，今译力求在“信、达、雅”的统一上勉为其难。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是很有裨益的。是为序。

王　炳　照

二〇〇〇年八月于北京

前 言

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政治制度，萌生于西汉，游移于魏晋南北朝，确立于隋代，形成于唐朝，完备于两宋，陡变于元朝，强化于明代，延续到清末。以隋唐为界标，其后历经一千三百年左右。在此过程中，文举与武举相继并行不悖，互作补充；文举中由皇帝特旨召试的制科和定期举行的常科则彼此交织，时有进退；常科中的进士科、明经科与诸科又连镳并轸，代有兴废；总趋势则是：科目逐渐减少，而进士科既常置不辍，又地位飙升，愈显突出和重要，成为朝廷的“抡才大典”和知识分子入仕的最正规的途径。

进士科的演变轨迹

进士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意谓可以向王室进荐并授予给爵禄的最优秀的人才。进士科则自隋炀帝大业中首次设置（或谓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不仅由此构成了科举制得以确立的主要标志，而且在日后的发展中愈益强劲地跃升为“选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滥觞之捷径”，既被看作士林华选，又被誉为龙虎榜或将相科，倍受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唯其如此，随着王朝的更替，局势的变化，时政的需要，进士科也从自身的各个方面递有因革损益，荦荦大者为：

考试程序的增扩 由唐直至北宋建国之初，均行二级考试制，即州府试和省试。州府试例称乡试，属地方级考试；省试又称礼部试，属中央级考试。州府试在当年秋季举行，省试在翌年正月举行。省试原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地点在尚书省；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礼部侍郎主持，以收位高望重之效，名其官为知贡举，考

试地点集中在新设置的礼部贡院。自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始增殿试,即由皇帝亲临殿廷主持的最高一级的考试,于是二级考试制自此变为三级考试制。殿试日期多为三月中、下旬某一日,起初在讲武殿,后移于崇政殿,又固定在集英殿。随而从之,省试便成为中央考试的第一步了,常于春季择日进行,试场则借用太常寺、国子监或武成庙,至徽宗朝及南宋,俱建礼部贡院。

三级考试制到元朝继续发生变化,即:原来的州府试上升为省级考试,仍称乡试,而礼部试则名会试(承金朝而来)。明清实际上均袭元制而纵贯直下。由元迄清,乡试例在省城举行,会试试场则定在礼部试院或礼部贡院,殿试元朝以三月初七日在翰林国史院举行,明朝始以三月初一、后又以三月十五日在奉天殿(皇极殿)举行,清朝则自乾隆十年(1745),定为四月二十六日,初在天安门,后改太和殿,又确定在保和殿。殿试的增设与延续,固然具有防止录取不公的因素在内,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殿试放榜,则恩由主上。"即是说,在二级考试制下,录取决定权掌握在主考官手中,被录取者只对录取本人的主考官感恩戴德,人为地造成"受爵公朝"却"拜恩私室"的损害皇权的现象;而经由殿试,便名正言顺地俱为天子门生,均属朝廷恩泽的蒙受者了。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态势在进士取人法上的投影。

无论二级考试制还是三级考试制,从唐代到北宋中期,基本上年年开考。遽及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始下"间岁贡举"之令。九年后,即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定为三年一考,以便"士得休息,官以不烦。"此制被后世所沿袭,即所谓三年大比。清代于三年大比即正科之外,如遇国家大庆或皇帝登基、大婚之年,往往加考一次,称为恩科。

在二级考试或三级考试制下,考生由唐迄元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生徒,即由中央官学和州府县学荐举的考试合格的学生;二是乡贡,即自学有成、经州县考试及格而由地方荐举的士人。迨至明清则渐次变成:凡欲应试者首先须进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否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被称为儒童或童生,无权赴试。而童生要取得生员资格,就必须通过知县、知府和本省学政依次主持的县试、府试和院试,成为秀才。

秀才再经过学政主持的旨在督促学习的“岁考”和意在选送的“科考”，才准予参加乡试。这显然比元朝以前强化了预试的环节。这一环节是以加强入学试的方式来运作的，同教育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

与强化预试环节相并行，明朝在唐代省试前审核举人“状书”和宋元检勘诸州解发举人试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乡试“试录”（试题与答卷的汇刻集）的审查，如有叛经离道、诡辞邪说、语含讥讪之处，不仅究治地方主考官，还将考生革退为民。自孝宗弘治四年（1491），又形成了每科殿试后由内阁同吏部、礼部在东阁另行出题考选庶吉士（未来高级官员）的定制。清代亦对乡试试卷严加“磨勘”，即仔细重审。重审中首严弊幸，次检瑕疵，如果字句可疑，文体不正，便将举人除名。其禁令之密，为前代所未有。乾隆帝在庚辰科（1760）的殿试策问中便曾专就磨勘特予发问说：“磨勘之申严也，将以蒸蒸日进于雅训，以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乃应试之文，犹不免夫支离疵谬。岂习尚之异趋欤？抑学臣之董率于平日者有未至也？”除去磨勘外，还强化了当地乡试榜后和在京会试前后的覆试，并参取明代东阁试，创立了殿试后的朝考，即令九卿确行保举，拟论、诏、奏议、诗四题，对及第进士在保和殿进行的关系到具体去向特别是选用庶吉士的一次考试。

考试内容与方式的调整 唐自中宗神龙元年（705）起，省试定为三场，先帖一经，次试杂文两篇，最后试策问五道，由此改变了隋及唐初进士仅试策问的状况。帖经即择所习之经，任揭一页，掩其两端，中开一行，再在这一行上用纸遮盖住部分字句，让应试者填写出来，借以测试其记诵经书的能力。所帖之经初为一小经，或《尚书》，或《春秋公羊传》，或《春秋谷梁传》，均连注在内，每经帖十次，答对六次以上为及格。后又规定帖一大经，即《礼记》或《春秋左氏传》，答对四次以上为及格。杂文包括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大多隐晦冷僻。至玄宗天宝年间，则专试诗赋，又有“赎帖”之法，即用试诗来抵补帖经。至于策问五道，其中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文宗太和八年（854）又改为经义三道，时务两道。依照北宋李淑回答仁宗询问唐制的说法，自太和八年以后，唐变三场试为四场试，即诗赋

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

唐杜佑《通典·选举三》谓："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复载："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但也存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及第进士舒元舆在《上论贡士书》中所讲的情况：省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火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闱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呜呼！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者也。"所谓手携脂烛，是因终唐之世允许继烛，即时至傍晚，如果考生尚未写好试卷，可以延长时间继续写，均以三条烛为限。三条烛接连燃尽，适为三更时分，即夜间一点以前必须交卷。这种夜试的场景被应试者描述为："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

宋初省试，基本承袭唐制，连试四场：第一场考诗赋各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问五道，第四场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墨义是从经书中提出若干简单的问题，命应试者笔答。如问："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答："七人某某也，谨对。"又问："请以注疏对。"答："注疏曰云云，谨对。"如果答不出来交白卷，就写"对未审，谨对。"这种四场试持续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被作了釜底抽薪式的重大调整，亦即罢诗赋，废帖经墨义，改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四场之内：首场大经，即《易》、《诗》、《书》、《周礼》、《礼记》任选一经；次场兼经，包括《论语》和《孟子》。前两场共试大义十道。第三场为论一道，末场为策问五道。所谓经义或大义，也就是以五经中的文句为题，令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这比以填空形式出现的帖经和以简答形式出现的墨义增大了难度，将测试记诵能力转向了测试辨析能力，遂被元明清递予继承和发展。自哲宗元祐中以迄南宋，又恢复诗赋，或诗赋经义两存而并行，或兼用而通试。惟南宋变四场为三场，首场为诗赋或经义，次场为论，末场为策，或首场为经义，次场为诗赋，末场为论、策。除诗、赋、论俱为一道外，经义与策的道数则递有增减，但都少于北宋神宗时期。

《宋史·选举志一》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载述太宗、真宗两朝先后定立礼部贡院故事或条制。故事规定:"先期三日,进士具都榜引试,借御史台驱使官一人监门,都堂帘外置案,设银香炉,唱名(点名)给印试纸。"条制修订为:"有司于试前一日,排定坐次榜名告示。至日,监门据姓名引入,依此就座,不得移易。或举人有所请问(指试题出处),主司即与解说。"进士在就试日,"不得张烛,亦不得将入茶担。火燎汤茶,官备。"但到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前后,业已变成:省试"所以待遇者又皆简薄,位次狭隘疏漏,上雨旁风,不能自庇,而幕帘器用、油烛薪炭之属,亦多不备"(《宋会要辑稿·选举六》)。

元代乡试和会试,定为三场,分别从八月二十日起隔双日而试,于次年二月初一隔日而试。其中汉人与南人首场试明经,包括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经疑是从四书中摘列原文,就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提出特予辨析的具体问题,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义则允许从《诗》、《书》、《易》、《春秋》、《礼记》五经中专治一经。第二场试古赋、诏诰、章表,任选一道。第三场试策问一道。自顺帝至正二年(1342)又略作变动,即:经疑二道改为四书疑和本经疑各一道,古赋由任选改为必作。同宋代熙宁新制相比,元朝在考试内容上一则把兼经《论语》和《孟子》扩充为四书,并且提到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二则以《春秋》取代五经中的《周礼》;三则变"论"为赋和杂文了。

《元史·选举志一》载:"凡就试之日,日未出入场,黄昏纳卷。"会试则"每举人一名,给祗应巡军一人,隔夜入院,分宿席房。试日,击钟为节。一次,院官以下皆盥漱。二次,监门官启钥,举人入院,搜检讫,就将解据呈纳。礼生赞曰'举人再拜',知贡举官隔帘受一拜,跪答一拜,试官受一拜,答一拜。钟三次,颁题,就次。日午,赐膳。其纳卷首,赴受卷所揖而退,不得交语。受卷官书举人姓名于历,举人揖而退,取解据出院,巡军亦出。至晚,鸣钟一次,锁院门。第二场,举人入院,依前搜检,每十人一甲,序立至公堂下,作揖毕,颁题就次。第三场,如前仪。"

明承元制,仍为三场,例定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为初九日首场,十二日次场,十五日末场。首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经义

则从《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中任选一经作文，这比元代加大了试题的份量。文兼五经，连同四书义共作二十三义，称为五经中式，属于特例，既为元代所无，又在清朝前期颇为盛行。第二场试论一道，判(断案文字)五道，诏、诰、表任选一道。这是减元古赋，增论增判。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则比元代增多了四道。三场综计十九篇，其中首场七篇称七艺，均为八股文体，形成于宪宗成化年间。每篇字数规定前后不一，短则二百字至三百字，长则六百字上下，至神宗万历八年(1580)，限定为五百字。《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载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科举定式谓："试前二日，图画东西行席舍间数，编排开写某行间系某处举人某人坐，又于间内贴其姓名，出榜晓示。试之日，黎明举人入场，每人用军一人看守，禁讲问代冒。黄昏纳卷，未毕者给烛三枝，烛尽，文不成者扶出。"

清初乡试、会试，沿用明朝旧例。至康熙三年(1664)，径废制义，改以首场试策五道，二场用四书本经题作论各一篇(如甲辰科会试《修己以敬论》、丁未科会试《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论》)，三场表一篇，策五道。似此仅行两科，便恢复旧制。自乾隆十年(1745)，改会试日期为三月；二十二年(1757)，移首场所试经义于第二场，罢试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一首；次年在首场复增《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1782)，移二场所试律诗于首场四书义后，置首场所试《性理》论于二场经义后；五十二年(1787)，命从翌年乡试起，在乡、会试五科之内，分年轮试一经，然后将第二场的论题废除，以五经各出一题并试，取代任试一经四题。此后成为定制，三场遂共计十四篇，即首场四书义三道，五言八韵律诗一首，二场五经文与三场策问各五道，合称十四艺。其中四书义和五经文俱为八股文，每篇字数顺治时限为五百五十字，康熙时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时又以七百字为准，违者不录。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乡、会试首场均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不准再用八股程式了。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一称：试前一日，"应试者由贡院东西门鱼贯序进，听唱名搜检，入大门给卷，各归号舍。试日，五鼓内帘出题纸，知贡举、监临、提调、监试视执事官分送号舍。及早晚，给饮

食，毋有不周。试毕，随其交卷次第给签验出。三试皆同。”

殿试自北宋创设之初，规定在一日以内试诗、赋、论共三题。迄至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改试时务策一道，此后历代均循其例。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所定《亲试进士条例》，便已规定：“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帘，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旦拜阙下，乃入就席，”试卷则由“内臣收之。”成书于南宋灭亡前夕的《梦粱录·士人赴殿试唱名》犹称：“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刊印策题。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答卷纸)，余皆不许夹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可见终两宋之世，其殿试方式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惟自真宗景德三年(1006)始禁继烛，悉行昼试，仅南宋孝宗乾道十年及宁宗庆元五年偶一行之。

元朝殿试对策限一千字以上成。在三月初七于翰林国史院试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元史·选举志一》)。出院时间，至迟在黄昏以前。

明清称会试被录取者为贡士，贡士得赴殿试。明代殿试仪为：“先期一日，鸿胪寺官设策题案于殿之东，光禄寺备试桌于两庑。至日早，礼部官引贡士入至皇极殿丹墀内，东西北向序立，文武百官各具公服侍立如常仪。鸿胪寺官请升殿，上常服，御皇极殿，鸣鞭，文武百官行叩头礼，侍班。执事官举策题案于殿中，内侍官以策题付礼部官，置于案上，鸿胪寺官引贡士就拜位，执事官举策题案由左阶降，置御道中，赞贡士行五拜三叩头礼，各分东西侍立。执事官随举策题案于丹墀东，鸿胪寺官奏礼毕，鸣鞭，驾兴，文武百官退。军校举试桌列于丹墀东西，北向置定。礼部官散题，贡士仍列班跪受，叩头就试。是日如遇天雨或大风，试桌即移设于两庑。”对策毕，诣东角门纳卷而出。以上由《明会典》卷五一、卷七七所载录的殿试仪，表明明代殿试是露天进

行的。

清代殿试仪为:“先期一日,丹陛上正中,太和殿内东偏,分设黄案,东西阁檐下备试桌。届日质明,内阁官朝服捧策题置殿内案上。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侍立,鸿胪寺官引贡士诣丹陛下立。大学士取题授礼部官,跪受,置丹陛案上,三叩。举案降左阶,陈御道正中。读卷官、执事官各三跪九叩,诸贡士亦如之。毕,驾还宫。徙试桌丹墀左右,北向。礼部官散题,贡士跪受,三叩,就桌。对策讫,受卷、弥封诸官俟左庑檐下,收封盛入卷箱。”从以上《清史稿·礼志八》所载述的策士仪来看,清代殿试实与明代大同小异。惟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不准再暮后给烛甚至次日黎明交卷,交卷最晚以日入为限。

命题和阅卷规则的严密化 清康熙帝在谕旨中就强调:“科场出题,关系紧要。”紧要之处其实在于:它是考试内容的具体化,决定着每一科乃至整个进士科的面貌与方向。其中乡试、省试(会试)命题,历代均由主考官负责拟定。殿试策题则由读卷官或内阁拟列后,送呈皇帝裁决。唐代省试和宋明清殿试试题,偶或也由皇帝亲自来出。清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还规定,会试以及京师顺天乡试中头场四书题俱由钦命,乾隆时又将诗题加进来。

在唐代,省试题目并非均有出处,时或出自命题者的一己之意。如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丁丑科,礼部侍郎吕渭充任主考官,鉴于中书省在数年前曾有柳树枯而再荣,其时正发生了德宗因藩镇反叛出宫又返京的事件,于是便取《西掖瑞柳》作赋题。唐文宗开成元年至三年(836~838),连开三科,每科均由文宗赐题,而二年诗题与三年赋题俱为《霓裳羽衣曲》,但此题却直接取自当时乐官献呈的乐曲名。这类随机命题的情况到宋初依然存在。如太平兴国二年(977)丁丑科,太宗在殿试以前曾向宰相薛居正询问长治久安的对策,薛居正答以莫若文臣武将交互任用,于是便出《训兵练将赋》和《主圣臣贤诗》二题。迨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诏命御药院摹印殿试试题并附题解,庆历四年(1044)又详定贡举条制以后,遂渐次明确规定:诗赋论于经史诸子内出题,策题通问历代书史与时务,禁出偏题,如系本朝事实,并须明白指问。经义宜出全题,必不得已方出关题(他处牵合而

成者),戒忌断章(上下割裂)。各类题目应力避重复。

试题具有出处,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得结合处便结合。如唐昭宗于光化三年(900)十一月被废黜幽禁,翌年反正,即以《天得一以清赋》试士。《元史·顺帝本纪四》载,至正五年(1345)"二月戊午(初三日),祭社稷。"次月殿试便用祭天祀祖之礼发为策问,颇有如影随形般对现实事件做出反应的架式。再看保存完整的宋神宗至宋高宗凡二十七科共二十七通殿试策问,正紧紧环绕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崇奉道教、对金和战而递次展开,都与这四帝的一朝大政息息相关。即所谓"时务策"也。

明朝颁布《文字格式》,又接连申明: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不许摘裂牵搭及问非所当问,并须依经按传,文理纯正。清代于顺治二年(1645)便规定:三场试题,俱如旧例。其四书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如第一题用《大学》,则第二题用《论语》,第三题用《孟子》。策题要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不许搜寻僻事,掩匿端倪,必问者列款而示,使对者可按牍而陈。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五十四、五十五年,鉴于考官拟题大多择取四书五经中的冠冕吉祥语句,致使应试者可以预先猜题拟卷而侥幸考取,一再降旨申饬:断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应出各种题目测试,不拘忌讳。"表"题亦不可出修书、赐书和本年时拟近事等类。至雍正元年(1723)又覆准:考官若仍出熟习拟题,交与该部议处。乾隆十九年(1754)规定,策问时务,主试官不当以己见立说,违者必治其罪。三十五年(1770),又禁策问连及本朝臣子,并重申每道策题限定在三百字以内的定例。此前二十六年(1761),革除殿试策题素由内阁预拟的陋例,改令读卷官密拟策问进呈俟定。

科场命题固然紧要,但如何阅卷更为根本所在,即"制科取士,全系司衡。"唐代省试,虽自玄宗开元中定有呈榜详覆之制,即礼部将阅卷结果和试卷在张榜公布之前或之后送呈宰相审查,但此制屡兴屡废,基本上仍是将命题权、阅卷权和录取权统统交付给主考官的,属于形式上的二审制,实际上的一审制。宋代定令:

“凡试卷，封印院糊名(密封)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复令封之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不合格者，须至覆场(覆试以后)方落。”这已经变成颇为严密的三审制了，即初考、覆考、再核定。核定之后，还须进奏试卷，候旨定夺。特别是在初考中，又设点检试卷官按试题类别和场次分成甲、乙、丙三房阅卷、初步批分定等，以便知举官三场互考，通定高下。这又构成初阅与总阅相结合的阅卷规制了。宋代还规定，初考用朱笔，覆考用墨笔。

元代的会试考卷，由知贡举(二人)居中，同试官(凡四人，略当于点检试卷官)对向而坐，公同考校，分作三等，逐等又分上中下，用墨笔批点。这是对宋代初阅与总阅相结合的阅卷规制的继承与改进。明沿此制，但对会试试卷尤重五经分房评阅(房即专题阅卷组)，初为十七房，后为十八房，终至二十房，故同考官又称房考官，每房为一名。主考官则二人，初由礼部临期具奏，从翰林中钦命简任，熹宗天启二年(1622)后，以二辅臣典试，成为常例。

清代会试主考官称为总裁，正副各二人，俱经钦命。房考官共十八人，均由部曹各自疏请简用。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停罢五经分房制，改为试卷分束制，即按房考十八员之数，将试卷分为十八束，每束大致以二百份为基准，再通过抽签，分发到各房阅看。道光二年(1822)，始命房考官随同所荐之卷粘签写明批语。在此前后，屡救三场并重，于头场阅荐既毕，便将二三场通行细阅。阅卷之时，主考官与房考官共坐一堂，随分随阅，随取随呈，去取权衡，专在主考官。主考官不得仅凭房考官的荐阅做决定，房考官须择三试全佳者为首荐，其第一场文义致佳、二三场无疵或第一场文义无疵、二三场致佳者为次荐。房考官用蓝笔，主考官用墨笔。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定会试三场阅卷完毕，择选试卷十本，缮写进呈，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

由元迄清，会试阅卷显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考综司衡之责，房考膺分校之任。而对这些内帘官的遴选，也品级越来越高又条件越来越严格了，但总体上的详密程度却转逊于宋代。

宋代殿试阅卷，例由中书门下择取适当人选(多为享有时誉、

时望者)临时充任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详定官负责对初考官与覆考官所定试卷等第进行审核。如果两相一致，则无权变动；若有不同，则确定其一，不许别自立等。意在参用众见，以求实才。仁宗嘉祐时，王安石充任详定官，始不采用初、覆考官的意见而另定。高宗绍兴五年(1135)又复旧，规定初、覆考官皆失当，方准详定官奏禀而别置等第。等第定毕，便将录取名单和试卷进呈，前十名亲由皇帝根据试卷定名次。自高宗建炎二年(1128)，乃令勿先进呈前十卷。元代则由读卷官同监试官对殿试对策定高下，分为三甲进奏。明代例以内阁大学士、翰林等充任殿试读卷官，在东阁共阅对策，拟定名次，俟钦定。清代略如明制，自殿试次日，令读卷官(初为14名，后为8名)会集文华殿悉心校阅，各加圈点，分别标识，两日毕，"公定前列十卷"，待奏呈。赵翼《簷曝杂记》卷二《辛巳殿试》谓：是科(乾隆二十六年)"将定进呈十 卷，……及 检，一卷独九圈，当以第一进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纸条，阅卷大臣各以圈点别优劣于其上。是岁阅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道出了当时的具体情形。

录取名额的扩大和渐趋均衡 唐代尽管大致上年年进士开科，每科获准入京的应试者至少八九百人，甚或二三千人，但被录取者通常不过十八名以至三十名左右，终身不第的举子占绝大多数。其艰难被称作"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代犹然。入宋后，经殿试决定录取的名额则自太宗朝开始激增，平均起来，相当于唐代的十四倍左右(详见下表)。即便在干戈俶扰的局势下举行的高宗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进士考试，仍录取259名(尚不包括四川进士120名)，属于南宋及第人数最低的一科，纵使如此，依然是唐代录取人数最高(79名)的高宗咸亨四年(673)癸酉科的三倍多。说来也凑巧，同为本朝高宗，一处南迁仓惶之际，一处贞观之治以后，仍旧相差恁般悬殊。宋自增设殿试后，对参加殿试者尚予大幅度淘汰，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至仁宗嘉祐二年(1057)，悉免黜落。这等于向应试者宣告：尔等省试过了关，进士其实已经在握了，殿试解决的只是你们每个人等第和名次的排定问

题而已。元明清也无不大略似此处理。

元代的录取人数，远低于两宋，其中汉人、南人每科仅三十余名。但自顺帝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曾有总数增至百人之举，却显露出固定化的意向来。这一意向到明代变为现实。明初会试约以取中百名为率，间有增损；自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后，基本限定在三百名上下。具体的录取对象在明成祖以前还不分南北，自仁宗始命按地域录取，比例定为：南方人占十分之六，北方人占十分之四，谓之南闱或南卷、北闱或北卷。宣宗宣德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又增中闱(亦称中卷)。若取百名，则南闱为55名，北闱为35名，中闱为10名。南闱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及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和广德一州，北闱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及顺天、直隶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和延庆、保安二州与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中闱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庐州、凤阳、安庆七省府与滁、徐、和三州。若取三百名，则南闱为165名，北闱为105名，中闱为30名。这一比例自孝宗弘治三年(1490)以后，相沿不改(仅武宗正德三年曾作更动)，它与殿试录取数是基本对应的。

清初仍分南、北、中闱，中闱或屡并屡分，三闱或又各分左右，但会试录取人数并无定额。以世祖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和九年(1652)壬辰科而论，俱取400名，其中南取233名，北取153名，中取14名。但问题是：仅分三闱或两闱来录取，仍会造成各省被录取额数或偏多、或偏少、甚至边远省份竟成空白的现象，于是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改为分省录取，即由皇帝综计省份大小和应试人数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数取中。会试取中的额数，实际上也就是殿试取中的额数，二者出入甚微。终清之世，历科大致上各为三百数十名，少或一百数十名。最高为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449人(不含满洲进士)，最低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81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省录取中，隶属福建的台湾府风气日开，入京会试者逐

渐增多。如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即达11名，而在录取的246人中，便钦定：台湾取中一名。这事实上等于宣布：台湾府已有一人进士及第了。虽仅一人，但放在全国共取246名中来看，已经是相当不简单了。

为便于说明历代进士科录取名额的升降状况及其趋向，兹仅据《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四书所载《登科总目》，列表如下(唐五代为省试录取数，宋以后为殿试录取数)：

朝代	存在年数	开科总次数	录取总人数	平均录取人数
唐	290	261	6460	25
五代	54	47	650	14
宋	320	118	40000 (内缺3科人数)	348 (按115科计算)
辽	210	57	2435 (内缺2科人数)	43 (按55科计算)
金	120	20	已无法统计全	
元	98	16	1136	71
明	277	88	24600	280
清	260	112	26000	232
合计	1283	719	101281	145 (按694科计算)

对登第者待遇的提高 这主要表现在入仕和礼遇两个方面。唐代进士及第，仅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还不能进入官员的行列，只有再通过吏部诠试，方可授官。至宋代，则对殿试合格者初按三甲、后又按五甲(一至五等)赐给身分：一、二甲赐进士及第，三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甲赐同进士出身。随后依此等级，直接便授予官职。这是与唐代的迥异之处，并被元明清引为定制。元代始改五甲为三甲，一甲又仅限前三名。明清亦复如是。自明始，一甲第一名径授翰林院修撰，二、三名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除考选为庶吉士者外，或授给事、

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等朝廷官，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地方官。从英宗天顺二年(1458)起，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神宗时进士出身的黄尊素便曾指出宋、明在登科入仕上的显著区别是："宋之御试第一人，不过签书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户簿尉而已。今则第一甲三人，即为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清代略如明制，但更重视庶吉士的选用。

由唐迄清，对登第进士的礼遇也在升格。唐代放榜，亦即公布录取结果，例在礼部南院贡院东墙之上，且发榜帖(似今录取通知书)。榜帖用黄花笺，长约半尺，宽约2.5寸，上书登第者姓名，花押其下，外护大帖，大帖帖面又书姓名，当时称之为金花帖子。至宋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唱名仪式，各赐绿袍、笏、靴等。元由礼部先期告谕中选进士，届时诣阙前，特设香案，由侍仪舍人唱名，放榜。榜用敕黄纸书写，分蒙古、色目和汉人、南人两榜张布在大内前红门左右。明清制定传胪仪更为隆重(详见《明会典》卷五一、《清史稿·礼志八》所述，此不赘引)，俱于东长安门外张挂黄榜公布。

在唐代，举人既及第，照例举行期集院欢宴、杏园宴、雁塔题名、曲江会等庆贺活动。在曲江会中，皇帝或亲临紫云楼，垂帘纵观。自宣宗大中十年(856)，又敕编《诸家科目记》，并命此后逐年编进，这类专书早在私家撰录时就已被应试者奉为"千佛名经"而于众目睽睽之下顶礼膜拜。以上诸多活动，到后世多被官方化和制度化了。两宋变期集经费自筹为特旨赐拨，数目不菲，"所以侈宠灵，重年好，明长少也"。更重要的是，宋赐闻喜宴，元明清赐恩荣宴，旨在宣扬"观国之光"和"惟王是崇"，喻示"寒儒逢景运，报国合如何"的问题。宋于礼部贡院和元明清于国子监责成工部刻石题名，则欲使"士子观览此碑，知读书登榜之荣，益励其潜修上达之志尔"。至于编刊同年小录或登科录，更绵延不绝，蝉联而下。

此外，宋对新进士又赐御诗、御箴和官刻《礼记·儒行篇》，特命金吾司为进士第一名提供七人导从、两节前引的鞍马仪仗。明清于张榜后均由顺天府备伞盖和仪从送第一名归第，俱赐第一名冠带朝服

一袭，对诸进士俱赏钞银。明为每人五锭，清为每人三十两，前三名外加五十两。自第二名以下，清还赏给表里（贵重衣料）各一端，且例授旗匾。明代进士赴恩荣宴时，承宋制均簪花一枝，花乃剪绢制成，上有铜牌，镶嵌"恩荣宴"三字，第一名所簪花，则"枝叶皆银，饰以翠羽，其牌用银抹金"。清定新进士冠服样式为：金镀银三枝九花顶，所赐第一名的冠服，比照六品顶带。

由唐至清，对进士登第者在入仕和礼遇上尽管存在着迟速之分、高低之别和隆杀之异，但在日后的超擢重用上却是归于一致的。这也就难怪唐代把礼部侍郎主持进士科考试视作替天子"拣宰相"，将进士登科喻为"登龙门"，推重成"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了。如德宗贞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802～805），凡开三科，共录取72人，72人中先后有10人位居宰相，其他任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相形之下，士大夫尽管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两宋则层楼更上，仅仁宗一朝十三科前三名凡39人，其后不至公卿者，仅5人而已。当时战功卓著的名将狄青就不由自主地常向人讲："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韩枢密指天圣五年（1027）丁卯科榜眼韩琦，狄青与之相比较的这两句话，遗憾胜过不服气，正是唐代重臣非由进士终不为美的普遍心态的回声。即使在民族矛盾相对突出的元朝，名臣亦多为进士出身者，世所流传的"九儒十丐"之说，自不免夸大其辞，事实上连灭元称帝的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发布的《开科诏》中也承认"前元待士甚优"的。明代欲"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而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的，已被普遍看成是"储相"。综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进者十居其九。翰林之盛（实即进士之盛），为前代所绝无仅有。清代宰辅，亦多由庶吉士之选；宰辅而外，例由此选而擢任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的，更数不胜数。

转折点之所在 合而观之，历代进士科因中求革，纷披错杂，但其嬗变之迹显然崭现出五大转折点来：宋初增殿试，变二级考试制为三级考试制，此其一；熙宁变法废诗赋而改试经义，殿试专用策问，奠立起后世以经术为先、词章为后、且重时务的格局，此其二；元朝把四

书列为首场考试项目，正式采用总阅与分阅相结合的阅卷制度，规定一甲仅限前三名，此其三；明代始定八股文体，按南、北、中三闱录取，进士及第得入翰林，此其四。清康熙变三闱录取为分省录取，光绪在科举制接近尾声之际改立考试内容，停用八股文体，此其五。正是在发生这一系列重大转折的过程中，诸如唐代名相房玄龄和宋王景，宋代名相王安石和文天祥，明代首辅张居正，清末重臣张之洞等彪炳史册的政治家经由进士而涌现出来。至于其他领域包括科技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非进士者毕竟占居少数。在这些进士出身的华夏精英中，也不乏前三名的获取者。

需要指出的是，辽金都先后实行科举制，亦以进士科为主。辽则沿唐袭宋，金则兼采唐和辽宋，包括两朝增入县试的四级考试制在内，并无实质性的重要突破。惟金始创会试之称，殿试仍始终予以黜落，连会试第一名也不例外。至如试题命定，如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丙子科殿试之《日射三十六熊赋》，则显示出契丹族的独有习俗、勇猛气概和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而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丁丑科的殿试三题：《不贵异物民乃足赋》、《忠臣犹孝子诗》、《忧国如饥渴论》，则又反映出女真族的汉化程度之深了。

前三名的来龙去脉

透过历代进士科的嬗变轨迹，可以看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即：果真摘取到前三名特别是第一名的桂冠，就会迅即赢得巨大的声誉，获享到最优渥的待遇，更为日后的仕途发展尤其是入居宰相创设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因而反转来，应试者自然把跻身前三名的行列有意无意地列作激烈角逐的终极目标，而对前三名的择定，也尤为封建王朝所关注，所重视。

前三名的归于钦定　如前所述，唐代基本上是将命题权、阅卷权和录取权统统交付给主考官的，随而从之，前三名亦归其选定。选定的情形试看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丁巳科知贡举高锴所奏："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衷，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

用研精覃思，磨励缉谐，其今年试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诗》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臣前后吟咏近三五十遍，虽使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枝，臣与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次张棠诗一首，亦绝好，亚次李肱，臣与第二人。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前此文宗曾诏命高锴：“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所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将奏章和诏命两相对照，表明主考官选定前三名的总原则是：推公精拣。具体体现为：第一，试卷最符合诗赋的“常规”与“体格”，亦即固定的标准。第二，人、才俱美，即除去文才以外，还要看本人的相貌（这与唐代吏部以“身、言、书、判”择人之法是一致的）。第三，贯彻皇帝的特定意图（宗室亦可录取）。唐代主考官对前三名的选定于此可见其概。虽进奏后须待“敕下”方属有效，但绝少做名次改动，其实是备个案而已。只有发生了科场风波，需要进行覆试，才有可能推翻主考官原来的意见。五代和宋初也莫不如此。

自实行殿试后，历代依然责成读卷官拟列名次进呈，但已“或如所拟，或有所更定”了，重点则集中在前十名特别是前三名上。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宋真宗“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馀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五及《宋史·蔡齐传》复载：蔡齐“姿表秀异”，真宗“临轩，目其堂堂英伟，进退有法，大悦之，”“顾宰相寇准曰：得人矣。”从以上载述不难发现，在衡量的标准上虽然仍如唐旧，但由皇帝径定名次则已不容置喙了。更有甚者，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御试所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等15人将应试者黄裳定在下等第五甲（其廷对策见本书“大宋状元卷”），而神宗“尝见其文，因记其数句”，至唱名令寻黄裳对策呈阅，当场便表态：“此乃状元也！”似此一言九

鼎把黄裳从第五甲亲擢其为第一名之后，还以考校试卷“不当”而对15名考官每人各自罚铜30斤。宋高宗虽自建炎二年(1128)命令勿先进呈前十名试卷，但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亦经阅卷，以“词翰(文章与书法)俱美”为由，进第二名张孝祥为第一名，抑第一名秦埙(权相秦桧之孙)为第三名。宋孝宗策士，也“不尽由有司”，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便将原第三名王容定为第一名。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是由初拟第七名而被宋理宗擢为第一名的。元代既分三甲进奏，后又限定一甲仅为前三名，其最终决定权当然也是由皇帝行使的。

明代进而强化了“读卷”制度及其仪式。“殿试后二日，早常朝毕，驾诣文华殿……传读卷。读卷官居首者至御前跪，展卷朗读，毕，司礼监官接卷置御案，本官叩头，兴，复班。其各读卷官以次进读如仪。读三卷后，临时候旨，再读几卷。如奉旨免读，各官即执卷同至御前跪，司礼监官以次接卷，俱置御案。……各读卷官出至文华门外，候上将试卷裁定。御批第一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第一甲第三名毕，其余各卷发出内阁官领收，上回宫。是日，各读卷官先将第二甲第一名以下折卷，填写黄榜。”这一整套读卷仪，显然是紧紧围绕前三名来进行的。至于如何裁定试卷和御批前三名，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和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较有代表性。这两科均由世宗亲自出题(题见本书《明代进士科殿试策题辑存》)，己丑科“以六卷分优与稍优各三来看”，世宗“每览之三过，既无所知(斯乃谦词)，况兼目疾小作，不过勉取卿等所拟之第而分别之”，结果手批一甲三人为罗洪先、杨名、欧阳德。其中对罗洪先对策的批语是：“学正有见，言说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乙未科进呈十二卷；世宗“各览一周”，降谕申明钦定一至第四名的理由在于：“其上一卷，正合题意。夫周道善而备，朕所取法。其上三，说仁礼为用。夫仁基之，礼成之，亦甚得其意。上四论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法矣。其上二，略泛而滞于行。其下二却似说，虽与题不合，言以时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余以次列去。”从这道谕旨看，也就是仅仅同意读卷官原拟的状元，转而进第三、第四为第二、第三，将原下二又提至第四，把原第二降到原下二的位次上去了。折卷后本科

状元遂为韩应龙，榜眼为孙升，探花为吴山。像嘉靖这两科的批阅之举，也仅属特例而已。

清代取消了“展卷朗读”的环节，改成：“阅卷三日毕，翼辰，前列十卷签拟名次，缄封呈御览，帝御养心殿西暖阁，阅毕，召读卷官入，亲定甲乙授之。出拆弥封，依次缮写缘头签，引十人进乾清门，祇俟西阶下。帝御宫，读卷官捧签入，跪呈。引班官引十人跪拜丹陛中，依次奏名籍，兴，退。帝亲定一甲三人，二甲七人，授签读卷官。跪受，兴，退，率十人侍立西阶下。驾还便殿，十人先出。读卷官捧卷诣红本房，填写名次毕，交内阁题金榜。”这与明代相比，在对进卷的仔细斟酌上无疑程度有所增强；而且在钦定以前，还要面睹入选者的相貌，作为权衡的因素之一，即乾隆帝所谓“尚待观人”而“人、文并重”，此与唐朝“人、才俱美”恰恰前呼后应。相貌条件在明代也起作用，如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王艮虽被拟为第一名，但惠帝见他相貌不扬，便降为第二名，而以第二名胡广居首。

一言以蔽之，在录取决定权由主考官那里收回到天子手中的过程中，历代进士前三名相继产生出来。根据高锴奏章和唱名放榜以及登科录与官修史书的说法，前三名大多径称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史书例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二》)，或称第一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第一甲第三名(明清传胪仪)。由唐末至南宋，又合称“鼎甲”或“三魁”。也有笼统称作“进士高第”的(例见《宋史》卷三四六《张庭坚传》、卷三五一《刘逵传》)。

状元之称的由来 进士第一名除去径称第一人外，正史中大都例称“进士第一”，如《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辽史》卷八十《张俭传》、《金史》卷八八《石琚传》、《元史》卷一九四《李齐传》等；或称“首选”，如《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但在唐代，因举人进京参加中央考试，必须先到主持考试的礼部投状报到，由此遂又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头”，高锴奏章便把“状头”和“第一人”连称。由状头复有“状元”之谓。元者，义取居首。“状元”较之“状头”，更显雅正了。其又称作“榜头”、“榜首”或“状首”、“魁甲”，具体的科次也常用本榜状元的姓名做代称。如唐玄宗天宝六载(747)丁亥科状元为杨护，后来即谓之

为"杨护榜",这种情况在宋代更为多见。出于对登科者的礼敬,唐宋时期民间以及文人之间也称第二名以下的新进士(宋限于五甲中的第一甲成员)为状元。状元在金朝则正式称作"敕头",实乃取自唐代制科第一名的习称。金章宗曾谓:"一场放二状元",则指汉人词赋榜状元、经义榜状元而言,此外还有女真科(策论进士)状元。状元在《金史》中出现的频率高于他史。而自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始定蒙汉两榜第一甲仅各取前三名,此后"状元"一词乃为新进士第一名所专有了。

从榜眼到探花 约自北宋初叶起,进士第一人和第二人,又被称作榜眼,意为榜中双眼。因眼必有二,故而转以用来指代第二名与第三名;第三名至南宋专称探花,榜眼遂独指第二名。探花源于唐时新科及第进士在杏园举行的庆祝宴会上,选派同榜中两名年龄最小又俊秀的人,充当探花使(又名探花郎),遍游京师名园,采折名花以示荣宠。正是从荣宠且又葱秀的双重意义上,探花被取作第三名的代称。《明史·选举志二》云:"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其名"制所定也"。即是说,迄明太祖始将状元、榜眼、探花由习称、俗称变为官方正称了,而"鼎甲"一词也进一步得到强调,终清亦复如此。《清史稿·选举志三》即谓:"士子咸以预选(指庶吉士)为荣,而鼎甲尤所企望。"

会元与状元的关系 随着三级考试制的施行,介乎于乡试和殿试之间的礼部试,其第一名在正史中被称作"试南宫第一"、"试礼部第一"或"南省第一人"(例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卷四三四《蔡幼学传》、卷一五五《选举志一》、《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等)。因礼部试又称省试或会试,宋代遂有"省元"之称,金朝中期以后复有"会元"之号(例见《金史》卷一五二《杨伯仁传》及金末李世弼《金登科记序》)。省元至元朝,转指分省考试即乡试的第一名;会元在明清则被士大夫及官方用作会试第一名的通称。省元(元朝除外)或会元,其实仅仅是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应试者的最高称谓,与状元作为已被录取者的头号人物的专称,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会元通过殿试又接着博取了状元,即所谓"会状联元",此其

一;其二,逢遇开科应试之年为皇帝守丧期或出自其他原因而不举行殿试,会元按规定自然列为状元。宋代太宗朝程宿、真宗朝孙仅、英宗朝许安世、哲宗朝焦蹈、徽宗朝李釜、高宗朝黄公度、孝宗朝木待问、宁宗朝傅行简、理宗朝王会龙等,便是如此。其三,会元殿试后与状元无缘而考中第二名、第三名直至第若干名或被淘汰掉。如金代麻九畴,于宣宗兴定五年(1221)辛巳科高中南省试经义第一,及廷试,则因误而被黜落。这种情况虽甚少见,但与因故罢停殿试而自然成为状元的会元相比,确有幸与不幸之别,反差极其强烈。相形之下,最难达到又最能显示应试者实力的是赢得"三元"的艳称。

三元及其他 在二级或三级考试制下,地方考试无论州府试还是分省考试,统称乡试(唐宋又称"乡贡"、"乡举"或"解试")。因其任务是通过初选,把合格者荐送到朝廷,所以乡试第一名被称作"解元"或"解头"、"举首"(元亦称"省元",宋又称解试中国子监试第一名为监元)。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亦即三试连中第一,是为"三元"(金朝曾行以县试为起点的四级考试制,又有"四元"之称)。由宋迄清,共开进士科四百三十一次(辽金限于已知者),而三元仅仅涌现出十一名,这就是:宋四名:孙何、王曾、杨寘、冯京;辽一名:王棠;金一名:孟宗献(又作孟崇献);元一名:王宗哲;明二名:许观(后复本姓黄)、商辂;清二名:钱棨、陈继昌。在此之前,唐代进士武翊黄、张又新分别号称"武三头"、"张三头",崔元翰既为德宗建中二年(781)辛酉科府元、状元,又为吏部试博学宏辞科、直言极谏制科第一名,被视为四元。其实,唐代的三头也好,四元也罢,都是按解头、状头、外加吏部试或制科"敕头"来合称的,这与宋以后进士科的"三元"在内涵上是不尽相同的。

除去"三元及第"相当罕见以外,且有"双桂联芳",即兄弟先后夺魁,或为三人,如晚唐孔纬、孔緟、孔缄;或为二人,如北宋陈尧叟与陈尧咨、孙何与孙仅。亦有父子相继俱中状元者,如晚唐归仁泽与归黯,北宋梁颢与梁固。还有祖孙隔代续取状元者,如清代彭定求与彭启丰(祖孙二人又俱为当科会元)。此外尚有解试、省试、殿试均中第三名者,如北宋的韩绛。宋孝宗乾道二年至八年(1166~1172)凡开三科,

状元萧国梁、郑侨、黄定皆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氏,这被当地誉为"七年三度状元来",而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前三名依次被吉水(今江西吉安)考生胡广、王艮、李贯所夺得,可谓一邑雄冠天下两京十三省。

前三名的个中三昧 在通常情况下,历代主考官选定前三名或初拟名次进呈而由皇帝钦点一甲三人,固然遵循凭文而取、兼及身貌的准则在周而复始地运作,但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掺杂渗透进来,影响甚至决定着前三名特别是状元的最终确定,从而构成了下述各类异乎寻常的情况:

一是依从惯例处断。亦即:在职官员、官宦(包括主考人员)的子弟以及皇亲国戚等参加应试者,纵使殿试折卷后原拟第一,也不得定为状元,通常则与原拟第二名互易名次。如两宋就有十科是如此定夺的。其中孝宗乾道二年(1166)丙戌科,魁甲原为赵汝愚,因其属于宗室成员,便升榜眼萧国梁为榜首。萧氏就此特在谢启中说:"预飞龙之选,淮安论次以当先;无汗马之劳,酂侯何功而居上。"这里借用西汉淮南王刘安首次入朝献艺文及萧何始受功封的典故,褒赞赵汝愚才高学博,表达自己的愧受之意,兼颂朝廷圣明。这在今天来看,"设科以待草茅士,凡预属籍、挂仕版者,法当避避"的做法,还是带有合理性的。

二是以帝王的个人好恶为进退。如宋太祖每每对最先纳卷者赐状元及第,而开宝八年(975)乙亥科,进士王宗嗣与陈识在殿试中同时纳卷,互争状元,太祖竟命二人通过手搏斗力,决定名次,结果以胜者王宗嗣为第一,负者陈识为第二。宋太宗亲试进士,亦沿太祖之习,致使举人唯以敏速相夸示,助长了轻薄的风气。逮至淳化三年(992)壬辰科,文思本来敏速的李庶几率先纳卷,却被轰出殿外,而以"尤苦思迟"的孙何为第一,诚所谓矫枉而过正。

三是适应政治的特定需要。如明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惠帝虽因貌陋而降王艮为榜眼,但擢榜眼胡广为状元,更因当时正对燕王用兵,胡广殿试对策中适有"亲藩陆梁,人心摇动"之语,遂置第一,并赐名"靖"字以代"广"字。清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初拟全椒(今属

安徽)人吴曷第一,金山(今属上海)人戴有祺第二,海宁(今属浙江)人杨中讷第三。但鉴于"鼎甲久无北人",康熙帝便将大兴(今属北京)人黄叔琳亲自擢为探花,并改戴有祺为状元,吴曷为榜眼,杨中讷为第四名。再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科原拟状元为江南人赵翼,探花为陕西人王杰,因陕西在清朝此科以前未曾出过状元,又值西师凯旋即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之后 ,乾隆帝便定王杰为状元,赵翼为探花,借以显扬文治武功相济之盛。

四是基于维护人伦纲常。如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考官奏宋祁为第一名,宋郊(后改名庠)为第三名,两人系亲兄弟,而章献太后不欲弟在兄上,遂擢兄长宋郊为状元,转把宋祁列作第十名。这种调整,其幅度之大,可以说达到极限了,不啻由天入地。

五是经由辅臣固请而使自家子弟减等。如清雍正十一年(1733)癸巳科,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名列探花,张廷玉则坚执不可,雍正帝便把张若霭退置第四名,将探花改成了原第四名沈文镐。君臣之所以似此处理,《清史稿》说是:"诚重之也"。亦即向世上表明:鼎甲不可轻授,孤寒士子应优于官宦子弟,务从至公,使应试者更看到希望。

六是利用权力施加无形的影响。如张居正在明神宗即位之初独秉国政,其子于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落第,张氏便不再从及第进士中选取庶吉士,待到后两科(五年丁丑科与八年庚辰科),其子张嗣修、张懋修就相继被录取为当科榜眼或状元了,而神宗亦听之任之。这与清张廷玉和雍正帝之举,截然相反。

七是应试者投身权贵而借助其力径自干预甚至要挟。如晚唐陆扆,身事宰相崔昭度,得崔高度信任,连当科主考官委派何人充当都依从陆扆之请,榜帖竟全由陆扆自定,遂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丙午科状元及第。前此四十九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838),裴思谦因投靠大宦官仇士良,竟在礼部考试开始前携带仇士良书信一封迳入贡院,当面胁迫知贡举高锴必须录取他为本科状元,结果果然不差。这同高锴在上一年选定李肱、张棨、沈黄中为前三名的情形相比,无异天壤之别。

八是应试者巧撰谀文。如北宋蔡薿参加徽宗崇宁五年(1106)丙

戌科殿试，揣测出奸相蔡京会被重新起用，就在对策中极力攻击元祐、元符党人，由此擢为第一，其对策还被颁示天下。

九是应试者预知试题。如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甲辰科，状元由沈晦获得。该科殿试为《易》数之问，原是上一科(宣和三年)要出的策题，只因当时方腊起义正声震东南，议政者请求改试今日当务之急的内容，徽宗迫于形势，不得不将《易》数之问收存起来，留待下一科继续使用，而深得徽宗宠信的"六贼"之一、大宦官梁师成探知此意并获见此题，便将它透给了沈晦，沈晦于是得以早早拟就成稿，在甲辰科遂一举夺魁。

十是主考官甄选不公。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主考官刘三吾等在三月廷试后放榜，所录取者均系南方人，致使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告，朱元璋命再阅卷，增录北方人入选，但所呈北方人的试卷却都文理不佳，且有触犯忌讳的话语，于是有人上奏这是故意拿陋卷欺君罔上，朱元璋得奏大怒，严惩刘三吾等，原定状元陈郯、探花刘谔也遭遣戍。时至六月，朱元璋又亲自主持廷试，所录取者均为北方人，前三名是韩克忠、王恕、焦胜。于是本科乃有"春榜、夏榜"或"南榜"、"北榜"之称，后世则谓之为"春夏榜案"或"南北榜案"。

十一是主考官预作允诺。如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甲辰科，中书舍人李宗闵充任知贡举。此前九江郡太守向李推荐庐山隐士李群等四人，李宗闵当即表示，日后若真主持礼部考试，则以四人到京的先后顺序列为一至第四名。迨至本年果操文柄，试前还采取行动刺激四人出山应试，其中只有年届十八岁的李群赴京赶考，果真依照前言，录取他为状元。

十二是主考官先入为主。如礼部侍郎郑薰于唐宣宗大中八年(854)甲戌科充任知贡举，因当时徐州(今属江苏)发生动乱，便想激扬当年抗击安史叛军的颜真卿那样的英烈人物，适巧发现本科应试者中有人名叫颜标，便认为是颜真卿的后裔，随即定他为状元。其实颜标与颜真卿并不存在血缘关系，当时就有人作诗，对郑薰此举讥笑说："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十三是主考官心存偏爱。如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不仅

章献太后出自维护人伦纲常的需要，将宋郊由第三名升为状元，退状元宋祁于第十名，连第二名叶清臣，也是由于主考官刘筠对他答卷中的策论感到出奇而径予厝置的，开了宋朝进士单凭策论即被擢置高第的先例。

十四是主考官政见不同。如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甲戌科，初考官主要录取殿试对策中执持元祐旧政观点的人，而覆考官则专取主张恢复熙宁元丰新法的人，因而毕渐最终被擢为状元。为此苏辙还专门奏上了一道《论御试策题札子》，申论其事。

十五是所谓传衣钵。后唐主客郎中和凝于明宗长兴四年(933)癸巳科知贡举，应试者中有大名宗城(今河北威县)人范质。范质答卷引起和凝的高度赏叹，但却不取范质为状元，故意将他排定在第十三名，原因是和凝本人在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07)丁丑科以第十三名被录取，自己又一直朝做宰相在努力，也兼以此意对范质寄予厚望。于是状元另定他人(已失其名)。嗣后科场中根据和凝对范质当面讲的话："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便将这一做法称为"传衣钵"，意谓如同佛教禅宗递相以衣钵授付。殊不料和凝后来果然在后晋仕至宰相，范质也在后周继登相位。

上列十五种特殊情况的存在，均与主考官负责阅卷录取或初拟名次、报呈皇帝钦定的制度有关，更无一不是皇权至上的产物，政治支配的结果，儒家传统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现象，并同在位帝王及主考官的个人素质密不可分。它们从最高层面上表现出个别做法的可取性，也暴露出进士科取士的某些严重弊端。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这些非正常录取的前三名就统统文不可观，人不足取。再者从整体上来看，历代各科进士前三名大多为英年崭露头角或壮年名扬天下。这表明古典戏曲中常以月宫折桂作为矛盾冲突的最终解决手段或喜剧结局，是有历史依据的。

鼎甲卷的独特风貌

进士及第特别是夺得前三名的桂冠，既是举业的终点，又是仕途的起点，而依题作答的试卷则从根本上构成其连结点。因此为防止凭

文录取中有人作弊，自宋始行誊录法，即由书手将密封试卷抄录出副本，转送考官评阅。元明清时一律用红笔做誊录，故又称朱卷。例由众多的朱卷或誊录卷、径呈卷中被剥笋般精拣出来的鼎甲卷，“况当短晷之辰，颇尽论思之美”，还要符合格式、字数、避讳、书法等方面的要求，显然殊非易事，艰苦备尝，其独擅一时也就可想而知了。无怪乎或由朝廷编成专辑颁发，以供举子效仿；或经书坊印成专书售卖，以便士人揣摩；或被作者收入文集，以存其迹；或被选家载入总集，以广其传。一直到今天，仍可得见大观。

衡文总标准的薪尽火传　牢笼天下英才，为封建官僚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从而提高统治效能，这是科举尤其是进士科久行不废的根由所在。为此而明试以言，把理论素养和文化知识定为公认的录取标准，同时充分地体现出一姓王朝的意志与愿望，也就势所必至了。在唐代，则州郡以德行贡士，礼闱以文词拣才，试官以帖问求学，铨曹以书判择吏。到两宋，转而通过经义考其讲学之源流，凭借诗赋观其词章之润色，以“论”见其评议古今，以“策”试其通晓时务。明朝仍先之经义，旨在观其穷理之学；次论、表，旨在观其博古之学；终策问，旨在观其时务之学。清乾隆帝说得更明确：“今制四子书以正其途，五经以博其趣，八韵以觇其才，五策以征其实。”对殿试策问，宋高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所在：“欲使士人初入仕途，皆知趋向之正。”其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对王十朋的对策所做的批语：“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正是具体的注脚。尽管历代会试和殿试的衡文正鹄或有侧重，提法非一，但薪尽火传，并无二致，即：经义制艺须通经有文采，以词达理醇、清真雅正为尚；诗赋须洞识音律，华赡雅丽；论表须体裁高古，典正渊厚；对策须义理惬当，博洽明通，不矜浮躁，惟务直述。宋初更在《亲试进士条例》中特作规定，所试诗、赋、论各一篇，以“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为第一等。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十一)亦指明：“经书文取雅正，诗取清华，策对取切实敷陈，浮文妨要及诡异雷同者皆不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六)还强调：“场中作判，务宜随题剖断，引律明确，不专以骈丽为工。”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以文章为依托，从器识、学力、才华、世事、时政

诸方面构建起一个素质考察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标准，而贯注其中的那段精神命脉无不在于：崇经学，尊儒术。

试卷入选的关键因素　遵循上述的衡文总标准，历代应试者去博取功名，特别是锐意高中状元，跻身鼎甲之列，则诗赋虽名小巧，且须指题命事，若记问赅博，便辞理自精，平素道义积蕴胸中，方可英华喷发于外。经义所论，皆原圣人之意而立其说，则须参酌经史子集，方能越发开掘出闪光点来，紧向格式要求贴进，便会愈见体制精密。与此同时，必待词章淹洽，通晓律令，然后才能作表，判。具有论古之识和断制之才，并且通达古今，明习时务，然后才能写论、策。归根结底一句话：若"非精究博赡之才"，难应进士之选，更与前三名无缘。倘若六经悖戾章旨，诗赋失律逊色，议论昧于趋向，对策专于套类，以穿凿为奇，以怪僻为异，引佛典之说，援法家之论，则名落孙山。且看明朝《文字格式》的敕令：作文"不许用浮华险怪之辞"，若发现"似前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文，必加黜落，仍听考试官摘出。不写经传本旨，不循体制，及引用《庄》、《列》背道不经之言，悖谬尤甚者，将试卷送出，以凭本部指实奏请除名，不许再试。"这还限于入选之前，防患于未然。而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已被取为会元的程可则，亦"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也一并治罪。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对照中，足见试卷能否入选，关键还在于应试者的基本素质和素养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和生活年代里究竟达到了何等境地(请托舞弊终究还在其次)。而鼎甲卷也委实摆落众作，独占鳌头，表现出前三名的较高素质和素养，最切合衡文总标准，成为应试文章的典范之作。这在考官的批语中更能得到具体的印证。

考官对鼎甲卷的批语　考官肩负着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历经简选才得以充任，其在阅卷中虽不免仁智互见，但毕竟有衡文总标准悬示在那里，殊难出其范围之外。换言之，即使心存偏见甚至暗作手脚，在整体上也终归要做衡文总标准的贯彻执行者和落实者。鼎甲卷实际上经由他们之手初步筛选出来，而其批语，也最能说明问题。以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而论，考官对本科前三名会试卷的批语依次为：

、状元陆增祥，“首场：首艺曲折奥衍，不令人一览而尽，而行文之乐仍如水到渠成；次、三工于烘托，遂觉耳目一新。诗，庄雅工丽。二场：《易》引用赅洽，发挥酣畅；《书》用训诰体，宏深肃括；《诗》妙切；祭祀（指《礼记》文）属对精工；《春秋》以‘礼’字作骨，穿插入妙，礼专主武库（指《春秋经传集解》作者西晋杜预），立言亦能自完其说，每股于典核中见精炼。三场：五策整散兼行，组织之中仍见条对，洵推博雅。”

榜眼许其光，一场首艺“英爽之概迥不犹人，次、三俊伟光明，情文并至，诗工稳。二场选言宏富，典赡风华，礼艺运用剪裁，尤觉藻思绮合。三场征引富赡，考证详明，尤有断制剪裁之妙。”

探花谢增，“华烛腾芒，蒲钟振响，据神渊而吐溜，播灵液以蒸云。蹑窟探根，其理彻也；攻坚破的，其思精也。次则锦绣胸罗，蔚蓄凤翔鸾之采。三则杼机手握，擅神驹灵雀之奇。绍诗学于宣城（指南朝谢朓），韵铿金石（按，以上谓首场）；师经神于高密（指东汉郑玄），才富缥缃（按，以上谓第二场）。五策编珠彪炳，奏万言之牍（按，以上谓第三场）。三场完璧麟玢，彰十色之华。”

在本科上一科，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状元为张之万。其弟张之洞至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被录取为探花。考官对这兄弟二人会试卷的批语又先后是：张之万“第一场：三艺金石千声，云霞万色，油然经籍之光。诗春容大雅。第二场：宏深肃括，汉儒说经之遗。第三场：不矜条对，持论名通。”张之洞则“第一场：词义精卓，笔意稳炼。次畅满，三后二比（股），遥吟俯唱，声采俱佳。诗雅饬。第二场：典博奥丽，古色斑斓。《书》艺前路推波助澜，层层翻跌，于汉唐以来制赋得失同异，洞见原委，具征学有根柢，不徒以獭祭为工。第三场：征引赅洽，笔有断制，视捋扯饾饤两家迥别。”

承此而下，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考试，考试内容业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录取的状元为刘春霖，其会试卷得到的批语乃是：“第一场：论古有识，思力沉挚，笔情清矫，纵横出没，变化从心。第二场：熟悉洋势，言之凿凿，词意透辟。第三场：议论驰骋，茹古涵今。”

以上六通批语，虽非适就“会状联元”的会试卷而发，也颇具代表

性。尽管它们褒赞的方式不同，程度有别，但都围绕着既定的衡文总标准在出此入彼，举要发凡，贯穿着封建王朝对应试者进行素质考察的基本精神，透泄着浓重的台阁气，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鼎甲卷的总体特色，并且表明因文而异，各有更为具体的讲求。

诗赋的律协词美 凡进士应试之诗，通常被称作试帖诗，赋则谓之律赋。唐宋省试及宋初御试之诗，多用五言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的排律，清代会试则悉用八韵，且题目前一律冠以"赋得"二字，表示摘取前代成句为诗题，诗题之下，列示所拈得的韵脚用字。此字务在首联或次联押出，不可更换。试帖诗首重声律工细，即必须符合平仄、对偶、押韵的规则，为此要句锻字炼，也讲究结构完密，首尾通贯，无论咏物叙事，都要直接或间接地颂扬当朝天子的盛大功德和太平景象，显现出一种典雅富丽的风格，即所谓"华实兼举"。例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于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考中状元，本科会试诗题为——赋得游鳞萃灵沼 得"灵"字，五言八韵。其所作诗如下：

凤诏翘林切，龙池咏藻新。贤如鳞并萃，民谓沼为灵。

共领潜渊趣，先呈纵壑形。三千春浩荡，卅六影珑玲。

鲂岂歌南国？鲲非化北溟。同依文囿广，奚羡禹门经！

李善笺名绎，潘尼雅什聆。几余精选理，咸若颂彤廷。

此诗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八联皆对仗，在次联押出所得"灵"字官韵。对这首试帖诗，房考官加批为："雍容华贵，雅近唐音。"总批为："制诗缉《颂》，有云霞蒸蔚之观；抗《雅》扬《风》，皆冰雪聪明之语。"于此可见试帖诗的庙堂化的真谛所在了。

律赋和试帖诗一样，也属韵文，但它以韵散间出、半诗半文的形式出现，比六朝骈赋更为讲求格律，并被定作程式。不仅要求对仗愈加工整，平仄必须谐和，而且限定韵脚用字。韵脚用字自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甲寅科始有八韵，即《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也就是用四言两句八字限韵，要求应试者把这八个字嵌入赋中，在应该押韵处分别选用与这八个字同韵部的官韵字来押韵。在此科前后，也有限用三字韵至七字韵的。到唐文宗太和以后，乃以八韵为常，并在平仄上规定为四平四仄；逮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

日，诏命八韵平仄相间，依次而用。这在押韵的顺序上又比唐及五代越发整齐划一，彻底取消了尚且可以把八韵折开、前后颠倒使用的自由。由于限制越来越严格，所以律赋关键在于音律和协，对偶精切，而剪裁融化典故以及藻饰反居其次。至于内容与立意，也由赋题和八韵给框定住了。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御试《有物混成赋》，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此八韵非独平仄相间，亦为撰写本赋所要着力阐发的主题思想之所在。本科状元王曾的试卷循此去作，当时文坛领袖、知制诰杨亿得见后，把他赞许为"王佐器"，王曾后来也官至宰相。此事到南宋仍在臣僚关于进士考试的奏疏中被引作例证，充分说明了八韵对律赋的重要作用。早在唐代，德宗贞元十年(794)甲戌科试《风过箫赋》，以"无为斯化、有感潜应"为韵，榜眼范传正之作甚显清丽，被词林所讽诵。十二年(796)丙子科试《日五色赋》，以"日丽九重、圣符土德"为韵，状元李程之作造语警拔，也极受士流推重。律赋总起来看，要比试帖诗略胜一筹，字数上也有一定的限制，一般不超过四百字。迄元改试古赋，规定用古体，律赋遂一蹶不振了。

经义的体正、理精、词达　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始试经义，便规定此类文章要通经且有文采，亦须得体。《宋文鉴》所存录的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探花张庭坚的两篇经义——《惟几惟康其弼直》和《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俱属《尚书》义，分别出自《皋陶谟》、《微子》，均被誉为不可磨灭之文，其实已开明清八股文的先声。元代依旧摘取五经文句为题，但把《四书》单独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并严格规定，必须主要依据程朱理学的观点指导作文，形式上则不拘格律，以"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由此完成了向明清八股文的过渡。明初至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神宗万历时还在申饬："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年间文体。"清初至乾隆时期，又对八股文从体式、格调、字数等方面续加规范。

八股文相对于古文亦称时文；由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通称制义或制艺；仅从形式上着眼，又称八比文。股或比，均为排偶之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及大结等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散行文字，把题目的要旨揭示出来。承题是承接破

题的意义，加以引申说明。起讲是开始议论，浑写题意而笼罩全局。入手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作用是从上文引到本题。下自起股到束股，才展开正式的议论，又以中股构成全篇的重心。在这四股即四个段落中，各自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而每一股的句数并无固定的限制，但每句的长短、字数的多少、声调的缓急，均须相对成文，合共八股。大结则是全文的结束语，可以发挥己意。由于明人大结每每涉及时事，多触忌讳，至清废去，改以三、四句收束，谓之收结或落下。此外，在四股之间，或用一两句转折过渡，称为过接。

八股文由体用排偶而得名，但却不取四六句式，不讲押韵，不求词藻华丽，因而非为骈体文，乃是一种古体散文同骈体辞赋合流所形成的议论性的专门文体。议论不只是依从程朱等几家的注解来阐发所试经文的精微义旨，还要模拟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从明清历科会试试题和鼎甲卷来看，所立之言集中在治身、治心、治国、治天下的原则与方法上，由此凸现了四书五经的主体内容和儒家理论的核心及其网上纽结之所在，也使理学观点得到强化，起到统一并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与此相适应，议论中更讲究题意的发挥，章法的安排，修辞技巧的运用，境界的开拓，文气的拟设，格调的定立等。用清代考官们对鼎甲卷的批语来说，就是“以理驭题，以慧炼识，以巧寓思，以博征材，以雕镂谐微，以形容尽饰”，达到“理彻意精、气清神完、局畅脉真、法密机圆、语粹词沛、虚实兼到”的地步，从而符合天子“清真雅正”的总要求，如此方为制艺的上乘之作。纵使同为上乘之作，四书义仍居五经文之先，这是因为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的缘故。

论、策的以真学问为真经济 这里所谓经济，是经邦济世的略语。仅据《宋会要辑稿·亲试》所载太宗至仁宗二十七道殿试论题略作分析，政论则十居五六，经论乃十居三四，余为史论。明代会试试题，更以君道为主，显示出政论与经论紧密结合的趋向。清代会试论题又限定在《孝经》以及明官撰《性理大全》和清敕编《性理精义》的范围以内。凡作论，均须依题发明大义，得其肯綮，体裁高古，词理明畅。这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科榜眼田锡的《登讲武台观兵习

战论》、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榜眼王锡爵的《人君其尊如天论》、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探花钱谦益的《圣王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论》中,可见一斑。

策题则重在当世之务,兼及经史或特定事项,每于疑似之间发问,带有质疑问难的性质。唐代犹用骈文,宋以后改用散文,进士对策的文体也随之而变。白居易和元稹为应试曾编《策林》,致有"策头、策项、策尾"的结构区定。明太祖在内容要求上讲得更干脆:"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对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明孝宗则严禁答策"引用缪误杂书,其陈及时务,须斟酌得宜,便于实用,不许泛为夸大及偏执私见。"清至同治元年(1862)仍降谕:"三场策问以经史与时事分问,使贯穿古今、通达治体者,得以敷陈政事得失利弊以及筹饷用兵之道。其言果有可采,不必责以忌避,亦不得绳以小疵。"光绪在科举废止前夕还在诏命:"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行剿窃。"把明清和上溯到宋唐的官方规定综括起来,历代对进士对策都注重明达治体,娴习时务,博古通今,具有裁断和见识。既要义必求归,词必己出,又要征引繁富,条辨详明。殿试对策于此之外还强调鲠亮切直,悉意陈说。一方面勿畏勿隐,勿拘勿讳,勿谀勿欺;另方面勿泛勿略,勿迂勿激,勿剿勿猥。总之一句话:策、论要"以真学问为真经济",确能用作施政的参考。

至于会试策问对策与殿试策问对策的关系,从保存至今的明太祖至神宗的原始策题和鼎甲答卷来看,二者在内容上是各有侧重又略相交叉的。殿试综合性强一些,宏观性的东西多一些,而会试则专指性强一些,微观性的东西多一些,彼此相辅而相成。

殿试对策的独到之处 从宋神宗一直到清光绪历科的殿试策问,呈现出一种效仿《尚书》诰体并字数增多的趋势,这在清代尤为突出。而进士的对策,尽管篇幅长短因世而异,但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格式化的写法。宋代是把策问原文按层次分解开,逐层递加引录,然后予以对答,详加陈说,直至完篇,少则四、五千言,多则七、八千言,乃至万言以上。明代大多特就策题专以总论性的文字开篇,转而颂扬当朝天子,概括策题要点;接下来逐条作答,常引唐虞三代之盛和太

祖、成祖的事功成法为证，穿插汉唐宋的情况，落实到现状；最后用篇终“别献”（类似统括语）及祈请之词，结束全文。字数由两千字至五千字不等，最短者尚不及一千五百字，最长者上万字，俱属特例。清代基本上仍在明代的既定框架内盘旋，不同之处在于：自乾隆后期起，每于起首处径引经文为据，至嘉庆十六年（1811）以后，多数又变成摘取经典字眼，缀合为排比句，此其一。其二，结尾处用“凡此者”或“若此者”等承上启下之词，转入简要总结和祝祈，并一律用“臣草茅新进”云云收笔，这是由乾隆帝于即位第四年（1739）议准，“以昭画一”的。嘉庆八年（1803），因为允许宗室成员应试，又特旨将“草茅新进”四字改作“末学新进”。其三，条对中减少了法祖的文字，增多了颂扬当朝天子的词句。其四，通篇行文趋于整练，一般都保持在两千至两千二、三百字之间。

殿试对策自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起，既决定着考生能否登科，又决定着本人的等级名次，状元、榜眼和探花也据此产生，实属政见和学识的激烈角逐，自然也成为全力结撰之作，因而在内容上崭现出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迸射出政治智慧的簇簇火花。诸如：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阐发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法，内圣外王之道，以及慎初克终，树纲立纪，文武并用，宽猛相济，勤政爱民，安内攘外和变法的依据，中兴的大计等。在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纵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执政大纲与施政万目的关系处理，古先帝王的要务，历代名臣的方略等。在经济领域，陈述重农课桑和屯田垦殖的措施，征收赋税与宽舒民力的办法，理财裕国和货币流通的途径，储粮救荒与治水通漕的对策等。在政治领域，直言帝王应具备的驾驭天下的素质与修养，礼乐政刑的施布顺序，崇俭防奢的倡行，人才的选拔与官吏的考核，吏治的整顿和贪污之风的遏制，刑罚的慎用与基层统治的强化，以及防范异族内侵和抵御外侮等。在军事领域，进奏边防和军政的谋略，涉及到选将练兵、器械装备、关防江防与海防，边疆地理分布形势，兵饷筹措与军中赏罚，水师建置和兵民关系等。在文化教育领域，备论士风的扭转，民俗的化导，学校的兴办，教官的遴选，以及史学体裁和诗文

标准等。举凡这一切，均被帝王递次在策问中分别视为立政之先务，经国之要道，致治之良规，保邦之远猷，适可证明殿试鼎甲对策在全部试卷中是最富政治意义的。它们虽或申明成说，但也不乏灼然之见。如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状元马世俊的对策就提出了取消满汉等级区分的主张，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二是腾涌出忧患意识的层层波澜。以名垂青史、二十岁便高中状元的文天祥而言，在对策中以刚健不息的精神激励坐在火山口上的宋理宗，剖析人才匮乏、兵力疲弱等八大问题的因果关系与连锁反应，倡言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情词恳切，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一股忠贞之气流溢在字里行间，致使覆考官、大学者王应麟对这篇长达万言的答卷启奏为："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无独有偶，家贫苦读的罗伦，于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被擢为状元，此时明朝已滑向衰落阶段，其殿试对策也字逾万言，其中对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百姓被盘剥得流离失所、周边地区动荡不安的现状和弊政指摘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并告诫宪宗切勿被歌舞美色、奇珍异物、土木工程、田猎游乐、求仙拜佛、谀言媚态所诱惑。那种忧国之思溢于言表，革弊之念跃然纸上，当时就名震京师。后来宰辅李东阳还为这篇对策特作评点，激赏有加，直至把罗伦誉为西汉贾谊(其《治安策》名传千古)的"后身"。与文天祥、罗伦二人相类似的鼎甲对策不一而足，在南宋更可谓层现迭出。这也是封建王朝从长治久安出发，加以鼓励的结果。能把此等作者置于前三名之列，推上状元的位置，即为最好的证明。

鼎甲卷的客观价值　综上所述，由诗赋、经义、论、策特别是殿试对策为主体而组成的历代鼎甲卷，鲜明地闪烁出帝王文化的强烈色彩，弥漫着帝王文化的浓厚气息，浸透着帝王文化的本质内涵，构成了帝王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们反映出唐以后各个帝王在位期间所面临的现实焦点问题，所关注的历史议题，所倡行的道德规范，所要解决的大政要务；映现出每一王朝由创建、兴盛到衰亡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大势和历代盛衰的总体进程；昭示了最高统治集团吸纳官僚生力军和后备军的统一标准、必备条件与基本精神，凸现了占居独尊

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和理论支点;影响到不同时期的文风的形成与变化,促进了"雅言"、"官话"(似今普通话)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增进了南北各地及华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其积淀之久,幅射之广,作用之异,都是自成一格的。堪称唐至清社会矛盾的一个写照,历史动态的一个缩影,官僚队伍建设的一个中心画面,文化气象的一个特写镜头。

还须明了的是,历代鼎甲卷径自折射出了学校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学校本为培育输送人才的场所,科举取士则属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制度。生员结业后,并不能直接从学校那里寻找到出路,要想从政为官,只有走科举的道路。这样一来,科举便形同指挥棒,逐渐凌驾于学校之上。而取士的标准就在无形中成为学校的培养目标,考试的内容也成为学校的教育内容。换言之,学校从培养目标、教育内容、考试方法等方面,都以适应科举的需要为转移,沦为科举的附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鼎甲卷正是当时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验证标尺,代表了其最高水平。

鉴于历代鼎甲卷本身所固有的客观价值,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志同道合的中老年学术同仁(正副教授或正副研究员),在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译了这部《中华状元卷》。由于历代三场(或四场)之试,唐及宋初决定录取与否,实在诗赋;元明清则以首场为重,首场又以四书艺为重;殿试更决定等第名次,所以流传至今的鼎甲卷主要是诗赋、四书义和殿试对策(数量最多),但已均非全帙了。其中辽金竟成空白,元代则寥若晨星。故而将全书分为唐宋明清四大部分。唐宋鼎甲卷缺佚也很严重,凡留存者概予收载。明清相对完整,自咸丰后则仅取状元卷;会试试帖诗均不录。旨在借此凸现出历代进士科的基本面貌、主体部位、演化链条和精髓所在来。答卷依题而作,题为答卷指针,凡唐代省试和宋以后殿试(含辽金元)犹存之题,虽答卷已佚,并做辑存(主要依据清徐松《登科记考》、《宋会要辑稿》、元人文集和明清《实录》等),编列于各部分之后,庶窥全豹。宋代殿试自神宗改以策问和对策,实际上是把唐至北

宋中期兴行的制科考试内容移植到进士科内，用以取代诗赋论。为沿流讨源，且制科第一名在唐代亦被称作状元(详见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唐宣宗大中五年")，兼以唐中宗以前的制科策问与对策同进士策问与对策仅限于道数不同(前者三道，后者五道)，内容上并无显著的区别，适可相互做比较，故在《大唐状元卷》内采列制科前三名特别是第一名题、卷俱全的原始文献。对本书选入的所有原始文献，均作今译。今译努力在"信、达、雅"的统一上勉为其难，以便雅俗共赏。全书之末，则附录《唐至清进士科前三名暨会元一览表》、《正续文献通考历朝登科记总目汇编后案》，以利研读。

在本书编译的全过程中，全部初稿始由主编轮流审阅(包括原文标点、分段、今译等)，复又责成杨寄林进行了统稿工作。其间承蒙著名历史学家、古籍整理大师王树民先生，著名教育学家、博士生导师王炳照先生欣然出任本书学术总顾问，由始至终给予了热情鼓励与全面指导。王炳照先生还特意命笔赐序。与此同时，山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亦从内容甄定、体例安排、文字修订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谨此一并深表敬意，特致谢忱。由于我们水平终竟有限，书中容或出现疏漏甚且谬误之处，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杨寄林

二〇〇〇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 (1)

进士科的演变轨迹 ……(1)
考试程序的增扩 …… (1)
考试内容与方式的调整 …… (3)
命题和阅卷规则的严密化 …… (8)
录取名额的扩大和渐趋均衡 ……(11)
对登第者待遇的提高 ……(13)
转折点之所在 ……(15)

前三名的来龙去脉 …… (16)
前三名的归于钦定 ……(16)
状元之称的由来 ……(19)
从榜眼到探花 ……(20)
会元与状元的关系 ……(20)
三元及其他 ……(21)
前三名的个中三昧 ……(22)

鼎甲卷的独特风貌 …… (25)
衡文总标准的薪尽火传 ……(26)
试卷入选的关键因素 ……(27)
考官对鼎甲卷的批语 ……(27)
诗赋的律协词美 ……(29)
经义的体正、理精、词达 ……(30)
论、策的以真学问为真经济 …… (31)
殿试对策的独到之处 ……(32)
鼎甲卷的客观价值 ……(34)

◉ 大唐状元卷 ◉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丁亥科 …… (1)
进士试题 …… (1)
策进士问二道
上官仪 对用刑宽猛策 …… (2)
对求贤策 …… (4)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丙午科 …… (6)
进士试题 …… (6)
策进士问二道
张昌龄 对高洁之士策 …… (7)
对刑狱用舍策 …… (8)
田 备 对高洁之士策 …… (10)
郝连梵 对刑狱用舍策 …… (11)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己卯科 …… (15)
制科试题 …… (15)
临轩试应岳牧举人问(口试)
员半千 应诏对岳牧举人问(口答) …… (15)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甲申科 …… (17)
制科试题 …… (17)
策词标文苑科问
房 晋 对词标文苑科策 …… (18)
皇甫琼 对词标文苑科策 …… (20)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乙酉科 …… (23)

进士试题 ……(23)
九河铭
高松赋
策进士问五道
吴师道 对政理策 ……(27)
对求贤策 ……(29)
对祥瑞策 ……(30)
对五运策 ……(32)
对历代帝王为理策 ……(33)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戊子科 ……(35)
制科试题 ……(35)
策词标文苑科问三道
张 说 对词标文苑科策 ……(38)

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己丑科 ……(47)
制科试题 ……(47)
策贤良方正科问二道
张柬之 对贤良方正策 ……(49)

武则天长寿三年(694)甲午科 ……(57)
制科试题 ……(57)
策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问三道
薛 稷 对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策 ……(59)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乙未科 ……(67)
制科试题 ……(67)
策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科问
张 漪 对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策 ……(68)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丙申科 ……(74)
制科试题 ……(74)
策应封神岳举贤良方正科问三道
重试一道
崔　沔　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 ……(77)
对重试 ……(84)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丙午科 ……(89)
制科试题 ……(89)
策才高位下科问
冯万石　对才高位下策 ……(89)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丁未科 ……(92)
制科试题 ……(92)
策贤良方正科问二道
苏　晋　应贤良方正科对策 ……(94)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壬子科 ……(105)
制科试题 ……(105)
策文可以经邦科问
策道侔伊吕科问三道
郑少微　对文可以经邦策 ……(106)
张九龄　应道侔伊吕科对策 ……(108)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甲寅科 ……(114)
进士试题 ……(114)
旗赋
制科试题 ……(114)

策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问
李 昂 旗赋 …… (115)
孙 逖 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对策 …… (117)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己未科 …… (124)
制科试题 …… (124)
策文词雅丽科问
邢 巨 应文词雅丽科对策 …… (125)
苗晋卿 应文词雅丽科对策 …… (130)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辛酉科 …… (136)
制科试题 …… (136)
策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问
杨若虚 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对策 …… (138)
张仲宣 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对策 …… (145)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丙寅科 …… (152)
制科试题 …… (152)
策贤良方正科问
袁 映 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 …… (153)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戊寅科 …… (161)
进士试题 …… (161)
拟孔融荐祢衡表
明堂火珠诗
崔 曙 明堂火珠诗 …… (161)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甲午科 …… (162)
制科试题 …… (162)

策洞晓玄经科问
独孤及 对洞晓玄经策 …… (164)

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乙卯科 …… (170)
进士试题 …… (170)
五色土赋(上都试)
日观赋(东都试)
龟负图诗(东都试)
丁　泽　日观赋 …… (170)
龟负图诗 …… (172)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丁巳科 …… (173)
进士试题 …… (173)
通天台赋
黎　逢　通天台赋 …… (173)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己未科 …… (175)
进士试题 …… (175)
寅宾出日赋
花发上林苑诗
王　储　寅宾出日赋 …… (175)
花发上林苑诗 …… (177)
周　渭　寅宾出日赋 …… (177)
花发上林苑诗 …… (179)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庚申科 …… (181)
制科试题 …… (181)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姜公辅　对直言极谏策 …… (182)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乙丑科 …… (189)
制科试题 …… (189)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穆 质 对直言极谏策 …… (191)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辛未科 …… (206)
进士试题 …… (206)
珠还合浦赋
青云干吕诗
尹 枢 珠还合浦赋 …… (206)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科 …… (208)
进士试题 …… (208)
明水赋
御沟新柳诗
贾 棱 明水赋 …… (208)
御沟新柳诗 …… (210)
陈 羽 明水赋 …… (211)
御沟新柳诗 …… (213)
欧阳詹 明水赋 …… (213)
御沟新柳诗 …… (215)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甲戌科 …… (217)
进士试题 …… (217)
风过箫赋
范传正 风过箫赋 …… (217)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丙子科 …… (220)
进士试题 …… (220)

日五色赋
春台晴望诗
李　程　日五色赋 …… (220)
春台晴望诗 …… (222)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己卯科 …… (224)
进士试题 …… (224)
行不由径诗
封孟绅　行不由径诗 …… (224)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庚辰科 …… (226)
进士试题 …… (226)
性习相近远赋
玉水记方流诗
策进士问五道
吴　丹　玉水记方流诗 …… (229)
郑　俞　性习相近远赋 …… (230)
玉水记方流诗 …… (231)
白居易　性习相近远赋 …… (232)
玉水记方流诗 …… (234)
进士对策五道 …… (235)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丙戌科 …… (244)
制科试题 …… (244)
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问
元　稹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 (246)
韦处厚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 (258)
独孤郁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 (269)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戊子科 …… (281)
制科试题 …… (281)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甫湜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 (283)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庚寅科 …… (301)
进士试题 …… (301)
洪钟待撞赋
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诗
陈彦博 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诗 …… (301)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丙申科 …… (303)
制科试题 …… (303)
策茂才异等科问
杜元颖 对茂才异等策 …… (305)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辛丑科 …… (316)
制科试题 …… (316)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庞 严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 (318)

唐敬宗宝历元年(826)丙午科 …… (330)
制科试题 …… (330)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舒元褒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 (332)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戊申科 …… (349)
制科试题 …… (349)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刘　蒉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 (351)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丁巳科 …… (374)

进士试题 …… (374)

琴瑟合奏赋

霓裳羽衣曲诗

李　肱　霓裳羽衣曲诗 …… (374)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癸亥科 …… (376)

进士试题 …… (376)

风不鸣条诗

卢　肇　风不鸣条诗 …… (376)

唐五代十国进士暨制科试题辑存 …… (378)

◉ 大宋状元卷 ◉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科 …… (414)

御试试题 …… (414)

不阵而成功赋

二仪合德诗

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

田　锡　不阵而成功赋 …… (414)

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 …… (416)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 …… (419)

御试试题 …… (419)

有物混成赋

高明柔克诗

君子黄中通理论
王 曾 有物混成赋 …… (419)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 ……(422)
御试试题 …… (422)
德车结旌赋
宋 庠 德车结旌赋 …… (422)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丙戌科 ……(425)
御试试题 …… (425)
戎祀国之大事赋
形盐象武诗
两汉循吏优劣论
刘 敞 戎祀国之大事赋 …… (425)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癸巳科 ……(428)
御试试题 …… (428)
圜丘象天赋
吹律听军声诗
乐本人心论
郑 獬 圜丘象天赋 …… (428)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丁未科 ……(431)
御试试题 …… (431)
公生明赋
许安世 公生明赋 …… (431)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 ……(434)
御试策题 …… (434)

黄　裳　廷对策 …… (435)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 …… (451)
省试试题　经义 …… (451)
惟几惟康其弼直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
张庭坚　省试卷二道 …… (451)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戊申科 …… (457)
御试策题 …… (457)
胡　铨　廷对策 …… (459)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 …… (500)
御试策题 …… (500)
张九成　廷对策 …… (502)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 …… (533)
御试策题 …… (533)
汪应辰　廷对策 …… (535)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 …… (554)
御试策题 …… (554)
王十朋　廷对策 …… (555)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 …… (588)
御试策题 …… (588)
叶　适　廷对策 …… (589)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 …… (613)
御试策题 …… (613)

卫 泾 廷对策 …… (614)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 …… (636)
御试策题 …… (636)
陈 亮 廷对策 …… (637)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己未科 …… (650)
御试策题 …… (650)
魏了翁 廷对策 …… (652)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 …… (670)
御试策题 …… (670)
徐元杰 廷对策 …… (671)

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 …… (697)
御试策题 …… (697)
姚 勉 廷对策 …… (700)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 …… (743)
御试策题 …… (743)
文天祥 廷对策 …… (745)

宋辽金元进士科御试试题辑存 …… (779)

◉ 大唐状元卷 ◉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丁亥科

进士试题

策进士问二道

问：狱市之寄，自昔为难，宽猛之宜，当今不易。缓则物情恣其诈，急则奸人无所容。曹相国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韦弦折衷，历代未闻，轻重浅深，伫承嘉议。第一道

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凭资于累迁！盖道有攸存，时无可废。爰暨浇讹，必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袭，遂成标准。今圣上务切恳旌，心摇启繇，虽衣冠华胄已乔迁于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遥集于魏鼎。岂英灵不孕于山泽，将物理自系于古今？无蔽尔辞，切陈其致。第二道

提问：把审理案件和解决集市交易纠纷托付给继任者，自古以来就是一桩很难办的事情。宽大与严厉做到恰如其分，到现在也不容易。过于宽大的话，人心就会毫无顾忌地施展那奸诈；过于严厉的话，奸恶的人就该全部杀头。这正是西汉丞相曹参对继任者反复叮嘱的原因，也是西汉担任代理廷尉史的路温舒长长叹息的由来。像战国西门豹佩带皮绳来告诫自己不可性急，董安于佩带弓弦来告诫自己不可性缓，从而达到恰到好处的地步，多少代以来，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司法官员。对于施用刑法轻重浅深的问题，殷切等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的良好建议。第一道

提问：在黄河的棘津渡口靠卖食物为生的姜尚，一下子就登上了周文王的辅臣高位，并非是把那晋升的凭借作为阶梯。在莘国郊野从事农耕的伊尹，猛然间就担任了商汤的国相，又哪里是依仗那经过几次升迁的资历！这是因为职官制度具有该明摆在那里的条文规定，可时势的需要却不能让他们错过去。等到进入了后世衰落的时代，对官员的提升必定要按照级别的高低顺序，先把在同一级别的人统统包括进来，然后就在这个范围内提拔较为突出的人，全都递相照这样去办，于是就成了固定不变的准则。如今圣明的皇上对高悬旌旗来征聘贤才非常关注，心里对察视国运绵长的卦兆文辞十分向往。尽管出身高贵的人士已经被选拔到文武百官的行列，可在隐居处所不出世的隐士却很少能在朝廷的重要职位上成串地聚集。这难道是英杰人物根本就在山林草泽诞生不出来，或者是事物的道理原本上就与古今的变化紧密相连呢？不要隐瞒你们想说的心里话，切要地陈述那极致所在。第二道

上官仪　对用刑宽猛策

上官仪(约608～664)　字游韶，陕县(今属河南)人。贞观元年(627)进士第二，时年20岁左右。后任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等职。高宗时被武后所嫉恶，又被告发同废太子李忠通谋，死于狱中，家被籍没。其精于五言诗，形成婉媚工整的风格，世称“上官体”。原有集，已失传。

对：攘袂九流，披怀万古，览玉篆之奥义，觌金简之遗文，睹皇王临御之迹，详政术枢机之旨，莫不则乾刚而张礼乐，法霆震而置威刑。纵使轩去鼎湖，非无涿鹿之戮；舜辞雷泽，遂有崇山之诛。自皋陶不嗣，忿生长往。甫侯设法，徒有说于轻重；子产铸书，竟无救于衰败。是知风淳俗厚，草艾而可惩；主辟时昏，黥凿而犹犯。我君出震继天，承图宰化，孕十尧而遐举，吞九舜而上征。犹以为《周书》三典，既疏远而难从；汉律九章，已偏杂而无

准。方当采韦弦于往古，施折衷于当今。若能诏彼刑章，定金科之取舍；征其张赵，平丹书之去留。必使楚国受金，不为庄生所责；长陵盗土，必用张子之言。谨对。

对答如下：对各种学说勤加研讨，把历代史迹装入胸中，观览天降秘籍的深奥义旨，查阅神赐书册的遗留文辞，考察称皇天下和称王天下的人在位执政的轨迹，辨明施政方法的关键之处的宗旨，没有谁不去效仿皇天的刚健不息而张布礼乐教化，取法雷霆的震撼万物而设置兵刑威慑的。即使像黄帝在鼎湖成仙登天，也不是没有在涿鹿对蚩尤的擒杀。虞舜从雷泽接受完唐尧对他在仁德化导方面的考验登上帝位，于是就有把大罪人欢兜流放到崇山的惩罚。自从像虞舜时皋陶那样的司法官不再出现，人们就互生忿恨而一直争斗不止。对此西周的甫侯制定法律，可也只是在轻判重判上做了一点儿说明；春秋郑国的子产铸造刑书，最终对衰败也没有什么补救。由此可知：社会风尚淳朴厚道，即使在罪犯的帽子上加上草带当作割鼻子的刑罚，截去罪犯衣服的蔽膝当作破坏生殖器官的刑罚，也可以起到惩戒的作用。如果君主邪僻，世道黑暗，就是真动用刺面之类的肉刑，人们还是触犯王法。我大唐英君在东方像春雷那样化生万物，承继皇天，奉受天书神册，主宰一切变化，包纳了十个唐尧的德业而远远地播扬开来，吞并了九个虞舜的功绩而向前扩展。但仍然认为《周礼》制定的轻典、中典、重典这三种刑典，已经很疏略遥远，难以依从了。汉朝制定的九篇法律，也偏颇驳杂，没有固定的准绳。正应该从古代那里吸取恰如其份的做法，在当今施行不偏不倚的原则。如果能够特就刑法颁布诏令，对不可更改的国家律条加以调整，使它完善起来；再起用西汉张敞、赵广汉那样的贤能太守，公正地判决春秋晋国奴隶斐豹的罪状记录书该不该烧掉的那类案件，就必定会使楚国用千金请求庄子制止住击剑斗杀的事情，不再受到庄子对这类事情的指责了。发生了在皇陵盗取土石的案件，一定要按照西汉廷尉张释之依法判刑的主张来做审理。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求贤策

对：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道叶冥通，类霜降而钟鸣，同云蒸而础润。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应之若转规，用能感会一时，抑扬千古。是以沉鳞暂跃，遂游泳于天汉；坠羽才迁，乃腾骧于日陆。弘心体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谋，义列丹青，德融金璧。迨乎时钟季叔，化渐浇讹，拔萃之惠罕流，因地之阶愈笃。使西都金子，奕叶称荣，东国袁生，八公为贵。廷尉之明穷识理，十载无知；黄门之妙极 摛文，八迁宁进。徒使干星秀气，永翳穷尘，照庑奇光，长湮幽石。自可循风市马，袭轨画龙，三反不亏，七年无废。迳迳束帛，指邱园而毕陈；翘翘车乘，望林泉而载辖。则材标海若，雾集丹墀，德表星精，云飞紫阙。岂直高尚之士，遥集于台司；衡泌之俦，乔迁于鼎职！谨对。

对答如下：像少皞氏那样的君德正十分亨通，但也必定要依靠英才的辅助。杰出的奇士尚未得到聘用，实际上有待贤明君主的识拔。这一方已经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去等待那适当的时机；那一方也敞开胸怀，来对待那急需的人物。双方没有不在事理上同灵妙的感应相符合的，也没有不在大道上与幽冥中的融通相协调的。这就类似那寒霜降下，铜钟就自动发出响声；如同山云涌动，屋室的基柱就潮湿起来。机密的计策献呈给君主，好似投入水中；神明的用心对那计策加以采用，犹如转动圆规。因此君臣能够在特定的时代感应会合，创造出一番大事业来。所以在水底的鱼儿一下子跃出水面，就在那天河中游来游去；落地的鸟儿刚刚飞起来，就在那太阳的周围腾跃盘旋。阐扬那仁爱孝敬的精妙义旨，播布那君主是船、民众是水的美好谋略，道义被载列在史书上，德业融汇在向苍天报功而进献的金璧里。等到时世正处在衰落的阶段，教化逐渐变得颓败，破格提拔的恩惠很少流布，按照资历和等级顺序晋升的做法越来越牢不可破。于是致使西汉金日磾一家，接连七代都官高爵显；东汉袁安一族，先后

有八个人担任三公的职位，贵盛至极。相反西汉廷尉张释之极为精明，深知法理，可在此之前，竟然长达十年而不被人知晓。西汉给事黄门郎扬雄撰写文章精妙到了极点，可八次改任官职，又哪里得到过提升？这就白白使逼近星辰的人间秀气，长久被偏远的灰尘所遮蔽；使照耀廊壁的奇异光华，长久被幽暗的土石所湮灭。对此原本可以循用战国燕昭王用千金购买千里马马骨从而招来贤才的风气，沿袭叶公喜好画龙而使真龙降临的路数，像东汉光武帝三次派遣使者去召请隐遁起来的严光而一直不亏待他，像西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后的七年里都在征召商山四皓。表示聘请的成堆礼物，直接带到隐士的住地全都摆设开来；专去迎请的众多车辆，直接奔向山林居所而排开等候。这样一来，贤才就姓名标列在海神巨龟的造像上，像雾一样会集在宫殿的台阶下；德士折射在箕、尾、昴等星宿的精光上，像云彩一样飞动在朝廷的大门前。哪里仅仅是高贵的人士成串地聚集在政府的各个机构里，隐士这类人也被提升到最重要的职位上。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丙午科

进士试题

策进士问二道

问:惟尧则天,全颍阳之节;惟禹奠川,遂沧州之美。然则高洁之士,出于盛明,廉耻之宾,不生浇季。自皇唐受命,驱驾前古,贞遁不闻,风轨莫继。岂端操之范,独秘于往辰;将奔竞之徒,顿骋于兹日?缅怀长往,有懵深衷,伫听诸贤,以祛心疚。第一道

问:玄默垂拱,理归上德,法令滋章,事钟浇季。是以唐虞画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训刑,三千而愈扰。故知胜残去杀,必在于弘仁;反朴还淳,不务于多辟。方知削兹三尺,专循五礼。幸陈用舍之宜,以适当时之要。第二道

提问:想那帝尧取法皇天,成全在颍水北岸隐居的许由甘做隐士的节操;想那大禹治理好洪水,允许伯成子高辞去诸侯而到靠近水边的地方去从事农耕。既然如此,那么就表明高迈纯洁的人士在兴盛清平的时代才会涌现出来,而廉洁懂羞耻的宾客在衰败的社会就不能够产生。自从我大唐皇朝承受天命,一切都超过古代,可是纯正的著名隐士却一个也听不到,以前那种高风和形迹没得到接续。这难道是端正节操的典范人物只在过去的年代才藏匿起来,而奔走钻营往上爬的家伙在今天立刻就活动开来吗?深深追念古代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就产生了大惑不解的地方。殷切期待着能听到众位应试贤才的解说,以便去除掉这块心病。第一道

提问:清静无为,垂拱而治,治理就会使人们归向最美好的品德。法律政令越来越明细繁多,国事就陷入衰落的时代。因而唐尧虞舜施用象征性的刑罚,对共工、欢兜等四个大罪人予以惩办,天下人就都心悦诚服了。而夏朝和周朝议定刑法,多达三千条,却越来越闹得各地动荡不安。由此可知:战胜残暴,去除掉凶杀,必定在于弘扬

那仁德;返归到质朴淳厚,决不能在多判死刑上花气力。由此就正该懂得废除这法律条文,专门循用吉凶宾军嘉这五礼的教化。很高兴你们应试者陈述动用或舍弃刑罚的合适做法,用来适应目前的紧迫需要。第二道

张昌龄　对高洁之士策

张昌龄(约626~666)　南宫(今属河北)人。二十岁即以文词知名,旋于贞观二十年(646)得进士第一。历任昆山道行军记室、长安尉、襄州司户、北门修撰等官。曾撰《息兵诏》,俄顷而就,颇得太宗嘉勉。其《平龟兹露布》,更为士林所称。原有文集二十卷,已失传。

对:则天分命,箕山多长往之宾;浚亩劬劳,沧州有肥遁之客。是以北荒孤竹,甘草泽而轻周;南岳紫芝,玩林泉而耻汉。此盖为匹夫小节,未达汾阳之旨;独行幽姿,宁动少微之宿!岂若大风在梦,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称师,委旄头而作傅?自大君有命,远顿天纮,尽岩穴之英奇,总濠梁之邁轴。脱荷裳而袭朱绂,解薜萝而绾青绶。五尺童子,羞称荷蓧,三事大夫,耻观瓢饮。将使郑君谷口,擅不言之谣;曹相府门,多清净之化。方知圣人在上,真隐不获全其高;淳风所偃,幽贞不能固其节。麛卵得性,麟凤所以呈姿;山林不夭,风云以之通气。物既禀和而适变,士亦感类而相从,调饪自可怡神,烹鲜足堪养性。犹谓寒泉独善,未臻授手之仁?薪槱兼济,有助兴王之道!谨对。

对答如下:唐尧效法皇天要把帝位让给贤人,可箕山却出现了很多像许由拒绝唐尧美意而只管超凡脱俗的那样的嘉宾。大禹疏通河道,制定田赋等级,非常劳苦,可在靠近水边的地方却产生了像伯成子高辞去诸侯而只管隐居的那样的贵客。因此到后来在北部边远地区孤竹国涌现出来的伯夷、叔齐这兄弟二人,甘愿在首阳山隐居,表示对周王室的蔑视。徜徉在南方富春山的严光,只是欣赏山光水色,表示不与东汉王朝为伍。这类举动大致上都属于一介匹夫恪守微小

节操的举动，其实并没闹懂在汾水北岸陶唐邑崛起的帝尧的意图。那种卓然自立的行径和避世不出的姿态，哪里能感动天上由四颗星组成的代表处士的少微星座呢？远远不如风后进入黄帝的梦境中而从海边被请来担任国相，姜尚进入周文王的占卜中而从渭水岸边被请来担任辅臣，伊尹从箕、尾星宿下凡来而被商汤奉作帝师，傅说把旄头星抛在一边而充当殷高宗的国傅。从圣德帝王承受天命，远远地辖领到天涯海角，把那山林隐居的英才奇士全部延揽到朝廷，把那水畔优游的贤人智士尽行汇集到手下。脱掉荷叶衣，穿上官员的服装；解下藤萝腰带，佩戴上官印的丝带。身材还不高的小孩子，懒得提起孔子弟子子路碰见的那个用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头儿。一般的朝廷官员，懒得去看当年许由把水用手捧起来就喝的举动。眼看着叫那西汉隐士郑朴居住的谷口，完全唱起圣人治国不发号施令的歌谣；在西汉丞相曹参的办公地点，形成很多清静无为的化导政绩。由此也就正会明白圣人在上面执政，真正的隐士也没办法做到始终保持自己的高洁；淳厚风气所影响的地方，避世的正人君子也没办法做到恪守自己的节操。幼小的鸟兽得以正常地生长，构成麒麟和凤凰展现风姿的基础；山中的草木不半途枯败，风云凭借它们来融通气流。万物既然禀受和谐的状态去适应变化，贤士也同类相感而递相跟从。像当年伊尹通过烧制菜肴那样自行可以调养精神，像老子主张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那样足以能够养护性情，还可以说在隐居处所修养好自身，尚未步入女子掉入井中就伸手使她上来的仁德境界吗？实际上应当像《诗经·棫朴》所说的那样：砍柴和烧柴相互配合，有助于兴起那帝王的治国大道！恭谨地对答如上。

张昌龄　对刑狱用舍策

对：两仪亭育，蓄严刑于积阴；四气平分，降明罚于秋序。是知观象设教，圣人所以胜残；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姒川受命，士师陈九德之歌；瑶山载刑，吕侯训百锾之典。然则激扬神化，鼓舞皇阶，资粉泽而弘风，俟德刑而振俗。是故六辔在御，飞龙之驾可期；九罭

不施，奔鲸之害斯兆。纵使业优倦领，道迈曾巢，齐饮啄于鹑居，绝来往于犬吠，犹未可长悬三礼，永摈五刑，削兹噬嗑之科，专行忠信之薄。况今时推纂圣，运属升皇，犹劳丹浦之诛，尚漏青丘之罪。伯夷典礼，与猾夏而同科；司寇详刑，共春官而联事。自可远稽九伐，近命三驱，释刀锯于凶魁，休甲兵于原野，然后弛威象阙，展事天宗，继美娲黄，追风火燧。石渠未灭，岂得辄议寝刑？中岳既封，自可专循大礼。谨对。

对答如下：天地化生和养育万物，在阴气浓重的北方聚积着使万物枯败的刑杀；少阳气、太阳气和少阴气、太阴气各占全年的一半，到秋季就降下使万物枯萎的处罚。由此可知，察看天象，施布人间的教化，圣人用来战胜残暴的罪犯；依据事物，创立最初的制度，英君由此设置下刑法。所以在妫水接受考验的虞舜代替唐尧登上帝位，主管刑法的士师皋陶就向他陈述九种德行的建议。游历到瑶山的周穆王修订刑法，大臣吕侯就向他解释对处以刺面刑罚还有疑问的罪犯就罚赎金六百两的条文规定。既然如此，那么激扬神妙的教化，鼓舞人们都进入盛明的畛域，借助礼义的表现形式来弘扬仁爱的风气，依靠恩德与刑罚振作起民间的习尚。所以六套缵绳和笼头掌握在手中，由飞龙牵挽的车辆才可望奔驰起来。网眼细密的鱼网如果不张布开来，乱窜的鲸鱼造成的祸害就会由此显露出来。即使德业胜过衣领向外翻的最淳朴的时代，大道超过用柴草搭成窝棚的最原始的社会，饮食活动和没有固定的处所而在旷野随地居住的那个阶段一个样，人们在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听得到的距离内到死也不彼此往来，但仍然不能把天、地、人三种礼仪长久地搁置到一旁，永远摈弃刺面、割鼻等五种刑罚，废除这施用刑法的重要方面，专门去行用作为忠信衰薄之体现的礼制。况且如今时运正转到了继承前代圣人大业的阶段，际运落在了如日东升的帝王身上，仍然要像唐尧在丹水岸边征讨三苗部落的大事上花费气力，这样还可能使黄帝在青丘诛杀的蚩尤那样的大罪犯逃避掉惩罚。伯夷为虞舜主持天、地、人的礼仪，但与制止住外族部落侵扰华夏地区相提并论。《周礼》中秋官司寇负责按

怜悯人命的原则动用刑罚，可仍然与掌管礼仪的春官宗伯联合办公。这就自然该去往远古考察对九种犯罪作乱的人的诛伐办法，在当代宣明网开一面、不忍赶尽杀绝的意向，对造反的头目免予死刑处决，在原野上不再设布行刑的军队。然后在朝廷宣布法令的地方放松那威慑，全面做好敬奉日月星辰的事情，继承炼石补天的女娲和黄帝的美好治绩，追比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和炎帝的雄风。西汉用来讨论儒家经典异同的石渠阁尚未拆除，哪里能够一上来就讨论废止刑罚呢？已经在中岳嵩山举行了报告功业的祭典，自然就可以专门行用重要的礼仪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田备　对高洁之士策

田备（生卒年不详）　或作田恪。贞观二十年（646）进士第二。他事不得其详，俟考。其对策亦仅存第一问。

对：圣人出震，博访刍荛，大帝登庸，询谋师相。是以周称尚父，吕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贤，傅说求诸版筑。莫不舟梁羽翮，鼎实盐梅，表区宇之明明，成朝廷之济济。自隆周洎乎幽厉，朝政在于诸侯；炎汉至于哀平，威权任乎卿相。貂蝉耀彩，雄俊遍五侯之门；剑履生光，宾客满四豪之第。吹竽弹剑，犬吠鸡鸣，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其备。弓旌之命，非道德之门；蒲帛之征，乖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后丞，龙翰凤翼，左辅右弼，岳气星精。加以征逸璞于岩廊，索遗珠于穷海，邱园之下，羔雁成行，闾巷之中，轩轺相次。玄纁之礼既备，巢父长谢山林；珪璧之问不空，夷齐岂食薇蕨！谨对。

对答如下：圣人在东方像春雷那样化生万物，广泛向割草打柴人做访询；圣德帝王登上宝座，特向国师辅相询问谋略。因而周朝采用尚父的专称，把吕望从垂钓的磻溪选拔上来；商朝说是获取到了贤才，把傅说从垒墙的地方访求到。对这类高士，没有不把他们看成是渡河的船只与桥梁，飞翔的翅膀和羽毛，鼎中食物的酸咸调味品，证

明整个天下盛明无比，形成朝廷人才众多的局面。自从周朝由隆盛时期转入幽王、厉王在位阶段，朝政把持在诸侯那里；由西汉建立延续到哀帝、平帝期间，威权被丞相九卿擅自行使。于是权贵的官帽闪耀出夺目的光彩，英雄豪杰聚集在一家有五人封侯的王氏门下；特许权贵上殿可以佩带的宝剑和不用脱掉的朝靴闪烁出逼人的光芒，宾客就像投靠战国喜好养士的孟尝君等四豪那样布满他们的府第。谁会吹竽，谁会弹剑歌咏，谁会学狗叫，谁会学鸡叫，都根据各自的特长作为人才来使用，选取能人不要求他们各方面都很突出。这时用弓和旌旗招引贤才，已经不属于注重道德的范围了；用蒲草裹住车轮的专车和币帛去征聘隐士，已经和政治清明的王朝相违逆了。如今我们大唐负责回答天子咨询事宜的前疑和后丞这两位重臣，如同龙鳞凤翼一般；负责协助天子做出决策的左辅和右弼这两位重臣，与山岳的精气和星辰的光华恰相对应。再加上从山林征召那未被发现的经过雕琢便成为和氏璧的人物，在大海的边际索求那被遗落的明珠般的贤才。在隐士居住地的下方，表示征聘的羔羊和大雁等礼物堆成一排又一排；在隐士藏身的街巷里，表示迎请的专车一辆接一辆在等候。特用黑色币帛加以征聘的礼节样样俱全，像唐尧时的高士巢父也就永远会和山林告别了。特用珪璧去问讯的礼节做到实处，像殷末周初的伯夷和叔齐，哪里还甘愿在首阳山中吃草根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郝连梵　对刑狱用舍策

郝连梵(生卒年不详)　贞观二十年(646)进士第三。他事不得其详，俟考。其对策亦仅存第二问。

对：法星垂象，列九冓而照烛；习坎分爻，疏六位而辉焕。故有皇王慎罚，正俗以经时；圣哲详刑，开物而成务。莫不克清函夏，载穆黎元，制天讨之威严，弘秋官之典宪。舜游妫汭，乃去四凶，汤出镳宫，驱除三面。然则质文异代，兴废殊途。徽禹会昌，仁流于下泣；独夫受

戮，祸招于剖心。自运往道消，淳离朴散。王风不竞，《菀柳》之刺斯闻；后德方衰，棘槐之制斯阙。望夷招败，酷甚凝脂，函谷生灾，冤多精气。虽复萧何改创，爰始九章，温舒上言，仍讥一失。网漏吞舟之罪，主苟持宽；律加盈阁之繁，吏还舞智。邈乎遗法，允属升平。

大唐执纪先天，凝图王气，化轶胥庭之上，功超步骘之前，扫氛祲于乾枢，静嚣尘于地轴。紫微君圣，时乘光于得一；黔首安生，日用陶其吹万。皇帝上元统历，下武嗣徽。道叶顺风，契黄神之罔象；精通就日，符赤运之文明。于是职列英奇，朝班俊乂。载升降之节，既著礼容；临甲乙之科，方在政辟。道无为以端拱，思有罪而责躬，念向隅之独嘬，乃纳隍而轸虑。曲询管库，取荐刍荛。诚宜妙简平反，旁求庶狱。渭桥惊马，必归张季之言；禁囿射兔，勿爽高柔之旨。于公阴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宪曹之任。剖符寄刘宽之辈，蒲鞭之教可追；分陕趋邵奭之俦，棠阴之听斯在。加以五词咸备，两造兼持，运静躁于韦弦，听迟速于宽猛。獬豸虽触咎繇，行其惠化；苍鹰辍号郅都，息于顿苛。自然圄犴空虚，靡怨黄沙之罪；钳钛安用，无施臼粲之刑。则迹迈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远，无得而称。谨对。

对答如下：代表人间法律事务的众星辰垂示法象，布列在天空的最高处，明彻地在察照。坑中有坑的《周易·坎卦》排列成卦象，六爻的位序各得其所，鲜明地在兆示。因而有那称皇天下和称王天下的人慎重对待惩罚，端正民间风习和整顿社会。圣明的君主按怜惜人命的原则动用刑法，开启万物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务。没有谁不能够肃清整个华夏地区，安稳住黎民百姓。制造出代替皇天去讨伐的威严气势，播扬司法官的法律条文。虞舜在妫水的转弯处游历，于是去除了共工、欢兜等四个大罪人。商汤从承受天命的名为镳官的处所一出来，就把打猎张布的罗网撤去了三面，只剩下拒不听令的一面。然而推崇质朴和推崇文采，每个朝代并不相同；兴盛和败亡，也道路不一样。除去大禹正逢国运昌盛，他那仁德竟看到罪犯后便从车上下来，对他们流泪，而商纣王那样的暴君最后被斩杀，这种惨祸是从挖出贤臣比干的七孔玲珑心来观看才招致的。自从时运过去，

大道消亡,淳厚质朴的社会习尚烟消云散,称王天下的人的感召力不强劲,像《诗经·菀柳》对周幽王暴虐无亲又刑罚不公正的讥刺就在这时让人听到了。帝王的仁德正衰败下去,公卿大臣审断案件的制度在这时就不施行了。秦二世在望夷宫招来败亡,就因为刑罚严密得比那凝冻的油脂还厉害。汉武帝到函谷关遇上了牛形怪物四足入土挡住去路的异事,就因为蒙受冤屈、死在这里的人凝聚成众多的精气。尽管萧何在汉初重新制定刑法,开始有了九篇律文,可路温舒到宣帝时献上奏章,仍然讥刺当时司法官执法太严苛。法网漏掉了身犯大罪的家伙,可君主还将就着施行宽大的方针;律条增附,繁琐得堆满了殿阁,司法官吏掉转来就要弄聪明,贪赃枉法。上古遗留下来的美好法度,确实要归太平王朝来施用啊!

我们大唐帝国早在皇天那里就承受到执掌天下纲纪的权力,从神赐天书中又凝聚起称王天下的英气,教化凌驾在远古赫胥氏、大庭氏之上,功业超越在三皇五帝的前面,在天空正中扫除了各种不祥的妖气,在大地四周使那战争的风尘平息下来。与天上紫微帝座恰相对应的君主十分圣明,承接时运在获得到真元一气上大放光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日常生活蒙受到广大的皇室恩德的薰陶。皇帝您往上开启那国家的命脉,往下紧接那盛世沿续的美好事业。治国大道和天下闻风响应相一致,同黄帝派罔象寻找到遗失在赤水的玄珠这类做法相契合。精诚感通太阳,与唐尧位当火德致使天下文教盛明一个样。于是国家职位上布列的都是英才奇士,朝廷上按顺序站立的均为俊杰贤人。定立起进前和退下的动作规范,已经显示出礼仪;亲自参预重罪轻罪的审判,正在政令刑法上用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治国大道,端坐拱手就实现了治理。考虑犯下罪过的人,反过来责备自己施治不力。感念罪犯的亲属在对着墙角哭泣,于是要把人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为此而深切地忧虑。详尽地询问低级官吏谁有才能,从割草打柴的人中选用被推荐的人。确实应该精审地挑选出能够为冤案平反的官员,广泛地研核一般的案情。遇上有人在渭桥使汉文帝车驾的马匹受惊的这类案件,一定要依照张释之只处罚金的意见来惩办。碰到在魏明帝的禁猎区内射兔的违法官吏,不违背高

柔关于既参预又告发的人一并治罪的宗旨。像西汉于公那种审案判刑尽力暗地予以保全的人，要任命他担任廷尉这一最高司法官的职务；像西汉丙吉那种非常仁义的人，要任命他担任御史中丞这一最高监察官的职务。委派太守县令，要托付给东汉刘宽那样的人，于是仅用蒲草拧成的鞭子责打犯有过失的下属而表示羞辱的教化，也就可以赶得上了。委派各地的安抚使，要注重西周召公姬奭那样的人，于是视察中特在棠树下处断案件和政事的举动，也就依然存在了。再加上从话语、神色等五个方面去勘察案情，原告和被告全都带上堂来，像战国西门豹佩带皮绳、董安于佩带弓弦那样防止太急躁或太平稳，在不紧不慢中决定从轻发落或从重处罚。獬豸这种神兽尽管用角去顶断案或有偏差的虞舜的最高司法官皋陶，但目的是要他实行恩惠的化导。苍鹰这类绰号不再在西汉郅都那样的酷吏头上给送上，武断苛酷的现象也就止住了。这样自然就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狱里没有一个罪犯，人们也对被关押起来的惩罚不再怨恨了。各种刑具哪里还要动用？不再施行那类罚作奴隶来为官府成年舂米选米的徒刑了。于是治绩超过那周成王与周康王，大道胜过那汉文帝与汉景帝，不宣称仁德却自行流布到远方，人们简直找不出恰切的语言来称颂。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己卯科

制科试题

临轩试应岳牧举人问(口试)

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

皇道、帝道、王道,何以区别?朕今可行何道?

兵书上所讲的天阵、地阵、人阵,各自是指什么意思说的呢?

称得上是“皇”的治国大道,称得上是“帝”的治国大道,称得上是“王”的治国大道,凭借什么来区别开?皇帝我如今该行用它们中的哪一种治国大道呢?

员半千　应诏对岳牧举人问(口答)

员半千(?~714)　字荣期,全节(治今山东章丘县西)人,后寓居临汾(今属山西)。初名余庆,其师王义方以五百年始出一贤,遂改名半千。生后便成孤儿,由其从父养育成人。年少即以颖慧见称,高宗上元年间曾应八科举,皆及第,授武陟县尉,在任内曾径自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调露元年(679)又应岳牧举,以面试笔试突出而得授第一名。历任华原、武功县尉。武则天当政时期,累官左卫胄曹参军、弘文馆直学士、正谏大夫,曾预修《三教珠英》。亦因请罢控鹤内供奉忤旨而贬为水部郎中,遭忌而出任濠、蕲二州刺史,所至礼化大行。睿宗时召为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累封平原郡公。其一生共历五君,以节操清白立于朝廷。《新唐书》本传谓其年九十四卒,与《旧唐书》所述不同。原有文集,已佚。

臣观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地阵,山川向背;人阵,偏伍弥缝。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

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善用兵者,使三军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战?

臣下我观阅典籍，对这宗事情的解说简直太多了。有人认为天阵就是指星辰时日的干支全不全,地阵就是指山峦河水的顺不顺,人阵就是指兵车与步卒的相配合。依照臣下我的愚昧看法，认为决不是这样的了。军队根据正义来出动,就像按时节准时降下的雨水,获取到皇天的适宜时机,这才是天阵呢!军队行动在于粮草充足,一边种田,一边作战,获取到大地提供的益处,这才是地阵呢!擅长指挥打仗的人，使三军将士像父子和兄弟一样，获取到人们之间的团结一心,这才是人阵呢!以上三方面都不要了,他能靠什么去作战呢?

〔杨寄林译〕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甲申科

制科试题

策词标文苑科问

问:朕闻北辰端扆,仡众彦以经邦;南面居尊,俟群材而纬俗。是知九官分职,薰风之咏载敷;八元匡朝,就日之规方远。历选列辟,遐考前修,并建明扬之躅,式广旁求之义。故康衢扣角,授相越于齐班;海上牧羊,封侯超于汉秩。洎乎淳风陵替,雅道湮沉,仕必因基,官非材进,官虽备职,位匪得人。遂使七辅之材,销声于岩穴;六佐之彦,晦迹于邱园。寤寐以之,载劳虚仡。今欲革因循之弊,蹑稽古之踪,此志虽勤,其途未遂。为是旌贲爽于前代,英杰寡于今晨。仡尔昌言,朕将亲览。

提问:皇帝我听说,像北极星那样端坐在屏风前面听政,就必须殷切地期望众位英杰来筹划治国的大事;坐北朝南占居最高地位做决断,就必须等待各类贤才去整治好民间的风尚。由此可知,虞舜时九大中央部门的长官划定各自的职守,《南风歌》的吟唱就广泛地传播开;号称八元的高辛氏兄弟八人辅正朝纲,驱使人们归附天子的谋划正十分深远。依次择选各个时期的国主,往远处考察前代的贤君,全都设立起举荐英才和识拔被压抑的贤士的法式,扩充那广泛求取的义旨。因而春秋时宁戚在大路上敲击牛角唱出悲壮的歌声,就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破格跃居在齐国官员的前列。西汉的苏武在匈奴北海上放羊也不投降,回朝后被封为关内侯,打破了汉朝确定官位品级的常规。自从淳朴的风尚衰落下去,公正的用人原则湮灭沉沦,在朝供职就必定要从最低那一级做起,官位并不根据才干来提升,官位尽管在朝廷需要的职事上相当齐备,可充任者却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于是造成像风后、天老等七位辅助黄帝的那样的人士,销声在山林的处所;像为黄帝分掌天地四方的六名佐政大臣那样的英才,匿

迹在隐居的地方。皇帝我在睡梦中都把这当成大事，在留出职位等待他们到来上忙个不停。如今打算革除一切都按老样子办理的弊病，紧跟考察古代如何做的踪迹来走，这种意愿尽管总闪现，可那具体的做法还没步入正轨。由于这个原因，征聘延请便与古代不合拍，英雄豪杰就在当今显得少。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的美好建议，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房晋　对词标文苑科策

房晋（生卒年不详）　其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应词标文苑科制举，对策第一。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对：惟德动天，文云开其五色；惟贤济俗，大运符其半千。是知广厦将崇，必伫群材之用；巨川方济，良资舟楫之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风姜御辨之始，树以后王群公；云鸟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师长。莫不投竿入相，舍筑称师。五臣光就日之朝，八凯翊薰风之代，阴阳由其燮理，百姓用以平康。

善佐必借于贤臣，辅国或伫于良佐。国家旁求俊乂，束帛之礼荐陈；物色异人，邱园之彦咸萃。登坛对楚，连城之宝不足称；置馆求燕，照乘之珍无以贵。多士迈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汉之朝，犹以为官匪材升，仕因基进，显革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风。诚愿察彼山苗之词，求夫纵壑之论。材或可纪，超升于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于公卿之位。开其上赏之路，颂以中和之诗，则淳于髡之进贤，一朝而见七士；许子将之举德，少选而收二俊。自然词人阔步，才子长鸣，公理息《昌言》之篇，节信罢《潜夫》之作。谨对。

对答如下：只有仁德才会感动皇天，绚灿的云彩就闪现出五色俱全的祥兆来。只有贤士才能救助社会，昌盛的时运就与五百年才会降生一名大贤人相切合。由此可知，宽敞的屋室眼看着耸立起来，必定需要各种木材砖瓦的配备使用。宽阔的河流正要渡过去，确实要

借助船只船桨的功效。让贤才作为自己的大腿和胳臂，把他们比拟成羽毛和翅膀。从风姓的伏羲氏和姜姓的神农氏驾驭天地分开后的人间开始，就设置起国君侯王和各个公卿。在黄帝组建的都带“云”字的官员和少皞组建的都带“鸟”字的官员各自供职的当初，就承接起大夫和师长。没有谁不像姜尚那样丢掉钓鱼竿进入周王室当辅相，不像傅说那样放下筑墙的苦活而被殷高宗尊称为国师。大禹、后稷等五名大臣弘扬起天下都归从的唐尧当天子的朝代，号称八凯的高阳氏兄弟八人又辅助《南风歌》传诵的虞舜当天子的朝代。阴阳二气由他们和谐地调理好，百姓由此而太平安康。

天子的得力助手必定借取那贤能的大臣，辅助国家有时要殷切期待那优秀的助手。我们国家广泛求取杰出的人才，持带物品特地去聘请的礼节接连陈布在隐士的面前；物色那奇异的人士，隐居的英才全部汇聚到朝廷上。像汉高祖那样请韩信登上封拜元帅的坛台来与西楚霸王相抗衡，即使是价值连城的和氏璧，我们国家也不吝惜它。像战国燕昭王那样设置招贤馆来求取燕国所需要的奇才，即使是光华能照亮成排车辆的宝珠，我们国家也不把它看得多贵重。因此济济一堂的贤才超过了隆盛的西周时期，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比汉朝还要光芒四射。但仍认为官位并不依据才干来提升，在朝供职要从最低的那一级做起而逐步升迁，为此要明确地革除一切都按老样子办理的弊病，用来追比那考察古代如何做而加以效法的风尚。臣下我从内心希望皇上您体察晋朝左思关于山上的初生草木遮蔽住山底下青松的诗句，探求汉代王褒关于让大鱼在大海中任意游动的论说。才干有的会被载入史册，就把他破格提拔到辅政重臣的行列中；德行有的可以褒奖，就把他晋升安排在三公九卿的职位上。开辟那优厚封赏的道路，使人们像汉宣帝时传唱起王褒所作的颂扬当今政治真平和的诗歌。这样一来，就会如同战国时淳于髡向齐宣王进献贤才，一个早晨就引见介绍了七名国士；如同东汉时许邵荐举德人，少年时加以识别，就收取到樊子昭、和阳士两位英才。这也自然就擅写文章的人大踏步地行走开了，倜傥的才子长长地发出呐喊声了，东汉的仲长统不会再写《昌言》那类论著，东汉的王符也停止《潜夫论》

的撰写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皇甫琼　对词标文苑科策

皇甫琼(生卒年不详)　或作皇甫伯琼,为是。乐陵(今属山东)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应词标文苑科制举,对策第二。官至司封员外郎。

对：珠衡上列，圣人居曜魄之尊；王理旁融，元后握乾坤之柄。膺宝历而推五胜，皇纲居混沌之先；悬玉镜而运三千，帝系出氛氲之上。莫不辟天关以统业，横地轴而开基，象列宿而环北辰，制诸侯而向南面。柱州巢氏之际，晦声迹于龙图；结绳炼石之余，摛景曜于龟象。未有巨川已济，不资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栋梁之力。至于远电流祉，既委任于三台；就日居尊，亦佥谋于四岳。道德为富，魏文侯之式庐；礼义可尊，燕昭王之拥篲。孔明佐蜀，叶鱼水以陈谋；仲父相齐，假鸿毛以康俗。洎羸晖掩镜，汉道亡珠，位以恩升，荣非德进，挂网罗者则黄鹄高飞，糜爵禄者则青凫竞至。自钦明抚运，宪章稽古，司光凤纪，位映龙名。振鹭来仪，袭宪飙而鼓舞；白驹萃止，食苗场以縶维。所以绳准百王，牢笼万代。

伏惟圣母皇帝陛下，辟阴阳之二气，独化初皇；启日月之三光，混成太极。灵祇翕忽，出震宫而齐巽围；云雨氤氲，辨天垓而通地圻。慕崩沙之灵运，符润石之休期。忧在进贤，道叶《采苓》之化；恩无不逮，德合《樛木》之风。掩娲后以称尊，迈姬任而立政。吹尘钓璜之侣，接武于阶墀；骑星弄电之夫，肩随于廊庙。虽良骏充厩，逾怀买骨之谋；真龙在堂，更伫丹青之玩。应休琏之独坐，鸟雀来庭；尹叔良之闲居，蟋蟀在户。傍加策问，亲览政途，词丽汾州，声侔沛邑。掩鹏图而该魏网，漆园无控地之词；飞鹤板而征汉臣，九皋有闻天之誉。凡曰群生，孰不幸甚！臣中庸贱逸，下泽幽微，忝预明扬，谬承推择。驰心日路，冀三舍以矜魂；

累息天门，瞻九重而惕虑。谨对闻。

对答如下:众星辰连珠般布列在空中,圣人就占居在北极星的至尊地位上；帝王的治理广泛地渗透进人心，元首就掌握着天地的枢机。承受拥有天下的历数而按五行相克的顺序做转移，三皇的纲领便处在混沌宇宙的前面；高悬治理天下的宝镜而时运推演到礼仪和刑罚各为三千条的周代，帝王的统系便出自阴阳二气交融的元气的上头。没有哪个朝代不开启那苍天的大门来统领起大业，铺开大地的枢轴而创立下根基,效法众星辰环列在北极星的周围,辖制住诸侯而归从天子。从天皇在昆仑山下的柱州兴起一直到有巢氏的时候，声名形迹被掩蔽在黄河龙马向他降示神图的伏羲氏下面。从伏羲氏连结麻绳做成鱼网鸟网到女娲氏炼石补天以后，光辉闪耀在洛水灵龟向他显示神书的大禹那里。在此过程中，没有哪个帝王在渡过宽阔的河流以后却未曾利用那船只和船桨的功效的；宽敞的房屋已经建成却不借助那栋梁的支撑力量的。至于致使景星闪现而播布福庆的黄帝，已经把政务交付给三公去料理；而使天下归从、身居帝位的唐尧,也与四方首领共同谋划国事。道德高尚才是真富有,战国时魏文侯每次经过孔子弟子段干木的住所就手扶车前横木来敬礼。礼法道义值得尊崇，战国时燕昭王就为邹衍亲自手执笤帚在前面开路。诸葛亮辅佐蜀汉,与刘备像鱼和水那样和谐,也就陈奏上谋略。管仲担任齐国的国相，齐桓公对他就如同借助鸿鹄的羽毛来飞翔而使百姓安康。自从秦朝的光芒遮住了玉镜,汉朝的做法失去了宝珠,官位靠恩宠来予以提升,尊贵不按德行增重,自愿进入顺从圈的人就迅速高升，白拿干耗俸禄的人就成群地争相来到。自从我们像唐尧般的皇帝主宰时运,把考察古代的做法作为效仿的东西,各个政府机构比少皞氏时期还要大放光辉，在位的官员比太皞氏时期还要光采夺目。展翅奋飞的鹭鸟成双成对地飞来，承受到鲜亮的乘风而行的神车而欢欣鼓舞。雪白的骏马汇集到一处，让它们吃那园圃中的菜苗而把它们绊住又拴住。这样地用来给那历代帝王确立起标准的做法,统括限定住各个时期。

万分恭敬地想来，圣母皇帝陛下开辟那阴阳二气，唯独像天皇那样化导天下；最先使日、月、星辰放射出光辉，混然一体地形成了宇宙的初始状态。神明快捷，从东方响起春雷而使万物化生，又到东南吹起和风而使万物长齐。恩泽融洽辨明九重天又通达到大地的边际。仰慕春秋时沙鹿山崩裂而六百四十五年以后会有圣女出世的灵验际运，应合那东汉和熹邓皇后梦中吮吸皇天降下的浸润石块的钟乳汁而登上尊位的美好日期。忧虑集中在进用贤才上，治国大道与《诗经》中《采苓》诗所叙述的化导相一致；恩泽没有施布不到的地方，仁德与《诗经》中《樛木》中所歌咏的风范相符合。胜过女娲氏来尊临天下，超过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来定立起国政。像黄帝梦见的吹走天下尘垢的风后和在磻溪钓到玉璜神文的姜尚这等人物，脚跟脚地来到了殿阶之下；像商朝的傅说和西汉的萧何这类从箕星昴宿下凡的人物，肩靠肩地来到了朝廷之上。尽管千里马已经布满了马棚，可愈益留心古代明君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招引千里马主动前来的谋略。真龙已经降现在堂室中，可更加关切满屋画龙来观赏的做法。曹魏的应璩一个人坐定，鸟雀就飞到了庭室中；东汉的尹勤呆着没事，长脚蛛蜘就在门上结成了网。皇帝您广泛加以策问，亲自观阅施政的途径，词采比唐尧时还绮丽，声势同汉代相对等。收拢起提出宏大长远谋划的全部答卷，包纳了魏王任用庄子的做法，致使庄子说不出原地不动的话语。火速颁发延揽贤士的诏书，征聘汉代那样的贤臣，致使隐居的名流发出了天上都听到鸣声的赞誉。只要称得上是一切活着的人们，谁不感到幸运到极点了呢！臣下我普普通通，低贱又不被世上所了解，处在下面，一点儿也不知名，并不合格地参加到荐举贤士和识拔受压抑的真实人才的行列中，错误地受到推荐和选取。心思投注在归从天子的道路上，只希望圣帝发出最仁德的话语怜悯臣下我的哀魂；多次在天门前做叹息，瞻望九重天而戒惧忧虑。恭谨地把曾听到过的东西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乙酉科

进士试题

九河铭

高松赋

策进士问五道

问:欲使吏洁冰霜,俗忘贪鄙,家给人足,礼备乐和,庠序交兴,农桑竞劝。善师期于不阵,上将先于伐谋。未待干戈,遽清金庭之祲;无劳转运,长销玉塞之尘。利国安边,伻闻良算。明言政要,朕将亲览。第一道

问:朕闻运海抟扶,必借垂天之羽;乘流击沃,必伻飞云之楫。是知席罗黄屋,握镜紫微,诚资献替之功,必待弼谐之助。所以轩辕抚运,遂感大风之祥;伊帝乘时,遽致秋云之兆。朕虽惭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犹虚傅野之梦。欲使岁星人仕,风伯来朝,河荐萧张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伻化,端拱仰成,多士溢于周朝,得人过于汉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思闻进善之言,以副求贤之旨。第二道

问:朕闻明王阐化,化感人灵之心;圣后宣风,风移动植之性。遂使翔龙荐检,鸣凤司农,兽解触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听遂初,载钦神化,每欲反斯觚薄,景彼上皇,欲使瑞篸司庖,仙蓂候月,游四灵于翠苑,集五老于荣河。致此休征,良由政感。伻闻启沃,以副虚襟。第三道

问:朕闻三微递代,哲后所以承天;五运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鳞次,应火木以环周。或寅子变正,天人之统斯辨;骊骊改色,昏旦之用有殊。兹乃涣汗图书,昭彰历数,受位出震,以迄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终始交际。然而都君土德,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宁宜用白!深明要旨,其义何从?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于紫色,则魏人鼎足,岂复应于黄星?缅镜前修,又以矛盾。张苍之议,既颇反于公孙;贾傅之谈,复远乖于刘向。子大夫学包群玉,文擅锵金,既听南史之篇,方

伫东堂之问。详敷事实,靡得浮词,商榷前儒,谁为折衷?第四道

问: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耽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或载纪遥邈,无其处而有其名;或坟籍丧亡,有其号而无其事。将求故实,以伫多闻。至如化被柱州,创基刑马,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石楼之都,见匪均霜之地;穷桑之壤,元非测景之区。时将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独王;轻兹中土,弃九洛而不营。大夏之时,化臻禁甲,隆周之日,道致韬戈。而七十一征,翻在凤凰之运;五十二战,更属云官之期。斯则偃伯之人,无闻于太古;摧锋之弊,反息于中叶。浇淳之道,名实何乖!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第五道

提问:要使官吏像寒冰秋霜那样地廉洁,民间百姓都忘掉什么是贪婪鄙陋,家家充裕,人人富足,礼仪完备,乐舞协和,各级学校交相兴盛起来,农耕和蚕桑竞相去大力从事。善于用兵的人,达到不摆列战阵却征服对方的目的。第一流的将帅,在不战而胜的谋略上首先取得成效。没等出兵作战,就一下子肃清了战场上密布的不祥恶气;不用艰难地运送粮草器械,就长时间平息了边塞地区的战争风尘。有利于国家,安定住边疆,殷切地盼望听到你们这些应试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美好筹划。明晰地讲述那施政的要领,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第一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大鹏鸟由北海飞到南海去,乘风直上,必定要借助它那遮蔽住天空的巨大翅膀。顺着水势搏击那升落的太阳,必定要依靠那如云飞动的船桨。由此可知,在帝王的宝座上稳稳坐定,在殿廷里执守住治国的大道,确实要借助臣僚议论国政兴革的功效,必定要依赖重臣和谐一致的辅助。因而轩辕氏黄帝主宰运会,于是就和梦见大风吹净天下的污垢从而获得到贤臣风后的吉祥事相感应。那位帝舜适应时势,特向皇天推荐大禹,猛然间就招来了庆云缭绕的好征兆。皇帝我尽管在古代圣帝明王的面前自愧不如,但内心却非常希望达到最为盛明的治理状态。虽然还没有去查验周文王对在滋泉垂钓的姜太公所做的占卜,可仍旧等待着殷高宗那种由天帝

告知他将会在傅岩原野上访求到辅臣的吉梦。想使作为岁星化身的西汉东方朔那样的人物进入百官的行列，驾驭风神的屈原那样的贤士前来朝见。黄河出图，荐举西汉萧何、张良之类的姓名；山岳显灵，降生下申伯和仲山甫那样的协助周宣王中兴的辅臣。清静无为，期待着教化大行，功业成就，杰出的人才比周朝还要众多，获得的贤臣超过汉代。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施政方法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呢？盼望听到你们这些应试者进呈良策的言论，以便符合朝廷求取贤臣的意旨。第二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英明的帝王阐扬教化，教化所至就会感通人和一切生物的心灵；神圣的君主宣播仁风，仁风所及就会牵动植物和动物的特性。于是致使盘旋飞动的瑞龙送来预示国家命运的玉制天书，面向朝阳鸣叫的凤凰带来丰收的年景，獬豸一类的神兽懂得顶撞邪恶的家伙，卷垂状的庭草能够舒展开来指向阿谀献媚的小人。仰起头来遥想那古代的圣帝明王，究竟是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德业才达到这种地步的呢？皇帝我往远处听到那天地开辟时代的盛况，非常敬佩他们的神妙的教化，常常想把如今孤弱浅薄的情状彻底扭转过来，和那最为盛明的景象同放光辉，想让名为“箑脯”的这种使食物永不腐臭的瑞物占满厨室，名为“蓂荚”的这种前十五天每天生出一荚、后十五天每天落下一荚的仙草迎候月相的变化，麒麟、凤凰、神龟、蛟龙都自行来到青翠的皇家苑囿随意活动，作为五星精灵之化身的五位老翁一起汇集在奇光闪耀的黄河岸边。招来这类吉祥的兆应，确实是由国家政治十分清平所感动而造成的。殷切地希望听到你们这些应试者富有启发性的说法，以便符合皇帝我虚心求教的愿望。第三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依次把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作为本朝历法的岁首，分别崇尚赤色、白色、黑色，这是圣明帝王用来承奉天命的做法。木行、火行、土行、金行、水行递次运转，周而复始，这是英明君主取代前朝的理论依据。有的金行和水行紧相连接，与火行、木行依序而下道理相同，返回到五行再度循环的新起点上。有的用十二月作岁首，改变前朝用正月作岁首的历法，皇天和人间的统系由此而区分出来。有的用赤身白腹的马匹牵挽战车，代替前朝用深黑色的马

匹牵挽战车,在黄昏时入敛或日出时入敛上,也有时间利用方面的差别。如今要使古代的神图天书昭然若揭,彰明那皇天既定的运历气数,但凡帝王承受帝位,在东方像春雷那样化生万物,一直沿续到现在,没有不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来承续的,周而复始地来交替兴起的。可是虞舜本来应属土行之德,反而倒崇尚木行青色;商汤本来应属水行之德,哪里就该采用金行白色呢?深切究明那切要的义旨,他们究竟是依从什么理论才这样做的呢?如果认为秦朝凭借武力建起了基业,就和搅乱纯正颜色的紫色相符合而不在正统王朝的序列以内,那么,曹魏建立起政权,又怎么该同土行黄星相对应呢?追思对照前代贤人的说法,又已经显得矛盾了。张苍关于汉朝承袭秦朝应属水行的议论,已经和公孙臣汉当土德的主张完全相反了,而贾谊关于汉属土德的讲法,又和刘向汉当火德的观点大相径庭。你们这些士大夫在学问上囊括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文章上都能写得铿锵有力,已经闻听过史书上的记载,正在应试的殿堂上等待询问,要详明地列举事实,不准空泛议论,对前代名儒的说法加以商讨研核,看看他们中哪个人最为恰当。第四道

提问:皇帝我利用在宫中的闲暇时光,通过研读史书来舒心散怀,向远处寻求那天地开辟的本源,往古代浏览那帝王的治国大道。然而有的记述太遥远渺茫,没有那个地点可却有那个地名;有的由于图籍已经失传了,仅有那个称号可却没有具体的事迹。打算研求可供借鉴的往事,以期扩大闻见的范围。例如有的在昆仑山下的柱州向天下推行开教化,有的在刑马山创立下基业,这两个时期的事迹,哪个更为久远,承受的是木、火、土、金、水五德转移中的哪一德?把都城建立在琅琊境内的石楼山南部,现今并不是能够划分出寒暖季节的地带;在穷桑这块地方修建城邑,原本就不是可以测量日影的区域。当时都眼看着在偏远的地带建立都城,只占一角却偏偏称王天下,轻视中原这片广大的地区,放弃黄河流经的区域而不去谋划。在夏朝昌盛的时期,施布教化达到了禁止住使用武器的程度;在周朝隆盛的阶段,行用大道造成了收藏起兵刃的局面。可是七十一次讨伐,反倒出现在因凤凰降临而用鸟作官称的少昊金天氏承接时运的年

代；五十一回征战，转而归属于因瑞云显现而用云作官称的黄帝时期。这样一来，就表明平息住争霸战争的人，在太古时代并没有一个人；而凭武力取胜的祸害，反倒在中古时代得到消除了。使世道浇薄或淳厚的治理原则与方法，在名称和实效上显得是多么地不一致！如今想让你们这些应试者逐个地衡量古代的圣帝明王，往远处考察最高的德业，采择崇尚文采与崇尚质朴的合适谋略，探求减损与增益的恰如其份的做法，究竟哪位君主可以作为效法的典范，哪个时代可以取作摹仿的准绳。慢慢地写出你们美好的建议，用来充实皇帝我的一片遐想。第五道

吴师道　对政理策

吴师道（生卒年不详）　一作吴道师，或作吴道古。垂拱元年(685)进士第一。睿宗至玄宗时，历官检校秘书监、司勋员外郎、仓部员外郎、户部郎中。曾奉敕参与浑仪的修造。武则天对是科进士敕批称："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祗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唯祗一人即指吴师道而言。

对：臣闻栖培嶲者，不睹嵩泰之干云；游泞涞者，岂识沧溟之沃日！臣蒿莱弱质，衡泌鄙生，未识广厦之居，安知太牢之味？不量蒭尔，轻从褒然，谬达天聪，兢惶圣问。粤惟皇家出震，累叶重辉，天人归七百之期，宗枋联亿兆之庆。太宗以明一察道，括珠囊而总万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转金镜而清九服。用能肃清天步，夷坦帝途，垂莫大之鸿基，托非常之元圣。伏惟皇太后陛下，道超炼石，化轶扪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仪之博爱。星阶已正，尚虽休而勿休；宸极既安，犹损之而又损。方欲还淳返朴，振三古之颓风；缉正苍生，降四海之昌运。拔幽滞，举贤良，黜谗邪，进忠谠。故得鸿、鹓接轸，和宇宙之阴阳；龙、武分曹，节风雨之春夏。礼乐备举，学校如林，俗知廉让之风，人悦农桑之劝。犹复旁求谏议，虚仁刍荛，既属对扬，敢陈庸瞽。诚愿察洗帻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让玉之夫，居其令守，则俗忘贪鄙，吏洁

冰霜矣。旌好学之流，赏力田之伍，则家罕贫惰，位列文儒矣。降通亲之使，喻彼枭心；发和戎之官，收其鸡肋。则四夷左衽，颠倒来王，三边元恶，讴谣仰化矣。自然笼羲驾昊，六五帝而四三皇；远肃迩安，飞英声而腾茂实。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栖身在小山包的人，根本看不到嵩山和泰山直插入云的雄伟气势。游逛在小水沟的人，哪里会知道沧海冲荡太阳的巨大威力。臣下我出身于民间，天资微弱，生活在不被人注意的偏僻角落，从来不晓得宏大殿堂的结构，又怎知道牛羊猪三牲俱全的祭肉的滋味？不估量自己的渺小，轻率地跟在儒士的后面，被错误地传达到皇上的耳畔，对圣明的策问深感惊恐。不过考察起来，我大唐皇室在东方像春雷那样化生万物，好几代都越来越昌盛，皇天和人间都期望能像周朝当年预测享有国运七百年那样地绵长，朝廷联结着亿万百姓的福庆。太宗皇帝凭借辨明宇宙的本原而察识大道，综括起五星的运行轨道，统领每一个区域。高宗皇帝凭借贯通天地人而驾驭天下，运用施政纲领，使远近各地都一片清平。由此能够肃正扫清艰难的时运，使称帝天下的道路平直坦荡，留下最宏大的基业，托付给十分突出的大臣。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太后陛下在行用大道上超过了炼石补天的女娲，在施布教化上胜过了梦中登梯撷到天的东汉和熹邓皇后。延布像哺育自己的儿子那样哺育民众的深厚仁德，弘扬为母之道的恩爱一切的慈惠。文武百官已经得到端正了，尽管局面挺美好可仍然不认为美好；朝廷已经安和了，依旧损抑再损抑。正打算返归到最淳厚质朴的状态，振刷上古、中古、下古的衰颓风气。安集端正众百姓，降赐下四海繁盛的命运。识拔长期被困在低级职位的英才，提升贤能优秀的人士，罢免陷害人的奸邪官员，进用忠诚正直的臣僚。因而实现了像黄帝的辅相大鸿和大稽那样的人在朝廷上一串接一串，使宇宙间的阴阳二气非常和谐；像虞舜手下的夔、龙和朱、虎那样的官员各自办好本部门的事务，使四季的风雨按时节准确来到。礼仪乐舞全都兴用起来，各级学校特别多。民间懂得廉洁谦让的风尚，人人都高兴地致力于农耕蚕桑。可又仍旧广泛征求微不足道的言论，

虚心期待着割草打柴人的建议，臣下我既然正处在对答称扬圣明策问的行列，就敢陈述一下平庸愚昧的意见。真心希望朝廷察识那种戴着洗过的头巾、穿着粗布衣服上殿的人，任命他们担任中央部门的重要职务；提拔那种拒不接受赃物的人，让他们长期出任太守县令。这样一来，民间百姓就忘掉什么是贪婪鄙陋了，官吏就像寒冰秋霜那样廉洁了。表彰喜好学习的那类人，奖赏大力种好庄稼的这批人。这样一来，每户人家就很少再有贫困懒惰的了，地位列居文人儒士了。派去通婚结亲的使者，开导对方奸诈的用心；派出与少数部族建立和睦关系的官员，收束住他们小打小闹的举动。这样一来，衣襟向左边开的四周少数部族，也就把衣襟向右边开，前来朝见称臣了；在东、西、北边境线上捣乱的头号首领，也就唱起歌谣，服从教化了。功业自然会笼罩住伏羲氏，凌驾在少昊金天氏之上，成为五帝以外的第六个圣帝，三皇以外的第四个明皇，远方得到肃正，近处获得安宁，美好的名声到处播扬，盛大的德业普遍传颂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求贤策

对：臣闻立极膺乾之君，当宁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将隆景化，莫不旁求俊彦，广命英奇，凝庶绩以安人，缓万邦而抚俗。是故轩丘膺箓，委四监以垂衣；丹陵握图，举八元而光宅。于是齐桓拟之于飞翼，殷武兴之以羹梅，克赞人谋，实宣神化。陛下功包邃古，道逸上皇，授受惟明，谋谟克序。弼辅之任，总风、力于前驱；燮理之司，列伊、周于后乘。振鹭翔鸾之客，毕凑天阶；乘箕降昴之英，咸趋日路。且犹虑心卜兆，托想旁求，冀山谷之无遗，庶贤良之毕萃。俯访愚鲁，敢述明扬。诚愿发德音，下明诏，咨列岳，访群公。举尔所知，不遗于侧陋；知人不易，无轻于慎择。下僚必录，上赏频沾。则叶县游龙，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骏马，赴千金而遥集。汉未为得，周岂能多？尽善尽美，于斯为盛！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给天下确立起最高准则而承受天命的君

王,接受朝拜而驾驭全国各地的国主,打算步入最高的治国大道的境界,期望使人们敬仰的大治局面隆盛起来,没有不广泛求取俊杰贤人,大量任用英才奇士的。取得多方面的治绩,安定住百姓;安抚好各个邦国,稳定住民众。因此在轩辕丘定居的黄帝,承受到天赐的图箓,委任四名分别掌管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事务的大臣,实现了无为而治。在丹陵降生的帝尧,掌握住神授的甲图,选用高辛氏的八个儿子,使仁德播扬到整个天下。在这个问题上,齐桓公用飞雁的翅膀来比拟辅相管仲,殷高宗用调配羹汤所需要的酸梅来起用傅说,使他们能够辅助人事的谋划,在实际上宣播神明的教化。陛下您功业包纳了远古时代的一切,行用大道超过了第一等的帝王。在官职封授上十分严明,重大的谋划得到了逐项落实。辅助朝政的大臣,把那黄帝时的风后、力牧这类人物聚合在自己的前面;协和阴阳的三公,把那商朝伊尹、周朝周公这类人物列布在自己的后面。像白鹭奋飞、鸾鸟翱翔那样的宾客,全都汇集到朝廷的殿阶之下;从箕星昴宿来到人间的那类英才,全都踏上了归附天子的路程。可陛下仍然像黄帝断梦、周文王占卜那样费心思,遥想能广泛求取到人才,希望山林没有遗漏的能人,期待贤士英才全部聚集到自己的手下,为此从上面询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粗鲁的应试者,于是就敢谈一谈选拔贤才的看法。真心希望陛下发布施恩的教令,下达明晰的诏书,向各地官员做咨询,向众位公卿做访问,荐举你们所了解的人才,对具有本领可却担任小官的人不要有遗漏。了解谁是人才并不容易,在慎重选择上不要出现疏忽。身居下位的人必定加以进用,破格提拔的恩赏屡屡施布。这样一来,在叶县游动的真龙,就会从九重天上飞下来;在燕国都城郊外的骏马,就会为燕昭王用千金购买马骨头而一齐奔来,排成一长串。汉朝还算不上确获人才,周朝又哪里值得赞许?尽善尽美,正在我大唐这时候才数第一!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祥瑞策

对:臣闻化浹乾枢,景纬呈其灵贶;泽周坤络,卉木效其祯祥。是

以若雾非烟，必应文明之后；九茎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应期纳箓，抚运登皇，孝道格于玄穹，仁心光于紫极。自临万域，辑御群方，灵瑞屡臻，休征荐至。五蹄仁兽，乐君囿而来游；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岂直银黄玉紫，雉白乌丹，翻鄗上之二秬，拔江间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检，拜洛披图，降五老于星躔，归四神于云路。盛矣美矣，巍乎焕乎！蹯三五以腾徽，吞八九而高视。尚且崇谦让之道，守冲抑之德，抑斯天瑞，访此人谋。陛下虽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谓。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教化深入到皇天的中心区域，太阳与星辰就呈现出神灵赐给的福佑；恩德遍及到大地的边缘一带，花草与树木就献上它们的吉祥兆应。所以像云雾又不是云雾、像烟气又不是烟气的五色庆云，必定对虞舜那样的礼乐教化大放光明的帝王作出回应。九茎连叶或一年开花三次的灵芝草，确实与唐尧那样的仁德播扬到整个天下的君主相符合。陛下您应合那既定的期数，承纳天赐的神箓，顺从那到来的时运，登上皇帝的宝座。尽孝的做法延及到广大的苍天，仁慈的用心照射到紫微星区。自从统领整个天下，安和驾驭各个地区，灵验的瑞应屡屡来到，美好的征兆接连降现。长有五支足蹄的仁兽麒麟，对皇家苑囿非常喜欢，自动来到里面游动；形体有六个部位分别同六种鸟兽很相像的凤凰，拂弄帝室的梧桐树，成群栖居在上面而不离去。哪里仅仅是深山中闪射出黄银紫玉的光芒，白雉和赤乌在各地降现，涌生出镐京郊野上一壳二米的谷穗，挺立出江淮间出产的茎有三棱的茅草呢？原本上已经在黄河边上巡视，承受玉制的天书；在洛水岸畔敬拜，披阅天赐的神图，使五星的精灵化成的五位老人从天空的运行轨道上降下来，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星精灵化成的龙、虎、鸟、龟送回到天上去。简直太兴盛又太美妙了，太伟大又太显赫了！把三皇五帝踩在脚下，进一步弘扬那美好的事业；把曾经在泰山举行过封禅大礼的古代七十二位帝王包纳在一起，也在他们之上。可依然崇尚谦逊推让的准则，恪守谦虚自抑的美德，不显示这些皇天的瑞应，专去访求人事的谋划。陛下尽管不把那成就的功业归在自己的头上，可卑微的臣下我也不知道该说些

什么才好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五运策

对：臣闻方圆既阙，帝王斯建，四游将六气交驰，五德与三微递变。自摄提著纪，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骊骝而继作。虽复武功文德，揖让干戈，御旒扆以高居，握图箓而深视，莫不垂天人之统，顺寅子之正。始终之际，何莫由斯！暨乎运偶都君，时云土德，道钟天乙，数叶水行，子胜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穷奥旨。至若秦居闰位，紫实非正之符；魏得中区，黄标应星之纪。未有矛盾，允惬随时。汉祖承天，人多异议，张苍言水而黑畤方兴，公孙据土而黄龙复应。逮二刘之父子，推五运之相沿，较彼前谈，斯为折衷。臣学非博古，识昧知新，轻陈管穴之窥，猥奉天人之问，惭惶靡地，悚越兼深。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天地开辟以后，帝王就在这时也相继产生出来。春夏秋冬伴随着风雨晦明等六种气候现象交替运转，永无止境；木火土金水五种德性和十一月代表赤统、十二月代表白统、来年正月代表黑统的三微之统递次循环，周而复始。自从“摄提纪”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被列入天地开辟以来的十纪中，各个王朝在东方像春雷那样化生万物，登上统治宝座，都是按照木生火这种依次类推的五行相生的顺序，彼此取代；在使用深黑色或赤身白腹的战马等礼制规定上，也后代变更前朝。虽然全是又讲论武功和文治德业，进行礼乐教化和采取军事行动，临朝听政而高高在上，承奉天命而察视各地，但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垂示皇天和人间的统系，在历法上循用正月做岁首或十一月做岁首的。按照五行推移的顺序改朝换代，哪一朝不是像上面所讲的那样呢？等到时运落在虞舜身上，本应宣布正属土行之德；大道寄托在商汤那里，却又认定气数和水行相一致，这是因为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虞舜正该属于木行而崇尚青色，商汤又按五行相生的顺序，由土生金而崇尚白色。这里大致上谈一谈那五行

生克的妙处，也就能彻底搞清那深奥的义旨了。至于秦朝恰属非正统的地位，说它是搅乱正色的紫色，实际上也在于表明它不在正统王朝的序列以内。曹魏占据了中原地区，土行黄色正代表着与黄星相对应的纲纪。所以这并不存在着矛盾的地方，依据时运却非常恰当。汉高祖承奉天命建立政权，人们对它该属哪一德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张苍强调应属水德，是因为汉高祖正致力于增立祭祀黑帝的名为北畤的专用场所。公孙臣坚持该属土德，是因为又有黄龙重新降现下来。等到到了刘向、刘歆父子那里，推导出历代王朝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更替不已的谱系，这比起以前的那些说法来，就显得恰如其份。臣下我论学问并非对古代的事情了解掌握得特别多，在见识上又对温故而知新闹不清楚，轻率地就陈述那非常狭窄浅鄙的看法，并非合格地承奉皇天与人间关系的询问，惭愧惊恐得无地自容，同时又深感犯下死罪。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历代帝王为理策

对：臣闻一剖为三，始鸿濛于太易；九变于七，渐茫昧于无为。既分清浊之仪，乃列君臣之位。则有天皇首出，瞰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马以开都。年匪异于万八千，号稍殊于七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开于天地之初，录自帝皇之纪。至若石楼远界，穷桑延壤，非万邦之土中，为二代之天邑。斯乃时犹鼍饮，道尚鹑居，谁知风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长于九域，岂独王于偏方！乃观象垂衣，化穆羲轩之代；翦商伐扈，人浇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战争之患；王道才著，复存韬偃之日。是则怀柔伐叛，取乱侮亡，虽钟大道之行，终伫胜残之战。是故劣于太古，非事优于中代。陛下选芳列辟，垂范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毕，亦何必损益今辰之政，师谟往帝之规！抚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辙，因循勿失，臣谓其宜。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真元一气划分成天地人，是从那浩莽迷濛的最原始的混沌状态演化来的；最高的阳数“九”又历经阳数“七”

变生出来，逐渐对清静无为也就闹不太清了。已经划分出天在上、地在下的基本格局，于是就安排出君主与臣僚的既定位置。这样一来，便有天皇最先出现，看准那昆仑山下的柱州而统领天下。地皇接着取代天皇，俯视那刑马山，建立起都城。它们在位的年限都是一万八千年，而称号却和七十二位曾在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帝王略有不同。天皇既然宣称占据木行之德，那么木生火，地皇也就说是占据火行之德了。它们在天地开辟的起始阶段首先崛起，这在《三皇本纪》和《帝王世纪》这类书籍中都有载录。至于石楼山位置遥远，穷桑也地理偏僻，都不属于万国环绕的天下中心区域，但却成为有巢氏、金天氏的理想都城，这是由于时运还限定在人们无心专去寻求什么食物的状态上，治理大道还在崇尚居无定所的野外方式，当时谁懂得风雨在哪里都降临可却偏要去修建代表着称皇天下或称王天下的宫殿呢？但也是在九州分别设置管理的人员，哪里仅仅就在偏僻的一个地区内说了算呢？于是观察天象，无为而治，教化在伏羲氏和黄帝时代非常美好。到了夏朝讨伐倒行逆施的有扈氏，周朝消灭商朝，世人在夏朝至周朝时期，就变得浅薄了。但在称皇天下的那种德业正隆盛的年代里，并没有彻底消除掉战争的祸患；到了称王天下的大道刚刚变得盛明的岁月里，又出现了收藏起兵器，制止住争霸的一段时间。这就表明，安抚住远方，讨伐叛逆者，攻取败乱的政权，侵侮将亡的国家，尽管有赖于大道的兴行，但最后还要靠那战胜凶残的军事行动。因此事情要比太古时代差，并不是到了中古时代显得更好啊！陛下您在历代的众多帝王中最为杰出，给千秋万代留下了效仿的榜样，仁德的化导已经致使天下太平，所有可以大见成效的治国措施在这里都算登峰造极了，又何必对现今的朝政进行减损或增益，偏要取法古代帝王的那套做法呢？弹拨和谐的琴具而使琴弦收紧，在平坦的大道上奔驰而停驻在已有的辙印上，还照原来那样去做，并不放弃它，臣下我认为这才是最为合适的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戊子科

制科试题

策词标文苑科问三道

问:朕闻立极开基之主,经文纬武之君,莫不法象殊流,污隆异制。至于安人导俗,咸即运以垂芳;缉化宣风,各因时而播美。是以道孚绳木,爰膺九翼之年;图秘龟龙,用启六爻之代。穷桑御历,仰威凤以分司;轩丘列位,因景云而命职。征汾阳之迹,则十政方凝;俯河滨之化,则四门攸辟。祥披玉斗,理九土以兴功;祚徙金精,调五声而作教。周崇六礼,仁义之道为先;汉设三章,王霸之图斯杂。皆所以牢笼八际,矞括三灵,齐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称正。且随时之义,既不相沿,师古之言,又闻前诰。朕钦承先圣,对越上玄。当宁兴怀,真切推沟之虑;凝旒结想,方深驭朽之情。思所以式展宏猷,勉康庶绩,而抚兹薄德,昧此永图。尔等积学多闻,含章独秀,未显畴膺之德,宜申待扣之音。适时之务何先,经国之图何取?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伫听良谟,朕将亲览。第一道

问:朕闻《礼》崇三典,方弘慎罚之规;《书》著五刑,不以深文为义。朕母临赤县,子育黔黎。夏日贻忧,惧青牛之结气;秋荼轸念,虑丹笔之成冤。然以人尚挂于汤罗,情倍深于禹泣。顷者荆郊起祲,淮甸兴妖,朕惟罪彼元凶,余党并从宽宥。今敬真之辈,犹蕴狼心,不荷再生之恩,重构三藩之逆,还婴巨衅,便犯严科。岂止杀之方,乖于折衷;将小慈之泽,爽彼大猷?子大夫等学富三冬,才高十室,刑政之要,实所明闲。倾此虚襟,伫闻良说。第二道

问:朕闻仰观乾象,房、心为布政之宫;俯察坤元,河、洛建受图之所。是以上稽珠纬,得风雨之和;下表圭臚,均远近之节。定都考室,斯焉是崇。顾以庸虚,谬膺大宝。乾乾夕惕,每轸纳隍之怀;栗栗宵兴,恒劳驭朽之念。而昊穹眷命,灵贶屡彰,云构既隆,天城斯毕。是用内省多愧,上答愈勤,将欲殷荐有常,严配不坠,光启惟新之躅,申明祀典

之方,顺四时以布和风,考五物以作正气。盛礼之要,犹虑未弘。尔等并积学基身,含章表质。或远从宾荐,声满于州闾;或遐应搜扬,誉光于朝选。采皇王之奥旨,援周汉之前踪,蕴彼胸襟,咸应备晓。未知何代之政,参酌适中?何礼之规,施用为切?务从必简之道,式崇可久之基。试陈嘉谋,尔其扬榷,思擢太常之第,副朕求贤之怀。第三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确立起最高准则并创立下基业的国主,筹划部署文治武功的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宗奉的对象存在着差异,而压抑什么、侧重什么又制度不同。至于安定民众,化导世风,又全都随顺际运来施布恩惠;凝聚起教化,宣播朝廷的意向,各自根据时势来播扬美好的东西。因而治国大道同结绳刻木记事相切合,于是就造成了长有九支翅膀的天皇辖领天下的时期。神图由灵龟龙马隐秘地降示,由此开启了伏羲氏创制八卦治天下的时代。在穷桑建立城邑的少昊金天氏主宰既定的历数,感召到威严的凤鸟,就用它作名称划分出各个朝廷机构。在轩辕丘建立大本营的黄帝设置官位,依从景云降现的祥瑞来给官职命名。考察去汾水北岸做寻访的唐尧的足迹,十种政务恰恰在获得成功。俯视虞舜在黄河边上的化导业绩,向四方征询意见和求取贤才的明堂大门正在敞开。吉祥显现在胸上长有玉斗花纹的夏禹那里,他就治水并划定九州来兴起功业。夏朝的国运转移到占据金行之德的商汤身上,他就重新制定乐舞来进行教化。周朝崇尚成年加冠和婚丧等六种礼制,把坚持仁爱和正义的准则放在首位。汉代约法三章,王道和霸术的筹谋在这时混杂在一起。以上这些举措都是用来统括起并挟制住八方所有的地区,包容住日、月、星辰,把天、地、人、道这宇宙中的四大聚合成一个整体而占居那至尊的地位,同天上的五方神帝保持和谐的状态而号称最为正统。况且依从时势来治国的具体涵义,既不递相沿袭;效法古代的主张,又在往昔的典册中使人闻知。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前代的圣帝明王,祭享报谢苍天,在临朝听政的时候心潮澎湃,对百姓有人不能安居乐业真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到深沟中的这种忧虑感到特别紧切。在聚精会神听取禀报的时候,想法驱散不开,对帝王治国相当艰险的那种感受正觉得非常深切。于是

思考扩展宏大谋划和努力使各种政事都稳步推进的对策,然而面对自己的浅薄德行,对这长远的筹谋一点儿也不清楚。你们这些应试者积累了深厚的学问,听到过很多的东西,蕴藏着才能,显得十分突出,但还没有表现出谁能努力为国事做出贡献的才德,应当亮出等待扣击那朝廷招贤钟磬的声音。切合当前需要下大力去做的事情要数什么最紧迫呢?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应当取用哪些呢?称帝天下和称皇天下的做法有哪些是正确的呢?称王天下和称霸天下的实施方式有哪些是错误的呢?殷切期待着听到你们有关这方面的美好谋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第一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周礼》看重三类适应对象不同的法典,正是在弘扬那慎重对待刑罚的原则;《尚书》中昭示刺面、割鼻等五种刑罚,但不把曲解条文判定有罪作为宗旨。皇帝我像母亲一样统领整个天下,像对待亲生子女那样养育黎民百姓。在夏季闷热的时候涌生出忧虑,害怕出现汉武帝时通往函谷关的路上有地下冤气聚结而成的青牛样的怪物挡住去路的现象;到秋季该行刑的时候又万分怜念,唯恐存在红笔一挥而错判构成冤案的情况。然而由于世人还有的仍旧陷入当年商汤张布的三面大开的罗网中,心情真是比大禹看到罪犯就对他哭泣加倍地沉重。近来荆楚地区产生了凶气,淮水扬州一带兴起了妖孽,皇帝我只对那些罪魁祸首治罪,剩下的其他党羽一律按照宽大饶恕来处置。可现今李敬业的弟弟李敬真那帮人,仍然包藏着狼子野心,不感念朝廷让他们再生般的恩德,重新构成了皇室亲属的叛逆行径,反过来承受最严厉的惩治,径直触犯严明的律条。这恐怕是运用刑杀止息住刑杀的做法在恰当掌握上出问题了吧?或许是稍加仁慈对待的这类恩泽正与国家的大谋略不符合吧?你们这些士大夫学问很渊博,才能很出众,对于刑罚和政事,实际上是该明了并熟悉的。亮出这毫无任何成见的心怀,殷切期待着能听到你们在这方面的良好建议。第二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抬头观看天象,房宿和心宿是天庭施布政令的处所;俯身察视地理,黄河与洛水构成了承受神图的地方。因而往上查验星象的分布,就得到风雨的和顺降临;往下测定日影的移动,就

调节好各地的节气。把洛阳城确定为京师，在这里修建官室，完全依从这两条。不过凭借皇帝我的平庸无能，错误地承受了帝位。整日里自强不息，夜间还在警惕，常常加重百姓有人受苦受难是自己把他们推入到城池里的那种想法；一直戒惧万分，天还没亮就起身，总也放不下帝王治国相当艰险的那种念头。而苍天把统治天下的大权深深地授付下来，各种罕见的吉祥兆应多次降现，壮丽的宫殿已经耸立起来，京城也整修完毕。因而内心省察起来，深感惭愧，报答皇天的意愿越发迫切，打算使盛大的祭天活动定有常规，庄严配享祖先的礼仪不失落下去，发扬光大国运焕然一新的法式，申明祭祀盛典的具体仪式，随顺春夏秋冬来播布和风，考察木火土金水的流转来振扬起正气。盛大祭礼的要领，还担心尚未齐备。你们这些应试者全都广积学问，构成立身的根基，怀有才能，在质性上表现出来。有的从远处被列入荐举入京的行列中，名声在州县里巷谁都晓得；有的早早就响应朝廷的搜求识拔，美誉在朝士中十分显赫。摘列出三皇和三王的深奥主旨，引证周朝与汉代的往迹，蕴藏在你们的心胸中，想来都是理应完全通晓的了。不清楚哪些朝代的国政，对它们参取酌定就恰如其份了呢？哪些礼法的具体规定，在施用上属于最为紧切的呢？一定要依从那必须简单易行的原则，巩固并强化确能国运长久的根基。尝试着陈述那高明的谋略，你们要列举出概要来，想到被识拔到主管礼仪的太常寺的人选中，切合皇帝我求取贤才的心意。第三道

张说　对词标文苑科策

张说(667～730)　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后徙家洛阳(今属河南)。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应词标文苑科制举，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郎，时年22岁。后预修《三教珠英》，谏武后避暑三阳宫宜早还朝理政。睿宗至玄宗开元前期三次为相，封燕国公。曾劝睿宗以太子(玄宗)监国，向玄宗建议招募壮士充实宿卫，慎对西北用兵。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崇尚气节，重然诺，素

喜延纳后进。卒赠太师，谥文贞。今有《张燕公集》犹传于世。

第一道

对：臣闻舜命昌言，汉征极谏，尝览千古，贤哉二君！今陛下发德音，下明诏，选空岩穴，访匝舆台，大哉邈乎，过之远矣。臣以草莽之贱，谬当车乘之招，诚不足以庶几王庭，充塞大问。伏读圣旨，乃知天情之所在焉。臣闻昔者，鸟迹代绳，龟文演卦，水土迁王，时更万祀，金木互兴，人非一姓。暨乎三皇五帝氏往，夏商周汉氏作，或导人以礼乐，或驱俗以政刑，或革弊以忠敬，或沿风以文武。非师古之诰有殊，尽随时之义且异也。

伏惟圣母神皇陛下，诞受鸿基，光膺骏命。粤若立极格天之业，论道布政之典，任贤克纂之功，出洛飞云之瑞，此并藏纬玉册，勒休金版，郁映于前古，扬光于后叶者矣。至于创业垂统之则，宏猷永图之义，重光三圣，再清六合，可不谓然乎！犹或惕虑推沟，劳谦驭朽，谢文明于薄德，想畴庸于清问。此陛下之至让也，愚臣何足以知之？

策曰适时之务何先，经国之图何取？臣闻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时以设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夫人者，理得则气和，业安则心固，崇让则不竞，知耻则远刑。若强人之所不能，虽令莫劝；禁人之所必犯，虽罚且违。故曰政不欲烦，烦则数，数则政无定，人怀苟免之心。网不欲密，密则巧，巧则文多伤，下有非辜之惧。

窃见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综核之词，考课专于刀笔；抚字之宰，职务具于簿书。陛下日昃虽勤，守宰风化多阙。臣以为将行美政，必先择人。失政谓之虐人，失人谓之伤政。舍人为政，虽勤何为？伏愿陛下，进经术之士，退掊克之吏，崇简易之化，流恺悌之风。画一成歌，此适时之务也；慎贤而用，此经国之图也。苟能英才不弃，大化方隆，而犹曰朝谢垂衣，野非击壤，则文、武之道，尚何言哉！尧舜之君，徒虚语耳。

策曰帝皇之道奚是，王霸之理奚非者，布在方策，臣闻之矣。皇人御历，上淳而下信；帝者膺期，君明而臣哲。周用王道，教化一而人从；汉杂霸道，刑政严而俗伪。故亲誉优于畏侮，文景劣于成康。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虞舜命令大臣们要发表良好的意见，汉文帝征聘竭力规谏的人士，曾经考察整个的历史，这两位君主真是太贤明了！如今陛下发出仁德的话语，下达了明晰的诏书，选取贤才达到了每一个隐士的住地，访求意见遍及到每一处议论的场所。这简直太盛大又太广泛了，远远超过虞舜和汉文帝了！臣下我凭借民间的一名低贱的百姓，错误地被列在朝廷征召的行列中，确实不足以约略对答圣王殿廷的重大询问，可跪拜敬读圣旨，才明白这是天意所在啊！臣下我听说在远古时期，用象形文字取代了结绳记事；由灵龟降示秘文到推演八卦，按照土行克水行的定律转换着当政的帝王，时间历经了上万年，又按照金行克木行的定律迭相兴起新朝代，在位的君主又不就是那一个姓氏。等到三皇五帝过去了，夏商周和汉朝又相继建立起来，它们有的依仗礼仪乐舞来化导世人，有的运用政令和刑罚来使百姓就范，有的通过崇尚恭敬代替崇尚忠厚来革除前一个朝代的弊病，有的凭借文治武功来沿续这种风习。这表明不仅效法古代的训条存在着区别，所有关于随顺时势来治国的具体涵义也有差异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圣母神皇陛下承受宏大的基业，显赫地担当起皇天赐予的统治权。至于确立起最高准则和顺从皇天的事业，讨论治国大道和施布国政的典制，任用贤才和战胜凶暴的功绩，灵龟从洛水中降示神书和景云涌现的祥瑞兆应，这些都是存录在玉册上辅助经书，编勒在金版上昭示美德，既浓烈地映照古代又播布光辉给后世的了。至于创建基业和垂示统系的法则，宏大谋划和长远部署的宗旨，在高祖、太宗、高宗之后再度大放光芒，重新又使上下四方一片清明，能不说是的确如此吗？可仍旧戒惧地忧虑百姓有人不能安居乐业真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深沟当中，在帝王治国相当

艰险上操劳又谦恭，把文德已经辉耀愧谢为自身德行浅薄，从清晰详明的询问来猜想确能为国事做出贡献的人。这正是陛下极度谦让的表现啊!愚昧的臣下我哪里足以了解这一切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切合当前需要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要数什么最紧迫呢?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应当取用哪些呢?臣下我听说，古代依据世人的状况来定立起法度，依从时势来设布教化，按照正义来处置事情，通过礼制来控制人心。作为人，道理讲得通，心气就和顺；本业很安康，想法就稳定。推崇谦让就不争斗，懂得羞耻就离刑罚远远的。如果非要逼人去做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即使严下命令也起不到督促的作用。禁止人们必定会违犯的那些方面，即使予以惩罚也还会去违犯。所以说政事不要让它太烦琐，一烦琐就会来回变，来回一变就政事没有定准儿，人们就揣上侥幸混过去的心思。法网不要让它太严密，一严密就会出现奸巧地利用它的现象，一奸巧地利用它，法律条文就有很多处被歪曲，下面就产生没罪却被说成有罪的恐惧了。

臣下我私下里看到当今的地方官吏，有的并不是纯正的人。他们把严刻当成明了一切，把苛酷当成洞察一切，把榨取下面的钱财作为谋求私利的来源，把讨好上司作为忠诚的表现。全面验定名位与实绩的文词，在应付考核督察上全权交给那帮刀笔吏去编造；安抚养育当地百姓的州县长官，职务只是在上报的公文上虚表一通。陛下尽管忙碌得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可地方长官的道德教化却大多做得很差劲。臣下我认为，打算推行开美好的国政，一定要首先择取好人选。国政出了偏差，这就叫做虐待百姓；人选不合适，这就叫做损害国政。放着择取人选不管而去推行国政，尽管很忙碌，可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跪拜敬请陛下进用那些精通儒家治国方法的人士，斥退那群榨取民财的官吏，重视简单易行的教化，播扬开尊敬兄长爱护弟弟的风气。道德和风气归于统一，形成赞颂的歌谣，这正是适合当前需要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啊!审慎地对待贤才并加以任用，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呀!如果真能做到英才不被遗弃，普遍的化导也就恰恰十分隆盛，可仍旧说什么朝政还

够不上稳稳坐定就全面得到了贯彻执行，田野上还不是老年人敲击土块在歌唱的景象，那么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原则与方法，还能针对什么来说呢?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也只是变成一堆谎话罢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称帝天下和称皇天下的做法有哪些是正确的呢?称王天下和称霸天下的实施方式有哪些是错误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都载录在古代的典籍上，臣下我对此曾经听说过了。称皇天下的人主宰既定的历数，上面淳朴而下面信实。称帝天下的人轮到该执政，君主英明而大臣富有智慧。周朝施行仁德的统治方式，教化统一而世人顺从。汉朝夹杂着使用刑罚的对策，刑罚和政令严厉但社会风气却奸诈虚伪。因此让百姓感到君主可亲并赞颂他，也就胜过使百姓害怕受到那官府的刑罚了；汉文帝和汉景帝也就比不上周成王与周康王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臣闻刑以助教，德以闲邪，先王慎于好生，《大易》诫于缓死。今陛下母临黔首，子育苍生，孚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东南小侵，荆蛮远郊。虽圣德泣辜，尚用防风之戮；天心罪己，仍劳淮甸之师。其有诖误闾阎，胁从井邑，陛下愍孤孀于海淮，恤困穷于江汉，舍从宽宥，此陛下之恩也。而蓑尔余孽，蠢兹顽凶，思弄兵于汉地之下，将构衅于戎狄之域。罪盈稔贯，祸得萌芽。此又陛下之明也。今陛下乃赐臣策曰：岂止杀之方，乖于折衷；将小慈之泽，爽彼大猷?臣实见折衷大猷之规，不知小乖微爽之义也。

策曰刑政之要，实所明闲。臣闻政同水火，刑譬阴阳。顷者三监乱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明辟赦之渥恩，安万人之反侧，布深仁于罗鸟，收至察于泉鱼，岂不大哉!天下幸甚。且夫人者，氓也，暗而不可罔；庶者，众也，愚而不可欺。是以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故明王之理天下也，刑一则人畏而不干，政简则俗齐而不伪。于是祸乱不

作，灾害不生，君安于上，臣悦于下，百姓日用，不知其然。四海风动，惟帝之则，道畅钟石，声流舞咏。其行己也非他，所理者以此。刑政之要，庶几一隅。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道德是用来防止邪恶的，古代的圣帝明王对喜好化生的问题特别慎重，《易经》上也把延缓死罪作为训诫。如今陛下像母亲一样统领众百姓，像对待亲生子女那样养育世上人，真诚地佑护下面的民众，确实能当好天帝的助手。然而出现东南地区的掀不起风浪的叛逆行径，荆楚一带的少数部族脱离开辖领。尽管像大禹那样圣明仁德的君主看到罪犯就对他们流泪，但还对会盟时迟到的防风氏施用斩刑。像周宣王那样深知天意谴告，引咎自责，但仍要出动平定淮水一带作乱方国的军队。对那些被同乡连带上而误入歧途或因在本地而被迫跟从的人，陛下您哀怜到处死他们而在扬州地区剩下的孤儿寡母，体恤到长江汉水一带走投无路的人们，于是一律免罪，按宽恕处置，这正是陛下的恩德啊!但那些渺小的余孽，妄图在华夏的领土上起来造反，打算在异族的区域里挑起战端，简直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杀身之祸就开始招到自家头上了。这又正是陛下的英明之处啊!如今陛下竟赐给臣下我策问说：恐怕是运用刑杀止息住刑杀的做法在恰当掌握上出问题了吧?或者是稍加仁慈对待的这类恩泽正与国家的大谋略不符合吧?臣下我实际上只看到了在国家的大谋略上应该恰当掌握的这一原则，并不晓得对此稍加违背或略微不符合之类的意思呀!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对于刑罚和政事，你们实际上是该明了并熟悉的。臣下我听说，政事就和水柔火猛一个样，刑罚就如同阴阳的交替运作。近来有人像周初管叔、蔡叔、霍叔那样联合反叛而搅乱纲常，国家主管部门已经运用严厉手段把他们纠正过来了。到现在像虞舜时共工等四个那样的大罪人受到了惩治而天下都心服了，陛下就应当通过宽大的政策来饶过其他的人。宣明赦免的厚恩，安定住众人的不安情绪，对陷入法网的徒众施布深厚的仁德，把那任

何东西都不放过去的察视从搅在里面的余党那里收回来，这还不度量宏大吗?天下人真是幸运到极点了!况且世人也就是田野上的平民啊，他们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却不可以瞒哄；普通百姓也就是群众啊，他们尽管愚蠢但却不可以欺骗。因而刑罚在于必定要清明，不在于必定要惨烈；政事在于必定要信实，不在于必定要烦苛。所以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对一个人使用刑罚而其他人就感到害怕而不去触犯，政事简明而民风就一致而不要弄奸诈。于是祸乱就不出现，灾害就不产生，君主在上面很安宁，臣僚在下面很高兴，老百姓的日常需用与活动，都闹不清它们是怎样形成那个样子的。四海闻风响应，只管照帝王说的去做，治国大道在钟磬乐器的演奏中透泄出来，美好的名声在歌舞咏唱中四处流布。在自己这里要施行的，并不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实现治理的，正由于这个缘故。刑罚和政事的要领，这也差不多就掌握住一个方面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三道

对：伏惟陛下，则天法地，畏命重人，据河洛之规模，总风雨之交会。轩后鱼图之水，建邦设都；周公龟墨之地，考堂作室。灵祇降福，嘉祥荐祉，制同神造，力以子来。将以殷荐上帝，至德也；严配先王，至孝也。是以八风攸序，四时克谐，无得而称，能事毕矣。犹复执劳谦之不已，惧盛礼之未弘，访末学之臣，询稽古之政。斯事体大，臣何足言?然而敢不钦承，以竭涓滴耳。

策曰何代之政，参详适中?何礼之规，施用为切?臣谨错综三五，明征《典》、《坟》，窃以纬武经文，布方策而非远；英风显号，流《颂》声而可袭。未有反义背德，而至升平之政；弃礼违经，以克永终之禄。莫不发号施令，法乾坤而动静；执契悬衡，顺金木之刑德。是故青阳玄室，遵季孟而观风；白辂朱旗，乘《离》、《兑》而布政。养老用上庠之礼，教胄取《大学》之义，环水著辟雍之名，向阳表明堂之位。盖所以享群瑞，朝诸侯，班正

朔，调景纬，成简易之业，崇久大之基也。皇王奥旨，庶此详探，周汉前踪，固难守用。臣才智驽劣，草莽鳏生，至如军国务广，政刑理急，但至敬无文，信言不美。陛下欲听其说，必观于事；将逆其谋，先求诸道。危言抵禁，破胆寒心，伏惟圣主，稽留天听。谨对。

对答如下：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取法皇天，效仿大地，畏惧天命，看重人事，据持黄河洛水的地理形势，总括起风雨的交融汇合。在当年黄帝获得到大鱼带来神图的水畔，建立国家，设置京都；在当年周公三次占卜确定的地段上，勘察设计殿堂，修建宫室。天地神灵降赐福庆，罕见的祥兆献上吉福，规制样式如同神灵造设，力量凭借是天子而涌来。准备用这一盛事盛大地祭享天帝，这正属于最高的德业啊!庄严地配享先王，这正属于最大的孝行啊!因而从八方递起的暖风与寒风就一种接一种吹来，春夏秋冬交替到来，简直找不出恰切的语言来做称述，人力所能做的一切都包括进来了，可还仍旧执守勤劳而又谦恭不罢休，担心盛大的礼仪尚未齐备，寻访像我这样学问浅陋的臣子，询问考察古代应该如何做的政务。这宗事规模宏大，臣下我哪里有资格讲论?然而敢不恭敬地承奉吗?也只是用来竭尽那点滴的力量罢了。

皇帝的策问中说：哪些朝代的国政，对它们参取酌定就恰如其份了呢?哪些礼法的具体规定，在施用上属于最为紧切的呢?臣下我审慎地交错综合三皇五帝的事迹，详明地验核《三坟》、《五典》这类经籍，私下认为筹划部署文治武功，全都载录在典册上，并非离得很遥远。英烈的风范和显赫的称号，在《诗经·三颂》的篇章中流播，完全可以承袭。从来没有违反道义背弃仁德却实现了太平的国政的，也没有废弃礼制违逆常规却能享受到最后的福禄的。无不发号施令，效法天地来采取行动或稳坐不动。执持住吉凶的关键并公布法度，顺从金行克制木行的定律来刑德相配合。因而天子春季在明堂的青阳堂，冬季在玄室，依从每季三个月的时序来观察天象；秋冬乘坐白色的专车，夏季打出红色的大旗，随顺《离卦》所

代表的南方和《兑卦》所代表的西方这种空间序列来施布政令。敬养德高望重的老人采用虞舜时特在国都西郊的上庠这一最高学府的礼仪，教育贵族的子弟取用《大学》的思想内容，四周水流环绕来突出“辟雍”这一最高学府的名称，方向朝南来显示明堂这一施政布教的处所的方位。所有这一切，目的都是接待持有五等玉圭信符的群臣，接受诸侯的朝拜，颁布精确的历法，调节星象天文，成就简单易行的帝业，巩固并强化国运长久的根基啊！三皇和三王的深奥主旨，大致上该这样去详尽地探究；周朝和汉朝的史迹，原本上就难以恪守行用。臣下我才能和智慧太迟钝低劣，生活在民间的偏僻角落，至于军国方面的事务相当广泛，政事和刑罚处理起来又十分紧急，也只需要极其虔敬，没有夸饰的东西，言出必行而不动听罢了。陛下想采纳谁的主张，一定要在事实上加以考察；打算拒绝谁的计谋，首先要在大道上进行对照。臣下我口出直言，触犯了禁令，感到万分地惊惧，跪拜只请圣明的君主拿在手中看一会儿。恭敬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己丑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科问二道

问:朕闻体国经野,取则于天文;设官分职,用立于人纪。名实相副,自古称难,则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谬荷昌图,思欲追逸轨于上皇,拯群生于季俗,澄源正本,式启惟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职,各得其长。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此虽孳孳束帛,每赍于邱园;翘翘错薪,未获于英楚。并何方启塞,以致于兹?伫尔深谋,朕将亲览。第一道

问:朕闻轨物垂训,必体正于因生;开国承家,理崇光于敦本。故七叶貂珥,表金室之荣;十纪羽仪,峻班门之躅。保姓受氏,义先于睦亲;翼子谋孙,事隆于长发。朕以蹇昧,叨奉先灵,坠典咸新,遗章毕睹。思欲甄明谱系,澄汰簪裾,派别淄渑,区分士庶。至如陈、田互出,虢、郭俱开,束皙改汉传之宗,辅果易晋卿之号。巨君之姓,曾非驭鹤之苗;元海之家,谅非扰龙之族。永言纰缪,良用怃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学,允迪褒然之举,宜扬锵尔之词。至若北郭、南宫,本因何义?三乌、五鹿,起自何人?公孙之由,司马之姓,咸加辨析,且显指归。式副对扬,朕将亲览。第二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规划国都,丈量田野,全都取法那天象;设立官位,划分职守,用来确立起人伦的纲常。名分和实际彼此一致,自古以来做到这样都说很难。知人善任就明智的具体举措,是深深不容易的。皇帝我凭借微薄的德行,错误地承担起谋划国家昌盛的重担,心想要从古代最贤明的帝王那里追寻出已经湮灭的法式,把世人从末代的衰败习气中拯救出来,澄清源头,端正根本,开启国运焕然一新的局面,使任用贤才能人,不被搅乱正常的次序,依据政事履行好

自身的职责,各自发挥出本人的长处。至于考核督察官员的办法,还在废除什么和采用什么上闹不清楚;降职罢免和晋升的宗旨,仍对古今的说法存在着疑惑。不知道哪位帝王的法度可以遵用,哪些朝代做出的沿承与变革最恰如其份?在这方面尽管表示聘请的成堆礼物常常耀眼地摆列在隐士的住所,可在众多又丛杂的群才中并未获取到杰出的人物。综合到一起,该用什么办法打开那闭塞的思路,来达到预期的目的呢?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的深远谋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第一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规范事物,垂示训条,必定要从它们产生的地方确定正位所在。册立诸侯邦国,传续卿大夫的封邑,也要在注重根本上处理好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七代接连朝冠高戴,显耀出西汉金日磾一家的殊荣。十世身居高位被人尊重,树立起了西汉班况一家的楷模。保全族姓得到本氏,这种义旨比亲属应和睦相处还重要;庇护子辈并给孙辈留下谋划,这一事项比家族长久呈现出祥兆还隆盛。皇帝我凭借闭塞暗昧的天性,侥幸承奉先王的灵光,使沉沦的圣典全都重放光辉,遗佚的图籍让人一律再看到了。心想甄别辨明宗族传衍的系统,对显贵者进行一番清理,划分出高低上下来,区分出士族与平民来。至于陈姓和田姓本为一姓却交互出现,虢姓与郭姓也本为一姓却同时开列,晋朝的束皙却改变了西汉代代繁衍的疎氏本姓,春秋时的辅果也改变了晋国六卿中知氏的原号。篡汉称帝、表字巨君的王莽的姓氏,终竟也不是登仙乘鹤的周灵王太子王子晋的后裔;在西晋末期建立汉国、表字元海的刘渊的家门,也委实不是夏朝时能驯龙的刘累的本族。可世上却总那样错误地讲说,确实使人感到太失望了。你们这些士大夫在十户人家组成的居民区中都是数得出的人物,历经三年苦读而积累了丰富的学识,认真加入了衣冠楚楚的荐举,请宣明播扬那铿锵有力的言词。至于北郭和南宫这两个复姓,最初是根据什么意义而来的?三乌和五鹿这两个复姓,又是从哪个人开始的?公孙这一复姓的由来,司马这一复姓的获得原因,都请加以辨析,并且揭示出它们的主旨所在。要符合对答称扬天子命令的要求,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第二道

张柬之　对贤良方正策

张柬之(625～706)　字孟将，襄阳(今属湖北)人。少年即涉猎经史，尤好《三礼》，补太学生，深受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的器重。后进士及第，调任清源丞。武则天永昌元年(689)以贤良征试，对策在千余人中独为第一，时年已届65岁，授官监察御史，后迁凤阁舍人，又出为合州、蜀州刺史，谏罢每岁以兵五百戍姚州。经狄仁杰和姚崇先后推荐，入为宰相，遂乘武后病重发动政变，恢复中宗帝位，以功擢拜天官尚书，旋迁中书令，封汉阳郡王。不久被武三思所排挤，乞还襄州养病，在故乡对亲属绳之以法，并筑堤防洪，使州城免受汉水淹灌。寻贬新州司马，忧愤而卒，卒年82岁。其为人刚直不附会，学问深邃，曾编次书籍数十篇，已佚。

第一道

对：臣闻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显阐幽，昭隆大业，瀍洛之功既备，范围之理亦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统辑黎元，载黄屋，负黼扆，居紫宫之邃，坐明堂之上，顺阳和以布政，摄三吏而论道，雍容高拱，金声玉振，征求无厌，误及厮贱。微臣材朽学浅，诚不足以膺严旨，扬天休。虽然，敢不尽刍荛，罄狂瞽，悉心竭节，昧死上对！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王者受命于天，故则天而布列职。天生蒸人，树之君长，以司牧之。自非聪明睿哲，齐圣广深，不能使人乐其生，家安其业。陛下德自天纵，慈悯元元，既乐其生，且安其业。臣闻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游于囿，凤皇集于庭，庆云出，神龙见，其余草木烟露之祥，不可胜记。陛下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祯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圣人之鸿业也。

臣闻《河图》、《洛书》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师说曰：圣人自伤己有能致之资，而天不致也。陛下有

能致之资而天蕴者，所以扶助圣德，抚宁兆人也。臣观今朝廷含章赡博之士，鲠言正议之臣，陛下诱而进之，并践丹地，伏青规，颙颙昂昂，云属雾委，鸾骞凤振，佩金鸣玉，曳朱纡，扬翠绥，充牣于阶庭者矣。昔舜举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前史美之，称曰尽善尽美。虽甚盛德，无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恶，昭德塞违，万万于虞舜。自托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议哉！

制策曰：思欲追逸轨于上皇，拯群生于季俗，澄源正本，式启惟新。臣闻善言古者，必考之于今；善谈今者，必求之于古。臣窃以当今之务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迹而比之当今，以为三皇神圣，其臣不能及。故于亲之。陛下刊列格，正爰书，修本业，著新诫，建总章以申严配，置法匦以济穷冤，此前圣所不能为，非群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师师，罔不咸乂，此群臣之能奉职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业也。

臣以今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县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联焉，有社稷焉，可谓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训其人，问于樊仲曰：吾欲训人，诸侯谁可者？仲曰：鲁侯肃恭明神，敬事耆老，必咨于故实，问于遗训。乃立之。晋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马，一时之高选；台郎、御史，万邦之俊哲。若出于宰牧，颂声兴矣。由此言之，则古牧州宰县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训不倦、动简天心者，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

今则不然多矣，门资擢授，或以勋阶莅职，莫计清浊，无选艺能。负违圣诫，安肯肃恭明神？轻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舍自便，安能求之故实？举措纵欲，安能问之遗训？选异一时之高材，非万邦之俊杰。于是多其仆妾，广其资产，齿角两兼，足翼双备，蹈瑕履秽，不顾廉耻，抵网触罗，覆车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故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人，无三皇之吏也。

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效力，各得其长。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臣闻皇王之制，殊条共贯，虽有改制之名，无不相因而

立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然则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虽有沿革,所取不殊,期于不滥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绩之规甚著。臣以为犹舟浮于水,车转于陆,虽百王无易也。今邱园已贲,英楚云集,启塞之路,岂愚臣所能轻云也?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孔老夫子修撰《春秋经》,把元气、四季、承受天命、端正教化、治理一国的开端借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样的字眼显示出来,作为法式,端正称王天下的治国大道的起始状态,彰显隐微的东西,阐明幽昧的事情,昭示一代新王的隆盛大业。像当年洛水灵龟降示神书的那等功绩既已齐备,规范一切事物的道理也相当精深。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承受皇天明晰赋予的统治天下的命令,统领并安抚黎民百姓,乘坐黄缯裹盖的专车,背靠图案绚灿的屏风,居住在皇宫的深处,端坐在明堂的上面,顺随阳气的协调流转来施布政事,辖领起三公来讨论治国的大道,从容不迫地在高处稳稳坐定,发布响亮和谐的命令,征聘搜求没有满足的时候,错误地延及到像臣下我这样最低贱的人。臣下我渺小得很,才质如同朽木,学问十分浅陋,实在不足以承奉严明的圣旨,称扬美好的命令。尽管是这样,哪敢不竭尽割草打柴人的那点儿看法,全部抖出轻率又昏昧的意见,用尽心力,完全履行身为臣民的节操,冒着死罪来向上面做出对答呢?

臣下我听说,皇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帝王从皇天那里承受到统治天下的命令,因而要效法皇天设布下百官的职位。皇天降生下众百姓,给他们树立起君主师长,专去管理他们。原本上并不属于耳聪目明,敏锐机智,任何举措都恰如其份,通晓众务百事,器度宏大宽广,了解一切又谋虑深远,也就无法使人人都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快乐,家家都安心自身的职业。陛下德性从皇天那里得到赋予,仁慈地怜悯天下百姓,既让他们对自己的生存感到了快乐,又使他们安心自己的职业。臣下我听说吉祥的兆应是皇天对君主进行申饬命令的手法呀!因此就让麒麟来到皇家的园林跑来跑去,凤凰聚集到庭院中,似

烟非烟又若云非云的庆云涌现出来,神龙降现下来,其余的草木烟露之类的祥兆,更多得记述不过来。陛下一天更比一天谨慎,已经局面特美好了可仍不认为美好,所以皇天就用吉祥的玉石来作申饬,拿神文来作嘱告。这种圣人的宏大事业真是太盛大了呀!

臣下我听说,《河图》与《洛书》不再降示,已经时间很长了。孔子说:凤凰鸟不飞来,黄河不再降示神图,我也就感到绝望了。对此传授经典的先师的说法认为:这段话是圣人自己在伤感本人具有能让它们来到的本领,可皇天却不叫它们来到啊!陛下具有能让它们来到的本领可皇天还没叫它们来到,目的是促使陛下进一步扶植协助皇天的圣明仁德,安抚稳定住亿万民众啊!臣下我观察当今朝廷上怀有才华又学识渊博的士子,直言不讳又议论纯正的臣僚,陛下对他们加以诱导又加以进用,全都站立在殿廷上,伏身在进谏奏事的席位上,既庄重恭敬又气宇轩昂,既像云彩一样汇集又像雾气一样聚积,既像鸾鸟一样飞翔又像凤凰一样展翅,既佩带金印又发出玉串的响声,牵扯起官袍,振扬起朝冠,在殿阶下和庭堂上布列得满满的了。从前虞舜起用八元、八凯这十六名辅相,去除掉共工等四个大罪人,建立了二十项大功勋,于是成为了天子。前代的史书赞美他,说是尽善尽美。即使是盛大的仁德特别突出,可也没办法凌驾在虞舜的上面。陛下表彰良善的人,摒弃邪恶的人,昭明道德,杜绝住违反道德的做法,已经超过虞舜亿万倍了。可仍把自己摆在道德微薄的位置上,愚昧的臣下我哪里有资格瞻仰陛下的风采而敢再有什么议论的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心想要从古代最贤明的帝王那里追寻出已经湮灭的法式,把世人从末代的衰败习气中拯救出来,澄清源头,端正根本,开启国运焕然一新的局面。臣下我听说擅长讲述古代治绩的人,必定要对当今做出考察;擅长谈论当今对策的人,必定要对古代进行研求。臣下我私下拿当今的要务去稽核古代,用古代的史迹来对照当今,认为三皇最神圣,他们手下的大臣也很难让后世赶得上。所以就该靠近他们。陛下修订各种规章制度,纠正对罪犯的判决书,修明本业,宣布新的诫令,建立总章堂来申明庄严地配享祖先的礼仪,设置意见箱来救助含冤无处上诉的人们。这都是古代圣人根本

就做不了而群臣又不能想象到的举措啊!如今朝廷的政事,上面有命令,下面就执行,如同身躯指挥臂膀,臂膀又指挥手掌一般,文武百官肃敬谨慎,无不使本部门得到治理,这正是群臣确能恪尽职守啊!《尚书》中说:元首圣明啊,大臣们贤良啊,一切政事都顺利正常啊!所以臣下我认为陛下既占有三皇的尊位,又能发扬光大三皇的功业啊!

臣下我鉴于当今的刺史,也就是古代十二州的长官;当今的县令,也就是古代辖有百里封地的国君。存在着官署之间相互协助联合办理的法度,关系到国家如何,可以称得上责任重大了。任用他们却不是合适的人选,由此造成的危害也就更严重了啊!从前周宣王打算训导人民,就向樊仲穆询问说:我打算训导人民,诸侯中谁是可以当鲁国国君的人呢?樊仲穆回答说:鲁侯姬称严肃恭谨,明智神异,恭敬地事奉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事必定向他们访求以往的正确例证,询问前人留下的训条。于是封立他为鲁国国君。晋朝的著名大臣也强调:舍人、洗马这类官员,都是一时间考选出的突出人物;台郎、御史这类官员,都是各地的英才智士。如果派出去担任地方长官,民间颂扬的歌谣也就传播起来了。由此说来,古代辖领各州和管理各县的官员,不改换那些胜任的人选啊!原本上就不属于对百姓慈惠地进行训导而不疲倦、一有举动就查验皇天意向的人,不能够把州郡县邑的职位任命他们担当。

如今不像古代那样的地方简直太多了。按照门第资格提拔任用,有的凭借所享荣誉称号的等级充任官职,不分好坏优劣,不选取道艺才能。违背圣上的诫令,哪肯严肃恭谨又明智神异?轻视事理又随意对待法度,哪肯恭敬地事奉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取用和舍弃什么自己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哪肯访求以往的正确例证?举措凭着性子来,哪肯询问前人留下的训条?考选偏与一时间的高才不对应,够不上各地的英才智士。于是把自己的奴仆和姬妾弄得多多的,把自己的资产捞得足足的,牙齿和犄角两方面都露出来,双脚和翅膀同时搧起来,什么肮脏事都去干,根本不考虑廉耻,违犯法律规定,受到惩罚一个接一个。孔子说过:已经得到了它,又唯恐再失去它,如果担心再失去它,那就没有什么都干不出来的了。所以臣下我认为陛下拥

有三皇时代那样的人才，可却没有三皇时代那样的官吏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使任用贤才能人，不被搅乱正常的次序，依据政事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各自发挥出本人的长处。至于考核督察官员的办法，还在废除什么和采用什么上闹不清楚；降职罢免和晋升的宗旨，仍对古今的说法存在着疑惑。不知道哪位帝王的法度可以遵用，哪些朝代做出的沿承与变革最恰如其份？臣下我听说三皇与三王的制度，具体规定不同，但脉络连贯。虽然存在着改变制度的名义，但无不递相沿袭而定立起政事来。孔子说：殷朝承用夏朝的礼制，其中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能了解到的；周朝承用殷朝的礼制，其中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也是能了解到的。有谁取代周朝建立起新王朝，即使是任何朝代也是可以了解到的呀！既然如此，那么虞帝的九年中进行三次考核，决定对官员的罢免或提升；周王的以廉洁为根本的考察官员的六个方面的事项，尽管存在着互有沿袭与变革的地方，但所择定的目标却并无不同，只希望达到不冗滥罢了。陛下择取人才的准则相当明确，考核政绩的规定十分显著。臣下我认为就像船只在水上飘浮，车辆在地上转动，即使任何朝代的帝王也改变不了啊！如今对隐士的住所已经摆列下征聘的众多礼物，杰出的人才像云彩一样聚集，打开闭塞思路的途径，哪里是臣下我所能轻率地就讲论的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臣闻保姓受氏，明乎典训。或因地以赐姓，或因官而命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为氏。诸侯之子，称为公子；公子之子，称为公孙；公孙之子，乃以其王父字为氏。后代因之，亦以为姓。田、陈、虢、郭，以声近而遂分；辅果、束皙，以避难而更改。王莽以田王为氏，元海因汉甥立族。骚、括分南北之号，充宗为五鹿之先。应氏著书，具表三乌之始。司马、司徒，是曰因官；公孙、叔孙，《春秋》备载。

陛下尽六艺之英，穷百代之要，淑问扬天地，玄情贯幽显。

《黄竹》清歌，词穷五际；《白云》高唱，文苞万象。昔曹门三祖，道愧《由庚》；刘氏四叶，仁非解愠。岂若睿思琼敷，同雨露之沾渐；神机茗发，等曦望之照临。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坟》而独秀。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训，名闻于圣听，言奏于阙前。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保全住族姓，获得到本氏，这在经典训条中说得很明确。有的是依据祖先出生地来赐给姓，有的是依据担任的官职赐给氏。有的担任某一官职因为世世代代立有功劳，也用它作为族姓；还有的在受封的领地，依据这来作为氏。诸侯的子辈，称为公子；公子的子辈，称为公孙；公孙的子辈，就用他们的祖父的表字作为氏。后代沿用这些做法，也把它们作为姓。田姓与陈姓，虢姓与郭姓，由于读音很接近，于是就划分出来了。春秋时晋国的辅果，西晋的束皙，都是出自躲避祸难自行就更改了他们的原姓“知”和“**疎**”。篡汉称帝的王莽依据战国田和取代齐国世代称王来作为自己的姓氏，在西晋末期建立汉国的刘元海根据是西汉刘氏皇朝的外甥辈来定立起族姓。从春秋时的北郭骚和周文王时的南宫括，分出了南宫和北郭这两个复姓，西汉时的五鹿充宗，是姓五鹿这个复姓的第一个人。东汉的应劭编著《风俗通义》这部书，详尽说明了三乌这个复姓的由来。司马、司徒这类复姓，就叫做根据所担任的官职为氏名；公孙、叔孙这类氏名，在《春秋经》上记载得很完整。

陛下延揽到精通儒家《六经》的所有英才，穷尽了各个时期的要务，美好的询问播扬到天上地下，玄妙的情思贯穿起隐微和明显的地方。那类周穆王哀怜民生的《黄竹歌》在清晰地咏唱，词章遍及到《诗经》中卯、酉等五个年份的阴阳终始的际会；那类西王母创作的《白云谣》在高声地吟唱，文辞包罗了天地人间的一切事象。从前曹氏一门的太祖曹操、高祖曹丕和烈祖曹叡，在治国之道上有愧于《由庚》诗所咏赞的万物按那生长规律都化生出来。西汉刘氏从高帝到武帝这四代君主，在仁德上并不是能使天下百姓都

解除心中的怨恨。哪里比得上陛下圣明的思虑如同琼浆般洒布，和雨露浇灌滋润万物一模一样；神妙的想法酷似玉屑般迸发，与太阳月亮的照临完全相同。兴起五帝的《五典》而又高高屹立，包孕三皇的《三坟》而又一枝独秀。臣下我沐浴到淳厚柔和的哺育，侥幸承奉最为深切的训示，姓名传到了圣上的耳鼓里，意见奏呈到宫门前。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长寿三年(694)甲午科

制科试题

策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问三道

问:若济巨川,必凭舟楫之势;将兴大厦,实仗榛栌之材。圣皇提象膺符,顺天革命,变浇风于易简,跻薄俗于醇酞。未明求衣,宵旰忘食,无遗庖鼎,不弃刍荛。闻逆耳之言,欣然启齿;听犯鳞之说,假以温颜。缅怀七圣之规,劳求五臣之俊。至如临难不顾,知无不为,献替帷幄,匡过补阙,爰洎御命之流,并应搜扬之旨。子大夫博古强学,见贤思齐,一善或同,千载相遇。肇自汉魏,以及梁陈,若斯之人者,布在方策。宜具载年代,各叙徽猷,无惮米盐,用旌多识。第一道

问:自周星攒耀,汉日通辉,象教聿兴,苾刍郁起。眷兹和众,因果为先,伊此法门,栋梁攸属。我皇光膺天授,托降阎浮,弘八解之要津,启四禅之幽键,济含生于彼岸,证圆果于中天。绀宇巍巍,缁徒翼翼,莫不誉高澄、什,声重安、远,振三翻于辨囿,悟两谛于谈筵。飞锡烟蒸,乘杯雾委,兰艾因而或糅,玉石由是难甄。迹虽选于玄关,名乃编于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将恐乖智海之宏规,匪提河之遗范。然则经行之所,在释氏而含容;朱紫分区,谈王化而期切。弛张之术,去就何从?第二道

问:神农王曰:金城千里,汤池百步,而无粟者不能守也。然则师出以律,咸资于糗粮;兵虽尚奇,必藉于流衍。皇周八纮有截,四海无虞,折冲樽俎之间,旋军衽席之上。而吐蕃小丑,时扰于沙场;默啜遗凶,偷生于玉塞。由是任以精卒,寄以边陲,车徒置骑,实赖防御。飞刍挽粟,转馈之弊尤深;疆理屯田,播植之功难就。欲使人无忧于半菽,岁有积于如坻,强国富氓,伫聆良策。第三道

提问:如果想渡过大河去,必定要借助船只和船桨的力量;准备盖起大厦,实际上要靠能做斗拱和栋梁的木材。圣明的当朝皇帝执定

证象又应合符命，顺从皇天取代李唐的统治权，把衰败的世风转变到简单易行的状态，把浅薄的民俗带入淳正厚重的境地。天还没亮就起身，从早到晚总是忙碌得顾不上吃饭，既不遗漏会炒菜做饭的人，也不抛弃割草打柴的人。听到很刺耳的意见，非常高兴地让他只管讲；听到触犯到要害的说法，采取温和的态度来鼓励。深深追思唐尧到周公等七位圣人的规制，辛勤求取虞舜手下像大禹、后稷那样的贤臣。至于面对危难而奋不顾身，了解到什么就都去实行，在君主面前提出国事兴革的建议，匡正过失又弥补缺陷，从承奉圣命的人们那里，全都应合朝廷予以搜求选取的用意。你们这些士大夫通晓古代，致力学问，看到贤人就想同他一样，有一处美好的见解两相契合，就像历时千年才碰上一般。从汉代曹魏开始，直至梁朝陈朝，类似以上列举的人，都载录在史书上。应当对此详尽开列出年代，分别叙述他们的美好谋略，不要怕什么繁杂琐碎，用来表明自己记住的事情特别多。第一道

提问：自从象征周朝统治的星宿聚集起光辉，代表汉代执政的太阳普照各地，佛教于是开始兴行，僧徒大量涌现出来。深想这些出家人都把因果报应放在第一位，按照它那修行的门径，只有突出的人才有希望。我们的皇帝显赫地承受起皇天的授命，像佛祖那样托生转世到人间，扩展佛门八解脱的切要途径，开启四种根本禅定的隐秘关键，把一切生物普渡到幸福的彼岸，在最高的天界证成圆满的圣果。佛寺辉煌壮观，僧徒万分虔诚，没有谁不比晋代高僧佛图澄和鸠摩罗什还声誉更大，名望比晋代高僧道安和慧远还要高出，在辩论的大会上振扬那三净业碾摧众生惑业的佛法，在讲席上使人领悟真谛和俗谛。手拄锡杖四处传教之类的和尚像烟霞一样升腾，乘坐木杯渡水之类的异僧像雾气一样聚积。兰花与艾草因而有的就混杂在一起，美玉与石头由此而难以辨别出来。形迹虽然被选入了奉佛修道的范围里，可姓名竟还登记在平民的户口上。如果想下命令进行淘汰，用刑法加以督促，恐怕会与佛门的宏大规制相违背，不属于佛祖留下的范式。既然如此，那么在旋绕往返练功的固定处所内，在佛教那里讲究包纳宽容，而使僧众与平民严格划分开来，讲论帝王的化导就感到很迫

切。放宽和收紧的对策,在采用与弃置上又该依从哪一种呢?

提问:神农氏说:坚固的城墙上千里,险峻的护城河宽百步,可没有粮食的人也守护不住啊!既然如此,那么按照军纪出动部队,全都要依赖那粮草;用兵尽管看重奇妙,也必定借助那地形。我们盛明的大周皇朝对八方极远地带都整齐划一了,四海以内没有值得担心的事情,在酒宴谈判上就击退了敌军,在平安欢乐中就收兵回朝。可吐蕃这少数部族,却时常在沙场上进行骚扰;突厥默啜可汗留下的凶孽,仍然在边塞一带偷偷生存。由此而朝廷拿精兵去驻守,把边疆交付给他们,步兵又配置战马,实际上是依赖这些设施做好防御。但长途又快速地运送粮草,辗转供应军需的弊病非常严重;筹划部署屯田事宜,种粮收粮的功效又很难实现。想让人们对年景歉收不存在忧虑,每年积蓄达到粮食如山的地步,使国家强盛又使百姓富裕,期待着听到这方面的美好计策。第三道

薛稷　对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策

薛稷(649~713)　字嗣通,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人。其曾祖父为隋朝著名诗人薛道衡,外祖父为唐初名臣魏徵。既擢进士第,又在武则天长寿三年(694)临难不顾徇节宁邦制科中对策第一,时年46岁。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中宗时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睿宗时以拥立之功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除以辞章知名外,尤擅书法,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兼工绘画,画鹤更为生动,时称一绝。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而未告发,被赐死狱中。碑刻今传《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及《信行禅师碑》。

第一道

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是群龙无首,虚己明庭之上;鼷鼠全身,深穴神邱之下。故有劳于一馈,不辍子高之耕;待以三

旌，无过屠羊之肆。怀乎朽驭，既识为君之难；蹑此春冰，未见为臣之易。然而梦弼降佐，风起云从，其天祐之，俊乂将至。当今制贤以禄，制爵以庸，设言不违，式化厥训。霸王骐骥，翼天驷而齐衡；社稷元龟，升帝宝而负兆。犹是幽芳在采，云逸来羁，垂倒影之悬光，烛重泉之沉隐。故远臣得离山草，比献野芹，瞻望天台，敷迹对曰：

帝德广运，六臣参其业；天道大明，五帝陈其序。犹黼黻之章五色，鼎鼐之饪五味，五灵之效祯祥，五音之和雅乐。若乃同义变力，古人中求，则纪信诳项以免君，王经刎颈以纾国。九卿居府，王修从赴难之义；二国合围，路中无返言之失。汉帝之惮汲黯，陈主之畏柳庄，社稷之臣，于是乎在。恪居尔位，勤不告劳，则萧公堂堂，吴汉纠纠，冯豹伏于阁下，黄公宿于台上。忧公奉国，可以不谓忠乎？

《书》诫面从，《诗》咏司直，犯颜无隐，求福不回。周昌之比汉高，同乎桀纣；刘毅之方晋武，类彼桓灵。申屠刚之轫车，钟离意之排阁，史鱼是慕，直在其中。圣人谟议，君子谋道。张良之翼汉王，郭嘉之协魏主，宋武之得穆之，齐高之得褚彦，定策决胜，谋夫孔多。蓬矢桑弧，有志四海；飞旌插羽，道好二同。胶柱岂调弦之术，饮冰实将命之难。陆贾南行，责蛮夷之失礼；陈汤西讨，诛单于之暴慢。终令赵佗贡职，郅支传首，竹帛所载，斯其庶乎！谨对。

对答如下：君主确能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是那君主；臣僚确能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是那臣僚。这表明群龙无首，君主就要自己谦虚地稳稳坐在光明的殿庭上等它们到来。鼷鼠要保住性命，就把洞穴深深地打在神灵的山包下面。所以就有大禹那样的人，吃顿饭中要站起十次地为天下民众操劳，可仍然不能使隐士子高不再耕田来当官。楚昭王用三公的高位来做延聘，可还超不过屠羊说这个人仍把宰羊做职业去。心中总想着烂缰绳套不住马车，这已经体悟到当君主的难处了；但在春天的薄冰上来回转，也看不出做臣僚的

容易来。然而像黄帝梦到辅政大臣，虞舜知道皇天要降下自己的助手，于是风就吹起，祥云就涌出，这都是皇天在佑助他们，英才智士马上便会来到。如今用俸禄来掌握住贤才，根据功劳来确定官爵，说出话来就绝对算数，依从训示施行教化。使君主称霸天下或称王天下的杰出人才，在皇室的庇护下而并驾齐驱；国家的辅政重臣，升入帝王的宝殿而应合那兆象。像这样而隐遁的奇才在搜采之列，高洁的逸士被收揽，垂示那天上最高处的日光月光，察照出地上最深处的沉沦隐士。所以处在偏远处的臣子得以离开山间草泽，接连献上浅陋的意见，瞻望那皇帝所在的处所，遵循提出的问题对答说：

唐尧的仁德覆盖广泛又延布遥远，舜、禹等六名大臣辅佐他那帝业；皇天的法则非常明晰，黄帝等五帝陈布那次序。这就如同华美的礼服显耀出五种颜色的图案，大鼎小鼎烹制出五味俱全的食物，龙凤等五种灵异的鸟兽献上那吉祥的兆应，宫、商等五个音阶组配成典雅的音乐。至于道义相同而出力方式不同的臣僚，从古人中来做索求，秦末的纪信就装成刘邦、诳骗项羽来使自己的君主免去祸难，曹魏的王经宁可被杀也要劝谏以便解除国家的灾难。身为九卿成员而在京师发生事变要守护好本部门，可曹魏的王修遵从奔赴危难的义理。西汉时吴、楚两个反叛的诸侯国联合围攻齐国的临淄城，而路中大夫没有还报天子命令的过失。汉武帝害怕主爵都尉汲黯，陈后主畏惧度支尚书柳庄，保护国家的大臣，正在这上面。忠实地在自己的职位上供职，辛勤忙碌但从不诉说劳苦，西汉的萧何就非常突出了，东汉的吴汉也异乎寻常了。东汉的冯豹常常伏身在尚书省阁下面等待批复的命令，东汉的黄香每每一个人在尚书台中留宿。以上这些人忧虑公家，为国效力，可以不说他们忠诚吗?

《尚书》中告诫当面迎合说好话，《诗经》上咏赞邦国中主持纠正人们过错的官员。触犯君主的尊严而没有任何隐讳，为国家求取吉福而坚定不移。周昌当面就把汉高帝比拟成夏桀、商纣王，刘毅也直接就把晋武帝比拟成汉桓帝、汉灵帝。东汉的申屠刚用头部挡住光武帝要出游的车轮，东汉的钟离意径入殿阁谏阻孝明帝修筑

宫殿，都是只管仰慕春秋时以正直著称的卫国大夫史鱼，正直扎根在他们的心中。圣人讨论重大的治国谋略，君子谋求道德。张良辅佐汉高帝，郭嘉协助魏太祖，宋武帝获取到刘穆之，齐高帝获取到褚渊，定下大计，取得胜利，谋划的事情特别多。男儿出生后用蓬梗为箭、桑木作弓射向天地四方，象征志向远大。火速派人去聘请，在道艺上喜好西汉龚胜、龚舍那样完全相同的人。胶住瑟上的弦柱，这哪里是调节音高音低的方法?平常不吃凉东西而到了承奉命令的当天晚上就要吃冰块，实际上也是承奉命令的难处。西汉的陆贾出使到南方，责问南越割据一方；西汉的陈汤去讨伐西部，怪罪匈奴单于的凶暴狂妄。到最后致使南越王赵佗进贡称臣，郅支单于的首级被送到了京师。史书上所载录的这些情况，恐怕还是现今应达到的吧!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窃惟善本无生，兹缘常寂。舍身舍智，涅槃之行可观；不动不定，般若之名已立。尊容圣质，剖碧玉而恒传；宝相灵模，镂紫金而尚在。运二仪而回掌，巍乎宝力；极万物之濡足，皇矣能仁。是以付受有归，郁兴尊记。知来之鉴，远明于万劫；祚圣之符，大启于九部。始则江汉广被，终以关河积学。由是名僧辈出，贤众肩降。道行息心，顾澄、什而服侣；戒梵禅结，视安、远而俯孩。

虽葱岭茄蓝，涉流沙而西极，白木聚落，浮涨海而东驰。圣教之兴，为期为感。但敬重坚固，有悲忍之大权；循习护持，有烦恼之深浅。物情以之勤切，俗慕由是恳到。苟求利养，或滋贪浊，滥名窃服，行伪学非。鱼目叨珍，遂人摩尼之宝；乌鹊借类，便假伽蓝之翼。谓宜宥而勿罚，限其自新，卷迹缁林之游，反服白衣之役，则愍愚受智，宽令四飞，辨是决嫌，浮食一变。九色扬翰，不谬于楚鸡；六管流声，岂混于齐士!庶人无量，在释典而虽弘；出家有限，凭国经而必恪。维摩之人诸必藏，尚为居士之身；菩萨之惠其神通，由持在家之诫。未亏平等，何妨慎择?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私下想来，良善出自没有生灭，这正经由永远空寂，把正常人的活动和智慧全都舍弃掉了，这类达到解脱境界的行为相当可观，稳坐不动而没有止境，智慧的专称已经确立起来。佛祖尊贵的容貌和神圣的佛身，用碧玉塑造出来而永久传布；佛祖庄严的形象和灵妙的外观，用紫金雕刻出来，至今还在世。运作起天地再把双掌合拢，法力大得无边；拯救万物被玷污的一切现象，盛明而能施仁。所以传付和承受有那既定的天份，繁盛地兴起了记录佛祖讲法的典籍。预知未来的洞察力，往远处对各种劫难都清清楚楚；圣人递相承接国运的符命，在九州大地鲜亮地启示。开始时在长江汉水流域广泛传播，到最后还是凭函谷关以西和黄河一带形成深邃的学问。由此名僧一批接一批涌现，优秀的弟子们肩并肩地产生。佛法得到弘扬而止息一切欲念，再看晋代的佛图澄和鸠摩罗什，便与他们并驾齐驱；遵守佛门戒律而身穿禅衣定念，再同晋代的道安和慧远比起来，就让他们俯首帖耳。

尽管在葱岭地区兴建的佛寺，经过流沙一带遍及到西部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西部海外沃民国特用白木修成的寺院，也飘过大海向东部传播，神圣佛教的兴起，既有固定的时日，也有感应的力量。本来也只是宣扬虔敬端重又坚忍牢固，具有慈悲忍耐的重大权衡；遵从研习又卫护持守，具有迷惑不觉悟的深浅差别。人心因为这而十分向往它，民间仰慕的对象由此而恳切归从。如果只是为谋求到不劳而获的供养，有的就会滋生出贪婪污浊的行径，把自己的姓名混充在里面，假装穿上僧服，行为是虚假的，学问也是错误的。拿鱼眼珠去冒充珍珠，于是就进入了佛珠闪耀的宝库中；凭乌鸦喜鹊去混进凤鸟的类属，就用佛园鸟作掩护。认为应当对这类人予以宽恕而不进行惩罚，限令他们重新做人，抬脚夹杂在僧众的活动行列里，反而去服世俗人的劳役，怜悯那些愚昧的人又准许那些聪明人的请求，就该宽泛地让他们到自己想到的各个地方去，对此做出察辨而去掉一切疑虑，游手好闲白吃饭的现象也就彻底改观了。鸾凤鸟振扬起翅膀，决不会与楚地的山鸡混同在一起；各种乐器演奏出

精妙的音乐，哪里能与齐国滥竽充数的家伙区分不出来?众百姓不计其数，在佛教经典中虽然主张都收容，可出家人数毕竟有限，从治理国家来说必定要严格控制。像维摩诘那样的人物进入方丈室中，必定会深明佛法，但还是居家信徒的原身；菩萨赐给那神通，仍然根据确能守持在家修行的戒律。这在平等对待上并没有什么偏向，又对审慎允许谁可以出家会有什么妨害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三道

对：持人之术，地著为本；应敌之道，糗粮为先。故李悝尽地力而创谋，本能强魏；卫鞅开阡陌而急战，终以霸秦。当今三壤既平，九税有职，仓庾陈积，稆秸充仞。山川效止而咸叙，阴阳感化而致和。狡戎黠羌，不讨之日久矣。

天有星象，以分其区；地有山河，以致其险。素野遐旷，玄国寒凉。塞下三春，未辨重重之树；河边九月，已落青青之草。我后恻隐岩廊之下，垂拱衽席之上，圣智备天地，神武动山岳。悠然远览，白露凉秋，建日月朱鸟之旗，树风雨苍牛之艳。将帅良猛，谋虑深长，犹重息人，未修伐鬼。而犬羊无检，时惊边柝。定远侯之功略，还出玉门；戍校尉之七营，更连金郡。麻奴小丑，敢怀凌斥之心；榆鬼残妖，仍延晷刻之命。结山豪而啸聚，驱谷马而陆梁。

百万之师，糗粮易尽；空虚之地，转饷难集。良可追踪垦草，取彼大田，修充国之旧图，采威明之远算。将军素励，爰兴断河之术；都尉垂强，毕尽通沟之利。举农夫而休战士，息转输而用耕牛。智效其谋，勇奋其力，资虏金之如粟，藉边马之如羊。赏士犒师，选骑馆谷，或休垣罢障，城灭途殚。然后坐凤凰之台，验麒麟之贡，王旅凯入，岂不休哉!清问徒训，危言每竭，短才抒轴，景夕贴忧。谨对。

对答如下：控制住世人的办法，从来都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作为根本；迎击敌军的策略，从来都把粮草供应放在首位。因而战国

时的李悝通过使土地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而提出前所未有的谋划，原本上就能使魏国强盛起来。战国的卫鞅通过鼓励开垦归个人所有的田地而首先去从事战争，到最后由此而使秦国称霸天下。如今上、中、下三等田地已经准确地划定，九种按田地征收的赋税分派到了理应交纳者的头上，各类仓库堆满了粮食，各种谷物非常充足。山峦河流献出了所有的出产，全都归入了正常的状态。阴气和阳气交互感应又彼此化育，送来了和谐的景象。狡诈的西北部少数部族，对他们不进行讨伐的日子已经很长了。

天上设有星辰的分布，用来划出它们与地上相对应的区域；地上设有山峦河流，用来构成所在区域的险要形势。无人耕种的原野广远荒芜，北方的邦国十分寒冷。边塞脚下，到春季三个月内，还辨别不出绿叶重重的树木；在黄河边缘地带，到九月份已经消失了青青的野草。我们大周皇帝在殿廷下面怜悯一切，在坐席上面无为而治，圣明与机智包纳了整个天地，神明与勇武撼动着大小山岳。悠闲地往远处观看，霜露白茫茫一片，深秋寒气弥漫，竖立起绘有日月和朱鸟这火行精灵的军旗，显示出和风细雨与青牛遍地走的美好景象。将帅贤良又威猛，计谋精深又长远，但仍看重安定民众，没有筹划当年殷高宗讨伐鬼方的那类军事行动。可西部少数部族却不自行约束，经常在边境上挑起事端。迫使像东汉定远侯班超那样的功业与方略，重新施布到玉门关以外去；由戊己校尉统领的七营将士，再次构成金城郡一带的防线。像东汉西羌首领麻奴那样的小丑，竟敢怀有凌辱天朝扩大地盘的野心；像秦汉时早在榆林塞就被击灭的匈奴部落残存的妖孽，仍然延缓片刻之间的性命。联络起山中的部落头目而聚集在一起，抽打喂肥的战马到边境上捣乱。

朝廷出动百万大军去讨伐，粮草容易很快就用光。在渺无人烟的地区，转运军需很难汇合起来。确实可以跟在敌军的后面开垦草场，从屯种的田地上获取到粮食，修明西汉赵充国当年的对策，采用东汉皇甫规当年的长远谋划。将军平素总激励自己，于是兴用起使敌军渡不过黄河的战术；属国都尉显出自强不息来，把水渠连成片的效益全都发挥出来。调动起农民而休整作战的士兵，止息住军

粮的辗转运送而使用起耕牛。机智的人献上自己的计谋，勇猛的人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利用少数部族的钱物如同谷米，借助边塞的战马如同羊只。赏赐兵士，犒劳部队，选取骑兵，享用敌军的粮草。在有的地方撤除防御的设施，取消城堡而敌军却害怕踏上那条路。然后坐在凤凰回翔的殿台上，验核远方奇禽异兽的贡进，帝王的军队凯旋入内，这难道还不美好吗？皇上清晰详明的策问只是在做训导，可正直的言论却总感到再也讲不出来了。才能太小的臣下我表达出内心的话语，从早到晚却总充满着惊忧。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乙未科

制科试题

策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科问

问：四岳畴庸，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职，稷、禹不易其能。逢化久以康时，籍功深而成务。洎乎嬴、刘以降，曹、马承流，罕为官以择人，直循资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迁，遂开趋竞之门，莫守代工之美。国家网罗群彦，驱驾时英，其政洽于至和，其人淳于太古。今欲削汉魏之遗法，复尧禹之远图，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称其职者不迁其任。增秩赐爵，用申劝善之规；金帛玺书，载表优贤之义。变通之理，尚或多端，用舍之途，伫闻良算。

提问：唐尧时四方的首领回答谁可以提拔任用，羲氏与和氏就世代负责观测天象、颁布历法的工作。虞舜时对九种中央要职进行任命，稷和大禹就不改变胜任的职务。逢遇上教化长久致使社会安宁，凭仗深切的功效而成就事务。从秦朝、汉朝以后，曹魏和晋代沿袭那习惯的做法，很少根据政绩来择用人才，只是按照资格让他进入百官的行列。有的人在百日以内就登上了三公的高位，有的人在一天当中就得到了九次升迁，于是开启了投机钻营的门路，根本不持守代替皇天完成任务的美德。我们国家网罗所有的贤才，使用当代数得出的英杰，政治同最为和谐的那种状态融为一体，世人比太古时代还要淳朴。如今打算去除掉汉朝与曹魏留存下来的用人制度，恢复唐尧和夏禹时期的长远谋略，让确能料理好那方面政事的人长久担任那个官职，对符合某一职务要求的人不改变他那职务。提高官位级别，封赐给爵位，用来申明朝廷鼓励履行好岗位职责的规则。特地赏给金银绢帛，专门颁发以示褒奖的诏书，用来彰明国家优待贤明官吏的宗旨。对此进行变通的办法，或许还有许多方

面，取用和舍弃的途径，期待着能听到你们这些应试者的高明谋划。

张漪　对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策

张漪(生卒年不详)　字若水，襄阳(今属湖北)人，张柬之长子。武则天执政初期，进士及第。后授武陟尉。至证圣元年(695)，应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科制举，对策第一。转登封主簿，累迁左补阙、著作佐郎。后侍父回故郡，卒于家，享年47岁。

对：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之以后王，化之以师长，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贤才。夫难知非独在于今日，故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自生人以来，有国之主，莫不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义，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贤人君子，国之所急。《诗》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贤臣，所以成其美化，广其基业也。

遐观历代圣王之求贤哲也，义匪一途。或精选以取之，或降访以得之，有营之经载而始获，有求之不日而便至。迟速之礼虽异，辅弼之职不殊。黄帝劳于梦想而感力牧，诚之至也；唐尧务于畴咨而致夔龙，访之审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考就绩；夏禹之顾眄空谷，七起成名。殷宗托梦于傅岩，姬文游心于渭水。此六君者，可谓勤于求贤而善于用人也。故能使元、凯就绩，申、甫登朝，道济五臣，功宣十乱。康良作诵，喜起成歌，人无险诐之情，代有雍熙之乐。《由庚》入咏，《天保》为诗，下怀报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禄。《书》曰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绩其凝。此之谓也。斯并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质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凭久化以济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

暨战国之代，王道浸微，各仁英贤，或杂或霸。楚襄劳持金之聘，燕昭躬拥篲之礼，空闻僭号之议，未睹升平之业。虽桓公之有仲父，晋侯之获赵文，委任责成，共登霸道。唯勤斗争之理，不务淳和之绩，而动乖王度，举违帝典。故五尺童子，耻之不论，况所由龌龊，何其卑

也! 秦皇不仁,虐乱是极,儒生填于坑井,《诗》、《书》灭于烟火。忠贞清白,以为徒苦,谄佞邪媚,谓之至公,卒以覆亡,为后代诫。实由远贤近佞,使之然也。

汉高祖虽不好儒,然亦任用英杰。登坛而礼韩信,辍洗而迎郦生,委萧、曹以股肱,寄张、陈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学渐该。采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国贡举,于是贤良方正之士,雾委云集。其晁错、公孙弘、匡衡、萧望之辈,并继踵而至。故当文景之代,号为得人。《诗》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汉所以宁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吴、邓以立功,任贾、寇以起事,拔奇取异,决自于心。爰至显宗中兴,于兹为盛。由此而两汉之代数百年间,陟正黜邪,褒善贬恶,虽不袭唐虞之法,亦去烦芟乱,几乎大成矣。

逮献灵之际,奸猾纵横,升必以财,进不由道。于是缙绅洁白之士,疾之若仇,乃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龟。至乃悬爵而卖之,列价而争之。守正道者以为陆沈,由斜径者谓之智变,衣冠为之失序,贤哲由是潜藏,遂使社稷丧亡,后嗣覆灭。悲夫! 此《伐檀》所以兴刺,《黍苗》所以劳歌,无他故焉,贤人不得进也。

及乎当涂启运,典午开基,陈群制九品之条,刘毅兴八损之难。故曹羲疾其阔远,孙楚以为鬼录。遂令权要归于中正,威福去于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次。宋、齐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贤,罕闻稽古。栋桡鼎折,唯见陵夷。既同自郤之讥,讵劳更仆之说!

圣上览百王之得失,立万代之规模,大开举尔之科,广陈训迪之典。用与不用,贤否各称其能;材与不材,轮桷并当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犹若寇仇;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百僚无滥,九有升平,不闻濡翼之讥,永绝烂头之诮。仲长亡越级之论,贾生无调下之悲。

今欲远服尧禹之踪,近弃刘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锡帛许其不迁,使官不易能,职遵代掌。虽优贤之义有所会通,而随时之谈或恐未可。何则?太古敦朴,务静人希。敦朴则易淳,务静人希则易理,故不劳而功可就。今圣明抚运,俗阜才多。俗阜则事烦,才多则理剧。必资明哲独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数迁何妨化理? 如其用失

其理,久任岂废功亏?愚管所窥,以为如此。大体期于不滥,所务在于得贤。苟违此途,未知其可。谨对。

对答如下:从前圣明的帝王驾驭天下,承奉并顺从皇天的法则,分封邦国,设置都城,把君主国王的名义确立起来,依靠师长施行教化,择定人选轮不到自己所喜爱的人,组建成百官队伍只在于选取贤才。了解谁能胜任很困难,这件事决非只在当今是这样,所以便强调了解谁能胜任就够得上明智,帝王在这一点上感到特难做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谁不是获取到贤才就实现大治而失去贤才就造成大乱的。这正是自行就那样的道理,任何朝代的帝王也改变不了它呀!由此可知,贤人君子是国家所要放在首位来求取的对象。《诗经》上说:南山生长着蓑衣草,北山生长着米苋草,而那和乐的君子啊,正是国家的根基哩!这四句诗是在强调君主获取到自己的贤臣,用来形成那美好的教化,扩展那基业啊!

往远处考察历代圣明的帝王求取贤才,所奉行的方针并不只是一种途径。有的精切选择来取用他们,有的屈尊寻访来得到他们,既存在着想方设法竟超过了一年的时间才获取到的情况,又存在着求索他们还不到一天就主动来到的现象。时间长和时间短的礼节尽管不同,但辅助君主的天职却没有什么区别。黄帝在梦中渴求上费尽心思,就感召到力牧,这属于诚挚达到了极点啊!唐尧在向下面询问谁能胜任上狠下气力,就招来了后夔和龙这二臣,这属于访求特仔细啊!至于唐尧虞舜进用政绩突出的人,贬退功效不明显的人,九年中进行三次考核,各按政绩决定职位。夏禹渴望极为难得的贤才能到来,在吃一顿饭的过程中七次起身来迎接,成就他们的美名。殷高宗把梦境托付到傅说做苦工的傅岩那里,周文王把心念投注到姜尚钓鱼的渭水边上。以上这六位君主,真可以称得上是在求取贤才上特用力而又善于用人了。因此就能使八元、八凯那样的人物投身到各自的职位上,申伯和仲山甫那样的人物来到朝廷上,治国大道经由唐尧所拥有的那样的五位大臣而得到实施,功业凭借周文王所拥有的那样的十名重臣而得到宣扬。各种政事特顺利和辅政大臣都贤良被

编入了颂词,大臣喜悦和君主兴起形成了欢歌,世人没有险诈邪僻的心念,世代享有和谐兴旺的欢乐。《由庚》被编入了咏唱的《诗经》中,《天保》构成了其中的诗篇,下面怀有报答君主恩惠的心愿,上面蒙受到皇天赐给的福禄。《尚书》中讲:所有的官员都恭敬谨慎,众多的属吏都不敢怠慢,一切政事都取得了成功。讲的就是上述的情形啊!这都属于朝政符合大道,治理切合最公正的准则,完全信用贤能的大臣,达到同心同德的地步。所以皇天的事务就可以代替去完成,人间的官爵就封授得恰当,依仗长久的教化来普济整个天下,借助深切的功效来安定住宇宙。

等到到了战国时代,称王天下的大道逐渐衰颓,各自招揽英才贤士,有的乱搞一套,有的只管称霸。楚襄王在奉持重金聘请庄辛那样的说客上忙得不可开交,燕昭王亲自为邹衍那样的辨士施行手执箒帚在前面开路的大礼,但光听到怎样超越位号的建议,并未看到国家太平的盛业。尽管齐桓公拥有管仲那等辅相,晋平公获取到赵文子这等统帅,把朝政全权交给他们料理,要求大见成效,但都是君臣一起踏进称霸诸侯的那套玩艺中。只在武力争斗的治理方式上用力气,不在淳朴和谐的业绩上花心思,而一有行动就背逆称王天下的准则,一有举措就违反称帝天下的法典。所以年幼的孩子都对他们感到羞耻而根本不去说起他们,何况那些采用卑鄙肮脏的手段建立起国家的诸侯,又是多么地渺小啊!秦始皇不仁德,只管把暴虐败乱推到极限,儒生被活埋在坑洞枯井中,《诗经》和《尚书》等经典被灭绝在烈火中。谁要是忠诚纯正又廉洁清白,就被认为纯属自己给自己找苦吃;谁要是逢迎讨好又邪僻柔媚,就被称作最为公正。到最后由此而覆灭亡国,给后世提供了鉴戒。实际上正因为疏远贤才,亲近邪佞的人,才使它形成那种结局的呀!

汉高祖虽然不喜爱儒士,然而也任用英雄豪杰。登上封拜元帅的坛台,礼遇韩信;停止洗脚,迎见郦食其。把萧何、曹参当成大腿胳臂来任用,把国家命运交付给张良、陈平来操持。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学问逐渐完备。采纳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的建议,开始命令各郡和诸侯王国荐举人才,于是贤良方正之士像雾一样聚积,像云一

样汇集。晁错、公孙弘、匡衡、萧望之这批人，全都脚跟脚地来到了。因而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号称获取到了各方面的贤才。《诗经》上说，众多的贤才布满朝廷，周文王靠他们得以安宁。西汉安宁的原因，也是发挥出了贤才的力量啊！东汉光武帝依靠吴汉、邓禹来建起功业，任用贾复、寇恂来扩展政事，提拔奇才，择取异士，都从自己的内心体悟做出决断。等到到了孝明帝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在这时形成了人才雄盛的局面。由此而两汉时期好几百年当中，进用忠正的人，斥退邪僻的人，表彰良善的人，贬抑奸恶的人，虽然并不沿用唐尧虞舜的法度，也去除掉烦苛，铲除掉祸乱，很接近完全成功的治绩了。

等到到了孝桓帝和孝灵帝时期，奸恶狡诈的人为所欲为，升官必须依仗钱财，进用不按原则标准办。于是清正廉洁的官僚士大夫对这种情况像对仇敌一样痛恨，便说荐举上来的秀才却不认识一个字，挑选出来的孝廉却和父母分开住，名列寒素科的人号称清正廉洁可实际上却和烂泥一样污浊，考核被定在优等的贤能将帅实际上却和乌龟一样胆怯。竟然恶化到公布官爵来出售它们，开出价码来争购它们。恪守正道的人认为这是埋没了贤才，通过歪门邪道捞官的人把这称作机智地应付变化，文武百官被这搅得乱了套，贤能明智的人由此隐居不仕，于是致使国家丧亡，继位者覆灭，简直让人感到太可悲了呀！这正是《诗经》中《伐檀》这首诗进行讽刺的来由，也是《黍苗》这首诗通过歌咏召伯慰劳修城士兵的行动而对周幽王加以讥刺的起因。说到底并没有其他方面的缘故，只是由于贤能的人得不到进用啊！

等到曹魏启动自家的国运，晋朝开创本身的基业，陈群在曹丕称帝以前首先制定出按九个品级选人用人的制度，刘毅接着在晋武帝时又对这种制度提出了它从八个方面损败朝政的诘难，因此曹魏时的曹羲早就痛恨这种制度不切实际，西晋时的孙楚把它看成是死鬼的名单。于是致使最重要的权力落入了地方上负责评定的中正官的手中，惩罚和奖赏的决定权从中央那里丢掉了，评议好坏只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走，做出鉴定不符合实际该进的等级。在刘宋、萧齐两代的

晚期和萧梁、隋朝的末叶,很少听到它们考察古代如何用人。国家的栋梁被弄弯曲,朝廷的支柱给折断了。已经和春秋时吴国的公子札聆听观赏到《桧风》以下的乐曲便认为不值得评论一个样了,哪里还能再烦劳像孔子当年对鲁哀公指出的儒士表现多得数不胜数的言说呢?

圣明的皇上您观察各个时代的帝王的得失,定立起千秋万代都遵用的制度,大范围创设荐举你们官员所熟悉的人才的科目,广泛地陈明要对帝王训导启迪的圣人典训,任用或不任用,贤明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各自都与本身的才干相符合;真属人才或够不上人才,圆形的材料和方形的材料一律都同各自的用途相对应。叫小人离开那职位,痛恨他们就如同敌人一个样;使君子布满朝廷,求取他们就总像求取不到那个样。所以便做到了百官没有冗滥的现象,九州一片太平,听不到打湿了鸿鹄翅膀之类的讥斥,永远断绝了关内侯多得像成串的烂羊头那样的嘲讽。东汉的仲长统停止了胡乱越级提拔的论说,西汉的贾谊不再有被打发到下面去的悲伤。

如今打算向远处沿着唐尧夏禹的踪迹走,在近处废弃掉汉朝和曹魏的用人制度,增加俸禄让官员长久地留任,赏赐绢帛赞许他们不调动,使官位不更换胜任的人,职务依照世代来执掌办理。虽然优待贤明官吏的宗旨有所融会贯通,而随顺时势任命官员的论调恐怕就不可取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远古时代敦厚质朴,追求宁静又人口稀少。而敦厚质朴就容易变得淳正,追求宁静又人口稀少就容易治理,所以不烦劳而功业就能成就。如今圣明的皇帝主宰着时运,民间富庶,能耐人又很多。民间富庶,事务就繁杂;能耐人很多,治理就艰巨。一定要依赖贤能明智的人独自任职,不拿这来讲什么避免嫌疑。只要做到委任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连接调动又对教化和治理能有什么妨害呢?如果在使用上失去了真能治理的人,长久留任难道就会避免功亏一篑的现象吗?愚昧的臣下我窥见到的一点点东西,认为应当这样。主要意思是希望做到不冗滥,该下力气的地方在于获取到贤才。如果不按这条道路走,那就不晓得它是可行的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丙申科

制科试题

策应封神岳举贤良方正科问三道

问:隆周御历,多士如林。扬己露才,干时求进,宁知媒衒之丑,不顾廉耻之规!风驰景铁,云集雾委,攘袂于选曹,盱衡于会府。吏员仍旧,人物实繁,优游窘于退飞,声最疲于点额。量能受职,无阙以供;料官列位,择才斯众。欲令九流式叙,一艺不遗,仁闻芳话,弘兹盛烈。且夫署行议年,殷、姬取人之道;门调户选,魏、晋持衡之术。因宜适变,何者为先? 第一道

问:屠钓关柝之流,鸣鸡犬吠之伍,集于都邑,盖八万计。然则人无求备,物各异宜,十哲殊科,八能异术。咸资对策,则绛、灌之器或沈;必俟公求,则许、郭之才难遇。选贤取士,应有良规。第二道

问:至于衢室、总章,重屋、阳馆,姬氏明堂之制,炎灵汶上之规,三雍、五室之名,清庙、容台之目,蔡邕之论,袁准之谈,庶几繁省之仪,前贤是非之说,咸宜详释,以判群疑。第三道

重试一道

问:不其才难于今,所叹知人未易,自古病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观声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问,有司藻核,公孙弘之于天子,晁错褒然为孝廉。贤才训迪,其道弘矣,多历年所,兹率典常。国家谒报上玄,展礼中岳,降非常之制,求希代之宝,将以润色云封,增辉柴燎。龙门既陟,方纵鳞于巨壑;鸿干斯渐,忽垂翅于风路。良由梦石之木,犹参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宪府,重摭词林,承风绂之明威,俟龙泉之断割。其何以搴秀长楚,审词众好,辨是与非,惩忿窒欲?聊耳陈事,冀获嘉谋。

至若柳庄黜殡,用事之差也;石建阙马,为字之失也。寻其后句,末韵或犯于前声;览以终篇,答难不伦于次序。一简之内,贫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顿别。取瑕则颇惭于卞氏,擢用则致嫌于葛龚。赠孟

孙之言，膏肓莫愈；学嗣宗之默，长短何分?进退之礼奚宜，用舍之方安在?又旁求疏议，纷披风谣，威势压于权衡，黩货通于主守。不同吾党，无嫌小子之词；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诈起，终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静流竞之来，何法可以杜讹谬之人?伫裨不逮，无吝话言。

(策应封神岳举贤良方正科问)提问：我们隆盛的大周皇朝驾驭着时运，众多的人才如同树林。显示自己，炫耀才能，利用时机，求得高升，这类人哪里懂得谋取进身的丑恶，竟不顾廉洁又有羞耻心的行为规范!像风一样奔驰，像光影一样闪过，如同云团般聚集，好似雾团般不散，在选用官员的吏部捋胳膊挽袖子，在主管全国政务的尚书省竖眉毛瞪眼睛。官吏的员额还跟从前一样，可人物实际上却太多。优闲消散的人对于往后站也感到为难，名声最高的人在点头应付上更累得不得了。依据才能授给官职，可已经没有空出的职位来安排。测定出需要的官员来设置职位，可择取人才却应当众多。想使九个层次的人才全都安顿好，怀有一技之长的人也不遗漏掉，期待着听到这方面的美好建议，用来弘扬目前的盛大功业。况且写明事迹，议定在职年限，这是商朝和周朝选取人才的方式。从门第来调取，由族姓中遴选，这是曹魏和晋代评定高低的办法。根据需要又适应变化，应该把它们中的哪一种放在首位做考虑呢? 第一道

提问：屠夫渔夫和守大门、敲梆子这类人，会学鸡叫或狗叫的这帮人，聚集到京师来，差不多算起来有八万人左右了。然而对于人不能够求全责备，万物各自有各自的用途。孔子的十大弟子在学业和专长上并不一样，汉代调配阴阳律历的八种专才也在技艺上互有区别。一律都靠对答策问做择定，而像西汉周勃、灌婴那样的武将也就会有被压制在下面的了。必定要等公正地做索求，而像东汉郭太、许劭那样善于鉴别优劣的人物很难遇得上。选拔贤才，取用士子，应当有那恰切的做法。第二道

提问：至于衢室、总章、重屋、阳馆这些处所，周代明堂的规

制，汉朝在汶水北面为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而修建的明堂的样式，以及三雍、五室的具体称谓，清庙、容台的命名涵义，东汉蔡邕的论断，东晋袁准的说法，希望你们这些应试者能对上列事体的繁缛或简要的仪节，前代贤人关于哪些正确或错误的意见，都应详明地做出解释，以便判定众人感到疑惑的地方。第三道

(重试)提问：并非是人才在当今很难降现，令人感叹的事情在于确能识别出人才来很不容易，自古以来就对这个问题感到头疼。凭借外表或光靠言论，已经是不行的了，而观察声色，考察行为举止，有的也不恰切。所以皇帝提出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评定骇核，西汉的公孙宏就在天子那里被认为是奇才，晁错衣冠整齐地成为孝廉科的首选。贤才对帝王加以训导启迪，他那治国之道就得到扩展了，经历了较长的岁月，世人也就全都遵从这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了。我们国家向皇天特做禀报，在中岳嵩山举行祭祀的大礼，颁降下特殊的诏书，求取罕见的英才，准备用来为那祭祀地神添加光彩，给那祭祀天神增添光辉。你们在进士考试中已经跃过了龙门，朝廷正该任从鱼儿在大海中游动。你们像大雁从溪水边继续往上飞，朝廷突然就让你们在乘风直上九重天的路程中展开翅膀翱翔。这实在是因为像北周勇将高琳那样由母亲梦知所得彩石为浮磬精灵而降生的人才，仍然要加入国家栋梁的行列；像西汉名相陈平那样天生就是美丈夫的奇士，还应自感羞愧地排列在文武百官的位序中。因此再次命令监察机构的官员，重新在众多的文士中加以选取，承用当今女皇的显赫威权，等待着龙泉宝剑削金断玉那样的篇章。应当通过什么来挑选出优秀人才，审定辞章而众人全都认为写得漂亮，明辨是与非，克制愤怒又杜塞欲望呢?暂且根据你们所闻听的东西，陈述一番这方面的事体，希望能获取到美好的建议。

至于像“柳庄黜殡”这样的文句，事实是柳下惠被降职，庄子给妻子殡葬，可见如此来写就属于运用典故出偏差了。像西汉的石建在奏章中对“马”字少写了一个收笔的小钩，这就是字迹上的错误了。验核下一句，最后一个字的用韵有的就和上一句不和谐。看

完了全篇，对答诘难在层次上却很凌乱。在一篇对答中，文字内容不均衡。在三道策问答卷中，写得好还是写得差，立刻就能区分出来了。硬挑毛病的话，就对春秋时楚国主动进献宝玉的卞和那样的人感到挺惭愧；提拔任用的话，又恐怕会在东汉善写文章却被人冒名顶替的蔡龚那类人的面前招来嫌疑。赠送给鲁国孟孙告诫的话语，他却始终也不醒悟改正；效仿西晋阮籍不对政事表态的做法，这在益处与害处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提升和摒退的礼法怎样做才适宜?取用和舍弃的办法又在哪里呢?再者朝廷广泛征求上书言事的意见，可却献上一大堆民间的顺口溜，挟借威势压倒了审核裁定的部门，送礼行贿买通那主管的官员。与我这一方形成对立，其实也并不嫌弃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言词，可却反过来请人代写，可以说费尽了我老夫的心思。命令开始下达，诡诈却出现了；策问颁布以后，奸邪却冒出来了。采取什么对策可以止息住设法钻营现象的蔓延?通过什么措施可以杜绝住错误百出的家伙?期待着你们补救那还没闹明白的地方，不要对自己的话语感到不该说。

崔沔　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

崔沔(673～739)　字善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性淳谨，口无二言，事亲至孝，博学擅文词。既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进士及第，又应本年贤良方正科制举，名列第一。因当时落第者散布流言，遂命重试，对策益工于前，仍被定为天下之冠，由此盛名远扬。时年24岁。再补陆浑县主簿，召为左补阙，累迁祠部员外郎。在位正言正色，未曾屈从。睿宗时担任检校御史中丞，奏请发放太仓粮及皇室减少用度以赈济贫乏，民赖其利，又举劾当政者不法子弟的罪行，由此转为著作郎而削其权力。玄宗时累官中书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亦曾出为魏州刺史，颇有治绩，考核居首。议定宗庙及丧服有关礼制。朝廷每有礼制疑议，均向其咨询取决。平素举止雍容，俭约自律，所得官俸随手便分给宗族，不修治住宅，曾作《陋室铭》以明志。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孝。

第一道

对：昔者贤良方正之士应务之际，沔虽固陋，尝亟闻之。莫不修词立诚，难进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舍之则藏，乂然后取。安肯负媒衒之丑，弃廉耻之规！若此之类，其可多乎？至夫扬己露才，干时求进，盱衡攘袂，以徇速者，斯皆小子趋附之徒，岂足以厕我周行，置于多士！屏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钦若庶官，明扬沈隐，是使群英雾委，多士景铁。而秉钧当轴之俊，察言观行之风，不能审枢机，定名实，惩鲁儒之虚服，辨齐竽之滥吹，至令累最为伪名交战，谬功与实效相参，而谓滞才由乎少官，无位供乎有德。嗟乎！事有大谬，一至于此。明主昧旦丕显，每叹才难，而群士扬于王庭，反忧多士。君臣之同德，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谈何容易！

今懿纲遐布，淳风殷流，家识廉隅，人知礼节。苟能上尊王制，下绝吏奸，闭请托之源，塞虚诈之路，使得怀才见用，以道周旋。无令椒兰信芳，独屈樵夫之手；骐骥虽骏，不贵屠者之门。则虚位待人，犹持固让，怀宝深藏，何患不达。九流式叙，庶莫远焉，一艺罔遗，谅其所也。沔又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济治之臣，无不弊之法。往古虽载其陈迹，行用实在乎主司。观夫署行议年，殷、姬令典；门调户选，魏晋良图。无非致远之规，咸有理乱之兆，所以允厘百揆，铨综百官。及谗虐官朝，则君子在野；贪佞窃柄，则以货售才。典故虽存，而官政已紊。然则随时通变，观象因宜。近取诸身，一言斯蔽；远求于古，两无适从。所以轻进狂言，犹冀或逢善听。谨对。

对答如下：古代的贤良方正之士在对答所应对答的朝廷询问的时候，崔沔我尽管迟钝浅陋，但也曾多次听说过他们的做法。没有一个人不修饰好言词，确立起真诚，对得到进用并不感到很情愿，但对退避却抬脚就走，在具体主张上不是随便就迎合，在基本原则上更不是轻易就赞同，不录取便隐遁起来，符合道义然后才接受朝廷的任用。哪里肯去背上谋取进身的丑恶名声，抛弃廉洁又有羞耻心的行

为规范呢?像这一类人,哪能在今天涌现出很多来呢?至于显示自己,炫耀才能,利用时机,求得高升,为此而竖眉毛瞪眼睛,捋胳膊挽袖子,以便达到快速升官的目的。这帮人全都属于年轻人中趋炎附势的家伙,哪里足以置身在我们大周的笔直大道上,安顿在读书人的行列里呢?摒退他们而不予进用,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皇上使百官承奉旨意去实行,对真有才能的人予以提拔,这是要让众多的英才像云雾一样聚集起来,使读书人像光影一样闪过。然而执掌大权的突出人物,察辨言语更观看行为的风尚,做不到审核最主要的方面,定准名声与实际的关系,把鲁地儒生假意穿着儒生服装的现象作为警戒,分辨出齐国混在擅长吹竽的乐工中跟着乱吹的人,致使缺陷很多却被评为政绩第一的人成为虚假捞取名声的交相争战,谎报的功绩和实际的效果彼此混杂在一起,但却认为具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晋升是因为官职太少,没有职位再对具有德行的人做出安排。哎呀呀!事体出现了非常错误的情况,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英明的君主从早到晚想要显扬功业,常常感叹获取到贤才太困难,可众多的贤才就显现在朝廷上,反而对读书人产生忧虑。君臣之间要同心同德,果真就像这个样子吗?做为天子和政府主管部门履行好天职,说起来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呢?

如今美好的治理准则广远地延布,淳正的风尚盛大地播扬,家家都懂得品德修养,人人都知晓礼节。如果能在上面尊崇帝王的法度,在下面杜绝官吏的奸恶行径,锁闭住不正当的请求托付的根源,堵塞住虚伪诡诈的途径,使身怀才能的人得到进用,依据道德来做处断,不使确实芬芳的椒木兰草偏偏折断在打柴人的手上,不使奔驰如飞的骏马却在屠夫那里得不到重视。这样一来,留出席位在等贤才到来,贤才到来仍然坚决推让,而身怀才能又深深隐遁的人,还担心什么不来主动投奔呢?九个层次的人才全都安顿好,大致上也就差距不会很大了;怀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被遗漏的,确实也就做到了。崔沔我又听说:人能弘扬大道而不是大道能弘扬人。世上只有协助君主实现大治的臣僚,并不存在永远没有任何弊端的法度。古代尽管记载下了当时走过的印迹,可行用起来实际上还在政府主管部门那

里。观察那写明事迹并议定在职的年限，属于商朝和周朝的用人规定；从门第来调取，由族姓中遴选，又是曹魏和晋代的美好筹划。这也超不出达到长远目标的制度，都面临治乱的苗头，用来料理好各种政务，多方面安排好文武百官罢了。等到残虐和专会讲人坏话的家伙在朝廷上做高官，君子也就处在说话不起作用的地位了。贪婪和专会献媚的家伙窃据了大权，也就拿贿赂的多少当作贤才来卖官了。国家的法令制度虽然还摆在那里，而为官准则与朝廷政务却已经紊乱了。既然如此，那么依从时势的需要来明了该变革的地方，观看事象来随顺适宜的东西，在近处取自君主本人，而想听到一句话就能治理好国家，这也就陷入昏昧当中了；往远处求自古代，两方面就没有恰恰可以依从的那个方面。之所以轻率地进献我这狂妄的言论，是因为仍希望遇上认真的倾听。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传》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隐于漠，是知文者，言之藻绘，志之筌蹄。有贞实者，或忘藻绘；得鱼兔者，必弃筌蹄。则存言舍文，合于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微。故《书》云明试以言，盖用此道也。今之对策，其试言之流欤？昔姬氏既衰，先王道丧。秦政虐戾，乱彼天纲，废古烧书，以愚黔首，穷兵骋诈，时无文焉。故绛、灌之徒，韩、彭之佐，雄姿虽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见方策，早闻师范，当亦略通大体，抑扬宏议，岂止决胜于境外，而不能专议于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试良将者，亦问以策，即其义矣。

国家树万世之基，迁九流之弊，《坟》、《索》奥业洋溢于时，缙绅先生蕴藉无缺。安有倜傥之杰，瑰玮之才，承明主之清恩，逢生人之大庆，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长策欤！然则谋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绮饰为工。视学论文者，暗于心而必升；晓政达幽者，失其数而咸退。譬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毁之，百丈之材，睹小节而弃之，亦良可悲矣。诚理达而义举者，勿以文害言；词婉而论深者，勿以言害意。则可以包括群品，网罗众途，察微知彰，以文用

武矣。

昔许子将、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际,而能拔奇旌异,因言揣心。况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试之寄,享厚禄,居尊官,而不能抚腕足于吴阪,指潜璧于荆山!至使有公辅之才,而无许、郭之鉴者,斯则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怀一异能,负一偏技,鸣梭抗履之汇,声律鼎饪之俦,事虽易于缣缃,功不资于翰墨,则方以类聚,各有司存。谨对。

对答如下:《春秋左氏传》上说:文采用来加强言辞的表达力量,言辞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言辞有的可以品察出来,而那思想意愿也就隐含在寂静无声当中了。由此可知,文采只是对言辞的一种修饰加工,只是表达思想意愿的一种手段。具有纯正真实的思想意愿的人,有时就忘掉了修饰加工;捕获到鱼和野兔的人,必定会丢弃捕鱼器和捕兔网。这就表明保存言辞,舍弃文采,与那淳朴古雅相符合;依据言辞考察德行,必定要洞悉那精粹隐微的地方。所以《尚书》中就讲,通过政绩汇报来明晰地予以验核。这大概也是在运用这种方法啊!如今的对答策问,恐怕也属于验核言辞之类吧?在过去,周朝衰落以后,古代圣帝明王的治国大道丧失了。秦朝的国政苛酷残暴,搅乱那皇天的法则,废除古代的制度,焚烧经书,用来愚弄众百姓,极尽武力,到处施用诈术,当时就没有文采可言。所以汉初周勃、灌婴这些武将,韩信、彭越这些副手,英雄的风姿尽管显扬,可大道法则却相当薄弱。假设他们稍略看到了古代的典籍,早早就听到了师长的正规教诲,也应大致通晓国家的纲要,在宏大深远的治国主张上各抒己见,又哪里仅仅是在战场上获取胜利,却不能在君主面前议定各种大政方针呢?所以《抱朴子》中讲:古代考核优秀的将帅也用拟定的书面问题加以询问,这也就是上述那种义旨的再强调了。

我们国家奠立起千秋万代的基业,纠正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三皇的《三坟》和五帝的《五典》这类经书的深奥学业在社会上四处播布,士大夫们宽厚有余而没有缺陷。这还哪里会有倜傥的豪杰和奇异的英才承受到圣明君主清晰询问的厚恩,逢遇到活在世上的人最大的

福份，却不能梳理他那独特的思绪，献上他那长远的谋划呢？既然如此，那么谋划了却不予施行，真确无疑却不加以采用，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可以了解出来了。现今考核言论选取士子的人，一定要把绮丽夸饰看成是擅写文章；察看学问评定文章的人，有谁能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就必定识拔他；通晓政事而使下面受压制者得到显扬的人，有谁不符合自己的套数就全把他们斥退。打个比方说，就像价值特别高的璧玉，因为上面有个小污点就废毁了它；就像百丈高的大树，看到上面有块树疙瘩就抛弃了它。这也实在让人感到太可悲了。确实对事理明达而大义显示出来的人，不依据文采如何而片面否定他的言辞；对言辞委婉而论述深刻的人，也不抓住言辞来片面否定他的深意。这样做也就可以包容统括起各个层次上的贤士，网罗起从各条渠道涌来的人才，察视隐微处便了解到明显处，又有文士又有武将了。

从前东汉的郭太与许劭只是分别凭借同他人的普通百姓间的交往，在那上下观察的时候，却能把那奇异的人才识拔并标列出来，依据他们的言辞揣测出他们的心性。何况现今有的人独具英明宽广的风姿，承受明晰考核士子的朝廷重托，领取丰厚的俸禄，身居尊贵的官位，却不能从吴阪这商朝傅说藏身的地方把傅说那样的隐士来慰抚！指向正在荆山隐藏着的和氏璧！致使世上存在着能当三公七辅的英才，可朝廷上却没有像郭太、许劭那样能鉴别出来的事情，这确实就是卿士的罪责了。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哪里足以了解这一切呢？至于怀有某种奇异的才能或某个方面的特技，投梭子或磨透鞋这群人，通过音乐或烹饪来接近君主的一类人，他们的事迹虽然在书册上一带而过，但功绩并不借助文章才气，这也就法术按照类属来聚集，由各个主管部门做安置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三道

对：我皇帝慈理广运，文思稽古，绍兴绝典，重光大壮。合官云构，明庭天竺，列辟轨仪，群工制度，可以即事而见，观象而察。今犹

远访先典，曲垂下问者，岂不欲揣其敏思，征其博物！臣实菲薄，何足当之？昔哀公问儒，而仲尼请更仆，况此大体，其可率尔言乎？虽敢略谈之，然未臻其极也。

若夫尧之衢室，舜之总章，夏之重屋，殷之阳馆，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阴阳，致孝于先，布政于下。历运虽改，此道不移。八窗四达，上圆下方，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周之制也。昆仑茅屋，周流璧水，汉之图也。明堂、辟雍、灵台，三雍也。大庙、青阳、总章、明堂，玄堂，五室也。取其宗祀祖考，则曰宗庙；取其修饰礼物，则曰容台。蔡邕之论，所以合异说；袁准之谈，所以别重事。历代繁省，其仪不一；先贤是非，其书甚众。非斯须之述所能尽，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创制之前，今臣定议之外，教明礼备，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词寡理举，处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谨对。

对答如下：我们皇帝仁慈的治理广大深远，文德教化考察那上古时代的情形，继承并振兴起灭绝的经典，使皇天正大壮盛的景象再放光辉。连接在一起的宫室像彩云一样排列，明朗的殿庭像皇天一样高耸。各个朝廷机构的长官完全照规章带头行事，文武百官都按制度供职。这些可以专就事项便看出来，观察规模气象便察识出来。现今仍然往远处追寻前代的典制，向下面谦逊地垂示询问的事体，这难道还不是打算揣测应试者的敏捷思考力，验证他们知识特丰富吗？臣下我实在是懂得太少了，哪里足以够得上那样的人物呢？从前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儒士的所作所为，而孔子却指出多得数不胜数，何况这道策问属于国家的纲要所在，哪能轻率地就作讲论呢？尽管还敢稍略地谈一谈它们，可却达不到那极致啊！

至于唐尧所特设的衢室，虞舜所特设的总章，夏朝所特设的重屋，殷朝所特设的阳馆，这些名称各异的处所都是用来从天地那里摹取法象，鲜明地比配阴阳，向祖先献上孝心，对下面施布政令。历数时运虽然发生了变化，可这原则却不会改变。八面窗口，四条通道，顶部呈圆形，底部为方形，根据庭堂的规格来陈设坐席，按照屋室的作用来摆放几案，这是周朝的明堂规制啊！楼台特称昆仑，殿堂只有

茅草屋顶，环绕宫墙有水流，这是汉代的明堂图式啊！布政祭祀的明堂，作为最高学府的辟雍，观测天象的灵台，它们合称三雍啊！明堂内的中央一大室，东面名为青阳的那个堂，西面名为总章的那个堂，南面名为明堂的那个堂，北面名为玄堂的那个堂，就合称五室啊！从祭祀祖宗的意义上讲，就又称为宗庙；从修饰好行礼仪容和各种器物的意义上讲，就又称为容台。东汉蔡邕的论断，目的在于调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东晋袁准的意见，目的在于区分开重大的事体。历代做出繁缛或简要的规定，具体的仪节便各式各样；前代贤人关于哪些正确或哪些错误的论说，这方面的书籍特别多。并不是片刻间的叙述就能全部说清的，也不是唐突的对答就能达到精深的。从我们皇帝还没创立规制的时候，在当今臣僚议定的范围之外，教化鲜明，礼仪完备，获取到繁缛和简要的适中的那部分，恐怕还是周朝的规制吧？言词很少而义理却突现出来，处在正确与错误的关节点上的讲法，恐怕还是蔡邕的论断吧？恭谨地对答如上。

对重试

对：夫铅刀均锋，剑之耻也；蹇驴齐足，骥之耻也。朗璞蒙垢，玉人之过也；鸣丝绝弦，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献嘉猷，而愚智纠纷，臧否错揉，斯亦士君子之所恨，岂独为政之忧哉！沔实陋才，良不足算。凭藉休庆，谬偕旌拔，狂言虽立，鄙道未孚。蕴杂薰莸，沉蔽玉石，重参群彦之末，再承议贤之问。进思自励，其何补欤？退欲鸣谦，岂获无咎！审词众好，倘或择善而行；辨是与非，请思即事而对。

策曰：柳庄黜殡，用事之差也；石建阙马，为字之失也。窃为议人者，贵知其心；论道者，务存其意。心惧未信，则援古以自明；道隐未光，即托文而后显。故事以明心为本，字以显道为公。事有小差，而心术著矣；字有小失，而道教存焉。斯则夜光之瑕，明月之颣，固不可得而弃也。事与类相反，字与义相违，证乖而心不可弘，象毁而道不可见，一至于此，亦无取云。

策曰：寻其后句，末韵或犯于前声；览以终篇，答难不伦于次序。

窃谓明试以言，古之道也；征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声韵，盖其浮饰，策之次序，固非典要。切问存于答难，次序岂效谋谟；精诚尽于对扬，声韵何寻献替？稽之于古，揣之于情，末韵或犯于前声，其来久矣。答难不伦于次叙，为病良深。

策曰：一简之内，贫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顿别。取瑕则颇惭于卞氏，擢用则致嫌于葛龚。窃谓万有一失，圣人不免；舍过举能，先师是训。道不可以纯备，才不可以周给，断可知矣。是以国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废善以取瑕，疑于擢用矣。

策曰：赠孟孙之言，膏肓莫愈；学嗣宗之默，长短何分？进退之礼奚宜，用舍之方安在？仲尼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进退之礼，用舍之宜，允非小人之所及也。然则览古昔之遗事，敢不荐其闻乎？窃谓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惩奸以察，何俟赠言？致身于朝，不可以默。固当参刑礼以定枉直，体明智以辨情伪。见利不亏其分，见死不更其守。属聪明不讳之时，居执宪绳违之任，何至持疑于果断，逡巡于正色哉！

策曰：旁求流议，纷披风谣，威势压于权衡，黩货通于主守。不同吾党，无嫌小子之词；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诈起，终策出而奸生。甚矣诚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虑怙威黩货者，其类犹存；假手借词者，其人不远。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核问试，优而柔之，则窃宝之名自分，滥吹之竽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廋哉？

策曰：何方可以静流竞之来，何法可以杜讹谬之人？窃谓任良在主，弘道在人。以执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扬清机以鉴群情，则知讹谬不兴，流竞永息。俯惭谘议，良非话言。谨对。

对答如下：同铅制成的钝刀比试哪个锋利，这是宝剑的耻辱啊！同瘸腿驴站在一起走，这是骏马的耻辱啊！内含洁璧的玉石被蒙上污垢，这是玉工的过失啊！正在弹奏的乐器突然断了弦，这是歌舞艺人的罪责啊！假如承奉圣明的诏旨，进献美好的谋略，可却愚昧的人同明智的人纠缠在一起，贤良的人同邪恶的人搅合在一起，这也是士大夫众君子所痛恨的事情，又哪里仅仅是推行朝政者的忧虑呢？崔沔我

实属鄙陋的人,确实不足以考虑。可凭仗朝廷颁降策问的福庆,并不合格地跟随在表彰荐举的行列中,轻狂的言论虽然亮出来了,但浅陋的道法并未使人信服。好坏同大家混杂在一处,真假与人们沉沦在一处,重新置身在众多英才的最后面,再次承奉如何选取贤才的询问。向前思索自己应努力答好,可又有什么补益呢?后退打算声明自己不行,哪里又会落得个没有罪过的结果呢?审定词章而众人全都认为写得漂亮,这或许就需要主考官择取优秀的答卷去给人看;辨明是与非,这就请求主考官要考虑根据策问提出的事情而进行的对答。

皇帝的策问中说:像"柳庄黜殡"这样的文句,事实是柳下惠被降职,庄子给妻子殡葬,可见如此来写就属于运用典故出偏差了。像西汉的石建在奏章中对"马"字少写了一个收笔的小钩,这就是字迹上的错误了。臣下我私下认为,对别人做评议的人,贵在了解他的心迹;讲论道法的人,务必要抓住那义旨。心中害怕不被人们所承认,那就援引古代来自我申明;道法隐匿还没有充分显露,那就依托文章,然后显现出来。所以用典应把昭明心迹作为根本,写字应把显示道法当成公正。用典稍略出现了偏差,可那心术却彰显了;写字个别出现了错误,可那道法的教化却亮在那里了。这就属于夜光珠上带有小斑点,明亮的月亮带有几片乌云,原本是绝对不能抛弃的呀!用典与那类别不一致,写字与那本义相违背,例证错误可心术又得不到弘扬,字迹变样了可道法又得不到显露,竟然达到这般地步,那也就太不可取了。

皇帝的策问中说:验核下一句,最后一个字的用韵有的就和上一句的用韵不和谐。看完了全篇,对答诘难在层次上却很凌乱。臣下我私下认为,根据政绩汇报来明晰地予以验核,这是古代的做法。通过策问来测试言辞,这是当今的制度。言辞具有用韵的要求,大致上属于虚浮的修饰;策问的层次结构,原本上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紧扣策问表现在对答诘难中,层次结构哪能让人献上谋略计策?精诚在对答称扬上完全体现出来,用韵的要求会从哪里寻求到可行与否的意见呢?从古代来做考察,从常情上来做推测,最后一个字的用韵有的就和上一句的用韵不和谐,这种情况是由来已久的了。但对答诘难

却在层次上很凌乱,这构成毛病确实就很大了。

皇帝的策问中说:在一篇对答中,文字内容不均衡;在三道策问答卷中,写得好还是写得差,立刻就能区分出来了。硬挑毛病的话,就对春秋时楚国主动进献宝玉的卞和那样的人感到挺惭愧;提拔任用的话,又恐怕会在东汉善写文章却被人冒名顶替的葛龚那类人的面前招来嫌疑。臣下我私下认为,在众多的行动中出现一次差错,圣人也避免不了;宽恕那种过失,多看他的才能,先师孔子早就训导过这一点。道法根本达不到特纯粹又极完备,才华根本做不到样样具备又很突出,这是可以绝对闹清楚的了。因而国家审查畅通与闭塞的途径,设置甲等和乙等的录取等级,也就不能废弃优秀的人才而去硬挑毛病,对提拔任用他们存有疑虑了。

皇帝的策问中说:赠送给鲁国孟孙告诫的话语,他却始终也不醒悟改正。效仿西晋阮籍不对政事表态的做法,这在益处与害处上又有什么区别呢?提升与摒退的礼法怎样做才适宜?取用与舍弃的办法又在哪里呢?孔老夫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在那官位上,就不考虑那政事。提升与摒退的礼法,取用与舍弃的合适办法,绝对不是像臣下我这样的普通百姓所能想得出的。不过观阅古代留下来的事例,哪敢不献上那些曾听说过的东西呢?臣下我私下认为,在正午时必定要晒干物品,拿起刀来必定要割取东西。惩治奸邪就去察辨,哪里还要等什么赠送的话语?在朝廷做官,就不能够对政事不表态。原本上就该参酌刑法与礼制,确定正直的人和邪恶的人谁应安置在上面;体悟英明与机智,辨别出真心与假意来。看到利益却不有损自己的名分,碰到死亡的威胁却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正赶上皇帝了解天下情况而让人不要隐讳的时代,承当着执持国法去处罚违逆者的重任,何至于在该果断上却犹豫不决呢?在该严肃认真上却徘徊不定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朝廷广泛征求上书言事的意见,可却献上一大堆民间的顺口溜,挟借威势压倒了审核裁定的部门,送礼行贿买通那主管的官员。与我这一方形成对立,其实也并不嫌弃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言词,可却反过来请人代写,可以说费尽了老夫我的心思。命令开始下达,诡诈却出现了;策问颁布以后,奸邪却冒出来了。策问中

列举的这种现象,可真是太严重了呀!想不到竟形成如此情状了。如今所忧虑的挟借威势和送礼行贿的家伙,这类人仍然存在;请人代写答卷的奸徒,这种人并不是离得很远。只要能够察识应试者的言词和气象,仔细予以揣摩;精切核定询问和对答的水平,慢慢做出择定。这样一来,窃取官位的丑名自然就区分出来了,混在众人中胡乱跟着吹竽的家伙,自行就逃走了。这种解决的方法十分明显,那类人还能躲藏到什么地方去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采取什么对策就可以止息住设法钻营现象的蔓延呢?通过什么措施就可以杜绝住错误百出的家伙呢?臣下我私下认为,任用贤才在于君主,弘扬道法在于世人。凭借主考官您的明智,遵从圣明君主的恩德施布,多方面运用智慧去考察以往的迹象,施展清明的心机去鉴别众人的意向,也就能断定出错误百出的家伙冒不出来了,设法钻营的现象也永远止息下去了。跪拜而对自己的浅陋意见深感惭愧,的确不是那有用的话语。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丙午科

制科试题

策才高位下科问

问：选贤举能，秀造参用。今之所荐，诚为得人。未闻含声待扣，乃有不耕而获。十室忠信，理亦难诬。若遂践于清朝，仗何材而济物?又二老归周，见称何德?八元佐舜，见述何功?滋泉以何术见称?莘邑以何辞作相?云台画象述其先，麟阁称名标其道。

提问：选取贤才，提拔能人，要对乡学中的秀士和国学中的造士混合使用。如今所举荐的对象，确实属于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从来没听说过蕴含着音声在等待扣击可竟有人能不耕耘却有收获。十户人家中必定存在着忠诚信实的人，这在道理上也是难以否定的。如果真正要步入到清明的朝代，该依仗什么样的人才去救助万物呢?再者，两位老年人主动投奔到周朝去，这是什么德业受到了赞美?八元这高辛氏的弟兄们一起辅佐虞舜，这是什么功绩得到了称述?在滋泉的那个人凭借哪种谋略被人称赞?在莘邑的那个人通过哪类言辞当上了国相?东汉在云台绘制功臣的图像要叙述一下那占居首位的人物，西汉在麒麟阁中被标列姓名的人物，要指出他们的各自做法。

冯万石　对才高位下策

冯万石(生卒年不详)　其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始登进士第，后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凡九登科选。其中大足元年(701)疾恶科、中宗神龙二年(706)才高位下科，俱名列第一。他事则不得其详，俟考。

对：昔者圣人之立极也，选众举能，列官分职，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亭毒之功。臣哉邻哉，时用远矣。主上重光缵曜，绍开中兴，拜辖轩于受命之初，希俊贤于御极之日。兹乃羲、轩之志，尧、禹之心，勤求道要，所望于清光哉！故邓林有必至之才，昆山无藏价之宝，可不谓然乎？臣以妄庸，艺无兼采，缪从卑列，应此嘉荐，诚非钝朽所能塞充。然天光震动，虚求秀逸，扬于王廷，亦俛俯矣。顾当参明试，献嘉谋，竭谗闻，敷大体，言用身退，以酬万一。岂所谓不耕而获，邀名幸时而已哉！

今见属有司，恭承下问，懋陈常务，自谓无奇。若得饬躬召见，对扬天休，下学上达，舒愤竭情，则亦引谕阴阳，较明时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撰授受之宜。效其涓埃，以增海岳耳。若遂践清朝，济时成务，其道甚大，惟变所适。俾闻后命，则藏器而动，顾以更仆，亦何尽言？曲学鏒生，居今志古。若乃忠为令德，功实佐时，披卷怀人，恨为异代。虽惭非博物，敢不扬言？则夫西伯善养，夷、齐以让国归老；帝舜举能，元、凯以通才授职。维师尚父，韬钤乃适道之功；相时阿衡，鼎钰为献君之术。云台纪绩，吴、邓懿其元勋；麟阁图功，卫、霍流其茂实。谨对。

对答如下：古代圣人给天下人确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都去选取众多的人才，提拔贤能的人士，设置官位，划分职责，用来融通天地的恩德，效法它们化育万物的功效。大臣要成为我的左右辅佐啊！施用这一条是由来已久的了。如今皇上您使太阳重放光辉，继承那阳光照耀，承接大唐帝业并开辟使国家由衰落再度走向兴盛的局面，在奉受天命的起始阶段就派出了解民情的使者，在登上帝位的当天就渴望得到英杰贤士。这正是当年伏羲氏和黄帝那样的志向，唐尧和夏禹那样的用心，辛勤求取治国之道的要领，使臣下看到皇上您的风采啊！因此当年逐日的夸父所遍形的邓林，拥有那必定前来效力的奇才，昆仑山没有隐藏起自身价值的宝物，能不认为就是这个样吗？臣下我凭借迷妄庸劣，技艺没有多重的光采，却不合格地跟从在低级官员的行列中，置身在这次美好的举荐名单内，

确实不是像我这样愚钝腐朽的人所能充数搪塞的。然而皇上的光辉在闪动，虚心求取优秀的隐士，在朝廷上予以显扬，也就跪拜顺从了。不过正赶上参加明晰的测试，献上美好的谋略，竭尽孤陋寡闻，陈述治国的纲要，建议被采用，自身就引退，用来报答君主万分之一的知遇厚恩。又哪里是不耕耘却坐享其成，骗取到名声又利用时机就算完事了呢?

如今从主管部门那里蒙受到嘱告，恭谨地承奉对下面的询问，广泛地陈述一般的事务，自己就感到没有什么奇特的看法。至于得到皇上的亲自召见，对答称扬帝王的美好命令，把在下面学习的东西反映到上面去，抒发忠愤竭尽情志，也还是援引并讲明阴阳关系及其表现，分辨清楚当前国政的纲要，感奋激切就不禁狂妄直率，阐明那授官册命上的恰切做法，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儿力量，用来扩大皇上大海泰山般的胸怀罢了。如果真要步入到政治清明的朝代，救助时势，成就事务，具体的做法特别广泛，但要坚持变动就应当与那客观的需要相适合。既让臣下我听到了皇上的命令，就该怀有才能便马上响应，但因逐项逐条做列举，又哪能说得完呢?像臣下我这样的不成正学的人和生在偏僻地方的人，生活在当今，想往那古代。至于忠诚属于美德，功业实际上能辅助时势，打开古书，怀念古人，真怨恨和他们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尽管对自己不是那类什么都通晓的人感到惭愧，哪里敢不明确地谈一谈呢?这样一来，周文王善于养护老年人，伯夷、叔齐就通过把国君之位让给别人而到周文王那里去养老。帝舜能够提拔重用贤能的人，八元和八凯这弟兄们就凭仗才干全面而授给职位了，那位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尚，谋略正建立了与大道相适合的功勋；而辅助时势的那位阿衡伊尹，把能做一手好饭菜作为进见君主的方法。东汉在云台铭记功绩，吴汉、邓禹在开国二十八将中占据了元勋的美好地位。西汉在麒麟阁绘制功臣的图像，卫将军张安世和大司马霍光流播他们的盛美德业。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丁未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科问二道

问：朕闻处域中之大，据天下之图，莫不设簴以思贤，解琴而愿化。虽君唱臣和，而明鲜晦多。所任者或非其人，所行者倘乖其道，归于浸弊，罔弗由兹。朕寅畏上玄，负荷先构，静言为国，有若涉川。风俗未淳，政教犹郁，黎元寡遂，鸾凤不臻。当宁永怀，良深愧叹。子大夫讲圣人之高议，明王事之大纲，蓄愤谋忠，历年载矣。何施而反本于古，何用而救末于今？何术而人物阜安，何德而神灵滋液？尔其无隐无忽，悉之究之，通其条贯，朕当亲览。第一道

问：妙尽黄间，期于百发；术该玄女，宁无七纵？声苟中律，不惮撞钟之求；服必称儒，何辞解衣之试！况今征上意匠，搴秀谈丛，枭鸾即是于分区，牛骥伫从于别皂。谓其凌厉顾盼，以雪陈琳之耻；何乃罔敞迂延，不答马卿之难？岂时英所病，共设于翟酺；将高尚在怀，不屈于周党？荐举之法，抑有多途，取舍之方，莫能折衷。何则含光隐迹，不盗处士之名；介立寡徒，安获知己之荐？举逸之法，应有通规，取舍之言，非无尽善。文、武之道，方册所不坠；德怨之报，人情之大纲。射为诸侯，杜预无穿札之力；士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泽宫，失之远矣，子皮、鲍叔，夫何有哉！举贤受赏，非才有罚，国柄所加，期乎必当。验之从政，效无限断之年；试以文才，智有迟速之别。知而不举，闻讥窃位；举而非人，宁当显戮。臧孙之犯，既是虚刑；子文之辜，复当何典？内外齐举，援亲岂不致嫌；师锡具陈，行庆又谁为首？凡此歧路，罔识攸从，迟冀如律，弘其利涉。第二道

提问：皇帝我听说帝王占居在整个辖境的最高位置上，掌握着全天下的治理方案，没有谁不在立柱上设置钟磬渴望贤才前来敲击，领悟当年虞舜的五弦琴音而希望教化大行。尽管君主起头，臣僚应和，

但明晰的情况却少见,闹不清的地方反倒占多数。所任用的官员,有的却不是合适的人选;所推行的政务,倘若违背它自身的法则,就会归入弊端逐渐地产生,没有哪一样不是由此而造成的。皇帝我十分敬畏皇天,承担着先王构建的大业,安静地治理国家,就像渡过大河去一般。可社会风气却还没有变淳厚,政治教化仍然受到阻塞,老百姓很少实现了生存的愿望,鸾鸟凤凰之类的吉祥物也没来到。接受朝拜时长久地做思索,确实深深地感到惭愧与可叹。你们这些士大夫讲求圣人的高明言论,明了称王天下的事体的大纲,积蓄愤发的情绪,考虑怎样尽忠,已经历经好多年了。采取什么措施就能把根本返回到古代那种状态去呢?通过什么对策就能在目前挽救那衰微的局势呢?按照什么办法就能达到世人和万物富庶又安宁呢?建立什么德业就会神灵来液汁渗透呢?你们不要有什么隐瞒,也不要有什么忽略,详尽地讲到底,把前后顺序贯通起来,皇帝我会亲自观阅的。第一道

提问:像西汉飞将军李广那样对射箭极尽其妙,期待着百发百中;像蜀汉诸葛亮那样在用兵技巧上把那天文观测都包括进来,哪能没有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呢?音声如果确实能符合律吕,就不畏惧撞击钟磬来应合朝廷的求取;一切行动必定要宣称本人是儒士,又哪里会辞谢脱掉平民服装换上官袍的考试呢?况且当今征聘一流的人才,个个都巧妙地构思;选拔杰出的贤士,人人都发表完整的高见。是猫头鹰还是鸾凤鸟,也就在这上面划分出归属;是笨牛还是骏马,同样由此而被划拨站立在各自的栏棚。既然西晋嵇康鼓励兄长嵇喜从军后要凌厉中原,顾盼生姿,用来洗刷掉建安时陈琳的耻辱,可汉武帝时蜀中二十七名大夫为什么又失意徘徊,并不回答司马相如的诘难呢?恐怕就因为像当今的英才所感到头疼的事情,是在皇后设下的宴会上聚在一起;或者是高尚的节操抱持在心中,不向武周政权的党羽来屈服吧?荐举人才的方法,或许具有多种的途径;取用和舍弃的做法,不能够调合到一起。怎样办就能使怀有才能却隐遁形迹的人,不窃取处士的美名?对耿介特立而落落寡合的人,如何做就得到了解他的人的推荐?荐举隐士的办法,应当定有一般的规则;取用和舍弃的建

议,并不是没有那最完善的东西。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大道,是在典籍上永不消失的;用仁德对怨恨做出回报,属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大纲。比射箭册封谁能当诸侯,灭掉东吴的杜预却没有穿透一层皮革的力气;义士要为了解自己的人献出生命,可西晋的崔洪却对推荐郤诜代替自己当左丞而产生这是挽弓射自己的悔恨。相圃这个孔子练习射箭的地方和泽宫这类朝廷组织练习射箭并选取士子的处所,彼此距离得太远了。执掌郑国国政的子皮和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鲍叔,又哪里能沾上边呢!荐举了贤才就受到赏赐,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有惩罚。这种国家法律所施加的对象,必定要达到恰切。从任职施政来加以验核,取得政绩就难有限定的年数;用文才来予以测试,智慧就有了迟钝和敏捷的区别。了解一个人却不向朝廷举荐,就会听到窃据高位的讥斥;举荐却不是合适的人选,哪里就该当众处以死刑呢?春秋时鲁国臧孙打城门砍门栓出奔到邾国,已经属于虚设的刑罚,楚国的子文推荐刚强无礼的子玉当令尹而被晋国打得大败,这又该适用什么刑罚呢?像晋国的祁奚对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人一并加以荐举,可援引亲属哪能不招来嫌疑呢?众人提出建议,详尽禀报某个人的情况,而施行封赏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应占第一位呢?所有这些相互存在矛盾的事情,皇帝我还不知道该依从的那一类,耐心地希望得到你们这些应试者提出的符合标准的答案,扩大那顺利解决的方法。第二道

苏晋　应贤良方正科对策

苏晋(676~734)　蓝田(今属陕西)人。幼年便能写文章。二十岁即进士及第,时值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次年及中宗景龙元年(707),又先后应大礼科、贤良方正科制举,均对策第一。玄宗时历官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复出为汝州、魏州刺史。在朝屡进谠言,深被嘉纳,常受命起草诏令,主管选官之事则独多赏拔,甚享时誉。又收养抚育友人后代,为之筹办婚姻仕宦大事,颇受世人称赞。卒于太子左庶子,享年59岁。

第一道

对：臣闻圣人法天而理，察道而行，心膺俊贤，子惠黎献，使恭尔位，人乐其业，朝无秕政，俗咏康哉。《书》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人从乂。此其谓也。虽根英异辙，火木殊途，革去故而鼎就新，变《咸池》而歌《大夏》。然而无易兹典，其故何哉？盖以因天人之和，顺阴阳之数，不可替也。

皇上道高西圣，德迈南薰，黄龙荐图，翠凤为宝，至于膺正历，享灵符，朗七曜于铜仪，安万人于宝历。延祥降福，陟酌登封，八表黎元歌皇风而周地络，四夷酋长颂玄化而建天枢。此皆以刻于玉版，载于金匮，为帝者之祖宗，与乾元而始终。至于坐衢室，端冕旒，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赫赫明明之美，无声无臭之化，固以荣镜宇宙，发扬神人，振古以来未有如斯之盛矣。犹复寅畏上帝，忧念下人，思反朴于鹑居，伫迁讹于鸿古，夕惕勤止，良以深焉，爰降纶言，俯询舆议，此陛下冲谦之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然而忝迹明时，敢忘披露！

臣闻帝王之道，借英彦以张风；邦国之图，资谟明以垂化。故能庶征有序，美政无亏。当今制礼作乐，悬章布宪，可谓文物大备，刑政中和。而紫宸弘卷舒之风，黔首罕阜安之业者，良以官僚空旷，守宰荒宁，不能宣裕皇明，洗蒸徒之耳目，发挥神化，变浇薄于闾阎。夫迁物化人，著诚去伪，岂惟君上之道，实亦官联之职！故文翁好儒，蜀学比于齐鲁；毛玠崇质，魏士素其裘裳。是知易俗移风，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故董生云：黎人未济，皆吏不明，使至于此也。贾谊亦云：下之有过，吏之罪也。夫闻伯夷之风者，贪夫以廉；见柳下之迹者，鄙人能恭。故曰教人莫若垂范，垂范必仰良材；阜俗莫若兴农，兴农必由循吏。且择贤而处，其弊犹滥，负乘为政，何以克堪？

今若选英杰而实百僚，自朝廷而及州县，咸令法易简之道，慎德刑之教。赏以春夏，慎其滥矣；罚以秋冬，敬其刑矣。夫赏刑中，则庶人安；庶人安，则财用足；财用足，则百志诚；百志诚，则天人和；天人

和,则神灵滋液矣。然后垂训而理,勤法而行,宣九式以均财,修六礼以节性,明七教以兴德,齐八政以兴邦。道格元亨,风还太古,时雍之和可致,济俗之义可弘,唐虞之美可逾,文景之声可越。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圣人效法皇天来治理,体察大道来行事,把英杰贤才视为心腹和臂膀,像对待儿子那样来惠爱黎民百姓,使官员们恭敬地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人人都为本身的职业感到快乐,朝廷上没有弊政,民间都歌咏太安康了。《尚书》中说:皇天依据民众的反映来听取意见和观察问题,圣明的帝王只管去效法这一点,臣僚只管去恭敬地承奉君命,世人只管去服从治理。说的正是以上那种情况啊!尽管根须和花朵并不一样,火行与木行存在区别,革除旧的东西,趋就新的事物,改变唐尧时名为《咸池》的乐舞,演唱夏禹的名为《大夏》的乐舞,然而却都更改不了《尚书》的讲法,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致上是因为依从天上和人间的交融,随顺阴阳的定律,根本上就是无法取代的了。

皇上的大道高过西方的佛祖,德业超过制作《南风歌》的虞舜,黄龙献上那神图,凤凰构成那宝物,直至承当起正统的时运历数,获享灵验的符命,在那铜铸的浑天仪上使日月五星大放光辉,在那绵长的国家命脉上安定住所有的世人。延布祥瑞,降赐福庆,回报祖宗,登临名山祭天祭地。八方边际的黎民百姓歌咏盛明的和风,遍及大地的每个角落;四方少数部族的首领颂扬圣德的教化,建立起统治的中心。这一切已经全都镌刻在皇室玉版上,载述在严密收藏的史册上,成为称帝天下的人效仿的典范,同皇天永远共存。直至稳稳坐在听取天下意见的衢室中,保持帝王的庄严仪表,虚寂地一动不动,感召随即融通,显赫盛明的美好治绩和安宁潜在的化导,原本上已经是光芒照耀那宇宙,引发播扬起神灵与人事的和谐关系,从远古以来就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了。可仍旧还是十分敬畏天帝,忧念下面的百姓,思考把那质朴的风气返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希望把那浅薄的世态扭转到远古时代,连晚上都在警惕着,又勤奋到了极点,这确实已经是太深远了,于是又降下越发广大的话语,俯身询问民间的意

见，这完全属于陛下谦虚自抑的做法啊！愚昧的臣下我，哪里足以明白这一切呢？然而赶上自己在盛明的时代充个数，哪敢忘记说出全部的心里话呢！

臣下我听说，帝王的做法，全都借助英才来播扬雄风；国家的谋划，全都依靠对策英明来垂示教化。因而各种气候现象就能具有正常的交替过程，美好的朝政不存在缺陷。当今制定礼仪，创制乐舞，悬示章程，公布成法，可以称得上是典章制度完全齐备，刑法政务恰到好处。然而帝室弘扬收卷和舒展相得益彰的风尚，老百姓却很少享有富庶安乐的生计，这种情形实在是出自朝廷百官废弃职守，地方官吏荒废政事而贪图享乐，不能够充分地宣播帝室的盛明，使百姓的所见所闻焕然一新，发挥神妙的教化，在民间改变那浅薄衰颓的风气。改变事物和化导世人，昭示真诚和去除虚伪，哪里只是君主该推行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各个政府机构相互协作、联合办理的天职！因此西汉的蜀郡太守文翁喜好儒生，蜀郡的学业就和齐鲁两地一个样。曹魏的吏部尚书毛玠崇尚质朴，曹魏的士大夫就把他们的华贵服装变得很朴素。由此可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转心意归向大道，并不是低劣的官员能够做好的。所以西汉的董仲舒就说，普通百姓还没过上好日子，全都是因为官吏不贤明，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啊！西汉的贾谊也说：下面的百姓出现过失，这是官吏的罪责啊！听到了殷末周初的伯夷的那种风范的人，贪婪的人由此会变得廉洁；看到了春秋时柳下惠的行为的人，粗陋的人能变得恭敬。所以说教化世人，没有能比得上做出榜样来的了；做出榜样，必定要仰仗贤良的人才。使民间富庶起来，没有能比得上振兴农业生产的了；振兴农业生产，必定要通过奉公守法的官吏。而且择取贤才予以委任，那弊病还会存在很多，采用居非其位、才不称职的那一套来施行治理，怎么能够经受得了呢？

如今要选取英杰，充实百官，从朝廷一直到各个州县，都要让他们效法简单易行的准则，仔细对待仁德与刑罚的教化。赏赐像春季和夏季那样，这就慎重对待冗滥了；惩罚像秋季和冬季那样，这就儆戒刑罚了。赏赐和惩罚恰如其份，普通百姓就安定了；普通百姓安定

了,财物用项就充足了;财物用项充足了,各种想法就真诚了;各种想法真诚了,天上与人间就融为一体了;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了,神灵就汁液渗透了。然后垂示训导施行治理,致力法令加以推行,宣明祭祀等九个方面使用财物的规定,用来调剂好财政;修明成人加冠等六类礼节,用来节制人们的性情;搞好父子等七种人伦关系准则的教化,用来兴行起道德;统一落实好饮食方式等八项制度,用来振兴起国家。大道顺从非常通顺的状态,风尚返回到太古时代,社会和睦的那种协调景象就可以实现,使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义理就可以得到弘扬,唐尧虞舜的美好政绩就可以超过去,汉文帝与汉景帝的名声就可以高过去。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物以类升,方以类降,故小大趋舍,未始离乎类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武,时其效欤!矧惟生人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安可处非其类乎?斯固士君子砥行立名,伸首抗迹,思欲奋迅泥滓,凌迈云汉,与鸾凤为伍矣。岂不能折其锋,沮其目?诚谓类有聚,群有分,下流不可久居。且无其时,犹欲干进之若此,况乎师旷倾耳,卞氏拭目,将欲察异音,求奇彩,苟有留者,谁肯迁延于解衣之试哉!

策曰:荐举之法,抑有多途,取舍之方,莫能折衷。何则含光隐迹,不盗处士之名;介立寡徒,安获知己之荐?举逸之法,应有通规,取舍之言,非无尽善者。夫人洪然则渊其心,饰其状,不可知以貌,不可穷以言。将为辨者不可也,求乎其端,或有可知矣。夫天之岩乎其上者,施人以气;地之坎乎其下者,成人以形。高下之间不可逃者,形气而已矣。气之积者彰乎形,形之动者感乎物。彰于形,故可以象察;感于物,故可以类求。察其象,长短之材可量矣;求其类,邪正之气可识矣。虽则含光隐迹,介立不群,终不能以形逃,不能以气隐,明矣。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古圣王之观人也,未尝越于是。取舍之言,非不尽善也。但夫怀诈饰伪,举

世有之。干禄者不尽善,举人者不尽智,或以势逼,或以利兴。观象察言,以难其识;附威藉利,谀媚其心。有于此者,则取舍之方,何所施矣。呜呼!负舟登山,诚难事也。

策曰:文武之道,方册所不坠;德怨之报,人情之大纲。射为诸侯,杜预无穿札之力;士为知己,崔洪有挽弓之悔。相圃泽宫,失之远矣;子皮、鲍叔,夫何有哉!夫射者,先王所以定人之心,和人之志,亦以示其威仪耳。以为诸侯分我茅土,育我黎蒸,抚有威衡,持秉生杀,当审心定志,敷德遵和。故为其立饮射之法,以导达其志,不在穿札贯的矣。子曰射不主皮,即其义也。则夫丽龟贯石者,将武夫之技耳,非不侮鳏寡,保其社稷之业。夫有大功者获大赏,异哉当阳,诚无间然矣。

古之君子,冠业而立于朝,则必有益于时矣。以为益时者,莫先于进贤。苟得其人,则没齿无怨矣,又何可顾望默识乎?子曰定其交而后求。夫古之人定其交者,将弘济时务,克清世几。恐夫道不吾行,才为时弃,是用定其交,求其达,岂徒瞩促存于情之所好哉?若以情之所好相求,则是便僻比周之人,岂得为文雅君子乎?崔侯必不以挽弓为悔。假使子皮荐国产,叔牙举夷吾,终不能光兴郑邦,匡合齐社,亦未足以纷昭载籍矣。

策曰:举贤受赏,非才有罚,国柄所加,期乎必当。验之从政,效无限断之年;试以文才,智有迟速之别。知而不举,闻讥窃位;举非其人,宁当显戮。臧孙之犯,既是虚刑;子文之辜,复当何典?内外齐举,援亲岂不致嫌;师锡具陈,行庆又谁为首?夫天之平分万物,体不俱举,有其才者童其首,挥其翼者两其足。德不必备,才难尽善。其人善于政者,不必有其文;工于词者,不必敏其事。《书》曰无求备于一人,详矣。先王均其曲直,任之事宜,物各有所长,工拙不相害矣。故《书》曰明试以言,车服以庸。则尧试其人以官,备在方策矣。

夫政有序,化有渐,时有险夷,功有显隐。为政者当责其岁晚,不可中道而废也。施政立德,不过乎三年,人情大可见也。孔子曰期月而化成,《书》曰三载考绩,何得无限断之年欤?夫文者,贵其能书理论,宣道其业,非得意之实,乃无意之筌欤?夫《传》曰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又曰非文无以自达。苟欲考之文词，求之迟速，则志有可得，在政斯亨，言之无文，用亦何害？

且夫官爵者，至公之器也；荐贤者，至公之道也。君子持至公之道，守至公之器，进思尽忠，何可回隐，复俯荐嫌疑亲仇之间哉？昔者先王之立制，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举非其实，置其阿党之诛；荐得其人，介以汇征之赏。行庆之典，不偏于师锡矣。时理则德存，世乱则道丧。难乎鲁无君子，楚不足征。使子文安居，臧氏无咎，痛哉政不难矣。不有仲尼，蔑贾之喻，千载之后，何知其过焉。谨对。

对答如下：万物通过类属往上升，法术凭借类属往下降，所以大小事物的趋向与归宿，未曾离开过各自的类属啊！世上所讲的属于同一类的声音就彼此应合，属于同一类的气味就相互寻求，云会跟在龙后面涌生，风会跟在虎后面形成，这些正是那效验吧！何况世人秉受仁义礼智信这五常，蕴含着喜好与厌恶的性情，更是天生就如此的态势，怎么能把自己的位置不放在既定的类属里呢？这在原本上就决定了读书人这批君子砥砺自己的言行，树立起名声，昂起头，挺起身，只想从那低洼处迅猛崛起，跨越到天河之上，与那鸾凤鸟结成同伴了。哪里不能够控制住飞去的箭羽，使对方屈服呢？这实在是说明类属存在着聚合，人群存在着区分，最卑污的层次决不能长时间陷在里面。况且没有恰切的时机，仍然想要像这样来取得官位，何况春秋时晋国的乐官师旷伸长耳朵，楚国的卞和擦亮眼睛，打算去察辨那奇妙的声音，求索那裹在石头中的美玉，如果真有留用的情况，谁还愿意在脱掉平民服装换上官袍的考试面前徘徊呢？

皇上的策问中说：荐举人才的方法，或许具有多种的途径；取用和舍弃的做法，不能够调合到一起。怎样办就能使怀有才能却隐遁形迹的人，不窃取处士的美名？对耿介特立而落落寡合的人，如何做就得到了解他的人的推荐呢？荐举隐士的办法，应当定有一般的规则；取用和舍弃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那最完善的东西。以上问题在臣下我看来，一个人要是想达到的目的不一般，就会深深隐藏起他的用心，故意做出某些姿态，仅凭外部表现是根本无法了解他的，仅凭言

辞也是根本无法彻底掌握他的。这样想去辨别一个人既然无法实现,而求索那本源所在,也就差不多会有了解出的东西了。皇天高高耸立在上面,把那气质施注给世人;大地与天相对应地铺展在下面,用那形体使世人成就。在天地之间根本藏匿不了的东西,是那形体和气质罢了。气质聚积的所有成份就在形体上显现出来,形体的活动方式就感召那事物。既然在形体上显现出来了,所以就能够凭借那证象去察辨;既然在事物上有感召了,所以就能够依据那类属去求索。察辨那证象,才能高的人和本事低的人也就可以做出衡量了;求索那类属,邪气和正气也就可以识别出来了。尽管他怀有才能却隐遁形迹,耿介特立而落落寡合,终竟无法在形体上躲避过去,也无法在气质上隐匿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孔子说过:察辨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观看他所采取的手段,了解他总感到心安理得的东西,这个人会隐藏到哪里去呢?这个人会隐藏到哪里去呢?古代圣人考察人未曾超越过这种做法去。有关取用和舍弃的建议,确实并不是没有那最完善的东西。只是心怀奸诈,装样子给人看,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谋取官位俸禄的人既不全都动机纯正,荐举人才的人也不全都明智,有的利用势力来逼压,有的出自私利跳出来。观看证象和察辨言辞,已经在鉴别力上很难达到高度;而又依附威势,专为私利而来,取悦讨好当权者的心意。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取用和舍弃的办法又会施用到哪里去呢?哎呀呀!身背木船却要登到山上去,确实就是难事了。

皇帝的策问中又说: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大道,是在典籍上永不消失的;用仁德对怨恨做出回报,属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大纲。比射箭册封谁能当诸侯,灭掉东吴的杜预却没有穿透一层皮革的力气;义士要为了解自己的人献出生命,可西晋的崔洪却对推荐邻讹代替自己当左丞而产生这是挽弓射自己的悔恨。相圃这个孔子练习射箭的地方和泽宫这类朝廷组织练习射箭并选取士子的处所,彼此距离得太远了。执掌郑国国政的子皮和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鲍叔,又哪里能沾上边呢?以上的问题在臣下我看来,举行射箭比赛,这是古代的圣帝明王稳定下人们的心念和协调好人们的情志的措施,也只借

助这种方式来显示那具体的礼仪罢了。认为诸侯受封到我王室的土地和物产，化育我王室的黎民百姓，享有威势，掌握着生杀的权力，就应当多加小心，稳定下情志，广泛施布仁德，遵循和谐的施政原则，所以就为他们定立起宴饮和射箭比赛的制度，用来诱导宣达他们的心志，目的并不是在那穿透皮革、射中靶心上了。孔子说：射箭比赛并非光看射中了没有，也就是强调这种宗旨啊！这样一来，箭中乌龟和穿透硬石，属于武将的技艺罢了，并不是去保护孤寡老小的那些百姓而保住国家的基业啊！立有大功的人就获得到重大的封赏，从面南朝阳而施治的天子那里受到特殊的优待，确实是没有那丝毫的阻隔啊！

古代的君子功业第一而挺立在朝廷上，就必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要有补益的了，而且认为对时代确有补益的事情，没有什么能比进用贤才更占首位的了。如果获取到了真正合适的人选，一辈子也不会存在怨恨了，又哪能瞻前顾后、暗中首肯呢？孔子说：确定下朋友关系，然后再为他办事情。古人和谁确定下朋友关系，目的是要广为救助当前的急务，解决好社会的微妙问题。唯恐大道在自己这里推行不开，才能被时世所沦弃，因此就确定下自己的朋友，谋求政治上彼此有所作为，哪里只是局限在双方感情特密切上呢？如果光凭感情特密切来互相帮忙，这也就成了投机取巧、彼此勾结的一类人，哪里能够成为修养很高的君子呢？这样来办，西晋的崔洪也就必定不会把挽弓看成是该懊悔的事情了。假设郑国的子皮推荐子产，鲍叔推荐管仲，可到最后却不能够振兴显扬起郑国来，不能使齐国多次聚合起诸侯，辅助王室匡正天下，那也就没资格在典籍上反复出现和得到彰显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荐举了贤才就受到赏赐，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有惩罚。这种国家法律所施加的对象，必定要达到恰切。从任职施政来加以验核，取得政绩就难有限定的年数；用文才来予以测试，智慧就有了迟钝和敏捷的区别。了解一个人却不向朝廷举荐，就会听到窃据高位的讥斥；举荐却不是合适的人选，哪里就该当众处以死刑呢？春秋时鲁国臧孙打城门砍门拴出奔到邾国，已经属于虚设的刑罚，楚国的子文推荐刚强无礼的子玉当令尹而被晋国打得大败，这又

该适用什么刑罚呢？像晋国的祁奚对家族和家族外的人一并加以荐举，可援引亲属哪能不招来嫌疑呢？众人提出建议，详尽禀报某个人的情况，而施行封赏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应占第一位呢？以上问题在臣下我看来，皇天均衡地分化出万物，在形体上并不是让它们都占全。具有特殊本领的东西，偏偏叫它脑袋长得光秃秃的；能够张开翅膀飞翔的东西，还要让它带上两只爪。对于人来说，德行必定不全具备，才能很难样样都行。擅长处理政事的人，不一定就具有那文采；擅长文辞的人，不一定就对政事很敏捷。《尚书》中讲论对一个人不要求全求备，已经讲得很详明了。古代的圣帝明王合理利用人才的优缺点，把每个人适合做的事务交给他去做。万物各有各的长处，精巧与笨拙彼此就不妨害了。所以《尚书》中讲：通过政绩汇报来明晰地予以验核，根据功绩来赐给不同等级的车马和官服。这就表明唐尧依凭履行职务的情况来考核那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在典籍上已经载述得相当完整了。

政事具有推行的次序，教化具有逐渐实现的过程，时势具有严峻和顺利的状况，功绩具有显赫与隐微的情形。执掌朝政的人应当要求手下人在较长的时间内见效，决不能让他们半途而废啊！可是施行政务，建立德业，不超过三年，人们的反应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的。孔子强调一年就差不多可以形成教化了，《尚书》中强调每隔三年考核一次政绩，这又哪里能够没有那限定的年数呢？文章贵在能写出道理来，宣明并引导那业绩，这还不是获取到义旨所在的实物却竟然是那没有义旨的一种摆设吗？《左传》上强调言辞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文采用来加强言辞的表达力量，又强调除去富有文采的言辞就没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意愿。如果打算从文辞上来做考察，看谁迟钝或敏捷，那么，思想意愿确有可以看得出的地方，在于政事的通畅顺利，言辞并不具备文采，任用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害处呢？

况且官职爵位，属于最应当公正授予的国家重器啊！推荐贤能的人，属于最为公正的准则与做法呀！君子执持最为公正的准则与做法，守护最应当公正授予的国家重器，到帝王面前就只想到竭尽忠诚，哪有什么可以隐瞒回护而又在嫌疑和亲属、仇敌之间俯身荐举

呢?从前古代圣帝明王定立制度,向朝廷进献贤才就受到第一等的赏赐,压制贤才就落得个当众斩首的下场。荐举却不符合实际,就对他处以结党营私的惩罚;荐举真是合适的人选,就对他赐以致使贤人汇聚成一大片的封赏。施行封赏的制度,并不是偏重在众人都一致推举他并说他胜任啊!时代处于大治的状态,德业就存在;社会一片混乱,大道就丧亡。春秋时鲁国没有君子,楚国不值得引 ,真是叫后人太感到为难了。假设子文仍然安稳地当他的令尹, 子孙不产生罪过,即使形势叫人感到伤痛,但施行起国政也并不困难了。没有孔老夫子做《春秋》的话,楚国的蒍贾对子文让子玉代替自己当令尹的劝导,在历经千年以后,哪里能使人明白子文的过错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壬子科

制科试题

策文可以经邦科问

问：三雄鼎立，四海瓜分，魏氏独跨于中原，孙、刘割据于南土。五胜更袭，唯受命以当涂；四大居尊，咸仗义而称帝。二十八宿，指疆次于何方？三十六郡，列封疆于何所？醇化懿纲，非无宽猛之规；爱国活人，自有弛张之度。皇皇祖考，并建鸿名，眇眇子孙，俱闻失德，为功业之厚薄，而存亡之后先。至如献纳忠规，纵横武节，既自方于乐毅，或见比于张良。各有其人，详诸史传，所行事迹，咸请缕陈。

策道侔伊吕科问三道

（原策题已佚。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唐制举科目》略述其概为：）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佽飞，皆出畿内。欲均井田于要服，遵丘赋于革车，并安人重谷、编户农桑之事。

（策文可以经邦科问）提问：三个强大的政权像鼎足那样并立，整个天下像田瓜那样被分割开来，曹魏独自占领了中原地区，孙氏东吴和刘氏蜀汉在南方各占一片领土。五行相克，轮番循环，只把曹魏作为承受天命的王朝。依据天、地、人、道这四大在宇宙中占居尊贵的地位，全都凭仗正义而称用帝号。天上的二十八宿，把星野分区都分别指向了地上的哪些方位？秦朝设置的三十六郡，又在辖境上被列布到哪些处所？醇厚的教化和美好的王纲，并不是没有宽大和威猛的原则；爱惜国家和使人存活，自然具有放松和加强的度数。显赫的祖辈和父辈，同时建立起了盛大的名声；微弱的继位子孙，全都听说有那丧失仁德的表现。由此构成了功业的伟大与渺小，而存在与灭亡便或先或后。至于有人进献忠正的规谏，在武力动用的规则上纵横驰骋，既把自己比拟成战国的乐毅，还有人把自己看成是西汉的张良。

以上列举的表现分别有那具体的人物,在史书列传上载述得很详明,他们所形成的事迹,全请你们这些应试者逐件予以陈述。

(策道侔伊吕科问)兴行起教化,实现国家大治,必定要依赖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求取贤才和审慎确定官位的担任者,没有什么能比任命和荐举更占首位的了。如今打算往远处遵循汉朝和魏代的制度,再施行州郡选送,可又担心地方长官的明辨能力,不能够做到绝对地识别准确。接下来又问到越骑、佽飞这些京师或皇室常备军,全都由京师管辖区域内选取兵员。还要在边远地带按井田制平均承担赋税,照古代那样由一百四十四户人家组成的"丘"一级的地方基层行政单位提供兵员和作战物资,以及安定民众、重视粮食生产、名列国家户籍的百姓要致力农耕蚕桑等政事。

郑少微　对文可以经邦策

郑少微(生卒年不详)　荥阳(今属河南)人。武则天大足元年(701)登拔萃科。睿宗太极元年(712),应文可以经邦科制举,对策第二。至玄宗开元六年(718),又博学通艺科及第。后任刑部侍郎,曾以全年仅判处天下死刑罪犯58人受到玄宗的褒奖,与其兄郑长裕均有名于当时。后出为岐州刺史,又贬为万州司马。

对:汉氏失德,魏图爰启,孙、刘建号,唇齿相依,咸能廓帝绪以定业,振皇纲而握纪。虽数有五胜,运锺当涂,而土无二王,终殊霸业。然则封疆画界,俯稽于地理;瞻星揆景,仰焕于天文。东井发曜于梁岷,傍分蜀汉;南斗联辉于吴会,远接荆衡。详魏土之分野,当毕昴之疆次,伊洛列山川之郡,曹公居四隩之中。毗陵在吴,华阳惟蜀。疆理所得,其在兹乎?

至于开国基,行政令,咸垂统履顺,永传来叶,创业兴绪,克昌后昆。终数代,而一何伦比!虽鸿名休德,将崇贻厥之谋;而继代守文,颇著聿修之美。是以堂构始于祖考,功业由于厚薄,负荷因其子孙,存亡以之先后。至于忠规动俗,武节冠时。异代齐名,孔明自方于乐

毅；死而可作，文若偶比于张良。怀独见之明，既一谋于匡济；行暗合之策，终不谢于孙吴。谨备诸前，庶几万一。谨对。

对答如下：东汉王朝失去了仁德，曹魏取代它的图谋于是开始形成。孙权和刘备建立国号，构成紧密相连的关系。三个政权都能扩展帝王的统系，定立下基业，振兴皇朝的纲纪又掌握住上天的归属。尽管气数具有五行相克的循环次序，可际运正落在曹魏身上，但全部领土上本来不该存有两个天子，最终同称霸天下的大业还是有区别。既然如此，那么各自的辖区划分出界限，俯身稽核那地理；瞻望星宿，揣摹光景，往上察视那鲜明的天象。东井星区照射着梁州岷山，依傍并划分出蜀汉辖境来；南斗星区在吴国建康与会稽一线联合闪耀出光辉，往远处又连接到荆州衡山。确定曹魏辖境与天上对应的区域，正值西方白虎七宿中毕宿与昴宿投射的方位，伊水与洛水分列开山川所在的州郡，曹操正占居四方边际的中心位置。毗陵城属于吴国，华山以南地带只归蜀汉所有。三国疆域所辖有的界区，恐怕就在这里吧？

至于开辟国家的根基，推行政令，全都是垂示统系，遵从天意，永久传续给继位的子孙，创建大业来兴起那帝位一脉相传的端绪，希望能使后代总昌盛。不过到几代就灭亡了，竟然构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尽管盛大的名声和美好的德业，准备显示那留给子孙的谋略，但继位者守护文教，正该突出地彰明那强化了的美好治绩。因此国家规模的构建从祖辈父辈那里做起，功业出自盛大与渺小，挑起重担依赖各自的子孙，存在和灭亡由此而或先或后。至于忠正的规谏感动人心，武力使用的规则在当代数第一。时代不相同可却名声并列，诸葛孔明把自己比拟成战国的乐毅；死后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曹魏的张辽偶尔把自己比作西汉的张良。怀有独到远见的洞察力，既然完全在匡正天下和救助百姓上做谋划；行用与古人暗暗吻合的计策，到最后确实不比孙武与吴起逊色。恭谨地把答卷呈献在皇帝的面前，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答对的地方。恭谨地对答如上。

张九龄　应道侔伊吕科对策

张九龄(678～740)　字子寿,一名博物,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幼聪敏,七岁便知写文章。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中宗景龙元年(707),又登材堪经邦科。睿宗太极元年(712),复应道侔伊吕科制举,名列第一,迁左拾遗。玄宗时官至宰相,因遭李林甫忌恨排挤,终被贬为荆州长史。其选拔人才以平允著称,主张不循资格用人,复置十道采访使。预料出安禄山怀有狼子野心,力主将其及早斩杀,以绝后患。对玄宗怠于政事每借议论必极言得失,特上《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所作五言古诗和五言律诗以格调深婉清雅著称。今有《曲江集》犹行于世。

第一道

对: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征仕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伏览睿问,大哉国体!九品流弊,尝所懵焉,幸因对扬,庶言其可。古者诸侯贡士,司徒论士,必讲礼观能,乡举里选。故十五、十八之岁,大学、小学之节,诵习以时,教化以礼,则孝悌之行可知于乡里,政事之业可升于国朝。先王务教,此其大者。及周既衰,斯文将丧,秦氏灭学,唯力是视,仁义大坏,俊造亦亡。汉高以马上非理,复修三代之事;魏武以军中是务,权立九品之仪。后代因循,莫能改作,纷纷横调,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谓伤心。伏惟殿下以神启睿图,天佐明德,物不终否则受之以泰,弊不遂极乃鼎之以新。涤瑕荡秽,今其时也,伏愿图之。

夫正其本者,万事理;劳于求者,逸于用。岂有大明御宇,虑此假权之人;循良择人,安得谢恩之义!是则外台会府,真若漏于网中;济理适时,复何殊于掌上者也。且有备无患,忘战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仪,羽林、佽飞之卫,汉家征选,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逾千里。此以均其远近,会其中正。王者之制,岂虚乎哉!必开井赋于要服,俾衷

益于畿甸，虽经始之规何施不可，而图远之业犹愿勿遵。

且将振九品之颓纲，维百姓之绝纽，使官有位次，贤有等差，才苟不侔，时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议者息高门之谈，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逋不日而来复，耕桑何忧乎不稔?动之斯应，缓之斯来。若唯作法于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业，孰与归乎？九龄怖栗尘埃，栖栖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拳拳因献策之。何敢望焉？尽心而已。谨对。

对答如下：由承袭鲁王封号的李道坚所荐举的道侔伊吕科应试者征仕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跪拜敬读圣明的策问，真属于重大的国家纲要所在啊!魏晋九品中正制相沿而成的弊病，我曾对它产生过纳闷的地方，万幸趁此对答称扬的机会，差不多能讲论这种制度可以行用。古代诸侯有责任向王室进献人才，司徒负责筛选他们，必定都要讲求礼仪，观察才能，由本乡荐举，经本里推选。所以到十五岁、十八岁的时候，分别在国立高级学校和初级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按照季节诵读研习经书，用礼仪进行教诲化导，于是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的品行可以在本乡本里挺闻名，有关政事的学业可以有资格提拔到诸侯国或天子朝廷上任职。古代的圣帝明王致力教化，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等到周朝衰落以后，文教礼乐眼看着沦丧下去，秦朝灭绝儒学，只看武力如何，仁德道义严重毁败，经过层层选拔的俊士和造士也不见了。汉高帝认为光靠武力不是治国的办法，就又修明夏商周三代的事体；魏武帝由于只管适应军事的需要，就暂且定立起九品用人的制度。后代照样沿用，没有谁能加以改变，乱纷纷地硬行选调，普遍都是名门望族的成员。本属天下人都有权获取到的官职，由此而可以称得上是伤透了人心。跪拜想来，殿下您凭仗神灵启示那明智的谋划和皇天辅助盛明的仁德帝王，事物还没闭塞到最终地步就承受到顺利亨通，弊病还没达到极限就用全新的面貌去加以变革，洗去污点和扫除一切脏物，现今正是最恰切的时候啊!跪拜希望筹划这宗大事。

端正那根本，各种政事就都会得到治理。在求取贤才上很辛劳，

而在任用以后就安逸了。哪里有那如同太阳的天子驾驭天下，却忧虑这类把权力交给他们去使用的人呢?奉公守法的大臣择取官员,怎么能套得上拜谢恩情的义旨呢?这也就表明,负责通报引见的谒者台和掌管全国政务的尚书省，在选人用人上真好像大鱼从网中漏过去了;而实现治理,适应时势,又与握在手掌上具有什么差别呢?而且有准备也就没有后患，忘掉战备必定就会危险。因此整顿军队返回都城和野战宿营的仪式，羽林军和佽飞射士这些卫护的部队，在汉朝进行征调选取,全都出自五处帝陵所在的地区,周代向王室提供赋税的制度，不超出王室的千里直辖区域以外去。这是用来调节好地方远近,归入到数量适中又固定上。称王天下者的规制,哪里是虚设的呢?必定要在边远地带按井田制征收赋税,使这能对京师直辖区域起到以多补少的作用,尽管筹划起始阶段的制度施用到哪里都可以,但谋求长远的大业,还是希望不要遵从它。

况且打算振作起九品中正制的衰颓了的大纲，维系住各个名门大族的灭绝了的枢纽,使官员具有品位序列,贤才具有等级区别,才能如果对不上号，对这类人就只管不予取用。让那贤能的人代替天帝对人间的治理,议政的人止息住对高门望族的谈论,官吏把心思用得特精细,世人享受到那好处,流亡欠税的人很快就返回到故乡,农耕与蚕桑还会忧虑什么不丰产呢?朝廷一有举动,天下就做出响应;朝廷一做安抚,他们就前来归从。如果只在细小的方面定立制度,并不是补救弊病的本来用意,盛明的仁德和伟大的帝业,有谁能跟着走呢?我张九龄跪拜在地上既害怕又恐惧,惊惶匆促并不是那可以乱说一气的地方,但在正确与错误上却慷慨激昂,万分恳切地依从策问来献呈上意见。哪里敢有什么奢望呢?竭尽那一片忠心而已。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王道务德,不来不强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由此劳逸异数,得失可明。故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是则汉武事胡,岂比重

华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拟公刘之橐囊！虽古人有言，引之者有同于秦汉；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于唐虞。不亦然乎？此其开基之大者也。

国家因已有之地，广无私之仁，犬戎即叙，肃慎入贡。若力不能救，岂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苏，是必成汤之怨。然而《春秋》所贵，惟义所在。内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国恐弊，不兴异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举。则知吊伐之义，随时之道也。今颇凋弊，抑非其时。至如守塞则侯应之言为得，斥地则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为明戒者也。必欲系单于之颈，裂匈奴之肩，奚、霫背恩，受制于北虏，小人发愤，请议于东征。谨对。

对答如下：称王天下的做法是在仁德上下气力，远方部族不主动归服就不强迫它们称臣；称霸天下的做法是崇尚武功，远方部族不屈从就不停止用兵。由此国家烦劳与安逸就定数决不相同，得与失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所以说在扩展仁德上下气力的人就昌盛，在拓展辖境上下气力的人就灭亡。这也就表明，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哪里比得上帝舜表演文舞而感化那三苗部落呢？秦始皇在越地派兵驻守，又哪里比得上周族公刘装好粮食做转移而使民众和睦呢？尽管古人讲过至理名言，而加以引伸的人也就和秦始皇、汉武帝一个样；但帝王化导整个天下，实行的人必定要依从唐尧和虞舜。难道还不是这种情形吗？这正属于开拓基业的最重要的方面啊！

我们国家依凭已经辖领的国土，扩展那没有任何偏爱的仁德，西部的少数部族立刻就归服，东北部的少数部族也前来进献礼品。如果力量不能够拯救眼看快被人吞并的方国，这哪里仅仅是当年齐桓公所感到的那样的耻辱？征伐投注在扶植已经灭亡的方国再度兴起上，这就必定构成当年商汤所怨恨的对象。然而《春秋经》所看重的东西，只是道义所在。把华夏各个诸侯国视为内部而把四周少数部族视为外部，这句话是宣明中原王朝恐怕衰落下去，不兴起征服异域的战争；异域的下层百姓如果能获得安宁，又哪里吝惜派出解救军队的行动？由此也就明白安抚民众和讨伐罪人的义旨，正是随

顺时势的举措啊！如今我们国家的情况很不景气，也不是适当的时候。至于守卫边塞，西汉侯应的意见属于恰切；拓展辖境，秦朝蒙恬修长城的害处可以了解到。从前的事情明摆在那里，足以成为明晰的鉴戒啊！一定要锁上单于的脖颈，劈开匈奴的肩膀，奚族雪族背叛朝廷的恩德，服从北部异族的调遣，我这名普通平民也义愤填膺，请求对东征进行商议。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三道

对：伏惟陛下，德盛问安，教存齿学，则孝悌之感，元良之旨。咏《子衿》之诗，义形乎辞，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伏以化凭于势，声若顺风之远；或因于时，德甚置邮之速。则何草不偃，何心不应？而曰未能动俗，殿下之至谦也，尚何术之务而舍此乎！

今又降意微言，征诸坠典。至如皇、帝斫木，盖取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虽成象之时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礼，《夏正》得天，纵损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圣既远，《礼经》残缺，遗文苟存，群儒纷揉。故丧服异制，诸家殊轨。故王肃之旨，约情以断；郑玄之言，引经取决。吕氏因封侯之余俗，采礼官之旧仪，故戴圣采《十二纪》之首为《十二月令》，存周礼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鲁而取美于《颂》，穆公以尊周而见序于《书》，《左氏》以艳富称诬，《谷梁》以文清为婉。范宁序事，其义则详。《乐书》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间之制；夹氏在《传》而不见，唯余班固之说。谨对。

对答如下：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仁德盛大，每天询问太上皇的安康，教化保存那在求学中按年龄排定次序的谦逊美德，这可是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的亲身感化和做太子的纯正义旨啊！咏诵《子衿》这首诗，那诗义在诗句中显现出来，真是我们君主的好太子啊！全天下简直幸运到了极点。跪拜又看到您把教化依凭在威势中，发布命令就像顺着风声传向远方；或者随顺那时势的需要，恩德比传递公文的驿站施布得还迅速。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草木不倒伏？还有哪个人的

心念不应合呢?但在策问中仍然说还没能使全社会做出响应来,这正是殿下极其谦逊啊!还要去致力什么治国的方法却舍弃这两条呢?

如今又对精微的圣人言辞极为关注,从散佚的典籍中进行验证。至于神农氏和黄帝砍木做成锄,挖空木心制成船,大概是取自他们个人的意向。到周文王推演八卦时,才讲说那卦象的启示。尽管形成卦象的时代不同,但获取到意向所在的讲法却是一致的呀!周公定立礼制,《夏正》这篇历书符合天象规律,即便所作的减损与增益可以闹清楚,但仍沿用而不改变。距离圣人既已遥远,《礼经》残损不全了,遗留下的经文还多少存世,众位儒士就众说纷纭。因而丧葬的服装就制度不一样,各个学者各作各的解说。因而曹魏王肃的旨趣,就揣摩人之常情来做断定;东汉郑玄的说法,就援引经书做出决断。秦朝的吕不韦依据册封诸侯所遗留下的风俗,采摘礼官的旧有仪节,因而到西汉的戴圣就摘录《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第一篇文字,组成《礼记》中的《十二月令》,用来保存周代礼制中的法典,其中的原因并不在别的方面。孔老夫子由于尊崇鲁国而对《诗经·鲁颂》特予赞美,秦穆公因为崇尊周王室而在《尚书》中得到编列,《春秋左氏传》由于华美又细节丰富而被称为不真实,《春秋谷梁传》因为文字清晰而被誉为委婉。晋朝范宁在《谷梁传集解序》中叙述事由,具体义旨便很详明。《乐书》历经了秦朝,于是就亡佚了,白白留有西汉河间献王的规制;夹氏解说《春秋》的著述在《春秋五传》的范围以内可却看不到了,只剩下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甲寅科

进士试题

旗赋　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

制科试题

策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问

问：朕闻理国莫尚乎任贤，命官必资乎选众。尧舜以声而以度，考核良难；殷周取德而取名，征求匪易。朕所以载怀经术之彦，夕遗其寝；虚仁艺能之士，朝忘其饥。子大夫光我弓旌，应斯扬择。为政作法，岂无前范？安人济时，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从官之才。至如七辅、八元，施何纲纪？十臣、四老，正何得失？并陈事迹，兼详名氏。夫朝会古礼，登享旧章，九仪式辨其赐，六赞各明所执。雍畤起自何年？亳社立于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诸布、诸严，彼何所主？又穆邦家而济生死，三圣之教何长？利动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两业，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适时何急？凡此数科，不获双美，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朕将亲览，尔等明言。

提问：皇帝我听说治理国家没有能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了，授予官职必定要依赖挑选的人多。唐尧虞舜按照名声又根据标准做，这表明考核起来确实很难。商朝和周朝择取德行又择取名望，这表明征聘搜求并不容易。皇帝我期待通晓儒家治国方法的英才，每到夜里都顾不上睡觉，虚心在等待身怀道艺才能的士子，每到早晨都忘记了肚子饿。你们这些士大夫为朝廷的延聘活动增添光采，响应这次的识拔择用。施布国政，制定法度，哪里没有前代的典范呢？安定民众，救助时世，也有那美好的法式。应当述说一番自己立身的志向，各自谈一谈本人做官的才干。至于古代的七辅与八元，他们都推行

了什么朝廷纲纪?十臣和四老,又矫正了哪些得失?全都陈述出各自的事迹,同时具体指出他们的名氏来。朝廷聚会属于古代的大礼,祭享天地属于旧有的惯例,对九种封授等级要准确地区辨出每一级的拜赐内容,对进见时的六种礼物各自指明所执带的具体物品。所谓雍畤始建于什么年代,所谓亳社又奉立于哪个朝代?所谓天士与地士,这是由什么来封拜的?所谓诸严和诸布,它们又起着什么作用?再者使国家肃静又救助世人的生死,老子、佛祖、孔子这三位圣人的教义要数哪一个见长呢?对动植物都有利又对众百姓有好处,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用途要数哪一种最重要呢?手工制造与经商这两类职业,在社会生活中要数哪一类位居前面呢?文治与武功这治国的两个关键方面,适应时势需要该数哪个方面更紧切呢?总共以上这些问题,达不到两全其美,你们必定要在认为该存用的地方做到孔子当年教导子贡时强调取信于民那个样,在认为该去除的地方做到孔子当年教导子贡时强调最后才去除粮食那个样。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你们这些应试者要明晰地做论说。

李昂　旗赋

李昂(生卒年不详)　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开元二年(714)进士第一,九年(721)又登拔萃科。历任吏部郎中和司封、考功、仓部员外郎及侍御史等职。性情刚急。二十四年(736),循例以考功员外郎充任主考官,受到举人诋诃。此后鉴于郎官位轻望微,乃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遂成定制。试赋限定八字韵脚,亦始自《旗赋》。

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排回惊鸟,飞天断鸿。至若混羽旗以横野,则睹之者目骇;杂金鼓而特设,则见之者气雄。尔其誓将临边,兴师授律,拥豹骑而长往,指龙山而冲出。月阵联云,星旄斗日。回五翎以革面,挫三庭而屈膝。匪旗之佐彼军容,则何以沙场清谧?明明我君,四海

无尘。立徽号，建洪勋。为旗削蚩尤之迹，画蛟龙之文。信俟功于巢、燧，谅比德于姜、云。奄有天下，体国经野，览兹旗之财成，故可得而言者。俨孤峙以摽众，列广形而助寨。随时卷舒，任用行舍，不务功以伐谋，良有足而称也。徒观其进退缤纷，旖旎三军，可仰可则，光辉一国。辕示迷于指南，何登车而逐北。塞断连营，幸偶时清。对岌岌之台殿，间悠悠之旆旌。陵紫霄而风扫，逗碧落以云萦。摆帝楼之晴树，弄天门之晓旌。高则可抑，犯乃不倾。每低昂以自守，常居满而望盈。时亨《大畜》，于何不育？永端容于太阶，沐皇风之清肃。

远扬那代表国家荣耀的仪仗卫护气派，实在是仰赖这大旗的多种功用。图案绘制成太阳和月亮的形状，倒影就遮蔽那秋霜染过的长空。猛可地曲折移动，便会挂带住云雾；突然间摇动飘荡，就能扬布起疾风。使受惊的鸟类在它周围徘徊，让掉队的鸿雁重新飞上高空。至于同帝王游车上专用的羽旗相混合，横立在原野，看到它的人就神色惊恐；与号角战鼓夹杂在一起，特地竖起来，望见它的人就勇气倍增。当那帝王叫将帅宣誓，督临边境，出动部队，授付军法，拥持勇猛的骑兵长驱直入，指向龙山而冲锋出击。月芽形的阵势连接起青云，流星般的旌旗与烈日争辉。致使众多部族掉转头来顺从，挫败各个强大方国而被迫归服。如果不是大旗在佐助那军容，凭什么战场会清静安宁？我朝当今皇上最圣明，天下各地竟没有战争的迹象。定立美好的称号，创建伟大的功勋。制作大旗，消除掉蚩尤的形迹，描画上蛟龙的图案。这真真是在期待着远古有巢氏、燧人氏那样的功业，同姜姓始祖神农氏、得云瑞应的黄帝比试恩德。拥有整个天下，治理国家，观览这大旗的筹划制成，所以能用合适的言辞称述它。俨然单独耸立，来挥动众人；列成在君主左右的形式，去救助少数。随顺时机卷起来或舒展开，依据特定用处行使它或收起它。决不是务求武功来谋划讨伐，实在有足可称述的呀！仅仅用来检阅部队进退的繁盛场面，使三军华美壮观，既可以瞻仰，又可以效法，光采映照整个国家。指示迷途超过那指南车，何必再登车追击那败逃的敌人！边塞上断绝了连成片的军营，幸好与时局的清明吻合适应。正对着

高高的楼台殿阁，四处散布着悠悠带穗的旗帜；凌越云霄而长风卷扫，逗弄天空而青云萦绕；既像汉武帝时在楼殿前摆设多面旗帜让它们自动碰击，又像清晨抚弄那星空中天门外的天旗星。它高高耸立，足可瞻仰；受到侵犯，竟不倒斜。每每低回昂奋来自我守持，常常处于饱满状态而期望达到极限。时势同《易经·大畜卦》所讲的那样顺通，对什么还不能够蓄育？永久在第一道台阶上端正地保持架势，沐浴着清明肃正的皇恩和风。

孙逖　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对策

孙逖(？~761？)　涉县(今属河北)人，一说武水(治今山东聊城县西南)人。幼而英俊，文思敏捷。玄宗开元二年(714)应哲人奇士科制举，名列第一，授山阴尉。十年(722)和十四年(726)，分别又登文藻宏丽科、贤良方正科，累拜左拾遗。后被辟为太原镇幕府从事，二十一年(733)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院修撰。遴选贡士两年间，多得颜真卿一类的英才。寻迁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凡八年，尤以文理精练和谦逊自抑见称于时。天宝三载(744)，权判刑部侍郎。五载以风湿病求散官，遂改太子左庶子，此后沉废多年，于肃宗上元中卒。曾有文集三十卷，已佚。

对：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圣广运，劝激极乎宇宙，察微穷乎物象。至如选众任能之术，礼经享物之要，三圣五材之短长，文武工商之用舍，斯并独断圣虑，悬衡睿谋，百辟端委而顺若，庶绩不言而潜运矣。犹以为立政图大，试言务重，弗躬弗亲，庶人不信。降清问于穹昊，俨神威于咫尺。斯亦尧咨舜吁，同德比义。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对扬天子之休命？

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应斯扬择。为政作法，岂无前范？安人济时，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从官之才者。臣闻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今神化阴骘，要道光被，设序塾以教于乡，立胶庠以训于国，制为禄秩，以劝其从，则含生禀灵者，孰不刻意于仁义，饬躬于闻

达?所谓尧舜之代,比屋可封也。

臣以一介,能行无取,思勉进以追群,顾观光而知愧。尝亦自强不息,有闻而行,驰颜、闵之极挚,伏周、孔之轨躅。学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润身。非有志于干禄,苟求仁于寡过。立身之志,允或在兹;从官之才,则愚岂敢!何则?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必也临事,难乎预谋。昔孔明之自比管、乐,时人未许;仲由因之以师旅,夫子哂之。祇奉睿问,惧深殒越,其敢觇冒,轻议天工?陛下若不弃菅蒯,无遗蕴藻,考片言而察所以,效一官而视所由,安敢庾哉?取则不远,知人则哲。陛下允迪于圣君,扬己自媒,微臣敢辞于丑行。

制策曰:七辅、八元,施何纲纪?十臣、四老,正何得失?并陈事迹,兼详名氏者。《书》曰: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违汝弼,时闻间出,代有其人。昔者黄帝之首出庶物也,时则有若七辅,股肱舟楫;虞舜之宾于四门也,时则有若八元,忠肃恭懿。周文之心德同济,始用十臣;汉储之羽翼已成,初闻四老。陈其事迹,斯亦庶乎!言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辅则风、牧共贯,八元乃伯、仲同归。语十臣之伦,则太颠、闳夭;稽四老之类,则绮季、园公。昔剡子之叙古官,劳于倾盖;鲁公之问儒行,疲于更仆。况实繁有众,急景不留,聊举凡以见意,岂遽数而周物!

制策曰:夫朝会古礼,祭享旧章,九仪式辨其赐,六贽各明所执。雍畤起自何年,亳社立于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诸布、诸严,彼何所主者。《传》曰:朝有定制,会有表仪。《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斯盖曲为之防,事为之制。经礼三百,仪礼三千,载在祀典,藏之史籍。九仪谓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贽谓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雍畤起于秦年,亳社立于周代。天士、地士者,汉武之宠方士,将军始受其封。诸布、诸严者,班史之记小祠,先儒不详所出。

制策曰:穆邦家而济生死,三圣之教何长?利动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两业,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适时何急者。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情之欲也。天禀其性而不能节,圣人能为之

节而不能绝。故务恬朴,贵清净,同术于汤之益谦,合志于尧之克让,此道教所长也。若乃不杀伐,证因果,包太空以为言,化群有而归寂,比释教所长也。皆能惩窒嗜欲,静镇纷揉,王侯得之,以贞天下。至于辨贵贱,立君臣,示之以好恶,因之以诛赏,使礼乐刑政灿然可观,则为善不同,其味相反,系风捕影,荡而无适。故知孔氏之立教,乃为邦之所急也。

《传》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断之于阴阳,效之于气物,示休咎以垂诫,因兴衰以运行。若可废,则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穑,居中履正,应我皇之休运,弼大化以阜成,利动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逾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国有六职,实载工商;时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征!然舜命共工之职,周有《考功》之记,车服器械,斯焉取斯。岂与夫乘时射利、滞财居逐者,若兹之琐琐焉。文德者,政之所专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则士农之末,作巧贤于鬻货;升平之岁,经国先于定功。臣学昧稽古,思迷政途。谋适不用,空愧绕朝之策;道之将行,犹委仲尼之命。谨对。

对答如下: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您文德辉映,十分显赫,大圣人的英明覆盖一切,施布到每个角落,劝导激励遍及到宇宙,察识隐微包括了所有的事物证象。至于多选人才和任用贤能的方法,重大礼仪和祭享物品的要领,老子、佛祖、孔子三位圣人的教义和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长处与短处,文治武功和手工制造以及经商活动的取用与舍弃,这一切全都由圣明的思考来独自做出裁断,通过睿智的谋虑定出标准,文武百官端端正正又恭敬从命,各种政务不用指点而无形中就运作起来了。但仍旧认为确立起国政要谋求宏大长远,测试下面的言论要在重大问题上用气力,自己不亲自做出表率,老百姓就不信服,于是从殿廷上颁降下清晰而又详明的询问,在君臣面对面之间庄严地显示出神圣的威势。这也就是和当年唐尧的咨询、虞舜的督促属于同一种德业,同一种用意啊!臣下我很愚昧,哪敢不叩拜又跪拜,对答并称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你们这些士大夫为朝廷的聘请活动增添光采,

响应这次的识拔择用。施布国政，制定法度，哪里没有前代的典范呢?安定民众，救助时世，也有那美好的法式。应当叙述一番自己立身的志向，各自谈一谈本人做官的才干。臣下我听说，国家政治清明，可自己还贫困又低贱，这可是耻辱啊!如今神明的化育在暗中佑助民众，切要的道法广泛地延布，设置初级学校来在乡间施布教化，设立最高学府来在国都进行训导，制定出官位品级，来激励世人紧跟在后面。这样一来，只要是秉受到天赋的活人，有谁还不对仁德道义特别用心，勉励自己名声传扬又取得官位呢?这正是人们所讲的在唐尧虞舜时代，家家可以受到特殊的表彰啊!

臣下我凭借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才能和品行都没有可取的地方，只想努力上进来追上众人，不过观看国家的盛德光辉就深知惭愧了。也曾自强不息，听到什么就去践行，向往颜渊和闵子骞那样的极度诚挚，归从周公和孔子设定的法式。研习古代希望自己能和大道保持一致，行为谨慎只想能够修养好自身。并不是对取得官位抱有志向，姑且追求仁德，做到少犯过错。立身的志向，恐怕确实就在这里，做官的才干，愚昧的臣下我哪敢去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老夫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称赞过谁，那是曾经考验过他的。必定要面临事件做出证明，很难事先就说自己怎么样。从前诸葛孔明把自己比拟成春秋时的管仲和战国时的乐毅，可当时的人们并未予以承认。子路声称对受到军事进攻的中等国家进行治理，三年就能使人人有勇气并且懂得道义，可孔子只对他微微一笑。如今恭敬地承奉皇上的明智询问，畏惧得深极了，简直要跌倒，哪里敢羞惭冒昧地去轻率议论代替皇天完成任务的事情呢? 陛下如果不抛弃微小低贱的人，不遗漏掉美好的言辞，考察那只言片语而察视他的所作所为，验核那一官半职而观看他的方式手段，他怎敢隐藏起来呢?择定准则并不遥远，知人善任就显出明智来。陛下同那圣明的君主确实相配，而显扬本人自我兜售，卑微的臣下我敢与这类丑恶的行径离得远远的。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古代的七辅与八元，他们都推行了什么朝廷纲纪?十臣和四老，又矫正了哪些得失?全都陈述出各自的事迹，同时

具体指出他们的名氏来。对于以上问题,《尚书》中曾讲过:君主离开贤臣就实现不了大治,贤臣离开了君主就没饭吃。所以君主圣明,大臣忠诚,君主我出了差错,你们大臣要辅正。这种情况听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任何朝代都有这样的人物。从前黄帝最先让万物化生出来,当时就有像七辅那样的大臣们,发挥着大腿胳臂和船只船桨的作用。虞舜在明堂的四门迎接各地的贤才,当时就有八元那样的助手们既忠诚严肃又恭敬美好。周文王与下面一心一德,同舟共济,就开始任用十臣。西汉太子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使人最先听说有所谓四老。陈述他们的事迹,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吧!具体指出各自的名氏,固然很能让人高看啊!七辅即风后与力牧等七人连成一串,八元是伯奋、仲堪等弟兄八人一起归从。讲起十臣这批人,便是太颠、闳夭等十名大臣;核定四老这类人,便是绮里季、园公等四位隐士。春秋时剡子述说古代的职官演变,使孔子忙不迭与他挨在一起攀谈。鲁哀公询问儒士的行为,使孔子累得讲论不过来。何况实际上很繁多又有各个方面,而考试快对答的时间并不停止,姑且列举那概要来看出其中的意思,哪能匆促地逐个数而一个也不剩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朝廷聚会属于古代的大礼,祭享天地属于旧有的惯例,对九种封授等级要准确地区辨出每一级的拜赐内容,对进见时的六种礼物各自指明执带的具体物品。所谓雍畤始建于什么年代,所谓亳社又奉立于哪个朝代?所谓天士与地士,这是由什么来封拜的?所谓诸严和诸布,它们又起着什么作用?有关上列问题,解释经书的《左传》上说:朝拜具有固定的站列制度,会见具有标志和仪节。《尚书》中说:享献的大礼在于仪节,仪节不完备,礼物再多,也只能叫做没有享献。这大致上都是多方面为它做出防范来,事事都给它订出规矩来。重大的礼仪为三百条,细小的礼仪为三千条,这正载列在祭祀的典册上,收录在史籍中。九种封授的等级说的是:最低的一等授给职位,第二等授给礼服,第三等授给站立在朝廷上的位置,第四等授给祭祀的器物,第五等授给领地,第六等赐给手下的臣子,第七等授给邦国,第八等授给辖领的一个州,第九等授给统辖的一个区域。进见时的六种礼物说的是:诸侯执带虎豹皮做装饰的缯帛,卿士

执带羔羊,大夫执带鸿雁,士子执带山鸡,平民执带鸭子,工匠和商贩执带家鸡。雍畤这祭祀天帝的场所始建于秦代,亳社这警惕亡国的祭祀场所奉立于周朝。天士将军和地士将军这两个官名,出自汉武帝宠信那些鼓吹登仙的术士,从五利将军栾大开始承受到这类封号。诸布、诸严这些祭祀星辰的祠庙,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成小型祭祀活动的用场,而古代的儒士不清楚它们的具体来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使国家肃静又救助世人的生死,老子、佛祖、孔子这三位圣人的教义要数哪一个见长呢?对动植物都有利又对百姓有好处,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用途要数哪一种最重要呢?手工制造与经商这两类职业,在社会生活中要数哪一类位居前面呢?文治与武功这治国的两个关键方面,适应时势需要该数哪个方面更紧切呢?就以上问题来说,人从生下来就安静,这是皇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就去行动,这是情志上产生的欲望。皇天给人赋予了本性可人却不能节制自己,圣人能为他们定出节制的办法可却无法彻底根除掉。所以致力于恬淡质朴,看重清净,既与商汤的越发谦逊属于同一种办法,又与唐尧的能够推让在思想上相吻合,这正是道教的长处啊!至于不杀生,不动武,证成因果报应,把整个太空都包括进来进行说教,化导一切生物而归入虚寂,这正是佛教的长处啊!二教都能教诲世人克制住自己的嗜好与欲望,镇定住各种想法和举动,帝王获取到它们,可以用来端正天下。至于区分出贵贱等级,确立起君臣名份,向人们显示朝廷所喜好与厌恶的东西,随后加以封赏和惩罚,使礼仪乐舞和政事刑罚灿然可观,那就看出道教与佛教所倡导的良善行为不一样,主旨正相反,显得系风捕影,空荡而叫人无所适从了。因此就能明白孔子的确立教化,正属于治国最应放在首位的东西啊!

解释经书的《左传》上说:皇天生长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缺少其中的哪一种也不行。它们由阴阳二气所决定,在气候物象上反映出来,显示吉祥与祸殃来向天子发出告诫,依据国家兴衰来运转流布。如果可以废弃掉其中的哪一种,天地阴阳的变化定律也就或许

止息了。不过土行的性能可以种植庄稼，占居在中心位置，登上最端正的宝座，应合我们皇上的美好际运。辅助遍及天下的教化来使成绩得到扩充，对动植物都有利又对众百姓有好处，就要把金行和火行放在前面，超过水行和木行去。实在不得已，那就抓住其中的一行。再者国家定有六种社会职业，里面实际包括着手工制造和经商活动。适应时势需要的最关键的两个方面，没有能比文治和武功更占第一位的了。它们和发出“唯”或“阿”的应答声其实差别极小一个样，又哪有什么谁对谁错足足可以证明的呢？然而虞舜任命“共工”这一官职，周朝编有《考工记》，车辆服饰和器具物品，该从这里取用就从这里取用。哪里像与利用时机获取利润而囤积居奇捞好处的做法一个样，如此这般地琐细呢？文德是国政的主宰方面，武力威势是文德的辅助方面。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在读书人和农民之下的职业，手工制造还比经商活动强得多；在天下太平的年代里，筹划怎样治国要比定立下武功更为重要。臣下我的学问在考察古代上很昏昧，思索的东西在施政途径上根本闹不清楚。提出的谋略恰恰不值得采用，白白面对响彻朝廷的策问感到惭愧；但大道眼看着就要行用，仍旧完全听从孔老夫子的命令。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己未科

制科试题

策文词雅丽科问

问：朕闻至道虽微，不言而化，皇天阴骘，相叶其彝。信寒暑而生成，施云雨而沐润。垂范作训，树君育人，时有浇淳，教垂繁略。成汤既圣，禹道云亡。《桑扈》、《谷风》，屡动诗人之刺；塞门、反坫，时贻宣父之嫌。我国家振彼颓纲，开兹盛业，朕以不德，袭号乘时。而皇极之道未敷，谟明之轨尚阙，思弘厥理，其义安从？至如视听貌言，恒若时若，会极归极，作哲作乂，一以贯之，何方而可？夫礼以饰情，情疏则礼略；乐以通感，感至则神和。理内为同，修外为异，同异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斯要。又《四时》、《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谁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礼容》，未详所出。悉情以对，用释余疑。

提问：皇帝我听说最高的大道尽管隐微，可什么也不说就能化生；皇天暗中在佑护天底下的民众，辅助使人们和谐相处的常规。寒暑总是交替到来而化生成就万物，施布风云雨露来沐浴滋润。垂示大法，发出训导，树立君长，抚育人民，时世存在着浇薄与淳厚的情况，教化的施行也就有繁缛和简略的区别。商汤成为圣人以后，大禹的治国方式也就消亡了。《桑扈》、《谷风》这类诗篇，屡屡兴起诗人对社会风气的讥刺；国君当门立影壁而大臣也这样干，国君在堂上设有放酒杯的台子而大臣也照样有，这类不懂礼法的行为每每给孔子留下嫌弃的对象。我们国家振刷那些颓败的朝廷纲纪，开辟目前的盛大帝业，皇帝我凭借没有德性，继承皇帝的称号，随顺时势统领天下，可给世人确立起最高准则的治国大道还没有广泛地推行开，使各种策略英明得当的途径还有缺漏，想要扩展

那治绩，在主旨上应当遵从什么呢?至于观察、闻听、态度、言语，某种气候现象持久不变的坏征兆和各种气候现象准时出现的好征兆，集中到最高准则下和全都归从最高准则，形成明智和实现天下大治，用一种方法把它们贯穿起来，究竟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了呢?礼仪是用来陶冶情志的，情志疏散，在礼仪上就会不当一回事；乐舞是用来融通感情的，感情到了极致，神灵就会应合。乐舞在美化心灵上造成人们全都感到和谐欢乐，礼仪在修饰外表上形成等级差别，有关这二者的各自施用，对它们的功效还闹不清楚。整个社会的风尚还没融合成一体，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阐明其中的要领所在。再有《四时》和《武德》这两种乐舞，是由哪个君主创制的?《五行》和《文始》这两种乐舞，又来源于哪个朝代?《昭德》和《盛德》这两种乐舞，还辨别不出它们所尊崇的东西；《昭容》和《礼容》这两种乐舞，还不清楚它们的来历。请用尽心思做出对答，以便解开那些还留存的疑点。

邢巨　应文词雅丽科对策

邢巨(生卒年不详)　扬州(今属江苏)人。中宗神龙年间，即与贺知章等吴越之士以文词俊秀而名扬于京师。睿宗太极元年(712)，始登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玄宗开元七年(719)，复应文词雅丽科制举，名列第一。官终监察御史。

对：臣闻太祖、文皇之御天下也，广直言之路，开纳善之门，近臣尽规，庶人毕议，可谓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绍复先业，齐心法宫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详延秀异，询及刍荛。若乃敷皇极以作则，弘礼乐以垂训，彝伦攸序，群德毕举，斯太宗之盛事也，岂前王访九畴之要、贞三极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万物尽睹，臣谬以黄绶之末，预闻赤墀之议，将何以塞厚问，扬天休?

臣闻诸仲尼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皇不归，大道悠久，圣人顺天地之性，究变化之元，虽损

益以文质，或沿袭以忠敬。至于饰礼容以昭贲，崇乐舞以立象，树君牧人，茂时育物，其致一也。夫务本于道，则浮竞可以镇静；习俗於变，即纯一或以伪迁。故轻乐见诮于《国风》，昧礼贻训于圣典，盖有由焉。

唐兴百有余载，高祖以神武定鼎，纽天纲于八纮；太宗以睿圣握符，纂天光于三象。荡亡隋之颓靡，弘圣唐之简易，盛德大业，与三代同风。伏惟陛下，诞受天休，光膺景命，粤若昭德殷荐之礼，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眷圣之微，顺时布德之典。将以登格皇穹，鸿业也；启迪王命，大猷也；风雨时若，休征也；人俗康宁，至教也。五辉叶训，八方顺轨，尧舜之盛，无以加焉，成康之道，复何足数?而犹曰皇道未敷，谟明尚阙，发天章于圣藻，采至言于舆诵。陛下之谦让也，愚臣何足以知之?

制策曰：至如视听貌言，恒若时若，会极归极，作哲作乂，一以贯之，何方而可者。臣闻王政之端，本于性也；至化之极，归于理也。能尽其性而合乎理，则休征至；不尽其性而悖乎理，则咎征至。故圣人法天以立性，畏命以作则，见天道之在五行，人事应之，彰彰类矣。自非统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从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畅顺而会其极，蒙恒而返其通?适于数，故虽以五事明；宗其极，则可以一理贯。

臣又闻圣心镜物，必采于至妙；大道虚象，垂契于理先。然即继圣业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陛下体周武之盛德，访唐尧之遗事，龟图灵文，天光垂象。伏愿沐时雨于动植，散祥风于涵泳，则大中之道，何以尚兹!

制策曰：夫礼以饰情，情疏则礼略；乐以通感，感至则神和。理内为同，修外为异，同异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斯义。《四时》、《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谁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礼容》，未详所出。臣闻礼乐，其所由来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伦，以致太平也。必将以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让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简，舞咏之功浅，而移风归乎至易。

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礼之所以饰情也。登金石，翔景瑞，此乐之所以通感也。故感发于内，乐由衷以致和；情见乎表，礼自外以为异。虽清浊之资，考性则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一。况今懿纲被遐裔，至道冠生灵，和理日跻，同乎大顺，非礼乐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范，此同异之用也；教齐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于《武德》之盛，武之业也；《文德》之盛，顺之至也。神道设教，制《四时》于炎历；德徽可崇，增《五行》于横序。尊《三德》于清庙，表《二容》于盛礼。圣问昭闳，与天道以元亨；狂言鄙浅，仰天文而知愧。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我朝的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驾驭天下，拓宽直言进谏的道路，敞开采纳良好建议的大门，身边的大臣个个都进行规劝，众百姓人人都发表议论，可以称得上是达到极点了。如今皇天把统治权投注在陛下的身上，继承并恢复祖先的大业，在料理政务的宫室中稳定住心念，在处于正中的殿廷上发号施令，广泛地延揽杰出的人才，访询延及到割草打柴的人们。至于普遍确立起最高准则来给天下人做出表率，弘扬礼仪乐舞来向天下人垂示训导，常规大法得到恰切的安排，所有具有才德的人一律被提拔任用了，这正是太宗皇帝的盛大举措啊！哪里是古代帝王访求九种治国大法的纲要和端正天地人的根基能够赶得上的呢？天上的日月星辰都光辉回转，一切生物都化生出来。臣下我并不合格地凭借众官员中的最末一个人，得以听到并参加赤红殿阶下的议论，可该拿什么来对答上厚重的询问，称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呢？

臣下我听说孔老夫子说过这样的话：使天下实现大同的治国之道以及夏商周时期的那些英杰人物，我没能赶得上看到它们啊！可一定要把这记载下来。自从最盛明的时代不再返回，使天下实现大同的治国之道长期被搁置起来，圣人就顺从天地的本性，彻底究寻变化的本源，虽然通过重视文采或重视质朴来进行减损与增益，但也通过崇尚忠厚或崇尚虔敬来递相沿用与承袭。至于强化礼节容仪来彰显文采灿烂，推崇音乐舞蹈来确立起国家的证象，树立君长，

管理人民，振作时世，化育万物，它们的目的都是同一个啊！对大道作为根本来下力气行用，浮躁钻营的习气就可以镇定住；社会风尚随上面而大变，就纯粹专一而改变虚伪的行径。所以不郑重地对待乐舞，就在《诗经·国风》中受到讥诮，对礼法闹不清，就在圣人的典册中留下训示。这是有那理由的了。

我们大唐皇朝兴起已经一百多年了，高祖皇帝凭借神明勇武创立起国家，把皇天的纲纪执持到大地的八方边际。太宗皇帝凭借睿智圣明掌握住符命，把皇天的光辉承接到太阳、月亮和星辰那里。荡除灭亡的隋朝的颓败萎靡，弘扬圣明大唐的简单易行，盛德与大业径与夏商周三代气象相同。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秉受皇天的佑护，承当起登上帝位的天命，直至昭明仁德和盛大祭祀的礼仪，感召人们和谐与沟通神灵的教化，恭敬奉事天帝和抱定圣人训戒的精微用心，顺从时序和施布恩德的成文大法。准备去登配感通皇天，这正是宏大的帝业啊！把帝王的命令向天下讲明白，这正是长远的谋划啊！风雨准时到来，这正是美好的兆应啊！世人和社会一片安宁，这正是最高的教化啊！五大行星放出光辉的地方都同训令相一致，八方区域都顺从那准则，当年唐尧虞舜的兴盛景象，也没有什么能凌驾在上面的，周成王和周康王的治国之道，又怎么足以值得一提呢？可陛下仍然强调给天下人确立起最高准则的治国大道还没有广泛地推行开，各种策略英明得当的途径还有缺漏，从圣明的品察中颁发下最高的策问，从民间的议论中搜采最恰切的意见。这都是陛下的谦逊辞让啊！愚昧的臣下我哪里足以懂得这一切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至于观察、闻听、态度，言语，某种气候现象持久不变的坏征兆和各种气候现象准时出现的好征兆，集中到最高准则下和全都归从最高准则，形成明智和实现天下大治，用一种方法把它们贯穿起来，究竟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了呢？对于以上的问题，臣下我听说帝王政事的开端，是依据人的心性做起的；最高教化的极致，是归入到事理的。能够把人的心性发挥到最善良的地步而又符合事理，美好的征兆也就降现了；不能把人的心性发挥到最善良的地步而又违背事理，凶险的征兆也就来到了。因而圣人取法

皇天来定立起自己的善良心性，畏惧命运来给天下人做出表率，看到皇天的法则蕴藏在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中，人事与它们相应合，也就非常明显地照着做了。原本上就不是统括起心性和命运的内在的事理，求取皇天和人事的起点，有谁能言语符合事理而实现天下大治，依据事情来达到明智，晴朗的天气准时到来又过去而人们集中到最高准则之下，因昏昧导致风总刮起而又使它变正常呢?同那定律相适合，所以尽管凭借观察、闻听、态度、言语、思考总共这五个方面的事情而特突出，但宗奉那最高准则，便可以依据那同一个事理而贯穿起来。

臣下我又听说，圣人心中把一切事物观察得万分清晰，必定要从那最玄妙的地方做采择；大道呈现出让人看不到又听不到的证象，在那事理的前面来垂示吉凶的主宰物。然而步入继承圣人事业的人，他们的治国大道都相同；遵用称王天下的法度的人，他们的教化都一致。陛下体察周武王的盛大德业，访求唐尧遗留下来的事迹，灵龟降示神图，神灵赐给秘文，皇天的光辉都显示那兆象。跪拜祝愿陛下用那按时到来的雨水去沐浴动物和植物，把吉祥的和风散布到沉浸在恩德教化中的世人那里。这样一来，最为适中的治国之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的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礼仪是用来陶冶情志的，情志疏散，在礼仪上就会不当一回事；乐舞是用来融通感情的，感情到了极致，神灵就会应合。乐舞在美化心灵上造成人们全都感到和谐欢乐，礼仪在修饰外表上形成等级差别，有关这二者的各自施用，对它们的功效还闹不清楚。整个社会的风尚还没融合成一体，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阐明其中的义旨所在。《四时》和《武德》这两种乐舞，是由哪个君主创制的?《五行》和《文始》这两种乐舞，又来源于哪个朝代?《昭德》与《盛德》这两种乐舞，还辨别不出它们所尊崇的东西。《昭容》和《礼容》这两种乐舞，还不清楚它们的来历。臣下我听说，礼仪乐舞出现产生，已经是时间太久远了。古代的圣帝明王用它们来使教化更美好，使人伦纲常更淳厚，以便实现天下太平啊!一定要去考察它们在美化世人心灵上的效能，求索那起

点，因而有关施礼互作推让的教化就属于细枝末节了，而使上面安宁的东西，正在那使人做起来最简单里面。歌舞咏唱那一套，功效并不大，而转变社会风尚的东西，归结到使人做起来特容易上面。

分清进来退下的规范动作，在礼服的花纹和色彩上显示出等级来，这是礼仪陶冶人们情志的规定；通过各种乐器演奏出来，造成吉祥纷呈的舞蹈场面，这是乐舞融通感情的方式。所以感情从内心涌生出来，乐舞发自内心便导致和睦亲近。情志在外表上显现出来，礼仪由外表便构成尊卑不同。虽然清纯或污浊的世人天赋，考察他们的心性就有差异，但教化的起点，在于美化心灵，这又是统一的了。况且现今美好的国家纲纪延布到遥远的周边地区，最高的大道覆盖到一切生物的头上，和睦亲近与美化心灵一天比一天提升，全都绝对地顺从，这除去礼仪乐舞的化导，还有什么能达到这种境地呢?崇尚仁德和垂示法式，这正是二者相同处与不同处的一致施用啊!教化统一又周密，这正是社会风尚的融为一体啊!至于《武德》乐舞的盛大隆重，这是表明运用武力去除祸乱的功业；《文始》乐舞的盛大隆重，这是表明天下归顺已经达到了顶点。取法神妙的天道来施布教化，就在火行占居主导地位的西汉创制出《四时》这套乐舞。认为德业美好显赫值得推崇，就在横插出来的帝王统系中的秦朝增设了《五行》这套乐舞。在西汉祭享宗庙时就尊崇《武德》、《昭德》、《盛德》这三套乐舞；在西汉举行盛大礼仪时就突出《昭容》、《礼容》这两套乐舞。圣上的策问揭示出隐微的事情，同皇天的法则相吻合而去致力元始亨通；臣下我狂妄的言论粗陋肤浅，面对颁赐的策问自知惭愧。恭谨地对答如上。

苗晋卿　应文词雅丽科对策

苗晋卿(685～765)　字元辅，壶关(今属山西)人。幼好学，善写文章。既进士及第，又于玄宗开元七年(719)应文词雅丽科制举，对策第二，时年35岁。后官至吏部侍郎，前后典选五年，所取多冗滥，以致留下“曳白”(交白卷)之讥。贬安康太守，徙魏郡

太守，旋充河北采访使。在魏郡三年，政化大行，郡人为其立碑颂德。入为宪部尚书，兼左丞。安史之乱中，以年老推辞陕虢防御使，潜遁山谷，南走金州。肃宗至凤翔，召拜左相，咨以军国大事。既收复两京，以功封韩国公，改侍中。代宗时仍任宰相，以喋不肯语回拒侵入长安的吐蕃的威逼，册为太保。其秉政小心谨畏，不甚斥是非得失，以智自全。然性敏聪，练达事体，百司文簿，过目即晓。卒年81岁。

对：陛下顷与三事大夫议于朝，以计天下，有奇才异行，含光而不扬其辉，诏诸侯咸举之。臣实至愚，不通大识，循才审行，不副高求。臣闻《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孝经》曰：王者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理。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勋业盖时也。逮金石斯缅，步骤不同，时有浇淳，教随繁略。《桑扈》、《谷风》之刺，三归、八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于此!

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传》曰：国家之弊，恒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绪，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万邦作乂。所谓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风，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赐臣策曰：皇极之道未敷，谟明之轨尚阙者，岂不以采刍荛之义，诚考试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问?实陛下谦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

制策曰：至如视听貌言，恒若时若，会极归极，作哲作乂，一以贯之，何方而可者。臣闻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畴相为表里，圣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数必征于错逆；政惟协雅，理必应于调和。考之咎征，粲然著矣。陛下随阳泽以著恩，慎严霜以肃威。鹰隼未击，罻罗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腾休气而涌醴泉。臣以为一以贯之，其道久矣。

制策曰：礼以饰情，情疏则礼略；乐以通感，感至则神和。理

内为同，修外为异，同异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斯要者。臣闻《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董仲舒对策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之为德，阴之为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缓死，顷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则修省刑罚之谓也。臣闻乐以理内为同，礼以修外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二者并行，合为一体。揖让而理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适时之要，斯并存焉。

制策曰：《四时》、《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谁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礼容》，未详所出。悉情以对，用释余疑者。臣以为斯并汉主之乐，载于班氏之书。必使究其明征，考其敏博，既劳更仆，何易尽言！虽敢略而陈之，尚未臻其极也。臣闻《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庙，太祝迎神于庙门，其义也。《四时》、《武德》者，汉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奏于高庙焉。《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为《五行》也。汉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昭德》、《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庙。《昭容》、《礼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谨对。

对答如下：陛下刚刚在朝廷上与辅政大臣们计议，来为天下治理做出筹划，民间有奇异的才子和行为卓异的人，身怀才华却不显扬自己的光辉，于是就命令各地官员把他们全部荐举上来。臣下我实际上极其愚昧，不晓得宏大深远的见识是什么，依照才能，审核品行，根本就不符合朝廷对高才的搜求。臣下我听说《论语》中讲过：皇天可发过什么话呢？但四季却交替到来，各种动植物总都化生。《孝经》中又说：帝王取法皇天的清明，根据大地的出产，去治理天下。因而他那教化不严肃却就形成，他那政令不威猛却就大

治。这正是古人所讲的天地设布好一上一下的位置，圣人效仿它来成就自身的效能，而保住大业，定下功绩，勋劳业绩在当时占第一。等到到了镌刻丰功伟绩的铜器石碑成为过去的东西，所奉行的治国之道引起日月运行的快慢反应各不相同，时世就出现了浅薄与淳厚的差别，教化随之也繁缛或简略了。《诗经》中《桑扈》、《谷风》这类诗篇的讥刺，卿相一人娶三女和大夫动用由八列六十四人组成的天子乐舞队这类招来圣人嫌弃的事情，表明人们由此而超越等级规定，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孔子说过：上面失去了正确的治国原则与方法，人们散去已经时间很长了。解释经书的《左传》上说：国家衰败，必定总是由于这样。陛下继承并守护绵长的皇朝统系，扩展并昭明盛大的仁德，能使文武百官按照法度行事，全国各地都实现了治理。正是人们所讲的包孕了虞舜又化育了夏朝，锻造出商朝又熔铸出周朝，革除弊端，改变社会风尚，从前代以来未曾有过啊!可陛下竟颁赐给臣下我策问说：给天下人确立起最高准则的治国大道还没有广泛地推行开，使各种策略英明得当的途径还有缺漏。这样讲难道还不是出自择取割草打柴人的议论，在考试起始时就十分真诚，不把功劳揽在自己的名下，俯身垂询而向下访问吗?实际上正是陛下谦逊美德的体现啊!卑微的臣下我哪里足以懂得这一切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至于观察、闻听、态度、言语，某种气候现象持久不变的坏征兆和各种气候现象准时出现的好征兆，集中到最高准则下和全都归从最高准则，形成明智和实现天下大治，用一种方法把它们贯穿起来，究竟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了呢?对于以上的问题，臣下我听说西汉的刘歆认为伏羲氏承接皇天而统领天下，奉受到黄河中由龙马降示的《河图》，取法它加以摹画，这就是八卦啊!大禹整治洪水，皇天又降赐洛水中由灵龟显示的《洛书》，效仿它予以陈说，这就是《洪范》啊!所以《河图》与《洛图》纵横交织地彼此配合，八卦与九条大法表里互用地两相补充，圣人行用大道，各自保持那真切的地方。如果由人这里出现了违背道理的情况，皇天的定数必定会在四季和五行次序的错乱上显现出征兆来。

政事只有和谐纯正，治理必定会与风调雨顺相应合。这从各种气候失常的坏征兆上作考察，也是非常鲜明地摆在那里了。陛下随顺阳气的流布来彰显恩德，慎重地对待严酷的霜雪来使威势得到肃正。鹰隼之类的鸟兽还没发育到能够振翅飞翔的时候，捕猎的网具就不张设开来；草木还没到凋零的时候，山林就不去砍伐。这就足以能让景星显现出来，甘露降落下来，美好的气流升腾起来，甘甜的泉水涌流出来。臣下我认为，用一种方法把它们贯穿起来，这种方法已经历时很长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礼仪是用来陶冶情志的，情志疏散，在礼仪上就会不当一回事；乐舞是用来融通感情的，感情到了极致，神灵就会应合。乐舞在美化心灵上造成人们全都感到和谐欢乐，礼仪在修饰外表上形成等级差别，有关这二者的各自施用，对它们的功效还闹不清楚。整个社会的风尚还没融合成一体，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阐明其中的要领所在。关于以上的问题，孔子早就说过：使上面安宁，治理好民众，没有什么能比礼仪更为有效的了；转变整个社会的风尚，又没有什么能比乐舞更为有效的了。西汉董仲舒在对答汉武帝的策问中也说：帝王打算有所作为，就应当从皇天那里求取入手的地方。皇天最主要的法则在于阴阳二气，阳气构成仁德，阴气构成刑罚。帝王承顺皇天的意旨来做各种事情，所以就要在仁德教化上用气力，同时减省刑罚。陛下修明古代圣帝明王喜好化生的美德，牢记《易经》中延缓死罪的训条，近来释放了许多关押在监牢中的犯人，摘下了套在人们身上的刑具，这正是称得上修明并减省那刑罚啊！臣下我听说乐舞通过美化心灵而造成人们全都感到和谐欢乐，礼仪通过修饰外表而形成等级差别。全都感到和谐欢乐，人们就会和睦亲近；形成等级差别，人们就会畏惧敬重。和睦亲近，就没有怨恨；畏惧敬重，就不争斗。两方面一起推进，就融合成一体了。倡导施礼互作推让来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仪和乐舞啊！适应时势需要的要领所在，正从里面同时存在着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四时》和《武德》这两种乐舞，是由哪个君主创制的？《五行》和《文始》这两种乐舞，又来源于哪个朝

代?《昭德》和《盛德》这两种乐舞，还辨别不出它们所尊崇的东西；《昭容》和《礼容》这两种乐舞，还不清楚它们的来历。请用尽心思做出对答，以便解开那些还留存的疑点。对以上问题，臣下我认为都是西汉君主使用的乐舞，载录在班固的《汉书·礼乐志》上。一定要让列举出全部的明确证据，来考察对答者的敏捷广博，既已烦劳得让人数不过来，又哪里很容易就能毫无遗漏地讲出来呢?虽然还敢大略地陈述一下，尚未达到那极点啊!臣下我听说《易经》上讲过这样的话：古代的圣帝明王通过创制乐舞推崇仁德，隆重地进献给天帝，用来配享祖宗。古代建立宗庙制度，负责献上祈祷词的太祝在宗庙门前迎接神灵降临，也就是那一义旨的体现啊!《四时》和《武德》这两种乐舞，由汉文帝所创制，用来显示天下已经安宁和谐了，而《武德》那套乐舞，专门在高祖庙里进献。《五行》这套乐舞，来源于周代的《武》舞；到秦始皇二十五年，改名为《五行》；到汉高祖六年，又改名为《文始》，用来表明乐舞不沿袭前朝啊!《昭德》和《盛德》这两种乐舞，是孝景帝、孝宣帝分别尊崇太宗文帝庙、世宗武帝庙的专用乐舞。《昭容》和《礼容》这两种乐舞，又是从《武德》、《文始》、《五行》演化出来的乐舞。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辛酉科

制科试题

策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问

问：朕闻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杀。轩辕三皇之圣，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聪，时犹振旅。故知体国经野，宜有吊伐；居安虑危，可无预备？朕纂承丕业，虔守大宝，因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将坠，兢兢戒惧，翼翼忧勤。而德教诞敷，烽燧尚警，三边每劳于征伐，百姓不歌于耕凿。言念于役，深轸于怀，所以日旰忘飧，中宵辍寐。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索名将以守边，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时，呈才应命，尽陈古今之事，备详攻守之策。

至时贤著述，往彦勋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种。汉臣有二十八将，自比夫几人？景略可逮于孔明，张辽得齐于关羽？斛律光、贺若弼，近代之用谁优？我李勣与李靖，先朝之光谁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碛西万里之域，将弃之以促境，宁守之以劳人？镇凉州至于流沙，军陇坂至于积石，险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岁役于防冰，若为厘革？代北年疲于御塞，奚所变通？蓟门屯田，何术以休其弊？柳城梗涩，何筹以系其虏？凡此边廷，今为重镇，何经何见，何履何历？若兵不获已，用何奇谋，贞我师旅，使有征无战？必文可来之，施何异政，柔彼夷狄，使怀惠畏威？咸述尔能，直言其事，当有升坛之拜，仁伸推毂之宠。

提问：皇帝我听说武力是用来保住大业和定立下功绩的，刑罚是用来禁断邪恶和制止住凶杀的。像黄帝等三皇那样的圣明天子，也没有谁能够停止用兵；像唐尧等五帝那样的明智君主，还要经常整顿军队。所以就能明白设置国都，丈量原野，应当有那慰抚民众和讨伐罪人的军事行动。处于安宁局面下，还要忧虑到危险，可以没有预先的防备吗？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基业，虔敬地守护那帝位，依凭祖宗创

下的安定局势，唯恐文治武功坠落下去，万分谨慎地戒饬警惕，格外小心地忧虑勤勉。然而文德教化广泛推行开，烽火台还在传来战争的警报。在东部、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上常常对征伐做出部署，百姓还没在耕田凿井的欢乐生活中歌唱。忧念那戍守征伐的人们，在内心对此深切地关注。由此而太阳偏西了，都忘记吃饭，半夜里就再也睡不着觉了。只想得到富有谋略的武臣来抉制住对方，在酒宴谈判中就击退敌军；索求到著名的将帅来守卫边疆，降伏那些异族部落。究竟采用什么办法，就可以使这样的英才来到呢?你们这些应试者身怀本领，等待时机，献出自己的才能，承奉朝廷的命令，请毫无遗漏地陈说古今的事例，完备地详述进击与守卫的计策。

至于当代贤士的著述，往昔英才的功勋，兵法计有五十三家，应当把它们划分成四个类别。东汉的开国功臣有二十八将，你把自己比拟成他们当中的哪几个人?王景略能赶得上诸葛孔明吗?张辽能和关羽相提并论吗?斛律光与贺若弼，他二人在近代的被世所用中谁更占先?我朝的李勣与李靖，他二人在先帝时期的建功立业上谁占第一?再者西南部邛郲山以南是独成一方的地带，沙漠以西是广阔的区域，打算放弃它们，也就缩小了辖境，而守护它们便要征兵服役，究竟怎样办才好呢?镇守凉州一直扩展到流沙一带，在陇山驻军一直绵延到积石一带，沿线的险阻要害，皇帝我还闹不清楚而你们这些应试者该了如指掌。秦川地区每年在防御结冰后敌军渡河上兴起兵役，该怎样加以厘正改进?代郡以北地区每年在防守边塞上疲惫不堪，应进行什么变通?在蓟门屯田，该采取什么对策根除其中的弊病?柳城一带的少数部族拒不归顺，应使用什么计策擒获他们的首领?所以这些边境据点，如今已经成为军事重镇，你本人到过哪里又看出了什么?都在哪里供过职又做过什么?如果军队没办法不出动，该采用什么奇谋，端正我方的部队，致使有征伐却不交战便获胜呢?必定要通过文德感化来使他们归服，应施布哪些非同一般的政事去安抚那些少数部族，使他们感念恩惠又畏惧兵威呢?请都述说你们本人的才能，径直讲论以上的事体，朝廷会有登上坛台封将拜帅的优厚礼遇，期待着你们能使皇帝我施布那亲自给将帅

推扶战车的恩宠。

杨若虚　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对策

杨若虚(生卒年不详)　原为州郡地方官,中宗神龙二年(706)曾进呈奏状,论说沙场丧败。玄宗开元四年(716)复上书,对处置投降归附者提出建议,后又上奏表章及《柔远论》。迄开元九年(721),特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制举,对策第一。他事俟考。

对:臣沐清化,忝纡黄绶。属陛下听鼓鼙之音,载怀将率;恤边鄙之耸,思辑军容。臣窃叹三隅未宁,为日久矣。不以庸菲,谬膺推荐,恭承大问,俯蹲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闻古先哲王,鲜不征伐。禁暴止乱,咸以为人,思患预防,实为善政。伏惟陛下,允恭克让,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于人,犹恤彼勤劳,求兹政道,实天下幸甚。臣闻事适于务则理有成,法宜于时则功可建。是以广采舆诵,询于刍言,不以人废言,不以欲违众。故计济事立,利倍功大,完军保胜,道泰人安,虽三边未清而百姓不弊。

臣闻或多难以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守宇。天其启此边难,以警陛下,勤于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乱之宜,以为子孙之业也。不然者,岂圣明之时,屡有斯寇?今若以明视远,以聪听德,钦崇天意,允厘庶绩,制以官刑,儆于有位。爱敬立于亲长,始终协于家邦。崇礼以致贤,修德以来远。言合于道,虽贱必行;议乖于政,虽贵必罚。谋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赏;刑当其理,不贻戮仆之愆。则在庭之官,足以致化。

臣闻燕昭立馆,以报强仇;越践自勤,竟雪深耻。景略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业成。岂明明之朝,不如区区之国!其珠玉无足爱之必至,贤良思用求之必来。惟陛下知与不知,用与不用。苟得其任,何忧制敌降戎而已哉?必资听之不滥,择之无失。审甄其操履,明试以言,谋之以八征,求之以五听,穰苴进于晏子,韩信用自萧何。是以君人劳于求才,逸于任使。舍人求胜,臣以为难。

臣闻自古用兵，成败相半，贤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于法焉。至于战胜攻取，无出三事，类文校义，分为四种，记之金策，具于玉韬。汉臣以之拨乱辅时，上应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终持满，窃仰邓禹之能；勍敌伸谋，颇怀冯异之略。至隐若敌国，思其奉上之故，亦采于一善，未致其全。

若景略比于孔明，功当术浅；张辽比于关羽，壮劣情优。斛律光著破虏之功，贺若弼有平陈之绩。论其功战，则可齐肩；语其才雄，此或先驾。彼亡隋之任士，内用宠戚，外阶朋党，忠言死于逆耳，国命出于谗言，政以贿易，功以财成。雁门之围，兵士以微而不赏；浪河之败，许公以亲而不诛。天下分崩，人受涂炭。是以李勣与李靖为国家用，因隋亡之臣，致有周之业。靖则克胜其任，匈奴于是破亡；勣则能达其谋，高丽以之终灭。谋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

臣闻惇德允元，柔远能迩，王者无外，守在四夷。张纲弃兵，竟和南国；充国不战，亦定西夷。若李牧以居边，魏尚而为牧，远和迩镇，固障持边。远和则不劳，迩镇则居逸，是谓释远谋近，逸而有终。然后明其伍候，守其交礼，谨其走集，诫以不虞，足以辑和士庶，羁縻夷狄。何必弃南邛之戎，舍碛西之地，隳先朝之业，致将来之诮焉。蹙国挫威，臣所不取。

臣又闻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充盈，则支体无害。古既守之不损，今御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虚，非古今有殊理，实授非其任。然东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以亭塞，隔之以山河。启玉关、金微之险，有临洮、墨鸡之阨。飞狐、白石，爰在并、汾；木狭、土门，出于幽、蓟。李靖距颉利于峡口，终绝南侵；李杰败王师于榆关，遂贻东难。险阻不异，成败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渐收塞上之士，申晁错之谋；安辑云中之人，晓严尤之术。保以邑落，守以城池，求贤良以为守，习农桑以为教。敌至则收其积聚，使野无所遗；贼去则伺其虚危，使兵不失利。则秦川岁减于冬戍，代北不惧于秋犯。

臣见蓟门屯田，防军寇之乘；攻守余暇，务耕耘之积。省两河之粟，资三军之费。但使役之无扰，何忧兵以致弊？军既未息，此安可

停! 臣闻取乱侮亡,《书》之明义,固险而守,国之恒政。若柳城之寇,不虐于边人,鸿胪之宾,未绝于来使,则养士卒以待其衰也。必若虐暴边隅,须申致寇之略;如其毒痛于下,方兴问罪之师。

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谋策,明赏必罚,教人以信。山林水泽之阵,识以权宜;父子兄弟之军,赴汤蹈火。然后扬兵耀武,示之以威,则师旅以贞,夷狄柔服,惠怀无战,其在于兹。若但行以秋霜之严,而无时雨之泽,不计而动,离怨在心,驱以合敌,贪以取败,既轻有生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窃恨焉。《易》曰: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臣以不才,展效州郡,每怀报国,屡上微言。神龙二年进状,论沙场丧败;开元四载投匦,言降户得失;銮驾西幸,又于河中府上表,并进《柔远论》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顾问。制问曰何经何历,敢不尽言! 臣识浅才微,罔知攸据。至若升坛之拜,推毂之宠,岂可一策所能及? 愚臣暗昧,不足以当之。俯伏惶恐,若履冰谷。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沐浴到清明的教化,并不合格地置身在官员的行列中。正赶上陛下听到异族入侵的消息,深切希望获取到将帅,忧念边境的防卫,考虑振扬起军队的威势。臣下我私下感叹东部、西部和北部的各个角落还没安宁下来,已经历时很长了。不因为平庸卑贱而错误地蒙受到推荐,恭敬地承奉到朝廷的重大询问,跪拜在殿阶之下,同天子的美好命令近在咫尺,来抒发自己的一片忠心和长期想法。臣下我听说古代的圣帝明王,很少有人不征伐的。禁阻凶暴,平定祸乱,全都把这看成是仁慈;考虑到祸患,预先做出防备,实际上属于美好的政务。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诚信恭谨又能谦让,忧勤地守护住四方边际,英才贤士全都得到了重用,已经被世人所信服,但仍然体恤将士们的辛勤劳苦,求取这方面的施政方法,这实在是全天下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听说政事适应那该下大力抓的方面,治理就会有成就;法度适合那时势的需要,功业就能建立起来。因而就要广泛地搜采民间的议论,向割草打柴人征询意见,不依据他是什么人而废弃了他的建议,也不凭仗自己的想法而和众人不一致。所以

计策就得到实施,政事便定立起来,益处超过一倍,功业非常宏大,军队不受损失,确保获得胜利,治国大道畅通,民众安居乐业,尽管东部、西部和北部边境还没完全肃清,但百姓却不感到凋敝。

臣下我听说,有的帝王正因祸难很多却由此拓展了他的疆土,有的君主没遇上祸难却由此丧失了他所守护的区域。皇天在发动目前边境上的祸难,用来警告陛下,在政事处理上要更加勤奋,实现安和太平,随即确定下兵荒马乱的恰切对策,来为子孙的千秋大业铺平道路啊!否则的话,哪里会在圣明的年代却多次出现这类异族入侵的现象呢?现今如果凭借圣明去观察远方动静,依靠灵敏听取恩德如何,顺从并重视皇天的意旨,整顿好各种政事,用官员处罚的规定去约束督察,对身在官位的人提出警告。慈爱与恭敬在亲属与长辈那里确立起来,由始至终保持家庭和邦国的和谐状态。崇尚礼节来吸引贤才,修明仁德来使远方归服。言论符合大道,即使出自低贱的人也必定采纳施行;议论违背政纲,即使出自尊贵的人也必定进行责罚。谋略切中了那关键所在,必定申明封侯世袭的赏赐;刑罚正适应就该那样执行的情形,不要留下错杀跪拜力谏的臣僚的过失。朝廷的所有官员也就足以实现教化了。

臣下我听说,战国时的燕昭王设立招贤馆,用来对强大的仇敌进行报复;春秋时的越王勾践自行奋勉,终于洗刷了深深的耻辱。王景略得到重用,前秦的统治就称霸北方;诸葛孔明得到起用,蜀汉的帝业就建立起来了。难道盛明的大唐皇朝,还不如它们那占据一方的小小的国家吗?对珍珠宝玉不值得爱惜,必定会有千里马到来。对贤臣良将思考重用,求取他们就必定会前来。只在于陛下了解不了解他们,重用不重用他们罢了。如果获取到了胜任的人选,还忧虑什么制服敌人、降伏异族就算罢休了呢?必定要依仗观听但不迷惑和择取不产生失误啊!审慎地鉴别出他们的操行,通过言论明晰地予以验核,拿八个方面考察将才的当场反应来做测试,用五种听断敌情的方法来做搜求,像春秋时司马穰苴那样被晏子推荐得到进用,像西汉韩信那样从萧何那里得到汉王重用。所以身为君主的人,在求取贤才上很辛劳,但在委任使用以后就轻闲了。舍掉人才而去谋求获胜,臣

下我认为是很困难的。

臣下我听说，自古用兵都是取胜与战败各占一半，贤明的人获得到重大的方面，愚昧的人获得到微小的方面，但又没有谁不是都在运用那兵法啊！至于战胜攻取，没有超出天、地、人这三方面的事情的；类聚兵书校核要义，划分成四大类别。这都记述在兵经上，备载在秘典中。东汉的大臣凭仗它们拨除祸乱，辅正时世，往上与二十八宿相应合，振扬威势又显耀武力，全都发挥出了各自的才能。凭借臣下我这样愚昧，能拿什么同他们相比拟？然而在保持晚节和功高却不骄傲上，私下真仰慕邓禹的难能可贵。在面对强敌申明计策上，又十分向往冯异的韬略。至于在形势隐隐显现出臣下与君主势均力敌的时候，就考虑他们奉从君主的一惯做法，也采择其中最好的一种行动，但还没达到全都包括进来的程度。

像前秦的王景略把自己比拟成当年的诸葛孔明，功勋还差不多能对等，但谋略就显得浅近了。曹魏的张辽同蜀汉的关羽相对比，在气势上比不过去，可在情意上却超过他。北齐的斛律光显扬出击破蠕蠕部族的大功，隋朝的贺若弼建有平定陈朝的战绩。讲论这俩人的功勋与征战，可以说不相上下；但要评定他们的才略与雄威，贺若弼就排在前面了。灭亡的隋朝任用官员，在宫内信用受宠的外戚，在朝廷上构成了拉帮结伙的祸根，进献忠言的人死在君主听来太刺耳的下面，国家的重大命令由进献谗言的人来左右。政事凭借贿赂来互相交换，功劳依仗钱财来建成。炀帝在雁门关被突厥数十万骑兵所围困，兵士已经人数很少，可解围后却不进行封赏。在浿河攻打高丽而大败，可许国公宇文述却因为是亲信竟不予以斩杀。天下于是分崩离析，世人遭受到惨祸。因而李勣和李靖被我们国家所任用，凭借是灭亡了的隋朝的臣民，建立起了辅助周朝消灭商朝那样的功业。李靖确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匈奴由此而破败灭亡。李勣确能实施自己的谋略，高丽因此到最后便被消灭。从出谋划策这方面的功绩来对比两人的事迹，李勣可以同李靖相提并论；但按实际战功来择取人物，李靖要在李勣的上面。

臣下我听说，加厚仁德又诚信良善，安抚远方又优待近处，帝王

并没有不归自己统辖的民众，守护的力量寄寓在四方少数部族那里。汉高祖张布天子的纲纪而放弃使用武力，到最后使南越国称臣归顺。西汉的赵充国并不交战，也平定了西部的少数部族。像战国时赵国的李牧那样来镇守边区，像西汉的魏尚那样来担任一郡的长官，对远方采取亲和的策略，在近处加强镇守，巩固边塞，控制住边区的局势。对远方采取亲和的策略，就会不兴师动众；在近处加强镇守，就会安逸地坐定，这正叫做丢开远方来筹划近处，安逸而又能保持到底。然后确定军事据点的驻守，遵守双方交往的礼节，谨慎地对待少数部族流动与聚集的情况，告诫驻军要警惕突发的事变，也就足以安抚团结起当地居民，控制并笼络住少数部族。何必放弃西南部邛郲山以南的戍卫，舍弃沙漠以西的区域，毁败先帝时期的基业，招致将来的讥诮呢！使国土缩小又使威势受挫，这是臣下我并不赞成的。

臣下我又听说，中原地区是国家的心脏与腹部，边境一带是国家的四肢与身躯。如果心脏和腹部内气十足，四肢与身躯就受不到损害。古代守护它既已不残损，现今驱使它又该失去什么呢？古代把它搞得内气很充足，现今却把它弄得内气挺虚弱，这并不是古今存在着不同的调治方法，实际上是因为授官不属于胜任的人选。然而东部从榆林算起，往西一直到蒲海，拿军事据点来扼制，用高山大河去阻隔。开辟玉门关和金微山那样的天险，拥有临洮城和墨鸡山那样的要塞。飞狐岭、白径岭这些险阻，都在并州汾水境内；木门城、土门口这些要隘，出自幽州蓟州。当年李靖在恶阳岭抵御突厥可汗颉利，终于使突厥向南进犯不再发生；而李杰在榆关使朝廷讨伐的部队遭到惨败，于是留下了东部的祸根。天然险阻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成败竟截然相反，由此说来，除去贤才是绝对不行的。如今要想逐渐聚合起塞上的部众，就应进一步施用好西汉晁错当年提出的募民充实塞下的谋略；要想安抚团结起云中一带的百姓，就应通晓西汉严尤关于对匈奴用兵的上中下三策。依凭居民点来做保卫，仰仗城池来做守护，求取贤良的人，任命他们当郡守，使人熟悉耕田植桑，拿这来进行教化。敌人扑来时，就收藏起积聚的物资，使原野上什么东西都不剩。贼寇撤退时，就乘他们不防备或陷入险境进行袭击，使军队的动用不

失去有利的方面。这样一来,秦川每年就减少了冬季的戍卫,代郡以北地区也不害怕敌人在秋季的进犯了。

臣下我观察蓟门一带的屯田,可以防备敌军入侵的突然袭击;在进击和守卫的空闲时间里,致力于农耕的粮草储备。既节省下河北与河南地区的军粮供应,又保证了三军的物资需要。只管做到役使他们而没有额外的干扰,还忧虑什么军队陷入衰弱呢?用兵既然还没止息,这种举措怎么可以做罢呢?臣下我听说攻取政治败乱的国家,凌辱眼看灭亡的政权,这是《尚书》中讲得非常明确的义旨;加固险关要隘来守卫,这是国家长期不变的政事。像柳城一带的异族部落,只要没对边境居民大肆劫掠,而负责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的朝廷机构还在接待,往来的使者还没断绝,就该养护训练士兵,等待对方的自行衰败。他们如果必定要在边区一角逞凶狂,就应该向他们施展那责问入侵的对策;如果他们对边区居民烧杀抢掠,这才出动惩治罪行的军队。

对机智贤能的人加以任用,把谋略计策施展开来,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拿信义去教导人们。在山林水泽布列的战阵,懂得灵活摆好;由父子兄弟组成的部队,勇于赴汤蹈火。然后调动军队,显耀武力,把威势亮给对方看。这样一来,军队就端正,少数部族被感化归服,通过恩惠感召而不交战就获胜,正在这上面啊!如果光是行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恩德的施布,不做全面的考虑就采取行动,叛离和怨恨涌生在人们的心头,驱使人们去和敌军厮杀,因贪功而自取失败,这样既已不把人们的性命当回事,人们就会在肉搏血战中谋求幸免,致使朝廷的威势受损伤,对此臣下我私下是很痛恨的。《易经》上说:出一点点儿偏差,结果就大错特错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啊!

臣下我凭借一个不成器的人,在州郡效力供职,常常想到报效国家,多次进呈微不足道的言论。在中宗神龙二年曾献上奏状,论述沙场丧败问题。开元四载又往意见箱中投书,言说对投降归附者的处理办法。皇上的车驾到西部视察,又在河中府上奏表章,同时进献了一篇《柔远论》。但因才能低下,道理拙劣,没受到理睬和询问。皇上的策问中问到你本人到过哪里又做过什么,怎么敢不详尽禀报呢?

臣下我识见短浅,才能低下,不知道自己的对答是根据什么做出的。至于登上坛台封将拜帅的优厚礼遇,亲自给将帅推扶战车的恩宠,哪能仅凭一道对策就会获取到的呢?愚蠢的臣下我很昏昧,没资格确能够得上。跪拜在皇上面前既不安又害怕,简直就像在薄冰深谷中走过去一样。恭谨地对答如上。

张仲宣　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对策

张仲宣(生卒年不详)　曾任低级武官,迄玄宗开元九年(721)应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制举,对策第二。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对:臣闻玉弩垂芒,耀明威于紫纬;金方戒序,凝杀气于丹霄。然则负扆登枢,规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辨,法四选以详刑。是故黄运披图,静妖氛于涿鹿;丹陵启业,耀佳兵于洞庭。

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顺下人之乐推,总不测之谓神,包混成而为道。然后运天地日月以临之,泄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义以绥之,张礼乐刑政以肃之。然则宿离无忒,天清也;海外无波,地平也;左学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东西沈潜,朔南浹洽,草木咸若,昆虫无夭。犹且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俯徇谦光,循《易》象之明义;降询得失,追汉策之高踪。所以广访刍荛,旁求道路。

臣戎旃贱伍,樗散陋容,策蹇以忘疲,励弱而知倦,猥兹庸菲,充赋阙庭,奉诏惭惶,启处无地。所冀齐庭设炬,九九之术先收;燕馆初开,先尊郭隗而已。敢缘斯议,庶竭丹诚。

制策曰: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索名将以持边,降伏于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臣闻晋谋元帅,汉召材官,必资悦礼之英,咸选良家之子。诚请秋风授律,吉日拜将,收不疑之十计,问子明之五策,赏必以功,罚必以信,则良将斯至矣,大功可举矣。

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种。臣闻习手足,便器械,积虞关,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权德刑,随斗系,因五胜,解鬼神,阴阳之兵也。雷动风举,后发先至,离合向背而应变无常,形会之兵也。守正

而用奇，详形而计战，兼伎巧，包阴阳，权宜之兵也。然后愤之以仁义，信之以赏罚，以我直而权其曲，以我智而薄其愚，以我和而制其离，以我治而乘其乱。故虽孙吴再生，亦不知为敌人计矣。

制策曰：汉臣有二十八将，自比夫几人？臣闻汉有二十八将者，上应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国，邓禹有决胜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吴汉有绥边之略；功论树下，冯异之绩弥彰；冰结河中，王霸之诚尤著。臣以卑贱，夙无器业，窃循运合，圣恩不次，得参贤俊之末，安敢自强而比哉？清问猥及，臣当万死。

制策曰：景略可逮于孔明，张辽得齐于关羽？斛律光、贺若弼，近代之用谁优？臣闻景略之功也，孔明之绩也，张辽之谋也，关羽之烈也，斛律光之勇也，贺若弼之略也，广论之则耀灵不驻，略谈之又书不尽言。景略之佐秦坚，才骋如熊之捷；孔明之匡蜀主，克著卧龙之名。张辽运筹之方，可以归之于先轨；关羽搴旗之效，可以论之于后尘。贺若弼之破陈军，功先诸将；斛律光之扶齐国，名劣众人。以次而言，断可知矣。

制策曰：我李勣与李靖之功谁最者。臣闻李勣者，智也，仁也，勇也，严也，躬教可以图始，心教可以保众。自伐三韩，克清九族，所以东夷之人不敢西向也。至于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语哉！大征北狄，讵见绝其余氛；授钺南蛮，宁见殄其遗寇？所以蛮胡猾夏、边鄙亟耸者，良由此也。

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碛西万里之域，将弃之以促境，宁守之以劳人？镇凉州至于流沙，军陇坂至于积石，险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岁役于防冰，若为厘革？代北年疲于御塞，奚所变通？蓟门屯田，何术以休其弊？柳城梗涩，何策以系其虏？凡此边庭，今为重镇，何经何见，何履何历？臣闻晚邦憬裔，既崇于吊伐；昧谷遐方，实资于镇抚。薇亦柔止，犹闻遣戍之诗；瓜时在期，尚起戍要之役。今欲明守边之术，开斥地之制，缅维经算，俯访刍荛，谬闻鄙术，何足以观之？

夫先王驭道也，必专其边守，强以戎索，恃吾有以备，怀其所以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今丸山在境，犹发度辽之师；葱河卷浸，仍开拜井之屯。劳人远役，其何以哉？若乃务广其土，以疲其人，宿兵于

无用之地,劳师于不御之俗,圣王之道,未足前闻。

制策曰:若兵不获已,用何良谋,贞我师旅,使有征无战?必文可来之,施何异政,柔彼夷狄,使怀惠畏威?臣闻季梁在随,楚朝罢议;仲尼居卫,晋国折谋。语曰:死诸葛走生仲达。陛下诚然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于无外,大启爵命,以示四方,拔将选才,各尽其用。急善同于饥渴,用人疾于应响。杜邪佞之门,废郑卫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有不羁之寇,北有不宾之虏,征之则劳师,待之则无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藩,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怀惠畏威也。但以日暮途远,汲深绠短,文不逮意,书何尽言!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枉矢星向西流动而闪射出光芒,在那紫微垣为中心的星空中显现出鲜明的兵威;金行所在的西方使时序转入戒备的形态,在那九重云霄上凝聚起杀气。既然如此,那么帝王背靠屏风,登上宝座,确定下可以归入七种类属的人来设置百官;临朝听政,驾驭四方各地,按照对四种人的选拔来审慎地施用刑罚。因而黄帝承受到神图,就在涿鹿驱散了蚩尤作乱的恶气;唐尧开启帝业,就在洞庭湖显耀了平定三苗的武力。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奉从天帝的明确的命令,顺从地上人们的衷心拥戴,把各种深奥莫测的做法汇总起来,构成所说的神妙,把浑然一体,自然生成包纳起来,构成那治国大道。然后运作起天地日月来照临,倾泄出雷雨水火来化育,宣明道德仁义来安抚,张布开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来整顿。既然如此,那么星宿和太阳不存在反常的现象,证明皇天真清明啊!四海以外没有风浪,证明大地真安宁啊!国立最高学府十分兴盛,证明文德教化大放光辉啊!保住大业又定立下功业,证明武力真威猛啊!由此而东部西部一片平静,南部北部一片融洽,草木全都顺利生长,昆虫没有受损害的。但仍旧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局面挺美好了,可还不认为美好。俯身屈就谦逊的美德,遵循《易经》卦象的鲜明义旨;往下询问朝政的得失,追比汉代策问的突出踪迹。用来广泛地向割草打柴人做访问,普遍地向过路的人做询

求。

臣下我是军队中的一名低级官员，被世上闲置的粗陋蠢人，赶动瘸腿的毛驴已经忘记了精疲力尽，驱动弱小的动物便感到了疲倦。混杂在这样平庸渺小的人群中，却到殿廷上充数写文章，承奉到诏令，既惭愧又惊惧，无论启奏或站立都无地自容。只是希望像春秋时齐桓公在殿庭上设置明烛，对仅仅懂得简单的算术乘法的人先予收用；像战国时燕昭王的招贤馆刚刚敞开，对郭隗那样并不出众的人首先加以尊重罢了。敢于顺着这次策问的内容，想能全部献上那一片赤诚。

皇帝的策问中说：只想得到富有谋略的武臣来挟制住对方，在酒宴谈判中就击退敌军；索求到著名的将帅来守卫边疆，降伏那些异族部落。究竟采用什么办法，就可以使这样的英才来到呢？臣下我听说，春秋时的晋国谋求元帅，西汉召用具有才力的武官，一定要依赖那喜好礼法的英杰，全都选用家世清白的子弟。真心恳请在秋季颁布军队纪律，在吉祥的日子封拜将帅，采纳西汉直不疑的那类十项筹划，征询三国东吴吕蒙的那类五种计策，封赏必定按照功劳进行，惩罚必定依据规定执行，这样做，优秀的将领也就来到了，大功也就能够建成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兵法计有五十三家，大致上可以把它们划分成四个类别。臣下我听说，熟悉格斗的技艺，擅长使用兵器，练成连发弩箭的本领，在进攻和防守上都能适应，这属于武艺要高强的用兵方式啊！衡量阳气和阴气的流转，随顺北斗星指向的方位，依从五行相克的定律，了解鬼神的意向，这属于利用阴阳的用兵方式啊！行动十分迅速，晚出动却先到达，分散汇合与直冲倒转，都随战机变化做出调整而不固定，这属于掌握战局形势的用兵方式啊！持守常规战法，又采用奇特战法，摸透形势来考虑作战，把武艺要高强也包纳进来，把利用阴阳也统括在内，这属于综合做出恰切部署的用兵方式啊！然后用仁德正义来鼓舞斗志，用赏赐和惩罚使人信服，根据我方正义在手而去估量对方理亏，凭借我方机智而去直逼对方的愚昧之处，依仗我方团结而去挟制对方的各怀二心，利用我方井井有条而去

痛击对方的混乱。所以即使孙武和吴起再生复活，也不知道怎样为对方做谋划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东汉的开国功臣有二十八将，你把自己比拟成他们当中的哪几个人？臣下我听说东汉有二十八将，他们往上正与二十八宿相对应啊！有的凭仗文雅给国家增添光采，邓禹怀有预决胜利的奇谋；有的凭仗勇武威慑住众人，吴汉怀有定安边区的才略。众将在论定功劳可他本人却躲到大树底下去，冯异的勋绩越发显得突出；冰在滹沱河中冻到一起，王霸的诚恳越发显著。臣下我凭借卑微低贱，一向没有才干业绩，私下循从时运的际合，圣上的恩惠予以破格优待，得以置身在贤才英杰的末尾，哪敢自不量力而同古人作比拟呢？清晰详明的策问屈辱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臣下我真该万死。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王景略能赶得上诸葛孔明吗？张辽能和关羽相提并论吗？斛律光与贺若弼，他二人在近代的被世所用中谁更占先？臣下我听说王景略的功勋，诸葛孔明的业绩，张辽的谋划，关羽的忠烈，斛律光的勇猛，贺若弼的方略，广泛做评论，时间就不够用，简略谈一谈，下笔又不能完全表述出来。王景略辅佐前秦的苻坚，才干施展起来就像熊罴那样迅猛；诸葛孔明匡扶蜀汉的君主，能够显扬卧龙的美名。张辽在运筹方面的策略，可以归入前列；关羽在拔下敌人旗帜方面的成效，可以排在后面。贺若弼击破陈朝的军队，功劳比众将都要高；斛律光扶助齐国，名望却比不上众人。按照这种次序来评说，绝对就可以明白他们怎么样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我朝李勣与李靖的功劳谁占第一？臣下我听说李勣既明智又仁慈，既勇猛又威严，亲身施教就可以谋划好开端，内心施教就可以保住众人。自从率军讨伐朝鲜，能够肃清各个部族，所以东方邦国的人就不敢再向西部进犯了。至于李靖，怎能同李勣相提并论呢？大规模征讨北部的突厥，难道使人看到灭绝了所留下的兴兵妖氛了吗？统兵对南方部族进击，哪里又使人看到剿灭了剩下的贼寇了呢？南方部族和北方部族侵扰华夏，边境多次加强防卫，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西南部邛郸山以南是独成一方的地带，沙漠

以西是广阔的区域，打算放弃它们，也就缩小了辖境，而守护它们便要征兵服役，究竟怎么办才好呢？镇守凉州一直扩展到流沙一带，在陇山驻军一直绵延到积石一带，沿线的险阻要害，皇帝我闹不清楚而你们这些应试者该了如指掌。秦川地区每年在防御结冰后敌军渡河上兴起兵役，该怎样加以厘正改进？代郡以北地区每年在防守边塞上疲惫不堪，应进行什么变通？在蓟门屯田，该采取什么对策根除其中的弊病？柳城一带的少数部族拒不归顺，应使用什么计策擒获他们的首领？所有这些边境据点，如今已经成为军事重镇，你本人到过哪里又看出了什么？都在哪里供过职又做过什么？臣下我听说对生活在睕邦县那类远地的异族，既要显扬拯救受苦百姓和讨伐罪人的军事行动；而对处在太阳归落处的遥远方国，实际上应依靠镇慑安抚。野豌豆已经生出嫩苗了，但仍能听到派去戍守的诗歌；田瓜眼看要成熟了，还要兴起换防的兵役。如今皇上打算究明守护边境的计策，设置拓展辖区的制度，只想那长远的谋划，俯身询访割草打柴人，可臣下我的孤陋的闻见和粗浅的对策，哪里值得看上一眼呢？

古代的圣帝明王运作大道，必定要加强边境的守卫，用武力来做威慑，依仗我方确有办法防备，感化对方前来归顺，拿礼节招抚离去的人，靠恩德怀柔远方。如今丸山已经归入辖境以内，还要出动渡过辽水攻打高丽的部队；葱河掀起了兵争的妖氛，仍要开辟祷拜枯井的屯田。烦苦民众到远方去服役，这可是出自什么理由呢？至于务必要扩展领土，来使民众疲惫不堪，在毫无用处的地方屯驻兵力，对统治不了的异域硬派军队去打仗，圣明帝王的做法还从古代没听说有这样干的。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如果军队没办法不出动，该采用什么高明的计策，端正我方的部队，致使有征讨却不交战便获胜呢？必定要通过文德感化来使他们归服，应施布哪些非同一般的政事去安抚那些少数部族，使他们感念恩惠又畏惧兵威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春秋时的季梁身在随国，楚国就在朝廷上废弃了讨伐随国的动议。孔子身在卫国，晋国就不敢实施那攻打卫国的图谋。俗话说：死去的诸葛亮吓跑了活着的司马懿。陛下确实从营帐发布仁德的话语，把

清明的和风散布到任何一个地区，大范围宣布封授爵位，亮给天下四方看。识拔将帅，选用贤才，各自发挥出他们的全部才能。把良善放在首位就和又渴又饿一个样，任用官员比回音应合本声还迅速。杜绝住邪恶献媚的门路，废除掉淫靡的乐舞。统一并肃清整个天下，实际上正出自这上面。尽管西部存在着拒不服从管辖的贼寇，北部还有拒不归顺的少数部族，但征讨它们就使军队白白劳苦，对付它们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东汉的班固强调说：占领了对方的田地却做不到耕种而食用，擒获了对方的部众却做不到让他们称臣而替国家当卫护力量，干脆就在他们入侵时予以打击和抵御，在他们撤走后加以防备和守卫。这大致上就是叫他们感念恩惠又畏惧兵威啊！只因为太阳快要落山而路途还很遥远，井水太深而打水的绳索又太短，文辞表达不全那意旨所在，写下来又哪能说得特透彻呢！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丙寅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科问

(原策题已佚。据袁映对策所征引，其大略乃云：)延想无为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将与图之。所以谋广聪明，询于仄陋，使君子道长，俊乂用彰。夫原疾而授药者，良医也；因时而救弊者，权政也。今塞垣犹守，府兵云耗，闲人轻去，冗食难归。膏粱无耻于侥幸，蓬荜未敦于退让。选举殷凑，官员不给。效职者或禄仕而养资，试言者多浮华而背实。岂风之不臧，何草之难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闻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给；诸侯贡士，赏罚存焉。改辙欲从，迷津尚仁。文质再复，忠敬何适于时?齐鲁一变，亲贤何近于道也?择何典而淳俗，采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寿?

遥想那清静无为的治理，修明那高度和谐的化导，并不是宣称就能实现这种局面，但准备与你们这些应试者来筹划它。用来谋求扩大那观察与闻听的范围，向埋没在下面的贤才做征询，致使君子的道法占据主导的地位，杰出的人才得到显扬。查明病因再付给药物，这属于高明的医师啊!根据时势来补救弊端，这属于灵活处置的国政啊!如今边塞防线仍在守护，可由折冲府为单位组成的军队却已枯竭；游手好闲的人轻易就离开土地，到处白吃饭的人很难回到农业生产上。贵族子弟对侥幸捞到官位毫不感到羞耻，民间百姓在退避谦让上还不笃实。选拔举用接连不断，可官员却实际上不够用。身在职位上的人有的只把拿俸禄当成做官的目的，光在那里混资历。接受言辞测试的人又大多浮泛华艳而背离实际。这难道是社会风气不美好吗?为什么草木竟很难随风倒伏呢?澄清源头，端正根本，具体的途径该从哪里切入呢?听说在古代，井田制下定有民力

助耕公田的赋税制度，公家和私人的取用都很充足。诸侯向王室荐举贤才，赏赐和惩罚都有严格的规定。改变当前的做法想按古代那样走，但闹不清楚的地方还在等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来辨明。文采和质朴轮番取代，崇尚忠厚与崇尚虔敬怎样才能和时势相适应呢？政治教化由齐国的状态变到鲁国那个样，亲近宗族和看重贤人怎样做就接近那准则了呢？究竟该择用什么经典来使社会风尚变淳厚呢？采用什么法度来安定住民众呢？建起怎样的功绩，天地就安宁了呢？修成怎样的德业，黎民百姓就富足又长寿了呢？

袁映　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

袁映(生卒年不详)　其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应岳牧举人试，对贤良方正科策问，名列第一。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对：臣闻天矜于人，人所必从。臣谬黩吹万，僻生草莽，幸陶无为之风，得守忠蹇之节。常愿拜手宸极，敷献乃诚，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盖伤衰周之运，不见圣明之代也。臣今舆诵刍言，肃祇眷命，陪圣跸于神岳，奉金策于玉宸，赓歌清泰，咫尺旒扆。是天纵聪明而超于孔丘，不图幸之至于斯也！况周颁禹膳，列坐尧衢，此优贤之至也。愚臣何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尽闻见？

臣伏惟皇穹有成命，圣唐受之，崇高配天，广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明于其中。有以觐高祖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鸿烈。乐成于郊祀，而昭升上帝；礼备于雍上，而敷问后祇。于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协而万国谐，皇灵丕应，象物昭格，无疆惟休，能事毕矣。况阴阳燮理，则贤相尽规；风俗敦庞，则良牧宣政。百揆时叙，庶物咸亨。诚已郁映华胥，迈续尧舜，岂夷吾所记七十二之凉德可望清光哉！而犹恭默思道，励精图政，帝阙峥嵘而下临，天问昭回而尽睹。乃赐臣策曰：延想无为之理，聿修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将与图之。所以谋广聪明，询于仄

陋，使君子道长，俊乂用彰。陛下执谦之至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无得而称焉。

制策曰：夫原疾而授药者，良医也；因时而救弊者，权政也。今塞垣犹守，府兵云耗，闲人轻去，冗食难归者。臣闻先王之理，布在方策，乘时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窥览万化之原，独运安危之兆，执大象，鼓洪炉，知微其神，惟睿作圣。九门尝药，致苍生于福寿；七政齐衡，得玄珠于利见。虽讲信修睦，寰区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虽道德齐礼，黔庶康济，而宽以厚载，故闲人或浮。

臣又闻之：兵戈者，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边鄙预备，谁能去军？参决远方，时闻失业。总寰瀛而观偃伯，则三边之戍役不足多也；据天下而览兆人，则万一之逋逃不足怪也。况国家皇极作乂，七政有伦，增新军以保厘，革浮情而绥辑，何忧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归？虽休勿休，惟陛下之深虑也。

制策曰：膏粱无耻于侥幸，蓬荜未敦于退让。选举殷凑，官员不给。效职者或禄仕而养资，试言者多浮华而背实。当今士食旧德，农服先畴；结绶登朝，咸遵揖让；被褐在野，尽归廉洁。臣实睹还淳反素之风，不知无耻未敦之事。尊谦俯问，臣何敢奉！钦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于其德，人文化成。敦《诗》、《书》，悦礼乐，济济多士，开元以宁。日者十铨分镜，群材焯叙，观行考言，责名征实。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弊，其命维新，则推让之风行，尸素之源灭。其肯养资禄仕，以速官谤者？使会府持衡，守而勿失，将恐咏彼空谷，叹此才难。岂有员不给官，殷烦乎选士；言而背实，浮华于举才！臣虽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

制策曰：岂风之不靡，何草之难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闻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给；诸侯贡士，赏罚存焉。改辙欲从，迷津尚伫者。臣闻人无恒德，实从上教，草顺风而靡偃，水随器而方圆。陛下神谋玄行，德如天覆，驱今之代，归于寿域。深源固本，政事惟醇，俗既分于土宜，人亦同于上好。又何取乎井田古

制，力助前规，赏罚于岁贡之士，增削于诸侯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非故相反，盖取随时。泥以从钧，车难改辙。臣诚庸妄，不识大体，窃愿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当今之代也。

策曰：文质再复，忠敬何适于时？齐鲁一变，亲贤何近于道也？大哉圣问！臣敢飚之。臣闻之：质再而复文，正朔三而改。殷因于夏，周因于殷。人德齐庄，夏尚忠厚，殷人质也，周人文也，文质虽变，忠敬咸宜。不敬则礼节遂乖，不忠则弼谐斯替。匡朝阐化，适时惟一。然则敬自外饰，忠由内淳，必也奚先，请同去食。若乃亲亲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余化乎？举贤而尚忠者，其有太公之遗风乎？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鲁由旧章，斯焉殆庶。

制策曰：择何典而淳俗，采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寿者。臣闻诸玄元皇帝曰：我无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愿陛下，克修圣祖，恢维化纲，崇帝象之风，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修，则地平天成矣。轻徭薄赋，慎罚措刑，则既富且寿矣。岂臣庸鄙，克堪预焉？

伏以垂政立范，因时变通，布陈前载，简在帝聪。今乃下问愚鄙，征其辨述，岂不欲观其末学，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云之流也。幸属千龄大庆，五载修封，遂得献颂皇衢，参陪銮扆。惭考言之无取，念天奖而何阶。忠比魏臣，空思捧日；梦非秦后，谬至钧天。蹋影天庭，若临冰谷。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皇天对世人很怜悯，这是世人必定要归从的。臣下我荒谬地亵渎了遍施天下的天赐恩德，偏僻地生活在民间，万幸受到了清静无为的皇风的薰陶，得以恪守忠诚正直的节操。总想跪拜在皇宫前面，全部献出那份忠诚，直言规谏不是我本人做得到的，只是稍微报答一下朝廷的养育大恩。从前孔老夫子感叹凤凰鸟不再飞来了，黄河中不再降示神图了。这是悯伤衰败周朝的国运，自己看不到那圣明的时代啊！臣下我如今作为民间献呈言

论的人，严肃恭敬地承奉到爱惜人才的命令，在神圣的东岳陪伴圣上停留的銮驾，在天子的住地奉受到重要的策问，君臣相继歌咏清明太平的景象，就置身在陛下的面前。这正是皇天赋予给陛下耳聪目明的天资并且超过了孔子，想不到臣下我竟然幸运到这般境地了啊！况且还向每个应试者颁赐当年大禹享用的那种饭食，又在如同当年尧舜听取意见的衢室中设布席位，这正是优待贤才的最高礼节啊！愚昧的臣下我哪里足以对答好圣明的策问？敢不说出全部的心里话，把自己听说过和看到过的东西都献出来吗？

臣下我跪拜想来，皇天具有既定的由谁统领天下的命令，我们圣明的大唐正承受了它。崇高与那皇天相配，广大与那大地相配，皇天与大地交合起各自的德性而陛下在它们的正中间大放光明。确有理由显扬高祖皇帝的盛明光辉，确有理由扩展太宗皇帝的伟大功业。乐舞在京师南郊祭天的大礼上创制成，盛大地奏报给天帝；礼仪在汾水南岸的山丘上完全齐备，敬献给后土地神。在这时又特在泰山举行积柴加牲再燔烧的典礼，从大小山川排列顺序的第一座起，依次进行望祭。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明亮，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也正常运转，八方边际都协调，天下各地全和谐，皇天之灵广泛地做出应合，各种事象与万物都显著地顺应，国运永无尽头，只有一片美好，人间能做到的事情全都做到了。况且阴阳要得到和协的调理，贤能的宰相就全力规谏；民间风气要敦厚朴实，优秀的地方长官就宣明政事。文武百官只管履行好各自的职责，一切生物全都顺畅。确实早已强烈地和远古华胥氏相映照，接续并超过唐尧虞舜了，哪里是春秋时管仲所记住的七十二名德业尚浅的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的帝王能够仰望皇上您的尊容的呢？可您仍旧恭敬又不露任何声色地思求那大道，励精图治，皇宫峥嵘而俯视下方，圣上的询问像日月而人们全都看得见。于是颁赐给臣下我等策问说：遥想那清静无为的治理，修明那高度和谐的化导，并不是宣称就能实现这种局面，但准备与你们这些应试者筹划它。用来谋求扩大那观察与闻听的范围，向埋没在下面的贤才做征询，致使君子的道法占据主导的地位，杰出的人才得到显扬。这是陛下极为执守那谦逊的美

德，天下真是幸运到了极点，天下真是幸运到了极点，愚昧的臣下我简直找不出恰切的语言来称述呀!

皇帝的策问中说：查明病因再付给药物，这属于高明的医师啊!根据时势来补救弊端，这属于灵活处置的国政啊!如今边塞防线仍在守护，可由折冲府为单位组成的军队却已枯竭；游手好闲的人轻易就离开土地，到处白吃饭的人很难回到农业生产上。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理措施，全面写在典册上。驾驭时势，掌握住吉凶的关键，这种大道很深奥吧!陛下窥探观览一切化育的本原，独自运筹安全与危险的征兆，执守那大道，把熔铸一切的巨炉烧得旺旺的，察知隐微十分神明，思考问题特别睿智而成为圣人。像神农氏在天庭九门品尝药物那样，把众百姓带入幸福长寿的境地；像虞舜观察北斗星而协调好四季与天地人等七项政务那样，从显现吉利的地方获取到优秀的人才。尽管讲求信义，倡导和睦，整个天下完全归于一致，但安平又不忘记危险，所以边塞防线仍在守护。尽管道德倡行，礼制又使人划一，黎民百姓安康，过上了好日子，但用大地承载一切的恩德去宽待他们，所以游手好闲的人有的就四处逛荡了。

臣下我还听说，武力是威慑不顺从的人并且昭示文德感化的，众百姓会忘记帝王的功德可却畏惧苛酷的朝政。边境上的预先防备，有谁能撤掉军队呢?参酌判定远方，经常会听到失去本业的情况。总揽四海寰宇来观察停止称霸的举动，东部、西部和北部边区的戍卫就不值得自豪；掌握全天下来观看亿万民众，一万人中有一个人欠债逃亡就不值得奇怪。况且国家确立起最高行为准则而实现大治，七项政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增加新的部队来保住吉福，革除游荡懒惰的现象来安抚聚集，还忧虑什么由折冲府为单位组成的军队兵源枯竭呢?到处白吃饭而不返回到农业生产上的人还存在呢?尽管局面已经挺美好，但仍不认为美好，只请陛下在这一点上深加考虑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贵族子弟对侥幸捞到官位毫不感到羞耻，民间百姓在退避谦让上还不笃实。选拔举用接连不断，可官员却实

际上不够用。身在职位上的人有的只把拿俸禄当成做官的目的，光在那里混资历。接受言辞测试的人又大多浮泛华艳而背离实际。其实当今士大夫守住过去获得的东西，农民继承祖辈留下的田地；挂上官印的人登上朝廷，全都遵从行礼互作谦让的法度；身穿粗布衣的人生活在民间，全都归从廉洁的要求。臣下我实际上看到了返归淳厚质朴的风气，不知道还有毫无羞耻以及尚未笃实的事情。圣上谦逊而俯身询问，臣下我哪敢就承奉呢?人人都恭敬顺从的大唐拥有天下，在仁德上长期施布，礼仪的光彩已经形成了教化。重视《诗经》和《尚书》等经典，喜好礼仪乐舞。众多的读书人，在开元年代得以安宁。前不久通过十种官员主持选授考核，分辨得非常清晰，各种人才都得到了界限分明的安排，观看品行，考察言论，按照名位验核实绩。斥退了虚浮浅薄的人，延揽进用了英才，彻底革除积弊，国运焕然一新，于是推辞谦让的风气盛行，白拿俸禄干占职位的根源灭绝了。还有谁肯去光混资历，只把领取俸禄做为当官的目的，迅速招来供职上的非议呢?让尚书省进行衡量，守执这一条而不丢弃它，恐怕就会写诗歌咏贤才隐居在幽深的山谷中，感叹这些人才太难得了。哪里还有员额满足不了官位的需要而接连不断地选取士子呢?言辞违背实际而在举用贤才上流于浮泛华艳呢?臣下我尽管庸劣又愚昧，但确有理由地知道并不是那种情形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这难道是社会风气不美好，为什么草木竟很难随风倒伏呢?澄清源头，端正根本，具体的途径该从哪里切入呢?听说在古代，井田制下定有民力助耕公田的赋税制度，公家和私人的取用都很充足。诸侯向王室荐举贤才，赏赐与惩罚都有严格的规定。改变当前的做法想按古代那样走，但闹不清楚的地方还在等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来辨明。对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人们没有永远不变的品德，实际都跟着上面的教化走。这就像草顺风而无不倒伏，水随器皿而成方形或圆形。陛下神妙的谋虑像元气那样流播；仁德如同皇天覆盖一切，驱动当今的时代归入长寿的境地。掘深源头，巩固根本，政事只求纯正，民间风气已经在各自生活的地域内区分出特点来，人们也与上面喜好的东西相一致。又何必取用

井田的古制和民力助耕的旧规定，在每年向王室进献贤才上施行封赏与惩罚，对诸侯的领地予以增加和削减，也就算完事了呢?黄帝至虞舜等五帝并不递相沿用前代的乐舞，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三王也不承袭前代的礼仪。这并不是故意要同前代对着干，大致上是因为取用什么必须顺应时势。泥土依从模型被铸成器具，车辆很难改变那辙印。臣下我的确很庸劣又狂妄，不懂得国家的纲要，但私下希望陛下神妙地予以化导，使人都感到特便利，正适合当今的时代需要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文采和质朴轮番取代，崇尚忠厚与崇尚虔敬怎样才能和时势相适应呢?政治教化由齐国的状态变到鲁国那个样，亲近宗族和看重贤人怎样做就接近那准则了呢?圣上的这一策问真是太重大了!臣下我敢做发挥。臣下我听说，质朴兴行了一整圈，又回到文采上；历法上选用哪个月份做岁首，依次确定三个以后就要重新改变。商朝从夏朝脱胎出来，周朝从商朝脱胎出来。仁德、严肃和诚敬，夏朝崇尚那忠厚，商朝讲究质朴，周朝讲究文采，文采与质朴虽在变动，但忠厚与诚敬全都适应。不诚敬，礼节于是就违逆；不忠厚，大臣们同心辅政也就由此衰败下去。匡扶朝政，阐扬教化，必须适应时势，这是完全相同的。不过诚敬要从外部规范动作上显现出来，忠厚要由内心纯正而形成，一定要说出它们哪个更占首位，请求像孔子当年教导子贡时强调最后才舍掉粮食那样来对待。至于亲近宗族和尊重地位高的人，在这方面要想还有周公当年化导的痕迹吗?举用贤人又崇尚忠诚，在这方面要想还有太公姜尚当年的遗风吗?孔子说：齐国一变，就进入了鲁国文教兴盛的状态；鲁国再一变，就达到符合大道的境地了。鲁国遵用周王室的原有制度，这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究竟该择用什么经典来使社会风尚变淳厚呢?采用什么法度来安定住民众呢?建起怎样的功业，天地就安宁了呢?修成怎样的德业，黎民百姓就富足又长寿了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玄元皇帝老子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任何欲望，世人就会淳朴。无所不包的最高道法，不可以频繁地发号施令。跪拜希望

陛下，修明圣明祖先老子的训条，扩展那教化的纲纪，崇尚天帝化生万物的风范，返回到三皇的初始状态，这样一来，民间风尚就已经变淳厚了，众百姓也安定住了。端正品德、物尽其用和使民众生活宽裕这三件大事确实做得好，木火土金水和粮食这六种物品的储藏得到大力的整顿，天地也就安宁了。减省徭役又少收赋税，慎重对待刑罚而使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世人就富足又长寿了。这哪里是臣下我这样庸劣渺小的人能够参预的呢？

跪拜而想来，部署政事，定立大法，需要依据时势加以变通，列举并陈述古代的事例，择定全在于帝王的圣明听断。如今竟向下面愚昧又鄙陋的人做询问，征求他们分辨与论述的具体意见，这难道还不是打算观看他们的肤浅学问，收用他们的微小才干吗？臣下我显得很狂妄，并不是西汉司马相如和扬雄那样的才子啊！万幸正赶上大圣人老子诞生一千年的盛大庆典，帝王每隔五年视察各地而在泰山修明封禅的大礼，于是得以在天子经过的大路上献呈颂歌，置身并陪伴在皇上停留的处所。对考察自己的言论却无可取之处而深感惭愧，想到帝王的奖励而本人又哪有什么获取的阶梯？忠诚和曹魏的大臣程昱一个样，可却只是白白在渴望捧托太阳；吉梦并不是秦穆公所做，可却特不合格地来到了天界的乐舞圈中。在皇帝的殿庭上身影局促不安，真像走过薄冰深谷。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戊寅科

进士试题

拟孔融荐祢衡表

明堂火珠诗

崔曙　明堂火珠诗

崔曙(?~739)　宋州(今河南商丘)人。自幼时即为孤儿,生活贫困。但志向高洁,不应官府荐举召用,而与隐士为友,在少室山中刻苦读书。开元二十六年(738)进士第一,次年不幸去世。尤工送别诗及登楼题咏,俱能催人泪下。其以应试《明堂火珠诗》而名闻于世。

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
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
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
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

布政宣教的明堂占居正位,辟设出各个屋室。
在那天空的正中,闪耀出一轮火珠。
夜晚降临了,双月重合在一起。
曙光闪现以后,就剩下一颗星星。
天空澄净,可那光华却难以泯灭。
云彩涌生出来,看上去火珠好像不见了。
掉转来还得说只有那神圣清明的时代,
国家的宝物才留存在京都。　〔杨寄林译〕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甲午科

制科试题

策洞晓玄经科问

问:大象无体,玄功阴骘,虽禀生之类万殊,而含道之原一致。是以至人垂训,将以利物,演为真宗,贻厥后学,包括六艺,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诠意。至如交乐于天,交食于地,不相与为事,不期与为谋,善无所私,恶无所弃,施之于教,何以劝勉?

经曰:不争善胜,不言善应。正直如绳,平易如水,常务斯道,曷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斯言信矣。昔放勋钦明,光宅天下,人歌《击壤》,政叶雍熙。可谓善乎建抱,善乎拔脱,宜其帝绪蕃远,贻厥孙谋,绵绵瓜瓞,迈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辍乎?又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若以天下观天下,岂有二君乎?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君无贤臣,谁与共理?粤若舜举八元,致垂拱之化;汉用三杰,成霸王之业。夏、殷之末,任佞去贤,宗社沦亡,为无匡辅。经称不尚贤者,其旨何哉?

圣人立教,专气致柔。故刑不欲劳,往不欲竭,深根固蒂,可以常存。则有朝穆肆任,劳逸过度,促龄损性,却以为然。又有惟静惟清,守真守朴。二经之说,何取则焉?又闻善摄生者,动与吉会,武不措爪,兵难容刃。单豹岩居水饮,身代俱损,寿永色孺,不免噬搏。何卫生之不异,而利害之顿殊?子既洞晓玄经,探微索隐,矛盾若此,何以会明?侧席虚心,伫闻启沃。

提问:大道没有形体,深远微妙的道功只是默默地佑护,尽管从皇天那里禀受到生命的各类生物千差万别,但都蕴含着道法的本原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修养境界最高的人垂示训条,准备拿来对万物有利,推演成纯真的学说,留给后世学习的人。既把儒家的《六经》内容全都包纳进来了,又涉及到八方边际的一切现象。有的根据事

情来确立起说法，有的借助别人的话语来说明义旨。至于从皇天那里求取到欢乐，从大地那里求取到食物，不与别人一起做事情，不与别人共同做筹划，对良善的东西没有偏爱的，对邪恶的东西没有遗弃的。把这些说法施布到教化上，要靠什么来勉励世人呢？

《道德经》上说：不争夺而善于获胜，不发话而善于回应。正直得如同墨线，平易得如同流水，总是在这种做法上下力气，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呢？《道德经》上还说：会建立的人就不可动摇，会抱持的人就脱落不了，子孙由此就能世代奉守祖先的香火而不中断。这几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了。从前唐尧恭谨明智，光辉照耀天下，人们咏唱那《击壤歌》，政治与兴盛欢乐的景象相一致。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建立与抱持的了，善于让它们不动摇和不脱落的了，他那帝王的统系本该长远延续，留给子孙谋略，像大瓜小瓜那样瓜蔓连结不断绝，德业突出而给后代留下绰绰有余的庇护了。可为什么他的儿子丹朱就没继承帝位而祭祀祖先的香火也中断了呢？再者，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民众没有两位君主。如果拿天下来观察天下，哪里存有两位君主的呢？君主属于元首，臣僚属于助手，君主没有臣僚，谁去同他共同治理天下呢？虞舜举用号称八元的高辛氏兄弟八人，实现了无为而治的教化；汉高祖任用合称三杰的萧何、张良与韩信，成就了霸道与王道相混杂的功业。在夏朝和商朝的末期，信用献媚的人，斥逐贤能的人，国家就灭亡了，这是因为没有匡正的辅臣。可《道德经》上却强调不推崇贤才，其中的义旨又是什么呢？

圣人确立起教化，聚结精气达到柔顺，所以形体就不让它太疲劳，干什么都不叫它到极限，扎深那根须，强固那枝叶，可以长久存活。但也有前去朝拜西王母的周穆王，只管到那车马所能到的地方，减少寿龄又损伤本性，但却认为做得很对。还有人只求宁静，只求清寂，执守本真，执守质朴。《道德经》与《南华经》的说法，该取法它们中的哪一种呢？又听说善于保养生命的人，任何举动都与吉福相会合。可猛虎放不下利爪，兵器很难不使用。《南华经》中讲到的鲁国人单豹，住在山林中，饮用泉水过活，自身和后代都豁出去了，寿命保持得同面色红润的婴儿一个样，到最后还免不了被猛虎吃掉。为什么

卫护生命并非存在差异,而益处与害处却立刻就截然不同呢?你们这些应试者既然完全通晓道家的经典,探究精微又索求隐秘,而像以上所列举的问题竟这样彼此矛盾,该怎样融会错综,加以阐明呢?留出旁边的席位又虚心地期待着听到你们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独孤及　对洞晓玄经策

独孤及(725~777)　字至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幼时读《孝经》,即铭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二语。年逾20岁,游于汴州、宋州之间,与高适等诗家交往。天宝十三载(754),应洞晓玄经科制举,对策第一,授华阴尉。安史乱起,避难江南,充任幕府掌书记。代宗时,召为左拾遗,至即上疏陈政,力主纳谏图治,节用爱民,裁减江淮、山南诸道兵额。转任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对礼制有所议定。又出为濠州、舒州刺史,颇有惠政,加检校司封郎中,徙常州,卒于任上,享年53岁。性孝友,喜鉴拔后进。为文彰明善恶,长于议论,与李华、萧颖士等齐名,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今有《毗陵集》犹行于世。

对:臣闻道之为物,无名无形。盖圣人酌而用之,推而弘之,取其精以修身,用其粗以顿物,从本降迹,散朴为器,于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略虽以冲寂为宗,虚极为体,然妙用无朕,故不可致诘。今陛下诘其体,探其宗,岂不欲因言演教,于教遗有!夫长风吹而众窍号,则大无不动,细无不应。况陛下用为大道,以鼓群有,臣则吹万之一音也,敢不唱于众窍之末?

臣谨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处其和,谓之交乐。分地之利,以养其正,谓之交食。夫相与生于有为,有为生于有事,有事则谋名存矣。善恶生于公私,公私生于用,用则弃名立矣。然圣人有为不为焉,有事无事焉,有谋不谋焉,有善无善焉,有恶无恶焉。泯善恶于一致,合同异于万殊,则妙门可存,教父斯立。

臣又按《道德经》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杀者杀之,此不争善胜之应也。文宣王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

善应之验也。《周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正直如绳之效也。《经》又云:居善地,心善泉,与善仁,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证也。

陛下弘其言,挹其道,以为天下式,四十有二载矣。且复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询事,若冲若缺。诏臣等曰:常务斯道,曷往不臻?臣鄙生也,焉知其辨。虽然,有一于此,愿陛下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使神不远于人,人不远于天,天人合契,如影响交应,则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

夫有国者,必善建皇极,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倾其宗,迁其社,之谓拔。桀放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极之不建,失其器,亡其国,之谓脱。太康去洛汭,幽王败骊山,厉王流彘是也。至如尧知天历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辞;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禅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谓迈德矣。其后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龙、唐杜之代禄,可谓垂裕矣。陛下兴废继绝,立五帝祠,即春秋备其祭典,亦可谓祭祀不辍矣。方之拔脱,臣谓不同。

《经》曰:不尚贤,使民不争。大哉圣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贤者,国家之所当先。然古先圣王虽求贤审官,其用未始不无为也。而圣人能无为于求贤,不能使无为无迹存,则有为者尚之以为利。于是有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污。其渐起于一时之名,其弊存乎千载之后。不尚贤者,非谓废股肱之任,绝臣辅之力也。盖欲因时致功,功成则遣而遗之;因义立事,事遂则有而无之。无之则迹灭,迹灭则争息,争息则于为无为,于事无事。虽八元以翼唐弼虞,三杰之戡秦灭项,其无为无事一也。

若夫齐天地,冥万物,莫大于全真。专气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静,全真之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设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贯之。虽逍遥与道养殊途,然性静与力命同辙。苟因其合而较其分,则子产不得不劳于刑政,朝穆不得不逸于肆任。若矫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续凫截鹤,亏其全矣。故圣人以大猷御六气之辨,以大方合二经之旨,明应变无方,立言不一。学者宜忘言以究其体统,不可执言以滞其筌蹄。《经》不云乎!返者道之动。惟动而常静,静可以取则,权足以合义,义无反经。

凡养生者，以本为精，以物为粗。闭其外，慎其内。迹不践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冯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遗其粗，故得于内而丧其外。外内无以持其分，则卫生之经悖矣。谓之不异，臣窃异之。至如希微大体，徼妙玄键，陛下得黄帝之遗珠久矣。虽广成无所陈其至精，傅说无所用其舟楫。启沃之问，岂臣及之？有黮奢谋，惧陨越于下。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大道构成一种客观的存在物，既没有恰切的名称，又没有能让人看得见的地方。圣人斟酌而运用它，推行而弘扬它，择取其中的精粹部分来修养好自己，运用其中的粗浅部分去控制万物，从本源上降示出形迹，散布开质朴形成器用，于是有那可以讲论的大道，忘记称说的理论。它那主体思想尽管把冲和静寂作为宗旨，把空明至极作为本体，然而灵妙的施用却没有任何迹象，所以根本就不能彻底究诘。如今陛下究诘它那主体，探寻它那宗旨，难道不是打算依据那理论来推演教化，在教化上赠予给一切有形的物体吗？猛烈的风在吹动，所有的孔窍都发出声音，于是多么大的东西都没有不动的，多么小的东西也都没有不应合的。况且陛下运用大道来熔铸一切物体，臣下我正是风吹万窍的一个音声，哪敢不在众多孔窍的末尾发出响声呢？

臣下我恭谨地做考察，皇天有那施布，大地有那产出。借用皇天的施布，来把自己固定在和谐的状态，这就叫做求取到欢乐；分享大地的产出，用来培养自己的纯正品德，这就叫做求取到食物。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从有所作为那里产生出来的；有所作为，这是从有所从事那里产生出来的；有所从事，谋求的名称就去不掉了。良善与邪恶是从公家与私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公家与私人是从各有需用上产生出来的，各有需用，遗弃的名称就定立起来了。然而圣人有所作为却不为，有所从事却不从事，有所谋求却不谋求，有那良善却不把它当成良善，有那邪恶却不把它认作邪恶。把良善与邪恶泯没到一个目标上，对千差万别的事物融化掉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一切奥妙变化的门径就能常存了，教化的主宰物由此就确立起来了。

臣下我又考察《道德经》中说:皇天的法网宽广无边,稀疏但什么都漏不过去。总有专管斩杀的部门去执行斩杀,这正是不争夺而善于获胜的兆应啊!孔老夫子说:皇天可发过什么话呢?可四季却交替到来,各种生物总在化生。这正是不发话而善于回应的证明啊!《尚书》里的《周书》说:没有偏执又没有同党,称王天下的大道十分平坦。这正是正直得如同墨线的效验啊!《道德经》中还说:住处会选好地方,内心会保持沉静,交朋友会接近仁人,说话会恪守信用。这正是平易得如同流水的证验啊!

陛下弘扬他们的学说,挹取他们的道法,作为全天下的准则,已经长达四十二年了。而且仍旧推辞功勋,把名声置之度外,不据为己有,不拿来仗持,考察言论和询问事情,总像特谦逊又总像有不足。下达诏令给臣下我等人说:总在这种做法上下力气,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的呢?臣下我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哪里明了那该辨清的东西呢?尽管是这样,对此还有一点儿看法,希望陛下守持它而不丧失掉,与神灵融为一体,使神灵不对人疏远,使人不对皇天疏远,皇天与人高度契合,如同影象与本体、回声与本音彼此应合。这样一来,极其平坦的大道,想到哪里去还到不了那目的地呢?

拥有国家的人,必定要善于建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善于抱持住最高的道法。道法保存不住,就会使他的祖庙倒塌,把土神谷神庙转给别人。这正叫做动摇。夏桀被驱逐到南巢,商纣王在牧野死掉,就是这样啊!最高行为准则建立不起来,就会失去他的君位,灭亡他的国家。这正叫做脱落。夏朝的太康被赶出了洛水的北岸,周幽王在骊山被杀,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就是这样啊!至于唐尧知道皇天的际运落在了自己的身上,所以就出自最公正来把天下作为众人的天下,全天下都拥戴他而不推让;又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成器,就又出自最公正来把天下禅让给别人统领,全天下离开他而不怨恨,可以称得上德业高出许多了。他的后裔轮番称霸又迭相称王,接连在夏朝成为御龙氏,在周朝成为唐杜氏,世世代代享有俸禄,可以称得上给后代留下绰绰有余的庇护了。陛下使废灭的国度显出来,使断绝的宗族有人继承,设立黄帝等五帝的祠庙,每到春季和秋季举行祭享的各

种典礼，也可以称得上他们的子孙奉守祖先的香火不中断了。这与那类动摇或脱落的情况作比较，臣下我认为是有区别的。

《道德经》中还说：不推崇贤才，以便使民众不争斗。这表明圣人了解隐微处又了解彰明处真是太伟大了！推崇贤才，这是国家应当放在首位去做的事情，然而古代的圣明帝王尽管求取贤才，审核官员，目的未曾不是不无为而治呀！但圣人能在求取贤才上达到无为而治，却不能使无为而治没有任何迹象留存下来，于是有为而治的人就推崇贤才，以便收到益处，在这时就出现了故意显出机智去使愚昧的人感到惊奇，修养好自身来表明那些相反的污浊的东西。这种过程是从一时间的名声开始的，可那弊病却沿续到千载以后。不推崇贤才，决不是说要废除助手的任用，断绝大臣辅助的力量啊！大致上是想随顺时势实现功业，功业告成就遣散并报谢他们；依据道义定立起事体，事体完毕就已经具有也像没有一样。像没有一样，迹象就泯灭了；迹象一泯灭，争斗就止息了；争斗一止息，就在有为上却无为，在有所从事上却没事了。即使号称八元的高辛氏兄弟八人协助唐尧又辅佐虞舜，合称三杰的萧何、张良与韩信平定秦朝又消灭项羽，他们在无为又无事上是完全相同的。

至于把天地的区分消除掉，使万物浑然一体，就没有什么能比保全纯真更为重要的了。聚结精气达到柔顺，这是保全纯真的根本所在；只求宁静和只求清寂，这是保全纯真的最恰当的形态。各自认为那对的就对，各自认为那能行的就行，这就纯属保全纯真的低劣做法了。设布教化的东西有儒学、道家和佛教这三类，把它们的道法聚合起来而用一种方法加以贯穿，尽管逍遥自在与修道炼养途径不同，但情性宁静与用力本命却辙印一样。如果依据它们的聚合来比较它们的区分，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就不得不在刑罚政令上操劳费力，前去朝拜西王母的周穆王就不得不在只管到那车马所能到的地方上消停得很。如果矫正他那只管到车马所能到的地方去的天性，用来屈从刑罚政令的首先做起，这就纯属给野鸭拉长它那短腿，给仙鹤截短它那长胫，使那天然的形态亏缺了。所以圣人凭借长远的谋划驾驭那六种气流的分化，通过重大的方略融合《道德经》与《南华经》的义旨，表

明应对变化并没有框框，确立说法并不限一家。学习的人应当忘记具体的说法而去探究那体统所在，不可以执定具体的说法来被那入门的东西限定住。《道德经》上不正说过吗?返归正是大道的运动。只有运动才会总保持宁静，宁静可以取来效法，灵活处置足以切合义旨，义旨决没有违背经典的地方。

一切养生的办法，都把本性作为精粹的东西，把外物作为粗陋的东西。不受外物的影响，慎重对待内心世界。形迹要是都不踏入凶险危急的环境中呢!可这事实上做不到，所以兵器就无法不使用。心念要是都不停留在光脚过河与赤手空拳打老虎上呢! 可这事实上做不到，所以老虎怎么能够放着利爪不动弹?如果执守那精粹的东西，抛弃那粗陋的东西，所以在内心有收效而在外界就有丧亡。外界和内心没办法操持住二者的区分，卫护生命的常规定律也就违逆了。说这并无差异，臣下我对此却感到差异很大。至于无声与隐微的主要宗旨，奥妙和归结的幽深关键，陛下获取到当年黄帝遗失的玄珠已经时间很长了。即使是广成子也没有再能陈说怎样才算得上最精妙的那类论断的了，商朝的傅说也没有再能发挥他那船只和船桨的作用的了。关于策问中要富有启发性的要求，哪里是臣下我能够达到的呢?对圣上的谋划多有亵渎，在下面真是害怕到了极点。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乙卯科

进士试题

五色土赋　以"皇子毕封、依色建社"为韵　(上都试)
日观赋　以"千载之统、平上去入"为韵　(东都试)
龟负图诗　(东都试)

丁泽　日观赋

丁泽(生卒年不详)　或作丁春泽。自代宗永泰元年(765)起,由于时艰岁歉,而赴京师长安应试的举人又数量众多,遂置两都(上都长安与东都洛阳)贡举,礼部侍郎的官号也均以知两都为名,两地每年单独张榜公布录取人数和名次。这一制度到大历十一年(776)被取消,仍悉至上都长安应试。丁泽为大历十年(775)东都试进士第一,他事则不得其详,俟考。

日之升也,浴海而丽天;岳之峻也,切汉而临边。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爱景者欲在万人之先。其所惟一,其仞惟千,伊风灵之有载,彼日观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终,曙色犹昧,彼穷高之极远,此有进而无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载。屡闻鸣雁,犹阴沉而不睹;忽听晨鸡,即瞳昽而可爱。于是渐出旸谷,将离地维,岩峦既秀,草树生姿,气则赫赩,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烛,其照也无私。昔者帝王御宇,立极垂统,封禅及此成功,巡狩应其春仲。莫不登兹绝顶,遐烛大明,思煦妪之义,穷造化之精。以为日象一人之德,岳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设险,俾夷狄之来平。方今一德无为,三光有象,动植昭泰,神祇胖蚕。千岩瑞色,思效祉以爱升;万壑春云,欲人封而空上。客有才泛羽仪,心思骞翥,每积聚萤之志,难登望日之处。引领终夕,含情达曙,知烛照之有期,故踌躇而不去。重曰日有观兮,绝代独立,登之望兮,无远不

及。何太阳之至精，莫不专于出入！

旭日冉冉升腾，既被沧海所洗浴又附着在天上。东岳泰山雄伟高峻，直接插向银河而临近边缘。登上高处的人，由此要到达九重天的顶端；喜爱景色的人，只想抢在所有人的前面。那处所只有这一处，那高度上千丈，风神在这里往来，日观峰在这里长存。当夜间计时器上的刻度还没滴满的时候，黎明的曙光仍然显得暗淡，那座日观峰高到极点又远到天边，这里观赏者只管挤到前面而决不后退。虽然还辨别不出夜晚和白天，可天地却区分出来。多次听到大雁飞过的叫声，依旧昏黑阴沉，看不到朝阳；猛然间听到雄鸡报晓，马上就晨曦闪映，更觉可爱。于是旭日从它升起的地方慢慢涌上来，眼看着离开那大地的边际，山峦岩石已经显出秀丽的景色，花草树木更摇曳生姿，气光是那样的鲜亮夺目，人们全都把头朝向了它。望上去就宛如红烛，可它却照耀到天下的每个角落。从前帝王驾驭整个人间，确立起行为的最高准则，给后代留下本朝的统系，到泰山这里举行祭天祀地的大礼，报告成就的功业，每隔五年视察全国各地，都要在仲春二月抵临东岳，没有谁不登上这日观峰的最高处，远远察照那旭日的升腾，想到生养抚育众百姓的义旨，穷尽那皇天创造出万物的精髓所在，认为太阳代表着君主的仁德，五岳是三公这类重臣的代称，确实要身为帝王诸侯就该设布下险要地带的防线，致使少数部族前来归服。如今我们大唐完全把力量用在仁德的施布上，不做其他的人为的筹措，致使日月星辰显现出吉象，动物和植物昭示出太平，天地的神灵全都被感召融通。众多的峰峦流泻出吉祥的光色，都想献上瑞应，升入祭祀的范围；遍布的山谷涌动出春天的彩云，都想进入封禅的行列，飞向高空。宾客当中有的人才干如同大雁飞翔所依靠的翅膀，内心渴望飞举施展，常常怀有积聚起萤火虫做灯用的苦读勤学的志向，可却很难登上观望日出的地方。一整夜都伸长脖颈，满怀希望到天明，深知总会有一天被君主所发现，因而就徘徊来又徘徊去而不离开。再次歌咏说：旭日有那让人观望的地点啊，举世无双而独自屹立。登上去而眺望啊，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太阳是多么地最

精诚啊,任何时候都投注在东升西落上!

龟负图诗

天意将垂象，神龟出负图。
五方行有配，八卦义宁孤!
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谟。
乘流喜得路，逢圣幸存躯。
莲叶池通泛，桃花水自浮。
还寻九江去，安肯曳泥途!

天意打算显示那吉祥的兆象，
神龟就从黄河里出来而背上带有灵图。
东西南北中分别与五行相配属，
八卦的象征意义哪里仅仅是一种!
呈现祥瑞,彰明君主的盛大仁德。
显露神文,与那帝王的谋略相吻合。
顺着激流游动,高兴得到了通向京师的路程。
逢遇到圣明的天子,很庆幸自己存下身来。
在御池的莲叶中间游动来又游动去，
在飘着桃花的清水中任意地沉浮。
仍要寻找旧路回到九江去，
哪里肯被路上的污泥浊水所困住! 〔杨寄林译〕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丁巳科

进士试题

通天台赋　以"洪台独存、浮景在下"为韵

黎逢　通天台赋

黎逢(生卒年不详)　大历十二年(777)进士第一。其气貌朴野，至考场便于帘前设席。主考官既耻笑他不懂规矩，又认为他文词必与其举动相当，便派专人在旁边察看他如何下笔。当听到起首为"行人徘徊"四字时，则谓"亦是常言"而已。随后数联报来，无不惊叹，于是擢其为状元。状元及第后之事迹，不得其详。

行人徘徊，登秦原而游目，见汉右之荒台。清风穆其尚在，翠华归而不回。对古情至，临高思来，披蔓草以遐想，睹离宫而兴衰。试问薪者，乃秦人也，云汉之兴，兹台之下，驰道通乎中禁，周墙绕于平野。经逝川而不息，抚环堵而殊寡。昔汉皇帝，幸甘泉宫，肆目将远，筑台其中。高居物外，若与天通，祈列仙之戾止，致寿圣之延洪。绎绎凭云，蹲蹲捧日，干元气以直上，倚长空而迥出。危槛岩岩，回途郁律，植承露之盘，开肃神之室。将以接上元，朝太一，乘大君之登降，访总真之摭实。於戏！郊祀之义，志而可采，鸿纷之状，望而已改。哀壮丽之都失，想威灵其如在，徒野鸟之飞来，何真人之可待！且白日可以精贯，玄珠难乎力求。虽层台巃嵸，磴道周流，秦畤乎西面，齐宫乎上头，仰通苍昊，俯瞰皇州，宁不死之可致，谅其生也若浮！我国家立太平，尚清静，俨宸居以自整，绝仙台之望幸。虽丹槛栖于列宿，飞梁历于倒景，有唐虞之允恭，无汉武之游骋。化由其衷，居慎其独，有仪可象，无思不服。自然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骞，何高台之是筑！

过往的人不愿离去，登上秦国的故地乐游原，四处观看，看到了汉朝曾经尊崇的荒凉的通天台。清爽的和风还在吹拂它，表示它仍存在，绿树红花却都收缩起来，不再环绕它了。面对古迹，情思涌生，登上高处，思绪奔来，拨开那丛杂的野草，顿生遐想，目睹那残破的离宫，不禁涌发哀思。试向打柴的人做询问，他竟是秦代的人。说是汉朝兴盛时，在这座通天台下，宽阔的道路直通皇宫以内，四周的围墙在原野上环绕。河水从中流过而不止息，主宰那低矮的民房而显得尤为突出。从前汉武帝驾临甘泉宫，放眼望去，打算哪里都看到，就在宫中修筑了这座楼台。楼台高高地耸立在万物之上，好像同苍天相连通，祈求众位仙公都来到，招致寿星扩展那福庆。节节相连接，靠近那云彩；密密相聚集，托住那太阳。触及到元气直插九重天，倚据广阔的天空，异乎寻常地凸现出来。高高的栏干在耸起，弯曲的道路特深邃，设置下承接露水的铜盘，开辟了敬奉神仙的斋室。准备沟通那元气，朝拜太一至上神，顺着圣德帝王献呈祭品的行动，访求到最高仙官的据实嘱告。哎呀呀！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大礼的用意，记下来可以采择，那盛大纷繁的景状，一眼望去却已经改观了。哀惜那壮丽的京都丧失掉了，想那威严的灵光像是还存在，只有野鸟从远处飞来，真人可怎么能期待？况且最炽烈的太阳可以凭借精诚去贯通，当年黄帝在赤水丢失的黑珍珠却很难依靠人力来找回。尽管一层又一层的楼台盘旋而上，一级又一级的石路无处不通，秦朝祭祀天帝的专用处所修建在北面，齐国斋戒的宫室耸立在前边，但仰头感通那苍天，俯身观望那九州，哪里会求来长生不死的仙药呢？难怪汉武帝慨叹人生像浮云啊！我们国家奠立起太平，崇尚清静无力，把皇宫整顿得非常威严，用来自己端正自己，断绝那想借仙台侥幸获得长生的想法。尽管华美的栏干散布在众星宿当中，飞悬的梁柱遍布在天界里面，可仍只有唐尧虞舜的虔诚恭谨，决没有汉武帝的游乐放纵。教化出自天子的内心，平常更在只有一个人时仍然保持谨慎，具有那典范的行为可以让人们效仿，天下没有谁不心悦诚服。这就自然成为整个世界中的主宰，获取到天下的福禄，和那南山永不亏缺一模一样，为什么还去修筑这类通天台呢？〔杨寄林译〕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己未科

进士试题

寅宾出日赋　“以大明在天，恒以时授”为韵

花发上林苑诗

王储　寅宾出日赋

王储(生卒年不详)　大历十四年(779)进士第一。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惟天为大兮，尧实则之。命羲和而驭日，俾出纳而从时。肇岁首以平分，即中星鸟；及宵衣而敬导，始见嵎夷。所以示农功之有序，叶君德于无私。我国家克定三元，光临四海，纂唐虞之旧说，崇德礼而私在，将举正以履端，奉天时而不改。由是春官藏事，太史作程，天子居青阳之左个，览万物之初生。始昭宣于东作，终协赞于西成。杲杲临空，无幽而不烛；迟迟监下，有蛰而皆惊。伊兆人分地之利，我圣上则天之明。淑气载扬，畅禽鱼而共跃；融风乍扇，迨葵藿而咸倾。庶绩其凝，三农式就，高台纪于云物，大野陈其蒐狩，毕向化以观光，亦顺时而敬授。岁如何?其岁既登，节盈缩兮日有恒。岁如何?其岁将起，兆发生兮日之始。苟奉顺而无违，得祯祥而所以。原夫君比德于日，日丽光乎天。抚有万方，每朝君于岁始；照临庶物，故出日于春前。煦百泉而冰泮，薰九陌而苍然。合璧表尤为之化，重云示有庆之年。信惟贞而惟一，示无党而无偏。客有藏器俟时，卑躬思泰，遇乾坤之诉合，睹日月之光大，莫不向春景以自娱，沐尧风而永赖!

只有皇天才最为尊贵，唐尧在实际上全都效法它。命令羲氏与

和氏负责天地之事，掌握住太阳的运行规律，让他们宣布历法，把各地的执行情况收集并反映上来，准确地随顺那节气时令。确定下岁首的第一天，把昼夜时间长度恰好对等的那日作为春分，已经和朱雀七宿出现在南方夜空正中之时相吻合。再早早起身，严肃恭敬地迎导太阳，使它在东方海滨开始升腾出来。目的全在于昭示农耕活动具有固定的次序，和君主的仁德本应普照天下相一致。我们国家能够稳定住日月星，光辉照耀四海，汇总有关唐尧虞舜的古代记述，崇尚仁德礼制，在无形中发挥作用，一直想推行正道，按照纯正的方向走，敬奉天时而不改动。由此而负责礼仪的春官不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太史奏明该做的一系列事情，天子居住在明堂东侧的青阳堂中位于左部的左个堂，观览万物初生的情形。从一开始就对搞好春耕做出明确的表示，到最后协助那秋季的大丰收。初升的旭日，腾跃到空中，没有任何一处幽暗的地方不把它照亮；全天都温暖照射的太阳，监临着下方，冬眠的动物全都被惊醒。那些亿万百姓分享到大地给提供的利益，我们圣明的皇上效仿皇天的清明。美好的气流到处扬布，使飞鸟游鱼都感到特别欢畅而共同跃动。融和的暖风猛然间吹起来，吹到葵花上全都朝向了太阳。各种政事获得成功，春夏和秋季的农事活动顺利完成，在宫门前的观台上记载下各种颜色的云气，在旷野上安排那集体打猎习武的行动，各地全都接受教化，观览泱泱大国的盛明光辉，同时也承顺时节，严肃地颁授历法。年景到底会怎样呢?年景既然五谷丰登，春季和秋季的时间长短极有规律啊而太阳的运行特正常。年景到底会怎样呢?年景眼看着是丰收年，就在万物化生时显出吉兆啊而太阳为起点。如果承奉顺从，没有违逆的情况，获得到吉福就确有理由了。认真推究起来，君主的仁德要同太阳来比拟，太阳的光辉要依附在天上。安抚并辖有所有的邦国，邦国常常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去朝拜君主。照耀地上的万物，所以就在春季到来之前恭敬地迎候太阳升起。照暖一切河流而寒冰消融，薰陶所有的原野而一片绿色。日月合璧表明人间实现了清静无为的教化，祥云重迭预示着吉庆的年景。确实只是纯正，只是专一，显示出既没有结党营私，又没有偏向一边。

宾客中有人身怀本领隐遁起来，等待那时机，降低自己的身分向往那亨通顺畅，遇到天地的欣悦交合状态，看到日月的光明盛大，没有谁不对着春天的景象来自我欢娱，沐浴着帝尧的皇恩和风而永远仰赖它!

王储　花发上林苑诗

东陆和风至，先开上苑花。
秾枝藏宿鸟，香蕊拂行车。
散白怜晴日，舒红爱晚霞。
桃间留御马，梅处入胡笳。
城郭连增媚，楼台映转华。
岂同幽谷草，春至发犹赊。

太阳运行到东方七宿的区域，和煦的春风吹来了。
皇家上林苑的百花，最先开放。
繁茂的枝条，收留住过夜的鸟类。
香艳的花蕊，拂动着行进的辇车。
散列开白花，眷恋那晴空的太阳。
舒展开红花，喜爱那傍晚的云霞。
桃花浓艳的地方，使御马舍不得离去。
梅花俏丽的处所，吸引着胡女来吹奏胡笳。
城郭连番在增添着明媚的春色，
楼台相映照，更显出华丽的光彩。
哪里像那幽暗山谷中的野草，
春天已经到来了，仍旧化生得稀稀落落。

周渭　寅宾出日赋

周渭(生卒年不详)　字兆师，淮阴(今属江苏)人。致力儒学，

工于词赋。大历十四年(779)进士第二，次年又登军谋越众科，授官汝州襄城尉。后任殿中侍御史，迁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老以秘书少监致仕。

陶唐氏钦若日出，资授人时，乃命羲仲，往哉汝司。纪寅宾而建始，旌烛照兮无私。旸谷初升，退群冥于侧陋；扶桑适上，分万象于毫厘。日之为德也均，日之为功也大。作朝夕之程准，见乾坤之交泰，无远无近，幽而必通，惟植惟生，罔不咸赖。出于东兮，示发生之所在；倾于西兮，睹光灵之不改。必将表岁以务穑，岂独陵虚而赋彩！尔其孟陬叶月，大簇和声，农祥正而土膏咸动，庶绩凝而百度惟贞。于以秩东作，于以望西成。涂足沾体，勉穑夫与田畯；布和施令，乐国泰而君明。岂不以五行班序，七曜宣精者哉！则有三足呈祥，重晖降祉，瑞圣斯应，为光有以。远色杲杲，非童子之辨焉；孚彩昭昭，惟仲尼之揭矣。爰考休征，图牒与能，既煦育之九外，同寅宾而有恒。宾者导也，惟人之导阳；寅者敬也，唯人之敬授。谅难逾而可仰，参地载而天覆。观其煜耀动川，澄明丽天，消濛濛之残雪，敛霭霭之轻烟。谣《东君》于楚客，祀倍岳于满年，愿捧图称瑞以相宜。

陶唐氏帝尧恭敬地承顺太阳升起，借此向人们颁授历法和四季该从事的活动项目，于是命令天官羲氏第二子，你前去掌管这宗大事。《尚书》用“恭敬迎候”这样的字眼作记述，表示确立起点，并显示太阳普照天下，没有任何私心。太阳从名为旸谷的地方开始升起来，把一切黑暗都扫到了各个角落；到了名为扶桑的处所，恰好腾向空中，把所有的景物都区分得一清二楚。太阳构成它的德业啊！最为均平。太阳形成它的功绩啊！最为巨大。规定出昼夜划分的准确时刻，显现出天地交合顺畅的形态。不分远近，幽暗的地方必定会照到；只管去扶植，只管去化生，没有什么不仰赖它的。它在东方升起，昭示着发育化生的所在地；它在西方落下，看上去光辉仍未改变。一定要彰明全年的节气时令，让人们致力农耕，哪里仅

仅是跃上太空，给人间赋予色彩!等于说你们世人要在孟春正月和月相的变化保持一致，确定太簇这一标准音要与音声相协调。农耕活动准确无误，致使土壤都跃动起来；各种政事都取得成效，所有的制度只管坚持纯正。用来有条不紊地搞好春耕生产，用来预见到秋季的好收成。天子举行亲身耕作的藉田礼，勉励农夫和农官；营造谐和的氛围，发布适时的命令，高兴国家太平又君主圣明。这难道还不是因为木、火、土、金、水这五行正常运转，日月和五大行星宣播那精气而造成的吗?于是就出现了太阳中的三足乌呈献吉祥的现象，太阳放射出双重光辉而降现福佑的情况，圣人与这些祥瑞恰相对应，成就盛大的功业也就确有理由了。远望太阳的光色是那样地鲜亮，这决不是当年两个童子争辩早晨还是中午太阳离人远或近所能了解的。浮动的光彩是那样地显赫，只有孔老夫子对此做过揭示了。考察那些美好的兆应，神图天书都授付给贤能的帝王，已经在生养抚育上遍及一切处所了，就像唐尧对太阳恭敬地迎候那样坚持不懈。所谓宾，意思是迎候，只是世人迎候那纯阳盛气；所谓寅，意思是恭敬，只是向世人恭敬地颁授历法。确实是无法逾越却可以仰仗，和那大地托载、皇天覆盖连同人事并立而三。观看太阳光芒四射，使那山川跃动，澄净明亮又附着在空中，融化那剩余的厚大冰雪，敛起那密集的轻盈烟气。使楚国的屈原吟诵出《东君》的诗篇，让帝舜到时满五年时来到东岳泰山进行祭祀，我愿大唐君主手捧天赐的神图，世称祥瑞，来递相宣播。

周渭　花发上林苑诗

灼灼花凝雪，春来发上林。
向风初散蕊，垂叶欲成阴。
人过香随远，烟晴色自深。
净时空结雾，疏处未藏禽。
蓂茸何年植，间关几日吟?
一枝如可冀，不负折芳心。

艳丽的百花，凝聚着昔日的瑞雪，
春天一来到，就在上林苑开放。
迎着东风，最先舒散出嫩嫩的花蕊。
垂布下枝叶，眼看着就要形成林荫。
人们走过后，香气一直跟随着而不散去。
烟光晴朗，花色自动就更显深重。
澄静的时候，就像结成薄薄的透明云雾。
疏朗的地方，未曾收藏起过夜的飞禽。
那样地繁茂浓密，可是哪年栽植的呢？
宛转的鸟鸣又该会延续多少天呢？
如果真有一枝花可以寄托那情思，
也不辜负君王折取芳枝的心愿了。〔杨寄林译〕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庚申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问:朕闻古之善为国者,未尝不旁求正士,博采直言,勤而行之,辅成教化者也。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心以沃予,当有犯而无隐。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徇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户不扃?五谏安从,三仁谁最?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但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仁辨深疑。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

提问:皇帝我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帝王,未曾不广泛地求取纯正的人士,多方面采纳正直的言论,勤勉地行用它们,辅助并形成那教化啊!皇帝我登上帝位时间很短,政务料理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常常期待着忠义之士切中要害地提出最解决问题的意见。你们这些士大夫收起翅膀,藏起才能,思求振翅高飞,等待适当时机。如今开启君心来滋润皇帝我,应当只有触犯而不存在隐讳。皇帝我私下自不量力,敢于追慕古代的圣帝明王,往上效法伏羲氏和黄帝,往下遵从唐尧和虞舜,把已经散消的淳朴风气返归到原状,振作起眼看着衰颓下去的纲纪,使彬彬有礼互相谦让的风尚到处兴行,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但世人仍旧轻易就犯法,官员们还在徇私舞弊,起来当盗贼的人还没有奔亡,不仁道的人还没有远远离去。难道是身为臣僚的人并不是当年后稷和契那样的人物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吗?或者是身为君主的人比不上当年的夏禹和商汤才使它这样的吗?设布什

么谋略就能使西部的少数部族归顺呢？施行哪些教化就能使百姓在夜间不关上屋外的大门呢？对五种规谏应当听从哪一种？商朝末期的三位仁人要数谁占第一？西汉的周昌把汉高祖比拟成夏桀和商纣王，西晋的刘毅把晋武帝比拟成东汉的桓帝与灵帝，可只是受到了宽容不追究的对待，君臣双方都没有猜忌和恨怒，所以君主在圣明方面没出现闪失，臣僚在忠诚方面也没出现闪失。你们这些应试者既然是他们的同类，就应仔细探究古人的行为，这君臣四位贤人的优胜处和低劣处，期待着你们辨明那深深令人闹不清的地方。涉及到皇帝我还没觉察到的一切问题，在以上逐项询问的范围以外，提请你们全部写出来，一定要杜绝当面说好话来迎合从而加重皇帝我不仁德的那套做法。

姜公辅　对直言极谏策

姜公辅(生卒年不详)　日南(今越南清化省清化东北)人。登进士第，补校书郎。德宗建中元年(780)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对策第一，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才高有器识，每进见，奏禀详明，多获采纳。四年(783)泾卒之变发生，德宗仓皇出逃，其诛捕职藩帅朱泚随行，又以奔往凤翔为事危，遂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在奉天，请集中兵力加强防卫，由此被擢为宰相。随着事态的扩大，德宗又走梁州(今陕西汉中)，途中唐安公主死去，诏厚其葬，公辅则力谏从俭，由此而被罢相，降为太子左庶子。后贬泉州别驾。顺宗时起为吉州刺史，寻卒。其以一言悟主而骤登相位，又以一言不合而沉滞下僚。

对：臣闻尧舜之驭宇也，以至理理万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伏惟陛下，玄德统天，文思居业，慎重光之不绪，返淳古之休风。光启先章，畴咨嘉猷，锡臣之策，思以启沃。臣狂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

制策曰：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

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徇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伏见陛下，征隐逸于空山，拔夔龙于下位，聘名士，礼贤者，善无欲之徒，发惟新之诏，使吏肃人悦，法明令张。而犹曰君谢禹汤，臣非稷契，此陛下让之至也，臣何敢间焉？

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暑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制策曰：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术而可以外户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长，解辫户庭。应以地僻遐荒，未知圣造。伏以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视边戍申严，则请通国好；睹疆埸无备，则屡启贪心。固难可以礼义和，难可以恩泽抚。取今之要，莫过于智将悍卒，设险边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为心，不以西戎为虑。今请制其边兵有常数，边将有常务，分其土而居之，给其畜而业之。因其业也，而为之城池；因其将焉，而为之牧守。又申严其令，使获虏马者赏以马，使获虏羊者赏以羊。人皆固业，战自力倍，则可少安。

今积甲日深，兴戎岁广，黎人抗弊，未可勤师。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广庶类，农桑以时。弘济济之士于朝，盛洋洋之化于野。使其来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边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后款塞，而可即叙矣。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化，则外户不扃矣。

制策曰：五谏安从，三仁谁最者。夫谏者，以讽为先。乱国非无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谄谀胜矣。理国非无谄谀也，谄谀不用，则直言胜矣。时逢否闭，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请从其直谏。臣之职也，敢二事乎？昔商纣不君，虐弃天物，三仁弼谏，藩捍宗彝，退八百之师，抑三分之众。均其忧乱，俱可称仁；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义，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进退不失其正，在

于太师乎!

制策曰: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俱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仁辨深疑。臣闻君明则臣直。二圣以乘时开国,参佐昌图;二臣以委质造邦,克扶兴运。开忠谠之路,成不讳之朝,固拟议失伦,比方不怍,将以感君之未寤,致理于升平,绝好恶之门,传和睦之代。名高终古,传在策书,巍巍三代,斯为盛美。臣素无学术,谬窃对扬,若变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礼,晋武宁劣于汉高;鼓怒抗辞,周昌不优于刘毅。

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侧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休阴阳之广运,每荷陶甄。岂意圣诏荐临,猥垂下问,心虑殒越,夏虫不睹于春冰,曲士宁知于天道!欲申微素,进退忧惶。伏见陛下,以道生成,以德覆载,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委符瑞为草莽,用忠良为灵庆。临群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诚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渐也,臣不胜其忭。愿陛下俯仰必于是,寤寐必于是。《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抑臣以为,知终终之可以存义者,其惟圣人乎!伏惟陛下终之,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唐尧虞舜统领天下,用最高的道理去治理各个邦国,用人们感到美好和有利的事情来对天下有利。对百姓仍然担心他们还没受到化导,对各个邦国仍然担心它们还没安定下来,竟又在交通要道上设置书写规谏意见的木柱,用来征询正直的言论,不敢自满自大,不敢享乐安逸。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化生一切的德性统括起皇天,筹谋部署天地又思虑深远机敏来执守大业,审慎地对待一脉相传的帝王统系而使它再度大放光辉,把远古淳厚的美好风气返归到原状。弘扬开启那规章制度,向低贱渺小的人做访询,赐给臣下我策问,希望得到启发和滋润。臣下我狂放轻率,不晓得教化的本源,恭谨地冒着死罪跪拜在地,擅自陈述那愚昧的想法。

皇帝的策问中说:皇帝我私下自不量力,敢于追慕古代的圣帝明王,往上效法伏羲氏和黄帝,往下遵从唐尧和虞舜,把已经散消的淳

朴风气返归到原状,振作起眼看着衰颓下去的纲纪,使彬彬有礼互相谦让的风尚到处兴行,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但世人仍旧轻易就犯法,官员们还在徇私舞弊,起来当盗贼的人还没有逃到偏僻的角落里,不仁道的人还没有远远离去。难道是身为臣僚的人并不是当年后稷和契那样的人物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吗?或者是身为君主的人比不上当年的夏禹和商汤才使它这样的吗?陛下这番话真是太伟大了呀!臣下我听说夏禹称赞那些良善的人,而不良善的家伙就远远离去了。跪拜看到陛下从山林中征聘那些隐士,从职位低的官员中提拔像虞舜手下后夔和龙那样的人物,延聘名士,礼遇贤人,优待那些没有私欲的官吏,发布使国运焕然一新的诏书,使官吏们个个肃正,百姓们感到喜悦,法度昭明,政令张布。可仍然说什么作为君主的人比不上夏禹和商汤,身为臣僚的人并不是后稷和契那等人物。这是陛下谦让到极点了呀!臣下我哪敢对此表什么态呢?

与那大道完全切合,就很容易兴行起教化来;丧失掉大道,就很难做到适应时势的需要。事体与那定律有差距,差去一分一毫也就混乱了;事体与那定律高度吻合,路途不一样可却都归向同一个目标了。安排出全年活动的人,并不是在一个季节里都可以实施完的;实现大治的人,也不是在一天中就能成功的。只管在部署政事的起始阶段定立起法度,在历经几年以后希望看到教化形成,使制度的增益和减损从兴盛衰败上汲取经验教训再做出,使寒冷和暑热逐渐过渡到春季与秋季,还忧虑什么不能和伏羲氏以及黄帝的治绩一个样呢?不能和唐尧虞舜的光辉相对等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设布什么谋略就能使西部的少数部族归顺呢?施行哪些教化就能使百姓在夜间不关上屋外的大门呢?其实陛下讲信义又施布恩惠,真心要感化那些少数部族,册封他们的首领,使他们在边区一带表示归服。但却应上了地处偏僻一角,距离特别遥远,便不知道圣明天子给他们的造化。跪拜而又鉴于少数部族说话不算数,缺少信义,贪婪又不讲论什么亲属不亲属。看到边境沿线戍卫严密,就请求建立两国相互往来的良好关系;看到边界一带没有防备,就屡屡萌生贪婪的心念。从根本上很难能用礼节道义感化他们,

很难用恩泽安抚住他们。择取当今的关键对策，没有什么能超过明智将帅和强悍士兵在边区设布险要防线的了。臣下我跪拜希望陛下，要把体恤下面的人作为心念，不把西部的少数部族当成忧虑事。如今请求在安排部署边境的军队上要有固定的数目，委任边境的将帅要有必须下大力气做好的事务，划分土地来让他们居住，提供充足的牲畜来使他们形成家业。依从他们的家业，来给他们修筑城池；通过他们的将领，来给他们确定下长官。再申明并强化命令，让俘获到对方马匹的人就把马匹赏赐给他，让俘获到对方牛羊的人就把牛羊赏赐给他。每个人由此全都巩固自己的家业，打起仗来自然就勇力倍增，可以稍略获得边境的安宁了。

如今兵器聚积的日子太深了，出动军队的岁月太长了，黎民百姓对弊害十分反感，不可以再对边区用兵。跪拜希望陛下重视对万物有利的本源和使人休养生息的做法，让人口得到繁殖，农耕蚕桑按节气进行。在朝廷上显扬那人才众多的场面，在民间加强那盛大的化导。使少数部族前来时，仰慕这中原文物典章的雄盛；在边区盘踞时，杜绝他们对财利私欲的贪求。然后就主动归附，可以顺服了。奸诈邪恶是从豪士雄杰那里产生出来的，廉耻和懂得羞耻是从礼仪道义那里产生出来的。礼仪道义确立起来了，还有谁不会具有羞耻心并且归顺呢？吃穿很充足，还有谁去违背道义追逐私利呢？臣下我认为实现人们富足又感到特有利的家业，申明仁德道义的教化，也就家家在夜间不关上屋外的大门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对五种规谏应当听从哪一种？商朝末期的三位仁人要数谁占第一？说起规谏这类行动，其实还数讽喻式的规谏占据首位。败乱的国家并不是没有正直的谏言，正直的谏言不被采纳，因而献媚逢迎的话语就占上风了。实现治理的国家也不是没有献媚逢迎的话语，献媚逢迎的话语不被采纳，正直的谏言就占上风了。时世正赶上阻隔闭塞，孔老夫子就恪守那文雅为主的进谏方式；今日显赫盛明，卑贱的臣下我便请求依从那直言规谏的方式。臣僚的职责，怎敢事奉两个君主呢？从前商纣王根本不是当君主的作派，虐待毁弃皇天降赐的物品，三位仁人辅政规谏，强力捍卫国家的宝器，要击退

八百诸侯跟随的周朝军队，抑制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周朝部众。，站在忧虑国家败乱的同一个角度上来看，他们三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仁人。再比较他们挽救危险的局势，有的就够不上道德对等了。其中比干深知死亡的意义，而且招来了把君主陷入不仁的评价。微子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国家，有人说这是靠机智免除祸殃。进前和退避都没偏离了忠正，还是归在箕子那里吧？

皇帝的策问中又说：西汉的周昌把汉高祖比拟成夏桀和商纣王，西晋的刘毅把晋武帝比拟成东汉的桓帝与灵帝，可只是受到了宽容不追究的对待，君臣双方都没有猜忌和恨怒，所以君主在圣明方面没出现闪失，臣僚在忠诚方面也没出现闪失。你们这些应试者既然是他们的同类，就应仔细探究他们的行为，这君臣四位贤人的优胜处与低劣处，期待着你们辨明那深深令人闹不清的地方。对此臣下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僚就忠直。汉高祖与晋武帝这两位圣明的君主出自顺应时势，创建国家，就酌取辅臣的宏大谋划；周昌和刘毅这两位大臣出自把性命全交给君主，营造国家，就能扶助正在兴起的国运。开辟忠诚正直的道路，形成决不隐讳的皇朝，固然是比拟的对象很不恰当，打比方一点儿也不害怕，目的是唤醒君主还没觉悟的地方，使治理达到天下太平的程度，断绝个人好恶的门径，传续那和睦的朝代。名声在任何时代都数第一，事迹在史书上流传，从盛大的夏商周三代以来，这两件事真够得上盛明又美好。臣下我一向就没有学问，荒谬地站在了对答称扬天子命令的地方。如果要辨明那细微的差别，我这番话就玷污前贤了。用礼节来使用大臣，晋武帝终竟要比汉高祖差；抖出怒气直言不讳，周昌并不比刘毅强。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涉及到皇帝我还没觉察到的一切问题，在以上逐项询问的范围以外，提请你们全部写出来，一定要杜绝当面说好话来迎合从而加重皇帝我不仁德的那套做法。臣下我固然平庸浅陋，置身在低贱渺小的位置上。仰仗天地普遍施布恩德，白白地对受到的化生与养育感到欢悦；在阴阳二气广远地运行流转的美好意图下，常常受到陶冶熔铸。哪想到圣明的诏书接连颁降，屈尊对下面进行询问，臣下我内心忧虑畏惧得简直要跌倒在地上。夏天的小虫子

不曾看过春天的冰雪，学问浅陋的读书人哪里懂得皇天的法则？想要表达一下内心的一点点儿看法，说或不说真是担忧又惊惧。跪拜看到陛下靠大道来化生成就，用仁德来覆盖承载，像春天和夏天那样进行封赏，像秋天和冬天那样施用刑罚。把金银珠玉搁置在江河湖海中不开采，把奇珍异宝归还给湖泽不搜求，把吉祥的兆应放到一边去看待，把任用忠诚贤良的人当成是最灵验吉庆的事情。用端正自己的德行来驾驭众多的臣僚，用生活富裕来给亿万百姓带来恩惠。这的确是实现太平的做法啊！是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起点啊！臣下我对此简直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祝愿陛下一举一动必定投注在这上面，醒来睡去必定集中在这上面。《诗经》中说：没有不有那开始做得特好的，但很少又有真能坚持到最后的。不过臣下我又认为，深知坚持到底又真坚持到底，确能恪守那义旨的，也只有圣人吧！跪拜只希望陛下坚持到底。臣下我如同葵花跟着太阳转的那片忠心简直无法表达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乙丑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帝若曰：盖闻上古有道之君，垂拱无为，以临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劳而事成也。星辰轨道，风雨时若，邈乎其不可继。何施而臻此欤？三代以来，制作滋广，异文质之变，明利害之乡；威之以刑，导之以礼，敦其俗而弥薄，防其人而益偷。岂浇淳必系于时耶，将圣贤间生而莫之振也？

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励，如恐坠失，忧济庶务，夕惕晨兴。永惟前王之典谟，是宪是则。师大禹以崇俭，法高宗以求贤，兴夏启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悌，举直言，养高年，敦本业，平均徭税，黜陟幽明。励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乱不惩，奸犯不息，五教犹郁，七臣未臻。乡党废尚齿之仪，蒸黎无安土之志。赋人日减而私室愈贫，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滥。意者朕不明欤，势不可欤？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思欲划革前弊，创立新规，施之于事而易从，考之于文而有据。备陈本末，将举而行，无或惮烦，略于条对。

自顷阴阳舛候，祲沴荐兴，仍岁旱蝗，稼穑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屡降凶灾，其咎安在？《传》曰时之不义，厥罚恒旸。又曰尧汤水旱，数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谁云从？今人靡盖藏，国无廪积，朕屡延卿士，询访谟猷。至乃减冗食之徒，罢不急之务，既闻嘉话，亦已遵行，而停废之余，所费犹广。欲转输于江徼，则远不及期；将搜粟于关中，则扰而无获。节军食则功臣怀怨，省吏员则多士靡归。中心浩然，罔知攸济。子大夫蕴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时之难灾，毕志直书，无有所隐。

皇帝提问说：听说上古具有道德的君主稳稳坐定，不去人为做干

涉，用来统领天下，不设法治理可世人却得到了化导，不终日忙碌可事业却获得了成功。星辰正常运行，风雨准时到来，广远得让后世根本就无法赶得上。究竟采用了什么措施才达到这种地步的呢？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各种人为的规定越来越繁杂，在崇尚文采和崇尚质朴的递变上各不相同，向世人宣明益处和害处的结果会怎样，用刑罚来进行威慑，用礼仪来加以诱导，促进社会风气淳厚可却越来越浇薄，防范世人行为可却越来越奸猾。这难道是社会风气浇薄或淳厚必定与时世联在一起吗？还是圣贤需要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世而别人就压根振作不起来呢？

皇帝我恭敬地继承我朝各位圣帝的大业，并不合格地位居在亿万民众的上面，虔诚恭谨又极力奋勉，总像害怕大业会坠落丧失似的，忧惧地想把各种政务处理好，夜间还在警惕着，清晨早早就起身，永远想去取法效仿古代圣明帝王的治国准则与谋略。把大禹作为榜样来崇尚节俭，把殷高宗作为典范来求取贤才，兴起夏启当年对有扈氏那样的征讨行动，振扬周文王当年对崇国那样的翦伐壮举。表彰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的典型，举用直言劝谏的人，养护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促使人们致力农耕，均匀地分派赋税徭役，提升政绩突出的官员，罢免平庸低劣的官员。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可以说勤奋到极点了。然而浮华奢靡的风气却革除不掉，治理和教化却推行不开，凶暴作乱的家伙却不吸取教训，奸诈犯法的人却不止息，有关五种人伦纲常的教化仍然受阻塞，像古代天子所拥有的七位谏臣还没来到朝廷上。乡村里巷废弃了尊重年长者的礼仪，黎民百姓没有绝不离开故土的心思。国家税收一天比一天减少，而民户越来越贫困。监管督察一天比一天强化，而为官之道却越来越胆大妄为，想来这是因为皇帝我不圣明吧？时势不允许吧？为什么古今事体完全相同可得失的实效却这样地不同呢？想要彻底铲除以前的弊病，创立新的规章制度，施布到政事上容易遵从，考求到经典上确有依据。请你们完整地陈述那根本方面与细小方面，准备全面推行它们，不要怕麻烦而在逐条对答上写得很简略。

近来阴气阳气打乱了正常的节气，反常的天象接连降现，好几年

都发生旱灾蝗灾，粮食不丰收。皇天给人间带来灾祸，必定是有缘由的。多次降示凶殃灾异，其中的罪责究竟在谁那里呢？解释经典的书籍上说，时气得不到调理，上天的责罚就表现为持久高温。又说唐尧遇到的水灾和商汤碰上的旱灾，属于历数中所注定的。这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应该依从哪一种呢？如今百姓没有粮食积蓄，国家没有仓库储备，皇帝我多次召见公卿大臣，询访具体的解决办法。至于裁减宫中白吃饭的那群人，停办并不紧要的事务，既然听到了这类良好的建议，也已经遵从并实施了，可停罢废除以后，需要支出的费用仍然很多。打算命令长江一带把物资辗转运送到京师来，就远得按期运不到；准备在关中地区征收粮食，就搅扰一场又收不上来。压缩军饷数目，立功的将帅就心怀怨恨；裁减官员名额，众多的读书人就没有着落。内心对此一片渺茫，不知道渡过难关的对策。你们这些士大夫蕴藏着才干，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切合皇帝我的虚心搜求，整整齐齐地坐在了殿廷的考试席位上。要匡正皇帝我的孤陋寡闻和识见昏暗，拯救当前的祸难灾殃，亮出心里所想的一切，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

穆质　对直言极谏策

穆质(？～约810)　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兄弟凡四人，皆以严守家法、为人和粹赢得世誉。其为次子，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对策第二。自补阙擢至给事中，凡时政得失，未曾不先论列谏诤。宪宗元和初，盐铁、转运各部门大多擅自便抓捕民户，滥施酷刑，以至惨死。穆质奏请与州县官吏联合审讯，此后使人不再蒙冤。又率同列伏阁谏阻以宦官为将帅，遂被改任太子左庶子。五年(810)又出为开州刺史，不久即谢世。

对：臣闻帝王之理殊涂，而谏诤之道一致；五谏之要同归，而直谏之用为急。今朝廷之不闻直声久矣。伏惟陛下，采唐尧师锡之义，降禹汤罪己之词，详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已来，忧劳思理，未有如

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为尧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与天比崇，欲陛下之名与天无极，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当退从作者七人之八耳，孰为来哉？

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无为，以临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劳而事成，星辰轨道，风雨时若。邈乎其不可继，何施而臻此欤？三代以来，制作滋广，异文质之变，明利害之乡；威之以刑，导之以礼，教其俗而弥薄，防其人而益偷。岂浇淳必系于时耶，将圣贤间生而莫之振也？臣闻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无为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浸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礼义，故有法度之制，质文之变。高其堤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既异，劳逸自殊。则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优劣，非时有浇淳。继三代者，其隆杀可知矣。

制策曰：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厉，如恐坠失，忧济庶务，夕惕晨兴。臣闻舜禹日兢，汤武日业，皆前代帝王之所以为理，忧勤之至也。窃闻陛下，忧劳大道，勤绩庶务，无大无小，必躬必亲，靡不关心，靡不经手。勤亦至矣，忧亦至矣。然神太用则竭，形太劳则弊。古人云：人生处代，如白驹过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则罪己，二则罪己。若然者，复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

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谟，是宪是则。师大禹以崇俭，法高宗以求贤，兴夏启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举直言，养高年，敦本业，均平徭赋，黜陟幽明。励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乱不惩，奸犯不息，五教犹郁，七臣未臻。乡党废尚齿之仪，蒸黎无安土之志。赋入日减而私室愈贫，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滥。意者朕不明欤，势不可欤？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思欲划革前弊，创立新规，施之于事而易从，考之于文而有据。备陈本末，将举而行。臣闻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谟，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师古为理也，欲何为乎？为皇乎，为帝乎，为王乎？驱天下之人欲令归忠耶，归敬耶，归文耶？

汉文帝以清净为宗，近称刑措；汉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谓中兴。

自古以来,未有不举纲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闻之矣。是宪是则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趋也。臣闻大禹称三王首者,以其卑宫室,菲饮食,裕人克己,俭之至也。其道湮没,不嗣久矣。惟陛下独能师而行之,苟纶言之可复,则天下之可化。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者也。

臣闻自古求贤,各以类至。三皇师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取其师之礼,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礼,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礼,以皮币先焉。陛下欲为皇,则行事师之礼;欲为帝,则行取友之礼;欲为王,则行取大臣之礼。自昔哲王,则有感梦而行,傅岩惟肖;则有协卜而出,渭滨亲载。则有卑辞以厚礼,汤命五返于处士;则有可就不可屈,备独三顾于草庐。此皆陛下备闻之矣。

臣窃见国家取贤之道,其礼部、吏部,失之远矣,则制策之举最为高科,以臣言之,不得无弊。且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藏。无聘问之先,有投刺自媒者;无软轮之礼,有蹑屩而来者。支离于京阙,会计于有司。又广张节文,妄设条格,禁御约束,邻诸盗贼,防贤之意,甚于防奸。崎岖困辱,旷日永久,然则一睹天颜,一承圣问。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辈琐琐者耳。强名曰贤,贤者固如是耶?厚颜包羞,臣窃自笑。则高宗求贤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国家最弊之务,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

陛下文可经天地,武可定祸乱。我武载张,则河壖亡命之寇,既已指朝自灭;我文载修,则淮濒逋逃之丑,可以不日自来。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启、周发,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实也;举直言,而直言未得上达,举之不得其人也。养高年则废礼已久,未有闻焉;敦本业则失农者多,鲜有劝者。平均徭税而怨嗟日生,奸赃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恶同贯,考课之法未精也。陛下师崇俭之遗训,则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谟必用,则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则暴乱惩,奸犯息,然后礼义可洽,五教自宣矣。七臣者,岂非《孝经》所谓天子有争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谏为名者,左右前后拾遗、补阙,其数甚众,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叹,其过将有所归矣。

以陛下养高年之礼著于上，则乡党不废尚齿之仪；均徭役之法行于吏，则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则乐业，乐业则务本，务本则兴农，兴农则家给，家给则赋不减而人不贫矣。吏道愈淫者，吏不精也。臣窃见吏部课最者遗其实，以资历为优；试材者失其本，以书判为上。加以检验滋章，简牍繁揉，瞒眊淹滞，吏缘为奸。事壅于上，权移于下，胥役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财贿公行，不殊市道，量职求直，价若平准。古则为官择人，今则为财择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经之目，试文之科，不同归于吏部选之至于此。虽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划革前弊，明诏固当疾行；创立新规，微臣以为不可。且烈祖之宪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辎如毛，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后成功？因人之欲，顺天之时则易从；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则有据。

制策曰：自顷阴阳舛候，祲沴荐兴，仍岁旱蝗，稼穑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屡为凶灾，其咎安在？《传》曰时之不义，厥罚恒旸。又曰尧汤水旱，数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谁云从？今人靡盖藏，国无廪积，朕屡延卿士，询访谋猷。至乃减冗食之徒，罢不急之务，既闻嘉话，亦已遂行，而停废之余，所费犹广。欲转输于江徼，则远不及期；将搜粟于关中，则扰而无获。节军食则功臣怀怨，省吏员则多士靡归。中心浩然，罔知攸济。臣闻旱蝗者，稽诸《洪范》，为言不乂之罚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为木所伤。木，东方少阳。古云阳腾，所以为旱。阳既亢极，气又嚣蒸，则介虫为孽，螽斯为害。臣见比年旱魃为害，已甚矣，则《洪范》之征亦明矣。无乃陛下诏令不信乎？抑又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义，贪于残戮，人用愁苦，怨气积下，以伤阴阳之和也。则国家兵先于河北，旱蝗适之。次及河南，旱亦随后。次关中，关中又蝗旱。旱既仍岁，蝗亦比年，无乃陛下用兵者不详其道也？

臣谨稽古典，参于历代，禳除异术，祈祷多门。至若贬食省用，稼穑圭璧，求邪于幻术，觊福于释流，土龙矫首于通衢，群巫分袖而鼓舞，此又从人之欲也。至若两汉旧仪，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此又一时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灾之道，则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隐，精达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祷，蝗且出境，旱不为

灾。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为天子，德为圣人，神动而天从，气使而时变，至诚所感，何往不通？

臣伏见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损常膳而不御，议狱缓死，掩骼埋胔。诏文始书，害气将究；诏书始下，和气自生。故不旬朝之间，凶渠歼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氛灾自销。天之监人也，明矣速矣。然则陛下之德有以动天，天且不违，况于鬼神乎！

若尧汤之灾，阴阳之数，此则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传疑。惟《洪范》之征信也，谨而言之，陛下鉴之可也。臣闻尧之水，汤之旱，而国无损瘠者，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国家或时不雨，一岁不登，尧汤比之悬矣。人至困竭，国为空虚者，备之不早。顷所以赋敛无极，怨讟日盈，权须诡求，朝令夕具，岂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劳师既还，关辅生人才息，不急军食，不烦军须，则搜粟关中，重扰未可，转输汇徼，虽远可期。关兵食以廪储，虽节食犹虑费用者多，则功臣何因而怀怨？择贤才以实官，虽省员犹虑旷职者众，则多士何忧而靡归？

臣闻方内之理乱，由君上之所执。上有所执，则下有所守。臣窃观国理，似或不然。无可久之图，无常备之制，用无本末，举无条纲，任运而行，应急而化。若虚舟之触，用济江河；如乱丝之棼，望成纶纻。所以遇运则福至，遇厄则祸生，遇岁恶则劳，遇岁丰则逸。坐迎天命，不关人谋。圣心浩然，罔知攸济者，乃彝伦不叙之故。

制策曰：子大夫蕴蓄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时之难灾，毕志直书，无有所隐。此乃陛下厚礼众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当之？若臣者生为唐人，马牛之齿甫以壮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贱矣，与蝼蚁何异！然《诗》、《书》天人之际，皇王经纬之道，《三坟》、《六经》，九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历代兴王所由，既尝经之于心，颇亦备之于学。虽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时政之损益，任贤之得失，刑辟之有轻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闻。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且无因至陛下言之尔。皇天后土，宗庙社稷，实宜知臣之心。每用愤发悁款，隐忧慑臆，激于肝血，藏于骨髓，思有以一陈之久矣。

蒙陛下开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诏执事，旁延郡国，俾有贤良

方正直言极谏之举。臣也幸苟有志，人乃举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锡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于上也。若贤与良，则臣岂敢？惟谏与直，或有可观。言不直，谏不极，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虚听之德也。至如忌讳挟诛，诽谤附律，脯醢淫戮，鼎镬滥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国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复有虞于圣朝耳。是敢竭虑极愚，指陈其切。是耶纳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谓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帝王治国各有各的途径，但鼓励臣僚谏诤的准则却是一致的。古代五种规谏方式的要领在目的上都相同，而对正直规谏的倡导更占第一位。如今朝廷上听不到有那正直规谏的人物已经时间很长了。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择取唐尧当年让众人提建议的义旨，颁降夏禹商汤当年把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的那样的诏书，广泛延揽正直的臣僚，多方面访求还没做好的政事。从近古以来还没有像这样忧惧操劳和思求大治达到极点的君主啊！这还担心什么成不了唐尧虞舜就不罢休呢？这真像是要使陛下的德业同皇天一样高远，真像是要使陛下的英名同皇天一样永无止境，这正属于皇天的意愿啊！也是臣下我的希望啊！否则的话，臣下我就应当跟在孔子所讲的古代七位隐士的后面，站到第八名去了，还前来应试干什么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上古具有道德的君主稳稳坐定，不去人为做干涉，用来统领天下，不设法治理可世人却得到了化导，不终日忙碌可事业却获得了成功。星辰正常运行，风雨准时到来，广远得让后世根本就无法赶得上。究竟采用了什么措施才达到这种地步的呢？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各种人为的规定越来越繁杂，在崇尚文采和崇尚质朴的递变上各不相同，向世人宣明益处和害处的结果会怎样，用刑罚来进行威慑，用礼仪来加以诱导，促进社会风气淳厚可却越来越浇薄，防范世人行为可却越来越奸猾。这难道是社会风气浇薄或淳厚必定与时世联在一起吗？还是圣贤需要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世而别人就压根振作不起来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伏羲等三皇凭借

大道进行教化,黄帝等五帝依靠德业进行教化,所以就强调修养好自身去安定百姓,稳稳坐定而化导好天下。皇天可发过什么话呢?帝王可费过什么力呢?不做人为的干涉就算到头了,使人的情性得到满足也就算完事了。最高的大道既已成为过去,最高的德业逐渐衰落,而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把礼仪正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因而就有了法度的制订和崇尚质朴或崇尚文采的递变。把那防范的措施定得严严的,把那刑罚定得重重的,达不到全面彻底的教化,到最后也可以实现一般的太平局面。上古的君主和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教化的原则与方法既然不同,费劲儿和省力自然也就不一样。由此可知,治理的兴盛或衰颓,全是由道德造成的。效果在于道德有优有劣,并不是时世存在着浇薄或淳厚。在夏商周三代以后递相兴起的王朝,它们加重或减轻的东西,就可以了解到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我朝各位圣帝的大业,并不合格地位居在亿万民众的上面,虔诚恭谨又极力奋勉,总像害怕大业会坠落丧失掉似的,忧惧地想把各种政务处理好,夜间还在警惕着,清晨早早就起身。臣下我听说虞舜和夏禹每天都警戒谨慎,商汤和周武王每天都忧惧不安,这全是古代帝王用来实现治理而忧虑并勤勉到极点啊!私下听说陛下在治国大道上忧思又操劳,对各种政务都要辛勤地搞出成绩来,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必定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没有一样不关心的,也没有一样不经手的。勤勉也真是到了顶点了,忧虑也真是到了极限了。然而精神气用得太过度就会枯竭,身体太劳累就会没力气。古人早就讲过:人活着而处在世上,就像太阳光在缝隙间一闪而过罢了。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苦又这样仓促呢!再者陛下一来就将罪过都归在自家身上,二来还是将罪过都归在自家身上。像这样的话,还用宰相干什么呢?还用各个朝廷部门干什么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永远想去取法效仿古代圣明帝王的治国原则与谋略。把大禹作为榜样来崇尚节俭,把殷高宗作为典范来求取贤才,兴起夏启当年对有扈氏那样的征讨行动,振扬周文王当年对崇国那样的翦伐壮举。表彰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的典型,举用直言劝

谏的人，养护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促使人们致力农耕，均匀地分派赋税徭役，提升政绩突出的官员，罢免平庸低劣的官员。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可以说勤奋到极点了。然而浮华奢靡的风气却革除不掉，治理和教化却推行不开，凶暴作乱的家伙却不吸取教训，奸诈犯法的人却不止息，有关五种人伦纲常的教化仍然受阻塞，像古代天子所拥有的七位谏臣还没来到朝廷上。乡村里巷废弃了尊重年长者的礼仪，黎民百姓没有绝不离开故土的心思。国家税收一天比一天减少，而民户越来越贫困。监管督察一天比一天强化，而为官之道却越来越胆大妄为。想来这是因为皇帝我不圣明吧？时势不允许吧？为什么古今事体完全相同可得失的实效却这样地不同呢？想要彻底铲除以前的弊病，创立新的规章制度，施布到政事上容易遵从，考求到经典上确有依据。请你们完整地陈述那根本方面与细小方面，准备全面推行它们。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什么事情不取法古代的做法却能世世代代统治下去，这可不是当年傅说所听说过的东西。陛下只管追踪古代帝王的治国原则与谋略，这正属于考察古代的做法啊！然而陛下效法古代进行治理，究竟打算实现什么目标呢？是要成为皇呢？或是成为帝呢？还是成为王呢？驱使天下的民众，是想叫他们归入忠厚呢？或是归入虔敬呢？还是归入文采呢？

汉文帝把清静无为作为主导方针，治绩和周成王与周康王的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相接近。汉宣帝用刑罚督察来约束臣下，也像周宣王那样称得上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自古以来，就没有大纲不张布而细目却端正的，源头未澄清而支流却清澈的。这也是陛下听得烂熟的道理了。对古代治国原则与谋略加以取法效仿，还应进一步申明它们，使身在下面的人有所归从。臣下我听说大禹在夏商周三代帝王中号称第一，原因在于他把宫室修得很低矮，在饮食上很简单，使世人富裕而克制自己，节俭到极点了呀！他那种做法泯灭下去，没人能继承，已经时间很长了。唯独陛下偏偏能去效仿并践行它。如果天子讲的话确能经得起检验，天下就可以教化好了。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照着去做；自身不端正，即使下命令，人们也不会照着去做。

臣下我听说自古以来求取贤才，贤才分别按照天子所采取的方式类别而来到。伏羲氏等三皇像对待师长那样来对待本朝的大臣，黄帝等五帝像对待朋友那样来对待本朝的大臣，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像对待助手那样来对待本朝的大臣。择用像对待师长那样来对待的礼节，就走下皇位来敬拜；择用像对待朋友那样来对待的礼节，就自身先做出榜样来；择用看重辅臣的礼节，就事先献上表示聘请的礼物。陛下想成为皇，那就行用事奉师长的礼节；想成为帝，那就行用择取朋友的礼节；想成为王，那就行用择取辅臣的礼节。自古圣明的帝王，就有像殷高宗那样在梦中梦到贤臣，醒来后便去搜索，结果在傅岩这个地方找到了和梦中最相像的傅说；就有像周文王那样占卜到吉兆而出游，在渭水岸边亲自请姜尚坐上车返归朝廷。就有言辞谦卑又聘礼厚重的做法，像商汤那样往返五次对隐居的伊尹进行迎聘。就有只能使对方自愿归就而决不可以胁迫的做法，像刘备那样三次到茅草屋去请诸葛亮出山。这一切，都是陛下详尽听说过的事情了。

臣下我私下观察国家求取贤才的办法，在礼部和吏部那里做得太差了。既然如此，由天子亲自进行策问的这一举用方式，够得上最高级别的科目了，但从臣下我这里说起来，认为它不可能没有那弊端。况且陛下表示征召的信物并不出示，表示延聘的礼物深深收藏起来。既然没有那聘请问讯的先导，就有递上个人简介而自己推销自己的人了；既然没有那派出专车迎请的礼节，就有穿着草鞋主动来到的人了。他们被七零八落地安排在京师的考场座位上，由主管部门统一进行判卷定等排名次。又多方面宣布制度规定，随意设立各种纪律条款，禁锢驾驭和约束就好像旁边都是些盗贼，防范贤才的意向比防范奸恶歹徒还厉害。应试者跋山涉水，一路艰难困苦，耽误了很长的时间，然而也只是看到了一次天子的尊颜，承奉到一次圣上的策问。臣下我恐怕辅佐圣皇明王的英才不能够由此就获取到啊！如今获取到的，正是些当个一般臣僚而干些细小事情的人罢了。硬把他们称为贤才，贤才原本上就像这个样吗？厚着脸皮占据那并不胜任的官位，臣下我私下对他们感到太可笑了。殷高宗当年求取贤才的

意旨,似乎不是这样的。这正是国家弊病最严重的政事,跪拜希望陛下对此格外注意,谨慎再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

陛下在文治上可以筹划天地,在武功上可以平定祸乱。我那武力一张布,黄河角落里乱窜奔逃的贼寇,就已经在一个早晨便自动覆灭了。我那文德一修明,淮水岸边逃债流窜的刁民,就可以不到一天便自动回来了。道德位居古今之上,功德遍及天上地下,夏后帝启和周武王姬发,竟哪里值得一提呢?陛下表彰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的典型,可这些典型却未能感化周围的人,这是由于表彰并没抓准那典型啊!举用直言劝谏的人,可正直的言论并没传到上面去,这是由于举用并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养护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已经把这种礼仪废弃很长时间了,下面还没听说有过这种事呢!促使人们致力农耕,可离开农耕的人数量很多,但很少有人去激励督劝。均匀地分派赋税徭役,可怨恨嗟叹却一天天冒出来,这是因为贪赃枉法的奸巧官吏还没被免职啊!提升政绩突出的官员,罢免平庸低劣的官员,但仍好坏搅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考核督察的制度还不精详啊!陛下遵用崇尚节俭的古代训条,还担心浮华奢靡的风气有什么革除不掉的呢?对古代帝王的治国原则与谋略必定行用,还担心治理和教化有什么推行不开的呢?教化推行开,凶暴作乱的家伙就吸取教训了,奸恶犯法的人就止息了。然后礼仪正义可以深入人心,有关人伦纲常的五种教化自然就宣明了。所谓七位臣子,难道还不是《孝经》中所讲的天子拥有七位谏臣吗?如今朝廷设置百官,安排职位,就有专把规谏作为名称的,左右前后等拾遗官、补阙官,员额相当多,不止七个人。致使陛下产生七位谏臣还没来到的慨叹,罪责也就有那该归属的对象了。

把陛下养护德高望重老年人的礼节在上面鲜明地显示出来,民间也就不会废弃那尊重年长者的礼仪了。平均分派赋税徭役的规定在地方官吏那里切实予以施行,黎民百姓也就有那绝不离开故土的心思了。绝不离开故土,就会对家业感到快乐;对家业感到快乐,就会致力根本;致力根本,就会振兴起农业生产;振兴起农业生产,就会家家都很富足;家家都很富足,就会国家赋税不减少而世人也不贫困

了。至于为官之道越来越胆大妄为，这是因为对官吏的选任不精详啊！臣下我私下看到吏部考核官员的政绩高低，根本不看实际作为，只把资历长作为优等。测试才能又丢掉根本的方面，只把案件审判词写得好作为高才。再加上检查验核越来越烦琐，各种公文繁多杂糅，老眼昏花的官员按时交不上，下面的属吏由此而从中舞弊。政事在上面被阻塞住，权力转到了下面人的手中，办事打杂的这类品级最低的人，得以在官府说了算。因而钱财贿赂公开进行，和集市上做交易毫无差别，根据职务开出价码，价码与买卖物品一模一样。古代是为官职择取人选，如今是为钱财来择取官员，直接同古代对着干，危害当今，弊病竟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又有通晓经典的科目和测试文章的科目，不把它们一并交给吏部来选取，竟分离到这种程度。虽然监管督察一天比一天强化，但压根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如果真是彻底铲除以前的弊端，明确下达的诏令就固然应当火速执行；创立新的规章制度，卑贱的臣下我认为不该这样做。况且我朝祖宗的规章制度并未更改，古代帝王的法度十分鲜明，仁德教化施行起来并不困难，只在于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改动，然后才求得成功呢？依从世人的愿望，顺应皇天的时运，也就容易遵从；行用古代的治国大道，获取到治理的恰切做法，也就确有根据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近来阴气阳气打乱了正常的节气，反常的天象接连降现，好几年都发生旱灾蝗灾，粮食不丰收。皇天给人间带来灾祸，必定是有缘由才会这样的。多次降示凶殃灾异，其中的罪责究竟在谁那里呢？解释经典的书籍上说，时气得不到调理，上天的责罚就表现为持久高温。又说唐尧遇到的水灾和商汤碰上的旱灾，属于历数中所注定的。这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应该依从其中的哪一种呢？如今百姓没有粮食积蓄，国家没有仓库储备，皇帝我多次召见公卿大臣，询访具体的解决办法。至于裁减宫中白吃饭的那群人，停办并不紧要的事务，既然听到了这类良好的建议，也已经遵从并实施了，可停罢废除以后，需要支出的费用仍然很多。打算命令长江一带把物资辗转运送到京师来，就远得按期运不到；准备在关中地区征收粮食，就搅扰一场又收不上来。压缩军饷数目，立功的将帅就心怀怨

恨；裁减官员名额，众多的读书人就没有着落。内心对此一片渺茫，不知道渡过难关的对策。对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旱灾蝗灾从《尚书·洪范》来做验核，属于对言语不符合道理而没实现天下大治所做的惩罚。言语不符合道理而没实现大治，再发号施令，人们也不信从啊！言语归属于西方金行，金行失去了它的性能，就会被木行所伤害。木行属于东方不太旺盛的阳气的聚合物，古人说阳气升腾就形成干旱，阳气已经达到了最旺盛的状态，气流又四处散布，长有甲壳的虫类就构成妖孽，蝗虫就形成灾害。臣下我看到旱魔连年形成灾害，已经特严重了，《尚书·洪范》列举的坏征兆也就确切无疑了。这恐怕是表明陛下的诏令说了不算吧？臣下我又听说，大兵过后，必定会出现凶荒年。这是由于那些掌握着军队的人不按仁德道义去行事，贪求残杀，世人由此而愁苦，怨气在下面积聚，损坏了阴气和阳气的和谐状态啊！既然如此，国家先在河北用兵，旱灾蝗灾就跟随到那里；接下来又转移到河南，旱灾也随后在那里出现。又转移到关中，关中又发生蝗灾旱灾。旱灾既已连年不断，蝗灾也连年不断，这恐怕是表明陛下在用兵上并不特别了解那具体方式吧？

臣下我恭谨地考察古代的经典，参酌各个朝代，发现解除天灾的方法并不一样，祈祷也有多种形式。至于君主降低饮食标准，节省费用，把粮食看成是珠玉宝物，从奇幻的法术那里捉到邪物，从和尚念经那里祈求到福佑，在四通八达的大路正中用土制成长龙让它昂起头来求雨，叫各类巫师跳舞唱歌来请神，这都属于顺从人们的愿望啊！至于西汉和东汉的旧有制度规定，遇到灾殃三公就应当免职；西汉的卜式提出动议，认为设法征税的桑弘羊应当下油锅炸死。这又是一时间的事体啊！然而全都不是解救旱灾的根本对策。消除旱灾的办法，有那只在一郡或一县，一名郡守或一名县令，多方面体恤民众的疾苦，精诚感通，神思明彻，有的用自己的性命去禳除，有的用诚心去祷告，蝗虫眼看着就从本辖境内飞走了，干旱也不构成灾害。像郡守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有的还能达到这种效果，何况陛下尊贵是那天子，仁德是那圣人，神思跃动而皇天就依从，心气运作而气候就改变，极度虔诚所感召的对象，投注到哪里而不融通呢？

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在去年八月二日所颁降的仁德诏书，退出正殿而不居住，降低日常饮食的标准而不享用，议定案件，减缓死罪，掩埋荒野的白骨和尸体。诏书文字刚一下笔写，凶害气眼看就散净了；诏书刚一下达，和谐气自动就产生了。所以在不到十天半月以内，叛乱的藩镇头目就被歼灭斩杀，兵器就收藏来不再使用，甘甜的雨水接连降下，妖氛和灾祸自动就消失了。皇天根据人的举动作出反应，真是太明显又太迅速了。既然如此，那么陛下的仁德确有办法感动皇天，皇天尚且不予违逆，何况在鬼神那里呢!

像唐尧和商汤遇到的那类灾害，属于阴阳运行的定数，这是前代儒士的说法，也显得太简单了，臣下我不敢传播这类没有定论的东西。只有《尚书·洪范》确实征引可信，谨慎地来谈谈它，陛下把它作为鉴戒也就解决问题了。臣下我听说唐尧遇到了九年大水灾，商汤碰上了七年大旱灾，但国家却没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是因为积蓄多而防备早就做好了呀! 如今国家偶或赶上老天不降雨，有一年不丰收，同唐尧商汤那时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世人陷入困绝的境地，国家为此而库存精光，是由不及早做防备而造成的呀! 前不久之所以征收赋税没有止境，怨恨日益强烈，权位需要依靠奸诈手段谋取到，早晨下达的命令到晚上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难道还不是因为军队的粮饷供应吗? 现今对蒲州、同州一带动用的军队既已凯旋，关中和三辅地区的民众刚刚得到安生，军队的粮饷供应已不紧急，军队的需用品已不频繁，再在关中地区征收粮食，重新扰民，这是不能做的。从长江一带把物资辗转运送到京师来，尽管路途遥远，也是可以运到的。堵住军队的粮饷供应来加强仓库储备，即便压缩军饷可仍担心宫廷的支出项目太多，立功的将帅会因为什么而心怀怨恨呢?选择贤才来充实百官，即便裁减员额可仍担心荒废职守的人太多，众多的读书人会忧愁什么而没有着落呢?

臣下我听说人间的大治与败乱，取决于君主所抱定的准则。上面确有抱定的准则，下面就有遵守的对象。臣下我私下观察国家目前的治理，似乎还不是这个样。没有能使国运长久的规划，没有经常保持戒备的制度，采用什么却没有来龙去脉，推行什么却没有条理纲

要，一切随从时运来办理，为应付紧急情况做变动。就像没人驾驶的船只到处瞎碰，却要渡过大江大河去。就像乱成一团的蚕丝乱加梳理，却想让它成为平整的绢帛。所以遇到好时运，福庆就来到了；一遇到厄运，祸难就发生了；遇到荒歉的年景，就忙得要命；遇到丰收的年景，就安逸得很。干干坐在那里迎候皇天的处置，.根本不考虑人为的谋略。圣上内心感到一片渺茫，不知道渡过难关的对策，这是常理大法没理顺的缘故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你们这些士大夫蕴藏着才干，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切合皇帝我的虚心搜求，整整齐齐地坐在了殿廷的考试席位上。要匡正皇帝我的孤陋寡闻和识见昏暗，拯救当前的祸难灾殃，亮出心里所想的一切，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这番话正是陛下优厚地礼遇众位君子的心声啊!臣下我太渺小了，怎能足以够得上呢?像臣下我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是大唐的臣民，年龄也刚刚步入壮年了。执守的大道得不到施展，自身也得不到任用，真是既浅陋又卑贱了，与那蛄蝼和蚂蚁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诗经》、《尚书》中所讲论的皇天与人间的关系，帝王筹措国政的做法，三皇的《三坟》和儒家的《六经》，各个学派与学说，前代帝王沿承与变革的要点，各个朝代兴起并统领天下的途径，既已在心中对它们做过研求，也在学问上相当备列了。虽然还没彻底闹清楚，但可以大略上讲一番。至于当前朝政的减损与增益，任用贤才的得与失，刑罚有轻或有重，民众对有的事情感到很有利或对有的地方感到挺遭罪，臣下我又都听到一些不见得就确切的东西。身离殿廷太远又太孤单，没办法站到前列去，而且也没机缘来到陛下面前奏报它们啊!皇天后土和宗庙社稷，实际上应当知道臣下我的心愿。常常因为激愤地涌发出一片忠诚，深深的忧虑在那诚挚的胸臆中萦旋，在肝血中激荡，在骨髓里深藏，渴望有机会痛快地陈述一番，已经时间很长了呀!

承蒙陛下开示那如天似地的大德，降下雷雨般的恩施，严切地命令主管部门的官员，广泛地从各个州郡进行延揽，让它们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人选推荐。臣下我万幸怀有一点儿志向，于是

当地官员便予以荐举了，这也是上天向盛明的大唐降赐福佑，使陛下赐给臣下我这样一个方便的机会，得以有那途径对上面求索的言论做出对答啊！至于贤能与忠良，臣下我哪敢承当得起呢？只有规谏和正直，或许还有可以看上一看倒像样的。言论不正直，规谏到不了极点，这正是渺小的臣下我并不忠诚的罪过啊！纯属使陛下虚心听取的仁德变单薄啊！至于忌讳听哪些东西，由此便怀揣诛杀的念头，谁有诽谤的话语就附会刑律来处治，使用剁成肉酱、制成肉干那类惨忍的杀戮手段，施行下油锅活活炸死的那类严酷的刑罚，这都是昏庸国主和残暴君王使国家灭亡的东西啊！也是陛下明晰了解的事情，所以臣下我不再对圣明的朝代还有什么忧虑了。由此就敢竭尽思虑，献出一切愚昧的看法来，指陈那切要的问题。对呢，就请采纳并施行；错呢，就请加以容忍并宽恕。正像人们所说的：发表意见的人决没有罪过，听取的人足以引为鉴戒啊！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辛未科

进士试题

珠还合浦赋　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

青云干吕诗

尹枢　珠还合浦赋

尹枢(生卒年不详)　阆州(今四川阆中)人。贞元七年(791)进士第一,时已七十余岁。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骊龙之珠,无胫而至,骇浪浮彩,长川再媚。回夜光之错落,反明月之瑰异。非经汉女之怀,宁泣鲛人之泪。状征既往,莫究奚自,偶良吏兮斯来,遇贪夫兮则罔。想夫旋返之仪,圆明可期,辉如电转,粲若星驰,光浦溆,窜蛟螭,映沙砾,晃涟漪。在暗而投,诚则悲路人未鉴;沉泉而隐,亦常表帝者无为。欣出处兮据德,幸浮沉兮中规。是以特表殊姿,潜怀有道,中含逸彩,上系玄造。丑当时之鬻鬻,应为政之美好,真列郡之尤祥,实重泉之至宝。于是焕清濑,辉浅湾,奔璀璨,走斓斑。岂能与石前却,随流往还,泛连波之下,盈一水之间而已哉?兹川兮始明,老蚌兮勿剖。瓠颜兮罢笑,琼瑰兮莫偶。抱圆质而胥就,扬众彩而未久,方载沉而载浮,且曷浣而曷不!玉非宝,泉戒贪,实为国之司南;诚感神,德繄物,在为政之不咈。愚是以颂其宝而悯其人,美斯政而感斯珍。想沿洄于旧渚,念涵泳于通津,则知美政不远,嘉猷入神。故中潜皎晶,下沉渝沦,转则无颡,磨而不磷。诚丹泉之莫拟,谅赤水之非珍。苟或疑此为虚诞,愿征之于水滨。

从黑龙颔下生出的宝珠,没经过什么东西携带就自动来到了,使波浪感到惊骇,闪耀出奇特的光彩,长长的河流更加清澈可爱。重新

显示出夜光珠那样的缤纷色泽，再度呈露出明月珠那样的瑰丽奇异。并没经过采珠汉女的怀抱，又哪里是人鱼哭泣、泪下成珠那样变来的呢？形状和证象既如上述，可谁也探究不出它到底出自何处。碰上了贤良的官吏，它就来到了；遇上了贪婪的官吏，它就藏起来了。想那官吏让它立即返回的模范行为，做到了全面又突出的地步，才有希望实现。它光辉闪耀就像滚动的雷电，灿烂夺目就像飞驰的流星，照得水边一片通明，吓走了蛟龙，映出了沙砾，使水中波纹光闪闪。在暗处做了投奔，确实对自身被来往行人鉴别不出来感到悲哀。沉入泉底隐蔽起来，也常常是昭示帝王应该清静无为。执持那道德，无论出世还是遁世都觉得很欢乐；符合那准则，无论浮起还是沉下都感到很幸运。因此特地显现出卓异的风姿，暗中怀藏着具有道德，内部蕴含着神彩，往上连结着天意。把当时贪得无厌的赃官视为丑恶的家伙，对施政美好的清官做出回应，真属于各个州郡里尤为突出的祥瑞，实在是深渊中最贵重的宝物。于是使清澈的沙石滩显出光彩，使浅水湾闪出光辉，璀璨得连成一片，斑斓得串成一线。哪里能够和石块共同向前或后退，随顺水流前往或回还？浮泛在一道又一道的水波下面，局限在一块水域之间就算完事了呢？这条河流刚刚闪光啊，对存活很久的河蚌可不要剖开。是砖块就赶快停止住你的讥笑，是宝玉也不要上来攀比。抱持圆形的形质来归就，显扬各种光彩却不能长久，正在或者沉下去，或者浮上来，而且洗涤什么又不洗涤什么呢？宝玉并不属于国家的宝物，是泉眼要警戒用贪泉作泉名，这才实际上是治国的指南针。精诚就会感动神灵，仁德才能抵作祭品，这全在于施政不违背众人的意愿。因此我颂扬那真正的宝物又忘情那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赞美这样的朝政又感念这样的珍宝。遥想它在原来的岸边上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念及它在通往各处的渡口内潜游，于是便知道美好的朝政近在眼前，精妙的筹划打动了神灵。所以内部潜藏着皎洁晶莹的东西，下沉到深广的水中，转动它也不会出现斑点，磨它也磨不薄。确实是饮后让人不再死亡的丹泉也比不上它，果真是赤水的玄珠也不如它珍贵。如果有人怀疑我这种说法纯属虚妄荒诞，那就请到水边去验证一下吧！〔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科

进士试题

明水赋　以"玄化无宰,至精感通"为韵

御沟新柳诗

贾棱　明水赋

贾棱(生卒年不详)　祖籍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贞元八年(792)进士第一,后官至大理评事。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祭祀上洁,精诚克宣,伊明水之为用,谅至诚以为先。积阴以成符,嘉应于冥数。以鉴而取感,无私于上玄;将假以表敬,式彰乎告虔。皎皎泛月,瀼瀼降天,既禀气在阴,亦成形于夜。有无虽系于恍惚,融结宁随于冬夏。明者诚也,我则暗然而彰;水惟信焉,吾非倏尔而化。徒观其清霄雾敛,朗月轮孤,鉴清荧而类镜,水滴沥而疑珠,混金波而共洁,迷玉露而全无。感而遂通,配阳燧之为火;融而不涸,异寒冰之在壶。彼既无情,此何有待?始同方而合体,宁望远而功倍!故能佐因心于霜露,均润下于江海。有形有实,徒加以强名;无臭无声,孰知其真宰。是以昭其俭,洁其意,含水月之淳粹,修粢盛于丰备。作玄酒而礼崇,登清庙之诚贵;嗤潢污之野荐,陋甘醴之莫致。祀事孔明,其仪既精,无眹而有,不为而成。二气相临,本自蟾蜍之魄;三危莫比,殊非沆瀣之英。至道自玄而兆,醴泉因地而生。原夫月丽于天,水习乎坎。物有时而出,故方诸而夜呈;事有眹而因,故阴灵而下感。大满若冲,其来不穷,风尘莫染其真质,天地不隔其幽通。况国家崇仪礼祀,荐敬旻穹,方欲行古道,稽淳风。客有赋明水之事,敢闻之于冈宫。

祭祀最注重圣洁，那片精诚由此得到表达。献呈在月下用铜镜承接到的净水，确实该把极其精诚放在第一位。积聚阴气的精华，形成那符象，美好的结果就在既定的气数中做出回应。专用铜镜来获取到感应，对上天并没有任何个人的祈求。准备借助它来表示恭敬，彰明那表达虔诚的初衷。铜镜洁净闪光，泛动那明月，露水浓密地从天上降落下来，已经在阴物那里禀受到气体，又在夜间构成那形态。万物的形态和宇宙的本原虽然维系在大道上，可融化与凝结又哪里随从那冬季和夏季呢?所谓“明水”的“明”，意思是说精诚，而我便默默地彰明它；“明水”的“水”，只是特别信实，而我并不是转瞬间就化解它。只去观看那清净的苍天把云雾收敛起来，明朗的月亮就圆圆地悬挂在空中，承接明水的器具清莹闪光，像是镜面，明水在一滴又一滴地洒落，让人怀疑是明珠，和那闪烁的月光混合在一起，共同显现出光洁，同那清净的露水分不清，可又完全看不到。彼此交感，于是就相互沟通，与用火镜从日光取火构成盛阳火气相配合；融合但不凝固，与在玉壶中的寒冰又迥然不同。那方面既然没有任何私意，这里又有什么要期待等到的呢?从一开始就目标相同又合为一体，哪里还用去眺望远方，希求取得双倍的功效呢?因而能够对心念投注在霜露上加以辅助，使水全都向下流入江海。一方面具有形状又有实物，只是硬行给它加上一个“明水”的称谓；另方面又没有气味，没有声音，有谁知道它是真正的主宰呢?因此表明那节俭，显示那纯洁的心意，包含着水和月亮的纯粹的精华，把祭祀的物品配备得既丰盛又齐全。制成用水代替的酒，礼敬的规格却最高；进献到清静的祖庙上，确实最珍贵。根本看不上那种拿河沟积水粗陋地向鬼神进献的做法，更瞧不起甘甜的美酒却不呈上的举动。祭祀的事体大为盛明，那套礼仪已经非常精妙，显露不出迹象可却全部具备，不进行人为的筹措可却获得成功。水气和阴气彼此降临，原本是来自月宫中蟾蜍的精魄。西部仙山三危山上的三青乌根本比不上，也和那北方午夜形成的水气精液完全不一样。最高的大道从幽深的原始状态显露出来，甘美的泉水通过大地涌生出来。细作推究，这是因为月亮附着在天上，水流依凭

于《坎卦》。物体遇到适当的时机才出现，所以承接明水的方诸这一专用器具就在夜间来献上。事情具有迹象才扩展开来，所以阴气的精灵就往下做出感应。非常满的状态可却像永远不会满，涌来的东西永无止境。风沙尘土玷污不了它那真纯的形质，天地隔绝不了那种幽冥中的感通。况且我们国家重视并加强四季的祭祀活动，特向皇天献上敬奉的心意，正打算行用古代的治国之道，验证那淳厚的民风。宾客中有人专就明水这宗事情写下律赋，敢把它传送到清静的神庙。

贾棱　御沟新柳诗

御苑阳和早，章沟柳色新。
托根偏近日，布叶乍迎春。
秀质方含翠，清阴欲庇人。
轻烟度斜景，多露滴行尘。
袅袅堪离赠，依依独望频。
王孙如可赏，攀折在芳辰。

在皇家花园里，春天的暖气来得早。
在流经宫内章台的河道上，垂杨柳景色一新。
扎下根须，偏偏就在贴近天子的地方。
散布开枝叶，一下子就喜迎那春光。
秀美的形质正饱含着翠绿，
清新的林荫直想遮盖那行人。
轻灵的云烟，飘过了傍晚的阳光。
一串串露珠，滴在了来往车辆掀起的尘土上。
枝条纤长柔美，真可以在离别时拿来赠送。
恋恋不舍，一个劲儿地独自在观望远去的人。
王公子弟如果觉得可以观赏，
攀折就在那最为芬芳的时辰。

陈羽　明水赋

陈羽(生卒年不详)　江东(今安徽芜湖、江苏南京长江河段以东地区)人。贞元八年(792)进士第二，时年已40岁。后官至东宫卫佐。其诗以道人所不能道见长。原有集，已失传。

彼美明水，含精自天。孤影流辉，乃凝空作润；万灵来享，故为酒称玄。所以贵新涤虑，殷荐告虔。水本涵清，表至深之心著；明以比德，惟馨香之义全。想夫含气遥空，成形永夜，出阴鉴则凝清自美，对明烛则摇光相借。至诚所感，同就湿而流；大享是资，若待神而化。斯可谓至精无眹，明诚有孚。泛清月而乍融乍结，洗轻烟而若有若无。润而鲜，见湛露之濡金镜；晶兮洁，类清冰之在玉壶。至若高天委秋，皎月分彩，氤氲既合，精粹斯在，方昭德以降神，异趋下而归海。是知严而敬者其德大，洁而祀者其福倍。繄景命之不渝，岂成功之不宰!原夫明水之初化也，天子斋心，司烜藏事。望灵月，露炎燧，皎晶浮光，清泠在器。自无而有，知灵化之不测；应感而来，知神物之斯至。其或崇国祀，设方明，备礼乐，洁粢盛。用陶匏之器，荐茧栗之牲。秩神祇而配坐，望天地之含精。匪明水而神不降，无明水则祀不诚。是以明处作《离》，水居为《坎》，谅明水之潜化，本阴阳之所感。其名也合五行之德，其用也冠三酒之功。泊尔昧淡，凝然色融，至馨无臭，至洁含光，则是水也与灵物幽通。

专门在月下用铜镜承接到的纯美的那种净水，蕴含着精气，从天上降落下来。单独的影象流泻着光辉，正在夜空中凝结，酝酿成水气。所有的神灵都前来享用它，因而当成酒就称为玄酒。目的是看重那清新，去除掉一切忧虑，丰盛地献上祭品，表达那一片虔诚。明水的所谓“水”，原本就蕴含着清彻，借助它显豁地表示出那最为深切的心意。明水的所谓“明”，是用来比拟那仁德，只有

仁德才是最为芬芳的香气这一义旨，完全具备在里面了。想来在那遥远的太空中蕴含着精气，在那长长的夜间凝结成形质，从那特制的承接铜镜中取出来，就凝聚着清光，自行就特别美好，对着那祭祀专用的明烛，就光辉闪耀，相互映照。被那极其精诚所召感，就一起归向湿润而流动。盛大的祭祀依赖它，简直像等待着神明来化导。这真可以称得上是极其精粹就显不出任何的迹象来，明智真诚就被信服。在清朗的月亮中不断泛动，猛可地融解又突然间凝结，洗涤那轻灵的云烟，好像真存在，又像不存在。湿润又鲜亮，只见那浓重的露水在铜镜里浸润；晶莹又光洁，酷似那清冽的寒冰凝结在玉壶中。至于高远的苍天付托在秋季，皎洁的月亮划分出光彩，阴阳二气既已交合，精粹就集中在这里，正昭示那仁德，用来使神灵降现下来，让各条河流各有流向，但都归入大海。由此可知，对祭祀严肃恭敬的人，他的仁德就广大；祭品丰洁的人，他的福庆就倍增。这也是盛大的天命不可更改，哪里会获取成功而不归在自己的头上?仔细推究起来，明水在开始融化的时候，天子通过斋戒来清心，负责火政的司烜做好本职工作，仰望那灵妙的月亮，摆出那从日光取火的火镜，皎洁晶莹，浮泛光辉，清澄凉爽的明水就在器皿中。从那宇宙的本原演化出具体的万物，由此就了解到灵验变化的难以预测；受到感应而来到，由此就清楚神物在这里降临了。有的帝王重视国家举行的祭祀，布置好上下四方的神灵偶象，安排好成套的礼仪和乐舞，备办好精洁的各种祭品。使用陶质或葫芦瓢这类器具，献上幼小牲畜的祭肉。按天神地祇的等级序列来供奉，配合上祖先，拜祭天地蕴含着精气的山川。不是明水，神灵就不降现下来；没有明水，祭祀就不虔诚。所以光明的地方构成《离卦》，水所占据的地方构成《坎卦》。这确实是因明水的暗中化解，来自阴阳的交感。它那名称符合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德性，它那用途在事酒、昔酒、清酒这三酒的功效之上。淡泊而酒味最淡，透明而颜色清纯，最芬芳可却没气味，最纯洁而内含光辉，这恰恰表明这种水与有灵之物在无形中相感通。

陈羽　御沟新柳诗

宛宛如丝柳，含黄一望新。
未成沟上暗，且向日边春。
袅娜方遮水，低迷欲醉人。
托空芳郁郁，逐溜影鳞鳞。
弄色滋宵露，垂枝染夕尘。
夹堤连太液，还似映天津。

纤细得如同丝线的柳条，
满含着嫩黄的芽片，一眼望去景色全新。
还没完全长成时，流经宫苑的河道上已经形成林荫。
眼看着又攀向天子身旁的春光。
枝条纤长柔弱，正遮住那流水。
林荫迷濛，简直要使人沉醉。
托付那晴空，芳香喷吐得异常浓烈。
追随那流水，影像映现得十分鲜明。
抖弄绿色沾满了夜间的露珠，
垂下枝叶染上了傍晚的灰尘。
两边的河堤连接着皇宫的太液池，
转过来酷似映照那天上的银河。

欧阳詹　明水赋

欧阳詹(756前～798后)　字行周，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初以道家炼养为念，事父母至孝，后在福建观察使常兖激励下，改走仕途，入京应试，凡四举不中，至贞元八年(792)始及第，名列第三，时年已近37岁。后任国子监四门助教，曾率生员伏阙，要求朝廷任命韩愈为博士。年四十余去世。其文章以深切明辨见长，对古文运动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有《欧阳詹集》今犹传世。

智之不测，有明水焉。方诸在手，圆月居天。象质遐分，则迢遥而迥远；精华潜合，遂滴沥以流连。可谓妙自斯妙，玄之又玄。兹道也自何而来，彼灵也从何而借？越杳杳之苍昊，滋遥遥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清泠忽下。等阳燧之通感，实柔祇之冏化。岂非月包阴德，蛤乃阴余，英精合契，气类相符，共禀坤而配坎，谅交津以有濡。是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于本无。精洁可嘉，清明斯在，湛玉露以无垢，入牺觞而有待。处罍实爵，观其所自，原夫所致。临庭目击，虽从阴鉴而来；向月心祈，允似上天而至。来莫我系，至莫我精。弃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从仪酌号，遂表性以称明。信可荐宗祐，祈上清。是故祭先展敬，类帝昭诚，首三酒而上献，掩五齐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万姓之惟真。无益下人，鄙玉浆于夜漏；自求其溢，哂珠露于金茎。游原习坎，固有旁感，处陆腾空，不无玄通。龙吟云而致雨，虎啸谷以来风，动无千里之熯，润才百里之功。岂若以握中之琐细，映天上之曈曚，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禄攸同者乎！

明智得无法令人预测，有那专在月下用铜镜承接到的净水。名为方诸的铜镜握执在手中，圆圆的月亮悬挂在天上。表象与实质远远地划分开来，就显得双方距离非常遥远。精华暗暗地聚合，于是就接连不断地往下滴落。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奇妙自行就像这样地奇妙，幽昧深远又幽昧深远了。这种道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类灵验又是从哪里获取到的呢？越过浩渺高远的苍天，在漫长的夜间里滋生，仰望月宫中蟾蜍的精魄而光彩神异地跃动，恭敬地执定蚌蛤形状的铜镜而清澄凉爽的明水就突然降落下来了。这与用火镜从日光取火而与盛阳火气相感通是一样的，实际上属于地神的隐密变化。这难道还不是由以下的原因造成的吗？亦即月亮包纳着阴性事物的仁德，蚌蛤属于阴性事物的一种，精华契合，气类相同，共同禀承着大地，又与《坎卦》所代表的水行相配属，确实是水气交合，才出现了滋润的现

象。这种道理，自然是取自万物必定会构成具体的形态；于是这明水就从那宇宙本原的地方化生出来了。精粹纯洁，令人赞叹；清澄明彻，正在这里。从那露水中再度提炼出来，已经不存在任何污垢；放入祭祀的器具里，正等待被使用。往规格不同的酒器中盛放妥当，如今专归负责供酒的甸人来办理。放在台阶下，献入庙堂上，已经听不到它是真正的主宰物了。观察它的由来，推究它的获取途径，在庭堂上亲眼看去，尽管是从特制的承接铜镜那里取得的，可面对月亮，内心做祈祷，又果真像是从天上降临下来的。取得以后，但不归我掌握；降临以后，证明我最精诚。放弃根本而不仁爱，所以仅留个名称就选用了“水”这个字眼；依据礼仪酌定名号，于是为显示那本性就选用了“明”这个字眼。确实可以进献给宗庙，向皇天做祈祷。因而祭祀首先要表示出各方面的恭敬，临时祭天要显现出精诚。把明水放在事酒、昔酒、清酒这三酒的前面，首先来进献；压盖住泛剂等五种清浊程度不同的用酒，首先来行用。招来所有神灵的盛大福佑，导致天下各地心悦诚服。对天底下的人们没有什么益处，那就鄙视在夜间酿好的美酒；自己去追求流溢出来，对在承露盘中的露珠的这种形态，予以耻笑。在坑中有坑的原野上游动，固然会形成广泛的召感。处于地上又腾向空中，没有对什么不在幽冥中相融通的。苍龙在云气中呻吟，就会招来雨；猛虎在山谷中呼啸，就会招来风。可跃动起来也形成不了千里以内的大旱，滋润起来也只是范围达到百里的功效。这哪里比得上凭借握持住心中该施行的各种礼仪，同天上的迷濛景象相映照，精气的液珠往下融通，神灵和世人加以崇奉，福禄一起来到呢？

欧阳詹　御沟新柳诗

东风韶景至，垂柳御沟新。
媚作千门秀，连为一道春。
柔荑生女指，嫩叶长龙鳞。
舞絮回青岸，轻烟拂绿苹。

王孙初命赏，佳客几伤神。
芳意能相赠，一枝先远人。

东风吹来，美妙的时光降临了。
流经宫苑的河道上，垂杨柳面貌一新。
明媚得使千家万户的门前变得秀美，
连结成一路的春色。
柔软雪白的细芽，就像女子生出那手指来。
嫩绿的枝叶，就像青龙长出那鳞片来。
飘舞的柳絮萦回在青翠的河岸上，
轻盈的云烟拂动着水中的绿苹。
王公子弟首先命人观赏，
才华横溢的宾客几度把精神来感伤。
美好的情意如果能相赠，
有一枝先赠给那远方来的人。〔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甲戌科

进士试题

风过箫赋　以"无为斯化、有感潜应"为韵

范传正　风过箫赋

范传正(生卒年不详)　字西老，顺阳(今河南邓县西)人。贞元十年(794)进士第二，又登博学宏辞及书判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后迁殿中侍御史、比部员外郎。出为歙、湖、苏三州刺史，均有显著政绩，进拜宣歙观察使。但渐好奢侈，以厚财交结权贵，视公蓄如私藏，以此还朝后改任光禄卿。患风痹卒。其人精悍好古，应试所作《风过箫赋》被词人所讽诵。曾著有《西陲要略》三卷。

风为气兮溥畅，箫在物而虚受。何相会于自然，合无情于妙有！泠泠斯韵，习习占久，如闻松盖之颠，宁比土囊之口？飒尔而至，锵然辄随，响才度以俄远，声成文而不亏。其虚其实，是可披襟而纳；以条以畅，何烦鼓腹之吹。彼孔雀下降，凤凰来仪，虽见美于格物，岂不惭于有为？彼箫之韵，惟风所借，或激越于清晓，或凄凉于永夜。寂寞之内，爰生不考之音；希夷之间，是合不言而化。谓越客乍流其遗响，谓秦女遥度其仙驾，散彼寥敻，复于沉潜。被治国之风，以安以乐？在敬心所感，乃直乃廉。动有轻重，应无洪纤。解愠且和，可并鼓琴之唱；不奸而顺，亦其从律之占。若乃察其所感，盖有符于玄漠，岂惟契于闲淡！籁之所之，智之所知，诚万殊之舛错，终一贯而透迤。风从武兮飘忽，箫象风兮参差。何体异之如彼，而音同之若斯？岂不以宫商所合，唱和为称，类霜钟之暗叩，同灰管之潜应！时然后起，风罔躁求，激而乃扬，箫为静胜。彼钧天之音胪欸，洞庭之乐虚无，岂比风箫之感召，亦由律吕之相须。异搜奇于蔡笛，鄙滥吹于齐竽。微颜成、南郭之

言，浩然难究；拟宋玉、王褒之赋，庶或同途。

风构成气流啊，周遍畅达；箫在万物当中作为一种，没有任何挂碍地来承受。这是何等地在那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彼此会合啊！将没有任何私情同那玄妙的万物具象融合在一起！这清越悠扬的韵调，伴随着平和舒缓的风声对它长时间地做欣赏，就好像听到松树树冠上面萦回的音响，哪里是山洞洞口发出的怪声能够比拟的？飒飒地就飘来了，铿锵地就跟随上了，音响刚刚符合那旋律，一下子就传到远处去了；声音形成了一整套乐章，哪样也不缺少。那表现虚幻或真实的地方，可以敞开胸怀来接受；既有条理，又节奏鲜明，哪里会像当年伍子胥拍击腹部来吹箎乞食那样地烦劳？唐尧虞舜时孔雀降临，凤凰双双来到，这些祥瑞尽管在感通万物上值得赞美，可难道在大力实行人为的举措方面还不对此感到惭愧吗？箫的那种韵调，只是借助和风，有时在清新的早晨发出激扬的旋律，有时在漫长的夜间发出凄凉的曲声。在寂寞之内，涌生出让人追索不到的音响；在看却看不到、听又听不到之间，这才符合不发号施令而教化大行的义旨。都说是到越国凭借会吹箫去拜见越王的宾客猛然间传播开他所遗留下的美妙韵调，都说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远远品味出萧史的箫声，最终成仙而去，散布到那辽阔高远的天空中，又播扬到水底下。延布那治理国家的风尚，既安定，又欢乐。集中在虔敬心念所感化的地方，既正直，又廉洁。吹奏起来有轻有重，回应起来就没有大小事物的区分了。化解恼怒，变得平和，可以同虞舜受到父母兄长的谋害却仍在床边弹琴的佳话相提并论了。使人不凌犯而顺从，也是依从西汉京房对韵律做出的占断啊！至于考察箫所感动的范围，大致上同那清静无为的大道相符合，又哪里仅仅与恬静淡泊相契合呢？声响所通达的地方，正是圣智所领悟的东西，确实属于各种事物错综复杂，彼此违逆，但最终还是用那大道统领起来，扩展开去。风随从猛虎的呼啸就刮得猛烈，箫取法凤凰的鸣叫而抑扬顿挫。为什么在形质上是那样的不同而声音却这般地一致呢？难道还不是因为宫商等五音组合起来特别协调，构成那均

称的状态，就像寒霜降下而铜钟自动就发出响声，装在竹管中的芦苇末到了特定的节气就从里面飞扬出来吗？时机到了，然后才刮起来，风并不去急躁地做营求；受到刺激，这才扬布起来，箫正属于靠安静取胜。那类天上的盛大仙乐联绵不绝，黄帝在广阔原野上演奏的《咸池》乐章虚寂渺茫，哪里比得上风和箫彼此之间相感召呢？这也是由阴阳各占一半的十二律相互依赖又配合所造成的。既与东汉蔡邕在江南柯亭驿馆搜求奇竹制成宝笛迥然不同，也鄙视战国时齐国处士混在吹竽队伍中乱吹一气的行径。除去颜成、南郭先生这类人的说法，已经渺茫得难以究明，而同战国宋玉的《风赋》、汉朝王褒的《洞箫赋》相比拟，差不多还路数一致。〔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丙子科

进士试题

日五色赋　以“日丽九重、圣符土德”为韵

春台晴望诗

李程　日五色赋

李程(生卒年不详)　字表臣，陇西(今属甘肃)人。贞元十二年(796)进士第一，同年又为博学宏辞科头一名。历仕德宗至武宗七朝，累官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宰相及鄂岳观察使、河东节度使、河中晋绛节度使等职。曾谏阻敬宗停罢宫室畋猎。其为人多智算，有口才，但性疏懒，滑稽好戏，因无重望。任学士时，日过八砖方入署视事，时称“八砖学士”。年七十七卒。其应试所作《日五色赋》，在当时被视为造语警拔，颇得士流推崇。

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验瑞典之所应，知淳风之不遐?禀以阳精，体乾爻于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气于皇家。懿彼日升，考兹礼斗，因时而出，与圣为偶。仰瑞景兮燦中天，和德辉兮光万有。既分羲和之职，自契黄人之守。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丽九华，当帝业之嗣九。时也寰宇廓清，景气澄霁，浴咸池于天末，拂若木于海裔。非烟捧于圆象，蔚矣锦章；余霞散于重轮，焕然绮丽。固知畴人有秩，天纪无失，必观象以察变，不废时而乱日。合璧方而孰可，抱珥比而奚匹?泛草际而瑞露相鲜，动川上而荣光乱出。信比象而可久，故成文之不一。足使阳乌迷莫黑之容，白驹惊受彩之质。浩浩天枢，洋洋圣谟，德之交感，瑞必相符，五彩彰施于黄道，万姓瞻仰于康衢。足以光昭千古，照临下土，殊祥著明，庶物咸睹。名翚矫翼，如威凤兮鸣朝

阳；时藿倾心，状灵芝兮耀中圃。斯乃天有命，日跻圣，太阶平，王道正。同夫少昊，谅感之以呈祥；异彼夏王，徒指之而比盛。今则引耀神州，扬光日域，设象以启圣，宣精以昭德，彰烛远于皇明，乃备彩于方色。故曰惟天为大，吾君是则。

仁德感动皇天的鉴察，吉祥的回应在那太阳的光色上显示出来。日月星辰都按既定的轨道运行，献上那福庆；太阳显耀出五种纯正的光色，让人值得赞叹。同载述祥瑞的经典所讲的感应表现做验核，明了那淳厚的风尚还不播扬得特别远吗?秉承那阳气的精灵，体悟《乾卦》六阳爻象征着君主的宝位。昭示国运正值五行转移中的土行之德，表明王气归在皇家。哎呀呀!那烈日在升腾，考察这代表礼制的北斗，依据时势来出现，与圣明的帝王在同一行列。仰望祥瑞的景象啊!在天空正中那样地灿烂；与仁德的光辉融为一体啊!普照人间和万物。已经划分出羲氏与和氏分掌天地事务的职责，自行就与那捧日仙人的职守相契合。舒展照耀的范围，符合为君之道的大放光明。让那彩云更绚丽，与帝业永远传续下去正对应。这时世整个天下得到平定，吉庆的时气致使雨过天晴，太阳在皇天边际的咸池中洗浴，在大海尽头拂动那神异的若木。似烟非烟的五色庆云烘托着太阳，烂漫鲜亮一片绚灿。其余的云霞散布在放射出双重光辉的烈日周围，光彩夺目更绮丽。由此就从根本上知道掌管天文历象的官员具有程序，皇天的纲纪没出现偏差，必定要观测天象来察知人间的动态，不荒废农时而搅乱三百六十天的安排。日月合璧，谁能够使它做到?日月两旁的光晕同时出现，又有什么能比配?吉祥的甘露在草稍上泛动来相互比试谁鲜亮，在黄河岸边引起感应，耀眼的光辉到处闪射。确实是和太阳的象征物来比照，才能够国运长久，所以形成的文采就各式各样。足以叫太阳里的三足乌对夜暮的情景都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日影酷似飞驰的白色骏马对那被赋予五彩的本体顿感惊骇。天体中心区域是那样地浩莽辽阔，天子圣明的筹划是那样地广远深长，双方的仁德交会感应，祥瑞必定与它们配合。太阳的五种纯正的光色在它运行的轨道上施

布并显耀出来，各个地区的黎民百姓在康庄大道上个个瞻仰。足以光辉昭示千古，照耀地上的一切。罕见的祥瑞非常显赫，万物全都看到了。著名的飞禽振动各自的双翼，就像威灵的凤凰朝着东方的朝阳在长鸣。葵花都朝向太阳，效仿灵芝草在皇家的苑囿园圃中闪耀。这正属于皇天具有那让他统治天下的意愿，天子一天比一天步入圣明的境界，天上的三台星太平无事，称王天下的治国大道十分端正。与那远古帝王少昊氏完全相同，确实是感动皇天才呈现出祥瑞；与那夏朝的君王却不一样，只会指着太阳来比量雄盛。如今是在整个神州扩展那光辉，并把光辉播扬到太阳能够照射到的一切地域。设布下兆象来启迪圣人，宣泄出精华来昭示那仁德，把太阳照耀远方显扬在最为圣明的时代，于是使东西南北中的五种色彩一样也不缺。所以说只有皇天最为尊贵，我朝明君效法它。

春台晴望诗

曲台送春日，景物丽新晴。
霭霭烟收翠，欣欣木向荣。
静看迟日上，闲爱野云平。
风慢游丝转，天开远水明。
登高尘虑息，观徼道心清。
更有迁乔意，翩翩出谷莺。

在通道曲折的高台上迎送春天的日子里，
景物在晴日重新当空时更为绚丽。
烟气密集，把那青山笼罩起来，
草木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安静地观看温暖的太阳在升腾，
悠闲地喜爱那原野的云彩连成片。
和风缓缓吹，柳丝跟着转。
苍天特开阔，远处的河水好明澈。

登到最高处，尘世的一切思虑都止息了。
观察边际的地方，怀道之心真清彻。
更涌生出飞落到大树上的意愿，
从幽谷里翩翩地飞出了那黄莺。〔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己卯科

进士试题

行不由径诗

封孟绅　行不由径诗

封孟绅(生卒年不详)　一作孟申，又作孟对或孟封。德宗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第一，官终太常卿。除《全唐诗》卷四六四载其本诗外，《全唐文》卷九四六尚载其《信及豚鱼赋》一篇。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欲速竟何成，康庄亦砥平。
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
不复由蓬径，无因访蒋生。
三条遵广道，九轨尚安贞。
紫陌悠悠去，芳尘步步清。
澹台千载后，公道有遗名。

只想快到达可最后又能成就什么呢?
其实走那康庄大道也像磨刀石般地平坦!
繁华的街道上世人都为私利而来来往往，
我那道路却依据正直来迈开大步。
不再经由蓬草丛生的小路，
也就没办法寻访到东汉蒋诩那样的隐士。
蒋诩开设房前的竹下三径也是遵从那宽广的大道，
都城内九条纵横交织的道路仍旧安宁又方正。
京师郊野的道路在脚下缓缓地落在后面，

芬芳的尘埃踏起来而步步清新。
春秋时武城邑的澹台灭明到千载以后，
他那一切都按公正行事的美德仍有留下的盛名。

〔杨寄林译〕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庚辰科

进士试题

性习相近远赋　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

玉水记方流诗

策进士问五道

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缞。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匮神废礼,谁曰非缺?且使日中为市、贸迁有无者,更何事焉? 第一道

问:《书》曰"眚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者非崇德欤? 第二道

问:圣哲垂训,言微旨远。至于礼乐之同天地,易简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征于何象?绝学无忧,原伯鲁岂其将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阳之桐,聿来凤羽;泮林之椹,克变鸮音。胜乃俟乎木鸡,巧必资乎瓦注。咸所未悟,庶闻其说。 第三道

问: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暮景回,吕梁有出入之游,周原变堇荼之味。不测此何故也?将以传信乎,抑亦传疑乎? 第四道

问:纺绩之弊,出于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贱,蚕织者劳焉。公议者知之,欲乎价平,其术安在?又仓廪之实,生于农亩。人有余则轻之,不足则重之,故岁一不登,则积食多竭。往年时雨愆候,宸慈轸怀,遣使振廪,分官贱粜,故得馁殍载活,麦禾载登,思我王度,金

玉至矣。窃闻寿昌常平,今古称便,国朝典制,亦有斯仓。开元之二十四年,又于京师大置,贱则加价收籴,贵则终年出粜,所以时无艰食,亦无伤农。今者若官司上闻,追葺旧制,以时敛散,以均贵贱,其于美利,不亦多乎? 第五道

提问:《周礼》规定平民百姓中不从事饲养放牧的男子,死后祭祀他时就不准供奉牲畜这类祭品;不从事种田耕作的男子,死后祭祀他时就不准供奉小米高粱这类祭品;不从事养蚕的妇女,一辈子也不准穿丝帛制成的衣裳;不从事织布的妇女,死后亲属不准为她穿戴上衣当心之处缀有一块方布条的丧服。这些规定都是用来羞辱那些不勤劳的人,抑制那些闲逛懒惰的人,想使世人在衣食的来源上花气力啊!然而推行政务的原则,应当根据世人感到有利的事情而使他们有利,因而要对他们搞好教化但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要对他们统一政令但不改变适合他们的那些东西,由此而农民、商人和工匠全都实现了各自的谋生本业。如果硬行拿周代的规定迫使编入国家户籍的百姓照着去做,牲畜谷物等祭品以及丝帛和孝服,必定要由自己本人在生前都创造出来,恐怕物力有限,土地出产也不全都适合,而对神灵的祭品并不丰盛又废弃掉礼仪,谁能说这不是缺陷呢?况且让人们在大中午组成集市,相互交换各自所需要的物品,这种商业活动还要它做什么用呢? 第一道

提问:《尚书》中说:"对不是故意犯下过失而造成危害的案犯,可以减免刑罚。"又说:"属于过失犯罪,尽管罪行很严重,也要宽恕。"可《礼记》上却讲:"执持禁令来使众人的行为整齐划一,决不赦免触犯它的人。"按照以上的说法来看,难道是依凭仁德来推行国政不足以使人具有羞耻心并且归顺,而制定严厉的法律条文,一触犯就予以惩罚,这倒成为礼制了吗?《诗经》上讲:"既明智又知识丰富,用来保护住自身。"《易经》上讲:"利用所学,致使自身安好,用来提高才德。"可《论语》上又说:"不贪恋生存来损害仁德,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按照以上的说法来看,明智而知识丰富的人就不成全仁德了吗?勇于牺牲的人就不提高才德了吗? 第二道

提问:圣明而知识渊博的人给后世留下训导的信条,言辞精微又义旨深远。至于礼仪乐舞和天地融为一体,容易简单这种对《易经》涵义的概括表现在《乾卦》和《坤卦》上,它们该用哪篇经文给考索出来呢?会在什么兆象上得到验证呢?灭绝一切学问就没有忧愁了,这样的话,不喜好学问的周朝大夫原伯鲁又哪里是像草木的枝叶在坠落呢?仁爱的人不去暴富起来,这样的话,卫国的公子荆为什么在家有财富以后便说差不多富丽堂皇了呢?朝向旭日初升的梧桐树,会招来凤凰的栖息;建有国家学府的水边树林里的桑椹树,能够改变猫头鹰的鸣叫声。斗鸡要取胜就需要那种训练得跟木雕雄鸡一样不动不惊的好鸡,赌博赌得巧必定要借助拿瓦器来下赌注。这些都是我这主考官还没领悟出来的问题,希望能听到你们的解说。 第三道

提问:天地具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太阳和月亮具有固定的运行轨道,水火草木具有固定的习性,这都属于不可改变的原理啊!可却奇异到战国的邹衍吹奏律管,寒冷的山谷竟变得温暖了;楚国的鲁阳公在酣战中挥动戈矛,眼看就落山的日光又为他返照了很长时间。在吕梁洪这条湍急险恶的河流中,有入水出水十分自如的游泳者;在周原这片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古公亶父来到后就把野草苦菜的味道变成了麦芽糖一样。我这主考官真是猜不出其中的原由在哪里?该把它们当成真事往下传呢?还是姑且把它们当成闹不清的事情往下传呢? 第四道

提问:纺线织布的害处,是由女子手工造成的。桑麻还没增加太多的产量,而布帛就已经一天比一天价格贱了,养蚕织布的人又劳累得很。出自公心来发表议论的人很清楚这种情况,可要使价格公平,具体办法又在哪里呢?再者说来,仓库储备殷实,是从农业生产那里得来的。人们在吃不完的时候就看轻粮食,到不够吃的时候就看重粮食,所以年景一出现歉收,积储的粮食就大多吃光了。往年按时节到来的雨水没有准时降下,皇上仁慈,深切关怀百姓,派遣使者,打开粮仓进行救济,分派官员用低价卖出粮食,因而得以使饿得快死去的人存活下来,米麦获得了丰收。回想我们君主的德行器度,样子像金又像玉,真是达到极点了。私下听说西汉耿寿昌创建的常平仓,古往

今来都称说很便利，我朝的典章制度也设有这种粮仓。在玄宗皇帝开元二十四年，又在京师大量设置，粮食贱时就加价收购进来，贵时就全年低价卖出去，因此什么时候都不存在吃不饱的现象，也对农业生产没有妨害。如今要是官府衙门把它奏报给皇上，恢复并完善旧有的制度，按照年景买入售出，用来平抑粮价，这对于老百姓感到挺好又很有利的事情来说，不也是帮助很大吗？第五道

吴丹　玉水记方流诗

吴丹(生卒年不详)　字真存，常州(今属江苏)人。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第二。后官镇州宣慰副使、知匦使等。卒于饶州(今江西波阳)，葬于常州。

玉泉何处比，四折水文浮。
润下宁逾矩，居方在上流。
映空虚碌碌，涵白净悠悠。
影碎疑衡斗，光清耐掩舟。
珪璋分辨状，沙砾共怀柔。
愿赴朝宗日，萦回入御沟。

产玉的泉水哪个地方能同它相比呢？
四面直角形转弯流过去而水纹在浮跃。
滋润低处哪里会超过规矩？
占据方正处恰恰在那上游哩！
映照天空使那美好的玉石看不见，
蕴含着洁白的璧玉在清净地长流。
影象散碎使人怀疑是星斗沉落在里面，
光华清亮照得出掩藏起来的扁舟。
珪璧与璋瓒的形制区分得异常明晰，
黄沙和砾石遍布的地方都接受感化。

只希望在奔赴大海的日子里，
曲折辗转地流入皇宫的河道。

郑俞　性习相近远赋

郑俞(生卒年不详)　贞元十六年(800)进士第三。后官长水县令。他事不得其详，俟考。

酌人心之善败，惟性习之所分。习者物之迁，以动为主；性者生之质，以静为君。运情有同于镕铸，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纯一，或逐境而纠纷。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犹理丝而又棼。且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徇物无已，近之则归于正性，远之则灭于天理。虽真妄之多端，谅御用而由己。至若习于所是，则孟母之训子，其居也初阛阓之是邻，遂贾竖而无耻，及夫又徙于学徒，示以坟史，卒能振文行以标名，郁古今而播美。岂不以性相近而习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则寿陵之从师，其故也等善行之无辙，见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郸之学，匍匐于兹，既所能之未尽，终故步而莫追。岂不以习相远而性亦失之。固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迁性，习以交丧。易贤愚之攸处，则舍于己而效于人，学弥得而性弥阻。述而莫息，亦莫之御。是非乖理而亦徇，未若袭慎而委顺。勿牵外以概名，在执中而克慎。钦若奥旨，闻诸古先，习之则善道可进，守之则至理自全。兹义也智所不染，愚亦难迁。倘中庸之可甄，愿斯焉而取焉。

斟酌人心的善良与败坏，只在于本性和习染相区分的地方。习染是外物的影响，把活动作为主导；本性是天生的质性，把安静作为主宰。调动情性就如同铸造物品，贯通心志也好比耕种除草。有的人用纯正专一来定住心念，有的人追随环境而乱成一团。所以定住心念，就像疏通本源而自有所得；追随环境，就像梳理乱丝而更加混乱。况且外物引动人的地方没有止境，人跟外物走又没有能停止的时候。在此过程中坚持接近本性的东西，也就归入纯正的本性了；陷

入习染使人相差很远里面,也就灭绝天理了。尽管真假各式各样,可的确是驾驭与施用全在于自己呀!至于在良好的环境中受习染,那么孟子的母亲训导儿子,开始时住处紧挨着店铺,于是孟子就学买卖那一套,而没有羞耻心,等到把住处迁移到学校旁边,拿圣明帝王的经典和史册亮给孟子看,孟子到最后就能够振扬起经文和卓行,标列大名,从古至今散发出芬芳而播布美德。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人的本性天生就很接近而习染又极为恰当吗?再拿效仿却不正确来说,寿陵这位年轻人拜从师长学习,他本来和人们会行走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看到大路也非常地平坦,可等到去赵国都城邯郸学习当地人的走步技巧,却在这件事上爬着返回来,一方面在自己天生就会的本领上没能完全发挥出来,到最后连原来会走路却都比不上了。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习染使人相差很远并且连本性也失掉了吗?以上两个事例表明,作为人,原本就该确定下自己的情性,对外物要让它原来怎么样就还怎么样,如果打算改变自己的本性,习染也跟着失去作用了。要是调换了贤明和愚昧的既定位置,就会舍弃自身而效仿别人,学习越有收获而本性也更阻塞了。加以取法而不止息,也就什么都驾驭不了了。是非和道理相违背可却还是跟着走,也就不如沿用谨慎和全靠顺适了。不要被外部环境拖累住而陷入名声的框子里,其实在于执守住不偏不倚的尺度又能做到谨慎啊!恭敬地依从这深奥的主旨,从古代先圣那里闻听到它。按它来习染,良善的准则与做法就可以得到提高;把它守持住,最高的道理自然就会保全好。对这一义旨,明智的人不去玷污它,愚昧的人也难改变它。如果不偏不倚的尺度能够甄别出来,希望人们在这上面做出择取呀!

郑俞　玉水记方流诗

积水棋文动,因知玉产幽。
如天涵素色,侔地引方流。
潜润滋云起,英华射浪浮。
鱼龙泉不夜,草木岸无秋。

璧沼宁堪比，瑶池岂可俦？
若非悬可测，谁复寄冥搜！

积聚起水流啊而那如同棋盘的波纹在跃动，
由此便知道美玉的生出特清幽。
酷似那苍天蕴含着洁白的光色，
又同大地一样引动着直角在转变的水流。
默默地滋润引发出白云的涌起，
艳丽的花朵扑向波浪一沉又一浮。
致使鱼龙潜藏的渊泉不成为它们的夜日，
草木丛生的岸畔没有那秋天。
学官前半月形的水池哪能来相比，
昆仑山上的瑶池又怎么可以相并立？
如果不是深得能揣测，
谁还会把艰难的搜寻对它来寄寓！

白居易　性习相近远赋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太原(今属山西)人。年轻时苦节读书，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名列第四，时年29岁。后又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江州司马和忠、杭、苏三州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在地方任内，多有惠政。于中唐发起新乐府运动，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今有《白氏长庆集》传世。其应试所作《性习相近远赋》被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然名列第四，可供今人同郑俞之作相比较；应试诗与吴丹之作究竟差距何在，亦足资研核，故而特予收录。对策并加载列，以见其全貌。

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

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原；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稽其本，谋其始，观所由，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矣，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而，道愈远而。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亦犹一源派别，随浑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诫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非乎率道为本，见善则迁，观炯诫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习性之说，吾将以为教先。

哎呀呀！在下面从世人开始，在上面直至君主，全都是德行凭借谨慎确立起来，而人的本性通过习染区分开来。习染就能产生出定型的东西，将会使良善和邪恶区别开来。谨慎在于从头就做起，必定要辨别正确与错误的混杂情况。推究起来，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彼此很接近，难道还不是因为只有教育的对象而没有类属的差异，最后都归入同一种道理？习染使人相差很远，难道还不是因为所走的途径不同而目的又不一样，于是就差得上千里？昏昧与贤明像流水一样在做灌注，疏导便成为愚昧与明智的本源；邪僻与纯正像岔路口一样在做划分，开启便成为大治与祸乱的轨道。怎么能够不考察那本源，谋划那起始，观看一个人所采用的手段，察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呢？考察成功与失败，进行择取和舍弃；审核良善与邪恶，决定行用和止息。使放纵耽乐的人从迷途上返回到儒雅文人的状态，使形成恶劣习惯的人遵循切要的行为准则达到君子的程度。况且德性没有谁能比老子更德性高的了，可他却强调只是依从那大道；圣明没有谁能比

孔子更为圣明的了，可他也强调人并不是从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的。由此就会明白：德性在于修养好自身，将会显现出本真，抱持住质朴；圣明来自立志要学习，必定要恳切地询问，多思考身边的事情。全在于从一点一滴来积累技艺和学业，在最细微的地方谨慎对待言语和行为。所以获取到入门处，心志就越发坚定了，人的本性也就越发接近了；按照正确的途径走，习染就更加精粹，大道就更加广远。其中的旨归可以显示出来，其中的要义可以列举出来。不要认为习染相接近就随顺那形迹而彼此违逆，设下一道又一道的阻隔。也不要认为人的本性相差很远就返归本真而彼此距离便有多少。这也就犹如同一个发源地而分成好几条河流，随同水浑水净而有的浑浊，有的清澈。又像同一元气而分成阴阳二气，任从吹动而形成寒冷或形成暑热。所以君子就从社会习染的原始形态去考察古代，在形成人的本性的地方去辨明疑惑。不过人的本性是内心的平和物，习染是对外部的谋求。内心平和要思索逐渐地达到，外部谋求要警戒轻狂地推进。不是该习染的东西却去习染，人的本性也就受到损伤了；属于应习染的东西而去习染，人的本性也就顺适了。所以圣明与轻狂出自思考与不思考，福庆与祸患在于谨慎与不谨慎。谨慎的涵义，无非是遵从大道，把这作为根本；看到良善，就向它靠拢，从过去的事情来观察鲜明的鉴戒，从未来的结果来审视该进该退。所以获取到这一点，人的最高本性就完全相同，犹如用水来补充水啊！丧失掉这一点，众人的心地就各不一样，犹如每个人像每个人的面孔啊！孔老夫子关于习染和本性的说法真是太确切了，我将把它作为教化的头等大事。

白居易　玉水记方流诗

良璞含章久　寒泉彻底幽。
君孚光泛泛，方折浪悠悠。
凌乱波纹异，萦回水性柔。
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

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
玉人如不见，沦弃即千秋。

质地优良的玉石蕴含着光采由来已久，
寒冷的泉水贯通到底部一片清幽。
美玉的色彩闪耀着晶莹的亮光，
直角转弯流过去而波浪一浪接一浪。
水面被搅得凌乱可那波纹更奇异，
曲折地流淌而那水性无比地柔和。
好似和风在摇动浅底的河湾，
犹如明月沉落在清澈的水中。
把那聪颖潜伏起来却正应当四处通达，
将那真质隐藏起来又怎能去浮泛在水面上？
雕琢玉石的工匠如果看不到它，
沉沦弃置也就上千年了。

白居易　进士对策五道

第一道

对：利用厚生，教之本也；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周礼》云：不畜无牲，不田无盛，不蚕不帛，不绩不缞。盖劝厚生之道也。《论语》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盖明从宜之义也。夫田、畜、蚕、绩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务者众，故《周礼》举而为条目，且使居之者无游惰，无堕业焉。其余非四者，虽不具举，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非谓使物易业，土易宜也。

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然后立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谓其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岂直易俗失宜，匮神废礼而已。且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

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后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则《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劝人之典，《论语》利人之利，三科具举，有条而不紊矣。谨对。

对答如下：物尽其用和使民众生活宽裕，这是教化的根本啊！依从人们适合的东西以及随顺各地的习俗，这是政务的关键啊！《周礼》上说：不从事饲养放牧的男子，死后祭祀他时就不准供奉牲畜一类的祭品；不从事种田耕作的男子，死后祭祀他时就不准供奉小米高粱一类的祭品；不从事养蚕的妇女，一辈子也不准穿用丝帛制成的衣裳；不从事织布的妇女，死后亲属不准为她穿戴上衣当心之处缀有一块方布条的丧服。这都是在激励那些使民众生活宽裕的具体做法啊！《论语》中说：根据世人感到有利的事情而使他们有利。这是在宣明依从人们适合的东西这项宗旨啊！种田、放牧、养蚕、织布这四种生产活动，土地给它们提供的天然良好的资源很多，世人在这些方面下气力的也人数最多，因而《周礼》列举出来作为主要事项予以强调，而且要让从事其中某种生产活动的人都不要闲逛懒惰，都不要败坏了自己的本业。不在以上四种生产活动范围内的其他生产活动，尽管没有详尽地列举出来，但也随顺土地物产和谋生职业来予以鼓励和引导，这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决不是在说：要让物产改换人们的职业，让土地改换它原本适合人们利用的东西。

古代的圣帝明王斟酌教化的根本，抓住政务的关键，没有比区定土质、辨明出产和简单好做、容易遵从更占首位的了。这样做以后，确立起最高的行动准则，告诉给人们却永远不会失去作用啊！如果认为他们是驱使天下人，却向各地征收当地不出产的物品，硬逼各处人做他们所做不了的事情，这同偏偏在大路上索求莲萍，偏偏在长江以北地区种植柑橘，又有什么两样呢？与大地提供的益处对着干，违背万物的生长习性，还有什么能比以上的做法更荒唐的呢？哪里仅仅是改变了习俗，失去了人们适合的东西，对神灵的祭品不丰盛，废弃了礼仪，就算完事了呢？况且圣人辨明九类土地的出产，区定读书人、农民、工匠、商人这四类人的职业，使他们各自对各自感到有利的地方

确获其利，各自对各自感到适合的东西切实适合，仍然担心一茬接一茬出产的物品还不是全具备啊！因而就让人们在大中午组成集市，互相交换完物品就散去，用来流通起货币和粮食，这里有的物资运到没有的地方去，然后就各自获到自身需要的东西了。由此说来，《易经》中聚合起人群的裁制原则，《周礼》中鼓励人们从事本业的规定，《论语》中使人们有利的那种利益驱动，三方面全都推行开来，也就具有条理而不紊乱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二道

对：圣王以刑礼为大忧，理乱系焉；君子以仁德为大宝，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归之义，可得而知焉，在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也。何者？当其王道融，人心质，善者众而不善者鲜，一人不善，众人恶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恶杀，且臻乎仁寿之域矣，而肆赦宥过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隐，至德衰，善者鲜而不善者众，一人不善，众人效之，故赦之之不可也，所以明惩恶劝善，且革浇漓之俗矣，而执禁不赦之文，由兹兴焉。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顺变而致理，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

然则君子之为君子者，为能先其道，后其身，守其常则以道善乎身，罹其变则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许得之；求仁杀身，亦道也，夷、齐得之。虽殊时异致，同归于一揆矣。何以核诸？观乎古圣贤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齐生于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欤？巢、由生于殷周之际，安知不求仁杀身欤？盖否与泰，各系于时也；生与死，同归于道也。由斯而观，则非谓崇德者不为成仁，杀身者不为明哲矣。

呜呼！圣王立教，同出而异名；君子行道，百虑而一致。亦犹水火之相戾，同根于冥数，共济于人用也。亦犹寒暑之相反，同本于元气，共济于岁功也。则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杀身之义，昭昭可知矣。谨对。

对答如下:圣明的帝王把刑罚和礼制作为十分值得忧念的事情,治理与祸乱同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君子把仁德作为最值得看重的东西,死亡或存活为此而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国家就有施用礼制而实现大治的,也有使用刑罚而达到社会基本稳定的;古人中就有崇尚道德而同祸害离得远远的,也有献身仁义而至死不变的。这些表现的目的所在的涵义,可以让人了解到,正是在于圣明的帝王适应时势的需要,而君子实行那大道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当称王天下的大道兴盛融洽,人心都很质朴,良善的人占居大多数而不良善的人却很少,有一个人不良善,众人就都厌恶他,所以赦免他是可以的,恰恰用来表明帝王喜好化生,厌恶杀害,眼看着就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地了。而赦免非故意犯罪和宽恕过失行为的条款,由此也就产生出来了。可到了大道隐没和最高仁德衰落的时代,良善的人为数很少而不良善的人却占多数了,有一个人不良善,众人就都跟他学,所以再赦免他是不行的了,恰恰用来宣明帝王惩治邪恶,激励良善,眼看着就要革除那浅薄败坏的社会习气了。而坚决施行禁阻和决不赦免的条款,由此也就兴用起来了。这属于圣明的帝王用来适应时势的需要定立起制度,随顺变动的情况来达到治理,并不是说德政不如刑罚啊!

既然如此,那么,君子之所以是君子的原因,在于确能把自己信奉的大道放在首位,把自身如何放在末位,守执那常规就用大道修养好自身,遇到变化就不用自身如何去损害大道。因而既明智又知识丰富,保全住自身,也属于大道的范围,唐尧时代的巢父和许由获取到了这一条。求取仁德而献出生命,也属于大道的范围,殷末周初的伯夷和叔齐获取到了这一条。尽管时势不同,目的不同,但都是归入同一种道理了。通过什么来验证这一点呢?观察古代圣人贤人的用心,如果守执大道而死去,死去了也永垂不朽,这属于并没死去啊!如果丢掉了大道而存活下来,存活下来却不仁义,这属于并没存活下来啊!假设伯夷和叔齐生活在唐尧虞舜时期,哪里就知道他们不明智又富有知识而保全住自身呢?假设巢父和许由生活在殷末周初,哪里就

知道他们不求取仁德而献出生命呢?这是因为闭塞与亨通,各自被时势所决定;生存与死去,共同归入那大道啊!由此来看,也就并不是说崇尚道德的人不去做成全仁义的事情,献出生命的人不去讲求聪明而有智慧的了。

哎呀呀!圣明的帝王确立起教化,本源是同一个而名目不一样;君子实行大道,想法各式各样而目的是同一个。这也就如同水行与火行彼此相对立,但根本都在于幽冥中的定数,共同构成世人的施用啊!这也就如同寒冷与酷暑彼此相反,但本源都在于元气,共同构成每年的收获啊!于是使用刑罚和停用刑罚的做法,保全自身和献出生命的义旨,就非常明晰地可以了解到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三道

对:古先哲王之立彝训也,虽言微旨远,而学者苟能研精钩深,优柔而求之,则壸奥旨趣将焉廋哉?然则礼乐之同天地,其文可得而考也。岂不以乐作于郊而天神和焉,礼定于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礼乐之驯致也。易简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征也。岂不以《乾》以柔克而运,四时不言而善应;《坤》以阴鹜而生,万物不争而善胜!柔克不言之谓易,阴鹜不争之谓简,简易之道,不其然乎?

老氏绝学无忧,儆其溺于时俗之习也。原伯鲁不学将落,戒其废圣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说,虑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丰财也。凤鸣朝阳,非梧桐而不栖,择木而集也;鸮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变也。事有躁而失、静而得者,故木鸡胜焉;有贵而失、贱而得者,故瓦注巧焉。虽去圣逾远,而大义斯存。是故远旨微言,可明征矣。谨对。

对答如下:古代的圣明帝王确立起永不可变的训示,尽管言辞精微,义旨深远,但学习的人如果能够研求精详,向深处钩稽,优游平和地去探求,里面蕴含的深奥的旨趣将会躲藏到哪里去呢?既然如此,那么礼仪乐舞和天地融为一体,它那文辞就可以考索出来了。难道

还不是因为在京师南郊的祭天大礼上表演乐舞而天神与人交融吗？在土地神庙的祭祀中确定下礼仪而地神与人合一吗？天上地下的完全合一、高度交融，是由礼仪乐舞逐渐造成的呀！容易简单这种对《易经》涵义的概括表现在《乾卦》和《坤卦》上面的，它那兆象就可以得到验证了。还不是因为《乾卦》凭借以柔取胜而运作，四季并不发话而美好的征兆就做出应合吗？《坤卦》通过暗中佑护而生育，万物并不争斗而美好的征兆就占上风吗？以柔取胜又不发话，这就叫做容易；暗中佑护而不争斗，这就叫做简单。简单容易的做法，还不是这个样吗？

老子主张灭绝一切学问就没有忧愁了，这是警戒人们沉溺在当时世俗的习气中啊！周朝的大夫原伯鲁不喜好学问就像草木的枝叶在坠落，这是告诫他在废弃圣明又知识渊博者的大道啊！孟子关于仁人不暴富的说法，这是忧虑积蓄私利而产生出坏事来啊！卫国的公子荆关于差不多富丽堂皇了的言论，这是赞赏安定住人们又使财物丰厚啊！凤凰朝着初升的太阳来鸣叫，不是梧桐树就不栖息在上面，这正表明择取树木而聚集啊！猫头鹰落在建有国家学府的水边树林里，吃下桑椹树的果实就变得叫声很好听了，这正表明受到事物的感化而发生改变啊！事情具有急躁就失掉而安静就获得的情况，所以训练得跟木雕雄鸡一样不动不惊的好鸡就取胜；又有尊贵的人却失掉而低贱的人却获得的情况，所以拿瓦器来下赌注就巧妙。尽管距离圣人很遥远了，但主要的义理还留存在这里。因此深远的义旨和精微的言辞，就可以明晰地得到验证了。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四道

对：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三才立而万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数情性各有其常。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盖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诚之诚，感无私之日用。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于水火草木乎！

故有吹律于寒谷，和气生焉；挥戈于曜灵，暮晷回焉。神合乎水游，吕梁而出人不没；化被于草木，周原而堇荼变味。盖品汇之生，则守其常性也；精诚之至，则感而常通也。静守常性，动随常通，是道可于物而非常于一道也。夫如是则两仪之道，七曜之度，万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谨对。

对答如下：出自元气的流布，最为精纯的物质就划分出来；天地人确立以后，万物都涌现出来。天地日月以及水火草木，在运行轨道和活动习性上各自具有各自的规律。它们随从并应合事物而产生的异常现象，这正是世人感召的结果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有天地才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才是万物中最灵妙的那部分。天地并不具备固定的心念，而是把人的心念作为自身的心念。如果能够用人的最灵妙的心念，去感召会做出美好回应的天地；用最为虔诚的那份虔诚，去感召没有任何偏向的日常事物。也就必定会像影子随同形体，回音随同发声那样做出反应了，何况水火草木呢！

因此有人在寒冷的山谷吹奏律管，春天的气流就涌生出来了；有人在太阳的灵光下挥动戈矛酣战，傍晚的时光就倒流了。由于神志切合那水中的游动，就能在湍急的吕梁洪中出来进去而不沉没；由于德化延及到草木，就能在周原这片土地上使野草苦菜改变原来的苦味。这大致上是因为，各种物体的生长，都遵循它那固定的习性，而精诚到达的地方，就受到感召而经常发生变化。静止时遵循那固定的习性，受牵动时跟随那经常发生的变化走，这表明大道适应那事物而不是永远保持它那一种大道啊！既然像这个样子，天地的定律，日月五星的运行轨道和位置，万物的习性，也就可以体察出来了，奇异现象也就可以信从了，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第五道

对：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圣人在上而下不冻馁者，非家衣而户食之，盖能为之开衣食之源，均财用之节也。方

今仓廪虚而农夫困，布帛贱而女工劳，以愚所窥，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而有缩也。古之人知其必然也，故教俭啬以足衣，务储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野无青草、人无菜色者，无他焉，盖勤俭储积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也。

当今将欲开美利利天下，以后生生蒸人，返贞观之升平，复开元之富寿，莫善乎实仓廪，均丰凶，则耿寿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闻，率修旧制，上自京邑，下及郡县，谨豆区以出纳，督官吏以监临，岁丰则贵籴以利农，岁歉则贱粜以恤下。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可以均天时之丰俭，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灾救弊，利物宁邦，莫斯甚焉。然则布帛之贱者，由锥刀之壅也。苟粟麦足用，泉货流通，则布帛之价，轻重平矣。抑居易闻短绠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语道。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惭下问。谨对。

对答如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穿衣吃饭是人民得以生存的源泉。古代的圣人位居上面而下面的人却不挨饿受冻，这种情形并不是靠给每家送上衣服穿，靠给每户送上粮食吃，而是能够为他们开辟穿衣吃饭的来源，调节好财物用项的合理分布啊！如今粮仓空虚，农民困乏，布帛价格低，从事纺织的妇女又很劳苦。依据我所察看到的东西，大致上知道那根本原因所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地的运转化育并不永久固定，所以有一个丰收年就必定又有一个歉收年；布帛和粮食的出产具有限定，所以物品既有多余的时候又有不够的时候。古人懂得这种客观的情况，所以就教促人们节俭，用来使衣服够穿；致力于储备，用来使粮食够吃。因而大禹遇上了长达九年的水灾，商汤碰上了连续七年的旱灾，可当时田野上青草不生而民众却没有面黄饥瘦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原因，只是由勤俭又有储备积存所造成的罢了。所以说对前面的事情不忘记，正是后面的事情的重大借鉴啊！

如今想要开辟人们感到美好又有利的东西来使天下有利，凭借

后来出生的人来使世人获得生存，返回到太宗皇帝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恢复玄宗皇帝开元年间富裕又长寿的境况，就没有什么能比充实粮仓，调剂好丰收年和灾荒年更为有效的了。这样一来，西汉耿寿昌所创设的常平仓就获取到那关键所在了。现今如果是丰收的喜讯奏报到朝廷来，就要完全整顿好旧有的制度，上自京师地区，下至各个郡县，对粮食数量要仔细予以对待，做好拨出和收进的工作，督察官吏，做好监督与控制的事务。年景大丰收，就用高价购进粮食，以便对农民有利；年景歉收，就用低价售出粮食，以便体恤下面的百姓。如果水灾旱灾构成阴阳反常的现象，就借助仓储作为九年应有三年积蓄的用场；如果战争突然发生了，就把仓储作为供养三军的军粮。这样就可以调节好天时造成的丰收或歉收的年景，均衡万物化生的多余或不足的状况。对此加以修明并施行开，实际上是任何时代都无法改变的做法啊！忧虑灾害，补救弊端，使万物各尽其利，安定住国家，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为紧要的了。然而布帛价格低的情况，是由商业活动受阻塞而造成的呀！如果米麦足够食用，货币再流通起来，布帛价格的高低也就归于正常了。不过白居易我又听说，短绳索根本就打不上深水来，学问浅陋的士人根本就讲论不了大道。我这年轻人狂妄直率，不懂得裁断的办法。根本就没把精微的言辞搞透彻，只是对主考官往下做询问感到自己太惭愧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丙戌科

制科试题

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问

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由。厥后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己之至论,进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于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

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弘化,万邦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氓,未遂富庶。督耕殖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

昔主父惩患于晁错,而请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启迪末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功。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今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

皇帝提问说:皇帝我观察古代称王天下的人,接受皇天的命令,统领世人,全都兢兢业业,承奉皇天又顺从大地,无不思求贤能的人才来实现治理,求取正直的言论来听到过失。所以大禹对提出美好建议的人就拜谢而高明的谋略就没有反映不上来的,汉朝征聘竭尽

规谏的人而富有学识的君子就逐渐得到进用。匡正时世，救助社会弊病，没有不照这样去做的。后世递相循用，可却光有名义却没有实际的东西，于是又设立各种科目规定，增加对通明卓异人士的索求，舍弃斥责君主自身的最恰切的言论，赏识那些没有用处的虚浮文章，而指陈痛切又非常明晰的答卷，很少有在当代能著称的。这正是皇帝我叹息又深感悲哀并考虑索求到真才的原因啊！所以就表明恳切悽恻的诚意，询问主体和施用这两个方面的要领，希望你们所讲的可以行用，行用后还不厌倦。上面获取到益处，下面掏出了心里话，君臣之间欢悦地相处。你们这些士大夫能不奋勉地思索皇帝我这番话而大力阐明它们吗？

我们国家光辉照耀四海，历时将近二百年了，十位前朝的圣帝弘扬那教化，天下各地感念他们的仁德，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礼仪没有不讲论的，由黄帝到周武王这六代的乐舞没有不兴行的，对大地在方泽坛进行祭祀，对皇天在名山举行报告成功的典礼。从周朝汉代以来，没有哪个朝代能比我朝更兴盛的了。自从祸患从边远地区开始酿成，重兵在中原长久不撤，众百姓穷困枯竭，死去了一多半。农耕和征战不是古代那种情形，吃穿用品很少有储备，忧念当今疲惫的百姓，还没达到富裕。督促农耕养殖的本业，可人们却没有留恋本业的心思；强化茶酒等商税的缴纳规定，而下面又有税收加码的危困。实行什么措施就可以恢复往日的强盛，采用什么办法就可以渡过当前的难关呢？过去的失误，哪些应当作为教训？将来的忧虑事，哪些应当引起警戒呢？

从前主父偃对晁错指出的祸患引为鉴戒，奏请由诸侯王分封各自的子弟。管仲使齐桓公称霸天下，实行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对策。精详地探求古人的用意，启迪还不明智的君主的心怀，特想在这方面能有广泛的了解，你们固然该去详尽地究明。再者执持吉凶关键的做法，在于无为而治，不去发号施令。可是把一切都交给下面去料理，人就借机谋取私利；全都由上面来决断，下面就建不成功绩。汉元帝对儒学一味地涉猎，可盛大的帝业到最后却衰败了。东汉光武帝对公卿大臣督察验核，但政务严苛并不属于美好之类。对这两

种倾向的取用与舍弃，还没获取到该依从的那一种。皇帝我心中一片渺茫，更加感到疑惑了。如今你们这些士大夫要周详地究明以上的主张和义旨，在答卷上连贯地写出来。兴用由皇帝我这里做出决定，你们不要为以后的祸害感到悲哀。

元稹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元稹(779～831)　字微之，一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八岁丧父，随母郑氏依倚鲁族为生。家贫无师，由母课读。德宗贞元九年(793)以明经擢第，十九年(803)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名列第一，拜左拾遗，时年28岁。后为监察御史，劾奏剑南东川不法官吏，遭到贬斥，转而依附宦官，为时论所薄。元和末入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穆宗长庆二年(822)拜相，在位仅三月，即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以暴疾卒于任所，享年53岁。其与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诗作崇尚坦易，形成平浅明快的风格。散文多为制诰，格高词美，被人效仿。又撰有传奇《莺莺传》，为后世《西厢记》故事所取材。今有《元氏长庆集》犹传于世。

对：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闻之，古者以言赋纳，岂虚美哉？盖用之也。是以益赞禹而班师，说复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汉文帝羞不若尧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国有贤良之贡人焉，塞诏者晁错而已。至武帝时，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选用条对，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弃其人，以其利于时也。得其人而弃其策，又何为乎？若此则徒设试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实矣。降及魏晋，朝成而暮败之不暇，又恶足言其策哉？

我唐列圣君临，策天下之士者多矣，异时莫不光扬其名声，宠绥其爵禄。然而曾不闻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问，得某士，行某策，

济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诏屡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屡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

今陛下肇临海内,务切黎元,求斥己之至言,责著明之确论,斯命说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对,皆以指病陈术而为典要,不以举凡体论而饰文词。事苟便人,虽繁必献;言苟谐理,虽鄙必书。固不足以副陛下恳恻之诚,庶可以尽微臣之献替耳。伏愿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有观,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汉文,虽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后能以策济人。则臣始终之愿毕矣。如或言不适用,策不便时,则臣有弊圣欺天之罪,将置于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

臣伏读圣策,乃见陛下念礼乐之浸微,恤黎人之重困,责复盛济艰之术,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当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别白而书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拨去乱政,我太宗文皇帝鞬橐干戈,被之以仁风,润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寿,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气和,总天下之众而天下之众理。理故敬让之节著,和故欢爱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举,称至德者举文皇以代尧舜。是异事哉?诚有物以将之也。

明皇帝即位,实号中兴,方其任姚、宋而召贤能也,虽禹汤文武之俗不能过焉。四十年间刑罚不试,人用滋植,四海大和。于是奉升中告禅之仪,则封泰山而秩嵩华;举东巡西狩之典,则宅咸镐而朝洛阳。礼既毕行,物亦随耗。天宝之后,征戍聿兴,气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时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为兵歼之。兵兴以来,至今为梗。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人贫则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榷筦权宜之法用矣。

今陛下躬亲本务,首问群儒,念礼乐之不兴,叹升平之未复,斯诚天下之人将绝复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对扬之!微臣以为,将欲兴礼乐,必先富黎人;将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术,臣请两言之。

夫古所谓销兵革者,非谓幅裂其旗章,销铄其锋刃而已也。盖诚信著于上,则忠孝行于下;敬让立于内,则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则边

鄙之兵息，敬让立则争夺之患销，争夺之患销则和顺之心作，和顺之心作则礼乐之道兴矣。此先王修政戢兵，兴礼乐，富黎人之大略也。

陛下必欲责臣以详究之术，臣又请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虽神农设教，天下不能无馁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农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断狱之明则食之，军有临敌之勇则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则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则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无一二焉。苟不能于此者，不农则不得食，不织则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于中，则作业兴于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务本者恒多。岂强之哉？彼易图而此难及也。

今之事则不然。吏理无考课之明，卒伍废简稽之实，百货极淫巧之工，列肆尽兼并之贾。加以依浮图者无去华绝俗之贞，而有抗役逃刑之宠；假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是以十天下之人，九为游食。蠢朴愚钝不能自迁者，而后依于农。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劳而难处也。以惰游之户转增，而耕桑之赋愈重。曩时之十室共输而犹不给者，今且数家一夫矣。虽有慈惠之长，仁隐之吏，尚不能存；若惨断击搏之，则将转移于沟洫矣。今之课吏者，以赋敛无逋负为上。以臣观之，足陛下之赋者，诚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则农桑之用既如彼，惰游之众又如此。耕桑之赋重则恋本之心薄，惰游之户众则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

今陛下诚能明考课之法，减冗食之徒，绝雕虫不急之功，罢商贾兼并之业，洁浮图之行，峻简稽之书，薄农桑之徭，兴耕战之术，则惰游之户尽归，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则富庶之道兴矣，而贞观、开元之盛复矣。若此则既往之失由前，将来之虞由后，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

至于主父偃乘七国并吞之后，谋分裂而矫推恩；管夷吾当诸侯争夺之时，先诈力而行寓令，皆一时之权术也。岂可谓明白四达，与日月齐明于圣朝哉？臣虽贱庸，尚不敢陈王道于帝皇之日，况权术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详究言之。

臣伏读圣策，又见陛下以为执契则群下用情，躬亲则庶官无当。以汉元尚儒学而衰盛业，谓光武课吏职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

也。夫委之于下而用其情，盖考绩之科废而清浊之流滥也。尚儒术而衰盛业，盖章句之学兴而经纬之道丧也。课吏职而昧通方，盖苛察之法行而会计之期速也。臣请条列而言之。

夫神农之斫耒耜，教耕耨，所以垦良田而植嘉谷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铲锄之而已。唐尧之辟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禹舜而种皋陶也。又不能遏共工、欢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弃殛诛之而已。神农不以稂莠滋而废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尧不以四罪进而夺舜禹之任，故能终任贤之道。若此则陛下之所任顾何如耳，岂可谓任之必不可哉？

至于考绩之科废，章句之学兴，经纬之道衰，会计之期速，皆当今之极弊也。幸陛下问及汉元、光武之事，臣遽数而终之。今国家之所谓兴儒术者，岂不以有通经、文字之科乎？其所谓通经者，又不出于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于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以是为通经，通经固若是乎哉？至于工文自试者，则不过于雕词镂句之才，搜摘绝离之学。苟或出于此者，则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树风声，不由殿最。连科者进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为清流，行法莅官者为俗吏。以是为儒术，儒术又若是乎哉？

其所谓课吏职者，岂不以朝廷有迁次进拔之用乎？臣窃观今之备朝选而不由文字者，百无一二焉。夫施众网而加一禽，尚不能得，况张一目以罗万品，而望其飞者走者、大者小者尽出乎其间，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绝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将执契而叹用情，念垂衣而惧不理，盖臣所谓课察之道不明也。

陛下诚能使礼部以两科求士，凡自《唐礼》、《六典》、律令及国家制度之书者用，至于《九经》、历代史，能专其一者，悉得谓之学士。以环贯大义而与道合符者为上第，口习文理者次之。其诗赋判论以文自试者，皆得谓之文士。以经纬今古、理中是非者为上第，藻绩雅丽者次之。凡自布衣达于未隶朝省者，悉得以两科求仕，礼部第其高下，归之吏部而宠秩之。若此则儒术之道兴，而经纬之文盛矣。

吏部罢书判身言之选，设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岁以朝

右崇重者一人与礼部郎校天下群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据其功状而登进之。牧宰字人之官藉之为理者，则上赏行焉。若此则迁次之道明，而迟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贤之式。每岁内自仆射，至于群有司之正长，外至于廉问、节制者，各举称朝选者一人。外自牧守，内至于百执事之立于朝者，各举吏郡县者一人。因其所举而授任之，辨其考绩而赏罚之，不举贤为不察，举不贤为不精，不精与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贤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业不通于学，才不属于文，政不登于最，行不知于人，则限以停年课资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则敷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无所弃矣。

两科立，则群材遂；三式行，则庶官当。陛下乃执左契以御之，总枢极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运支体，是支体运而无效于心目乎？察群材如明镜之形美恶，岂美恶形而逃隐于明鉴乎？然后陛下辟四门，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视；达四聪，以天下之耳听。不私其言，以为好恶，端拱岩廊，高居宸极，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纩塞耳而声响必闻。则彼汉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责之术，又恶足为陛下言之哉！

且臣闻之，圣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壮，戴陛下为君，仁寿欢康，未始有极，何忽自苦，堕肝胆而言天下之事乎？诚以为国家兵兴以来，天下之人惨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后，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话开元之政。臣恐此辈不及见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饮恨于穷泉。此臣之所以汲汲于心者，陛下能不怜察其意乎！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正对近古时期策问卓异士子不兴行感到是一大弊病，而陛下幸好填补了它，这真是全天下所有人的福份啊！渺小的臣下我哪敢憋住心里话而不讲出来呢？况且臣下我还听说，古代对建议广泛予以采纳，这哪里是毫无根据的赞美词呢？因为要行用它呀！所以伯益辅助大禹而撤回了前去讨伐三苗的军队，傅说回复殷高宗的命令而制作了《说命》。这都是行用建议的主要表现啊！自从汉文帝为比不上唐尧虞舜而感到羞愧，首次通过策问来求取士子，于是天下各郡和诸侯王国就有贤良科的应试人选给保送到朝廷去，符合

诏令要求的只有一个冕锴罢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显露出来,然而到最后却不能择取行用他逐项对答的意见,施布到全天下去。行用他的对策意见又不废弃他本人,这是因为他对时势很有益处啊!获取到他本人却废弃他的对策意见,又来做什么用呢?像这样也就等于白白设立测试言论的科目,收不到行用建议的实效了。往下延续到曹魏和晋代,早晨刚取得成功而到晚上又失败了,像这种动乱事还忙得顾不过来,又哪里足以再讲什么策问呢?

我们大唐各位圣帝亲自驾临来策问天下士子,次数真是太多了。到后来没有不显扬被录取者的名声,提高他们的官爵和俸禄的。然而竟没听到天下人传扬说:某日天子颁降下某类策问,获取到了某位士子,行用了某种对答意见,实现了某种功效。这也闹不清是鼓励直言的诏书多次下达而直言的士子涌现不出来呢?还是直言的士子屡屡涌现出来而那直言的对策意见得不到行用呢?

如今陛下开始驾驭天下,极力关切黎民百姓,求取指斥自己的最中肯的意见,要求提出非常明晰的确切论断。这正是当年殷高宗命令傅说代替自己发表言论的盛大用心啊!渺小的臣下我哪里足以承奉得了呢?然而臣下我用来献上愚昧的对答,都把指明弊病和陈说对策作为固定的标准,不拿列举一般情况和怎样论说才精采而在文词上做修饰。事情如果对人有利,即使繁琐也必定进献;言论如果符合道理,即使浅陋也必定写出来。固然不足以切合陛下恳切悽恻的诚意,希望能够尽到渺小的臣下我的规谏罢了。跪拜恳请陛下,把臣下我这篇对策交给主管部门,如果有些地方还有可取的地方,就施布到天下去,使天下人传扬说:汉文帝太让人痛惜了,他尽管通过策问来选取士子,可一直到了我朝的圣明天子,然后才做到了拿对策意见来救助世人啊!这样的话,臣下我由始至终的愿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如果言论有的地方并不适用,对策意见对时势没有什么帮助,这就纯属臣下我犯下了蒙骗圣人和欺哄皇天的大罪,接下来按刑律进行处置,陛下原本上就没有理由加以宽恕了,也是臣下我毫无怨恨的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明的策问,于是看到陛下忧念礼仪乐舞的逐渐衰颓,体恤黎民百姓的重重危困,要求提出恢复强盛局面和渡过难

关的有效办法，斟酌汉代由诸侯王分封各自的子弟和齐国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适宜之处。这些全是当今的严重弊病啊！渺小的臣下我哪敢不细作区分而写出来呢？从前我朝高祖武皇帝拨去隋朝的败乱国政，我朝太宗文皇帝又收藏起兵器不再使用，用仁德的和风来延布，用雨露来滋润，停息天下的徭役而天下人安宁了，减省天下的刑罚而天下人长寿了，沟通天下的心志而天下的气氛和睦了，统领起天下的民众而天下的民众都得到治理了。得到了治理，所以恭敬和谦让的礼节就显扬起来了；达到了和睦，所以欢洽仁爱的化导就兴行起来了。因而改变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所沿用的礼仪，统括起黄帝至周武王这六代的乐舞，世上称赞谁是最仁德的帝王的人，都首推太宗文皇帝，用来取代唐尧和虞舜。这难道是奇怪的事情吗？实在是有那社会效应在主宰着它呀！

玄宗文皇帝登上帝位，实际上称得上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了兴盛。正当他任用姚崇、宋璟而召请贤能的人时，即使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时期的民俗也不能占上风啊！四十年间刑罚没人去尝试，人口由此滋生繁殖，四海高度和谐。于是奉从向皇天报告成功进行祭拜的礼仪，祭祀泰山又祭祀嵩山和华山；实行定期到东部和西部进行视察的制度，在咸阳、镐京高高坐定又在洛阳接受朝拜。大礼既已全部实行，社会财富也随之消耗。天宝以后，征伐戍守开始兴起，气势由强盛变得微弱，这也是事理必定会这样的啊！从前辛勤哺育而拥有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叛乱的军队给毁灭了。战事兴起以来，到今天还构成藩镇拒不服从中央的局面。战事一兴起，户口就减少；户口一减少，土地就荒芜；土地一荒芜，赋税就加重；赋税一加重，世人就贫困；世人一贫困，躲避徭役和逃税的罪犯就增多，而增收商税等一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便兴用了。

如今陛下亲自狠抓根本的事务，第一次策问众位儒士，忧念礼仪乐舞不兴行，慨叹太平的景象还没恢复，这真是天下人眼看着要灭绝而又重新得到保全的时候啊！渺小的臣下我有多么荣幸来对答称扬天子的命令啊！渺小的臣下我认为，要想兴行起礼仪乐舞，必定要首先使黎民百姓富足起来；要想使黎民百姓富足起来，必定要首先停止

用兵。停止用兵的办法,臣下我请求从两个方面来做论说。

古代所谓停止用兵,决不是说把那旗帜徽章都撕碎,把那兵器都销毁就算完事了。大致上是强调,真诚信实在上面鲜亮地显出来,忠诚孝敬就会在下面兴行起来;恭敬谦让在内部确立起来,少数部族就会在外部变得和睦。少数部族变和睦了,边境一带的战争就止息了。恭敬和谦让确立起来了,你争我夺的祸患就消弭了;你争我夺的祸患消弭了,和睦顺从的心念就形成了;和睦顺从的心念形成了,礼仪乐舞的教化就兴行起来了。这正是古代帝王修明国政、止息战争、兴行礼仪乐舞、使黎民百姓富足的主要做法啊!

陛下一定要用详尽究明的对策来督责臣下我,臣下我又请求针对事体来阐明它。粮食不够吃,即使是神农氏设布教化,天下也不能没有挨饿甚至饿死的人。因此古代不从事农耕而让他有粮吃的人,仅有四类也就到头了。官吏具有审理案件的明断力,就让他有粮吃;士兵具有与敌人交锋的勇气,就让他有粮吃;工匠具有便利世人的巧手艺,就让他有粮吃;商贩具有流通起货物的智慧,就让他有粮吃。这四个方面都是贤明人、勇敢人、灵巧人、聪明人做得了的事情啊!天下一百个人当中,没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如果对以上四类事情根本做不了,他却不从事农耕,也就没饭吃;不从事纺织,也就没衣穿。世人的常情是,从心里感到要吃要穿,从事职业就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所以四处游荡混饭吃的人就总是很少,而致力农耕的人总是很多。这哪里是强迫他们呢?因为那样做就容易达到目的而这样做就难做到呀!

如今的事体却不是这样的。对官吏的治绩没有考核督察的严明劲儿,对部队废弃了检阅查验的实际效应,各种物品把淫靡精巧的制作施展到顶点,集市商街上全都是吞并小买卖的大商人。再加上依附佛寺的人没有去除奢华和断绝俗念的纯正修行,却有对抗徭役和逃避刑罚的特权。穿上军装的人没有跳上战车和拉开硬弓的勇力,却有四处闹事和辱骂官吏的骄悍劲儿。因此天下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成为到处游荡混饭吃的人。蠢笨质朴又愚昧迟钝而自己没办法离去的人,到最后才进入农耕的行列。以上情形又不是由其他原因

造成的,而是因为那样干就安逸而又容易有保障,这样干就辛苦而又难呆长啊!由于懒惰游荡的民户转而增多,对种田织布人的税收就愈益沉重。以前由十户人家共同缴纳可仍不够用的税收,到如今却变成好几家就只有一户来承担了。即使真有仁慈施惠的长官,仁爱又富有同情心的官吏,尚且很难存活下去;倘若再残酷地用刑罚逼他们,也就只有流亡到山沟河边饿死了。如今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把征收赋税没有拖欠不足的情况作为最优秀。这从臣下我看来,那些给陛下如数收上赋税来的人,其实正是在祸害陛下辖有的民众罢了。像这样一来,农耕织布的需用既然是那样,而懒惰游荡的人群又是这样。对农耕织布人的税收沉重,他们留恋本业的心思就变得淡薄;懒惰游荡的民户一增多,就与使人富裕的办法相违逆了。这是必定如此的道理啊!

如今陛下确实能够申明考核督察的制度,裁减白吃饭的那帮人,断绝雕刻修造那类并不紧急的工役,消除商人吞并小买卖的勾当,使僧众的行为变纯洁,强化检阅验核士兵的法令,减轻农耕织布人的赋役,行用农耕和征战的措施,这样一来,懒惰游荡的民户也就全都回到土地上,而留恋本业的心思也稳固下来了。留恋本业的心思一稳固下来,使人富裕的办法就兴行起来了,而太宗皇帝贞观年间和玄宗皇帝开元年间的兴盛景象就重新恢复了。像这样,以往的失误就只出在前面,将来的忧虑事就只出在后面,全在陛下长期对它们加以警戒并慎重对待罢了。

至于西汉的主父偃跟在反叛的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被中央吞并的局势后面,谋求将诸侯王国一个个缩小封区,便来打着推布私恩的旗号做削减。春秋齐国的管仲正处在诸侯各国争斗的时代,就把诡诈和武力放在首位,推行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对策。这都属于一时间的狡诈计策啊!哪里称得上在圣明的朝代正大光明传布到四方,与那日月同放光辉呢!臣下我尽管低贱庸劣,尚且不敢在称帝、称皇天下的年代陈说那称王天下的做法,何况狡诈的计策呢!这正是臣下我最为它感到羞耻的事情啊!所以就顾不上详尽究明来做陈述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明的策问,又看到陛下认为执持吉凶的关键,

下面的群僚就会按照各自的私欲干;一切都亲自处理,百官就没该做好的政事。认为汉元帝崇尚儒学可竟使盛大的帝业衰败下去,认为东汉光武帝验核官员的供职情况却对普遍的法则闹不懂。从臣下我想来,觉得都不是这样的。把政事交付给下面去处理可却按照私欲干,这是由于考核政绩的制度废弛而清正与污浊的人搅合到一起了呀!崇尚儒学而使盛大的帝业衰败下去,这是由于划分经文章节和解释字义的学问盛行而筹划国政的准则与方法丧失了呀!验核官员的供职情况却对普遍的法则闹不懂,这是由于苛刻察辨的做法兴行起来而汇总上报的期限刻不容缓呀!臣下我请求逐条列示来讲论它。

神农氏砍木材制成犁巴,教给人耕作的方法,目的是开垦出良田和种出美好的谷物。然而不能遏制住禾苗与稗草的同时滋生,用来遏制的办法是用锄草工具除掉它而已。唐尧在朝廷设置大臣,安排百官,也是用来培植大禹、虞舜那样的人和栽培皋陶之类的人,但又不能遏制住共工、欢兜这类人的倒行逆施,用来遏制的办法,是流放驱逐他们而已。神农氏不因禾苗与稗草同时滋生便废弃犁巴的用途,所以就能保存住器具使用的方法。唐尧不因共工等四个大罪人得到进用便撤销大禹、虞舜的职务,所以就能把任用贤才的原则坚持到底。既然如此,也只在陛下所任用的人究竟怎么样罢了,难道可以说任用谁就绝对不行吗?

至于考核政绩的制度废弛,划分经文章节和解释字义的学问盛行,筹划国政的原则与方法衰落下去,汇总上报的期限刻不容缓,都是当今最严重的弊病啊!幸好陛下询问到汉元帝和东汉光武帝的事情,臣下我疾速地列举而对答完策问。如今国家所讲的兴行起儒学来,难道还不是因为设有通经和文章的考试科目吗?可那所谓通经的科目,不超出填上抽出来的经文的几个字,明晓经义,仅仅做到辨析章节条理。因而被录取的人每年都超出一百名去,可通晓经典的士子却相当少见。把这看成是通晓经典,但通晓经典原本上就像这个样吗?至于擅写文章而自愿应试的人,又不超出雕琢字句的才华和搜求摘取冷僻游离的典故的学问去。如果是出自这种选拔的人,公卿的高位可以干坐着就捞取到,尚书省的郎官可以俯下身来就求取

到。推崇和树立良好的风气，不通过考核政绩优劣来进行。接连登第的人爬得非常快，多次获得好名次的人职位就高。什么都不表态而只管照老样子办的人，却被视为清雅的一类官员；而执行法度并履行岗位职责的人，却被看成是庸俗的官吏。把这当成是儒学，儒学果真又像这个样吗？

东汉光武帝所讲的验核官员的供职情况，难道还不是因为朝廷有按等级升职提拔的任用权吗？臣下我私下观看如今供朝廷选用而不经由文章考试合格的人，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两个人。施布下多处罗网来捕获一个禽兽，尚且捕获不到，何况只张设一个网眼去包罗所有的动物，希图会飞的、能跑的、大个的、小个的全都从里面蹦出来，这能做得到吗？拿这种办法去验核众官吏，众官吏又能验核得了吗？如果验核不了，又能任用他们而杜绝掉他们的私欲吗？这正是陛下打算执持吉凶的关键却又慨叹下面按照私欲干，向往无为而治却又害怕治理不好的原因啊！也是臣下我所说的考核督察的方法并不明晰啊！

陛下果真能命令礼部按以下两种科目来求取人才，凡属通晓《大唐开元礼》或《唐六典》、刑事法典和政府法规以及国家制度的有关成文典册的人就予以选用，由此而直至《九经》与历代正史确能精通其中一经或一史的人，都有资格统称为学士。把其中达到疏通并贯穿大义又与道法密切吻合的水平的人，列为优等；开口对文字义理很熟悉的人列为第二等。那些通过律诗、辞赋、判辞和策论来凭文章自愿应试的人，都有资格统称为文士。把其中达到统括并措置古今又在事理上切中是非的水平的人，列为优等；词藻修饰得典雅华丽的人列为第二等。凡是从民间读书人直至还没隶属朝廷与尚书省的人，都有权利按以上两种科目求取官职，礼部判定他们被录取的等级与名次，送到吏部赐给优越的官爵。像这样来做，儒学的道法就兴行起来了，而统括并措置古今的文章也雄盛了。

吏部取消在书法、判辞、体貌、口才上择选官吏的一惯做法，设立三种程式来任用人才。一种叫做验核才能的程式。每年责成辅政重臣一人和礼部郎官来验核天下众官吏的治绩，排名在第一到第三的

人，在验核完毕的时候就根据他们的功劳簿提升他们。属于管理地方、抚育民众而朝廷依靠他们施行治理的官员，优厚的封赏就降赐下去。像这样来做，按等级晋升的制度就得到彰明了，而提升慢与提升快的区分也定立起来了。第二种叫做任用贤才的程式。每年在朝廷上由尚书仆射到各个政府机构的长官，在地方上直至廉察按问使和节度使，各自荐举一名符合朝廷来选用的人。由地方上的太守县令直到朝廷上每个在职能部门供职的官员，各自荐举一名可以担任郡县官吏的人。根据荐举的情况予以授官任用，辨明这些人的政绩考核结果，据此对荐举者进行赏赐或惩罚。不向朝廷荐举贤才就属于不明察，荐举庸劣的人就属于不精详，不精详与不明察的罪责各自相对等。像这样来做，担保和任用的制度就兴行起来了，而贤才与庸才的地位就相差悬殊了。第三种叫做一般晋升的程式。官员中有人在本业上对学问不通晓，在才华上对文章写不了，在政绩上进不到优等中来，在品行上不被人们所称赞，就用不问贤愚、专以资历深浅来录用的规定来役使他们。像这样来做，广泛加以任用的典制就保持下来了，而才能微小的人也没有遗弃的了。

学士和文士这两种科目确立起来了，各类人才就都如愿以偿了；三种程式施行开了，文武百官就有该做好的政事了。陛下于是执持住吉福的关键去驾驭他们，掌握住最高准则去端正他们，把一切交给众官员去办理就如同心和眼睛运作到四肢上，这还会四肢动起来却不依从心和眼睛的吗？察辨各类人才就如同明镜使漂亮或丑陋的面容显现出来，难道这种漂亮或丑陋的面容的显现还能在明镜中逃离掉或隐藏起来吗？然后陛下敞开迎候贤士的明堂上的四面大门，使能进献建议的道路畅通无阻；明晰地观察天下各地的情况，用天下人的观察来做观察；全面听取天下各地的反映，用天下人的听取来做听取。不对某些言论存在偏听偏信的现象而作为自己喜好与憎恶的东西，在朝廷上稳稳坐定，在皇帝宝座上居高临下，通过皇冠下垂的玉串遮蔽住面庞可却任何细微的事情都察辨得一清二楚，用丝绵球堵住耳鼓可却任何声响都听得到。这样一来，汉元帝推崇的只会划分经文章节和解释字义的儒学，东汉光武帝督察验核百官的做法，又哪

里值得为陛下讲述它们呢?

而且臣下我又听说,圣人位居在上面,人们就不丢弃礼仪。像臣下我这样的人,生下来还没进入壮年,拥戴陛下当君主,仁爱长寿又欢悦安康,未曾有那到头的时候,何必不注意而自讨苦吃,披肝沥胆来讲论天下的大事呢?这实在是觉得国家兴起战事以来,天下人凄惨惊惧又悲伤愁苦已经长达五十年了。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后,头发花白的老年人没有谁不哭得眼里流血来称说玄宗皇帝开元年间的美政啊! 臣下我担心这批人来不及看到陛下功业告成和治理定局的化导,就先带着遗憾死去了。这是臣下我在内心深为焦急的原由所在啊!陛下能不怜悯并体察这种用意吗?恭谨地对答如上。

韦处厚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韦处厚(773~828),字德载,京兆(今陕西长安)人。原名淳(或作惇),以避宪宗御讳改今名。幼有至性,服侍继母以孝闻,终丧游长安,通《五经》,博览史籍,且文思赡逸。宪宗元和元年(806)登进士第,又应本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对策第二,授校书郎。俄迁右拾遗,兼史职,修成《德宗实录》。后拜户部郎中,知制诰。穆宗时为翰林侍讲学士,献呈与路隋合编的《六经法言》,补修《宪宗实录》,驳罢户部侍郎张平叔官自粜盐之议。敬宗时进翰林承旨学士、兵部侍郎,执道义营救李绅,以死谢罪规谏敬宗尽心国事,平定宫廷变乱,拥立文宗,进拜宰相,致力于清肃朝政,力主重用裴度以壮国威,执朝典威慑魏博藩镇,撰《大和国计》以献。性嗜学,家中聚书万余卷,手自刊校。笃信佛教因果之说,晚年尤甚。大和二年(828)十二月奏对时突发疾病,一夕而卒,享年56岁,追赠司空。

对:臣闻古之以道莅天下,皆酌之人言,用凝庶绩。伏惟陛下,统承丕绪,光膺骏命,志气中蕴,清明下临,恤黎庶而惠慈方洽,枭叛戾而威武已炽。犹能虑危于未兆,思理于已安,聿追孝思,缵述前烈,愍官吏之无用,求斥己之至言。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体识不足以经

远，祇奉圣问，伏用兢惶，谨昧死上愚对。

制策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由。厥后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己之至言，推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于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闻复济慎惧，虽危必乐；理安佚肆，虽顺必忧。帝尧之为道也大矣，《书》称其本，曰允恭克让；文王之为德也宏矣，《诗》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图天下之安者，必称之于劳；虑天下之大者，必慎之于微。任贤诚固，思虑诚深，百姓虽未富庶，四夷虽未宾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贤不固，思虑不深，百姓虽富庶，四夷虽宾服，天下明知其乱也。

今陛下鉴前代已往之失，求当今未然之理，使虚文不设于下，至言必闻乎上。端视凝听，所委惟贤，则上获其益矣。惠爵施禄，所理惟直，则下输其情矣。顾言而动，思利乎安，则何虑乎言之不行？顾行而动，思利乎安，则何虑乎行之有倦？诚能兢兢于一日二日，业业于无小无大，苟能此道，虽微必昌，虽柔必强。凤凰麒麟不足来，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时不足序。天之高明也，斯不爱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爱其宝。彼之大者犹若是，况其细者而难乎？

制策曰：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弘化，万方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以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兹疲氓，遂乖富庶。督耕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者。伏以陛下，缵充明德，继荷大业，居十圣之全区宇，守百代之成礼乐，扬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黩武而弭戢，念疲氓之富庶，理自顺此生，危自反此作。

兵者，国之威也。威不立，则暴不禁。君得其术而已，举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者，国逸而功

倍;用形者,人劳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仁足以怀,义足以服,端居庙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尝欲系其颈而制其命,伏其心而笞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击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斩馘献俘,忧思岩廊之上,谋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惩其罚,化其心而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贵藏有于无,兵之形不可张也。骚然而动,其政难久,人不可终扰,兵之精所宜密胜也。今陛下既枭叛寇,复征违命,屈己之至已浹于兆庶,恤人之诚已敷于四海。乘众之怒,用兵之形,则近无转输骚扰之勤,远无经费供求之役。诚能固守,必大畏其力,小怀其德矣。岂兵宿中原之为虞,生人耗竭之为虑!

臣又闻理国之本,富之为先;富人之方,劝农为大。三代以耕籍率天下,汉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劝之之道。夫农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昼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官输籍督,坐非己有。夷时郡邑长吏,偷容朝夕,养声钓禄,非恤人隐。此所以耕植之业不勤,恋本之心不固。有遁于军旅而邀功赏者,有冒于老、释而渎清浊者,有逸于负贩而制贫人者,有隐于椎剥而干教令者。农耕之难也如彼,日百其劝,常有不务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之为政,知人苦之者劝之必深,知人乐之者禁之必至。昔贾琮以最于十二州,颁之以玺书;黄霸以甲于二千石,宠之以侯印。惟陛下注意于守宰字人之官,以田垦辟为最,地荒榛、人离散为殿,即耕植可劝,困竭可苏。

兵未弭则人不蕃,人不蕃则农不劝,农不劝则国用虚,此榷酤所以兴也。然盐曲之税,山泽之利,法用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犹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则上无峻刻之举,下无重敛之困矣。

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臣闻王者之兴,皆鉴乎前代圣君贤佐之所以兴,昏主庸君之所以丧。景行其兴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丧也,用得以常存。诗人美殷鉴于有夏,贾山谏汉而借谕亡秦,备于图籍,著于编册,非臣繁词所可曲尽。自陛下统极,举滞淹,已逋责,恤刑狱,振乏绝,德泽所临,戴之不暇,微臣

未见其失也。明将来之戒,其在法令刑赏乎?四海之广,亿兆之众,非家令户告之能也,发号出令而已矣。

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献替,政之损益,灿乎其书,灼乎其人。始则鼓舞蹈咏不足以充其善,终则渴日望岁不足以喻其劳。教之本,莫大乎复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诚能复言重令,上之克当乎天心,下之允协乎人情,天人交相为感,而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不然,日有德音而人不悦,日有威罚而人不畏。苟不悦矣,无与同劝;苟不畏矣,无与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时之功者,宠乎其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荣乎其名者也。其名不足以劝者,则刑罚存焉;其效不得而宠者,则褒贬存焉。是小人之所趋,君子之所务。今陛下刑赏已足劝惩,褒贬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输力,举如鸿毛,拾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为,非不能也。

伏以致诛逆党,罪止渠魁,原情究恶,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馈军,致命折冲,渥恩必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赏也。然善有彰,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赏一人不足以耸天下之善者,其赏不足行;刑一人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赏不遗微细,惟功之所加;罚不为暴乱,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知赏之可重,而罚之可戒。

制策曰:昔主父惩患于晁错,而用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启迪末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臣闻汉兴鉴亡秦孤立之弊,踪《周官》众建之法,茅茅列土,非复异姓。其后吴、楚强大,本根不拔,晁错之策未终,七国之兵已发。主父念前事之败露,期本朝之强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诸侯之国,星解于上,汉廷之威,风行于下,此所以为谋也。齐桓当周季陵夷之运,思大彰诎霸之功,志图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务强兵。习之野,大国防其谋;习之朝,小国谨其备。其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俟,用为隐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

制策曰:执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获所从,吾心浩然,盖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

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无悼后害者。臣闻契者，君之所司也，综其会归，则庶务随而振之。职者，臣之所司也，践其轨迹，则百役通其流矣。委之于下者，委之职业也，非委其权；专之于上者，专其操持也，非专其事。赏罚好恶之出，生杀恩威之柄，此非权舆操持乎？委之于下，则上道不行矣。提衡举尺，守器执量，此非事与职业乎？专之于上，则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专其职业，孰虑无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职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于上，臣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属于下，君得举而明之。故《乾》之经曰首出庶物，《坤》之文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而《泰》形焉，阴阳离而《否》形焉。君臣之道，盖象乎此。

汉元优游于儒学，而权归王氏，失其所专也。光武责吏事于三公，而劳神簿书，集其所委也。一则旷而荡，一则察而狭，既非中道，不可以范。臣所谓阴阳乾坤之说，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载，如此而已。才者综物以研务，识者辨惑而不泥，体者抚往以经远，用者临事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辅陶钧，可以赞化育。微臣固陋，从师之说，循名而实不充，承问而学不称，进退殒越，惧烦刑书。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古代凭借大道驾驭天下，全都酌取世人的议论，用来建成各种功绩。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承接盛大的帝室统系，担当起重大的使命，志气在内心蕴积，政治清明往下照临，体恤黎民百姓而恩惠仁慈正深入人心，削平叛乱而威势武力已经达到雄盛。仍能在苗头还没显露时就忧虑到危险，在已经安定之后还谋求大治。追念大孝，就去继承前代的丰功伟绩，悯惜官吏发挥不出作用，就去求取斥责自己的最确当的言论。渺小的臣下我才干和用处不足以操持大事，体察和识见不足以筹划长远的规制，恭敬地承奉圣明的策问，跪拜而戒惧惊恐，恭谨地冒着死罪献上愚昧的对答。

皇帝的策问中说：皇帝我观察古代称王天下的人，接受皇天的命令，统领世人，全都兢兢业业，承奉皇天又顺从大地，无不思求贤能的人才来实现治理，求取正直的言论来听到过失。所以大禹对提出美

好建议的人就拜谢而高明的谋略就没有反映不上来的，汉朝征聘竭尽规谏的人而富有学识的君子就逐渐得到进用。匡正时世，救助社会弊病，没有不照这样去做的。后世递相循用，可却光有名义却没有实际的东西，于是又设立各种科目规定，增加对通明卓异人士的索求，舍弃斥责君主自身的最恰切的言论，赏识那些没有用处的虚浮文章，而指陈痛切又非常明晰的答卷，很少有在当代能著称的。这正是皇帝我叹息又深感悲哀并考虑索求到真才的原因啊！所以就表明恳切悽恻的诚意，询问主体和施用这两个方面的要领，希望你们所讲的可以行用，行用后还不厌倦。上面获取到益处，下面掏出了心里话，君臣之间欢悦地相处。你们这些士大夫能不奋勉地思索皇帝我这番话而大力阐明它们吗？臣下我听说，返回来和渡过去一直都谨慎又戒惧，尽管危险但结果必定会使人感到高兴。实现治理和获得安宁后又享乐放纵，尽管顺畅但必定会招来忧愁。帝尧构成他那道法真是太盛大了，《尚书》中称述他那根本所在，强调他诚信恭谨又能谦让。周文王构成他那德业真是太宏大了，《诗经》中赞美他那功业，强调他小心翼翼。谋求天下安定的人，必定要在辛劳上符合要求；考虑天下大局的人，必定要在细微处特别谨慎。任用贤才确实坚持到底，思虑确实特深远，百姓即使还没富庶，四方少数部族即使还没归服，但天下都清楚地知道他就要实现大治了。任用贤才不能坚持到底，思虑并不深远，百姓即使富庶了，四方少数部族即使归服了，天下也清楚地知道他就要面临动乱了。

如今陛下借鉴前代已经出现的失误，谋求当今还没形成的大治局面，使虚浮的文章不在下面铺张开，最恰切的言论必定要让上面都听到。严肃地做观察，专心地来听取，所委任的只是些贤才，上面也就获取到那益处了。封给爵位，发给俸禄，所做的处断只是正直这一条，下面也就掏出心里话了。斟酌那言论而采取举措，考虑对安定天下真有利，那还忧虑什么言论行用不了呢？留意那行用而采取举措，考虑对安定天下真有利，那还担心什么行用却产生厌倦呢？果真能在日理万机上总保持警戒，在大小政事上都感到危惧，如果确实践行了这一准则，即使微弱也必定会昌盛起来，即使柔弱也必定会变得刚强

起来。凤凰麒麟的来到就不在话下，甘露醴泉的招致也不在话下，日月星辰和四季的正常运行更不在话下。皇天是那样的高远明彻，并不吝惜它那道法；大地是那样的广博深厚，并不吝惜它那出产。那些重大的国政依然像这样，何况那细小的事务还困难吗？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我们国家光辉照耀四海，历时将近二百年了，十位前朝的圣帝弘扬那教化，天下各地感念他们的仁德，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礼仪没有不讲论的，由黄帝到周武王这六代的乐舞没有不兴行的。对大地在广泽坛进行祭祀，对皇天在名山举行报告成功的典礼。从周朝汉代以来，没有哪个朝代能比我朝更兴盛的了。自从祸患从边远地区开始酿成，重兵在中原长久不撤，众百姓穷困枯竭，死去了一多半。农耕和征战不是古代那种情形，吃穿用品很少有储备，忧念当今疲惫的百姓，还没达到富裕。督促农耕植桑的本业，可人们却没有留恋本业的心思；强化茶酒等商税的缴纳规定，而下面又有税收加码的危困。实行什么措施就可以恢复往日的强盛，采用什么办法就可以渡过当前的难关呢？对于以上问题，跪拜深感陛下蕴积着明彻的仁德，继承并担负起大业，据有十位前朝圣帝的整个辖区，守护着历代已经形成的礼仪乐舞，弘扬高祖皇帝的盛明光辉，播布太宗皇帝的美好功业。思虑到穷兵黩武而要消弭止息住它，忧念到疲惫百姓的富庶问题。治理正由顺从这种意向而实现，危亡也正由违反这种意向而发生。

兵力是国家威势的表现。威势立不起来，凶暴就禁遏不住。君主把握住那方式便将它平息下去了，施展出要领便将它平息下去了。凡是最善于动用兵力的人，就动用兵力的内在要素；较为善于动用兵力的人，就动用兵力的外在威力。动用内在要素，国家很轻松而功效又增倍；动用外在威力，世人劳苦而威势确立起来。法令一颁布就都执行，禁令一公布就都遵守，民间富足，刑罚几乎不施用，仁德足以让人感念，正义足以让人信服，稳稳在朝廷上坐定，威势延布到四海以外，而反叛的人常想自动戴上刑具，把性命交给朝廷随便处置，内心认罪而任凭朝廷施加刑罚。这是对兵力内在要素的动用啊！鸣金擂鼓，搏击刺杀，追击战败奔逃的敌军，攻下城池，夺占地盘，斩杀敌人，

献上俘虏，在朝廷上苦苦思索，谋求在千里战场上制服对方，而反叛的人确有理由畏惧朝廷的威力，把受到惩罚作为教训，改变自己的心念，收敛凶暴的行径。这是对兵力外在威力的动用啊！和乐地施行化导，具体效能不让它显出来，用兵贵在将实体藏伏在空无中，因而兵力的外在威力就不可以张布啊！使人惊扰地采取行动，朝政就很难长久，世人不可以总去搅扰他们，因而兵力的内在要素就应当秘密地去谋求胜利啊！如今陛下已经剿灭了叛乱的贼寇，又去征讨违抗朝廷命令的人。自己最大限度地承受委曲的举动已经得到亿万民众的衷心拥护，体恤百姓疾苦的诚意已经延布到四海。依凭众人对反叛者的恨怒，动用兵力的外在威力，近处就会没有缴纳粮草、骚扰民众的频繁举动，远处就会没有经费索求和提供的负担。果真能牢固持守这一条，必定会势力大的藩镇害怕朝廷的威力，势力小的藩镇感念朝廷的恩德了。哪里还会对重兵在中原长久不撤构成忧愁呢？对百姓消耗枯竭构成忧虑呢？

臣下我又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要把使人富足放在第一位；使人富足的办法，顶数鼓励农耕最重要。夏商周三代用天子在藉田中亲自耕种的大礼给全天下做出榜样来，汉朝把荐举孝敬友爱的人同荐举致力农耕的人相配合。这都是进行鼓励的具体措施啊！农民在天寒时就耕田，到热天时又锄草，身上和脚上沾满了泥巴，从白天到黑夜不停地费尽力气，父母兄弟的手掌和双脚都磨出了老茧，可官府逼交赋税，那些收成白白地就不归自己所有了。在平时，郡县的长官和属吏从早到晚只知道侥幸保住性命，骗取名声，捞到俸禄，根本不去体恤百姓的痛苦。这正是从事农耕植桑的本业不辛勤，留恋本业的心思不牢固的原因所在啊！既有藏匿到军队中去骗取功劳赏赐的人，又有混充到道教宫观和佛教寺院中而搅乱出家人与世俗人的区别的人，既有混迹在商贩中而诈骗穷人的人，又有隐身在盗贼中而触犯法令的人。农耕既然像那样地艰难，即使每天进行上百次鼓励，也常有不去干的人了。懒惰游荡既然像这样地享福，即使每天宣布一百回禁令，也常有不罢休的人了。这正取决于上面设布政务，心里明白那类人们感到痛苦的事情，对它进行鼓励就必定要深切；心里明白

那类人们感到快乐的事情，对它加以禁遏就必定要最严厉。从前东汉的交阯刺史贾琮在十二州中政绩数第一，就对他颁降玺书特予征拜。西汉的颍川太守黄霸在所有的太守中治绩最突出，就赐给他关内侯的大印来表示优待。只请陛下对管理地方、抚育百姓的郡守县令特别留意，把田地得到开垦作为治绩第一，把田地荒芜、百姓离散作为治绩最差，也就农耕植桑可以激励起来，困穷枯竭可以缓解复苏了。

战争还没平息下来，人口就繁衍不了；人口繁衍不了，农耕就激励不起来；农耕激励不起来，国家的财政就空虚，这是征收商税的起因啊！然而盐酒的税项，山川河流的物产收入，凭借征收的制度抓住那关键，不在于强化缴纳的规定。治理获取不到确能胜任的官吏，还不如宣明那制度。宣明了制度，抓住了关键，上面就没有严厉苛酷的举动了，下面也没有赋税加码的危困了。

陛下的策问中还说：过去的失误，哪些应当作为教训呢？将来的忧虑事，哪些应当引起警戒呢？臣下我听说，帝王兴起时，都借鉴前代圣明君主和贤良辅臣兴起的经验和昏庸君主败亡的教训。大力行用它那兴起的经验，就得以保持大治的局面；对它丧亡的教训引起警戒并慎重对待，就得以国家长存。诗人赞美商朝能把夏朝引为鉴戒，西汉的贾山规谏汉文帝而借用灭亡的秦朝做喻示。这都完整地载录在图籍中，显现在史册上，不是臣下我讲很多话就能完全表述清楚的。自从陛下登上帝位，提拔久居下位的贤才，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从轻处治罪犯，赈济困乏陷入绝境的贫民，恩德所施布到的地方，拥戴都还忙不迭呢！渺小的臣下我并没看到有什么失误啊！辨明将来应警戒的事情，恐怕还在于法令和赏赐与惩罚上吧？四海这样地广大，百姓这样地众多，绝对做不到给家家下命令，到每户去传告啊！发号施令也就行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谋求美好的国政，大力振扬宏大的规划，人们赞成与反对的意见，政事的减损与增益，在奏章中写得满纸生辉，在当事人上十分耀眼。开始时欢欣鼓舞咏唱舞蹈还不足以表达出那良好的愿望，到最后盼了一年又一年还不足以反映出那劳苦。

教化的根本,没有什么能比说了就兑现更为紧要的了;政务的头等大事,没有什么能比下令就算数更为紧要的了。果真能说了就兑现,下令就算数,往上面就符合皇天的心意,往下面就与人心相一致,天上和人间彼此形成感应,灾害就不发生,祸乱就不掀起。否则的话,每天都有仁德的诏书可人们并不喜欢,每天都有威严的刑罚可人们并不畏惧。如果都不喜欢了,那就没有一起能激励的人了;如果都不畏惧了,那就没有一起能抑制的人了。这就不是法令可以裁定的了。建成一时间的功绩的人,属于该去推崇他那功绩啊!思考长远利益的人,属于该去显扬他那名声啊!他那名声不足以拿来激励人们,刑罚就放到那里了。他那功效没资格予以优待,贬抑就摆在那里了。这正是小人所奔向的目标和君子所致力的对象啊!如今陛下的刑罚与赏赐已经足以起到激励和惩办的作用了,褒奖与贬抑又留存在文籍史书上面了。君子竭尽忠诚,小人献出全部的力量,举起就像吹羽毛那样容易,拾取就像捡草叶那样轻松,还有什么治理不能形成呢?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奏效呢?陛下只是不去做,决不是做不到呀!

跪拜还认为,对叛逆的一伙人进行讨伐,罪罚只限定在罪魁祸首上;体察情由追究恶棍,不牵连到他的父母。这是帝王的刑罚啊!将帅使部队人强马壮,豁出性命击败了敌军,对他们的恩赏必定要优厚,爵位必定要封赐,这是帝王霸主的赏赐啊!然而良善表现得特突出,即使他很低贱也要赏赐;奸恶挑起了事端,即使他很尊贵也要惩罚。赏赐一个人却不足以激励天下人都去行善,这样的赏赐不值得施予;惩罚一个人却不足以禁止住天下的凶暴行径,这样的惩罚不值得动用。现今应该做到赏赐不漏掉低贱渺小的人,只根据功劳来授予;惩罚不因参加了暴乱,只根据罪过的酿造者是谁来处置。这才是天下人都明白赏赐值得看重而惩罚该引起戒惧的做法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从前主父偃对晁错指出的祸患引为鉴戒,奏请由诸侯王分封各自的子弟。管仲使齐桓公称霸天下,实行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对策。精详地探求古人的用意,启迪还不明智的君主的心怀,特想在这方面能有广泛的了解,你们固然该去详尽地究明。臣下我听说,汉朝建立后,把灭亡的秦朝没有自家子弟做卫护的

弊端作为鉴戒，追踪《周官》大范围册封同姓诸侯的做法，也按仪式分封子弟，不再有刘姓以外的受封者。后来吴国、楚国势力强大起来，中央王朝指挥不动了，晁错请求削弱诸侯王国的计策还没实施完毕，七个诸侯王国的军队就已经叛乱了。主父偃念及到前朝政事的明显失误，希望汉武帝执政期间能强大，就建议由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使他们有权施布私恩。于是各个诸侯王国，在上面像星辰一样散离开，而汉朝中央政府的威势，像风一样在下面延布。这是主父偃做筹划的目的所在啊！齐桓公正处在周朝后期的衰落际运上，思求大力地彰显匡扶王室又称霸诸侯的功业，志向企图吞并弱小的国家，力量要投注在攻打拒不服从的国家上，渴求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在壮大兵力上下气力。但在原野上演练，大国就会防备他的图谋；在朝廷上演练，小国就会加强自身的防备。他那志向没办法迅速实现，他那功业没办法立即建成，于是就施行别人看不出来的国政，而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这是他称霸诸侯的原由所在啊！

二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执持吉凶关键的做法，在于无为而治，不去发号施令。可是把一切都交给下面去料理，人就借机谋取私利；全都由上面来决断，下面就建不成功绩。汉元帝对儒学一味地涉猎，可盛大的帝业到最后却衰败了。东汉光武帝对公卿大臣督察验核，政务严苛并不属于美好之类。对这两种倾向的取用与舍弃，还没获取到该依从的那一种。皇帝我心中一片渺茫，更加感到疑惑了。如今你们这些士大夫要周详地究明以上的主张和义旨，在答卷上连贯地写出来。兴用由皇帝我这里做出决定，你们不要为以后的祸害感到悲哀。对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吉凶的关键属于君主所执掌的东西，综括起会聚归从的目标，各种政事就该随之振作起来。职责属于臣僚所承当的东西，按照那轨迹步步走下去，各种任务就该各自完成得顺利了。把政事交付给下面去料理，是把职责交付给他们啊！并不是把权力交付给他们。一切由上面来做决断，是对大政方针做出决断啊！并不是对具体政事做出决断。赏赐惩罚和喜好憎恶的宣示，让谁生叫谁死和恩德威慑的决定权，这还不是决断大政方针的入手处吗？把它们交付给下面，上面的准则就贯彻不下去了。提起秤砣举起铜尺，守

住衡器执定量具，这还不是政事与职责吗？把它们都由上面来做决断，下面的功绩就建不成了。不把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付给下面，下面能在哪里按照私意干呢？不把下面的职责都揽在上面，会忧虑谁能没有功效呢？君主要掌握住那大权，臣下要履行好自己的职守。然而大权不能在上面极度运用，臣下有权辅佐而助成它。职守不能在下面谁都管不着，君主有权指示而彰明它。所以《易经·乾卦》的《彖辞》说：皇天最先化生出万物。《坤卦》的《文言》说：大地的法则是无所成就而代替皇天具有最后的结果。《乾卦》，代表着阳性的事物；《坤卦》，代表着阴性的事务。阴阳交合，《泰卦》的卦象就显出来了；阴阳分离，《否卦》的卦象就显出来了。君主和臣下相处的法则，也就模仿这卦象啊！

汉元帝对儒学一味地涉猎，可大权却落入了外戚王氏的手中，这是失去了所独揽的东西啊！东汉光武帝对三公大臣督责官吏的事务，而对上报的公文费心思，这是统揽起交付给别人该干的事情了。一个是空旷又飘荡，一个是苛察又狭隘。已经不属于恰到好处的做法，就不能奉为法式。臣下我所讲的阴阳乾坤的说法，各自保留各自的作用而互相发生感应，然而便构成那长久的状态，配合着执持不变，也就像这个样罢了。有才能的人综括万物来研求成就的事务，有见识的人辨清疑惑的地方而不被拘泥住，会体察的人揣摩已往来筹划长远的问题，能施用的人面对事情而解决的办法就来了。神灵般地阐明它，就可以辅助阴阳的陶冶熔铸，就可以协助天地的化生养育。渺小的臣下我愚笨浅陋，依从师长的说法，按名义做验核而实际却对不上号，承奉策问而学识却不相配，进退简直惊恐得跌倒在地，只怕麻烦皇上动用那刑律。恭谨地对答如上。

独孤郁　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独孤郁(776～815)　字古风，洛阳(今属河南)人。为独孤及次子。始生而孤，与其兄独孤朗俱由伯父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宪宗元和元年(806)，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举，

名列第三，在白居易之上。即拜左拾遗，俄迁史馆修撰，进右补阙，持议鲠直坚定，时谓称职。寻充翰林学士，以岳父权德舆辅政，转任考功员外郎，仍兼修撰、判馆事，预修《德宗实录》。及德舆去位，复知制诰，仍为翰林学士。九年因病改秘书少监，遂卒，年仅40岁。议者均为其早逝而叹惜。

对：臣闻天发生以雷雨，圣人发生以号令，天道帝道并行于上，群僚庶物咸遂于下。伏惟陛下，与天为仁，与雷作解，臣则蠢动之一物也，气下乃出，安知其由？比于金石草木，物之无心者也，扣之或大鸣小鸣终始相生、清浊杂作变而成文者，以圣人击考之，不得藏其声也。若臣者朴直蠢愚，陛下考之而无声，是不如金石草木之无心矣，敢不极闻以对？伏以陛下发德音，访岩薮，招贤士，求直言，询可行之谋，垂不倦之听，欲使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此禹所以称大，汉所以称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

臣以为有国不患无贤，患不能用贤；不患无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众，非无贤也。然陛下蔑纡凝旒，或未之察，群臣各默默来朝而退，虽有贤哲，孰能辨之？观《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为君，坤为臣。君意下降，臣诚上达，则是天地交，泰之时也。君意不下降，臣诚不上达，则是天地不交，否之时也。

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视朝，未尝不从容问群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无不奖；上有一毫之失，下无不谏。或有引人禁内，或周旋禁中，疾则幸其第，没则临其丧，君臣之道可谓至矣。是以无遗才，无阙政，巍巍荡荡，与天无穷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专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于是胡亥常居禁中，群臣希见者，不闻其过。天下所以乱者，上下不交也。

伏惟陛下，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群臣各有所陈，陛下赐之温颜，尽其启沃言语。侍从之臣，得以奉其职，左右有所思，以贻来代。谏诤之官，与闻其政而献替之。使此辈无有所补，黜之可也。使其稍识大体，陛下与之论道讲政，岂不可裨于万一也，孰

敢不输其情乎？苟居位者不与之言，献直言者不与之用，又何必搜罗岩穴，远访不用之人，勤求不信之言乎？贤者固不来也，来者又何言也？此体用之要，求贤济理之术尽于是矣，惟陛下行之。

若生人之困于衣食而无恋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实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风，保抚其人如赤子。而乃倾其脂血，剥其生财，聚其技慧淫巧，以荡上心。天子诚以为物力有余，而不知其情也。执事者又未尝闻以生人艰苦为言而得罪者，岂其尽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于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达也？若臣者，草木孤贱，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

今天下困于商税，不均可谓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尝有人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万钱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为墟，居室崩坏，牛羊奴婢十不余一，而公家之税曾不稍蠲，督责鞭笞，死亡而后已。于是州伯邑长，方以人安赋集，攘臂于其间，趋办朝廷，用升考绩，取彼逋责，均其所存，展转奔逃，又升户口。是以赋益重而人益贫，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财赋均一，而无日蹙之患，宜视通邑之盈虚，使乡户坐于田迭相隐，核其上下，不使贪官贼吏纷动其间，则有无轻重，可得而均也。

夫古有四人，今转加七。计口而十分之，其所以尽悴出赋而衣食其九者，农夫、蚕妇而已。绛衣浅带，以代农者，人十之一。缦胡之缨，短后之服，仰衣食县官者，人十之二。髡头坏衣，不耕不蚕，坐而供养者，人十之二。审曲面势，以饬五材，鬻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时射利，贸迁有无，取倍称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给衣食者，人十之一。其余为农桑之数焉。农夫糠核不足，而十人者畜马厌粱粟。蚕妇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袭罗纨。是以性近儒则入仕，近武则从军，善计则贸迁，避事则髡削，技巧则为工师，拙奸则为驵侩。非戆愚专一无他肠者，孰肯勤体效力，为稼穑之苦乎？且以田废而衣食罕者，户口所在减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诚能宽农人之征而优乐之，杜众邪之门而困辱之，则农桑益而衣食有余也。

自兵革以来，人多流散，版籍废绝，户口荡析，加以忧惧，越于异

乡，未以侥幸，利其苟且。宽之则偷于朝夕，勤之则挺而陷于邪。又讹言焉，屋室聚为瓦砾，田野俱为榛芜。赋税不均，居者日困，又为此也。伏愿陛下，敕百姓所在编为土著，不即归之旧乡，缮黄籍，生则书之，死则去之，庶男女之所生，户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无田者给与公田假种食，因其井泉制为民居，为艺桑麻，种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输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犹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后人安其生，乐其业，而无奔亡之患矣。安土则敦本，敦本则人庶矣。税均则敛轻，敛轻则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为?以此济人，何难之有?

若夫盐榷者，经国之所资，财用之大宝也。然而当今之务，莫若修其业，除其弊，亦可以无重敛之困也。夫盐榷之重，弊失于商徒操利权，州县不奉法，贾太重而利太烦，布帛精粗不中数矣。夫以商徒操利权，则其利有时而废，州郡不敢谁何，是劝农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则各私其人而盗煮者行矣。贾太重，则贫者不堪矣。吏太烦，则糜费之者众矣。布帛精粗不中数，则女工徒损，风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罢盐铁之官以省费，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门，禁人为商以反其耕，损其厚贾以利其人。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齐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于国，大赖于人矣。酒酤之人，罢之可也。

夫既往之失不能久于其道，将来之虞中道尽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俭于其初，天下归焉；满假于其终，天下离焉。陛下以勤俭为恒，满假为戒，勤而不已，损之又损，慎终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

晁错所以急绳七国者，欲尊天子，恐削弱迟而祸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尽为郡县，无诸侯强大之患，无宗室葭莩之亲，而以推恩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齐桓之时，列国相倾，管夷吾欲辅霸业，恐诸侯先谋而为之备，是以修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战者必耕，耕者必战，无事则散之垄亩，有事则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验也。

夫舜之所以为圣人，以其选贤任能也。五教契也，五谷弃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龙也，共工垂也，舜无事焉。是以执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岂以必躬必亲，侵于百职，然

后以为圣乎？必也信而显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绩用不立，则有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刑罚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

儒家者流，示人以中而为之节，访其所至而导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长也。然迂者为之，则执古以非今，凝滞而不变。夫责课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责人之效重也。伏惟陛下，取汉光武之求实，勿务速成；用汉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滞。任人而示之所为，端拱而不失其勇，取舍之间，于此乎判矣。

陛下不能用臣言，不当问也；谓臣不能言其事，不当来也。既来矣，陛下问状，宜直其辞；既问矣，微臣尽忠，宜采其策。尽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谁欲为也？忠未见尽，直必有咎。吝构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盖有之矣，由未见其为人也。非天之与其刚健，地之与其直方，内不疑其身，外不疑于人，忧君而不顾其己，济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恻恻款款，出于骨髓，发于肝膈，如此其切于天下乎！

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怀其效以天下为忧，不怀其身以天下为念。知所以责难于君者，宜尽忠言；知所以尽忠于己者，宜及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庙之重，其可忽乎？属之于篇，勉之于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听说皇天用雷雨来震动和化生万物，圣人用号令来震撼驱使世人。天道与帝道在上面一起施用，众官员和万物就在下面全都顺从。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同皇天一样构成仁德，与春雷一样化解群生。臣下我只是愚蠢动弹的一个物件，气流降下来才生出，哪里知道那原由呢？同金石草木相比拟，属于物件中没有心灵的那一类啊！受到扣击就由始至终相应地发出大响声或小响声，清音和浊音错杂响起，变动而形成乐曲，由于圣人在敲击验定，就没办法藏起那声音来啊！像臣下我这样的人，朴素直率又蠢笨愚昧，陛下来验定却发不出声响，这就连金石草木没有心灵都比不上了，哪敢不亮出所听到的一切来做对答呢？跪拜又鉴于陛下发布仁德的圣旨，访求山林中的人，招揽贤士，求取正直的言论，询问可以行用的谋略，赐给

不厌倦的倾听，想使上面获取到益处，下面掏出心里话，君臣之间欢悦和谐地相处。这是夏禹号称地位最高，汉朝号称强盛的原因所在，原因也就是运用这套办法啊！臣下我哪里足以仰受承奉呢？

臣下我认为，拥有国家就不忧虑没有贤才，值得忧虑的是不能够任用贤才；也不忧虑没有正直的言论，值得忧虑的是不能够容忍正直的言论。如今朝廷这样地宏大，百官这样地众多，决不是没有贤才啊！然而陛下专心临朝听政，有的却未察识出来，众位臣僚各自默默地前来朝见又退下，即使有那贤能明智的人，谁又能辨别出他们来呢？观看《易经》中的卦象，上面是乾卦而下面是坤卦，也就组成了《否卦》；上面是坤卦而下面是乾卦，也就组成了《泰卦》。乾卦代表君主，坤卦代表臣僚。君主的意旨降示下来，臣僚的诚心传达上去，这就属于天地交合而顺畅的时候啊！君主的意旨不降示下来，臣僚的诚心不传达上去，这就属于天地不交合而闭塞的时候啊！

像我们的太宗文皇帝，每次临朝听政，未曾不态度和蔼地向群臣询问朝政的得失。下面有极小的美好表现，上面就没有不予以奖励的；上面有点滴的过失，下面就没有不进行规谏的。对有的人还引入到皇宫里，或在皇宫中漫步交谈，生病了就驾临他的府第去慰问，去世了就参加他的丧礼作祭奠。君主和臣僚相处的准则与方式可以称得上是达到极致了。所以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就没有存在缺陷的国政，高远又广大，同皇天一样浩无边际，这正由于上下交合又顺畅啊！秦朝的二世皇帝胡亥，信用身边的宦官，身边的宦官想执掌秦朝的大权，就教给胡亥说：陛下正年富力强，刚刚登上帝位，为什么偏要与公卿大臣在朝廷上裁断政事呢？政事出了差错，宣明这是群臣有过失也就行了。于是胡亥经常泡在皇宫中，群臣很少有能见到他的时候，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天下很快大乱，正因上下不交合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往上效法皇天，往下效法大地，在天地之间效法太宗皇帝。每次临朝听政宣布圣旨，都让群臣各有陈奏的意见，陛下用和蔼的态度对待他们，使他们把富有启发性的话语全讲完。辅政的身边大臣，得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左右涌生出什么想法，用来给日后留下谋划。负责谏诤的官员，参加到政事讨论中来，

提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假如这批官员对朝政没什么补益，罢免他们也就可以了。假如他们多少懂得一些国家施政的纲要，陛下与他们讨论大道，讲求政务，难道还不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又有谁竟敢不掏出心里话呢？如果身居官位的人陛下却不让他们说话，进献正直言论的人陛下却不予采用，又何必搜罗那些山林隐士，向远处寻访本来不想予以任用的人，辛勤地求取本来就觉得不必行用的言论呢？这样的话，贤能的人压根就不前来，前来的人又能讲些什么呢？这正属于主体和施用两个方面的要领和求取贤才、实现大治的办法，它们全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只请陛下实行它们。

至于众百姓在穿衣吃饭上很困乏，没有留恋本业的心思，只弄得重兵在中原地区长久不撤，这种状况认真地追究起来，正该说全属辖领一方的大臣的罪过啊！身为辖领一方的大臣，本应直接播布天子的美好仁风，保护并抚育治下的百姓如同婴儿。可竟然把他们的膏血全都榨出来，把他们的生存财物全都剥夺过来，把那些淫靡精巧的手工制品全都聚敛上来，进献给皇上，摇荡皇上的心念。天子还真以为天下物力绰绰有余，而不了解实情啊！负责政务的人也未曾听说他们有谁特向天子禀报民间百姓的疾苦，由这种隐瞒行径而受到惩治的人。帝王居身在九重天的上面，除去臣下披肝沥胆痛切地指明各种实情做奏报，又会通过什么渠道而把问题反映上去呢？像臣下我这样的人，如同草木孤单卑贱，正应该反复考虑确能做到的地方来讲论它们啊！

如今天下被商税所困扰，负担的比例并不均平可以称得上是太严重了。百姓忘掉本业，已经达到十分之九了。从前有的人家拥有上千亩良田，上千株桑树，上百间居室，二百五十多头牛羊，五百多名奴婢，所缴纳的赋税已经不低于七万钱了。然而还不到三、四年，桑树良田变成了废墟，居室残破不堪，牛羊和奴婢剩不下十分之一。可公家的赋税竟不减免一点点，鞭抽棒打只管催逼，死去才算完事了。于是各级地方长官恰恰又利用世人刚刚安定下来而赋税可以聚敛的机会，在他们当中捋胳膊卷袖子，赶紧按照朝廷的指令来收税，以便在政绩考核中得到提升，就又再收原来拖欠的税款，把它分摊到还活着

的人的身上,这些人从这里逃亡到那里,又在停留的地方列入户口的人数当中。所以就赋税越沉重而百姓也越贫困。这是赋税极不均平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啊!因此要想使世人的赋税变得均平统一,不再有那一天比一天减少的忧患,就该根据重要城镇的富足或空虚的情况,使乡间民户在倒手隐瞒田产上受到处罚,验核出大致的数量,不让贪官污吏在里面纷纷捞油水。这样一来,有无家产和赋税承担的轻重比例,就能变得均平了。

古代只有读书人、农民、工匠和商贩这四种职业的人,如今却增加到七种了。统计人口总数按十等分来推算,费尽苦力而交纳赋税并供养十分之九白吃饭的人,就是农夫和蚕妇而已。在总人口中,穿上红色袍服、腰插浅带而脱离了农民身份当上官的人,占去了十分之一。头戴缦服冠、身穿短后衣而靠国家供养的士兵们,占去了十分之二。剃光头发穿上烂僧袍,既不耕田又不养蚕织布,呆在那里就有人供养的和尚尼姑们,占去了十分之二。掂量曲直又察看宽窄,对分属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天然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出卖手艺而谋生的人,占去了十分之二。利用时机谋取利润,倒动买卖而收取成倍利息来谋生的商人们,占去了十分之二。在集市上晃来绕去给人牵线搭桥,用来养活妻儿老小,以便能吃穿不愁的人,占去了十分之一。最后剩下的那些人,才是农夫蚕妇的人口数。农夫吃糠粒还填不饱肚子,可一顿饭必定要摆下十个人的盛馔的人家,畜养的马匹都不爱吃上等的谷物了。蚕妇衣不蔽体,可一顿饭必定要摆下十个人的盛馔的人家,全都绫罗绸缎一件又一件。所以天资接近儒士的人就进入仕途当个官,天资接近武士的人就去当兵打仗,擅长计算的人就去做买卖,逃避苦差事的人就去剃发当和尚,有套手艺就去当工匠,奸猾差点劲儿就去集市上做个中间人。除非是憨厚愚昧得要命而没有其他心眼的人,还有谁肯去劳苦身躯,使出力气,从事农耕的苦活计呢?而且由于田地荒废,吃穿都不够,户口在所在地锐减,离开本业获取到的好处就多,这是赋税极不均平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啊!陛下果真能够放宽对农民的赋税征收,优待他们而使他们感到活着有意思,杜绝住各种奸邪行径的门路,让他们遭受困乏和羞辱。这样一来,农耕蚕桑就得到

发展,而吃穿也有剩余了。

自从战事发生以来,世人多数都流亡离散,国家户籍废弃断绝,户数和口数根本不存在了。再加上人们忧愁又恐惧,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侥幸还没在战火中死掉,就对活一天算一天感到挺好。放松对他们的管理,他们就从早到晚混饭吃;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有的就会铤而走险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谣言又四处传播,说什么老家的房屋都成了一堆瓦砾了,田野都变成乱草窠了。赋税不均平,住在某地的人们也一天比一天穷困,又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呀!跪拜希望陛下发布诏书,把百姓在现今所在地都编成当地的居民,不立刻让他们返回到故乡去,专门登记在黄纸户口簿上,生下哪个来了,就写上;谁死掉了,就勾销。致使生下的男子或女子,户数与口数的多少,能够具体掌握住。没有田地的人,把公家的田地拨给他们种,同时借给他们种籽和口粮,根据水井和泉水的分布情况组建成居民点,让他们种植桑麻,栽培蔬菜和蒲草,饲养猪狗,三年内不向公家缴纳租税。从开始组建到以后三年之内,还有跑到别处去的人,在他跑到的地方就用重罪来处罚他。这样做以后,人们就对自己的生计安心了,对自己的本业感到欢乐了,再也没有逃亡的忧患了。对土地留恋不想离开了,就会搞好本业;本业搞好了,人口就得到繁殖了。赋税均平,征敛就会轻微;征敛轻微了,世人就富裕了。采用这种办法去使民间变富庶,不兴盛还能有什么呢?采用这种办法去救助世人,还有什么难处呢?

至于盐酒等方面的商税,属于治理国家所依赖的东西和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一环啊!然而当今该下力量去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能比修明那职业和去除那弊端更为紧切的了。这样也能使人没有税收加码的危困了。盐酒等方面的商税太重,弊端出在商人把持着财利收入的权力和各个州县不按法规来办理。价钱定得太高而财利收入又一层层地剥取,布帛等物品的好坏根本就不符合度量衡制度了。由于商人把持着财利收入的权力,它那私财收入有时候就敢干脆不要了,而州郡却不敢对他们中的哪个人怎么样,这正是鼓励农民去追逐末业啊!各个州郡不按法规来办理,也就各自包庇各自的那伙人,私自煮盐之类的行径便兴行了。价钱定得太高,贫困的人根本就买不

起。收税的官吏一层层地剥取，白白消耗它的人就太多了。布帛等物品的好坏根本就不符合度量衡制度了，纺织的妇女就白白受到损害，民间风气变得越来越瞎糊弄，特浇薄，而上面也收不上商税来了。既然像这样，就应撤除主管盐铁专卖的官员，用来节省经费；取消各个州郡的地方政令，用来统一流通的渠道；禁止人们做买卖，用来促使他们返回到农业生产上；降低那高价，用来使人们获取到好处。叫商人快快出售，布帛等物品必定就质量精良了，用来统一民间的风气，加重财利的收入。这样去做，也就能对国家大有帮助，能对世人特有好处了。专门征收酒税的官吏，罢废他们也就行了。

以往的失误，正在于不能长久坚持那套正确的做法。将来的忧虑事，正在于恰如其份的准则彻底消失了。自古以来，帝王没有谁不在起始阶段不勤俭的，于是全天下都归从他；也没有谁不在最后不骄傲自满的，于是全天下都离开了他。陛下把勤俭作为总也不变的美德，把骄傲自满作为警戒的对象，勤勉而永不止息，对自己减损再减损，像对待起始阶段那样慎重对待最后阶段，持守而切莫丧失掉。天地能够那样地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一直运行不息啊！陛下难道可以止息吗？可以懈怠吗？

西汉的晁错急切地要约束住七个刘氏同姓诸侯国，原因在于打算尊崇天子，唯恐晚削弱它们，祸患就酿大了。主父偃建议让刘氏同姓诸侯王各自分封各自的子弟，原因在于利用他们的欲望而把诸侯王一个个地缩小势力，做起来更容易啊！如今天下一家，全都是归中央统辖的郡县，不存在诸侯王势力超过中央的祸患，也没有皇室宗族疏远淡薄的亲属关系网，却拿当年的推布私恩来加以强调，臣下我恐怕是做不到使天下听从的。在齐桓公的时候，各国相互倾轧，管仲想辅助齐桓公建成霸业，担心诸侯事先做出谋划来对齐国形成防备，所以就修明把军令寄寓在国政中的策略，而兵力和粮食就充足了。让作战的人一定要从事农业生产，叫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一定要会作战，无事时就分散到田地上去，有事时就授给他们盔甲和武器去上阵，古人的这种意图可以仿行并验证它啊！

虞舜成为大圣人，是因为他能选拔贤才和任用能人啊！有关五种

人伦纲常的教化,就交给契来掌管;粮食生产,就交给后稷来负责;刑罚施用,就交给皋陶来掌管;乐舞事宜,就交给后夔来负责;山林湖泽的出产,就交给伯益来掌管;治理洪水,就交给大禹来负责;传达朝廷命令和征集各地意见,就交给龙来掌管;器具制造,就交给垂来负责。虞舜自己却什么事也没有。所以就执持住吉庆的关键,稳稳坐在朝廷上,天下却大治了。哪里认为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又亲自处理,干涉众百官的具体职守,然后才成为大圣人呢?一定要信任大臣并彰显他们,鼓励大臣并放手让他们去做。任用他们却建立不起功绩来,就有把三苗驱逐到三危地带,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把鲧流放到羽山这样的惩治。刑罚有该施用的就必定施用,有谁还敢按照自己的私意干呢?

儒家学派的人,把最为适中的原则告知给世上人,并且给他们制定出节制自身的方法,防范他们能干的事情又引导他们去做通常做不到的事情,使君主与臣僚、父亲和儿子各自获取到各自的纯正状态。这是该学派的长处所在啊!然而迂腐的人践行它,就执定古代来否定当代,凝固呆滞而不知变通。督察验核,目的是指挥好百官啊!然而东汉光武帝实行这套做法却不属于美好之类,是因为责成官员拿出成效太苛刻了呀!跪拜敬请陛下,择取东汉光武帝的求取实际,但不要在迅速见效上用气力;取用西汉孝元帝的推崇儒学,但要清楚他那凝固呆滞。任用官员要指示他应该取得的政绩,稳坐朝廷也不丧失那勇做决断。在取用与舍弃二者之间,在这上面就明显地区分出来了。

陛下不能采用臣下我的意见,就不该进行策问;认为臣下我不能讲论那些事体,就不该加以征召。已经征召了,陛下询问情况,臣下我就应直截了当地说出心里话来。已经策问了,臣下我竭尽忠诚,陛下就该采用那对策。竭尽忠诚的人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直言不讳可有谁愿意这样做呢?忠诚未曾完全被人看出来,正直必定会有遗憾的地方。遗憾形成了可正直却不感到悔恨,不被相信可忠诚却不往回退,这种人是有过的了,因为世上还没看出他的为人啊!如果不是以下的这类人:皇天赋予给他刚强雄健,大地赋予给他正直方正,在

内心决不疑虑自身，在外界决不怀疑别人，忧念君主根本就不顾自己会怎么样，救助万物而不谋求好处，可还有谁肯诚挚又恳切，出自那骨髓，发自那肝胆，对天下如此地关注呢？

天下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啊！天下安定，渺小的臣下我就可以保全住性命；不安定，渺小的臣下我就不能保证不死掉。所以顾念那贡献就要把天下作为忧虑的对象，不考虑自身如何就要把天下作为念及的对象。懂得对君主进行责问诘难的人，就应该献出全部的忠言；也懂得在自己这方面应竭尽忠诚的人，就应该像这样考虑到整个天下。况且陛下守护住宗庙是那样的责任重大，哪能忽略呢？臣下我在答卷上连贯地写出来了，而从上面也需要加以奋勉，这全在陛下斟酌它而已。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戊子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帝若曰：盖闻昔之令王，体上圣之姿，御大宁之时。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负荷之重，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忽怠！至若穷神知化，以盛其德；经武纬文，以大其业。考古会极，通教化之源；明目达聪，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将何以匡逮而致之乎？

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谬戾，岂无根源？爰自近岁，仍敷大泽，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导人心，省徭役以丰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葺国学以振儒风，督废职以补维纲，备众官以叙贤俊，庶继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革变其俗，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愈失乎？仡闻嘉言，无或隐讳。

周之德，受田有经制；汉之法，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佣无依，率是编户。本为交易，焉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寡。酌于中道，其术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非造次而备察，才非错综而遍知。不必文采为轻重，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适变矫枉，渴于良规。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征于前训而可据，设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以称朕意。

皇帝提问说：听说古代的杰出帝王，体悟最高圣人的风范，驾驭极其安宁的时世，仍然担心治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便求取贤才，让他们发挥出作用；仍然担心各种举措还不恰如其份，便征询谏言，闻听到过失。何况像皇帝我这样孤陋寡闻又识见昏暗的人，承受到皇天和祖宗的各种福佑，想到肩负着帝业的重任，对发生动乱这类可怕事保持警惕，在求取贤才和征询谏言上，哪敢忽视或懈怠呢？至于竭尽神志，明了化导，用来使德业更盛大；筹谋文治武功，用来使帝业更扩展。考察古代，使世人全都归从那最高的行为准则，贯通教化的本源；仔细观察又多方听取，把视听的一切范围都包纳进来。这是皇帝我从早到晚一直放不下的志向啊！你们这些士大夫准备拿什么匡正皇帝我还没想到的事情，帮助我实现那志向呢？

从中古以后，谋求大治的君主相继涌现，全都特别激扬自己的志向，可功效却很难鲜亮地显出来。没有谁不想回归到质朴淳厚的远古状态，可浇薄的社会风气却经常煽起；没有谁不想遵用节俭的原则，可奢侈的物品却总受到重视；没有谁不想疏远奸邪的家伙，可擅长献媚的人却总得到进用；没有谁不想亲近庄重的人士，可忠诚正直的人却总遭到疏远；没有谁不想勉励人们归入到正义上来，可纯正的品行却总得不到修明；没有谁不想禁止人们去干坏事，可触犯法律的行径却总也止息不住。这些悖谬乖戾的现象，哪里没有产生的根源呢？从近年以来，施布广泛的恩泽，就像霜露降落的地方必定一律滋润一样。荡涤邪恶的东西，以便化导人心；减轻徭役，以便使物力丰盈；免除田租，以便使农家宽裕；整顿国家学府，以便振扬起儒风；督察荒废职守的现象，以便补救朝廷的纲纪；设置好各种官职，以便提拔贤士英才。希望由此继承我朝先帝的壮志，达到太平的境地。然而改变恶行的人却没听到真有谁，服役的人还没得安宁，农民没办法摆脱吃不饱的困境，读书人没途径通晓圣人的精微论断。在政事上取得业绩的人，还没在百官中有谁能被载录；缺少贤才的感叹，还没在天子吃完饭时不再涌发。对法度构成损害的东西没有不予以去除的，可法度还没得到修明；对朝政尤为紧要的事情，没有不加以施行

的,可朝政还没发扬光大起来。这难道是彻底转变社会风气,道法特广远而难以实现吗?又难道是没找到恰切的途径,政事越繁多也就越有闪失吗?期待着听到你们关于这方面的美好建议,不要有什么隐瞒和忌讳。

周朝的恩德,表现在授付田地定有固定的面积;汉朝的制度,表现在田地占有上定有最高的限额。如今田地块块连接,一半归富豪所有,流亡给人当雇工的人没有赖以存活的东西,可又都是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原本上是出自土地买卖,怎么能够剥夺富人的田产去拨给穷人呢?打算就按老样子走下去,又哪能做到拿多余的部分去弥补缺少的部分呢?在恰到好处的做法上细加斟酌,具体的措施又应如何办呢?取用人才只须看他的品行,不一定非会写文章不可;任命官员只根据他的才华,不一定非靠资历验核不可。然而品行要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就很难全面体察出来,才华要不是经过综合考察就很难彻底了解到。不一定要把写文章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对士子又能进用或斥退,不一定要把资历验核作为晋升的程式而对官吏又有先后次序做安排。适应变化,矫正偏失,在这方面渴求得到高明的对策。通过什么办法就能使天地的六种气流正常地流转,招来各种吉祥的兆应呢?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世人长寿,使百姓蒙受到仁恩呢?对以上问题的对答,要做到从古代的训条那里做验核而确有依据,在当代设布开又容易实行,不要繁杂,也不要混在一起讲,以便切合皇帝我的心意。

皇甫湜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皇甫湜(约777～约830)　字持正,新安(今浙江建德附近)人。宪宗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授陆泽尉。三年(808)复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对策第一。后仕至工部郎中、东都判官。其嗜酒使性,狂妄不羁,举止古怪,不可理喻。然与韩愈处于师友之间,为文奇崛。今有《皇甫持正文集》犹行于世。

对：臣伏见陛下征天下之士，亲策于庭，求贤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将以为虚策乎，将以求其实效乎？以为虚策，则后之缙绅者观书于太史氏，曰天子之忧人如此，急贤如此，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礼而问之！斯亦足以为名矣。若以得人为务，社稷之计为心，则不宜待之如是也。

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神，以聘问先之，以礼貌接之，造膝而言，虚心以受，犹恐惧殒越，而不得自尽其所怀。况乎坐之阶庭，试以文字，拳曲俯偻，承问而上对乎？且天下之事，难一二以疏举。臣所当言，又有非臣下所宜闻知，清问所不该，又郁而不得发。强附之于篇，考视者必以为余烦，又摈而不得进。陛下何惜一赐臣容足之地，于冕旒之前使得熟数之乎？可采则行之，无用则罢之，何损于明也？然臣不敢有望于是，谨旁缘圣问，粗竭愚弊。傥陛下怜察其志而宽其诛，赐之当日之间而卒其说，则覆照之下，形气之生，孰不幸甚！

制策曰：盖闻昔之令王，体上圣之姿，御大宁之时。犹惧理之未至也，求贤以致用；犹惧动之不中也，咨谏以闻过。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负荷之重，警风波之虞，求贤咨谏，岂敢怠忽！至若穷神知化，以盛其德；经武纬文，以大其业。考古会极，通教化之原；明目达聪，周视听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将何以匡逮而致之乎？此陛下之忧勤切至也。臣闻尧舜以有天下为己之累，而不以位为乐也。臣又闻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为国之经而不忘夙夜求贤咨谏，延及微士，臣有以见尧舜之心矣。

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顺阴阳之和以育物，事无不序，动无不时，此穷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杀禁暴则兵宜戢，文以经邦济时则化必行，此经武纬文之大业也。崇礼而明义，好士而尊儒，斥魏晋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汉已前盛明之理，斯考古会极之方也。任贤而勿贰，招谏而必行，屏近习之邪佞，进周行之骨鲠，斯明目达聪之道也。抑臣又闻先王所以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披颈负之明，断非僻之绪，其道易知也。盖左右仆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者，必有知礼者，出使足以尽情伪，居常足以助听览。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与公卿大夫讲

论政事，史书其举，官箴其阙，以至于百工庶人莫不谏而谤焉。济济之士为之股肱，赳赳武夫为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

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百执事奉朝请而退，而律且有议及乘舆之诛。未知为陛下出谏喉舌者为谁乎，为陛下爪牙者为谁乎？日夕侍起居，从燕游，与之论臣下之是非、赏罚之臧否者，复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何献替之有美？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贞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者。

诚能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日延宰辅，与论义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进之，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对以尽其词，可采者必行，有犯者无罪。王之爪士，宜择公卿大臣总统而分理之。则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财不足丰，蛮夷戎狄不足臣，休征嘉瑞不足致矣。又何虑乎视听之表有所不周乎？

制策曰：自中代已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砥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谀常进；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于义，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谬戾，岂无根源者。臣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王者之谓也。故人不从上之令而从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轨度其信，恕己及物，自诚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还，则异乎此。至诚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纵身以检物。虽砥砺其意，而事实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无其效也。

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无为至诚，所以浇风常扇也。欲人之俭约，而不率之以卑宫菲食，沈珠贵谷，所以侈物常贵也。欲远小人而好悦耳之言，所以巧谀常进也。欲近庄士而恶拂心之虑，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于义而贪浊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为非而法制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则谬戾之本，其在兹乎？陛下诚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

制策曰:爰自近岁,仍敷大泽,霜露所坠,沾濡必同。涤瑕秽以道人心,省徭役以丰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葺国学以振儒风,督废职以补维纲,备众官以序贤俊,庶继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闻,输劳者未艾,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岂丕变其俗,道广而难济乎?岂不得其门,事繁而每失乎?伫闻嘉言,无或隐讳者。臣以陛下涤瑕秽而改行者未闻,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在明赏罚,不在涤瑕秽也。故赏当善,罚当恶,天下晓然逃恶而趋善;赏当功,罚当罪,天下耸然远罪而趋功。则人自为理,而上无为矣。此尧舜之所以莅天下也。夫赏罚,皆报也。赏之失称,罚之不当,咎孰甚焉?

伏见兵兴已来,开权宜之道,行苟且之政。台省之官,王公之爵,滥于国郡,遍于舆台。将帅之臣,借绯紫而使令,定官位而奏请,名器均于土芥,操柄擅于爪牙。此其所以赏人而人不劝也。州县之断狱,月以千数,连年累纪,未闻有一疑狱而上于朝者,未闻有屈人而诉于王者。岂天下长吏尽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乡县州府各自为制,所怒则专杀,居常则臆断。人过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达,不其难乎?况乎赋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惧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罚人而人不沮也。

赏之不劝,罚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难焉。虽涤其瑕秽,惠奸贷法而已,又何为也!伏惟陛下慎用赏,赏必当功,则天下之善劝矣;慎用刑,刑必当罪,则天下之非沮矣。夫择人而任之,则僭滥不作;富庶而教之,则廉耻自生。如是则无所改其行,无所涤其瑕矣,又何足忧之哉?

陛下省徭役而输劳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长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则物力何惧乎不丰,劳者何忧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农室,而人犹艰食者,生者犹少而费者犹多故也。商乘坚而厌肥,工执轻而仰给,兵横行而厚禄,僧道无为而取资。劳苦顿瘁,终岁乏绝,滨于死而为农者,亦愚且少矣。况乎两税不均,失变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赋,随长吏自为之政乎!若困工商老释之邪末,均

田野布帛之征税，禁横暴之赋，减镇防之兵，则耕者如云，积者如山矣。

臣请再为陛下精言之。夫贱瑰奇之货，斥雕琢之淫，则工商之道自息矣。黜异端之学，使法不乱而教不烦，则老释之流当屏矣。且天下所以蒸蒸然者，岂非以兵乎？使税之厚而不可蠲徭役者，岂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边备未可去；中夏或虞，镇防未可罢。若就其功，则莫若减而练之可也。今之将帅，胜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众以固权位，行货以结恩泽，因循卤莽，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饬，使之教阅，简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无用，曷若少而必精乎？

又比者州府虚张名籍，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今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众之虚，曷若寡之实乎？一则以强兵，一则以宽赋。若江淮州郡，远寇戎，属清平，自非具使令、备仪注者，一切可罢。以其轻费代征徭，薄逋悬，然后慎择长吏，曲加绥抚，无四三年，则家给而人和，则横暴不作，赋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于人犹艰食乎？

陛下葺国学以振儒风而微言尚郁者，盖其所以干禄而得仕者，以章句记读而不由义理故也。若变其法，则可以除其弊矣。陛下督废职以补维纲，而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工者，实有司之罪也。今职备而不举，法具而不行。谏诤之官溢员，不闻直声；弹察之臣塞路，未尝直指。公卿大夫则侧合苟求，持禄养交，为亲戚计迁除，领簿籍而已。兴利之臣专以聚敛计数为务，共理之吏专以附上剥下为功，习以为常，渐以成俗。标异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涅泥者富贵立须。虽陛下焦劳聪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请下明诏，为画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职是法者，必有明绩，然后许迁擢。考功之殿最，无敢阿比而干刑司。则能者日进，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绩，将褒扬记述之不暇矣。

陛下备众官以序贤俊，而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者，由奉上者迁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犹以为多也。曲轮直枻，各适其用。今则不然。举于礼部，则曰幽昧凡陋而不可采；选

于吏部，则曰声名虚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则惧华而不实，敦质者则惧朴而寡能，冠盖之族则以为因依，微贱之人则以为幽险。上求之愈切，下搜之弥深。夫士何负于有司，而乃蹇顿之、抑刻之如是哉！

才能如积，郁抑居下。一朝阙将相之职、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则曰岳不降神，时之乏人。于是循环，其所已用者递迁。居上者不知格限，无闻声绩，或一时三拜，或再岁九迁，是以位高者当能也。是仕进之门常阖，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权，当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圣，夫岂不欲国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岂不欲人之足用乎？盖从来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岁各举所知于礼部、吏部，于计偕常选之中，访察推择。得其人则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则必行殿罚，以惩逾滥。则周之以宁，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叹，何有于圣朝乎？

陛下谓蠹于法者无不去，而法未修明；切于政者无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长吏不得其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伏见赦书节文，周备纤悉。然空文虚声，溢于视听，而实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主德不宣，王泽不流，虽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忧勤奉职，又何为也？夫将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号令，有朝令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昔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纲以张万目，澄源以清万派，则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广而难济，事繁而愈失也，实承诏将事者之罪耳。

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佣无依，率是编户。本为交易，焉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寡。酌于中道，其术如何者。臣闻古之道不可变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纣，周之幽厉，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乱。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元之际，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赡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实得以闻，一吏之犯得以诛，由此致也。是法之举，化之成，则田自均，人自赡，而天下陶然化矣，岂待曲防而事制乎？其与贞观、开元非异时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职，徒易其制，更其业，扰人敛怨而已矣。

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资考。然则行

非造次而备察，才非错综而遍知。不必文采为重轻，而士可进退；不必资考为程准，而吏有条贯。适变矫枉，渴于良规者。今之取士，以文学记读为法，其素履实行则无门而知。使由文学而进者，往往犯奸赃，为枭獍，此诚其弊也。

乾元以还，版籍斯坏，而所在游寄，莫知所从。伏请敕天下人士，未归者一皆复贯，愿留者则令著籍。置乡校县学州庠，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志。自乡升之县，自县升之州，自州升之礼部。公卿子弟尽育于京辇者，则使之必由太学，然后登有司。如是则其幼弱，其壮老，发言举足，云为趣进，皆可得而知矣。然后参以才艺，试其器用。诚取人之急务，伏惟陛下裁之。密资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资荫之常调者，宜仍旧贯。贤能之士，则皆行臣向者之谋，从有司长吏之举，其赏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

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气，来百祥？何施可以寿群生，仁众姓？征于前训而可据，设于当代而易从。勿猥勿并，以称朕意者。臣闻古者山林薮泽，皆有时禁。动作之为无差《月令》，则六气以序，百祥以来，而怀生之类莫不跻仁寿之域矣。今舍此而不务，杀胎毁卵，伤仁挠和，而使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断天下之屠，欲蕃物产而祈福祐，斯亦诬矣。伏惟陛下，动遵《月令》，前训可据之文也；事稽时禁，当代易从之道也。施之而不已，执之而有恒，则帝皇之美，远惭于今日矣。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征召天下的读书人，在殿廷上亲自进行策问，可以说求取贤才和谋求大治也达到极点了。然而臣下我还不清楚这样做是把它当成按惯例走走形式的策问呢？还是通过它来求得实效呢？如果是把它当成按惯例走走形式的策问，那么后世的士大夫们从史官那里观阅史书，就会说：天子忧虑百姓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急切地求取贤才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士子，竟亲加礼遇而策问他们！这也足以赢得那美名了。但如果把获取到人才作为目的，把筹划国家大计作为心念，那就不该像这样来对待他们了。

身为帝王，他那尊贵地位就如同皇天，他那威势就如同神灵。通过聘请问讯先向读书人表示礼遇，特用礼貌的态度接待他们，他们跪拜献上建议．天子虚心采纳，可他们仍旧恐惧到极点，没办法把胸中蕴藏的一切都自行倾吐出来。何况坐在殿廷上，用文章来测试，手掌得弯起来，身躯得俯下去，承奉策问来向上做对答呢！况且天下的事情，很难用一两项来逐条列举。臣下我本应讲说的东西，又有不属于臣下我需要闻知而清晰详明的策问又不包括在内的，于是就被憋在胸中没办法抒发出来了。硬行把它们附缀在答卷上，判卷的人一定会认为纯粹是多余的话，于是便摒弃而不予录取。陛下对赐给臣下我一块站住脚的地方，使我能在天子面前详尽做陈述可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可以采纳就施行它，没有用处就废弃它，对天子的圣明又有什么损害呢？然而臣下我对此不敢抱有奢望，恭谨地沿着圣明的策问，粗略地献上那愚蠢昏昧的全部看法。如果陛下哀怜体察那片心志而不予责罚，准许在答卷的时间内让把看法全讲完，那么在皇天和太阳般的覆盖与照耀下，形体和内气得以生发，还有谁不幸运到极点了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听说古代的杰出帝王，体悟最高圣人的风范，驾驭极其安宁的时世，仍然担心治理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便求取贤才，让他们发挥出作用；仍然担心各种举措还不恰如其份，便征询谏言，闻听到过失。何况像皇帝我这样孤陋寡闻又识见昏暗的人，承受到皇天和祖宗的各种福佑，想到肩负着帝业的重任，对发生动乱这类可怕事保持警惕，在求取贤才和征询谏言上，哪敢忽视或懈怠呢？至于竭尽神志，明了化导，用来使德业更盛大；筹谋文治武功，用来使帝业更扩展。考察古代，使世人全都归从那最高的行为准则，贯通教化的本源；仔细观察又多方听取，把视听的一切范围都包纳进来。这是皇帝我从早到晚一直放不下的志向啊！你们这些士大夫准备拿什么匡正皇帝我还没想到的事情，帮助我实现那志向呢？这番话正表明陛下忧惧勤勉真是恳切到极点了呀！臣下我听说唐尧虞舜把辖有天下当成自己的拖累，不把帝位看作快乐。臣下我又听说各种政事取得成功，必定在于对它们保持谨慎的态度；而结果落空，必定在于对它

们不当一回事。如今陛下念及古代帝王的训诫而不敢懈怠忽略，思考治国的大法而不忘记从早到晚去求取贤才，征询谏言，延及到渺小的读书人，臣下我这就确有理由地看出这真是唐尧虞舜的那种用心了。

效仿天地的法则去施布国政，顺从阴阳的和谐状态去化育万物，事体没有不步入正轨的，举动没有不切合时机的。这正是竭尽神志、明了化导的盛大德业啊！武功用来制止残杀，禁遏凶暴，而征战就应该止息；文治用来治理好国家，救助社会弊病，而化导就必定要兴行。这正是筹谋文治武功的盛大帝业啊！崇尚礼仪又宣明正义，喜好士子又尊崇儒学，摒弃曹魏晋代以后的衰败法度，考察汉朝周代以前的盛明治绩，这正是考察古代而使人们归从到最高行为准则上来的办法啊！任用贤才而不动摇，征询谏言必定行用，斥退邪僻献媚的身边那批人，进用忠诚耿直的正人君子，这正是仔细观察又多方听取的途径啊！臣下我又听说，古代的圣帝明王不察视就什么都一清二楚，不听取就什么都明明白白，播布开令人仰慕归从的圣明，断绝掉邪僻的端绪，具体的做法很容易了解到啊！这就是左右仆从，只按法定的东西来向天子做供应。其中必定有懂得法度的人，必定有懂得礼制的人，派他们出宫去办事，就足以把下面的各种情况了解到；平常做服侍，就足以对天子的视听有帮助。身边的臣子既然像这个样子了，又每天同公卿大夫讲论政事，史官记载下一言一行，百官指出失误所在，直至众工匠和普通百姓没有谁不进行规谏和诽谤。众多的贤士英才成为天子的大腿与臂膀，勇猛的武士成为天子的利爪和尖牙，这正是永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啊！

如今宰相进见也很有限，跟在身边的臣子全都丧失掉职守，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也只是按惯例朝见朝见就退下，况且刑律中还有议论圣驾就治罪的条款。真不清楚为陛下宣达命令和搜集谏言而充当喉舌的人究竟是谁？给陛下充当爪牙的人又究竟是谁呢？从早到晚服侍陛下的起居，陪伴日常的休息活动，与陛下议论臣僚的是非和赏罚对错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辅政的大臣得不到接近，武士不足以拼死来捍卫，那类肯定或否定的话语又有什么美好的地方呢？只会亵狎

并被阉割了的卑贱宦官，阴险狡诈的那帮家伙，打杂的那群人，怎么能让他们负责帝王诏书的传达，掌握兵权，在内部当成心腹来使用，在外部作为耳目来任用呢?这正是正人君子和义士寒心又收起志向，愤恨痛泣无法止住的原因啊!

果真能恢复周代的既定法度，去除汉朝末期的祸患，重新确立起谏官、史官、侍臣的职权，使他们围在前后左右，每天召见宰相，与他们讲论义理。在朝廷担任职务的人，逐个把他们召到面前来，亮出和蔼的态度，来稳住他们的心思，让他们长时间做对答，把话全讲完，可以采纳的就必定行用，出现冒犯的地方也不治罪。帝王的武士应选择公卿大臣统领又分别掌管他们。这样一来，朝政顺利推行开也就不在话下了，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也就不在话下了，世人和睦相处也就不在话下了，财富丰饶也就不在话下了，四方少数部族都来臣服也就不在话下了。美好吉祥的兆应纷纷降现也就不在话下了 这还忧虑什么视听的一切范围还有没包纳进来的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从中古以后，谋求大治的君主相继涌现，全都特别激扬自己的志向，可功效却很难鲜亮地显出来。没有谁不想回归到质朴淳厚的远古状态，可浇薄的社会风气却经常煽起；没有谁不想遵用节俭的原则，可奢侈的物品却总受到重视；没有谁不想疏远奸邪的家伙，可擅长献媚的人却总得到进用；没有谁不想亲近庄重的人士，可忠诚正直的人却总遭到疏远；没有谁不想勉励人们归入到正义上来，可纯正的品行却总得不到修明；没有谁不想禁止人们去干坏事，可触犯法律的行径却总也止息不住。这些悖谬乖戾的现象，哪里没有产生的根源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一旦克制自己，使言行完全符合礼制，天下人就都用仁来称赞他了。这正讲的是帝王该怎样做呀! 所以世人并不服从上面的命令但却看到他的美好行为便服从啊!远古时代的君主，用纯正亲自给天下做出榜样来，在信义上绝对说了就算数，从自己这方面设身处地来着想，扩展到万物那里去，自身特虔诚而使别人全都看得到。这正是他们化导如同神灵而天下整齐划一的原因啊!从中古以后，与这完全不一样了。自身特虔诚显示不出来，却想一味借助刑法来防范世人；自身忠正信实树立不

起来，却想本人放纵而偏去约束万物。尽管特别激扬自己的志向，但事实上却不两相吻合。这正是立有志向却无功效的原因啊！

想使人们像远古那样质朴淳厚，但君主却不能在很少有那私欲和不做人为干涉又极为虔诚上做出榜样来，这是浇薄的社会风气经常煽起的根由啊！想使人们都节俭，但君主却不能在修建低矮居室、饮食很简单和把珠玉放在山川中不开采、唯独看重粮食上树立起典范来，这是奢侈的物品总受到重视的根由啊！想疏远奸邪的家伙，但君主却爱听悦耳的话语，这是擅长献媚的人总得到进用的根由啊！想亲近庄重的人士，但君主却厌恶违逆自己心意的告诫言辞，这是忠诚正直的人总被疏远的根由啊！想勉励人们归入到正义上来，但污浊贪婪的人在当官，这是纯正的品行总也得不到修明的根由啊！想禁止人们干坏事，可法律执行起来不是同一个标准，这是触犯法律的行径总也止息不住的根由啊！所有这些悖谬乖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根由，恐怕就在这里吧？陛下果真能把它们完全扭转过来，功效就能立刻鲜亮地显出来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从近年以来，施布广泛的恩泽，就像霜露降落的地方必定一律滋润一样。荡涤邪恶的东西，以便化导人心；减轻徭役，以便使物力丰盈；免除田租，以便使农家宽裕；整顿国家学府，以便振扬起儒风；督察荒废职守的现象，以便补救朝廷的纲纪；设置好各种官职，以便提拔贤士英才。希望由此继承我朝先帝的壮志，达到太平的境地。然而改变恶行的人却没听到真有谁，服役的人还没得安宁，农民没办法摆脱吃不饱的困境，读书人没途径通晓圣人的精微论断。在政事上取得业绩的人，还没在百官中有谁能被载录；缺少贤才的感叹，还没在天子吃完饭时不再涌发。对法度构成危害的东西没有不予以去除的，可法度还没得到修明；对朝政尤为紧要的事情，没有不加以施行的，可朝政还没发扬光大起来。这难道是彻底转变社会风气，道法特广远而难以实现吗？又难道是没找到恰切的途径，政事越繁多也就常有闪失吗？期待着听到你们关于这方面的美好建议，不要有什么隐瞒和忌讳。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认为陛下荡涤邪恶的东西可改变恶行的人却没听到真有谁，这是由于朝政没从根

本做起的缘故啊！想让人们改变恶行，奉守道德，其实在于彰明赏赐和刑罚，并不在于荡涤邪恶的东西啊！所以赏赐正该适用于良善，刑罚正该适用于邪恶，使天下人明白要远离邪恶而归向良善。赏赐正该适用于立有功劳，刑罚正该适用于犯有罪过，使天下人惊恐地远离罪过而归向立功。这样一来，世人就自动构成治理而上面无事可做了。这正是唐尧虞舜统领天下的做法啊！赏赐和刑罚，都是一种回报。赏赐偏离了客观的对象，刑罚不恰当，还有什么过错比这更严重呢？

跪拜看到战事兴起以来，开启了灵活处置的门路，施行将就着办理的朝政。国家最高机构的官职和王公的爵号，在州郡多得很，遍布到各个战区。担任将帅的大臣，凭借赐给朝廷的官服来驱使指挥部众，先定好官位再奏请朝廷批准，国家官职和粪土草叶没什么两样，实权被下级所擅自行使。这正是对人赏赐而人仍旧不奋勉的原因啊！州县审断案件，每个月要按一千桩来计算，接连好几年也没听说有一桩疑难案件奏报到朝廷来，更没听说有蒙受冤屈的人到京城来告御状。这难道真是天下的地方长官全都像虞舜的法官皋陶那个样吗？国家法律、政府法规和行政条例、公文程式明摆在那里却不遵行，乡县州府各自制定本地的法规，对自己所恼怒的人说杀就杀，平常想怎样审判就怎样审判。世人犯下罪过还不知道该如何躲避，却想让他能投案自首，不也太难实现了吗？况且赋税徭役不固定，吃不饱又穿不暖，人们连死都不怕，还怎么能去远离罪过呢？这正是处罚人而人仍不服软的原因啊！

赏赐却人不奋勉，处罚却人不服软，还想让人改变恶行，这恐怕太困难了吧？尽管荡涤那些邪恶的东西，其实正是给歹徒带来好处又使法律更宽松罢了，还做它干什么用呢？跪拜只请陛下谨慎施行赏赐，赏赐必定要与功劳相对应，这样全天下的良善人就奋勉了。谨慎施用刑罚，刑罚必定要与罪过相对应，这样全天下的歹徒就服软了。择取合适的人选来任用他们，超越等级和胡作非为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富庶了再教化他们，廉洁和羞耻心自动就能产生出来。像这样也就没有要改变的恶行了，也没有要荡涤的邪恶的东西了，又哪里还值

得去忧虑它呢?

陛下减轻徭役而服役的人还没得安宁，这是由于小恩小惠没施布到所有人的身上而政府部门的长官有的从中作梗而未按诏令办的缘故啊!如果陛下扩大恩惠的范围并督察落实的情况,对物力还担心什么不丰盈呢?对服役的人还忧虑什么没得安宁呢?陛下免除田租,用来使农家宽裕,可人们还填不饱肚子,这是由于从事生产的人仍然很少而享用的人依旧太多的缘故啊! 商人坐着坚固的车子又连肉食都不爱吃,工匠拿着轻巧的工具而仰赖官廷供养,士兵横行霸道而享受优厚的军饷，和尚道士什么都不干而收取香火钱。劳苦困顿费尽气力而一年到头又贫乏困绝、濒临死亡去当农民的人,也太愚蠢并且少得很了。何况分春秋两季征收的赋税并不均平，没有灵活变通补救弊端的办法，繁多的横征暴敛又随地方长官自行制定的政务乱来一气呢!如果对工匠、商人、道士、和尚这些邪僻末等的人严加限制,均平农耕纺织的赋税征收,禁断横征暴敛,裁减重镇驻防的军队,也就从事农耕的人如同云团,粮食堆积如山了。

臣下我请求再为陛下精详地讲论这宗大事。不看重瑰丽奇特的物品,排斥精雕细刻的淫靡技艺,当工匠和做商人的谋生手段自动就消停下去了。罢黜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使法度不淆乱而教化不烦琐,道教与佛教这类说教就应当斥退了。况且天下提心吊胆,难道还不是由军队造成的吗?致使赋税沉重而没办法免除徭役,难道还不是由商人造成的吗?如今西北少数部族还没平定,边境的防卫不可以撤除；华夏内地有时还发生令人担忧的事件，重镇的驻守也不可以罢休。如果归结到实际的功效,那就最好是裁减兵员,训练好他们,这样也就行了。现今的将帅,确能胜任并懂得作战的人也太少了,只是依仗手下有部众来巩固自己的权位，进行贿赂来与朝廷掌权的人物相勾结,一切照老样子和本人脾气办事,保住富贵而已。哪里顾得上按时去训练军队,熟悉并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呢?现今如果特意加以申诫,责成他们检阅训练好军队,挑选出武艺出众的士兵,斥退原来卖酒宰牲口、做小买卖那伙人,士兵也就可以减省掉十分之五了。人多却无用处,哪里比得上人少但却一定很精干呢?

再有近来州府虚张户口人数，随意索求各种物资供应，把那多余的部分全都据为己有，用来扩充私财。现今如果验定户口登计数和实有人口数，用法规进行纠察，使用各类武器的士兵又可以省去十分之二了。人多却是虚数，哪里比得上人少但却属实呢？一则用来使军队强盛，一则用来减轻赋税。像长江淮河一带的州郡，远离战争地区，正归入太平的区域，原本上不属于供使用和充当仪仗队的人，全都可以裁减掉。用这笔裁减后剩下的费用来代替征发徭役，减轻拖欠税款的追缴，然后慎重择任州郡长官，设法加以慰抚，不超过三四年，家家户户就都富裕，人人就都和睦相处了，横征暴敛也不再发生，赋税自动就变得均平，实现大治而天下太平了，还去忧虑什么世人仍然填不饱肚子呢？

陛下整顿国家学府用来振扬起儒风，然而圣人的精微论断还未被阐明，这是由于谋取官位、得以入仕的途径只凭死记经文和做点儿解释却不凭义理的缘故啊！如果改变这种录取方法，就可以革除掉那弊病了。陛下督察荒废职守的现象用来补救朝廷的纲纪，然而在政事上取得业绩的人还没在百官中有谁能被载录，这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的罪过啊！现今官职齐备可却发挥不出作用，法度明摆在那里可却得不到执行。负责谏诤的官员多得超编，可却没人以正直著称。负责监察的官员多得堵满道路，可却未曾直接劾奏谁。掌管国家财政的臣僚专门把聚敛民财、计算数目作为唯一的事情，各级地方官吏专门把依附上司、盘剥百姓当成功绩。既成习惯便视为平常事，逐渐就形成了风气。显出与众不同而露出棱角的人，紧跟着就悔恨自己不该那样做。随大流儿而和稀泥的人，富贵立刻就能等来。尽管陛下焦虑辛劳和明察广闻像这样激切到了极点，可治理又得到了哪些扩展呢？跪拜恳请陛下颁布明确的诏书，形成统一的法度，使身居这一官位、管理这批民众、执行这套法度的人，必须取得明显的政绩，然后才准许晋升。考核政绩的部门决定谁属上等、谁属下等，不敢偏袒勾结而触犯法规。这样做了，贤能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得到进用，无能的人就一天比一天被斥退，而百官在政事上建立起业绩来，就眼看着褒奖表彰和记述载录忙得不可开交了。

陛下设置好各种官职用来提拔贤士英才，然而缺少贤才的感叹还没在吃完饭时不再涌发，这是由于对讨好上司的人提升太快而对身居下位的人苛求太深的缘故啊！古代取用官员，从十个人中选拔到五个，仍然认为人数太多了。对具有不同特长的人才，分别安排到适合本人的职位上。如今却不是这样。谁被荐举到礼部，礼部就说他一向不出名，平庸又浅陋，不能够录取。谁在吏部等选任，吏部就说他名声不切实际，不能够选用。擅长写文章的人，就害怕招来华而不实的评价；忠厚质朴的人，就害怕招来朴野而缺少才华的论定，名门望族便认为是承受到祖上的福份，普通读书人便认为是低贱邪僻。皇上求取越急切，下面挑剔就越苛刻。读书人对主管部门可有什么辜负的地方，可竟像这样来阻隔抑制他们呢？

怀有才能的人多得一跺压一跺，身在下面受压抑，而一旦将帅宰相和卿士大夫的职位出现空缺，求取胜任的人选又求取不到，就说什么名山不降现神灵，当代缺乏人才。在这时就来回拨拉，已经被任用的人按顺序往上升。身居高位的人不知道在一定的期限内应当做出贡献，在名望和政绩上都传扬不起来，有的在一个季度内三次受封拜，有的在两年内得到九次提升，因此谁职位高就把他当成有能耐。这就造成官职晋升的大门总被关住，而天子辖有的职官和天子的大权，就由五六个身居高位的人轮流把持住而已。凭借陛下的英明神圣，难道还不希望国家获取到贤才吗？凭借宰相的公正忠诚，难道还不希望人才足以任用吗？可却由于上述情况出现的时间太长了，一直沿续下来就成为那个样了。跪拜只请陛下严厉命令朝廷和州府官员，让他们每年向礼部、吏部分别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才，在随同各地入朝禀报政绩的官员进京应试和例行铨选当中，访求察辨，推举择选。获取的真是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们破格任用的职位，用异乎寻常的恩惠优待他们。获取的不是合适的人选，就必定实行考核结果属下等的处罚，用来给越级和冗滥的现象敲起警钟。这样做了，当年周朝由于人才众多而国家安宁的局面，虞舜时家家可以受到特殊表彰的景象，坐在那里就能实现了。缺乏人才的感叹，哪里还在圣明的朝代仍然存在呢？

陛下认为对法度构成危害的东西没有不予以去除的，可法度还没得到修明；对朝政尤为紧要的事情，没有不加以施行的，可朝政还没发扬光大起来。这是因为政府各个机构的长官并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舍去合适的人选来致力朝政，即使勤勉又能有什么收效呢？臣下我跪拜看到大赦天下的诏书的文字摘要，讲得周全完备又细致入微。然而空泛的文字和敷衍的话语让人听来和看上去一大堆，但实际功效和深厚的恩惠却丝毫没有施予给众百姓。君主的仁德不宣播，帝王的恩泽不流布，即使陛下睡觉醒来都在思求大治，宰相忧虑勤勉恪尽职守，又拿它来干什么用呢？想把枝叶弄直了，必定先要端正那老根。朝廷就是那老根啊，州郡就是那枝叶啊！如今朝廷的命令，有早晨下达而傍晚就作改变的了。各个政府机构的法式，有从前已经废除而现今又重新行用的了。跪拜只请陛下端正大纲来张布开各个细目；澄清源头来净化所有的支流，天下四方也就幸运到极点了。由此说来，并不是道法特广远而难以实现，政事越繁多也就越有闪失啊！实际上正是承奉诏令该去贯彻执行的官员们的罪过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周朝授付田地定有固定的面积，汉朝在田地占有上定有最高的限额。如今田地块块连接，一半归富豪所有，流亡给人当雇工的人没有赖以存活的东西，可又都是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原本上是出自土地买卖，怎么能够剥夺富人的田产去拨给穷人呢？打算就按老样子走下去，又哪能做到拿多余的部分去弥补缺少的部分呢？在恰到好处的做法上细加斟酌，具体的措施又该如何办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古代的准则不能够改变，但古代的制度不是非去行用不可啊！夏朝的帝桀，商朝的纣王，周朝的幽王和厉王，当他们在位时井田制度并没有废除，可天下却大乱了。我朝的太宗皇帝和玄宗皇帝，并没有推行井田制度，但天下却大治啊！在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不授付田地但却人人都有田地，不限定占有田地的最高数额可家家都很富裕，这种局面正是由朝廷端正，法令得到贯彻执行，有一个人的举报被朝廷闻知到，那个违犯法令的官吏就受到惩治所造成的呀！这表明法令确能贯彻执行，

教化形成，田地也就自然都有份，世人也就自然都富裕，而天下就欢乐地得到化导了，哪里还需要设法做防范和事事都做出规定来呢?现今并不是与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时代不同啊!法令如果还没得到贯彻执行，朝政如果失去了百官该做好的事情，光去改变那制度，重新确定人们的职业，只会搅扰世人，招来怨恨罢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取用人才只须看他的品行，不一定非会写文章不可；任命官员只根据他的才华，不一定非靠资历验核不可。然而品行要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就很难全面体察出来，才华要不是经过综合考察就很难彻底了解到。不一定要把会写文章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对士子又能进用或斥退，不一定要把资历验核作为晋升的程式而对官吏又有先后次序做安排。适应变化，矫正偏失，在这方面渴求得到高明的对策。臣下我就此问题来看，如今选取士子，把会写文章和记诵经典原文作为录取的标准，对于被录取者的一贯表现和实际的品行没途径能够了解到。致使通过会写文章被进用的人，往往犯下贪赃枉法的罪过，成为狠毒的家伙，这的确是特严重的弊病啊!

从我朝肃宗皇帝乾元年间以后，国家户籍遭到破坏，而流亡到各个地区的人不知道该归向哪里去。跪拜恳请命令天下的人士，还没返回故乡的人一律都返回到故乡去，愿意留在目前所在地的人，则让他们把全家姓名登记在当地的户籍上。设置乡、县、州三级地方学校，来教诲他们的子弟，培育这些人的才能与志向。由乡学选送到县学，由县学选送到州学，由州学选送到礼部。公卿大臣的子弟全在京师培育的人，就一定要使他们经过太学这一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然后推荐到主管部门那里。像这样做了，从他们幼年时期到壮年乃至老年，言语举止和所作所为以及追求的目标，就都可以了解出来了。然后再参酌才华技艺，测试他们当官供职的能力。这实在是择取人才的头等大事啊!跪拜只请陛下对此做出裁定来。强化资历验核的规定，对只会划分经文章节和解说字义的那些庸才，按资历和朝廷对功臣子弟的恩典来晋升的人，仍旧按旧有制度办。贤良的士子全都行用臣下我在上面提出的谋略，依从政府各部门长

官的荐举，该赏赐的必定予以赏赐，显示出法度定立了就算数，问题也就解决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通过什么办法就能使天地的六种气流正常地运转，招来各种吉祥的兆应呢?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世人长寿，使百姓蒙受到仁恩呢?对以上问题的对答，要做到从古代的训条那里做验核而确有依据,在当代设布开又容易实行。不要繁杂,也不要混在一起讲,以便切合皇帝我的心意。臣下我听说在古代,对山林湖泽都有每个季节的禁令,一切举动都与《月令》没有任何偏差,六种气流也就正常流转了,各种吉祥的兆应就都降现了,而所有动植物没有不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地的了。如今放弃这一条而不下力气去做，捕杀胎驹,毁灭卵蛋,损伤仁德,搅乱和气,竟让人们奉守佛教的法规,在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不许宰杀天下的牲畜,借此想繁衍物产,祈求福佑,这也简直太荒唐了。跪拜只请陛下一有举动就都遵循《月令》,这正是古代的训条可以作为依据的文字啊! 任何事情都考查季节的禁忌,这正是当代容易实行的做法啊! 施行它而不中断,执守它而有常性，五帝三皇的美好国政在当代面前也就大为逊色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庚寅科

进士试题

洪钟待撞赋

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诗

陈彦博　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诗

陈彦博(生卒年不详)　字朝英,闽县(治今福建福州市)人。宪宗元和五年(810)进士第三,官终贵溪令。

阿衡随逝水,池馆主他人。
天意能酬德,云孙喜庇身。
生前由直道,殁后振芳尘。
雨露新恩日,芝兰旧里春。
勋庸流十代,光彩映诸邻。
共贺升平日,从兹得谏臣。

国家的宰辅随同流去的清波而长辞人间了,
伴有池塘的馆舍却由他人做了主人。
皇天的意愿能对功德盛大的人给予回报,
九世嫡孙又为身躯得到了庇护而欢欣。
生前一切都按正直的准则来做处断,
逝世后依然振扬起那芬芳的尘埃。
在朝廷雨露般降赐新恩惠的日子里,
故居又像灵芝兰花那样春色满园。
卓异的功勋流布福庆长达十代,

光彩映照那远近的四邻。
共同庆贺天下太平的阶段，
从此以后又获取到了犯颜直谏的忠臣！

〔杨寄林译〕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丙申科

制科试题

策茂才异等科问

问：大禹求贤而夏德长茂，文王多士而周道缉熙。然则为政在人，人存政举。朕德薄化浅，嗣膺宝业，夙兴寅畏，若涉大川。求思至谟，庶答天诫。子大夫志行修洁，学术通赡，储思于天下之际，研精于大道之极，俨然就辟，良用嘉焉。

乃者夷夏多虞，烽鞞屡警，因之以荒馑，生人荡析，比屋榛芜。今八表甫清，万兵未戢。朕恭承丕绪，寤济横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汤受夏，周武定殷，刘矫赢弊，魏乘汉俗，以乱为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令典。同符今日，可举而行，精辩所长，著之于策。《禹谟》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纪，有守有为，是彝是训。经纶远古，用彰得失，国志详载，天官必书。成务济时，莫斯为急，并宜明敕功利，别白条流，较圣王之损益，揆今代之用舍，沿革之要，茂对所宜。

今欲废关市之征，轻什一之赋，归逾年之戍，罢无事之官，则国用靡资，军食尚歉，人多胥怨，边有侵轶。匠无良画，明示谋谟。其法令或不便于时，吏人将未适其任，贤士见沉于负俗，遗纲有补于化源。可以均沃增于原田，便工商于市肆。改制征物，厘创建正，复务官曹，澄清流品。使朝有济理之士，边有死难之臣，而返俗廉隅，还风朴略。必书效实，指陈利害。授简之外，尚有令图，各罄所闻，备申谠议。虚怀固久，勿隐予违。

提问：大禹求取贤才而夏朝的德业就长久又盛大，周文王延揽英杰而周朝的道法就一片光明。既然如此，那么施布国政在于人才如何，人才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国政就全面推行开了。皇帝我德行微薄，教化肤浅，继承并担负起帝业，从早到晚处于恭敬戒惧的状态，就像要渡过大河去一般。求取并思索最高明的治国谋略，希望能报谢

皇天降示的告诫。你们这些士大夫志向和品行高洁突出，学术通明又宏富，在天下正需要的时候积蓄着许多的想法，对治国大道的极致加以精详地研核，庄严郑重地响应朝廷的征召，确实值得赞许啊！

前不久边境一带和中原地区发生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事情，战争的迹象接连传来警报，随后就出现了饥荒，众百姓死的死，逃的逃，一户挨一户变成了废墟。如今八方边际刚刚肃清，各种战事还没止息。皇帝我恭敬地承接起我朝一脉相传的帝王统系，只管去救助这动乱的时世，希望实现太平，使制度焕然一新。况且成汤取代夏朝，周武王平定商朝，西汉刘氏矫正秦朝嬴氏的弊政，曹魏借助东汉末叶的社会风气，把大乱作为大治，用安宁取代危情险态。其中一定有最恰切的朝政留存在宪章法度上。那些和当今类似又可以推行的东西，请你们精确地辨明长处所在，写在答卷上。《大禹谟》中所讲的六种物资储存和三宗大事，周朝治国大法中的八项政务和五种纪时方式，以及有所遵守又有所作为，把天子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奉为常规与训条。像远古时代那样做谋划的情形，借此来彰明得失，这是正史详尽载录的内容，也是观测天象的官员必定要加以记述的东西。成就事务和救助时世，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紧要的了。你们应该一并明晰地阐发出功效与利益所在，清楚地区分出每个具体方面，比较古代圣明帝王递相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揣摩当今该取用和舍弃的东西，对沿承与变革的关键，大力地回答出最有用的那部分。

现今打算废除关卡和集市的商税征收，减轻按十分之一缴纳的田赋，让超过时间规定的戍卫士兵回到家乡去，裁撤没事干的官员，然而国家的费用还没有来源，军饷供应还缺少许多，人们大多心怀怨恨，边境上还有少数部族的侵扰。皇帝我真像工匠没有巧妙的设计，因而请你们明晰地开示那计策。法令有的还与目前状况不适应，官吏有的对自己的职务还不胜任，贤士被埋没在与世俗的抗争中，古代遗落的国家纲纪对教化的本源具有补益的地方，可以对原野的田地调剂好肥田与瘠薄地的搭配比例，对集市上的工匠商贩的经营活动很有利，改变制度与验定器物，刷新并创制礼仪乐舞和确定历法中该把哪个月作为岁首，恢复并充分发挥出各个政府机构的职能，分清官

员的类别与等级，使朝廷上拥有那协助实现大治的贤士，边区拥有为国难献身的臣僚，把社会风尚扭转到人人注意品行修养的境界，把民间习俗返归到朴素简单的状态。对以上这一切，你们一定要写明切实可行又见成效的对策，指出益处与害处所在。在策问的范围以外，如果还有高明的筹划意见，也可以各自说出本人所闻知的全部东西，毫无遗漏地申明正直的议论。皇帝我虚心等待本来就时间很长了，不要有什么隐瞒，致使皇帝我产生过错。

杜元颖　对茂才异等策

杜元颖(769～832)　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为唐初名相杜如晦五世孙。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宪宗元和元年(806)登吏部试博学宏辞科。十一年(816)复应茂才异等科制举，对策第一。先后充任幕府属员，入为翰林学士。手笔敏速，在平定淮西镇叛乱中多次起草诏书，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穆宗时骤为宰相，出镇蜀川，多方求索珍异玩好进献固宠，致使军民嗟怨，武备废弛。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且上表声明为诛虐帅杜元颖而起兵。由此贬为循州司马，三年后卒于贬所。

对：臣元颖案《周易》，君道下济，臣志上通，谓之泰。其繇曰：小往大来。臣历观书契以还，君德定位，未有遗斯道而能达聪明目，光极鸿业者也。伏惟陛下，诞膺明命，克敷文德，亲降大问，询于微臣。愚臣智识庸鄙，经术短浅，不足以充明诏之言，而隐罪大矣，敢不俯罄愚衷，仰谢万一？

制策曰：朕躬承丕绪，寔济横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汤受夏，周武定殷，刘矫嬴弊，魏乘汉俗，必有至政，存乎令典者。臣闻汤革夏政野以质，武革殷政鬼以文，秦暴以亡，汉宽以矫，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东汉既衰，皇纲幅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法以取威权。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礼，蹈驳前世，固非萧曹画一、文景更令之比也。虽曰革命，固无足采。陛

下承匕鬯以取大器，赫雷电以扫群凶，功高一戎，业定再造。欲维新制度，以救生灵，幽明动植，罔不称庆，实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愿献替，不惮斧钺，以干龙鳞，伏惟陛下少留意焉。

臣闻自古王者，易姓受氏，告成于天，则维新制度，以改人视听。所以示亡王之骄僻也，所以扬造邦之耿光也。其余少康复夏，武丁兴殷，武王兴周，光武绍汉，则皆举用旧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淳茂也，以辩其凶逆之滔天干纪也，以志其昭前之光而纂修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隐，始除暴乱，而建王业。我太宗叶赞经纶，增辉先圣，皇天眷祐，祚以名臣。于是酌之人心，参之典礼，立我王度，为万代业。陛下诚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极。矧乎周秦汉魏造邦之事，非臣之所宜言也。

臣又伏见去岁征臣等诏书，圣旨殷勤，忧天谪见。今制书首章则曰：求思至谟，庶答天诫；次曰：期至和平，维新制度；下曰：改制征物，厘创建正。臣伏念圣上，岂不以彗有布新之道，明欲承顺天意，旌于国章乎？

臣愚以为，自古灾眚多矣。大者天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蚀，小者星辰变谪，皆或应或否，系于其君之德也。夫严风不能凋翠叶，凝寒不能冰醇酎。何则？不当凋者，风则何有！不当冰者，寒亦胡为！然则灾眚者，天道之常，无德者当之，不为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为恭御，则德为之实而禳为之华，居其实不居其华，此社稷之景福也。

制策曰：《禹谟》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纪，有守有为，是彝是训。经纶邃古，用彰得失，国志详载，天官必书。成务济时，莫斯为急，宜明敕功利，别白条流者。臣闻夏禹之弼成五服也，肇漠六府三事；周武之诞敷明命也，实陈八政五纪。语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三事者德据以成。八政为经国之用，五纪为岁天之道。

别其条流，则曲直，木也，从革，金也，水以润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顺则五稼阜滋，谷登则烝人乃粒。直己以正德，理财以利用，务本以厚生，此九功所以惟叙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

货所以聚人也，祀所以仁鬼神也，司空实平水土，司寇实诘奸慝，司徒实敷五教，宾以叶多方，师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万有也。周星者岁之纪，合朔者月之纪，信旬者日之纪，星辰以察乾象，历数以授人时，此先王所以合德二仪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虽殊，其致一也。陛下执古之道，驭今之有，降此彝训，以及于臣，但禀师说，难副睿问。

制策曰：较前王之损益，揆今代之用舍，沿革之要，茂对所宜者。臣闻贯古今、蔽天壤而不可易者，道与德也。时损益而皆便于理者，名与物也。所以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倚道之主，莫不袭行。其余正朔服色，声名文物，则三代以降，逮乎陈、隋，各从其所尚尔。伏惟陛下，视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舍之，此沿革之要也。

制策曰：废关市之征，轻什一之赋者。臣以征关市、税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逾辙，无害于人，诚宜取之，以资国用。陛下明欲废之轻之，以息黔首，甚大惠也。然臣以为，百姓之患者不在于此，在于法令不一，赋敛迭兴，名目滋彰，杼轴皆尽尔。今王畿之内，外地州县，亦不当赋税者何有?镇守、团练，等使数州，又置节度、度支使。皆多聚强兵，增置部伍，车禾斗米，皆出于人，计其诛求，十倍王府。至于睚眦之际，不戢自焚，杀长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边陲有难，羽檄交驰，必不得一人尺铁，以资天讨。伏望陛下下旷然之诏，使内地州县悉依平时，旧帅故老尽罢，以息疲人，则天下赋税十减七八矣。

制策曰：归逾年之戍，罢无事之官者。臣闻王卒以旧，楚子所以败也；将骄卒惰，项梁所以亡也。今缘边将士，功已高，位已重，进不求赏，退不畏刑。伏望申命将帅，言于军中：有思归者，内以新卒代之；愿充军者，复以师律整之。夫如是，则军政必行，军政必行，则边无侵轶矣。臣又闻赏功以贵，任能以职，古之道也。伏见比岁诏旨，诸员外、兼、试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员，其余并依本资数进。陛下已得八柄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间焉?

制策曰：法有或不便于时，吏有或不适其任，贤士见沉于负

俗，遗纲有补于化源者。此皆经国大体，则当与朝之众君子议焉。臣位卑识寡，何足裨补?然臣以为，令合于经而人悦之者，可存也。令为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犹未安之者，可省也。若乃申黜幽陟明之典，则吏人砥节矣；遵弃瑕录能之义，则俊乂敕职矣。若王纲者，布于方册，顾在陛下行与不行，何谓之遗矣!

制策曰：均沃堉于原田，便工商于市肆者。臣闻度土功，因地利，所以惠众人也；禁末作，绝奇货，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于申明田令与不扰市人耳。

制策曰：改制征物，厘创建正者。伏以国家受命向二百年，宪章典礼，并吞千古。今陛下嗣圣御极，孝理君临，华夏既平，临欲改制。此皆先圣旧典，臣窃惜之。臣又闻夏以木德王，而正以人统；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统；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统。孔子曰：夏正为得天。此不易之道也。

制策曰：复务官曹，澄清流品者。臣闻设官分职，以赡王事，犹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见艰虞以来，增制使额类，官有二事，人无底从，销钱销食，十场十扰。今陛下欲使复务于官，人志所底，此为政之本也。臣闻政以贿成则廉者贪，匪直其道则贪者廉，此仕进之情也。今圣虑及此，孰不洁其源而浚其流乎?

制策曰：朝有济理之士，边有死难之臣者。臣闻舜举皋陶，汤举伊尹，则仁者至矣。今贤才夹辅，俊乂扬庭，犹沧海之富珠玑，昆山之积琼玉，但恐未察耳。伏望听政之暇，引备顾问，则十六相不专美于尧代矣。臣又闻子骄者不志孝，臣骄者不志忠。伏望陛下训将帅以礼，示师徒以义，则伏节犯难者，孰变其功乎?

制策曰：致俗廉隅，还风朴略者。臣以为非难也。其化始于朝廷，公卿大夫孰不尚退让，崇节俭，而率土之士，畴不从风而靡乎?制策曰：授简之外，悦有令图者。臣以为当今所务者，在于兴礼乐，务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余则诏书所以问臣纤悉矣。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杜元颖查验《周易》，为君之道施布到下

面，臣僚的想法传达到上面，这就叫做顺畅。《泰》卦的卦辞强调说：小的去了，大的来了。臣下我按次序观察文字出现以来，君主仁德，巩固住帝位，从来没有谁舍弃以上做法却能观察了解到天下各地的情况与反映而使大业弘扬到顶点的。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承受到皇天的明确命令，能够广泛地施布文德教化，亲自颁布下重大的策问，向渺小的臣下我做征询。愚昧的臣下我识见平庸浅陋，经术狭窄肤浅，不足以对答上圣明诏书提出的问题，然而故意做隐瞒的罪过可就太大了，哪里敢不跪拜说出心中全部的愚昧想法，往上对天子的恩情做出万分之一的报答呢？

皇帝的策问中说：皇帝我亲自承接起我朝一脉相传的帝王统系，只管去救助这动乱的时世，希望实现太平，使制度焕然一新。况且成汤取代夏朝，周武王平定商朝，西汉刘氏矫正秦朝嬴氏的弊政，曹魏借助东汉末叶的社会风气，必定有那最恰切的朝政保存在宪章法度上。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成汤用崇尚质朴去革除夏朝崇尚朴野的国政，周武王又用崇尚文采去革除商朝信从鬼神的国政，秦朝由于暴虐而灭亡，汉朝就用宽缓去进行矫正。这些都是古代帝王的宪章法度啊！等到东汉衰败以后，统一的天下四分五裂，曹操挟制天子来向诸侯发号施令，借用汉朝的法度来取得威慑天下的权力。中原大致平定以后，就夺取了帝位，它那政事刑罚和典章礼乐，把前代混杂搅合在一起，原本上就无法同西汉萧何与曹参前后保持法度一致，汉文帝与汉景帝递相改变政令相比拟，虽然号称取代前朝，压根就没有值得采择的。陛下承接祭祀的大礼来取得帝位，发出雷鸣闪电去扫除各个叛乱的家伙，功绩比手提一把宝剑定天下的汉高祖还盛大，勋业和东汉光武帝重新建立汉朝一个样。打算使制度焕然一新，去拯救一切生物，生存在暗处和明处的动物与植物没有不宣称吉庆的，实际上真是全天下幸运到了极点啊！然而臣下我私下的心意，存有想要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就不怕死刑加身，敢去触犯皇上最忌讳的地方，跪拜只请陛下稍微留意了。

臣下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取代前朝接受自家一姓的统治权，向皇天禀报成功，这才使制度焕然一新，用来改变世人的视听。目

的是宣明前朝灭亡的君主的骄奢邪僻，目的是播扬创建新皇朝的盛明光辉。其他像少康恢复夏朝的大业，武丁重新振兴起商朝，周武王使周朝正式建立起来，东汉光武帝承接起汉朝的统系，就都兴行采用原有的典章制度，用来昭明先帝在位期间的纯正盛大的美德，用来辨明反逆篡位者侵凌纲纪的滔天罪行，用来表明弘扬前代的功绩和继承并进一步修明前代的德业啊！我朝高祖皇帝多方面体恤民众的疾苦，开始铲除暴乱，建立起称王天下的事业。我朝太宗皇帝和谐地辅助开国大计，给圣明的先帝增添光辉，皇天顾念又佑护，给降生下著名的大臣。于是斟酌世人的心愿，参取前代的典章礼乐，定立起我朝称王天下的制度，构成千秋万代的基业。陛下确实应该恭敬地执守它，勤勉地推行它，与那皇天相配合，确立起我朝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何况周朝秦代和两汉曹魏创建国家的事体，根本就不是臣下我再应讲论的了。

臣下我跪拜又看到去年征召臣下我等人的诏书，圣明的旨意非常殷切，忧虑皇天的谴告降示下来。如今策问的诏书在开篇就说：求取并思索最高明的治国谋略，希望能报谢皇天的告诫。接下来又说：期待着实现太平，使制度焕然一新。最后还说：改变制度和验证文物，刷新并创制礼仪乐舞和确定历法中该把哪个月作为岁首。臣下我跪拜念及皇上，难道还不是因为彗星出现而有施布新政的预兆在内，明确地打算承奉并顺从皇天的意愿，在国家制度上显著地表现出来吗？

臣下我愚昧地认为，自古以来，灾殃简直太多了。最严重的是天崩地陷，其次是日蚀月蚀，轻微些的是星辰变得异常而谴告。它们有的应验，有的并不应验，完全以君主的仁德为转移啊！严酷的烈风并不能使翠绿的树叶变凋零，聚积的寒气并不能使反复酿成的醇酒结成冰。这是为什么呢？本来不该凋零的东西，风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本来不该结成冰的东西，寒气又能做出什么来呢？既然如此，那么灾殃也是皇天运行的正常现象，不具备仁德的君主才会承受到它，对具有道德的君主构不成危害，这也最明显不过了。陛下如果真想敬畏皇天，大力做好驾驭六条龙牵挽的车辆在天空中运行

的事情，就要把道德作为实际的东西而将祈祷禳除作为走形式的东西，在实际的东西上下气力，不在走形式的东西上费功夫。这正是国家的大福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大禹谟》中所讲的六类物资的储存和三宗大事，周朝治国大法中的八项政务和五种纪时方式，以及有所遵守又有所作为，把天子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奉为常规与训条。像远古时代那样做筹划的情形，借此来彰明得失，这是正史详尽载录的内容，也是观测天象的官员必定要加以记述的东西。成就事务和救助时世，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为紧要的了。你们应该一并明晰地阐发出功效与利益所在，清楚地区分出每个具体方面。对于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夏禹辅助帝舜最终形成五等地区的统属关系，是从做好六种物资的储存和三宗大事的谋略开始的。周武王最终向天下宣布明晰的政令，实际上是以箕子向他陈说八项政务和五种纪时方法为基础的。讲论它们的功效与利益所在，六种物资的储存，是世人依赖它才得以存活的；三宗大事，是道德凭借它才得以形成的。八项政务属于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五种纪时方式属于确定每年天象变化的做法。

区分出各个具体方面：能变弯曲又能变直，这属于木行；经过熔铸会变形，这属于金行。水行通过往下流而孕育万物，火行凭借火苗往上窜而与皇天相接，土行和顺，五谷就茂盛生长，五谷丰登，老百姓就有粮食吃。自身行得正，用来端正德性；料理好财政，用来使物尽其利；致力根本，用来使民众生活宽裕，这是由六府三事组成的九种功效井井有条的缘由啊！八项政务是：农业生产用来使世人存活，货币流通用来聚集起人群，祭祀用来报答鬼神，司空官实际上要搞好水利和民居等工程，司寇官实际上要纠察出奸恶的歹徒，司徒官实际上要广泛施行五种人伦纲常的教化，邦交官用来使各个邦国和睦相处，军事长官用来使国家显示出动用武力的七种功德。这正是古代帝王保有并治理好天下的有力措施啊！岁星在天空循环一周，这是年份的标记；阴历初一，这是月份的标记；十天一旬，这是日期的标记。观测星辰用来察辨天象的变化，推算

日月运行的度数用来向世人颁布历法，这正是古代帝王与天地合德的方式啊！获得到以上道法的人就称王天下，丧失掉以上道法的人就灭亡，古今尽管有差别，但那准则却是相同的啊！陛下执持古代的道法，驾驭当今的事务，颁降下这些固定不变的古训，来向臣下我做询问，臣下我只会秉承师长的说法做对答，很难切合明智的策问。

皇帝的制策中还说：比较古代帝王递相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揣摩当今该取用和舍弃的东西，对沿承与变革的关键，大力地回答出最有用的那部分。臣下我听说贯通古今又包纳天地而根本不能改变的东西，就是道法与仁德啊！依据时势进行减损或增益而对治理都有利的东西，正是名位与器物啊！所以没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礼法和没有声音的乐舞，只要是依靠大法的君主就没有谁不沿承行用。其他确定新岁首和服饰以及最主要的颜色，声教文明与典章制度，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一直到陈朝隋代，各自依从本朝所崇尚的对象罢了。跪拜只请陛下察辨它们当中良好的部分来行用，对不好的那部分就舍弃，这正是沿承与变革的关键所在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废除关卡和集市的商税征收，减轻按十分之一缴纳的田赋。臣下我认为，在关卡和集市上征收商税，对田地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这是古今通用的制度，如果不超出法定的标准，对百姓并没有什么危害。确实应当收取，用来保证国家的支出。陛下明确地打算废除或减轻它们，用来使黎民百姓得到生息，真是特大的恩惠啊！然而臣下我认为，百姓的忧患不在这上面，而在于法令不固定，赋税征收连连兴起，名目越来越繁多，财物被搜刮干净了。如今在京师直辖地区和外地的各个州县，又哪里有不承担粮税的呢？镇守使和团练使，在许多州都是同时各派一名去，又设置节度使、度支使。这些地方大员全都多多聚集起强悍的部队，增置亲兵，一车车的粮草和一斗斗的谷米，全都由众百姓提供，计算他们的严酷征收，比朝廷多十倍。至于在彼此动怒的时候，互不平息下来而自相火并，杀死长官，踏平城邑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了。突然间边境地区发生祸难，接连下达调兵的命令，必定得不到

一个人和半点儿兵器，用来协助朝廷的讨伐。跪拜希望陛下下达遍及全国的诏令，命令内地州县完全像平时那样施行管理，旧帅和老臣一律免职，用来使疲惫的百姓得到生息。这样做了，赋税就减少十分之七八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让超过时间规定的戍卫士兵回到家乡去，裁撤没事干的官员。臣下我听说朝廷的军队依靠老兵，这是春秋时楚共王被晋国打败的原因啊！将领骄傲士兵懈怠，这是秦末项梁灭亡的缘故啊！如今边境沿线的将士，功劳已经很高了，官位已经很重了，进击不追求恩赏，斥退不畏惧刑罚。跪拜希望陛下命令将帅向全军宣布：有想回故乡的人，招纳新兵来代替他；愿意留在部队的人，再按军律来整顿他。像这样做了，军政必定会推行开；军政必定推行开了，边境就没有少数部族的侵扰了。臣下我又听说拿高官来封赏有功的人，拿职位来任用贤能的人，这是古代的做法啊！跪拜看到近年的诏旨，凡属正员以外和兼任、代理的众官员，其中具有才华的人和能干的人，都改授正式在编的官员，其余的人一律依照本人的资历年限来晋升。这表明陛下已经获取到运用爵禄赏罚等八种重要手段驾驭功臣的方法了，渺小的臣下我又哪能介入到里面去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法令有的还与目前状况不适应，官吏有的对自己的职务还不胜任，贤士被埋没在与世俗的抗争中，古代遗留的国家纲纪对教化的本源具有补益的地方。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应当与朝廷上的众位君子议定它们。臣下我地位卑贱，见识很少，哪里足以做出补益呢？然而臣下我认为，法令符合经典而人们都喜爱的那部分，可以保留不动；法令专为补救弊端而制定，行用时间已经很长了可仍然还没固定下来的那部分，就该废除掉。至于申明对政绩平庸和政绩突出的官员分别予以罢免和提升的制度，官吏也就磨砺自己的节操了；遵从抛弃有污点的人和录用贤能的宗旨，英才也就努力履行好职责了。像国家的纲纪，都载列在典册上，只在陛下行用不行用罢了，怎么能说它们遗落了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可以对原野的田地调剂好肥田与瘠薄地的

搭配比例，对集市上的工匠商贩的经营活动很有利。臣下我听说测量土地的功效，顺从田地的出产，目的是给众百姓带来好处啊！禁止卑贱的行业活动，断绝奇异的货物，目的是给工匠商人带来好处啊！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申明土地法规和不搅扰买卖双方罢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改变制度与验定器物，刷新并创制礼仪乐舞和确定历法中该把哪个月作为岁首。跪拜鉴于我们国家承受天命将近二百年了，宪章礼典包纳了各个朝代。如今陛下继承先圣登上帝位，用一片孝心搞好治理，当好君主，华夏已经平定，再予统辖便想更改制度。这些都是前代圣帝的原定制度，臣下我私下为它们感到可惜啊！臣下我又听说夏朝凭借木行之德而称王天下，历法便采用代表人统的正月作岁首；商朝凭借金行之德而称王天下，历法便采用代表地统的十二月作岁首；周朝凭借火行之德而称王天下，历法便采用代表天统的十一月作岁首。孔老夫子曾说过：夏朝的历法属于获取到了皇天的法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定律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恢复并充分发挥出各个政府机构的职能，分清官员的类别与等级。臣下我听说设立官职，划分职守，用来完成帝王设布的政事，这就如同众星宿确定下在天空中的位置，共同来拱卫北极星啊！跪拜看到国家发生动乱以来，增添由皇帝派出的特使的员额与类别，致使官员出现侍奉两个上司的局面，人们不知道最终该听从哪一个。耗费钱财又耗费粮食，到哪里就给哪里造成搅扰。如今陛下打算恢复并充分发挥出各个政府机构的职能，人们的心志也就有归从的对象了，这是施布政事的根本所在啊！臣下我听说政事通过贿赂才能达到目的，本性很廉洁的官员也变得贪婪了；而使施政的原则端正起来，本性很贪婪的官员也变得廉洁了。这是人们在仕途上谋求进取的心态啊！如今皇上的圣明思虑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谁不让本源得到澄清并且疏通那支流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朝廷上拥有那协助实现大治的贤士，边区拥有为国难献身的臣僚。臣下我听说虞舜重用皋陶，商汤重用伊尹，仁德的人就都来到了。如今贤才站在左右辅助，英杰布满朝廷，就像大海中蕴藏着无数的珍珠，昆仑山中积蓄着众多的美玉，

只恐怕还没察辨出来罢了。跪拜希望陛下在听政的空闲时间里，接见臣僚，当作询问的对象。这样一来，像八元、八凯那样的十六名辅政大臣也就不被唐尧时期独享美誉了。臣下我又听说，当儿子的骄纵，就不会在孝敬上抱定心念；做臣僚的骄纵，就不会在忠诚上抱定心念。跪拜希望陛下用礼法去训导将帅，用正义去晓喻士兵。这样一来，为节操而捐躯和勇赴国难的人，还有谁会改变他那功用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把社会风尚扭转到人人注意品行修养的境界，把民间习俗返归到朴素简单的状态。臣下我认为这并不难办到啊！化导从朝廷上开始做起，公卿大夫还有谁不崇尚退避谦让，看重节俭呢？而全天下的士子又有谁不跟在风后倒下呢？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在策问的范围以外，如果还有高明的筹划意见就都讲出来。臣下我认为，目前应下大力做好的事情，在于兴行起礼仪乐舞，搞好农业生产，禁遏四处游荡混饭吃的人，抑制奢侈的行为。其余的事情，已经在诏书中用来策问臣下我的那些问题上非常细致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辛丑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帝若曰：盖闻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侧微，积德累勤，多历年所。夫经盛圣之虑，岂有遗哉！然犹好问察言，勤求贤士，盖以承天之任重，忧人之志深也。况朕长于深宫，涉道日浅，奉列圣之鸿绪，抚万宇之黎人，夙夜严恭，不敢有懈。实惧烛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详求谠言，以辅不逮。子大夫是宜发所蕴蓄，沃予虚怀，极意尽词，勿有隐讳。

昔王政之兴，必臻于康泰；霸道所立，犹致于富强。我国家提封溢于三代，酌宪兼乎百王，无尧汤之灾，积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凋讹，家无盖藏，公阙储蓄。卒乘之数，货币之资，统而较之，莫继前代。岂率土生殖变于古欤？将阜时政令失于今欤？固已揣摩，必穷利病，明征末失之渐，具陈兴复之谟。且文武兼学以成功，士农迭居以丰业，故家给足以恋本，才周可以应时。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资用，致令从事异心，难成考课，去秩无守，轻为惰游。指明共贯之方，斯合二途之利。

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为或差，得失斯远。将修睦劝义，则在下难知；将任数驭情，则人心益伪。思闻旨要，得合诚明，旌别比周之情，敷详忠厚之道。知人则哲，从古攸慎，九征恐泥，五事难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诣理，而行或乖方。宜陈取舍之端，用明真伪之辨。至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详延而至，可得直书。退有后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皇帝提问说：听说虞舜和大禹拥有天下，都是从卑贱的平民中崛起，积累仁德，勤劳不止，历经了很长的时间啊！经过了圣明宏大的计虑，哪里还会有遗漏的事情呢？然而他们仍旧喜好询问，体察身边的

议论,辛勤地求取贤士,这是因为承奉天命的责任太重大而为世人忧虑的心意又特深切啊!何况皇帝我一直生长在深宫中,涉猎治国大道的时间很短暂,承接起各位圣明先帝的绵长统系,辖领天下各地的百姓,从早到晚严肃恭敬,不敢出现半点儿懈怠。这实际上也是忧惧还没完全洞察治国的方方面面,还没明了自身反省的做法啊!所以就详尽地求取正直的言论,用来辅助那未曾考虑到的政事。你们这些士大夫由此就该抒发出平时所蕴积的东西,启迪皇帝我那没有任何成见的心怀,把想说的全都说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或忌讳。

从前称王天下的朝政兴行起来,必定会步入太平的境地;称霸天下的那套措施定立起来,仍旧会达到富强。我们国家的辖区比夏商周三代还要广大,酌定各种典章制度,包纳了各个帝王,没有唐尧和商汤所遇上的那类水灾与旱灾,积淀起列祖列宗的治绩。可世人还没大量繁衍又生活富裕,社会风气仍旧衰颓败落,私人那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公家这里没有仓库的储备。军队的数量,货物和钱币的资财,分别加到一起做统计,总数还比不上前代。这难道是因为全天下土地的出产竟和古代不一样了吗?还是因为致使社会富足的政令在当今出差错了呢?你们对这种情况原本上已经做过反复考虑了,一定要彻底指明那弊病所在,还要明晰地考察末代失误的愈演愈烈,详尽地陈述恢复与振兴的谋略。而且文武同时研习就会成就功业,读书与务农轮流进行就会使家业兴旺,因而家里富裕就足以留恋农耕,才能全面就可以应对时势的变化。近代以来却各自只朝一个方向发展,不相互依存又彼此施用,致使人们下力量去干什么就想法不同,很难形成考核督察数第一,抛弃常规而没有遵守的准则,轻易就成为懒惰游荡的人。你们要指明贯穿到一起的办法,聚合起这两方面的益处来。

总是强调教化与治理,希望酌定出最为适中的对策。但在具体施行中偶或出现偏差,得失的结果就相差悬殊了。打算修明和睦相处的方式,激励正义感,可下面的百姓却很难闹得懂。打算专用法律控制欲望,而人心就越发奸诈。想听到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主旨和要领,得以符合经典所提出的最真诚与明照一切的这种要求。仔细辨

别出相互勾结和团结一致的两种用心，全面阐明使人忠诚厚道的做法。真正了解人也就显出明智来了，这是自古以来都慎重对待的问题。可古代通过远近使用来考察人才的九种办法恐怕有点儿拘泥，从态度到思考等五个方面的修身事宜也难精确做出判断来。有的人在名望上能够使人佩服，可他的才能却应对不了各种事务；有的人在主张上都深得道理，可施行起来却不是那码事。你们应当陈述取用与舍弃的根源，阐明真伪的区别。至于朝廷还做得不够的地方，天下各地的弊病，既然把你们都请来了，就有权直截了当地把它们写在答卷上。退下后再有想说的事情，皇帝我就不予听取了。你们这些士大夫要勉励自己呀！

庞严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庞严（792～?）　字子肃，寿春（今属安徽）人。宪宗元和十年（815）进士及第，穆宗长庆元年（821）复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时年30岁。后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谏官。敬宗时出为江州刺史，又入为库部郎中。文宗大和二年（828）担任制举考策官，因惧宦官威权而不敢录取对策激切之刘蕡。再迁太常少卿。五年（831），权知京兆尹，以强干不避权豪而著称。性聪敏，辞章峭丽。然贪势嗜利，溺于声色，因醉而卒。

对：臣言，臣少从师学，讲论载籍为皇、为帝、为王、为霸之所行，理乱兴衰之所由起。迨壮岁而以身处穷贱，又得农桑工贾之利病，人情风俗之厚薄。思愿一发于明天子之前，郁抑于中，无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于南郊，回御丹凤楼，赦天下。臣与万姓咸观，列在大逵之南。祥风北来，时聆德音，乃闻有直言极谏之召，私自快喜，得进所志于今日也。今蒙陛下亲策于赤墀之下，惧所以烛理未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极意正词，勿有隐讳。臣其敢不直、不极而有阙陋哉？臣生三十年，实沐唐化，恨无以自效于日月之下。乃逢昌运，获进狂言，愿增天高，以益地厚。恳迫激切，不知所裁，谨昧死上愚对。

制策曰:昔王政之兴,必臻于康泰;霸道所立,犹致于富强。国家提封溢于三代,酌宪兼乎百王,无尧汤之灾,积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凋讹,家无盖藏,公阙储蓄。卒乘之数,货币之资,统而校之,莫继前代。岂率土生殖变于古欤?将阜时政令失于今欤?固已揣摩,必穷利病,明征末失之渐,具陈兴盛之谟。臣闻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礼乐刑政理者王。夫以处天下之尊,举四海之力,为皇、为帝,为王、为霸,致之一也,犹反掌之易。而况人之诚伪,时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于天,厚不取于地,远不致于四夷,师友辅弼而已矣。师友辅弼,岂有他求哉?贤哲忠信而已矣。

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念天地之无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蚀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贤哲,置诸左右,然后德尊而益至。臣日献其谟,君日行之;臣日闻其过,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于臣;其终也,百善归于君。以为皇者师,帝者友,卒未闻师圣于皇而友明于帝。后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献,或虑乎美归于下,是以言有所不听。臣有所替,或虑乎恶彰于己,是以过有所不去。然则曰谏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饮医工之药,而医工未必免病也,饮其药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异于人,颜色殊于众,而后饮其药,则疾之根本,得不为深乎!

今陛下迈皇、帝之圣,辅弼有师友之贤,所谓圣贤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犹虑乎人未蕃庶,俗尚凋讹,则理不优于三王,德不超于五帝。其致之哉,诚有道焉。臣愿陛下详视典图,舜禹所以待夔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汤、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吕、周召者何如哉;贞观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开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尧舜、成汤、文武之名,贞观、开元之理何如也?

今陛下自即位以来,舜禹之心已刑于四海矣。陛下尊敬师傅,拔用忠贤,谪弃奸贪,发散滞积,皆舜禹之心也。臣愿陛下尊敬之不废其道,拔用之不废其言,谪弃之今勿复之,散发之今勿敛之。《夏书》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陛下能终之,又何忧盖藏不赡于下人,储蓄有阙于公府?铸锋销镝,卒乘之数可减于后时;薄赋节用,货币之资可益于前代。末失之渐,莫甚于贤不任而政不修;兴盛之谟,莫先于复

开元而履贞观。则三代之康泰，可翘足而致。彼五霸富强之术，安足为陛下道哉！

制策曰：且文武兼学以成功，士农迭居以丰业，故家给足以恋本，才周可以应时。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资用，致令从事异心，难成考课，去秩无守，轻为惰游。指明共贯之方，讵合二途之利者。臣以为文武之道虽不同，士农之业虽各异，而要归于修其职业而济于时也。今之所谓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谓武者何哉？骑射而已。欲求兼学，其可得乎？经纬古今，文之业也；用之于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业也；用之于文，文之辅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备，其可得乎？今苟各视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济天下之务矣 。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广其道；汉高有三杰，以成其功。所以不求备于人，故能创业于前代，垂教于无穷者也。

士农迭居以丰业，今所以轻为惰游者，国家自幽蓟兵兴，人无土著。士者、农者，迁徙不常。慕政化则来，苦苛暴则去。禄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则知去秩者无守，不为游惰者，何所归乎？陛下端心克己于上，任贤使能于下，则文武各得其任，士农各安其业矣。宁虑家有不给，才有不周之患乎？

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为或差，得失斯远。将修睦劝义，则在下难知；将任数驭情，则人心益伪。思闻旨要，得合诚明，旌别比周之义，敷详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劝义为念，而以难知益伪为虑，岂耳目之臣未尽得贤乎？何忧叹之深也！自中代以降，淳朴既漓，贤不肖混淆，莫能两辨。臣以为天下之事，统而计之：善而不可以为恶者，十一二焉；恶而不可以为善者，十一二焉。其间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则贤人多也，惩劝不精则贪冒众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有所承流者乎？

且陛下左右惟贤，所进惟贤，则四目明，四聪达，不难知矣。陛下左右非贤，所进非贤，则伪行坚，伪言辨，心益伪矣。今陛下必择忠贤，居之左右，以为耳目，以为腹心矣。任忠贤，所进者复何疑乎？诚若是，则管夷吾、鲍叔牙，友进之不为比；祈奚、祈午，父进之不为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

制策曰：知人则哲，从古攸慎，九征恐泥，五事难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诣理，而行则乖方。宜陈取舍之端，用明真伪之辨者。陛下清问及此，非念切求贤取士之道乎！夫求贤取士，所以备官也；设官，所以分理众务也。夫得一尺之木，将斫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块之土，将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选人以仁，天下皆归于仁矣；选人以义，天下皆归于义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与义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悯默低柔；进人不以义，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于行，才有不足于用矣。陛下虽欲精五事，五事何术而精？虽欲法九征，九征焉得而法？若是求众务之理者，是以材与陶，以土与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难乎！

今朝廷开取士之门，不为不广。其中选择精详、望为俊彦者，通于进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选于是者十八九，诚有才有器，亦尽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浮华之名；所习者，雕虫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术；官牧守者，不知疾病之源。岂其有任事之才而无任事之智乎？盖艺非而职异也。

臣闻古者有豢龙之官。夫龙，神妙不测，变化无穷，而能节其嗜欲，察其动息，扰而制之，无所不得者，盖代袭其官，述修其业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马，岂尽性哉？必习而善矣。今纵未能大更其事，尚明殿最考绩之科，驱天下之人于修效饬行之地。假如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举某善，雪某冤，必擢而迁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举某善，雪某冤，又擢而迁之。蔑然无闻，不待罪而黜之。则下无蔽善党恶之情矣。下无蔽善党恶之情，则贤者不进于朝廷，复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称者乎！

制策曰：至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详延而至，可得直书。退有后言，朕所不取者。臣陈帝王之道于前矣，陛下又垂问以朝廷之阙，四方之弊，岂不欲跻人于善道，补政之阙遗哉？臣又陈取士任贤之道矣，陛下诚能任贤于上，待人于下，朝廷岂有阙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备繁细之事，以干聪明者矣。

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寿，使人迁善，使人无恶，统四夷于荒外，正百事于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厚耕植；欲人之寿，莫若

和阴阳;欲人迁善,莫若明劝赏;欲人无犯,莫若慎刑罚;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贤。忠贤不任,虽日亲众务,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修,虽日致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罚不慎,虽日杀千人,奸盗其得而止?劝赏未明,虽日爵千人,礼义其得而修?冤滥未尽雪,阴阳莫得而和;浮屠未尽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

抑臣又闻,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陛下惧化之未光,惧德之未洽,惧一物之失所,惧众政之有乖,访遗阙于下臣,张条目于清问。凡前强对者,莫不备陈所得,则陛下知之不难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万端,陛下深居九重,广有四海,安得劳心神于思虑之外,极圣明于视听之表!臣愿陛下:为一事必师于古,行一道必法于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泽,振雷霆之威。内得夔龙,掌万机之务;外选方召,视百事之成。利于上者,必虑于害人;怿于志者,必求诸非道。则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先禀报一下。臣下我从小就跟从老师学习,讲论经典中有关称皇天下与称帝天下、称王天下与称霸天下所行用的东西,治理与动乱、兴起与衰亡的原因所在。等到到了成年时期,由于自己处在贫穷卑贱的人群中,又了解到农耕蚕桑和工匠商贩的有利处和有害处以及人情习俗的淳厚与浇薄的情形。渴望在圣明的天子面前完全倾吐出来,可却憋在内心中,没有机缘主动把它献上去。本月初一那天,陛下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活动,返回时驾临丹凤楼,大赦天下。臣下我与众百姓都去观看,站立在大路的南面。吉祥的和风由北面吹来,当时就聆听到仁德的诏书,于是知道朝廷有直言极谏科目的征召,私下感到特别欢快和喜悦,得以在今天献呈上内心所积蓄的一切啊!目前承蒙陛下在殿阶下方亲自主持策问,策问中忧惧还没完全洞察治国的方方面面,还没明了自身反省的做法,于是命令臣下我等人把想说的话语全都说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或忌讳。臣下我哪里敢不直截了当又不倾吐一切而有遗漏或粗浅的地方呢?臣下我已经活在世上三十年了,实际正沐浴到大唐圣朝的化育,只恨没

办法在天子脚下主动贡献出力量，如今竟遇上国家昌盛的际运，得以进献狂妄的意见，希望能增进皇天的高远，补益大地的广厚。恳挚激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恭谨地冒着死罪来献上愚昧的对答。

皇帝的策问中说：从前称王天下的朝政兴行起来，必定会步入太平的境地；称霸天下的那套措施定立起来，仍旧会达到富强。我们国家的辖区比夏商周三代还要广大，酌定各种典章制度，包纳了各个帝王，没有唐尧和商汤所遇上的那类水灾与旱灾，积淀起列祖列宗的治绩。可世人还没大量繁衍又生活富裕，社会风气仍旧衰颓败落，私人那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公家这里没有仓库的储备。军队的数量，货物和钱币的资财，分别加到一起做统计，总数还比不上前代。这难道是因为全天下土地的出产竟和古代不一样了吗？还是因为致使社会富足的政令在当今出差错了呢？你们对这种情况原本上已经做过反复考虑了，一定要彻底指明那弊病所在，还要明晰地考察末代失误的愈演愈烈，详尽地陈述恢复与振兴的谋略。对以上问题，臣下我听说用大道进行化导的人，就称皇天下；用仁德进行教诲的人，就称帝天下；用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施行治理的人，就称王天下。凭借身居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上，调动四海的力量，称皇天下或称帝天下，称王天下或称霸天下，这些目标都是能够实现的呀！就像把手掌翻过来那样容易。何况世人的诚实与奸诈，时世的淳厚与浇薄，也必定是由上面扩展到下面去吧？称帝天下和称王天下的办法，高明并不从皇天那里降示下来，深厚并不从大地那里择取过来，广远并不从周边少数部族那里招引过来，只在于像对待师长或对待朋友那样来对待的辅政大臣罢了。像对待师长或对待朋友那样来对待的辅政大臣又哪里还有其他途径的访求呢？只在于看谁贤能又明智、忠诚又信实罢了。

因而古代的圣帝明王，考虑到天地也没有使万物全都正常生长的功效，于是就不把自己的德性看得最高；观望太阳和月亮还有发生日蚀或月蚀的时候，于是就不把自己的圣明看得最准确。必定要去访求贤能又明智的人，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德性更数第一而补益也到来了。大臣每天都进献自己的谋略，君主每天都施用它；大臣每天都指出有什么过失，君主每天都加以改正。在开始的时候，有

某种好事情是由大臣提出来的;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好事情都归在君主的名下。人们只认为称皇天下的君主只是像对待师长那样对待大臣,称帝天下的君主只是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大臣,从来也没听说过受到师长般对待的大臣比称皇天下的君主还神圣的,受到朋友般对待的大臣比称帝天下的君主还贤明的。后世的君主有的就不这样做了。大臣有献呈的东西,却担心美名会落到大臣的头上去,所以就对建议不予采纳。大臣有表示反对的意见,却担心恶行都在自己的身上表现出来,所以就对过失不加以改正。反过来便宣称:规谏我的过失,难道他们就必定纯正吗?可这样讲竟然不懂得疾病生在自己身上,一定要服用医师所开的药物,而医师本人不一定就能免除疾病,但服用他开的药物或许就会有效的呀!非等到体力和常人不一样了,脸色和众人差得多了,然后才去服用医师所开的药物,那么病根能不更严重了吗?

如今陛下超过那些称皇天下或称帝天下的圣人,辅政的大臣也有值得像对待师长或朋友那样去对待的贤才,正像人们所说的: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碰到了一起,而远古时代的大治景象就能够实现。但仍忧虑世人还没大量繁衍又生活富裕,社会风气仍旧衰颓败落,这正表明治绩还没胜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去,仁德还没超过黄帝等五帝去呀!要实现远古时代那样的大治景象,确实是有具体办法的啊!臣下我希望陛下精详地观阅经典和秘图,体察虞舜大禹是怎样对待后夔和契的,商朝的成汤和周朝的文王与武王又是怎样使伊尹、姜尚、周公及召公当辅臣的,我朝太宗皇帝在贞观年间又是怎样任用房玄龄与杜如晦的,玄宗皇帝在开元年间又是怎样信用姚崇与宋璟的,用来赢得唐尧虞舜和商汤以及周文王与周武王那样的美名又是怎样的,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的大治景象又是怎样的?

迄今陛下从登上帝位以来,虞舜大禹那样的用心已经给天下人做出典范来了。陛下尊敬太师太傅,识拔起用忠诚贤能的人,贬谪抛弃奸诈贪婪的人,把积聚的怨气都散发开来,这都是虞舜大禹那样的用心啊!臣下我希望陛下尊敬他们但不废弃他们指明的治国准则,识拔起用他们但不废弃他们提出的建议,贬谪抛弃那帮人但不重新恢

复他们的官职，散发出人们的怨气但不让它再聚积起来。《尚书》中的《夏书》部分曾说过：没有谁不有那良好的开端的，但却很少有能坚持到最后的。陛下能坚持到最后，还忧虑什么多余的粮食不在下面百姓那里特别多，仓库储备还在公家这里挺空虚呢？把各种兵器熔化销毁掉，军队的数量就可以在日后减少下来，减轻赋税又节约开支，货物和钱币的资财就可以超过前代去。末代失误的愈演愈烈，没有什么能比贤才不被任用而朝政得不到修明更为有害的了。重新振兴的谋略，没有什么能比恢复开元年间的治理和追踪贞观年间的举措更占首位的了。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的太平景象，可以抬起脚跟看它到来。春秋五霸那套富强的措施，哪里值得为陛下做讲述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而且文武同时研习就会成就功业，读书与务农轮流进行，就会使家业兴旺，因而家中富裕就足以留恋农耕，才能全面就可以应对时势的变化。近代以来却各自只朝一个方向发展，不相互依存又彼此施用，致使人们下力量去干什么就想法不同，很难形成考核督察数第一，抛弃常规而没有遵守的准则，轻易就成为懒惰游荡的人。你们要指明贯穿到一起的办法，聚合起这两方面的益处来。对以上问题，臣下我认为，文与武的内容方式尽管不同，读书人和农民的职业尽管各有特点，但总之要归结到修明各自的职业而对时势有帮助啊！如今所谓的文事又是什么呢？也就是会写华丽的文章而已。如今所谓的武事又是什么呢？也就是会骑马射箭而已。打算求取同时研习的人，能够获取到吗？筹划古今，这才是习文的本业呢！运用到武事上，就成为武事的德业啊！禁遏凶暴，止息战争，这才是习武的本业呢！运用到文事上，就成为文事的辅佐物啊！不修明本业却在细枝末节上用力气，打算求取那两方面都不缺的人，能够获取到吗？现今如果各自依据各自的特长授给相应的官职，也可以处理好天下的事务了。所以孔老夫子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类教育的科目，用来推广他的学说。汉高祖拥有萧何、张良、韩信这三杰，用来成就了他的帝业。因而不对人求全责备，所以就能在前代创建基业，给千秋万代留下训导啊！

古代读书与务农轮流进行，而如今轻易就成为懒惰游荡的人，原

因在于国家从幽州蓟镇兴起战事以来，人们没有在当地世代居住的处所。读书人和农民经常迁居流动。仰慕政治教化就前来，憎恶苛酷残暴就离去。人的福禄从生下来就有厚有薄，在田地蚕桑的占有上并不均平，由此就可以明白抛弃那常规的人就没有遵守的准则。他们不成为懒惰游荡的人，可该归向哪里去呢？陛下在上面端正心念又克制自己，在下面任用贤才又使用能人，文武就各自获得到胜任的职务，读书人和农民也各自在本业上安下心来了。这难道还要去忧虑民户有不富裕、才能有不周全的麻烦事吗？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总是强调教化与治理，希望酌定出最为适中的对策。但在具体施行中偶或出现偏差，得失的结果就相差悬殊了。打算修明和睦相处的方式，激励正义感，可下面的百姓却很难闹得懂。打算专用法律控制欲望，而人心就越发奸诈。想听到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主旨和要领，得以符合经典所提出的最真诚与明照一切的这种要求。仔细辨别出相互勾结和团结一致的两种用心，全面阐明使人忠诚厚道的做法。陛下把修明和睦相处的方式和激励正义感作为心念，又把下面难闹懂和人心更奸诈作为忧虑事，恐怕还是因为深予信任的臣僚还没完全获取到贤才吧？为什么忧愁和感叹那样地深重呢！自从中古以后，淳厚质朴的风气已经变得衰颓了，贤士和庸劣的人混淆在一起，很难区辨出这两类人来。臣下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合在一起进行估计，良善而绝不去做坏事的人，占去十分之一二；邪恶而根本不会去做好事的人，也占去十分之一二；介乎二者之间的十分之六七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好不坏的一般人啊！法令得到修明，贤人就会多起来；惩罚和鼓励不恰当，贪婪犯法的人就会多起来。这必定在于上面具有施行的东西而下面又有承奉命令加以播布的人吧？

况且陛下左右都是贤士，所进用的人也都是贤士，那就观察到天下的各种情况又听取到天下的所有意见了，而下面的百姓也就不难闹懂了呀！如果陛下左右并不是贤士，所进用的人也不是贤士，那就虚伪的行径决不更改，虚伪的言论更振振有词，内心更奸诈了呀！如今陛下一定要择取忠诚贤良的人，把他们安排在左右，作为耳目，作为心腹。任用了忠诚贤良的人，所进用的人还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

果真像这样，春秋时齐国的管夷仲和鲍叔牙，他们是好朋友，而鲍叔牙推荐管夷仲，却构不成相互勾结啊！春秋时晋国的祁奚和祁午，他们是父子，而祈奚推荐儿子祁午，却构不成为自己打算啊！这正在于陛下有所任用罢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真正了解人也就显出明智来了，这是自古以来都慎重对待的问题。古代通过远近使用考察人才的九种办法恐怕有点儿拘泥，从态度到思考等五个方面的修身事宜也难精确做出判断来。有的人在名望上能够使人佩服，可他的才能却应对不了各种事务；有的人在主张上都深得道理，可施行起来却不是那码事。你们应当陈述取用与舍弃的根源，阐明真伪的区别。陛下清晰详审的策问涉及到这个问题，还不是顾念那求取贤才和择用士子的办法吗？求取贤才和择用士子，目的在于使官员具有选任的余地啊！设置官员，目的在于分别掌理各种政务啊！获取到一尺长的木材，准备砍削它做东西用，必定要让木匠来干。有一块泥土，准备用水搅拌它做成器皿，必定要让陶工来干。如今陛下用仁德作标准来选取人才，天下就都归向仁德了；用正义作标准来选取人才，天下就都归向正义了。而治理天下的人，也必定要依靠仁德和正义的了。可如今朝廷任用人却不把仁德作为标准，竟看谁能哀悯沉默又恭敬顺从；提拔人却不把正义作为标准，竟看谁能因循守旧又犹豫不定。这就主张有与实际施行不一致的了，才能有应对不了各种事务的了。陛下尽管想在态度到思考等五个方面的修身事宜上做出精确的判断来，可这采用什么方法就能做出精确的判断来呢？尽管想效仿古代通过远近使用来考察人才的九种办法，可这又怎么就能效仿得了呢？像这样去谋求各种政务能有人掌理好，等于是把木材交给陶工去加工，把泥土交给木匠去铸造却想得到器具啊！这也不是太难了吗？

如今朝廷开辟取用士子的途径，不是不广泛。其中选择精详并希望真是英才的人，统统经由进士科的考试。朝廷和地方上的重要职位与清显官职，从这里面择任的有十分之八九。确实具有才华又具有器识的人，也都荟萃在里面了。然而所采择的，只是浮华的名气；所研习的，只是会写辞赋的雕虫小技。因而负责教化的朝廷官

员，不讲论称皇天下或称王天下的道法；担任地方长官的人，不知道百姓疾苦的根源。这哪里是他们具有担负职责的才能却没有担负职责的智慧呢？只是因为技艺不是那一套而职责又不是那一路呀！

臣下我听说古代设有豢龙这一官职。龙是神妙不测又变化无穷的，可却能使它节制住最喜爱的食物，察看它的动静情况，驯服并控制住它，想让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这是因为世代担任这一官职，继承并修明那本业啊！楚地的人们会驾驶船只，冀州的人们会骑马，哪里全是天性造成的呢？必定要练习才精通了呀！如今即使还不能彻底改变那些人的职守，但若能宣明谁属上等谁属下等的考核政绩的制度，就会把天下人引领到确有成效和修养好本人品行的境地。假设哪个人担任某一官职，显示出某种品行，搞好了某项政事，荐举了某位贤才，昭雪了某桩冤案，那就必定晋升他。晋升后又能显示出某种品行，搞好了某项政事，荐举了某位贤才，昭雪了某桩冤案，那就继续晋升他。而什么政绩也没有的人，不等治罪就先罢免他。这样一来，下面就没有压制贤才而包庇坏人的想法了。下面没有压制贤才而包庇坏人的想法，贤才不被提拔到朝廷上又能到哪里去呢？怎么还会存在具体主张与实际施行相违逆、才能与名望不相称的人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至于朝廷还做得不够的地方，天下各地的弊病，既然把你们都请来了，就有权把它们直截了当地写在答卷上。退下后再有想说的事情，皇帝我就不予听取了。臣下我在对策的开头部分已经陈述了称帝天下或称王天下的办法了，陛下又拿朝廷还做得不够的地方以及天下各地的弊病来进行询问，这难道还不是想把世人带入良善的行为规范中去，弥补朝政的缺陷与不足吗？臣下我又陈述那选取士子和任用贤才的办法了，陛下果真能在上面任用贤才，从下面等待他们做出成绩来，朝廷哪里还有缺陷得不到弥补的呢？天下各地怎能还有弊病却不去除掉的呢？何必再详尽陈述那些繁多琐细的事务而去扰乱陛下的视听呢！

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谁不想使世人富裕起来，使世人获得长寿，使世人归向良善，使世人没有恶行，在最遥远的地区统辖起四方的少数部族，在朝廷上端正一切政事。真想使世人富裕起来，就没有

能比加强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真想使世人获得长寿,就没有能比调节好阴阳二气更为重要的了;真想使世人归向良善,就没有能比昭明赏赐激励更为重要的了;真想使世人不触犯法律,就没有能比慎重使用刑罚更为重要的了;真想使四方少数部族归服,就没有能比修明礼乐教化更为重要的了;真想端正一切政事,就没有能比任用忠诚贤能的人更为重要的了。对忠诚贤能的人不加以任用,即使每天都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一切政事哪能就都端正了呢?礼乐教化不予修明,即使每天都采取讨伐行动,四方少数部族哪能就都归服了呢?刑罚不慎重使用,即使每天斩杀一千个人,奸恶与造反行径哪能就都遏止住了呢?赏赐激励没昭明,即使每天对一千个人授给爵位,礼仪正义哪能就都兴行了呢?冤假错案没全部予以昭雪,阴阳二气就没办法形成和谐的状态;和尚尼姑没全部斥除掉,农业生产就没办法得到加强。以上这六个方面正是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跪拜只请陛下考虑它们。

臣下我又听说,并不是了解它很困难,而是真正实行它最困难。陛下忧虑教化没能发扬光大起来,忧虑竟然还有一种生物失去了它本来的位所,忧虑各种政务出现违逆的现象,于是向卑贱的臣民寻访朝政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在清晰详审的策问中列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凡是臣下我在上面勉强做出的对答,没有不完整陈述那益处所在的,陛下了解它们也就不困难了,只在于怎样实行罢了。臣下我又鉴于天下的事情有大有小,头绪非常多,陛下居住在皇宫里,拥有整个天下,怎能在思虑以外再耗费心思,在视听的一切范围内极尽那圣明的裁断呢?臣下我希望陛下,实行一桩政事,必定要取法古代;行用一种措施,必定要效仿皇天。使太阳月亮的光辉更明亮,使星辰的位置更端正,降赐雨露般的恩泽,振扬起雷霆那样的威势。在朝廷上获得到虞舜时后夔和龙那样的大臣,掌管各种繁杂的事务;在地方上选用周宣王时方叔与召虎那样的独当一面的大臣,查验辖区内所有政事的成绩。对上面很有利的东西,一定要想到可能会危害百姓;违逆自己心愿的意见,一定要思考是否符合大道。这样一来,天下人的心愿就得到慰抚了,渺小的臣下我的心志也得到满足了。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敬宗宝历元年(826)丙午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帝若曰:朕恭守宪祖中兴之运,穆宗绍宁之业,寅畏兢翼,亦免荒坠。诸侯忠上而奉职,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内向,兆人休息。至于属统垂文,程示后代,终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术。古人云:希颜之徒,亦颜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窃不让,欲追踪乎三代,俯视乎二汉,陶今俗于至道,跻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缊器应荐,愤愤悱悱,思所以奋者于日久矣。当极其虑,开予郁滞。

夫礼乐刑政,理之具也。礼乐非谓威仪升降,铿锵拊击也,将务乎阜天时,节地利,和神人,齐风俗也。刑政非谓科条章令,繁文申约也,将务乎愧心格耻,设防消微也。必有其论,何方致之?四人混处,迁于异物,历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于儒,而有诡道之行;农尚笃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缮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无,而贵难得之货。思矫其弊,必有其术。

汉高之基称萧、曹,孝宣之兴称丙、魏。朕观其书,灿焉尽在。我国家之盛,其纪年则曰贞观、开元,其辅相则曰房杜、姚宋。朕观其书,则拔群绝类者不能相远。然两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诬也。将与元化合德,谟谋而无际欤?为史官词志,不能久于其事欤?口食至多而垦辟者惰,供亿至众而财官是空,官无阙员而家食者告困,德泽仍臻而鳏弱者未赡。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朕将亲览。

皇帝提问说:皇帝我恭敬地执守宪宗皇帝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时运以及穆宗皇帝继续使天下保持安宁的大业,恭谨畏惧又格外小心,避免荒废坠落的结果。地方官员对上面忠诚又履行好职责,朝廷卿士遵守法度又恪尽职守,四周少数部族都归附朝廷,亿

万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至于承接帝室统系而垂示典章制度，给后代树立起法式，最终尽管有那献给世人的愿望，但却没有治理世人的恰切做法。古人讲过这样的话：仰慕孔子大弟子颜渊的人，也属于颜渊的同类啊！又说过：虞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就能成为他那样的人。皇帝我擅自不做谦让，想要追踪夏商周三代，凌驾在西汉东汉之上，把当今的社会风气陶冶成符合最高道法的状态，把亿万百姓带入太平的境地。你们这些士大夫都身怀才干，响应荐举，焦灼激切到顶点，思求奋扬已经时间很长了。应当把计虑运作到极限，开启皇帝我一直闹不清的地方。

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都是治国的具体措施啊！礼仪乐舞并不只是说动作规范地进前退下，悦耳动听地敲击乐器啊！而是要致力于天象节气变得特顺畅，大地的出产变得特正常，使神灵和世人融为一体，统一起社会风尚啊！刑罚政令并不只是说列出条款细则，用多种条文规定去做申明和约束啊！而是要让人们从内心感到惭愧，由衷地顺从并且具有羞耻心，设起防范的堤坝，消除那隐患啊！这里面一定有该讲论的事项，采用什么办法就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呢？从事四种社会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转向其他新鲜的玩艺，从各个朝代以来，这都是让人感到头疼的问题。读书人是把儒学作为根本的，可却存在着要弄奸诈手段的行为；农民注重耕好田织好布，可多数人却有舍弃本业的心思；工匠本应制造日常用品，可却打制精巧的奢侈器物；商贩职在沟通两地的物产，可却持带罕见难得的物品。考虑要矫正这些弊病，一定会有具体的对策吧？

汉高祖的基业，得说靠了萧何与曹参这两位丞相；孝宣帝的中兴，得说靠了丙吉和魏相这两位大臣。皇帝我观阅他们的传记，鲜亮地留存在那里。我们国家的兴盛阶段，在年代排列上就顶数太宗贞观和玄宗开元时期了，那时的辅政宰相也顶数房玄龄与杜如晦，姚崇与宋璟了。皇帝我观阅他们的传记，出类拔萃的地方并不是比平常人高出许多去。然而太宗朝和玄宗朝的盛况，四位宰相的才干，却是不可否认的呀！打算与元气化育万物的盛德一个样，在谋略上就永无极限了吗？形成史官载述的那番景象，就不能把此类事体长久保持下

去吗?张口要吃饭的人多极了,可垦田耕种的人却懒得干活。国家对各方面的支出多极了,可主管财政的部门却没钱没物。官职不存在人员空缺的情况,而靠祖上德业享受俸禄的人家却禀告困乏。仁德的恩泽接连施布,而孤寡老弱的那些百姓们还没够吃够用。其中必定有那主旨所在,该怎样辨明它呢?不要空泛,也不要简略,不要有夸夸其谈的议论,也不要有隐讳的东西,用来符合皇帝我的虚心访求,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舒元褒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舒元褒(生卒年不详)　东阳(今属浙江)人。既进士及第,又于敬宗宝历元年(826)应贤良方正科制举,对策第三。其一兄两弟俱为进士,亦均遭杀戮,唯其本人得幸免,终司封员外郎。

对:臣久讶今之天道运行,地力负载,生生滋息,皆与尧舜、禹汤之时不异,及言其理乱安危,则邈然数千里而远。臣因静索其源,盖由时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汤以殷王,纣以殷亡。是古今有异耶?直人事而已矣。臣尝病之,愿抱血诚而写置于天子之前。天路甚高,无由上达,所以卒岁於悒,如抱沉痼。

天意似知臣有移时之术,而能恳恳不已,幸使臣不为霜露所薄,而无犬马之疾,得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极谏征夫贤良方正之士,而虚心以问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难行,而一朝陛下尽能行之,所谓天地交泰之时也。臣不敢惧避,愿就汤镬之诛,愿尽吐成败利害之根,愿解天下元元倒悬之急也。亦不枝蔓藻饰以为言,上缘圣问,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后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谅其直,实天下幸甚。谨昧死上言。

制策曰:古人云:希颜之徒,亦颜之流。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窃不让,欲追踪乎三代,俯视乎二汉,陶今俗于至道,跻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蕴器应荐,愤愤悱悱,思所以奋者于日久矣。当极其虑,开予郁滞者。陛下首问及此,有以见圣人思理之深

也。臣闻杨雄有希颜之言，颜渊有慕圣之语，皆谓生虽异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缊上圣之姿，执大宝以御乎人。夫寒暄发于咳唾，生死系于喜怒，其力与天地争大，其财与泉源不穷。臣窃谓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也。今赐策曰：予窃不让，欲追踪乎三代，俯视乎二汉。此乃陛下谦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称贺，条列而言乎？

臣闻三代之理，以义化天下，其犹天地之无不覆载，日月之无不照临。虽负至圣之姿，常若不足，在求贤以辅，张谏以规，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未尝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后，亦求其所理之门，何者足以立功而亲人。此道苟失，在未尝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必轻用其人。所谓轻用者，非谓日杀不辜，盖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无节；上之用无节，则有转死沟壑之患生于无节，足以为生人之刀锯也。又有甚于此者，则爵禄遍于舆台，威福生于左右，刑罚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乱，犹不知觉，自以为万代之安。以此求理，何异缘木而求鱼哉！

今陛下欲追踪乎三代，则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则思求贤以广其覆载；以贞明并日月，则思纳谏以助其照临。察逆耳之言，则知其为端士而进用之；闻悦心之语，则辨其为邪谄而斥远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饥；披一裘，思天下之冻。览国史，思祖宗创业之艰难；睹贡赋，思黎氓耕织之勤苦。居宫殿，思采伐之勤劳；视嫔嫱，思离旷之怨恨。声色游宴，悟伐性之言；驰骋畋猎，念垂堂之戒。戢六军，无令恃宠；抑近习，无纵威权。无使有求恩之名，无使有得幸之号，无使内干外政，无使中夺外权。无垂饰喜之赏，无行迁怒之罚，无求悦目之华，无好荡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术也。陛下诚能慕之，则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远超于三代矣，况俯视二汉乎！此则陶今俗于至道，跻兆人于泰和，又岂劳圣虑哉！

制策曰：夫礼乐刑政，理之具也。礼乐非谓威仪升降，铿锵拊击也，将务乎阜天时，节地利，和神人，齐风俗也。刑政非谓科条章令，繁文申约也，将务乎愧心格耻，设防销微也。必有其论，何

方致之者。臣闻礼乐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于礼。礼明则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识其分，而人伦之序正矣。人伦之序正，则和顺孝慈之庆感于上，所以阜天时也。贵贱之位别于内，则奢侈耗蠹之弊息于外，此所以节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悦。天下之心悦，因可以达于乐，乐达则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则天下之心乐；天下之心乐，则风俗自然齐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其此之谓乎?固非谓乎威仪升降，铿锵拊击也。伏惟陛下，举三代礼乐而行之，而不以形声之为贵，则可以阜天时而节地利，和神人而齐风俗。

刑政者，国家之大典。臣闻贞观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于无刑；政者，期于无政。盖以一人而齐天下，能用之者则理，不能用之者则乱。刑设而不犯，画一之谓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后能去奸宄，惩暴乱，而养育黎人也。然其患，在于任情好恶，远近雷同，虽尧舜不可为理也。况今人人自为强御，欲其愧心格耻，设防销微，无由得也。

何以言之?今军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县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则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游无赖之人，不修本业，输货榷酤，苟求微利，一人北军，张影附势，凭托附籍，恣行凶顽。执宪与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绳其罪，主者则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权，以固护之。持刑政者无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叹耳。此陛下刑政不行于毂下，况其远者乎!其外则守土之臣，或多自开户牖，征徭榷税，不本制条，刑罪重轻，率于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于内地，况其远者乎!伏惟陛下，明于用刑，则可与期于无刑矣，岂止于愧心耻格乎?率力为政，则可与期于无政矣，岂止于设防销微乎?伏惟陛下征贞观刑政而行之，则天下之人有耻且格矣。

制策曰：四人混处，迁于异物，历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于儒，而有诡道之行；农尚笃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缮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无，而贵难得之货。思矫其弊，必有其术者。臣闻明君在上，制四人之业，不使为异物所迁。今士之为儒，非不强

学，而有诡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亲巧谀而疏鲠直也。农人之业，非不笃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恶菲食也。工人之艺，非不专，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厌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赍难得之货者，其弊自陛下贵珠玉而贱布帛也。

伏惟陛下斥巧谀，则士无诡道之行矣。绝珍味，则农无弃本之心矣。碎淫巧，则工无雕磨之器矣。贱珠玉，则商无难得之货矣。矫弊之术，其在此乎！夫矫弊在先原其本，然后责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禄使稍优，宽农人之税使加薄，酬工人之庸使当直，来商人之货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业矣。复敢有为异物所迁者，则陛下之刑政存焉。

制策曰：汉高之基称萧、曹，孝宣之兴称丙、魏。朕观其书，灿焉尽在。我国家之盛，其纪年则曰贞观、开元，其辅相则曰房杜、姚宋。朕观其书，则拔群绝类者不能相远。然两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诬也。将与元化合德，谟谋而无际欤者。臣闻元首以辅弼兴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业，则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汉之高祖资萧、曹，孝宣凭丙、魏，一则以创业，一则以中兴，其道可得而知也。汉祖起于布衣，以有天下，大敌未灭，日月持久，萧、曹匡辅，谋计居多，所以觉其功业盛也。孝宣起于人间，霍光殁后，方亲政事。然霍光虽乘时之功，不通经术，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余，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兴，所以觉其辅佐之劳也。

我太宗、玄宗，明圣之资，海内从化。而房杜、姚宋，当至理之代，皆尽启沃之力，咸有匡辅之道。主圣臣贤，君臣道合，是以贞观、开元与汉之功臣有异，而两朝功德事业，光乎史册。陛下以拔群绝类之不相远者，则臣向所谓主圣臣贤，道合交泰，正史氏无德而称焉。

制策曰：日食至多而晷刻者惰，供亿至众而财官是空，官无阙员而家食者告困，德泽仍臻而鳏弱者未赡。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略，毋游说，毋隐情，以副虚求，朕将亲览。陛下终问及

此，有以见圣心忧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隐而不尽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垦辟者惰，供亿至众而财宫是窘，非上失勤俭之化而下弃其本不务乎？夫欲垦辟多而财赋足者，莫若劝人之务本，务本在百姓乐其业。而垦土以谷，树桑以丝，此皆取之于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岂有穷竭耶？今舍此不务，而欲垦辟之不惰，不可得也。

今陛下宫室池台之盛，则人务采伐而辄趋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后宫罗纨铅红者数千人，日费数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馔，穷海陆之珍以充上方，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厩马与鹰犬之多，皆使厮养之，其刍菽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于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车舆服玩，皆错以兼金，镂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贝明珠，齿革羽毛，穷异极奇。采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尽不回，继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于浮屠，削发惑众，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数十万，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奸吏理人，苟以应办为先，急征其租，厚剥其赋，以媚于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则商通无用之货；上好伎巧，则工作无用之器。器与货皆出于人力，乃委于无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数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国用之甚者。

陛下诚能慕采椽茅茨之化，绝浮屠惑众之教，抑奸吏赋敛之心，闭工商无用之事，则百姓皆归本而垦辟矣，何虑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诚能节嫔嫱之侍，斥犬马之繁，减海陆之溢，省车舆服玩之珍，则赋自然足，何虑乎供亿之众哉！故《语》有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使伊、傅复生，为陛下计者，不能易此也。

陛下以官无阙员而家食者告困，岂非择才授任之不明欤？迁转课绩之不核欤？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禄，考成在于岁满则转。不知陛下何以选而致之哉！臣闻《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内外各用其人为理，而天下安宁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忧劳若此，虽无阙员，将何用哉？甚失“文王以宁”之谓也。陛下何不各于其局而考其课绩，有其效者则升之，无其效者则退之。如此则尸素充员者鲜，何忧乎家食而告困哉！

陛下以德泽屡降而鳏弱者未赡，岂非方镇之臣为壅遏其恩者耶？窃见今主宰之臣与聚敛之臣，巧计万端，割剥生人膏血。两税之外，征率杂科，以为非时之进，富贵陛下恩泽。于是有月进、时进、朝贺之进、羡余之进。当进之时，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圆，不扰陛下百姓。举此一节，则明其欺诈甚矣。今长吏节度、观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数百人，其俭者不下百人。以其禄俸自给，尚且不足，必重敛于人以继之，则明知其所进非禄俸也。既非禄俸，而云不扰百姓，将何得哉？所以两税之外，常有诛求，盐铁榷酤，重叠笼税，托为进奏，般次相运，水陆转输，半入私家。

今天下之人，流离弃业，日益困矣，而陛下无由知之。虽仍降德泽，德泽不流，则鳏弱从何而赡？陛下闻之，得不为少轸圣虑，少动圣心！臣窃料陛下将不忍闻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圣意，一为思之，敕有司簿天下旧定之租赋，禁奸臣非法之诛求，减盐铁榷酤之繁税，绝天下无端之进奉。如此则德泽自降，天下之人自获苏息，富而庶矣，岂虑乎鳏弱之不赡哉！

然清问所及，皆当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尽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业业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圣之重构，自即位以来，尝日旰不视朝，大臣忧惧，百辟惴栗，进谏者词旨恳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请，然宰相卿士未有转时之对，则万几之重，其阙几时。加之千门之深，羽卫之隔，则堂上之远，岂止于千里哉！虽陛下雄杰聪明，极思虑而忧天下，何由而得？虽日征贤良为直谏，又何益于理？故《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推是而言，则天下理乱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谁乎？臣所谓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业业者，盖为此也。况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

所谓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权臣之弄柄，朋党连结，货贿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轻于粪土，公侯遍于顽驽，恣行威福，毒伤暴残。谏官不敢论，御史不敢纠。虽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辈乃害天下之实。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谀佞，进忠贤，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询访天下

之利病，至于群有司，皆使鲠直列侍，而亲决万几之务。此乃圣帝明王理天下之术也。伏惟陛下留神独听，无惑于左右，则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爱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谨对。

对答如下：臣下我长久感到惊讶的是，天道在运行，地力在承载，一轮接一轮地滋生繁衍，这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时期完全相同，可等到一讲起各个朝代的治乱安危，却相差得数千里那样遥远。臣下我随后沉静地探索那根源，基本上还是由当时的君主所造成的啊！在大禹身上，凭借夏朝而称王天下；到桀手中，却凭借夏朝而灭亡了。在成汤身上，凭借商朝而称王天下；到纣王手中，却凭借商朝而灭亡了。这难道是古今存在着差异吗？也只是人事罢了！臣下我对这种历史现象感到是大祸患，渴望抱持一片至诚来书写并放置在天子的面前。可通往皇宫的道路太高远了，没有途径传告到上面去，所以就整年地忧闷愤激，如同久治不愈的重病缠在身上一般。

皇天的心中似乎知道臣下我怀有改变时世的对策又能恳切到极点而不止息，万幸使臣下我不被秋霜寒露所侵袭，而没染上犬马常得的那类疾病，得以遇到陛下在继登帝位的日子里，第一次通过直言极谏科目来征聘贤良方正这类人士，并虚心向他们做询问。这正是从黄帝到周文王与周武王等五帝三王所难施行的事情，到陛下便在一个早晨的功夫里彻底施行它了，真是人们所说的天地交合特顺畅的时候啊！臣下我不敢因畏惧而回避，甘愿接受下油锅活活炸死的处罚，乐意倾吐出成败利害的根源所在，乐意解救全天下黎民百姓的严重危难啊！同时也不东牵西扯、修饰词藻来构成答卷，往上沿着圣明的策问，往下切合世人的心愿，揣摩陛下一定能行用的东西，然后来讲说它们。跪拜只请陛下察辨那片忠心并体谅那番正直，天下也就实在幸运到极点了。下面恭谨地冒着死罪献上答卷。

皇帝的策问中说：古人讲过这样的话：仰慕孔子大弟子颜渊的人，也属于颜渊的同类啊！又说过：虞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就能成为他那样的人。皇帝我擅自不做谦让，想要追踪夏商周三代，凌

驾在西汉东汉之上，把当今的社会风气陶冶成符合最高道法的状态，把亿万百姓带入太平的境地。你们这些士大夫都身怀才干，响应荐举，焦灼激切到顶点，思求奋扬已经时间很长了。应当把计虑运作到极限，开启皇帝我一直闹不清的地方。陛下在策问的开头部分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让人确有理由地看出圣人谋求大治的深切程度啊！臣下我听说西汉的扬雄讲过仰慕颜渊的那番话，颜渊本人讲过追慕圣人的那番话，这都是在强调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只要行用那大道，也就成为那样的人了。如今陛下蕴含着第一等圣人的天资，执持最高权力去统领世人。寒流和热气从咳嗽一声、吐口唾沫中就能形成，根据一喜一怒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力量可以同天地争一争谁大，那财富和源泉一样无穷无尽。臣下我私下认为，凭借这样的力量，完全能提起五岳名山去填塞四海呀！可如今颁赐策问却说：皇帝我擅自不做谦让，想要追踪夏商周三代，凌驾在西汉东汉之上。这正是陛下谦逊又奋扬到极点了啊！渺小的臣下我哪里敢不叩拜又起舞，称赞又庆贺，逐条逐项地来做讲论呢？

臣下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理，都是用正义去化导天下，就如同天地没有不加以覆盖和承载的，太阳和月亮没有不予以照耀的。尽管怀有最高圣人的天资，却总像还很不足，只管去求取贤才来辅佐朝政，敞开谏诤的大门来取得规正，忧虑天下人所忧虑的事情，为天下人的欢乐而感到欢乐，未曾使一种生物蒙受到冤屈而把功劳归在自己的名下啊！夏商周三代以后，也寻求实现大治的途径，看什么措施足够用来建成功业又使世人相互亲近。这种治国大法如果丧失掉了，原因在于未尝想到天下人的疾苦。既然不了解那些疾苦，必定轻易就使用世人。所谓轻易使用，并不是说每天都斩杀无罪的人，而是由于天下的民力已经困乏了，可上面的用度却毫无节制，于是辗转流亡而死在山沟路旁的祸患就从君主毫无节制上产生出来了，足以成为活人的刀斧尖锯啊！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情况，那就是爵位俸禄遍及到各个军事防区，刑罚和封赏从地方官员那里擅自做出决定来，刑罚不公正，法令得不到贯彻执行，天下昏暗动乱，可仍然还觉察不到，自以为千秋万代总安宁。用这一套去谋求

大治，又跟爬到树上去找鱼可有什么两样呢？

如今陛下打算追踪夏商周三代，那就最好实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治理。那样的治理到底是什么呢？跪拜希望陛下用那仁德去治理天下，就要考虑求取贤才来扩展覆盖与承载的范围；靠那正大光明来同太阳月亮一模一样，就要考虑接受规谏来协助那照临。体察刺耳的意见，便会知道提出意见的人属于正直的人士而进用他。听到悦耳的话语，就要辨别出专讲这类话的人属于奸邪献媚的家伙而斥退疏远他。享用一顿饭食，就要想到天下人的饥饿；穿上一件皮衣，就要想到天下人的受冻。观阅本朝正史，就要想到祖宗创建基业的艰难；看到贡品和税钱，就要想到黎民百姓耕田织布的劳苦。置身在宫殿中，就要想到采伐木石的辛劳；看到嫔妃，就要想到男女届时无法婚配的怨恨。对歌舞美色，要体悟它们是砍伐性命的斧锯的名言；对跑马打猎，就要念及靠近堂屋檐下会被檐瓦砸伤的戒语。镇抚住中央直辖的军队，不要让他们依仗恩宠胡来；抑制身边受宠的人，不要让他们随便借用天子的威势和权力为所欲为。不要使谁蒙受到求取恩宠的恶名，也不要使谁蒙受到获得偏爱的称号；不要使宫内干涉朝廷的政务，也不要使宫内侵夺朝廷的权力；不要施布假装高兴的封赏，也不要使用转移怒火的刑罚；不要搜求悦目的奢侈品，也不要喜爱摇荡心志的淫巧器物。这些正是夏商周三代圣明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啊！陛下果真能仰慕它们，就应该效仿并行用它们。行用它们不中断，自然就远远超过夏商周三代了，何况凌驾在西汉东汉之上呢！这正属于把当今的社会风气陶冶成符合最高道法的状态，把亿万百姓带入到太平的境地啊！还哪里再烦劳圣上的思虑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都是治国的具体措施啊！礼仪乐舞并不只是说动作规范地进前退下，悦耳动听地敲击乐器啊！而是要致力于天象节气变得特顺畅，大地的出产变得特正常，使神灵和世人融为一体，统一起社会风气啊！刑罚政令并不只是说列出条款细则，用多种条文规定去做申明和约束啊！而是要让人们从内心感到惭愧，由衷地顺从并且具有羞耻心，设起防范的堤

坝，消除那隐患啊！这里面一定有该讲论的事项，采用什么办法就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呢？臣下我听说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啊！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未曾不首先从礼仪做起。礼仪得到彰明，君主和臣僚，父亲和儿子，长辈与幼辈，尊贵的人与卑贱的人就明了各自的本份，而人伦纲常的等级序列就端正了。人伦纲常的等级序列端正了，和睦恭顺孝敬慈爱的福庆就感应到天上，这正是致使天象节气变得特顺畅的缘由啊！尊贵与卑贱的地位在内部区定出来，奢侈浪费消耗的弊病就在外部止息住了，这正是致使大地的出产变得特正常的缘由啊！自然也上下交合特顺利了，而天下人心中便感到喜悦了。天下人心中感到喜悦，随后就可以反映到乐舞上去；在乐舞上反映出来了，神灵与世人自然就融为一体了。神灵与世人融为一体，天下人心中就充满欢乐；天下人心中充满欢乐，社会风气自然就统一了。孔老夫子说：安定上面和治理民众，没有什么能比礼仪更起作用的了；改变社会风气，没有什么能比乐舞更起作用的了。说的也就是这种情形吧！压根就不只是说动作规范地进前退下，悦耳动听地敲击乐器啊！跪拜只请陛下振扬夏商周三代的礼仪乐舞去兴行它们，不把动作和声音看得很重要，也就可以使天象节气变得特顺畅，大地的出产变得特正常，神灵与世人融为一体，统一起社会风尚了。

刑罚政令属于国家的重要法典。臣下我听说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的治理，刑罚与政令特别严明。刑罚的制定，目的是期望到最后没有刑罚了；政令的颁行，目的是期望到最后没有政令了。凭仗君主一个人去使全天下整齐划一，确能运用好它们的，就会实现大治；不能运用好它们的，就会构成大乱。刑罚设立了，没有人去触犯，这才讲的是整齐划一呢！政令定立起来决不改变，这才是必定施行的道理所在呢！然后就能够铲除内奸和外贼，惩治凶暴和叛乱的家伙，养育黎民百姓啊！然而其中的祸患，在于君主任从自己喜好什么和憎恶什么的性子来，远处和近处都一模一样，这样即使是唐尧虞舜也实现不了大治啊！况且当今人人径自构成凶暴的行径，想叫他们内心感到惭愧，由衷地顺从并且具有羞耻心，设起防范的堤

坝，消除那隐患，恐怕是没办法达到的呀！

根据什么这样讲呢？如今部队中的士兵，属于陛下的人；各府各县的民众，也属于陛下的人。既然都属于陛下的人，刑罚政令就该共同守行。如今有懒惰游荡的无赖汉，不从事农业生产，贩运货物卖酒茶，对付着牟求点儿赚头，可一加入京师卫戍部队，就四处晃动，依附权势，凭仗加入了军籍，肆意干那凶暴不讲理的勾当。朝廷司法部门和京师地方长官一用陛下的刑罚政令去治他们的罪，而主帅们就说你们超过权限来抑制我带兵啊！于是显耀自身的威风与权力，来执拗地庇护手下的那批人。朝廷的司法官员和政务官员没办法去禁遏，只有歹徒仗势胡作非为的感叹罢了。这是陛下的刑罚政令在天子脚下竟实行不开的情形，何况京师以外的地方呢！在京师以外负责守护一地的官员，大多擅自编造户口册，征发徭役和收取赋税，不按国家的规定办，对罪犯判重刑或判轻刑，全都自己想怎样判就怎样判。这是陛下的刑罚政令在中原地区也实行不开的情形，何况更遥远的地方呢！跪拜只请陛下在使用刑罚上做到严明，也就可以进入期望到最后便没有刑罚的地步了，又哪里仅仅是让人们内心感到惭愧又有羞耻心并且由衷地顺从呢？带头大力地贯彻执行好政令，也就可以进入期望到最后便没有政令的地步了，又哪里仅仅是设起防范的堤坝并消除那隐患呢？跪拜只请陛下考察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的刑罚政令而去照样实行，天下人也就都有羞耻心并且由衷地顺从了。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从事四种社会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转向其他新鲜的玩艺，从各个朝代以来，这都是让人感到头疼的问题。读书人是把儒学作为根本的，可却存在着要弄奸诡手段的行为；农民注重耕好田织好布，可多数人却有舍弃本业的心思；工匠制造日常用品，可却打制精巧的奢侈器物；商贩来沟通两地的物产，可却持带罕见难得的物品。考虑要矫正这些弊病，一定会有具体的对策吧？臣下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位居上面，划定四类民众的职业，不让他们被新鲜的玩艺所引动。如今读书人作为儒家的门徒，不是不努力研求学问，然而却存在着要弄奸诈手段的行为的人，这

种弊病是由陛下亲近奸猾献媚的人又疏远正直耿介的人造成的。农民的本业，不是不注重耕好田织好布，然而多数人却有舍弃本业的心思，这种弊病是由陛下特爱享用山珍海味并厌恶简单的食物造成的。工匠的技艺，不是不投注在主要方面，然而却去打制精巧的奢侈器物，这种弊病是由陛下厌恶朴素的东西而看重淫靡精致的物件造成的。商贩的赚头，不是不多，然而仍持带罕见难得的物品，这种弊病是由陛下看重珍珠美玉而轻视布匹丝帛造成的。

跪拜只请陛下斥退奸猾献媚的人，读书人也就没有要弄奸诈手段的行为了；撤掉山珍海味，农民也就没有舍弃本业的心思了；砸碎淫靡精致的物件，工匠那里也就没有打制出的精巧的奢侈器物了；轻视珍珠美玉，商贩手中也就没有罕见难得的物品了。矫正弊病的对策，恐怕就在这上面吧！矫正弊病在于首先查明那根源所在，然后再去处理细枝末节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制定读书人的特殊待遇而使他们稍感宽裕，减轻农民的赋税而使他们把减轻的那部分留为己用，回报工匠的劳作而使工钱适当，吸引商贩的货物而使它们流通起来。这样去做了，自然就各自修明各自的本业了。仍有被新鲜的玩艺所引动的人，陛下的刑罚政令就摆在那里等着呢！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汉高祖的基业，得说靠了萧何与曹参这两位丞相；孝宣帝的中兴，得说靠了丙吉和魏相这两位大臣。皇帝我观阅他们的传记，鲜亮地留存在那里。我们国家的兴盛阶段，在年代排列上就顶数太宗贞观和玄宗开元时期了，那时的辅政宰相也顶数房玄龄与杜如晦，姚崇与宋璟了。皇帝我观阅他们的传记，出类拔萃的地方并不是比平常人高出许多去。然而太宗朝和玄宗朝的盛况，四位宰相的才干，却是不可否认的呀！打算与元气化育万物的盛德一个样，在谋略上就永无极限了吗？臣下我听说元首借助左右助手来兴起治理，自古以来帝王希望建成卓异的功业，就一定要有杰出的人物来辅佐他。西汉的高祖依靠萧何、曹参，孝宣帝凭借丙吉、魏相，一个用来创建了基业，一个用来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了兴盛，具体的做法是可以看出来的呀！汉高祖由一名平民百姓崛

起，去占有天下，最主要的敌手还没消灭，时间延续得很长，萧何与曹参进行匡扶佐助，做出的谋划占多数，用来使高祖感到功业盛大啊！孝宣帝从民间被拥立为皇帝，大将军霍光死后，才亲自处理政事。然而霍光虽然利用时势立下功勋，但不通晓儒家的治国方略，不是帝王的真正助手，造成的弊政特别多。丙吉和魏相跟在弊政的后面，尽到辅政大臣的一切责任，最后形成了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局面，用来使孝宣帝感到辅佐大臣的辛苦啊！

我朝太宗皇帝和玄宗皇帝禀受到圣明的天资，全天下都接受教化，而房玄龄与杜如晦，姚崇和宋璟，正处在最佳治理的年代，全都竭尽那启迪君主的力量，都有匡正佐助的办法。君主圣明而大臣又贤能，君主与大臣在各自的行为准则上非常一致，所以贞观、开元年间与汉朝的功臣存在着区别，而两朝的功德与事业，在史书上非常显赫。陛下认为出类拔萃的地方并不是比平常人高出许多来，其实也正在于臣下我在上面所讲的君主圣明又大臣贤能，各自的行为准则非常一致，彼此交合而顺畅啊！这正是史官找不出恰切的语言来做称述的地方啊！

皇帝的策问中还说：张口要吃饭的人多极了，可垦田耕种的人却懒得干活。国家对各方面的支出多极了，可主管财政的部门却没钱没物。官职不存在人员空缺的情况，而靠祖上德业享受俸禄的人却禀告困乏。仁德的恩泽接连施布，而孤寡老弱的那些百姓们还没够吃够用。其中必定有那主旨所在，该怎样辨明它呢？不要空泛，也不要简略，不要有夸夸其谈的议论，也不要有隐讳的东西，用来符合皇帝我的虚心访求，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陛下在策问的最后部分涉及到以上问题，让人确有理由地看出圣上内心忧虑又勤勉真是到极点了呀！渺小的臣下我哪敢有所隐讳而不把一切都说出来呢？陛下认为张口要吃饭的人多极了，可垦田耕种的人却懒得干活；国家对各方面的支出多极了，可主管财政的部门却没钱没物。这两种现象还不是因为上面丧失了勤俭的化导而下面又舍弃自己的本业不去干才形成的吗？要想田地得到大量开垦而财政收入又充足，没有什么能比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而从事农业生产在于

百姓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很快乐。开垦田地打出粮食来，种植桑树生出蚕丝来，这都从大地那里去获取到。大地的出产就象泉水的水源，哪有穷尽呢?如今舍弃它而不大力去抓，却想垦田耕种的人不懒惰，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了。

如今陛下的宫室池台那样地华丽，人们就致力于采矿伐木而径自求取抡斧头的好处去了，这样耕田的人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后宫中妆扮艳丽的嫔妃和宫女多达数千人，每天就耗费掉数千金，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十分之一了。由饮食部门提供的饭菜，搜求到各种山珍海味来满足天子的享用，一顿饭菜的费用就相当一百户普通人家的家产，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十分之一了。马棚里的骏马和雄鹰良犬多得很，都让专人去喂养，那些草料精米和肥肉的供应以及一个动物的生死比人还贵重，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了十分之一。车马銮驾和服装以及赏玩品，全都镶嵌上双层的金银饰物，缀上美玉，或者是带花纹的犀牛角，异龟的甲壳，大贝与明珠，象牙虎皮和珍禽的羽毛，都奇异到极点。捕取它们的人有的要渡过大海，登上高山，力气用光了返不回来，接着就是死掉，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了十分之一。还有人依托佛教，用剃光头发来迷惑众人，而修建寺庙，雕造佛像，接纳天下的信徒多得不少于数十万，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奸诈的官吏治理百姓，只知道把上边交给的收税任务足额收齐作为头等大事，手段严酷地向百姓征收田租，重重地向百姓榨取税款，用来讨好皇帝身边的人，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了十分之一。上面喜好珍奇的物品，商贩就专卖没有实际用处的货物；上面喜爱精巧的制品，工匠就打制没有实际用处的器具。这些器具和货物都是由人力做成的，竟然放置在没有实际用处的地方，这样耕田的人又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这些表现，都是使百姓财力困乏又使国家用度枯竭的最有害的因素啊!

陛下果真能够仰慕远古帝王住在最简陋的屋室中的那种教化，约束佛教迷惑众人的说教，抑制奸恶官吏横征暴敛的黑心，杜绝工匠商贩干那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百姓也就全都归向本业而开垦田地种庄稼了，还忧虑什么张口要吃饭的人多极了呢?陛下果真能够

减少嫔妃的侍奉，斥除良犬骏马的繁多，减省山珍海味的浪费，压缩车马服饰以及赏玩品的华丽程度，赋税收入自然就够用了，还忧虑什么国家对各方面的支出多极了呢?因而《论语》上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能不富足呢?假设让商朝的伊尹和傅说再活过来，他们为陛下做谋划的东西也改变不了这几条啊!

陛下认为官职不存在人员空缺的情况，而靠祖上德业享受俸禄的人却禀告困乏了。这种现象难道还不是因为择取人才、委任官职不英明，考核政绩、晋升转任不真切才形成的吗?如今从三公一直到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各自的官员，每个官员都有各自的俸禄，但考核政绩却只在年头够了就晋升。真不知道陛下凭什么选取并让他们献出力量来?臣下我听说《诗经》上讲：贤才济济一堂，周文王由此而安宁。这是说朝廷和地方上分别任用合适的人才进行治理，而天下就安宁了呀!如今贤才布满朝廷，可竟使陛下忧虑劳苦到这般地步，尽管不存在人员空缺的情况，可还有什么用处呢?简直太不符合“周文王由此而安宁”的说法了。陛下为什么不分别在各个机构考核他们的业绩呢?取得功效的人就晋升他们，没取得功效的人就斥退他们。这样做了、白拿俸禄不干事，只在里面充个数的人也就少见了，还忧虑什么依靠祖上德业享受俸禄的人禀告困乏呢?

陛下认为仁德的恩泽接连施布，而孤寡老弱的百姓们还没够吃够用。这种现象难道还不是因为坐镇一方的大臣成为阻隔住朝廷恩泽的人才形成的吗?私下看到当今负责守护一方的大臣和征收赋税的大臣，奸巧的办法多极了，用来榨取世人的血汗。在按夏、秋两季征收的国家田赋以外，又收苛捐杂税，作为平常的进献，取得陛下对他们加官晋爵的恩泽。于是有所谓的月进、时进、朝贺之进、羡余之进。在进献时特意奏呈章表，都说这些物品是由臣下我自己筹办的，并没搅扰陛下的百姓，仅列举这一条，就知道他们的欺诈简直太厉害了。如今地方官员中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的家中，本人讲究奢侈的，就有家僮好几百人；本人还算节俭的，也不下一百人。拿他们的俸禄养活这些人还远远不够用，接下来必定去对百姓横征暴敛。由此可知，他们的进献决不是节省下的俸禄啊!既然不

是节省下的俸禄，却说没去搅扰百姓，那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所以在按夏、秋两季征收的国家田赋以外，常有苛酷的贡求，又在盐铁茶酒上层层加码收税，打着进奉的旗号一批又一批地运送，由水路和陆路辗转输纳，有一半落入了自家的手中。

现今天下人流亡离散，抛弃农耕，日益困乏了，可陛下没有途径了解到这种情况。尽管接连施布仁德的恩泽，可仁德的恩泽播扬不开，孤寡老弱的那些百姓们从哪里能够吃够用呢?陛下听到这种情况，能不稍略绷起那圣明的顾念吗?能不稍略抖动那圣明的心意吗?臣下我私下估量陛下都不忍心去听这种情况啊!陛下如果体察臣下我的话语，特地把那圣明的心意掉转过来，彻底为众百姓想一想，命令主管部门按天下原定的租赋做核算，严禁奸臣在法外的苛酷贡求，减少盐铁茶酒的繁重商税，断绝天下毫无来由的进奉。这样做了，仁德的恩泽自然就施布到百姓的头上了，天下人自然就获得到复苏滋息，富足又人口众多了，难道还要去忧虑孤寡老弱的那些百姓们还没够吃够用吗?

然而清晰详审的策问所涉及到的问题，都是当今的紧切事务啊!渺小的臣下我做出对答，也已经都包括在内了。陛下体察并行用它，在于陛下留心各种政事，并效仿那些兢兢业业的远古帝王罢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陛下正年富力强，往上肩负着我朝十二位圣明先帝接连构建的帝业，自从即位以来，却经常太阳偏西了还不临朝听政，大臣们忧虑又惊惧，百官们惴惴不安，害怕得很，进谏的人在言辞和义旨上都非常恳切。陛下既已赞许他们的忠诚，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宰相卿士没有隔五天按次序指陈政事的活动，这样一来，陛下日理万机的重任，会拖延到什么时候去呢!再加上宫门一道又一道，卫士的把守一层又一层，殿堂上的隔绝又哪里仅限于千里呢!虽然陛下雄迈杰出，耳聪目明，把思虑运作到极限，忧虑全天下，但能通过什么途径会达到目的呢?尽管宣称征聘贤良进行正直的规谏，又对治理天下会有什么补益呢?所以解释经书的《论语》中说：在位者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事情行得通；自身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服从。由此说来，天下大

治或大乱不由陛下来造成，又能由谁来造成呢?臣下我所强调的留心各种政事，效仿那些兢兢业业的远古帝王，正是出自这一原因啊!况且目前最严重的弊病还没有去除，哪能忽略它们呢?

所谓最严重的弊病，表现在司法官员通过曲解法律条文来给罪犯开脱，窃取大权的臣僚肆意玩弄权柄，结党营私，贿赂公开进行。由于朝廷和地方的重要职位，谁都出来进去可以轮流担任，名位比粪土还不值钱，公侯的爵号在顽劣蠢笨的人那里都有份。他们任意施行赏赐和惩罚，苛酷地进行伤害，凶暴地进行摧残。对这帮人谏官不敢劾奏，负责监察的御史不敢纠察。陛下尽管拥有天下之主的名义，而这帮人却是祸害天下的实权人物。以上的弊病不去除，世人就不得安宁。陛下决心要去除这些弊病，就要铲除那老根，斥退逢迎讨好的人，进用忠正贤能的人，早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召见宰相公卿，询访天下的益处与害处所在，直至各个政府部门，都让忠诚耿直的人环列在自己的周围，亲自裁决各种政务。这正是圣帝明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啊!跪拜只请陛下留神而独自做出听断，不被身边的人所迷惑，四海九州由此也就幸运到极点了。渺小的臣下我哪敢顾惜自己的性命而不有什么就讲什么呢?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戊申科

制科试题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问：朕闻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诚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质文迭救，而巧伪滋炽，风流浸微。自汉魏以降，足征益寡。

朕顾昧理道，祇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荒宁。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所未达，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理而豪猾时逾检；大学，明教化之源也，期于宣化而生徒多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惰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理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行。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理。思欲究此缪戾，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仡启宿懵，冀臻时雍。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庭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主之阙，辨政之疵，明纲条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可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理；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推此龟鉴，择乎中庸，期于洽闻。朕将亲览。

提问：皇帝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沉默不语，不去做人为的干涉；稳稳坐定，执守吉凶的关键。净化百姓的心灵，一切都简单易行；成就日常的事务，不把功劳归在自己名下。确立起根本，

使民众富足;推布一片赤诚,建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由此而使皇天与人间融为一体,阴气和阳气形成高度和谐的状态,社会进入了仁德长寿的境地,万物没有受损害的情况。哎呀呀!盛大仁德所达到的境界,广远得真是让人无法赶得上啊!夏商周三代的英明君主,用崇尚质朴或崇尚文采来递相补救前代的缺陷,可奸巧诡诈却越来越盛行,风尚习俗逐渐衰颓。从两汉曹魏以后,值得引证的东西更越来越少了。

皇帝我对治国大道闹不清楚,恭敬地承担起列祖列宗构建的大业,奉守并依从《皋陶谟》和《伊训》等经典,不敢安逸享乐。任用贤才,保持警惕,终日辛勤忙碌,哪里是要追踪三皇五帝那广远的足迹,只希望能够承接起列祖列宗的宏大统系罢了。可内心还有闹不明白的事情,实行中还有让人不信服的地方,由朝廷一直到各地,尚不完善的国政仍有许多方面。因而世人不接受教化,时气有时受阻碍变得异常,水灾旱灾往往延续一整年,谷物种植错过了农时。国家仓库储备很少,没有二十七年中应有多出九年也够用的那种积蓄。官吏施政的方法五花八门,三年任期内应建成的功绩微乎其微。京师是整个华夏的根基所在,可一去察看治理的状况,却是奸猾的豪强经常超越等级规定。太学是彰明教化的本源所在,期望能宣播化导见成效,可学生们却大多荒废学业。各个郡县致力于颁布法规,可触犯禁令的人仍未断绝。全体工匠要求他们遵守制造规则,可淫靡精巧的器物打制还没衰歇。民俗懈情,风气淫靡,不良的玩艺积聚起来,就变成了祸害。择任官员来实现治理,光从言论上对人做考察就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很难辨清。只用法令来驾驭下面的人,羞耻心和自动顺从就兴行不起来。为扩大财富而专门发布命令,可生产它的人却太少而享用它的人倒特多,在命令上发布来又发布去,可在实效上却很少看得到。想要彻底铲除这些背谬乖戾的现象,实现天下太平,这片心思还感到很渺茫,就像渡过滔滔不绝的河流去,因此在前些天命令主管部门,广泛地延聘各种英才,期待着能够启迪皇帝我一直闹不清的事体,希望形成欢乐祥和的局面。

你们这些士大夫全都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志向在于救助百姓

并使社会安宁，来到了殿廷上等待询问，都想符合皇帝我虚心求取的那一愿望。一定要指出君主的过失，辨析朝政的弊端，指明纲纪法度紊乱的地方，考察使百姓人口增多又生活富裕的最紧急的事务。采取什么措施来革除以前的弊端，施布什么恩泽来给下面带来好处，通过什么办法而治理就能接近远古时代，经由什么途径而和谐的气氛就能充盈呢?要推究本源，逐条在答卷上明晰地写出来。至于春秋时管仲调整货币价值高低的那一整套做法，有哪些能对当今的治理会有帮助呢?西汉严尤关于对付匈奴需要择定的四种策略，要数哪一种更与目前的形势相切合呢？西晋杜预制定的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又把哪一条放在首位呢？西晋羊祜提出的扫平东吴的战略又在什么上狠下力气呢?推究这些鲜明的历史借鉴，把它们归结在最为适中的尺度上，期望能提出广博的看法。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刘蕡　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

刘蕡（生卒年不详）　字去华，昌平(今属北京市)人。博学擅写文章，尤精《春秋》。喜论古代兴亡之事和王霸大略，颇为关注时务。性情耿介，嫉恶如仇，浩然有救世之志。宝历二年(826)进士及第，两年后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在对策中痛斥宦官专政，纵论时政安危，极为激切，迥异于其他一百多名应试者的"冗龌常务"之词。考策官读后尽管嗟叹折服，但因畏惧宦官却不敢录取。对策传出后，第三名李郃自愧不及远甚，特上疏愿将所获官职让与刘蕡。谏官御史亦扼腕愤发，轮番奏请朝廷宣表彰刘蕡忠直。正人君子传读其文，叹其诚鲠，至有相对垂泣者。但刘蕡仍被黜落。甘露之变(公元835年)后，被辟为山南东西道幕府执事，倍受尊敬。复遭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卒于任上。此后六十余年，正义之士一直为他切齿饮泣，致使昭宗追赠其为左谏议大夫。新旧《唐书》本传及《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文粹》均载其对策。后世进士在殿试对策中亦每以刘蕡为取法效仿的典范。其对策实为一篇名副其实而又被扼杀了的制科状元卷，故特予载录。

对：褐衣小臣贲，沐浴斋戒，伏于彤庭之下，谨顿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但怀愤抑，郁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夸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兴，以大明垂照，询求过阙，咨访谟猷，下制中外，举能直言极谏者。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之所忌，时之所禁，权幸之所讳恶，有司之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朝有谠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谨昧死以对。

伏以圣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人以济俗，和阴阳之煦物，见陛下慕道之诚也。臣以为哲王之理，其则不远，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祇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心有所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达。欲俗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气之和也，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旱在致乎精诚，广播植在视乎食力。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检，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伏以圣策有择官济理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则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理鲜，要在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庭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咨访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言，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于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为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

之战?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言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臣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始终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则可以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矣,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环之弊而为巧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大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者,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今陛下不以国家存亡之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为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计也耶?或万机之勤而圣虑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忧者而不先忧乎?臣以为陛下之所虑者,宜先忧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乃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大帝业既艰难而成之,胡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余载矣。其间明圣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而陈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臣又按《春秋》,阍寺杀吴子余祭,书其名。《春秋》讥其疏远贤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戒。将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臣得以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总天下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

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后生于今日矣，此宫闱之所以将变也。

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春秋》以为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储未建，郊祀未修，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

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而此书者，重其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

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以其能逐君侧之恶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所以将乱也。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以抗词，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陛下皆明知之耳。

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戕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故《传》有造膝诡词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

今公卿大臣，非不欲为陛下言之，虑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以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故低徊郁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耳。陛下何不以听朝之余，明御便殿，召当时贤相与旧德老臣，访持变安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得理于前，当理于后；不得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旰食之忧矣。

臣前所谓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舜之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二其业，不侵其职。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汉之元成，咸愿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明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

伏愿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纲纪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者，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擅权而震主。臣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洪绪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者。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由而知，则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由而信。臣谨案《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灭亡也。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虽国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

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亲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之于上也，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

今四海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

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权兵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黩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九重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师旅，继之以凶荒，臣以谓陈胜、吴广不独生于秦，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腐心泣血耳。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者，固其然也。

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凶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愿陛下慎终如始，以塞万方之望，诚宜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黩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人苏息，则心无所不达而信无所不孚矣。

臣所言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闻德以修己，教以导人，修己也则人不劝而自至，导人也则人敦行而率从。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不以立教之旨未尽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匡时为忠，知人则任贤而去邪，匡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人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举贤正不遗其疏远，则化洽于朝廷矣。爱人以敦本，分职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于天下矣。

臣前所言欲气之正也，在安其情以和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修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

清则人安矣。既富则仁义兴焉，既安则寿考生焉，仁寿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言救旱灾在致乎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鲁文公二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无悯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诚而不害物，文无悯恤而变成灾。陛下诚能有恤人之心，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言广播植在视乎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人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言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齐。《春秋》讥其国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徒，以督其耕植；省不急之务，以赡其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言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道息矣。

臣前所言豪猾逾检，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书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

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间农事以修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义邦家，式遏乱略。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居闲岁则辇弓力槁，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修复古制，不废旧物。

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大将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嫉文职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

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驭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仗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耶?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还军伍之职,修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规,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万国,始天子而达于诸侯,则可以制豪猾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臣前所言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者,盖以国家贵其禄而贱其能,先其事而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修业之心矣。臣前所言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理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曾经战阵及功臣子弟,各请随宜酬赏。如无理人之术者,不当授任此官,则绝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言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言辨枝叶者,在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言形耻格者,在道德而齐礼也。臣前所言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游惰者,已备之于前矣。臣前所言令烦而理鲜,要在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乃理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理鲜,得非持之者为所蔽欺乎?

臣前所言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庭待问,则小臣岂敢爱死者,臣闻晁错为汉画削诸侯之策,非不知其祸之将至也。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逢死而启殷,比干死而启周,鄢生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至于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

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祀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调元气以煦育，扇太和于仁寿，可以逍遥而无为，端拱而成化。

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而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而任之，使修分阃之寄；念百度之未贞，在择庶官而任之，使专职业之守；念万姓之愁痛，在择长吏而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以致其理哉？谨对。

对答如下：身穿粗布衣衫的渺小臣民刘蕡我收拾整洁，经过斋戒，跪拜在紫红的殿阶下面，恭谨地施行大礼特向皇帝陛下进献言论。臣下我确实很不成器，怀有匡扶国政、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圣明的帝王的对策，然而没有官位竟不能施展出来；怀有触犯龙颜敢于规谏的心念，然而没有途径竟不能表达上去。只是蕴积着满腔的激愤与抑郁，强烈渴望碰到机会完全倾吐出来。总想在道路上和平民百姓议论一通，在集市上与商贩高谈一番，得以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使君主的内心彻底醒悟。即使蒙受到妖言惑众的罪名，也没有什么悔恨的地方。况且正赶上陛下依仗最高的德性接着兴起，凭借太阳般的盛明来垂示照临，询求过失和缺陷，访问计策和谋略，向朝廷和地方下达诏书，要求荐举确能直言极谏的人士。臣下我既然不合格地被列入了这次荐举的行列中，专门承奉重大的策问，哪里敢不亮出全部想法来做讲论呢？至于上面所忌讳的事情，时世所禁遏的东西，权贵所厌恶并不愿人们提起的问题，主管部门录取与否，臣下我很愚昧，都对它们闹不清。跪拜只请陛下稍略予以宽容，不使圣明的朝代出现忠诚正直却被处死的人，这也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了，可这也不是臣下我敢抱希望的事了。下面恭谨地冒着死罪来做对答。

跪拜而鉴于圣明的策问中讲到思慕远古时代的治理，念及到清静无为的化导，希望沟通皇天与人间的感应关系，用来使社会变美好；让阴阳高度和谐，化育好万物。这真能看出陛下仰慕治国大道的一片诚意啊！臣下我认为圣明帝王的治理，它那该效仿的准则并不离

得多遥远，只在于陛下获取它的办法怎么样罢了。跪拜又鉴于圣明的策问中讲到恭敬地承担起列祖列宗构建的大业而不敢安逸享乐，奉从并依从《皋陶谟》和《伊训》等经典而不敢懈怠荒废。这真能看出陛下忧惧辛劳到极点了啊！至于任用贤才，保持警惕，终日辛勤忙碌，就该斥退身边那些连每桩小事都要讨好献媚的人，进用确能起到助手作用的大臣。至于追踪三皇五帝，继承并恢复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就该借鉴古代的兴亡轨迹，辨明当时的得失所在。内心还有闹不明白的事情，这是由下面的想法被阻塞而反映不到上面来所造成的呀！实行中还有让人不信服的地方，这是由上面的恩泽被堵住而无法施布到下面去所造成的呀！希望世人接受教化，在于修养好自身来给天下做出表率来；希望时气变正常，在于使它的本性得到发挥来引导它。拯救水灾旱灾，在于献上精诚；扩大谷物种植，在于察识民食和民力。国家仓库储备很少，这是出自四处游荡混饭吃的人还太多；官吏施政的方法五花八门，这是出自选拔任用不恰当。奸猾的豪强超越等级规定，这是由于朝廷和宫内的法令不统一；学生荒废学业，这是由于学校的教官丧失了职守。各个郡县还有人触犯禁令，这是因为委派的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全体工匠还在打制淫靡精巧的器物，这是因为使用规则还没确立起来。

跪拜又鉴于圣明的策问中有那择任官员来实现治理的心愿，为扩大财富而专门发布命令的慨叹。这真能看出陛下教化的根本所在啊！而且依据品行来提拔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哪里还有很难辨清的呢？用礼仪来防范下面的人，具有羞耻心和自动顺从哪里还有表现不出来的呢？忧念生产的人太少而享用的人却特多，就可以去罢斥那些懒惰游荡的人们。忧念政令发布来又发布去而治效却很少看得到，关键在于察辨政令得到贯彻执行与否。广泛地延聘各种英才，就希望陛下一定要采纳他们的建议。来到殿廷上等待询问，渺小的臣民哪敢顾惜性命呢？跪拜又鉴于圣明的策问中有那求取贤才指出君主过失的话语和审查朝政、辨析弊端的命令，这真能看出陛下询访的用心太殷切了呀！实现渺小的臣民摒除奸臣权贵的志向，弊病就在前面革除了。执守陛下顾念到救助百姓并使社会安宁的诺言，恩惠就

施布到民众头上了。奸邪与正直的标准区分出来了，治绩就能与远古时代相接近。礼仪乐舞的规制得到彰明了，和谐的气氛就能充盈。至于春秋时管仲的货币调节法，不是称皇天下或称王天下的谋划。西汉严尤所陈述的对付匈奴的策略，并没有最高一等的策略。西晋杜预督察官吏放在首位的那一条，比不上唐尧虞舜的考核政绩的制度。西晋羊祜平定东吴要狠下力气的那宗事，比不上虞舜通过文舞来感召三苗部落。而且它们都不属于盛大仁德的最为适中的做法，不能够成为最高圣人的借鉴的东西，又哪里值得再为陛下讲述它们呢？但有些确实关系到安危的奥秘、预示出存亡的巨变的事项，臣下我请求披肝沥胆为陛下详作区分来反复地讲论它们。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圣明帝王的治理，它那该效仿的准则并不离得多遥远，这也只在于陛下审慎地思索它，大力地行用它，由始至终总不懈怠而已。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全经一开头就使用的那个“元”字，是表示元气的开端啊！第三个使用的那个“春”字，是表示一年的开端啊！《春秋经》把“元”字放在“年”字的前面，把“春”字放在“王”字的前面，是宣明帝王应当奉守并依从皇天的法则，来谨慎地对待起始阶段啊！又举出季节来寓示年份的结束，举出月份来寓示季节的结束，《春秋经》即使在无事可记时，也必定写出第一个月份，用来保留那季节，这是宣明帝王应当奉守并依从皇天的法则，来谨慎地对待最后阶段啊！帝王一举一动必定由始至终地效法皇天，是因为皇天总是运行而不止息啊！陛下既能谨慎地对待起始阶段，又能谨慎地对待最后阶段，努力地修明它，勤勉地行用它，就可以执持住吉凶的关键而一切都简单易行，不去做人为的干涉又不把功劳归在自己名下了，扩展那确立起根本的大业，增进那建立起最高行为准则的盛德了，又怎能还有夏商周三代轮番补救所带来的弊病而形成奸巧诡诈日益盛行的过程呢？臣下我所以就说，只在于陛下获取远古帝王治国原则的办法究竟怎么样罢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至于任用贤才，保持警惕，终日辛勤忙碌，就该斥退身边那些连每桩小事都要讨好献媚的人，进用确能起到助手作用的大臣，这实际上是出于陛下忧惧辛劳到极点了啊！臣下我听

说，不该去忧惧的事情却去忧惧它，国家必定会衰败；应该忧惧的事情却不去忧惧它，国家必定会危亡。如今陛下不拿国家存亡的大计和社稷安危的对策在清晰审详的策问中降赐下来，对此臣下我不知道是陛下认为普通的臣民不够用来定立大计呢？还是日理万机太繁忙而圣明的思虑有遗漏的地方呢？否则的话，为什么应当忧惧的事情却不首先去忧惧呢？臣下我认为陛下思虑的事情，首先应当忧惧皇宫里将会发生事变，国家将会变得危险，天下将会倾覆，海内将会大乱。这四个方面正是国家已经显出来的兆头了，所以臣下我认为圣明的思虑应当首先想到它们。

帝业既然历尽艰难困苦才建成，怎么能够很容易就守护住它呢？从前我朝太祖皇帝打下了基础，高祖皇帝操劳那功绩，太宗皇帝定立下大业，玄宗皇帝弘扬那光辉，到陛下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在此过程中圣明的先帝递相承袭，祸乱也接连发生，但却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君子而能继承并弘扬那丰功伟绩的呀！有一天不深加顾念，就会帝位丧失，成为列祖列宗的耻辱，千秋万代引为遗憾啊！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强调君主治国的原则在于体察元气的根本情形，永久占居在纯正大道的主导地位上。对此董仲舒在以前曾为汉武帝讲明了基本的意义，他还讲得不够的地方，臣下我可以为陛下完整地再做陈述。凡属承接上一代国君来当新国君的人，经中一定写上“即位”这两个字，目的是端正他那起始阶段的举措啊！哪位国君死去了，一定要写明他死去的地点，目的是端正他那最后阶段的举措啊！所以身为国君的人，他所发出的必须是纯正的话语，他所遵用的必须是纯正的大道，他所占居的必须是纯正的位置，他所亲近的必须是纯正的人士。

臣下我又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对宦官杀死吴国的国君余祭，直接写出余祭的名字。这是《春秋经》讥刺余祭疏远贤士，昵爱亲近那些被阉割过的人，有那根本不像个国君的举动了。跪拜只请陛下思索列祖列宗创建国家的艰辛劳苦，念及《春秋经》继承上一代国君来当新国君的戒条。将要宣明法度的始立，就去发出纯正的话语又遵用纯正的大道。将要遏止篡位弑君的态势，就去占居纯正的位

置又亲近纯正的人士。疏远被阉割的宦官，亲近耿直的忠臣，辅政大臣得以独立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百官得以恪尽各自的职守。为什么偏用五六个身边的宦官去总揽天下的大政呢？致使他们在外部擅自行使陛下的命令，在内部窃取陛下的大权，威慑朝廷，势力压倒全天下，群臣不敢指斥他们的罪状，天子没办法控制住他们的野心，祸难就在宫室底下酝酿成熟，奸恶就在卧室里面萌生。臣下我恐怕东汉的曹节、侯览那样的宦官在今日又接着产生出来了，这是皇宫里眼看着要发生事变的原由啊！

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到鲁定公即位时，只写下“元年春王”四个字，没在“王”字下写“正月”两个字。这是因为《春秋经》认为上一位国君没能在最后阶段保持端正，继位的国君就没办法使起始阶段很端正，所以谥号便叫做“定”，这是表明没有纯正的来头啊！如今忠诚贤能的人得不到高度的信任与使用，宦官把持着废立皇帝的威权，把上一位皇帝敬宗推入没能在最后阶段保持端正的境地，又造成陛下没办法使起始阶段很端正，况且皇太子是谁还没确定，在京师南郊祭祀皇天的大礼还没举行，将帅和宰相的职权还没归他们行使，等级名分的原有次序还没固定下来，这是国家眼看着要出现危险的原由啊！

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经》的大义有：属于底下双方相互残杀的事件就不予记载，而这一事件却作记载，是突出王札子擅自行使天子的命令啊！皇天把统治权授付给谁的对象，只在君主那里；君主所独自掌握的东西，在于命令。掌握下命令的权力可却失去了它，这就不像个君主了；侵凌君主下命令的权力，这就不像个臣下了。君主不像个君主，臣下不像个臣下，这是天下眼看着要倾覆的原由啊！

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晋国的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造反，进入晋国的国都，可经中却用“归于晋”作记载，这是根据他能驱逐国君身边的奸恶家伙，来安定住自己的国君，所以《春秋经》就赞许他。如今兵权旁落，藩镇将帅飞扬跋扈。有的人根本不懂做为臣下应尽的节操竟带头叛乱，还用安定住君主作为名义。有的人闹不清《春秋

经》的寓意竟挑起战事，还用驱逐恶贼作为招牌。这样一来，政令刑罚都不由天子做出决定了，征讨必定由诸侯说了算了。这是天下眼看着要大乱的原由啊！所以西汉的樊哙就径自推开宫中小门去见禁止群臣入见的汉高祖而泪流满面，西汉的袁盎就挡住坐有宦官的孝文帝的专车而高声规劝，西汉的京房就愤然向孝元帝指斥宦官石显等人而被处死，东汉的窦武就不顾自身安危去谋诛宦官而结束了生命。这些事例都是陛下明晰了解的呀！

臣下我认真查验《春秋经》，晋国的狐射姑杀死阳处父，但经中却记为实际上是晋襄公杀死了他。这是依据他的君主泄露了他进奏的话语啊！晋襄公不能持守住暗中重用的微妙之处，所以阳处父就遇到了突然被刺杀的祸难，所以《春秋经》就指责晋襄公的做法。君主泄露了臣僚的真实意见，下面就不敢把想法全部亮出来了；君主泄露了臣僚的机密行动，下面就不敢把心里话全部讲出来了。所以《春秋谷梁传》上就有拜见君主做禀告而君主不把实情透露出去的说解文字，《易经》上就有臣下不慎密就丧失生命和隐微事不保密就祸害构成的训诫。

现今公卿大臣并不是不想为陛下讲出心里话呀！只是担心陛下必定不会采用。陛下既然忽视它而不采用，必定会把那些心里话给泄露出去；臣下已经讲出了心里话，可却得不到实行，必定会蒙受到祸难。这样就恰恰足以封住正直臣僚的嘴巴，而加重奸臣的威势。所以臣下想把心里话全都讲出来，便产生丧失性命的恐惧；想把真实的想法全都亮出来，便出现祸害构成的忧虑。因而就徘徊来又徘徊去，憋在心里不讲出，用来等待陛下意识到并醒悟过来，然后把那些开导启迪的意见都提出来。陛下为什么不在临朝听政之后引人注目地坐在便殿上，召见当时的贤明宰相和德业厚重的老臣，询访控制事变、驾驭安危的谋略，求取扶定倾覆、拯救祸乱的对策，堵塞住阴险邪恶事的途径，斥退身边宠幸的那批宦官，挟制住他们侵凌皇权和胁迫天子的野心，让他们还干看门打扫宫院的那类差事。警戒那确应警戒的大事，忧虑那确应忧虑的问题，在前面没得到治理可在后面就该得到治理，没办法端正那起始阶段可在最后

阶段就该有办法端正，这样便能虔敬地奉守《皋陶谟》和《伊训》等经典，肩负起盛大的帝业，实现任用贤才的功效，没有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的忧虑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至于追踪三皇五帝，继承并恢复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就该借鉴古代的兴亡轨迹，辨明当时的得失所在。对此臣下我听说唐尧虞舜作为君主而天下实现了大治，原因在于他们能任用九种中央要员和四方诸侯的长官以及十二州的第一把手，不在人选举用上出差错，不让他们改变各自的职守，不侵夺他们的职权。让谁担任官职只根据他的才干，身边的大臣只管择取贤士。八元和八凯这兄弟十六人还处在下面，尽管卑微可一定要提拔他们；共工、欢兜等四个大罪人位居朝廷，尽管势力强大可必定要惩治他们。这正是考察那安危的局势，明悉那取用和舍弃的对象。到了秦朝的二世皇帝和汉朝的孝元帝、孝成帝时，他们也都渴望把国家治理得跟唐尧虞舜一个样，自己也成为唐尧虞舜那等君主，可到最后却都衰败灭亡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看不出安危的微妙之处，不懂得取用和舍弃的准则与方法，不信任大臣，不辨明奸贼，不亲近忠诚贤良的人士，不疏远诋毁人又会献媚的家伙。

跪拜希望陛下察识唐尧虞舜兴盛的来由，对前代仰慕他们的行为；把秦汉灭亡的原因作为借鉴，对后世引起戒惧。陛下不要认为朝廷上没有贤能的宰相，百官中没有优秀的人才。如今国家纲纪还没废绝，典章制度仍然摆在那里，人们中有谁不想献上自己而成为天子的大臣，把时世带入太平的境地，陛下为什么忽略他们而不任用呢?还有身居官位却不是胜任的人选，位于天子左右却不是贤才，凶恶就跟唐尧虞舜时的四个大罪人一个样，诡诈就跟秦朝的赵高一个样，奸邪就跟西汉的弘恭、石显一个样，陛下又害怕什么而不驱逐他们呢?帝位原本上就有归属的对象，天命原本上就有既定的安排，列祖列宗原本上就有佑护的威灵，忠臣原本上就有为君主献身的心愿，陛下要深思这一切啊!从前秦朝灭亡，弊害出在强硬凶暴；汉朝灭亡，弊害出在衰微薄弱。一强硬凶暴，贼臣就害怕自己被处死而谋害君主；一衰微薄弱，奸臣就独揽大权而威震天子。

臣下我跪拜看到敬宗皇帝不忧虑秦朝灭亡那样的祸患，不根除那苗头才遇害的。跪拜只请陛下加深汉朝灭亡那样的忧惧，遏止住发展的态势，列祖列宗的宏大统系也就可以承接上了，三皇五帝的遥远足迹也就可以追上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陛下内心还有闹不明白的事情，这是由下面的想法被阻塞而反映不到上面来所造成的呀！实行中还有让人不信服的地方，这是由上面的恩泽被堵住而无法施布到下面去所造成的呀！况且百姓遭受着灭绝的痛苦，陛下没途径能够了解到。这样一来，陛下怀有像抚育儿子那样抚育百姓的心念，可百姓也没办法真相信啊！臣下我认真查验《春秋经》，经中记载梁国灭亡，而不写成秦国攻取了它，这是表明梁国属于自取灭亡啊！因为梁伯思虑昏昧而视听闭塞，上面施行恶劣的国政，民众都成为盗贼，不知道秦国为什么要袭取梁国，由此而自取灭亡啊！臣下我听说国君能保持尊贵的地位，是因为加强国家的实力呀！国家能加强实力，是因为保存住手下的百姓啊！如果百姓保存不住，尽管还是一个国家，但却没办法加强它那实力呀！如果国家实力不强，尽管还是一个国家，但却没办法保持住他那尊贵的地位啊！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就不能不了解百姓的想法啊！

百姓是陛下的天真无邪的孩子，陛下应当任命仁慈的官员去爱护他们和养育他们，就像少保、少傅一般，就像乳母一般，就像师长的教导一般。所以世人对于上面，敬畏得就如同神灵，热爱得就如同父母。如今却不是这种情形。陛下亲近宠幸的权贵，划分部门又设置官署，补授办事人员，召揽宾客，依据他们的进献物品而助长他们的气势，职务高的就统辖一方，职务低的就当郡县长官，在上面的人没有清正仁惠的民政却有极度贪婪的祸害，在下面的人没有忠诚的节操却有奸邪欺诈的罪过。所以世人对于上面，畏惧得就如同豺狼，憎恨得就如同仇敌。

如今四海以内困乏贫穷，每个地方都在流亡离散，挨饿的人吃不上东西，受冻的人穿不上衣服，无夫无妻的老人和孤儿，根本没办法活下去，上年纪的人和孩子以及得病的人得不到养护。再加上

国家的大权和兵权，掌握在宦官的手中，贪婪的大臣通过聚敛民财来保住皇上对自己的宠信，奸恶的官吏一味比附引申而玩弄法律，冤屈悲痛的声音往上传到了九重天，往下传到了地底下，鬼神为此而怨恨愤怒，阴阳为此而形成灾害。君主的官门一道又一道而没办法告御状，读书人没有归从化导的处所，众百姓没有依附性命的地方，官员混乱，世人贫困，盗贼同时兴起，土崩瓦解的局势令人忧惧得就在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之间。假设不幸随后兴起造反的军队来，接着又出现大饥荒，臣下我认为不单单陈胜、吴广那样的人物像在秦朝时一样会出现，也不单单赤眉军、黄巾军那样的起义队伍像在两汉时一样会出现了。臣下我正由此而为陛下发愤扼腕，绞碎心又哭出血啊！像这样，百姓存在着灭绝的痛苦，陛下通过什么途径而能了解到呢？怀有像抚育儿子那样抚育百姓的心念，百姓又怎么会相信呢？致使陛下在实行上还有让人不信服的地方，内心还有闹不明白的事情，原本上就只能这个样啊！

臣下我听说从前汉元帝在登上帝位不久，便对七十多种事项做出了新规定，他那用心极其真诚，他那名声也极其美好，然而朝廷纲纪却一天比一天紊乱，国家命运一天比一天衰败，奸恶凶残的大臣一天比一天势力强大，黎民百姓一天比一天困顿。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不能够择取贤明的人而予以任用，失去了决定一切的权力才造成的呀！自从陛下统领天下以来，忧念亿万民众并为他们操劳，多次颁降仁德的诏书，四海以内没有谁不仰起头来长长叹息，为自己从死亡中重新获得生存而感到高兴啊！跪拜希望陛下像对待起始阶段那样慎重对待最后阶段，用来满足天下各地的愿望，确实该标揭国家的权力，把它再交给宰相去掌管；执持住兵权，把它再交给将帅去掌管，去除贪婪的大臣光聚敛民财的弊政，铲除奸恶的官吏一味比附引申法律的祸害。只去亲近忠诚贤能的人，只管任用正直的人，对宫内宠爱和邪僻献媚的人不听从他们的任何话语。选用清正谨慎的官员，择任仁慈施惠的长官，用财利来抚育百姓，用宽和来沐浴百姓，用孝敬慈爱来教育百姓，用道德正义来化导百姓。去除视听的阻塞，沟通上下的想法，使天下各地欢悦安康，亿万民众复

苏生息，也就内心没有任何闹不明白的事情，信义没有任何不被人信服的了。

臣下我所讲的希望世人接受教化，在于修养好自身来给天下做出表率来。对此臣下我听说，道德是用来修养好自身的，教化是用来开导别人的。修养好自身，对人们不用鼓励就会自动前来归附；开导好人们，人们就会努力提高品行而服从。所以君子想使政令一定要推行开，因而就首先自己做出表率来；想使人们接受教化，因而就用道德驾驭他们。如今陛下先给天下做出表率来了可政令还没推行开，用道德去驾驭世人了可世人还没接受教化，这难道还不是因为确立起教化的宗旨尚未在那方法上做得特恰当吗?确立起教化的方法在于君主凭借英明去做出规定，臣僚依靠忠诚去贯彻执行，君主把能了解人当成英明，臣僚把匡扶时世作为忠诚，了解人就会任用贤才而斥退奸邪的家伙，匡扶时世就会巩固根本而遵守法度。贤才得不到任用，重赏也不够用来激励人们做好事；奸邪的家伙得不到斥退，严刑也不够用来禁止住邪恶的行为。根本得不到巩固，人们就四处游动；法度得不到遵守，政事就涣散。这样却想教化一定要让它大见成效，化导一定要让它推行开，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了。陛下能够斥退奸邪的家伙而不偏爱自己身边的人，提拔贤良正直的官员而不遗漏掉关系疏远的人，化导也就在朝廷上遍布开了。爱惜世人用来巩固根本，分清职责又奉守法度，修养好自身再延及到别人那里去，在内心先做起而在外部又告成，化导也就在全天下推行开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希望时气变正常，在于使它的情性不变化来与它保持和谐的状态，就应当把世人带入仁德长寿的境地啊!而想使世人仁德长寿，又在于定立起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定立起来了，国家的开支就能节省；国家的开支节省了，赋税就会减轻；赋税减轻了，世人就富裕了。教化得到了修明，争斗就会止息；争斗止息了，刑罚就会不使用；刑罚不使用了，世人就安全了。已经富裕了，仁德正义就会兴行；已经安全了，长寿就会来到。仁德长寿的心思在下面相感召，和睦安平的时气就在天上做出回应来，所以

灾害就不降现了，各种吉祥的兆应就接连来到了，四方归于安宁，万物全都顺利生长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拯救旱灾，在于献上精诚，对此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鲁僖公时在一年以内经中连续记载了三次天不下雨的事情，这样做记载是因为鲁僖公作为国君怀有体恤百姓的志意啊！而鲁文公时在三年以内却只记载了一次天不下雨的事情，这样做记载是因为鲁文公作为国君却没有怜悯百姓的心思啊！所以鲁僖公献上精诚，天旱却没殃害动植物；鲁文公不存在怜悯体恤，天旱就演变成重灾。陛下果真能有体恤百姓的心念，也就没有形成重灾的恶化情形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扩大谷物种植，在于察识民食和民力，对此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强调国君必须经常察识人们在为什么事情而忙碌得受不住。人们在力役上忙碌得受不住了，土木工程就很少能修建成；人们在财物上忙碌得受不住了，赋税就很少能征收上来；人们在食物上忙碌得受不住了，一切国家分派的事情就都干不成了。如今人们在财物、食物和力役上全都忙碌得受不住了，希望陛下废弃一切徭役和赋税的征发，用来扩充春夏秋三季的农事，谷物种植就不会错过农时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国家仓库储备很少，这是出自四处游荡混饭吃的人还太多，对此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经中记载鲁国的臧孙辰到齐国去借粮食。这是《春秋经》在讥斥鲁国没有二十七年中应有多出九年也够用的积蓄，一年出现歉收而百姓就会挨饿啊！臣下我希望陛下罢斥游荡懒惰的那群人，去督促他们搞好农耕；停止并不紧急的徭役，用来使百姓够吃够用。这样一来，国家仓库的储备也就不缺乏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官吏施政的方法五花八门，这是出自选拔任用不恰当。之所以如此，又是由于国家选取官员不发挥出他们的全部才能；任用官员不明了关键所在的缘故啊！如今陛下用人，只看他的名声却不看他的实际，所以人们为了往上爬，就在细枝末节上花气力而不在根本上用功夫。臣下我希望陛下验定政绩考核的实

效，确定下晋升的制度。这样一来，五花八门的官吏施政方法也就消停下去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奸猾的豪强超越等级规定，这是出自朝廷和宫内的法令不统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官员的禁令不统一啊！臣下我认真地查验《春秋经》，凡是齐桓公召集诸侯举行会盟，都不记明具体的日期，而在葵丘举行的会盟偏偏记明日期，这是赞扬他能够宣明天子的禁令，奉守并服从做为王室官僚成员的法度，所以《春秋经》就详尽地予以记载。官职，这是三皇五帝就已经设立起来的呀！法度，这是我朝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制定出来的呀！法度应当整齐划一，官职应当端正名分。现今又划分出朝廷官和宫内官的具体员额，形成以宰相为首的南司和宦官掌领的北司并立的局面，有的在南司触犯了禁令就跑到北司保命，有的在朝廷上该按刑法处治可又由宫内破坏律条而不予处治，法令由各个方面说了算，人们没有放置手脚的地方，这实际上是由军队和农民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宫内与朝廷又法令不统一所造成的呀！

臣下我听说古代按照井田制来确定军事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农活的空隙中来修明武备，在各个行政区内分派士兵和战车的数目，任命将帅从公卿的行列中来做挑选，所以军队和农民合二而一，文治和武功方法同等，可以保有并治理好国家，遏制住祸乱。等到我朝太宗皇帝创建各种国家制度，也设置以折冲府为单位的军队，中央权力机构和军事主管部门，文武交互掌领，在太平无事的岁月里就收起兵器，大力从事农耕；一发生战事就放下农具，操起武器去打仗，用来恢复并完善古代的制度，不废弃原有的东西。

如今却不是这个样子了。军事主管部门的官员不知道军队有多少，只是上朝点个卯；大将不负责军政事务，只是在坐等勋官等级待遇的提高。军队的架式要符合宦官的命令，部队的纪律要依附宦官的职权。头上一戴上武官的帽子，就像仇敌那样嫉恨文官；双脚一踏进军营的大门，就像草叶那样对待农民。谋略不够用来翦除奸恶凶残的家伙，可诡诈却足够用来随意施展刑罚和封赏；勇力不够用来镇抚保卫国家，可凶暴却足够用来祸害民间百姓。囚禁起坐镇

一方的大臣，触犯侵凌宰相，败坏帝王的法度，搅乱朝廷的纲纪。张扬那武夫的威风，往上去挟制君主；假借天子的命令，往下去驾驭英雄豪杰。抱有隐藏奸谋、观看事态发展的野心，没有执守节操、为国难献身的正义感。这难道是我朝先帝筹划文治武功的宗旨吗?臣下我希望陛下贯通文治武功的方式方法，调节好军队与农民的功效，厘正尊贵与卑贱的名分，统一起宫内和朝廷的法令，恢复军官的职权，修明政府各机构的职守，在近处崇尚我朝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的成规，往远处恢复周代的制度，从京师地区给天下各地树立起榜样来，由天子做起而延及到诸侯，也就可以控制住奸猾豪强的强大势力，没有超越等级规定的祸患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学生荒废学业，这是由于学校的教官丧失了职守。其中的原因在于国家给他们很高的俸禄却轻视他们的才能，把有人教书放在前面而把品行如何放在后面，所以众多的教官就缺乏通晓经典的学识，学生们也没有修明学业的心思了。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各个郡县还有人触犯禁令，这是由于委派的长官不是合适的人选。臣下我认为，刺史的授任，关系到国家治乱的根本所在，朝廷的法令制度明摆在那里，要求动用威权可以抑制住奸猾的地方豪强，施布恩惠可以使孤儿寡母得到好处，强硬可以抵御住奸贼强盗，政事可以转变社会风尚。手下的将校曾在战阵中拼杀以及功臣的子弟，都有权代替他们分别向朝廷奏请，赐给这些人相应的封赏。如果没有治理百姓的一整套办法，那就不应把刺史的官职授付给他。这样一来，有人触犯禁令的祸患也就断绝了。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全体工匠还在打制淫靡精巧的器物，这是由于使用规则还没确立起来。臣下我请求按照官位和品级高低来做出器物车马和服饰的使用规定，禁止在私人家积聚金银珠玉和上等刺绣以及雕刻品，也就没有那摇荡心志的奢侈物件了。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辨明一个人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于考察他的言论又询访他的品行啊!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人们具有羞耻心并由衷归从就能表现出来，在于道德感化又用礼仪去统一人们的行为啊!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顾念到生产的人太少而张口要吃饭

的人却特多，就该罢斥游荡懒惰的那群人，已经在前面谈得很详备了。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政令发布来又发布去，可治效却很少看得到，关键在于察辨政令得到贯彻执行与否。臣下我听说政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啊!君主审慎地颁布它，臣僚承奉并执行它，有人予以擅自更改或押压，罪过就在决不饶恕的范围内。如今陛下的政令发布来又发布去，可治效却很少看得到，恐怕是接到政令的官员对百姓在于那欺瞒蒙蔽的勾当吧?

臣在我在前面所讲的广泛地延聘各种英才，就希望陛下一定要采纳他们的建议。来到殿廷上等待询问，渺小的臣民哪敢顾惜性命呢?对此臣下我听说当年晁错为汉王室筹划削弱同姓诸侯王的策略，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杀身之祸就会招来呀!但忠臣的用心，壮士的节操，表现在如果对国家真有利，死去也没有什么悔恨的。如今臣下我也不是不知道答卷写出后，祸难就跟着降临；计策行用后，本人就遭到斩杀，但出自痛惜国家的危情险态，哀悯百姓的艰难困苦，哪里就忍心对目前的禁忌予以将就，窃取陛下授给一个官职的恩宠呢?从前夏朝的龙逢被夏桀处死，却给商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商朝的比干被纣王处死，却给周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秦末的郦食其被齐王田广处死，却给汉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东汉的陈蕃被汉灵帝时的宦官杀死，却给曹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如今臣下我来到了殿廷上，主考官们或许就不敢推荐臣下我的答卷，陛下又没办法体察臣下我的忠心，交完答卷后必定会在权臣手中受到斩杀，可臣下我有幸能够跟从以上四位贤士在地下往来，原本上就是臣下我的志愿所在啊!但不清楚斩杀了臣下我，在臣下我死后将会给谁崛起，开辟那道路了。

至于君主的过失，政令教化的缺陷，从前的弊病，臣下我已经在上面做过讲论了。至于向下面的百姓施布恩惠，修明接近远古时代的治绩，实现太平的景象，只在于陛下实行臣下我的建议罢了。然而上面所陈奏的看法，实际上是出自臣下我亲身承奉圣明的策问，哪里敢不逐条做对答呢?尽管像臣下我这样的愚昧，但仍认为策问并未涉及到教化的重大方面和称皇天下或称王天下的紧要道

法。跪拜只请陛下服事皇天大地来教导世人怎样恭敬，奉守宗庙祭祀来教导世人怎样孝顺，养护老年人来教导世人怎样敬重长辈，抚育众百姓来教导世人怎样慈爱，调节好元气来化生养育，把那高度和谐的状态引入到世人仁慈长寿的境界，也就可以消遥自在地无为而治了，稳稳坐在那里就形成教化了。

至于顾念到陶冶熔铸世人和万物的方式方法，正在于择取宰相而任用他们，使他们掌握那创造化育的权力。顾念到保有国家和定立下大业的功勋，正在于择取将帅而任用他们，使他们修明独挡一面的职守。顾念到各种典章制度还没端正，正在于择取百官而任用他们，使他们履行好各自的岗位职责。顾念到天下百姓的忧愁痛苦，正在于择取地方长官而任用他们，使他们熟悉施恩养护的具体做法。这样自然就言辞足以成为对天下的训导，行动足以成为天下的典范，仁德足以激励起良善，正义足以禁遏住邪恶了。又何必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费尽心思又忧虑重重，然后才会形成那大治呢？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丁巳科

进士试题

琴瑟合奏赋
霓裳羽衣曲诗

李肱　霓裳羽衣曲诗

李肱(生卒年不详)　祖籍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后徙于谯(今安徽亳县)。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第一,历官岳、齐二州刺史。当时有"文章精练,行义昭详"之誉。

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
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
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
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
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
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

在我朝玄宗皇帝开元年间太平的时代,
天下各地无不庆贺丰收的年景。
黎园的乐工献呈上古时传下的曲调,
天子的宝座上又流泻出翻新的创制。
凤凰形制的乐器吹奏出参差错落的旋律,
云霞般的舞衣竞相摇曳而多姿。
欢宴结束水殿上一片空寂,
辇车过后春草是那样地纤细。
蓬莱三神山的盛事已经为时很久,

如今的仙家乐舞却功效永远不可取替。
哪里肯去欣赏古时留下的乐曲，
圣明的当朝天子深知要善于继承前代的功绩。

〔杨寄林译〕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癸亥科

进士试题

风不鸣条诗

卢肇　风不鸣条诗

卢肇(生卒年不详)　字子发,宜春(今属江西)人。自幼家贫,武宗会昌三年(843)进士第一。初被辟为鄂岳、江陵、太原等镇从事或门吏,后任潼关防御判官,征为著作郎,迁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直学士。懿宗咸通中,出任歙州刺史,转调宣、池、吉三州卒。曾有赋集八卷,诗文集十三卷,亦工书法。

习习和风至,过条不自鸣。
暗通青律起,远傍白苹生。
拂树花仍落,经林鸟自惊。
几牵萝蔓动,潜惹柳丝轻。
人谷迷松响,开窗失竹声。
薰弦方在御,万国仰皇情。

和暖的春风习习地吹来,
吹过树枝时却不自行发出任何的响声。
与那春三月的律吕暗暗地融通而吹起,
往远处依傍住白苹而生出。
吹拂树木而那树花同时就飘落,
经过林荫而百鸟自行就感到吃惊。
多次牵引萝蔓在摇动,
悄悄惹动柳丝更轻柔。

进入山谷就让人分不清哪里的古松在响动，
推开窗扉便消逝了翠竹的音声。
弹奏当年虞舜《南风歌》的琴弦正握在手中，
天下各地都仰望那皇恩施布的天子心情。

〔杨寄林译〕

唐五代十国进士暨制科试题辑存

〔已入前编者不录〕

1.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己未科

关内父老迎驾表 /

贡士箴

2.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乙未科

策进士问　问:卦分江使,图演天文,文籍于是滥觞,书契以之抽绪。皇《坟》、帝《典》,述纪言以联镳;《五传》、《六经》,纡礼乐而齐驱。斯并悬诸日月,焕乎文章。至如诸子相腾,小说奔竞,有惭屑玉之化,无异杂铅之宝。请用于火,恐招博弈之讥;将扇其风,复爽焚夷之义。二涂交战,一为解环。《百两》之篇,孰明其善?七分之术,孰著其能?谁求天下之书,谁决冢中之箓?识二简者何子,观四辙者何人?《京兆耆旧》之篇起于何代,《陈留神仙》之传创自何人?谁先《孝子》之图,谁首《逸人》之记?傥无谈于凋棘,将有荐于拔茅。

提问:八卦由充当清江使者的神龟而分立起来,神图演示天庭的秘文,人间的书籍在这时开始出现,文字由此形成。三皇的《三坟》和五帝的《五典》,递相记述圣人言辞而并驾齐驱;解释《春秋》的《五传》和儒家的《六经》,编列礼仪乐舞而相提并论。这些典籍全都像太阳和月亮那样高高悬照,在文章中最为光彩夺目。至于像其他各个学派相互比高低,街头巷尾的传言也设法挤进来,在道教仙家的化导面前都很逊色,真和夹杂着铅质的宝物没有什么差别。请求把这类书籍都烧掉,恐怕会招来不懂得学习小技艺也比整天闲着没事强这一道理的讥斥。但眼看着这类书籍盛行起来,又违背了铲除异端学说的宗旨。这就像从两条路聚到一起展开争战,你们这些考生要把那纠结处完全解开。《百两尚书》,是谁明了它的优胜之处?《易经》学中七分的占断术,是谁显现出他最擅长?又是谁去访求天下的图书,是

谁裁断汲郡古墓中的典册?辨认出竹简上两[illegible]人是哪一位,观览车马足迹能到达的四方各地的人又是哪个人?《京兆耆旧传》是从哪个朝代开始问世的,《陈留神仙传》又是由谁创作的?是谁首先编撰了《孝子图》,又是谁第一个写成了《逸人记》?如果你们在过时的那一套上不谈及,将会向朝廷递相加以推荐引进。

3.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戊戌科

策进士问　问:玄龟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乌呈祥,金德总商君之业。白鱼跃而周道隆,丹雀来而秦德霸。殷因夏礼,损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灭火起,殷周之运匪人;若桀暴纣昏,废兴之期自我。然而龙斗兴于夏日,毫妖发于周年,灾祥兆于前成,荒败兴于后政。荡荡之德,何所加焉?伫尔扬名,为余张目。

提问:黑色的神龟献上福庆,九鼎的授付昭示了夏朝国王的世代传续;赤色的神乌呈现出吉祥,占据金行支撑了商代君主的大业。白鱼跃上舟船,周朝的统治方式由此而隆盛;丹雀飞来,秦国的德业由此而称霸。商朝沿袭夏朝的制度,其间所进行的增益和减损可以清楚,但秦国却兴盛起来而周朝却衰落下去,天上和人间的关系为什么竟这样地让人弄不懂呢?如果说水行泯灭,火行兴起了,商朝和周朝的国运不是能由人所决定的;如果说夏桀残暴,商纣王昏乱,废绝和兴盛的时候是由自身造成的。可是雌雄两条龙争斗却在夏朝孔甲时出现,装放两条龙所吐口水的匣子被打开而口水变成玄黿致使宫女碰上就怀孕的妖孽现象,又在周朝幽王时产生。吉祥的兆应总在前面创立基业的时候显示出来,荒乱败亡又常在后世执政的阶段出现。既然如此,广大的仁德究竟该往哪里去施布呢?等待你们这些应试者对答得特出色而名声播扬,特为皇帝我张列那名目。

4. 武则天大足元年(701)辛丑科

策进士问四道　问:有征无战,道存制御之机;恶杀好生,化含亭育之理。顷塞垣夕警,战士晨炊,犹复城邑河源,北门未启,樵苏海

畔，东郊不开。方议驱长毂而登陇，建高旗而指塞，天声一振，相吊俱焚。夫春雪偎阳，寒蓬易卷，今欲先驱诱谕，暂顿兵刑，书箭而下蕃臣，吹笳而还虏骑。眷言筹画，兹理何疑。第一道

问：夫子述《孝经》，裁道德，辅天相地，树之王化，穆乎人伦。既《钩命》而合谟，亦《契神》而尽性。历听藏书，同为代宝；永言五孝，不列《六经》。将设教之有旨，岂偏序之无法？北宫群彦，未始详焉；东观诸儒，不之辩也。且礼乐二本，古文漏失；《春秋》三传，大议派分，而备六籍于兰台，悬《九经》于甲令。今欲登孝道为七艺，亦未前闻；足经名为十部，恐疑后进。思观义窟，用定儒门。第二道

问：语人以伦，鸣鹤斯和；砥名砺节，异代同归。子等温古知今，将施有政，前言往行，岂曰无闻？至于显仁义以基德，标智信以习礼，触目青史，比肩缥帙，思齐其事，各辩其人。既呈役于扣钟，可征贤于求燧。肖形天地，甄化阴阳，五常配于五行，六情同于六气。为所禀之各异，盖因物而或迁。仍分情气之题目，兼叙常行之方位。第三道

问：自昔帝王，必有制作，所以隆基天命，器辩神奸。至于或铸昆吾，或迁郑鄏，虞邱之说尚疑周汉，楚子之问未详轻重。通明旧史，幸为指陈。亦有弗父勒名，仲山传器，得于何代，显自何功？鱼游之旨安施，雉颂之文奚戒？兼言鼎鼐之异，及显国家之宜。第四道

提问：有那征伐却没有实际的交战，这种获胜的方式寄寓在制服驾驭住对方的机缘当中。厌恶斩杀，喜好化生，这种化导的办法蕴含着普遍养育的治理。近来边塞的城墙在夜间修筑好，而战士们在清晨就开饭准备行动，仍然再在黄河的源头修建城池，北部边防的大门尚未打开，又在沙海边上砍柴割草做储备，东部的郊野还没自由能活动。朝廷正在商议出动大军而登上陇山一带，竖起高高的战旗而指向边塞，皇朝的声威一振扬，抚慰百姓和讨伐罪人的地方就全都成为一片焦土。春天的冰雪依偎着太阳，寒地的蓬草容易收卷，如今打算派出前锋部队进行诱导劝喻，暂时停止用兵用刑，像战国高士鲁仲连把书信系在弓箭上射入燕国将领占据的聊城中使他率军离城而去那样，征服吐蕃部族而主动称臣，像晋朝刘琨在深夜吹奏胡笳而使围攻

晋阳城的异族骑兵自行撤离那样，也叫当今的异族骑兵退回去。殷切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来讲论本人的筹划，这种解决办法存在着哪些令人值得疑虑的地方呢？第一道

提问：孔老夫子撰述《孝经》，裁定道德，辅助天地，树立起帝王的教化，使人伦纲常井然有序。既作《孝经钩命诀》而与圣明帝王的治国谋略相吻合，又作《孝经援神契》来穷尽世人的情性。逐部闻听珍藏的图书，它们和其他典籍同样属于各个时代的宝物。世上总是讲论从天子到平民的五种孝行，可《孝经》却偏不列入《六经》的范围以内。这是设布教化具有特定的主旨呢？恐怕还是排定经典序列没有固定的标准呢？在北宫侍从皇帝的众多英才，未曾对此做出过详究；身在东观供职的各位儒士，也没对此做出过辨析。况且礼经和乐书的两种传本，用蝌蚪古文写成的已有遗漏和散失；解释《春秋经》的三部典籍，在主要观点上又划分成派别。它们在兰台藏书处和六部经典相配备，在国家法令上又作为《九经》而公布。如今想把尽孝之道提升为同六艺组合在一起的七艺，也属于前所未闻的事情；再扩充经典的数目而合称为十部，恐怕又会使后来求进的士子感到疑惑。真想观看到经义大旨的渊源所在，用来确定下儒家学说的门类。第二道

提问：把重大的法则告诉给别人，仙鹤也会鸣叫而对此做出应和来。培养锻炼自己的名节，各个时代都目标相同。你们这些应试者温习古代，了解当今，准备在推行政务上施展出来，对于前代的美好言行，哪里能说没听到过呢？至于彰显仁爱正义来给道德打下基础，标示明智诚信来熟悉礼法，满眼都投注到史册上，全身接连沉浸在书籍中，心想要同那古事一个样，请各自辨明一下具体的当事人。你们既然在扣击钟磬取得任用上献出力量，朝廷就有权像用火镜聚集日光来取火那样征召人才了。人的形体取法天地而生成，陶冶化导离不开阴阳二气的定律，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分别和木金水火土这五行相配属，喜怒哀乐爱恶这六情又分别和风寒暑湿燥热这六气相对应。由于所禀受的东西各自不同，大致上就会随顺外物而有的发生变化。你们要同时区分出情性与天气的具体名目，一并叙述稳定的行为该在的位所。第三道

提问：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必定会有器物的铸造，用来巩固和扩展皇天赋予的统治权，借助器物来辨别神灵与精怪。至于有的铸成昆吾宝刀，有的把九鼎迁移到郏鄏这座王城中。汉武帝时的虞邱关于在汾阴所获宝鼎的说法，尚且怀疑是周代九鼎传到了汉朝。春秋时的楚庄王询问宝鼎的情况，还不知道它的重量。请贯通弄清古代史书的记载，万幸要为我主考官列举陈述这个问题。历史上还有弗父何勒定家庙的鼎铭，仲山甫传下重器，这是在哪个朝代获得的，是从什么功业来予以显扬的？鱼游釜中的义旨是针对什么来设布的，野山鸡飞到鼎环上鸣叫的那段经文是来告诫什么的？连带讲一讲鼎和鼐不同的地方，以及突出地说明一下国家的恰切做法。第四道

5.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壬寅科

东堂壁画赋　(重试题)

6. 武则天长安中(?)

策沈谋秘略科问三道　问：西自临洮，东洎沧海，延袤万里，控扼三边。林胡不宾，犬戎犹梗。守之冲要，备其窥窬，聚多则戍卒不充，布少则敌人莫御。用舍之理，扬榷而言。立镇屯兵，其来非久，悬道分列，自昔犹安。李牧守边，匈奴窜伏，魏尚为郡，郊垒乂宁。今欲悉罢军城，委之牧宰，敬达嘉话，将献吾君。第一道

问：用兵制敌，先资良将，搜奇掇异，昔贤病诸。厚貌深情，最为难辨，受金善盗，终而有益。至如清言要理，行之则违，强力暗通，口不宣意。临问定职，何以分之？李将军简易便人，程不识刁斗严卫，张飞勤于礼士，关羽接于常流。四子所施，幸甄优劣，两适为用，何斯短长？今边锋未亡，善将悬急，试可淹于岁月，拔萃昧于玄黄？子其直言，以去未悟。且三全五事，十过九差，何所废兴，何所施用？理国之贵何首，爱人之道何为？各书名数，仁济邦国。第二道

问：科敌多途，应变无算。览去病之对，顾在方略；读孔明之书，虞于备预。至如烈风猛火，烟焰赫然，雨水奔流，弥漫无际。修何人事，以却天时？或有暴兵卒来，我则未暇，敌人非远，静然无闻。何法

以知敌情，何方以收我众？如其争先不远，我怯须勇，列军甚严，彼强使弱。善战不阵，抑有前人，未战屈人，伫听嘉话。四轻二重，于将谋而何施？三礼五才，于兵形而何要？幸存升降，曲尽所宜。第三道

提问：西部以临洮算起，东部从大海开始，绵延上万里，控制扼守着西部、北部和东部的边境。可东部的少数部族还没有归服，西部的少数部族仍然在作梗。把守险要的地带，防备它们窥伺偷袭，聚集的兵力多，就会感到戍卫的士卒不够用，布设的兵力少，就会感到敌人没办法抵御住。对施用和舍弃的处理办法，请加以发挥来做阐述。设立安西四镇，屯驻部队，这种举措的由来并不是很长久，而设置道一级的政区，分地布列，从往昔以来仍能获得安宁。战国时赵国的李牧守卫边境，匈奴就逃得远远的而不敢动弹；西汉的魏尚担任云中太守，郊野城垒一片安定。如今打算全部撤除掉驻有军队的城镇，把一切都交付给地方官员办理，希望你们这些应试者恭敬地写出美好的建议，将把它们献呈给我们的君主。第一道

提问：动用兵力制服敌人，首先要借助优秀的将领，可搜求网罗奇异的人才，古代的贤人对此就感到很难办。外表憨厚而内心却深有谋略，顶数对这类人难以辨明了；接受部下的贿赂又善于和嫂子私通，到最后这类人却能发挥出作用。至于能明晰地讲论切要的道理，可实行起来就碰壁；武力强劲而心里又能领悟，可就是口头上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到了验核他们而确定职务的时候，应该依据什么来加以分辨呢？西汉飞将军李广处理军务简单易行，使部下感到行动便利，而车骑将军程不识必定命令敲击刁斗，严加防卫。三国蜀汉的张飞在礼遇士人上做得很周全，关羽又和普通人来交流。对这四位将帅所采取的行动，万幸请你们区分优劣，两方面都适合而加以运用，在这上面的长处和短处又是什么呢？如今边塞的两军交战还没有消除，得到优秀的将领是摆在那里的最紧急的事情，可以尝试着拖延时间而对选拔奇才问题却在浴血鏖战面前看不清吗？你们要直切地讲出心里话，用来扫除掉我这主考官还没闹明白的地方。而且三种用兵全胜的意图，五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将帅的十种过失，九

种差异，应该废弃和兴行起哪些，施布和运用其中的什么?治理国家最应重视的东西要数什么占居首位，爱护百姓的方法究竟该做些什么?各自写出这些问题的条目，期待着对国家有所帮助。第二道

提问：查核敌军的情况具有多种途径，应对突然的变化没有固定的计谋。观览西汉霍去病向武帝所做的对答，只是在于方略如何；阅读诸葛孔明的兵书，只是在预先防备好上多用心思。至于烈风猛火，烟气和火焰非常耀眼地在焚烧敌军，可猛然间却雨水降下，奔泄流淌，四处漫过而没有边际。应当修明哪些人事，用来去除这种天时呢?有时会有凶暴的敌军突然扑来，我方就来不及做防备。其实这时敌军距离并不太远，可却没事一样竟不知道。采用什么办法去了解敌情，又通过什么方式来收拢住我方的部众呢?如果敌军奋勇争先而短兵相接；我方胆怯应该变成勇猛。布列军阵特别严整，对方强盛而让它变弱。善于作战的人并不摆设战阵，这在古人中也曾出现过。还没交战就征服了对方，殷切期待着听到这方面的美好建议。四种便于作战获胜的因素和进有重赏，退有重罚，在将帅的谋略中该怎样施用?祭祀天、地、人的礼仪和勇智仁信忠这五种德性，对于用兵形势要数什么最紧要?万幸请你们确定下主要和次要的地位，周详地讲透那适宜的东西。第三道

7. 武则天期间(不详科年)

策宰臣科问　问：圣人握天下之图，居域中之大，莫不仗群材而康庶绩，资多士以牧黎元。梦想傅岩之野，伫思磻溪之上。遂得乘箕入相，就三命而作盐梅；投钓升朝，封四履而称师父。故知英灵间出，千载一贤，皇化轨躅，殊途共贯。我大周道冠牺轩，功高娲燧，长楚必割，翘木无遗，虚席旌贤，宵衣纳善，降贤良之制，下征辟之书。子等并藏器待时，悬瓢俟扣，深识宰臣之体，妙达经邦之术。欲使阴阳调六律，风雨应四时，一百姓之心，平九州之利，余粮栖亩，外户不扃，亭障无虞，关河罢戍，渔者处湍濑，田者让肥腴，路不拾遗，市无二价。眷言于此，何道以臻?至如九仪八座之指归，四师六典之题目，并驭人之大体，抚俗之良规。幸陈

名义之端，无致疏遗之对。

提问：圣人掌握着全天下的治理方案，占据在整个辖境的最高位置上，没有谁不依靠各类贤才来使所有的政绩建立起来，借助众多的读书人去管辖黎民百姓。殷高宗在梦中梦到傅岩这个地方所在的原野，周文王把思虑投注在磻溪这个钓鱼处所上，于是获取到了在箕星星座上往来的人到朝廷担任国相，承奉三道君命而充当了调制食物必须的盐和酸梅的角色；放弃钓鱼竿，升入朝廷，建立起统辖四境边缘的功业而被尊称为师尚父。由此可以明白，英杰人物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涌现出来，千载会有一位大贤士，盛明的教化前后承接，途径不一样而脉络却连贯。我们大周王朝道德在伏羲氏和黄帝之上，功业高过女娲氏和燧人氏，长长的荆条必定会割取回来，高出来的树木没有遗弃掉的，空出席位用来聘请贤才，早早起身专去招纳善士，颁降贤良科考试的特旨，下达征聘辟用的诏书。你们这些应试者全都身怀才能在等待时机，隐居在民间等待扣击朝廷招贤的钟磬，深深懂得辅政大臣的纲要，精妙地通晓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想让阴阳二气和六种音律相协调，风雨与春夏秋冬相应合，统一起百姓的心念，均衡九州的财利，多余的粮食堆积在农田里，住宅的大门不用关起来，边境的军事据点不存在让人担心的事情，关隘与河口撤去驻守的部队，打渔的人争着在水浅流急的地方作业，耕田的人把肥沃的地块让给别人，道路上不捡别人丢失的物品，市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现象。关切地讲到这种局面，采用什么措施就能实现呢？至于九种封授官员的仪式和八种中央主要官职的旨归，左右太师、少师和六类治国施政的法典的名目，以及驾驭世人的纲要，抚定民间的有效措施，万幸请你们陈述名称和要义的诸多方面，不要献上疏略不全的对答。

8.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丁未科

兵部策沈谋秘算科举人问　问：《诗》称有截，《传》载无为，必在得人，方致斯道。皇上心存玄默，政洽清虚，坐五室以调气，舞两阶以柔远，溥天之下，计日来庭。尚有戎羯余尘，亏长城于塞北；句骊旧

壤，走都护于安东　弃招蹙国之讥，取有疲人之患，绥讨之理，用舍何从？且夷狄异方，地俗殊等，借使断山川之足利，较战守之所长，羸粮调兵，几何克济？选伦求将，何者为谋？静听嘉谋，将闻执事。第一道

问：安西迥途，碛北多寇，自开四镇，于兹十年。及瓜戍人，白首无代，分阃节使，丹旆方归，未悟恢边之益，且疑事远之弊。今赤坎既并于黄姓，默啜复觇于庭州，汉掖徒张，胡臂未断，而内匮积谷，外非足兵。于何出践更之师，奚使间穹庐之党？息人静国，有策存乎？第二道

问：五岭山深，三蜀地险，篁竹之下，时惊剽劫，瓜芋之壤，岁扰居人。若纵兵扬麾，则鸟散溪谷；及旋师返旆，则蚁聚津涂。穷之及一切归降，置之又无可反覆。安辑之术，敷陈其要。第三道

提问：《诗经》上宣称边远地带都要归服，解释经典的书籍记载说不要人为地多做干涉。但必定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才会实现这种统治方式。皇上内心投注在静默不语上，政治和清静虚寂相切合，端坐在发布政令的明堂五室中来调节时气，在殿廷的两阶下让人表演文舞来感化远方，整个皇天底下，很快就都前来朝拜。但还有西北少数部族余下的风尘，在边塞北部窥伺着长城；还有高勾丽的原来区域，使朝廷派遣都护官到安东去忙碌。放弃它们，就会招来使国家辖境缩小的讥斥；攻取它们，又存在着使人们疲劳的忧患。安抚和征讨的处置办法，在行用和舍弃上应该依从哪一种呢？况且少数部族所在的方位不同，地形和习俗的等级也不一样，假设只谋求控制住山川的益处，比试进兵和防守的长处，粮草不充足而调动军队，多少时间才能达到目的呢？选择普通的士兵和求取将帅，该用什么作为谋划呢？宁静地在听取你们的美好计策，将把它们奏报给主管的官员。第一道

提问：安西地区路途非常遥远，沙漠以北经常出现入侵的情况，自从开设四处驻军的重镇，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到期限应当回来的卫戍士兵，头发变白了可还没人去替换；独挡一面的节度使，到军旗被血染红了才回到朝廷。这种局面使人没体悟到扩展边境的益处，而且疑虑到对远方用兵的害处。如今赤勒部族已经归并到中原统领

之下，可突厥的默啜可汗又对庭州做窥伺。汉代的张掖城白白屹立在那里，可北部异族的臂膀还没有斩断，内地又缺乏积储的粮食，边境上也不是兵力很充足。该从哪里派出那出钱雇人组成的军队，派遣什么样的使者去离间住在帐篷里的异族的同党呢？既使世人不烦劳又使国家很安静，有那对策存在着吧？ 第二道

提问：五岭一带山谷幽深，川蜀地区地势险要。在竹林下面，经常会发生盗贼抢掠劫杀的惊扰；在栽瓜种芋的土地上，每年都有盗贼骚扰居民。如果出动大军扬布战旗，这些盗贼就像飞鸟一样分散到溪谷中；等到班师收兵，他们又像蚂蚁一样聚集在渡口通道上。彻底围剿他们就达到所有的人全都归降，不再去管他们又没有能够重新出来捣乱的。这种安抚聚合的对策，请你们全面陈述那要领所在。第三道

9.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癸丑科

籍田赋

10.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丙辰科

丹甑赋　以“国有丰年”为韵

11.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丁巳科

止水赋　以“清审洞澈涵容”为韵

12.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己未科

北斗城赋　以“池塘生春草”为韵

13.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癸亥科

黄龙颂

14.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丙寅科

考功箴

15.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丁卯科

积翠功甘露颂

16.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庚午科

冰壶赋　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

17.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甲戌科

梓材赋　以"理材为器,如政之术"为韵

武库诗

18.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丁丑科

花萼楼赋　以"花萼楼赋一首并序"为韵,皆押八韵。《登科记》作"花萼楼赋并序",以题为韵。

19. 唐玄宗天宝四年(745)乙酉科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

20.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丁亥科

罔两赋　以"道德希夷仁美"为韵

21.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辛卯科

豹鳥赋　以两遍用四声为韵

湘灵鼓瑟诗

22.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丙申科

东郊迎春诗

23.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辛丑科

迎春东郊诗

24.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癸卯科

日中有王字赋　以题为韵次用

25. 唐代宗永泰四年(765)乙巳科

辕门箴

26.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丁未科

射隼高墉赋　以"君子藏器待时"为韵

27.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癸丑科

东郊朝日赋　以"国家行仲春之令"为韵

禁中春松诗

28. 唐代宗大历九年(774)甲寅科

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　(西都试)

蜡日祈天宗赋　(东都试)

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　(东都试)

29.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辛酉科

白云起封中赋

30. 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壬戌科

学官箴

31.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癸亥科

易简知险阻论

32.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甲子科

朱干铭

33.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乙丑科

策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问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鸿烈,获主神器,任大守重,惧不克堪。思与贤士大夫共康理道,虚襟以仁,侧席以求,而群议纷然,所见异指。或牵古议而不变,或趋时会而不经,依违以来,七年于兹矣。国制多缺,朕甚恧焉。今子大夫博习坟典,深明教化,裒然充举,咸造于庭。其极虑精思,以喻朕心之未寤。仲尼叙礼乐,删《诗》、《书》,修《春秋》,广《易》道,《六经》之教,所尚各殊。岂学者修行,理当区别?将圣人立意,本异宗源?施之于时,孰为先后?考之于道,何者浅深?差次等伦,指明其义。夫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今之教人,则异于是。工祝陈礼乐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诵礼乐之文,而不究其事。欲人无惑,其可得耶!将革前非,固有良术。尧舜率天下以义,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则上之化下,罔或不从,而三仁四凶,较然自异。有教无类,岂虚言哉!作乐移风,闻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必希。文侯列国之贤君,犹曰则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将使天地同和,灾沴不作,黎人丕变,奸慝不萌,何施何为,以致于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时,故忠敬质文,更变迭救。三代之际,罔不由之。自秦划古法,汉杂霸道,纷纶千祀,王教不兴。国家接周隋之余,俗未淳一。处都邑者,利巧而无耻;服田亩者,朴野而近愚。尚文则弥长其浇风,复质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将安所从?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后之术士,乃言五运相生。以汉应火行,则周为木德,礼称尚赤,义则颇乖。永言于兹,莫识厥理。九流得失之论,历代兴亡之由,王、郑识礼之异同,《公》、《谷》传经之优劣,必精必究,用沃虚怀。

策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问　皇帝若曰:朕遐观《典》、《谟》,详求理道,三代之制,粲然可征。未尝不文武并兴,农战兼务。故能居则足食,动则足兵;兵足则威,食足则固;威则暴乱息,固则教化行。邦国之本,实在于此。秦汉以降,王制不修,选士废射御之仪,教人无　狩之礼,即戎者不知其稼穑,力本者罕习于干戈。于是异文武之人,分农战之道,守则乏食,征则鲜兵。历兹千年,竟莫能复。抑知之者盖寡,将行之者惟艰欤?朕念之甚勤,思继前躅。良以军旅之事,役成靡

宁，勋庸既多，爵秩咸贵，俾服田畴，虑兴怨咨，仰给县官，不可胜计。由是版图岁减，阡陌日荒，水旱小愆，廪饷咸竭。欲使军人悦归于耒耜，儒者兼达于韬钤，田莱尽耕，攻取必胜，诱人孔易，其术安施？王者之师，本于立德，兵家之法，方务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诈胜，理有违反，将何适从？宋襄成列而败军，见嘉鲁册；韩信决囊以摧敌，取贵汉朝。然则丧国亡身，岂霸王之道；冒危乘险，非仁谊之心。所宜讨论，以定褒贬。夫众寡不敌，克必有谋。乐生下齐，孙子破楚，魏武之胜袁绍，宋高之灭姚泓，成败之由，备陈本末。古人有言曰：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又曰：善为国者不师。二端异焉，其有深旨？子房次序兵法，任宏论撰军书，指明异同，详录名氏。想闻商略，择善而行之。

（策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问）　皇帝提问说：皇帝我继承大唐祖宗的盛大基业，得以执掌最高的权力，责任重大，守护的东西太重要了，真害怕承受不住。一心想和贤士众官员共同使治国的大道兴盛起来，为此而敞开心怀来期待着好建议，空出旁边的席位来求取贤才，可大家的议论各种各样，所持的看法在主旨上并不相同。有的局限在古代的说法上而坚持不改变，有的追随时势的际会而不成法则，依从与拒绝总也定不下来，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国家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备的地方，皇帝我对此感到非常惭愧。如今你们这些士大夫广泛研习圣明帝王的典籍，深深明了教化，衣冠儒雅地应从举荐，全部来到了殿廷上。你们要思虑到极点，精详思索，用来开启皇帝我心中还没闹清楚的问题。孔子排定下礼仪乐舞，删定《诗经》和《尚书》，修撰《春秋经》，扩展《易经》的原理，在《六经》的教化上，每一经所推重的主旨各不相同。这恐怕是学习的人修养好自己的品行，理应加以区分的吧？或者是圣人定立意旨，原本在宗奉对象和源头上就不一样呢？施用到当今社会上，哪个应在前面或在后面呢？从大道来做考求，哪个属于浅显或属于深奥呢？在排列好等级次序上，要指明其中的大义。了解根本，才能对变化做出反应来；学习古代，目的是在当今来行用。当今教导人们，却和以上那两点不一致。乐工和祭祀官员陈列礼仪和乐舞方面的器物，却不懂得它们所要表达的感情；学生们诵读

礼仪和乐舞方面的经文,却闹不清那事体。这样还想让人不迷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准备革除以前的错误做法,固然具有那恰切的措施。唐尧虞舜用仁义来统领天下,家家户户可以受到特殊的表彰;夏桀和商纣王用残暴来统领天下,家家户户可以被判处死刑。既然如此,那么上面化导下面,下面就该没有不听从的,可是比干等三位殷朝末期的仁人和共工等四名尧舜时的大罪人,就非常明显地自行与当时不一样。如此看来,只有教诲的对象而不分世人的类属,哪里是句空话呢!创制乐舞来改变民风,这从古代的经典中已经听到的了。最典雅的乐舞,必定会平淡;最美妙的乐曲,必定会无声无息。魏文侯属于战国时各国中的贤明国君,可他仍然说欣赏古代乐舞只怕听着听着就要睡着了,何况那些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这方面的化导吗?打算使天地会同协和,灾异现象不发生,众百姓彻底转变,奸邪事不萌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推行什么政事来达到这种境地呢?帝王掌握治理,必定要随顺时势的需要,因而崇尚忠厚或虔敬、质朴或文采,轮番予以变动,迭相加以补救。在夏商周三代交替的时候,没有不照这样来做的。自从秦朝破坏掉古代的法式,汉朝夹杂着霸道,变动频繁的上千年间,称王天下的教化兴盛不起来。我们国家承接在北周和隋朝的后面,社会风尚还没达到淳厚一致。生活在都市城镇中的人,贪利奸巧而没有羞耻心;从事农耕的人,朴野而近于愚昧。崇尚文采的话,就会越发助长浅薄的风气;恢复质朴的话,又无法挽回那鄙陋的民俗。确立起教化的根本,究竟应该依从什么呢?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只是拿正月、十二月、十一月作岁首的三种历法来递相使用;后代的术士,才讲论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运转递相诞生出取代前一个王朝的新王朝来。认为汉朝应合火行,周朝就该属于木行之德,但礼书上却说它崇尚赤色,这在义理上就很矛盾了。但人们总是讲论这一点,皇帝我真还闹不清其中的理由。先秦九个学派互有得失的论断,历代兴起和灭亡的缘由,王肃和郑玄在辨析古礼上的异同之处,《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解释《春秋经》方面的优劣,一定要对这些问题精详思考和探求到底,用来启发皇帝我毫无成见的心怀。

(策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问)　皇帝提问说:皇帝我往远处观阅

《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详切求取治国的大道，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非常鲜明地可以得到验证了。它们未曾不是文治和武功一并振兴，农耕与战争同时下力气。所以在平时就能使粮食充足，一旦采取军事行动就能使军队够用；军队一够用，就有威力，粮食一充足，就国家稳固；具有威力，凶暴和动乱就被平息，国家稳固，教育化导就得到推行。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实际上正在这里。从秦朝和汉朝以后，称王天下的制度得不到修明，选取士子废弃了射箭和驾车的仪节，教导世人取消了四季都组织打猎的礼制，在军队服役的人不懂得耕种收获的技艺，大力务农的人很少对战争挺熟悉。于是使搞文搞武的人分离开来，划分出农耕与战争的实施方法，守卫起来就缺乏粮食，一出兵作战就兵员很少。这种状况到现在已经历经一千年了，始终不能够恢复到古代去。这是由于懂得其中原委的人太少呢?还是因为施行的人感到太难办呢?皇帝我对此忧念得特别深切，想要沿着古人的轨迹走。这实在是出自军队方面的事务，在服役戍守上没有安宁的时候，立有战功的人既然很多，爵位官品就都提高了，再让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担心会兴起怨恨来，可全依靠朝廷提供衣食，又多得计算不过来。由此而国家的户口人数一年比一年减少，田野一天比一天荒芜，发生轻微的水旱灾害，也就仓储和军饷全都枯竭了。想让军人全都高兴地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读书人同时又通晓军事谋略，田地全部得到耕耘，攻取必定会获胜，诱导人们十分容易，具体的办法应当放在哪里呢?帝王兴兵打仗，是从树立起仁德来出发的；兵家的作战理论，在战术运用上致力于出奇制胜。可仁德是凭借诚信而形成的，奇特的战术是依靠险诈来获胜的，在事理上存在着矛盾的情况，应当顺从哪一点呢?春秋时的宋襄公等到楚军排好队列后才出击，结果使宋军战败了，可这却在《春秋经》上得到了赞扬。西汉的韩信命令部下打开堵住潍水的沙土袋来摧毁楚军，在汉朝取得了高官。然而宋襄公丧失掉国家，自己也死去，这哪里是称霸诸侯的做法呢?韩信利用并冒着危险击败敌人，决不是仁德道义的用心。对此应该加以讨论，确定下褒奖和贬抑的结论来。人多和人少构不成均势，但以少胜多必定要有谋略。战国的乐毅攻下齐国，春

秋末期的孙武击破楚国，魏武帝曹操战胜袁绍，南朝宋高帝刘裕灭掉后秦的姚泓，关于他们成败的缘由，请完整地陈述那来龙去脉。古人有过话语说：声讨征伐做不到天下都归服。又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并不出兵打仗。这两句话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含有深长的义旨吗？西汉的张良编定兵法，任宏整理军事典籍，请指明他们之间的异同点，详实地开列出姓名来。皇帝我渴望听到商榷的意见，选择其中精善的东西来加以行用。

34.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戊辰科

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

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问　皇帝若曰：朕闻王者统御寰宇，司牧黎元，一人之聪不足以周听，一人之目不足以遍观，敷求贤良，用辅闻见。朕以寡德，纂承丕绪，托于人上，十载于兹。虽多难仅宁，而升平未复。永惟前古之理，布在方册，宪章典礼，可得而详。考之则易遵，行之则难至，中夜忘寝，莫知所以。然子大夫学览该通，待问斯久，敛襟应召，朕甚嘉焉。各启尔心，以祛予惑。成王致理，刑措不用，孝文励精，断狱四百。太宗皇帝《箫》、《勺》群慝，削平八隅，囹圄空虚，又逾前代，一岁所决，二十九人。今者官署尚存，法令明具，封域之内，可谓小康。而黔首上僚，尚资科禁，循源究本，其故何哉？岂朕教之不明，将或人之多僻？仁敷旨要，当酌其宜。文王建邦，经制斯备，周公立政，礼乐增修。然而朝命六卿，揆分百度，乡闾有长，林泽有官，计其职员，动以万数，农夫不充于缉伍，编籍不给于虞衡。以是制人，又或安在？永言师效，良用为疑。唐虞设规，九载三考，俾安其位，将尽其能。列授群司，寄之众务，一官不理，事有所隳，一吏非人，官有所废。罚宁俟于终日，赏不待于逾时。若官废而后求人，事废而后变法，政将□浇，其道如何？今欲济天下于太和，致群生于仁寿，劝农务穑，何术为先？教学崇儒，何礼为切？何方可以顺风雨，何典可以序神　？成汤遇灾，何七年而后祷？高宗伐叛，何历载而不宾？辨于古者通于今，鉴于事者明于理。备陈终始，朕亲览焉。

皇帝提问说：皇帝我听说帝王统领和驾驭整个天下，主宰和管理黎民百姓，单凭自己一个人的闻知能力并不足以听到一切意见，光靠自己一个人的观察能力并不足以看到所有情况，于是就广泛求取贤良的人士，用来辅助所闻所见。皇帝我凭借微小的德行，继承盛大的我朝统系，托身在众人的上面，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尽管祸难很多，仅仅平定下去，可天下太平的景象还没有恢复。常常想到古代的大治，载述在典籍上，各种规章旧例和礼乐制度，可以详尽了解到。考察它们就容易遵循，但行用它们却很难达到，深夜都忘记睡觉，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在。然而你们这些士大夫学习和观览既全面又明晓，等待朝廷询问也至今很久了，挽起袍襟响应征召，皇帝我感到万分高兴。各自要发挥出你们的聪明才智，用来扫除掉皇帝我的困惑。周成王实现大治，刑罚搁置起来不再使用；汉文帝励精图治，每年判决死刑案件才四百起。我们太宗皇帝用虞舜的《箾》乐和周朝的《勺》乐进行感化而征服了各地的邪恶势力，平定了八方的每个角落，监狱里没有在押的犯人，又远远超过了古代，每年处死的罪犯，仅仅二十九个人。如今司法机构仍然存在，法令既明晰又完备，在整个辖区以内，可以称得上是基本安康的社会。可普通百姓与各级官吏，还要靠朝廷用法律禁令来加以约束，追寻源头和探究根本，具体原因又在哪里呢？恐怕是皇帝我进行教化不明晰吧？或许是世人还大多很邪僻呢？期待着你们阐明那要旨所在，应当斟酌合适的解决办法。周文王创建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已经齐备了；周公定立朝政，对礼乐制度进行增添和修明。然而由朝廷任命六大政府机构的长官，由冢宰分派百官的政事，乡和居民点都有负责人，山林湖泽也都有专职官员，再把手下办事人员加起来，一动就是上万名，农民不列在部队的编制以内，登记在国家户口上的居民不向山林湖泽官交纳赋税。凭借这类方式治理世人，它那要义又在哪里呢？人们总是说要效法这一套，实在让人对此就产生疑虑了。唐尧虞舜设立制度，九年里要对官吏进行三次考核，使他们安于各自的职位，希望他们施展出本人的全部才能。设置并责成各个政府部门，把众多的政事委托给它们料理。如果有一个部门履行不好职责，政事就有毁败的情况；有一名官吏不是合

适的人选，所设部门就有不起作用的问题。惩罚宁可拖到一整天再做出决定，封赏则不等待超过一个时辰。如果政府部门不起作用了，然后再去求取合适的人选，事务荒废了，然后再去改变法度，朝政也就将要陷入衰败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究竟该是怎样呢？现今打算把整个天下转变到高度和谐的状态，把众百姓带入到仁爱长寿的境地，鼓励农业生产，在本业上下气力，要数什么对策占据首位呢？促进求学，崇尚儒士，要数什么礼仪最为紧切呢？通过什么方法可以使风调雨顺？采用什么礼典可以使天神地神井然有序呢？商代的成汤遇到了旱灾，为什么七年以后才以身祭祷呢？商高宗讨伐反叛的鬼方部落，为什么历经好几年还不归服呢？对古代辨析得很明确，也就对当今挺通晓；对往事引为鉴戒，也就对事理很明了。你们要完整详尽地陈述来龙去脉，皇帝我要亲自观阅。

35.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庚午科

观庆云图诗

36.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癸酉科

平权衡赋　以"昼夜平分、铢钧取则"为韵

风光草际浮诗

37. 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乙亥科

立春日晓望三素云诗

38. 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丁丑科

西掖瑞柳赋　以"应时呈祥、圣德召感"为韵

龙池春草诗

中书试进士策问二道　问：先师之言，辨君子小人而已。劝学则举六蔽，咸事则称九德，推其性类，又极于是矣。孟轲之数圣者，有清有和；文子之言人位，上五下五。列夷惠于天纵，颇有所疑；况牛马于最灵，岂为至当？班固之《古今表》，刘郡之《人物志》，品第乖连，或钩

摭纤微，诚有可观，恐非尽善。既强为己之学，必有析理之精。敬俟嘉言，以祛未达。第一道

问：乃者西裔背盟，劳师备塞；今戎王自毙，边遽以闻。而议者或曰因其丧而吊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虚而伐之，可以辟地。或曰夷实无厌，兵乃危事，皆所以疲中国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采，思而辨之。第二道 （清徐松云：中书试进士，事无所考。按是年德宗以有司出赋题不悦，宰相喻使减人数，十余人已得复黜，见李翺《独孤朗墓志铭》。或使中书重试以策欤？）

提问：先师孔老夫子的说法，在于分辨出君子与小人也就算到头了。激励人们学习，就列举不好学而带来的六种弊害；人才都得到任用，就称述九种德行。推导世人的情性与类别，又在这两条上达到极点了。孟轲列举圣人，既有清正纯洁的圣人，又有柔和的圣人。文子讲论人的等级层次，分为最高的五类人和最低的五类人。列夷惠对于皇天任从孔子成为圣人还很有怀疑，何况庄子说什么牛马最灵，这哪里属于最恰切的论断呢？东汉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曹魏刘邵的《人物志》，排列高低顺序并不正确，但有的地方摘列勾稽出特细微的地方，确实有值得让人好好看一看的，但恐怕并不完全精善。你们这些考生既然努力从事修养好自己的学问，必定具备分析事理的精确本事。恭敬地等待着你们的美好言论，以便扫除掉我这主考官还不清楚的地方。第一道

提问：前不久西部的少数部族违背了盟约，朝廷派兵去加强边塞防备。如今他们的国王自行死去了，边境上立刻把这一消息奏报给了朝廷。而议论政事的人有的说趁他们有这丧事，前去吊唁，可以使内地百姓安宁下来。还有的说，乘他们没首领去讨伐，可以扩展国土。更有的说，少数部族实际上没有满足的时候，用兵正属于危险的事情，这两种行动都是使中原疲惫的做法，不如还像原先那样。以上三种主张必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请你们仔细思索，加以辨析。第二道

39.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戊寅科

鉴止水赋　以"澄虚纳照、遇象分形"为韵，任不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

青出蓝诗　题中用韵，限四十字成。

40.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辛巳科

乐德教胄子赋　以"育材训人之本"为韵

41.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壬午科

风动万年枝诗

策进士问五道　问：《六经》之后，百氏寒路，微言大义，浸以乖绝，使昧者耗日力以灭天理，去夷道而趋曲学，利诱于内，不能自还。汉庭用经术以升贵位，传古义以决疑狱，诚为理之本也。今有司或欲举建中制书，置五经博士，条定员品，列于国庠，诸生讨论，岁课能否，然后删非圣之书，使旧章不乱，则经有师道，学者颛门。以为如何？当有其说。至于九流百家论著利病，有可以辅经术而施教化者，皆为别白书之。第一道

问：《易》曰"君子夕惕若厉"，《语》曰"君子坦荡荡"。《礼》之吉绸衣，则曰"恶其文之著也"，《儒行》则曰"多文以为富"。或全归以为孝，或杀身以成仁，或玉色以由立，或毁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尽通。颜回三月不违仁，孟轲四十不动心，何者为优？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无愠，何者为愈？召忽死子纠，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为吴行人，何者为是？析疑体要，思有所闻。第二道

问：周制什一，是称中正；秦开阡陌，以业农战。今国家参酌古道，惠绥元元，均节财征，与之休息。丰年则平粜于穀下，恒制则转漕于关东。尚虑地有遗利，人有遗力，生之者少，靡之者多，粟帛浸轻而缗钱益重。或去衣食之本，以趋末作；自非翔贵之急，则有甚贱之伤。欲使操奇赢者无所牟利，务农桑者沛然自足，以均货力，以制盈虚。多才洽闻，当究其术。至若管仲通币之轻重，李悝视岁之上下，有可以行于今日者，固亦陈之。美利嘉言，无辞悉数。第三道

问：惩忿窒欲，《易·象》之明义；使骄且吝，先师之深诫。至若洙泗之门人、故人，渐渍于道德，固已深矣；而仲由愠见，原壤夷俟，其为忿与骄，不亦甚与？商不假盖，赐能货殖，从我之徒而各齐缺如是！皆所未达，试为辨之。第四道

问：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修辞待问，贤者能之。岂促速于俪偶，牵制于声病之为耶？但程试思存，则有拘限。音韵颇叶者，或不闻于铁响；珪璋特达者，亦有累于微瑕。欲使楚无献玉之泣，齐无吹竽之滥，取舍之际，未知其方。子曰"盍各言尔志"，赵孟亦请七子皆赋，以观郑志。古人有述祖德、叙家风之作。众仲子藏器而含章者久，积善而流庆者远，各言心术，兼叙代德。勖夫虚伪，以广未闻。第五道

提问：《六经》以后，诸子百家占满了道路，圣人精微的言辞和重大的义旨，逐渐走样灭绝，致使昏昧的人消耗每天的精力来灭绝天理，离开平坦的大道而追逐邪僻的学说，从内心被私利所引诱，不能自行返回来。汉朝用儒家经典的学问来使人升上尊贵的职位，解说古代的义旨来判决疑难的案件，确实属于进行治理的根本啊！如今主管部门有的援引建中年间的制书，主张设置五经博士，逐级确定员额和品级，安排在国立最高学府，引导学生们讨论，每年考核优秀与否，然后删除诋毁圣人的书籍，使旧有的章节不淆乱，每部经典也就具有师长递相传授的权威说法，学习的人也专精了。你们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应当具有自己的主张。至于各个学派的论著的优缺点，具有可以辅助儒家经典学问又在教化中能施用的，全都对它们逐条区分并写上来。第一道

提问：《易经》上说：君子夜间都在警惕，就像情况特严重一样。而《论语》上却又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礼记》中讲到穿漂亮衣服要加上外套，就说这是"厌恶那文采太显眼啊！"《儒行》却又说：把多学文章技艺当成是富有。有的人把身躯保全到最后作为孝顺，有的人献出生命去成全仁义；有的人脸色不变又站立纹丝不动，有的人放下架子而与普通人打成一片。这都像是彼此矛盾，无法完全讲得通。孔子的学生颜回长年累月不违背仁德，孟子四十岁不动心，他们俩哪

个人属于更优秀呢?春秋时鲁国的柳下惠三次被降官却不离去,楚国的子文三次被免职却不感到愤恨,他们俩哪个人属于更好些呢?春秋时齐国的召忽为公子子纠而死去,管仲却担任了公子小白的国相,棠君伍尚依从楚平王的恶意宣召,他的弟弟伍子胥却担任了吴国的行人官,他们俩哪个人属于做得对呢?辨析疑惑,体悟主要的东西,真想从你们考生那里有所听闻。第二道

提问:周朝的赋税制度是征收粮食收获量的十分之一,这可以称得上适中又公平。秦国开垦私有土地,用来把农耕和战争作为人们的本业。如今国家参取斟酌古代的做法,安抚并施布恩惠给百姓,均衡并减少财物的征收,与民众休养生息。丰收年就在京师稳定住粮价,按常规就从关东地区通过水路转运来粮食。这样还忧虑土地存在着没发挥出来的效益,人们还有没使出来的气力,生产它的人少,享用它的人多,粮食布帛慢慢不值钱而钱币越来越贵重。有的人就离开了解决穿衣吃饭的本业,去追逐经商活动。原本上并不属于物价飞涨,也就产生了粮食布帛特不值钱的害处。想叫操纵市面的人没办法牟取暴利,从事农耕养蚕的人充裕地自家够吃够穿,用来调节好钱币和劳动量的比例关系,用来控制住贫富相差悬殊的现象。你们这些富有才华、闻见广博的考生,应当究寻那具体的对策。至于春秋时的管仲调节货币价值的高低,战国的李悝依据年景的丰歉平抑粮价,其中具有能在今日施用的东西,也请顺便陈述它们。对百姓感到美好和有利的这方面的良好建议,不要辞去详尽的列举。第三道

提问:克制愤怒,杜塞贪欲,这是《易经·损卦·象辞》的鲜明义旨。假如骄傲又吝啬,这是先师孔子的深切告诫。至于孔子的学生和老熟人,逐渐沉浸在道德里面,固然已经很深了。可是子路却对孔子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不高兴,原壤两脚八字叉开在等孔子,他们属于愤怒和骄傲,不也太厉害了吗?子夏不借给别人伞,子贡擅长做买卖,拜我为师的徒弟们却各自吝啬亏缺到了这种地步!以上都是我这主考官还没闹清的问题,尝试着为我辨析它们。第四道

提问:培育人才,造就士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修饰好文辞,等待朝廷询问,贤能的人才做得到。哪里只是光干些在那对偶句式

上迅速写成又被唯恐押韵出错牵着走之类的事情呢？不过考试的标准要想到它得确立起来，于是就有一定的限制。可是音韵很协和的答卷，有的却叫人听不到奇特的思想观点；属于杰出人才而专门被推荐到朝廷的人，也在存有小毛病上造成拖累。想使现今没有当年的楚国献上宝玉却受刑的泣诉现象和齐国混在众人中吹竽的冗滥情况，在选取和舍弃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恰切的做法。孔子说：何不各自谈一谈你们的志向呢？春秋时晋国的赵孟也请郑国的七位要员全都赋诗一首，以便了解郑国的意向。古人撰有称述祖上德业和叙说自家风范的作品。你们这些应试的君子怀抱才能又蕴含光采已经时间很长了，世代积累善行而给后人带来福庆的事情也很悠久了，各自谈一谈本人的心术，连带叙述自家世代的德业。我这粗鄙的主考官在虚心等待，用来扩展我还不曾听过的东西。第五道

42.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癸未科

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以"嘉节初吉，修是农政"为韵

策进士问五道　问：汉廷董仲舒、公孙弘对策，言天人相与之际，而施于教化。韦玄成、匡衡之伦，以明经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虽以文以经贵禄学者，而词绮靡于体物，浸失古风；学因缘于记问，宁穷典义？说无师法，经不明家，有司之过，敢不内讼！思欲本司徒之 物，崇乐正之四术，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名义益修，风俗益厚。程考秀之本业，参周汉之旧章，虑难改作，式仁嘉话。事关理本，必议上闻，斯乃诚求，诸生毋忽。第一道

问：齐人之所以务于赋输，用给公上，大抵馈军实、奉边备而已。今北方和亲，驿通礼命，南诏纳款，屡献奇功；而蠢兹西戎，尚有遗类，犹凋盛秋之戍，颇勤中夏之帅。思欲尽复河湟之地，永销烽燧之警，帅息左次，人无外徭，酌古便今，当有长策。乃者戎人，愿修前好，因请其俘。或曰彼实无厌，绝之以固吾圉；或曰始示大信，许之以靖吾人。或曰利其贵种以怀其心，或曰夺长技以剪其翼。当缊皎然之见，备陈可举之方。第二道

问：祖宗昭穆，王者之盛典；明祀严禋，有国之大事。顷岁春常上

奏，以献祖之位非正，太祖之尊未伸；而公卿诸儒杂有其议，皆以百代不迁，宜居东向，而献、懿二主，所归不同。或曰藏于夹室，或曰置于别庙。或曰祢于德明，兴圣酌殷周之制；或曰迁于园寝，石室采汉魏之仪。而又有并居昭穆之列，竟虚其位；分享禘祫之礼，互处于西。众议云云，莫有所一，至今留中未下，诚圣意所重难也。至当无二，众君子辨之。第三道

问：人之生也，禀五行之秀；其化也，顺一气之散。而牛哀为兽，杜宇为鸟，赵王为苍犬，夏鲧为黄能，傅岩之相为星，圮桥之老为石，变化纠纷，其故何也？夭寿贵贱，赋命万殊，而骊山之儒，长平之卒，历阳之鱼鳖，南阳之侯王，岂禀数斯同，复适然也？众君子通性命之理，究古今之学，幽探造化，伫所未闻。第四道

问：有司之求才，与多士之求进，其心不相远也，诸生知之乎？计偕者几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盖二十五之一也，诸生又知之乎？雕龙之辨，皆谓有余；灵蛇之珠，无非在握。射或失鹄，瑜宁掩瑕！虽泾渭终分，而蓬麻未直。匿名飞语，诋讦云云，诚无它肠，时有谗口。岂有司之道未至，复诸生之所习难化耶？异时有司，固诸生之所履也，复何如哉？非有防川之心，愿闻易地之说。第五道

提问：西汉殿廷上董仲舒和公孙弘对答天子询问的答卷，强调皇天与人事彼此应合的关系，并且施布到教化上。韦玄成和匡衡这类人，凭借通晓儒家经典而位至宰相，封拜侯爵。这都是依据称王天下的大道，扩展到人事上。现今虽然通过文章和经义来使学习的人取得官位和俸禄，可文词却在体察细物上变得越来越绮丽淫靡，逐渐失去了古代的风尚。学问沿着记忆背诵往下走，这哪能穷尽那经典的义旨呢？解说没有师长递相传授的法式，经书宣明不了一个学派的观点，这是主管部门的过错，哪敢不在内心里责问自己呢？想要依据周朝大司徒在乡间学校施行的六德、六行、六艺教育的总纲，看重大乐正在国立学校传授的《诗》、《书》、礼、乐的四种经术，对不服从教导的人就摒弃到荒远地带，于是名称与道义就越发得到修明，社会风尚就越发变得淳厚了。酌定孝廉与秀才的本业，参取周朝和汉代的旧有

制度，恐怕改变起来很困难，恭敬地等待着你们的美好建议。这宗事关系到治国的根本，必定要加以讨论并奏报给皇帝。这次是诚挚的征询，众位考生千万不要忽视。第一道

提问：编列在国家户籍上的百姓在交纳赋税上必须履行义务，用来使公家和朝廷物资充足，目的大致上都在于支付军需，花费在边境防备上罢了。如今北方少数部族与我大唐通婚结亲，多次奏呈上礼节和拜谢的文书，南诏地区也前来归顺，屡屡献上奇功。可那愚蠢的西部少数部族还有遗留下的人马，仍然迫使朝廷调遣盛秋八月的戍守力量，闹得华夏的军队频繁出动。打算收复黄河湟水的全部地区，永远消除战争的警报，军队停止行动，只驻扎在高立险峻的地方，老百姓没有到边境服役的事情，斟酌古代的做法又便利当今，应当具有高明的计策。前不久西部少数部族愿意续修从前的和睦关系，随即请求释放被俘虏的人。朝廷上有人说它们实际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应当予以拒绝，用来巩固我们的边防。还有人说最先向它们显示最高的信义，应当答应这种请求，用来安定我们的百姓。有人说把那头领送回去，用来感化它们的心田。还有人说把那武艺高的人放回去，用来翦除它们的羽翼。你们这些考生应该蕴藏着非常明晰的看法，请完整详尽地陈述可以施行的做法。第二道

提问：排定始祖列宗、父辈子辈的次序，属于帝王的盛典；明晰庄严地祭礼天神，这是拥有国家者的大事。近年负责祭祀事务的太常寺上奏，认为献祖宣皇帝的牌位不恰当，太祖景皇帝的尊贵没能突现出来。而公卿大臣和众位儒士各有各的看法，都认为太祖景皇帝的牌位任何时代也不能移动，应当排在东侧，而献祖宣皇帝和懿祖光皇帝这兄弟二人的牌位，归位却有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供藏在太庙内堂东西厢的后部，有的主张放置在太庙以外另建的庙中。有的主张在祭祷先王后实行讣祭，彰显圣明就要酌取商代和周代的制度。有的主张迁移到帝陵区，石造的墓室采用汉朝和后魏的规格。更有的主张共同排列在父辈或子辈的序列中，最终不设牌位，分别享受分祭与合祭的礼仪，互相位居在西侧。众人的主张各式各样，没有一致的看法，至今还暂时扣押在宫中，没有宣布最后的意见，这确实是皇

上特难做出决定的事情啊!处理得最为恰当而根本就没有别的做法,请你们这些应试的君子就此辨析一番。第三道

提问:世人生下来就都禀承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精华;当本人生命化解的时候,就都顺从那元气的散落。可春秋时鲁国人公牛哀病了七天以后却变成了老虎,古代蜀国的国王杜宇死后却变成了杜鹃鸟,西汉的赵王刘如意变成了一只大黑狗,夏禹的父亲鲧变成了一只大黄熊,从傅岩请来的国相死后变成了星宿,在圮水桥上的老人变成了石头。这类变化五花八门,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早亡与长寿,尊贵与低贱,皇天赋予给世人的本命千差万别,可在骊山被活埋的儒士,在长平被坑杀的赵国士兵,历阳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湖泽,南阳既出天子又出被封侯的人,这难道是既定的本命就全是同一个而最后的结果又都那个样吗?你们这些应试的君子通晓人性和命运的原理,究寻古代与当今的学问,要深入探求皇天创造与化生的情形,期待着听到我这主考官未曾听到过的东西。第四道

提问:主管部门求取贤才与你们这些读书人求得进用,在心意上并不离得很远啊!众位考生了解这一点吗?随同送交政绩表的地方官员而一起前来参加中央考试的人,每年都将近五百名,可被录取的人却超不过二十名去,大约是二十五分之一呀!众位考生又了解这种情况吗?像战国邹奭那样刻意修饰邹衍的雄辩文辞,谁都认为自己绰绰有余,而像灵蛇宝珠那样的贤才,朝廷也没有一个不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中。有的人射箭没射到靶心上,那长处怎能就遮掩住短处呢?尽管泾清渭浊到最后区分出来了,可蓬草生在桑麻底下还没有长直。隐匿自己的姓名,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诋毁谩骂这般那般,确实还是没有其他方面的用心,可却经常冒出诽谤的话头。这难道是因为主管部门的录取标准和方法还没达到最高的境界,还是表明众位考生习以为常的那一套太难化导呢?到将来,主管部门原本就是众位考生所要负责的地方啊!那时你们又会怎么样呢?这样提问并不是我这主考官怀有像防止洪水那样来防止人们诽谤的用心,只是希望听到你们关于今日与将来互换位置的说法。第五道

43.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乙酉科

沽美玉诗

策进士问五道　问：古之善为政者，在得人而已，在求理而已。周以功德诏爵禄，秦以农战居职员，汉武帝诏察茂异可以为将相者。夫功与德，非常才所及也；农与战，非笾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设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利病，幸错综言之。又三适之宜，九品之法，或计户以贡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采，制度当否，悉期指明。第一道

问：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终循环。而上自五帝，不言三统，岂备有其政，或史失其传？嬴刘而下，教化所尚，历代相变，其事如何？岂风俗渐靡，不登于古，复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国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胜兹文弊。前代损益，伫闻讨论，遽数之中，所希体要也。第二道

问：古者士足以理官业，工足以备器用，商足以通货贿，而农者居多。所以务三时之功，有九年之蓄，用阜其业，实藏于人。乃者情游相因，颇复去本。今皇帝励精至化，在宥万方，德音圣泽，际天接地。凡弘于理道者，无不至也；裕于济人者，无不被也。而又询吏禄公田之制，稽财征榷毓之宜，使群有司质政损益，庶官匹士皆得上言。众君子躬先师之儒，生盛圣之代，伫兹嘉话，当荐所闻。第三道

问：昔伊尹酒保，傅说胥靡，竟昌殷道，以阜王业。春秋时观丁父、彭仲爽，申郹之俘也，克州蓼，朝陈蔡，楚邦赖之。汉庭韩安国徒中拜二千石，张释之以资为郎，并称名臣，焯叙前史。然则俘徒作役，或财用自发，前代取之而得人如是。魏晋以降，流品渐分，笾仕之初，率先文学。或荐贤推择，皆秀发州闾，而致理之风，颇未及古。岂朴散浸久，或求之大精？其故何也，常有所懵。今四门大辟，百度惟贞，执事者固欲上副聪明，悉搜才实。幸酌古道，指陈所宜。第四道

问：言，身之文也。又曰灼于中，必文于外。司马相如、扬雄，籍甚汉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涤器，或赞符命以投阁。其于溺情败度，又奚俟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祢衡，夸傲于代，祸不旋踵，何可胜言！两汉亦有质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顺之举，皆本于行而遗其文。复何如

哉?为辨其说。第五道

提问:古代善于施行治理的帝王,在于获取到人才罢了,在于谋求大治罢了。周代依据功勋和德业来封赐爵位俸禄,秦国依据农耕和战争任命在职的官员,汉武帝诏命各地访察才能卓异可以担任将帅丞相的人。功勋与德业,并不是普通人所能建立起来的;农耕与战争,并不是预测入仕的人所能适应的;对国家安危关注留意的重任,决不是设立科举考试能够等来那合适人选的。这三个方面,原本上就有各自的益处与弊病,万幸请你们这些考生综合在一起来谈论一番。再者周朝由诸侯向王室接连三次都推荐了合格人才的恰切做法,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还有的依照户口人数的比例来向朝廷推荐人才,有的限定年龄来进入百官的行列。这些事体有能行用的东西,办法有能采取的地方,以及制度恰当与否,全都期待着你们来指明。第一道

提问:夏商周三代的国政,依次崇尚忠厚、虔诚、文采的做法,都是后一朝承接前一朝的弊病来予以补救,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可往上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期,就不讲论黑、白、赤这三统,这恐怕是原来完整地具有那政事,而史书却没记载它们的流传吧?从秦朝和汉朝以后,教化所崇尚的东西,历代加以变革,那些事体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是因为社会风尚逐渐奢靡,达不到古代的程度,再加上补救的办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吧?我们国家的教化比夏商周三代还要光采夺目,在所有的帝王中占据首位,原本上就是凭借忠厚压倒那文采的弊害。前代对制度进行减损或增益的地方,期待着听到你们这些考生的讨论意见,在快速列举当中,所要获取的是那纲要啊!第二道

提问:古代的读书人足以处理官府的事务,工匠足以使各种器具都够用,商人足以使货物钱币流通起来,而农民占据大多数。这是用来致力于春夏秋三季的功效,在二十七年内具有九年的储备,使本业富裕充足,粮食都储藏在百姓的手中。近来世人懒惰和游荡的现象沿续下来,又严重地离开了本业。如今皇帝在最高的化导上振奋精神,使天下各地自由自在,仁德的诏书和圣明的恩泽覆盖了皇天大

地。只要对治国之道能弘扬的东西,就没有不采用的;只要对世人过上好日子能有帮助的事情,就没有不延布的。而且又询问官吏俸禄要赐给公田的制度,考察赋税征收的合适办法,责成各个政府部门验核政事进行减损或增益,一般官员和普通的读书人都有权向朝廷提出意见。你们这些应试的君子本身就成为先师孔子门下的儒士,生活在昌盛圣明的时代,期待着你们在这方面的美好建议,也会向皇上献上从你们这里所听到的东西。第三道

提问:从前伊尹只是一个在酒店炒菜的人,傅说也只是一个服苦役的人,可最后却使商朝的统治方式兴盛起来,用来鄯展那称王天下的大业。春秋时的观丁父和彭仲爽,原来分别做过　国和申国的俘虏,可得到楚武王与楚文王的重用,攻灭了州国和蓼国,使陈国和蔡国前来朝拜,楚国其实正靠了这两个人。西汉的韩安国在服刑中被封拜为二千石官员,张释之凭借出钱当了个骑郎,可最后一起被称为名臣,在前代史书中显赫地得到载述。既然如此,那么身为俘虏、服刑者和打杂做苦工的人,有的才华自行显现出来,古代就选取他们而获得到合适人选便达到了这种程度。魏晋以后,类属和等级逐渐区分出来,在预测进入仕途之前,全都把文章学问放在首位。有的荐举贤才,进行推荐择取,全都是从本地选送的拔尖人士,可实现治理的风气,却在很大程度上赶不上古代。这恐怕是因为质朴的风尚散去得时间太长了吧?或者是求取得太精细了吧?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常常存在着闹不清的地方。现今向四方征询意见的大门完全打开了,各项规章制度都十分端正,充任主考官的人固然想往上符合皇帝听取建议和观察情况的要求,一个也不遗漏地搜求到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万幸请你们斟酌古代的做法,指出并陈奏那些适合当今的东西。第四道

提问:言辞属于自身的文采啊!人们又常说在内心里特明晰,必定会在外面写出好文章来。司马相如和扬雄,在西汉朝廷上名声特别大,他们的文章真是太雄盛了。可两人中有的却弹琴向女子表达爱慕的心意并同她一起卖酒帮着洗酒器,有的给新莽政权写那赞颂正应神符天命的文章并没听清逮捕谁就从校书阁上跳下来。他们对

那沉溺在男女情意中以及败坏伦理纲常，又等待哪门子文章呢？至于三国时的孔融、祢衡，对当时整个社会傲视又夸耀自己，祸难飞快地就降临到头上，哪里可以说个清清楚楚呢？西汉与东汉也设有质朴敦厚和廉清孝顺的荐举科目，全都是依据品行而不理文章那一套。这又该怎样做出解释呢？请你们替我这主考官辨析那说法。第五道

44.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丙戌科

山出云诗

45.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丁亥科

舞中成八卦赋　以“中和所制、盛德斯陈”为韵

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

46.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己丑科

荐冰诗

47.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癸巳科

履春冰诗

48.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乙未科

春色满皇州诗

49.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戊戌科

玉声如乐诗

50.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己亥科

王师如时雨赋　以“慰悦人心、如雨枯旱”为韵

骐骥长鸣诗

51.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庚子科

早春残雪诗
何论

52.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辛丑科

孤竹管赋 （重试题）
鸟散余花落诗 （重试题）

53.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壬寅科

木鸡赋 以“致此无敌、故能先鸣”为韵
琢玉诗

54.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癸卯科

丽龟赋

55.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戊申科

猴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

56.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壬子科

君子之听音赋 以“审音合志铿锵”为韵

57.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戊午科

霓裳羽衣曲赋 任用韵
太学创置石经诗

58.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己巳科

尧仁如天赋

59.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甲戌科

振振鹭诗

60.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壬午科

倒载干戈赋　以“圣功克彰、兵器斯戢”为韵

天骥呈才诗

61.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癸未科

谦光赋

澄心如水诗

62.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丙戌科

被衮以象天赋

63.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戊子科

天下为家赋

64.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丙申科

王者之道如龙首赋　以“龙之视听、有符君德”为韵

一一吹竽诗

涨曲江池诗

65.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戊戌科

以至仁伐至不仁赋

66.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壬子科

止戈为武赋

东风解冻诗

67.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乙卯科

人文化天下赋　以“观彼人文、以化天下”为韵

内出白鹿宣示百官诗

曲直不相人赋　取“曲直”二字为韵

良弓献问赋　以“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取五声字轮次，各双用为韵。宋洪迈《容斋四笔》引作：“皆取五声依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

询于刍荛诗　回纹，正以“刍”字，倒以“荛”字为韵。

品物咸熙诗　七言八韵成

68.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丁巳科

未明求衣赋

69. 唐昭宗乾宁五年(898)戊午科

春草碧色诗

70. 唐昭宗光化四年(901)辛酉科

天得一以清赋

武德殿退朝望九衢春色诗

71. 唐玄宗至唐哀帝期间(不详科年)

蓂荚赋　以“呈瑞圣朝”为韵

舞马赋　以“奏之天庭”为韵

泰阶六符赋　以“元亨利贞”为韵

金茎赋　以“日华川上动”为韵

人镜赋　(原定六字韵，已不详)

三统指归赋　(原定六字韵，已不详)

信及豚鱼赋　(原定六字韵，已不详)

日再中射巳之鹄赋　(原定七字韵，已不详)

观紫极舞赋　(原定七字韵，已不详)

五声听政赋　(原定七字韵，已不详)

六瑞赋　以“俭固能广、被褐怀玉”为韵

径寸珠赋　以“泽漫四荒、非宝远物”为韵

宣耀门观试举人赋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为韵

悬法象赋　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为韵
玄酒赋　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为韵
幽兰赋　以“远方袭人、悠久不绝”为韵
日月合璧赋　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为韵
金柅赋　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
金用砺赋　以“商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

72.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917)丁丑科

宫漏出花迟诗

73.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乙酉科

君从谏则圣赋　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
臣事君以忠诗　(与赋俱为覆试题)

74.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辛卯科

铸鼎象物赋

75. 南唐元宗(保大中)伍乔榜

画八卦赋
霁后望钟山诗

76. 南唐后主(宋乾德中)卢郢榜

王度如金玉赋

77. 南唐后主(宋开宝中)邱旭榜

德厚载物赋

78. 南唐后主(宋开宝中)邓及榜

销刑鼎赋
儒术之本论

79. 南唐后主〔宋开宝五年(972)〕杨遂榜

天鸡弄和风赋

80. 前蜀后主乾德四年(922)壬午科

制科策问　问：炎汉致治，始策贤良；巨唐思皇，爱求茂异。讲邦国治乱之体，陈天人祥祲之原，岂角虚文？盖先硕德！朕念守器之重，识为君之难，思得奇才，以凝庶绩，因举故事，以绍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时，投书应诏，必有长策，以副虚怀。何以使三农乐生，五兵不试，刑狱无枉，赋敛无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长世？朕当亲览，汝无面从。

提问：西汉帝室要实现大治，开始策问贤良士子；大唐王朝思求盛明，于是求取优秀的人才。讲论国家治乱的纲要，陈述天上与人间的吉凶本原，哪里只是比试虚泛的文章？大体上把那盛大的德行放在第一位！皇帝我体念守护住政权的重要，明了身为君主的艰难，希望获取到奇异的人才，用来成就各种功绩，因而振兴旧有的策问贤良的制度，用来继承前代的英君。你们这些士大夫身怀大道，遇上时机，献上文书，响应诏令，一定具有长远的计策，用来符合皇帝我那一片期待的心怀。凭借什么能使居住在平地、山区和水乡的农民为生活而感到欢乐呢？各种兵器不再擦拭呢？刑罚审案没有遭受冤屈的呢？赋税征收不再增加呢？采用什么计策可以平定中原呢？通过什么办法可以预测出国运长久呢？皇帝我要亲自观阅，你们不要当面光说好话来迎合。〔宋大川　辑译〕

◉ 大宋状元卷 ◉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科

御试试题

不阵而成功赋 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
二仪合德诗
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 限五百字以上成

田锡 不阵而成功赋

田锡(940~1004) 字表圣，原名继冲，洪雅(今四川洪雅西)人。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第二，时年39岁。历仕太宗、真宗两朝，官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其仰慕唐代魏徵之为人，屡上章疏直言时政得失，并呈《御览》、《御屏风》以尽规劝。今有《咸平集》传世。

圣人以德御天下，威加域中，.谅至仁以无敌，故不阵以成功。征《道德》之格言，谓乎善战；取《春秋》之经武，自服皇风。是知恩始乎于万灵，武实加乎七德。安民和众以为本，禁暴戢兵而是式。所以堂堂之阵弗施，而唯取怀柔；整整之旗何用，而陋乎刚克。昔者成汤革夏，泽及万邦，勋敌靡由乎力制，匪人自悦而心降。岂比夫祖龙霸秦，恃山河之百二；淮阴事汉，称智勇以无双。又若武王克商，灵旗前指，岂鹅鹳之是列，匪鱼丽之称美。自然威宣，有亳民率服以来归；师济盟津，众悦随而戾止。是知王者之取天下也，泽普群动，恩流九围，道

德为城池之固，忠信为甲胄之威。所以箪食壶浆，迓王师而自速；靡旗乱辙，望圣德以如归。宜乎师克在和，动先观衅。仁义之施也，若风雨之速；威武之加也，若雷霆之震。《传》称因垒，美崇伯之归周；《书》曰舞干，纪有苗之服舜。今圣朝以民跻寿域；道洽人寰，将铸剑于农器，方虚候于玉关。弭祸乱于未形，恩能服众；布英威于有截，礼以防闲。下臣赓歌之曰：化洽无私兮，功符不宰；取仁义为胜兮，岂干戈砺？乃德上冠于唐虞，政下任乎元凯。孙吴之阵法奚取，韩白之兵机弗采。宜乎车同轨而书同文，至化方流于寰海。

圣人依靠恩德驾驭天下，威势施加到整个宇宙之内。的确是最为仁慈就没有对手，因而不摆下战阵就大功告成。验核《道德经》的格言，这才称得上能征善战；择取《春秋经》动用武力的准则，人们就自行归从那盛明的感化和风。由此可以知道，恩德从一切生物那里开始施布，武力实际上要播扬七种德惠。七种德惠中要把安定民众并使百姓和睦作为根本，奉行那禁遏凶暴和止息战争的准绳。因而威武雄壮的战阵不予设布，只是采取那感化安抚的方针。鲜亮严整的战旗还用它来做什么，对以刚制刚的手段根本就不屑一顾。过去成汤取代夏朝，恩泽扩展到各个邦国，强悍的敌军并不是通过武力来制服，刁民歹徒自动就心悦而诚服。哪里像秦始皇让秦国在天下称霸，就依仗本国险峻坚固的地理优势；又哪里像淮阴侯韩信事奉汉朝，号称智勇无双。再比如周武王攻灭商朝，只是把那战前经过祭祷以求旗开得胜的大旗往前方一挥动，哪里去布设如雁成行、如鹤飞旋的那些阵式，对鱼贯而进的前后策应的阵法也不称赞它多么巧妙。自然而然地就威力播扬，商朝毫地的民众全都服从，前来归顺。周朝主力军在盟津渡过黄河，八百诸侯都心甘情愿地从征，于是个个都主动地来到。由此可以知道，帝王取得天下，都是泽惠遍及一切生物，恩德推广到九州，道德才构成坚不可摧的城池，忠信才构成兵器那样的巨大威力。因而众百姓带着食物和酒浆，自动就急速地前来迎接帝王的部队。敌军士兵把战旗放倒，让战车乱撞，向往圣明仁德的帝王，如同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也就难怪军队取胜在于上下一心，采取

行动前要首先观察对方的内部矛盾。仁爱和道义的施布，就像风雨那样迅速;威势与武力的施加,就像雷霆那样震撼。《春秋左氏传》讲到周文王仍按原先修筑的营垒布置军队,崇国就自动请降,这是赞扬崇国国君归顺了周朝啊!《尚书》中讲到帝舜让人演出手执羽毛的文舞,这是记载下三苗部落向帝舜归服啊! 如今我们圣明的大宋皇朝,由于把民众带入了长寿的境地,治国的大道和整个人间非常融洽,正准备把兵器都改铸成农具，正打算在边关象征性地设防。在那萌芽阶段就把祸乱消除掉，恩德能够使众人心悦诚服。在那截然整齐的状态下就把英气威势播扬开来，礼制用来防止住超越规定的行为。做为下面的臣子我禁不住接着歌咏道:教化遍及到每个角落,没有任何一点儿私意,功业和天地相配,然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取用仁爱和道义,作为胜利的法宝,又哪里去磨快磨亮那武器! 于是恩德从上面超过了唐尧虞舜,政事在下面都交付给八元、八凯那样的贤臣去办理。对孙武和吴起的阵法会有什么择取?韩信、白起的用兵时机更不去采用。这也就难怪车辆的宽度全一致,而文字天下都统一,最美好的教化正流布到整个寰宇。

登讲武台观兵习战论

《春秋》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又曰:谁能去兵! 是知尧舜、禹汤而下,迨于宗周之至圣,鲜不以仁义道德牢笼天下,而以甲兵武备以制海内。故仲尼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周有井田之法,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乘三农之隙,以教民战。夫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和众之为用也。故古先帝王临御天下,持威制之柄于上,以制四裔而齐万国,得不以兵为本焉。

昔晁错上汉文之书曰:兵不坚利,与空手同。是知兵不得不坚,而战不得不习。唐开元之际,海内无事,明皇幸于骊山,讲兵而阅焉,于时称为威盛。今国家自先帝临御以来,弭祸乱而安黎元,胜兵数百万,所谓霸王之器在手,故远戎畏服,诸侯恭肃,岂非甲兵之用,善弛张卷舒由圣人乎! 今陛下乘乾坤交泰之时,而当寰海宴清之际,虽以

《诗》、《书》、礼乐以化天下，而致民于富寿之域，然能遵尧舜、禹汤之用心而弗忘战，以是知卜年之祚方远，而卜世之基弥固，登崇高之台，以讲武焉。

讲武之大体，实观兵之威武焉。既威且武，而有习战之术，以是众战，则何敌弗克？夫是三令五申，虽古之习战之法，而《易》贵师贞之吉。今睿谋神武，以兵战之机以时习焉，天下畏天威而服圣德，岂非前书所云“善师者不阵”者乎！四裔之心，咸走梯航玉帛而来朝者，由陛下德先胜而兵有威也。今论兵甲之利，府库之备，士卒之勇，土田之广，疆埸之安，虽汉武承文景之羡财而利甲兵者，弗能加焉。区域之安，蒸黎之泰，风雨时顺，天地气和，虽太宗革隋之余而善整武备者，亦弗能至焉。

《春秋左氏传》上说：皇天生长出属于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别的物资，老百姓一起使用它们。又说：谁能把军队废除掉呢？由此可知，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往下数，一直到宗周最明智的圣王，很少不用仁义道德去把整个天下凝聚起来，又用军队武备去控制住海内辖区的。因而孔老夫子说：不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到时候却让他们去打仗，这就叫做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所以周朝定立起井田制度，春季就组织百姓去猎取活动能力差的动物，夏季就组织百姓去猎取没怀孕的动物，秋季就组织百姓去猎杀各种动物，冬季就组织百姓去猎取大小动物，利用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闲时间，教导民众熟悉军事活动。武力的动用具有七种德惠，其中禁遏凶暴和止息战争、安定民众并使百姓和睦构成它的根本目的。所以古代的圣帝明王统领并驾驭天下，在上面掌握住威力强制的关键手段，用来制服四周的少数部族，使各个邦国都服从统治，这能不把军队作为根本吗？

从前晁错向汉文帝献呈奏章说：武器不坚固锐利，就和空手一个样。由此可知，武器不能不坚固，而战斗不能不演习。唐朝在开元年间的时候，天下太平无事，唐玄宗到骊山去游幸，讲求武力并对军队进行检阅，在当时被称为威武雄盛。如今我们国家自从太祖皇帝登上帝位以来，消除祸乱，安定住百姓，精锐的部队多得上百万，正是人

们所讲的称霸天下和称王天下的宝器掌握在手中，所以远方的少数部族就畏惧并顺服，各地的节度使都恭敬地听从命令。这难道还不是在军队的动用上善于宽缓或严厉，善于收起与放开，都由圣人做安排吗？如今陛下正承接起天地彼此顺畅的时运，处于整个寰宇安宁清平的时候，虽然用《诗经》、《尚书》和礼制、乐舞去化导天下，已经把民众带入了富裕和长寿的境地，然而仍能遵循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的用心，不忘记战备，根据这一点就能知道我们大宋比当年周成王定鼎王城而预测出享有国运七百年还要长久，比它预测出传续三十代的那个根基还要牢固，于是陛下登上高大的楼台，来讲求武备呀！

讲求武备的基本宗旨，实际上是观察部队的威武程度。既威猛，又勇武，并且具有对作战很熟悉的技艺。凭借这样的部众去交战，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够打败它呢？这表明当年孙武对吴王的宫女进行训练时三番五次地申明军令，虽然是古代熟悉作战的方法，但《易经》更看重军队严正所带来的吉庆结果。如今陛下机智的谋略既神明又威武，用作战的奥妙让士兵定时来了解掌握它们，天下人都畏惧皇天的威势，又对圣人的仁德心悦诚服。这还不是从前《春秋谷梁传》这部书里所讲的善于用兵的人不设布战阵吗？四周少数部族都想长途跋涉，携带金玉绢帛前来朝拜，原因是出自陛下先用仁德征服它们而又军队具有威力啊！如今讲论起兵器的锐利，府库的钱粮储备，士兵的勇猛，沃土良田的广大，边界的安宁，即使像汉武帝承接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多余财富而使军队特精锐的盛况，也不能凌驾于我们大宋之上啊！讲论起整个辖区的安定，众百姓的吉福，风雨的按时节来到，天地阴阳二气的协和，即使像唐太宗取代隋朝以后而善于整治武备的情形，也不能达到我们大宋的恁般地步啊！〔金山译〕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壬寅科

御试试题

有物混成赋　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

高明柔克诗

君子黄中通理论

王曾　有物混成赋

王曾（978～1038）　字孝先，益都（今属山东）人。咸平五年(1002)进士第一，时年25岁。历仕真宗、仁宗两朝，累官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枢密使、宰相，封沂国公。立朝方严持重，多所荐拔人才，号称贤相。卒谥文正。有《王文正公笔录》传世。

妙物难模，先天有诸，著自无名之始，生乎立极之初。不缩不盈，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虚。原夫未辨两仪，中含四象，虽欲兆于形质，曾莫知夫影响。问洪纤而莫得，自契胚浑；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大朴将散，三光欲萌，清浊待兹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后品汇咸观，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发，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隐于纤介，大不充于寰海！配一气以冥运，亘终古而斯在。纵阴阳之推荡，我质难移；任变化之纷纭，斯形不改。岂不以有者真有之筌，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显，寂听而音容莫传。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视焉且无讶，深蟠于厚地；搏之不得疑，上极于高天。本自强名，诚难取类。其始也，既出无而入有；其终也，亦规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窥，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无反无侧，神之听之，谅潜形于恍惚，实委化于希夷。倾毁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刚柔有体，将用舍以随时。今我后掌握道枢，恢张天

纪，将穷理以尽性，思反古而复始。巍巍乎执大象而抚域中，达妙有之深旨。

那个玄妙的东西简直难以描划出来，在天地开辟以前就有它存在着吧？它显现在什么名称都叫不出来的起始的时候，产生在太极形成的当初。既不往里缩，又不朝外溢，那拟象哪里是广大和狭小能够穷尽的呢？既不雕琢，也不砍削，流布的形态没有不限定在虚空里的。推究起来，还没区分出天地阴阳，里面就包含着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这四象。尽管要在形体质地上显露出来，但竟无法知道那如影随形、如声回应的踪迹。究寻洪大与纤细却究寻不到，可却自行就与那胚胎或浑然一体的形态相契合。考察上方与下方已经全都忘记掉，哪里又分得出天上地下来。到了混沌迷濛将要散去，日月星辰想要萌生出来，清轻阳气上升为天和重浊阴气下凝为地，就靠它一下子给区分开来。黑暗的夜晚和明亮的白天，也由它交替形成。然后万物的种类全都看得清了，成为有形物体的开端。淳粹与和谐散发到外部，有的人就了解了最高真道的精髓。这是多么地微小却不在最细微的东西上让人看不到，广大又不扩充到整个寰宇。配合那元气在幽冥中运作，贯穿往古而当今仍然存在。即使阴阳二气推移激荡，我那本质却难移动。任凭变化千种万种，固有形态却不改变。这哪里不是因为所谓“有”，正属于确实具有的本原；所谓“物”，正是物体生出的先导。竭力去搜寻，那征兆和迹象就显现在这里；寂静地来闻听，那声音和容状却传不过来。获取到我那微小方面的，就散布开来，成为草木；获取到我那重大方面的，就聚合起来，成为山川。察视的话，且不要感到惊奇，往深处盘绕那厚重的大地。摸抓的话，不必产生怀疑，往上面逼近那高远的苍天。本来就勉强给它起了个名称，确实难以用什么来作类比。在它起始的时候，既从“无”转入“有”；到它最后的时候，也支配苍天和主宰大地。既不能够伸出手掌窥见到，又不能够依从谁就招引来。圣明的君主体悟它，实现对天下的教化，也就是人们所讲的无为却有为。君子执持它，确立起自己的品格，和那没做将相的相将一个样。不违反又不偏斜，尊崇它又顺从它，真在若无若

有中潜伏起身形，确实在无色无声中随从自然的变化。倾轧诋毁还会从哪里袭来，固然还在我坚定持守不动摇。刚强与柔和处理得非常恰当，依据时势来决定接受任用还是拒绝任用。如今我大宋皇帝掌握着大道的枢纽，张布皇天的纲纪，正准备穷尽天理，完全实现人的本性，思索返回到古代，恢复那初始的状态。崇高广远地执持大道的法象去安抚整个天下，通晓那“有”和“无”是众多奥妙之门的深邃义旨。〔金山译〕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甲子科

御试试题

德车结旌赋　以"车结旌者、昭德之美"为韵

宋庠　德车结旌赋

宋庠(996～1066)　初名郊，字伯庠，后改字公序，安陆(今属湖北)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第一，时年29岁。历仕仁宗、英宗两朝，累官参知政事、枢密使、宰相。遇事分辨是非，以慎静为治，与其弟宋祁俱以文学名世，世称大小宋。今有《宋元宪集》等著作传世。

君有至德，时乘大车，当偃革以无外，乃结旌而有初。奉驾陈仪，采物虽资于备设；鸣鸾示礼，旗旒匪俟于垂舒。顺考前经，铺闻往说，谓戎事以既息，贵君车之有结。雍容抚轼，盖藏饰以尚纯；肃穆展铃，岂垂旃而就列！盖由抑乃盛饰，昭夫令名，虽冠品于舆服，蔑扬威于旆旌。肃轸无哗，方敛藏于旂厉；驰轮有度，靡赫奕于绥缨。且夫礼有质文，器随用舍。车号乎德，则崇化于邦本；旌结其表，则示人于天下。意自象见，名非人假。君轩弭节，孰讶乎卷而怀之；国乘制容，益显乎素为贵者。是知车之用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饰兮，辅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军容而外销。组辔启行，陋邦旄之孑孑；错衡遵路，殊风旆之摇摇。若然则动有彝仪，文无异色，虽严驾以备物，终去华而表德。故使礼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于采章；辚辚肃容，岂外扬于藻饰！用能上载明德，旁昭缛仪，自驾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仅比非心之屋；章明尽屏，宁同止猎之绥？大矣哉！邦礼是崇，帝仪资始，实务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国容备而兵器销，卒由兹而尽矣。

君主具有最高的仁德，就经常乘坐车厢敞亮的专车。这时正值战争已经止息，没有不归统辖的地方，于是就把专车旗帜上的旗穗挽结在旗杆的顶端，表示回到了最初的和平状态。侍奉天子车驾，陈布相关礼仪，各种装饰物尽管要靠件件都布置好，可响起那节奏鲜明的车铃声来显示礼节，旗帜上的旗穗并不是要等它垂下并舒展开来。依次考查古代的经典，全面汇集从前的说法，都强调战争既已止息，就重视天子的专车特意把旗穗挽结在旗杆的顶端。雍容大方地扶住那车前的横木，这源于收敛起装饰物，用来崇尚质朴。严肃和谐地发出那串串车铃声，又哪里需要垂落下旌旗的飘带而进入行列当中来呢?这出自减少那样样俱全的装饰物，显扬那美好的名声，虽然在车辆服饰上位居第一等，但决不在旗帜上播扬什么威势。车厢底部四面的横木看上去特肃静而无声息，这正寄寓在下垂的旌旗飘带中。转动起来的车轮具有行进的节奏，不在那帽带上显出高贵显赫来。况且礼制具有讲求质朴和讲求文采的区别，器物就依从它们使用与否。天子的专车既用“德”字来命名，正表示在国家的根基方面注重教化。旌旗把那表面装饰的东西挽结起来，正是特向天下宣示仁人的作用。用意自行会在表象中显现出来，美名并不是随意就加在哪个人的头上的。君主的专车减少了仪节，又有谁会对这收卷起来放在心中的举动感到惊讶呢?国家的车队控制住外观上的讲求，更加显出天子一向是最尊贵的人。由此可以知道，专车的使用，是扩充那仁德才形成盛大的场景。旌旗的装饰，辅助那威势才光彩夺目。兴师问罪的行动已经停止了，确实就要在军队外观上加以减损。配备好马匹开始出发，瞧不起那种国家仪仗队由骑兵十分突出地担任先驱的架式。绘有金色图案的车辕横木不偏离道路，和那旌旗随风飘扬的场面完全不同。像这样也就一举一动都有固定的礼仪，而文采却无不同的颜色。尽管车驾严整，各种物品非常齐备，到头来还是去除浮华，彰明那仁德。因而致使礼制规定所重视的那部分，老百姓看到后就不违背。盛明的全副车驾，从把各种装饰物收聚在内层来做起。响动的车声就构成了严肃的状态，又哪里在外观上显扬那华丽的装饰物?因而能够在上面托载着圣明的

仁德，在四周昭示着繁缛的仪节。从车驾本身发出的号令，就使各地诸侯自动地来到，和那天下分裂的时候迥然不同，因而在规模上就予以收敛。上车或下车，只是恭恭敬敬，就和怀有邪心害怕在屋室中被诛杀一个样。各种华美的装饰物全都摒弃掉，又哪里和那抖动一下来示意停止打猎的帽带相同呢?太伟大了呀!只是崇尚国家的礼制，帝王的仪节靠它来做起，实际上是致力于仁德来垂示教化，也就必定收敛起旌旗上的旗穗来昭示那道理。这就难怪国家的礼制仪节相当完备而兵器却销毁不用了，最终一切都由这德车结旌而实现了。〔金山译〕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丙戌科

御试试题

戎祀国之大事赋
形盐象武诗
两汉循吏优劣论

刘敞　戎祀国之大事赋

刘敞(1019～1068)　字原父,号公是,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六年(1046)进士第二,时年28岁。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知制诰、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等。曾出使契丹,以熟知其山川地理,为契丹人所叹服。在朝敢言事,在地方任内亦有治绩。长于《春秋》学,不拘传注,开宋人评议汉儒之先声。对《汉书》亦颇有研究。有《公是集》等著作传世。

戎在御侮,祀专享神,皆有邦之大事,岂庶政以同伦!宜社而行外,伸威于殊俗;受厘以报内,均福于生民。盖所谓朝廷之先务,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经,发挥至理,政有常法,事或殊轨,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驭神者莫如祀。善师不战,谅治体之孰加;精意克禋,眷彝伦之莫拟。是故将命武事也,必有归膰;将格神贶也,必先执膰。盖大其所当大,尊其所可尊。干戈肖貌,信丕经之斯在;玉帛荐德,微末节以同论。然则治道有后先,国务有小大,威四海者兵为急,叙五经者祭为最。民神之事不一,皆以底和平;腥熟之俎不同,皆以福中外。故圣王劳意于用众,致诚于逆禧,动则谨尔,下皆仰之。知夫事之大,不在于彼;礼之重,莫先于斯。亦犹仲尼陈三慎之端,惟斋及战;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与师。用能祭典不奸,天威无陨,或谨以进胙,或重之受膰。迩遐一体,慭武节而服从;上下交欢,欣德馨之明允。故曰圣人之

祭,不能独丰,天下虽治,亦将御戎。大而慎之则蒙福,细而慢之则亡功。谨禁暴戢兵之机,惟政之本;明昭孝息民之义,何治之隆!盛哉丕冒群生,钦崇大节,非戎无以威远,非祀无以著洁。故蛮夷服而鬼神享焉,有以缉熙于鸿烈。

出兵作战在于抵御外部的入侵,举行祭祀用来专门供奉神灵。它们都属于国家的重大事情,哪里是同一般政务相提并论的呢?在土神庙举行军祭仪式,然后部队向境外进发,在少数部族居住的地区显扬威势。接受祭祀完毕后剩下的祭肉,献呈到宫廷内,天子把这获得的福庆施布给每个百姓。这大致上就是人们所讲的:出兵作战和举行祭祀属于朝廷的头等大事和教化的根本所在啊!考查综合古代经典的记述,发明阐扬那最高的道理,政务定立有固定的法则,事情却有不同的料理方式,但在保护民众方面却没有比得上出兵作战的了,在驾驭神灵方面却没有比得上举行祭祀的了。善于用兵的人却不进行交战,这确实是在治国纲要上谁也超不过的地方。心意精诚而能祭天求得福佑,这确实是在顾念常理上什么都不可比拟的事情。因而将要部署军事行动,必定要有把那分赐的土神庙的祭肉再送回来的做法。将要顺从神灵的赐福,必定要首先执定用于祖宗庙的祭肉。这是因为要把应当放在重要位置的事情放在重要位置上来办理,要把可以尊崇的东西真去加以尊崇。拿盾牌和戈戟这类武器同自身的意图融为一体,重大的法则确实就在这上面。用玉石布帛向神灵献上治国的德业,不是那细小礼仪可以相提并论的。既然如此,那么,治国的方法有先后,国家的事务有大小,威慑天下的东西要数军队占首位,依次施行吉、凶、宾、军、嘉这五种礼制要数祭祀为第一。保护百姓和供奉神灵的事情不一样,但都是要实现安和与平静。案板上盛放的生祭肉和熟祭肉并不相同,但都是要给朝廷内外带来吉福。所以圣明的帝王在兴师动众上费尽心思,在迎来吉福上竭尽虔诚。一举一动就都小心谨慎,下面的人全都仰望他。很清楚最重大的国事,不在出兵作战以外的其他方面;而那最紧要的礼制,没有比这祭祀更占首位的了。孔老夫子也依旧陈说三种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列在前面的只是那斋戒与战争。作为殷朝末期三位仁人之一的箕子开列八种政事的名目，也把祭祀和出兵作战包括在里面。因此能够使祭祀的法典不受到扰乱，皇天的威灵不受到损伤。有的去恭谨地献上酒肉，有的特看重赐给的祭肉。远近结成一体，对武力的动用准则深感恐惧而归服顺从。上下一起欢悦，庆幸仁德散发的香气被神灵明确地予以接受。所以说圣人的祭祀，不能够只是丰盛；天下尽管实现了大治，也要指挥好军队。重视并谨慎地处理好这两宗大事，就会蒙受到吉福；忽视并随意地对待这两宗大事，就建不起功业。对禁遏凶暴和停用武力的关键之处加小心，这是施政的根本。宣明孝悌和与民休养生息的义旨，治理该是多么地隆盛！真真盛明啊！皇天覆盖下的众百姓，敬顺崇尚国家的纲纪，除去出兵作战就没办法威震远方，除去祭祀就没办法昭明精洁。因此四周的少数部族前来归服，鬼神接受献上的祭品，就有办法发扬光大那宏大的功业了。〔金山译〕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癸巳科

御试试题

圜丘象天赋　以"圜丘就阳、上宪天体"为韵

吹律听军声诗

乐本人心论

郑獬　圜丘象天赋

郑獬(1022～1072)　字毅夫,一作义夫,安陆(今属湖北)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第一,时年32年。历仕仁宗、神宗两朝,官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知杭州等。曾疏请从俭营筑仁宗陵,许中外尽言并予采纳,不满王安石新法。词章则以豪伟峭整见长。有《郧溪集》传世。

礼大必简,丘圆自然,盖推尊于上帝,遂拟象于高天。必在国南,蟠宏基之高厚;用符阳体,取大运之周旋。王者揆礼之文,为民之唱,修明大禘,导迎景贶。有祭焉,格神于下;有祀焉,享帝于上。谓丘也其形特异,我所以贵其自成;盖天也其体亦圆,我所以法之相尚。尔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长,扫以除地,升而诏王。是必肇灵壤以高峙,模圆清而上当。择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仿高穹之大体,以就乎阳。由是欢然神意交,穆然天贶授。遍群灵以从之祀,严太祖以为之侑,焕尔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耸宝势以下蟠;仰合乾仪,环太虚而高覆。然则礼有物也,其制可象;天无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于厚地,取类于重丘。崇崇其高,隐若积土之固;浩浩其大,浑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藁秸以籍诚,有陶匏以荐礼,大裘焉以彰其质,苍璧焉以象其体。固异周朝授政,筑层级之三成;汉祀命郊,兆重阶之八陛。是则事至神者,物无以称其德;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虔。与地居上,

如天转圆。对方泽之成形，乃殊其象；规大仪之冥运，自贵其全。圣人所以明礼大原，建邦茂宪，兆其成迹，符于至健。夫然因天事天，得先民之至论。

礼仪盛大就必定简要，祭坛筑成圆形也就自然而然了。这是由于推尊到天帝，于是就模拟那高远的皇天确定下形状。必定要设在京师南部郊外，盘结起宏大基座的高挺深厚。以便符合阳位的本体，特取五德转移的周而复始。称王天下的人，审核礼制的明文记载，向众百姓做出倡导，修明盛大的祭祀，迎受那天赐的大吉大福。专有供奉地神的仪式，感动地上的所有神灵；更有供奉天神的仪式，敬请天庭的大帝享用祭品。说是祭坛的形状非常特殊，我用来看重它那自然天成；因为皇天的形体为圆形，我用来效仿它而相互推崇。那祭坛竟然年复一年地推移到仲冬十一月，迎来从冬至那日起白天开始变得时间长。把那地面清扫干净，禀告帝王踏上去祭祷。这就表明一定要开辟出那块灵验的宝地，把祭坛高高地矗立起来，模仿圆形的清天而与上方相对应。选好吉祥的地块，筑成基座，于是确定下它的空间方位。效法高远的苍天砌成那主体建筑物，用来归就纯阳。由此而使神灵的心意欢悦地同人交融在一起，皇天的恩赐和蔼地授付给帝王。众神灵一个也不少地伴随着祭天大典来加以供奉，庄严地把创建皇朝的太祖作为皇天的辅佐来祭享。盛大的仪式十分醒目，配得上取得的丰功伟绩。祭坛的筑成靠的不是人力，它张布开佑护人间的态势，往下一节一节地延伸。祭坛朝上，又完全符合皇天的威仪，环绕太空，高高在上，覆盖天底下的一切。然而礼仪规定具有实物，实物的形制可以仿造，但皇天却广大得没有具体的形制，它那边际可以想象出来。因而我就从厚重的大地察视那法则，从一层又一层的山丘择取那近似之处。一节又一节地越来越高，隐然就像那土层堆积起来，非常牢固。广大得浩莽无边，浑然就像那覆盖一切的苍天，遍及各个角落。因此有那祭祀时专用禾杆编成的坐垫来表达虔诚，有那盛放清水酒的陶制器皿和葫芦瓢来进献礼品，专门穿那黑羔皮衣来彰明质朴，专门用那青色圆璧来象征天体。这固然就和周朝时

周公向成王交回执政的权力、筑成拾级而上的三层高台已不相同，又和汉代举行祭天大礼、首次修建层层上升的八级台阶完全两样。这就表明，供奉至上神，具体的实物没办法符合它那恩德。与最高的皇天相沟通，祭坛用来表达那虔诚。耸立在大地的上面，像皇天那样呈圆形运转。与专门祭地的名为“方泽”的方形坛台相对照，鲜明地区分出各自的形状。效法混沌元气的默默流转，自行就看重本身的无所不包。圣人用来明了礼制的本原，建立起国家，扩大那成法，显现出成功的足迹，符合那皇天最为刚健的本性。做到这样，依凭皇天而去敬奉皇天，也就获取到了古人的最高的结论了。〔金山译〕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丁未科

御试试题

公生明赋　以"公不偏党、明则生矣"为韵

许安世　公生明赋

许安世(?~1083)　字少张，襄邑(今河南睢县)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第一。神宗朝官任都官郎中、权中书舍人，复贬官房陵县，归至黄州而于元丰六年(1083)十月卒。平生与文字学家陆佃交游甚密，亦同苏轼往来深厚。或谓其享年仅仅二十七岁，如此则考中状元时尚不满十岁，显属误说。但其英年早逝却是事实，当为三十七岁时。

事欲无蔽，心宜尽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祛一意之党偏，不私乎物；照百为之情伪，罔汩于中。若夫外交事变之繁，中固心诚之守，以谓虚己鉴物，则枉直昭晰；挟情适事，则是非纷纠。欲庶理之皆辨，舍至公而则不。中立不倚，始持正于群伦；旁烛无疆，遂致明于万有。无陂无侧，不阿不偏。非妄恶也，恶其众之所弃；非作好也，好其众之所贤。盖依违牵制者，固已去矣，则明白洞达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宁，居绝倾邪之渐；五蓁不乱，遂观昭旷之先。盖夫智因窒而后昏，性以私而有党。爱憎既绝，则真伪必审；取舍既平，则善恶不爽。抱纯正以中执，涵机灵而内养。所以主心善治，汤无蔽塞之忧；直道钦承，文有照临之广。岂不以湛静者人之性，偏暗者性之情？知静为本，故虚之则定；知暗为害，故去之则明。正厥之官，始闲邪而制物；发为智烛，终迪哲以通诚。大抵处有累之地者，莫不徇私；对无穷之变者，鲜能不惑。凡适理以非眩，由秉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质，蹈行圣则。周而不比，无一曲之蔽情；静之徐清，有三知之人德。因知心

乃物之鉴，公为职之衡。系吝既屏，纯明自生。以之察己，则事至不惑；推而成务，则物来敢名。是故君子养源，于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己，岂徒无潜愬之行？嗟夫有为者易失其本心，无惮者或迷于至理。故伾、文党与以丑正，恭、显庸回而嫉士。智尚昧于自保，识敢期于远视！惟夫以公正为心，明则生矣。

要想事情不存在闹不透彻的地方，用心就应当完全公正。既已执守公正去牢固地定立起志向，于是就产生出明智而存留在自己的身上。去掉那满门心思的结党营私和偏向一边，对外界事物不存在个人的考虑；察照出各种行事的用意真伪，不在思想上出现混淆。至于在外界接触到众多的事变，在思想上加强那用心至诚的守执，一直认定没有个人的私意而去明辨事物，那就是曲是直看得非常清晰；如果怀有个人的感情去对待事物，那就是对是错弄得复杂混乱。真想使各种事理全都分辨出来，舍弃掉最为公正的准则就办不到了。站在中正的立场上而不倒向一边，这才能在众多的同辈人中执持住公正；观察周围的事物没有穷尽的时候，于是对所有的现象都形成明辨。既没有不平正的地方，也没有倾侧的地方。既不逢迎，也不偏颇。决非是随便就憎恶什么，憎恶的是那众人所唾弃的家伙；决非是故意就喜爱什么，喜爱的是那众人都认为贤良的人物。大致上说来，何去何从而做不出抉择的情形，原本上就已经去除掉了，那么也就一切都看得明白透彻，这正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各种念头只求宁静，在平素断绝掉倾侧邪僻的逐渐滋生；目耳口鼻心各尽其情而不错乱，于是就能观察出明显而又广远的事物的先兆。这大概是因为，明智由于受到阻塞，然后就昏昧；心性出自个人的私欲，随之就形成结党营私的举动。自身的爱憎既已灭绝掉，真伪就必定分辨得十分准确；取舍既已出自公平，善恶也就出不了区分上的差错。抱定纯正来在思想上做守执，蕴涵天机灵气而在内心里做养护。所以操持住用心，进行美好的治理，商汤就不存在受蒙蔽而阻塞的忧患。恭敬地承用正直的大道，周文王就具有照临天下的广远波及面。这难道还不是由于沉静正属于人的天性，而偏颇暗昧正属于天性中的私欲吗？懂得沉静属

于根本,所以把它什么都不掺杂进来,也就定立住了。懂得暗昧构成危害,所以把它去除掉,也就明智了。端正那心灵的思虑功能,这才能够防止邪恶而驾驭外界的事物;运用出来构成明察一切的智慧,最终践行那圣明的大道,去通达那至诚。一般讲来,身处存在着拖累的境地的人,没有谁而不徇私;面对着事物无穷变化的人,很少有谁能够不迷惑。只要是适合事理而不头昏眼乱,就出自秉持心志的自我克制。这还能不保守住天赋的质性,践行圣人的准则,和人团结却不勾结,没有一种片面的闹不透彻的私情,宁静而缓缓使它变清澈,具有全面的认识而进入道德吗?由此可知,心志正是外界事物的镜子,公平正是履行职责的一杆秤。狭窄的心胸已经排除掉,纯正的明智自动就会产生出来。用这来察照自身,事情就会达到不迷惑的境界;把这推广开来,成就天下的事务,万物就自动前来而本人敢于公开宣布这一点。因此君子养护本源,用来实现对忠正与奸邪的剖判;居官在位的人端正自身,哪里会白白没有遭到诋毁上告的行径呢?可叹有所作为的人容易失去它那天赋的心性,什么都不怕的人有的却在最高真理上转入迷惑。所以唐朝的朝臣王伾、王叔文等人结成朋党来憎恶正直的人;汉代的宦官弘恭、石显用心邪僻而嫉恨纯正的国士。智虑尚且在自我保全上还闹不清楚,器识哪里还敢指望他看得很深远呢?只有把公正作为心志的主宰,明智也就形成了。〔金山译〕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闻礼以辨上下，法以定民志。三王之时，制度大备。聘、乡射、燕享、祭祀、冠昏之义，隆杀、文质、高下、广狭、多少之数，尺寸铢黍，一有宜称。贵不以逼，贱不敢逾，所以别嫌明微，释回增美，制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上自朝廷，下迨闾里，恭钦撙节，欢忻交通，人用不偷，国以无事。降及后世，陵夷衰微，秦汉以来，无足称者。庶人处侯宅，诸侯乘牛车，贫以不给而废礼，富以有余而僭上。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义，祭享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无复防范，先王之迹因以熄焉。《传》曰：礼虽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后之学者，多以为非圣人莫能制作。呜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不作也亦久矣。抑恣其废而莫之救欤？将因今之材而起之也？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闻听礼制是用来区分出上下等级关系的，法律是用来约束住民众的思想的。在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时期，制度十分完备。诸侯朝拜天子和天子问候诸侯以及诸侯之间彼此会见与相互问候，乡级政权在乡办学校集会饮酒和举行射箭竞赛活动，备酒设宴款待来宾，祭祀天地祖先和群神，男子二十岁成年加戴礼帽，男女到年龄成婚等方面的礼仪，与此相关的提高品级与减等处理，文采与质朴，高与低，广与狭，多与少的具体规定，哪怕精细到最微小的地方，也完全都有合适的限制。于是尊贵的人不能逼近王室与国君，卑贱的人不敢超越制度规定，用来辨别出容易产生嫌疑的事情，搞清楚隐微难明的问题，去除掉邪僻的行为，增进美好的品德，在还没发生动乱的时候就制定好大治的措施，在还没显现出来的时候就阻止住邪恶，上自朝廷，下至民间，个个恭恭敬敬，节制自身的行为，欢快愉悦，相互沟通，世人由此而不苟且懈怠，国家由此而没有变故。可沿续到后世，却变得衰落败坏了。从秦朝和汉朝以

来，就没有值得称述的东西。普通老百姓却住在王侯才有资格住的宅第中，王侯反倒乘坐牛车。贫穷的人家因为生活接济不上而废弃了礼仪，富有的人家因为家有余财而超过了制度规定。在屋室的规格上，器具服饰的使用上，成年加冠和男女婚配的仪节上，祭祀和待客的标准上，全都乱得一团糟，随便对付着做，不再有防范的规则，古代圣帝明王的足迹随之泯灭了。解释经书的《礼记·礼运》上说：礼仪尽管是在古代圣帝明王那里未曾有过的部分，也可以根据道义重新制定出来啊！后代研求学问的人，大多数却认为除去圣人，谁都没资格制定礼仪，创制乐舞。哎呀呀！古代的大道得不到行用已经时间太长了，礼乐教化不盛行也时间太长了。究竟是该任凭它废弃而不去挽救呢？还是该借用当今的人才去把它振兴起来呢？

黄裳　廷对策

黄裳(1044～1130)　字冕仲，或作勉仲，一云字道夫，号演山，延平(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时年39岁。后官至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徽宗时针对三舍法而主张仍行科举制。其精通礼经，又喜道家玄秘之书。有《演山集》今犹传世。

臣闻致道则求诸人，以人者善之所在也；及其行道也，不可以求人，惟人求道。置法则从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从人，惟人从法。圣人之为天下，合众善以为道，合群情以为法。其为教也则宜民，下无异习；其为政也则宜臣，下无异说。若夫鉴管之见，涓埃之善，奚足以致哉？圣人以为物态有新故，民情有好敝，俗有盛衰，时有彼此，事有变常，道有升降，法有损益。以道应时，以法制俗，当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则夫善之所在，未可以废也；当与万物之变相适于无常，则夫情之所在，未可以废也。

陛下所以三岁一诏，旁集天下之士，亲降圣问，而使一介草莱，类得发其涓埃之情，以助太山之崇高，沧溟之深远，如臣之愚，何足以与此？然而臣闻大道之世，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则俗之于物轻

矣。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俗之于我轻矣。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天叙之中，夫妇之情，父子之性，君臣之义，兄弟之序，所谓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于义而薄于仁，母厚于仁而薄于义，君无为而尊，臣有为而累，所谓有则者也。方是之时，上下之分乌用辨哉！不必持衡与之为轻重，而人自以为平；不必探筹与之为得失，而人自以为公。其正不必规矩，而天与之为方圆；其信不必符契，而天与之为取与。方是之时，上下之志乌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鸟兽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观而俯察者，则象与器，其孰制而用哉？

法无所始，亦无所成；礼无所益，亦无所损。道之下降，在乎众器之间而已。人能轻物与我，而相与为天游，未有过礼而逾、不及礼而逼者，圣人盖未有患也。然而污尊而饮，捭豚而食，遂以为礼；抟土为桴，筑土为鼓，遂以为乐。营窟橧巢，羽皮毛血，圣人恶其鄙野太甚。贵贱之分，长幼之序，饮食居处，几与鸟兽草木无以异焉。以故圣人作为礼法，以文其实。营窟橧巢，未利于居也，为之台榭宫室；草木血毛，未利乎食也，为之炮燔烹炙；羽皮未利于服也，为之丝麻布帛；污尊抔饮，未利于饮也，为之范金合土。网罟之利佃渔，耒耜之利稼穑，刳剡之利于川，服乘之利于涂，弧矢之利御寇，击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详于此矣，然后制礼之文，施于饱食逸居之时，使远于禽兽。

朝聘之礼，所以和君臣；冠婚之礼，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礼，所以交鬼神。为之射礼，以观其志体；为之乡礼，以辨其齿位。合其欢也，为之燕礼；致其钦也，为之享礼。虽然昔时鄙野之风稍趋于文，而文之弊使人役有涯之生，随无穷之情，忘不可乱之分，狥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菲废礼也逼，以美没礼也僭，遂丧天礼之自。尔者性命之情，日入于衰薄，有如横流之冲，失其大防，汗漫而难制。是以朝聘之礼，不足以和君臣；冠婚之礼，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礼，不足以交鬼神；射乡之礼，不足以仁州乡；食享之礼，不足以乐宾客。然则礼之数，岂可废哉？

有数而无义，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因情；有义而无数，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朝聘、乡射、燕享、祭祀、冠婚之义，高下、隆杀、文质、广狭、多少之数，所以见于圣问，而臣以为礼法之行，自贤与贵者

始。贤者先王以率愚,贵者先王以率贱者也,数度存焉。其在宫室也,庙各有数,堂各有尺;其在衣服也,冕各有章,旒各有寸;其在车旗也,常各有旂,车各有乘;其在器皿也,所食之豆,所献之爵,其数有多寡,其用有贵贱。虽然,礼数之于天下,岂特进其不及之才,敛其不平之气,以就绳约,然后以为得哉?有以多为贵者,以文为贵者,以大为贵者,以高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有以少为贵者,以质为贵者,以小为贵者,以下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故常不丰;不可寡也,故常不杀,惟其称而已。

天下之人,顾其教则谨其分,明其义则进其德,此其所以致治于未乱,止邪于未形欤?不然,而礼之近者适人之情,礼之远者明德而反本。刍豢稻粱,庶羞酸咸,以养其口;椒兰芳芷,以养其鼻;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养其目;钟鼓管磬,琴瑟笙竽,以养其耳;疏房安车,越席床第,以养其体。此适其情者也。圣人以此救上古之鄙野,不能使后世无文之弊。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未有能克己复礼以为仁焉,则礼之近者,适足使人流而为淫泰,乘而为诈伪耳。山藻之僭,澣濯之陋,岂可废哉?是故圣人之制礼也,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章之美而疏布之尚,莞蕈之美而蒲越槀鞂之尚,丹漆雕镂之美而素车之尚。是故礼虽道德之下及忠信之薄,而道德忠信所以不丧者,礼实明之也。

礼之近者,适人之情,而人情之适,未常放者,礼之所尚不在乎美者而已。二帝三代以法趋时,以义起礼,不能有异于此,特其详略未可同耳。故臣尝言:道无常也,未始有弊焉,必有升降者,礼法为之也。时无止也,未始有弊焉,或有彼此者,习俗为之也。继道以致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异法者,彼此之时;异时者,盛衰之俗;异俗者,新故之物。物之新故,俗之盛衰,未始有常也,则以法趋时,以义起礼,岂有一定之论哉?

是故圣人之在下者,或清或和,以矫一时之俗而救其弊焉,则有三子之行;圣人之在上者,或损或益,以应一时之俗而救其弊焉,则有三王之礼。然而道失而后德,则二帝之趋时也,致隆于德,未能以为

皇。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则三代之趋时也,致隆于业,未能以为帝。道也,德也,业也,皆圣人所能有者也,其用之异者,以制俗异之也。皇也,帝也,王也,皆圣人所能为者也,其名之异者,以应时异之也。臣谓有成与亏者,法也;无成与亏者,道也。无成与亏之中,注之不盈,酌之不竭,万法之造,费之弥多,资之愈有。唐而后,成周而后,备于形色名声,不可以为量数。若夫制于礼者为之,非特不可以致治也,必待数百岁,其智足以相备者而后全。若夫休道者虑后而致隆,则尧之所成,周之所备,伏羲旦暮而陈之,奚必俟唐与周哉?

臣谓时之所缓,圣人不以为急;俗之所恶,圣人不以为好。是故五帝而上,其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书谓之《二典》,言常道也。然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者欤?不然,而忠质之过也,周以极盛之文而救之,盖自夏商之末,仁义失尽矣,则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礼欤?尽仁之数以制礼,尽礼之数以制法。辨等之仪,教节之度,尤详于二代,则大道之降者,未足以为怪也。后世之难治,惟其物、我大重。我重而逾,物重而逼,无穷之欲,不测之变,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至于三百六十而后已,岂其好详哉?礼以义起,法以时行而已。

臣观三代之盛,忠、质、文之不同道,服、器、官之不同法,相沿以情,相革以迹。朝聘之勤,燕享之欢,祭祀之诚,婚姻之好,欢然有恩以相爱,粲然有文以相接。彰之以车服,扬之以声音,光之以《诗》、《书》,明之以藻色。其犹一元之散,遂华万物而为春欤?和气之中,声色万类,飞者翔,走者伏,潜者跃,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莫知为之者。三皇之世,未著于德义,其犹一元之含万物欤?二帝之喻,则向乎春矣。陛下体道在上,造化群材,因革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犹天道之运四时欤?作者使复,枯者使荣,则春之风雷;散者使敛,华者使实,则秋之霜露。将与有生之类还淳反一,而为太古之游,固陛下之志也。若夫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义,祭享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未复三代之遗法,岂可望哉?念此,宜圣策之所及也。

臣闻不能以礼趋时,则其为法也无功;不能以义起礼,则其为法

也无道。礼乐之情同，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则礼有损益。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损其文而益之以质故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损其质而益之以文故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文弊则质救之，质弊则文救之，文质相代而趋于中，盖虽百世不能易也。伪者文之过，野者质之过，继文之过必过于质而救之，此孔子所以欲从先进欤?时也，惟夏之从；车也，惟商之从；服也，惟周之从；乐也，惟舜之从。郑声之淫，非所可欲者也。文弊之俗，皆溯于此。乐则惟舜之从，然后郑声可以放焉。

自秦继周，礼之情不能有所因，乃滋法令以酷天下；礼之文不能有所损，乃极奢侈以穷其欲。不能以智出义，以义明德；不能以仁出礼，以礼明分。苟以徒法而制天下，礼之近者又从而充之，古远而难行者类弃而不为，遂使天下之俗流而为淫泰，乘而为诈伪。淫为郑声，殆为佞人，则其治天下也适足以为乱焉，岂能辨上下，定民志，使恭敬撙节，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若夫诸侯乘牛车，庶人处侯宅，贫以不给而废礼，富以有余而僭上。宫室之度，服器之用，冠婚之义，祭享之节，率皆纷乱苟简，未足以为怪也。

汉文帝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皆罢去之，专务朴素，然而文帝岂能监周之弊而致然哉?会其所好，适近圣人继周之意，故其屋壁得为帝服，倡优得为后饰，卖僮婢妾，富人大贾，皆得以上僭，莫之制焉。斯亦文帝不能以义起礼之过也。呜呼!文帝畏甚高论，而释之与言秦汉间事而已。唐太宗好三代之礼乐，房、杜不能对者。故其为礼也，沿秦故以为汉，沿隋故以为唐，其治卒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数末度寂寥数千载间，未有能振之者，可胜惜哉!陛下慨然有志于此，将欲贫者不至于废礼，富者不至于犯义，文不至于野，趋乎文质之中，非特天下后世受其赐也，斯文不亦幸乎!

臣闻有其德而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为其无行礼乐之权也。有其位而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为其无立礼乐之道也。而今陛下尊为天子，有其权矣；德为圣人，有其道矣，何惮而不为?然而不能因俗，则礼失人；不能制俗，则人失礼。礼失人也无情，人失礼也无分。陛下以义起礼，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以制俗而已。

寒暖燥湿异气，刚柔轻重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饮食异和，此天理之所异者，俗之所宜，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乱名左道，淫声异服，奇技奸色，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有疑于众。圭璧金璋，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量，或不中仪，有行于世。此人伪之所异者，俗之所病，先王之禁。因其所宜而弗禁其所异，天下之人，心与物化，志逐利往，譬如新生之犊，猖狂而趋，未知其所向，则虽以义明法，以数定分，敛其放肆，以就绳约，亦已劳矣。是故大司徒施十二有教，所以因俗者一，所以制俗者四。太宰以八则治都鄙，以礼驭其民，则其制俗者也；以俗驭其民，则其因俗者也。盖惟圣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后能为因俗而与之同，能为制俗而与之异。其因俗而与之同也，则能使之欢欣交通；其制俗而与之异也，则能使之恭敬撙节。礼之远者，使之知所尚焉，则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薄，道德之下衰，三代之礼可得而终始也。此臣之计也。

臣下我听说：引来大道，就该求之于人，因为人是良善的承担者啊！等到行用大道，就不能再去求之于人，只应人去求索大道。设立法度，就该依从于人，因为人是情志的承担者啊！等到施行法度，就不能再去依从于人，只应人去依从法度。圣人治理天下，聚合起众多的良善因素构成大道，聚合起各方面的情志构成法度。施行教化，那就对民众很适合，下面不存在歧异的风尚。推行政务，那就对百官很适合，下面不存在歧异的主张。至于非常短浅狭隘的见解，特别轻微细小的好建议，又哪里值得征求到呢？圣人认为物体的状态有崭新又有陈旧，民众的情感有喜好又有厌弃，社会风尚有兴盛又有衰败，时世有那一时又有此一时，事情有变化又有常规，大道有上升又有下降，法度有减损又有增益。用大道来适应时世，用法度来制约风尚，应当和万物的常理永无穷尽地相互一致，这样一来，良善所在的地方，就不可以废弃呀！还应当和万物的变化永不固定地彼此适合，这样一来，情志所在的地方，也不可以废弃呀！

陛下每隔三年就专门颁发一次诏书，广泛征集天下的读书人，亲

自降赐圣明的策问,目的是让每一个民间士子,全都有权抒发他那一点点儿内心的看法,用来补助皇上那泰山般崇高、大海般深远的谋略,但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哪里有条件置身于这个行列里呢?不过臣下我却听说:在大道盛行的时代,对物品人们厌恶有人把它丢弃在地上,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手中,这表明当时社会上对物品并不看重啊!对力气人们厌恶不是从自己身上使出来,但使出力气不一定就是为自己,这表明当时社会上对个人利益并不看重啊!不拿我个人去给大道抹黑,不拿物品来给自己添上污点。在皇天既定的次序中,夫妇之间的情份,父子之间的性格,君臣之间的道义,兄弟之间的排行,属于人们所讲的具有客观对象的东西啊!在皇天既定的品级中,做父亲的在道义上占的比重大而在仁慈上占的比重小,做母亲的在仁慈上占的比重大而在道义上占的比重小。做君主的不去做什么但却尊贵,当臣僚的具体办事又承担出错的责任。这属于人们所讲的具有原则的东西啊!正值这个时代,又哪里用得着辨明上下之间的等级区别呢?不一定要拿杆秤给人们称一称物品的重量是多少,但人们自行就认为绝对差不了。不一定要通过抽签给人们定出谁占便宜谁吃亏,但人们自行就认为公平。人们的纯正,不需要定立规矩,皇天就给他们设布了是非的标准。人们的诚信,不需要签订契约,皇天就给他们设布了取付的准绳。正值这个时代,又哪里用得着框定住上下之间的情志呢?因此皇天的日月星辰分布和运行的景象,大地的众多物产,鸟兽的羽毛外观,土地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不存在往上观望和朝下察看的对象。这样一来,天象和地产又该去控制和利用哪一种呢?

法度并没有起始的时候,也没有终结的时候。礼制并没有需要增益的地方,也没有需要减损的地方。大道往下坡路滑,在于众多的事物之间罢了。人们能够不看重物品和自身,而共同形成随顺自然的状态,就不存在超越礼制规定的人和够不上礼制等级而逼近的人,圣人并未产生过这方面的忧患啊!然而挖个土坑就当酒缸,用手捧起来就喝,把小猪劈开,在烧热的石头上烤一烤就吃,接下来把这就当作礼制。揉搓揉搓泥巴就作为鼓槌,堆起泥土就作为鼓面,接下来把

这就当作音乐。冬天就挖洞穴避寒，夏天就用柴草搭成棚子避暑，身上穿点儿兽皮鸟羽，嘴里喝点儿鸟兽的鲜血。圣人厌恶这种生活方式粗陋朴野得太厉害了。贵贱的区分，长辈和晚辈的排列，吃喝住行，几乎和鸟兽草木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圣人开始创设礼法，来给那朴实增添上文采。挖洞穴和搭草棚，对居住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就教人们修建亭台屋室。生吃草籽树果和鸟兽毛，喝鸟兽鲜血，对进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就教人们进行烧烤烹炸。披戴鸟羽兽皮，对服饰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就教人们纺麻织布和螺丝制帛。挖个土坑就当酒缸，用手捧起来就喝，对饮用没有什么好处，就教人们制造铜质或瓦质的器皿。网具的发明又对打猎捕鱼很有利，木锄木犁的发明又对种庄稼很有利，木船木桨的发明又对渡河很有利，驾牛套马来拉车又对远路出行很有利，弓箭的使用又对抵御外部的侵害很有利，夜间敲梆子又对应付盗贼很有利。物尽其利的方法，在这些方面都很完备了，然后就制定礼制的具体条文，在人们食物充足、居住安乐的时候加以实施，使人们同禽兽根本区分开来。

朝见和问候的礼仪，目的是使君主与臣僚彼此和睦；男子二十岁成年加戴礼帽以及婚配的礼仪，目的在于端正男子和女子。祭祀的礼仪，目的在于沟通鬼神。给人们制定下射箭比赛的礼仪，用来观察参赛者的心志与外在表现。给人们制定下在乡办学校聚会饮酒的礼仪，用来辨明辈份的高低。使双方感情欢快地交融在一起，就给人们制定出了宴饮的礼仪。为表达对对方的敬意，就给人们制定出了招待的礼仪。尽管过去那种粗陋朴野的风气逐渐归向带有文采了，但带有文采的弊病也使人们为有限的一生而奔波，伴随着没有尽头的欲望，忘掉了不可滥乱的名分，追求那不是非得到不可的东西，性情就失去了适中的状态，心念就失去了性情的原样。由于感到太寒酸就不管礼制那套规定，而逼近天子或国君的规格；由于感到太荣耀就把礼制那套规定甩在一边，而超越过去。于是就丧失掉了皇天所昭示的礼制的本原。过去那种天生的由本性和既定命运所带来的欲望，一天比一天陷入衰败浇薄之中，就像泛滥的洪水劈头冲来，失去了牢固的堤防，四处奔流而难以控制住。因此朝见和问候的礼仪，不

能够足以使君主与臣僚彼此和睦。男子二十岁成年加戴礼帽以及婚配的礼仪,不能够足以端正男子和女子。祭祀的礼仪,不能够足以沟通鬼神。在乡办学校举行射箭比赛和聚会饮酒的礼仪,不能够足以使州乡的居民变得仁厚。设宴招待的礼仪,不能够足以使宾客感到欢乐。但是礼制的具体规定,又怎么可以就干脆废弃呢?

有具体规定却没有道义作主导,那么制定起礼仪来,就不能够足以随顺人们的情志。有道义作主导却没有具体的规定,那么制定起礼仪来,就不能够足以确立起名分。朝见和问候,在乡办学校聚会饮酒和举行射箭比赛活动,备酒设宴款待来宾,祭祀天地祖先和群神,男子二十岁成年加戴礼帽和男女到年龄成婚等方面的礼仪,与此相关的提高品级与减等处理,文采与质朴,高与低,广与狭,多与少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也就难怪在皇上圣明的策问中被提出来。臣下我则认为,礼制与法度的施行,要从贤明的人和尊贵的人那里做起。贤明的人属于古代的圣帝明王让他们给愚昧的人做出表率的人,尊贵的人属于古代的圣帝明王让他们给卑贱的人做出表率的人,一切制度规定都明摆在那里。在屋室方面,家庙各有各的座数,大堂各有各的长宽。在衣服方面,礼冠各有各的彩色丝带,丝带上的玉片各有各的寸距。在车辆和旗帜方面,旗帜各有各的旗边装饰物,车辆各有各的辆数。在器皿方面,进食所用的盛放干、稀食品的食器,飨宾和祭祀所用的酒器,数量各自有多又有少,用途各自有贵又有贱。尽管是这样,礼制规定对于全天下来说,又哪里仅仅是让那些还没达到要求的人确有提高,收敛起那股不平之气,归于约束当中,然后才认为收到实效了呢?礼制规定其实存在着把数量多列作尊贵的情况,把文采突出列作尊贵的情况,把所占空间大列作尊贵的情况,把所在位置高列作尊贵的情况,这都属于在内心以外的表面上的规定。同时存在着把数量少列作尊贵的情况,把质朴列作尊贵的情况,把所占空间小列作尊贵的情况,把所在位置低列作尊贵的情况,这都属于在内心里面的深层的规定。在内心里构成尊贵,在外观上造成和乐,数量少构成尊贵,数量多造成和美。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礼仪不能够多出来,所以就常常不丰盛;也不能缺少什么,所以就常常不减等。只在于恰

如其分罢了。

天下的人们接受教化，就会恭谨地对待名分地位；明了那道义，就会提高自己的品德。这恐怕正是在没发生动乱的时候就制定好大治的措施，在还没显现出来的时候就阻止住邪恶的原因吧？否则的话，礼制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那部分规定，正适合人们的欲望；礼制和日常生活联系不紧的那部分规定，正强调彰明自己的品德，返回到根本上来。肥美的肉制品和精美的米麦以及各种山珍海味与调味品，人们用来满足口感的享受。各种上等的香料，人们用来满足嗅觉的享受。各种精雕细刻的物品和花纹文采，人们用来满足视觉的享受。各种敲击、吹奏和弹拨的乐器和乐曲，人们用来满足听觉的享受。宽敞的屋室和柔软的车辆以及蒲草编成的坐垫和床上的铺设用品，人们用来满足身体舒适的需要。这些全都属于适合人们欲望的东西啊！圣人在这些方面去矫正上古时代粗陋朴野的生活方式，但却不能使后世不产生讲究文采的弊病。视觉对于色彩，听觉对于音声，嗅觉对于气味，口感对于美味佳肴，四肢对于安逸，并没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回归到礼制上来，把这作为仁德，那么，礼制中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那部分规定，就恰恰足以让人们蜕变成特别过分的淫靡举动，借用它形成欺诈虚伪罢了。像春秋鲁国大夫臧文仲给一只大龟盖房子，竟把柱上的斗拱雕成山形、梁上短柱画上藻草的僭越行为；像春秋齐国国相晏婴穿着洗过的衣服，戴着洗过的礼帽，去朝见国君的粗俗举动，哪能消除掉呢？所以圣人制定礼制，醇酒虽然香甜，但在祭祀时仍然崇尚白水代替的酒浆和夜间用铜盘承接的露水。花纹文采尽管华丽，但在祭祀时仍然崇尚不带任何色彩的粗布。用细软的小蒲草和竹子编成的坐垫尽管美观舒适，但在祭祀时仍然崇尚用普通蒲草和禾杆编成的草垫。经过雕刻、绘有图案的车辆尽管华美，但在举行丧礼时仍然崇尚涂满白土的车辆。因此礼制尽管标志着道德不如前代以及忠诚信实的愈益淡薄，但道德与忠诚信实终归还没沦丧，原因正是礼制实际上在宣明着它们啊！

礼制中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那部分规定，正适合人们的欲望，而人们欲望的适合，并未总是放纵起来，原因是礼制所崇尚的东西并

不集中在那些华美的方面而已。帝尧帝舜和夏商周三代，用法度去适应时世的需要，靠道义来兴行起礼制，也无法和上面所讲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只是各自在详略上不能完全一样罢了。因而臣下我曾经说过：大道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平稳状态，未曾有过弊端，但它必定会时而上升，时而下滑，原因是礼制和法度给造成的呀！时世并没有停止不前的状态，未曾有过弊端，但它会形成那一时，此一时，原因是社会风尚给造成的呀！跟在大道后面而发挥作用的东西，是那良善啊！保持住良善而实现大治的东西，是那法度啊！法度不一样，就形成那一时，此一时。时世不一样，就形成兴盛或衰败的社会风尚。社会风尚不一样，就形成崭新或陈旧的物体。物体的崭新与陈旧的状态，社会风尚的兴盛与衰败的情形，未尝有凝固不变的呀！那么，用法度适应时世的需要，靠道义兴行起礼制，又哪里具有绝对不可改变的结论呢？

所以隐遁在民间的圣人，有的特别清高，有的非常随和，用来矫正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补救那些弊病，于是就出现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位圣人的不同行为。身居统治地位的圣人，有的进行减损，有的进行增益，用来适应一个时期的社会风尚，补救那些弊病，于是就产生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武王的礼制。然而大道丧失主导地位以后，接着是讲求德，于是帝尧帝舜适应时世的需要，在讲求德上达到了最高境地，但没能够赢得光辉普照天下的“皇”的称号啊！德又失去主导地位以后，接着是讲求仁；仁又失去主导地位以后，接着是讲求义；义又失去主导地位以后，接着是讲求礼。于是夏商周三代适应时世的需要，在功业上达到了最高境地，但没能够赢得德如天地的“帝”的称号啊！大道、德业、功业，这都是圣人能够拥有的东西，但他们施用起来却各有侧重，是由于要约束住自己所面临的社会风尚才各有侧重的呀！皇、帝、王，这都是圣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他们赢得的称号却不一样，是由于要适应自己所处的时世的需要才不一样的呀！臣下我认为，存在着成功和美中不足的东西，是那法度。不存在成功和美中不足的东西，是那大道。在那不存在成功与美中不足的大道中，往里面灌注却总也满不了，往外面舀取却总也枯竭不了，各

种法度的创立，越费气力就越多，越借助它就越用不完。从唐尧以后，西周以后，在礼制的种类和名称上，简直多得数不过来。至于被礼制所局限住的人去施行它，不单单不能够实现大治，还必定要等上好几百年，他那智慧足以和礼制完全配备以后才会全部施行完。至于傅用大道，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而实现大治，那么，唐尧所成就的事业，西周所具备的规模，三皇中的伏羲在一天之内就能把它们陈列出来，为什么还一定要等待唐尧和西周呢？

臣下我认为，时世需要放在后面去做的事情，圣人不把它当成急务。世俗都厌恶的东西，圣人不把它看作自己该喜好的对象。因此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以上，他们的书籍命名为《三坟》，是专门讲论大道的。从唐尧虞舜以下，他们的书籍命名为《二典》，也就是《尧典》和《舜典》，是专门讲论通常性的道理的。然而通常性的道理的施用，又属于大道下滑的表现吧？否则的话，夏朝崇尚忠实和商朝崇尚质朴所产生的偏失，周朝用极其隆盛的文采去补救它们，大致是因为从夏朝、商朝的末期，仁和义都已经完全丧失掉了，这样一来，周朝补救它们的弊病的办法，恐怕就只有礼制了吧？把能体现仁的规定都用上，制定出礼制来；把能体现礼制的规定都用上，制定出法度来。辨别等级的礼仪和教导人们具有行为规范的法度，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最为详备。那么，大道下滑的势态，也就不足以感到奇怪了。后世难以治理，原因只在于人们对物品和自身看得太重。把自身看得太重，那就会超越礼制规定；把物品看得太重，那就会遍进天子的规格。永无止境的欲望，加上无法预测的变化，根本就不能稍略地抑制住。执行法度的官吏，在西周达到三百六十名，然后才不再增加，这哪里是它喜好这样完备呢？不过是出于礼制依据道义来兴起，法度按照时世的需要来推行罢了。

臣下我考察夏商周的隆盛治绩，递相崇尚忠实、质朴、文采，在治国指导方针上各不相同；使用的服饰、器物、官制，在法度上各不相同。但都从情志上前后沿袭，都从表面形式上彼此变革。朝见与问候频繁进行，备酒设宴款待宾客十分欢洽，祭祀非常虔诚，各国相互通婚而关系特别密切。皆大欢喜地有那恩德，致使彼此爱护；光彩夺目

地有那条文规定,致使前后承接。通过车马服饰来彰明它,通过音乐舞蹈来显扬它,通过《诗经》、《书经》等经典来光大它,通过色彩图案来昭明它。这就像那作为宇宙本原的元气散布开来,于是使万物花团锦簇而形成春天吧?在和美的气息中,发出声响或显出色彩的东西成千上万,会飞的动物任意翱翔,能奔跑的动物藏伏不动,会游水的动物跃出水面。它们各自进行各自的活动,彼此并不违逆;它们各自生长发育,彼此并不妨害,但却没有能知道自身为什么会这样的。在伏羲、神农、燧人这三皇治理天下的时代,对仁德和道义并没有摆在突出的位置,那时就如同元气涵化万物吧?帝尧帝舜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朝向了春天啊!陛下您在上面体悟大道,培养造就各种人才,对众多的政务进行承用与变革,教化的命令和刑法的禁阻,下面的人都去执行,上面的人都去部署,这就如同皇天的法则在四季中运作吧?天然就生长的生物让它们周而复始,枯萎的生物让它们重新茂盛起来,这就像春天的风雷啊!散落的生物让它们聚拢起来,开花的生物让它们结成果实,这就像秋天的霜露啊!准备与那具有生命的一切类属回归到淳厚状态,返还到本原,形成在太古时代遨游的情景,这固然是陛下您的志向所在啊!至于在屋室的规格上,器具服饰的使用上,成年加冠和男女婚配的仪节上,祭祀和待客的标准上,全都乱得一团糟,随便对付着做,不再有夏商周三代所遗留下来的法度,这种状况怎能指望陛下的志向得以实现呢?想到这一点,难怪皇上的圣明策问中把它提出来呀!

臣下我听说,不能拿礼制去适应时世的需要,贯彻它那法度也就获取不到功效;不能靠道义制定好礼制,贯彻它那法度也就没有大道在里面起作用。对礼仪乐舞,人们的情志反应都一样,圣明的帝王在这方面就前后承袭,懂得礼制存在着承袭前代的因素。但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所处的时代不同,也就不完全承袭前代的礼制,于是礼制就有减损和增益的地方。商朝承袭夏朝的礼制,但它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能够了解到的,这是因为它减损夏朝带有文采的那部分,同时增益了体现质朴的内容啊!周朝承袭商朝的礼制,但它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地方也是能够了解到的,这是因为它减损商朝

体现质朴的那部分,同时增益了带有文采的内容啊!取代周朝而兴起的王朝,哪怕是上百个,也是能够了解到它们怎样承袭又如何加以减损和增益的。因为注重文采出现了弊病,就用质朴去补救它;注重质朴出现了弊病,就用文采去补救它。文采和质朴轮番取代而归于恰如其分,这即使是上百个王朝也没有哪一个能够改变的呀!虚伪属于注重文采所造成的过错,粗野属于注重质朴所造成的过错,在周朝注重文采的过错之后,必定要在质朴上花气力,加以补救,这大概是孔子希望选用那首先学习好礼乐的人的原因吧?孔子主张治理国家,就要在历法上只应使用夏历,在车辆上只应使用商朝的规制,在服饰上只应使用周朝的形制,在乐舞上只应使用帝舜的《韶舞》。郑国的乐曲淫靡放荡,不是能够切合人们欲望的东西。注重文采所造成的弊端在世俗那里蔓延,全都沉溺在这上面。乐舞只有使用帝舜的《韶舞》,然后郑国的乐曲才能够排斥掉。

自从秦朝取代周朝,对礼制包纳人们的情志不能够有所承袭,竟然去扩充法度,使天下处在残酷暴虐之下。对礼制的文采部分不能够有所减损,竟然奢侈到极点,满足个人的一切欲望。不能凭借明智亮出道义,通过道义昭明德业;也不能凭借仁爱亮出礼制,通过礼制昭明名分。光是随意用那套刑法去箝制天下,而礼制中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那部分又跟在刑法后面加以充实,古代同日常生活联系不紧、施行起来又很困难的那部分却全都废弃掉而不采用,于是致使天下的社会风尚蜕变成特别过分的淫靡举动,借用它形成欺诈虚伪。淫靡放荡地沉迷在郑国那样的乐曲中,结果就差不多都变成花言巧语来献媚的人。这样一来,治理天下就恰恰足以造成祸乱,又哪能区分出上下等级关系,约束住百姓的思想,使人人恭恭敬敬,节制自身的行为,欢快愉悦,相互沟通,共同去拥戴自己的君主呢?至于王侯却乘坐牛车,普通老百姓反倒住在王侯才有资格住的宅第中,贫困的人家因为生活接济不上而废弃了礼仪,富有的人家因为家有余财而超过了制度规定,在屋室的规格上,服饰器具的使用上,成年加冠和男女婚配的仪节上,祭祀和待客的标准上,全都乱得一团糟,随便对付着做,并不足以让人感到太奇怪啊!

西汉文帝喜好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认为纷繁的礼仪只是在外表上装样子，对治理天下没有什么补益，就全都罢废不用，专门在朴素上用气力。然而文帝哪能对周朝的弊病引为鉴戒才这样干的呢？其实是正赶上他所喜好的东西，恰巧和孔老夫子对取代周朝而兴起的王朝应该如何办的主旨相接近。因而他所宠幸的人能够穿上帝王的服装，歌女可以戴上皇后的饰物。卖身给人家的年轻奴仆、婢女和姬妾，富豪与大商人，全都得以超越礼制规定，但国家却控制不了。这也正是文帝不能靠道义制定好礼制的过失啊！哎呀呀！文帝最害怕听那些非常高远的议论，而张释之也只能对他讲一讲秦汉之际的事体，就算到头了。唐太宗喜好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乐舞，但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却回答不上来。所以这两位君主制定礼制，沿袭秦朝的旧礼作为汉朝的新礼，沿袭隋朝的旧礼作为唐朝的新礼，而他们的治绩，到最后同夏商周三代相比，显然有愧，致使夏商周三代的从根本到细节的一整套礼制，在好几千年间寂寥无闻，没有能够振兴起它们的人，这太让人感到痛惜了。陛下您慷慨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立有志向，打算让贫穷的人家不至于废弃掉礼仪，叫富有的人家不至于凌犯道义，讲求文采不至于陷入粗野，达到文采和质朴恰如其分的境地。这不单单当今天下和后世蒙受到恩赐啊，礼乐教化本身不也是太幸运了吗？

臣下我听说，具有那仁德但没取得那最高地位，就不敢创制礼仪和乐舞，因为他没有推行礼仪和乐舞的权力啊！取得那最高地位却不具备那仁德，也不敢创制礼仪和乐舞，因为他没有定立礼仪和乐舞的基准啊！如今陛下您论尊贵，身为天子，掌有那权力了；论仁德，又身为圣人，拥有那基准了。这还畏惧什么而不去大干一番呢？然而不能随顺世俗人情，礼制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从；不能制约世俗人情，人们就会失去礼制。礼制失去人们的信从，也就没有情志上的反应了，人们失去礼制，也就没有名分可言了。陛下强调靠道义制定好礼制，而臣下我却讲明随顺世俗人情和制约世俗人情的道理所在罢了。

寒冷温暖、干燥潮湿，这在气候上并不一样。坚硬柔软、轻微沉

重,这在体积和分量上并不一样。器械在形制上各不相同,衣服在该穿什么上也不相同,饮食在怎样调剂上仍不相同。这是皇天规定的道理而使它们存在差异的现象,也是世俗人情习惯了的东西,更是古代的圣帝明王所随顺的事情。巧言诡辩,歪曲法律条文来替罪犯开脱,收取好处;擅自改变官名和事物名称,用歪门邪道破坏政治;传播淫荡的乐舞,穿戴奇装异服,耍弄奇特的技艺,出售颜色不纯正的物品;行为虚假却拒不悔改,言谈虚假却强词夺理,研习有害的图籍又非常广博,顺从坏人坏事又给它们涂脂抹粉。所有这一切,都在大众那里蛊惑人心。祭祀用的圭璧和金质璋瓒,华美的丝织品和珍珠玉石,有的不符合尺寸,有的不符合长宽,有的不符合大小,有的不符合标准,却都在社会上行用。以上所讲的这些表现形式,都是由人乱干一气而使它们产生差异的现象,也是世俗人情所忌恨的东西,更是古代的圣帝明王所禁止的对象。随顺世俗人情所习惯了的东西,却不去禁止那些由人乱干一气而使它们产生差异的现象,天下人就会思想与物品融为一体,志在追逐,只管谋利,如同那新生下来的小牛犊,疯狂地四处乱奔,不知道究竟该奔到哪里。这样一来,即使凭仗道义宣明法度,通过具体规定确立起名份,叫人们收敛起放肆的行为,归入到受约束的范围里去,也已经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因此西周的大司徒向民众施布十二种教化,其中用来随顺世俗人情的有一条,用来制约世俗人情的有四条。西周的大宰运用八种通则来管理京师直辖地区。其中第五种规定:用礼制来驾驭众百姓,这就属于制约世俗人情的一面啊!用风俗习惯来驾驭众百姓,这就属于随顺世俗人情的一面啊!圣人只有依凭大道来亮出法度,依凭仁德来支配行为,然后才能构成随顺世俗人情而与它保持一致,才能构成制约世俗人情而与它保持对立。随顺世俗人情而与它保持一致,就能使人们欢快愉悦,相互沟通。制约世俗人情而与它保持对立,就能使人们恭恭敬敬,节制自身的行为。礼制中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的那部分,使人们懂得该去崇尚,就能够昭明仁德,返回到本原,而不沉溺在忠诚信实愈益淡薄、道德往下滑落的状态中,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就可以一直沿续下去了。这是臣下我为皇上所做的谋划呀!〔杨寄林译〕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

省试试题　经义

惟几惟康其弼直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

张庭坚　省试卷二道

张庭坚(生卒年不详)　字才叔,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县)人。元祐六年(1091)进士第三。徽宗时擢为右正言,屡言司马光等臣之贤,又荐苏轼、苏辙可任用,且不附奸相蔡京,遂被列入元祐党人籍,连遭贬谪,年五十七卒。其省试时所撰两篇经义,被后世誉为不可磨灭之文,从中适可看出宋代经义的体式,实开明清会试八股文之先声,故特予载录。

惟几惟康其弼直

所贵乎圣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虑之深远,察微正始,忧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与勇,足以大有为于世,而以其安静休息,有所不为。非以其无一过失,使天下莫得而议之,以其有过而必改。故于事也,无忽于民也,不扰于群臣也,不惮其危言正论以拂于己。夫是以虑无遗策,举世无过事,而天下治安之势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几康弼直,禹之所以为舜戒也。盖惟几也,则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则能安静休息,不扰乎民。惟辅弼之臣直,则能不以无过之为美,而以改过之为善。凡忠谠之论,矫拂之辞,皆所以乐从而愿听焉。

虽然,是三者在艰难创业之时则固未始以为难,海宇适平,基绪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则祸患将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虑

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几者，势使然也。民虽出于涂炭，而恐惧之未忘；世虽偃于征诛，而疮痍之未瘳。俄然扰动而不之恤，则下不胜其困怨，乱将复作。所以设法务约，敷政务宽，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势使然也。夫欲事之适于几，民之适于康，则天下之深谋至计，惟恐一日而不得闻；朝廷之上，辅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势不得不然也。

天下既大治矣，则智虑怠而昏，心意侈而广。智虑昏，则玩宴安而忽忧勤；心意广，则喜功名而烦兴作。夫宴安之是玩，则不可责以难也；功名之是喜，则不可语以过也。于是谄谀者亲，而谏诤者疏。几康弼直之戒，于是时最不可忘。彼舜也，继尧极治之后，天下可谓无事矣。虽然，无事者，有事之所从起，而圣人之所深畏者也。观舜之君臣相与赓歌规戒，而其言及于敕天命，康庶事，则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犹戒之，何也？使天下后世咸曰：以舜之圣而犹不免于此，则庶乎其能知戒矣。

对圣人来说引以为贵的东西，并不是凭借他那威力足够用来消除掉天下已经来到的祸患，而是凭借他那谋虑深沉长远，察知苗头，端正初始，担心祸患所没有想到的地方。并不是凭借他具有智慧和勇气，足够用来在当今时代大有作为，而是凭借他安宁清静，让百姓休养生息，有所不为。并不是凭借他没有一样过失，致使天下没办法能议论自己，而是凭借他出现过失就一定改正。所以在政事上，对民众不忽略，对群臣不搅扰，不害怕他们严正的言论同自己不合拍。因而谋虑就没有遗漏下的计策，在整个执政期间没有失误的政事，而天下大治安定的形势得以永久保持而不改变。这正是大禹用思考细微的情状、安康和辅臣正直来为帝舜做告诫的原因啊！由于只有思考细微的情状，才能够察知苗头，端正初始，不忽略政事；只有思考安康，才能够安宁清静，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搅扰民众；只有辅佐的大臣很正直，才能够不把没过失当成美事，而把改正过失当成好事。只要是忠正爽直的言论，过激和违逆的言词，全都用来乐意依从又愿意采纳。

尽管是这样，以上三个方面在艰难创业的时候固然未尝把它们看成是难做到的事情，但天下恰恰平安了，基业正奠立起来，转瞬间又懈怠忽略而不明察，祸患就将会极其迅速地降临。所以操持心志经常感到危险，忧虑祸患总是很深，而政事每每不失去那苗头，这正是情势使它这样的。老百姓尽管从深重的苦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恐惧还没忘掉；社会上尽管平息了战争，但创伤还没医治好。转瞬间又搅扰掀动而不体恤，下面就承受不了那困顿怨恨，动乱将会又起来。所以设立法度务必要简明，施布政事务必要宽和，而使民众不失去那安康，也是情势使它这样的。希望政事与那细微的情状相切合，老百姓与那安康的状态相切合，天下的深远谋略和最高明的计策，也就唯恐每天却听不到；在朝廷上，辅佐的大臣也就没有谁却不正直得多有责难。这也是那情势不得不形成这样的。

天下已经大治了，就容易智虑懈怠又昏乱，心意膨胀又扩大。智虑一昏乱，就沉溺在安乐中而忽略忧思精勤；心意一扩大，就喜好功业与名声而采取各种人为的举措。只管沉溺在安乐中，就不准人们再用诘难去责备了；只管喜好功业与名声，就不准人们再拿过失去劝告了。于是阿谀奉承的人得到亲近，而规谏争执的人受到疏远。有关思考细微的情状、安康和辅臣正直的诚语，在这个时候最不能忘记。那位帝舜，承接在帝尧治理达到顶点的后面，天下可以称得上太平无事了。尽管如此，但太平无事却正是天下有事的起因，是圣人深深畏惧的事情。观看帝舜的君臣们相互一个接一个咏唱诗歌，规正劝诫，而他们又讲到对天命要慎重对待，使各种政事保持安定，那么，大禹所说的那三方面的事情，帝舜原本上不用等他告诫就早已了解了，可是大禹还去告诫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使天下后世全都说：凭借帝舜的圣明，仍然在这上面不能完全避免掉，也就差不多表明帝王能够懂得告诫了。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一身。故其死者

非沽名，其生者非惧祸，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义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为之奴，而皆无愧于宗庙社稷，岂非谋出于此欤？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盖于是时，纣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飞廉、恶来者，皆道王为不善，而不与图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谓至贤者，则洁身退避而义不与俱亡。夫为商之大臣，而且于王为亲，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视其败，则不忍；欲进而与王图存，则不可与言。虽有忠孝诚悫之心，其谁达之哉？顾思先王创业垂统，以遗其子孙；设为职业禄位，以处天下之贤俊，俾相与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于危亡而后已。子孙弗率，亡形既见，而忠臣义士之徒，犹不忘先王所以为天下后世之意，以为志不上达，道与时废，乱者弗可治也，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报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献可也。

虽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当于义，不获罪于先王，非人所能为之谋，其在于自靖乎！盖若商祀之颠陊，则微子以为心忧而辱于臣仆，不与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为也。微子抱祭器适周以请后，则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谏不从，故继以死，则事君之节尽矣。箕子以父师为囚奴，犹眷眷不去，则爱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辄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为愧人，更相劝勉，以求合于义，而不期于必同。

夫谓先王所以望于后世臣子者，惟忠与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献以其孝；比干以谏死，箕子以正囚，则自献以其忠，则是三子之心，非苟为也。处垂亡之地，犹眷眷乎天下国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谋，各出其所欲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谓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谓乎？虽然，《书》载微子与箕子相告诫之辞，而比干不与焉，何哉？人臣之义，莫易明于死节，莫难明于去国，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难辨者也。比干以死无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义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并称三仁哉？

君子离去还是赴就，死去还是存活，他们的心志都在于天下和国

家,并不在于自身一个人。所以那种死去的人并不是骗取名声,那种存活的人并不是惧怕祸难,而那种引身谋求离去的人,也不是追逐私利来忘掉国君啊!仁德所存在的地方,正义所支配的东西,鬼神是知晓的了。从前商代被孔子盛称的“三仁”,有的存活下来,有的死去了,有的变成了奴隶,但都对王朝和国家没有愧疚的地方,难道谋划不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吗?这正是他们互相告诫的话语说:“自己感到心安理得,每个人自行向先王献呈道义。”因为在这个时候,纣王正向灭亡在靠近却没觉悟到,他手下的宠臣像飞廉、恶来这号人,全都诱导纣王干那不良善的勾当,而不同他谋求王朝存在下去。像伯夷、姜太公这类人,在全天下可以称得上是最贤明的人,他们干脆保持自己的清白,退隐躲避,而不与纣王一起灭亡。作为商朝的大臣,而且同纣王构成亲属,只有王室的子孙比干、箕子和微子啊!这三个人打算退隐而眼看着纣王败亡,却不忍心;打算挺身而出,与纣王谋求王朝存在下去,却没办法与纣王谈得拢。尽管具有忠实孝敬和诚恳真切的心念,又能向谁表达呢?然而想到先王创立基业,垂示统系,用来留赠给自家的子孙;设立起职官本业和俸禄爵位,用来安置天下的贤才,使他们一起处在国君的左右而扶持他,希望不达到危亡的境地,然后也就可以了。可是自家子孙却不照先王的意愿去做,灭亡的形迹已经显现出来,而忠臣义士这批人,仍然忘不掉先王用来为天下后世做打算的深意,认为心志不能够宣达到上面,大道与时世一起废弃,动乱的局面没办法再整治了,倾覆的国君没办法再支撑住他了,而臣子用来报答先王的做法,只有各自凭借本人能做到的事情自行献呈,也就可以了。

尽管是这样,君子的心志并不相同,而打算死去还是存活下来,离去还是赴就,各自都符合正义,不在先王那里获得罪过,并不是别人能够替他谋划的,恐怕只在于自己感到心安理得吧?像商朝的命脉眼看被断绝,微子把这看成是内心忧虑的事情,宁愿在周王朝那里忍受甘当臣子奴仆的屈辱,也不与自己的国君一起灭亡,这种做法是箕子、比干感到羞辱而不干的。微子抱持国家的祭祀器具来到周王室,请求商朝后代的封国,这样一来,奉守祖先的那种孝道就获取到了。

比干劝谏纣王却不听从，所以接下来就死去，这样一来，事奉国君的那种节操就完全献出来了。箕子凭借父师的身份却去成为被囚禁起来的奴隶，仍然一心一意而不离去，这样一来，爱护国君的仁德就达到极点了。他们中死去的人好像挺愚蠢，他们中成为囚徒的人好像很污浊，而他们中径自离去的人好像是背叛而不忠诚，然而这三个人全都心安理得地去实行，不把做不到的事情看作是自我惭愧，也不把做到的事情看作是愧对别人，递相劝勉，用来谋求符合正义，而不期望一定要做法相同。

讲论起来，先王用来对后世臣子寄予希望的东西，只是忠诚与孝敬啊！所以微子的离去举动，是用他那孝敬来自行献呈；比干通过劝谏而死去，箕子凭仗纯正而成为囚徒，他们是用忠诚来自行献呈；这样一来，这三个人的心志，并不是随便去动用的。处在眼看就灭亡的境地，仍旧牢牢不忘天下国家，并不在于自己一个人，所以他们的心志所筹谋的，各自出于本人所想做的事情，用来期望先王能知晓罢了。古代所讲的明明白白地不期瞒自己心志的人，说的竟还不是这三个人吗？尽管这样，《尚书》中记载微子与箕子互相告诫的话语，而比干却没包括在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别人臣子的合适做法，没有什么能比为节义而死更容易辨明的了，也没有什么能比离开国家更难辨明的了，而屈辱隐蔽起形迹来，也是很难辨明的呀！比干通过死去表明自己，就不值得再怀疑了，所以不必来告诉世人他怎么样，而箕子、微子免不了要记载他们如何如何，这是看重离去还是赴就的合适做法，并且赞许他们啊！否则的话，怎么能够合称为殷末三仁呢？〔杨寄林译〕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戊申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逾年于兹，寝兴在是。故府库殚匮，军费倍滋，而赋敛加薄；外患未弭，寇盗尚多，而追胥有程。择守令以厚牧养，责按廉以戢贪暴。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恶者，朕有弗闻，未有闻而不恤，恤而不行也。

然而迎亲之使，接武在道，而敌情未孚；保国之谋，刻意在兵，而军势未张。躬纯俭以厚本，而骄侈之习未悛；扩大公以示训，而私枉之俗尚胜。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迷之心。田亩未安，旱蝗害岁。岂朕不德，无以动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为病乎？何精诚之弗效，而祸患之难戡也。伊欲复亲族，奠疆埸，清寇攘，善风俗，使百姓安业而亹亹迈衡，何修而可以臻此？

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诚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其悉言之毋隐。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非朕之所欲闻也。其以朕所未闻而宜于时者言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闻听治国之道以皇天为转移，而皇天的法则又以天底下的众百姓为转移，所以在察视与听闻、依从和回绝上，不把事先进行算卦和占测放在第一位，而是只察看众百姓的反映如何做出决定来，把那最真诚的用心保持不变，就没有任何目的地到达不了的。古代的圣帝明王治理国家，无不遵循这一法则啊！皇帝我在天下动荡不安、形势极其危险的后面承继起国家命运的重托，又在民心离散、势单力孤的时候怀揣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一有想法，就必定是安抚民众来顺从皇天，希望做到悔痛祸乱，平定国难，到

现在已经两年时间了，每天从早到晚全都集中在这桩大事上。因而朝廷府库匮乏空虚，军费支出却成倍增长，但对百姓的赋税征收仍然尽量减轻。金国入侵的祸患尚未消除，各地的盗贼依旧很多，但向百姓催交赋税却有限制。选用太守县令，来加强对地方民众的宽厚管理与养育；责成监察官员，来制止住地方官吏贪婪残暴的行径。朝廷的命令专门为百姓而下达的，常占十分之六七。凡属人们所讲的凝聚起百姓所希望的东西，去除掉百姓所痛恨的东西，皇帝我没有听到，那算另一码事，但却不存在听到后而不加以体恤、加以体恤而不落实的情况啊！

然而前去金国接回皇室亲属的使者，在路上后脚跟前脚地一个接一个，但敌人心里就是不顺从。保住国家的谋略，特别用心地投注在军队上，可军队的威力却没有发挥出来。皇帝我亲身在节俭上做出表率，用来巩固住根本，可世上骄逸奢侈的恶习仍未得到改正。在一切事情都实行公正的原则方面，皇帝我大力加以扩展，用来做出训导，可人们却按私情来曲意处理的习气仍占上风。刑罚和封赏不足以把苟且怠惰的风气振作起来，明令训诫不足以把狂荡迷乱的心念革除掉。农业生产还没有稳定下来，旱灾蝗灾伤害每年的收成。所有这一切，恐怕是皇帝我不具备仁德，没办法去感动皇天造成的吧？或许是政令不恰当，民众感到很痛苦而造成的吧？为什么皇帝我那样地精诚却收不到效果，祸患又难以平定呢？准备把皇室亲属从金国接回来，确定下国家的边界，清除盗贼的捣乱，使社会风尚变美好，让百姓安居乐业而美满地迎来那太平的政局，究竟该修明哪些要务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呢？

你们这些读书人一路上历经艰难险阻，前来应合朝廷广泛延揽英才的意愿，确实也太辛苦了。你们一定怀有想为皇帝我陈述的最为恰切的主张和意见，只管全部讲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至于炫耀空洞的议论却对实际没有补益，只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指责却对目前没有补益，这可不是皇帝我打算听到的东西。你们要陈述皇帝我从来没有闻听过并且又适合当前需要的意见，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胡铨　廷对策

胡铨(1102～1180)　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赴淮海(今江苏扬州)应试,其殿试对策被高宗视为奇异,欲擢为状元,但因是科高宗改变前十名先纳试卷、由御前定高下的旧例,悉付主考官拟名次,而主考官忌其对策切直,遂移置第五名。唯其切直,《宋史》本传亦予节录,等于承认这属于不是状元卷的状元卷。胡氏时年27岁,后任枢密院编修官,力斥和议,乞斩奸相秦桧等三人之首,名振朝野,亦遭秦桧报复,连被罢官谪斥。孝宗朝仕至兵部侍郎。其以赈灾为急务,以议和为阙政。有《澹庵集》等著作传世。

臣对:臣闻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天。汤、武听于民,其兴也勃焉;桀、纣听于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纣之未亡也,谓己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为真可恃,偃然自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及其亡也,诸侯归商者三千,资以胜夏,则成汤以兴;诸侯归周者八百,资以胜商,则武王以兴。夫汤、武听于民,而反以兴,非民兴之也,修人事以应天,是以兴。桀、纣听于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于人,是以亡。兴亡之端,厥监在民而不在天,甚易晓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不悟也。

陛下起干戈锋镝之间,适丁天下倥偬不暇给之秋,外乱内讧,憸人柄朝,边方有风尘之虞,中原有新羁之马,赤子人无知之俗。民愁盗起,祸稔萧墙,王室摇摇然,几如一发引千钧。当此之时,可谓乱甚矣。臣愚,谓陛下宜焦心尝胆听于民之时也。而陛下策臣等数十条,大概质之于天。首曰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又曰岂朕不德,无以动天?又曰何精诚之弗效,祸乱之难戡也?似皆听于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愿为陛下直言无讳也。

伏读圣策曰: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

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臣有以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臣谨按《春秋》祸变之由,与祖宗已然之故事,为陛下陈之。

为《春秋》之说者曰:"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此汉儒傅会之论,谓不然。臣闻圣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为万代训,未尝有明言天者。盖谓天道难测,若深言之,则遂以为茫昧莫究而忽于天,若浅言之,则天下后世遂溺于阴阳灾异而惑于天。圣人推变于天,常与人事杂而书之。至其变见祸败,或应于数十年之后,甚则或不旋踵而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改悔,覆败乃至。苟无其事,变不虚生。若痛自惕惧,侧身修行,则祸灾灭塞,可转为福。此《春秋》之大凡也。以此知天心之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诚,而不及于算数占候,诚知夫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我国家自江南平定,太祖感宇县分割,生民受弊,涕下恻然,思布声教,以抚养之。是时识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且如择一法官,细事也,而太祖择王济则曰:无或有冤滥,以致天下灾。任一宪台,细事也,而真宗选诸道提点刑狱则曰:一夫受冤,即有灾沴。夫一夫受冤,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动念,惧致天罚,则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陛下龙飞之初,传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响应。臣虽不识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来圣虑渐解,浸不克终,国势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无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测,可胜寒心!愿陛下持以至诚,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无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圣策曰: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或悔祸以靖乱,逾年于兹,寝兴在是。兹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呜呼!陛下兴言及此,亦知有宗庙社稷之托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忧乎?知有宗庙社稷之托,所与任其托者为谁?知有父母兄弟之忧,所以分其忧者为谁?任其托,分其忧,一非其人,则天下之大势无复救矣。臣闻天下大器,得之甚

难,败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艰难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孙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于百年,而覆坠于一日,遂使祖宗艰难之业并与宗庙社稷,一旦成墟。是以圣人作《春秋》,于乱君亡国,痛以王法绳之。

谨按昭二十二年书:王室乱,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是时新有景王之难,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刘、单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赘斿,则王室安得不乱?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乱,而播迁于皇,则俶扰阽危亦甚矣。卒至天王播奔,避子朝之难,终昭公之世,仅复成周,至黄池之会,而天下奔溃。圣人独反复书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单微幼冲之资,独戡多难,则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俭佞而佐大计,则庸如刘、单。臣恐王室之乱,又甚于子朝之难矣。安知江都之幸,不变为狄泉之胁迫乎?是陛下知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后,而未知荆卿何罗窃发于肘腋之间。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监《春秋》王室之祸而慎守之,毋谓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而遂解体也。

谨按襄二十八年书曰:公如楚。二十九年书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窃原公如晋、如齐、如京师,皆未尝书"在",独于楚书"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国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逾年不反,祸且不测,书曰"在楚"者,盖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两宫有沙漠之狩,孰与"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归,《春秋》深危之。况两宫暴露于穹庐,三年于此矣。则陛下怀父母兄弟之忧,臣愚不知何以处之。为陛下之计者,独不念在楚之事乎?臣愿慎择贤佐,惟断惟果,侧身忧灾如宣王,厉精综核如孝宣,锄去乱略如光武,刚明果断如宪宗,复仇刷耻如勾践。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首策以此,中则曰: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而赋敛加薄;外患未弭,寇盗尚多,而追胥有程。择守令以厚牧养,责按廉以戢贪暴。命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恶者,朕有未闻,未有闻而不恤,恤而不行也。此又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臣闻治天下者,正如疗疾。方天下之受病也,府库单匮,军费倍滋,则病在血脉矣;外患未弭,寇盗尚多,则病在肠胃矣。客邪干正矣,择守令以厚牧

养，正犹导之以汤液醪醴而助真气也；责按廉以戢贪暴，正犹投之以砭剂而攻强肠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肠胃又受病，而导之以汤液醪醴者，或失节焉，则疾益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剂，又非良焉，祇速其死耳。医国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际，府库竭矣，军费滋矣，外患炽矣，寇盗多矣，乃牧之以不贤之守令，扰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犹疾已深而投之以野葛，岂不殆哉！臣请历言其弊。

臣闻府库单匮，军费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师老而费时也，以生事而食众也。三者今之最大弊也。自古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其势然也。昔汉之兵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京师亦不过南北、期门、羽林之兵而止。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事已辄罢。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尝聚也。唐置十六卫，无事则力耕而积粟，非但自赡，且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其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尝无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养兵之法，中下一兵，衣粮给与，岁约五六十缗。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十有二万而已；至乾德间，中外止十万兵耳。太宗尽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十余万。真宗当全盛之时，乃始五十余万。当时军数非多，尚虑耗蠹调度，命汰疲冗。周莹不奉减兵之诏，则怒而罢之。向敏中奏军额渐多，则反复诘难之。诚知夫兵无事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以日计之，费已如此，况今旷日弥年，兵拏不解，百人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概虽数百为辈，要归则无异于数十万之兵，而坐食连年，无毫发功，则农夫之力，安得不困？馈饷之卒，安得不疲？

谨按庄公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春秋》书用兵，未有历三时而后反者，独于此书春、书夏、书秋，恶庄公无故劳师，兴围郕之役，卒之郕降于齐，而鲁师无功，比秋乃还。故书曰"师还"者，恶其夏已无功，秋始班师，暴露滞留之甚。是后二十八年，有告籴之举，其祸正基于围郕之役矣。以今征役之久，动至累年，校之《春秋》三时而反者，不已太甚乎？则府库竭而军费滋，自不足怪。臣故曰师老而费财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师老而费财，加

以生寡食众，人少用多，陛下虽赋欲加薄，而州县之追科实烦。何则？用度既匮，则其势不得不取于民矣。

臣前所谓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盗贼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过，生灵多怨。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则外患、寇盗亦何名而动哉？盖自古奸雄，如陈涉、吴广之起于秦，赤眉、黄巾之起于汉，苏峻之乱晋，安史之乱唐，本皆巨盗凶渠，伺朝廷之过，执以为辞，幸生灵之怨，唱而称义，遂至迭起州县，劫令杀守，相挺为乱。今明盛之朝，岂有大过！窃闻长老之谈，或谓戚近挠权，奸臣盗柄，刑赏不必行，小人不尽除，纲纪不甚振。此岂过之渐邪！何则？自古乱天下国家，多自戚近挠权。如汉之诸吕、窦、霍，唐之诸武、韦、张，窃弄朝柄，一败赤族，国家俱破。今乃有肺腑领枢柄，戚属将卫兵。汉南北军之祸，其监不远。倘不少戢，是增朝廷之过，而起奸雄之胆。大乱之后，岂宜复然？晋赵王伦、石勒之徒，心窥人主，口责宰相，实奸雄伺过而后动。不幸因之以饥馑，加之以灾荒，生民愁苦无聊，则奸人乘隙奋飞血，视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盗所以尚多。是虽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乱！

谨按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蔡般，弑逆之贼，王诛之所必加，《春秋》反恶楚灵，何也？曰讨蔡般可矣，诱而讨之，此匹夫之贼行，《春秋》所甚恶也。前日下诏书，招纳叛亡，许以不死。此辈皆投戈请命，谓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阳示以信，阴加以刑，是诱讨也。陛下为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臣恐大信一失，则后来以招降为悔，自今上下猜忌，如寇仇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何怪乎寇盗之未弭也！

臣前所谓择守令以厚牧养，而守令多不贤者，朝廷轻守令也。责按廉以戢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轻按廉也。守令一不贤，则郡县受祸；按廉一不才，则守令敢于为奸。故择守令在择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尝亲选诸州长吏，又亲书其历，戒曰：公务刑政，惠爱临民，奉法除奸，方可书为劳绩。因顾钱若水曰：朕暑中书此，岂不劳乎？盖为任官择人，以安百姓耳。呜呼！太宗不惮盛暑而亲札赐行，今守令则未尝有召对者。太宗躬自选择而延见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拟者。是朝廷轻守令也。朝廷轻守

令，则守令轻郡县。郡县之职一轻，则牧养之方尽废。使要近州县或非其人，彼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惮不敢逞。若远方细民，虽使盗跖为之守，梼杌、饕餮为之令，斯民虽千百为辈，号呼聚骂，朝廷不知，其为害岂不大哉？臣闻太祖以钱文敏知泸州，戒之曰：比闻郭思齐掊敛不法，恃其暇远，谓朝廷不知耳。至则为朕鞫之。夫泸州去京师四千余里，而郭思齐不法，太祖已尽知之。今州县稍远者，其守令过失，朝廷乃不闻，则远如泸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惮而不为盗耶？然则所赖以纠察其弊者，尚赖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则其祸可胜言哉？

臣闻太祖以按廉之职，出为朝廷耳目，或由圣选，或命举充。选之既难，责之亦重。凡宽一按廉，是坏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数百万军民受殃。自太宗即位，厉精求理，诏转运使考核职任之废举，又遣使察廉官吏之污洁。如刘文质察举部内官吏，则有迁移之宠。如王德裔部内不治，则有黜爵之罚。赏罚如此其严，则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则守令振职。厥今守令不职，是按廉未得人也。往者遣使抚谕诸道，天下想望风采，以为行被大惠，卒之厨传骚然，公行贿赂，甚者责子女于郡县，辇家属以偕行。虽官以抚谕为名，而民有供输之苦。守令之外，复增一蠹。夫远方细民，不幸遭不贤守宰，终岁抱冤，引领辕轩之出，以雪其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终身怀冤而莫之控诉也，则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动？此奸雄所以窃发也。

谨按《春秋》闵元年，齐仲孙来。圣人嘉而字之，重其将命从宜，以安邻国之难。方闵之初，叔牙、庆父媒孽鲁祸。闵公始立，国人危如赘旒，齐人可箠取之。当是时，鲁之轻重在齐，仲孙乃能说其君务宁鲁难，卒使闵不失国，而鲁人以安，湫之力也。经书仲孙之来，喜其一出而民安存鲁也。以今两河淮甸兵革之余，岂不甚于鲁国之难？而按廉之出，未闻如仲孙以务宁鲁难为怀者。以《春秋》之法责之，则罪人矣。臣故曰守令不职，是按廉未得人也。

夫以守令既不职，而按廉又失职如此，则陛下命令为民而下，虽十常六七，而壅遏诏书者，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诏，无及民之惠。州县知有守牧之令，不闻有天子之诏。三数年来，边防用兵，凡

百科敛,不以四方有无物之处,但严令督之。近海州军,例科枪觜,居山州县,则买鹅翎。有司既不辨有无,州县或罕能条奏。官取一物,民费数倍。且如前日劝诱一事,监司责办于郡,郡责办于县,县移文于乡。假军期急速为名,迫若星火,小有不至,则械系苦掠,人皆畏死,其敢有辞。是名为劝诱而实暴敛之。监司郡守,但务上供,以悦朝廷,则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务足用,以悦陛下,则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穷无诉。是陛下恤民之诏虽多于孝文,而天下干耗乃甚于孝武,伤和召怨,咎将谁归?

臣闻咸平中,议改元赦书,颇多蠲免,或谓三司必以惠泽太广为言。真宗责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赐矣。时方午,雷震。帝恻然曰:岂赦令少及民之惠,上天以雷警朕邪?呜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惧速天罚,则陛下命令多壅,实悖天心,其害殆不为细。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不以草茅之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迎亲之使,接武在道,而敌情未孚;保国之谋,刻意在兵,而军势未张。躬纯俭以敦本,而骄侈之习未悛;扩大公以示训,而私枉之俗尚胜。刑赏不足以振偷惰之气,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亩未安,旱蝗害岁。岂朕不德,无以动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为病乎?何精诚之弗效,而祸乱之难戢也?此又见陛下听于天而不听于民之弊也。臣谓陛下躬纯俭而骄奢弗悛者,是陛下未必纯俭也。扩大公而私枉尚胜者,是大公未必能扩也。赏罚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乱之兆也。田亩未安而旱蝗害岁,则生民失职而怨沴并作也。若乃遣迎亲之使而敌情未孚,则臣窃有说焉。

臣闻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萧英、刘六符来聘。是时使来非时,而兵既压境,中外忿怨。仁宗皇帝命宰相择所以报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谋,卒挫虏主。自景德以来,北方无事八十余年于此矣,岂惟弼之力哉?是时宰相则晏殊,参政则范仲淹,枢密则杜衍、韩琦,谏官则余靖、欧阳修,皆天下之所仰望而北虏之所畏惮者。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计得而虏计不得逞。以今庙堂之上宰相,

有如晏殊者乎?参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枢密有如杜衍、韩琦者乎?谏臣有如余靖、欧阳修者乎?臣知陛下必无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敌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

臣闻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使弃爪牙,则孤豚特犊皆得搏噬。譬之国无劲兵,则蕞尔丑虏皆为劲敌。故《春秋》虽恶穷兵之祸,至于兵不素养而取具临时者,又深罪之。谨按僖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师,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者曰,乞,重辞也,重师也。臣谓圣人非唯意在于重师,盖其恶鲁之无□也。夫齐为鲁难久矣,自鼸瓶之役,齐败于宋而鲁不救,是时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结矣。为鲁计者,正宜早夜预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卧,养成腹胁之疽根,不旋踵而齐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师于楚,以取谷焉。假夷狄而伐中国,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丑虏大张,害甚于齐,而兵不素养乃甚于鲁。议者乃欲借助兵于高丽,何异乞师于楚以伐谷者哉?是陛下徒知军势之未张,而不知兵将之未练,可为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

国初,剑南、交广各僭大号,荆南、江表止通贡奉,西戎北狄未尽宾服。太祖垂意将帅,命李汉超等守关南,命郭进御并寇,命姚内斌守庆州。以为既得名将,非厚通其意,无以得其死力,故许收逐郡关征酒榷之利,不惟养犒士卒,兼使丰富其家。又虑所费不足,仍许图回其家属在京师者,并厚抚之。则将帅之心,更无私虑,但专力边事而已。又虑奏陈之事未尽机要,时许入朝自陈,至升殿赐坐,又复厚赐遣之。以故边臣多富于财,得以养募死力,使为间谍,尽知蕃夷情状,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平西蜀,复湖湘,下岭表,克江南,尽得东南之地。虽诸将之功,实太祖驭将之力也。以今将佐偏裨,其雄挺孰与李汉超?其才略孰与姚内斌?其镇重孰与马仁瑀?其运筹决敌孰与韩令坤?以陛下驾驭诸将,孰与太祖?然而借之重权,禄之显秩,赐之重赏,其恩礼已过先朝数等矣。是陛下择将不如太祖,而恩礼则过之,适足以启诸将之骄心,而长奸臣之觖望。假令收复两河,迎还二圣,陛下何以加之?

夫战胜之兵,勇智百倍;败亡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胜者,气

也。今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天下之大忧也。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开关延敌,六国之师皆逡巡不敢进。然长平之败,廉颇犹能收拾余烬,北摧栗腹,西抗强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时秦人围邯郸,梁王使新将军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流涕,深以为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之大势有所不可也。而议者乃谓宜尊奉夷虏,不可一触其意。陛下何不以鲁仲连抗秦之事谕之?然则何怪乎军势之未张也!

夫《春秋》何为作也?为天下无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窃国命,家臣僭大夫,圣人有忧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赏罚。书"天子",书"王",书"天王"者,诛赏之大柄也。书"天子",书"王",皆其常称也。其曰"天王",则至大之称。天王与《周官·司服》所称"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宁,正危疑之机,大奸之所伺,非常之时,故大威武以防之。称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时,故曰非常也。然则又书"天子",书"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权丧矣,大政大法,诸侯擅而行之,护强恃众,迭相吞据。是本末大弱之世,名分大乱之时。非刚健大过之才若九二焉,不足以震其弱;非毒众穷讨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戡其乱。故仲尼于《春秋》凡有出于王为之者,皆书"天王",言于斯时,王之所为当大诛赏,不可循常道,异后世兴王之知变也。

是时吴楚之君,皆鸱视虎踞,僭号称王。诸蛮群酋,荐据中土。如此则文辞之告,犹可治之也欤?霸侯暴国,迭相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数。如此则诛赏之令,犹可治之也欤?故曰有用我者,吾其东周乎!东周仅存礼文而已,非拨乱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曰"天王"者,正赏罚于大乱之时也。若事非王为,但从诸侯之称,只书"王"者,礼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谓至贵以亲诸侯也。庄王不书"天王",以其宠逆贼之人,不足以当至大之称,故去"天"字,以重其讥。重庄王之讥,则鲁元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于州吁,内始于鲁元。圣人著其恶如此,若曰世大乱,则从恶者众,趋善者鲜。善若不予,则是赏不足以有劝;大奸大恶不加诛,则是罚不足以有惩。赏罚不行,而能兴衰拨乱者,无有矣。陛下临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机,称天王以临

下之时，大柄大权乃悉窃弄权臣之手，太阿倒持，收之良难。是陛下有《春秋》之乱而无《春秋》之赏罚，则何以驾驭群雄而平大乱也？

窃观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要在赏罚二事而已。当时赏则常薄，刑则常严。方澶渊之役，李继隆有疾战破虏之功，但加开府阶尔。臣尝怪真宗何赏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谓，既杀虏将而不能破其众，此将之可责也。有将帅之寄而独赏内臣，不可以为后世法。此所以薄其赏一也。又以自古宦者领兵，未尝不为乱。如太宗朝内侍王继恩出平蜀乱，大有功，止受宣政使尔。谨守先帝之法而不敢违，此所以薄其赏二也。至驭之以刑，则未尝不严。且如主将战没，则降黜别将，如王继勋者；诛戮亲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严，则人皆死力求赏。故太祖兵法，罪在不赦；而《春秋》兵法，尤严于驭军。

城濮之役，楚师败绩，则得臣死之。书曰杀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又败绩，则子反死之。书曰杀其大夫公子侧，罪在子反也。二子皆以失律丧师，不逃重戮，则见夷狄用兵，其刑赏常严而中国常宽，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后，中国累累受制于吴、楚者，抑有由矣。厥今军势未张，而动见败衄，是有《春秋》之乱而无《春秋》之赏罚。臣故曰赏罚不足以振偷惰，则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则陛下徒拥虚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

然臣愚，不识狂悖者为谁。谓前日诋忤权臣者为狂悖乎？谓左右便嬖为狂悖乎？谓前日诋忤者为狂悖，则臣不敢奉诏。如谓左右便嬖为狂悖，则陛下岂不能断然而去之哉？窃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则是推委权臣之弊也。自古以推委臣下为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乱。汉高祖推委群杰则治，至其后，推委王凤、王音，至于王莽则乱。光武推委二十八将，而取天下则治。至其后，推委后族，至于董、吕、二袁则乱。魏委荀彧则治，至委司马则乱。唐文皇驾驭英豪，而取天下则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杨国忠则乱。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终以推委而天下乱，何弊之然哉？当推委之际，超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若黜削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以故忠义解体而上之势孤矣。前日将相大臣，放意诛戮，冤

及无辜，陛下不得一举手，此岂推委之弊邪？明皇天宝之祸，未大远也。此可不为寒心哉？

厥今天下大体皆坏，独祖宗德泽未泯，人心未厌，譬羸病之人厌厌待尽，独气血尚在尔。如使人心一离，则是气血又将绝，天下无复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亩未安，旱蝗害岁为患，则是生民失职、人心将离、气血将绝之时也。谨按《春秋》，灾异变见，常与人相符。灾异见于上，则祸败应于下，犹铁炭之低昂，见效可信者也。凡《春秋》书"螽"者，伤旱蝗之害稼也。然书"螽"凡九，而哀公十数月之间凡一书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时十三年之间，而帅师伐某、侵某、取某、战于某，比他公为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烂其民矣，生灵至此而为血肉矣。黄池之会，夷狄之盟，中原天下日趋于亡矣。乃复暴兴田赋，民怨祸稔，岁大旱蝗，人有艰食之苦。圣人于此不一年而三书"螽"，伤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实兵革怨毒之余所由作也。

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熳而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炽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几年于此矣。创痍之民，肝脑涂地，丘垄发掘，罪及朽骨，脔腐血流者不知几亿万生灵之命。陛下不得而见也。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辎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涂悲巷泣，怨痛彻天。陛下不得而闻也。陛下不见其所不见，不闻其所不闻，驱万死之地而卒无一毫之利，积毁销骨，积怨伤和，阴沴作而灾疫兴，何怪乎田亩未安，螽蝗之害岁也！今者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视无计而请为遣蝗之举。呜呼！正使蝗而可遣，是移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

臣闻天禧中，真宗以岁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动念。实虑政令阙失，有爽天意，因诏削茶盐条禁之峻刻者，以惩旱蝗之变。以今政令阙违，岂惟茶盐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为害，实天意大警陛下也。而议者尚谓天灾流行，由历数运会，非政令失宜之咎。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何圣贤之用心也？愿陛下少戢诛讨，少息调发，练兵实粟，养吾锐气，而全中国之力，以销旱蝗之灾。毋以精诚弗效而怠荒，毋畏祸乱难戢而息志。以《春秋》为戒而谨持

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无以草茅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伊欲复亲族，奠疆埸，清寇攘，善风俗，使百姓安业而[illegible]迂衡，何修而可以臻此？臣于是见陛下真欲兴衰拨乱，以起天下之病也。窃观陛下首怀父母兄弟之忧，中念迎亲之使，至此又以复亲族为言，是陛下痛念二圣銮舆暴露，而未有迎复两宫之策也。

夫汉高祖所以还太公于楚军，岂独侯生力哉？臣尝料高帝有胜项王者五：以兵强力壮，则楚不如汉；以三杰为用，则楚不如汉；以驾驭诸将，则楚不如汉；以关中廪粟之富，则楚不如汉；以关中形势之重，则楚不如汉。五者皆项王所不如，则何苦而拘于太公哉！以今凋弊之余，无汉之兵力，无汉之三杰，无汉之驾驭，无汉之廪粟，而又违远上都，弃去两河，则又无关中之形势，而欲求亲族之复，虽使如侯生千百辈往焉，臣知其无能为也。故臣谓欲复亲族，莫若复两河；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复。

今陛下以奠疆埸为念，是欲复两河也。两河得失，系天下轻重。唐神尧起晋阳，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难如此。晋于春秋为大，尝驱役诸侯，至秦萃锐兵之晋，乃得韩，遂折天下眷。韩信联齐有之，故蒯通知汉楚轻重在信。宋武号英雄，得蜀关中，尽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窥边。是两河之地，王者不得则不王，霸者不得则不霸，贼得之则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两河，则亲族不可得而复也。

咸平中，真宗与王济极论边事。济言蠢兹丑虏，敢尔凭陵，盖谋谟当位之臣，未有昔人之比，且国家所恃，独一河耳。此诚急贤之秋。不然，臣惧北戎饮马于河渚矣。呜呼！济之言，诚切中今日之病。臣谓欲复亲族而收两河，亦诚陛下急贤之秋，当以济言为监也。

然当今最大患者，亲族之未复，疆埸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风俗之败坏也。风俗，天下之筋络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维持气血者，唯筋络耳。风俗一败，则筋络又绝矣。汉唐之亡，其弊皆风俗之先坏也。故臣尝论东汉之亡，与李唐大略相似。东汉之季，阉童乱政，毒被生灵。豪杰据郡而起，天下遂裂为三国。唐末，宦官蠹于

内，藩镇溃于外，天下遂磔为五代。然三国之士，其好恶去就尚有可观。虽天厌汉德，而刘氏犹拥虚器，亦卒以禅代。终五季之乱，其臣皆凶狠顽鄙，戕贼君亲，专为枭雄。岂天于东汉之季独多君子，而唐末专为小人哉?诚风俗染激然也。

中原乱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盖未有不亡之国。然当其时，有推变于天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节以死者，有卫社稷而死者，有愤国破亡犹奋不顾并家族破灭者，有知几之士挂冠而去不蹈其祸者。我国家涵养天下也久，士大夫受君父之赐亦久。一朝国家有难，自公卿剑履间以及下之百执事凡几人，自王畿以达四方郡邑有位凡几人，前知而言者为谁?死名节、死社稷者为谁?破家徇国者为谁?知几而挂冠者为谁?推变于天而知其将亡者又复谁也?

方晋南渡，士流尚有聚于新亭、伤国之衰、对江山而下泣者。周之东迁，尚有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殒者。以今两宫播越，则非直东迁之辱也，而陛下仓皇远狩，则非直南渡之迫也，谁复有泣对江山而忧宗周之殒者哉?自晋风俗之坏，而海内横溃，生灵鱼肉，甫二百余载。以晋监今，其祸可胜言哉!

昔田横一豪士，耻北面臣汉，遂自杀，从者五百余人皆死之，无一人降汉者。诸葛诞，魏室一叛臣。及其既败，所养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为诸葛公死无憾。今之士大夫，蒙国厚恩，何啻齐卒之受恩于田横，死士就养于诸葛哉?而忍耻含垢，视君父之僇辱甘心焉。呜呼!纵不愧田横之客，又独不愧诸葛之奴邪?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风俗之败坏也。风俗一败，则筋络又将绝矣。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不以草茅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

虽然，陛下策臣等数十条，皆当今之大弊，臣既已极言之，而圣策尚谓：子大夫涉艰险，以副详延，诚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为朕陈者。其悉言之无隐。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非朕之所欲闻也。其以朕所未闻而切于时者言之，朕将亲览焉。臣又见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然臣观陛下求苦口之言，虽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何也?臣闻鹊巢覆而凤不至，直士受祸则忠臣杜口。往者从东南来，道路籍籍，皆谓陛下即

位以来，不旬月之间，戮直言者三。有是乎？岂道路之妄议乎？傥如所言，则伤威损德，为害不浅。

谨按《春秋》，陈杀其大夫泄冶。说者谓：泄冶以直谏被诛，国人大恶。是时盖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徵舒之祸，十一年而楚子入陈，不三年之间，而陈国大乱。呜呼！戮直言之祸而至于此！然而泄冶被诛，权不在陈灵而在徵舒。前日议士被诛，权不在陛下而在左右。专杀之祸，《春秋》大恶；而况专杀直士，恶又甚矣。此楚子入陈，所以得借口而讨徵舒。则丑虏乘隙，将以假讨恶为名，而蹑入陈之轨矣。臣是以卜在廷之士，必不敢尽言无讳也。然而臣犹敢区区竭愚者，窃自惟念，陛下诏臣等无矜空言而陈实务，则陛下知前日滥诛为过而改之，是陛下乐闻其过矣。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则陛下负臣。

抑臣尝闻太平兴国中，有布衣皂囊献书者，其辞狂妄。太宗览之弗罪，因谓宰相曰：比降诏书许言事，故虽狂悖，亦不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书狂瞽，李昉请加黜削以惩之。太宗责曰：曷尝以言罪人哉？呜呼！太宗乐闻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请黜敢言之士。幸而太宗不从，如使太宗不乐直言，而李昉之请得人焉，则武程者俎上肉矣。今臣累千万言，则其罪过于皂囊之书；以臣疏贱，则甚于武程而有狂瞽之论。使陛下乐闻谠言，尚患见忌；借使人主一恶直言，大臣如昉者又从而媒蘖之，则臣言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为念，而扩太宗纳谏之量；大臣体陛下之意，而无李昉恶直言之心。则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所窃耻也。臣故曰：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监而力行之，无以草茅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一个国家眼看着要兴起，就以民众为转移；眼看着要灭亡，就以皇天为转移。商汤和周武王以民众为转移，他们兴起就突如其来。夏桀和商纣王以皇天为转移，他们灭亡就在转瞬之间。正当夏桀和商纣王还没灭亡的时候，认为自己享有天命，声称我从生下来不就在皇天那里享有大命吗？他们以为天命确实可仗持，消消停停地自称子子孙接连当帝王，属于世世代代永远传续的

大业啊!等到他们灭亡的时候,原属夏朝的诸侯归从商朝的多达三千个,借助这一大批诸侯战胜了夏朝,商汤就由此兴起。原属商朝的诸侯归从周朝的多达八百个,借助这一大批诸侯战胜了商朝,周武王就由此兴起。商汤和周武王以民众为转移,反而兴起,其实并不是民众让他们兴起啊!修明人事来应合皇天,因此才兴起。夏桀和商纣王以皇天为转移,反而灭亡,其实并不是皇天让他们灭亡啊!仗持天命而残暴地对待世人,因此才灭亡。兴起和灭亡的起因,那鉴戒正在于民众,并不在于皇天,这是非常容易弄明白的呀!可具有一般才能的平庸君主,却常常与此相反。这正是忠臣义士深深感到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败乱灭亡一个接一个的来由,可当代的君主却不醒悟啊!

陛下在战争激烈残酷的环境中崛起,正赶上天下事务纷繁紧迫而顾不上片刻休息的岁月,外部给造成祸乱,内部又相互争斗,奸诈的小人执掌朝政,边境上存在着战争不断的忧虑,中原存在着金朝扶植下的僭伪政权,心地纯正的人们陷入无知的颓风。百姓愁苦,盗贼四起,祸患在脚跟底下酝酿成熟,王室摇摇欲坠,几乎就像一根头发丝承受千钧的重量。身在这个时候,真可以称得上动乱到极点了。臣下我很愚昧,认为这正是陛下应当心焦如焚、卧薪尝胆,完全以民众为转移的时候啊!可陛下策问臣下我等人的十几个问题,大体上是对皇天如何做质询。一上来就说:闻听治国之道以皇天为转移,而皇天的法则又以天底下的众百姓为转移。又说恐怕是皇帝我不具备仁德,没办法去感动皇天吧?又说为什么那样地精诚却收不到效果,祸乱又难以平定呢?这些话语,似乎都属于以皇天为转移的东西。这是臣下我等人深深感到弄不清楚的地方,愿意为陛下直言无讳啊!

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说:闻听治国之道以皇天为转移,而皇天的准则又以天底下的众百姓为转移,所以在察视与听闻、依从和回绝上,不把事先进行算卦和占测放在第一位,而是只察看众百姓的反映如何做出决定来,把那最真诚的用心保持不变,就没有任何目的地到达不了的。古代的圣帝明王治理国家,无不遵循这一法则啊!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以皇天为转移却不以民众为转移的弊病啊!臣下我审慎地考察《春秋经》载述的祸乱变故的来由,以及我朝列

祖列宗的旧有事例，为陛下陈述它。

专门对《春秋经》做解说的人讲：全经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其中“正”字放在“王”字的后面，“王”字又放在“春”字的后面，意思是说一代新王往上承顺皇天的所作所为又在下边端正自身的所作所为。这是汉代儒士牵强附会的论断，可以说并不正确。臣下我听说，圣人孔子撰写《春秋经》，目的是推尊一代新王的大法，给千秋万代定立起训条，未曾有那明确载述皇天的内容。这大概是认为皇天的法则很难测断出来，如果讲深了，会使人感到这方面的问题渺茫暗昧，探索不清，从而对皇天产生轻视的倾向。如果讲浅了，会使天下后世沉溺在阴阳灾异里面，从而对皇天产生迷信的心理。圣人孔子从皇天那里推断它的奇异现象，常常和人事交织在一起，加以载录。至于奇异天象出现预示着哪些人间的祸乱败亡，有的到几十年以后才应验，有的甚至还没移动脚跟就应验了。国家将要出现政治黑暗的祸败，皇天就事先显现出水旱等自然灾害来做谴责和告诫；国君不知道自行反省，皇天又显现出罕见的奇异现象来做警告，使国君感到恐惧；但仍然拒不改悔，覆灭败亡也就来到了。如果没有人间的祸败事，奇异的天象就不会凭白无故地显现出来。倘若国君深痛地自行引起警惕，感到后果可怕，翻来复去地修明自己的德行，天灾人祸就会消失或被止住，可以转变成吉福。这正是《春秋经》的主旨所在啊！由此可以明白皇天内心爱护人间的君主，打算把他那祸乱给止息住啊！原本上并不是政治特别黑暗的社会，皇天都想扶持它的君主并使君主安安全全。这正是古代的圣帝明王把那最真诚的用心保持不变、不去事先进行算卦和占测的原因所在，他们确实明白皇天与人事相互感应，非常让人感到可怕呀！

我们大宋皇朝自从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太祖皇帝深感天下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老百姓蒙受祸害，凄惻地流下了眼泪，就想施布声名教化，来安抚养育他们。这时节，深有远见的人知道天命原本上已经非常牢靠地降临在太祖身上了，想摆脱都摆脱不掉了。可是就连择任一名中央法律部门的官员，本来属于小事一桩，但太祖皇帝选用王济时却对他说：千万不要出现冤假错案，由此招来天下的灾殃。

任命一名地方法律部门的官员,本来也属于小事一桩,可真宗皇帝在选用省一级的各路提点刑狱时却对他们说:有一个人蒙受冤屈,就会出现灾异现象。实际上,即使有一个人蒙受了冤屈,但按理说也不会造成天灾,可我朝的祖宗却十分警惕地涌生出想法,畏惧招来皇天的责罚。这正表明民众不可忽视,创造万物的神灵更不可欺骗啊!陛下您在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发布檄文,四处飞快地传播,天下全都不约而同地响应。臣下我尽管看不透皇天的原理,但用人事来做测断,就知道皇天的意愿原本上就已经具有固定的归属对象了。近来皇上的谋虑逐渐懈怠,渐渐显出不能够善始善终来。国家的势态委靡不振,众百姓愁苦而没有依赖。皇天的意愿究竟归属到哪个人的身上,恐怕会出现意外的变化,这太让人寒心了,谁能承受得住呢?希望陛下把那最真诚的用心保持不变,将《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持守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因为这是民间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点了。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皇帝我在天下动荡不安,形势极其危险的后面承继起国家命运的重托,又在民心离散、势单力孤的时候怀揣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一有想法,就必定是安抚民众来顺从皇天,希望做到悔痛祸乱,平定国难,到现在已经两年时间了,每天从早到晚全都集中在这桩大事上。以上这番话,又属于陛下以皇天为转移却不以民众为转移的弊病啊!哎呀呀,陛下发出话语触及到这个问题,也清楚肩负着国家命运的重托吗?也清楚怀揣着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吗?果真清楚肩负着国家命运的重托,那么,与自己共同承担起这重托的人,又是谁呢?果真清楚怀揣着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那么,与自己共同分担这忧虑的人,又是谁呢?与自己共同承担起重托,又与自己共同分担忧虑的人,一旦不是合适的人选,天下的大势可就不能再挽回了。臣下我听说,统领整个天下的权力,获取到它极其艰难,失去它非常容易。没有一个朝代不是由列祖列宗辛苦备尝、历尽艰难才打下江山的,也没有一个朝代不是由子孙后代奢侈骄逸又把江山丧失掉的。历时上百年才会打下江山,可在一日之

内就能把江山丧失掉，致使列祖列宗艰难开创的大业以及国家的命运，转眼间就变成废墟。因此圣人孔子撰写《春秋经》，对于酿成祸乱的国君和灭亡的国家，痛切地用一代新王的大法予以衡量，加以斥责。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在鲁昭公二十二年记载道：东周王室发生了祸乱，王室大臣刘狄和单旗携带周王姬猛在皇邑安身。这时候，刚刚发生了周景王突然病死的事件，嫡出王子姬猛凭借年幼而继承王位，刘狄和单旗凭借庸劣的才能辅助年幼的君主，国家命运就像旌旗上的飘带，这样一来，王室怎能不发生动乱呢？王室属于整个天下的根基所在，根基所在发生了动乱，天子逃亡到皇邑，这表明天下动荡、形势危急得也太严重了。最后恶化到周天子到处流亡，躲避庶出王子姬朝发动的叛乱，在整个鲁昭公时期，仅仅保住了归王室领辖的成周这一座城邑，到了由吴王夫差召集黄池盟会时，名义上归东周统领的整个天下就彻底崩溃了。圣人孔子偏偏对这一事件反复载述，是要让天子看重国家命运啊！陛下凭借势单力孤又年纪不大的条件，独自需要平定众多的祸难，那就和当年周王姬猛同样危急。左右大臣依靠奸巧逢迎的本事来辅佐国家大计，那就和当年刘狄、单旗同样庸劣。臣下我担心王室的祸乱，又比当年庶出王子姬朝发动的祸乱还要厉害了。怎么就能知道决不会像继猛而立的周敬王身居洛水岸畔的成周王城里，而不演变成晋国在城外的狄泉召集诸侯大夫举行盟会，构成对周敬王的威胁呢？这表明陛下深知自己在天下动荡不安、形势极其危险的后面承继起国家命运的重托，但却不了解像当年要刺杀秦王的荆轲那类人物，正在准备着什么，寻找机会突然在胳膊肘底下发作呀！希望陛下追思太祖皇帝夺取天下付出的艰难，及早做出安排，把《春秋经》所记载的王室祸乱作为鉴戒，谨慎地持守住它，不要觉得在民心离散、势单力孤的时候怀揣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从而致使王室解体呀！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在鲁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道：鲁襄公到楚国去了。在二十九年又记载道：鲁襄公身在楚国。还记载道：鲁襄公从楚国回到了鲁国。臣下我私下推究起来，经中记载鲁襄公到晋国去，

到齐国去，到京师去，全都未曾选用“在”这个字眼来做记载，唯独对楚国特意用“在”字做记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说楚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鲁襄公到楚国去，已经超出了寻常活动之外，而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还没返回来，祸难恐怕很难测断了。特意记载为“在楚”，这是臣子痛惜国君失去了他该在的地方啊！当今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及其随从人员出现了到沙漠地带去视察的情况，拿这来相比，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超过鲁襄公到楚国去的那样的危难的呢？况且鲁襄公在二十八年到楚国去，待至二十九年就回来了，《春秋经》还对他深深感到危险，何况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及其随从人员在番邦的帐蓬下面披头露面，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呢！既然如此，陛下怀揣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臣下我愚昧地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对待呢?替陛下来考虑，偏偏就不念及当年鲁襄公身在楚国的事情吗?臣下我希望陛下慎重地择用贤能的辅政大臣，只管果断地做出决策，像周宣王那样翻来覆去地忧虑天灾的谴告，像西汉孝宣帝那样励精图治，汇总验核各级官员的政绩，像东汉光武帝那样铲除祸乱有方略，像唐宪宗那样刚强明智又果断，像越王勾践那样复仇雪耻。把《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对待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民间读书人说的话，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点了。

陛下在起首部分用以上的问题来进行策问，到中间部分又说：朝廷府库匮乏空虚，军费支出却成倍增长，但对百姓的赋税征收仍然尽量减轻。金国入侵的祸患尚未消除，各地的盗贼依旧很多，但向百姓催交赋税却有限制。选用太守县令，来加强对地方民众的宽厚管理与养育；责成监察官员，来制止住地方官吏贪婪残暴的行径。朝廷的命令专门为百姓而下达的，常占十分之六七。凡属人们所讲的凝聚起百姓所希望的东西，去除掉百姓所痛恨的东西，皇帝我没有听到，那算另一码事，但却不存在听到后而不加以体恤、加以体恤而不落实的情况啊！以上这番话，又属于陛下以皇天为转移却不以民众为转移的弊病啊！臣下我听说，治理天下正像给人治病。现今天下如同患上了疾病，而朝廷府库匮乏空虚，军费支出却成倍增长，这属于在血脉

部位得了病呀！金国入侵的祸患尚未消除，各地的盗贼依旧很多，这属于在肠胃部位得了病呀！人体外面使人得病的那些东西侵袭体内的正气了，选用太守县令来加强对地方民众的宽厚管理与养育，也就正像拿汤药汁儿和浓酒来进行疏导，辅助那体内的先天真一元气啊！责成监察官员来制止住地方官吏贪婪残暴的行径，也就正像用石针扎下去，用配好的药物灌下去，来克制那不顺当的肠胃啊！假如一个人在血脉部位得了病，又在肠胃部位得了病，而用汤药汁儿和浓酒进行疏导却不恰当，那就病得更厉害了。已经病得更厉害了，而用石针扎下去，用配好的药物灌下去却不得当，那就只会使病人加快死亡了。医治国家的疾病，也是这个样。因而在现今天下正如同患病的时候，朝廷府库已经枯竭了，军费支出已经增长了，金国入侵的祸患已经加重了，各地的盗贼已经众多了，可竟然却任用不贤能的太守县令去管理民众，却委派低劣的监察官员去搅扰地方，这就如同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了，却用野生的藤蔓给人吃下去，还不眼看着就死掉了吗？臣下我请求逐条逐项地讲论那弊病。

臣下我听说朝廷府库匮乏空虚，军费支出成倍地增长，原因出在部队超员而白白吃皇粮，出兵打仗拖拖拉拉而空耗时日，生产的物品少而需用的人却太多啊！这三个方面是当今最大的弊病。自古以来，部队没有军事行动而要供养，就不能使它聚集起来；聚集起来的话，就不能让它没有军事行动而去供养，这是客观规律使它必须这样的。从前汉朝的军事制度，设有出钱雇人代替本人去服役的士兵，没有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执行军事任务的部队。在京师长安，也不过设有保卫皇宫的南军、保卫京师的北军、护卫皇帝的期门兵、羽林兵，也就到头了。边境上发生战事，诸侯王发生叛乱，全都用虎符作凭证去调集各个郡、各个皇子封国的军队，行动结束以后，就予以解散。所以汉朝兵尽管不熟悉农业生产，但天下不感到财力紧张，这是由于部队未尝聚合在一起啊！唐朝设置十六卫，没有军事行动就大力进行农业生产，积储粮食，不仅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增加朝廷的储备。所以唐朝兵虽然聚集在京师，而天下也不感到财务紧张，这是由于未尝没有军事行动却白白供养呀！我们大宋皇朝沿用五代时期

的养兵方法，等级属于中下的一名士兵，在衣服和粮食的发放方面，每年大约折合五六十贯钱。太祖皇帝接收了后周的军队，京师和地方上只有十二万人就到顶了。到了太祖皇帝乾德年间，京师和地方上也只有十万人就到顶了。太宗皇帝辖有了整个天下，增添士兵最多，也不过三十多万。真宗正处在我朝全盛的阶段，这才开始达到五十多万。当时军队的员额并不是超编，但还担心耗费国家财政支出，命令淘汰缺乏战斗力和多余的士兵。周莹对削减士兵的诏令拒不执行，真宗皇帝听后大怒，就撤销了他的邠州知军府事兼环庆路都部署的职务。向敏中奏呈军队员额逐渐在增多，真宗皇帝就反复向他究诘根据何在。这的确是深知部队没有军事行动就不能使它聚集起来，聚集起来的话，就不能让它没有军事行动而去供养。臣下我所以说，部队超员而白白吃皇粮，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啊！查照兵法，动用十万军队，每天就要支出千金。按照一日来计算，支出就已高达这个数目，何况如今耗费时日，拖延长久，军事行动不解除，本来只有一百个人仰仗朝廷供给军粮，但却虚报一千个人的数目。大致上尽管数百人组成一个编制单位，但统计起来就和数十万军队没有什么差别，白白吃皇粮一年接一年，却没有一点儿战绩。这样一来，农民的财力物力，怎能不困乏呢？靠朝廷供应军饷的士兵，又怎能不疲弱呢？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记载鲁庄公八年，春季派军队驻扎在郎地，夏季鲁军同齐军联合围攻邾国，秋季鲁军撤回来。《春秋经》记载各国用兵，没有历时三个季度，然后才撤回来的，唯独在这一年特意记载下春季，记载下夏季，记载下秋季，这是厌恶鲁庄公无故就动用军队，发起围攻邾国的战役，最后导致邾国在夏季向齐国投降，而鲁国军队却没有任何收获，待到秋季才撤回来。所以特用“师还”这样的字眼做记载，是厌恶鲁庄公在夏季已经没有任何收获了，可到秋季才撤回军队，使军队在外面遭受劳苦、滞留得也太厉害了。此后庄公二十八年，又有鲁国向齐国请求借粮食的举动。这种国家的不幸正是从围攻邾国的战役引发出来的。拿现在出次兵、打回仗，一动就长达好几年来与《春秋经》记载的历时三个季度才撤回的事情相比较，不已经显得太拖拉了吗？既然如此，朝廷府库枯竭而军费支出又成倍

增长，自然就不值得奇怪了。臣下我所以说：出兵打仗拖拖拉拉而耗费财力，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啊！部队超员而白白吃皇粮，出兵打仗拖拖拉拉而耗费财力，再加上生产的物品少，需用的人却太多，朝廷收入少，用项却太多，陛下尽管想把赋税减轻，可州县催交赋税实际上更频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朝廷的财力既已匮乏，那势态就不得不从民众那里收取了。

臣下我在答卷前面所谈到的：向百姓催交赋税具有限制，但金国入侵的祸患尚未消除，各地的盗贼依然很多，这一问题的弊病出在朝廷过失太多，老百姓也就怨恨众多。假使朝廷不存在过失，老百姓也就没有怨恨了。这样一来，金国入侵的祸患和各地的贼寇又有什么借口煽动起来呢？大致上讲，自古奸诈的人物，像陈涉、吴广在秦朝后期率众起义，赤眉军和黄巾军的首领在西汉、东汉末叶率众起义，苏峻搅乱东晋王朝，安禄山和史思明败乱大唐帝国。他们原本都是野心勃勃的盗贼，凶恶势力的头目，暗地里专等朝廷出现过失，便拿来做借口；对百姓怨恨朝廷感到庆幸，就宣称自己是正义的代表而发出号召，于是演变成各州各县递相响应，劫持或杀掉太守县令，互相比试谁的势力大而制造祸乱。如今盛明的我朝，哪里有那严重的过失？可臣下我却私下听到过老年人的议论，有的说后妃家的人和皇帝身边的人阻挠皇权的实施，奸臣窃取了朝廷的大权，惩罚和封赏不完全按照原则来施行，奸巧的人没有全部清除掉，朝廷的纲纪法度不是非常振作。这难道还不属于重大过失的阶梯吗？为什么这样讲呢？自古败乱天下国家的事情，大多都起于后妃家的人和皇帝身边的人阻挠皇权的实施。像西汉的吕后家的亲属，文帝窦皇后家的亲属，宣帝霍皇后家的亲属，唐朝武则天的同姓子弟，中宗韦皇后的同姓子弟，武则天所宠爱的张易之、张昌宗等人，窃取并耍弄朝廷的大权，一经失势，就满门被斩杀，王朝和家族同时毁败了。如今竟有皇帝最亲近的人执掌兵权，后妃家的人统领侍卫部队。汉朝有人利用南军和北军发动武装政变的祸患，作为一面镜子，距离今天并不是太遥远。如果不对这些人的权势稍予削弱，这就等于加重朝廷的过失，致使奸诈的人物胆大起来。现在已经是大乱过去的时候了，哪里还应重演历史

上的惨祸呢?西晋赵王司马伦、羯族人石勒这些家伙,内心里要取代当朝的天子,口中责斥宰相的罪行,实际上纯属奸诈的人物暗中寻找朝廷的过失,然后采取行动。更不幸有那平素的饥饿状况可以利用,有那灾荒雪上加霜,老百姓愁苦连天,没有生存上的依靠,于是奸诈的人物乘机使那鲜血四溅,要把广大区域纳入自己的辖领之下。这正是金国入侵的祸患尚未消除和各地盗寇依然很多的原因啊!形势既然如此,尽管向百姓催交赋税具有限制,又凭借什么去平定那祸乱呢?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记载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在申地诱杀了蔡侯姬般。蔡侯姬般本来是杀死父亲夺得君位的贼子,属于一代新王必定要予以严厉惩处的对象,可《春秋经》反而厌恶楚灵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说讨伐蔡侯姬般是可以的了,但却采用诱骗的手段去讨伐,这正属于一个男子暗害他人的行径,是《春秋经》非常厌恶的对象啊!前些日子朝廷颁发诏书,招抚收纳叛乱逃命的人,答应不处以死刑。于是这帮人全都放下武器,请求朝廷处置,认为陛下会向他们显示出说话非常算数啊!然而表面上用说话算数来做表示,暗地里却用死刑进行惩办,这正属于当年楚灵王采用诱骗手段去讨伐的做法啊!陛下身为天下人的父母,为什么把天子的诏书作为诱骗人上当的玩艺呢?臣下我担心,朝廷说话非常算数,一旦让人不相信了,后来的人就把接受朝廷的招降当成是后悔莫及的事情,从今以后闹得上下互相猜疑,彼此忌恨,就像仇人一样在一起相处,瞅准机会就你杀我,我杀你,只有最先动手的人才称王称霸。这还对盗寇尚未消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臣下我在答卷前面所谈到的:选用太守县令来加强对地方民众的宽厚管理与养育,可太守县令大多都不贤能,这是由朝廷不重视太守县令的选用而造成的呀!责成监察官员来制止住地方官吏贪婪残暴的行径,可监察官员大多都低劣无能,这是由朝廷不重视监察官员的委派而造成的呀!太守县令一旦不贤能,郡县就遭受祸殃了;监察官员一旦低劣无能,太守县令就敢为非作歹了。所以选用太守县令,关键在于委派好监察官员,这是我朝列祖列宗固定不变的规则啊!太

祖皇帝和太宗皇帝对太守县令特别留意。太宗皇帝曾经亲自选任各州的长官,又在他们的履历表上亲笔题写诫令说:公正地致力于审理案件和地方民政,用仁惠慈爱去管理百姓,遵守国家法度,铲除地方上的奸恶势力,这才可以载录为劳绩。写完后掉头对钱若水说:皇帝我在酷暑中写下这番话,难道就不辛劳吗?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任命官员,选好人选,让他们去安定百姓罢了。哎呀呀!太宗皇帝不避盛暑,亲笔写下诫令,在他们上任时赐给他们,可如今皇帝对太守县令,未尝有过召见并让他回答问题的人。太宗皇帝亲自选择并在便殿接见太守县令,可如今却有交付给吏部登记姓名、再考察一下就直接任命的情况。这表明朝廷不重视太守县令的选用啊! 朝廷不重视太守县令的选用, 太守县令就不把自己管辖的郡县当回事。郡县的职责一不当回事, 管理和养育治下民众的方式方法就全都废弃了。假使是靠近京师的紧要州县,有的长官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可他毕竟害怕朝廷派出的人离自己很近, 还不敢胡作非为。至于像远离京师的那些地方的百姓,即使让春秋时盗跖那样的大盗去当他们的太守,让尧舜时梼杌、饕餮那样的大凶人去当他们的县令,这些百姓尽管成百上千地结成一群,呼天喊地,齐声痛骂,可朝廷仍然看不到又听不到,这样造成的祸害难道还不太大了吗? 臣下我听说太祖皇帝任命钱文敏到泸州去当知州, 行前告诫他说: 接连听说郭思齐在那里大肆聚敛钱财,不遵守国家法度,这是依仗他离京师遥远,认为朝廷不了解情况罢了。你到了任所,马上替皇帝我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泸州距离京师开封有四千多里地,可郭思齐不遵守国家法度,太祖皇帝早就一清二楚了。可如今距离京师稍微远一点儿的州县, 朝廷对那里的太守县令的过失竟然不清楚,至于像泸州那样遥远的地方,陛下肯定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当地的太守县令还惧怕个什么, 不干那强盗一样的勾当呢?然而赖以纠察这些地方的弊政的对策,还要依靠派出监察官员去监察啊!假如派出的监察官员又不是合适的人选,祸害也就说不过来了!

臣下我听说,太祖皇帝鉴于监察官的职务,派出去是充当朝廷的耳朵与眼睛,所以有的就亲自加以选任,有的命令大臣推荐,予以委

派。在选用上已经条件规定得很苛刻，对他们履行好职责也要求得特严格。只要对某一名监察官员放宽条件和降低要求，这就是败坏了整个一个路级政区的事务；整个一个路级政区得不到治理，这就致使数百万军民遭受殃害。太宗皇帝登上帝位以后，励精图治，下诏责成各路转运使考核本路官员履行岗位职责的好坏情况，又派遣使臣察验各路官员贪污或廉洁的表现。例如刘文质察核举报自己辖区内的官吏，就受到太宗皇帝让他升官转任的宠信。又如王德裔在自己的辖区内管理松懈，就受到太宗皇帝对他削夺官爵的惩罚。封赏和惩罚像这样地严明，监察官员也就扬布起威势；监察官员扬布起威势了，太守县令也就履行好职务了。现今太守县令不履行好职务，这是因为监察官员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以前朝廷派遣使臣安抚晓喻各路，天下盼望看到他们的风采，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蒙受到朝廷的大恩惠了，可最后却闹得为提供上等的食宿供应而家家不安，公开接受贿赂，严重的竟向郡县索取美女，让家属坐在车上和自己同行。虽然官方名义上是去进行安抚晓喻，可老百姓却有供应方面的苦处。这纯属在太守县令之外又添了一个大蛀虫。离京师遥远的那些地方的百姓，不幸遇上了不贤能的长官，成年含冤抱屈，伸长脖子等着朝廷使者来到，以便宣泄他们的冤愤，可监察官员又低劣无能，这纯粹是叫他们含冤终生也没地方去控诉啊！这样一来，老百姓怎么能够大多数人不怨恨而容易造反呢？这正是奸诈的人物趁机冒出来的原因啊！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记载鲁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来到了鲁国。圣人孔子赞赏他，特意记载他的表字而不直接使用他的名字——湫。这是推重他肩负使命，采用妥善的办法处理邦交事宜，去平息邻国的祸难。正值鲁闵公初年，叔牙和庆父在酿造鲁国的祸乱。鲁闵公刚刚当上国君，国人危险得就像旌旗上的飘带，齐国人可以像折断鞭子那样吞灭鲁国。正当这个时候，鲁国的命运掌握在齐国的手中。仲孙竟能劝说自己的国君一定要协助鲁国平息内乱，最终使闵公不失去君位，而鲁国人由此安定下来，这正是湫的力量啊！《春秋经》特意记载仲孙来到了鲁国，是对他一从齐国出来而鲁国百姓就安定并保

存住鲁国感到喜悦啊！凭借当今河北河东地区与淮河一带经历战争之后，怎能不比鲁国当年的国难更形势严峻呢？可监察官员出使到地方，没听说有像仲孙务必要把平息鲁国祸乱作为心腹大事的那样的人。用《春秋经》的大法来责问这些人，那就够得上罪人了。臣下我所以说：太守县令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因为监察官员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

由于太守县令已经不履行自己的职责，监察官员又像这样地失职，陛下的命令专门为百姓而下达的，尽管常占十分之六七，但对诏书顶着不办的人，也就常占十分之八九了。这正属于陛下发有体恤百姓的诏书，却没有落实到百姓身上的恩惠。州县百姓只知道有那地方长官的命令，没听说有过天子的诏书。两三年来，边境一带用兵，只要是各种赋税征收，不管四方有出产、无出产的地方，只管严厉地命令征收上来。靠近海边的州军，一律征收枪杆；处于山区的州县，就用预购的名义征收箭上的鹅毛。中央主管部门既已不区分出产与否，州县很少有能够逐项上报得很清楚的。这样就官方征收一件物品，老百姓便多交好几倍。就拿前些日子劝导富户向官府出售余粮这宗事来说，路级政区主管机构督责各郡办理，各郡又督责各县办理，各县又向各乡下发公文。借用军期急速的名义，催逼得像流星和着火一样快速，稍微有晚交的，就抓起来严刑拷打。只要是人，就都害怕丧命，哪里敢有不交的呢？这纯属名为劝导富户向官府出售余粮，实际上对他们进行横征暴敛。路级政区的主管机构和郡守，只在向上面交足物品上花气力，以便取得朝廷的欢心，于是就糟踏而不懂得节省。宰相大臣，只在够用上花气力，以便取得陛下的欢心，于是就明知下面乱糟踏却不敢奏禀。上下相互蒙蔽，老百姓穷困而没地方诉说。这属于陛下体恤民众的诏书尽管比西汉孝文帝下达得还要多，可天下干耗却比西汉孝武帝还厉害呀！伤害天地的交合之气，招来百姓的怨恨，这种罪责将会归到谁的头上呢？

臣下我听说在真宗皇帝咸平年间，讨论改立年号需要颁发的赦免诏书，其中蠲免赋税的内容很多，有人对此就提出意见，认为掌管财政的三司只想施布恩惠越广越好。真宗责备提这种意见的人说：

不合道理、伤害百姓的事情，朝廷是不能施行的。如果敕令得到施行，必定会使良善的百姓受到恩赐了。当时正值中午，突然天空响起了雷声。真宗皇帝凄恻地说：这恐怕是敕令缺少落实到百姓身上的恩惠，上天特用雷声来警戒我吧？哎呀呀！我朝列祖列宗因敕令施恩不普遍，畏惧由此而使皇天的责罚提前到来，那么，陛下的命令多数被下面顶着不办，实际是违背皇天的心愿的，由此构成的祸害恐怕不算小。臣下我希望陛下把《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持守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因为这是民间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点了。

陛下在中间部分用以上的问题来进行策问，又念及到前去金国接回皇室亲属的使者，在路上后脚跟前脚地一个接一个，但敌人心里就是不顺从。保住国家的谋略，特别用心地投注在军队上，可军队的威力却没有发挥出来。皇帝我亲身在节俭上做出表率，用来巩固住根本，可世上骄逸奢侈的恶习仍未得到改正。在一切事情都实行公正的原则方面，皇帝我大力加以扩展，用来做出训导，可人们却按私情来曲意处理的习气仍占上风。刑罚和封赏不足以把苟且怠惰的风气振作起来，明令训诫不足以把狂荡迷乱的心念革除掉。农业生产还没有稳定下来，旱灾蝗灾伤害每年的收成。所有这一切，恐怕是皇帝我不具备仁德，没办法去感动皇天造成的吧？或许是政令不恰当，民众感到很痛苦而造成的吧？为什么皇帝我那样地精诚却收不到效果，祸患又难以平定呢？从这段话中，又可以看出陛下以皇天为转移而不以民众为转移的弊病啊！臣下我认为，陛下亲身在节俭上做出表率而世上骄逸奢侈的恶习仍未得到改正，这是由于陛下不一定就特别节俭啊！在一切事情都实行公正的原则方面大力加以扩展而人们却按私情来曲意处理的习气仍占上风，这是由于在一切事情都实行公正的原则方面不一定就得到了扩展啊！封赏和惩罚不足以把苟且怠惰的风气振作起来，这正标志着朝廷大权转移到了臣子的手中啊！明令训诫不足以把狂荡迷乱的心念革除掉，这正显示出危急动乱的苗头啊！农业生产还没有稳定下来，旱灾蝗灾又伤害每年的收成，老百姓就会失去自己的本业而天灾人祸同时发作起来呀！至于派遣那

迎回皇室亲属的使者而敌人心里就是不顺从，臣下我私自对这一问题却有看法来献上。

臣下我听说在仁宗皇帝庆历年间，契丹在边境上聚集起军队，特地派遣它的使者萧英和刘六符前来问候。这个时候派遣使者来到，违反常规，而且大军已经在边境上摆好阵势做后盾，对此朝廷内外都感到十分愤恨。仁宗皇帝命令宰相选派回访契丹的人，选到了官任右正言的富弼，结果一两句话就打消了刘六符的图谋，最后挫败了契丹国主要求割地的企图。从真宗皇帝景德年间一直到这个时候，北部边境没有战事已经八十多年了。这哪里只是富弼一个人的力量呢？在这个时候，宰相是晏殊那样的人物，参知政事是范仲淹那样的人物，枢密使是杜衍、韩琦那样的人物，谏官是余靖、欧阳修那样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属于被天下所仰望又被北方契丹所畏惧的人物。契丹知道我们大宋朝廷拥有杰出的人才，所以富弼的谋略得以实现，而契丹的企图没办法得逞。拿现今朝廷上的宰相来说，有像晏殊那样的人吗？参知政事有像范仲淹那样的人吗？枢密使有像杜衍、韩琦那样的人吗？谏官有像余靖、欧阳修那样的人吗？臣下我知道陛下手下肯定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人物了，然而却打算获取到敌人内心里很顺从，这是臣下我感到大惑不解的事情啊！

臣下我听说，猛虎使百兽感到可怕，原因是它生有利爪和坚牙啊！假如叫它废弃了利爪和坚牙，一只小猪崽儿或一头小牛犊儿都能够去攻击它、撕咬它。由此作类推，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弱小的少数部族都能够成为它的强硬的对手。所以《春秋经》尽管厌恶炫耀武力所造成的灾祸，但对军队平常不加以训练、临时需要时却凑合起来的做法，又深深地斥责为大罪过。审慎地考查《春秋经》记载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国人侵犯我们鲁国的北部边境地区，我们鲁国的公子遂到楚国去请求出兵援救。我们的僖公依仗楚国的军队反击齐国，夺取了谷邑。对此解释《春秋经》的人说，“乞”是表示特重视的字眼，用这个字眼是说重视军队啊！臣下我认为，圣人孔子不单单是把义旨投注在重视军队上，大概是厌恶鲁国没有防备呀！齐国对鲁国构成威胁，已经时间很长了。自从在巅地所打的那一仗，齐国被宋国打败而

鲁国却不去援助齐国，齐国国君孝公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对鲁国产生刻骨的仇恨了。到了鲁僖公二十六年春季，齐国侵犯鲁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两国的仇怨就已经结下了。替鲁国作筹划的最好对策，正应当从早到晚常像敌军就要来到那样做防备，然而竟安稳地高枕无忧，养成了由对方在己方腹部胁下生出的大肿瘤的根苗，紧接着齐国人到夏季又侵犯鲁国的北部边境地区了。竟然可怜到向楚国请求出兵援助，夺取了谷邑。借用少数部族的力量去讨伐中原地区的对手，属于绝对不可采用的最大的忌讳啊！凭借当今金国大举入侵，祸害比当年的齐国严重得多，我朝军队平常不加以训练又比当年的鲁国差劲儿得多，可议论政事的人竟然想向高丽国求借援兵，这与鲁国向楚国请求出兵援助、夺取谷邑又有什么两样呢？这表明陛下只知道军队的威力还没发挥出来，却不清楚兵将尚未得到训练啊！真可以为陛下痛哭流涕的事情，正是这一桩啊！

我朝建立初期，四川的后蜀和岭南的南汉，各自自称皇帝。湖北的南平国和江南的南唐仅仅向我朝进贡称臣，西部和北部的少数部族尚未全都归服。太祖皇帝对将帅的任用特别留意，命令李汉超等人镇守瓦桥关以南地区，命令郭进防御北汉势力，命令姚内斌镇守庆州。进而认为已经选任好名将，不深深地使他们从内心里感念朝廷的恩德，就没办法收到他们为朝廷拼死效力的结果，所以允许他们取得对辖区以内的州郡征收商业税所带来的财利，不只是用来供养和犒赏士兵，同时也让他们每个将帅之家富有资财。又考虑到他们每家的费用不充足，同时批准他们当中希望把家属迁回到京师居住的人的请求，并且厚厚地予以抚慰。这样一来，将帅的心中不再存有个人方面的忧虑，只管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边防事务上而已。太祖皇帝又担心书面陈奏的事务存在着关键和机密的地方还没全都讲清楚的情况，经常准许他们来到朝廷，自己当面陈奏。来到以后，就升殿并赐坐接待，回去时还重重地赏赐他们。因此边区将帅大多资财雄厚，得以召募和豢养拼死效力的人，让他们从事探听敌人情况的活动，由此对少数部族的内部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交战大多都取得胜利。二十年间，没有西北方面的忧虑，于是削平后蜀，收复湖北湖南地区，

攻取南汉，消灭南唐，统辖起整个的东南国土。这虽然是众将帅的功劳，可实际上全都来自太祖皇帝驾驭将帅的力量啊！拿现今的将帅和副将来看，论起雄盛挺立，又有谁比得上当年的李汉超呢？论起才干谋略，又有谁比得上当年的姚内斌呢？论起镇定稳重，又有谁比得上当年的马仁瑀呢？论起运筹于幄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又有谁能比得上当年的韩令坤呢？再拿陛下驾驭众将帅来看，又哪里比得上太祖皇帝呢？然而却把大权交付给他们，用显赫的官爵品级作为他们的俸禄标准，赐给他们重重的奖赏，关于恩赏礼数已经超过先朝好几倍了。这正属于陛下选任将帅比不上太祖皇帝，可对将帅的恩赏礼数却超过了太祖皇帝，这恰恰足以诱发众将帅的骄纵之心，助长奸臣的非份奢望。假设收复了河北河东地区，迎回了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陛下再用什么去优待那些将帅们呢？

取得战斗胜利的部队，勇气和智谋会增长百倍；打了败仗而逃命的士兵，至死也不会重新振作起来。这是因为战斗获胜的东西，靠的是那股士气啊！现今的士兵，还没交战就已经士气丢光了。这正是天下最使人忧虑的问题啊！从前战国时期，秦国人在崤山以东派出部队，打开函谷关放对方进来，可齐、楚、燕、韩等六国组成的联合部队全都徘徊逗留，不敢挺进。然而长平大战失败后，赵国的老将廉颇还能够整顿起战后的剩余力量，在北面摧毁了燕国将领栗腹率领的攻打赵国的部队，在西面抗击强大的秦国，振作刷新，磨砺锻炼，决不自行屈服。这时候，秦军又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魏国国王派遣新将军辛垣衍来到赵国，打算让赵国尊奉秦国为帝，而齐国高士鲁仲连慷慨陈辞，激动得泪流满面，深切地认为绝对不能这样做。这不光是痛惜尊奉秦国为帝的那个虚名，更是痛惜天下的整个形势存在着绝对不能这样做的情状啊！可如今议论政事的人竟然认为应该尊奉金国，决不能稍微违抗金国的心意。陛下对这种人为什么不用鲁仲连与秦国抗衡的事情训示他们呢？既然如此，那么，对目前军队的威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春秋经》到底是针对什么而撰写的呢？它是针对当时的天下没有最高的君主而撰写的呀！周朝衰败以来，天下不知道还有什么最高

的君主,国君的卿大夫窃取把持着一国的权力,卿大夫的家臣凌驾于卿大夫之上。圣人孔子对这种状况深怀忧虑,于是撰写《春秋经》来代替一代新王的封赏与惩罚。特意记成"天子"或"王"、"天王"这些字眼的,全都代表着惩罚与封赏的最高权力啊!其中记成"天子"或"王"的地方,都属于一般的字眼使用,而使用"天王"的地方,就属于最高的字眼使用了。《春秋经》中的"天王"和《周礼·司服》中所称呼的"天王",都是出于新君刚登上君位,为君之道尚未显现出来,人心还没安稳下来,正处于新君危险、国人惊疑的关头,也是要篡权夺位的奸贼暗中找机会下手的时候,属于异乎寻常的阶段,所以就加重那威势武力来做预防啊!特意用"天王"这个字眼的,是说正处于加重那威势武力来使天下做预防的阶段,因此强调异乎寻常啊!然而又记成"天子"、记成"王"这样的字眼,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强调《春秋经》撰写成,周王室的威权已经丧失掉了,大政和大法,诸侯擅自就施用它们,依仗自身强大人多,递相吞灭。这纯属根本和末稍完全颠倒的世道和名分彻底淆乱的时代。不是那刚强雄健异乎寻常得像《易经·乾卦》倒数第二阳爻所象征的真龙天子,就不足以将那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不是像唐太宗那样对残害百姓的各股势力进行剿灭性的军事打击的帝王,就不足以将那淆乱的局势平定下来。所以圣人孔子对于《春秋经》中只要是出自王室而采取的行动,全都选用"天王"这样的字眼来作记载,意在强调处于这个时候,一代新王的做法应当是实行严厉的惩罚和重大的封赏,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处置,这同后世兴起的帝王懂得灵活处置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时期,吴国和楚国的君主全都像猫头鹰那样窥视,像老虎那样蹲立,超越名号,自称国王。各个少数部族和他们的众多首领,逐渐占据中原地区。在这种局势下,文辞一类的告诫,仍然能够治理得了吗?当上霸主的诸侯和凶暴的国家,递相吞并,留存下来的由周王室册封为伯爵、子爵的国家,算起来还不够十个。在这种局势下,惩罚或封赏的命令,仍然能够治理得了吗?所以孔老夫子说:假如有人任用我,我将要使周朝的治国之道在东方复兴吧?在东方复兴的治国之道,仅仅留存下礼制规定的条文罢了,并不是拨乱反正的办法

啊!因此《春秋经》必定要选用"天王"这个字眼,是说处于大乱的时候正该施行封赏与惩罚啊!如果那时的事件不是由周王室发起的,就仅仅依从诸侯对周王室的称呼,只用"王"这类字眼来做记载,这属于例常的礼节啊!专用"天子"这类字眼做记载的地方,正是表示人们所讲的最高的君主去亲近诸侯呀!但对周庄王不用"天王"这个字眼作记载,是因为他宠爱背逆而弑君的人,没资格配得上最尊贵的称呼,所以就去掉那个"王"字,用来加重对他的讥斥。加重对周庄王的讥刺,鲁桓公的罪恶也就显而易见了。《春秋经》中大逆不道而弑君的人,在外部是从卫国的州吁杀死卫桓公开始的,在内部是从鲁桓公杀死鲁隐公开始的。圣人孔子像这样来显示出他们的罪恶,等于说世道大乱,随从罪恶的人就众多,趋向良善的人就很少。对良善的人不授予官爵,这就表明封赏不足以发挥出激励的作用。对非常奸恶的人不予以诛杀,就表明刑罚不足以发挥出惩办的作用。封赏和惩罚施行不了,却能使衰败转为兴盛,去除掉祸乱,这种事情是从来没有的。陛下刚刚登上帝位,正是《春秋经》所讲的新君危险、国人惊疑的关头,也是号称天王去统领下面的时候,可朝廷大权竟然全被权臣窃据在手中并加以玩弄,太阿宝剑的剑柄被别人所操持,收回来可就太难了。这就属于陛下面临着《春秋经》所载述的大乱情景却没有《春秋经》所强调的封赏与惩罚的威权,那还凭借什么去驾驭各路英雄而平定大乱呢?

臣下我私下观察,我朝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攻取天下的原因,关键在于封赏和惩罚这两宗事而已。当时进行封赏,常常很轻微,而予以惩罚,却常常很严厉。正值澶渊之战的时候,李继隆立有奋力交锋、击破辽兵的功劳,可对他只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阶罢了。臣下我对真宗皇帝为什么封赏得这样轻微感到奇怪,其实具有深意,认为斩杀了辽将却没击破他的部众,这属于可以对将帅进行责备的地方。朝廷有已经委任的将帅而唯独封赏宦官,不能给后世确立起法则来,这是对李继隆封赏轻微的第一种原因啊!又认为自古宦官掌领军队,没有不酿成祸乱的。像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内侍王继恩出宫平定了蜀地的动乱,立有大功劳,也只是授予宣政使的官职而已。谨慎

地持守先帝的法度而不敢违背，这是对李继隆封赏轻微的第二种原因啊！至于用刑罚进行控驭，却未曾不严厉。例如主将战死，就对负责接应的副将降职罢官，像王继勋就是这样；也对主将的亲兵斩首示众，像荆罕儒就是这样。威令既像这样严厉，人们就全都拼死效力，追求封赏。所以太祖皇帝的用兵法则，罪在不赦；而《春秋经》的用兵法则，更在指挥调遣部队上非常严厉。

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军队彻底战败，主帅成得臣由此而死。《春秋经》记载楚国处死了它的大夫成得臣，这是说成得臣罪有应得呀！晋楚鄢陵之战，楚国又彻底战败，主帅子反由此而死。《春秋经》记载楚国处死了它的大夫公子侧，这是说子反罪有应得呀！他们两个人都因违反军纪丧失了部队，逃不掉被处死的惩罚，可以从中看出少数部族用兵打仗，在刑罚方面常常很严厉而中原地区却常常很宽松，这是少数部族常常打胜仗的原因所在。从鲁成公、鲁襄公以后，中原地区多次被吴国、楚国挟制住，也是具有来由的了。如今军队的威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一和金国交战就败退，这正表明存在着《春秋经》所载述的大乱情景却没有《春秋经》所强调的封赏与惩罚措施。臣下我因而说：封赏和惩罚不足以把苟且怠惰的风气振作起来，这正标志着朝廷大权转移到了臣子的手中啊！如果真让朝廷大权转移了，陛下也就只是拥有一个皇帝的虚名罢了，还对明令训诫不足以把狂荡背逆革除掉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然而臣下我很愚昧，看不出狂荡背逆的人都有哪些人。是认为前些日子攻击并违逆权臣的人属于狂荡背逆的人呢？还是认为陛下身边逢迎得宠的人属于狂荡背逆的人呢？如果认为前些日子攻击并违逆权臣的人纯属狂荡背逆的人，那么，臣下我不敢接受皇上的看法。如果认为陛下身边逢迎得宠的人纯属狂荡背逆的人，那么，陛下哪里不能够果断地斥逐他们呢？私下想来，陛下不能够斥逐他们的原因，这是由一切都全权交付给权臣去办理的弊端所造成的呀！自古以来，就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臣下去办理当成盛明美好的举措，然而有的凭借这一举措实现了大治，也有的凭借这一举措而败乱。汉高祖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众英杰去办理就实现了大治，然而到了后来，西

汉王朝把一切都交付给王凤、王音去办理，到了王莽那里，也就败乱了。东汉光武帝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二十八将去办理，就夺取了天下，实现了大治，然而到了后来，东汉王朝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后妃家的人去办理，到了董卓、吕布、袁绍和袁术那里，也就败乱了。曹魏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荀彧去办理，就实现了大治，到了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司马懿去办理，也就败乱了。唐太宗驾驭英雄豪杰，就夺取了天下，实现了大治，到了唐玄宗，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李林甫、杨国忠去办理，也就败乱了。开始时凭借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臣下去办理，天下都实现了大治，可到最后仍旧凭借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臣下去办理，天下都归向了败乱，这是什么弊端造成了这种情势呢？在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臣下去办理的时候，破格提拔十个人，皇帝往往至少同意其中的九个人，这标志着有十分之九的恩惠是臣下施布给被提拔的人的。这样干下去，几年以内，皇帝前后左右的人就都是权臣的党羽了。如果降职罢免十个人，皇帝往往至少同意其中的九个人，这标志着有十分之九的威权是臣下行使给被降职罢免的人的。这样干下去，几年以内，朝廷内外和远方近处就没有再敢违逆权臣的人了。因此忠义之士解体而皇帝的威势就孤单了。前些日子将相大臣随意诛杀朝士，冤枉到没罪的人，可陛下却一点儿都不能制止，这难道还不是把一切都全权交付给臣下去办理的弊端吗？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叛乱的惨祸，距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啊！这能不让人感到寒心吗？

时至今日，天下的主体方面已经全都败坏了，只有我朝列祖列宗的恩德施布的泽惠尚未泯灭，人心尚未厌弃，这就好比瘦弱的病人奄奄一息，等着死去，只有那气血还在体内运转罢了。假如真使人心一旦背离了，这就如同气血眼看着断绝，天下就没有再能讲论的地方了。陛下把农业生产还没有稳定下来、旱灾蝗灾伤害每年的收成当成一块心病，这正属于众百姓失掉本业、人心眼看着要背离、气血眼看着要断绝的时候呀！审慎地考查《春秋经》记载奇异灾象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常常与人事相应合。奇异灾象在天上显现出来，祸败就在天底下作出应合，这就如同烧红的铁块被上下敲打，结果亲眼能看

到被敲打成什么形状啊!《春秋经》只要是记载成"螽"的地方,都是伤叹旱灾蝗灾损害庄稼啊!然而记载成"螽"的地方总共有九处,而在鲁哀公十来个月以内,就集中加以记载,这是说太严重了。所谓太严重,是痛恨鲁哀公祸害百姓太厉害呀!查考这段时间是在第十三年以内,而率领军队讨伐哪个国家,侵扰哪个国家,俘虏了哪个国家的部队,在哪个地方交战,比起鲁国其他国君在位的年份都特别频繁。战争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分残酷地殃害众百姓了,生灵到这个时候已经化成血肉了。在黄池举行的会盟,属于少数部族主持的会盟,中原天下已经日益趋向灭亡了。可鲁哀公竟然还凶猥地征收田赋,民众怨恨,祸患酝酿成熟,年景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人们遇上吃不饱的痛苦事。圣人孔子在此处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三次记载下"螽",这是深表哀伤啊!由此可知,旱灾蝗灾带来的祸殃,实际上是在战争和人们怨恨到极点以后所引发出来的必然现象啊!

连年以来,金国四处横行,战火猛烈燃烧而不止熄,未曾有过一年以内而不交战的。老百姓一天比一天疲弱困顿,周边的少数部族一天比一天嚣张放肆,天下不再晓得什么是生存的快乐,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遭受战争创伤的老百姓,肝脑涂地,坟墓也被发掘,罪过延及到了死人的骨头,鲜血流淌和肉体腐烂的人,不知涉及到几亿万生灵的性命。陛下对此却是看不到的。士兵死在边境的荒野上,做妻子的为自己的丈夫而哭泣,当母亲的为自己的儿子而哭泣,寡妇和幼弱的孩子抱住载运空棺材的车子,在千里以外遥望冤魂,进行吊唁哀悼,路上充满悲鸣,街巷一片哭泣声,怨恨和哀痛布满了天空。陛下对此却是听不到的。陛下看不到那些应该看到的惨景,听不到那些应该听到的悲鸣,把人们驱赶到必死无疑的战场上,最后却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功效。众口不断毁谤,就会把人置于死地;怨恨不断加剧,就会伤害天地协和的状态。阴气聚成的反常现象涌现出来,灾殃和瘟疫四处蔓延。这还对农业生产尚未稳定,旱灾蝗灾伤害每年的收成,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今河北河东地区以及淮河一带,赤地千里,飞蝗遮蔽了天空,公卿大臣却看惯了,没办法去应对,请求采取驱赶蝗虫的行动。哎呀呀!假如蝗虫恰恰可以驱赶走,这等于是把心

腹部位所得的疾病转移到大腿和胳膊肘上去，不知道其他地区的民众，又会有什么苦痛事降临到头上啊！

臣下我听说天禧年间，真宗皇帝鉴于连年发生旱灾蝗灾，秋季的庄稼成熟不了，慨然心动。这实际上是考虑到政令存在不完备、有缺陷的地方，对皇天的意旨有所违背，随后就发布诏书，命令去除茶叶和食盐贩运交税方面的严峻苛酷的条文规定，来对旱灾蝗灾的反常现象引起警戒。拿现今政令的不完备和有缺陷来说，又哪里只是茶叶、食盐这一两个方面有问题就算到头了呢？臣下我很清楚，旱灾蝗灾构成祸害，实际上是皇天的意旨在对陛下进行严重的警告啊！可议论政事的人还在讲什么天灾流布蔓延，是由既定的历数和运会决定的，并不是政令不恰当造成的罪罚。哎呀呀！天底下有吉善的事情，就把功劳归在自己的头上；天底下有祸患，就把罪过归在皇天的身上。这可是哪家子圣贤的用心呢？臣下我希望陛下稍略止息一下对金国讨伐的军事行动，稍略止息一下对百姓的人力物力的调发，训练好部队，储备起粮食，培养我朝军民的锐气，保全住华夏大国的力量，消除掉旱灾蝗灾。不要因为那样地精诚却收不到效果就懈怠荒废，不要畏惧祸乱很难平定就失掉志向。把《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持守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把民间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当成是该嫌弃的玩艺，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点了。

陛下在中间部分用以上的问题来策问臣下我等人，又念及到要把皇室亲属从金国接回来，确定下国家的边界，清除盗贼的捣乱，使社会风尚变美好，让百姓安居乐业而美满地迎来那太平的政局，究竟该修明哪些要务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呢？臣下我从这段话中看出陛下真想使衰败转为兴盛，去除掉祸乱，来医治好天下的病痛啊！臣下我私自观察，陛下在策问的起始部分就讲怀揣父母兄弟被金国带走的忧虑，在中间部分又念及到迎回皇室亲属的使者问题，到这里又用要把皇室亲属接回来进行策问。这表明陛下深痛地惦念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的銮驾暴露在外，但还没有迎回两位皇帝及其随从人员的好计策呀！

汉高祖把自己的父亲太公从西楚军营中接回来，哪里光是候公一个人的力量呢？臣下我曾经推断高帝有五处胜过西楚霸王项羽的地方。拿兵强力壮来说，西楚就比不上汉朝；拿对萧何、张良、韩信这三杰的任用来说，西楚就比不上汉朝；拿驾驭众位将领来说，西楚就比不上汉朝；拿关中地区粮食的充足来说，西楚就比不上汉朝；拿关中地区地理形势的重要性来说，西楚就比不上汉朝。这五个方面都是西楚霸王项羽比不上高帝刘邦的地方，他何苦还关押住太公不放呢？拿当今凋零衰败过后的情况来看，不具备汉朝那样的兵力，不具备汉朝萧何、张良、韩信那样的人物，不具备汉朝驾驭众将领那样的办法，不具备汉朝那样的粮食储备，而又离我朝上都开封很遥远，丢弃了河北河东地区，这又不具备汉朝占据关中地区的有利的地理形势，可却要谋求皇室亲属的回归，即使像当年侯公那样的使者派出成百上千个去，臣下我也知道他们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呀！因而臣下我认为，打算接回皇室亲属，没有比收复河北、河东地区更重要的了；河北河东收复不了，皇室亲属就接不回来。

如今陛下把确定下国家的边界作为心事，这正是打算收复河北、河东地区呀！河北、河东地区占领与否，拴系着整个天下的重轻。唐高祖从晋阳崛起，依靠一支五百人组成的军队夺取了天下，可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借整个天下去收回由三个藩镇控制的河北地区，难度就大得像这样呀！晋国在春秋时期属于霸主，曾经驱遣役使诸侯，到秦国聚集起精兵开进到晋国，夺取了韩原，于是就割断了天下诸侯对晋国的尊奉。韩信把齐国、燕国、赵国的旧地连成一片，控制了该地区，因而蒯通很清楚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最终命运究竟如何完全掌握在韩信的手中。南朝宋武帝号称英雄，攻占了蜀地和关中地区，重新占领了晋朝十分之八的原有疆域，但却不能够派遣一个人渡过黄河去打对方边境的主意。这表明河北、河东地区，称王天下的人占领不了它们就做不到称王天下，称霸天下的人占领不了它们就做不到称霸天下，盗贼占领了它们就天下不安宁。臣下我所以说：占领不了河北、河东地区，皇室亲属就没办法接回来。

咸平年间，真宗皇帝与王济全面透彻地议论边境的事体。王济

说，这些蠢笨的辽国人，竟敢像那样欺侮凌驾我朝，大致上是因为我朝富有谋略又在位的大臣，没有能和从前比得上的人，况且国家所依仗的，只是黄河一条天险防线罢了。现今确实是把获取到贤才作为头等大事的时候了。否则的话，臣下我唯恐北方的辽国军队在黄河边上饮他们的战马了。哎呀呀！王济这番话，的确切中了今天的病态。臣下我认为要想接回皇室亲属而收复河北、河东地区，也确实是陛下把获取到贤才作为头等大事的时候了，应当把王济的话语当成一面镜子啊！

然而当今最严重的祸患，说起来有皇室亲属还没接回来，国家边界还没得到确定，盗贼的捣乱活动还没清除掉，可臣下我很愚昧，却感到最大的祸患是社会风尚的败坏呀！社会风尚属于天下的筋骨脉络，它就如同人的整副躯体，其中赖以维持气血流动的部位，只是那筋骨脉络罢了。社会风尚一败坏，天下的筋骨脉络就断绝了。汉朝和唐朝的灭亡，弊病都出在社会风尚首先败坏了呀！因而臣下我曾经论说东汉的灭亡，大致上同李唐很相似。在东汉后期，宦官扰乱国政，毒害到天下的百姓。豪杰占领郡县纷纷起兵，于是天下分裂成魏蜀吴三国。在唐朝末年，宦官在朝廷上蛀空国家，藩镇在地方上纷纷割据，于是天下厮杀成五代。然而三国时期的士人，他们喜好什么和憎恶什么，离开哪里和归向哪里，还有可观的地方。尽管皇天已经厌弃了东汉的国运，但刘氏仍然保持着皇帝的那个虚名，到最后也把帝位让给了曹魏。五代的动乱一直延续下来，每个朝代的臣僚全都凶恶狠毒，顽劣粗野，杀害君主和亲兄弟，专门成为奸诈的头号人物。这哪里是皇天偏在东汉后期让君子生出很多来，到了唐朝末年就专让他们成为小人呢？这确实是社会风尚习染激扬才形成那种情形的呀！

中原败乱灭亡，自古一朝取代一朝，也是天下的常事，因为世上没有永不灭亡的国家。然而就在那个时代，有依从皇天推断变故而作论说的人，有凭借预知人事变化而作论说的人，有恪守节操去死的人，有保卫国家而死的人，有对国家破灭深感悲愤而奋不顾身并且整个家族都毁灭的人，有看出征兆而把官帽挂在大堂上径自离去、不卷入祸难的人。我们国家培植养育天下，时间很长了；士大夫蒙受君主

的恩赐,也时间很长了。可一旦国家碰上了灾难,从享受佩剑穿靴上金殿的特殊待遇的公卿,以及下面的文武百官总共该有多少人,从京师地区一直到四方郡县担任官职的人又总共该有多少人,这些人中预知人事变化而作论说的人又是谁呢?为名节而死或为国家而死的人又是谁呢?毁灭家族、为国捐躯的人又是谁呢?看出征兆而把官帽挂在大堂上径自离去的人又是谁呢?依从皇天推断变故而清楚国家面临灭亡的人又是谁呢?

正当西晋王朝迁移到江南的时候,知识层中还有人在建康的新亭上聚会,哀伤国家的衰落,面对江山禁不住流泪。西周王朝迁移到东都洛邑的时候,还有民间的寡妇不操心织布机上的纬线怎么样,但却忧虑宗周的殒落。拿现在徽宗皇帝和钦宗皇帝及其随从人员流亡到金国来说,并不仅仅是西周把都城迁移到东都洛邑那样的耻辱呀!而陛下仓悴惊恐地到很远的地方来避难,也不单单是西晋王朝迁移到江南那样的逼迫呀!可有谁又面对江山禁不住流泪,或者忧虑宗周的殒落呢?自从两晋社会风尚败坏下去,造成海内乱得一团糟,众百姓任人宰割,时间长得将近二百多年。拿两晋来和现今相对照,那些灾祸能够说得过来吗?

从前田横作为一名豪士,把面朝北来向汉室称臣当成耻辱,于是就自杀了,跟从他的五百多个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没有一个投降汉室的人。诸葛诞是曹魏王朝的一名叛臣,可等到他败亡的时候,他所豢养的三百多个死士在被处以斩刑时,全都说为诸葛公而死,并没有什么遗憾的。如今的士大夫蒙受国家的厚恩,这与齐国的士卒从田横那里蒙受恩惠,死士在诸葛诞那里受到供养,又有什么区别呢?但却忍受羞耻,含容污辱,面对我大宋君主遭受的凌辱而无动于衷。哎呀呀!纵然在田横的那些宾客面前不感到惭愧,又偏偏在诸葛诞的那些奴仆面前也不感到惭愧吗?臣下我因而说:如今最大的祸患,是那社会风尚的败坏呀!社会风尚一败坏,天下的筋骨脉络又眼看着断绝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把《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持守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把民间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当成是该嫌弃的玩艺,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

点了。

尽管如此，陛下对臣下我等人所策问的十几个问题，都属于当今的严重弊端，臣下我已经全面透彻地做了对答了，而皇上的圣明策问还是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一路上历经艰难险阻，前来应合朝廷广泛延揽英才的意愿，确实也太辛苦了。你们一定怀有想为皇帝我陈述的最为恰切的主张和意见，只管全部讲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至于炫耀空洞的议论却对实际没有补益，只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指责却对目前没有补益，这可不是皇帝我打算听到的东西。你们要陈述皇帝我从来没有闻听过并且又适合当前需要的意见，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从这段话中，臣下我又看出陛下确实有意求取到不厌其烦地反复劝导的言论，用来营救那天下的病痛啊！然而臣下我观看陛下求取那不厌其烦地反复劝导的言论，虽然像是非常殷切，可在殿廷上应试的读书人必定不敢毫无忌讳地把话全都讲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臣下我听说喜鹊窝破碎了，凤凰就决不会来到；正直的读书人遭到惨祸，忠臣就会闭口，什么也不再讲了。前些时候臣下我从东南来到扬州，一路上只见议论纷纷，都说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杀死了三名直言不讳的人。真有这种事情吗？恐怕是路上人的胡乱议论吧？如果真像他们所议论的那样，也就有伤威权，损害仁德了，它所造成的危害可就不小了。

审慎地考查《春秋经》，上面记载说：陈国杀死了它的大夫泄冶。解释《春秋经》的人认为，泄冶因直言劝谏而被斩杀，国人非常憎恨陈灵公。这时正是鲁宣公九年，到了第十年，陈国发生了徵舒射杀陈灵公的祸乱。到了第十一年，楚庄王进入陈国。在前后不满三年时间里，陈国就大乱了。哎呀呀！斩杀直言劝谏的臣子的祸乱竟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然而泄冶被斩杀，权力不在陈灵公而在徵舒那里。前些日子我朝议政的人士被斩杀，权力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大臣那里。擅自斩杀人的祸乱，是《春秋经》非常憎恶的事情；况且又擅自斩杀直言劝谏的人士，对此就憎恶得更厉害了。这正是楚庄王进入陈国，找到借口来讨伐徵舒的原因。既然如此，金国瞅准机会，将会借用讨伐《春秋经》所憎恶的对象的名义，跟着楚庄王进入陈国的路子走了。

臣下我因而推测在殿廷应试的读书人，必定不敢毫无忌讳地把话全都讲出来啊！然而臣下我仍然敢从内心竭尽那一点点儿愚昧的想法，原因是私下里只想到，陛下命令臣下我等人不要炫耀空洞的议论，陈述实际的事务，这就表明陛下知道前些日子随便杀人属于过错而应改正，标志着陛下乐意听到自己的过错了。做臣子的却不讲出看法来，这属于辜负了陛下；让做臣子的讲出看法来却不采纳，就是陛下辜负做臣子的了。

不过臣下我曾经听说，在太平兴国年间，有个民间读书人秘密献呈奏章，言语很狂妄。太宗皇帝读过以后却不加罪，随即对宰相说：接连下达诏书，准许人们奏呈事情，因而尽管狂妄背逆，也不要给他定上罪名。到了淳化年间，武程献呈奏章既狂妄，又乱说一气，李昉请求对他予以罢官，叫他作为教训。太宗皇帝却责备李昉说：我们大宋什么时候因为言论却给人定罪呢？哎呀呀！太宗皇帝高兴听到爽直的言论达到了这般地步，可大臣尚且请求斥退敢言的人士。幸好太宗皇帝拒不听从，假设太宗皇帝不高兴听到爽直的言论，李昉的奏请也就采纳了。这样一来，武程也就成了案板上的肉块了。如今臣下我对答了数千上万字，那罪过要比当年秘密献呈奏章的人还严重；拿臣下我的粗疏卑贱来说，要比武程还厉害，也有狂妄又胡说一通的言论。纵然陛下高兴听到忠直的言论，尚且担心遭到忌讳；假使君主一旦厌恶切直的言论，又有像李昉那样的大臣趁势加以陷害，那么臣下我讲了半天，也就太危险了。万望陛下要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追念的对象，扩展太宗皇帝采纳谏言的度量；大臣体悟陛下的用意，没有李昉厌恶切直言论的心思。这样一来，畏惧回避而不敢把心里话全都讲出来，也是臣下我私自感到可耻的事情。臣下我所以说：希望陛下把《春秋经》作为戒条来谨慎地持守它，把我朝的列祖列宗作为镜子来大力地遵行它，不要把民间一个读书人说的话当成是该嫌弃的玩艺，就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天下真是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承中否之运，获奉大统，六年于兹。顾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夙兴夕惕，靡敢康宁。悯国步之久艰，悼已事之失策，虚心求治，不惮改图，故详延子大夫于廷，咨当世之急务，冀闻长计，以兴大业，将核其言，收其用，非特循故事，设科举、塞人情而已。

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芟夷大乱，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业，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今赖四方黎献，翊戴眇躬，列圣之泽未远也。朕焦心劳思，不敢爱身以勤民，然屈己以和戎，而戎狄内侵；招携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济而廪乏羡储；以军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严赃吏之诛，而不能革贪污之俗；优军功之赏，而无以销冒滥之风。方今非外攘夷狄，则不足以靖民。取于民有制，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为人父而榷其子，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

朕弗明治道，仍暗事机，凡此数者常交战于胸中，徒寝而不寐，当食而叹也。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宜考前世中兴之主其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祖宗传绪累世其法度有可举而行者，平时种学待问、奇谋硕画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其悉意以陈，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遭受由盛转衰的恶运，登上了帝位，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但祖庙仍然没有收回，我朝两位皇帝及其随从人员还在遥远的金国，因而每日惊惧警惕，不敢有片刻的享受和安宁。忧伤国家命运的长期艰难，痛惜以往重大政事的失策，

虚心谋求大治，不害怕更改方略。所以把你们这些读书人全都延揽到殿廷上来，询访目前国家最急迫的事务，希望听到长远的计谋，用来振兴国家的大业。皇帝我将要验核你们的意见，收到实际的效用，不光是沿用已往的惯例，开设科举，敷衍人情就算完事了。

古代英明的帝王，承接中途衰落的世道，利用渴求国家大治的百姓，消除平定十分严重的祸乱，往往事半功倍。少康凭借由五百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周宣王把衰败的国势振兴起来，使周朝重新隆盛；东汉光武帝用三年时间，使汉朝国运得到重振；唐肃宗用两年时间，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这都是承受前代的帝王统系和基业，整治了混乱局面，恢复到正常状态，像这样地容易啊！如今依赖四方百姓拥戴我登上了帝位，这表明各位先帝的恩泽还没远离啊！皇帝我心焦如焚，一再思虑，不敢爱惜自身怎么样，而去为民众操劳。然而委屈自己来同金国讲和，而金国却继续向我大宋内地入侵；招抚离去的人，用来消除盗贼，可盗贼仍然气势嚣张。把粮食作为紧要政务，可水道运粮却接不上，国家粮仓缺乏充足的储备；把军队作为重大事情，可选练士兵还不精锐，部队中还有大量多余的人员。官员众多杂滥，而丧失职守的人还为数很多；农田大多荒芜，而回到本业的农民还为数很少。强化对贪官污吏的惩办，却不能革除贪污腐化的邪气；加重对军功的封赏，却没办法消除不合格而滥加任用的歪风。当今如果不对外驱逐金寇，就不足以使百姓安宁；按固定的数额对百姓征收赋税，就不足以满足大量的军费开支。身为万民之父，却不断向自己的子民征税，那么他又凭什么保护子民而称王天下呢？

皇帝我不明白治国大道，同时也对事情的契机闹不清楚。总共以上这几种矛盾，经常在胸中碰撞，只是躺下却难以入睡，面对饭食就叹息。你们这些读书人已经同国家经受灾难很长时间了，应该考察前代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君王，他们施政的顺序对当今很切合的东西；考察祖宗把帝位传下好多代了，他们的法度可以施行的地方；以及你们平时积累学问，等待朝廷询问，来自个人所得并能挽救国家危难的奇谋和远大筹划，把这些全部用尽心思陈述

出来。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张九成　廷对策

张九成(1092～1159)　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第一,时年41岁。后官至礼部、刑部侍郎。因反对和议,遭奸相秦桧忌恨,长期被贬谪在外。桧死后,起知温州。其精研经学,多有训解。有《横浦集》等传世。

臣对:臣闻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商道不衰,何以见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见宣王?汉无昌邑之变,则无以启宣帝;唐无宫壶之变,则无以启明皇。是以知君天下者,遇祸逢乱,当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灼知此理,然后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臣尝历考前古兴衰拨乱之君,以为莫善于宪宗,莫不善于文宗。何以言之?宪宗当唐室陵夷之际,藩镇跋扈,主权下移,乃能左顾右盼,慨然起恢复之心。不幸廷臣异议,刺客在朝,京师皇皇,朝不谋夕,惟宪宗当宁发愤,屏声却欲,讨贼之心愈厉,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淮蔡,元和之功,卓然为天下冠。此以刚大为心者也。文宗当昭愍之后,阉寺执柄,主威不宣。虽能高举远蹈,毅然有扫除之心,不幸委任失当,害及非辜,甘露之祸,言之使人酸楚。岂非文宗遽以泣下沾襟,魂飞气索,自比周赧又自比汉献,又自谓无与尧舜,又自纵酒以伤其生,悲辛愁苦,不复以朝廷为意。此以惊扰自沮者也。故臣尝断之曰:若宪宗可谓知天意之所在,若文宗者又何足与论天意哉?盖祸乱之作,正圣人奋励之时也,何至以惊扰自沮乎?

今陛下痛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又悯国步之久艰,悼已事之失策,然深察祸乱之故,是乃皇天所以启至圣也。伏惟陛下谨之重之,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庶几与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等相揖于千载之上,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不胜臣子至愿。然以刚大为心者,要当夙兴夜寐,恶衣菲食,屏远便佞,登崇俊良,好切直之言,戒声色之惑,先定规模,以定大事。

臣观古之圣人，将大有施为于天下者，必先默定规模，而后从事。其应也有候，其成也有形，非若顺风扬帆、一求快意而无所归赴也。商君之法，非良法也，然而规模先定，故能兵雄天下，臣服诸侯。苏秦之术，非善术也，然而规模先定，故能合六姓之异，却强秦之兵。淮阴对高帝，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无一不如其言者，规模先定故也。耿弇对光武，以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无一不如其言者，规模先定故也。

伏仰陛下欲迎九庙，归两宫，安国步而康庶事，式扩规模，固已定于圣心，而又元枢捷报，歼厥渠魁。自前世之君观之，固有满假而自大，以速天下之谤者矣。独陛下不然，乃执谦不居，躬御便殿，亲颁德音，以前世中兴之君为问；至于攘夷狄，弭盗贼，足食练兵，澄冗官，复农业，革贪污而消冒滥，宽民力而给车徒，前世中兴之施为，祖宗传绪之法度，下询于承学之士曰：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勤也。臣虽智识浅陋，然而仰见规模宏阔深大，辄整冠肃容，再拜稽首曰：猗欤盛哉！有君如此，天下何忧乎？宗庙社稷何忧乎？二圣六宫暂当淹恤亦何忧乎？臣学术至空虚也，然忠愤所激，敢不敷陈管见，上裨日月之光？臣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承思治之民，芟夷大患，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所以为中兴之本也。臣闻禹有治水之德，民心怀之，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历年四百六十有二。少康一旅而复有夏者，祖宗之德在人也。稷有播种之德，民心怀之，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历年八百有余。宣王兴衰以隆成周者，祖宗之德在人也。汉高祖有宽仁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而历年至于四百。然则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者，岂非蒙高祖之德哉？唐太宗有仁义之德在人，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而历年仅及三百。然则肃宗再岁而复两京者，岂非蒙太宗之德哉？皇宋一祖六宗英灵在天，功德在民，中兴之运正归今日。倘能扩此规模，济以兢谨，果何往而不可乎？

伏读圣策曰：今赖四方黎献，翊戴眇躬，列圣之泽未远也。朕焦

心劳思，不敢爱身以勤民。然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祖宗之德，士民之归，将乘此时为两宫中国雪积年之耻也。臣观金人有易弱之势三：夫好战者劳，失其故俗者敝，人心不服者离，而金人皆与有焉。臣请为陛下历陈之。始皇并吞六国，可以止矣，恣心快意，复征南越，曾不知骊山之役未成，而二世、子婴已被害而就擒矣，此以好战而伤也。隋文帝远平江东，可以止矣，炀帝嗣位，亲驾征辽，曾不知锦帆未过隋渠，而大盗已据其都矣，此亦好战而伤也。金人负其勇锐，自靖国兴兵，越于今三十余载矣，适国家当此否运，乃敢因势乘便，犯我民人，侵我疆土，夺我两河，又捣我都城，又要我二圣，又入我淮右，践我江浙，转战经年，恃其士马之盛，而不知民力固已殚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此臣所以言好战必伤也。

西晋之乱，兵燹侵陵，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资，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宜有以自立，然不过一传再传而已。何也？君臣相戾，上下不安，虽建都邑，立城社，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寓于其间，其可恃乎？金人既灭契丹，复陵中国，中国声名文物，洵非遐陬所及，然承平日久，士人或溺词章，小人共安畎亩，怯战斗而恋身家，使金人乐而效之，其亦易弱也。此臣所以言失其故俗必衰也。

始皇灭韩，张良奋椎击其车；朱泚僭号，段秀实提笏击其额。以今日我士庶蒿目时艰，固亦有豪杰慷慨之士欲图之久矣。而又凌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有臣仆之耻，将见有愤惋郁结而思变者矣。此臣所以言人心不服必亡也。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

然金人虽有易衰之势，而我有必兴之理，不可不讲也。臣观古人所以谋人之国，必有一定之计。越王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六国，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离间其君臣而已。今越之计，秦之计，高祖之计，宜次第而用之。当先用越王之法骄之，使其侈心肆意，无复忌惮，天其灭之，将见权臣争强，篡夺之祸起矣。臣请备论越王所以取吴之术，惟陛下听之。

范蠡曰:卑辞厚礼以骄之。越王则自称曰草鄙之人,自称其国曰贡献之邑。范蠡曰:玩好女乐以骄之。越王则先之以皮币,随之以管簫,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其称吴为天王者,范蠡使尊之以名也;其请亲为前驱者,范蠡使以身为市也。今日之金人,当损益其法可也。

呜呼!越王含辛茹苦,志在报吴,非笃志之君,其孰能之?以民之不蕃,而兵之不给也,乃下令于国中曰: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则罪其父母。生男子也,赐束修一犬;生女子也,赐束修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支子死,当室者死,则哭泣之,葬埋之如其子也。载脂与粱,以食孺子。身耕妻织,以裕国人。国人荷其恩,感其德,愤其土地之狭,而悯其会稽之耻也,于是父兄请战,不许;父兄则又请战,而致其辞曰:越四封之内,其视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敢不尽力乎?及其将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谓是行也,而可无死乎?陛下欲报金人,当先结吾民之心可也。

越王之在国也,觞酒豆肉,以分左右,饮酒不尽味,听乐不尽声,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病者问,死者葬,老其老,长其幼,慈其孤,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富者安之,贫者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南事楚,西事晋,北事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今陛下有是乎?如其有也,天下幸甚;若犹未也,伏愿陛下勉之。

越王归国四年,愤祖宗之仇,思欲一战以快心,范蠡曰未可也。五年而吴王信谗喜优,憎辅远弼,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七年吴王杀申胥,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七年而吴国稻蟹不遗种,又欲乘其间以伐吴,范蠡曰姑待之。今之金人,虽有易衰之势三,然而信谗乎?喜优乎?憎辅而远弼乎?曾杀贤如申胥乎?曾有天灾如稻蟹不遗种者乎?必也俟其天时去,人事失,然后可以图之。

越王归国二十年,乃得举兵以遂其志。其举兵也,必智以度天下之众寡,仁以共三军之饥劳,勇以断疑而决大事。又舌庸使之审赏,

苦成使之审罚，大夫种使之审物，大夫蠡使之审备，大夫皋使之审声。其将行也，则背屏而立，委夫人以内政；背檐而立，委大夫以国政。其至军也，则斩通行赂者；又明日徙舍，则斩不从令者；又明日徙舍，则斩不用命者；又明日徇军，则归无兄弟尽在军者；又明日徇军，则归有昏眊之疾者；又明日徇军，则归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令者。虽列国之君，不足以为今务，然其禁密如此，亦可喜也。故能一战而败吴于囿，再战而败吴于泓，又战而败吴于郊，夷其城，犁其庭，墟其庙，以雪积年之耻。陛下欲报金人，愿观其用心，而以越王之法用之，不亦可乎？

伏读圣策曰：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欲先靖中国也。臣闻唐太宗之说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尔。当去奢从简，轻徭省赋，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韩愈之说曰：刺史不得其官，观察不得其职，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而为盗也，亦幸矣。此皆论良民为赋敛所困，故不得已而为盗尔。

今日之事，则又甚于此。其横行于州郡，啸聚于山林者，类皆军兵尔。此曹在太平时，帖首妥尾，惟上之令。不幸中国多故，朝廷权轻，何尔动辄怨怒耶？而一夫倡乱，百夫从之；百夫倡乱，千万人从之。然使吾无间而可人，则朱滔不能起卢龙之卒，而李怀光不能强邠宁之兵。今其所以一呼响应者，其心不服也。其心所以不服者，无乃吾恭俭未至乎？用人未当乎？赏无功而罚无罪乎？

昔唐德宗放象豹，出宫人，以恭俭服天下；罢常衮，用崔祐甫，以用人服天下。赏淄青将士，以折其奸谋；杖邵光超，以惩其贪冒，又以赏罚服天下。时李正己持兵十五万，雄视山东，其将士闻德宗所为如此，皆投兵相顾曰：明天子出矣，吾辈犹反乎？不特此也，吐蕃恃其强大，以凌侮中国，非一日积也。德宗即位，使者归告其国主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威德英武，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遣使入贡。

夫德宗恭俭委任，信赏必罚，行于户庭之间，而强蕃悍卒自格于千里之外，使其恪守此心，终始不变，则贞观之风亦不难到，奈何其自败坏也。臣愿陛下笃恭俭，谨用人，明赏罚，以收天下之心。若曰我有

甲兵,可以诛其不服;我有招降,可以俟其改过。诚恐去一大盗,其事卒未已也。诚能用臣之说,非特悍卒格心,而蕃戎亦且悔过也。故臣以太宗、韩愈、德宗之事为献。

伏读圣策曰: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兵食之不可不虑也。臣以谓漕运不继,宜选财赋之官;选练未精,宜责将帅之职。唐代宗以国用缺乏,馈饷纷纷,独得一刘晏,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操天下赢资,而军用以给,以财赋得其人也。臣愚,欲于常赋之外创置一司,名曰军兴。凡关市榷酤,载在有司者,不与其数,独变通有无,权制轻重,使利归公,上敛不及民。出入钱谷,勾检簿书,则付之士类;书符檄,觇低昂,则付之皂吏。明敏精悍如刘晏辈,实司其职。夫何忧漕运之不继乎?

马燧之在河东也,驭马厮役,教以骑射,制甲有长短之等,造车为行止之宜,比及二年,得精兵二万,以将帅得其人也。臣愚,欲于冗兵之数创置一军,名曰精锐。凡攻卫战斗、功在有司者,不与此选,独招降之兵,擒获之兵,俾弓矢戈矛随器而使,有能者则书之尺籍,其无能者则驱之屯田。择强力勇毅如马燧辈,实司其职。夫何忧选练之未精也。

伏读圣策曰: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知吏农之不可不虑也。臣以谓吏员猥并,宜行辟举之法;田莱多荒,宜行屯田之法。昔沈既济欲宰臣叙群司,州郡辟僚佐,其意欲无失职之士也。臣愚,欲使宰臣精选太守、部使者之职,若群僚则太守辟举,若监当、若巡尉则使者辟举。举而不当,重者褫其职,轻者罚其金,吏部台谏得以纠正之。每辟一员,则具二人以待之;补者既上,则又辟一人以待之。前后相承,虽怠者亦励。

夫国家所以设官分职,将惟贤才之求,非为尔衣食之资也。志在衣食,胡不为工乎?为商乎?为农而力田亩乎?胡为在缙绅之列也?夫责之以士人,则朝廷待之亦不可轻。凡太守、监司之赴官也,若内或外皆陛辞而后行,监司为一辈,郡太守为一辈。当行之日,陛下亲御正殿,借辞色。告监司则曰:一路官吏,实汝之托。告郡守则曰:一郡

官吏,实汝之托。汝当夙夜以思,宣我所以爱民之意。予有大赉报汝功,亦有大罚惩不恪。庶几贤才并用,则失职非所患也。

昔邓艾欲行陈、颍以东屯田,两淮得谷五万斛,其意欲得复业之农也。臣愚,不敢远引,且以镇江一路论之。屯兵江口,无虑数万人。就以二万人论之,人必有家,家止五人,人日二升,日计二千斛,月计六万斛,则岁百万斛矣。顾此馈运,非由天降,非从地出,皆当取之于民。三吴之间,旱暵仍岁;长淮以北,草莽连云。去岁到今,米斗千余。今此下民,谁救其迫?而又追需急于星火,箠械酷于秋霜。开元屯田之法,振武屯田之法,不知其可用乎?

勋官八品以上,前资七品以上,此建官之法也。土柔则五十亩而一牛,土刚则二十亩而一牛,此耕耨之法也。如是之法,出于开元。募人为十五屯,屯置一百五十人,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极西,过云州界中,出入河山之险八百余里。寇来不能为害,人得肆耕其中。如是之法,出于振武。臣愿自淮以北,开置屯田,参开元、振武之法,非特足以招复业之农,而军储所资,亦足以宽其忧矣。

伏读圣策曰:严赃吏之诛,而未能革贪污之俗;优军功之赏,而无以消冒滥之风。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欲清流俗而惩侥幸也。昔毛玠为尚书,而士大夫不敢鲜衣美食;杨绾为宰相,而豪贵功臣为之撤乐毁第减骀御。赃吏贪污,流风远矣。臣愿陛下去声远色,躬俭节用,以励朝廷。朝廷宰相却苞苴,断货贿,以励猾胥而惩狡吏。又何患贪污之弗革乎?

昔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踵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皆如所欲而去。代宗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己用,乃擢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事出主意,宰相不知,缙等由是稍绌。臣今欲用此策,以消冒滥可乎?凡大将以功来上,陛下亲据其中一二人,晏见而劳问之。果有功者,优加拔擢;其或言语不伦、事涉诞罔者,痛加惩斥。又何患冒滥之弗消乎?

伏读圣策曰:方今欲外攘,则不足以靖民;取于民有制,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为人父而榷其子,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恤民如是之深也。臣伏读圣问至此,不觉涕泗交颐,仰知

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而天下弗知也。臣观滨江郡县为守为令者,类无远图;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湮实;湮实虚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流离奔窜,益以无聊。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彼所谓守令,独抵几而言曰:与其委之于盗贼,孰若输之于国家?呜呼!安得此委巷之语乎?堂堂国家,而下比于盗贼。不忠之罪,莫大于此矣。

夫节财即生财之道也。今藩方大使,各置使臣,收召亲戚,竭民膏血,以市私恩。或曰准备,或曰干办者,不知其几人也。色目纷纷难以数,举凡医巫卜祝之流,皆在其选。又诸县添置武尉,尤为无用,见敌则走,小胜则杀贫民以要功,居山则卖私茗,滨海则鬻私盐,未及交付,则已捕之为已功矣。不知平时剥肤椎髓,敛怨招谤,以廪此曹,果何谓也。臣愿陛下明降诏书,戒饬藩方,罢去武尉,以苏凋瘵。此亦保民之道也。

伏读圣策曰:朕弗明治道,仍暗事几。凡此数者,交战于胸中,徒寝而弗寐,当食而叹。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宜考前世中兴之主其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祖宗传绪累世其法有可举而行者,平时种学待问、奇谋硕画本于自得、可以持危扶颠者,其悉意以陈,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谦冲退托,将以追配前王,绍述祖宗,旁搜远取,以尽愚夫之虑也。

臣窃谓中兴之主,大抵以刚德为上。是故震伐鬼方者,高宗之刚;有严有翼者,宣王之刚;信赏必罚者,宣帝之刚;赳赳雄断者,光武之刚也。陛下之欲中兴,当以刚德为主。去谗节欲,远佞防奸,此中兴之本也。祖宗传绪之意,大抵以俭德为主。恭闻仁祖服浣衣,寝绝被,力行恭俭,不忍费一毫以伤民力。至今父老言我仁祖,必泣下沾襟。盖俭必仁,仁必能感天下。陛下欲绍祖宗,当以俭德为主。珍奇弗御,玩好弗求,此祖宗之意也。夫攘夷狄,弭寇盗,足食练兵,澄冗官,复农业,革贪污而消冒滥,宽民力而给车徒者,臣以一言而该之,不过曰刚与俭而已。

然刚俭之德，圣心自明，天下犹未信者，何也？臣窃有说焉。臣尝读《左氏传》，见吕甥论君子小人情状于秦穆公，何其切至也。其曰小人慭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又曰小人曰秦岂归君，君子曰秦必归君。又曰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夫士人所见高远，故其言多恕；小人所见浅狭，故其语易深。善夫孟子有曰：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夫百姓以齐王为爱牛，以小人之见每如此也。然小人满天下，而所谓士人者几何？虽家置一喙，言提其耳，不能胜众多之口也。则人主于食息晷刻之间，其可以弗谨乎？

夫文王一饭，武王亦一饭；文王再饭，武王亦再饭。是武王以身试文王之安否也。盖一饭则我力微矣，今吾亲一饭，而已力不其微乎？此其所以可忧也。再饭则我力强矣，今吾亲至于再饭，无乃寿考之期乎？此所以可喜也。夫武王之于文王如此，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

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

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

若小民之心则不然，以谓搜揽珍禽，驱驰骏马。道路之言，有若上诬圣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量微贱，思为陛下雪之也。深察其言，盖亦有自焉。唐阉人仇士良致仕，其党送归私第，教以固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当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

暇及他事。又曰:谨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此术既行,卒使天子昏惑于上,大臣壅蔽于下。兵柄在手,官爵在手,废立在手,至自称曰定策国老,而称昭宗曰门生天子。呜呼!不臣之态,臣岂忍陈于君父之前?彼私求禽马,动以陛下为名,此臣之所以耻也,又何怪乎小民?

陛下欲尊临宸极,泽及寰宇,何不反其术而用之,勿为其所陷也。且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是以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此臣所以忧也。窃惟万乘之尊,深居邃宇,万机之暇,何以为情?贤士大夫晏见有时矣,宦官子女安居前后矣。有时者易疏,前后者难间。圣情茌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扫除之役,复门户之私,凡交结往来者有禁,敢与政事者必诛。

陛下日御便殿,亲近儒者,讲《诗》、《书》之指归,论古今之成败,追求典故,历访民情,不在于分文析字,缔章绘句,为书生之学,以取天下之名也。呜呼!隋炀帝、陈后主岂曰不文,适足以亡国而已,果何补于人主之学欤?臣愿陛下之为学也,见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则瞻之仰之,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此为法乎?见前世暴虐之主,则震焉沮焉,退而自省曰:吾其以是为戒乎?读《贤臣传》,默观百僚中有类是者,任之勿疑。读《佞臣传》,默观左右有类是者,诛之无赦。久之不倦,将闻阍寺之言,见便佞之态,如狐狸夜号而鸱枭昼舞也,则陛下之圣德进矣。昔唐宪宗卓卓为中兴之主,其必有以也。及观其与宰相论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请退,宪宗留之曰:朕之禁中,所与游者独宫人、宦官尔,故乐与卿等共谈为理之要。此其所以兴乎?

臣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陛下勿谓深宫密殿,万事无迹也。然善恶未究,四海已知。历观前史所载宫闱之谋,床第之语,想见时君以谓宫中不得而知也,而况外庭乎!外庭不得而知也,而况天下乎!然而皎如日星,不可掩没,卒为天下后世之所嗤笑。呜呼!其亦可畏也哉!故古人有言曰:莫见乎隐,莫隐乎微,故君子谨其独也。谨独之学,其用甚大,陛下不可不知也。古之圣人所以端拱岩廊,而四方万

里日趋于治，天地清明，日星循轨，百谷用成，蛮夷率服，用此道也。

心一不善，足以伤天地之和；心欲悔过，固已同天地之德。古之圣人所以趋众善之门，而得改过之要者，不过听谏一路而已。此臣所学于师，盖以为持颠扶危之术也。舜，圣人也，而益戒之以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武王，亦圣人也，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以至禹有善言之拜，汤有改过之称。汉高祖何人也，止能听谏，故能成四百岁之大业。唐太宗亦何人也，止能听谏，故能成三百年之洪基。至于商纣杀谏臣，其祚终归于周室；成帝杀谏臣，其祚终移于王氏；明皇杀谏臣，其祚终微于禄山。杀一谏臣，真若无与于治乱也，然乱臣贼子，苛政虐刑，一切不得闻也，不亡何待乎？故臣愿陛下，先以谨独为心，后以听谏为意。奖借言路，以旌直士之风，以至远阁寺，亲儒臣，以成就规模之大。此臣所望于陛下也。

草茅贱士，充赋在庭者，志在一第尔。独臣不揆愚贱，妄议国体，负罪于不可赦，可谓愚矣。然臣闻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谏官能言之。职不在此，虽抱奇策，拥雄材，无路可进，卒于老死而已。伏惟国家策士之制，上至公卿之子弟，下至山林之匹夫，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怀。非天子黜陟赏罚之吏，而得议百官之长短；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而得推财赋之多少；非天子帷幄将帅之臣，而得论兵革之强弱。则夫宰相、谏官之事，一旦得以详说而悉数之，而臣何敢无说，以处于此？又况晏子一言，齐侯省刑；田千秋一言，而使武帝念太子；柳伉一言，而使代宗黜程元振。谁谓皇皇大宋，无其人乎？

《皋陶谟》曰：天叙有典。是父子之间，君臣之际，无非天理也。臣处闺门之内，勉明孝道久矣。今自山林中来，望见陛下，突兀孤忠，卓然发于悃愊，不可遏也。此盖天理自然，无足怪者。臣或志在爵禄，不为陛下一言，臣谁欺？欺天乎？故臣虽进一言，退受铁钺之诛于司败，不忍欺天，以昧此心也。惟陛下幸赦其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祸乱兴起，这是给圣人出世开辟道路啊！商朝的治国之道如果不衰落，通过什么会使商高宗显现出来呢？四方部族如果不叛乱，通过什么会使周宣王显现出来呢？汉代假如没

有昌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又被废黜的事件，就没有条件能使汉宣帝出世。唐朝假如没有韦皇后和太平公主用毒酒毒死唐中宗的事件，就没有条件能使唐玄宗出世。由此可知，统治天下的君主，遇到祸难，碰上大乱，应当把刚毅远大作为心志，不要因为惊惧忧虑而自己丧失掉自己的志气。透彻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就能知道上天的心意到底是投注在谁的身上了。臣下我曾经依次考察过前代把衰败国势振兴起来、整治好混乱局面的君主，认为没有哪一个能比唐宪宗再好的了，也没有哪一个能比唐文宗再糟糕的了。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宪宗正赶上唐皇室衰落的时候，藩镇势力飞扬跋扈，君主大权向下转移，可他竟能仔细分析周围环境，慷慨激昂地涌发出恢复大唐盛世的志愿。不幸的是朝廷大臣有的反对这种做法，藩镇派来的刺客又行刺宰相和御史中丞，京师一片恐慌，在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只有宪宗身处别殿愤发图强，摒弃声色，斥除欲望，讨伐叛贼的意向越来越坚定。第二年平定了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再过一年又平定剑南四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再过一年又平定了淮西镇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元和年间的功业，异乎寻常，称得上天下第一。这就属于在乱世把刚毅远大作为自己的心志啊! 唐文宗正赶在被宦官谋害的唐敬宗的后面，宦官把持了朝廷的大权，皇帝的威势不能施布，虽然他能够做出重大举措，毅然有铲除宦官势力的心志，不幸的是，用人不当，危害到无辜的人们，宰相李训等人利用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来诛灭宦官反而被宦官杀害的惨祸，说起来让人心酸。这难道不是文宗猛然间因为受挫落泪，湿透衣襟，魂飞气尽，就自己把自己比作周赧王和汉献帝，自认为与尧舜根本沾不上边，又自己只管饮酒求醉来伤害身体，整日悲伤愁苦，不再把朝廷放在心上吗?这就属于在乱世由于惊惧忧虑而自己丧失掉自己的志气啊!所以臣下我曾下结论说:像唐宪宗这样的君主，可以称得上是知道上天的心意到底是投注在谁的身上了。像唐文宗这样的君主又有什么资格能够加入到讨论上天心意的行列中来呢?因为祸乱兴起，恰恰是圣人奋扬勉励的时候啊!哪里至于因为惊惧忧虑，就自己丧失掉自己的志气呢?

现在陛下您为祖庙尚未收回，两位皇帝及其随从人员还在遥远的金国而痛心，忧伤国运的长期艰难，痛惜以往重大政事的失策，然而深深察辨祸害战乱的根源，这实在是皇天要让那最圣明的君主出世啊！跪拜希望陛下对此要谨慎，要重视，把刚毅远大作为心志，不要猛然因为惊惧忧虑就自己丧失掉自己的志气，差不多同千年以前的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平起平坐，符合上天用来托付的心意，这是臣下我的最大愿望。然而把刚毅远大作为心志的具体表现，总之应该早起晚睡，粗衣淡饭，远离摒弃那些曲意逢迎的人，提拔重用贤能的人，喜好痛切正直的谏言，戒除声色的诱惑，首先制定长远的规划，来定立下大事。

臣下我观察古代的圣人，打算在天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一定先在胸中制定好长远的规划，然后再付诸实施。对此做出的回应具有一定的时机，对此取得的成功具有完整的蓝图。并不是像顺风行舟，扬帆远航，只是一味追求痛快的感觉，却没有所要去的目的地。商鞅的法律，并不是很好的法律，但是他事先制定好长远的规划，所以能使秦国在军事上称雄天下，使各个诸侯都臣服。苏秦的策略，并不是很好的策略，但是他事先制定好长远的规划，所以能联合起异姓的六国，击退强大秦国的军队。淮阴侯韩信对答高帝刘邦，提出向北攻下燕赵，往东进击齐地，在南方断绝楚霸王的粮道，再往西在荥阳同楚霸王会战，结果没有一处不与韩信的战略相符合，这就是因为首先制定好了长远规划的缘故啊。耿弇对答东汉光武帝，提出先平定渔阳，再攻取涿郡，回师夺取富平，再向东攻下齐地，结果没有一处不与耿弇的战略相符合的，这就是因为首先制定好了长远规划的缘故啊！

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要收回祖宗的宗庙，迎回我朝两位皇帝及其随从人员，使国运安定下来，让各种政事都振作起来，扩展长远规划，本来已经在您圣明的心中确定下来了，又有前方将帅传来捷报，歼灭了敌人的首领。从以往的君主来观察，原本就有骄傲自大、迅速招来天下人指责的。只有陛下您却不是这样，竟然十分谦逊，不把功劳放在自己头上，驾临便殿，亲自颁布恩诏，用前代使国家由衰败重

新走向兴盛的君主来询问,涉及到驱逐金寇,平定盗贼,使粮食丰足,训练好军队,裁撤多余的官员,恢复农业生产,革除贪污又消除不合格却滥加任用的现象,缓解民众的人力、财力、物力又保证军费供应,以及前代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做法,祖宗递相传承的法度。还往下向继承师说的儒士询问来自个人所得并能挽救国家危难的谋略。这就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您的勤勉用心了。臣下我虽然学识浅薄鄙陋,但十分敬重地看到陛下的长远规划宏伟开阔,博大深远,立刻就整理衣冠、端正举止、敬行叩拜大礼说:多么盛大宏伟啊!拥有这样的君主,天下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江山社稷还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两位皇帝和六宫妃嫔暂时遭受灾难,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臣下我学问非常空疏,但被忠心和愤慨所激励,哪敢不列举和陈述自己的一点点儿见解,往上对日月的光辉有所补益呢?臣下我恭谨地冒着死罪,献上愚昧的对答。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古代英明的帝王,承接中途衰落的世道,利用渴求国家大治的百姓,消除平定十分严重的祸患,往往事半功倍。少康凭借由五百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周宣王把衰败的国势振兴起来,使周朝重新隆盛。东汉光武帝用三年时间,使汉朝国运得到重振;唐肃宗用两年时间,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这都是承受前代帝王的统系和基业,整治了混乱局面,恢复到正常状态,像这样地容易啊!"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看出陛下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很清楚这是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根本。臣下我听说,夏禹建有治理水害的功德,百姓都真心感念他,所以夏朝统治天下长达十七世,总共经历了四百六十二年。少康凭借由五百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恢复夏朝的统治,原因就是祖宗对臣民有恩德。后稷有教会人民播种五谷的功德,百姓都真心感念他,所以周朝统治天下长达三十七世,总共经历了八百多年。周宣王把衰败的国势振兴起来,使周朝重新隆盛,原因就是祖宗对臣民有恩德。汉高祖对臣民具有宽厚仁慈的恩德,所以汉朝统治天下长达二十一世,总共经历了四百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光武帝用三年时间,使汉朝国运得到重振,难道还不是蒙受了高祖对臣民曾经有过的恩德吗?唐

太宗对臣民具有仁义的恩德，所以唐朝统治天下长达二十四世，总共经历了将近三百年。既然如此，那么唐肃宗用两年时间，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难道还不是蒙受了太宗对臣民曾经有过的恩德吗？我大宋皇朝一位太祖，六位前帝，他们的英灵就在天上，功德就在百姓心中，因而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时运，恰恰就归结在今天。如果能扩展这个长远规划，用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来做补充，究竟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如今依赖四方百姓拥戴我登上了帝位，这表明各位先帝的恩德还没远离啊！皇帝我心焦如焚，一再思虑，不敢爱惜自身怎么样，而去为民众操劳。然而委屈自己来同金国讲和，而金国却继续向我大宋内地入侵。"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看出陛下长远规划的深远宏大，很清楚祖宗的恩德，是士人百姓的归宿所在，准备利用这个时机，为两位皇帝和我大宋洗刷几年的耻辱啊！臣下我察看金国，存在着三种容易衰弱下去的态势：喜好战争，就会疲乏；丢掉原有的习俗，就会涸敝；人心不归服，就会众叛亲离。而金国都占全了。臣下我请求为陛下您一一陈述。秦始皇吞并六国，就应当停止军事行动了，可却随意胡来，求得一时高兴，又去攻打南越。竟没料到骊山的坟墓还没修成，二世胡亥和子婴已被赵高杀害或被人俘虏了。这就是因为喜好战争而伤害了自己。隋文帝远征并且平定了江东，就应当停止军事行动了，而隋炀帝继位后，又御驾亲征辽东，竟没料到声势浩大的舰队还没渡过隋渠，而窃国的盗贼已经占据了隋朝的都城。这也是因为喜好战争而伤害了自己。金国依仗它的部众勇猛锐利，自从在我大宋建中靖国年间开始发动战争，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正逢我朝遇上由盛转衰的恶运，他们竟敢利用便利的机会，侵扰我百姓，侵犯我疆土，夺占我河北河东地区，又捣毁我国都，又劫持我两位皇帝，又侵入我淮西地区，践踏我江浙一带。他们转战南北，已历经好几年，仰仗自己兵强马壮，却不知道本国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来已经耗尽了。没有平地就没有陡坡地，没有去就没有回。这是臣下我讲论喜好战争，必定会伤害自己的道理。

西晋末年的大动乱，晋室八王刀兵相争，在整个中原地区接连不

断。而那些少数部族的英雄豪杰借机崛起,成为本族的君主,像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这些人,都凭借不同凡响的天资,驱使驾驭当时的贤士英才。他们中强大的曾占据大半个中国,确有理由自立为帝,但也不过传一两代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君臣彼此不和协,上下都不感到安全,虽然也建立了都城,修筑了宗庙,但内心都时刻觉得危险,经常像寄居在那里不是长久的办法一般。金国灭掉契丹以后,又来侵凌中原。中原的声威教化和典章制度,实在不是异族部落所在地区所能比得了的。但我大宋经历的太平盛世时间一长,读书人有的沉缅在写诗作文章中,普通百姓都满足自己有块土地养家糊口,他们全都害怕打仗,爱惜性命,留恋家小。如果让金国人对此感到很不错,加以效仿,他们也就很容易衰弱下去了。这是臣下我讲论丧失掉原有习俗就会凋敝的道理。

秦始皇灭掉韩国以后,张良奋力用铁椎去掷击他的车驾;唐朝朱泚自立为皇帝,殷秀实举起奏事用的手板去击打他的额头。凭借今天我朝的士人和百姓,对时局忧虑不安,原本也有豪杰式的慷慨勇士,早就打算对金国采取行动了。加上金国又对公卿大夫进行凌辱,公然在殿阶之上进行鞭抽棍打,虽贵为将相,却难免有做金人的臣子或仆人的耻辱,眼看就有愤恨积聚在胸中而想发动事变的人了。这就是臣下我讲论人心不服,统治就会灭亡的道理。小小一个投靠金朝的刘豫,打算收拢华夏的人心,简直是多么地愚蠢啊!华夏的人心,哪里是容易收拢的呢?那个叫刘豫的家伙,是个什么东西?一向没有功勋和美德,一点儿没有名望,就像狡诈的小鸡儿在搭窝,如同小孩子做游戏,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然而金国尽管存在着容易衰败下去的态势,而我大宋也要有必定能兴盛的办法,对此不能不讲论。臣下我观察古代人打算消灭其他的国家,必定有自己的特定计谋。越王勾践攻取吴国,用了使吴王夫差骄傲的计谋;秦国攻取六国,用了破坏掉六国合纵的计谋;汉高祖战胜项羽,用了离间他们君臣关系的计谋。如今,越国的计谋,秦国的计谋,汉高祖的计谋,应该依次去使用。但首先应当使用越王勾践的办法,使金人骄傲,让他们野心越来越大,任意胡来,什么也都不

再忌讳畏惧，上天就会叫他们灭亡，眼看着掌握大权的贵臣争斗高低，篡夺皇位的大祸就挑起来了。臣下我请求完整详尽论述越王勾践用来攻取吴国的谋略，只希望陛下您听一听。

范蠡说用低声下气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使吴王夫差骄傲，越王就自称卑贱鄙陋的人，自称本国为贡献物品的城邑。范蠡说用珍奇物品和女色使吴王夫差骄傲，越王就先献上皮货和钱币，随后又献上本国仓库的所有钥匙，让越国士大夫的女儿嫁给吴国的士大夫为妻，让越国士人的女儿嫁给吴国的士人为妻。越王称吴王夫差为天王，是范蠡让越王从名称上对吴王来表示尊重；越王请求亲身给吴王当马前卒，是范蠡让越王做出任凭吴王支配越国的财富而自己紧紧跟随并顺从的假象。对付当今的金国人，把越王这些做法有所增减，也就可以了。

哎呀呀！越王含辛茹苦，志向就在向吴国复仇。不是意志坚定的君主，谁能做到这样呢？因为人口数量不多，兵源不充足，越王就在全国下令说：壮年男子不能娶老年妇女为妻，老年男子不能娶壮年妇女为妻。女子十七岁尚未出嫁，男子二十岁尚未娶亲，都要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惩罚。生了男孩，国家赏赐给十块肉干和一只狗；生了女孩，赏赐给十块肉干和一口猪；一胎三产的，由公家给他们派保姆；生双胞胎的，由公家给他们提供喂养品。谁家的庶子或嫡长子死去，对他们进行哭泣和埋葬的礼节都与自己的孩子一个样。用船装载肉食和谷物，去让流浪的年轻人食用。自己亲自耕作，夫人亲自织布，用来使本国的百姓生活宽裕。本国民众蒙受到越王的恩惠，感念他的仁德，为越王地盘狭小而愤恨，又为越王在会稽山所遭受的耻辱而忧伤，于是向越王请战，越王不答应；父老兄弟们又去请战，并且表示决心说：在越国的辖区以内，看待君主就如同父母。做儿子的，想给父母报仇；做臣子的，想给君主报仇。有谁敢不竭尽全力呢？等到部队要出发时，父亲鼓励自己的儿子，兄长勉励自己的弟弟，妻子激励自己的丈夫，都说：谁能说这次出征，可以不战死呢？陛下您要向金人复仇，应该先联结起我大宋百姓的人心才行啊！

越王在本国的时候，把壶中酒、盘中肉都分给左右享用，自己饮

酒不尽兴,听音乐不等全听完,这样来谋求向吴国复仇。如今陛下您有这样的举动吗?越王对伤病员进行慰问,对战死者进行葬埋,赡养他们的老人,扶养他们的孩子,关怀他们留下的孤儿,这样来谋求向吴国复仇。如今陛下您有这样的举动吗?越王对富有的人,让他们安心;对贫穷的人,进行救济。弥补不足的人家,对财产有余的人家就征税,这样来谋求向吴国复仇。如今陛下您有这样的举动吗?越王往南部事奉楚国,往西部事奉晋国,往北部事奉齐国,春季秋季献纳皮货钱币、美玉丝帛、美女僮仆来表示宾服,从来没敢中断过,这样来谋求向吴国复仇。如今陛下您有这样的举动吗?如果有,整个天下就幸运到极点了! 如果还没有, 臣下我跪拜祝愿陛下您在这些方面多努力。

越王从吴国回到本国后,历经四年,为祖宗的仇恨感到愤慨,想要与吴决一死战,来使心里快慰一番,范蠡说还不行。到了第五年,吴王信任好进谗言的人,喜好优伶,憎恶和疏远辅政的大臣,越王又要趁此机会去讨伐吴国,范蠡说再等一等。到了第七年,吴王杀死了贤臣伍子胥,越王又要趁此机会去讨伐吴国,范蠡说再等一等。同为第七年,吴国稻田中河蟹把稻子吃个精光,越王又要乘此机会去讨伐吴国,范蠡说再等一等。如今的金国,虽然存在着三种容易衰落下去的态势,然而金国君主信任好进谗言的人了吗?喜好优伶了吗?憎恶并疏远辅政大臣了吗?曾经杀过像伍子胥那样的贤臣吗?曾经有过天灾像稻田中的河蟹把稻子吃个精光那样严重的情形吗? 所以必须要等待金国的天时远去,人事出现危机,然后才可以图谋消灭它。

越王回国后二十年,才得以发兵实现了他的志向。勾践的发兵,一定等到才智足以计算出天下民众的多少, 仁义足以与三军将士共同承受饥饿与疲劳, 果敢足以能裁断疑难和决定大事。又让大夫舌庸当面为他审辨奖赏该怎么办, 让大夫苦成当面为他审辨刑罚该怎么办,让大夫文种当面为他审辨装备该怎么办,让大夫范蠡当面为他审辨守卫该怎么办, 让大夫皋如为他当面审辨金鼓发令该怎么办。在发兵之前,越王背对屏风站立,把后宫的政事委托给夫人;又背对房檐站立,把国家的政事委托给大夫们。他来到军队驻地,把那些行

贿而扰乱部队的人斩首;第二天挥军前进三十里,把不服从本编队命令的人斩首;第三天又挥军前进三十里,把拒不执行国王命令的人斩首;第四天又巡视全军,让在军队中的独生子全都回国去;第五天又巡视全军,让视力模糊有眼病的人全都回国去;第六天又巡视全军,让体力难以支撑住盔甲武器、志意和品行不足以听从军令的人全都回国去。虽然越王勾践作为诸侯列国的一位君主,不足以操持当今涉及整个天下的事务,但防范严密到如此地步,也是令人感到可喜的。所以能首次交战就在囿地打败了吴军,第二次交战又在泓地打败了吴军,第三次交战又在吴国都城的郊外打败了吴军,直至屠灭它的都城,荡平它的宫殿,使它的宗庙成为废墟,雪洗了多年的国耻。陛下您要向金国复仇,希望您仔细观察金国人的用心,而用越王谋取吴国的办法去对付他们,不也是可行的吗?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通过招抚引诱去消除盗贼,可盗贼仍然气势嚣张。"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打算首先使中原地区安定下来。臣下我听说唐太宗的说法是:百姓成为盗贼的原因,是由于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百姓饥寒交迫,所以没空儿去顾及廉耻了。应该去除奢侈,依从节俭,减轻徭役,减少赋税,让百姓吃饱穿暖有盈余,就自然不会去当盗贼了。韩愈的说法是:刺史履行不了他的岗位职责,观察使也履行不了他的岗位职责,百姓已经财力枯竭,可是横征暴敛仍不停止;人们已经走投无路,可是赋税催逼越发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不离开故土去当盗贼,也就万幸了。这些说法都是强调安分守己的黎民百姓被横征暴敛所困扰,所以才不得不去当盗贼罢了。

现在的情况,比上面所讲的还要严重。那些在各州郡随便闯荡、聚集在山林中招兵买马的人,差不多都是当过兵的人。这批人在太平时期,俯首贴耳,夹紧尾巴,对上面唯命是从。不幸的是,中原发生的变故太多,朝廷的权力越来越不顶事,不然为什么一动就敢怨恨恼怒呢?有一人发动叛乱,就有一百人跟随;有一百人发动叛乱,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然而假使朝廷没有空子让他们能钻进来,当年唐朝的朱滔就不可能鼓动起卢龙镇的兵卒,李怀光也不能胁迫邠宁镇

的兵卒与朝廷对抗。现在一呼百应的原因,是人们内心不服呀!之所以内心不服,恐怕是我们谦恭节俭还没做到最完美的程度吧?用人还不妥当吧?奖赏了没立功劳的人又惩罚了没有罪过的人吧?

从前唐德宗不再豢养专供玩乐的象和豹,让宫女各回各家,凭借谦恭节俭使天下心悦诚服;罢免了常衮,起用崔祐甫,凭借任用贤才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奖赏淄青镇的将士,来遏制住跟随节度使叛乱的阴谋,对邵光超施以杖刑,来惩罚他贪污与假冒军功的罪行,又凭借赏罚分明使天下心悦诚服。当时淄青镇节度使李正己手握重兵十五万,在山东地区虎视眈眈,他手下的将士听说唐德宗所作所为竟能这样,都放下兵器相互说:圣明的天子出世了,我们这些人还反叛吗?不仅仅就这一种反应,吐蕃依仗它的强大,欺凌中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德宗登上皇位以后,吐蕃使臣回去告诉他们的国王说:大唐新天子让宫女各回各家,不再豢养珍禽异兽,威严仁德,英明神武,在整个华夏普遍传扬。吐蕃国王听后十分高兴,派遣使臣向唐朝进贡。

唐德宗谦恭节俭,真诚用人,赏罚分明,在庭堂上付诸实施,而那强大的吐蕃,凶悍的叛军,就自动在千里之外归服。假使唐德宗恪守这种心志,自始至终不予改变,那么贞观盛世的雄风,也不难到来。但德宗自己败坏了自己,又拿他有什么办法呢?臣下我希望陛下谦恭节俭要坚定,用人要谨慎,赏罚要分明,借此来收揽天下的人心。如果一上来就说:我有军队,可以诛杀那些不服的人;我有招安诱降的对策,可以等待造反的人改过自新。这样恐怕真让人担心去除掉一个巨大的盗贼,但事情到最后也没能解决啊!如果确实能采用臣下我的主张,不仅仅是凶悍的士兵都心向朝廷,连像吐蕃那样的少数部族也会改正过错的。所以臣下我用唐太宗、韩愈、唐德宗这几个人的事情向陛下做献呈。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把粮食作为紧急政务,可水道运粮却接不上,国家粮仓缺乏充足的储备;把军队作为重大事情,可选练士兵还不精锐,部队中还有大量多余的人员。”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深知军队和粮食不能不多加考虑啊!臣下我认为,水道运粮接不上,应该选用善于主持国家

财政的官员;挑选和训练士兵还不精锐,应该命令将帅履行自身的职责。唐代宗因为国家用度短缺,军费支出供不应求,只是获取到一个刘晏,刘晏调度山川江海的出产,打击商人的牟利活动,控制住各种货物的价格,掌握住天下剩余的资财,因而军事支出变得很充裕。这是由于在主持国家财政方面得到了能人啊!臣下我很愚昧,想在固定赋税之外,再创建一个机构,叫做军兴司。凡是关卡和市场上征收酒税明文由专门机构负责的,不把它们的数额再包括进来,由军兴司只管调剂有无,灵活掌握价格的高低,使所获财利归入公家,上面聚敛财富但不牵连到普通百姓。钱币谷物的出入,有关勾销验核簿册的事务,交给读过书的人去办理。出示公文告示,察看物价状况,交给办事人员去办理。由刘晏那样精明敏锐、精干果断的人实际掌管这个部门的工作,那还担心什么水道运粮接不上呢?

唐朝马燧在河东道担任观察使时,教给养马和打杂的人学会骑马射箭,打制盔甲具有长短规格,修造车辆考虑到行车和停车的便利,等到两年后,聚集起精兵两万人,这是因为在将帅方面得到了能人啊!臣下我很愚昧,想在多余出来的士兵中,新建一支军队,叫做精锐。凡是士兵进攻守卫和两军交战,功劳由专门机构负责的,不在这支新军的选拔范围之内。它只包括受招安、被俘虏的士兵,让他们会使用弓箭刀枪中的哪种兵器就使用哪种兵器。有特长的就编入军籍,没特长的就驱使他们都去屯田。选拔像马燧那样刚强有力、勇猛坚毅的人实际掌管这支部队,那还担心什么选拔和训练士兵不精锐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官吏众多杂滥,而丧失职守的人还为数很多;农田大量荒芜,而回到本业的农民还为数很少。”这就确有理由地可以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深知官吏和农业生产不能不多加考虑啊!臣下我认为,官吏众多杂滥,应该实行征辟察举的办法;农田大量荒芜,应该实行屯田的办法。从前唐朝沈既济主张由宰辅大臣决定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吏人选,让各州各郡自己征辟幕僚佐吏,其用意是想使各官署不存在丧失职责的人。臣下我很愚昧,主张由宰辅大臣精选太守和各路转运司、提

刑司、仓司的人选，至于那些州郡幕僚则由太守本人来聘请选用，至于负责茶盐酒税场务和冶铸事务的监当官、维护地方治安的巡检和县尉，则由各路转运司、提刑司和仓司聘请选用。如果选用不恰当，严重的要削夺选用者的职位，轻微的要对选用者处以罚金，吏部及御史台、谏官有权进行纠正。每选用一个人，就确定两个选用对象来让他们等待被选用。两个人中已经有一个被选用后，就再确定一个选用对象，让这两个人再等待被选用，这样前后连接，即使是懈怠的人也会勤勉起来了。

国家设立官位，划分职责，目的只是打算获取到贤才，并不是为当官的人提供衣食来源啊！当官的人如果只是为了谋取到衣食来源，为什么不去做工匠呢？不去当商人呢？不去当农民到田里耕作呢？还在官员行列中干什么呢？把为官施政的重任交付给读书人，朝廷对待他们也不能轻率。只要是太守、各路转运司、提刑司、仓司的长官去上任，无论原来是京官还是地方官，都要让他们到殿阶下与陛下辞行，然后再赶赴任所。把各路转运司、提刑司、仓司的长官分成一批，各郡太守又分成一批，在出发那天，陛下您应亲自驾临正殿，对他们给予鼓励。嘱告各路转运司、提刑司、仓司的长官就说：这一路的官吏，实际上就全部托付给你了。嘱告郡守就说：这一郡的官吏，实际上就全部托付给你了。你们这些人应当思忖，宣达皇帝我爱惜百姓的意愿。皇帝我对你们的功绩，将会给予重重的奖赏；但也有严厉的刑罚，等着来惩办那些不恪尽职守的人。这样就会贤才都能得到使用，而丧失职守的问题就不是再值得担忧的了。

从前三国曹魏的邓艾打算在陈留郡、颍川郡以东的地区实行屯田，这样淮水南北一带每年就能获取到谷物五万斛，他的用意也是想聚集起回到本业的农民。臣下我很愚昧，不敢往远处引证，姑且就镇江这一路来做番论述。在江口驻扎部队，大约有好几万人。仅以两万人来计算，每个士兵必有家小，每家就算它最多五口人，每个人每天吃两升粮食，一天就总计两千斛，每月就总计六万斛，而每年就需要一百万斛了。但这批军粮的供应与运送，并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都必须到老百姓那里去征收。三吴地区，大旱连年，长江淮河以北，野草漫天遍野。从去年到现在，一斗米价格为千余钱。如今生活在最低层的百姓，有谁能救助他们的紧迫状况，而官府催交军饷比流星火光还急迫，不交或迟交就动用刑罚，比秋天的寒霜还冷酷。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开元年间的屯田措施，振武镇的屯田做法，不知可以行用与否？

享有国家授予给荣誉称号的八品以上的官员，已经官阶在七品以上的官员，这是设置屯田官的标准。土质疏松就五十亩田地配一头牛，土质坚硬就二十亩田地配一头牛，这是耕作的配置方法。像这样的标准和方法，出自唐玄宗开元年间。招募流民组成十五个屯田区，每个屯田区安置一百五十人，让各个屯田区在地势高的处所修建城堡，东起振武镇，转而延续到最西边，经过云州地界，错落分布在沿线八百多里的山河险阻中，敌寇即使来了，也造不成危害，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耕作。这种屯田方法，由振武镇所首创。臣下我希望从淮河以北地区开辟设置屯田，参照开元和振武镇的做法，不仅仅足以招募到回到本业的农民，连军事储备的来源，也足以放宽心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强化对贪官污吏的惩办，但不能革除贪污腐化的邪气；加重对军功的封赏，却没办法消除不合格而滥加任用的歪风。"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打算使沿袭已久的恶习得到澄清，使靠侥幸当官的人受到惩戒。从前三国曹魏的毛玠担任尚书仆射时，士大夫不敢穿华丽的衣服，吃鲜美的食物；唐朝的杨绾担任宰相时，豪富显贵的功臣得给他撤去自家的乐舞，拆除壮观的住宅，减少车马器具。官吏贪污腐化，这种相沿形成的风气已经由来很久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摒却乐舞，远离美色，亲自励行节俭，缩减生活开支，来激励文武百官。朝廷宰相拒收馈赠的礼物，断绝收取贿赂，来激励奸猾的官吏，惩戒狡诈的官吏。这样还担心什么贪污歪风不能革除呢？

从前唐朝的元载、王缙执掌朝政时，四面八方想通过贿赂取得

官职的人在他们的府第门前接踵而至。想出价做大官的，由元载、王缙决定；想出价做小官的，由卓英倩决定。他们都如愿以偿而离去。唐代宗想获取到士大夫中刚直不阿的人供自己使用，于是提拔李栖筠担任御史大夫，这件事出自皇帝一个人的决定，宰相根本不知道，王缙等人自此逐渐被贬退。臣下我在今天想用这种办法去消除不合格却滥加任用的现象，是可行的吧?凡是大将拿战功来禀报的，陛下您亲自择定其中的一两个人，在便殿召见并慰劳询问他们。果真有功劳，就优厚地加以提拔升迁；有谁要是说得没有道理，事情涉及到编造欺骗，就严加惩处。这还担心什么不合格却滥加任用的现象不能消除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当今要对外驱逐金寇，就不足以使百姓安宁；按固定的税额对百姓征收赋税，就不足以满足大量的军费开支。身为万民之父，却不断向自己的子民征税，那么他又凭什么保护子民而称王天下呢?"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体恤百姓是这样的深切啊!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到这里时，止不住泪流满面，抬头仰望，深知陛下您的仁慈心肠象天地一样广大，可是天下人却不清楚啊!臣下我观察，濒临长江的各个郡县的郡守和县令，大多没有长远的想法。阳羡、惠山一带的百姓，遭受苛酷赋税的盘剥是多么地深重啊!临时设置的赋税名目种类繁杂。秋苗税之外，又有苗头税；苗头税还没收完，又收折八税；折八税还没收完，又冒出个大姓税；大姓税都收上来了，又冒出个湮实税；湮实税把百姓的财物都收光了，又冒出个均敷税；均敷税之外，还有许多叫不准名称的税目。百姓颠沛流离、四处奔窜，更加没有生活依靠了。从前桑麻在良田沃土上茁壮成长，鸡犬之声相闻，何等富庶，可如今竟成了狐狸和虎豹藏身的地方。举目远望，漫天遍野都是苍烟白露的凄凉景象，而那些所谓郡守县令，却偏偏身靠桌案说：百姓的财富与其留给盗贼，哪如上缴给国家?哎呀呀!怎么能说出这种民间才说得出的话语呢?堂堂大宋皇朝，居然降格到与盗贼相提并论。不忠的罪过，没有比这再严重的了。

节财本身就是生财之道。现在坐镇一方的军事长官，各自设置低级武阶官；召用自己的亲戚，把榨取的民脂民膏全拿出来，去施布个人的恩惠，换取对方的好感。有的名为“准备”的属官，有的名为“干办”的属官，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名目繁多得数不过来，凡是江湖郎中、巫师、占卜算命先生这类人，都在任用的范围以内。又在各县添置武尉，更是没有用处。看到敌人就逃跑，取得小小的胜利就屠杀贫民百姓邀功领赏。在山区县就贩卖私茶，在靠海县就偷贩私盐，还没等到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时，就把对方抓起来，做为自己的功劳了。不知官府平时盘剥百姓到了扒皮榨髓的程度，招来极大的怨恨，却供养了这帮家伙，这到底叫什么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明确下达诏书，告诫命令坐镇一方的军事长官，撤消武尉，来缓解民间的惨状，这也是保护百姓的措施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皇帝我不明白治国大道，同时也对事情的契机闹不清楚。总共以上几种矛盾，经常在胸中碰撞，只是躺下却难以入睡，面对饭食就叹息。你们这些读书人已经同国家经受灾难很长时间了，应该考察前代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君主，他们施政的顺序对当今很切合的东西；考察祖宗把帝位传下好多代了，他们的法度可以施行的地方；以及你们平时积累学问，等待朝廷询问，来自个人所得并能挽救国家危难的奇谋和远大筹划，把这些全部用尽心思陈述出来。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您的长远规划深远宏大又谦逊辞让，准备来与古代帝王并驾齐驱，继承弘扬祖宗的大业，广泛搜求，往远处择取，来使愚昧人的思虑全都亮出来。

臣下我私下认为，能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君主，大致上都把刚健的德行放在第一位。所以震慑和讨伐鬼方，这是商高宗的刚健德行的表现；抗击和驱逐猃狁，既威严，又谨慎，这是周宣王的刚健德行的表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汉宣帝的刚健德行的表现；气宇轩昂地对大事做出决断，这是东汉光武帝的刚健德行的表现。陛下要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应当把刚健的德行作为主宰。摒弃谗言，节制欲望，远离佞臣，严防奸贼，这是使国

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根本。我朝列祖列宗帝位相传的宗旨，大致上是把节俭的美德做为最主要的东西。臣下我曾恭敬地听说仁宗皇帝穿用洗过的衣服，盖粗绸被子，亲身来大力实行谦恭节俭，不忍心耗费一点儿财富去损伤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直到今天，天下父老一谈起我朝仁宗皇帝，必定会落泪湿透衣衫。因为节俭一定就会仁慈，仁慈一定就会感化天下。陛下您要继承祖宗大业，应该把节俭的美德做为主要的东西。珍贵奇异的物品不要沾边，专供赏玩的器具不要索求，这是祖宗的意旨。用来驱逐金寇，消除国内盗贼，使粮食充足，训练好军队，裁撤多余的官员，恢复农业生产，革除贪污，消除不合格却滥加任用的现象，缓解民力，保证军费开支，所有这一切，臣下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不过是说要刚健、要节俭罢了。

然而刚健节俭的美德，圣上自己心里是明了的，但天下人还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臣下我对此具有自己的看法。臣下我曾经阅读《春秋左氏传》，看到吕甥向秦穆公讲论晋国君子、小人的情状，那是多么地贴切深刻啊!他说：小人忧愁苦闷，认为我们的国君不会被赦免；君子宽厚仁慈，认为我们的国君一定能回来。他又说：小人说秦国哪能放回我们的国君呢?君子说秦国一定能放回我们的国君。又说：小人说这回一定要报仇，君子说这回一定要报答恩德。君子的见识高明宽广，所以他们的言论大多显得宽厚仁慈；小人的见识肤浅狭窄，所以他们的言论容易刻薄。孟子有句话，说得多么好啊：百姓都认为齐王您吝啬，臣下我原本就知道这是大王您不忍心呀!百姓把齐王看成是吝惜他那头牛，因为按小人的看法常常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小人遍布天下，而所说的君子又有几个呢?即使家中安排个能言善辩的人，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可终竟抵挡不过众多人的嘴呀!这表明，君主在吃饭睡觉、言谈话语之间，哪能不谨慎呢?

周文王生病时吃下一口饭，武王也照样吃下一口饭；文王吃下两口饭，武王也照样吃下两口饭。这是武王亲身来体验文王究竟健康与否。因为吃下一口饭，我的体力就显得很微弱；如今我的亲人

也吃下一口饭，他的体力就早已微弱了吧?这正是值得我担扰的原因。我能吃下两口饭，我的体力就显得强壮些；如今我的亲人也吃下两口饭了，恐怕他就会长寿了吧!这正是让我感到高兴的原因。周武王对于文王竟是这样，至于陛下您的心意；臣下我也就完全能够了解到了。

正当阳春三月，暖意融融，江南行宫别殿，到处繁花似锦，柳枝拂动，想来陛下您思念二帝还在金国，那里一片风沙，遮天盖地，不能在一起欣赏眼前这融洽和乐的景象，哪能安心呢?盛夏时节，微风拂过窗棂，庭院流水潺潺，水气清凉澄澈，想来陛下您思念二帝还在金国，正用毛毡裹体，不能在一起共享这舒畅的生活乐趣，又哪能安心呢?秋天江水清澈，流淌如同雪白的丝带，桂花在夜间香气飘溢，陛下您享受这种欢乐时，一定会说金国现在正西风凄厉强劲，两位皇帝恐怕会有什么问题吧?冬季狐衣皮帽，温暖至极，在鸟兽形状的火炉中燃烧的炭火，如同春天盛开的红花，陛下您享受这种欢乐时，一定会说北方的大雪厚过一丈，两位皇帝恐怕很寒冷吧?至于陈设山珍海味，饱用各种美食时，陛下您一定会扔下筷子，猛然站起来说：雁粉汤和腥羊肉，两位皇帝是吃不惯的，我吃眼前的这些东西哪能咽得下去呢?住在宽敞的庭室中，处在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陛下您一定会抚摸着桌案感叹说：金国的帐蓬和土堡哨所，两位皇帝一定住不惯，我住在皇宫里能睡得着吗?

如今的民间百姓，都知道有父兄妻子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陛下您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天下，但因为金国的缘故，致使陛下您冬天得不到真正的温暖，夏天得不到真正的清爽，晚上没地方去问安，早晨没地方去探视。每日向长辈探视请安的家庭礼节，什么时候可以例行无误呢?兄弟的危难，什么时候可以解救呢?日月荏苒，光阴流逝，两位皇帝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每年过各种节日时，看到二帝的遗物，想来圣上您心如雷震，泪如雨下，手抚剑柄，长长地慨叹，思考着要荡平金国毡帐，迎回两位皇帝的銮驾。这是臣下我心里了解陛下您的地方，就像这个样子。

至于普通百姓，心里却不是这样来看的。他们认为皇帝您搜罗

珍禽异兽，成天打猎游乐。街头巷尾的议论，存在着诬蔑圣明德行的地方。这是臣下我吃不香，睡不着，不考虑自己低微卑贱，想要给陛下您洗刷的原因。但仔细察辨那些流言蜚语，也自有来由。唐代宦官仇士良退休离职时，他的党羽送他回私宅，他教给这帮党羽保持住皇帝对我们宠爱的绝窍说：对于天子，决不能让他闲下来。应当经常用奢侈的享受、糜烂的生活使他看了高兴，听了开心，感到一天一个花样，一月一个劲头，没有一点时间去顾及其他的事情。还说：千万注意别让皇帝读书，别让他与读书人亲近。他一读书，看到前代的盛衰兴亡，就知道忧虑恐惧，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就会遭到疏远排斥了。他的党羽听后，拜谢离去。这一绝窍被运用后，终于使皇帝在上面昏庸迷惑，大臣在下面被阻塞隔开，宦官却随意指挥军队，随意封官授爵，甚至随意废立天子，发展到杨复恭自称是拥立昭宗的定策国老，而把唐昭宗称为门生天子。哎呀呀！那些简直不是臣子所能做出的丑态，臣下我哪里忍心在皇帝您面前陈述它呢？如今朝中宦官个人去搜罗珍禽骏马，动不动就假借陛下您的名义去干，这正是臣下我也为陛下感到羞耻的地方，又能去怪罪什么不明真相的普通百姓呢？

陛下您真想威严地在皇宫统治天下，恩泽遍布各地，为什么不反过来对付宦官那一套，不被他们所操纵呢？况且宦官闻名天下，这是国家的不祥征兆啊！所以尧、舜时期的宦官，在《尧典》、《舜典》、《皋陶谟》、《大禹谟》中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的宦官，在《尚书》各篇《誓》、《诰》中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宦官竖刁在齐国出了名，结果齐国大乱；宦官伊戾在宋国出了名，结果宋国危难。现在宦官这帮家伙的名字，已经逐渐在朝野之间有些名气，这是臣下我担忧的原因。臣下我私下想来，身为天子，居住在殿阁一层又一层的皇宫里，每天处理政务获得休息的时候，又用什么来消遣一下时光呢？贤德的士人和官员被便殿召见是有固定时辰的，接下来就是宦官妃嫔陪伴在周围了。对具有固定时辰被召见的人容易感情疏远，对陪伴在周围的人很难感情割离开。圣上的感情一天天习以为常，不知道他们的

坏处，倒不如让他们只管干好扫地除尘这类差事，向妃嫔住处传个口信，凡是和朝臣交结往来的行径严格禁止，敢于参预政事的人，一定杀头。

陛下您每天都驾临便殿，与读书人亲近，讲求《诗经》、《尚书》的主旨，讨论古今的成败道理，追问寻求典章制度，遍访民间百姓的想法，并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划分经文段落、剖析字义和雕琢华美的文辞上，致力书生的学问而去博得天下颂扬的美名。哎！隋炀帝、陈后主哪能说没有文采，但这恰好招致亡国罢了，对君主的学问究竟又有什么补益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致力的学问，应当是看到前代具有道德的君主、英明的帝王，就崇敬仰慕他们，回到宫中自我反省说：我应该把他们做为榜样吗?看到前代残暴凶虐的君主，就震惊失望，回到宫中自我反省说：我应该把他们做为鉴戒吗?观读史书中的《贤臣传》，就默默察辨百官中有谁和他们很类似，就加以重用而不疑忌；观读史书中的《佞臣传》，就默默察辨自己身边的人有谁跟他们很相像，就予以诛杀而不赦免。长久坚持而不厌倦，那就会再听到宦官的言语，看见献媚讨好人的表现，就如同狐狸在深夜号叫，猫头鹰在白天飞动。这样一来，陛下您圣明的德行就提高了。从前唐宪宗十分突出地成为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君主，这是一定有理由的。等到看他与宰相在延英殿讨论治国大道，尽管天色已晚，闷热难当，汗水湿透了龙袍，宰相请求退下，宪宗却挽留说：皇帝我回到宫内，能和他们相处的，只是些妃嫔宦官罢了。所以很高兴同爱卿你们一起谈论治理国家的要领。这就是唐宪宗使国家由衰败重新走向兴盛的原因吧!

臣下我听说鹤在树荫里鸣叫，小鹤也鸣叫应和它。陛下您不要认为在深宫密殿之内，什么事情也传不出去。尽管善恶还没有定论，全天下都已经知晓了。遍观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宫庭内部的阴谋，床席上的密语，可以想见当时的君主认为宫中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更何况朝廷呢?朝廷是不会知道的，更何况整个天下呢?然而事情明了得如同天上的日月星辰，是不可能遮掩住的，最后却被后世天下人所嗤笑罢了。哎呀呀!那也真是值得畏惧的呀!所以古人有

句话说：不要把私欲在暗处显露出来，也不要把私欲在细小的事情中显露出来，所以君子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谨慎。这种学问，作用特别大，陛下您对此不能不有深刻的了解。古代的圣人，能在朝廷上垂手端坐，而四方万里一天比一天趋于大治，天地清静明朗，日月星辰各按轨道运行，各种农作物获得丰收，四方部族全都前来归服，原因就是运用了这种学问。

心地一旦有不善良的地方，就足以损伤天地之间的和谐；内心想要悔过，本来就已经同天地的德行相吻合了。古代的圣人，用来步入多种美德的大门，掌握住改过自新的要领，只不过是听取规谏这一途径罢了。这是臣下我从先师那里学来觉得可以挽救国家危难的方法。虞舜固然是圣人，但伯益仍然告诫他：不要沉溺在安逸中，不要过度地享乐。周武王固然也是圣人，但召公仍然告诫他：不注意细小的行为，到最后就会给大德造成污点。以致于大禹有听到美好的言论就向他行礼的举动，商汤有善于改过的美称。汉高祖究竟是个什么人，但他仅仅能听取规谏，所以就建成了汉朝四百年的大业。唐太宗又究竟是个什么人，但他仅仅能听取规谏，所以就建成了唐朝三百年的基业。至于商纣王诛杀进谏的大臣，商朝的国运最后归于周室；汉成帝诛杀进谏的大臣，汉朝的国运最后转移到了王莽手中；唐玄宗诛杀进谏的大臣，唐朝的国运终因安禄山而走向衰败。诛杀一名谏臣，表面好像真对治乱兴衰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乱臣贼子，苛政虐刑，一切全都听不到了，国家不灭亡，还能等待什么呢?所以臣下我希望陛下您，首先把独自一人时要十分谨慎作为心志，然后把听取规谏作为意愿，广开言路，奖励进谏，用来表彰正直士人的气节，直至疏远宦官，亲近精通儒学的大臣，用来成就宏大的长远规划。这是臣下我对陛下您的期盼。

出身茅屋草室的卑贱读书人，在朝廷上凑个数来应试的，只想能榜上有名罢了。唯独臣下我不思量自己的愚昧卑贱，妄加议论国家大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很愚蠢了。然而臣下我听说天下的大事，宰相有权处理，谏官有权议论。不担任这种职务，即使身怀奇伟的计策，拥有杰出的才干，也没有途径向皇

帝献呈，最后老死罢了。万分恭敬地想来，我大宋制定的策问读书人的制度，上自公卿大臣的子弟，下至山野村夫，都可以自己竭尽力量，把胸中的想法全都讲出来。并不属于只有天子决定予以升降赏罚的官吏，才有权议论文武百官的优点和短处；也不属于只有天子手下大司农里负责钱粮的官吏，才有权推算财政税收的多少；也不属于只有天子手下运筹帷幄的将帅，才有权讨论武器装备和部队的强弱。这样一来，那些宰相、谏官有权处理、有权议论的事情，民间读书人一下子就有权详细陈说并全部列举出来。既然如此幸运，臣下我哪里敢不言说而却站在这里呢?又听说晏子一句话，使齐景公减少了刑罚；田千秋一句话，使汉武帝思念被逼起兵造反的太子；柳伉一句话，使唐代宗罢免了宰相程元振。谁敢说我堂堂大宋，没有这样的人呢?

《尚书·皋陶谟》中说:上天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纲常。这表明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没有不是出自天理的。臣下我生活在普通百姓的家里,就勉力通晓孝道,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从山林中来到殿廷,看到了陛下您,就把我一片忠心献出来,十分鲜明地发自至诚,简直无法阻遏住。这也属于天理自然,不值得奇怪。臣下我如果志向只在获取到官爵俸禄,不向陛下痛快地讲论一番,那么臣下我是在欺骗谁呢?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所以臣下我即使献上一番议论,退下后在司法官员那里接受死刑处罚,也不忍欺骗上天,违背这颗良心。只希望陛下您饶恕我那鲁莽愚笨,真是万分荣幸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刘永海译〕

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德匪陋，绍承大统，遭家多难，求济未获，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觊闻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尽精极虑，乐为朕言之。盖闻在昔圣王之治天下，正心诚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诸事业之间，则或宽或猛，或质或文，变通随时，不胶于迹，故其成效，布在方册，昭昭乎其可观也，朕甚慕之。

越自即位，九年于此矣。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夙夜祗惧，罔敢荒宁，而施为缪戾，治效缺然，深惟其故，不惮改作。间者乃下铨量之令以择吏，而真才犹未显也；严科敛之禁以恤民，而实惠犹未孚也；谨简练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犹未革也。夫吏道未肃，民力未苏，兵势未强，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顾何以辑事功，弭祸乱哉?而建议之臣并欲考课以校殿最，省官以抑俸稍。力役不足以供饷馈也，为之屯戍营田以宽之；赋入不足以难调度也，为之平准均输以佐之。爵赏未艾也，为之定武功之等；纪律未明也，为之参府卫之制。凡若此者，其合于古，便于今乎?其或有不然者邪?

虽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时序，灾沴不生而动植遂性；下之欲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协心。兹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敌不克，何难不济，兴复大业其庶几乎!子大夫以为何修何营而可以臻此?其条列而茂明之，务适于用，朕将有稽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德行浅陋，继承了皇位，正赶上国家遭到了很多危难，谋求渡过难关却没有见到成效，因此广泛地延请英雄豪杰，都到殿廷上来，希望能听到治国之道的纲要。你们这些读书人必定会竭尽自己的全部想法，乐意为皇帝我讲论它。听说从前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端正自己的心志，使意念真诚，在

上面身体力行，原本就具有那原则和方法，而实施在各项政务中，有的就奉行宽大的方针，有的却奉行严厉的方针，有的就崇尚质朴，有的却崇尚文采，这都是根据时势加以变通而不拘泥于前代的做法。所以他们成就的功业，明明白白地载列在典籍中，容易看到。皇帝我十分羡慕他们。

自从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时刻想着要洗刷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当年的宏伟帝业，昼夜恭敬畏惧，不敢过度享受和安宁。然而筹划部署不对头又很混乱，治理成效看不到，深深地思考其中的缘由，不怕改弦更张。于是近来下达考核官员的诏令来选拔官员，然而真正的人才仍然没有脱颖而出；强化征收赋税的禁令来体恤百姓，然而实际的恩惠还没有让百姓信服；谨慎对待挑选和训练的办法来治理军队，然而白吃军粮的现象仍未革除。说起来，做官的原则与方法还没有肃正，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没有宽舒，军队的威势还没有强大，这是皇帝我进行治理还没收到成效的具体表现，可还能凭借什么去聚集起事功，消除掉祸乱呢?提建议的大臣都主张通过考核督察来查验官员的政绩高低，裁撤多余的官员来削减俸禄开支。征用民力不足以供应军饷需求，就用驻扎戍守、在当地耕种田地的办法来缓解；赋税收入不足以满足政府开支，就用平抑物价、调剂各地物资的办法来补充。封官赐爵还不普遍，就制定武功的等级；纪律还不严明，就参取唐朝的府兵制度。综合起这样的建议，它们合乎古代，适合当今吗?是否有的还不见得就正确呢?

虽然如此，这还是治国的外部措施。往上要日月星辰大放光明，春夏秋冬正常交替，阴阳失调的灾害不发生，动植物都各得其所；往下要风俗教化推行开，社会习尚淳朴厚重，为非做歹的人不出现，朝廷和地方齐心协力。这样就可以获得天时与人和的帮助了，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攻克，还有什么难关不能渡过，振兴光复我朝宏大的帝业，不就大有希望了吗!你们这些读书人认为应该整治什么，筹划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呢?你们要把这些逐条列出来，尽力说明它，一定要切合实际应用。皇帝我准备进行验核。

汪应辰　廷对策

汪应辰(1119～1176)　本名洋，字圣锡，玉山(今属江西)人。五岁知读书，十岁能诗。绍兴五年(1135)高中状元，年甫十八，赐名应辰，授镇东军签判，后召为秘书省正字。因反对和议，屡受秦桧迫害，家居滞外。桧死，得还朝，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正直敢言，多革弊事。以作文为敝精神于无用，然每作辄过人。有《文定集》传世。

臣对：臣闻治道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行霸道则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于廷，询之以天下之大计，曰觊闻治道之要。顾臣浅陋，何足以奉承大问?臣谨以所闻于师者言之。

窃以为为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诸己而已。盖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为也；然人君一为仁，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仁矣。天下皆不义，宜不可为也；然人君一为义，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义矣。故爱人而人不亲，则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则人自亲矣。治人而人不治，则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则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吾之一身既正，则天下心悦而诚服，若风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者也。

以修己安百姓为病，此尧舜之所以反求诸己也。以百姓有过为在予一人，此汤武之所以反求诸己也。小人怨詈则皇自敬，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尝不反求诸己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尝不反求诸己也。

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数圣人者，达而在上，则力行此道以泽天下；穷而在下，则力行此道以诏万

世。自孟轲之死，始不得其传。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诸己而力行之，则凡所以问于臣者，臣虽不言，而治道固已举矣。不然，则臣虽欲言之，无益也。然而圣策下询，则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谨一二而对。陛下当见此理之昭然，而不复疑矣。

伏读圣策，首慕古先圣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窃以为，圣王之治，其则不远。陛下反求诸己，在先立其志尔。陛下聪明神武，首出庶物，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为者，但陛下未之为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国，莫有当其锋者，宜若不可与之较也。然去冬警奏既闻，陛下赫然震怒，亲总戎辂，号令六师，而敌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断而不惮于勤劳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为患久矣。陛下委之贤将，授以方略，不出数月，遂能歼厥渠魁，去历年深根固蒂之盗，而安千里刀刃之余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长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见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复古先帝王之治，第恐圣志有未加焉耳。

臣不知陛下之志，将兴衰拨乱，行帝王之道耶？抑将趋小利，急近功，为霸者之事耶？今圣策乃以正心诚意为言，则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能以其所闻所知，尊而行之，则高明光大，孰能御之哉？至于措诸事业之间，宽猛文质之宜，特其余事而已。臣愿陛下立志以为本，以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进一日，新而又新，则二帝三王之事，岂有不可为者哉？惟陛下力行之耳。

伏读圣策以粤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夙夜祗惧，罔敢荒宁，施为缪戾，治效缺然，深维其故，不惮改作。臣以为此则在陛下反求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论收复山东之策，而以自治为上。牧之言，万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盍亦先于自治乎？

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为自治之计者何也。昔之人君，虽当干戈扰攘之际，亦必先择形胜之地，以为根本之图。故高祖之兴，根本关中；光武之兴，根本河内。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自维扬

而之临安，自临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会稽，自会稽而再之临安。是都邑之迁徙，未始有定论也。

越王之欲伐吴，与种、蠡协谋，凡二十年，然后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毁而罢之。自艰难以来，所置辅相凡几人矣。是宰相之废置，未始有定论也。中间尝用留守兵，欲率励群帅，复收赵魏矣，几渡河而辄罢。又尝以宰相都督诸军，议遣大将，欲涉淮以趋宿、泗矣，俄而中辍。是进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论也。至于号令之间，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之类，则于措画政事，何其无定论也！如所谓以差下人、别与差遣之类，其于进退人才，又何其无定论也！

夫都邑之迁徙，宰臣之废置，进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画，人才之进退，皆国家大事，不可易为者，而乃纷纷不定如此，则陛下所以为自治之计，臣窃恐为敌国之所窥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复祖宗之烈，正犹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间治效缺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奋悟，不惮改作，则中兴之业，殆犹反手之易。愿先定大计，然后从事，毋为此纷拏错乱而无归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无所不至，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则为之而成，动之而功，将无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进为忧乎？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以真才之未显，实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为虑。臣以为此诚当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则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夫吏道未肃，宰相之责也；民力未苏，郡守县令之责也；兵势未强，诸将之责也。臣窃谓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异，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上之所好者财利，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者也。今陛下下铨选之令，则诚有意于肃吏道矣；严科敛之禁，则诚有意于苏民力矣；谨拣练之法，则诚有意于强兵势矣。然而真才之未显，则是宰相进贤退不肖有未尽也；实惠之未孚，则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则是二三将臣训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诏也若声，而其下应之也若响。苟好恶一萌于方寸，虽不形于言词气色之间，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为宵旰之忧，发于诏令，而下之人犹不能奉承之，无乃陛

下诚有所未至耶?苟诚未至而徒为空言,则虽日下诏书,果何补于事哉?

臣窃见朝廷前日以郡县之吏多非其人,乃诏侍从、台谏、馆阁之臣,使各举所知,以备其选。一时在位之士,盖尝以其所知而举之于朝矣,而未尝出其姓名而试其用也。又尝下诏,以今之守令有历任虽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从散局。当时盖尝略行之矣,而今则又复废弃而不举矣。则是择吏诚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显也。

数年以来,民不堪命,虽诏书出于上,而虐令阻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恐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办。夤缘奸弊,下不聊生,乃复宽下赦文,放其租负。而律文又以分数为限,实不能免,苟以欺之。则是恤民诚有所未至,此实惠所以未孚也。

今士卒骄惰,赏罚不明,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其无故则已矣。教习击刺,叫噪号呼,有如聚戏,金鼓旗号,白梃小队,皆效敌人。节制荡然,虽其将帅莫敢自保。至于冒请月俸,虚糜饩廪,盖有诡名而请者矣,盖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矣,盖有借补官资而请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则是治兵诚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诚心,则必有能为陛下任其事者;苟诚心未至,则在下之人虽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且欲考课以核殿最,省官以节俸稍,屯戍营田以宽力役,平准均输以佐赋入。以爵赏之未艾,欲定武功之等;以纪律之未明,则欲参府卫之制。臣以为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则又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昔唐虞之法,则九载而黜陟;《周官》之法,则三岁而诛赏。而朝无幸位,官无旷职,是考课固所当先也。光武下诏,减内外四百余员;太宗创制,定文武七百余员。而国用以足,民事亦理,则省官又在所当先也。二者之法,诚足以核殿最而节俸稍矣。

然臣以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术也。司马光有言曰:考课之法,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功状者,迹也;功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诚以人主一有偏党之心,则

以愚为智，以是为非。但徇一己之爱憎，不复问其人之贤否，而人才于是乎混淆矣。此考课之本，所以在于正心术也。荀况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诚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辐辏而趋之，各求自售，则名器必自此滥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术也。陛下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哀乐乱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谄谀不得以入之。如此则考课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

屯戍营田，韩重华常用之矣，终足以赡边将之用，而省度支之费。平准均输，桑弘羊常用之矣，终能使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则二者之法，诚足以宽力役而佐赋入矣。然臣以为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汉宣帝与赵充国议论疆埸之事，一时在廷之臣，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充国以为明主可为忠言，条列利害，反复凡数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终获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国之事观之，则营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

唐之刘晏，初得渠河之利病，乃畏为人牵制，而移书于朝廷。朝廷以其言为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尽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邦计也，凡始于广德之二年，而终于建中之元年，前后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观之，则平准均输，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诚能搜揽人材，经略世故，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久任而责成之，则屯戍营田、平准均输之法，始可得而行矣。

武功之等，在秦则凡一十七级。然臣以为，纪纲先振，然后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肃宗，当干戈多难之际，朝廷之势日以委靡，爵赏滥冒，莫此为甚。将军告身，才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纪纲之不振而然也。惟上之纪纲，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觊觎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与。此武功所以滥冒也。然则今日之事，盍亦取监于肃宗，而先振其纪纲乎？

府卫之制，在隋则凡十二卫，在唐则凡十六卫。然臣以为，亦必纪纲先振，然后始可得而参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晏安太平之后，苟且偷安，昧于远图，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诸卫之兵浸以贫弱，百姓苦之，而张说始献矿骑之议。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纪纲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纪纲日以不振，废而不举，弊而不修，此府卫所以败

坏也。然则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鉴于明皇，而先振其纪纲乎？凡此数者，考之于古，验之于今，以臣观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则在陛下正其心术，明于任使，而振其纪纲焉耳。古人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无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尔。

伏读圣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时序，灾沴不生，动植遂性。臣愿陛下反求诸己，而应天以实可也。下之欲风化行，习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协心。臣愿陛下反求诸己，而动民以行可也。

臣闻之《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面稽天若。言圣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颠沛造次，不违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钦，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尔。大抵天道，虽至高而下，虽至远而迩，虽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虑之失，则足以伤天地之和；一言一动之善，则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恶之应，速于桴鼓。臣窃观于今岁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劳思，上惧天戒，下忧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间。既有膏泽继降，不出于旬日之内，盖以陛下诚有惨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陛下诚能因前日之所已为，而推今日之所未为者，扩而充之，则天意昭格，将保佑宋祚于千万年矣。昔孟子以齐宣王有爱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况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应天以实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尔。

臣闻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将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将百人；得千万人之心者，可以将千万人。今陛下将大有为于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权势不可得而胁，惟人主力于为善，勤于进德，始足以服其心尔。昔宣王承厉王之烈，《小雅》尽废，四夷交侵，而终能复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诗》者称之曰：侧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盖方其侧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庆，知王化复行矣，此民心所以归也。光武初入关，冯异送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者。光武于是乎招徕俊乂，屈己从谏。邓禹之徒闻风慕义，裹粮而归，相与扶持协赞，以成再造之业。陛下诚能体二君之所为，使圣德日新，昭著天下，则民之不幸而陷于强敌，将日夕引领而望王师之来苏，惟

恐其后，况吾东南之民，安有不协心以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尔。

臣窃见陛下临政愿治，当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浅，幸赐诱进，而以治道为问。仰慕先圣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历年之宿弊，而欲行昔日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圣虑深远，规模广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问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对；周思历算，窃以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为，他人皆莫能为也。故因大问之及，而辄求所以反求诸己之道，诚不敢务为多言，以上惑圣听。

臣不知陛下之意，将以今日之事责之于谁耶？将责之大臣，陛下即位以来，大臣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告廷之命以某为有道，以某为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所谓大臣者，虽负经纶之方，方且畏惧而避嫌；而其不贤者，又且持禄而保宠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

将责之台谏，陛下即位以来，台谏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训诰之词以某为正直，以某为謇谔，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所谓台谏者，有怀忠徇国之心，方且待信而后谏；而其不贤者，又且希旨以求进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

抑将望之四方之贤才耶？陛下即位以来，所以招徕而用之者，不为不多矣。以为不贤耶？则或得之众论，或得之荐举，或朝奏而暮召，或一岁而九迁，陛下又何所见而然也？以为贤耶？而中兴之功，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果能无愧于前王乎？苟为不然，则天下之士，其贤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贤者，往往旅进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谀谄佞，无所不至矣。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

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为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奋然先有以自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效其死，举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将无不可者矣。不然，则群臣虽有伊、吕、稷、契，亦安能为陛下计哉？此臣所以愿陛下力行反求诸己之道也。臣不胜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实万世无疆之休。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国大道，不在于提出很多措施，只看对它大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实行称帝天下的大道就能称帝天下，实行称王天下的大道就能称王天下，实行称霸天下的大道就能称霸天下，没有大力去实行却达不到目的的，也没有不大力去实行却达到目的的。现在陛下您在殿廷上策问臣下我，用治理天下的大政方针来询问，说是希望能听到治国大道的纲要。但是臣下我浅薄鄙陋，哪里能承受殿廷上的询问?臣下我恭敬地用从老师那里听来的东西说一说。

臣下我私下认为治国的纲要，只在于君主从自身去求取罢了。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植根于君主身体力行的。天下的人都不仁德，固然很难办了，然而君主一旦实行仁德，那么天下的人就一起归向仁德了。天下的人都不讲正义，固然很难办了，然而君主一旦实行正义，那么天下的人就一起归向正义了。所以，关爱百姓而百姓还不和睦，这是仁德仍然存在着尚未达到极限的地方；能回到自己的仁德究竟应该怎么样上，百姓自然就和睦了。治理百姓而百姓还没得到治理，这是智慧仍然存在着尚未达到极限的地方；能回到自己的智慧究竟应该怎么样上，百姓就自然得到治理了。凡是实行中出现行不通的情况，都返回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自己一个人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如同被风吹过的野草肯定倒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说治理大道的纲领，没有比这再占首位的了。

把修养自身、安抚百姓当作忧虑，这是尧舜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的做法。认为百姓有过失，责任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是商汤、周武王返过来从自身来寻求的做法。百姓说出怨恨的言词，就自己赶紧敬行美德，这是商高宗、商中宗、祖甲、周文王返过来从自身来寻求的做法。古代要在天下把圣明仁德显示得特鲜明的君主，首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他的国家，首先整治好他的家庭；要整治好家庭，首先修养好自身。孔子讲论治国，没有不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的。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

根本在于自身。孟子讲论治国，也没有不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的。

这个大道，尧把它传给了舜，舜把它传给了夏禹，夏禹把它传给了商汤，商汤把它传给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把它传给了孔子，孔子把它传给了孟子。这几位圣人，在上面显贵，就大力实行这个大道，来给天下带来恩惠；在下面处境穷困，仍大力实行这个大道，告诉给千秋万代。从孟子去世，才开始断绝了得到传授的人物。这就是地位卑微的臣下我对陛下您报有希望的原因。现在陛下您果真能够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大力去实行，那么所有用来询问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即使不说，而治国大道原本就已经得到贯彻了。否则的话，臣下我即使想说，也没有益处。然而圣上的策问往下来询问，那么臣下我就有不容沉默不言说的了，在这里就恭敬地对答一星半点儿。陛下您应当看出这个道理非常明显，而不再存有疑问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首先是说您仰慕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绩，好像有抬头瞻望但又无法赶得上的地方。臣下我私下认为，圣明帝王的治绩可以效仿，离得并不遥远。陛下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在于首先定立志向。陛下您聪明睿智，神明威武，让万物开始生长出来，对于那些好像做不好的天下大事，只是陛下您没有去做罢了。面对金国侵犯我大宋，在开始阶段没有能阻挡住他们兵锋的地方，应该就不去跟他们直接做较量。然而去年冬季接到前方报告金国又入侵的消息后，陛下您显赫地动起愤怒来，亲自担任统帅，指挥中央大军迎战，敌人自动就撤退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您英明果断，不怕辛勤劳苦。洞庭湖和湘江一带的贼寇，在池塘水泊中武装捣乱，已经成为朝廷的祸患很久了。陛下您委任贤能将帅，教给他作战策略，没出几个月，就歼灭了贼寇的首领，除去了多年根深蒂固的强盗，使方圆千里之内遭受刀兵之苦的百姓安定下来。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陛下您精通韬略并能长久任用贤明将帅啊！凭借陛下您已经做到的事情竟像这样，可以见到的成效又竟像这样，这就是臣下我知道陛下您一定能恢复古代圣帝明王那样的治绩的理由，只怕陛下的圣明心志还没有注意到它们罢了。

臣下我不知道陛下您的远大志向，是要振兴衰败局势，拨除祸乱，实行称帝天下、称王天下的大道呢?还是要追逐微小利益，急成短期功效，致力称霸天下的事情呢?现在圣上的策问讲到端正心志使意念真诚，那么称帝天下、称王天下的大道，陛下您是早已清楚的了。曾子说：推崇自己所听说过的君子之道，就会高远明达了；实行自己所了解的君子主张，就会发扬光大了。陛下您真地能够依据您所听说和了解的东西，推崇并实行它们，就会高远明达，发扬光大，谁能够抵挡得住呢?至于实施到各项政务中去，宽大严厉和文采、质朴恰到好处，只不过是剩下的小事罢了。臣下我希望陛下立下大志做为根本，坚信帝王的大道是一定能够达到的，坚信圣人的主张是一定能够行用的，效法上天运行的刚健，不自我懈怠，一天比一天进步，更新了再更新，那么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哪有不可做到的呢?只在于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以为自从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时刻想要洗刷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宏伟帝业，昼夜恭敬畏惧，不敢过度享受和安宁，然而筹划部署不对头又很混乱，治理成效看不到，深深地思考其中的缘由，不怕改弦更张。臣下我认为这全在于陛下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首先治理好内部。从前杜牧论说收复崤山以东地区的计策，就把治理好内部放在第一位。杜牧的论断，实在是万世的良方。现在陛下您要洗刷父兄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宏伟帝业，何不也把治理好内部放在第一位呢?

茅屋草舍中的读书人，不知道朝廷用来治理好内部的计谋是什么。从前的君主，虽然处于干戈四起的混乱时期，也一定首先选择地形优越便利的地方当首都，做为图谋大业的根基。所以汉高祖兴起，把关中作为根基；东汉光武帝兴起，把河南作为根基。如今我们却不是这样，好像小船在漂流，不知道该要停泊的地方。从扬州到临安，又从临安到建康，再从建康到会稽，转过来从会稽又到临安。国都的迁徙，不曾有个确切无疑的结论。

春秋时越王勾践要讨伐吴国，跟文种、范蠡共同谋划，总共二

十年，然后得以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现在我们却不是这样，今天因为某人说某人好就让他当宰相，明天又因为某人的诋毁罢免了他。自从蒙受国难以来，设置的宰相总共有好多个了。这表明宰相的废除与设置，不曾有个确切不疑的结论。在这期间曾动用留守京师的军队，打算给各路军队做出表率并激励它们，已经收复赵、魏失地了，眼看要渡过黄河却又罢了兵。又曾让宰相督领各支军队，商议派遣大将，打算渡过淮河直奔宿州、泗州了，不久又中途停止，这表明在军事调动，是进攻还是退守上，不曾有个确切无疑的结论。至于在发布命令的过程中，如所谓前些时候降下的指令，突然做更改不用再执行之类的情况，又表明在筹划部署政事上，怎么那样地没有一个确切不疑的结论呢!再如所谓已经差遣另一个人来办，对你另行差遣之类的事情，更表明在进用和贬抑人才方面，又是多么地没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结论呀!

都城的变动迁徙，宰相的废黜与设置，军事调动的进攻与退守，政事的筹划与部署，人才的进用与贬抑，都是国家的大事，不能随便就决定的，可是竟然像这样变来变去，那么陛下您用来治理好内部的计谋，臣下我私下担心会被敌国偷偷看出来了。这样还想洗刷父兄所蒙受的耻辱，恢复祖宗的宏伟帝业，正好像倒着行走却想追上前边的目标一样，九年之内治理成效看不到，本来也只会如此啊!如今陛下您果真能够猛然醒悟，不害怕改弦更张，那番重新使国运振兴的大业，恐怕就像翻过手掌来那样容易建成了。但愿陛下先定下大政方针，然后再具体落实，千万不要再干这类纷繁杂乱的事情而没有归宿了。凡是我所用来治理好内部的措施，没有涉及不到的，超乎寻常地具有不可战胜的准备，那就施行会有成绩，动用会见功效，将会没有做不成的事了。又根据什么还把治国效果没有进展作为忧虑呢?只在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您把真正的人才还没有涌现，实在的恩惠还没有让百姓信服，空耗军饷的现象还没有清除作为忧虑的事情。臣下我认为，这些的确是当今的老问题，而解决它们的办法，就在于陛下您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啊!做官的原则与方法还没有肃

正，这是宰相的责任；百姓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还没有恢复，这是郡守县令的责任；军队的威势还不强大，这是各个将帅的责任。臣下我私下认为，天子对于整个天下说来，想要什么就必定会得到，想求取什么就必定会到来。皇帝喜好珍奇物品，下面的人就用珍奇物品来进献了；皇帝喜好财富利益，下面的人就用财富利益来进献了。大概还没有皇帝喜欢而下面却违逆的事情。如今陛下您下达了考核官吏的诏令，确实对肃正做官的原则与方法予以注意了；强化征收赋税的禁令，确实对恢复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注意了；谨慎对待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方法，确实对加强军队的威势予以注意了。可是真正的人才还没有涌现，这属于宰相在举荐贤能、摒退庸劣方面还有做得不彻底的地方；实在的恩惠还没有使百姓信服，这属于郡守县令在承受朝廷命令、进行宣扬化导方面还有做得不得力的地方；白吃军粮的现象还没有革除，这属于那几个将帅督臣在训练士兵、整治军队方面还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君主下达的诏令好像声音，而下边人的反应就如同回响。如果君主的爱好或厌恶一旦萌发在心中，即使不在言谈气色间流露出来，下面的人也会顺势探求出君主的意愿而去迎合它了。现在陛下对以上三个问题构成了终日的忧虑，并在诏令上表现出来，可下面的人仍然不能遵照执行，这恐怕是陛下您确实还存在着没有做到家的地方吧?如果确实还存在着没有做到家的地方，却只是空喊一通，即使每天都下一道诏书，果真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

臣下我私下发现，朝廷前一段时间因为郡守县令大多不是确能胜任的人选，于是下诏给侍从官、御史台和谏台、三馆秘阁等大臣，让他们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来供选用。一时间在位官员都曾把自己所了解的人才向朝廷推荐了，而朝廷却不曾公布他们的姓名，试加任用。又曾下诏，鉴于当今郡守县令有的虽然先后在各个州县担任过职务，但才干不能胜任，全部让他们退下来，转入散官的行列。当时也曾大致地实行过了，可如今又废弃不再实行了。这表明，在选拔官吏上，确实还存在着做得不到家的地方。这就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没出现的原因。

多年以来，老百姓难以存活下去。朝廷虽然颁发了诏书，到下面它却被残暴的地方命令所阻止。用提供力役自我保护为由诳骗百姓，因而征调青壮年男子；用犒赏慰劳军队为名恫吓百姓，因而大量聚敛钱财谷物。打造弓弩的材料和造箭的竹木、造甲的皮革等，天天征收，样样置办。各级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老百姓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朝廷又表示宽大，颁发诏书，免除百姓所拖欠的租赋，可是法律条文又把每家承担的赋税数额作为必须交足的东西，事实上是不能减免的，暂且欺骗一下百姓罢了。这表明在体恤百姓方面，确实还存在着做得不到家的地方。这就是实在的恩惠还没使百姓信服的原因。

如今的士卒骄纵懈怠，赏罚不分明，没有什么区别和选择。权且白白养活，毫无原则地容忍他们，唯恐他们当中有谁变脸不高兴，侥幸他们没发动哗变就行了。演练刺杀，士兵们呼喊乱叫就好像聚众做游戏；演练阵法，却让手持大木棒的小队充当敌人。指挥系统不复存在，即使是本军将帅也难自我保全。至于冒名领取月俸，白白耗费国家俸禄，差不多已有化名来请领的了，差不多已有用使臣的名义来请领的了，差不多已有借口补助官员俸禄来请领的了。朝廷知道这些情况，却没人敢禁止。这表明，在治理军队方面，确实还存在着做得不到家的地方。这就是白吃军粮的现象还没有革除的原因。总共这三项，陛下您如果能把诚心贯注进去，就一定有能够为陛下承担起具体责任的人。如果诚心没贯注到极限，那么处在下边的人，即使想承奉您的旨意去执行，也有做不到的。只在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还要通过考核督察来查验官员的政绩高低，裁撤多余的官员来节省俸禄开支，用驻扎戍守和屯田来缓解百姓的力役，用平抑物价、调剂各地物资来补充赋税收入。因为封官赐爵还不普遍，就打算定立军功的等级区别；因为纪律还不严明，就打算参取唐代的府兵制度。臣下我认为这都是适合当今的好对策，至于实施的根本途径，又在于陛下您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啊！从前尧舜实行的制度，每九年对官吏考核三次，决定升降；《周

礼》规定的制度，每三年对官吏进行封赏和处罚，因而朝廷上没有侥幸捞到的官位，官员没有荒废本职工作的现象。这表明，对官员进行考核督察，本来是应当放在首位的。东汉光武帝颁发诏令，裁撤官廷内外官员四百多人；唐太宗创立下制度，确定朝中文武官员数额为七百多人，国家的用度因此而充足，百姓的事务也得到了治理。这又表明，减少官员也是应当放在首位的，这两种举措，确实足够用来查验官吏的政绩高低和节省俸禄开支了。

然而臣下我认为，制度必须要施行，陛下您不能不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心计。司马光有番话说过：对官吏进行考核督察的制度，根本在于极其公正，极其明晰。报告政绩的文书，就是官员施政的实际表现；政绩确定得明晰，就是君主心念的反映。自己的心念还不能端正，却要去考察别人的实际表现，不就很难了吗?这确实是因为君主一旦产生偏袒的心念，就会把愚蠢的看成是明智的，把正确的看成是错误的，只顺从个人的好恶爱憎，不再追问那个人究竟是贤能还是庸劣，在这时人才就好坏混淆在一起了。这就是考核督察官吏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和心计的原因。荀况说过这样的话：减少官员不如减少政事，减少政事不如使心念纯净。这实在是因为君主的嗜好显露出来以后，下边的人都靠拢并直奔过来，各自想办法使自己受到赏识，朝廷的官职爵位就必定由此冗滥了。这就是减少官员的根本又在于端正思想和心计的原因。陛下您真地能够不因亲疏贵贱而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不因喜怒哀乐而扰乱心志，使奸邪佞幸没办法来迷惑您，使阿谀奉承的人没办法钻进来。这样考核督察与减少官员的制度就可以施行开了。

驻扎戍守和屯田，韩重华曾经用过这个办法了，最终足以满足边境将士的费用，节省了户部的开销。平抑物价，调剂各地物资，桑弘羊曾经使用过这个办法了，最终能使征敛不涉及到百姓，而国家的用度也自行充足。这两种办法，的确能够缓解百姓的力役，补充赋税收入。然而臣下我认为，想让有效的办法必定施行开，陛下您不能不首先对任用主管官员的问题特清楚。汉宣帝与赵充国商议边境事宜，一时间朝中大臣有的认为对，有的认为不对。赵充国坚

信可以向英明的君主进献忠言，就逐条指明利害关系，反复加以陈述，总共有几千字。汉宣帝深信不疑，终于取得了大破羌人部落的功绩，也收到了屯田的好处。从赵充国的事情来看，驻扎戍守和屯田，对陛下您说来，怎么能够不对任用主管官员的问题要特清楚呢？

唐代的刘晏，开始了解到由水道往京师运送粮食等物资的利弊所在，但担心被别人牵制住，就向朝廷上书。朝廷认为他的意见可以行用，就把漕运方面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办理，所以刘晏得以充分施展出自己的才干。待至臣下我考察刘晏的事迹，他掌管国家财政，总计起来，从唐代宗广德二年开始，到唐德宗建中元年为止，前后共十六年，才得以成就了他的功绩。从刘晏的事情来看，要平抑物价，调剂各地物资，对陛下您说来，怎么能够不对任用主管官员的问题要特清楚呢?陛下您果真能够招揽人才，使用经验特丰富的人，选取他们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经过长期任用，要求他们做出成绩，有关驻扎戍守和屯田、抑制物价和调剂各地物资这些措施，就可以行得通了。

关于军功的等级，在秦朝总共设有十七级。然而臣下我认为，只有国家纲纪首先振作起来，然后才能够确定军功的等级。从前唐肃宗正赶上干戈四起、国难频繁的年代，朝廷的威势越来越萎靡不振，封官赐爵弄虚作假，毫无限制，没有比这时更严重的了。将军的任职凭证，充其量换回一次酒醉钱罢了。恶化到这步田地的原因，都是出自朝廷纲纪废弛才造成的啊!只因朝廷的纲纪越来越废弛，所以下面的人都存有僭越窃位的野心，去要挟朝廷，而朝廷也不得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就是军功爵位弄虚作假、毫无限制的缘由。既然如此，那么现今的事情何不从唐肃宗那里汲取教训，首先振作起朝廷纲纪呢?

府兵制度，隋代在京师总共设有十二卫，唐代在京师总共设有十六卫。然而臣下我认为，也必须首先振作起朝廷纲纪，然后才可以参取府兵制度。从前唐玄宗在历经安逸太平以后，就苟且偷安，对长远谋划很昏昧，政令一天比一天松弛，国家法度一天比一天败

坏，各个府卫的士兵，逐渐贫困衰弱，百姓深受其害，因而张说才开始进献组建名为矿骑的部队的建议。演变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也是由于朝廷纲纪废弛才造成的啊！只因朝廷纲纪日益废弛，衰败难以整治，弊端难以纠正，这就是府兵制度败坏的缘由。既然如此，那么现今的事情，又何不从唐玄宗那里汲取教训，首先振作起朝廷纲纪呢？总括以上这几种措施，从古代去做考察，用今天加以验证，就臣下我看来，没有不可行用的。但行用的根本途径，就在于陛下您端正自己的思想和心计，对任用主管官员问题特清楚，振作起朝廷的纲纪来。古人所说的：明智如神，就看那个人究竟怎么样；有能治理天下的人，却没有能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法令，全都出自这个原因。只在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其中说到："往上要使日月星辰大放光明，春夏秋冬正常交替，阴阳失调的灾害不发生，动植物都各得其所。"臣下我希望陛下您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用实际行动顺应天意就行了。策问中还说："往下要使风俗教化施行开，社会习尚淳朴厚重，为非做歹的人不出现，朝廷和地方齐心协力。"臣下我希望陛下您还是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用模范行为来感化百姓就行了。

臣下我听说《诗经》上讲：周文王或升或降，始终守在天帝的左右两旁。《尚书》中说：当面考求天意。这都是在讲古代的圣明帝王侍奉上天，就好像上天在自己的头上，自己如同在天帝的左右啊！所以即使是人事困顿、窘迫仓猝，仍不违背仁德，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时候，这都是因为敬畏上天的威严而侍奉上天罢了。大体上说来，天道虽然极其高远，却又降临；虽然极其遥远，却又离得很近；虽然极其神秘，却又很明晰。作为君主，思虑上的一点闪失，就会损害天地的和谐；言行上的一点美善，就会同天地的德行合拍。善与恶的回应，就好像鼓槌与鼓声一样。臣下我私下察看今年夏天，及时雨没有按节气降下，陛下您心情焦虑，往上害怕触犯了上天的禁忌，往下忧虑百姓的疾苦，吃饭睡觉时都无法忘却。不久就连降及时雨，没超出十天的时间，这是因为陛下您确实有慈

悲的心肠啊!古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地方，并没有其它的方面，只是善于推求他所应做的事情而已。陛下您果真能够依据前些时候已经做了的事情，推求今天还没有去做的事情，加以扩展，加以充实，上天的心意就显示感通，将会保佑大宋国运一直到千万年了。从前孟子鉴于齐宣王有爱惜一头牛的善心，还说凭这种善心就足以称王天下了。况且陛下您的仁爱之心像天地那样广大，从这加以推求，扩展开去，还有什么目标会达不到呢?这就是用实际行动顺应天意的效验。只在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臣下我听说，赢得十个人衷心拥护的人，就可以统率十个人；赢得一百个人衷心拥护的人，就可以统率一百个人；赢得千万人衷心拥护的人，就可以统率千万人。如今陛下您将要在天下大有作为，应该首先有办法让天下的人心深深归服，而天下的人心，也不是容易归服的。威严的刑法并不能控制住人们，强有力的权势并不能威胁住人们，只有君主在善行上努力，在提高美德上勤勉，才足以使人心归服。从前周宣王承接周厉王的基业时，《小雅》诗歌中所颂扬的东西全已荒废，周边各部族交替入侵，然而最终能够恢复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疆域，原因就在于周宣王在上面身体力行的东西，能使天下人心归服。所以给《诗经》写小序的人说：小心谨慎地修明自己的德行，天下人都为德政教化再次施行而高兴。大概当周宣王小心谨慎地修明自己德行的时候，天下人肯定都很庆幸，知道德政教化会再次施行了。这就是民心归服的原因啊!东汉光武帝刚进入函谷关时，冯异给他送行说：要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光武帝于是广泛招徕英雄豪杰，降低自己身份，接受规谏。邓禹这类人，听到消息很仰慕光武帝的仁义，带领人马、装着干粮前来归附，共同扶持赞助，成就了光复汉室的宏大事业。陛下您果真能够体察这两位君主的所作所为，使圣明的仁德日日更新，让天下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百姓中不幸陷入强敌手中的人，就会每天伸长脖颈来等待我大宋军队去解救他们，唯恐落在后面。何况我东南地区的百姓，哪有不齐心协力来为陛下您效力的呢!只在陛下您大力去实行罢了。

臣下我私下里发现陛下您登上皇位，盼望大治，接受朝见时长长叹息。不因为臣下我等人愚昧浅陋，却把诱导进取荣幸地赐给我们，用治国大道作为策问的内容。您仰慕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理成效，对以前的失策感到悔恨；深深思索多年以来的积弊，打算实行从前的良好措施。又要上得皇天的心意，下收百姓的感情。圣明的思虑深切长远，总体筹划和部署宽广宏大，这都不是愚昧的臣下我所能体会到的。臣下我恭敬地捧着策问的事项，对它沉吟很久，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回答。经过周密考虑，逐条琢磨，私下认为如今的事情，只有陛下您可以做，其他的人都不能做。所以就按照策问中所涉及的问题，一对答就讲求那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的道理，实在不敢一个劲儿地乱讲一通，以致往上干扰了圣明的听断。

臣下我不知道陛下您的意向，准备把今天的事情交给谁去完成?准备交给大臣去完成吗?那么陛下您即位以来，大臣不是不多了。认为他们不贤良吗?那么在朝廷公开宣布的命令中，却说某人有道，某人有德。陛下您又从哪里亲自了解出这是真的呢!以为他们贤良吗?可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兴盛的功绩，到最后又没有符合陛下心愿的地方。陛下您也要思考一下大有作为的涵义，确实能在先王面前没有惭愧之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大臣们，即使身怀怎样治理好国家的方略，也正畏惧而避开嫌疑；而那些不贤能的人，又打算保住俸禄，保住皇上对他们的宠爱了。这对治理成效听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再疑惑的了。

打算交给御史和谏官去完成吗?那么陛下您即位以来，御史和谏官不是不多了。认为他们不贤良吗?那么在下发的训诰文词中，却说某人正直，某人刚强。陛下您又从哪里亲自了解出这是真的呢!认为他们贤良吗?可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兴盛的功绩，到最后又没有符合陛下心愿的地方。陛下您也要思考一下大有作为的涵义，果真能在先王面前没有惭愧之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御史和谏官，即使怀有为国献身的忠心，也要等到查明实情以后才进谏；而那些不贤能的人，就光打算迎合圣上的意旨来求得进升了。这对治理成效听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再疑惑的了。

或者准备把希望寄托在全天下的贤才身上吗?那么陛下您即位以来，通过招揽并予以任用的人，不是不多了。认为他们不贤良吗?那么，有的是通过公众舆论获取到的，有的是通过推荐获取到的，有的早上奏报上来，晚上就进行征召，有的一年中，得到多次升迁。陛下您又是亲眼见到了什么而这样做的呢!认为他们贤良吗?可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兴盛的功绩，到最终又没有符合陛下心愿的地方。陛下您也要思考一下大有作为的涵义，果真能在先王面前没有惭愧之处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的士人，他们中属于贤良的人也正奉守自身，谋求隐退；而那些不贤良的人，往往一起前进又一起后退，患得患失，阿谀奉承，献媚讨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这对治理成效听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再疑惑的了。

依据上面的情况来说，如今的事情，只在陛下您自己怎样去做罢了。如果能够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勤勉地去实行，昂奋地先有办法自立起来，明智的人就愿意献出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愿意拼上他们的性命，把整个广大的天下都包括进来，任凭陛下您想做什么，将没有做不到的了。否则的话，在众多的臣子中，即使有伊尹、吕望、后稷、契那样的人物，又怎能为陛下您做考虑呢?这就是臣下我反复要祝愿陛下您大力实行那返回来从自身来寻求的原则的理由。臣下我诚恳到极点，只请陛下您对此留神省察，这实在是万世永无尽头的福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刘永海译〕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衍;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谟,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先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人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借鉴先王的法规和事例,就永远不会有过失。遵守先王的法规而犯错误的,还从来没有过。敬思我朝祖宗以来,树立治国的原则,设置施政的纲领,各项规章制度都非常明确,大小事情都得到施行,这都属于各位先朝皇帝递相传授的谋略,构成了永远不可改变的法典。皇帝我继承先朝的远大规划,恪守他们的宏伟功业,凡是一个法令、一项措施,都考察那些已往的成例,只管效仿并依从祖宗的成法办。然而谁都必须遵守的禁令和有关赏罚的规定仍和从前一样,但奸恶弊害却没有完全革除;赋税征收的制度和国家财政收支的规章仍和从前一样,然而财富还不特别宽裕;取士的科目和培养人才的方法仍和从前一样,然而人才还没有繁盛;对官吏罢免升迁的制度和训导启迪的方法仍和从前一样,然而百官相互规正还有的并未励行。其中的过错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是大道即使历时长久也不会改变,法度有时却会出现弊端,对它们适当进行减损与增益,存在着不能不做的地方吗?或者是推行法度的人,并不是

合适的人选呢?皇帝我打算参考查验经典中的训导,讲求阐明推行的关键,使祖宗实现天下大治的效果,能够在当今重现,这里面一定有基本原则和方法。你们这些士大夫学习古代典籍,入仕做官,明了治国之道,积累学问等待询问已经很久了,要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王十朋　廷对策

王十朋(1112~1171)　字龟龄,号梅溪,乐清(今属浙江)人。幼颖悟,日诵数千言。年长即讲学授徒,后入太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一,时年46岁。历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起居舍人、侍御史等职。先后建议整顿朝政,起用抗金将领,恢复中原,坚持北伐等。在地方官任内,救灾除弊,颇有治绩。诗文刚健晓畅,有《梅溪集》传世。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

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邪?

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

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

恭惟陛下，缵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

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谔谔诵之，无益也。

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

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核名实，

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羊，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

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犹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飧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

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机之暇，独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

《春秋》书王曰天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僭礼乱乐者，欲

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僭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

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纲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谟，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

《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

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

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抵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

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

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待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

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矣。效者陛下,躬亲万机,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概。

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用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悦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其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

臣伏读圣策曰: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

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

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官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王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绵。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

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聚敛毒民者之深戒也。

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切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人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者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

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

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

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

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成，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太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巨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

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

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缛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诿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

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置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志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也，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

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切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桓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尽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桓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切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修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

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至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朝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

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

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余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

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

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

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

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商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庇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

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

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文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手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

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

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彼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

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余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

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

死,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世上有治理家庭的法度,也有治理天下的法度。臣子们把治理家庭的法度作为一家的法度,君主把治理家庭的法度作为天下的法度。君主和臣子,虽然身份和地位有所不同,因而法度也有大小的区别。至于能够世世代代遵守他那法度的东西,总括起来也就叫做权力罢了。臣子能够执掌一家的权力,遵守一家的法度,把它显示给子孙们,就一定会世世代代都成为显赫的家族。君主能够执掌天下的权力,遵守自家的法度,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度,留传给子孙们,并且永无止境地去施用,就一定会世世代代都成为政治清明的国家。因为法度是治理家庭和治理国家的重大措施,而权力又是持守法度的关键所在呀!

如今陛下您亲自降低最高的身份,在殿廷招集众多的读书人,询问治国之道。在清晰而又详尽的策问中,首先讲借鉴先王的法规与事例,恪守祖宗的成法,这表明陛下您想要遵守自家的法度并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度,原本就已经对此领会到了。臣下我能够凭借一个卑贱人的身份,进入士大夫的行列,承奉陛下的圣旨,哪敢不详尽亮出胸中所学,勉力阐明重大策问的对答,特为陛下遵从祖宗、恪守成法来做进献呢?

臣下我想要讲说的东西,没有别的,也就是强调总揽大权罢了。臣下我曾经认为,君主是天,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是因为它耳聪目明,刚正强健,执掌赏罚的大权而不迷惑啊!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他能够效法上天的耳聪目明,体察上天的刚正强健,执掌赏罚的权力而不向下转移罢了。上天执掌上天的大权而成为天,君主执掌君主的大权而成为君主,因此上天与君主在宇宙中同称第一,而君主的名号必定与上天相对应。凭天道而称王天下的君主,就把他称为天王;用上天的恩德而像对待儿子那样对待百姓的君主,就把他称为天子。占居《易经·乾卦》龙飞九五的最正中的位置,就把这称为天位;享受万寿无疆的福禄,就把这称为天禄。五种服饰和相应的五种颜色标志,就把这称为天命;五种刑罚和相应的五种处置对象,就把

这称为天讨。人们像奔向太阳那样去奔向的，就把这称为天表；人们像敬畏神灵那样去敬畏的，就把这称为天威。君主居住的地方叫做天阙，君主的器具叫做天仗，君主的法度叫做天宪，君主的诏令叫做天语。上天数第一，不能再有在它之上的了；君主数第一，也不能再有在他之上的了，原因就是他们都能够执掌宇宙的大权罢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您蕴积着聪明的品德，具有体察刚正强健的资质，亲自听政决断，一有行动就效法祖宗。每一道诏令下达，天下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就像上天的惊雷和疾风；每一种恩德施布，天下百姓没有不沉浸在其中的，就像上天的雨水和甘露。开辟众多正人君子进用的途径，堵住各个小人钻营的门路，天下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就像上天的清净和明朗；处理政务，使得百姓的精神面貌，天天有更新，又一天天地更新，而天下百姓没有不擦亮眼睛来观看的，就像上天的运行，永无止息。高大啊，宽广啊，已经不能够再有在这之上的了。然而臣下我仍然用效法上天统揽大权作为建议，因为陛下您的仁德虽然登峰造极了，但是臣子心中常用要有增加、没有停止来期望陛下。这是臣下我冒死把话说尽而不知隐讳的原因。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首先讲借鉴先王法规与事例，就永远不会有过失；遵守先王的法规却犯错误，还从来没有过。其次又谈到了祖宗树立治国的原则，设置施政纲领，各位先朝皇帝递相传授的办法，又接下来用今日遵照执行，却不能没有四种弊端作为询问。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了解实现天下大治的准则，在于持守先王的法规与事例，遵从祖宗，想要革除当今的弊端啊！臣下我深切认为，陛下能够统揽赏罚的大权，一概都由自己决定，那么先王的法规和事例就不难持守了，祖宗就不难效法了，当今的弊端就不难革除了，天下就不难治理了。凡是用来策问臣下我的问题，都不值得陛下您忧虑了。不这样的话，陛下您即使一再询问，臣下们即使喧喧嚷嚷为您解释，也没有用处啊！

臣下我观察，自从古代以来，善于讲论治理天下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揽权作为首要的事情的。自从古代以来，善于使天下达到大治的君主，也从来没有不把揽权作为首要的事情的。只有君主才有权

对人予以封赏,只有君主才有权对人施加刑罚,只有君主才有权享用美好的食物。臣下绝对无权擅自对人予以封赏、施加刑罚和享用美好的食物。这是箕子告诫武王的话。天下太平,那么制礼、作乐、征讨、攻伐这些事情都由天子决定;至于天下混乱,那就由诸侯和大夫做决定了。这是孔子告诫后代人的话。认为能够独自施行赏赐,动用惩罚,才称得上是君主,君主是能够制定命令构成正义的人,这是左丘明记载的春秋时代人的话。认为正殿和殿外的台阶不可以相互侵凌,头和脚不可以相互倒置,这是贾谊告诫汉文帝的话。这些就是臣下我所说的善于讲论治理天下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揽权作为首要的事情的。

伏羲等三皇实行帝位禅让的制度,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揽赏罚大权才实行禅让的;黄帝等五帝实行帝位世袭的制度,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揽赏罚大权才实行世袭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用计谋安定天下,而且经历年代都很长久,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揽赏罚大权才使天下安定的。汉宣帝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能够恪守祖宗的法度,完成汉朝中兴的大业,原因也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能够革除霍光专权这个弊端,亲自统揽赏罚大权罢了。观看他全面核查名分和实际,该赏赐的一定赏赐,该惩罚的一定惩罚,在斋戒的处所中裁决政务,听取意见,做出决定只追求精明,神爵和五凤年间的治绩,号称是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功绩显扬祖宗,大业传给后世,大概也就是依据揽权这一条啊!东汉光武帝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国君,然而他能够恪守祖宗的法度,创建起汉朝中兴的功业,原因也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他能够借鉴西汉被王莽篡夺的灾祸,亲自统揽赏罚大权罢了。观看他总揽权柄,宣明并谨慎地对待施政的要领,摒退创业的功臣,进用文臣,收取天下的武器,遣散用来作战的牛马,建武年间的政治,号称是放弃用武器而达到的武功,维系并使汉室兴隆,和汉高祖一模一样,大概也就是依据揽权这一条啊!唐玄宗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能恪守祖宗的法度,实现开元之治,原因也是因为他能够革除前朝权贵和外戚干预朝政的弊端,亲自统揽赏罚大权罢了。在继位的当初,唐玄宗锐意进取,谋求天下大治,姚崇假设出十

件大事，来向他进行劝说，主要意思也是劝说唐玄宗独揽大权。唐玄宗自己说能够办到，从此以后殚精竭虑，进行治理，督责下属做出成绩，而大权归入皇帝的手里了。唐宪宗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能够恪守祖宗的法度，实现了元和之治，原因也是因为他惩戒从前沾沾自喜的小人窃取大权的弊端，亲自统揽赏罚大权罢了。在继位的当初，唐宪宗锐意进取，谋求天下大治，杜黄裳恐怕他抓不住关键，劝说他执掌大纲要领，总之掌握住那些大的方面，唐宪宗表示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殚精竭虑，进行治理，定立并施行开来，十分显赫地号称唐室中兴了。这就是臣下我所说的自从古代以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揽权作为首要的事情的。

陛下您惩戒从前权臣长期专权，收回赏罚的权柄，独自对臣民施行教化，独自对国家政事加以裁断，天下人都不约而同地称赞陛下是英明的君主，威严高大已经远在汉宣帝、光武帝、唐玄宗、唐宪宗之上了。然而臣下我仍然规劝陛下独揽大权，并不是想要陛下您像秦始皇那样每天必定处理多少奏章才叫做揽权；也不是想要陛下您像隋文帝那样传令献上饭菜还在听断政务，才叫做揽权；也不是希望陛下您像唐德宗那样自以为刚强精明，亲自处理每件小事，连宰相都不任命，才叫做揽权；也不是希望陛下您像唐宣宗那样精通百官政务，把苛察看成是贤明，不再有仁德恩惠，才叫做揽权。只希望陛下您惩戒那些已经在过去出现过的史事，警惕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情况，在操纵执持和掌握方面决不能有一天稍微放松，使赏罚的大权完全都由您行使，不至于转移到下面去罢了。

臣下我深切地认为，陛下您要恪守祖宗的法度，什么也比不上亲自统揽赏罚的大权；要亲自统揽赏罚的大权，又什么也比不上践行陛下您平时所学的东西。《五经》是广泛讲论治国大道的，而《春秋》这部经典又是讲论君主独揽大权的经典。陛下您圣人的学问高深明达，不知疲倦地积累学问逐渐达到了大放光明的境地，在处理国家大事稍有空隙的时候，十分喜好这部经典，本来就曾亲自挥洒笔墨，把这本书的经文和传文镌刻在碑石上，来昭示天下钻研学问的人了。最近又命令精通儒学的亲近大臣，在经史讲席来讲解诵读它。这表

明，孔老夫子这部关于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的经典，原本上已经在悠圣明心灵的神妙运作中默默地获取到了。至于其中可以称得上是揽权方法的地方，臣下我请求为陛下您来做述说。

《春秋》中特意写上“王”又说“天下”的这种笔法，是用来表明君主效法上天揽权的方法的；还有特意写上“王”却不写上“天”字的这种笔法，是用来表明君主不能效法上天揽权的告诫的。特意写上“朝”、写上“会”的这种笔法，是希望朝见、临时会集诸侯的权力必须由天子来行使；特意写上“侵”、写上“伐”的这种笔法，是希望征讨、攻伐的权力必须由天子来行使。特意载录僭越礼制和扰乱乐舞的事情，是希望天子能够收回制礼作乐的权力。特意载录随便赏赐和乱用刑罚的事情，是希望天子能够收回施行赏罚的权力。权力掌握在诸侯手中，就讥刺他们，如践土之盟这类事件就是这样的；权力掌握在大夫手中，就讽刺他们，像鸡泽之盟之类事件就是这样的。把周王室的小官员放在前面做记载，而把诸侯的下属放在后面做记载，是希望权力掌握在周王室的小官员那里；把中原各国放在同周王室的亲近地位，而把各个部族放在同周王室的疏远地位，是希望权力掌握在中原各国那里。特意写上“盗”这个字眼，是用来表明要警戒小人窃取权力的；特意写上“阍”这个字眼，是用来表明防止宦官玩弄权力的。凡是《春秋》中仅仅用一个字所作的褒奖，比朝服加身还要有份量，都是用来劝导君主统揽大权来施行封赏的；凡是《春秋》中仅仅用一个字所作的贬抑，比刑具加身还要厉害，都是用来劝导君主统揽大权来施加刑罚的。臣下我希望陛下尊崇圣人的经典，行用圣人的主张，凭这来端正天下人的地位和身份，凭这来判定天下人的奸邪与正直，凭这来成就天下的事业，那还忧虑什么不能借鉴先王的法规与事例，遵守祖宗的法度，革除当今社会的弊端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敬思我朝祖宗以来，树立治国的原则，设置施政的纲领，各项规章制度更加明确，大小政事都得到施行。这都属于各位先朝皇帝递相传授的谋略，永远不可改变的法典。皇帝我继承先朝的远大规划，恪守他们的宏伟功业，凡是一个法令、一项措施，都考察那些已往的成例，只管效仿并依从祖宗的

成法办。”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谦逊恭敬，仰畏祖宗，不以聪明自居，一定要行用祖宗的法度，来实现使我大宋皇朝重新振兴的治绩。臣下我认为，陛下您想效法祖宗来达到天下大治，又不能不效法《春秋》来独揽大权。臣下我查验《春秋》，其中有变更古制就对它进行讥刺的记载，有存留古制就对它表示庆幸的记载，有恢复古制就对它加以肯定的记载。《春秋经》中载录“首次进献由四十八人组成的六行乐舞”，这是讥刺鲁隐公不能够遵守祖宗的法度，而轻易地变更了周王室规定的乐舞。载录“开始按土地亩数征税”，这是讥刺鲁宣公不能遵守祖宗的法度，而轻易地变更了周王室制定的征收总产量十分之一的税制。这都属于所说的变更古制就对它进行讥刺的例证。载录“仍然举行祭祀国内三处山川的礼仪”，这是讥刺鲁僖公不举行在郊外祈求谷物丰收的礼仪，而庆幸他仍然举行祭祀国内三处山川的礼仪。载录“仍然每月在宗庙中祭拜”，这是讥刺鲁文公不举行每月向神灵报告初一的礼仪，而庆幸他仍然每月在宗庙中祭拜。这都属于所说的保存古制就对它表示庆幸的例证。在襄公十一年载录“重新组成左、中、右三支军队”，这是讥刺他改变古制。在昭公五年载录“撤销中军”，这是肯定他恢复古制。这都属于所说的恢复古制就对它予以肯定的例证。

《尚书》中说，不要自作聪明，弄乱了旧有的规章。《诗经》中也说：没有过失不遗忘，一切遵循那旧有的规章。汉惠帝任用曹参，曹参完全恪守萧何制定的法令，天下出现一片安定的景象。汉武帝任用张汤，张汤把汉高祖时的法令拿来进行多处的更改，因而盗贼多得占了天下人的一半。遵守祖宗法度的君主，治绩竟然这样；变更祖宗法度的君主，动乱竟然那样。作为君主的人，怎么能够自己破坏自家的法度呢？我朝太祖、太宗是创制我大宋皇朝自家法度的人。真宗、仁宗以至于各位圣明的先帝，是遵守我大宋皇朝自家法度的人。先朝忠正的大臣像范质、赵普这类人，是一起参与创制我大宋皇朝自家法度的大臣。在真宗皇帝时，像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皇帝时，像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这类人，都是一起遵守我大宋皇朝自家法度的大臣。

从旁听说在庆历年间,仁宗皇帝出示了亲笔书写的条幅十三幅,一共讲到了三十五件大事。第一件就讲的是:遵守祖宗的训示;第二件讲的是:奉持先皇真宗的大业;第三件讲的是:祖宗创业艰难,不敢有失落;第四件讲的是:真宗爱惜百姓,感念孝亲之思禁不住哽咽。因此当时君主圣明,臣子贤良,遵循祖宗法度,四十二年中治理效果非常显著,大概依据的就是这一条。又听说熙宁年间,先朝忠正的大臣司马光,在经史讲席上向神宗皇帝讲解经史,讲到萧何、曹参的事情时,认为曹参没有改变萧何的法令,是懂得保持已有成就的道理,还说祖宗的法度是不能更改的。另一天吕惠卿进献讲解时,另立新说来攻击司马光,认为法令有一年变更一次的,那就是《周礼·太宰》和《大司寇》所讲的正月初一这天开始调和,在王宫门外的门阙上公布法令;有五年变更一次的,那就是《礼记·王制》所讲的天子每五年出外视察各地,考察诸侯执行各种制度规定的情况;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那就是《尚书·吕刑》所讲的刑罚在治世就轻,在乱世就重。司马光随后反驳吕惠卿说:在王宫门外的门阙上公布法令,这是公布旧有的法令,不是在变更法令。诸侯有改变礼制、更换乐舞的,天子在视察时就会惩办他们,天子并不自己去改变。对新建立的邦国施行刑罚就用从轻的法典,对混乱的邦国施行刑罚就用从重的法典,对太平的邦国施行刑罚就用不轻也不重的法典,这才叫做在治世就刑罚轻,在乱世就刑罚重,决不是在变更法令。观察过两个大臣的言论,也就足以看出这两个人的邪与正了。

陛下您从继位以来,压根就从来没有不遵守祖宗的成法,近年有出于一时间臣下申请而灵活处理并加以施行的东西,直至与祖宗的成法有些地方相抵触。近来陛下您又当面告知群臣,强调国家的政事,都应该遵守祖宗的法度。今天又在清晰详尽的策问中提出来,以求取得天下大治的成效。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获取到在极盛阶段保守成业的办法,真是当年仁宗的用心呀!然而臣下我又把独揽大权作为建议,因为《春秋》讥刺当时的周天子失去了独揽大权的办法,所以才出现了诸侯变更法度的弊害。如今陛下您打算遵守祖宗的法度,应该运用《春秋》的赏罚大权去驾驭,也就可以了。大臣

中有像曹参那样清静的人,就应该让他负责怎样遵循先王成法;有像司马光那样忠诚正直的人,就应该让他去研讨和论辩。有像张汤那样变乱成法的人,就干脆杀头;有像吕惠卿那样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就应该斥退。像这样做了,祖宗的有效法度和美好意图,就可以留传万代而没有弊端了,还担心什么天下达不到大治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法令和有关赏罚的规定仍和从前一样,但奸邪弊害却没有完全革除。"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想要行用祖宗的法度,在于明确赏罚来革除弊端啊!臣下我深切认为,想要完全革除掉奸邪弊害,不可以不效法《春秋》来独揽大权。因为《春秋》所显示的法度,并不是孔子的法度,而是周公的法度。因此杜预说:周公的用意,孔子进一步把它阐明了。《春秋》中有记载赏赐方面的内容,例如"赐给鲁桓公服饰","赐给鲁文公服饰和圭璧","赐给鲁成公服饰和圭璧"这类事,都是用来讥刺当时周天子的随便赏赐,并不属于周公所讲的予以赏赐。还有记载刑罚方面的内容,例如"杀掉他的大夫","放逐他的大夫","杀掉他的公子"这类事,都是用来讥刺当时周天子的随便动用刑罚,并不属于周公所讲的施加刑罚。当时的周天子已经违背了周公施行赏罚的法度,不能够革除当时的奸邪弊害,因此孔子运用亲笔删削的权力,代替周公来劝勉良善,使超越法度的人感到畏惧。

我朝祖宗制定了赏罚的法度,明文载录在主管部门;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章,清楚地可以看到。创设的人像萧何一样,遵守的人像曹参一样,未曾出现过随便奖赏的情况,赏赐必定和他的功劳相当;也未曾出现过苛刻施用刑罚的情况,刑罚必定和他的罪过相当。各位皇帝在位期间都奉行它,弊端没有不被革除的,这是因为圣明神异的祖宗们在上面能够独揽大权,百官们在下面能够严格执行的缘故。所以司马光从担任谏官到成为待从官,曾经用天子达到天下大治的大道三条进献给仁宗皇帝,又进献给英宗皇帝,还进献给神宗皇帝,而他的两个主张就在于:应该奖赏的,必定要予以奖赏;应该惩罚的,必定要予以惩罚。三位皇帝采用了他的主张以后,都达到了天下大治。司马光凭借纯粹的品德,清高的声望,在元祐初年执掌朝政,亲

自实行自己的主张，去革除当时的弊端，提升和罢免群臣中异常忠正或特别奸邪的人共计十多个，天下人都佩服他赏罚的恰当。当时的弊端，也没有不被革除的。我朝的仁宗、英宗和神宗确实是仁德盛大的君主，而司马光也可称得上是挽救时局的贤明宰相了。加以效仿的是陛下您，您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使当前的朝政焕然一新，斥退驱逐那些奸邪的人，任用那些老臣，原来终身不许再做官的人都予以解禁，揭露别人隐私的人都予以惩办，这是当今赏罚最为公正、革除弊害最彻底的地方。然而圣上的策问，仍然把奸邪弊害尚未革除作为担忧事，难道是当今朝廷仍然存在着像春秋时代越级赏赐、滥用刑罚那样的情况吗？臣下我不敢不为陛下陈述其中的主要方面。

君主施行赏罚最重要的地方，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提拔和摒退天下人才的了。如今陛下您每逢提拔一个人，必定要出自您一向就知道他贤良，亲自加以识别和提拔就可以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出自大臣和侍从官为公家考虑特予荐举，也就可以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听取公众舆论而天下人都说他很贤能，也就可以了。倘若不是出自以上三个方面，却一下子突然提拔某个人，那么议论的人就会说这个人被提拔，是出自谁谁谁暗中给他当后台。像这样，一个人被胡乱提拔，就会因此削弱陛下您独自施行奖赏的权力了。陛下您每逢摒退一个人，必定要出自您完全了解他的罪过，盛怒之下予以放逐就可以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出自谏官和御史用公正的言辞进行弹劾，也就可以了。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得自众人议论而天下人都说他有罪，也就可以了。倘若不是出自以上三个方面，而一下子猛然摒退一个人，那么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个人被摒退，是出自谁谁谁暗地对他进行了中伤。像这样，一个人被错误地摒退，就会因此削弱陛下您独自施加刑罚的权力了。从前虞舜起用了八元、八恺这十六位辅政大臣，天下都为他奖赏恰当感到高兴；去除掉共工、欢兜、三苗、鲧这四个凶人，天下都为他处罚公正而由衷折服。陛下您如果能够把祖宗如何制定赏罚作为法式，把虞舜如何施用赏罚作为心愿，运用《春秋》所显示的赏罚大权去驾驭天下，那还担心什么邪奸弊害不被革除呢？至于某人立有某份功劳，应该晋升哪

一品级，作为对他的奖赏；或者某人在哪件事情上犯下罪过，应该定个什么罪名，作为对他的处罚，这只是有关部门该履行的职责罢了，并不属于君主亲自决定赏罚的重要方面，臣下我不再为陛下做讲论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赋税征收的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的规章仍和从前一样，然而财富还不特别富裕。"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想要行用祖宗的法度，在于使天下财富充裕，用来治理国家啊！臣下我深切地认为，想使天下财富充裕，又不能不去效法《春秋》去独揽大权。臣下我仔细查验《春秋》，里面载录"鲁国大夫臧孙辰奉命到齐国去借粮食"，这是在讥刺鲁庄公不能节省国家的开支，有一年谷物不丰收就得向邻国告急啊！载录"首次按田地亩数征税"，这是讥刺鲁宣公不能节省国家的开支，改变了周王室制定的征收总产量十分之一的税制，发展到丈量土地亩数来按亩收税啊！载录"新建立丘甲制度"，这是讥刺鲁成公不能节省国家的开支，发展到按一百四十四户人家组成的用"丘"作名称的这种地方基层组织，各出铠甲啊！载录"行用承担兵役的制度"，这是讥刺鲁哀公不能节省国家的开支，发展到按田亩各出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特意载录"求告什么"的地方，是表示不应该去求告；特意载录"首次干什么"的地方，是表示不应该首次去干它；特意载录"新建立什么"的地方，是表示不应该去新建立；特意载录"行用什么"的地方，是表示不应该去行用。臣下我由此知道《春秋》中有关赋税的记载，明显地属于对君主节省国家开支、致使财富充裕的训条。从前孔子回答齐景公询问的施政问题时，不说施政在于创造财富，而说施政在于节省财富，这就和回答鲁哀公询问灾荒年应该怎么办一样，不告诉鲁哀公创造财富的方法，而告诉他为什么不去实行周王室只征收总产量十分之一的税制。臣下我由此又知道使国家富裕的方法，其实是在于节省国家的开支啊！

臣下我从旁知道太祖皇帝曾经有番话说：我凭借四海的富庶，宫殿都用金银来装饰，也是有力量办得到的。只是想到我是在为天下人守护财富，怎么能够胡乱动用呢？古人说依靠一个人去治理天下，

而不拿天下来供奉一个人。哎呀呀!多么伟大的言论啊!真可以作为万代子孙保有国家的训条啊! 又听说仁宗皇帝圣明的心性务求勤俭节约,器物用品只限于刷点儿黑色,涂点儿白色,披褥的料子也只用黄色的粗绸。仁宗皇帝在嘉祐年间来到殿廷上策问应试的读书人,亲自出了《富民之要在节俭》这道试题。当时的考生吕溱在答卷中说:"国家开支节省以后,百姓的财产才能丰裕。"仁宗对这种回答很喜欢,于是把他定为第一名。观察仁宗皇帝选拔人才、亲自出题的用意,又确实可以作为万代子孙保有国家的训条啊!

又听说熙宁初年,司马光、王安石同时对答神宗的询问,谈论到有关救灾和节约开支的事情。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充足,原因在于没有获取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你所讲的善于理财的人,也只不过会苛刻征敛,把百姓财富都搜刮上来。百姓穷困就会成为盗贼,这不是国家的吉福。王安石说:不是这个样子。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对百姓增收赋税而国家用度就充足了。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大自然所提供的财富物品和万物,只有一个固定的数目。不是掌握在百姓那里,就是掌握在官府手中。这就像上天的雨水,夏天涝就会秋天旱。不用对百姓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就充足,不过是想办法暗中掠夺百姓的利益,害处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论调,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载它,是为了让人看出汉武帝不英明罢了。司马光的这段名言,真可以称得上是节省国家开支、掌管财政的法式,也是横征暴敛、残害百姓的人应该深深牢记的训诫。

陛下您自从同金国讲和以来,不用兵打仗已经二十年了。这样也应该国库充实富足,穿钱的绳索已腐烂,粮食新粮压旧粮,就像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时期那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可陛下的策问竟仍然把国家用度不充足作为忧患,即使是臣下我,也对此深感怀疑。恐怕是国家财政开支时,还有不够节俭的吧?奢侈的风气,还有没革除的吧?不紧要的政事,不知名目的费用,还有很多吧?如今赋税的收入比不上祖宗全盛时期,而国家财政支出却比祖宗全盛时期没有什么减少。每三年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大礼是不能不花

销的，然而在此过程中对臣下例行的赏赐费用是有办法减省的。不得已向金朝每年进献的币帛是不能不给的，然而使臣往来的费用是有办法减省的。文武百官的俸禄是不能不发放的，然而多余的官员是有办法裁减掉的。供养中央部队的饷银是不能不支出的，然而超员的士兵是有办法淘汰掉的。臣下我听说的国家财政开支时还有不够节俭的地方，诸如此类，不仅仅是这些啊！

朝廷以前曾经多次发布过禁止用黄金作装饰的法令了，然而妇女们用黄金来装饰衣服的，如今还是老样子。朝廷又曾发布过禁止用翠玉作装饰的法令了，然而妇女们用翠玉作首饰的，如今还是老样子。这难道是法令所不能禁止的吗？恐怕是宫中都穿洗涤过的衣服、裙边都不拖地的风尚，还没有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吧？臣下我所说的奢侈风气还有没革除的地方，大致就表现在这里啊！臣下我又道听途说，说是边远地区的部族和海外的国家，有拿没有任何益处的稀奇物品来换取我朝有用物资和钱财的举动。皇家园林和宫廷车马器用，还存在着没能够不再增加的情况。显贵的侍从宦官和后妃家族中的人，蒙受皇帝宠爱的小臣和指使起来特听话的仆从、歌舞艺人和宫中演员这群人，还对他们存在着没能够不再临时给予赏赐的情况。臣下我所说的不紧要的政事，不在正式支出范围的费用还有很多，大致就表现在这里啊！从前汉文帝亲自倡导节俭来教化百姓，因而天下达到富庶。臣下我希望陛下在上面独揽大权，革除众多方面的弊端，把汉文帝以及我朝太祖、仁宗的谦恭节俭作为法式，把《春秋》所记载的事情作为鉴戒，那还担心什么财富不充裕呢？至于把自己和那些横征暴敛的人等同起来，进献给朝廷弄来财富的方法，臣下我是不敢这样办的。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取士的科目和培养人才的方法仍和从前一样，然而人才却没有繁盛。"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知道达到大治的办法，在于获得到人才，因而希望人才和祖宗时期同样繁盛。臣下我深切地认为，陛下您要想使人才繁盛，应该独揽培养人才、选取士人的大权。臣下我仔细查验《春秋》，上面载录"新建立丘甲制度"，《谷梁传》据此论说古代有士、农、工、商四种民

众，而把士人列为第一等。范宁解释说：士人是研究道德和技艺的人。又查验《春秋》,上面载录“单伯把周天子的女儿送到鲁国”。《谷梁传》说：单伯这个人，是我鲁国经周王室册命的大夫啊！范宁解释说:在古代,诸侯要向周天子保送优秀的人才。大的诸侯国要保送三名，中等的诸侯国要保送两名，小的诸侯国要保送一名。又查验《公羊春秋》说：征收总产量十分之一的税制实行开来，民间赞颂太平的歌声就响起来了。何休据此论述西周时期施行的井田制度和乡间在秋后由父老在校舍施教的制度,以及八岁入小学、十五岁进大学的规定,有关培养和选拔士人的说法特别详细。又查验《春秋》这部经典，赦免许国太子姬止未尊先尝药而导致杀死许悼公的罪过，《谷梁传》据此说：孩子出生三个月，未能免于水火的威胁，这属于母亲的罪过。系上发髻成为八岁的儿童,还没去跟随老师学习,这属于父亲的罪过。跟随老师学习，却没有收获，内心总不开窍，这属于本人的罪过。内心开窍以后,名声却没有传扬开,这属于朋友的罪过。名声已经传扬开,主管部门的官员却不进行举荐,这属于主管部门的官员的罪过。主管部门的官员已经进行举荐,天子却不加以任用,这属于天子的罪过。《春秋》痛惜当时的天子失去了培养人才、选取士人的权力,而把这种深意隐含在用笔删削的过程中。公羊高、谷梁赤、范宁、何休这些人进一步加以发挥和阐明，也可以称得上对风俗教化很有功绩了。

自我朝祖宗以来,都从科举中选取人才,这是古代诸侯向天子保送士人的方法;在太学中培养人才,这是古代通过各级学校培养士人的方法;又有皇帝按需要亲自主持的多种科目的考试,来等待具有特殊才能的士人,这是对汉唐时代使人才繁盛的方法有所取用啊!进士科成为定制，以后有的考诗赋，有的考经书的义旨，虽然变更有所不同，然而却从来没有获取不到人才啊！在太学的学生，有的出自三舍选察升补法，有的出自科举考试，虽然培养造就的途径有所不同，然而也从来没有获取不到人才啊！二百年以来,名望高的大臣和学问深的儒生建立功勋和业绩,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谁不是从这些途径涌现出来的，可以称得上是人才繁盛了！陛下您以前虽然处在用兵作战、

终日忙碌当中，也从来没有废弃过礼乐方面的事情。自从罢兵停战以来，重新使太学兴盛，来培养各位儒生。那些选取人才的科目，培养造就的方法，完全遵守祖宗的旧例，恩情真是特别深厚了呀！然而圣上的策问仍然把人才还没特繁盛作为忧虑，臣下我还是一动就进献那独揽大权的建议。

当今选取人才的科目，培养造就的方法，虽然说仍和从前一样，但人才却不像从前那样繁盛，这是由于赏罚的大权在前些时候转移到下面去了的缘故啊！法度中最公正的东西，没有比得上选取人才的了；名位官爵中最尊贵的东西，没有比得上科考及第的了。往年权臣的子孙和门客，无论在礼部考试和殿试中，大都窃取了前三名的桂冠，而主管部门把国家的名位官爵变成了向权臣献媚的工具，这样还想获取到人才，做得到吗？朝廷近来按照各路地方长官的意见，对那些人一律按规定取消了他们的资格，士人议论没有不说大快人心的。臣下我希望陛下您经常独揽赏罚大权来加以控制，下诏严厉命令主管部门谨慎对待选取人才的公正办法，不要再重蹈往年的覆辙，这就可以了。至于所说的培养造就人才，想要把他们都培养造就成真正有用的人，就像鸾鸟在天空中翱翔，鱼儿在水中跳跃，也就是滋润培育他们平时的刚强正直，来成就他们以后为国家发挥栋梁作用罢了，并不是看中他们谁会雕琢文章字句，借此来捞取高官厚禄啊！自从权臣凭借高位阻碍住天下人发表言论的道路，而各级学校中的读书人学会阿谀逢迎倒形成了风气，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不敢有一个字触及到当代的事务，这样还想振奋起读书人的正气，能做得到吗？

臣下我听说嘉祐年间，仁宗皇帝通过制科选用特殊人才，当时应承诏令来考试的有很多人。四川眉山县苏辙的讲法，最为切近正直。考官认为皇上并没有失德的地方，纯属苏辙胡言乱语，打算不录取他，只有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坚持要录取苏辙。仁宗皇帝说：皇帝我通过直言极谏科来求取人才，怎么能够因为人家直言而不录取呢？于是把苏辙定为特等。这是陛下您选取人才的自家法度啊！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把仁宗作为法式，把前些时候权臣的事情作为鉴戒，命令各级学校废除掉诽谤朝廷要治罪的规定，在科举考试中革除掉不许触忌

犯讳的禁令,主管部门要选取那些志在忠正的言论,就会眼看着贤良方正科、茂才异等科、直言极谏科这类突出的人才,像仁宗时期那样大量涌现出来了。还担心什么人才不能够繁盛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对官吏罢免升迁的制度和训导启迪的方法仍和从前一样,然而百官相互规正还有的并未励行。"臣下我由此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清楚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在于获得到人才,并希望百官在相互规正上自觉励行,和祖宗时期一个样啊!臣下我深切地认为,要使百官在相互规正上自觉励行,就应该独揽那提拔贤臣、罢免昏官的大权。仔细查验《春秋》,在鲁隐公十一年中特意用"滕侯"这样的字眼。到了鲁桓公二年又特意用"滕子"这样的字眼。范宁对此解释说:在前面称为"侯",到这里称为"子",这是表示被当时的天子贬抑了。在鲁隐公二年特意用"纪子"这样的字眼,到了鲁桓公二年又特意用"纪侯"这样的字眼。范宁对此解释说:在前面称为"子",到这里称为"侯",这是表示被当时的天子晋升了。臣下我深切地认为,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并不能对诸侯决定升降,这一定是孔老夫子在修书时运用奖赏处罚的权力,根据他们是贤良还是庸劣进行升降啊!再查验《春秋》这部经典,记载楚国特意把它称为"荆",《公羊传》对此解释说:荆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州名。用"州"这个字眼比不上用"国"这个字眼,用"国"这个字眼比不上用"氏"这个字眼,用"氏"这个字眼比不上用"人"这个字眼,用"人"这个字眼比不上直接载录他的姓名,直接载录他的姓名比不上直接载录他的表字,直接载录他的表字比不上特意称"子"。何休又对此解释说:孔老夫子根据周朝有削夺爵位的制度,因此设置了七个等级的类别,用来表示对臣下的进用和斥退。臣下我由此知道《春秋》实际上是孔老夫子决定升降的公正法度啊!所以作为臣下而精通《春秋》的人,就一定会成为忠臣,因为《春秋》是对忠臣提出最高要求,用来训导启发全天下身为天子臣属的人的。作为人子而精通《春秋》的人,一定会成为孝子,因为《春秋》是对孝子提出最高要求,用来训导启发天下身为人子的人的。

我们国家任命官员的方法,上至公卿百官,下至一个郡、一个县

的官吏,没有不是依照公正的原则来对他们决定升降的,因此压根就同虞舜每隔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差别。在他们尚未步入仕途之前,就有学校教育他们;在他们初次做官以后,就有法规限制他们,没有不是依照公平的原则来对他们进行训导启发的,因此压根就同周代训导启发全体官员的方法不存在任何差别,所以当时在朝廷各个部门任职的人,没有谁不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坐在朝堂上,和天子一起议论政事可行不可行的,这是宰相在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站立在大殿的台阶前,和天子争论是非的,这是谏官在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谈论到皇帝所用的器物,皇帝就得改变脸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得准备承担罪责的,这是御史在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百官在朝廷上都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郡守、县令在所辖郡县都积极努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祖宗在位时期,朝廷内外有很多称职的臣僚,因此当时实现天下大治的效果,远远超过汉朝唐朝。如今陛下您任用贤良,使用能人,来建立使我大宋重新走向兴盛的治绩,对官吏进行升降的制度和训导启迪的方法,没有不遵守祖宗时期的成规的,可圣上的策问仍然把百官相互规正还没励行作为忧虑,臣下我还是一动就进献那独揽大权的建议。

如今对官吏进行升降的制度和训导启发的方法,虽然说仍和从前一样,但治理的效果却不是从前那样,这是由于赏罚的大权在前些时候转移到下面去了的缘故啊!法度中最公正的东西,没有比对官吏进行升降更占首位的了;而关系到天下治乱的东西,没有比百官能相互规正更重要的了。先前朝廷内外掌权的臣子,大多出自权贵的亲戚,旧日的熟人,勾结在一起的党羽。文官中有的人并不是品德高洁、享有名望的人,然而却滥竽充数地担任地位显贵、政务不多却又重要的官职;武将中有的人并没有军功,然而却滥竽充数地占据将帅的职位。贿赂公开盛行,权贵门前如同集市。郡县的官吏,就像污泥一样混浊。这些都是政府各机构得到整顿、全都称职时让人感到可笑的事情。至于一句话触犯了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罪过,也予以贬斥;有谁只对自己瞪了一眼的怨恨,即使他是忠良贤能的人,也要给

予惩罚。一时间对官吏进行的升降,全都是出自个人的喜怒爱憎,不再有尧舜时代考核政绩,唐朝用德义传扬等四善和二十七类政绩第一等作为标准的考核规章。这样还想要官吏鞠躬尽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能做到吗?至于所说的训导启发官吏的方法,大概也就是用忠诚和正义去训导启迪臣下,使他们忘掉自身,为国家献出生命罢了,并不是训导启发他们用各种花招往上爬,善于拜见请托,去为有权势的人效劳啊!当权贵炙手可热的时候,百官们一个接一个地去讨好他还恐怕来不及,有谁还能用忠诚与正义相互做训导,做启发呢?直到今天百官相互规正仍未励行,这是因为他们承接在长期形成的恶习之后,遗留的弊端还没有革除的缘故啊!陛下您一定想使百官都相互规正,积极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最好是在上面对怎样升降官员做出榜样来,而把低一等的升降事宜交给宰相去办理,把再低一等的升降事宜交给吏部去办理,把又低一等的升降事宜交给各路的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去办理,也就可以了。

在先朝的庆历年间,仁宗贬斥夏竦等人,任用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担任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要职,任用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担任谏官,他们都是天下所敬仰的人物,鲁地人石介专门撰写了一篇《圣德颂》,来赞扬这件事。这就是陛下您对官吏进行升降的自家法度啊!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把仁宗作为法式,把前些时候权臣的事情作为鉴戒,运用赏罚的大权,去施行升降官员的法度;宣明忠孝大节操,去落实训导启迪的方法。这样去做了,还担心什么百官不相互规正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就同祖宗时期一个样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里面说:"奸邪弊害还没有完全革除,财富还不特别充裕,人才还没有繁盛,百官相互规正还有的并未励行,其中的过错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是大道即使历时长久也不会改变,法度有时却会出现弊端,对它们适当进行减损与增益,存在着不能不做的地方吗?或者是推行法度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呢?皇帝我打算参考查验经典中的训导,讲求阐明推行的关键,使祖宗实现天下大治的效果,能够在当今重现,这里面一定有基本原则和方法。"臣下我由此恭敬地看到陛下您迫切希望天下能得到大治,深切

地思念和仰慕祖宗,想要赶上他们的盛大仁德和宏伟功业,在这方面可以称得上是勤勉并且达到极点了。然而臣下我已经在前面陈述了独揽大权的主张,而且又拿《春秋》作为献呈,不过又听先代儒士曾参说过:尊崇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就高远明达了;实行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就发扬光大了。有关《春秋》的学问,陛下您已经深深掌握了,再能够尊崇自己所听到的这些东西,实行自己所了解的这些东西,独揽赏罚的大权,靠这去恪守祖宗的自家法度,就会赏罚恰当,天下都心悦诚服了,奸邪弊害就不用担心革除不掉了;节俭得到倡行,天下就被教化好了,财富就不用担心不充裕了;选取人才公正,贤能的人就涌现出来了,人才就不用担心不繁盛了;对官吏进行升降很严明,奸邪和忠正就区分开来了,官员相互规正就不用担心他们不自觉励行了。祖宗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还忧虑不在当今重现吗?

至于所说的大道即使历时长久也不会改变,法度有时却会出现弊端,对它们适当进行减损与增益,存在着不能不做的地方,臣下我查验先代儒士解释《春秋》,有变更周朝所崇尚的文采,遵从商代所崇尚的朴质的说法,又有商朝变更了夏朝的崇尚对象,周朝变更了商朝的崇尚对象,《春秋》又变更了周朝的崇尚对象的说法。臣下我认为,《春秋》从来没有变更过周朝的崇尚对象,只是依据时势,补救弊端罢了。又曾听董仲舒说过:先王的治国原则与方法,必定会出现偏颇而不再起作用的地方,所以政务也会产生模糊不清而施行不开的现象。纠正它的偏颇,也就是用来补救它的弊端罢了。我朝祖宗的法度,打个比方来说就象一座大厦,出现损坏的地方,就要对它进行修补,但是决不能重新建造。如果不懂得遵守,却轻易地致力变更,臣下我恐怕连风雨也不能挡住啊!关于对它们适当进行减损与增益,存在着不能不做的地方,臣下我乐意用董仲舒补救弊端的说法作为献呈,该是可以的吧?

至于所说的推行法度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臣下我查验《春秋》,有特意用"乃"这样一个字眼来表示"竟然"之义的,例如"鲁国公子遂去齐国,到了黄邑竟然返了回来"这类记载。《谷梁传》对此解释说:"乃"字,这是表示没有贤人的用词。这种解释是强调派谁去干什

么,没有获得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又曾听荀子说过:有能使天下得到治理的人,没有能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法度。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不是不美好。如果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借鉴先王的法规和事例,常常像傅说所讲的那样;遵守先王的法度,常常像孟子所讲的那样;一切按原有的规定去做,常常像《诗经》作者所讲的那样,夏商周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办得到的。汉唐的法度,也不是不美好。如果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常常像西汉曹参那样遵守萧何所制定的法度,像唐朝宋璟那样遵守先朝的法度,像西汉魏相、唐朝李绛那样奉行已有的规章和惯例,汉唐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办得到的。祖宗的法度,也不是不美好。如果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常常像司马光那群人坚持守护已有成就的主张,延续到千秋万代,永久与天地并立,也是办得到的。陛下您已经清楚从前推行法度的人,没有获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今天就不能不谨慎地加以选择了。臣下我乐意用荀子有能使天下得到治理的人这种说法作为献呈,该是可以的吧?

至于参取查验经典中的训导,就有我大宋各个皇帝在位时期的朝廷规章和惯例明摆在那里,就有祖宗的《宝训》、《政要》明摆在那里,就有各个政府机构的明文规定明摆在那里,就有朝廷的先例明摆在那里。陛下您应该下诏书,命令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及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参取验核来奉行,也就可以了。至于讲求阐明推行的关键,就没有什么比得上亲自独揽大权的了。陛下您提纲挈领,而把那些繁多的具体政事交给臣下去办理,也就可以了。

陛下您在最后策问臣下我等人说:"你们这些士大夫学习古代典籍,入仕作官,明了治国之道,积累学问等待询问已经很久了,要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这是陛下您诱导臣下我等人,让我们发表言论,臣下我不敢不把想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臣下我听说,君主广泛开辟征求言论的道路,一定会有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臣子遇到能够发表自己意见的年代,不应该没有进献意见的诚心。因为征求意见的道路不经常开辟,而臣子能够发表自己意见的年代更不容易遇上。陛下您有听取意见的实际行动,臣下我怎么能没有进献意见的诚心呢?臣下我还有一句话要为陛下进献,这就是希

望陛下端正自身,把它作为独揽大权的根本。查验《春秋》,有特意用"正"这个字眼的地方,杜预认为是让国君想到与天地元气合为一体,常居正道去施政。《公羊传》又有君子应该把守持正道放在最重要地位的说法。强调君主要端正自己的心念来使朝廷端正,端正朝廷来使百官端正,端正百官来使天下百姓端正,这是董仲舒论述"正"的观点。强调君主所行用的必定是纯正的大道,所讲出的必定是纯正的话语,所占据的必定是最正的朝位,所亲近的必定是正直的人物,这是唐代刘蕡论述"正"的观点。

臣下我观察,自从古代以来,君主能够端正自身去教化天下的,没有比得上周文王的;不能够端正自身去教化天下的,没有比得上汉武帝的。周文王把心念集中在正道上面,他辛勤劳作,太阳都偏西了还顾不上吃饭,不敢沉溺在游玩和打猎中,对于各个邦国和万民百姓,只让他们交纳法定的赋税和贡品。因此能够给妻室做出榜样,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兄弟,直至推广到整个邦国去,这在《思齐》诗里可以见到。担任各个职务的大臣,都作风节俭,品行正直,这在《羔羊》诗里可以见到。人伦纲常得到端正,朝廷得到治理,全天下都被他清一色地教化好,这在《驺虞》诗中又可以见到。周文王能够自己端正自己,而他对下面的教化竟达到了这般地步。至于汉武帝就不是这样了,他用来修养自身,以及下面人回应他的东西,都不纯正啊!汉武帝喜好阿谀奉承,所以公孙弘就用曲解经学来回应他;汉武帝喜欢刑罚,所以张汤就用曲解法律来回应他;汉武帝喜好财利,所以孔仅、桑弘羊就用榨取百姓增加政府收入来回应他;汉武帝喜好炫耀武力,所以卫青、霍去病就用扩大统治区域来回应他;汉武帝喜好夸耀显示,所以司马相如就用撰写《封禅书》来回应他;汉武帝喜好神仙家长生不老那一套,所以少翁、栾大这帮术士就用歪门邪道来回应他。汉武帝不能端正自身,而下面的人回应他竟是那种情形。

臣下我希望陛下把文王作为法式,把汉武帝作为鉴戒,端正内心的意向,把它作为教化的根本。不是纯正的东西就不看,不是纯正的话语就不听,不是纯正的言词就不说,不是纯正的行为就不动。任用人,不必问他有才能还是没才能,而是首先察看他纯正不纯正。果真

是纯正的人，把他提拔上来，就能成为治理的表率，又怎能因为他才能不足就不任用呢？果真不是纯正的人，把他提拔上来，就会成为动乱的开端，又怎能因为他才能出众就让他得到任用呢？听取一个人的言论，一定要观察他的言论是否正确，这就能够看出他人品的邪与正。遇有顺从陛下意旨的言论，一定要对此予以察辨说：他究竟要干什么，偏偏投合我所喜好的呢？这一定是不纯正的人的言论，这种言论对我是有害处的。怎么能够因为它顺从了我的意旨就接受它呢？遇有逆耳的言论，一定要对此予以察辨说：他究竟为了什么，偏偏触犯我所厌恶的呢？这一定是纯正人的言论，这种言论对我是有益处的。怎么能够因为它让我听来不顺耳就不接受呢？身边人赞美某个人的话语一天比一天增多，一定对此予以察辨说：这一定是不纯正的人，一定是战国时期齐威王手下的阿邑大夫之类的人，一定是善于买通我身边人来替他讲好话的人，斥退他也就可以了。身边人对某个人诋毁的话语一天比一天增多，一定要对此予以察辨说：这不一定不是纯正的人，一定是战国时期齐威王手下的即墨大夫之类的人，一定是不善于买通我身边人以致招来诋毁的人，提升他也就可以了。像这样去做了，就会每个想法没有不是出自纯正心念的，每句话没有不是符合正道的，左右前后大臣和侍卫仆从就没有不是纯正的人的。将会眼看着天下四方，万里辖区，就像疾风吹过、野草随之倒伏那样，没有不完全归向纯正的了。

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把这作为独揽大权的根本，同时又任用贤臣作为独揽大权的辅助，广泛观察，多方听取，来使独揽大权的益处达到极点。大权掌握在陛下您手里，就会谋求什么，就得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到什么。即使是国家的大计，天下的大事，都能够不动声色地解决好，何况以上所讲的小小四个弊端，还哪里足以让陛下您在内心里对它们深切顾念呢？臣下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刚直。只希望陛下您宽恕臣下我的狂妄愚昧，那就简直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冒昧触犯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邵永忠译〕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绍休圣绪,厉精万机,夙夜靡皇,庶克有济。今兹登进多士,咸造在廷,将以讲明治道,考观素蕴,角虚文而废实用,朕无取焉。历稽邃古,三皇之书谓之《三坟》,以言大道;五帝之书谓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经,要本诸《五典》,而《三坟》所载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谓耶?仲尼之门,难疑答问,惟仁尤重。或以爱人为仁,或以刚毅近仁,或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他论仁,不一而止。夫圣人立教,宜有定说,乃多为之目如是,后之求仁者果安所从耶?

汉高祖制礼,欲度其所能行。齐鲁两生,召之不至,谓必俟百年而后兴。惟叔孙通达于时变,定一王之仪。二者之见,其孰是耶?唐太宗论乐,谓治之隆替,无关乎此。杜淹疑其不然,虽魏徵亦曰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二者之论,其孰当耶?

朕上宪帝皇之道,中参将圣之训,下监汉唐之迹,烛理未深,治不加进。故欲强国势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士风惰而未振,民力艰而未裕。抑尝览苏轼之论,言天下之势,中国士民优游缓带,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转输天下,以为一时深弊。朕有感焉。子大夫以选待问,其考引古初,捃摭经史,博举先儒之言,茂明当世之务,条著于篇。勿迂勿泛,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继承先辈留下的美好事业,殚精竭虑处理天下大事,日夜都顾不上安歇,希望能取得功绩。现在你们这些被选拔上来的众多士人,都来到殿廷,打算同你们讲述阐明治国的道理,借此来考察你们积累的学问。围绕空洞的文章做比试,却不管当代的实际运用,皇帝我对此不予采取。纵观远古时代,三皇时代的书籍称为《三坟》,用来阐明大道;五帝时代的书籍称为《五典》,用来阐明常道。拿出治理措施的基本准则,总之要依据《五典》,而《三

坟》所记载的大道，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孔子这一派儒士，质疑问难，相互答问，对仁尤为重视。有的认为博爱天下众人就是仁，有的认为意志刚强、行为果断就接近仁，有的认为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法，天下就达到仁的境界了。其他论述仁的，也不止一两种见解。圣人创立教化天下的学说，也应该有固定的主张，可却产生这么多的歧异看法，后代探求仁的人，究竟该去遵循哪一种呢？

汉高祖制定礼仪，打算试一试自己能够行用的。齐鲁地区的两个儒生，召请他们却不前往，说是一定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兴起礼仪。只有叔孙通了解时代的变迁，定立了一代皇帝的礼仪。这二者的看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唐太宗谈论乐舞，认为天下的兴盛衰败与此没有关系。杜淹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觉得不是这样，即便是魏徵也说乐舞的根本在于使天下人和睦，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声音上。这君臣之间的两种论断，哪一种恰当呢？

皇帝我往上效法可称“皇”、可称“帝”的大道，在中间参照五百年必有圣人再出世的训导，往下借鉴汉唐时期的史事，但洞察道理尚不够深刻，治理的成绩还进展不大。因此想要增强国势，而威严的政令还没使人们全都信服；想要弘扬统治全天下的纲纪，而所作的筹划与部署尚不够广大；士人们的风气懈怠低迷，还没有振作起来；百姓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拮据，还不充裕。转过来也曾观阅过苏轼的论说，他讲天下的局势，中原的士人和平民穿着宽大的衣服优游闲适，勇气却消除耗尽，而政府每年向辽人政权交纳的岁贡，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认为这是当时最令人担心的弊端。皇帝我对此也深有感触。你们这些士大夫正通过选拔，等待朝廷的询问。希望你们要考察引用远古的史事，采集收取经书和史书里面的内容，广泛列举前代儒士的言论，尽力说明当今的急切事务，逐条写在答卷上。不要迂阔，也不要空泛，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叶适　廷对策

叶适(1150～1223)　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

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时年29岁。历任知蕲州、权吏部侍郎、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等职。志意慷慨,素以经邦济民自任,坚主抗金,力倡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被推为永嘉学派的巨擘。为文藻思英发。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等著作传世。

臣恭惟陛下,天锡勇智,临御九有,实开有宋无疆之业,故能不以草茅之陋,爰命有司博举秀异,亲降色辞,问以道仁礼乐之大要,当世之先务。圣心之所向,参验酌取,图惟厥中。臣愚不肖,窃独自念,以为古之忠臣未尝不愿言天下之事,古之明君未尝不乐闻天下之言,然而听之者常以为难,而言之者终不敢尽,何哉?岂非君臣之情不通,而上下之势不合耶?今陛下虚己宏大,畴咨众言,凡伊尹、傅说之流伏藏于农役之贱而不敢发,贾谊、陆贽叫呼于堂陛之间而不见听者,亦既举以访之矣。宸衷恳恻,诏策深厚,臣而不言,其又何责?

虽然,君听在乎广大,臣言贵乎切近。臣闻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伏睹今日之故,承末流之极弊而不及其本,厌众说之太烦而不求其要。或以浅末之议而废经远之论,或以一时之效而易久大之规。朝廷一体也,而□□内外;文武一道也,而互为抑扬。是以上下喜无事,群臣不任责,当天下积累之后而无根固不拔之势,以生齿日滋之众而有贫弱就衰之萌。至于大本不立,大义不明,少不为虑,则天下之事又将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岂非以圣君行弊政之故欤?如其条贯统纪,臣不得以尽言也,敢因圣问之所及而疏其略。

臣伏读圣策之所以诏臣者曰:"朕绍休圣绪,厉精万机,夙夜靡皇,庶克有济。今兹登进多士,咸造在廷,将以讲明治道,考观素蕴,角虚文而废实用,朕无取焉。"臣仰见陛下勤政愿治十有七年,周旋万机之变,多阅义理之会,深患虚文之误世矣,故将以卓然可见之实下求臣等。臣闻虚文者,实用之所因以见,非舍言语文字之外而有所谓实者也。陛下聪明圣知,度越古昔,所受群臣章疏书奏、闳论密语、大廷广对,凡几何矣。考览载籍,上自尧舜、禹汤之德业,孔氏之所记录,与秦汉以来废兴成败之迹,百家众说无不明矣。嗣服以来,四策

多士，其间山岩遗弃、抱不能已之人，投匦肆言，利害百出，固已众矣。陛下亦尝得其所谓实乎？

古之治道，皆有一定必然之说，相传而不变。彼尧舜、禹汤号为圣人者，特奉行之耳。自圣人不作而治不明，战国秦汉之君臣日乱其统，而儒者独传之。董仲舒、刘向、王通，盖稍欲广推发明其意矣，而位不足以行其言，才不足以发其志。若苏绰之辅宇文，魏徵之劝太宗者，二君既亲见其利矣。虽然，祖宗立国之定势，则常因儒者之学以求三代之旧，而施之于政事之际。二百余年，《六经》孔氏之说益以著明，凡古人之所以治天下之常道无不尽顺，今之世反厌其熟烂迂阔而不可信用。陛下翻然改虑易念，将求一新之乎？臣恐其无所据矣。陛下盍亦因已然之众说，详考而择其中乎！则凡今之所谓虚文者，随其高下皆足以为实。不然，则虽《六经》孔氏之书均为无用，而何益于治哉？

夫十有七年，天下颙颙，海内向风，而治道之实终于未定。今欲拨去虚文以幸天下，而士亦不免以空言应上之求，是将孰从而取之？故其素所蕴积而自见者，亦于此观之足矣。孟轲曰：我知言。未有不知言而能得其人者也。

臣伏读圣策，有"历稽邃古，三皇之书谓之《三坟》，以言大道；五帝之书谓之《五典》，以言常道。夫出治之经，要本诸《五典》，而《三坟》所载曰大道云者，果何所谓耶？"臣窃惟陛下本《五典》以出治，则古人治天下之常道，陛下既得之矣。《三坟》之书，孔氏不序，而安国独言之，何欤？彼将以为天地运化之始，阴阳消长之会，羲农、黄帝所以开天极而制化原者乎！敬天爱民，尊道保法，执赏罚之信，示予夺之公，此尧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而立人纪也。尧舜三代以人合天，而后之为异学者夸焉以为羲农黄帝，是以天应人也。故其高诞恍忽者，入于佛老；而迂僻下俚者，流为阴阳、卜筮、纵横之方。其技其意，莫不自托于大道以惑世主。臣愿陛下执《五典》之常道，而无疑乎安国之偏辞，则出治之经正矣。

臣伏读圣策，有"仲尼之门，疑难答问，惟仁尤重。或以爱人为仁，或以刚毅近仁，或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他论仁，不一而止。

夫圣人立教，宜有定说，乃多为之目如是，后之求仁者果安所从耶?”臣闻仲尼亲见周之衰坏，中国夷狄并起而争，以为本于其君不仁。其君不仁，故其臣贪诈邪虐，而不为信谊忠厚之事以报其上。君臣流毒，被于天下，纲纪隳坏，人文不正，而天下之民物不能自必其命。当是之时，仲尼退与其徒求所以为仁之方，发其所厚，消其所薄，根于心术，见于事变。虽其质之所受者有异，性之所习者有偏，而仁之为道未尝远也。或曰爱人，或曰刚毅，或曰克己复礼，与其他不一之论，广大充满，上下周流，而仁在是矣。以为虽未能以救当时之患，而犹可以启后人之心也。

嗟夫!蓽门委巷之士，其势与力不足以自存矣，可谓微也，而犹不忘于求仁。乃若陛下，承尧舜付托之重，守累圣太平之业，欲从而意得，恩博而泽厚，所谓操可致之实，有能致之势矣。陛下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则有喜有怒，有生有杀，应天下之众变而不失吾心之至仁，此孔氏之本旨也。若夫拘牵于文谊，训释乎章句，因有得焉，亦足以助陛下之仁，然而未敢为陛下言之也。

臣伏读圣策，有“汉高帝制礼，欲度其所能行。齐鲁两生，召之不至，谓必俟百年而后兴。惟叔孙通达于时变，定一王之仪。二者之见，其孰是耶?”臣闻周之礼至秦而亡，汉氏初起，以其智力角逐一世而仅得之，则秦之礼至汉亦亡矣，其君臣上下未有长久之意也。使汉仪不定，则何以系其心?如必积德百年而后兴，则汉不及积矣。若其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上下有章，登降有数，举无失乎天人之常理，则非积德百年有不能至也。士欲及时以致功，达权以致变，则通意诚近之矣。耻为一时之用，而宁甘没世之无闻，两生殆未必知礼之用也。虽然，一代之大典，则必与斯人之徒议之，此固非叔孙通之所能识也。

臣伏读圣策，有“唐太宗论乐，谓治之隆替，无关乎此。杜淹疑其不然，虽魏徵亦曰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二者之论，其孰当耶?”臣窃以为两生之论高祖未可以制礼，而犹制之，盖尊卑贵贱之序，不可一日废也。若太宗，则治既效矣，功既成矣，可以作乐而犹未作也，反以谓治之隆替无关焉者，何耶?魏徵智足以知仁谊而不足以知礼乐，知

人之和而不知声音之致和,故其所以辅太宗者亦仅是耶!

陛下求道于《典》、《坟》,求仁于孔氏,是既然矣。求礼乐于汉唐,则非所求也。汉唐之始,不及政事,何暇礼乐?且高帝不喜儒,不知学,先王圣人之道无所入于其心,然犹曰度吾所能行者。太宗经理世务,动询诸生,天资明锐,尤喜文学,然乃曰治不必为乐,乐不足为治。夫不稽之古,不谋之道,而苟欲循其所安,陛下何取焉!

深惟今世,上自郊庙,下至田野闾里,制度文为之节,脱略而不备,浅陋而不经。嫁娶祠祀,饮食生养,无所取法,贫富相遁,无所纪极,而天下之治因以不举,其患皆坐于礼乐之不明。礼乐不明,则政事不立;政事不立,则财用竭而天下匮矣。陛下慨念天下之大,将奋然有所自为,而不先定其本,则仁心仁闻何由而著?王功帝德何由而隆?且夫祖宗之盛,盖尝有意于礼乐矣。屡举而不遂,欲行而辄止者,陛下知之乎?汉唐苟简之说杂乎其中,旧臣元老未能深识礼乐之意,以有所论建也。故臣愿陛下,将兴礼乐,以为出治之本,而无求乎汉唐之陋,则天下之士必有出而赞陛下者矣。

臣伏读圣策,有"朕上宪帝皇之道,中参将圣之训,下监汉唐之迹,烛理未深,治不加进。故欲强国势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士风惰而未振,民力艰而未裕。抑尝览苏轼之论,言天下之势,中国士民优游缓带,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转输天下,以为一时深弊。朕有感焉。"臣伏读至此,窃知陛下以当世之要务,圣心之所向,形之训词,开导诱掖,使之有知而必言,有言而必尽。臣不佞,盖于其始也,愿陛下即虚文而求实用;于其次也,愿陛下执常道以正治经,存至仁以厚民望;又其次也,则欲立礼乐以定出治之本。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不敢不条列而对也。若夫当世之要务,则虽圣问之所不及,而因其所及,可一一而陈也。圣志之所向,虽众人之所未喻,而臣之所自喻者,可反复而论之也。其本末可见,其次第可知,陛下试幸听之毋忽。

陛下留意天下之大计,而不蔽于一偏之见,不任独知之明,是以上法三五,中稽孔氏,下验汉唐,凡道仁礼乐之大要,皆泛观而博取之,然而非圣志之所向也。陛下以今日之事为何如耶?以陛下夙兴夜

寐,精实求治,十有七年之久,而迄未有尺寸之效,能使陛下有以自慰其心者,亦尝思其故乎?独运于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辅也。且陛下临政之初,尽起诸臣于废弃休老之余,举国论而听之,而其人既足以副陛下之望也。陛下又自简拔,至兴于梦寐,取之具员疏远之中,一朝而暴亲贵之者,不知其几人焉,而其人又多为罪戾,以负陛下之知矣。使陛下徘徊四顾,莫识谁可,丞相之席虚而不登者二三期矣。然而卒以付之旧学之臣也,尝辅政于十五六年之前,则陛下观之亦审乎?群情嗷嗷,观听是举,其亦有以佐陛下之大有为乎?

虽然,宰相失其职久矣。自崔亮、裴光庭以铨法自守,世谓吏部为失职。此特一有司之事耳,犹可为也,而至于宰相专限资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今也管库之小臣,在外职司之僚属,进拟不足,除授不行,相视莫知所以为计。四方之士大夫,足相蹑于政事堂,不自知其贤不肖,而皆取必于上。若乃侍从近臣之进退,又常曰不敢预闻。不知丞相之职,真若是而已乎?天下大事,于今有几?其所施设,宜何后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臣不知今之所谓大臣者,能进此道而任此责乎?三代之佐,臣不敢论。若诸葛亮、王猛,振起治功之臣也。唐之裴度,近世之韩琦、富弼,维持法度之臣也。宰相之职为最大,而居今日为甚艰,以其失职之久而不自知也。从坚中实,未能革伪;苟绝亲党,岂云守公?臣愿陛下诏大臣交修协济,纪律粲然,以回天下之视听,而无蹈于失职之过而不自知,则众务可以渐举矣。

谏官御史,各有分职,不可相侵。规切谏诤,以人主之得失、国家之大体为己任者,谏官之职也。明于人臣之忠邪,以排击奸佞,肃清班列为己任者,御史之事也。今谏官侵御史之事矣,非惟侵御史之事也,且又失谏官之职矣。往者祖宗之世,谏官御史以言事为贤。或除授有不当,废置有不宜,所言不见听,连章谨哗,至于空台省而去,更出选人,议论不衰,岂不多事而可厌乎?然而祖宗不厌,益置员数,分命荐举。若是者何也?以为不厌其多事,直差可以无事尔。伏自顷岁,有论除授之不当而去者数人,陛下既觉悟而亟还之,超迁而尊遇之矣。六七年前,以沉默相承,而天下遂至于无可言之事。然则真无可言之事欤?抑其有而不敢言欤?抑不惟不敢而亦不知言之欤?不敢言

固可畏，不知言又大可畏也。虽然，陛下之于谏官，多缺而不补，而比者独以一人长之，又何欤？天下固不为无可言之事矣，而使他人不得言，言之则为越职，为生事。臣愿陛下益置员数如祖宗之旧，择今之所谓以名义材实自任者焉，而责之以天下之所当言，其必有可言者，而国是可以渐定矣。

朝有政令，虑其遽行而不审也，而集两制以上议之，所以广谋智，重改作也。此先王之典，而汉氏之所以尝行。然臣窃怪其所议者，多不急之细故，有司之烦文。小臣转对，无以应故事而为臆说者。陛下既以乐听不拒之意而付之近臣，又不以正义大体明其不足论，乃委曲迁就，犹为之辞，徒闻某州添一通判事、某路添一参议者而已。陛下所任两制侍从，以为心膂经画之地，今也敝精神于无用微文，而不讲天下之大政要务，以为数千百年经久之规，天下之祸不切而最深，孰有甚于此者？臣愿陛下责之以远且大者乎！若夫法令苛密之为患，使天下度外之士无以自容；人才衰少之为忧，使缓急倚伏之际无一可保。陛下圣志且有所向，而内治数端，近在目前，犹或未举，何欤？岂非并志于所向，而不还顾其所行乎？然则欲强国势而威令未孚，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于此乎得之矣。

士风惰而未振，陛下思振之欤？陛下必以今世儒者最为无用，而科举之士多文少实，陛下且欲任使而不可得乎？臣请析之。臣闻周公太宰之治，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有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儒者职业，在周公时犹未大也。其后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故儒者诵孔氏之遗言，取《六经》之具载者而切劘之。彼直抱圣人所传之道耳，至其用之则在人主。夫其忠信孝友以为行，言语文字以为能，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朋友无间言，乡党无过行，斯可谓修洁博习之贤，亦足当卿大夫之选矣。凡今儒者，正当是耳。陛下如欲求卓异特起之士如孟轲、子思、周公、召公，以兴起治道，则宜详择而遍观之。天之生是人也，不数矣。陛下望之太深，责之太备，以大贤之任而欲众儒者之皆能，臣是以知其难也。天下不察，猥谓陛下不好儒，斯言过矣。科举之法，凡今大略皆所以堤防不肖，而欲贤者自振于其

中，此直幸耳。其多得不肖而不自振者，此乃法之所宜有也，而又何怪焉！虽然，振之在陛下耳。

民力艰而未裕，臣日夜念此久矣。以陛下忧悯元元之心，天下奏报，为民而上，常蒙画可。而今东吴数州赋役差轻之外，自浙水而西，江水以东，民终岁勤动而有仅足以输者，何欤？一遇水旱，不能偿种，逃田尽室而去之，不知论议之臣亦尝以告陛下乎？陛下盖恻然兴叹，以为俟版图之复也，当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天下无不感陛下之言也。然臣以为陛下诚欲大有为也，则必先有大慰天下之望。故夫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俟版图之复而后捐之者，无是道也。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待进取之定而后裕之者，无是道也。陛下徒因今之法而稍宽之，此不足以裕民；果裕民也，更为之法可也。

以臣所论，今天下之财，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陛下清俭寡欲，至于太息。而言财利主计之臣，甘受聚敛之名而不辞。郡县之官，明行侵刻而不愧。非以奉陛下无益之用、侈靡之资也，为天下之大蠹，十分之九以供之而犹不足者，兵是也。自唐之末年，固已困于兵，而藩镇四起，乱亡相继，艺祖受命，收节度之权，严阶级之法，以安天下，而养兵之患，未暇去也。太宗、真宗，继有西北之事，天下之兵遂以增益而不省，而本朝之大，独当前世养兵之患矣。祖宗之已然者，姑不暇论，而以今天下之半，专给百万之兵，可乎？流弊之极，至于陛下犹豫而不知所以处之，数年之后，陛下亲见之矣。陛下诚思所以处此也，则民力裕而百度修。不然，民未裕也。

陛下圣志之所独向，臣愚不肖，不足以窥测万一。然臣独以为使宰相得其道，谏官得其职，近臣与大计，儒者守常度，至于宏大规模于文法之外，振起人才于名义之中，减兵费，宽民力，治官之冗滥，去吏之弊害，凡急政要务十数条者，陛下一朝改定，以幸天下，使民志定而人心悦，则圣志之所向，始有可得而言者矣。

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义而陛下未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未能举，平居长虑远想，当食而不御者，几年于此矣。陛下上则重违太上皇帝问安侍膳之意，下则牵于儒臣深根固本之说，徒与二三亲信密计而深筹之，然犹不欲诵言

其事,方借苏轼之论以旁训臣等,此亦公卿大夫不能建明之罪也。夫轼之论,为祖宗平世而发也,故以优游缓带而讥其俗,转输戎赂而惜其费,若曰不爱金帛乎?今日复仇之义,不得旋踵,而今也四十年不举矣。陛下若欲教天下以为人子之义,使枕戈北首,虑不顾身,天下之人其又何辞!而徒有感于轼之论而已乎?

虽然,臣则有忧于此,何也?为复仇之论者有矣,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自用兵以来无他画也。为固本之论者有矣,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而已,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为国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容苟简。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陛下圣志之所独向者,其固有本末次第之可考乎?抑亦未免徒出于用兵也?如其本末可见,次第可知,则陛下行之而已。如未免于用兵也,则臣以为过计矣。

往者隆兴之初,聚重兵于淮水之上,使辅臣督之。方其未战也,天下交口而议其后;及其一战而不胜也,大兵溃散,飞檄告警,督师罢黜,而复与虏和矣。今日之事,其去隆兴之初有几?粮储备乎?器械精乎?士卒练乎?所恃者如此而已,可谓眇矣。且夫复仇者,本非用兵之谓也。合数十利口之臣,操胜负常势之说,以误陛下。一战弃之,而陛下之大功不可立也。直使王猛、王朴辈为陛下计之,必不出此。此天地之大义,国家之大体。救御之术,消复之方,转祸为福,因败为功,以辅成陛下之志者,天下岂无人耶?陛下何不博求而公选之,赐以清闲之燕,姑告其圣志之所独向者!必坚决,必刚健,必信任,必不息,必无使小人参之,天下之事在陛下岁月之顷耳。起膏肓于神药,还淳厚于重裘,可立而待也。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而于终曰:"子大夫以选待问,其考引古初,据摭经史,博举先儒之言,茂明当世之务,条著于篇。勿迂勿泛,朕将亲览。"臣不肖,所闻不广,孤陋自成,无以极古初之道,摭经史之传,妄以其意之所以欲言者,略而言之。臣闻谈天下之常理,必近乎迂;为天下之正论,必近乎泛。古之圣人,平心以来天下之言,而不责其必中。其听之似迂也,其取之似泛也,而切言实论始可得而识矣。责其必中而不乐夫迂且泛之言,则奇怪可喜之说交至而莫能择。歆艳夸衒,捭阖箝制,而人主之心术,始为天下之所窥矣,名实之辨有不乱

乎?

臣伏惟陛下求治岁久,未睹成效,深知夫天下之事,似足以乱真,名足以欺实。是以策臣于始,既责之以实用;策臣于终,又戒之以勿迂。然而臣恐陛下乐闻切近之论,而怪奇可喜不计本末,不参古今,乘间而为说,以中陛下之欲者,不为少矣。陛下之爵足以贵,陛下之禄足以富,名器之所予而奔走之,彼为怪奇可喜之说者攫取而去,陛下将何便于此?陛下诚存广大,以为听之之道,而使人臣得因贵仕,以输切近之忠,规为定于上,法守行于下,怪奇可喜之说不得参于其间,驯致而责其成,则禹汤之功不难到矣。陛下有上圣之资,而行乎久弊之政,方将新美众事,兴举百废,以济大业,以定治本,以追禹汤之骏功,而听言之道不幸有近于臣之所忧者,故列于末,惟陛下财幸。

臣下我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您有上天赐与的勇武和智慧,统治天下,实际上开创了我大宋永无尽头的功业,因此能够不因为出身草舍茅屋的人很鄙陋,特命主管部门,从中广泛选拔优秀人才,亲自下达制策,询问有关大道、仁德、礼法、乐舞这些方面的要旨以及当今最紧迫的事务。陛下您心中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参考验证,适当采取,只谋求恰到好处。臣下我愚昧不成器,私下里也独自考虑,认为古代的忠臣,从来没有不愿论说天下大事的;古代贤明的君主,也从来没有不喜欢倾听天下言论的。但是听取言论,往往很难做得到;发表言论,到最后也不敢全盘托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还不是因为君主和臣子的思想不能彼此沟通,而上面同下面所处的情势不能配合起来吗?现在陛下虚心对待自己,胸怀博大,访求众人的言论,凡是像从前伊尹、傅说这类埋没在卑贱的农夫和役夫当中而不敢崛起的人,贾谊、陆贽当年在朝廷上大声疾呼却不被听取的事情,也都被推举出来并加以寻访了。陛下您的心意恳切悽恻,您的制策深远重大,做为臣子却不讲出肺俯之言,那他又能逃避掉什么罪责呢?

尽管如此,皇帝倾听意见,仍以广泛为佳;臣子发表议论,仍以切合当代实用为贵。臣下我曾听说昏庸的君主施行善政,天下是不会混乱的;圣明的君主施行弊政,天下是不能达到大治的。观察当今仍

未改变的状况，世人承袭了前世衰败、社会最坏的地方，而不能顾及到它的根本；掌权者讨厌众人说法的纷繁，而不能探求它的要旨。或者用浅陋的议论废弃了筹划长远的主张，或者用一时的功效改变了久远宏大的谋略。朝廷上下原本为同一体统，可却区别成内外；文臣武将原本是同一准则，可却相互贬抑张扬。因此君臣上下都喜欢天下相安无事，群臣也不承担各自的责任。当天下长期保有之后，却没有根基来巩固不可动摇的国势；由于人口繁殖一天比一天多，国家随之出现了贫困脆弱而走向衰落的苗头。至于天下的根本不确立，大义不明了，稍微不做考虑，必将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难道这不是因为贤明的君主施行弊政所造成的吗？至于像系统梳理朝廷纲纪，臣下我在这里是没办法讲个明白的，敢按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逐条对答梗概。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策问中用来命令群臣的东西，说道："皇帝我继承先辈留下的美好事业，殚精竭虑地处理天下大事，日夜都顾不上安歇，希望能取得功绩。现在你们这些被选拔上来的众多士人，都来到殿廷，打算同你们讲述阐明治国的道理，借此来考察你们平时积累的学问。围绕空洞的文章做比试，却不管当代的实际运用，皇帝我对此不予采取。"臣下我由此恭敬地看到陛下您勤于政事，希望天下大治，已经十七年了。应付时常变化的政事，经历了多次对义理的领会，深深担忧空洞的文章损害时世，因此屈尊向臣子们询求能够明显见得到的实务。臣下我听说空洞的文章是使实务得以显现出来的对照物，并不是舍弃语言文字之外还有所说的实务。陛下您聪颖明智，超过古代。所接受的群臣奏章、秘密建议和殿廷上的公开对答，总共有许多次了。又纵观典籍，从上古唐尧虞舜和大禹、商汤的仁德业绩，到孔子一派的记载，以及秦汉以来兴衰成败的史迹，各个学派的众多主张，没有不明白的了。继承皇位以来，已经四次策问天下士人。在此过程中，被遗弃在山林之间、但仍对国事放不下的人士，往朝廷所设意见箱里进献一吐为快的言论，畅谈益处和害处所在的各种讲法，原本数量也已经很多了。陛下您也曾从中获取到所说的实际用场了吗？

古代治理天下的大道，都有固定不变、必然如此的理论根据，递相承传而无所变更。像那唐尧、虞舜和大禹、商汤被称为圣人的君主，也只不过是照样执行罢了。自从圣人不再出现，因而对怎样治理闹不明白，战国秦汉时代的国君和臣子一天天地扰乱那基本原则，只有儒生们将它世代相传。董仲舒、刘向、王通差不多稍稍想全面推广发挥它的主旨了。然而他们的地位不能使他们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的才干不能使他们彻底实现自己的志向。像苏绰辅佐宇文泰，魏徵劝勉唐太宗，这两位君主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两位大臣的主张所带来的益处。尽管这样，我大宋祖宗创建国家的固定模式，也都常常依据儒家的学说，去探求夏商周三代的大治局面，并将它施行到处理政事上来。我朝二百多年以来，《六经》和孔老夫子的学说，一天比一天明晰、显著。凡是古人用来治理天下的常道，没有不顺畅地施行的。在当今社会，反而厌恶它已被人们讲得烂熟了，不切合实际，因而不能信从和运用。陛下您一下子改变想法，打算求得焕然一新的局面吗？臣下我担心这样做就没有依据了。陛下您何不随顺已经形成的众多主张，详细加以考察，择取其中最为恰当的那部分呢？这样的话，凡是当今所说的空洞文章，按照它们的等级做裁断，也就都能构成实用了，否则的话，即使是《六经》和孔老夫子的书籍，也都属于没有用处的东西，那又对治理天下有什么补益呢？

十七年以来，天下人都对陛下非常仰慕，各地都群起响应，然而治国大道的实务，最终也没能确定下来。现在要废弃空洞文章，以此来使天下感到庆幸，可士人们也不免要用空洞的议论来对付陛下的索求。这样将听从谁的议论并采纳它呢？因此一个人平时所蓄积的学识自我表现出来，从这表现观察他究竟怎么样，也就足够了。孟子说：我了解别人的言论。世上从来没有不了解别人的言论却能获得到合适人选的事情。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纵观远古时代，三皇时代的书籍称为《三坟》，用来阐明大道；五帝时代的书籍称为《五典》，用来阐明常道。拿出治理天下的基本措施，总之要依据《五典》，而《三坟》中所记载的大道，究竟说的是什么呢？"臣下我私下想来，陛下依

据《五典》拿出治理天下的基本措施,那么古人治理天下的常道,陛下已经掌握住了。《三坟》这本书,孔子没有对它进行编订,只有孔安国提到了它。这是为什么呢?他恐怕是认为在天地运动变化的开端,阴气和阳气彼此消长的汇合点上,伏羲、神农、黄帝用来开启上天准则,制定教化本原的吧?尊奉上天,爱护民众,推崇大道,保持法度,运用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来显示赐予和剥夺的公平,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并确立起人伦准则的办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用人事来符合天意,然而后世创立异端学说的人,却逞用夸诞,又认为伏羲、神农、黄帝是拿天意来符合人事。因此那些高深怪诞又含义模糊不清的学说,最终归入佛教及道教中去。那些迂腐怪僻又低下通俗的学说,演变成阴阳、卜筮、合纵连横的方法。它们的伎俩和用意,都主动把大道作为依托,去迷惑当时的君主。臣下我希望陛下执持《五典》的常道,不要被孔安国一个人的说法所打动,那么拿出治理天下的基本措施,也就会纯正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孔子一派儒士,质疑问难,相互答问,对仁尤为重视。有的认为博爱天下众人就是仁,有的认为意志刚强、行为果断就接近仁,有的认为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法,天下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了。其他论述仁的,也不止一两种见解。圣人创立教化天下的学说,也应该有固定的主张,可却产生这么多的歧异的看法。后代探求仁的人,究竟去遵循哪一种呢?”臣下我听说,孔子亲眼看到周朝的日益衰败,中原诸侯和少数民族同时起兵争夺天下,认为根源在于周朝的国君不行仁政。国君不仁德,因此他的臣子们也就贪污狡诈,奸邪暴虐,不做诚实合理、忠实厚道的事情,用这来回报他的君主。君臣互相传播毒害,扩展到整个天下,朝廷法度就被毁坏,礼教不复存在,而天下百姓和万物也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了。在这个时候,孔子离开官场,和他的弟子们探求能够达到仁的方法,充实好的方面,消除不好的方面,把它植根在人们的思想中,显现在世事的变故上。虽然人们禀受的资质不一样,受后天影响所形成的习性具有偏差,而仁作为大道,距离他们也并不遥远。有的认为仁是博爱天下众人,有的认为仁是意志刚强、行为果断,有的

认为仁是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制,以及其他各不相同的主张,既广泛博大,又充实盈溢,上下到处流传,而仁恰恰就在这里面了。这些说法的创立者认为,虽然未能挽救当时社会的危机,然而仍然可以启迪后代人们的心智。

哎!那些乡野间的人士,他们的地位与力量,还不能够使自己一直生存下去,可以说是十分微弱呀,但却仍然不忘记去探求仁!至于陛下您,承受了唐尧把天下托付给虞舜那样的重任,守护我朝各位圣明天子的太平基业,想怎么办就都能实现,恩泽广大又深厚,称得上是掌握着可以达到的实力,具有能让它达到的威势。陛下您凭借圣明的品性获取到这一切,又加上了圣明的用心,那么有该喜欢、有该恼怒或有该让它生、有该让它死的地方,做起来都能适应天下的各种变化却又不失去心中那最高的仁德,这就是孔子学说的主旨所在。至于处处不离开经典的文义,对章节字句进行解释,随后真有收获,也足以辅助陛下的仁德,然而臣下我却不敢向陛下讲述这些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汉高祖制定礼仪,打算试一试自己能够行用的。齐鲁地区的两个儒生,召请他们却不前往,说是一定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兴起礼仪。只有叔孙通了解时代的变迁,定立了一代皇帝的礼仪。这二者的看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臣下我听说周朝的礼仪,到秦代就消亡了。刘氏刚刚起兵时,凭他的机诈和武力,争夺了一辈子,才建立起汉朝。这表明,秦朝的礼仪,到汉代也消亡了。汉朝君臣上下,并没有长远的打算呀!假若汉代的礼仪不定立,那么能用什么来牵制住他们君臣的心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积累德行一百年之后才能兴起礼仪,那么汉朝来不及积累就要灭亡了。至于用典章来记载它,宣传文教来阐发它,君臣上下具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标志,上朝退朝具有常规,只要采取行动就与皇天和人间的常理相符合,那么一定要积累德行一百年才能达到。士人们想要适应时代要求来建立功劳,知道灵活运用以求变通,那么叔孙通的用意也就真地很接近这种情况了。把适应一时间的需要看作耻辱,宁愿自己一辈子默默无闻,齐鲁地区的两个儒生恐怕不一定就了解礼仪的施用吧?尽管如此,制定一个时代的典章,也一定要与这样的人来

讨论,这肯定是叔孙通所不能认识到的。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唐太宗谈论乐舞,认为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败,与此没有关系。杜淹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觉得不是这样。即便是魏徵也说乐舞的根本在于使天下人和睦,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声音上。这君臣之间的两种论断,哪一种更恰当呢?”臣下我私下认为,齐鲁地区的两个儒生讲论汉高祖还没资格制定礼仪,然而汉高祖却仍然制定了礼仪。大概是因为尊卑贵贱的次序,不能有一天被废除。至于唐太宗,治理天下已经取得成效了,功业已经建立起来了,有资格创制乐舞却仍然不创制,反而认为一个时代的兴盛衰败与此没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魏徵的智慧足以明了仁德道义却不足以明了礼仪和乐舞,懂得人们应该协和却不懂得声音能使人们达到协和,所以他用来辅佐唐太宗的东西,也仅仅是这样罢了。

陛下您在《三坟》、《五典》中探求治国大道,在孔子的学说中探求仁德,这已经是很正确的了。在汉唐中探求礼仪和乐舞,那就不是应该探求的地方了。汉唐两代初期,处理政务尚且来不及,又怎能顾得上礼仪和乐舞呢?况且汉高祖不喜欢儒生,不懂得学问,先王和圣人的大道没有地方能进入他的心里,可他却仍然对叔孙通说要考虑我能够行用的礼仪。唐太宗筹划当时的政务,一动就向儒生咨询,天资聪明敏锐,特别喜欢文学,然而却仍然说天下大治也不必创制乐舞,乐舞不足以使天下大治。他不考察古代,不求取大道,而仅仅想得过且过,按照自己所习惯的那一套去做。陛下您又从中参取个什么呢?

深切想来,在当今世上,上自皇帝祭祀皇天和祖庙,下至田间乡里的礼仪活动,制度规定几乎全都脱漏而不完备,肤浅鄙陋而不正规。嫁娶和祭祀庙宇、饮食生养这类事情,没有可以去遵循的礼法。富人和穷人纷纷回避礼法,没有任何限度。因而天下的治理,不能够全面推行开,其中的祸患全都在于礼仪和乐舞不明确。礼仪和乐舞不明确,政事就无法支撑起来;政事无法支撑起来,国家财用就枯竭,天下就匮乏。陛下您慨然想到天下这么广大,准备自己奋发而有所作为,然而不首先定立起根本,那么仁德之心和仁德的名声,通过什

么能够传遍四方呢?称王天下的功业,称帝天下的德行,通过什么能够隆盛呢?况且我朝祖宗兴盛时期,大概也曾经对礼仪和乐舞留意了!可屡次施行却不能奏效,刚打算施行又停止下来,其中的原因陛下您清楚吗?原因就在于汉唐两代关于礼乐要从简凑合的说法掺杂在里面,先朝的大臣和元老也没能深刻认识到礼乐的作用,而在这方面有所论列和建树。因此臣下我希望陛下马上兴礼作乐,把它作为拿出治理措施的根本,而不寻求汉唐两代的浅陋做法,那么天下的士人一定会有出来辅助陛下的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皇帝我往上效法可称‘皇’、可称‘帝’的大道,在中间参照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世的训导,往下借鉴汉唐时期的史事,但洞察事理还不够深刻,治理的成绩还进展不大。因此想要增强国势,而威严的命令还没使人们全都信服;想要弘扬统领天下的纲纪,而所作的筹划与部署还不够广大。士人们的风气懈怠低迷,还没有振作起来;百姓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拮据,还不充裕。转过来也曾观阅苏轼的论说,他讲天下的局势,中原的士人和平民穿着宽大的衣服优游闲适,勇气却消除耗尽,而政府每年向辽朝交纳的岁贡,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认为这是当前最令人担忧的弊端。皇帝我对此也深有感触”。臣下我跪拜敬读到这里,私下深知陛下您把当今的重要政务,圣明用心想要达到的目标,在训导的言辞上禁不住表现出来,进行开导启发,使我们了解什么就必定讲出来,讲出来又必定讲得很彻底。臣下我很愚钝,大致上在答卷一开始时,就希望陛下对照空洞的文章而寻求实用;接下来,希望陛下执守常道去摆正治国的基本措施,保存至仁的品性来加重民众对陛下的信仰;再接下来,希望能制礼作乐,来确定拿出治理措施的根本。凡是陛下策问臣子的问题,不敢不逐条排列来对答。至于当今世上最重要的政务,即使陛下没有问到,但依据所问到的问题,也可以一一做出陈述。陛下您圣明的用心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使众人尚未明白,而臣下我自己已经明白了,也可以反复地予以论证。这样根本和末稍就可以看出来,先后的顺序也可以知晓。请陛下您屈尊试加倾听,不要疏忽。

陛下您留意天下的大计，不被强调某一方面的见解所蒙蔽，也不全靠自己独具慧眼的明智之处做裁断，因此往上去效法三皇五帝的大道，在中间考察孔子的学说，向下验核汉唐的史事，凡是大道、仁德、礼法、乐舞的主旨，都广泛阅览，多方面吸取，然而这些都不是陛下您圣明心志所要达到的目标。陛下您认为当今的天下大事究竟怎么样呢？凭借陛下您早起晚睡，精诚务实地谋求大治，已经长达十七年了，然而却一直没有取得尺寸那样大小的功效，真能使陛下心中感到有所安慰。这其中的缘故是否也曾做过考察呢？缘故就是陛下您只在上面独自筹划，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来辅佐您啊！况且陛下刚刚统领政务时，尽数起用被免职和退休年老的群臣，所有治国的主张都听从他们，这些人也确实足以符合陛下的厚望。陛下又亲自选拔，以至于做梦睡觉的时候都要起来，在那些并不熟悉、仅仅充数的官员中选取某个人，一个早晨就让他猛地成为亲近尊贵的人，算起来也不知总共有多少个了。然而这些人又大多违法乱纪，辜负了陛下对他们的信任，致使陛下左右徘徊，四方环顾，不知道谁真能够来辅政。丞相的职位空缺，不派人担任，已有两三次了，然而最终把它交付给了通晓旧学的老臣，他们曾经在十五六年前辅佐政事，这说明陛下观察人也挺仔细吗？众人的情绪乱哄哄，只管观看和聆听，他们也有办法来辅佐陛下大有作为吗？

尽管这样，宰相不能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也由来已久了。自从北魏崔亮、唐朝裴光庭利用考核官员的制度来保住自己的职位，世人都认为这属于吏部失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部门的事情罢了，仍然可以纠正。至于宰相，却一味去抱定文武百官的资格，由此等于仅仅在帮助吏部实行一个部门的事务。如今掌管仓库的小官吏，在外机构的所属官吏，对他们向朝廷报请晋升做得很不够，拜官授职又不下达，丞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天下四方的士大夫，脚跟脚地来到政事堂上，而 丞相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人是否贤能，最终都由陛下决定。至于殿阁学士、翰林学士等跟随在皇帝身边的大臣的升降，丞相又常说不敢参预此事。不知道丞相的职责，真地像这样就算完事了吗？天下的重大事情，在今天来说共有几件？那些要推

行的措施,应该如何安排先后?我们大宋称王天下的事业却在整个天下的一块小地方上苟安,国家各项政务却一直荒废到今天,臣下我不知当今被称为大臣的人,能进献解决的办法并承担起责任来吗?夏商周三代的辅政重臣,臣下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像蜀汉诸葛亮、前秦王猛确属振作和奋扬起治理功业的贤臣。唐朝的裴度,我朝的韩琦、富弼,都是维持住朝廷法度的贤臣。宰相一职最为重要,而在当今担任起来也特别艰难,因为长期失职而自身又不知道。说是归向坚定、内心忠实,但却未能革除虚伪。如果仅仅断绝了结党营私,又怎能就说是恪守公道了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下达诏书,命令大臣彼此修养好自身,同心协力,相互帮助,使朝廷法纪粲然可观,来扭转天下人的视听,不要再陷入失职的过错又自己还不知道,那么各项政务就可以逐渐施行开了。

谏官和御史,各有各的职权分工,不可以互相干预。恳切规劝,直言相谏,把君主的得失和国家的纲领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谏官的职责。明了群臣的忠诚与奸邪,把排斥奸佞、整肃百官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御史的事情。如今谏官干预御史的事情了,不仅仅是干预御史的事情了,而且又丧失掉谏官的职责了。在以前我朝祖宗那个时代,谏官和御史把敢于讨论政事看成是贤良。偶尔有授官不当,废除设置不适合,所进之言不被采纳,就会联名启奏,呼叫喧哗,直至让办公场所空起来,离职而去。出出进进,议论不停,这难道不是多事而令人厌恶吗?然而我朝祖宗却不厌恶,更多地增设该机构的官员数量,分别命令大臣荐举合适的人选。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我朝祖宗认为不厌恶他们多事,差不多就不会再有事了。自从近几年来,因为议论授官不当而被罢官的有好几个人,陛下觉悟后马上召回他们,授予更高的官职,借此尊重并优待他们了。可六七年中,谏官和御史相继沉默不言,于是天下直至变成了没有可以言说的事情。然而果真是没有可以言说的事情了吗?还是有可以言说的事情却不敢再言说了呢?或者是不仅不敢言说,而且也不知该言说什么了呢?不敢言说固然可怕,不知该言说什么就更令人可怕了。尽管这样,陛下您对于谏官,大多是缺员而不增补,近来又只让一个人来领导,这又是什么缘

故呢？天下固然不是没有可以再言说的事情了，可却不让别人言说，言说就属于超越职权，就属于惹事生非。对此臣下我希望陛下您增设谏官人数，和我朝祖宗时一样。选择当今所谓用名义和实际才干来自我承当得起的人担任，把当今天下应该言说的事情责成他们来言说，他们一定会有可以言说的东西，这样国家大计就可以逐渐确定下来了。

朝廷有政令，担心马上执行会出问题，于是召集起草诏书的内外两制以上的官员进行讨论，目的在于增广谋略和智慧，慎重对待需要改变的事情。这是古代圣帝明王的制度，汉朝因而也曾经实行过的。然而臣下我私下对当今他们那些官员所讨论的东西感到奇怪的是，大多是些不紧迫的细小事务，是些政府部门的烦琐条文。在京师的文班朝臣每隔五天依次列举时政缺失和国家要事，本应没有为应付这种惯例而凭空想象、乱说一气的，陛下既然把喜欢闻听又不拒绝的意愿向身边的大臣做了交待，又不按照大义和纲领指出他们这类话不值得一说，竟然委曲迁就，还让他们讲，结果也不过是听到些某州应添一名通判，某路应添一名参议罢了。陛下您所任用的内外两制官员和侍从官，是要把他们作为心腹和臂膀那样的筹划中心的，可如今却在无用的细小条文上耗费精神，不讲论天下的大政要务来列为千百年的长远谋划，对天下的祸患不紧紧抓住并且感到特别值得忧虑。这可还有什么能比此类举动更严重的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把长远重大的事务交给他们去办！至于法令过于苛刻繁冗所造成的祸害，使得天下置身世外的士人也保全不了自己；人才衰落缺乏所造成的忧患，使得事件突发、变乱酝酿的时候没有一桩能够控制住。陛下圣明的心志已有想要达到的目标，而朝廷上的几种政事就在眼前，有的仍然还没有推行开来，这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只把它们集中在想要达到的目标上，却不回过头来看一看施行的情况吗？既然如此，那么，想要增强国势，而威严的政令还没能使人们信服；想要弘扬统领天下的纲纪，而所作的筹划与部署还不够广大，恰恰从这里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士人们的风气懈怠低迷，还没有振作起来，陛下您想振作它吧？

陛下您一定会认为当今的儒生最为没用，而科举录取的士人注重文辞，缺少实际，陛下您打算任用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吧？臣下我请求为您做个分析。臣下我听说周公作《周礼》，规定太宰治理天下，用九种协和君民关系的方法联结起邦国中的百姓，其中有两种叫做：教师用贤惠来赢得百姓，儒士用道德来赢得百姓。儒士的职业，在周公时还不重要，以后孔子总结各位圣人的大道，传给儒生，使他们世代恪守。从秦汉以后，对事功利益和兼用暴力的国政都很习惯，与各位圣人的大道不相一致，因此儒士们诵读孔子遗留下的说教，取用《六经》详细记载的东西进行钻研。他们只不过是恪守圣人所传授的大道罢了，至于应用，就全都取决于国君了。那些把忠诚、信实、孝悌、友爱作为品行，把善于讲论和撰写文章作为才能，谈论道义而不谈私利，注重仁德而不注重事功，朋友之间没有不及早实现的诺言，在乡党居住地没有错误行为的人，这才称得上是品行高洁并善于多方面传习的贤人，也完全能充任卿大夫的人选。凡是当今的儒士，正应该是这种样子。陛下您如果要访求到像孟轲、子思、周公、召公那样杰出的贤士，用来振兴奋扬治国大道，就应该仔细去选择，广泛来加以考察了。上天造就这样的人才，为数不多。陛下您对他们期望太高，要求他们过于完备，想让众多儒生都能担当起古代圣贤的使命，臣下我因此知道这很难啊！天下人看不清这一点，就错误地认为陛下您不喜欢儒士，这种说法就错了。科举制度，凡是今天所施行的一切，总体上还都是用来提防无能的人，同时让贤士在其中脱颖而出，这真是幸运事。那种大多数获取到无能的人而贤士却未能脱颖而出的情况，也是科举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又何必感到奇怪呢？尽管这样，振刷科举制度，也全在陛下罢了！

民力艰难而尚未充裕，臣下我日夜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凭借陛下忧念怜悯百姓的心意，天下各地的奏请禀报都是为百姓的事情呈递上来，常常会得到皇上您的批准。然而当今除了东吴地区几个州的赋役还比较轻之外，从浙水向西，到长江以东，百姓终年辛勤劳作却仅够交上租赋，这是为什么呢？一遇水旱灾害，收获物还不够偿还种子，百姓就纷纷不再耕作，全家离开故乡。不知那些论政的

大臣，也曾经把这类情况奏报给陛下您吗？陛下您悲痛叹息，认为等到收复失地后，应当尽数地把法定租税以外的杂税废除掉，天下人没有不感念陛下您这番话的。然而臣下我认为，陛下您真想大有作为的话，那就一定要首先有举措来深深慰籍天下百姓的愿望。因而能够废除强征的赋税，然后才能收复失地；等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废除强征的租税，还没有这样的道理。能够使民力充裕，然后才能议论北伐灭金的事情；等到北伐灭金的事情成功后才去使百姓充裕，也没有这样的道理。陛下您只是沿用现有的法令而稍加放宽，这样做并不能使百姓充裕；真想使百姓充裕，更改现行的法令才能够实现。

拿臣下我的论断来说，现在天下的财富，从一缕一丝以上，没有不全部收取的。陛下您清苦节俭，没有更多的欲望，达到了对天下苦难长叹的地步。可是讲论财利、掌管国家财政的臣僚，甘愿承受聚敛的恶名而不免掉；郡县的官吏，公开进行贪污和榨取而不惭愧。这并不是来供应陛下对国家没有好处的需用和奢侈的物品，作为天下的大蛀虫，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九拿去供应它可仍不够用的，恰恰是军队呀！从唐朝末年以来，已经就受军队的困扰了，而拥兵自重的藩镇四处出现，战乱败亡相继不断。太祖皇帝承受天命，收回节度使的权力，强化官兵一级服从一级的制度来安定天下，然而养兵的祸患，还没来得及去除。太宗、真宗时期，相继出现西北地区的战事，而天下军队数量于是大量增加而不予裁减。然而凭本朝的幅员广大，却要独自承担五代十国时期养兵的祸患了。我朝祖宗已经形成的那种情况，姑且顾不上去讨论，而把当今天下国家收入的一半，专门拿来供养百万军队，可以吗？相沿而成的弊端已经严重到了极点，致使陛下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可过几年以后，陛下您就亲眼会见到恶果了。陛下您果真想好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就会使民力充裕，国家各项事务都得到修明了。否则的话，百姓是不会富裕的。

陛下您圣明心志所独自要达到的目标，臣下我愚昧无知，不能够猜测出其中的万分之一。然而臣下我独自认为要使宰相明白做宰相的原则与方法，要使谏官履行自己的职责，近臣多考虑国家大政方

针，儒生们恪守行为规范。至于在法令条文之外，扩展长远的筹划与部署，在名誉和道义中使人才脱颖而出，削减军费，宽舒民力，整治官员的冗滥，清除吏治的弊害，对这总共十多项紧要的政务，陛下一旦改革并确定下来，使天下感到特幸运，使百姓的思想稳定而又人心欢悦，那么陛下您圣明心志所要达到的目标，才会有能够宣讲的了。

复仇是天下最大的道义，收回原来的国土是天下最崇高的名誉。凭借天下最大的道义而陛下却没能施用，凭借天下最崇高的名誉而陛下却没能振扬，平时深思远虑，该吃饭了都顾不上去吃，这种情况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陛下您往上来说唯恐违背了向太上皇帝问安侍膳的心意，往下来说被儒学大臣扩大和巩固国家根本的说法所牵制，只是和两三个亲信秘密商量，深深谋划，然而却仍然不愿意公开讲明这类事，还借助苏轼的论断来旁敲侧击地训示臣下我等人，这也是公卿大夫不能够对国家大事有所陈述的罪过啊！苏轼的论断，是针对我朝祖宗太平时代而提出的，因此用“穿着宽大的衣服优游闲适”来讥讽当时的习俗，用“征收各地物品作为给辽朝的供品”来叹惜这种费用支出。像这样说，是不珍惜钱币和绢帛吗？现在复仇的道义不容许有片刻延误，可到今日已经四十年没能振扬了。陛下您如果想去教给天下百姓作臣子的义理，使他们头枕长矛，面向北方，不考虑自身安危，天下人又有谁能推辞呢？只是对苏轼的论断发发感慨就算完事了吗？

尽管如此，臣下我还是对此深感忧虑。为什么呢？倡导复仇主张的人已经有了，也不过想要在军事上斗胜负罢了。自从开始用兵以来，也没有其它的谋划。倡导巩固国家根本的人也有了，也不过想和金国长久和好，以便相安无事罢了。除了同对方讲和之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治国的办法，一定要有先后的顺序。天下的大事，容不得草草处理，哪里光能不是出自用兵就是出自同对方讲和呢？陛下您圣明心志所独自要达到的目标，果真有根本末稍和次序先后可以考见的吗？或者也不免只是出自用兵这一条计策呢？如果根本末稍确能看得出来，次序先后确能明了，陛下您就只管施行它们好了。如果不免还是用兵，臣下我就认为这是错误的谋划了！

以往隆兴初年,在淮水上聚集重兵,命令辅政大臣监督他们。正当还未开战时,天下人纷纷议论这次大战的结果会如何;到了一交战就失利时,大军溃散,文书火速向朝廷飞来报警,督战的辅政大臣被罢免,又一次与金国讲和了。现在的天下大事,和隆兴初年相差多少呢?粮草储备充足了吗?器械精良了吗?士兵训练好了吗?用兵所凭借的也就是这些罢了,但却可以说都还没有达到要求呀!况且复仇,本来就不是说光用兵啊!十几个口齿伶俐的臣子串通起来,用胜负是兵家常事的说法,来贻误陛下。一场战争过后就放弃北伐了,而陛下的大功不能够成就。假如让前秦的王猛、五代的王朴这样的人为陛下出谋划策,一定不会提出这种办法。这属于天地间最大的道义所在和国家的纲领所在。有关挽救和抵御的策略,下降和上升的方法,转祸为福,从败势中取得成功,来辅佐陛下实现宏大志向的东西,难道天下就没有精通的人吗?陛下您为什么不广泛访求、公开选拔这样的人,赐给他们从容论政的职位,姑且把陛下您圣明心志所要达到的目标告诉给他们呢?一定要坚决果断,一定要刚猛强健,一定要始终信任,一定要自强不息,一定不要让小人参与进来,天下大事就在陛下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成就。用灵丹妙药来医治严重的疾病,用厚毛衣裹身那样的方式去爱护百姓,使风俗返归淳厚,就指日可待。

陛下您用来策问臣下我的东西,在末尾说道:"你们这些士大夫,正通过选拔,等待朝廷的询问,希望你们要考察引用远古的史事,采集收取经书和史书里面的内容,广泛列举前代儒士的言论,尽力说明当今的急切事务,逐条写在答卷上,不要迂腐,不要空泛,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臣下我没有才能,见闻有限,孤陋寡闻,天生就这样,没办法极尽古代的大道,采集经书和史书中的记载,只是荒诞地把自己心中所要讲出的东西,概括地谈了一下。臣下我听说谈论天下的通常道理,一定会接近迂腐;阐发天下纯正的理论,一定会接近空泛。古代的圣人,平心静气地来引出天下的言论,但不要求一定要说得恰切。他们所听到的内容好像挺迂腐,他们所采纳的主张好像很空泛,正是由于这样,那些切近实用的言论才能够获得并且识别出来。责令他们一定要说得恰切,却不喜欢迂腐空泛的言论,那么怪僻可喜的

论说就会一起到来而不能选择。对夸诞虚衍的那套玩艺很欣赏又很羡慕,在挟制天下的圈子里纵横捭阖,而帝王的心术就开始被天下人窥察到了。名实之间的界限,怎能不会混淆呢?

臣下我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您谋求大治已经时间很久了,没有看到实际效果,深切了解到天下的大事中,表面相像的东西足可以扰乱真切的东西,名称足可以蒙骗过实际。因此在开始策问臣下时,已经责令要注重实际用途;在结尾策问臣下时,又告诫不要迂腐。然而臣下我恐怕陛下您本来愿意听到恰切贴近的言论,可那些让人感到奇怪惊喜,不考虑本末,不参照古今,乘机进献说法,来迎合陛下心意的人,已经不算少了。陛下您的爵位足以让人尊贵,你的俸禄足以让人富足,官职俸禄的授予被那些上下奔走、鼓吹奇怪和令人惊喜言论的人捞取而去,陛下您又能从这里得到什么益处呢?陛下您果真胸怀博大,把它作为听取意见的准则,而臣子们能够由此获得高贵的职位,来进献恰切贴近的忠言,规章条例在上面定立起来,法令执守在下面得到实行,那些奇怪和令人惊喜的言论不掺杂在里面,逐步引导,责令他们取得成功,那么商汤、夏禹那样的丰功伟业,就不难达到了。陛下您有最为圣明的天资,却施行了积弊已久的朝政,如今正要使天下事务焕然一新,更为美好,使百废俱兴,来成就伟大的功业,来确定治国的根本,来追比商汤、夏禹那样的宏大功绩,而听取意见的办法不巧存在着和臣下我所担忧的问题相接近的地方,因此列在最后,只希望陛下裁断,那就万分幸运了。〔邵永忠译〕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盖闻道者,适治之路,传万世而无弊者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盖用此道也。朕膺光尧之命,承祖宗之绪,思所以阐文谟而扬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夜祗惧,莫敢遑宁。故博延豪英,访以当世之务。子大夫造廷待问,必有蕴而欲陈者。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议;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皆绵世历年,不能无弊。岂道有升降,政有损益而然欤?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

今朕正心诚意,体道之用,将以格物,而士风犹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礼教,将以范民,而俗化犹未醇也。义不胜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胜奸,何以防民之伪?意者仁义礼乐之用,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非耶?何视古之有愧也?伊欲道与世兴,风移俗易。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曼之虚文;民相与兴礼逊,趋本业,而不溺奢侈之末习。八政修而食货足,七教明而狱讼息。措国如唐虞,巍乎跨三代之隆,而无忠、质、文偏胜之弊。其策安在?熟之复之,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所谓的大道,就是适合治理的途径,留传万代也没有弊害的东西。仁德、正义、礼法、乐舞,都是贯彻大道的具体措施。而朝廷纲纪和法度,又是用来维持这些治国具体措施的。唐尧虞舜建立起帝业,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成就王业,原因就是运用了这个大道。皇帝我担当起先帝高宗的重托,继承列祖列宗的基业,考虑显示文治的谋略和奋扬武功的办法,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用心勤勉,可大道却离得很远,治绩没有扩展,每天恭恭敬敬,惶恐不安,不敢有片刻的安宁。所以广泛延请优秀人才,向

你们访问当前社会的急切事务。你们这些读书人来到朝廷，等待询问，一定有蕴积胸中、想要陈述的东西。况且唐尧虞舜时期的兴盛景象，原本没有可以轻易议论的地方。至于夏代崇尚忠厚，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采，都延续并历经了许多年，不能没有弊害。这难道是大道有升有降，朝政有减损、有增益所造成的吗？还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存在着不周全的地方呢？

如今皇帝我端正心性，使意念真诚，体察大道的功用，打算来穷尽事物的道理，可是读书人的风气还是没有归向同一个目标。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活动，推崇并提倡礼乐教化，打算让百姓都有行为准则，可是民间的风俗教化还是没能淳厚啊！道义很难胜过私利，通过什么会使百姓的生计充裕呢？刑罚很难胜过奸诈，通过什么能防止百姓的虚伪呢？想来仁德、正义、礼法、乐舞的功用，以及朝廷纲纪和法度这些用来维持治国措施的东西都不对吗？为什么一对照古代就让人感到惭愧呢？那些想让大道与社会一起兴起，改变风气与习俗，读书人共同讲论仁德道义，践行名誉和节操，而不自我炫耀华丽空洞的文辞；百姓共同兴起礼让，奔往本业，而不沉溺在奢侈的衰败习气中。《尚书·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得到修明而粮食与货币充足，《礼记·王制》所讲的有关父子、君臣等七种伦理关系得到宣明而诉讼平息。把国家治理得如同唐尧虞舜时期并远远超过夏商周三代的隆盛局面，没有忠厚、质朴、文采偏向一方的弊害。谋略究竟在哪里呢？你们要仔细考虑，反复斟酌，详尽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卫泾　廷对策

卫泾（生卒年不详）　字清叔，晚号西园居士，昆山（今属江苏）人。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第一。历官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封秦国公。其与朱熹关系密切，谋诛权相韩侂胄有功，遭忌，罢知潭州。有《后乐集》传世。

臣对: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纵,并隆五三,不自神圣,谦冲退托,亲屈帝尊,廷策多士,访以古今之治道,当世之急务,陛下岂以草茅之言为可用欤?然自陛下即位以来,六策多士,所以与之讲论治道,亦不一矣。亦尝采其所言,见之施行,而有补于治乎?抑草茅之士,华文少实,不当于理,而不足以措之事业乎?抑亦临轩赐问,姑循祖宗之故实,而不要之于用也?夫科目之兴,始自西汉,而贤良之策亦有时而措之用者,载诸史册,灿然可观。况陛下舍己从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广览兼听,以极群下之幽隐,开心见诚,以来天下之谠言,将与海内共臻至治,夫岂崇尚虚文,不究实用,徒应故事而已哉!虽然,君听存乎广大,臣言贵于切近。以陛下好问之勤,愿治之切,而徒泛为之辞,以娱观听,非士之所学也。

臣闻成天下之治者,固惮于改作;革极弊之政者,尤患于因循。改作之患,至于扰扰多事;而因循之弊,将有委靡不振之忧。二者皆非所以为治,而因时制宜,则治道之所不废也。昔汉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资,即位之初,侈然不满汉家之意,慕唐虞、乐商周之言,屡形诏策。董仲舒待问广延,乃劝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纷更制度,日不暇给,而一时之治,骎骎愈不如古。岂仲舒之言有以误之耶?终日变易法令,而不出于簿书期会之间,正非仲舒所以拳拳于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书期会之末,则知仲舒有救弊之名,无变道之实,诚古今不易之常理。从是而加之意焉,则以之振起治功,扫除积弊,跻一世于唐虞三代之隆,如圣策之所问,诚无难者,又岂在于变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陛下亦悟于斯而已矣。谨昧死上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道者,适治之路,传万世而无弊者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以见陛下探治道之本源,而知帝王之为同条共贯也。臣闻道无精粗,治有详略,本末不可以偏废,而阖辟变化之用,则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则不外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废。此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执中之妙,密相授受于心传之际,

而皇极之编，九畴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讲切者，岂惟繁文末节是务？而庶绩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礼乐庶事之备，固其形见之末效，而斯道之本原，固当求之于精微之运，诚不外乎“中”之一辞而已。不然，尧舜、禹汤、文武之君，不能舍仁义礼乐、纪纲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节，后世因欲持此以治天下，不可胜穷之变，则亦无具甚矣。然则帝王之治，固不难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废其末，举其全而不溺于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实用，而不惟繁文末节之是徇，则古今一天下也，而岂有异道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膺光尧之命，承祖宗之绪，思所以阐文谟而扬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夜祗惧，莫敢遑宁。故博延豪英，访以当世之务。子大夫造廷待问，必有蕴而欲陈者。”臣有以见陛下念付托之至重，思宵旰之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虚己问承学之臣，将以讲明济时之术也。顾臣微陋，何以塞明诏？

臣闻天下非治效不进之可忧，而人情安于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愿治之诚，迈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而二十三年于兹，计算见效，曾未之闻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毋亦愿治之心虽切，济时之术实疏，士大夫安于苟且以为成习，而天下万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窃观陛下即位之始，锐于为治，念版图之未复，愤仇雠之未殄，慨然奋发，将一扫而清之。一旦起故老于废弃之中，擢将相于俦常之列，畀之大任，责以成功；而徒肆大言，习为诞谩，玩岁愒日，无补事功，比比负责而去，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伤于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缓。惟其责效之速，故诞谩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窃取陛下爵禄而去；惟其习于纵缓，故庸常琐琐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为保持之计。上下苟安，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刑罚日以峻，徒为九重之隐忧，而不思所以救弊之术者。循是而不之反，则天下之患，殆将有出于意虑之外，而何治功之成？臣愿陛下思所以济治之术，革人情于极弊之余，正纪纲，明赏罚，毋徒徇于虚名，而必责之实用，则今日苟且之俗，将易而为趋事赴功之臣。则天下之治，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惟陛下所志耳。

臣伏读圣策曰:"唐虞之盛,固未易议;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质,周之尚文,皆绵世历年,不能无弊。岂道有升降,政有损益而然欤?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臣有以见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极,考三代治尚之偏,图惟厥中,以为救弊之术也。臣闻三代之治,本于一道。道之所在,初无毫厘之差,而救偏补弊,特其济治之术,由于时变之推移,而生于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质、文之名未立也,而忠、质、文未始不为用。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此其世变之使然,有不容御,则周人之处此,若其极弊不可为之世矣。自常情观之,必将厌委曲而务阔疏,弃文采而尚朴素,以求还上古之无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务为繁缛之典,凡可以管摄人心而提防风俗者,纤悉备具。是岂好为多事而繁文末节如后世之纷纷也哉?彼其损益之相因,无非因人情之所系,而扶持设施之术,固有出于法度纪纲之外。此太和之效,所以并称于唐虞,而弥文缛典,皆足以起当世之治。使周之子孙世守而勿变,则千万世而长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术,原其所以为人情之虑者,略其异而反其同,则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运用而已矣,奚必拘于形迹之末哉!

臣伏读圣策曰:"今朕正心诚意,体道之用,将以格物,而士风犹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礼教,将以范民,而俗化犹未醇也。"夫士风之不美,以其无所范也。今陛下以正心诚意之学,将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风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也。今陛下敦本业而抑末作,崇礼教而设防范,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流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乎?

臣闻古之仕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后之仕也,上下相胜,以败其事。夫仁义道德之本,孝弟忠信之实,古人之所以修于乡党,处于庠序,以为吾之所当为,初无所觊于上。而官爵禄位之设,车马衣服之奉,古人所以用于朝廷之上者,亦以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于下。故士知修于家,以待上之求,上取夫士,以为天下之用。上之所以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固其宜也。后世则不然,上设其爵禄,以待士之求,而士亦苟且修饰,以有所要于上。士惧其无以自达,则巧取幸进,不顾礼义,而上亦

惧其进之滥，则多为之防，以绳其来。此后世之通患，而按之今日则尤甚矣。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苟侥幸于一得，则抵法禁而不知畏。天下固未始无卓然特立之士也，而以一眚之过，而绝其终身之善；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则亦自流于薄恶而已矣，而何怪于士风之不美欤？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

臣闻古之治天下者，将以定民志；后之治天下者，将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达之于民，尊卑贵贱之不相侔，则服食器用之间，截然等级之有辩。古人非故为是无益之文也，防闲之不至，则情伪之相滋；乐好之不厌，而弊将有不可胜言。深为之节，严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趋向之一，而风俗之厚，亦其理也。后世则不然，举圣人所以检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偷风薄俗亦复荡然于法制之外。富商大贾，得以交通王侯，而乡曲豪右，无别于贵近。自后世有所由来而较之今日，则殆将不止于是者。车服上僭宫闱，家室略拟都邑。辇毂之下，四方之所观瞻，而此风益炽。上下恬然相视，不以为怪，则亦日流于无节文已矣，而何怪于俗化之未醇欤？臣故曰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也。

臣伏读圣策曰："义不胜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胜奸，何以防民之伪？"夫率民以义，则义之所在，而利固存于其中，则民心之礼义，若可以厚其生也。而义或不胜其利，得毋以义利之不能两立而趋于利，则或违其义乎？夫防民以刑，则刑章之立，可以不试而民畏也。而刑或不胜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胜民，则奸宄亦不胜其多乎？

臣闻古者先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后世不知养民，不知教民，一于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饮食之须，冠昏丧祭之具，圣人初非举手以予民也。为之立其官师，制其田里，又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乐出其力，以供上之用，亦不以为劳我而且厉我也。后世教养斯民之事，曾弗之讲。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为，而上之人又从而征敛困苦之。今日之民，其无聊赖甚矣，而何义之能知？山泽之饶，舟车之算，香盐茶酒之榷，凡桑弘羊辈所以笼天下之利者，无不悉为常赋。常赋有限，复令先期；常数既殚，复令别配，凡陆贽所以进疏于唐德宗者，无不尽用。陛下加惠元元，勤恤民隐，形于

诏旨，无非以宽民力、厚民生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减放之令，而督促如初；岁久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犹故。所谓禾稼如云，问之父老，皆有忧色，曰丰年不如凶年。而况水旱相仍，曾无虚岁，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邪？

臣闻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后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矣。夫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制刑，盖为夫不孝、不友、不姻、不睦者是禁，而山泽之利，无不弛以予民。而或为之限节，盖亦禁其未作之为害，而非夺民利以自殖也。后世不明圣人制刑之意，而禁网之密，条章之具，无非与民争利。而茶盐之商贩，酒榷之私酤，毫发之不贷，纤悉之必计。刑禁之既加，而科罚又从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宽滥亦甚矣，而奚伪之能防？故刑不足以胜奸，则奸宄之习滋炽。聚于山泽者，为盗贼之区，而刑余之众不得与齐民齿者，亦将流而为盗。陛下广覆宇内，远近如一，通商贩之禁，宽酒榷之征，虽见于比年之诏，而有司诿曰国用之所须，无得以辞其责。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泽，有宽恤之美名而无宽恤之实惠，所谓罔民以为利，诱民以为奸。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奸宄之消，其可得耶？

臣伏读圣策曰："意者仁义礼乐之用，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非耶？何视古之有愧也？"诚如陛下所言，则信知后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问臣，臣不敢徒以古对。陛下果有意于古也，盖亦稽唐虞致治之原，参三代救弊之政，一政令之未纯乎古，一设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张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习，以起天下趋事赴功之心，则以之美士风，善俗化，厚民生，去民伪，亦惟磨以岁月，无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无师古之实，则今日之策臣者，徒为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虚文而已。是将奚益？

臣伏读圣策曰："伊欲道与世兴，风移俗易，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曼之虚文；民相与兴礼逊，趋本业，而不溺奢侈之末习。八政修而食货足，七教明而狱讼息。"臣愚以为，世有先后，道无异同，由大原之所自出而观之，越千载犹一日。唐虞三代即斯道以为治，既有以措天下于无为之盛，况陛下心传之妙，得于授受之懿，则施之事业，移风易俗，诚无难者。若夫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而不矜靡

曼之虚文，臣以为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与趋本业，兴礼逊，而不溺奢侈之末习，臣以为莫若有以定经制。

夫礼义者，人心之所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胜，是以忠纯笃实之意日亡。是固科举之法，有以坏天下之心术也。今陛下徒曰严法禁，谨堤防，足以革士风之弊。臣以为无以善人之心，则未见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举之法，后世即以之取天下之人材，而天下之人材，亦辐辏于科举之内。即取之于未用之初，盖亦择之于既用之后。广之以教化之本原，而恃之以趋向之所在。贪浊者黜之，廉介者用之，奔竞者抑之，靖退者进之。旌直言以来谏诤，伸士气以通下情。若是而[illegible]风之不美，臣未之信也。

夫礼制固有一定之经，惟防范之既亏，故至荡然而莫知限节。是固民心之无常，亦上之人无以樽节之过也。今陛下徒曰躬节俭，务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为躬行之至，虽为正风俗之本，而礼制之未明，经制之不立，则人心之无厌者，方且苟于目前之便，未见徒善之足以有为也。今为之明其礼，定其经，上而乘舆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人，冠昏丧祭之节，宫室器用之制，严为限量，设有科条，逾者有禁，断于必行。贪溺者无所歆艳，而豪右兼并，粟腐贯朽，无所用之，则民志定而争端息。无甚富之民，则亦无甚贫之民；无甚侈之家，则亦无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风俗归厚。若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

厚民之生，则莫若讲节用之策；省民之刑，则莫若谨按察之使。今日之利原竭矣，不可复兴矣，无已则有节用之说乎？节用固多术也。曩者固尝限宫观之员，而宫观之除，滥予犹故也；固尝省添差之数，而添差之恩，妄授犹昔也。佞幸之赐，得毋有过度者乎？虚籍老弱之兵，得毋有坐糜廪食者乎？节之于彼，而又节之于此，则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滥矣，不可以复峻矣，盍亦谨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谨也，州县之间，责成案于胥吏，而长吏不以为意；付箠楚于狱卒，而狱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迹，尝一至于圜土之门乎？监司之按行，又能尽得于一见之顷乎？谨之于彼，而复谨之于此，则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舍是而曰八政修而食货自足，七教

明而狱讼自息，臣恐未免于揖逊救焚之举也。

臣不佞，陛下召至阙廷，赐之清问。臣首以更化为陛下献，次愿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风，定经制以善民俗，次愿陛下节用以厚民生，谨按察以省刑罚，以为更化之说。请复为陛下终始言之。臣观艺祖皇帝，为天下除大残，致民更生，兵不血刃而天下归戴。征伐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敛，蠲繁苛，一以仁厚为本。大抵兵以不杀为武，刑以不用为威，财以不费为饶，人以不作聪明为贤。此其立国之本意，而列圣守之以为家法者也。仁宗庆历间，承平既久，一时事类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过于增谏员，减任子，展磨勘。虽一二节目之或殊，而大体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臣以更化为献，亦岂劝陛下以变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夫之偷惰者，从而振作；王业之偏安者，思有以规恢而广大之；万事之积废者，思有以作新而奋励之；而不失祖宗立国之本意。则士风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罚之清，固有不期而至。则圣策所谓"措国如唐虞，巍乎跨三五之隆，而无忠、质、文偏胜之弊"，其策舍此，将安在耶？

陛下复策之于终曰："熟之复之，详著于篇，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咨访之意益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度愚贱，窃有拳拳忧国爱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条当世之事，陛下所以问臣等固已略陈于前。若天下大体之所系，而国家安危理乱之所从出者，虽圣策之所不及，臣安敢有怀不吐，上负陛下详延之意？敢为陛下毕言之。

臣闻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台谏者，朝廷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进贤退不肖；非有硕德重望，不足以镇抚中外；非有不穷之才，不足以赞万机之务。择相而任之者，不可以不谨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排击奸回；非有刚强之守，不足以肃清班列；非有高明之见，不足以裨益冕旒。擢台谏而付之者，不可以不审也。苟曰以其久位而姑以迁之，幸其无过而因以任之，则何以称具瞻之望，起非常之功？专求州县之下吏，搜索钱谷之细务，姑以应故事，而朝廷之阙失，国家之大议有不敢言，则何以通幽隐之情，辅圣明之德？臣愿陛下委

任擢用之际，详择而审处之。疑之当勿复用，用之当勿复疑。必期有以尽其才，然后可也。

陛下爱惜名器，必无滥予之爵。然技术艺能之贱，或充斥于朝路，而宫掖非泛之恩，或不厌于公言，可不有以节之乎？陛下亲近儒臣，必无偏信之失。然是非毁誉之说，或出于细微，而士大夫结托之私，或竞趋于权要，可不有以抑之乎？陛下诚于是而留听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台谏以谨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励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则兹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过于事为之末，非圣明之可虑也。臣是以终篇之末，论次其大者，以为陛下献。若乃襞绩故实以为有学，雕绘言语以为新奇，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录其区区。臣无任昧死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您被上天赋予无限的聪明智慧，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同样盛大，但却不认为自己圣明神奇，而是谦虚礼让，亲自降下皇帝的尊贵身份，在殿廷上策问众多的读书人，向他们访问古今的治国大道和当前社会的急切事务，恐怕陛下您是真地认为民间人士的言论可以采用吧？然而自从您登上皇位以来，六次策试询问众多的读书人，用来与他们讲求、讨论治国大道，也不都是一样的了，也曾采纳他们的言论，加以施行，对治理国家有所补益吗？或者是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文辞华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不符合根本法则，因而不够用来施行到国家事务上吗？还是您亲自到殿前策问读书人，姑且遵循列祖列宗的旧有惯例，摆摆样子给人看，而不落到实际应用上去呢？分科取士的兴起，是从西汉开始的，可是贤良文学一科中的对策，也有根据时势，把它们加以运用的情况，这种情况记载在史册中，鲜明地能够看得到。况且陛下您放弃自己的意见、听从众人的言论，就像大舜一样不自夸，不炫耀，像大禹一样广泛观察，全面听取，使群臣的心里话全都倾吐出来，推心置腹，用来得到天下正直的言论，准备与全国各地共同步入太平盛世。这哪里光是推崇空洞的文辞，不探究实际的用途，只按惯例敷衍一下就算完事了呢！尽管这样，君王听取意见应该

又多又广，臣子的建议可贵在切实近便。凭借陛下您勤学好问，殷切希望治理见效，可应试者却光是泛泛卖弄文辞，来使别人看到听到都很高兴，这决不是读书人所学的东西啊！

臣下我听说，实现天下大治的人，本来就害怕改动变更；革除极大弊害的朝政的人，更忌讳按老规矩办事。改动变更的忧患，会发展到凭空生出许多事端；而按老规矩办事的弊害，将会出现萎靡不振的担忧。两者都不是进行治理的办法，而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对策，却是治国大道所不能废弃的。从前汉武帝凭借非凡的才能和谋略，在继承皇位的初期，追求盛大而不满意汉代现状的意向，赞赏唐尧虞舜，喜爱商周时代的言辞，在诏书和策问中多次表露出来。董仲舒在朝廷广泛延请贤才的地方等待被询问，于是用更改制度、完善治理来劝说汉武帝，最后导致汉武帝不断更改法令制度，每天都忙不过来，可是一时间的治绩迅速下降，越来越不如古代。这哪里是董仲舒的主张确有原因地造成了汉武帝的失误呢？每天更改变动法令制度，可是只局限在官署文书与定期施行政令的范围以内，这根本不是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抱的极其恳切的原意。明白董仲舒所讲的更改制度，并不在于官署文书与定期施行政令这些细枝末节上，也就明白董仲舒有补救弊害的名义，没有改变大道的实际，这确实是古今社会不可改变的一般法则。从这条法则出发，予以特别注意，那么凭借它振兴起治国的功业，扫除积蓄已久的弊害，把全社会带入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隆盛治理状态，就像陛下您书面所询问的那个样，确实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又哪里在于变更法令制度，随之凭空生出许多事端，而给自己造成拖累呢？《诗经·文王》篇说：岐周虽然是旧的国家，但是它的国运却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陛下您只要对这诗意深有领悟就可以了。臣下我恭谨地冒死对答。

臣下我跪拜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所谓的大道，就是适合治理的途径，留传万代也没有弊害的东西。仁德、正义、礼法、乐舞，都是贯彻大道的具体措施。而朝廷纲纪和法度，又是用来维持这些治国具体措施的。唐尧虞舜建立起帝业，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成就王业，原因就是运用了这个大道。"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

下您探求治国大道的本源，并且明白建立帝业、成就王业是道理相通、脉络连贯的。臣下我听说，大道并没有精微与粗略之分，治理却存在着详明与简要的区别，根本的东西和枝节的东西不能够只重视其中的一个而遗忘另一个，但是关闭开启加以变化的实际运作，本来就有主宰的东西在里面起作用。因此大道的来源，不会超出精微的专一心念的范围以外，而各种治理措施对于天下来说，也不能够有一天废弃。这就是唐尧虞舜建立帝业，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成就王业的原因，本来就在这个大道以内。然而精粹专一、执守中正的精妙之处，秘密地在心与心相传的时刻递相授付与承接，而帝王的最高统治法则编集在《洪范》中，九种治国大法的主旨，君臣上下用来勤勉讲求的东西，哪里只是致力于繁琐的条文和细微的方面呢？而各种政务的振兴，君主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富裕等九件大事的排定，水灾的消除，礼仪乐舞和众多事务的完备，固然是具体地显现在细微的功效上，可是这种大道的本源，压根就应该从精妙隐微的内心运作中去寻求，确实只是“中正”这一个词儿罢了。否则的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这些帝王，不能够舍弃仁德、正义、礼法、乐舞和朝廷纲纪与法度来治理天下，而那些繁琐的条文和细微的方面，后代却承袭下来，想要凭借它来治理天下，不能够应付各种变化，也就缺少治国措施太厉害了。既然如此，那么，像称得上“帝”、够得上“王”的治绩，并不难达到，也不过是探究它的根本又不废弃末节的东西，全面推行而不一边倒，寻求实现大治的实际施用，而不仅仅屈从繁琐的条文和细微的方面，那么古今是同一个天下，哪里会有不同的大道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担当起先帝高宗的重托，继承列祖列宗的基业，考虑显示文治的谋略和奋扬武功的办法，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用心勤勉，可大道却离得很远，治绩没有扩展，早晚恭恭敬敬，惶恐不安，不敢有片刻的安宁。所以广泛延请优秀人才，向你们访问当前社会的急切事务。你们这些读书人来到朝廷，等待询问，一定有蕴积胸中、想要陈述的东西。”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顾念托付特别重大，思考终日忙于政务要更

勤奋,但又怀疑治国大道离自己越来越遥远,虚心向稟承师学的臣子询问,想要讲求阐明匡时救世的谋略。然而臣下我低微又浅陋,拿什么来完满对答圣明的诏令呢?

臣下我听说,治理天下的效果没有长进扩大,并不是令人忧虑的,而人心、世情对得过且过、按老规矩办事习以为常才是令人畏惧的。凭借陛下您勤于政务、期望大治的真诚,超过了前代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绩,看起来好像伸手就能够达到,可是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统计验核能看到的成效,不曾听到过有什么,这怎么能不寻求其中的缘故呢?恐怕也就是期望治理的心情虽然急切,匡时救世的谋略实际上却很疏漏,士大夫对得过且过心安理得已经形成习惯,而天下的各种事情还存在着次序不对的地方吧?臣下我私下里观察,陛下您在登上皇位的初期,对于治理国家锐气百倍,考虑到国家的疆土没有收复,愤恨仇敌没有灭绝,激昂奋发,打算一下子就彻底解决问题。猛然在被罢职的官员中起用元老旧臣,从普通官员的行列中提拔大将和宰相,交给他们重大使命,要求他们成就功业;可是这些人只会一个劲儿地讲大话,习惯于狂妄、蒙骗,贪图享受,虚度岁月,对于事业功绩没有什么补益,接连辜负使命而离去,可皇帝您想要大有作为的志向,也从这时逐渐松弛了。所以前段时间的治理,毛病出在太急躁了;现在的治理,又错在太缓慢了。只因要求尽快见到成效,所以狂妄、轻慢这类人能够大肆施展他们的欺诈和蒙蔽的伎俩,骗取到皇帝您的爵位和俸禄而离去。只因习惯于随随便便拖拖拉拉,所以平庸渺小这类人能够苟且偷安,稳固官位,自己为自己谋划保住官职的办法。君臣上下得过且过,没有谁愿意承担起责任,而治理的效果就扩大不了,社会习俗越来越败坏,读书人的气节越来越软弱,百姓的生计越来越困苦,刑罚越来越严峻。只是给皇上造成深深的忧虑,却不思考补救弊害的对策,照这样走下去而不加以扭转,那么天下的忧患,恐怕将会出现超出忧虑之外的情况,还能成就什么治理的功业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思考有益治理的谋略,在革除人心、世情的极大弊害以后,端正朝廷纲纪,明确奖赏惩罚,不要仅仅屈从虚有的名声,而一定要讲求实际有用,那么现在得过且过的风气,

将会转变成臣僚们真干事业，建立功绩。这样一来，天下的治理不准备采取什么举措便罢，只要是采取什么举措，就没有不成功的，完全任从皇帝您的心愿罢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唐尧虞舜时期的兴盛景象，原本没有可以轻易议论的地方。对于夏代崇尚忠厚，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采，都延续并历经了许多年，不能没有弊害。这难道是大道有升有降，朝政有减损、有增益所造成的吗？还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存在着不周全的地方呢？"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向往唐尧虞舜达到了最高的治理状态，考察夏商周三代治理所崇尚的对象的偏失，只谋求中正，把它作为补救弊害的办法啊！臣下我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依据同一个大道。大道存在的地方，起初没有任何差别，而纠正偏向，弥补弊害，只是补救治理的手段，属于随着时代变化的推移，在人心、世情中产生而不能作罢的事情。唐尧虞舜时期那样兴盛，忠厚、质朴、文采的名称虽然还没被确立起来，但也不是从来就没有施用过它们。忠厚一变而进入质朴，质朴一变而进入文采，这是因为社会变化才造成这种情况的，具有不可抵制的力量，那么周代人处在它那个阶段，就好像是弊害极大、不可救药的社会了。从一般的情理观看，肯定要厌弃各种严密的防范措施，致力于宽大疏阔，抛掉文采而崇尚质朴，以便谋求回到上古社会的太平无事局面。然而周代的国君，恰恰大力制定繁琐细碎的法典，凡是能够辖制、威慑人心和防范风气习俗变化的东西，连最细小、最详尽的部分都具备无遗。这哪里是凭空生出许多事端，就像后代乱纷纷地在繁琐的条文、细微的方面花气力呢？周朝在礼法增加或减少方面所做的承袭和变革，无非是根据人心、世情所在而进行的，有关扶助和维持治国措施的对策，本来就有超出朝廷法度和纪纲以外的内容。这恰恰是当时社会极为协和的效用能够同唐尧虞舜时期并称的原因，而繁琐的礼节规定和法典，也都足够用来振作起当时社会的治理。假如周朝子孙世代持守而不加改变，那么周代千秋万代是可以永远存在的，又有什么弊害可以提出来的呢？陛下您也该依据周朝用来补救弊害的办法，推究给人心、世情造成让人忧虑的地方的原因，去掉其

中的差异而返回到相同点上，那么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治绩，也只在陛下您灵活运用罢了，何必拘泥于并不重要的表面迹象上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如今皇帝我端正心性，使意念真诚，体察大道的功用，打算来穷尽事物的道理，可是读书人的风气还是没有归向同一个目标。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活动，推崇并提倡礼乐教化，打算让百姓都有行为准则，可是民间的风俗教化还是没能淳厚啊！"读书人的风气不美好，是因为他们没有行为规范的约束。现在陛下您通过端正心性、使意念真诚的学问，打算收到穷尽事物的道理和使天下太平的功效，可是读书人的风气还没有归向同一个目标，恐怕是因为承袭了衰乱时代的不良风气，而本源有的还不端正吧？风俗教化不美好，是因为百姓愚昧无知。现在陛下您重视农业生产并抑制工商业活动，崇尚礼乐教化，采取了防备禁阻的措施，可是风俗教化还不淳厚，恐怕是因为流行的恶劣习俗逐渐浸入人心太深了，而制度又不严密吧？

臣下我听说，古代做官的人，上面和下面彼此恭敬对待，形成美好的结果；后代做官的人，上面和下面彼此倾轧，败坏各自的政事。仁爱、正义和道德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和忠厚诚信这些实际的行为，都是古人在居住地和学校用来修养的目标，并且认为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对上面没有非分的企图。而爵位、官职、俸禄、品级的设立，车辆、马匹、衣服、食物的赐给，古人在朝廷上行用的这套制度，也是拿来给天下读书人的，并不是对下面有什么私人的恩德。所以读书人知道在家中修养好自身，来等待上面的访求，上面选取读书人，也是作为治理天下的人才去使用。上面用来对待读书人的东西越丰厚，所以读书人对自己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地方就越发不敢轻慢。上面和下面相互这样对待，人才就一天比一天兴盛，这是非常自然的了。后代就不是这番情形，上面设立爵位和俸禄，来等待读书人的寻求，可是读书人却随便装点门面，对上面有所索求。读书人害怕自己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就设法骗取，侥幸得到任用，根本不考虑礼法和道义，而上面也害怕进入仕途的人太冗

滥，就多方面加以提防，来控制他们的混入。这是后代普遍的祸患，而对照当今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才德不称却希求做官的习气滋长起来，人要懂得廉洁与羞耻的道德准则就沦丧了。如果在一点私利上可以侥幸谋取到，就和法制禁令相对抗并且不知道畏惧。天下不是从来就没有特别突出、特别优秀的读书人，可是却因为一个小过失，就否定了这个人的一生的美善；因为一个人的过失，就怀疑到天下的所有读书人，读书人也就自行滑入轻薄丑恶，完事大吉了，这还责怪什么读书人的风气不美好呢？臣下我因此说，这是继承了衰败社会的不良风气，而根源还没有端正啊！

臣下我听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打算来稳定住百姓的思想；后代治理天下的人，却打算随顺百姓的常情。在古代，上自天子下到百姓，尊贵卑贱不相等同，在衣服、饮食、器物方面界限分明，严格区分开等次差别。古人并不是特意制定这些没有益处的礼乐制度，因为防备超越规定的行为不周全，弄虚作假的现象就会滋长；喜欢好的东西没有止境，弊害将会多得数不过来。周密地制定好条文，严格地加以限定，所以百姓的思想统一，而自己所应遵守的本分也自然明确了。那时候百姓归向同一个目标，而风气、习俗淳厚，也是理所必至的。后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拿出古代帝王用来约束人心的办法，一概只随顺人情的便利，而轻薄、不厚道的风气与习俗也在法令制度以外不受约束。富有的大商人，能够与王侯交往勾结，而地方豪强，与身居要位的近臣没有什么区别。自从后代出现这种情况，用来与现在进行比较，现在恐怕还不像这样就算到头了。民间的车马衣物僭越到同后妃差不多，住宅大致上仿效皇宫。天子脚下是全国各地瞻望的地方，可是这种风气却越来越兴盛。上面和下面都坦然地互相对待，不认为奇怪，那就越来越滑向没有礼法约束了，还责怪什么风俗教化尚未淳厚呢？臣下我因此说流行的恶劣习俗逐渐浸入人心太深了，而制度又不严密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道义很难胜过私利，通过什么会使百姓的生计充裕呢？刑罚很难胜过奸诈，通过什么防止百姓的虚伪呢？"其实说起来，依靠正义统率百姓，那么正义所存

在的地方,私利原本也就存在于其中了,百姓心中的礼法、正义,似乎能够使他们的生计充裕。可是正义有时不能够胜过私利,恐怕是因为正义和私利不能够同时并立,因而趋向私利,有时就违背正义吧?依靠刑罚防范百姓,那么法律条文的定立,可以不必试验而百姓就会畏惧。可是刑罚有时不能够胜过奸诈,恐怕不是出自刑罚用来防范百姓,却谋求用它来压制住百姓,结果造成为非作歹的人更加多得数不过来吧?

臣下我听说古代是先养护百姓,同时又教化百姓,然后才治理百姓。后代不知道养护百姓,不知道教化百姓,全都是治理百姓罢了。有关日常生活费用和饮食方面的需要,举行成年礼、婚嫁、丧事、祭祀的物品,古代帝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双手举着送给百姓的。而是为他们设立长官和老师,为他们分配固定的田地和居住区,又教给他们君臣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等级秩序。百姓接受教化以后,他们的生计更加充裕,所以百姓乐意献出自己的财物,来供给上面使用,并且不认为这是上面使我劳累又对我进行压榨。后代对教化和养护百姓的这些事情,竟然不加以讲求。百姓生计的需用,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可是上面的人又紧跟着进行征税,使百姓窘迫,感到痛苦。现在的百姓,他们没有寄托和依靠已经到了极限了,还能知道什么正义呢?山林河泽的出产,船车往来的收税,香料和盐茶酒的征收,凡是像西汉桑弘羊这类人用来聚集天下财利的东西,全都定成固定的税收项目。固定的税收项目定有交纳的日期,可又让提前交纳;固定的数额收完以后,又让另外附加,凡是当年陆贽向唐德宗进献奏疏所讲的东西,全都采用。陛下您对百姓广施恩惠,经常体恤百姓的痛苦,在诏书中表现得清清楚楚,无非是强调宽舒民力,使百姓的生计充裕。可是太守、县令不遵照执行,也仅仅是一纸空文罢了。在水灾、旱灾时颁有减轻或免除赋税的法令,可是地方上督察催促依然像从前一样;年头长了,有免除所欠租税的条例,可是地方上追交催逼依然像从前一样。世上所说的谷物像云一样聚集,向老年人做询问时,他们却都露出忧愁的神色,说是丰收年头还不如收成不好的年头。何况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竟然没有一年不遭灾,上面和下面对此都感到

非常紧迫难办!像这样还想使百姓的生计充裕,怎能达到呢?

臣下我听说古代制定刑法,是用来使百姓习俗变淳厚;后代制定刑法,是用来骗取百姓的利财罢了。古代的帝王,出于实在没有办法才制定刑法,目的在于禁止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弟兄、不亲近姻亲、不亲近宗族的行为,但是山林河湖的利益,没有不放松来提供给百姓的。有的地方也做出了限定和节制,但也许是禁绝工商业活动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不是剥夺百姓的好处来供养自己。后代帝王不明白古代帝王制定刑法的意图,禁令法网的严密,条律规章的完备,无非就是与百姓争夺利益。而茶叶和食盐的贩卖,酒类的私自出售,一点点儿都不放过,最细微的地方也一定要计算。刑法禁令加在百姓身上后,又有处罚跟着进一步使他们困苦。现在的刑法,造成冤枉和不该审判的案件也太厉害了,又有什么虚伪行为能够防范的呢?所以刑法不能够完全胜过奸诈,那么为非作歹的风气就会滋长盛行。聚集在山林河湖中的,就成为盗贼出入的地区;众多受过刑法的人不准与平民百姓一样看待,也将堕落下去成为盗贼。陛下您广泛覆盖整个天下,对全国各地都一样对待,撤除贩卖盐茶的禁令,放宽酒税的征收,虽然在近年的诏书中可以见到,但是主管部门却借口说什么这些都是国家费用所需要的,不能够推辞掉自己所承当的责任。所以陛下有仁爱的心意,但是百姓蒙受不到那些恩泽;有慰抚和体恤百姓的美好名声,但是没有慰抚和体恤百姓的实际恩惠。正所谓蒙骗百姓来获得私利,引诱百姓去干奸诈的勾当。不返回到根本上来,却只是治理不重要的方面,这样还想消除为非作歹的人,怎能达到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想来仁德、正义、礼法、乐舞的功用,以及朝廷纲纪和法度这些用来维持治国措施的东西都不对吗?为什么一对照古代就让人感到惭愧呢?"果真像陛下您所说的,就确实知道后代的治理不如古代了。陛下您用古代的事情询问臣下我,臣下我却不敢只拿古代的事情作对答。陛下您确实对古代有想法,也就应考察唐尧虞舜时期实现大治的本源,参照夏商周三代补救弊害的国政,有一条政令还不像古代那样纯正,有一项设置还与古代不符合,都应该振兴奋起并且改变它们,来刷新天下得过且

过、一味按老规矩办事的习气，激扬起天下真干政事、建立功绩的心愿，凭借这些使读书人的风气变得美好，使风俗教化变得良善，使百姓生计变得充裕，消除掉百姓的虚伪行为，只需通过长时间的磨砺，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了。否则的话，陛下您仅仅有羡慕古代帝王的名声，但是没有向古代帝王学习的实际，那么今天书面询问臣下我的东西，也仅仅是照例行事摆样子，而臣下我禀告给陛下您的事情，也是一纸空文罢了。这会有什么用处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那些想让大道与社会一起兴起，改变风气与习俗，读书人共同讲论仁德正义，践行名誉和节操，而不自我炫耀华丽空洞的文辞；百姓共同兴起礼让，奔往本业，而不沉溺在奢侈的衰败习气中。《尚书·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得到修明而粮食与货币充足，《礼记·王制》所讲的有关父子、君臣等七种伦理关系得到宣明而诉讼平息。"臣下我愚昧地认为，时代有先有后，所说的大道却没有不同，从大道的来源观察它，经历千年如同一日。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运用这个大道进行治理，已经把天下带入了无为而治的太平盛世，何况陛下您心治大法相传的奥妙，已在授付与承接的美德中获取到了，把它施行在国家大业上，移风易俗，确实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至于让读书人共同讲论仁德正义，践行名誉和节操，而不自我炫耀华丽空洞的文辞，臣下我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有办法来端正人心。想让百姓共同奔向农业生产，兴起礼让，而不沉溺在奢侈的衰败习气中，臣下我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有办法来定立起有关礼制的常规。

礼法和正义，是人心都归向的东西。只因为利害得失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所以忠厚、纯洁、朴实的意念就越来越消亡。这压根是科举取士的制度，存在着败坏天下人心术的弊端。如今陛下您只是强调强化刑法禁令，谨慎防范阻止，就足够用来革除读书人风气的弊端。臣下我认为没办法来使人心变良善，那就看不出光是一个好法令就能够自动施行开。科举取士的制度，后代就依靠它来选取天下的人才，而天下的人才也都聚集在科举取士的圈子里。在没有任用以前已经选取他们，恐怕也该在任用以后再择用他们。扩大教化的

本源，又用目标所在来做标准。罢免贪污浑浊的人，起用廉洁正直的人，压制投机钻营的人，提拔不追求名位的人。表彰直言来鼓励谏诤，伸张读书人的正气来沟通下面的情况。像这样做却说读书人的风气不会美好，臣下我对此是决不相信的。

礼制本来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准则，只是防范上已经出现了缺口，所以礼制也就达到了不复存在的地步，而没有谁还知道限度和节制。因此民心不固定，这也是由于上面的人没有约束措施的过失啊！如今陛下您只是强调带头节约俭省，致力朴实，足以给天下习俗树立起榜样。臣下我认为带头实行达到极限，虽然是端正风俗的根本，可礼制尚未明确，有关礼制的常规还没有定立，那么贪心永无满足的人，正好在当前的便利情况下得过且过，这就看不出光有好心就足以有所作为啊！现在替他们明确礼制，定立起礼制的常规，上至皇帝的车马衣服，固然具有一定的标准，下至公卿大臣，再下至读书人和平民百姓，有关举行成年礼、婚嫁、丧事、祭祀的仪式，房屋和器物的规格，都严格加以限定和控制，设立条例，对逾越的人进行禁止，决定后一定要落实。贪婪和沉溺的人没有什么再去让他们艳羡的，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积存的粮食腐烂，穿钱的绳索朽断了，也没有地方能使用它们。这样一来，百姓的思想就会稳定下来，而打官司也止息了。没有特别富有的民户，也就没有特别贫困的民户；没有特别奢侈的人家，也就没有特别败落的人家。人心稳定，风俗归向质朴。像这样却说风俗不会变淳厚，臣下我对此是决不相信的。

使百姓的生计充裕，没有什么能比讲求节省费用的办法更重要的了；减少对百姓的刑法，没有什么能比慎重任命各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更重要的了。现在物尽其利的来源已经枯竭了，不能够再重新兴起了，但毕竟还要支出，于是就有节省费用的主张提出来吧？节省费用本来是办法很多的。从前也曾限制过掌管祠庙道观的官员人数，可是对宫观使的委任冗滥依然如故；也曾减少过额外增补官差的人数，可是额外增补官差的恩典，随便授予还和从前一样。赏赐谄媚得宠的人，恐怕还存在着太过分的情况吧？在花名册上虚列姓名及年老体弱的士兵，恐怕有白白耗费国家军粮的吧？在那方面要节省，在

这方面也要节省,那么百姓生计的充裕,差不多就有来源了。现在的刑法太滥用了,不能够再严峻了,何不慎重任命各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让他们特别留意呢?朝廷委派官员不是不慎重,可在州和县里,却把案件交给办事人员去审理,知州和知县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把残酷的逼供大刑交给看管监狱的人员去施用,可是负责审案的官吏却什么案情也不知道。郡守知府的足迹,曾经有一次到过监狱的门口吗?负有监察责任的漕司、宪司和仓司的验核巡察,又能够在察看一眼的刹那间就获得到全部真情吗?在那方面要谨慎,在这方面也要谨慎,那么爱惜生灵的美德,差不多就遍及百姓了。放弃这些却说什么八种政务得到修明而粮食与货币充足,七种伦理关系得到宣明而诉讼平息,臣下我恐怕这不免是在救火的关键时刻还在行礼辞让的举动吧!

臣下我没有才能,有幸被陛下您宣召到殿廷上来,赐给详细清晰的询问。臣下我首先拿更改制度来向陛下您做献呈,其次是希望陛下您端正人心来使读书人的风气变美好,定立有关礼制的常规来使百姓的习俗变良善,接下来希望陛下您节省费用来使百姓的生计充裕起来,慎重任命各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来减少刑罚,构成了更改制度的整个主张。请求再为陛下您从头到尾谈一谈。臣下我观察我朝太祖皇帝,为天下除去了拥兵割据的藩镇势力,使百姓获得新生,士兵不必血染刀口,天下就归顺拥戴。讨伐南方各国取得胜利以后,必定首先把当地百姓拖欠给官府的赋税一笔勾销,并且免除苛捐杂税,完全把仁德宽厚作为根本。基本上是军队凭借不杀人而构成威武,刑法凭借不动用而构成威严,钱财凭借不浪费而构成宽裕,人才凭借不耍小聪明而构成贤能。这是太祖皇帝建立国家的根本思想,我朝各位先帝持守并把它作为自家皇朝的准则。仁宗庆历年间,太平局面已经时间很久了,一段时间内各类政事逐渐有所松弛。仁宗皇帝一旦加以振作兴起,不过是增加谏院的官员,减少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得以做官的人,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尽管有一两项细节同太祖的举措略有不同,但纲领最终也没做改变。所以嘉祐年间的治理,往昔没有比得上的。江山的长久保有,最终一定要依赖的东西,就是

这个大道啊!臣下我用更改制度来献策,哪里是劝说陛下您要改变祖宗的法度呢?对士大夫得过且过又懒惰的习气,紧跟着要把它振作起来;对称王天下的事业还没能统治天下却苟且安居一方的状态,要考虑有办法恢复并扩展它;对长期荒废的各种事务,要考虑有办法更新并奋扬激励起来。但这些又不丢掉我朝祖宗建立国家的根本思想,那么读书人的风气越来越美好,民间习俗越来越淳厚,百姓生计充裕,刑法不再动用,自然会没抱希望却又来到了。陛下您在圣明的策向中所说的“把国家治理得如同唐尧虞舜时期并远远超过夏商周三代的隆盛局面,没有忠厚、质朴、文采偏向一方的弊害”,如果舍弃上面所讲的谋略,又在哪里会实现呢?

陛下您在最后又说:“仔细考虑,反复斟酌,详尽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咨询访察的用意更为勤勉,让臣下我等人能够全部谈出各自愚昧的想法。臣下我不考虑自己的愚昧卑贱,私下里怀有一片时刻忧虑国家、敬爱君主的忠心,一旦有幸得以承奉陛下您清美的光影,分条陈述当前社会的事务,陛下您所询问的东西,臣下我已经在前面粗略地做过陈述了。至于像关系到天下大局,而国家安定和危险、治理和动乱究竟是从哪里造成的问题,尽管陛下您在圣明的策问中没有提到,臣下我哪敢心里有话却不倾吐出来,对上辜负陛下您广泛征求意见的心意呢?敢为陛下您把这些话说完。

臣下我听说,宰相就如同朝廷的大腿和胳膊,御史台和谏官就如同朝廷的耳朵和眼睛。如果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光,就不足以进用贤人和摒退庸劣的人;如果没有盛大的德行和崇高的名望,就不足以镇抚住朝廷内外;如果没有层出不穷的才智,就不足以辅助众多的政务。选择宰相并且任用他们,对此就不能不谨慎啊!如果没有公正和忠诚的节操,就不足以排斥奸佞和邪恶;如果没有刚毅坚强的操守,就不足以整顿并澄清百官的队伍;如果没有高远明智的见解,就不足以对皇帝的视听有所帮助。提拔御史台官员和谏官并且任用他们,对此就不能不仔细啊!如果借口某个人在位时间很久了而姑且提升他,庆幸某个人没有过错而随后任用他,那么这类宰相凭什么能符合

人们都在瞻仰他的众望，重新取得特殊的功绩呢？如果专门去抓州县小官吏的罪过，搜求检查钱币和谷物这些细小事务的差错，姑且来应对例行的公事，可对朝廷的缺陷和失误，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却不敢发表意见，那么这类台谏官凭什么能把下面隐藏的想法和动向反映上来，辅助皇帝圣明的仁德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在任命宰相、选用台谏官的时候，仔细选择并审慎处理。怀疑他们就应该不再任用，任用了就应该不再怀疑。一定要达到有办法让他们施展出自己的全部才能，然后也就可以了。

陛下您珍惜朝廷的名位和官职，一定不存在随便授予官爵的情况。然而靠卖弄一技之长的低贱人，有时却在朝廷上黑压压占一片。而对后宫不属于都应施予的赏赐，有时却对批评这种现象的公正言论表示不满。这能不采取措施去节制吗？陛下您亲近儒生出身的臣子，一定不存在只相信一方的那类过失。然而是与非、诋毁与赞誉的言论，有的却出自官位特低下的人，而士大夫结党营私，有的竞相去投靠权贵，这能不采取措施去抑制吗？陛下您果真在这些方面留心听取，任用宰相要重视他们做为朝廷股肱的使命，任用台谏官要谨慎对待他们作为朝廷耳目的职责，珍爱国家的名位和官职来激励天下人，警惕偏信一方来显示极为公正，那么这次询问臣下我的那四项政事的弊害，只不过局限在事情的末节以内，不是圣明的陛下您值得去忧虑的。臣下我因此在写完答卷的末尾，依次论列那最重要的内容，来向陛下您献呈。至于把堆砌旧有事例看成是有学问，把雕琢修饰言辞看成是新颖奇特，臣下我不仅不敢这样做，也根本没空儿理会它。只希望陛下您赦免臣下我的狂妄和犯上，采纳其中的一点点儿建议，臣下我冒昧地犯下死罪，非常恭谨地对答如上。〔章爱先译〕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至切也。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之习犹未尽革。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

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归于正，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名实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浹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问久矣，咸造在庭，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凭借才德浅薄，却承担着至尊寿皇圣帝把帝位传让给我的重托，日夜恭敬，小心翼翼，思考遵用慈父的谋略，履行明确的成法的具体措施，十分迫切。到现在执政已经五年了，但治理没有取得进展，恩泽没有变得更广大，难道这是教化的实效没有宣明，号令的意图没有被人信服吗？士大夫是风俗的倡导者，皇帝我用来劝导、勉励他们志气的东西，不能算不勤恳，但苟且懈惰的习气仍然没有彻底革除；审案定罪是关系到百姓性命的大事，皇帝我用来选择任命司法官员的举措，不能算不谨慎，但断案冤枉失实的弊病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想来对人之常情习以为常就难以改变，对做表面文章都司空见惯就无所畏惧了吧？况且五帝时的社会，贤臣

在朝廷上都很和睦，事情在民间也很协调，习俗确实是完美了，但说坏话和残暴的行为，同时也成为忧虑事。采用象征性的刑罚，使礼服的图案按等级各不相同，而人民都不犯法，刑罚已经搁置不用了，但有所仗持而终不悔改，就予以严厉的处罚，必定要对此十分审慎。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教育感化，训导戒勉，自有义旨呢?

现在想让身为士大夫的人纯洁地继承美好的品德，而趋向又全都归入正道；身为民众的人转向良善，远离罪恶，而诉讼归于平息。名称与实际相符合，是非不能够用虚假来做掩饰；私心被公理所征服，喜爱和憎恶不能够掺杂进个人的感情。节俭正直的义旨，在百官中兴行，断案中哀怜实查的恩惠普遍施布到四方，果真用什么办法就能达到这种地步呢?你们这些士大夫等待朝廷的询问已经很久了，全都来到了殿廷上，你们为皇帝我考察古今的适宜做法，推求治理教化的本源，凡是能够使风俗统一，使刑罚清明，构成太平和美的功效的，都用尽心思，逐条陈述上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陈亮　廷对策

陈亮(1143－1194)　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一，时年51岁。此前未入仕，曾三次上书朝廷，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恢复中原。亦遭人诬告，三度下狱，幸得不死。其才气超迈，喜谈兵，志在经邦济民，倡行"事功之学"。虽与朱熹友善，但与之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辨"。所作政论气势纵横，笔锋犀利。词作亦颇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传世。

臣对：臣闻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昔人谓其以己而观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尧舜三代之治所以独出于前古者，君道、师道无一之或缺也。后世之所谓明君贤主，于君道容有

未尽，而师道则遂废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之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

臣恭惟皇帝陛下，谦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进臣等布衣于廷，而赐以圣问曰："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而圣问又曰："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著，而号令之意未孚耶？"臣于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运而不已也。臣闻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则曰克勤克俭，不自满假而已。今时和岁丰，边鄙不耸，亦几古之所谓小康者。陛下犹察其治之不加进，泽之不加广，而欲求其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盖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为陛下诵君道、师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

夫所谓教化之实，则不可以颊舌而动之矣。仁义孝悌，以尽人君之所谓师道可也。所谓号令之意，则不可以权力而驱之矣。礼乐刑政，以尽人君之所谓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学，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风俗者，乃"五、皇极"之事也。极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则不能以建极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岂一人之私意小智乎？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以会天下于有极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厕德行于言语、政事、文学者，天下之长，俱得而自进于极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以出也。

《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

由而正乎?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荡荡乎与天下共由于斯道。则圣问所谓"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犹未尽革",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皇极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阴消天下之贤者,则风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

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尽,而执八柄以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异势而随时弛张者,人主所以独运陶钧而退藏于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势,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国者,悉取而执之,此岂臣下之所得而亵用乎?沉潜克刚,高明克柔,以明刑法之适平而已。吾夫子为鲁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诸刑,其说以为教之不至则未庸以杀;而少正卯则七日而诛之,盖动摇吾民,不可一朝居也。

《周官》之刑,平国用中典,盖不欲自为轻重耳。而二三十年以来,罪至死者,不问其情而皆附法以谳,往往多至于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为然矣。数年以来,典刑之官遂以杀为能,虽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庙堂或以为公而尽从之。使奏谳之典,反以济一时之私意,而民命何从而全乎?臣愿陛下尽君道以宰天下,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谳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至其无可出而后就极刑,皆据案以折之,不得自为轻重。则圣问所谓"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威福在己,而欲一日尽去其冤滥,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无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犹有准绳也。圣问又曰"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臣以为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终不可化者乎?臣愿陛下明师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也。

臣伏读圣策曰:"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尧舜以师道临天下,苟可以救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矣。而说之横人于人

心者，谓之谗说；行之高出于人心者，谓之殄行。人心之危，说有以横人之，则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则伏矣。此所谓震惊而尧舜之所忧也。故必有纳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人，而得以同归于道，而天下之学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学争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谓谗说殄行者，一变而为乡原，务以浸润于人心，自纳于流俗。天下之学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势不屈而自归。孔孟盖深畏之，以其非复尧舜之时所尝有也。愿陛下畏乡原甚于尧舜之畏谗说殄行，则人心之正有日矣。

臣伏读圣策曰："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臣有以见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尧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种，民固已乐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途，使得优游于契之教，伯夷之礼。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于人心者，隐然而不可诬也。后世之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宽简之生于微密也，温厚之胜于严厉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则既废矣。

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轻者释以财，情之误者释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谓怙终贼刑者，盖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当刑者能几人?后世之轻刑，未有如尧舜之世者也。愿陛下考尧舜之所以轻刑之由，则民命之全可必矣。而圣策又曰"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臣之所以反复为陛下言之者，苟尽师道，则薰陶在其中；苟尽君道，则训厉不足言矣。尧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岂能出吾道之外哉?仁义孝悌，礼乐刑政，皆其物也。

臣伏读圣策曰："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归于正；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臣有以见陛下之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异类自为哉?而圣策又曰"名宾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私灭于公，而爱恶莫能容其情"，则圣意不免于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学贵乎正，天下之情贵乎平，其终固未尝不归于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实是非之未辩，公私爱恶之未明，其极至于君子小人之分犹未定也。伊尹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其说近矣。而汉之谷永，其言未尝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

尝不顺。则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论国人皆曰贤，必察见其贤而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必察见其可杀而后杀之。其说密于伊尹矣。然为人上者，何从而得国人之论也？

凡今之进言于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为是而自以为公哉？陛下亦尝察舆论之曰贤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尽平也，未能举无私也。小人乘间而肆言以为公，力抵以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两存之以为平。薰莸决无同器之理也，名实是非当日以淆，而公私爱恶未知所定，何望夫风俗之正而刑罚之清哉？陛下见其贤而用之，举动之小偏，则勿行而已耳。君臣固当相与如一体也，何至有肆谗之人以恐惧其心志，而徊徨其进退哉？陛下苟能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公私爱恶之所归，则治乱安危于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计略定矣。风俗固不期而正，刑罚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迁善远罪，直其细耳。而圣策又曰"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浹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公私爱恶之所归。其道则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

陛下三载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视之，以文具应之。过此一节，则异时高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图其名，而草茅取其实，此岂国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务也。陛下用以策士，则既不鄙夷之矣，于其末又复策臣等曰："子大夫待问久矣，咸造在廷，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臣有以见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尽君师之道，而自达于二帝三王之治而后已。顾臣何人，岂足以奉大对？臣窃观陛下以厚处其身，而未尝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犹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处身之道，岂有穷哉？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焉可也。

陛下之圣孝，虽曾、闵不过，而定省之小夺于事，则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陛下之英断自天，不借左右以辞色，而废置予夺之不当，则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终无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而九五之需于饮食者,待时以有为,当于此乎需也。岂以陛下之圣明,而有乐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两明相照,抚心自失,而不敢以乱礼也。岂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郁郁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臣愿圣孝日加于一日,英断事逾于一事,奋精明于宴安之间,起心志于谦抑之际,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终为寿皇继志而述事。则古今之宜,莫便于此;治化之本,莫越于此。同风俗以正人心,清刑罚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验可以为万世无穷之法,其本则止于厚处其身而已。《诗》不云乎!"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而子思亦曰:"纯亦不已"。夫以厚处其身,岂有穷哉!臣昧死谨上愚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用宽厚对待自身,没有用刻薄来对待天下人的,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尧舜。而过去的人们认为,从自己本身来看世人,天地给世人赋予的本性原来都是相同的。上天庇护下民,而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礼乐刑政,这是用来督责匡正天下而辖制世人的;仁义孝悌,这是用来给天下做表率并成为世人的规范的。君主和师长二者交相完善而同时发挥出作用,那么人的思想只有正道而无邪恶,百姓的性命只有该活而无冤死,这是天下太平与纷乱、安定与危亡区分开来的根据。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绩在古代独树一帜的原因,就是为君之道和为师之道没有哪个方面存在着缺失。后代那些所谓的明君贤主,在为君之道上或许有未做到的地方,在为师之道上却完全荒废了。天下的事情,有什么能比人的思想和百姓的性命更重大的呢?而它的关键就在于统一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没有该统一起来的地方,百姓的性命无处安置,却想讨论古今沿革的恰切做法,探究兵力、财政收入支出的数目,去寻求天下治乱安危变化的全部情形,这就如同没有土地却去谋求所种的植物必定会生长,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呢?

臣下我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谦虚恭敬,谋求天下大治,经常像是还没有做好一样,深切思考人的思想不容易端正,而百姓的性

命也不容易一辈子保全,把臣下我等民间读书人宣召到殿廷,赐给圣明的策问说:"皇帝我凭借才德浅薄,却承担着至尊寿皇圣帝把帝位传给我的重托,日夜恭敬,小心翼翼,思考遵用慈父的谋略,履行明确的成法的具体措施,十分迫切。"臣下我暗地感叹陛下在寿皇执政的二十八年中,哪有一项政务、一件国事不在陛下的心中盘旋呢?而问安视寝之后,审辨寿皇的言词,观察寿皇的神色,根据这件事而推得那件事,各种情况特别多,也已经得到寿皇治国的要领并付诸施行了,哪里只是一个月去拜见寿皇四次,把这作为京城中让人看来显得挺美好的举动呢?而圣明的策问又说:"执政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但治理没有取得进展,恩泽没有变得更广大,难道这是教化的实效没有宣明,号令的意图没有被人信服吗?"臣下我由此明白陛下谋求天下大治好像还没有达到的用心,就像天体运行永无止息一样。臣下我听说夏禹即位三年,百姓因夏禹的仁政而随顺他。推究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克俭克勤,不自满自大罢了。现在天时和顺,年年丰收,边境安定而不纷乱,也差不多是古人所说的小康社会了。陛下仍然察辨治理没有取得进展,恩泽没有变得更广大,并想要探求那教化的实际,号令的意图,原因就在于深深了解人的思想不容易端正,百姓的性命不容易一辈子保全啊!臣下我请求能为陛下讲诵为君之道和为师之道,来符合陛下谋求大治永无止息的心愿。

所谓教化要施行开的实效,那是不能用脸色、口舌来鼓动的,在仁义孝悌方面,能尽到君主的所谓为师之道就行得通了;所谓号令的意图,那是不能用权力来驱使的,在礼乐刑政方面,能尽到君主的所谓为君之道就行得通了。天下的学术不能彼此统一到一面旗帜下来,然而使道德一致和风俗相同,却正是《尚书·洪范》中所讲的"第五条为君主的最高准则"的事情。把最高准则称为"皇",并且"皇"居第五条,不是占据帝位的人就不能来建立起最高准则。用大公无私、极其正直的法则来审视天下与最高准则不相符合但还没陷入罪罚的行为,全都将它们整顿并统一起来,这难道是个人的小算盘和小智术吗?不偏激,不结党,不反复无常,来使天下人全都集中到最高准则的下面,然后才算罢休。我们孔老夫子开设四类教育科目,其中把德行

同辞令、政事、文化修养并列，目的是使天下具有长处的人都能得以自动进入到最高准则中来，但是德行又占首位，因为天下的学术本来就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

《周礼》中所说的儒者凭借道德而得民，师长凭借贤能而得民，也只是用作得民的两条途径而已。但如今二十年来，道德性命的学说一兴起，而文章、政事几乎彻底被废除。其理论既已偏颇，而有志向的读书人也曾经对这种学说感到很头疼了。十年之间，共同起来阻止贬抑它，但却没能遏制住它的偏颇，摒弃它的虚假，而天下的贤人先被罢官而不任用，旁观者也为贤人的遭遇发愤而向朝廷大声疾呼。这样一来，世人的思想从哪里会端正呢？臣下我希望陛下彰明为师之道去驾驭天下，对仁义孝悌交相发扬并显示它们，全部收罗起天下的人才，无论才高才低、才大才小，都使他们各自被得到任用，德行、辞令、政事和文化修养高的人，没有一方面被废弃，并且德行经常位居它们的前列，坦荡地与天下人共同沿着王道前进，那么圣明策问中所讲的情况："士大夫是风俗的倡导者，皇帝我用来劝导、勉励他们志气的东西，不能算不勤恳，但苟且懈惰的习气仍然没有彻底革除"，恐怕将会不值得陛下担忧了。假若用最高准则作为名义，却选取那些苟且懈惰的人并且任用他们，来暗中消蚀天下的贤人，那么风俗就会日益苟且懈怠，而天下的大事也就完了。

天下的人情，君主一个人不能全都掌握，但用爵禄赏罚等八种办法去驾驭臣民，这是《尚书·洪范》中所讲的"第六条为三种治理臣民的方法"的事情。强弱形势不同，而根据时机来松弛或紧缩，是君主独自控制臣民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有效方式。用珍美的食物不能谁都可以享用的威势，去察辨出擅自动用刑罚、施加赏赐而对王室和国家造成危害的那些人，并把他们全部逮捕起来，这哪里是作为臣下的人能够有权随便使用的呢？对柔弱的人就采取强硬手段，对刚强的人就采取柔和手段，这是用来表明刑法的适度和公平而已。我们孔老夫子出任鲁国司寇，百姓有违背孝道的，不忍心将他们处以刑罚，他的观点是认为教化没做好就不能用诛杀；而对少正卯七日就处死，因为他动摇民心，不能让他在世上停留一天。

《周礼》中的刑法,对平稳的国家就用中等程度的法典,这是因为不想自己随便就确定刑罚的轻重罢了。但如今二三十年以来,罪行达到死罪的,司法部门不追究他的犯罪情节却都依附法律来重新审断,常常大多数能够幸运地生存下来。这种做法已经偏向一边,而持公平之心的人也都不以为然了。近几年来,掌管刑法的官员又把多杀犯人作为能干,即使是能够让他存活下来的,也附会法律硬判死罪,而朝廷却有的认为公平而完全听从这样判,使复审的制度反而成全了一时间的个人乱判,但百姓的生命从何处能够得到保全呢?臣下我希望陛下使为君之道完美而去主宰天下,礼乐刑政一起推出并运用它们。凡天下各地上奏复审的案件,无论是冗长的案卷,还是细碎的事由,都让他们呈递给刑部、大理寺。其情节被怀疑为较轻的,批复下去,让他们按照宽大的刑法来处断,直到实在没有让罪犯存活的理由,然后处以死刑。全都根据案情来决断,不能由自己随意决定量刑的轻重。这样一来,圣明策问所说的情况:“审案定罪是关系到百姓性命的大事。皇帝我用来选择任用司法官员的举措不能算不谨慎,但断案冤枉失实的弊病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恐怕将会不值得陛下担忧了。假若凭借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想在一天内彻底去除掉断案冤枉失实的现象,须知人的私心本来就不能相信都没有,而我就绝对能保证不会产生私心吗?因此不如把案子交给有关部门,还有准绳可依。圣明的策问又说:“想来对人之常情习以为常就难以改变,对做表面文章都司空见惯就无所畏惧了吧?”臣下我以为君主用宽厚对待自身,就未曾用苛薄去对待天下人,怎么会有自身已经作出榜样,而天下却始终不能被感化的事呢?臣下我希望陛下彰明为师之道和为君之道,并首先做出表率然后才算作罢。这就是所说的教化的实效与号令的意图所在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说:“况且五帝时的社会,贤臣在朝廷上都很和睦,事情在民间也很协调,习俗确实是完美了,但说坏话和残暴的行为,同时也成为忧虑事。”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十分了解人心是不容易端正的。过去尧舜用为师之道来驾驭天下,如果是能够用来教育好人民的办法,没有不尽力使用的。但一

种说法不合正道而渗入人心的，就称做谗说；行为超出人心设想之外的，就称做殄行。人心本来就危险，一种说法又不合正道渗入人心，就受它影响了；行为又用超出人心设想之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对它依从屈服了。这就是所谓的让人震惊，并且是尧舜所担忧的事情。所以必须有名为纳言的官员，使君主的命令和人民的言论交替传达下去并反映上来，能够全都归于正道，而天下的学说也就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了。到了周朝衰落时期，天下各个学派争相崛起，纵情涌出，不能向对方甘拜下风，而过去所说的讲坏话和残暴的行为，一下子变成了言行不符、伪善欺世的老好人作派，务必让它慢慢渗入到人心中，自己就甘愿同世俗搅成一片。天下的学说既然不能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而那情势又互不服气，也就自行归从那老好人了。孔子和孟子十分害怕这种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是尧舜时代所曾有过的。希望陛下害怕老好人超过尧舜当年害怕说坏话和残暴的行为，那么人心端正的日子就不远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说："采用象征性的刑罚，使礼服的图案按等级各不相同，而人民都不犯法，刑罚已经放置不用了，但有所仗持而终不悔改，就予以严厉的处罚，必定对此要十分审慎。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十分清楚人民的性命不容易一辈子保全。正值尧舜用为君之道统治天下时，大禹平息洪水，后稷教民众播种农作物，民众本来已经高兴自己有了生计了，但这时皋陶又彰明刑法给百姓看，堵住那些陷入犯罪的道路，使人民能在契的教化、伯夷的礼制上优闲自得。天下人都知道大禹、伯夷、后稷、契的功绩，而皋陶那些深入人心的法律措施，暗中在起作用，却不能否定。后世统治天下的人，只有刑法这一桩政务而已，宽简的刑法胜过细密的刑法，温厚的刑法胜过严厉的刑法，这些功绩都能够称述一番，但皋陶无声却起重要作用的功绩，却已经被人抛弃了。

把鞭抽作为对官吏的刑罚，把用荆条抽打作为违背教化的刑罚，把罚款作为赎罪的刑罚，对无意过失造成危害的，可以宽恕，对有所仗持而终不悔改的，予以严厉的惩罚。官刑既作出那样的规定，教刑又作出这样的规定，情节轻的，用财物可以免罪，情节属于不是故意

犯罪的,通过法令可以免罪,凡是能够免罪的全都免罪了。那些所谓有所仗恃而终不改悔的人,属于根本不能免罪的人。这样一来,全天下应当受刑的能有几个人呢?后世的轻刑,没有能比得上尧舜时代的。希望陛下考察尧舜之所以轻刑的原因,那么百姓的性命就能够保全了。可是皇上的圣明策问又说:"是不是教育感化,训导戒勉,自有义旨呢?"臣下我反复为陛下讲说的道理在于:如果尽到为师之道,那么教育感化就包含在里面了;如果尽到为君之道,那么训导戒勉就不足谈论了。尧舜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难道能够出于大道之外吗?仁义孝悌和礼乐刑政,都是大道的具体表现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说:"现在想让身为士大夫的人纯洁地继承美好的品德,而趋向又全都归入正道;身为民众的人转向良善,远离罪恶,而诉讼归于平息。"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未曾用苛薄来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又有什么理由忍心把自己当成外族骚扰那样去做呢?但圣上的策问又说:"名称与实际相符合,是非不能够用虚假来做掩饰;私心被公理所征服,喜爱和憎恶不能掺杂进个人的感情。"这表明圣上的想法不免存有小小的猜疑了。但是天下的学说贵在纯正,天下的人情贵在平和,到最后原本未曾不归向忠厚啊!现在的忧患,正在于名和实、是与非没有辨明,公与私、喜爱与憎恶尚未分明,最严重的情况竟是发展到了君子、小人的区分还没有确定下来。商朝伊尹讲论说:"有言论对你的想法有所忤逆,必定要放在大道上来做衡量;有言论顺从了你的心意,必定要放在不合乎大道上来做衡量。"伊尹的说法差不多能成立了。但汉代的谷永,他的言论不曾不忤逆;唐代的李泌,他的言论不曾不恭顺。这表明人心哪里有固定的呢?孟子讲论说:国人都说某人贤能,必须察见到他的贤能,然后再任用他;国人都说某人可杀,必须察见到他的可杀之处再杀他。孟子的说法要比伊尹周密了,但高居人上的皇帝,从什么地方会得到国人的议论呢?

凡是现今在陛下面前进言的,谁不自以为是又自以为公呢?陛下也曾考察舆论所称赞的贤人并任用他了,但是人的天生器度有限,他的心地不能完全公平,也不能做到任何行动都没有私心。小人就借

此机会毫无顾忌地发表议论来显示公心，用竭力加以抵制来显示自己正直，陛下也不能不受到迷惑，就想两方面都容忍来表示公平。但香草与臭草绝对没有放在一个容器里的道理，名和实、是与非正一天比一天混淆，而公私爱恶却不知归向哪里，又怎能指望风俗端正而刑罚清平呢？陛下看见那个人很贤能就任用他，他的举动稍有偏差，让他不要再这样做也就算了。君臣本当相互和睦，如同一个人，何至于有放肆进谗言的人来使陛下的内心对那个贤人产生恐惧，并对进用他还是贬退他犹豫不定呢？陛下如果能辨明名实是非的恰切结论和公私爱恶归向的地方，那么治乱安危就在这里区分开来了，而天下的大计也差不多确定下来了，风俗原本上不用期待就变得端正了，刑罚原本上不用期待就变得清平了。纯洁地继承美德，转向善良，远离罪恶，只是小事罢了。但皇上的圣明策问又说："节俭正直的义旨在百官中兴行，断案中哀怜实查的恩惠普遍施布到四方，果真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其实那关键就在于辨明名实是非的恰切结论和公私爱恶归向的地方。那原则就是用宽厚对待自身，而未曾用刻薄来对待天下人而已。

陛下每三年就策问一次众多的读书人，自然就像是沿用过去的惯例，自然就像是走走形式。民间读书人也用惯例看待它，也用走过场应付它。过了这一关，那么以后高爵厚禄，陛下就不能够吝惜它们了。陛下谋求策问选士的名声，民间读书人却获得到实际的好处，这难道是国家该大力施行的吗？端正人心来建立国家的根基，让人民正常生存，来使国家命脉长久，这是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陛下拿这大事来策问读书人，已经不轻视它了，但在策问的最后又对臣下我等人说："你们这些士大夫等待朝廷询问已经很久了，全都来到了殿廷上，你们为皇帝我考察古今的适宜做法，推求治理教化的本源，凡是能够使风俗统一，使刑罚清明，形成太平和美的功效的，都用尽心思，逐条陈述上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一定要使人心端正，使人民的性命得以保全，来尽到为师之道和为君之道，并使自己达到二帝三王那样的治绩才算终止。然而臣下我可算个什么人呢？哪里足够用来

承奉殿廷上的重大询问呢？不过臣下我私下看到陛下用宽厚对待自身，而未曾用刻薄来对待天下人，已经得到了使人心端正、使人民性命保全的根本办法了，却仍然想让臣下我考察古今的合适做法，推求治理教化的本源。其实用宽厚对待自身，哪里有尽头呢？让天下没有一个人对此有疑虑就行了。

陛下的圣孝，即使是曾子、闵子骞也比不过。但对寿皇早晚问安探视，也因政事会出现小有不周的地方，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陛下的孝心了。陛下从即日起便如往常一样，而怀疑的人也就没白期望陛下永远用宽厚来对待自身啊！陛下的英明果断来自天授，对左右不给脸色看，但废除、设置、授予、剥夺偶有不恰当的地方，那么人心就有理由怀疑陛下的英明果断了。陛下始终没有按私意对谁做出处置的举动，而怀疑的人也就没白期望陛下永远用宽厚来对待自身啊！《易经》上所讲的："云在天上，构成《需卦》，是等待降雨，君子用饮食安乐来等待时机。"而《需卦》倒数第五阳爻的爻辞所说的对饮食的需求，是等待时机好大有作为，正应当在这上面来等待啊！难道凭借陛下的圣明，却对饮食安乐很感兴趣吗？但人心不能没有疑问啊！《易经》上所讲的："日月的光明两次升起，构成《离卦》。大人用前后相继的光明，照耀四方。"而《离卦》倒数第五阴爻的爻辞所说的："泪流滂沱，忧戚嗟叹。"日月相照，扪心自问，若有所失，而不敢用这搅乱礼法啊！难道凭借陛下的英明勇武，却对此而愁眉不展吗？但人心不能没有疑问啊！臣下我希望陛下圣孝一日胜过一日，英明果断一事超过一事，在安乐中奋扬起精明，在谦虚自抑之际树立起志向，使天下没有一个人有猜疑，到最后陛下替寿皇承接起志向和事业。那么古今的合适做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治理教化的本源，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使风俗相同来端正人心，使刑罚清明来保全百姓的性命，显著的成效和极大的效验，能够成为万世永不废弃的法则，根本就落在用宽厚对待自身罢了。《诗经》上不是说："皇天的意旨，深远得永无止境。文王的仁德，是那样的纯正！"而子思也说："纯一不杂，没有间断。"用宽厚来对待自身，哪里有尽头呢！臣下我冒昧地犯下死罪，恭谨地呈上愚昧的对答。〔陈明洁译〕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己未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嗣承丕绪，六年于兹。兢业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图乂，其效悠缅。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矫厉多事者，未免于失。汉文未遑用贾生之策，武帝则谩唐虞之嘉。一乃兴于礼义，几至刑措；一乃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此其证也。朕以凉菲，凛凛乎兆民之上，其敢媲踪五三？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不卑汉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

百执事盖已略备，时下之令而谋一帅、择一部使者，戛乎每难其人。岂世徒尚于美观而未究实用欤？国家之经制有常，朕之自处，罔或不约，而内焉省计，外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给。岂财货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欤？考课之制，戒饬之诏，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简，皆自丰贿财，有愧乎吏称其职。盐税之蠲，逋赋之除，前后相望，而岁虽丰登，民尚愁叹，有愧乎民安其业。官益猥冗，而人仕之源未澄，率数人而同一缺，使贤愚同滞。兵虽蒐择而将佐莫之拊循，第闻有掊克苛役，使军政未修。况欲教化之行，习俗之美，不赏而劝，不罚而惩，动容貌，出词气，天下向风而化，如《诗》、《书》所载隆古盛时，其可得乎？朕未尝不当宁慨叹，斯一新弊蠹，深惟矫厉多事之过，抑何修而前六者各得其理？

自昔抗议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殆类石田，将孰与耕？有侔画饼，莫济于食。或矜于为异，惑一时之见闻；或阴寓其私，规他日之进用。朕固不取，亦岂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于庭，其详著于篇，俾无多事之蹈而日臻于盛。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继承递相传续的帝王大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一直都兢兢业业，自我克制，不敢安逸享乐，每天从早到晚谋求治理，可效果却离得那样遥远。曾经考察古代的圣帝明

王治理天下，不做人为的筹措，一切随顺自然状态，没有不取得成功的。而偏激并喜好人为筹措的人，不免出现失误。汉文帝没有来得及采用贾谊的建议，可汉武帝却看不上唐尧虞舜的治绩。结果前者在礼乐道义上兴起，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地步；后者竟然是天下虚空消耗，户口减少了一半。这就是证明啊！皇帝我凭借微薄的德行，高居在亿万百姓之上，哪里敢追比五帝三王？但暗中观察朝廷的文武百官，没有谁不高谈尧舜的重臣后稷和商契，再往后就瞧不起汉朝和唐朝。可是现今的弊病，也不止一个方面了。

朝廷各部门的官员大致上已经基本齐备，可随时下达命令打算任命一位将帅，选择一位地方重要长官，常常一下子就卡住，很难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这恐怕是世上只在表面好看上一味做追求，却没探究实际用场吧？国家的财政收支具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皇帝我自身的用度，也没有不注意节省的，可在朝廷上的财政主管部门，在地方上各郡县，总是心里敲小鼓，常常忧虑不够用。这是对钱币和物资的来源与去向，还不明白它们的运作次序吧？考核督促的制度，警戒整顿的诏令，深刻严切，非常明确，但地方官吏施行治理的方法却怎么省事省力就怎么来，全都自己为自己更多地捞取贿赂得来的财物，有愧官吏胜任自己职务的要求。盐税的免除，拖欠的国家赋税的勾销，一个接一个地施行，可年景尽管大丰收，老百姓还是愁苦叹息，有愧让民众安心本业的准则。官吏越来越猥杂冗滥，进入仕途的源头没有得到澄清，大都是好几个人才有一个官缺，致使贤能的人竟和愚蠢的人一起不能提升。兵士尽管经过演练挑选，但将领却不加以抚慰，光听说存在着克扣军饷以及严苛役使的情况，致使军政得不到修明。何况朝廷还打算教育感化推行开，社会习俗很美好，不赏赐也自动勉励，不惩罚也自动引以为戒，帝王一动脸色，一发话音，全天下就迅速响应，普遍归服，像《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古代隆盛时期那个样，哪里会实现得了呢？皇帝我未尝不在接受朝拜时而慨叹，渴望把这些弊端全部去除掉，深深思索偏激而喜好人为筹措所会带来的过失，又该修明什么而使以上所列举的六个方面的政务各自得到各自的治理呢？

从前直接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僚，呈奏章疏的人士，文采很繁富，议论却不切实际。类似那石头太多的田地，还想谁来一起耕种呢？又同在地上画饼一样，对吃饭没有什么帮助。有的人在故意标新立异上很自负，来迷惑世上的一时间的视听；有的人暗中包藏着个人的目的，图谋日后的进用。皇帝我压根就不采用，这哪里又算得上是公允的言论呢？如今开始延揽天下的杰出人才，在殿廷进行策问，要把个人看法详尽地在答卷上写明，使重蹈人为筹措的覆辙不复存在，一天比一天达到兴盛。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魏了翁　廷对策

魏了翁（1178～1237）　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第三，时年22岁。历仕宁宗、理宗两朝，官为权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江淮督府等。在朝敢论事，多切中时弊。在地方任内，关心民间疾苦，致力于修武备，兴学校。曾居白鹤山授徒讲学。有《鹤山集》等著作传世。

臣对：臣恭惟国朝以忠厚为治，以好生为心，以和平养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气。熙丰大臣之变法，邻于骤；元祐诸君子起而救之，疑于激。惟我仁祖皇帝，培养根本，扶植政道，治体浑大，汪汪乎有唐虞、成周泰和之风，诚足以为万世法。陛下习祖宗之余休，膺上皇之重寄，诚能持平守正，以兴天下，辑安靖和平之福，而不凿吾祖宗浑厚之治体，则陛下所以策臣数条，如荐举之尚难其人，财货之未知其序，吏未称其职，民未安其业，贤愚同滞，军政未修，皆上廑陛下之宵旰者，臣愿以仁祖为法则，六者之弊，臣当熟数之于前，惟陛下裁幸。

臣伏读圣策曰："朕嗣承丕绪，六年于兹。兢业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图乂，其效悠缅。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矫厉多事者，未免于失。"臣有以见陛下叹六年治效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为出治之龟鉴也。陛下夤畏天威，遵守祖武，勤恤民隐，贬玉食之

奉，服浣濯之衣，屏声色之娱，天资固已超绝，而且阅大臣章奏，或至日晏，御内殿讲筵，不问双只日，孜孜求理，尚惧阙失。是以比年以来，亲享而霁景舒，日蚀而云雾散，先春而瑞雪应，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边尘不惊，狱讼希省，盗贼屏息，此天之所以顺陛下也。陛下兢业自持，臻兹六年，其大体固已素定。今临轩策士之始，询臣等于庭，乃谓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矫厉者失，则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体矣。而独有言宵旰图乂，其效悠缅，陛下责效于六年，则切矣，臣犹未敢以圣问为然也。

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则亡具甚矣。天圣之五年，即仁宗之六年也。是岁范仲淹上书执政，历言时事，其略曰：今朝廷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曹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使好功喜名之君临攻，发愤者六年，而治效悠久之若此，则必锐意勇为，以激天下于多事之场。惟我仁宗一切为根本虑，财以不聚为富，兵以不用为功，刑以不杀为威，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庆历之治，迄今有光。陛下无谓六年之久而治效悠缅，诚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广大作人才，则安靖自然，靡不有成，当不虚陛下所以考古之意，而矫厉多事之失，非所忧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

臣伏读圣策曰："汉文未遑用贾生之策，武帝则谩唐虞之嘉。一乃兴于礼义，几至刑措；一乃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此其证也。朕以凉菲，凛凛乎兆民之上，其敢媲踪五三？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见陛下酌汉文、武之得失，以为鉴戒，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谈危论，而不切于时政之弊也。然尝观今日之治，以言乎荐贤，则人才未甚辈出如汉文，而数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财，则用度节约如汉文，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无可纪之绩如汉文，而击断于州县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民，则除租减税如孝文，而外施仁义不如武帝之矫；以言乎张官置吏，选将练兵，大抵有汉文之宽厚，而无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终而观，则宽厚者有余味，而激烈者无成谋。

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绝望媲踪三五者，以是数者之政，未能根厉奋

发,以新斯人之耳目。而卿大夫所以高谈危论者,亦必厌满于此也。然今日之治虽小缓,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为陛下献。臣之所以拳拳于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时事势浸流于弛。请总权纲,时则有若宋绶;请揽威权,时则有若余靖;请立威福,时则有若孙甫;请出号令,时则有若苏伸。谓政令姑息者,张方平也;谓威柄渐移者,宋祁也;谓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谓天下之势近于弱者,苏洵也。而我仁宗曷尝以治具之未张,而绝意于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谈远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术欤?陛下诚能涵养治体,以取法仁宗,则陛下六条之问,臣当件举而对,而陛下详择其中。若陛下方以治效悠缅为忧,而亟欲大有所作为,则臣虽言之,无益也。

圣策曰:"百执事盖已略备,时下之令而谋一帅、择一部使者,戛乎每难其人。岂世徒尚于美观而未究实用欤?"臣有以见陛下患荐举之未得实才也。然今日荐贤之法弊矣。异时士大夫介洁不苟求,今不见举也;异时举官不妄荐人,今未能矣。牓章旁午,率多具文,类曰某人可备监司,而不明夫州县之尝有劳绩;某人堪充将帅,而不明夫谋略之尝有显效。某人可举廉吏,某人可备著述,某人善治狱讼,某人善治财赋,而不列其可纪之绩。下泛然而举之,上亦泛然而用之。上下俱以虚文不实相尚,宜乎谋一帅、择一部使而尚难其人也。

往年陛下论议臣之谋,凡宰执、台谏、侍从不许亲戚子弟交荐。日者议臣有请自今科目荐延者,各因其长,明著实迹;苟不如举,即坐以妄谬之罚。陛下欣然嘉纳。圣意一形,举官当无谬举,而实才当为时辈出矣。然持循至于今 ,而荐举不实之弊自若者,何也?未闻陛下罪一举官之不实,而赏一举官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赏罚之信必也。昔我仁宗尝诏:举官自今已改迁而贪污者,许原举官以实状闻;其不实者,置之罪。臣愿陛下考仁祖之遗意,诏中外大臣,自今举三人皆实者,特与拔擢;俱不如举,则举官责降;已举而易所守者,举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败,则以其罪罪举主。迟之三年,而谋一帅、择一部使尚难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

圣策曰:"国家之经制有常,朕之自处,罔或不约,而内焉省计,外

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给。岂财货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欤?"臣有以见陛下虑理财之不得其序也。财非天雨鬼输，必责之民。今自两税而外，凡军兴之一切权宜者，皆人于经赋；且茶盐酒铁之所立，古人不敢尽利以遗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栝无余。国家虽号承平，然犹有经费之不可缺者：郊庙之费，百官之费，军储之费，备荒之费，岁赂之费，缺一不可。使藏之州县，藏之府库，某色可以供某数，某数可以备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财货可以得其序。而今也有所谓备拨，有所谓登承，有所谓填补，有所谓充措，移易文历，变乱色额，有司者将亦病之。

往年议臣患州郡财物之虚数，应郡守替移，取委本路漕司具实在之数以闻。其后又欲于监司、郡守放罢及官祠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勾定见在财物之数，具申朝省。其堤防不可谓不密矣，然以处升平则可。往年五谷不登，而诸路常平司支发不给，不知欲建规恢等议，国胡以馈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先朝与天圣中赋人若干，官若干，及今赋人之数与兵数、官数，约取中道，立为经制，以十分为率，七分为养兵及官省之费，以三分备水旱非常，迟之十年，始可以言。上从之。臣愿陛下规仿此制，明诏三司大臣及诸道计臣，自今量入为出，不得更相为用，以紊经常之目，庶使盈虚可考，而缓急不至无备。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

圣策曰："考课之制，戒饬之诏，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简，皆自丰贿财，有愧乎吏称其职。"臣有以见陛下之望吏治为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与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贤太守，则十万户受其福；得一贤令尹，则万家之县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贪豪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诞以废事者，总总也。应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矫为公廉之迹，以要虚誉。一年之后，本心稍见：淹延狱讼，移易府藏，扰乱文历，互送之费，公帑之费，送迎之费，则视为当得。至有合解诸处纲运，则占护而不解；支应于诸军请给，则积压而不支。县蘄之州，州又蘄之监司，动以缺乏借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

日者献议之官，谓监司郡守送迎不得过数，吏籍不得额外收补，监司、通判行部不得骚扰。又尝有谓欲宽远郡之忧，莫若重守臣之

选；欲校臧否之实，莫若重监司之罚，莫非所以责吏治之实。陛下悉俞其请。陛下责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人亲见而后任之哉？今之监司，宜总诸道之守令而进退之也。陛下于一道止得一二贤监司，则人人知所警惧矣。今守令不必择，而监司不可不择。侧闻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条上时事，请以次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使惩汰所部吏，令两府通选转运，即委诸路自择知州。况日者廷臣有请今后监司遇有缺者，乞专用在廷之臣。愿陛下自今亲择贤监司，分部诸道，若内若外，必待陛下辞而后行。当行之日，陛下亲御殿，假辞色以谕之曰：一道之吏，实汝之托。吏有政绩者，其具名以闻；而阘冗酷虐者，亦仰觉察，重加典宪。汝将匿不言，异时下转上闻，汝将有显戮。彼知上意勤恳，则贤监司之下，不容有滥员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

圣策曰："盐税之蠲，逋赋之除，前后相望，而岁虽丰登，民尚愁叹，有愧乎民安其业。"臣有以见陛下念民力为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往年江、淮、湖、浙、四川等处所申灾伤，数目轻重各有差，今秋成又未可预计。假令岁果大熟，则亦仅可支一年之须而无赢，而况国家之征赋，夏输绢，冬输绌，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钱有两料之数，而额外之科敛不与。是以年来为产户者，小则易田以避追扰，甚则竭产而供转输。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责之户部，户部责之监司，监司责之郡守，郡守责之县令，期限迫于星火，文移惨于戈戟。大书长牒，遽然而至，则系逮案胥，凌辱长吏。且如朝廷严税绢捐纳之数足而后施行者，其患皆起于期会之不容缓也。使州县府库有以为应手之备，则犹可以纾目前之忧。而今也扶东而西倾，捉襟而肘见，一额之输，仅可以应本额之期限。财非出于官而使不责之税，产户不责之四五等，得乎？

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请，纂集宽恤诏条，颁行郡国，虑长吏奉行不虔，则令监司劾奏。臣观圣虑非不恳恻，然使州县之财未裕，则长吏虽称有爱民之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东饥，出内藏绢代上供；以淮南饥，出内藏绢代民输。下京西籴军储，则出内库钱；下河北市粮草，则出内藏绢。夫仁宗不惟不责之州县，而反取之内库，盖谓

迅州县之期会,适所以重斯民之凋瘵也。今欲民生之安其业,先自裕州县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

圣策曰:"官益猥冗,而人仕之源未澄,率数人而同一缺,使贤愚同滞。"臣有以见陛下欲清人仕之路而使贤不肖有别也。国家有三岁进士之外,由特科进者多昏耄,补进者多骄佚,由杂进者多舞文,由荫爵进者多贪污。人仕之路虽狭,特三岁一用郊,三岁一取士,名之登于吏部者,为员可胜计哉!故有一缺则替者一人,任者一人,待之者一二人。虽曰速仕者至于营近次,仰禄者志于得厚禄,而自便者志于得清安。然自京秩而上,犹未至太冗,而未脱选调者,至于员多而无缺可取。是以忧国之臣,虽屡求所以汰冗之术,然多畏于所拂而不行。

昔我仁宗朝,大臣议省冗官,是知立法自贵近,则人无怨,请自嫔御、宗室、两府大臣及诸司带职员内外臣之家,裁减补荫,则十年当见成功。今世赏之数虽烦,然减任子,废恩赦,昔人常难之。议者又欲裁奏荫之法,严铨选之数,则又恐非祖宗忠厚之意。今欲裁省冗滥,而仕者仍无所拂,莫若开张诠试之期,二年一铨,不惟俾之涵养气质,学而后从政,而吏员多猥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

圣策曰:"兵虽蒐择,而将佐莫之拊循,第闻有掊克苛役,使军政未修。"臣有以见陛下欲革将佐之苛,使军政修举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卫,江淮之列屯,诸道之禁军,阶级欲其严,号令欲其明,军势不可谓不张。比年以来,缮治沿边之城壁,制造御前之军器,命臣寮以检视战舰之弊,诏诸将以讲求马政之利,则武备不可谓不讲。江上诸军军器数目,则委官检阅,沿边州县土兵弓手,则议行招填,则蒐练不可谓不至。今日军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为之将者,裁简犒赏,积压请给;而为之兵者,傲睨邀赏,骄悍难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则临事难以共患难。

昔我仁祖经略西夏,是时升平日久,兵逾百万,范仲淹虑其骄悍,条上边政,大略以和靖军情为先。臣愿陛下诏诸道将帅,自今赏罚欲其信必,毋掊克,伤士情,则军政不修之患,非所忧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

圣策曰:"况欲教化之行,习俗之美,不赏而劝,不罚而惩,动容

貌，出词气，天下向风而化，如《诗》、书》所载隆古盛时，其可得乎？朕未尝不当宁慨叹，斯一新弊蠹，深惟矫厉多事之过，抑何修而前六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弊蠹，陛下责治则太锐矣。然尝恭闻哲宗皇帝朝，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则可至天德矣。夫《诗》、《书》所载隆古盛时，其教化习俗固非后世之所可及，然我仁祖之治，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则所谓隆古盛时亦何以异此？何陛下近舍家法而乃取法于太古久远之事哉！

虬虽贱臣，恭闻嘉惠圣问之所及，臣既竭愚忠，冒犯忌讳，件别于前矣。陛下于其终复策臣曰：“自昔抗议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殆类石田，将孰与耕？有侔画饼，莫济于食。或矜于为异，惑一时之见闻；或阴寓其私，规他日之进用。朕固不取，亦岂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于庭，其详著于篇，俾无多事之蹈而日臻于盛。朕将亲览焉。”陛下之问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请复以取法仁祖为陛下终其说。

国朝自艺祖以至仁祖，积四世而治体成；自乘舆驻跸东吴，至陛下又四世，涵养根本，作成人才，以凝治体于不变，以为我宋筑亿万年无穷之基，则在陛下当无以辞其责。然尝观仁祖之治体，所以汪洋洪大而与唐虞、成周比隆者，虽自仁祖持平守正以扶植治本，而亦一时元老大臣中正广大而维持公道于上也。庆历盛时，杜、富、韩、范相与主持公道于上，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列居言路，相与维持正论，以固治本。天章阁所条陈时事，富、范诸人身言之而身行之，初岂矜于为异，惑一时之见闻，如陛下之所忧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国，愿与俱贬者相继，初岂阴寓其私，规他日之进用，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今日涵养治体，作成人才，以无愧于我仁宗之盛，其责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荐进实才，以无愧庆历之大臣，其责在人臣。愿陛下与左右大臣深思熟计，思祖宗之艰难，念上皇之付托，为千万世子孙治体虑，一切以中正广大行之，实宗庙幸甚。臣无任惓惓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恭敬地想来，我大宋皇朝用忠诚厚道治国，

把爱护生灵作为心念,依靠协和平静来积蓄天下的福禄,凭借忠诚正直来振作起读书人的气节。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大臣们的变法,近于操之过急;哲宗皇帝元祐间以司马光为首的诸多君子奋起挽救,似乎又过于偏激。只有我们的仁宗皇帝,培植养护国家的根本,扶持正确的施政方略,治国的纲领浑厚宏大,广远地具有唐虞和成周时代那样太平和乐的气象,实在能够成为万世的楷模。陛下熟悉列祖列宗的美好作为,蒙受太上皇的重托,确实能够保持不偏不倚和正直公道,去使天下兴起,聚积起安静平定的福禄,但不损害我朝祖宗们的浑厚宏大的治国纲要。既然如此,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的几个问题,诸如当今荐举仍难以获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的财政还不明了它的运作次序,官吏们还不能同自己的职位相称,百姓还未能安居乐业,贤才与愚蠢人混杂在一起而不能进用,军事政务尚未得到修明,致使陛下天未明就起床,夜半方进食而日夜牵挂并勤勉处置的事情,臣下我愿意拿仁宗皇帝作为效法的榜样,仔细地为陛下分析这六者的弊端,希望陛下裁定,这将是臣下我的荣幸。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递相传续的帝王大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一直都兢兢业业,自我克制,不敢安逸享乐,每天从早到晚谋求治理,可效果却离得那样遥远。曾经考察古代的圣帝明王治理天下,不做人为的筹措,一切随顺自然状态,没有不获得成功的。那些偏激而喜好人为筹措的人,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是在慨叹在位六年,治国的效验不明显,因而寻求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把它作为拿出治理措施的借鉴啊!陛下敬畏上天的威势,遵守祖宗的行迹,十分体恤百姓的疾苦,减少珍美食品的供奉,穿用洗涤过的服装,摒弃歌舞女色的娱乐,天性资质原本已经超凡绝伦,而且审阅大臣们的表章奏疏,有时直到太阳快落山;亲临内殿的经史讲席,不管双日单日,只是孜孜不倦地去谋求天下大治,仍然担心有所缺失。所以近年以来,亲自祭祀而淫雨停止,风和日丽,日蚀也没产生什么危害,春天还没有到来就天降瑞雪兆丰年,这些都是上天用来帮助陛下的好兆应。边境兵事不起,诉讼案件稀少,盗贼屏声匿迹,这些都是上天用来回应陛下的表现。

陛下兢兢业业，自我克制，至今已经有六年了，治国的纲领本已早就确定好。现在亲自策试士子，在殿廷上询问臣下我等人，一上来就说古代的圣帝明王治理天下，不做人为筹措的就大功告成，偏激妄动的就出现失误，这表明陛下已经明白不做人为的筹措就能够形成治国的纲领了，但又偏偏说每天从早到晚谋求治理，效果却离得那样遥远。陛下在位六年就要求治国有显著的成效，那就显得太迫切了，臣下我还不敢认为皇上的圣明策问肯定就是正确的。

我朝仁宗皇帝治国四十二年，成效是那样地盛大，现在拿他即位到第六个年头上的情形来作考察，当时没有具体措施还特严重呢！天圣五年，正是仁宗皇帝在位的第六年。这年范仲淹上书给执政的宰相，一一评说国家大事，内容大致上说：现在朝廷没有忧虑了，天下太平很久了，军队很久不动用了，士大夫不进行训导了，朝廷内外正在奢侈无度，百姓反而更加贫困穷苦了。假如是喜欢追逐功绩和名声的皇帝执政，努力发愤治国已经六年了，但治理的效验却离得如此遥远，就必定会更加坚定决心，勇于作为，从而把天下卷入多生事端的境地。只有我们的仁宗皇帝，一切为国家的根本考虑，财政上把不聚敛作为富有，军事上把不用兵当作功业，刑罚上把不斩杀人当作威严，人才上把那些不要弄小聪明的人作为贤人。庆历年间的治绩，到现在仍有光辉照耀史册。陛下不要认为六年的时间很久而治理的成效不显著，果真能用忠诚厚道、协和平静去培植国家的根基，用不偏不倚、宽广博大去培养人才，那就会不做人为的筹措，一切随顺自然状态，没有不获得成功的，肯定不会使陛下用来考察古代的一片心意落空的。而那些偏激妄动、多生事端的失误，也不会成为陛下的忧患。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去加以施行。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说："汉文帝没有来得及采用贾谊的建议，汉武帝却看不上尧舜时代的治绩。结果前者在礼乐道义上兴起，几乎达到了刑罚废弃不用的地步；后者竟然是天下虚空耗尽，户口减少了一半。这就是证明啊！皇帝我凭借微薄的德行，高居在亿万百姓之上，哪里敢追比五帝三王？但暗中观察朝廷上的文武百官，无不高谈尧舜的重臣后稷和商契，再往后就瞧不起汉唐。但现今

的弊端,也实在太多了。”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斟酌汉文帝、汉武帝的得失,作为治国的鉴戒,并担忧朝廷百官的高谈阔论,却与时政的弊病毫不相干啊!然而曾经观察现今的政治,就荐举贤才而言,人才还没有像汉文帝时那样辈出,而我大宋各路辖区获取到合适的长官人选还不如汉武帝时众多;就理财方面而言,花费上注意节约很像汉文帝,但辨别分析细微处还不如汉武帝时精明;就吏治方面而言,没有什么可载入史册的业绩像汉文帝,但在州县打击地方豪强和审察疑案上还不如汉武帝时明察;就使百姓富裕方面而言,免租减税像汉文帝,但在施行仁义给百姓亲眼瞧上不如汉武帝出色;就设置官吏、选择将领、训练士兵而言,基本上有汉文帝的宽大仁厚,却没有汉武帝的急切猛烈。但针对他们的结局来看,宽厚的帝王还是有令人回味不尽的地方,急切猛烈的帝王却没有成熟的谋略。

臣下我深深感到陛下断绝比配五帝三王的念头的原因,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政事,没能从根本上激励奋扬起来,致使当代人耳目一新。而官僚大夫们高谈阔论的原因,也一定是对此感到满足了。但现在的治效虽然稍微慢了些,总之还是不能过于急切。汉文帝、汉武帝的得失,臣下我不敢用来给陛下献呈。臣下我对陛下深报希望的是,我朝自有我朝的家法罢了。仁宗皇帝在位时,当时国事渐趋废弛,当时请仁宗皇帝总揽朝政大权的有宋绶,请仁宗皇帝独揽威势的有余靖,请仁宗皇帝树立起刑罚和奖赏权威的有孙甫,请仁宗皇帝发号施令的有苏伸。认为政令无原则姑息迁就的是张方平,认为天子权柄渐渐转移到他人手中的是宋祁,认为当朝在十方面事务上赶不上先朝的是富弼,认为国家的力量渐趋衰弱的是苏洵。但我们的仁宗皇帝何曾因为治国的措施尚未推行开,却对五帝三王的太平之治断绝念头呢?因为官僚大夫们的高谈远古就急切地寻找能改变目前状况的办法呢?陛下果真能体会治国的纲要来效法仁宗皇帝,那么陛下关于当前六种弊政的策问,臣下我会逐项做出对答,由陛下详加选择其中最合适的地方。如果陛下正把治效缓慢作为忧虑,并急切地想要大有作为,那么臣下我即使说了,也毫无益处。

皇上圣明的策问说:“朝廷各部门的官员已基本具备,但随时下

达命令打算任命一位将帅,选择一位地方重要长官,常常一下子就卡住,很难物色到合适的人选。这恐怕是世上只在表面好看上一味做追求,却没探究实际用场吧?”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担心荐举还没有得到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但现在荐举贤才的办法是毛病太大了。过去读书人耿介廉洁,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取利禄,可现在这样的人却得不到荐举;过去荐举人才的官吏不胡乱荐举人才,现在却做不到了。文书章奏纷繁,大多是一纸空文,几乎全是说:某人能充任路一级的地方长官,却不明确写出该人在任州县官时是否有劳绩;某人可担任将帅,却不明确写出该人的谋略是否取得过显著战绩。某人可以被推举为廉吏,某人可以充任著述官职,某人善于审理案件,某人善于掌管财政赋税,却不列出他们值得记录的业绩。下面泛泛而荐举,上面也泛泛而任用,上上下下都崇尚空文,不务实际,因而临时谋求一个将帅,选择一个地方重要长官,难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实在是势所必至的。

往年陛下裁定执掌规谏讽议的官员们提出的建议,凡是宰相、御史台、谏院官、侍从官,不允许他们相互举荐对方的亲戚子弟。近来议论政事的臣僚有人提出请从现在起,对凭各种科目而被推举上来的人,各自根据他们的特长,明确地验核出他们的实际事迹;如果事迹不像荐举人所荐举的那样,就用妄谬的罪名处罚荐举人。陛下对此表示赞许并采纳。圣上的心意一表明,负责荐举的官吏就会没有错误的荐举,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会层出不穷了。但照此规定执行至今,胡乱荐举的弊端依然如故,原因又在哪里呢?因为还一直没有听说陛下惩罚过一个胡乱荐举的官员,也没有奖赏过一个荐举真使朝廷获得人才的官员,以此来向天下表明自己赏罚分明。过去,我们的仁宗皇帝曾下诏令说:凡是经荐举上来的官员,从现在起已经改任他官但有贪污行为的,允许原先推举他的官员把实情奏闻;凡不以实情奏闻的,处以相应的罪罚。臣下我希望陛下考察仁宗传下的深意,向朝廷内外大臣颁布诏令:从现在起,荐举三个人都属于名副其实的,将特别给予提拔升迁;荐举都不名不副实的,那么荐举的官员将被斥责降职;已受荐举却改变操守的,荐举者却隐瞒这个人的罪行

不禀报，以后这个人因犯法而败露的，就用他所犯的罪名处罚荐举者。照此施行，最晚三年，临时谋求一位将帅，挑选一名路级地方长官仍感到难以获得合适的人选的事，就不会有了。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国家的财政收支具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皇帝我自身的用度，也没有不注意节俭的，但朝廷上的财政主管部门，地方上各郡县，总是心里敲小鼓，常常忧虑不够用。这恐怕是对钱币和物资的来源与去向，还不明白它们的运作次序吧？"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在担忧财政收入还没找到它的运作次序呀！钱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鬼神送来的，一切都必须从百姓那里索取。现今除夏税、秋税之外，所有为满足军用而因时因地临时征集的东西，都被列为正式的赋税。况且茶、盐、酒和铁器税的设立，是古人不敢把这方面的财利都刮尽而不给百姓留一点儿的。可现在从一个小钱以上，都彻底搜刮上来，一点儿也不剩。国家虽然号称太平无事，但仍有不可缺少的财政支出费用，像祀天祭祖的费用，百官俸禄的费用，军用储备的费用，预防灾荒的费用，每年给异族政权进贡的费用，哪一项都不能缺。假如把财富储藏在州县，储藏在国库，某类钱物可以够某种数额，某种数额可以作某项用途，官署间互不侵扰挪用，财物钱币就能够实现正常的运作次序了。但现在却有所谓的备拨款项，有所谓的登承款项，有所谓的填补款项，有所有谓的充措款项，致使改变文书帐簿，变换扰乱类别和数额，主管部门对此也感到很头疼。

往年议论政事的臣僚担心州郡所藏财物的数字虚假，在郡守调任交接时，就要派本路转运司验清实在的数字而上报。后来又想在路级主要长官或郡守放归、罢免以及充任官观祠庙的官员，等到朝廷正式文书传到的时候，即令同官验定和注销现今的财物数目，具体备文上报给朝廷主管部门。提防不可谓不严密，但这种办法用在太平的岁月才会行得通。往年出现歉收或饥荒，而各路提举常平司调拨救济粮食都数量不够，真不知道那些想要建立起宏大规制的动议，国家能用什么来保证供应呢？过去仁宗朝时，大臣提议，想让三司使详

细计算出先朝和天圣年间赋税收入的多少，官员人数的多少，以及现在赋税收入的数目和兵员数目、官员人数，大致取个中间数，定为制度。以十等分为标准，用十分之七来养兵及给官员、衙门发俸禄，做经费，用十分之三来防备水旱等灾害。最迟十年，才可以说步入正轨。仁宗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臣下我希望陛下认真仿照这一制度，明确下诏给三司大臣及各道理财官员，从今以后，量入为出，不准相互挪用，紊乱固定的财政收支项目。这样做，大体能使盈亏可以验核出来，而遇到紧急事情，不至于毫无准备。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按标准对官吏功过善恶进行考核的制度，警告与训诫的诏令，深切而明确，但地方官吏施行治理的方法却怎么省事省力就怎么来，全都自己为自己更多地捞取贿赂得来的财物，有愧官吏胜任自己职务的要求。"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对地方官吏处理好政务的期望是十分殷切的。但今天的天下，是陛下和各地郡守县令共同治理的。得到一个贤良的太守，那么十万户百姓就会蒙受到他带来的福份；得到一个贤良的县令，那么万家百姓就会得他带来的好处。但蒙受到这种福份，得到这种好处的百姓，一百户中也没有一二家。而贪财受贿去私意歪曲法律，用苛刻严酷来虐害百姓，虚诞狂妄而荒废政事的人，却很多很多。这是因为太守县令刚得到官职时，大多假装出公正廉洁的样子，来博取虚假的声誉。一年后，本性就逐渐显露出来：拖延审理案件，转移更换府库财物，扰乱文书帐簿，对官员间互相馈赠的费用，下去办公事的费用，送往迎来的费用，都看作是理所应当的收入。等有应当解送各处的成批编组运送的货物，却侵占、把持着不发运；支付给各部队要求供给的物资，就扣压拖延而不支付。县求之于州，州又求之于本路长官，动辄就用缺乏作借口来搪塞。哎呀呀！生活在当今的百姓真是不幸又不幸了。

近日进献建议的官员认为各路长官与郡守送往迎来的费用不得超过定额，官吏登记册不准在定员之外再添补，各路长官、通判巡视地方，不准骚扰百姓。又曾有人认为，要想舒解陛下对边远州郡的担忧，没有一个办法比得上加强对州郡长官的人员选择；要想验核地方

官员的善恶实情，没有一个办法比得上加重对各路长官的责罚。这些办法没有一个不是用来督责官员恪尽职守，处理好政务的，陛下对此都予以采纳了。陛下督责官员的心情并非不迫切，但对人不容易个个都了解。天下郡邑这样繁多，陛下怎么能见到每个拟任郡县长官的人之后，才去任命他们呢？现在各路的地方长官应该统管各路的太守、县令，并对他们决定升降。陛下在一路只要得到一两个贤明的路级长官，那么就人人知道警惕戒惧了。现在太守县令不一定要选择，但各路的长官却不能不选择。曾经听说在仁宗皇帝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上书，分条陈述时事，建议按次序逐步更换各路地方长官中无能的人，让地方各路长官惩罚淘汰所辖官员中不称职的人，让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联合选用各路的转运使，随即责成各路自行选择人才任知州。况且最近朝中大臣有人建议，今后遇有路级地方长官空缺，请求专门任用在朝中的大臣。希望陛下从现在起，亲自挑选贤良的路级地方长官，分别安排在各路，不管是朝中的大臣还是京外官员，必须上殿辞别陛下，然后才能出发。在出发的那天，陛下亲临殿廷，做出姿态训导他说：一路的官员，实际上全都托付给你了。官吏有政绩的，开列他们的名字奏报上来，昏乱卑鄙、严酷凶暴的家伙，也靠你去发现，对他们严加惩处。如果你隐瞒不报，以后下面报告给上面知道，你将被明正典刑，当众处决。辞行赴任的人知道陛下的心意勤勉恳切，那么贤明的各路长官的手下，也就容不得有贪滥的官员了。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盐税的免除，拖欠的国家赋税的勾销，前后连续不断地施行，但年景虽然大丰收，老百姓仍然忧愁哀叹，有愧让民众安居乐业。"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顾念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真是十分周到。但今日百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已经困乏了。往年长江、淮河、荆湖两浙和四川等地所申报的灾害，数目及轻重程度各不相同，今年秋天的收成又不可预计。假设今年果然大丰收，那也只能应付一年的需要而没有多余。况且国家征收的赋税，夏天缴纳绢帛，冬天缴纳丝绵。用粮食来折算成该交的丝帛，又有各种的名目。徭役钱也有夏秋两税那么多的数目，而额外的临时性杂

税,还没有包括进来。所以近年来有一定田产并承担赋役的人家,轻则卖掉田地来避免逼交赋役钱的骚扰,严重者就倾家荡产来交纳赋税。这些弊端也是有缘由的,即朝廷督责户部,户部督责各路长官,各种长官督责郡守,郡守督责县令,期限比星火还要紧急,公文措词比戈戟还要惨烈。严厉的公文突然送达,于是关押有关办事人员,凌辱长官。况且像朝廷严格规定税捐交纳的数量满额之后再施行的东西,祸患也都是起于期限不容许稍有迟缓。假使州县的府库中有拿来就能办的储备,还可以缓解一下眼前的忧愁。但现在却是扶起东面,西面又倒下,捉襟而见肘,一项税额的送缴,只能应付本项税额的期限。财物不是在官员手中生出的,却让它不从收税中去搞来,收税却不向那些四五等的小户人家去征收,行吗?

近来陛下采纳臣僚的建议,尽可能多地汇集有关宽缓体恤百姓的诏令条文,颁行到各郡县,担心各郡县长官执行不力,又命令各路长官弹劾举奏。臣下我察看圣上的担忧不是不诚恳殷切,但假如州县的财政不宽裕,那么长官即使很称职,怀有爱民之心,真地能一一承奉宣扬陛下的宽恤诏条吗?过去仁宗皇帝因为京东地区遭饥荒,就拨出宫内储藏的专用绢代替该地的进贡品;因为淮南地区遭饥荒,又拨出宫内储藏的专用绢代替该地的百姓赋税。到京西购买军用粮储,就拿出内库钱;到河北购买粮草,就拿出内藏绢。仁宗皇帝不仅不督责于州县,反而从内库中取出钱绢,是因为仁宗皇帝认为使州县的缴纳期限迅速兑现,正是加重了百姓的衰落疲惫状况。现在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应该先从使州县的府库富足开始。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官吏越来越猥杂冗滥,进入仕途的源头没有得到澄清,常常是好几个人才有一个缺额,致使贤才和愚蠢的人混杂在一起而得不到进用。"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打算扫清进入仕途的道路,让贤明的人与庸劣的人有所分别。国家除了有三年录取一次的进士之外,由特奏名这类慰抚性考试入仕的人,大多年老糊涂;由荫补入仕的人,大多骄奢淫逸;由杂科入仕的人,大多营私舞弊;由出钱买官爵入仕的人,大多贪赃枉法。进入仕途的道路虽

然狭隘，可仅仅是三年一次因郊祀而特授的恩例荫补等官员，三年一次的开科取士，在吏部登记注册的名字，人数能够数得清吗？所以有一个职位空缺，接替者只能是一个人，新任者也只能是一个人，可等待空缺者却有一二人。虽然说希望很快升官的人，目的在于谋求跻身于近臣的行列；追求俸禄的人，目的在于得到丰厚的俸禄；希望自己方便的人，目的在于得到清闲安逸。但从京官以上，还不至于十分冗多，可仍旧没有脱离选调的人，竟然到了人数众多、无缺可以递补的地步。所以为国担忧的大臣，虽然屡屡寻求淘汰多余官员的办法，但大多害怕违拂人心而不敢实行。

过去仁宗朝大臣们商议减少多余的官员，在这时就很清楚定立法度应从权贵近臣身边开始做起，人们就不会有怨言，所以请求从后宫的嫔妃、宗室、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大臣以及各政府部门中兼领殿阁学士和三馆职务的内外臣僚做起，裁减荫补，那么十年就会看见成效。现在荫补的数目虽然烦多，但减少任子，废除恩赦，这是过去人们经常感到困难的事情。议事的大臣又想撤销遇见朝廷举行大礼而申请荫补的成法，严格控制铨选的数量，这恐怕又不是祖宗坦诚仁厚的本意了。如今想要裁减多余的官员，而使在职的人又不从内心深为反感，最好是扩展赴吏部应试的期限，每两年举行一次，不仅使候选的人自己培养气质，学习好了然后从政，而且吏员大多猥杂冗滥的弊端，也可以逐渐清除了。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士兵虽然经过演练挑选了，但将领却不去抚慰他们，只听说有克扣军饷、苛刻役使士兵的情况，致使军事政务得不到修明。"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打算革除将领的苛刻行径，使军事政务得到修明啊！今天的部队，从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辖的京师卫队，江淮各处的驻守正规军，到各路的禁军，都想使它们上下等级严格，想号令严明，军队的气势不能说不振作。近年以来，修缮整治沿边的城池壁垒，制造御前的兵器，派遣臣僚去检阅视察战舰的损坏情况，下诏给各位将领来讨论探求马政的好处，武备也不能说没讲论。江上各军军用装备的数目，就派官员去检查验核；边境各州县的土兵、弓手，商定实行招募补充的做法，有

关挑选和训练的事宜也不能说不全面。今日军事政务的弊端，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协和。担任将领的人，裁减朝廷颁发给士兵的犒赏，扣压截留士兵的军需给养；而身为士兵的人，傲慢斜视，目空一切，强迫给予赏赐，骄横凶悍，难以控制。平时将卒不能同甘共苦，那么战事临头，就难以一起为国难操心费力了。

过去仁宗皇帝筹划对西夏的用兵事宜，当时天下太平已经时间很久了，士兵超过百万，范仲淹担心士兵骄横凶悍，逐条奏上有关边政的事项，基本上把协调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放在首位。臣下我希望陛下下诏给各路将帅，从现在起，赏罚要做到该赏必赏，该罚必罚，不许聚敛克扣，伤害士兵的感情。这样一来，军事政务得不到修明的祸患，就不是陛下再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只请陛下遵守祖宗的法度加以施行。

皇上的圣明策问说："何况朝廷还打算教育感化推行开，社会习俗很美好，不须奖赏就能自动勉励，不用惩罚就能自动引以为戒，帝王一动脸色，一发话音，全天下就迅速响应，普遍归服，如同《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古代隆盛时期那个样，哪里还会实现得了呢？皇帝我未曾不在接受朝拜时慨叹，渴望能一举把弊端全部去除掉，可又深深想到偏激而喜好人为筹措所会带来的过失。究竟应该修明什么而使前面所提到的六个方面的政务，各自得到各自的治理呢？"陛下感慨并仰慕古代的圣帝明王，要使上述六个方面的弊端一举大变样，这就显得陛下求取大治太锐猛了。曾经听说哲宗皇帝时，范祖禹提出建议说：陛下要效法尧舜，只须效法仁祖，效法仁祖就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仁德境界了。《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远古盛世，那时的教育感化、社会习俗本来就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但仁祖治理天下，才智不施用却道德有余，功业很难称述却福禄无穷，那么所谓远古盛世，又与仁祖时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为什么要放弃近在眼前的祖宗法度，却去效法太古时期的久远事情呢？

臣下我好似虮虱般卑贱，恭敬地听到陛下所施恩赐予的策问中涉及到的事情，臣下我已经竭尽自己的愚忠，触犯了圣上的忌讳，逐项在上面做陈述了。陛下在最后又策问臣下我说："过去直接提出反

对意见的大臣，呈上奏疏的人士，文采很繁富，议论却不切实际。类似那石头太多的田地，还想谁来一起在上面耕种呢？又好比在地上画饼，对于吃饱肚子毫无帮助。有的人在故意标新立异上很自负，来迷惑世人的一时间的视听；有的人暗中包藏着个人的目的，图谋日后的进用。皇帝我压根就不予采纳，这哪里又算得上是公允的言论呢？今天开始延请天下的杰出人才，在殿廷上进行策问，要把个人看法详尽地在答卷上写明，使重蹈人为筹措的覆辙不复存在，一天比一天达到兴盛。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陛下的策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真是天下的幸运啊！臣下我愿再用取法仁祖来为陛下谈完我的看法。

我大宋皇朝从太祖一直到仁祖，前后历经四代，治国的纲要在此过程中得以形成；从高宗皇帝的车驾留驻东吴，到陛下又历四世。培植国家的根基，培养造就人才，在不做改变中稳定住治国的纲要，来给我大宋皇朝奠立起亿万年永无尽头的基石。这一重任就落在了陛下的肩上，陛下当然没理由能推辞掉。然而曾经观察仁宗的治国纲要，广远宏大而能与唐尧虞舜以及成周并列媲美，原因虽然出自仁祖的持守公平，恪守正道，用来扶植起治国的根本，但也离不开当时的元老大臣不偏不倚，宽厚博大，在朝廷上维持公道。庆历年间兴盛时期，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一起在朝中主持公道，同时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并肩担任谏官，一起维持公论，来巩固治国的根本。天章阁那些逐条陈奏的时事，富弼、范仲淹等人自己提出来又身体力行，其动机哪里是依仗标新立异去迷惑人们的一时视听，真像陛下所担忧的那样呢？范仲淹因忤逆大臣而离开朝廷，自愿与他一起贬谪的人一个接一个，其动机难道也是暗中藏有私心，为日后的晋升提拔作打算，真像陛下所摒弃的那样吗？如今培植治国的纲要，培养造就人才，从而无愧于仁宗的兴盛时期，这个责任也正在陛下的身上。而扶植公道，荐举引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从而无愧于庆历年间的大臣，这个责任正在当朝的大臣那里。希望陛下和左右大臣深思熟虑，想想祖宗创业的艰难，体念太上皇的托付，为千万世子孙承接的治国纲要做考虑，一切靠不偏不倚，宽厚博大去施行，这就实在是宗庙的大幸了。臣下我恳切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陈明洁译〕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盖闻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帝王有异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时以为治，而无一定之论。吁!有是哉?夫统理民物，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顾，蒙祖宗之付托，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

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俊，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六经》之道，所以该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通鉴》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以劝戒于后者。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靖边疆，恤民隐而惧天变。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迂阔。求其所以置力者，乃即燕闲窃有慕古人辑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土，若士与民，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韪欤?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绸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学习是帝王的事情，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一直到现在，这都没有改变过。可是有的人认为古今有不同的时势，帝王有不同的治理，社会风气有好有坏，各自依据当时情况进行治理，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唉!真有这种问题存在吗?统领管理百姓和万物，作为天下的君主，承受天地的垂爱，蒙受祖宗的托付，像这样的重大，可是作为根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依

据而偏要来使这个社会变美好，这是不行的。因此唐尧虞舜建立帝业，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成就王业，没有谁不在学习上花大力气的，就像饥饿一定要吃饭，干渴一定要饮水一样，不曾在大道之外拿出治理办法，也不曾舍弃经典来寻求治理方法啊!

皇帝我凭借渺小浅陋的自身，继承宏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每天天不亮就上朝，向辅政的大臣咨询政事，接纳优秀的人才，每天亲身到讲解经史的处所，不管叫诵读还是叫讨论，都有固定的标准。在《六经》的原则和方法中，用来包纳贯穿自然和人事，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最细微又最详尽，不能够探讨到极点。《资治通鉴》一书，又用来显示各朝各代的善恶、对后人进行劝勉告诫的东西。它们中最紧要的是：修养自身的道德而治理好家庭，提拔君子并摒退小人，严定等级名份并遏制住动乱的苗头，处理好政事并安定边疆，体恤百姓的痛苦并惧怕上天出现不祥的征兆。皇帝我深 入地思考经书的解说和史书中的谋略，每天摆列在面前，但内容繁多，具体途径很宽泛，就寻求那些该下大力气的地方，于是在轻闲时就私下里仰慕经书中所讲的古人学问积累到大放光辉的义旨，日积月累，亲自行用，心领神会。用这来给治国大道的根本奠定下基础，使人心的归向集中到同一个目标，让全国各地以及读书人和平民百姓，全都按照名理与道义行事，而不会出现本末颠倒错乱的忧患，也不会出现上面和下面目标不一致的歪风。这样做恐怕很对吧?至于商讨治国措施的得当与否，探寻百姓风俗的利弊，讨论读书人风气的淳厚或浇薄，就有的还来不及去考虑了。这是因为根基确立以后，其它的事情就能够一一解决啊!你们这些读书人奉命在殿廷上做对答，要把那些在经书史册中确有收获的东西，理清头绪，全部述说出来。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徐元杰　廷对策

徐元杰(1194～1245)　字仁伯，一字子祥，号梅野，上饶(今属江西)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第一，时年39岁。后历任知南剑州、侍

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每入经筵讲诵，多举鉴戒之事。在地方任内，亦有化感之绩。年五十二暴卒。有《楳埜集》传世。

臣对：臣闻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盖道无近功，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教、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学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则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学者，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

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圣学日新。自临御以来，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间大震怒，大拂乱，所以攖宵旰之怀，关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计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讲求所以压万变之纷纭，镇群疑之汹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则夫坚始者之念，以就来者之图；勉今日之诚，以为后日之虑。不以仅定为无恐，不以苟安为自足。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抵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

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丕绪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自家而国，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自国而天下，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其效证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则学之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间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惟陛下少垂听焉，臣昧死

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帝王有异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时以为治,而无一定之论。吁!有是哉?"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

臣闻道与心一,帝王之心与万世一。尧之授舜,舜之授禹,三圣授受相传一道,载之于《书》。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惟其形气之并生,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人心每患于难制,而道心每患于难明。难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难明,故微而知之者几希。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执,万世惟允。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帝王之治,所以蒸为雍熙,薰为泰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

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乎讲贯之忱。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果为何事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成汤之礼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自世之昧者观之,泥于迹而不求于心,索于治而不求于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劳逸之殊,而不揆其符节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质之异,而不通夫损益之因。善夫!董仲舒之言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盖其所以异者,世之治乱而已。所谓道,未尝不同焉。故韩愈亦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谓继,求韩愈之所谓传,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历千载而一日,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果无一定之论乎?然而有知帝王之无异心,则知帝王之无异道;知帝王之无异道,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

臣伏读圣策曰:"夫统理民物,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顾,蒙祖宗之付托,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

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而欲讲学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

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祖宗之心与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当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当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则道法著矣；道法立，则治法举矣。世去古远，正学不传，生民不见帝王之泽。至治之主，盖不世出，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艺祖皇帝肇造区夏，拨乱立极，读《书》而叹后世刑网之密，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绍休圣绪，继体守成，讲《易》而得六情六气之说，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夫以祖宗讲明学问，稽式帝王，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幸致也。

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辍，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故观乎天地，则见帝王矣；观乎帝王，则见祖宗矣。何则？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则此道为有宗；道得其正，则此位为无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动息造次，常以天下为忧；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为乐。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轻矣。自是而充之以学力，所到日益月新；心术所存，天宽地大。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浑浑乎如四时之春，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俊，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愈尊而愈谦；问学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

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惟谨养乎心术之微，不徒为诵说之务；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为外饰之求。宫庭深邃，燕佚易失；声色满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维持；一日万几之繁，非

小智所能经理。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则是心不可以不尽,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纵肆,则不足以充此学;有一息之间断,则不足以充此学。外庭固学矣,内庭其可息乎?经筵固学矣,退处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与学矣,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

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固出于圣心之实,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儆戒无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奸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辅弼,延英俊矣,然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讲诵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

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经》所载,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诚非徒以讲诵为也。口以诵之,必反心而载惟;学以讲之,必闻义而力徙。故于至善之所当止,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于不善之所当改,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学有如是,则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无一政之不立,无一事之不举。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

臣伏读圣策曰:"《六经》之道,所以该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通鉴》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以劝戒于后者。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靖边疆,恤民隐而惧天变。"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明史册之劝戒,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

夫经,所以载道也;史,所以纬经也。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尝以是观之,《六经》皆所以言天人,而至于该贯其道,则莫详于《易》与《春秋》之为书;《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而所谓至纤至悉,则莫大于《易》与《春秋》之

为用。《易》者，六艺之原也。卦有阴阳，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则《易》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诘也。《春秋》者，史记之约也。义有褒贬，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灾异所书，未尝不以天言之，则《春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即《易》与《春秋》之旨，而概之《六经》之道，则维持世变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可以类推矣。

虽然，此经之所以载道者然也。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则自周之衰，以迄五代之季，其间安危理乱之分，成败兴亡之故，上下数千年间，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别贤否而定名义，谨修攘而全爱敬，大概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要亦有由矣。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

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因曰自汉唐以来，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学。大哉王言！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然刺取《六经》，盖亦仿佛于王者之意。故当时之治蔼然，犹有王者气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

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齐家之道粗立；张武受贿，益愧其心，吴王不朝，赐以几杖，而治国之道之粗审；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成军礼以张国势，务休息而专德化，警灾异而求直言，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于此而加之意。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岂非粗知道之效欤？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既足以致后世之治，后世考论文帝之史，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则治道功用，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愿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励。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乌患其有难行者哉？

臣伏读圣策曰："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迂

阔。求其所以置力者，乃即燕闲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土，若士与民，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韪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用力于本原之地，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

夫经之与史，虽文字之繁，而关于君德治道者，则未尝无纲领之要。夫缉熙光明，日就月将，此诗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至于曰躬履，曰神会，此则陛下心术纯明，义理融贯，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盖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会，皆致知之功。行无不力，则缉熙矣；知无不致，则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会，求成王之缉熙光明，而又形诸心画，发诸圣制，布尧言于天下，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国矣。举天下之大，家传人诵，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

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以为讲学之本也。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臣考诸《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谆勤恳切之意，又必继之以“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无时而不然，而敬之为敬，无一动之或违，无一息之可弛也。成王于此，灼知用力之要，谦虚挹损，形之于言曰:“惟予小子，不聪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论，则知缉熙光明，乃为学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缉熙光明之要也。

今陛下既即燕闲，慨慕于古，其事非不伟也。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闲，无微而不敬者，兹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盖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彻上彻下之道。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故必绌绎心思，续续不已，充广心地，恢恢有余，而后可以言缉熙。清明一有纷汩，志虑一有间断，气象一有偏狭，则不足谓之缉熙矣，而可以为敬乎?必明善诚身，动与理觉，尽心知性，静与理融，而后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气少有昏蒙，智识少有凝滞，则不

足谓之光明矣，又可以为敬乎？

陛下之所谓躬履，盖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谓神会，盖会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则规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则仪刑弗谨，观听莫新，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皆风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随，上倡而下必应，阴消其舛逆之患，潜格其异向之风，则其感动意思，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臣愿陛下以真存心，则躬履神会，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则以成王之学，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圣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盖政治之得失，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民俗之利病，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士习之厚薄，亦视夫君心之好尚如何。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故《中庸》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亦以修身在正心者为之本。陛下讲明于此，盖亦熟矣。

继今而后，极致知之善，尽力行之诚；因全体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刚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俭以约己，必渊静以养心。如是则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不然，外有讲学之文，内无讲学之实。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假修饰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民俗之未暇问，士习之未暇问，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

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朕心未尝放下，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圣谟洋洋，载在国史，皆陛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广推于

外,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则本原在于圣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况于是三者之务哉!

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谦冲温粹,犹终之曰:"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绌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非徒为是取采之文具也。臣窃闻《六经》之书,致治之成法也;史之为史,亚乎《六经》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而史又亚乎经之道,则凡天下国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于纤悉节目,所以救习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绌绎而具陈之,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以为陛下告,不惟下负所学,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

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其说盖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肃军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盖民者,国之命脉也;兵者,国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精神运动,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以为元气调养之方。则立国之势,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

《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间困于科率,市井困于征求,商贾困于抽敛,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叠是数困,犹未已焉,远近怨咨,不可闻也。乖戾之气,上熏于天,激而为江闽之盗,滋而为辅近之奸,涨而为都会之灾,溢而为边陲之警,延而为数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国家命脉,一缕千钧,深可虑也。昔光武中兴,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先朝范镇亦曰:欲备契丹,莫若宽天下之民。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陛下亟图之,则其证犹可起也。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

《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言卫国以兵,诘之者有其道,则服之者有其机也。今之为兵者,何如耶?自核实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训练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养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级之不严,而兵益以骄;自刻剥纵弛之相蒙,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

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盖资之以卫吾国也。今乃不冗则惰，不惰则脆，不脆则骄，不骄则叛，不叛则溃。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战，利于为寇而不利于御寇，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帅。闽南之纷乱方迩，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西蜀之惊荡方传，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姑息养祸，浸以成风，蔓草难图，犹未歇也。昔晋文公成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艺祖皇帝始明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铁锧，是以上下有序，无征不服。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陛下其亟图之，则其患犹可弭也。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

夫固国以民，卫国以兵，二者命脉之所关，精神之所系，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护养其民，调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今之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耶？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而曰将曰帅，则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兴利除害、信赏必罚为心，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偷安旦暮之计。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则夫民怨而思乱，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

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龚遂，单车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养，盗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马燧之在河东，驭马厮役教以骑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万，而兵不患其不强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国朝开基之初，藩侯不抚百姓，则有断不容之之戒。至于南征北伐，战胜攻取，兵不过二十万者，亦惟以曹彬、潘美为将耳。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明效大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鉴者，汉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论也。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则天下幸

甚,宗社幸甚。臣无任昧死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寻求大道具有根基和本源,实行大道具有功能和效用。从根基和本源通达到功能与效用,那么天下的治理,就能够轻易地施行开了。大道没有想实现就马上实现的功效,只有志向和情趣都很高尚远大的人,才称得上足够用来使它的功效达到最高点;大道并不是发挥微小的效用,只有力量能够集中并稳定的人,才称得上足够用来使它的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自从天地产生以来,用来理顺世风教化、支撑人伦最高准则而使它们处在不泯灭、不断绝的状态,都不是偶然的缘故造成的。最原始的那个本源的法则,在各类不同的事物中分别显现和流布施行,经常是人们获得它、随从它但感觉不出来的东西。因此,一定要等待那超出亿万普通人之上的杰出人物出来,做这些人的老师。依靠他一个人的心愿,融合那天地的心愿;凭借天地的心愿,使天下人的心愿都觉悟。帝建立帝业的原因,王成就王业的原因,是与这一心愿相同,也与这个大道相同的;是与这一学问相同,也与这一功能效用相同的。既然如此,那么具有帝王心愿的人,这才能够有志向钻研帝王的大道;具有帝王学问的人,又哪里不能够步入帝王的功用里面去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英姿生来就卓越超群,圣明的学问日日更新。自从登位和统治天下以来,勤勉不怠,急切求学,已经懂得寻求这种大道的功用,来运作那心愿;并懂得推广这心愿的功用,来运作到天下。这期间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彻底扫除掉动乱,致使皇帝从早到晚、吃饭睡觉都在做考虑的事情,恐怕不是一两件就可以计算出来的。陛下您稳稳坐定,集中精力,格外留意探求能够控制住纷乱多变的局面,镇抚住上下喧嚣的众人猜疑,心中暗暗认定是可以作为国家大计的东西,这大概就是陛下您寻求大道该下大力气的地方啊!寻求大道有所收获以后,就该坚定最初的信念,去适应今后的谋划;也应勉励现在的真诚之心,把它当作今后的考虑。不把刚刚安定就看成是无所恐惧了,不把国家占据一角就看过是自可满足了。凡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构成国运昌盛的根基所在的东西,

也就正是皇帝您实行大道该下大力气的地方啊。

依据所下力量有所收获,扩充所下力量有所施用,天地的垂爱就已经很深厚了。用来报答天地垂爱的办法,应当如何呢?祖宗的托付很重大了,用来承奉祖宗托付的办法,又该怎样呢?陛下您继承宏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九年了。用来充实并开拓宏大基业的办法,应当怎样去做才能完善呢?陛下您确实能够依据所下的力量有所收获,增添所下的力量有所施用。从自身扩展到家庭,用来端正人们之间的伦理纲常和关系到风俗教化的东西,不能不谨慎对待那些做表率加以倡导的细微地方;从家庭扩展到国家,用来区别是否德才兼备和确定名分地位的东西,不能不有防微杜渐的考虑;从国家扩展到全天下,用来谨慎修明内政、驱逐外敌和爱民敬天特周全的东西,不能不使那劝勉和激励的真诚之心达到极点。以上这些的效用已经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的所做所为中得到验证了,借鉴作用也在秦汉以后各朝代人们都有目共睹的地方得以具备了,事例更在经书史册中可以考证的地方得到体察了。陛下您确实在本源上费尽心思,不只是把诵读、讲解经典当作固定的标尺,那么学习作为帝王的事情,也应该在陛下您的心中体悟出来了。臣下我又怎么敢乱多嘴呢?请求您让我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敬拜叩头拿来回答陛下您的询问,只希望您能稍微注意听取一下,臣下我冒死呈上愚昧的对答。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学习是帝王的事情,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一直到现在,这都没有改变过。可是有的人认为古今有不同的时势,帝王有不同的治理,社会风气有好有坏,各自依据当时情况进行治理,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说法。哎!真有这种问题存在吗?"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有志于继承帝王圣道相传的统系,而替那些认为大道与时势有差异的愚昧的人发出感叹。

臣下我听说大道与心是统一的,帝王的心与各朝各代的心是统一的。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三位圣人传授与接受、递相传承那同一个大道,这记载在《尚书》当中。分清人心和道心,辨别哪一个是危险的,哪一个是幽昧的,有的产生于人们的形质和性情,有的出自

人们的中正本性和客观命运。只因形质和性情同时产生，即使智力突出的人也不能没有那危险的人心；只因人的本性和客观命运各自中正，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能没有那幽昧的道心。所以常常忧患人心难以控制，常常忧患道心难以明确。人心难以控制，所以人心危险却能使它安稳住的人常常不多；道心难以明确，所以道心幽昧却能获知的人就很稀少。只有精粹，那么判断、选择时就很详明精审而充实知识的功夫便深厚；只有专一，那么主宰一切时就很坚定而大力实行的功用便长久。因此中正的守执，千秋万代都必须确确实实。商王成汤把这承传下来，就成为显示仁德、建立中正的标准；周文王和武王把这承传下来，就成为顺应上天法则、建立最高的准则。古代帝王的治理，之所以兴盛得呈现出太平欢乐的景象，熏陶得形成万分协和的局面，没有一个百姓、一件事物不各得其所，原因都是出自这个大道的功能和效用啊！

把大道的功能和效用分散到天下各类事物中去，就像这样的明白显著；而把根本的东西聚集在一心的途径，还不敢废弃那讲论贯通的虔诚。所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被称做急切求取学问的人，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呢？难道还不是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四句话、开始打开通往大道的大门吗？因此十六字心法的承传，虽然时代不同但轨迹相同。商王成汤的礼法制度，周文王和武王对所设官员的考察制度，都是在根本的方面下大力气啊！尽管他们的时代存在着差距，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大道的承传未曾不一致。这从社会上愚昧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现象，却认为他们拘泥于表面迹象而不从内心去寻求，他们在治国方法上做探索而不在大道中去寻找。舜与周文王事实上属于同一类，可有的人却怀疑他们所经历的劳苦和安逸大为悬殊，而不去揣摩他们像信物核对丝毫不差的契合之处；商朝与周朝事实上也属于同一类，可有的人却怀疑这两个朝代存在着文采与质朴的显著差异，而不去闹清楚它们减少与增补的轨迹。董仲舒的话讲得太好了！他说：继承太平盛世的君主，他们承传的大道完全相同；继承动乱时代的君主，他们承传的大道迥然不同。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只是社会的太平与动乱罢了，而

所说的大道，未曾不相同啊！所以韩愈也说：尧把这传授给舜，舜把这传授给禹，禹把这传授给商汤，商汤把这传授给周文王和武王。专就董仲舒所说的继承，特去探求韩愈所说的传授，那么以上这几位君子的用心，超越宇宙而精神一致，经历千年如同一日，又有谁能够断定社会风气有好有坏，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治理，确实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说法呢？既然如此，那么能够明了帝王没有不同的用心，就能明了帝王没有不同的大道；知道帝王没有不同的大道，就能明了帝王没有不同的效用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统领管理百姓和万物，作为天下的君主，承受天地的垂爱，蒙受祖宗的托付，像这样的重大，可是作为根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依据而偏要来使这个社会变美好，这是不行的。因此唐尧虞舜建立帝业，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成就王业，没有谁不在学习上花大力气的，就像饥饿一定要吃饭，干渴一定要饮水一样，不曾在大道之外拿出治理方法，也不曾舍弃经典去寻求治理方法啊！"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认为天地祖宗的寄托不能够忽视，认为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大道一定可以实行，并且想要通过研究学问来寻求大道，依据大道来谋求大治，而又很明白该在哪些地方下大力气啊！

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的心念与天地的心念是一致的，我朝祖宗的心念与古代帝王的心念是一致的。古代帝王是代替天地来剪裁成就化育功德的人，我朝祖宗是效法古代帝王来融会贯通那功能与效用的人。所以寻求帝王治绩的人，应该寻求帝王的大道；寻求帝王大道的人，应该寻求帝王的心念。心治大法明确，那么大道准则就明显了；大道准则确立，那么治理的措施就施行开了。时代距离上古遥远，正统的学问没得到承传，因而百姓看不见帝王的恩泽。能够达到太平盛世的君主，不是每代都会涌现出来的，而天地降生圣人，也是在经历许多年之后才能隔世看到。我朝的太祖皇帝创建统一的中国，拨乱反正，确立最高准则，阅读《尚书》感叹三代以后的刑法太严密了，这就有理由同天地生长养育万物的心念相契合了。我朝仁宗皇帝继承并弘扬祖宗的美好基业，承接帝位、守护已有的成就，讲解

《易经》从而得知喜怒哀乐爱恶六情和阴阳温热冷寒六气的学说，这就有依据同天地一动一静的规律相符合了。凭借我朝祖宗讲论、阐明学问，效法古代帝王，没有一处不与天地的心念相符合，那么天地对我朝眷顾佑助的，并把那无边无际的福庆留给陛下您的地方，总之不是能靠人力侥幸会得到的啊！

陛下您讲论学问，早晚不知疲倦，一年四季从不中止，必定要与古代帝王的心念同样地承载运作，目的大概是想告慰列祖列宗的重托，报答天地的垂爱吧！因而观察天地，就可以看见古代帝王了；观察古代帝王，就可以看见列祖列宗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天地，把这个帝位授付给陛下您了；是古代帝王，用这个大道使陛下您与他们一致；是列祖列宗，把这种心念留给陛下您了。心念获得到端正，那么这种大道就有宗奉；大道得到端正，那么这个帝位就占据着没有愧疚。帝位端正了，大道更加可以实行；大道端正进而心念更加可以控制。行动退止或仓卒行事时，经常把天下作为忧虑；安乐舒适、悠闲轻松时，一点也不把占据帝位看成是快乐。像这样的话，就确实知道天地所授付的职责最重大，而不敢把它视为自己的事情了；就确实知道列祖列宗传给的东西太重大，而不敢自己把它看轻了。在这基础上进而从两方面加以充实：凡是学习的功力涉猎过的地方，每天都有收获，每月都有更新；心术寄存的地方，就像天地那样宽阔广大。把整个时代的所有百姓，都带入到太平和乐的世界里，都如同生活在四季中的春天里，看不到热风大雪的惨状，这都是那个心念推广开来的结果啊！只希望陛下您越发返回到那个心念当中，更加花大力气，这样一来，功能和效用哪里有难以达到的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凭借渺小浅陋的自身，继承宏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每天天不亮就上朝，向辅政的大臣咨询政事，接纳优秀的人才，每天亲身到讲解经史的处所，不管叫诵读还是叫讨论，都有固定的标准。"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高高在上面统领天下，地位越尊贵反而越谦卑；勤勉求学，时间越长反而越不衰颓啊！

臣下我听说帝王的学问，具有它的本源。只应谨慎养护心术的

微妙之处，不光是致力于诵读和谈论；只应深入地探求事物开端的源头，不光是追求表面上的装模作样。皇宫内廷深邃幽昧，生活安逸就容易出现过失；面对众多的乐舞和美色，志向和意念也容易错乱。囊括四海九州的统治区域是这样的广大，不是靠空洞的言词就能够维护和持守住的；每天的事务是这样的繁多，不是靠小聪明就能够处理筹办的。然而用来维护和持守住天下并且能够处理筹办政务的东西，本源正凝聚在圣明心念的承载运作之中，效用正形成在圣明学问的贯穿通晓以后，这样一来那个心念就不能够不达到极点，学问的功力就不能够不充实，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因此有一个念头放纵起来，就不足以充实这门学问；有刹那间的中断，也不足以充实这门学问。在宫廷之外固然应该学习了，在宫廷之内就可以停止吗？在讲解经史的处所固然应该学习了，离开那个地方就可以松懈吗？正人君子固然该与他们一起学习了，谄媚小人和那些奴仆，哪能与他们特接近呢？

陛下您有志向干成帝王的事业，固然是出自您圣明的诚实，然而古代帝王兢兢业业，戒备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勤勉不倦，急切求学，长时间不停止的这些做法，难道不是陛下您应当深切拿来做勉励的吗？决不只是停留在口头诵读谈论这类末节上就算完事了呀！陛下您继承帝位已经九年了，然而在外事上，国家的疆土还没有平定；在内政上，为非作歹的人也没有肃清，陛下您想到这里，能不用西周完全战胜商朝历经九年，而盛大功业尚未完成来激励自己应当忧虑和勤奋吗？陛下您每次上朝，固然向辅政大臣咨询政事，接纳优秀人才了，然而朝内小人和君子还不分明，地方上谁是贪官、谁是廉吏还没有得到判定。陛下您想到这里，能不用虞舜九年进行三次考察、决定官员升降、各项工作都很兴盛来警戒自己要居安思危吗？不这样的话，凭借能够达到的资质却不能达到，在可以做的时候却不能做，在可以准备的岁月里却自己懈怠到不准备不戒备的地步，可却还在说讨论诵读经书有固定的标准，臣下我实在不知道陛下您讨论诵读指的是什么了。

陛下您如果能够把古代帝王的心念当作自己的心念，就一定要

深入探求古代帝王用力的关键。凡是《六经》中记载的东西，在讲解经史的处所通过诵读、讨论而获知的，确实不只是诵读讨论一番就算了。口中诵读这些东西，一定要回到心中去施行；通过学习来讨论这些东西，一定要听到其中的义旨去大力转变。所以在最完美的道德应达到的境界上，一定要像喜好美女那样，让它令人赏心悦目，这也就可以了。在道德不完美应当改正的地方，一定要像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让它的影子和迹象灭绝，这也就可以了。学习达到这种程度，那么本源就端正了。本源端正以后，那么从自身扩展到家庭，从家庭扩展到国家，从国家扩展到天下，没有一项政务不定立，也没有一件政事不兴起了。明显的功能和效用，怎么能够限制与了结了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在《六经》的原则和方法中，用来包纳贯穿自然和人事、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最细微又最详尽，不能够探讨到极点。《资治通鉴》一书，又用来显示各朝各代的善恶、对后人进行劝勉告诫的东西。它们中最紧要的是：修养自身道德而治理好家庭，提拔君子并摒退小人，严定等级名份并遏制住动乱的苗头，处理好政事并安定边疆，体恤百姓的痛苦并畏惧上天出现不祥的征兆。"臣下我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融会了经书讲解中的精华与简略之处，搞清了史册中的劝勉与告诫，并想在帝王道德和治国大道最重要的方面下大力气啊！

经书，是用来载述大道的；史书，是用来辅助经书的。帝王的学问，之所以要讲论经书与史书，目的是要运用到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中去。臣下我曾经以这样的认识做过考察，《六经》都是用来讲求自然和人事关系的，至于包纳与贯通其中的大道，就没有比《易经》与《春秋》作为两部经典而更为详细的了；《六经》都是用来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可是在人们所说的最细微又最详尽的方面，就没有比《易经》与《春秋》的用处更大的了。《易经》是《诗经》、《尚书》等六经的根源，易卦有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原本是用来显示自然的变化规律的；可是吉凶和小有过失，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人事来做讲说的，那么《易经》中用来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理应穷尽那变化、通达、激励、推动的准则，但却不能够问个水落石出啊！

《春秋》是国家史书的简编，具有表示褒贬的意义，原本是用来阐明人事准则的；而记载反常的自然现象，未曾不是通过上天来做讲说的，那么《春秋》中用来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理应明确天下的邪恶与纯正，而杀父杀君的人都感到恐惧并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了。依据《易经》与《春秋》的主旨，来同《六经》的大道做衡量，那么主宰社会变化的东西，又最细微最详尽，不能够探讨到极点，但从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庭直到体恤百姓痛苦，并惧怕上天出现的不祥征兆，就都可以按类推求了。

尽管如此，这是经书用来载述大道才形成这样的。至于史书用来辅助经书，则从周朝的衰落开始，一直到五代末期，这期间安定与危难、太平与动乱的区分，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亡的缘故，上下几千年间都好像用烛光去照耀和灼烧龟甲去占卜那样，不能够掩盖住。然而从那些善于讨论社会变化的人的眼光来看，汉朝是总的纲领基本端正但许多细目却没能张布开来，唐代各种细目都张布开来但总的纲领又未能端正。那么汉唐用来端正人伦纲常和维系风俗教化，辨别贤才和庸才，制定等级名分，谨慎修明内政和驱逐外敌，保全仁爱与恭敬，大体上不能够同帝王的功用相提并论，总之也是具有原因的，这怎能就成不了探本溯源的论断呢？

空荡的山谷中首次传来脚步声就显得十分难得，昏暗黑沉里出现日月就显得十分宝贵，在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寻找那些与古代帝王的大道大致应合的君主，只有汉文帝一个人罢了。从前我朝孝宗皇帝与大臣们谈论古今的太平与动乱，曾说自汉唐以来，君主中只有汉文帝能够大致了解帝王大道。自汉文帝以外，那些君主不仅不了解帝王大道，也不懂得去钻研学问。孝宗的话太伟大了！真属于对后代君主从事学问的情况予以深切考察评论的典范吧！试从汉文帝大致了解帝王大道来观察，尽管他在位期间礼节仪式这方面的事体还有许多缺漏，然而采摘《六经》，大致上也接近称王天下的君主的用意。所以当时的治理，呈现出一片和平安乐的景象，仍然具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气象。不是大致了解帝王大道的君主，有谁能做到这样呢？

自从汉文帝实行无为而治，以大道为依托，以仁德为标准，而修

养身心的准则也大致明确了；他所宠爱的夫人，穿的衣裙不拖到地上，而整顿好家庭的准则也大致确立了；张武接受贿赂后，反而给他再送去钱物使他内心更觉羞愧，吴王刘濞不到朝廷来拜见，反而赐给他表示优待的几案与手杖，而治理国家的准则也大致知晓了；至于不计较匈奴的小过错而避免武力冲突，完善军队的礼仪来使国家威势张布开，致力于休养生息又专注于仁德教化，警惕上天显现的不祥征兆而寻求正直的言论，凡是能够作为使天下太平的准则的东西，也大致在这上面多加留意。既然如此，那么汉文帝成为汉朝仁德兴盛的君主，难道不是大致了解帝王大道的效验吗？只因汉文帝大致了解《六经》的大道，就已经足够用来造成后代的治理局面，后代考察评论汉文帝的史事，也就应该对人劝勉汉文帝之所以成为汉文帝的那些东西，叫人戒备那些比不上汉文帝的东西；应当对人劝勉汉文帝能够成就帝业、建立王业的地方，叫人戒备汉文帝最终没有成就帝业、建立王业的那些地方。这样一来，治国大道的功用，又哪里允许到君主心念之外去探求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您反过来从自己的心念去做寻求，更注意大力实行，用能成就帝业、建立王业的地方来自我劝勉，用未能成就帝业、建立王业的地方来自我激励。这全在于下力气或不下力气罢了，哪里还担心存在着难以实行的地方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深入地思考经书的解说和史书的谋略，每天摆列在面前，但内容繁多，具体途径很宽泛，就寻求那些该下大力气的地方。于是在轻闲时就私下里仰慕经书中所讲的古人学问积累到大放光明的义旨，日积月累，亲自行用，心领神会。用这来给治国大道的根本奠定下基础，使人心的归向朝着同一个目标，让全国各地以及读书人和平民百姓，全都按照名理和道义行事，而不会出现本末颠倒错乱的忧患，也不会出现上面和下面目标不一致的歪风。这样恐怕很对吧？"臣下我这就有理由看出陛下您在学问光明的那片至诚上特留意，在根本的地方下大力气，并打算把它推广到治国大道的重大功能和效用上啊！

经书与史书，尽管内容繁多，但是关于帝王仁德和治国大道的，却未曾没有切要的纲领。学问积累渐渐达到光明，日有所得，月有所

进，这是古代诗人所记述的情形，属于周成王下力气进行学习的实际。至于说到亲自行用，说到心领神会，这就属于陛下您心术纯洁光明，经义和道理融汇贯通，能够用诗人所记述的内容推究到内心，又用周成王学习的情形来更下力气啊！亲身践行，都是尽力实行的事情；心领神会，都是充实知识的功夫。实行没有不尽力的，那就积累广博了；知识没有不充实的，那就大放光明了。凭借陛下您的亲身行用，心领神会，寻求周成王学问积累逐渐达到光明，而又能够把它们形成内心的谋划，在圣旨中颁发出来，向天下宣布唐尧那样的言论，绝对认为从皇帝到平民百姓，毫无例外地都把修养自身道德作为根本，从而就知道学习对于百姓和国家都有好处了。整个广大的天下，家家传告，人人称诵，都十分真切地知道陛下您学问积累逐渐达到光明的美德，几乎与周成王是不能够再看成两个人了。

不过周成王谨慎修养自己的身心，目的是把这作为讲求学问的根本。陛下您也曾在这方面确实下过力气吗？臣下我考察《诗经》，在《敬之》篇中有这样的诗句："戒慎啊戒慎，老天爷很高明，保住天命不容易。"这是群臣把需要下力气的最重要的地方告诉给周成王。而那种忠诚、勤勉、恳切的心意，又一定接着说："不要说老天爷高高在上看不着，其实万事万物都由它主宰，每天都在这里做监视。"这是群臣想让成王知道上天的监视没有一处不存在，每时每刻都这样，因而要戒慎再戒慎，没有一个举动敢违背，没有片刻敢松弛。周成王在这方面，显然知道下大力气的关键，谦虚又卑恭，在语言上表现出来说："只有我这年幼的人，听后更是要戒慎。"还必定真心诚意地再加上："日有所得，月有所进"，又用"学问积累逐渐达到光明"的目标来做勉励，积累再积累，一直到永远对上天赐予的大命保持戒慎。从这方面来讲论，就知道积累逐渐达到光明，正是学习的关键；而戒慎再戒慎，又是积累逐渐达到光明的关键。

现在陛下您已经在轻闲时对古代产生感慨和仰慕，这件事不是不壮伟。至于古人谨慎对待轻闲时光，没有一处最细微的地方不戒慎，这又是陛下您的切身事情，而治国大道恰恰由此奠定下根基，人心由此而归向同一个目标，经义和道理由此而能够推广。因为戒慎，

说的是抓住它就无不适应，属于贯通上下的大道。陛下您赞许周成王所说的学问积累逐渐达到光明的实际，就是尧舜二帝与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用来传授心治大法的目标所在。所以一定要把心思梳理清楚，前后连贯不断，使心地充实广大，宽阔具有余地，然后才能够谈得上积累广博。清静明朗的神志一出现纷乱，志向和思虑一出现间断，气象一出现狭窄，就没资格称得上是积累广博，这还能戒慎吗？一定要宣明至善，使自身诚实，行动与事理相一致，穷尽心念、了解人性，静寂与事理相融合，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大放光明。物质欲望稍微出现阻隔遮蔽，血气稍微出现晦暗昏乱，敏感力和洞察力稍微出现拘泥停滞，就没资格称得上是大放光明了，这还能戒慎吗？

陛下您所说的亲自践行，大概就是践行这戒慎吧！陛下您所说的心领神会，大概就是领会这戒慎吧！凭借它奠定下治国大道的根基，使天下国家的治理如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兴盛，是办得到的。如果不是这样，长远规划就不能建立，在实现一般治理时就会贪图安逸，虚度岁月，根本与末节不能没有错乱或违背的现象，这些都是太平社会的拖累啊！凭借它促使人心朝向同一个目标，一定可使全国各地的风俗教化如同唐尧虞舜时期、夏商周三代那样美好，也是办得到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表率作用不恭谨，社会的视听不能焕然一新，上面和下面不能不目标有区别。这些都是风俗的弊害啊！陛下您能够反过来从自己的心念去做寻求，经常保持这种戒慎，在内心抓住专一而不带上繁杂的毛病，在外面没有其他的倾向又不徇私情。根本端正了，末节也就自然跟着端正；上面倡导了，下面也就一定响应。无形中就消除了那些错乱与违背的忧患，不知不觉中就纠正了那些目标不一致的风气。这样一来，对人的感情的触动，几乎就与孔子的七十个及门弟子佩服孔子，是同一个道理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您用真诚来留存住心念，那么亲自践行和心领神会，自然不能掩盖住它那明显的功能与效用了。由此来加以充实，就会凭借周成王那样的学问，深入到帝王大道里面去。只在于陛下您对此留意罢了。

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又说："至于商讨治国措施的得当与否，探寻百姓风俗的利弊，讨论读书人风气的淳厚或浇薄，就有的还来不

及去考虑了。这是因为根基确立以后，其它的事情就能够一一解决啊!”臣下我私自认为,陛下您的话语触及到了这类问题,难道这不正是天下的幸运和天地与列祖列宗期望陛下您的吗！政务管理的成功与失误,常常和为君之道的转变紧密相连;民间风尚的利弊,实际上与国家政务的修明与废弃密切相关;读书人风气的淳厚或浇薄,也要看君主内心所喜好和崇尚的是什么。陛下您对以上三项政事的筹谋不太重视,却一定对端正根本不厌其烦,难道还不是因为在根本上下力气做好以后,以上三项政事的效用,只不过全面加以部署就行了。所以《中庸》论述治理国家有九种根本大法,可是用来实行的只是一个“敬”字。《大学》讲述整顿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途径，也把修养好自身在于首先端正心念作为根本。陛下您在这方面讲论究明,大概也很精熟了。

从今以后,把充实知识的益处推进到极点,把尽力行用的真诚扩展到顶峰;依据对整个主体的明了,寻求显著的重大功用;一定用刚强来控制欲望，一定用奋勇来尽力行用，一定用恭敬节俭来约束自己,一定用深沉宁静来修养心性。像这样去做了,根本的东西端正以后,以上三项政事肯定能够依次解决。不然的话,表面上有讲求学问的空名,骨子里没有讲求学问的实际。用根本性的论断来做推托,去遮盖事体的失误；假借修明整饬的一纸空文，去掩饰自我反省的不足。戒除饮酒具有《尚书·酒诰》,可对自己控制心念却没有什么补益。积累学问具有《礼记·学记》,可对自己增进道德却没有什么补益。像这样还去说顾不上过问政务管理如何，顾不上过问民间习俗如何,顾不上过问读书人风气如何,这是自行把天下和国家放置在圣明的考虑范围以外,又怎么能够成为根本性的结论呢?

从前我朝孝宗皇帝的《宝训》中有一条说:皇帝我不曾把心放下过，一天中必定要把整个天下想一回。孝宗皇帝在考虑天下大事上煞费苦心,像这样的全面而且详尽,竟然能认为他因为根本性的东西已经端正,却一概来不及过问天下的其它事情吗?孝宗皇帝的谋划完美广远，记载在我朝的正史中，都是陛下您应当体悟并且加以施行的。臣下我希望陛下您越发返回到自己的心念上，想方设法痛下真

实而没有虚伪在内的功夫;向外面广泛推广,把承载运作没有止境的奥妙传到四面八方;那么根本性的东西就存在于陛下您的内心了。凡是皇帝您书面询问臣下我经书史书中应该讲明的问题,都能够按次序得到解决,何况前面要做的三项政事呢!

陛下您书面询问的事情中用来教诲臣下的东西,也已经非常周全了。可是陛下您谦虚温和,在最后还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奉命在殿廷上做对答,要把那些在经书史书中确有收获的东西,理清头绪全部陈述上来。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臣下我由此尊敬地看到陛下您咨询访问孜孜不倦,乐意和出身低微的人寻求根本性问题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为了在询问和采纳上走走形式啊!臣下我私下里听说《六经》这些经典,是实现大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史书作为历史的记载,是辅助《六经》的。实现大治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已经在经书中都具备了,而史书又辅助经书中的大道,那么凡是天下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把根本性的东西端正以后就算完事了,还涉及到细小详尽的具体措施,用来补救风俗习惯的缺陷,防止人心的衰败。经书与史书对这些又是相互贯穿会通又相互启发阐明的。陛下您既然让臣下我等人把收获理清头绪,全部陈述出来,臣下我却不能够倾尽自己那一点点儿浅薄的学问,来向陛下您做禀告,这不仅对下辜负了自己所学的东西,也对上辜负了陛下您的谆谆教诲啊!

然而臣下我对陛下您特别诚挚而情不自禁要献纳忠心的是,大致有三项建议:第一项叫做稳定民心,第二项叫做肃正军心,第三项叫做端正士大夫的心志。因为百姓是国家的生命与血脉;军队是国家的精气与神髓;士大夫又是国家的医师和药物。作为统治别人的君主,应该使生命与血脉强壮,使精气与神髓运作,经常谨慎地使医师和药物发挥作用,作为调和养护国家元气的药方。这样一来,确立起国家的威势,自然无形中就收到了天下安定和平的功用了。臣下我请求陛下您让我竭尽自己的愚昧来讲完这三项建议。

《尚书》中《五子之歌》说:只有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难道要在百姓怨恨明显的时候才去考虑吗?应该在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加以筹划啊!这是说百姓不能够不让他们稳定,

怨恨不能够不加以消除。现在用来使百姓稳定的方法又怎么样呢？农民被赋税所困扰，城镇街区被征税和索求所困扰，商人被抽税所困扰，富有的大户人家被没收全部财产的惩罚所困扰。这几种困扰加在一起，还没有到头，因而全国各地的怨恨嗟叹，是让人无法去听的。乖逆抵触的邪气弥漫到天空，激场起来成为长江、闽江一带的盗贼，滋长开来成为皇帝身边的奸恶，高涨起来成为大城市的灾难，扩散开来成为边境的战火，蔓延开来成为几千里的大旱，简直危险到快垮台了！国家的命脉，千钧一发，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从前东汉光武帝要使汉朝重新振兴，邓禹规劝他应当建立汉高祖那样的德业，拯救所有百姓的生命。我朝的范镇也说过，要想防备契丹，没有比对天下百姓放宽赋税徭役更紧要的了。这些都是为国家命脉所作的谋划。陛下您要急切地考虑它，那么病症还可以救治。否则的话，就不是臣下我所敢知道的了。

《尚书》中《立政》说：一定要治理好你的军队，沿着大禹的足迹踏遍天下，一直达到海边，使全天下没有人不服从。这是说保卫国家靠军队，治理军队要有治理军队的方法，这样一来天下服从就有契机了。现在的军队又怎么样呢？自从不进行兵员验核，军队人数越来越多；自从训练不精详，军队越来越懒惰；自从不注意对士兵的养护，军队越来越脆弱；自从不强化官兵的等级关系，军队越来越骄纵；自从侵吞军饷、自由放任而上下相互蒙骗，军队又转向叛乱并且溃散了。

国家竭尽百姓的血汗来豢养军队，为的是借助他们来保卫我们的国家。现在竟然不是超员就是懒惰，不是懒惰就是脆弱，不是脆弱就是骄纵，不是骄纵就是叛乱，不是叛乱就是溃散。习惯于放跑敌人但却不习惯把敌人置于死地，有利于盗贼的形成但却不利于抵御盗贼，敢于凌犯上级但却不敢保卫上级，因此士兵能够欺凌副将，副将能够欺凌主帅。闽江以南地区的动乱正近在眼前，紧跟着长江以西地区又有人造反；四川的动荡消息刚刚传来，乘势在淮河以东境内又有人发难。无原则的宽容酿成了祸患，逐渐形成了风气，野草蔓延开来就难以清除掉，可仍然还没有停止。从前晋文公在城濮大战中，看到他的军队上级和下级之间有礼节，就知道他们可以使用。我朝太

祖皇帝开始明确治军的法令;让官兵一级服从一级,有谁稍略违犯,都要斩首示众,因此上下级之间有秩序,征讨过的地方没有不顺服的。这些都是为国家的精气与神髓作谋划啊!陛下您要急切地考虑它,那么祸患还能够消除。否则的话,就不是臣下我所敢谈论的了。

稳定国家要靠百姓,保卫国家要靠军队,二者一个关系到国家的生命与血脉,一个维系着国家的精气与神髓,是一天都不能够忽视的。然而用来保护养育百姓,调整驯服军队的办法,只有把士大夫当作医生、当作钢针了。圣人养育德才兼备的人,以便推广到平民百姓中去;任命将领和派遣主帅,以便保卫中原地区,也是用来加重戍守边境、管好部队的职责。现在身为士大夫的人,臣下我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陛下您把培植巩固国家的根本作为自己的心念,可是地方各级官员,却施行搜刮百姓财富的暴政;陛下您把振扬国家的威势作为自己的心念,可是那些称为将领、主帅的人,却趁机实现克扣军饷、破坏士气的私利;陛下您把兴起有利的事情、废除有害的事情,有功的人一定奖赏、有罪的人一定惩罚作为自己的心念,可是朝内朝外的大小群臣,都是用虚妄荒唐、得过且过、早晚只求眼前平安的花招来胡乱应付。这就难怪陛下您的真切仁德和诚实心意,不能够在百姓中间宣明与传达;而百姓对自己的怨恨不敢作声、不敢出气,也不能顺利地反映到陛下您那里。上面与下面在正常关系互相违逆之间被阻隔切断,那么百姓怨恨而要造反,军队怨恨而要叛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从前汉宣帝想平息渤海郡的动乱,获得到龚遂这个太守,他独自乘车来到任所,宣明和发布教化的政令,慰问和安抚百姓,盗贼就被他全部平定了,这就表明对百姓不忧虑他们不安分,凭借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够使百姓安分下来。唐朝的马燧在河东道担任采访处置使时,教给驾车、打杂的人骑马射箭,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得到二万名精锐士兵,这就表明军队不忧虑不强大,凭借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够控制住他们。因此在我朝建国初期,各地驻军长官不安抚百姓,就有朝廷对此绝不能容许的警告。至于向南征战,向北讨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兵力不超过二十万的军队,也只是

任命曹彬、潘美当将领罢了。这在国家把士大夫作为钢针药物来使用方面，明显的成效得到了极好的验证，很显然足以成为后人好好仰赖并维系持守的依据。汉唐两朝的美好政治，只是在一个朝代里显得很兴盛。现在陛下您所仰慕的是古代帝王的大道，您借鉴的是汉唐两代的言论，您所采取的是我朝祖宗遗留下来的完善的谋略。这样一来，现今所讲的使军心和民心归向同一目标的办法，总之要首先端正士大夫的心念，而用来端正士大夫心念的办法，又不过是首先端正陛下您的心念罢了。董仲舒有番话说：君主端正自己的心念，可以用来端正朝廷；朝廷端正了，可以用来端正所有的官员；所有的官员端正了，可以用来端正天下的百姓。推广到极限，直到天下各地，无论远处还是近处，就全都归于端正了。这又是从根本性的东西出发，扩展到功能和效用，属于古今都永远不能改变的最好结论。只希望陛下您在这上面确确实实地下大力气啊！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国家也太幸运了。臣下我冒昧地犯下死罪，非常恭谨地对答如上。〔章爱先译〕

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朕临政愿治，夙夜不遑康宁。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亲贤之为务。今选举之法，未戾于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当馈而叹。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与茂明之。

夫学术者，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达于性命之原，穷乎圣贤之指，形于气节，见于言议。平昔之所讲贯，其要可得闻欤?才智者，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或识国家之大体，或知民事之本末，材术足以裕邦计，谋略足以捍边陲。平昔之所蕴蓄，其亦有所本否欤?

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无所不用其至。进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时，或一榜才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或胪传之际，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欤?近岁州乡贡举，率多混淆，考核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选于礼部，又覆试于中书。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棫朴》之茂，丰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称朕意者欤?

学校之设，所以教养作成。庆历中，湖学最盛，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遂取其法，以教太学，而胡瑗职教京师，几二十年。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今负笈担簦，云集行都，来者甚众，而与选者甚寡，朕心为之恻然。其当何道使无道路之劳，而坐收教养之实欤?

资荫人仕，与寒畯同升，患其不学，故严程式，近岁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乃送审官考试；淳熙之议，欲令铨试本经法律，各取其半。今举行之，可欤?

书判之选，唐铨部常用之，至有龙筋凤髓之誉。建隆、天圣立拔萃科，或于内殿，或于秘阁。朕比以吏道之衰，复书判于吏部，以考狱官县令之能否，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其法可加详否欤?

贤良之举，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如富弼、张方平辈出焉。自熙宁以试进士策，与大科无异，由是罢之。绍兴、淳熙，追思前宪，下诏复置，而应书绝少。今可复之，茂异之才其出否欤？

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取该博华藻之士。比年以来，应选亦稀。朕方患词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何欤？

右科之设，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非特校虚文而课骑射也。兵兴累年，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欤？

遗逸之召，当取人于岩穴，如艺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招陈抟，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简册矣。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扬之旨者。抑又何欤？

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于下法。意之未尽、可商榷者，固朕所欲闻。若学术、才智二者，则下所以应上之求，有关于世道之大。子大夫贲然来思，必不耻于自言，其合而具陈之，毋略。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在位执政，希望实现大治，早晨晚上都顾不上安乐消停。常常想到自古以来，帝王没有谁不把亲近贤才作为大事来急切对待的。如今选拔举用方面的制度，并没有同古代相违背，可获取到合适人选的效应，却存在着不合人意的地方，因而常常在用饭时慨叹。你们这些读书人全都来到京师，身在殿廷，共同勉力讲明这个问题。

知识学问，这是君子用来维护持守统治大道的东西。对人的本性和上天既定的命运很明了，彻底闹清楚圣人贤人的主旨，在气节上显现出来，在言论上表现出来。平常所讲论贯通的内容要点，可以让人听一听吗？才能智慧，这是用来筹划措置当今社会的东西。有的明白国家的纲领，有的了解百姓事务的全部情况，才干足够用来使国家财政充裕起来，谋略足够用来捍卫边境地区。平常所蕴藏积累的事项，是否也有所依凭呢？

如今皇帝我搜罗天下人才的办法，没有一处不用尽心力。进士这种考试科目，从唐朝地位得到提高。在我朝列祖列宗兴盛时期，有的同一次考试，仅仅录取一百二十名，但却从中获得了四个贤能的宰

相。有的在宣布录取名单时,太阳闪射出五种光色,获取到许多著名的大臣。这究竟是凭借什么办法而达到这种地步的呢?近几年州郡向朝廷选送应试人员,大多优劣不分,考查验核的制度,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在礼部选取以后,又在中书省进行覆试。皇帝我对培育新人这一重大问题关注到极点了。像《诗经》中《棫朴》诗所颂扬的人才济济的盛况,像《文王有声》中所歌咏的丰水岸旁、芑草生长的数代仁德,你们这些读书人也拿得出符合皇帝我那心愿的好建议吧?

学校的设立,目的是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仁宗皇帝庆历年间,湖州州学最为兴盛,特地设立治道斋这一教学场所,用来讲论探明当今的事务。于是朝廷采取它的做法,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施行教育,并且责成湖学的开创者胡瑗在京师主抓太学教务将近二十年。这哪里仅仅是让生员比试一时间的优胜之处呢!如今背着书籍,挑着长把伞,像云团一样聚集在临时都城临安,前来读书的人特别多,可被选取的人却非常少,皇帝我内心里为他们感到痛惜。对此应当通过什么办法使生员免除道路上奔波的劳苦,原地不动就收到教育培养的实际成效呢?

凭借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这类官宦子弟和贫寒的读书人单靠科举而一起进用,担心他们没有学问,所以把荫恩补官的规则定立得十分严格,近年来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像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的诏令,先让这些人到国家学府学习经书两年,然后再送往审官院考试。孝宗皇帝淳熙年间的议论,打算在吏部主持的选用官员的考试中对这些人进行经书和法律方面的考试,分别录取一半人。如今完全照这样去施行,可以吗?

让官员当场撰写判决书这类文字的考试方式,唐朝吏部经常采用它,甚至产生了写得好就如同龙筋凤髓的赞语。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仁宗皇帝天圣七年,设置和重定书判拔萃科,有时在内殿举行考试,有时在收藏图书的秘阁举行考试。皇帝我近来鉴于做官原则与方法的衰落,特在吏部恢复书判拔萃科,用来考核司法官员和县令称职与否,这也是唐朝和我朝列祖列宗的旧制啊!具体规定是否能够再进一步详细些呢?

贤良方正这种科目,我朝列祖列宗用来收揽雄奇卓异的人物,像富弼、张方平这些贤臣就都涌现出来了。自从神宗皇帝熙宁年间因为用策问对进士进行考试,与贤良方正科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取消了它。高宗皇帝绍兴年间,孝宗皇帝淳熙年间,回想从前的成规,下达诏书,命令重新设置,可前来应试的申报文书却特别少。如今可以再恢复它。这样做,卓异突出的人才能否涌现出来呢?

自从哲宗皇帝绍圣元年起,朝廷通过设置宏词科,考试制、诰、诏、表等十二种文体,用来选取学问渊博、文笔华丽的人物。可连年以来,参加考试的人也很稀少。皇帝我正忧虑词章华采的衰败,想让各地的人士共同振兴起那股风气,可议论政务的人竟然认为所定立的制度还没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

武举这一科目的设立,原本上是用来显示朝廷重视武备,求取到身怀重大军事谋略的人,并非仅仅是比试空洞的兵法论述,看一看谁会骑马射箭啊!战争延续多年,但却还没听到过激昂慷慨、凭借超常谋略而闻名的人物。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民间隐士的征召,应当从山林把他们请到。像我朝太祖皇帝招请聚徒讲学的王昭素,太宗皇帝召见华山道士陈抟,真宗皇帝让种放从终南山来到京师开封,都在史册上光辉闪耀了。如今仍然没有能够符合《尚书·尧典》明察贤能、举用隐遁高士这一宗旨的举动,却又出自什么缘故造成的呢?

以上这八项政事,属于上面用来向下面做访求的办法。其中意思还有没穷尽、值得商讨的地方,固然是皇帝我想要再听一听的。至于像知识学问、才能智慧这两大问题,却是下面用来顺应上面的访求的,关系到社会政治将会如何的大局。你们这些读书人疾速地来到这里,一定不会为发表个人的看法而感到羞愧,综合起来详尽全面地陈述它们,不要太简略!

姚勉　廷对策

姚勉(1216~1261)　字述之,一字成一,新昌(今江西宜丰县)

人。宝祐元年(1253)进士第一,时年38岁。后因上书言事和指斥权奸,两为校书郎而两度免归。有《雪坡文集》传世。

臣对: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诏宾兴,九临轩御,求贤靡倦,博采刍荛。兹者进臣等于廷,策之以选举之八事,而欲得夫学术、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真尧舜之用心也。臣来自远方,怀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理乱安危之机,而圣问所及,乃止于此。其虑臣等触时讳而不使之言乎?抑亦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而问其所不备乎?甚非策士本意也。虽然,人才亦国家之重事。陛下求学术者,则欲其达性命而学圣贤,挺气节而发言议;求才智者,则欲其理国家而究民事,裕邦计而捍边陲,亦皆时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问,而条其所以对,然后以臣所欲言者,为陛下言之。惟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上帝降衷,烝民有则,孰非良心善性之赋!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则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古先圣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言古先圣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于义理之极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乡举里选,首废于周,而策士有科,始见于汉。既非古意矣,犹未至词章也。隋唐以来,始有进士。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益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心术日坏,以至于今,士习之趋,犹唐旧也。

虽然,今之士习,臣犹以为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绝响以来,士不知道。隋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韩愈。然皆得圣门之仿佛,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圣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于圣道皆昧指归。学道之士且然,而况科目之士!故士习难骤变焉。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敦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

矣。虽为科目之学，盎其心术，而道学之功，每从而救之。识之明者，亦多觉焉。臣故曰变今之士习为易。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则学术、才智之士，宜出为国家用矣。

陛下聪明天锡，问学日新，接尧舜精一执中之传，得孔孟《中庸》、《大学》之旨，陛下可谓知道之君矣。抑臣犹愿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则未免于以文耳，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无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间有能为天下用者，亦天资暗合耳，岂以道用天下者哉？

古之盛时，自八岁入于小学。其所学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也，礼乐、射御、书数之艺也。十有五而入大学，其所学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后世以来，所习者词章，所志者利禄。进士可以求仕，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学校可以求进，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学有几？已仕之人，可试尚多。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而道则不知；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而道则愈暗。武科则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遗逸则不过为终南捷径之求。道之不闻，弊乃至此！无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则下之士应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习，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则士习新，虽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学术、才智之乏哉！臣请为陛下疏言之，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朕临政愿治，夙夜不遑康宁。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亲贤之为务。今选举之法，未戾于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当馈而叹。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与茂明之。"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为用，而叹选举之难得士也。

臣闻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术者，本也；选举者，末也。今之人则选焉而得，举焉而获。本之不正，而惟欲于末以求之，虽日变其法而使详，日讲其术而使精，天下之所以应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则？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则道矣，求之末则文矣，文岂足以观人才乎？故成周之时，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德则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也；行则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艺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而独不言所谓道，岂非道贯乎三者

之中，而有德、行、艺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将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将。

古之人何以能是也？无所不通之谓道，知道则无所不能也。成周曷尝求之选举之末哉！乡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先教后兴，盖有素矣；兴而曰宾，盖有礼矣。岂若后世圜棘以试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贱乎？况乎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无所谓奔竞之习。今之所以教天下则异是矣！六艺云者，古人之所谓末节也，今之士亦皆不复知矣，而况所谓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科举已久其行，何敢轻议变革？臣但愿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不足尊。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轻；科举之念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以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

臣伏读圣策曰："夫学术者，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达于性命之原，穷乎圣贤之指，形于气节，见于言议。平昔之所讲贯，其要可得闻欤？才智者，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或识国家之大体，或知民事之本末，材术足以裕邦计，谋略足以捍边陲。平昔之所蕴蓄，其亦有所本否欤？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无所不用其至。"臣有以见陛下思得夫学术、才智之士，以为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

臣闻学术、才智，一事也。学术其体，而才智其用也。有学术而有才智，其人则君子；有才智而无学术，其人则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两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于圣问所及学术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则脉络相贯，事理相关，亦不可以异观者。是故达性命之原，则能穷圣贤之旨矣；秉正直之气节，则发忠鲠之言议矣；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谋略矣。臣请为陛下条陈之。

夫圣贤教人，惟性命之学而已。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命则天令之自然，性则仁义礼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为士者，当全天所畀付之

命，而尽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则一善而无恶，不可执气质之性以为性也。四端之性，则一真而非伪，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也。圣贤教人，不过如此。今之学者，则异是焉。资禀之下者，局于功利之申、韩；资禀之高者，溺于虚寂之释、老。高谈性命，藐视辈流。好虚议论者，无实事功；尚虚声名者，无实践履。为程颢之体认"天理"二字者，谁欤？为程颐之求孔、颜所乐何事者，谁欤？为朱熹之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者，谁欤？明善诚身之言，资士夫谈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诚也。格物致知之说，窃先儒绪论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体可以达用，精可以贯粗。而今之言道者，则以为无用之空谈，不能见于有用之实学。圣贤岂如是乎？臣故曰达性命之原，则穷圣贤之指者，此也。

夫议论者，自气节而发也。天下安有无所谓气节而有议论者哉？王素为谏官，以"独击鹘"见称，则王素之气节为之也。刘安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见惮，则刘安世之气节为之也。有欧阳修之气节，则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则初虽弹竦，而终则攻杜衍矣。有吕诲之气节，则能劾王安石之巧诈；如常秩，则始虽立节，终则附石矣。无气节而有议论，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气节言议视先正，似若少逊矣。以讦直为矫亢，以缄默为安静，以随声附和为不立异，以无所指斥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从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窃议时政，惟曰内批也，营缮也，近习之弄权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缴还内降如杜衍者，谁欤？论张尧佐四使如唐介者，谁欤？请不再建玉清昭应宫者，谁欤？夺任守忠节度，指曾觌、龙大渊奸利者，又谁欤？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从之也。无一人为陛下言者，而徒诿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无类于欺君乎？是皆气节不立之过也，而何言议之有？臣故曰秉正直之气节，则必发忠鲠之言议者，此也。

国家大体，其本在仁。艺祖皇帝陈桥驿之言，紫云楼之誓，子孙万世，根本在斯，爱养元元，是为大务。胡今膏泽不下于民？陛下《仁厚论》中所谓"以术辅贪、以材济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撤阛阓而广通衢，略无救正之谏；侈土木而穷事力，第先应办之

谋。以至监司守令之官,所谓承流宣化之任,而诸路台节,旷职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贪吏朘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肤。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盖不知有国,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

今之备边,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强?而今之兵赋,体统乖异。制阃则曰食少,总饷则曰兵多;制阃则曰乏粮,总饷则曰虚籍。岁行和籴,内斫本根。边有屯田,竟无效验。徒耗事力,不立规模。敌至则逃,敌去则舞。乘军之退,则以为功,愚弄朝廷,希觊酬赏。侧闻壬子之蜀祸,甚于丁酉之北兵,而掩败不言,惟以捷告。观其夺回虏掠三十万计,则知残害鱼肉凡几何人。生聚良难,岂堪频蹂?边之不能御,政坐不能练兵足食以为备,而徒以欺朝廷为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谋略者,此也。

是皆不知道而然也。无道中之实用,而尚虚文以欺世,其失故宜矣。故臣愿陛下,求才智于学术之中,而毋求才智于学术之外。苟不求其学术,而第求其才智,虽求士无所不用其至,非所谓至矣。陛下而先审乎此,则选举八事,臣得以次第而熟数于前。

臣伏读圣策曰:"进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时,或一榜才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或胪传之际,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欤?近岁州乡贡举,率多混淆,考核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选于礼部,又覆试于中书。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棫朴》之茂,丰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称朕意者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进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

臣闻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举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众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惟能窃用先儒之言而谓之明理学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义理也。词赋不本于理致,日以雕镌;经义不求其指

归，日以穿凿。至于论策之作，欲观其通达之才，而乃俪叶骈花，抽黄对白，竞为纤巧之制，无复浑厚之文。世变如斯，可为太息。然此犹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冒举，挟厚资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

臣观有唐取士，乡贡以荐而充。虽或间有私情，不敢大废公论。有如武陵之托杜牧一赋，韩愈之荐侯喜数人，允为得才，今岂能及？故唐之世虽曰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曰公，而实用私情。臣为科举之谋，其说有二：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一曰公覆试于其终。科举所选考官，必有出身科第之人，然后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为，方今诸州贡士之际，以至省闱廷对之时，精选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谬得科第，决不使与校文，则不至于滋缪种矣。昔仁祖朝，用欧阳修典贡举事，一脱西昆之体，丕变嘉祐之文，用能革险怪之刘几，得名世之苏轼，皆考官得人之验也。臣故曰严考校于其始。

今日省闱取士之后，必行覆试，可谓良规。独于州县取解之时，虽有帘引，未免文具。使乡举果皆得实，则省闱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间，奉行不恪，以覆护为长厚，以驳放为过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将安用？臣谓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连坐之罚不严。傥自今以往，省闱覆试不通者，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则必可以得实材矣。前日都堂覆试，已极堤防，然虽能察张奭曳白之庸，未能觉温岐潜救之巧，似闻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脐，后当加意，毋使人谓清明之世而犹有是也。昔艺祖时，徐士廉诣院，诉榜不公，始命覆试。当时考核，可谓至公。虽以陶谷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审察，此覆试尽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试于其终。虽然，此犹未为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尝因县补，明布训谕，俾父兄毋为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傥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义，则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才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廷唱之际，五色云见，而得世名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时乎！

臣伏读圣策曰："学校之设，所以教养作成。庆历中，湖学最盛，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遂取其法，以教太学，而胡瑗职教京师，几二

十年。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今负笈担簦,云集行都,来者甚众,而与选者甚寡,朕心为之恻然。其当何道使无道路之劳,而坐收教养之实欤?"臣有以见陛下轸念学校之士,而欲加教养之功也。

臣闻学校者,最近民而易以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安废学之失,外则有挑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太学四方所聚,实系观瞻,而乃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太学尚然,况乎天下!有如省闱之试,辄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确然不行,则幸门何由而启?而乃务为姑息,复与放行,弊例一开,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乡井,乃遍州郡而行类申,曾不几时,又复中变。于是补阙之士,云集京师,无鼓篋孙业之风,如螯弧先登之状,躁死不可胜计,仁人岂所忍闻?是皆启侥幸之心,所以激纷纭之祸。

迩者廷臣欲分路而试,其法亦可谓良。而臣为学校之谋,其说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一曰示奖励之微机。夫养士,欲养之以为异日用也,而可徒教以无益之时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而后可也。今天下监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于学校之外,创立精舍,讲明义理,意固善矣。而精舍讲道,学校习文,然则学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当如此异其趋也。昔先儒程颢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养人才为本。宜访经术充备足为师表、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自洒扫应对,以修其孝弟忠信;明善诚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学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之受其业。若颢此言,则臣所谓教养之良法也。

科目、学校,自是两涂。欲立学校之规,当于科目之外。方今太学舍选,亦与科举并行,固亦此意。然舍选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谓行,则坐斋满季,无私过议罚之谓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况太学为然,而天下之学不皆然乎?程颢又曰:择学明德尊者,为

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节、通明学业、晓畅治道者。若颢此言，则臣所谓奖励之微机也。虽然，师儒则每难于择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为太学师，取湖学以为太学法，爰教人以有用之学者也。当时伊川程颐，实在表倡之列，天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颢之言以为法，命胡瑗之类以为师，则士无道路之劳，而有教养之惠矣。

臣伏读圣策曰："资荫入仕，与寒畯同升，患其不学，故严程式，近岁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乃送审官考试；淳熙之议，欲令铨试本经法律，各取其半。今举行之，可欤？书判之选，唐铨部常用之，至有龙筋凤髓之誉。建隆、天圣立拔萃科，或于内殿，或于秘阁。朕比以吏道之衰，复书判于吏部，以考狱官县令之能否，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其法可加详否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察任子于未仕之初，而且欲察县令狱官于已仕之后也。

臣闻夫已仕、未仕之人，皆当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则未仕者固无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请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岁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从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资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考第未满，举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识如吕端，问学如张栻，岂不足以为天下之用？独斯人之不多得耳。身燠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饫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福威。寒畯生长《诗》、《书》，明习义理，决不至有是也。臣谨按《春秋》讥尹氏之世卿，讥仍叔、武氏之子弱，则任子之不当有，明矣。

臣观古人，赏曰世延，仕曰世禄，使之有田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自汉朝。必父兄真知其子弟之有材，然后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则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才玷郎秩，荫可及门，则不复为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为己子之计，故不复以任子为非也。是必为父兄者，如先正之不为子弟祈恩；为子弟

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门荫,则善矣,然而难能也。臣谓任子之恩,朝廷当稍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少减奏荐之数;每岁一铨,必严考核之法。如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使稍知道,然后如淳熙之议以试之,斯可矣。否则亦文耳,文岂足知任子之贤否哉?

至若令录之官,尤当深识道理。使为县令者,常有学道爱人、弦歌为邑之意;为狱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则书判虽不试而何害?苟为不尔,虽有龙筋凤髓之誉,徒美观也。虽中书判拔萃之科,亦虚文也。士而能为文章,安有不能书判?此但可以观其曲直是非之识耳。其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而知之哉?虽然,臣犹幸铨闱之试,尚可以惧愚骀之任子;书判之试,尚可以惧庸缪之令录也。抑臣闻之,试则当公,不公则不必试。闻之道路,铨闱固可捐厚资而得传义,书判亦可先嘱省吏而得案牍也。傥或无之,言之者固无罪;万一有此,闻之者不足以为戒乎?试已非古矣,试而私焉,曷若不试乎?惟陛下察之。

臣伏读圣策曰:"贤良之举,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如富弼、张方平辈出焉。自熙宁以试进士策,与大科无异,由是罢之。绍兴、淳熙,追思前宪,下诏复置,而应书绝少。今可复之,茂异之才其出否欤?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取该博华藻之士。比年以来,应选亦稀,朕方患 词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复贤良之科,以收魁垒杰特之士,而又欲新宏词之科,以收该博华藻之士也。

臣闻异等大科,皆当知道。苟不知道,名贤良者固无足观,名宏博者亦无足观也。臣请先以贤良言之。今世贤良,久废不举,盖自淳熙以后无之矣。夫贤良者,所以待非常间出之士也。三岁大比之时,所得恐或常士,于是又设贤良之科以取之。能谋王断国,斯可谓之贤良;能直言极谏,斯可谓之贤良。此名未易当也。熙宁之朝,以贤良与策士无异,由是罢之,盖有深意。自苏轼兄弟以直言对策,简知仁宗,其后立朝,风节坚劲,争论新法,积忤大臣,故当时怒影移木,并贤良之科而罢。然而本朝贤良知道,盖亦可数。如富弼,如张方平,如苏轼、辙,是真贤也,是真良也。奸邪之夏竦,倾险之李清臣,谓之贤良

可乎?读人所不知之书,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为世所不能之文,曷若为世所可用之才!千门万户之书,何补于晋之衰!济水帝丘之对,何益于唐之乱!公孙宏之贤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贤良;牛僧孺之贤良,固不若裴垍之贤良也。贤良今不复试矣,贤良之才,臣不敢诬天下以无人也。但所以取之者,当以其道耳。

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祈招》之诗则不能知,以救楚围之汰。是知记问之浩博,适足以为玩物丧志也。贤良之策,亦始于汉朝。观其策晁、董、公孙之徒,无非问之以谋国之大方,为政之大略,初未尝以隐僻难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记杨万里上书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详。孟献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乃若孟子,则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孟子之所能也。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万里此言,则上所以策贤良之道也。程颐亦有言曰: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宏犹强起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则自求举耳。若曰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尚可。若志富贵,而得志则骄纵,失志则放旷与悲愁而已。若颐此言,则下所以为贤良之道也。

至若词学之科,其文犹当贯道。文不载道,虽华奚观?文章所以黼黻皇猷,号令所以鼓舞天下。词气萎苶,世道系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诏四方,自今三年省闱,别立小词科,一试激昂表厉,陛下可谓得其术矣。但愿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赡之才,出应搜罗之意。谨毋以舍大就小,即易去难,为浮议所摇,方行而复辍也。又既设此科,当寿其脉。傥使真无可取,亦当短中求长。市骨而骏马自来,悦画而真龙必至。苟进取之无阶,则习尚之无益。然臣闻之,异科之才多负劲气,出而为世用,每不见容。熙宁之罢贤良,盖以苏轼兄弟之故。近时词科之不取士,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词臣,忤于当国。既已逆其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罢其科。不然,何名存而实废也?惟陛下察之。

臣伏读圣策曰:"右科之设,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非特校虚文而

课骑射也。兵兴累年,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也?"臣有以见陛下慨念时艰,思欲得武略之士以为用也。

臣闻以武设科,虽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议之矣。贡荐额狭,选举路艰,于是以武为捷径,而求为右科之试。能诵兵法者,罕能兼骑射之习;能使弓马者,罕能兼刀笔之长。于是能文者代课《七书》,能武者代执鞭弭,是无非欺朝廷也。间有能兼二者之长,亦不过苟一时之试。求其英略,宜而无闻。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后改京者;今之武举,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既登武级,复试文闱,换侵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矣。陛下于此,方且求其英略焉,可谓按图而索骏矣。寇准器兼将相,非右科也;韩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举也。此犹文士也。岳飞、韩世忠诸将,亦尝自武举中来乎?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举为速化之地,则英略者出矣。

臣伏读圣策曰:"遗逸之召,当取人于岩穴。如艺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陈抟,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简册矣。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扬之旨者,抑又何欤?"臣有以见陛下广罗人才,而取遗逸于科目之外也。

臣闻逸民之举,天下归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汉。遗逸固有国之所先也。然而不求闻达,而后可谓之遗逸;借此以钓名者,非也。不慕荣贵,而后可谓之遗逸;阶此以媒进者,非也。汉有樊英,终于败节;唐有藏用,亦至损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无大异。审观其后,然后秩伪而雍真矣。其羹藜饭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制芰,非不愿文绣也。将有所待也,是作伪也,非真隐也。夫治天下者,进恬退之人,固可以风奔竞之士,然而恬退之伪者进,则奔竞者愈竞矣。恬退之伪,奔竞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犹议之,况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如陈抟,斯可矣。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遗逸为捷仕之径,然后诏内之侍从台谏,外之监司郡守,举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则竞科目、逐利禄者亦可以少弭矣。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与臣所以奉天对者,已略尽其概。而陛下于其终复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于下法。意之未尽、可商榷者,固朕所欲闻。若学术、才智二者,则下所以应上之求,有关于世道

之大。子大夫贲然来思，必不耻于自言，其合而具陈之，毋略。”臣有以见陛下求言之意，有加无已，以八者责之已，而以二者责之臣等也。

愚臣浅陋，何足以仰承圣问？抑臣之意，则终愿陛下以道淑天下，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谓尽矣，而陛下犹以为未尽者，是无乃详于法而略于道乎？今日之患，乃正在于下之求上者，切于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于下者，虽广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检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上者，投牒觅举，肆欺售伪，无所不至，又岂如汉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为耻，又岂特耻于自言而已乎？风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后之所趋，又当何如也。然此选举事也。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已丑、壬辰，不敢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则僭，欲隐而不言则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略言之，可乎？圣问之中有气节言议之说，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是二者，敢以二说为陛下献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

何谓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汤之执中也，曰立贤无方；武王之建极也，曰无偏无党。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后可谓君子。君子者，未尝有所谓党，而上之人亦不当以党视之。禹、皋叶忠于事舜，而言焉不合，则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于辅周，而事有不可，则或不悦，不诡随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苏轼不狥熙丰，亦不阿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党视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国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为党。空党锢以危汉，空清流以祸唐。而指元祐臣寮为奸党者，宣、靖之时空国而无君子，其祸尤不忍言也。

独惟有道之朝，虽倡为朋党之论而不胜。方庆历诸贤之用事也，夏竦等辈结内侍蓝元震上疏，谓仲淹、修、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仁宗虽不之信，未几诸贤相继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

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动摇之术也。独惟仁皇天意终定,浮云暂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时,皆用庆历之彦,而成功致治,竟是当时指为朋党中之人。然则君子之党,何负于人之国哉?

何代无贤!固有居今之时,义胆忠肝如庆历诸贤者,而或者以哗竞朋比目之。陛下本无是心也,臣意必有倡为是论者矣。夫使真哗竞,真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论国事为哗竞,以志同道合为朋比耳。夫以好论国事为哗竞,则喑默唯阿、辕驹伏马者为是乎?以志同道合为朋比,则怀奸相结、根蟠株据者为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晓也。

大概今日之弊,在于用一宰相,则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则凡在其时者,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吴育犹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张浚既罢,而赵鼎犹不变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论台谏者有二。前日大臣进拟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其一则犹縶白驹之谷。得非前日之论台谏者,其台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后之论台谏者,其谏臣犹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谏臣,心乎体国,则必如彦博之不憾唐介,夷简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于此?况西蜀之贤,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异罚,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

中者,非执一之谓也,亦非参用之谓也。元祐调停,为祸不细;建中靖国,何以为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远谪,谓除误国殄民之外,并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议旨挥,他皆未及,独惟前日之柄相密党数人,首拜此惠。是得无类于调停,以平旧怨者乎?夫其据言路,为宰属之时,陷忠良不知其几,误国殄民孰有大于此?而首蒙湔灌!臣甚为执事者羞之。臣愿陛下与大臣自今进退人才,秉执公道,不肖者终身可弃,忠良者一眚不遗,且毋使大夫有西人、东人之讥,毋使天下有蜀党、洛党之说,则人才之气节者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者,此也。

何谓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舜闻一善,若决江河;禹闻昌言,下车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而人有法家拂士,则出无敌国外患也。汉有汲黯,淮南为之寝谋;唐有温造,悍将为之堕胆。二鲍可以敛贵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于人国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轻视之?古之危邦,未尝不箝谏者之口,以自涂其耳目。贺琛之言,未为

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景之祸，竟无与言。张九龄之谏，可谓忠鲠，唐明皇黜之，他日禄山之变，曾不知觉。泛观史传，如此甚多，不可枚数也。

独惟盛时，则不若是。仁祖朝士气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枢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陈执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叩铜环之呼，事关宫禁也，仁祖虽以是黜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灯笼锦之诋，事关廊庙也，仁祖虽以是谪唐介，亦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养直言者如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谏官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思之忠，百官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当时天下延颈太平，徒以一鉴早亡，诸贤失助，相踵而去，渐已销声。淳祐初年，柄相当国，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议，于是直气日销矣。

今虽更化，神观未收，噤无能言，萎瘁滋甚。泛观士大夫之奏疏，无复我先正之绪余。凡而封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臣谓直言之不振，原于直气之久销。陛下责诸臣以先正能言之风，当责圣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圣度天广，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显用者。得非陛下虽能容其批鳞之直，而终不能无逆耳之厌乎？台谏许以风闻，祖宗自有典故。陛下迩者宸翰，乃责其廉访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后言，臣恐自此无言者矣。况其一台臣已去职，其一则犹未至国也，而并罢之，可乎？其逊避再三，久而后就，而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见听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为结言者之舌，不亦甚乎！

前日台臣之罢，或如圣训之言，然而外议纷纷，则不谓是。咸曰台臣之仆隶，怒于近幸之貂珰，浸润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万万无之，第惟台臣未去之先，偶有仆隶交斗之事，是以外议不能无疑心。固不然，迹则相似。万一因循不革，遂长此风，则汉之常侍必横于司隶，唐之中尉必横于南衙矣。陛下固不纵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渐也。苏轼有言曰：奸邪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乃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

采委靡之余,虽豪杰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尝终日废飧,中夜不寐,以为方今事势,盖有莫大之隐忧。火未及然,安于薪寝,所赖朝廷有见远识微之士,必能为陛下陈长虑却顾之谋。而迩日以来,言者畏忌,天下有患,陛下谁与销之?臣愿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时,次用端平之初政,广辟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从,置之无害,悦或可用,岂小补哉!则人才之言议者出矣。臣故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者,此也。

臣草茅愚生,不识忌讳,忠爱一念,与生俱生。陛下可为忠言,故敢于圣问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谓出位犯分矣。大则殛而投之鼎镬,小则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饴,九死无悔。虽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岂以臣一蝼蚁,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历议弊端,旁忤贵幸,将恐第刘蕡之策者,虽嘉其忠,而不敢进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来,所学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谀悦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语可裨时政,虽黜不恨也。臣固万不及刘蕡,而堂堂天朝,岂唐比哉?臣可以无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听之,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曾十次颁发诏书,命令各地向朝廷选送人才,又九次驾临集英殿,亲自主持进士考试,求取贤才不厌倦,广泛听取民间普通人的意见。如今又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选举方面的八项政事来进行策问,并希望获取到关于知识学问、才能智慧这两大问题的完满回答,来扶持社会政治,这真真是唐尧、虞舜那样的用心啊!臣下我来自远离京师的地方,心怀忠诚准备倾吐出来,猜想陛下准会用当今需要解决的大事和治乱安危的关键进行策问,可圣上策问所涉及的问题,竟局限在这些方面。这恐怕是担心臣下我等人触及眼下的忌讳而不让他们讲论吧!或许是想到臣下我等人事先准备好应付考试的文章,而询问他们没有料到的问题吧?这可太不是朝廷策问士子的原本意图了。尽管如此,人才也属于国家的重要事体。陛下求取具有知识学问的人,是想让他们明了人的本性和客观命运,向圣人贤人学习,显现出气节并发

表个人的看法。求取具有才能智慧的人，是想让他们治理国家，处理好百姓事务，使国家财政充裕并捍卫边境地区。这也都是当前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臣下我敢按陛下的询问，逐项对答所应对答的内容，然后用臣下我想说的东西，为陛下言说它。只希望陛下尝试着给予听断。

臣下我听说用文章来求取天下的士子，不如用大道来完善天下的士子。用大道来完善天下的士子，这是端正他们的心志啊！用文章来求取天下的士子，这是败坏他们的心志啊！上天赐给人善良的本性，众百姓具有与生俱来的行为准则，哪一个不是善良本心、善良本性的承受者呢？只是百姓从一生下来就很淳厚，随着所看到、所习惯的东西才发生变化，这是教导他们的人方法不对头罢了。《中庸》上说："天所赋予给人的叫做本性；随顺本性，叫做大道；修明大道，叫做教导。"这是讲古代的圣明帝王教导天下的办法，只在于修明那种使世人心性保持适中状态的大道啊！《大学》上说："高深学问的纲领，在于显示出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地步。"这是讲古代的圣明帝王显示他们内心的光明德性，来使天下民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都达到义理的极致啊！古代用来完善天下的东西就像这样。自从由地方基层组织选送荐举人才的制度，在周朝以后头一个被废弃，而通过询问来选用读书人，并且定有科目，这在汉朝才最先看到。但它已经不是古代的用意了，可还没发展到专凭文章啊！隋朝和唐朝以来，开始设有进士科目。科目的引诱既经设下，利禄的风习就更牢固。然后天下的读书人越发不知晓所说的大道，思想心计一天比一天败坏；一直到现在，读书人风气的趋向，仍和唐代一个样。

尽管如此，改变当今读书人的风气，臣下我还认为容易花力气解决。这是为什么呢？自从孔子、孟子失去继承人以来，读书人都不知晓大道。隋朝时期，只有一个王通；唐朝时期，只有一个韩愈。但他们全都仅仅获取到圣人真传的表面的东西，还没深入到这种大道的精深玄妙的境界。像王通认为圣人的心迹存在着差异，韩愈认为人的本性存在着三个等级，他们对于圣人的大道全都不明白主旨所在。

研习大道的读书人尚且这样,何况那些光想科举应试的读书人呢!所以读书人的风气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上天使我朝开辟,大道统系又接续上了。太祖皇帝曾问大臣赵普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回答说:道理最大。这句话一确立,声气感应,同类相从,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掌管人间文运的奎宿区域,奇异的人才隔一段时间就出世。有居住在濂溪的周敦颐首倡道学的开端,有河南的程颢、程颐推进道学的发展,有关西的张载辅助道学的扩大。朝廷转移到南方以来,有朱熹来推广它,有张栻来讲明它。于是全天下的读书人也大致听到古代圣人所说的大道了。尽管把力气用在科举应试的学问上,败坏了他们的思想和心计,但道学的功用,常常随后挽救他们。见识通透的人,也大多觉悟过来。因而臣下我说,改变现今读书人的风气还算容易。假使掌权的人不专用文章来求取天下的士子,而专用大道完善天下的士子,那么具有知识学问、具有才能智慧的士子,按理会涌现出来,被国家使用了。

陛下奇异的天资由上天特别赐予,探究大道的奥妙一天一个样,承接唐尧虞舜精粹纯一、执守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的传授,获取到孔子、孟子、《中庸》和《大学》的义旨,陛下称得上是了解大道的君主了。可臣下我还是希望陛下推广这大道来完善天下的读书人啊!但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的东西,却还没有摆脱掉用文章啊!这可不是完善天下读书人的方法。教导没有长期的功夫,访求得到的人也就很平庸了。偶尔碰上能被天下所使用的人,也只是天资暗暗吻合罢了,哪里是凭借大道来效力天下的人呢?

古代强盛的时候,人们从八岁进入小学这种初级学校。所学习的是洒扫门庭、回答问话、上堂下堂的规矩和礼仪、音乐、射箭、驾车、写字、计算的技艺。十五岁进入大学这种高等学校,所学习的是探究事物道理、充实知识、意念真诚、端正本心、修明自身、整顿好家族、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一整套功夫。这是古代士子大多属于全才的原因啊!后世以来,人们所研习的是文章,所追求的是利禄。进士这种考试科目能够谋求到官职,于是藏带书籍、请人代上考场的人就出现了。学校可以谋求到升官的途径,于是假冒他人姓名、籍贯的人就出

现了。世代做官的人家，能够学习的会有几个？已经做官的人，需要对他再做考试的还有很多。以贤良名义推荐的人，只是观看冷僻的书籍和奥秘的解说，但大道却不知晓。应试宏词科的人只是研习奇特的文章和华丽的词藻，但大道却越来越搞不清楚。参加武举的人哪里真具备像武举出身的唐朝郭子仪那样的将帅学问，隐居的人只不过谋求尽快做官的途径。大道不去闻知，弊病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了！原因不是别的，掌权的人用文章做为求取人才的东西，在下面的士子也只是用文章做为应对的东西。陛下打算让读书人的风气焕然一新，为什么不首先端正人心呢？人心端正了，读书人的风气就焕然一新了。尽管通过科目求取士子，也就全都获得到合适人才了，还缺乏什么具有知识学问、才能智慧专长的人呢？臣下我请求为陛下分条言说这个问题，恭谨地不避死罪献上愚蠢的对答。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皇帝我在位执政，希望实现大治，早晨晚上都顾不上安乐消停。常常想到自古以来，帝王没有谁不把亲近贤才作为大事来急切对待的。如今选拔举用方面的制度，并没有同古代相违背，可获取到合适人选的效应，却存在着不合人意的地方，因而常常在用饭时慨叹。你们这些读书人全都来到京师，身在殿廷，共同勉力讲明这个问题。"臣下我由此而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谋求大治非常迫切，希望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加以任用，但又感叹选举很难得到人才啊！

臣下我听说向细微的方面去求取，不如向根本的方面去求取。思想心计，这属于根本方面；选拔举用，这属于细微方面。如今的人才通过选拔而得到，通过荐举而获得。根本的方面不端正，却只打算在细微的方面去求取，尽管天天改变规定而使它详密，天天讲求具体办法而使它精细，天下用来应对的，也只是限定在像那样会写点儿文章的人罢了。这是为什么呢？根本的方面不去谋求却去谋求细微的方面，压根就只能这个样啊！谋求根本的方面就都奉行大道了，谋求细微的方面就都沉溺文章了。文章哪里足够用来鉴别人才呢？所以西周的时候，凭借品德、行为、大道、技艺兴用天下的贤能人士。品德即六德，也就是明智、仁爱、预见、适宜、忠诚、和善；行为即六行，也就

是孝敬父母、兄弟友爱、亲睦宗族、亲近亲戚、对朋友讲信用、怜悯救助穷人;技艺即六艺,也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写字、计算。但却偏偏不讲所谓的大道,这难道还不是大道已经贯穿在这三方面的里头,而具有品德、行为、技艺的人都不能不了解大道吗?因而文武不分为两个方面,具有武艺的人也都具有文才;将帅和辅相不分为两个系统,能够担任辅相的人也都可以担任将帅。

古代的人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没有什么不通晓的,这叫做大道。懂得大道,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西周什么时候谋求过如何选择举用这类细小方面的事情呢?乡间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件事教导众百姓,推荐和尊重突出的人。首先是教导,然后是推荐,这就具有长期的功夫了。推荐而称作宾客,这就具有礼节了。哪里像后世用荆棘围成座位圈来测试他们,把姓名密封起来考试他们,这种对待的方式也太看不起考生了吧?况且古代任用士子的办法,献给王室的推荐书尽管收藏在国家的档案馆,而做官的地点却不超出他们所在的本乡本土。所以全天下的士子,都知道自我尊重,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钻营奔走往上爬的习气。如今用来教导天下的东西却和这种情况不一样了。称为六艺的东西本来是古人所讲的细枝末节的东西,可现今士人也全都不再知晓了,何况所讲的六德、六行呢?还没做官的人追求进士登第拿第一,做官的人追求品级高的官位,获取不到就不罢休,越往上爬就越贪婪。抛弃父母,同亲戚闹翻脸,远离祖宗的坟墓和本乡本土,显出死活追逐的一副模样,光想获取到名利官位,这是科举制度确有缘由地使他们败坏了呀!科举制度已经推行很长时间了,哪里就敢轻易地讨论对它变革呢?臣下我只是希望陛下用大道完善天下,使天下的读书人明白仁义忠信这类天赋的爵位值得看重,而公卿大夫这类人定的爵位不足以看重;明白正义的荣耀值得尊崇,而权势的荣耀不足以尊崇。利禄的心思淡下来,科举应试的念头也就淡下来;科举应试的念头淡下来,不得已然后去参加科举考试,不重名利地位和沉静稳重的士子就涌现出来,而死死赖定、没有廉耻的风气也可以稍略止息了。这哪里还会有获取到人才,效应却不合人意的地方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知识学问,这是君子用来维护持守统治大道的东西。对人的本性和上天既定的命运很明了,彻底闹清楚圣人贤人的主旨,在气节上显现出来,在言论上表现出来。平常所讲论贯通的内容,要点可以让人听一听吗?才能智慧,这是用来筹划措置当今社会的东西。有的明白国家的纲领,有的了解百姓事务的全部情况,才干足够用来使国家财政宽裕起来,谋略足够用来捍卫边疆地区。平常所蕴藏积累的事项,是否也有所依凭呢?如今皇帝我搜罗天下人才的办法,没有一处不用尽心力。”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想得到具有知识学问、具有才能智慧的人士,来被天下所使用,但却慨叹如今世上没有这样的人选啊!

臣下我听说知识学问和才能智慧,原本就是同一码事。知识学问是本体,而才能智慧是施用。具有知识学问又有才能智慧,这样的人就属于君子;具有才能智慧却没有知识学问,这样的人就属于小人。陛下求取人才,一定要一律求取那两方面都具备的第一流的人,不能各自求取只具备一个方面的人。至于圣上策问所涉及的知识学问方面的四种表现,才能智慧方面的四种表现,脉络相互贯通,事理相互关联,也不能够把它们单独分开来看待。所以对人的本性和上天既定的命运很明了,就能够彻底闹清楚圣人贤人的主旨了;秉持正直的气节,也就能发出忠恳耿直的言论了。明白国家的纲领,也就了解百姓事务的全部情况了;具有使国家财政充裕起来的才干,也就形成捍卫边境地区的谋略了。臣下我请求为陛下分条陈述它们。

圣人贤人教导世人,只是集中在关于本性和命运的学问上罢了。在上天就属于命运,在世人就属于本性。命运是上天安排的自然状况,本性是仁爱、适宜、礼节、明智这四种道德观念的开端在人身上原本就具备的呀!所以作为读书人,应当成全上天所赋予的命运,又竭尽世人所固有的本性。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就完全是善良而没有邪恶,不能够拿心理和生理素质的秉性认为是人的本性。作为四种道德观念的开端的本性,就完全是纯真而不是虚假,不能够拘泥佛教、道家所说的性情而认为是人的本性。圣人贤人教导世人,不过就像这样。如今求学的人,却与此大不相同。天资秉赋低下的人,局限

在讲求功利的以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范围以内；天资秉赋高超的人，沉溺在讲求虚无空寂的佛教、道家的学说中。高谈性理命运，看不起一般人。喜好空发议论的人，没有实际的事业功绩；看重虚飘名声的人，没有实际的具体行动。真在程颢所提倡的体察认识“天理”这二字上下功夫的人，有谁呢？真在程颐所提倡的探求孔子、颜渊对哪些事情感兴趣上下功夫的人，又有谁呢？真在朱熹所提倡的要为朝廷谋划部署重大政事上下功夫的人，还有谁呢？昭明最完善、使自身真诚的主张，不过给士大夫增添了一个谈论的话把儿而已，压根就不懂得最完善究竟应该怎样去昭明，自身应该怎样去达到真诚。穷尽事物的道理、充实知识的说法，在今人手里，不过把前代名儒的传统理论偷取过来罢了，压根就不懂得事物要怎样去穷尽它的道理，知识该怎样去充实。大道对天下人来说，本体可以实现它的功用，精妙可以统贯粗略。可如今讲论大道的人，却认为这是没有用处的空洞理论，不能在具有用处的务实学问上显现出来。圣人贤人难道真是这样吗？所以臣下我说，对人的本性和上天既定的命运很明了，也就能彻底阐清楚圣人贤人的主旨了，原因就在这里。

对国家大事提出看法，是从气节引发出来的。天下哪里存在着没有人们常说的气节却能对国家大事提出看法的人呢？仁宗朝王素担任谏官，凭借“独击鹘”这一美誉而受到称赞，这是王素有气节才造成这样的。哲宗朝刘安世在负责议论政事的职位上，凭借“殿上虎”这一美誉而被人畏惧，这是刘安世有气节才造成这样的。具有欧阳修那样的气节，就能够排击夏竦的奸邪；但像王拱辰，起初虽然也弹劾夏竦，但到最后却攻击贤相杜衍了。具有吕诲那样的气节，就能够劾奏王安石的巧诈；但像常秩，起初尽管也树立节操，但到最后却依附王安石了。没有气节却能对国家大事提出看法，天下存在着这种道理吗？如今的士大夫，气节和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比照从前的典范人物，好像差一些了。把揭发人的过错而不讲情面看成是故意与人违异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把对政事不表态看成是安稳沉静，把随声附和看成是不故意与众不同，把没有什么指摘斥责看成是不贪图名声。陛下并非不容纳接受正直的言论，也并非不放弃自己的看法而依从

他人,可是竟然没有提出意见的人。如今天下私下议论当前的国政,光是说皇帝亲自决断,并直接交付有关机构去执行事务,光是说大兴土木工程,光是说皇帝身边的人玩弄权势,后妃的亲属封官授职。然而像杜衍那样把皇帝直接批发的圣旨退回去的人,有谁呢?像唐介那样反对一日之内就封拜仁宗张皇后伯父张尧佐四个高级官位的人,又有谁呢?奏请不再修建玉清昭应宫的人,还有谁呢?要求撤销任守忠的节度使职务,指斥曾觌、龙大渊奸邪谋利的人,又有谁呢?如果真有一句劝谏的话,臣下我知道陛下一定会听从的。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为陛下进谏,只是找借口说,恐怕陛下不接受。这是不是同欺骗君主很相像呢?这全都属于气节没树立的过错,还有什么劝谏议论呢?所以臣下我说,秉持正直的气节,就一定能发出忠恳耿直的劝谏议论了,原因就在这里。

国家的纲领,根本在于仁德。太祖皇帝在陈桥驿的言词,在紫云楼的誓言,子孙万代,根本就在这里。爱护抚养百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现在皇恩不能施布到百姓那里呢?因为陛下《仁厚论》中所讲的"用巧妙的办法来辅助贪婪、用才干来助成暴虐"的现象,往往都存在。就像去年,接连出现严重的灾害,九个郡的生灵变成了喂鱼喂鳖的场所,众多的百姓住宅变成了烧成灰末的地带,不加以赈济抚恤,百姓的生命还叫做什么呢?但是拆除街市的店铺来拓宽大道,一点也没有救护纠正的劝谏;扩大土木工程而用尽一切力量,只是把应命承办的招数放在第一位。以至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郡守县令这些官员,成了只是口头上说说的承受朝廷对百姓的恩泽、宣达教化的职任,而各个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不履行职责的也特别多。严明的监察官不任命,哪里会有什么正派人可以看到呢?贪婪的官吏榨取百姓的财产,暴虐的官吏残害百姓的肉体。陛下深深拱立在皇宫里面,又哪里会了解这种状况呢?这大概是不知道有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百姓啊。臣下我因而说明白国家的纲领,也就了解百姓的全部情况,原因就在这里。

如今的边境防备,重在军队和军粮。军粮如果不充足,军队通过什么会强盛?可现在的军费征收和物资调拨,却体制不统一。各地区

统领部队的制置司一说就是军粮太少，而负责供应的总领所一说就是兵员太多;制置司一说就是缺乏军粮,总领所一说就是兵员花名册上有空额。每年实行预购粮草,在内地损伤了国家的根基。边境设有屯田,最后都没有成效。白白耗费力量,不定立有效的制度。敌军来到就逃跑,敌军撤走就特别高兴。跟在撤走的敌军后面假装追击,把这作为功劳。愚弄朝廷,希望得到重赏。臣下我从旁边听说淳祐十二年的川蜀战祸，远比嘉熙元年元兵入境还厉害，但却隐瞒战败不提起，只是用取得胜利向朝廷报告。看一看报捷的人说是夺回被元兵掠走的人算起来有三十多万，就知道他们总共残害屠杀了多少百姓了。人口繁殖和物资积蓄确实特困难,哪里经受得了频繁的蹂躏?边境不能够守卫住，弊病正在于不能够训练军队，使军粮充足来作防备，而只把欺骗朝廷作为心思啊! 所以臣下我说，具有使国家财政充裕起来的才干,也就形成捍卫边境地区的谋略了,原因就在这里。

以上种种情形，都是不懂得大道而造成的。没有大道最为适中的那一准则的实际运用,却崇尚虚浮的言词来欺骗世人,它那过失因而就免除不掉了。所以臣下我希望陛下，在知识学问中求取才能智慧，不要在知识学问以外求取才能智慧。如果不求取一个人的知识学问，却只求取他的才能智慧，即便求取士子没有一处不用尽心力，但却够不上人们所说的用尽心力了。陛下首先对这一点很清楚，有关选拔任用的八个方面的问题，臣下我也就得以按顺序精熟地陈述在您的面前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进士这种考试科目;从唐朝地位得到提高。我朝列祖列宗兴盛时期,有的同一次考试,仅仅录取一百二十名，但却从中获得了四个贤能的宰相。有的在宣布录取名单时,太阳闪射出五种光色,获取到许多著名的大臣。这究竟是凭借什么办法而达到这种地步的呢?近几年州郡向朝廷选送应试人员,大多优劣不分,考查验核的制度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在礼部选取以后，又在中书省进行覆试。皇帝我对培育新人这一重大问题关注到极点了。像《诗经》中《棫朴》诗所颂扬的人才济济的盛况,像《文王有声》中所歌咏的丰水岸旁、芑草生长的数代仁德,你们这些读书人

也拿得出符合皇帝我那心愿的好建议吧?"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对进士这种考试科目特别留意，希望像列祖列宗那样获取到众多的人才啊!

臣下我听说求取天下士子的途径,是分科考试;而败坏天下士子的东西,也是分科考试。读书人不在明了大道上花气力,只知道熟练掌握对偶不出毛病的文章;替国家效力不适合时势的需要,只知道熟悉给经文填个空的低级学问。在他们还没做官的时候，使用力量只在这上面;做了官以后,处理政务又哪里会知道那些方法?失误就在于所学习的却不是所要应用的，所要应用的却不是所学习过的。这还不是分科考试败坏了他们吗?大致上说来,科举取士只在于文章,不在于大道。所以天下的读书人就对大道不熟悉,只对文章很熟悉。每到三年,称为"大比",好多官员来考试他们的才艺,誊写过录来观阅他们的文章。不考虑乡里对他们的评价，不依据著名人物对他们的看法。只要他们的文章足够用来迷惑住主考官员就全够了，起始不一定非要他们的平素品行可以使乡里佩服啊! 只要能窃取运用前代名儒的说法而认为他们懂得理学就全够了，起始不一定非要他们使用力量真在于义理啊!词赋不依据天理的极致,一天比一天雕琢华丽;经典的意义不探求主旨,一天比一天穿凿附会。至于议论和对策的写作,本想观察考生明白事理的才能,可竟然追求工整华美,拼凑一气,争相写成纤弱精巧的作品,不再有浑厚的文章。世风的变化竟像这个样子,真可为它长长叹息。然而这还是自己能做到的人,原本就有平时文名不被人所知晓,可一旦竟在录取黄榜上突然冒出来,这纯粹是通过私人关系来买通主考官获得名次，或依仗大量的金钱来请人代替自己考试。公正的原则越来越丧失掉，科举于是被人瞧不起了。

臣下我观察唐朝取士,由地方初选后再推荐上来,取得参加中央考试的资格。尽管偶尔也存在私情，但不敢把社会的普遍舆论全都抛在一边。就像太学博士吴武陵用杜牧《阿房宫赋》托付主考官崔郾让杜牧榜上有名，韩愈推荐侯喜等几名考生，确实属于获取到了人才。如今哪里能够赶得上呢?因而在唐朝时期尽管说是私情,但还有

公正的评议。如今这个时代尽管说是公道,但实际上却按私情办事。臣下我考虑科举方面的谋划,具体主张有两条:一条叫做在开始时要使考查验核很严格,一条叫做在结束时要使覆试很公平。科举所选派的考官,一定要是那具有科第出身资格的人,然后才可以进入考查验核的行列。不了解科第出身的甘苦的官员,有一半原本就属于以前请人代考的人。靠他们来做出评定,哪里会获取到人才?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当今各州向朝廷选送考生的时候,以至于在礼部考试、在殿廷对答皇帝策问的时候,一定要精选考官,来使众多的读书人得到好处。有的官员胡乱获取到科第出身,决不能让这类人验核文章优劣,这样就不至于让荒谬错误的东西滋长了。过去仁宗朝任用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事务,完全摆脱了形式华美的西昆文体,大大改变了嘉祐时期的文风,因而能把专写艰涩怪异的文章的刘几排除在录取的范围以外,获取到世上闻名的苏轼,这都是考官选派得到合适人选的证明啊!臣下我所以说,在开始时要使考查验核很严格。

当今礼部考试决定录取人员以后,一定还要进行覆试,这称得上是很好的一项规定。只是在州县选拔进京应试的人员的时候,尽管设有同考官同堂负责的制度,但未免还是一纸空文。假使地方选拔推荐果真都符合实际标准,到礼部应试哪还会出现什么都不行的现象呢?可州郡之间,奉行朝廷规定不严格,把包庇袒护看成是大度宽厚,把不予录取看成是过于苛刻,但却不明白选取这类平庸的人们,以后又准备拿他们做什么用呢?臣下我认为州郡奉守执行朝廷规定的想法不真诚,也由于朝廷连同治罪的惩罚不严厉。如果从今以后,遇到礼部考试和覆试什么都不行的考生,对他所在的州郡确实施行连同治罪的惩罚,就必定会获取到真实的人才了。以前中书省覆试,已经把防范工作做到了极限,然而尽管能够检查出像唐朝张奭交白卷的庸劣考生,但却没能发觉像唐朝温庭筠在考场上对其他考生代笔作答之类的暗中补救的奸巧者,好像听说是被人袒护,这可大大是邪恶的官吏。如今已经来不及纠正了,以后应当特别注意,不要让人说清明的时代却还有这种事情。从前太祖皇帝时,考生徐士廉到登闻鼓院击鼓,控诉录取不公正,开始命令覆试。当时的考查验核,称

得上是极为公正。即使因大臣陶谷的儿子进士及第，也必定要在进行审察的对象之内，这是覆试做到完全公正的办法啊！所以臣下我说，在结束时要使覆试很公正。尽管如此，但还没做到完善考生的心灵。朱熹在同安县任职时，曾经利用初次考试补入县办学校做生员的机会，明确公布训示，让做父亲或当兄长的，不要替自己的儿子或弟弟代为答卷，教他们怎样进行欺骗。陛下如果能用大道完善人心，使世人知道这种道理，那么很有才华肆意替别人代考的人，平庸而请求别人代考的人，就都感到惭愧了。一榜才录取一百二十人，却得到四个贤明的宰相；在殿廷宣布录取人名单时，五色的彩云闪现出来，而获取到闻名于世的大臣。还担心什么比不上列祖列宗兴盛时的那番景象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学校的设立，目的是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仁宗皇帝庆历年间，湖州州学最为兴盛，特地设置治道斋这一教学场所，用来讲论探明当今的事务。于是朝廷采取它的做法，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施行教育，并且责成湖学的开创者胡瑗在京师主抓太学教务将近二十年。这哪里仅仅是让生员比试一时间的优胜之处呢？如今背着书箱，挑着长把伞，像云团一样聚集在临时都城临安，前来读书的人特别多，可被选取的人却非常少。皇帝我内心里为他们感到痛惜。对此应当通过什么办法使生员免除道路上奔波的劳苦，原地不动就收到教育培养的实际成效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深切体念学校的读书人，打算对他们施加教育培养的功夫啊！

臣下我听说，学校是最贴近百姓又容易教化百姓的地方。如今天下没有一处不设有学校，可学校用来培养士子，分科考试用来选取人才，两方面相互不关联，学校于是等于白白设立。重在生员的才艺而不在他们的品行，考核那些一时像回事的东西不考核那些长久起作用的东西。能够写出打开试题、会被录取的文章，就说本领已经到头了；询问他们根本性的理应那样的事体，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气习一虚浮，风俗于是变浅薄。在校内就产生安逸悠闲、荒废学业的过失，在校外就出现轻薄放肆、男女幽会的过错。追逐名利只是在细小

事务上相互比试，保养手指于是丧失掉肩膀后背。失误就在于所培养的却不是所要教导的，所教导的却不是所要培养的。太学是四方所注目的场所，实际上关系到给天下做出榜样，可竟然冒名顶替成风，于是变成了奸邪弊病的聚集地。祈求恩典趋就私利，更打开了侥幸当上官的门径。太学尚且这样，何况整个天下呢！就像礼部考试，动不动就请求免除殿试赐给科第出身的恩典。假设朝廷坚定地不予施行，侥幸当上官的门径会从哪里打开呢？可竟然尽力予以姑息，又授予官职，这种坏惯例一蔓延，公法又在哪里呢？朝廷过去想让士子在本乡本土安下身来不动，于是在所有的州郡都颁布这样的命令，过了不长的时间，又中途改变。于是补试成为太学生员的士子像云团一样聚集在京师，没有那种听到鼓声就拿出书本、恭谨从事学业的风气，却像春秋郑国颍考叔举大旗首先登上对方城楼的模样，躁动而死的人多得数不过来，仁德的人哪里忍心听到这种情况呢！这都是引发了侥幸的心思，因而激成了奔忙不迭的祸患。

近来朝中大臣打算分路考试招生，这种方法也称得上很好。可臣下我考虑学校方面的谋划，具体主张有两条：一条叫做定立教导培育的良好规则，一条叫做显示奖掖鼓励的潜在要素。培养士子，原本准备培养他们，作为日后来使用，能够只用没有益处的应试文章教导他们吗？这就必须要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准则教导他们，要用修明自身、整顿好家庭、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的相互关系教导他们，这样做之后，才算有成效。如今天下各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郡守，有懂得应该研讨大道的人物，于是在学校以外，创建精舍这类学堂，讲论探明义理，用意固然是很好了。可精舍讲论大道，学校研习应试的文章，既然如此，那么学校的生员就不必了解大道了吗？这又不该使他们的方向像这样地不一致啊！过去我朝名儒程颢有段话说：治理天下，要把端正社会风气、培养人才作为根本。应当访求经学充实完备足以作为师表和专心致志喜好学习、天资良好品行出众的人，结成师生关系，朝夕共同讲论探明正统的学问。所持的大道必定要依据人们的伦理道德关系，明了事物的道理。从洒扫门庭，回答问话，来修明孝敬、友爱、忠

诚、信用;从明了人的善良本性,使自身真诚,直至化导好整个天下。学问都符合这种标准的人属于成就了德业,选取才识明达、有希望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人,让他们承受成就德业者的学问。像程颢的这番话,就是臣下我所说的教育培养的良好规则啊!

分科考试和学校,原本就是两种途径。打算定立学校的规则,应当在分科考试的范围以外来进行。如今太学外舍、内舍、上舍的选察升补法,也同科举一起施行,原本也是这种用意。然而三舍选察升补法所择取的人,也只是看他的文章,这些人的所谓品行,也不过说他们按时上课满三个月,没出现个人过错要给予处罚罢了。品行仅像这样就算完事了吗?这只是奸相蔡京制订的规则啊!况且太学竟这个样子,天下的各个学校不也就全都是这个样子了吗?程颢又说:选择学问通达、德行被人尊崇的人,担任太学的各级教师;比他们逊色些的人分头在天下各个学校执教。选择士子入学,由县学升入州学,由州学选择保送到太学,聚集到一起教导他们,每年年底评定其中贤良的人和具有才能的人,上报朝廷。但凡选取士子的方法,都按品性行为端正纯洁,在家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具有廉耻礼节,通晓明白学业,特别了解治国之道来办。像程颢这番话,就是臣下我所说的显示奖掖鼓励的潜在要素啊!尽管如此,师长儒士常常很难选择到。过去在仁宗朝,任命胡瑗作为太学的负责人,采取湖州州学的办学方法作为太学的办学方法,这是因为要拿有用的学问来教导人啊!当时还很年轻的伊川先生程颐,实际置身在被表彰的行列,天下的读书人哪里还有不了解大道的呢?陛下用大道来完善天下,取用程颢的主张作为准则,任命胡瑗那样的人物担任师长,士子们就不会存在道路奔波的痛苦,而有教导培育的益处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凭借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这类官宦子弟和贫寒的读书人单靠科举而一起进用,担心他们没有学问,所以把荫恩补官的规则定立得十分严格,近年来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像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的诏令,先让这些人到国家学府学习经书两年,然后再送往审官院考试。孝宗皇帝淳熙年间的议论,打算在吏部主持的选用官员的考试中对这些人进行经书和法律

方面的考试，分别录取一半人。如今完全照这样去施行，可以吗？让官员当场撰写判决书这类文字的考试方式，唐朝吏部经常采用它，甚至产生了写得好就如同龙筋凤髓的赞语。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和仁宗皇帝天圣七年，设置和重定书判拔萃科，有时在内殿举行考试，有时在收藏图书的秘阁举行考试。皇帝我近来鉴于做官原则与方法的衰落，特在吏部恢复书判拔萃科，用来考核司法官员和县令称职与否，这也是唐朝和我朝列祖列宗的旧制啊！具体规定是否能够再进一步详细些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打算明察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在他们还未被授予官职以前该怎么办，而且打算明察县令和司法官员，在他们已经做官以后该怎么办。

臣下我听说，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的人，都应当让他们了解大道。如果不了解大道，尚未做官的人压根就没择取裁定的依据，已经做官的人又有什么择取裁定的依据呢？臣下我请求先拿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谈一谈。如今官员冗滥的弊病，全在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太多。每隔三年，开科取士，仅仅录取数百人。而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一年就衡量决定一次，每次达一百多人，累积到三年，也够数百人了。纵观州县考取进士做官的人，不到十分之三，而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常常占到十分之七。这哪里是进士科目能使陛下的官员冗滥呢？也只能说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太多罢了。世家门第非常贵盛，亲戚和部下又很多，依仗大量的金钱而获得好官职的任命，巴结得力的靠山来图谋立刻被安排。考核排定等级还没有满数，升迁去职的人已经多了出来。贫寒的读书人，又哪里能够挨上边呢？假设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都能够才干见识像太宗朝吕端那样，研究学问像孝宗朝张栻那样，哪里不足以被天下所使用呢？只是这样的人很少能得到罢了。官宦子弟身上被锦绣服装裹得暖暖的，哪里知道陛下的百姓的寒冷；嘴里被上等食品塞得满满的，哪里知道陛下的百姓的饥饿。他们中平庸的人，全由手下的办事人员代办公务，暴虐的人擅自作威作福。贫寒的读书人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中泡出来，明白熟悉义理，决不至于出

现这类情况。臣下我恭谨地考查《春秋经》讥刺尹氏世代作为周王室的大夫，讥刺周王室大夫仍叔的儿子和周王室大夫武氏的儿子虚弱，可见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不应存在，是最明显不过的了。

臣下我观察古人，恩赏叫做世代都延续下去，封官叫做世代享有俸禄，旨在让他们拥有土地和俸禄而已，开始时并不是让他们世代都担任那官职啊！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制度，从汉朝开始建立。但当时也一定是父兄确实知道自己的子弟具有才干，然后保任再授给官位，并不像现在本人官职做到那份上就让自己的子弟也当官。儒士在没做官以前，都清楚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应该抑制。才干玷污小小郎官的品级，恩荫却能降临家门，现在不再有人说这种话了。这是私心，不是公心。为自己的子弟做打算，所以不再把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制度认为是不妥当的了。这就必定要使做父兄的，自觉像前代贤者那样不为子弟祈请恩典；当子弟的，自觉像前代贤者那样靠自己去考取明经科目，不接受朝廷因其父兄而允许自己入仕的恩典，那就好了，然而却很难做得到。臣下我认为特地允许官员的子弟入仕的恩典，朝廷应当稍略予以抑制，不至于冗滥纷繁。三年一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稍略减少这方面奏请推荐的人数；每年一进行衡量选用，一定要使这方面的考核制度很严格。仿照真宗朝大中祥符二年的诏令，让他们在国家学府学习经书两年，使他们大致上了解大道，然后按照孝宗朝淳熙年间的议论来测试他们，这就可以了。否则也是光看文章了，文章哪里足以知道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究竟是贤能还是无知呢？

至于县令和司法官员，尤其应当深深明了大道。假设担任县令的人，经常怀有学习大道、爱护民众、像孔子弟子宓不齐弹琴而平和治理单父邑那样的心意；担任司法官员的人，经常怀有丧失大道民众就离心离德、审理出犯罪真情就哀痛怜悯但不沾沾自喜的心思，对判决书即使不予考试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不是这样，尽管赢得龙筋凤髓的赞誉，也只是表面好看罢了。即使中书省主持拔萃科的考试，也

是没用的文辞。士子能够写文章,哪里会有不能写判决书的呢?这仅仅可以观察应试者曲直是非的见识罢了。那些贪婪如狼、苛猛如虎的人,又凭这纸判决书会从哪里能够识别出他们来呢?尽管如此,臣下我还是庆幸吏部长官厅前的帘试,尚且可以使愚蠢呆痴的依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进入仕途的人感到畏惧;当场写断案判决书的考试,还可以使昏庸荒谬的县令和司法官员感到畏惧。可臣下我又听说,考试就该公正,不公正就不必考试。在道路上听说,吏部长官厅前的帘试,原本就可以通过献纳大量金钱事先就得知解释经书的题意,当场写判决书也可以事先买通尚书省的官员而得知案例。如果没有这类事,言说的人固然无罪;万一真有这类事,听到的人还不足以引为鉴戒吗?考试已经不是古代那个样子了,考试却营私舞弊,还不如不考试。只请陛下明察这个问题。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贤良方正这种科目,我朝列祖列宗用来收揽雄奇卓异的人物,像富弼、张方平这些贤臣,就都涌现出来了。自从神宗皇帝熙宁年间因为用策问对进士进行考试,与贤良方正科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就取消了它。高宗皇帝绍兴年间,孝宗皇帝淳熙年间,回想从前的成规,下达诏书,命令重新设置,可前来应试的申报文书却特别少。如今可以再恢复它。这样做,卓异突出的人才,能否涌现出来呢?自从哲宗皇帝绍圣元年起,通过设置宏词科,考试制、诰、诏、表等十二种文体,用来选取学问渊博、文笔华丽的人物。可连年以来,参加考试的人也很稀少。皇帝我正忧虑词章华采的衰败,想让各地的人士共同振兴起那股风气,议论政事的人竟然认为所定立的制度还没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准备恢复贤良方正的考试科目,用来收揽雄奇卓异的人物,又准备使宏词科面貌一新,用来收揽学问渊博、文笔华丽的人物啊!

臣下我听说,贤良方正、博学宏辞这些科目被优等录取的人,都应当了解大道。如果不了解大道,号称贤良方正的,压根就没有什么足以让人看起来真敬慕的。号称博学宏词的,也没有什么足以让人看起来真敬慕的。臣下我请求先就贤良方正谈一谈。如今的贤良方

正科,长时期废弃不再举行考试,大致从孝宗皇帝淳熙年间以后就停止了。贤良方正科,是用来等待非同一般、隔一时期才出现的卓异士子啊!三年举行一次进士考试的时候,所获取的人恐怕都是一般的士子,于是又设立贤良方正科来获取奇特人物。能够谋划王业,裁断国政,这才称得上是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这才称得上是贤良方正。这种称号不容易承当得起。神宗皇帝熙宁时期,认为贤良方正科同用策问考试进士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罢废了它,这恐怕是有深刻的用意的。自从苏轼兄弟通过直言不讳地对答策问,被仁宗皇帝所选用,到后来在朝廷供职,气节坚定雄劲,对新实行的法度提出异议,长久与掌权大臣相对立,所以当时因恼怒这兄弟二人而牵连到其他方面,连同贤良方正科也罢废了。然而我朝贤良方正被录取者懂得大道的,大致上人数也很少。像富弼,像张方平,像苏轼、苏辙,确是真正的贤能,确是真正的忠良啊!奸诈邪恶的夏竦,狡诈阴险的李清臣,把他俩称为贤良,能行吗?研读人们所不知道的书籍,哪里比得上了解人们所共同遵循的大道呢?把精力放在世上所写不出的文章上,哪里比得上成为世上可被使用的人才呢?像张华《博物志》那样的书籍,对西晋的衰亡有什么补救?像许敬宗向唐高宗所做的有关济水、帝丘的知识对答,对唐朝的祸乱有什么益处?西汉公孙宏的高中贤良,压根就不如董仲舒的高中贤良;唐朝牛僧孺的高中贤良,压根就不如裴垍的高中贤良。贤良如今不再设科考试了,但对够得上贤良录取标准的人才,臣下我不敢诬蔑全天下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是录取的标准,应当根据他对大道的掌握程度罢了。

臣下我恭谨地考查《春秋左氏传》,上面说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远古的典籍,可《祈招》这首劝谏周穆王不要周游天下的诗篇他却不知道,以便用来谏阻楚灵王兵围徐国的狂妄举动。由此可知,记忆诵读很浩博,恰恰足以构成玩物丧志啊!对贤良进行策问,也从汉朝首次出现。观看朝廷策问晁错、董仲舒、公孙宏这些人,也不过拿治理国家的大计,施行统治的大谋划来询问他们,当初也未曾用冷僻很

难知晓的事情策问他们。臣下我记得杨万里上书孝宗皇帝说过这样的话：孟子生活的年代，距离周朝还不太远，可诸侯销毁周朝的典籍，孟子已经不能得知那些详细的情况。孟献子距离孟子更近，交有五位朋友，可孟子已经忘记掉其中的三位是谁了。这表明，记忆诵读并不是孟子所擅长的东西。至于孟子，却有他所擅长的东西。孟子说，苍天要平定治理天下，在当今的社会，除去我还有谁呢？这是孟子所擅长的东西。如今贤良方正这种科目，不求取孟子所擅长的东西，竟去求取孟子所不擅长的东西。杨万里这番话，真属于朝廷策问贤良的正确做法啊！程颐也有看法说：汉朝策问贤良，还是先由别人来推荐。像公孙宏，尚且经朝廷下命令才前来应对。至于后世的贤良，就主动请求举用了。如果说在殿廷答对，只是想要直言不讳地讲论天下的事体，这还是可以的。如果目的只在于追求富贵，那就得志便骄奢放纵，失志便放荡无羁和悲伤愁苦罢了。像程颐这番言论，真属于士人参加贤良考试的准则啊！

至于博学宏词这种科目，所做的文章尤其应当贯彻大道。文章不宣传大道，尽管华美，又有什么看头呢？文章用来给帝王的谋略添光彩，号令用来给天下作鼓舞。文辞气势萎缩微小，同社会政治关系很大，不能不特别注意啊！陛下近来明确地诏命各地，从今以后每三年举行礼部进士考试，另外设立小词科，专门测试激昂蹈厉的文气与词采，陛下称得上是获取到合适的方法了。只希望陛下大力施行它，一定会有文采出众、知识渊博的才士，出来响应朝廷搜罗英才的意愿。要谨慎地对待，不要因为舍弃重要的却致力次要的，去做容易的却排除掉困难的，而被虚浮的议论所动摇，正在施行却又停止啊！再者已经设置这一科目，就应当延长它的存在时间。如果假设确实没有可以录取的人，也应当在短处中寻求长处。像古人那样用千金购求死马的骨头，骏马自动就会前来；像叶公那样喜欢到处画龙，真龙必定就会降临。如果进取没有途径，习尚也就没有什么好转。不过臣下我又听说，考取特异科目的人，大多挟有一股宁折不弯的气势，出来被世上任用，常常不被人们所接受。神宗朝熙宁年间罢废贤良方正科，大概就因为苏轼兄弟的缘故。近

年博学宏词科根本就不录取士子，陛下也了解这种情况吧?这也是因为前些时候由博学宏词科出身的臣僚，同掌管朝政的大臣相抵触。既然已经违背了大臣的心意，所以大臣就不让他晋升，还罢废了博学宏词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却废止了呢?只请陛下明察这个问题。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武举这一科目的设立，原本上是用来显示朝廷重视武备，求取到身怀重大军事谋略的人，并非仅仅是比试空洞的兵法论述，看一看谁会骑马射箭啊!战争延续多年，但却还没听到过激昂慷慨、凭借超常谋略而闻名的人物。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感慨并关注时势的艰难，思考要获取到具有军事谋略的人才来使用啊!

臣下我听说根据武备设立科目，尽管说是重视武备，但根据文章来谋求武备，反而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如今的武举科目，臣下我有理由议论它了。荐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名额很少，选拔任用的途径很困难，于是人们把武艺作为捷径，营求从事武举科目的考试。但能够诵读兵法的人，很少能够同时也熟悉骑马射箭；能够耍弄弓箭战马的人，很少能够同时也会写文章。于是会写文章的人，就代替对方去考《武经七书》；会武艺的人，就代替对方去考武艺，这没有一样不是欺骗朝廷啊!偶尔也有人具备文、武两方面的特长，但也不过姑且在一时间的应试中混过关去算完事。求取身怀重大军事谋略的人，自然就闻听不到。如今进士科出身的人，必定经过五次不予提升，然后才能改授京朝官；如今武举出身的人，不超过十年就可以官至郡守。已经取得武官品级，又去参加文章考试，替换着捞取官位，已经身在有权进入皇官的人的上边了。这是天下的士子把武举说成是迅速变换身分的原因，争相朝这方面奔走了。陛下在这种情势下，正准备求取身怀重大军事谋略的人，真可以说是按图形去求取骏马了。真宗朝寇准，器识兼备将帅和宰相，但并不是武举出身；仁宗朝韩琦、范仲淹，才能兼备文武，但也不是武举出身。这些人毕竟还属于文士。高宗朝的岳飞、韩世忠等将帅，又曾经是从武举中选拔出来的吗?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大道来完善天下的

士子，不要让人们把武举说成是变换身分的场所，具有重大军事谋略的人也就涌现出来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民间隐士的征召，应当从山林把他们请到。像我朝太祖皇帝招请聚徒讲学的王昭素，太宗皇帝召见华山道士陈抟，真宗皇帝让种放从终南山来到京师开封，都在史书上光辉闪耀了。如今仍然没有能够符合《尚书·尧典》明察贤能、举用隐遁高士这一宗旨的举动，却又因为什么缘故造成的呢?"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广泛搜罗人才，而在科目考试以外还去求取民间隐士啊!

臣下我听说举用被遗弃的贤士，全天下就都归向了西周；求取躲藏起来的高士，民心就都追随了汉朝。这说明对待民间隐士，原本就是建立政权的人所应先要解决的事情。然而不追求名声显赫，然后可以称得上是遗民逸士；借此来钓取名声的人，就根本算不上。不羡慕荣华富贵，然后可以称得上是遗民逸士；把这作为途径来谋求升官的人，就根本算不上。汉朝有个樊英，到最后却败坏了名节；唐朝有个卢藏用，也直至损坏了名誉。我朝的邵雍、常秩，两人在开始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仔细观察他们后来的行迹，然后证明常秩是假隐居而邵雍是真隐居了。常秩这类人喝野菜汤，吃干粮，并不是不贪图享用美食啊!穿荷叶菱角制成的衣服，并不是不希望穿华贵的衣服啊!但却偏要那样干，是想有所等待，这纯属作假相，并不是真地隐居起来。治理天下的人，选用不求做官的人，原本可以亮给奔走钻营往上爬的人看，可是不求做官纯属装假相的人得到选用，奔走钻营往上爬的人就更加钻营往上爬了。种放出山，人们还议论他，何况还不如种放的人呢!像王昭素，像陈抟，这才配得上隐士了。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大道来完善天下的人心，不要让人把隐居作为直接做官的途径，然后命令朝廷上的贴身大臣和监察官员，地方上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仓和郡守，荐举具有道德却不在分科考试上花气力的人，表彰任用他们。这样一来，在分科考试中设法争夺、光去追逐利禄的人，也就可以稍微止息了。

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和臣下我用来对答皇上的事情，已经大致上把那梗概讲到头了。可陛下在最后又策问说："以上这八项政事，属于上面用来向下面做访求的办法。其中意思还有没穷尽、值得商讨的地方，固然是皇帝我想要再听一听的。至于像知识学问、才能智慧这两大问题，却是下面用来顺应上面的访求的，关系到社会政治将会如何的大局。你们这些读书人疾速地来到这里，一定不会为发表个人的看法而感到羞愧，综合起来详尽全面地陈述它们，不要太简略。"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听取建议的心愿，有增加而没有停止，把八项政事归到自家头上，而把两大问题归到臣下我等人身上啊!

愚昧的臣下我肤浅鄙陋，哪里足够用来抬起头承受圣上的询问?不过臣下我的本意，归根结底希望陛下用大道来完善天下，而不一定要去谋求具体的办法啊!如今在具体办法方面，其意旨也可以说讲到头了，然而陛下还认为没讲到头，这恐怕是对具体办法很重视却对大道忽视吧?现在的弊病，正在于下面有求上面的东西，要比上面访求下面的迫切得多了。上面访求下面的方式，尽管扩大途径来招揽他们，但也加强防范并约束他们，这已经不是求取士子的本意。而下面有求上面的办法，投献名片寻求荐举自己的人，大肆欺骗，兜售假相，没有不用到的地方，又哪里比得上汉朝人的自我卖身为奴呢?这更不是古代的用意了。像这般模样，已经全都不感到是耻辱了，又怎能会像陛下策问中所讲的不为发表个人的看法而觉得羞愧，就算完事了呢?社会风气越来越浅薄了，陛下不去用大道挽救扭转它，臣下我不知道人们以后所奔向的目标，又该会怎么样了!然而这还仅仅是选拔举用方面的事项。臣下我观察陛下在大殿颁布策问，在此以前，没有不用当世的重大事务来询问的，只有绍定二年己丑科和五年壬辰科，不敢深切涉及当前的国政。这是陛下在晦暗中养育光明的时候，权奸忌讳直言的时候。可现今还像那个样子，这又为什么呢?这特别不是臣下我所期望的。臣下我打算深入讲论却属于犯上，打算藏起来不说又属于欺君，敢按陛下所涉及的问题简单地谈一下，可以吧?圣上的策问中有气节和对国事

提出看法的问题，臣下我在今天正对这两个问题最不满，敢拿两条主张为陛下进献。一条叫做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一条叫做奖励无所回避的言论来振作天下的士气。

什么叫做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呢?商汤执持最为适中的尺度，说是选用贤能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规。武王定立最高的准则，说是没有偏私，没有朋党。因此团结但不勾结，和协但不曲意顺从，然后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君子未曾出现过人们所讲的朋党，在上面的人也不应该用朋党来看待他们。大禹和皋陶一致忠诚地事奉虞舜，但意见不统一时，就发出感叹的声音，这表示不曲意顺从啊!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同心辅佐周王室，但对政事不赞成时，就显露出不高兴，这是表示不假意随从啊!唐朝有白居易，既不依附牛党的首领牛僧孺，也不依附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我朝有苏轼，既不曲意迎合熙宁、元丰时期的变法派，也不阿附元祐年间的守旧派。君子卓然自立的情况就像这样，为什么却用朋党来看待他们呢?小人打算使一姓皇朝架空的办法，一定是要迷惑君主，而把君子指斥为朋党。把反对宦官的一大批人士都排挤掉，就叫东汉陷入危亡的境地。把议论朝政的一派人物都排挤掉，就给唐朝造成了祸害。而把元祐废除新法的臣僚都指斥为奸党的做法，就致使宣和、靖康年间整个国家被架空而没有君子，那种惨祸更让人不忍心再谈起来啊!

只有在政治清明的朝代，即使大力鼓吹朋党的论调也占据不了上风。正当庆历年间各位贤臣执掌国政的时候，夏竦等一伙人勾结内侍蓝元振献上奏疏，说什么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从前蔡襄把他们称为四贤，四贤得到了掌权的机会，于是提拔蔡襄作为同一行列的人，拿国家的爵位俸禄当作私人的恩惠，牢固地结成朋党，用来报谢蔡襄当时写诗歌颂他们的那片心意。仁宗皇帝虽然不相信这种劾奏，但没过多久，几位贤臣相继都被调离京师。这说明仁宗皇帝那样圣明，而小人也得以施行他们动摇君心的伎俩啊!只有仁宗皇帝，圣意才终于确定下来，浮云暂时遮蔽天空，白日立刻照耀天下。延续到嘉祐年间，全部起用庆历时的英才，而成就功

业，达到大治，最后靠的还是当时被指斥为朋党中的那批人物。既然如此，那么，君子的抱成一团，对于一姓皇朝国家又有什么辜负的地方呢？

哪个朝代没有贤臣！原本就存在着身当今日、而义胆忠肝就像庆历年间各位贤臣那样的人，可有人却用喧哗钻营、抱团勾结来看待他们。陛下本来就没有这种想法，臣下我猜测，一定有鼓吹这种论调的人了。假设真地喧哗钻营，真地抱团勾结，固然是很可恨的。但只恐怕是把喜好议论国家大事看成是喧哗钻营，把志同道合看成是抱团勾结罢了。既然把喜好议论国事看成是喧哗钻营，那么一声不吭、只是逢迎和百般顺从就对了吗？既然把志同道合看成是抱团勾结，那么心怀奸恶、互相勾结和形成严密的关系网就对了吗？这是臣下我根本闹不明白的问题。

现今的弊端，大致上在于任用一个宰相，就任用同这宰相关系密切的一班人。一个宰相被罢免，那么凡是在这个宰相当政期间的官员，就都指斥成某个宰相的同党而全部调离他们。并不像范仲淹已被调离朝廷，而吴育仍然奏请施行范仲淹的那套政务；也不像张浚已被罢相，而赵鼎仍然不更动张浚所任用的那些人。去年凭借百官身分劾奏御史台、谏院的有两个人。前些时候大臣提出晋升意见，其中一个人已经获得到衡州郡守的差遣，另一个却仍然未被授以职位。莫非是前些时候劾奏御史台、谏院的人，因那个御史中丞已经免职，所以就可以提拔任用。后来又劾奏御史台、谏院的人，因那个谏议大夫还在朝廷，所以就有所妨碍与嫌弃吗？如今的谏议大夫把心思都放在体念国家上，就一定要像文彦博那样不忌恨曾经劾奏过自己的唐介，像吕夷简那样不忌恨曾经劾奏过自己的范仲淹，这样还会对此有什么嫌弃呢？况且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那样贤能，也是第二个人所劾奏的，当时也得到衡州郡守的职位了吗？要说前后犯的是同样的罪过，惩罚却不一样，一个加以任用，一个予以舍弃，臣下我认为这恐怕不属于不偏不倚的原则啊！

不偏不倚，并不是说执持固定不变的常规，也不是说交参互用。哲宗皇帝元祐年间调停守旧派和变法派，造成的祸患已经不小

了。徽宗定年号为建中靖国，靠什么做到了不偏不倚呢?陛下恩德最大，仁德深厚，怜悯体念被贬斥到远方的官员，说是除去耽误国家、残害百姓的人以外，全都施予离开朝廷、让本人自便的恩典。可首次议论这道指令，其他人都没有被提起，只是以前专权宰相的亲密党羽几个人，最先蒙受到这种恩惠。这是不是同调停很类似，用来平息旧怨呢?当这些人把持议政大权、充当宰相下属的时候，陷害忠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说耽误国家、残害百姓，哪一宗比这还要严重呢?可他们却最先蒙受洗刷罪恶!臣下我万分替当政的人感到羞耻。臣下我希望陛下与大臣从今以后进用和贬斥人才，执持公正的原则，不正派的人一辈子都可以抛弃掉，忠良的人有个过错也不遗弃掉，而且不要让人产生那个大夫是西部人、这个大夫是东部人的讥刺，不要让天下出现蜀党、洛党的说法，人才的气节也就生发出来了。所以臣下我说，确立不偏不倚的原则来任用天下的贤能，原因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奖励无所回避的言论来振作天下的士气呢?虞舜听到一句好言语，就好像江河决了口没人能阻挡住。大禹听到美好的言论，走下车来就敬拜。深切正直的言论，是圣明的君主想急切听到的东西。听到后就入朝拥有法度严明的大臣和辅佐的士子，出境就没有能够抗衡的邻国和外来的祸患。汉朝有汲黯，淮南王刘安要为他而止息住叛乱的阴谋；唐朝有温造，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将帅要为他丧失掉胆气。东汉的鲍永和鲍恢，可以让后妃的亲戚收敛行为。唐朝的一个李勉，可以使朝廷显得最尊严。正直敢言的人对一姓皇朝有功就像这样，在上面的人怎么能够轻视他们呢?古代危亡的国家，未曾不封住劝谏人的嘴巴，来自己蒙混住视听。贺琛的建议，还算不上深切正直，可梁武帝却惩办他，后来侯景叛乱的惨祸，最终也没有人向梁武帝做过提醒。张九龄的劝谏，称得上忠正耿直，可唐玄宗却罢免了他，后来安禄山发动的变乱，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随便翻看史书，像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多得数不过来啊!

只有在国家强盛时，就不是这般情形了。仁宗朝士大夫的风气最兴盛，直言不讳的人最多。弹劾夏竦要出任枢密使，十八道奏章

连续献上，最后采纳了这种意见。弹劾陈执中要出任宰相，十九道奏章连续献上，最后也批准了这种奏请。叩击宫门铜环来坚持不应废掉郭皇后的谏诤，事情关系到皇室，仁宗皇帝尽管由于这个缘故贬斥范仲淹，但最后也因这个缘故重新起用范仲淹。关于文彦博通过向妃嫔赠送灯笼锦而当上宰相的劾奏，事情关系到朝廷，仁宗皇帝尽管由于这个缘故贬谪唐介，但也因这个缘故再度召回唐介。仁宗皇帝容忍养护直言不讳的人就像这样!陛下端平初年的政治，就像天日重放光芒，使蕴积的愤慨顿时得到舒展，长久被压抑的人全都振奋起来。谏官议论国事，御史指斥奸邪，贴身大臣怀有谋划朝政的忠诚，百官具有五天轮到一人上殿面奏的切直，以至百姓投递检举信，学校上书，无所回避的言论光耀国家，哪里比庆历时期逊色!当时天下伸长脖颈盼望太平，只是因为做为一面镜子的真德秀过早死去，各位贤臣失去援助，脚跟脚地离去，逐渐就失去声响了。淳祐初年，揽权的奸相掌管朝政，完全任用自己的党羽，布满朝廷的每个角落，把他们的意图暗示给百官，使百官不敢讲话，扼制住学校的喉咙，使生员不敢议论，于是正直的风气就一天比一天消失了。

如今尽管改变治理的状态，但神明的鉴别还没有聚拢，朝臣都闭口，没有敢真地讲论什么的，萎靡无力越来越厉害。粗略观看一下士大夫的奏疏，不再具有我们前代贤德剩下的一点儿东西。凡是密封上奏的公文，大多如同应试士子回答策问的文章。平平地论述事务，稍微提个看法，也唯恐触犯时忌，姑且用来搪塞一下。臣下我认为无所回避的言论兴不起来，是因正直的风气长时间地消失了。陛下用前代贤德正直敢言的风气来责成众位臣僚，也应当用我朝列祖列宗接受意见的事例来责成圣上自身。陛下神圣的度量像皇天一样广大，没有正直的言论不能容纳的。然而正直敢言的臣僚离开了朝廷，到最后也没有像范仲淹、唐介那样重新受到重用的。莫非是陛下尽管能够容忍他们触到痛处的正直之言，但却终归做不到没有逆耳的厌恶之心吧?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允许把听到的消息都报告上来，这在我朝列祖列宗那里原本就有制度规定。陛下近来的

亲笔诏书，竟责怪他们探访的消息不真实。如果等到消息全都真实以后再言说，臣下我恐怕从今以后就没有再言说的了。况且其中一个御史中丞已经被罢免职务，另一个还没有来到朝廷，却全都罢免了，这样做行吗?他再三谦恭地推辞，很长时间才同意，臣下我想来，他必定有要言说的事情，却担心不被听取。陛下又竟然不等待他说上一句就干脆让他离职，这样做，来叫言说者止住自己的舌头，不也太过分了吗?

前些时候御史中丞的罢免，也许像圣上命令所说的那样，然而外面议论纷纷，认为不是这种情况。全都说是御史中丞的奴仆，惹怒了皇帝身边受宠幸的太监，太监就一点点儿地对皇帝讲他的坏话，因此就被打发出京了。臣下我很清楚这种事绝对是没有的，也只是御史中丞还没被调离以前，偶尔发生了奴仆相互斗殴的事情，所以外面的议论不能没有疑心。本来虽然不是这样，可迹象却很相像。万一沿袭下来，不予革除，致使这种歪风助长起来，那就会像东汉的宦官中常侍们必定压过司隶校尉，唐代的宦官中尉们必定压过中央各机构了。陛下固然不会放纵太监到这种地步，然而也不能不对太监防微杜渐啊!苏轼有句话说：奸邪开始冒出来时，依靠监察官和谏官顶回他们富富有余；等到他们形成气候，凭借武力攻取他们也不够用。还说：弹劾积聚成威力以后，即便是一般人也可以奋发昂扬；风采萎靡消沉下去后，即便是豪杰也不能使他们再振作奋起。如今的祸患，同苏轼这番话非常相像。臣下我曾经整个白天吃不下饭，深夜睡不着觉，认为当前的事态，存在着最大的隐忧。火还没到烧着的时候，却仍安心在柴草垛上睡觉，这是仰赖朝廷有看到远处、察识细微的人士，一定能够为陛下陈奏长远考虑、消除后顾之忧的谋略。可近日以来，言说的人害怕又顾忌。天下如果出现祸患，陛下又同谁去止息住呢?臣下我希望陛下首先把仁宗皇帝鼎盛时期作为榜样，其次施用端平初年的政治，广泛开辟议政的途径，普遍沟通下面的想法。言论不可以听从，放在一边也没有什么妨害，如果有的可以采用，哪里仅仅是微小的补益呢?这样做，人才中敢于言事议政的人物就涌现出来了。所以臣下我说，奖励正直

不讳的言论来振作天下的士气，原因就在这里。

臣下我是民间一个愚昧的书生，不懂得忌讳，忠君和爱民这一信念，同我来到世上就一起产生。陛下允许提出忠言，所以敢在圣上的策问以外，献上那狂妄暗昧的全部看法，也可以说是越出本位、触犯等级规定了。往严重说就是处以死刑而投入油锅，往轻微说就是斥退而摒弃在山林，我也心甘情愿，多次陷入死亡也没有悔恨。尽管如此，陛下一定也不会这样处置的。陛下自从登上皇位以来，未曾因为耿直发表意见而惩办士子，哪里会因臣下我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人，而连累陛下像天地那样的仁德呢？只是臣下我所对答的内容，逐项议论弊端，普遍地触犯到深得皇帝宠幸的权臣，恐怕像唐朝审定刘蕡对策的那些人，尽管赞赏他的忠正，但却不敢把答卷呈献到陛下的面前啊！然而臣下我从小以来，所学习的就是大道。在事奉君主的起始阶段，哪里敢不忠诚？况且用阿谀讨好考官来取得好名次，并不是臣下我原本的心愿。如果真有一句话对当前国政有所补益，即使不被录取也不怨恨。臣下我压根就赶不上刘蕡的万分之一，但我们堂堂的大宋天朝，哪里是唐朝能够比得上的呢？臣下我可以没有担心的事情了。只请陛下怜悯那尽忠却不明事理的说法，万幸地听上一听，臣下我恳切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

御试策题

制策曰：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精神心术，达之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则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者，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窃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圣之术，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已以听。

《三坟》而上，大道难名；《五典》以来，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顺乎上，鸟兽草木若于下，九功惟叙，四夷来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圣神功化之验欤？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语，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欤？誓何为而畔，会何为而疑，俗何以不若结绳，治何以不若画像？以政凝民，以礼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内外，忧勤危惧，仅克有济。何帝王劳逸之殊欤？抑随时损益，道不同欤？及夫六典建官，盖为民极，则不过曰治、曰教、曰礼、曰政、曰刑、曰事而已。岂道之外，又有法欤？自时厥后，以理欲之消长，验世道污隆，阴浊之日常多，阳明之日常少。刑名杂霸，佛老异端，无一毫几乎道，驳乎无以议为。然务德化者，不能无上郡、雁门之警；施仁义者，不能无末年轮台之悔；甚而无积仁累德之素，纪纲制度为足维持凭借者，又何欤？

朕上嘉下乐，夙兴夜寐，靡遑康宁。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变沓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符泽未清，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宝祐四年五月八日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超越了没有极限的太极原始形态的玄妙,但实际上离不开日常应用事物的一般情况;植根于阴阳五行的幽深,但实际上却没有超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的范畴之外。天得以澄清明亮,地得以安定宁静,做人的最高准则得以明确,没有一样不是通过这个大道来实现的。圣人一个接一个相传的,都是这个大道。由努力修养好自身到统治别人,由穷尽事理到整治好家庭,管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都根据精神和心术,贯彻到礼乐刑政上去。它的本体很隐微,它的作用却十分广泛,经历了千秋万代而不能够改变它,但功业与教化有浅深,证验和实效有迟速,这是为什么呢?皇帝我凭借少见无知,却亲掌大政,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到现在已历多年,志愿更加勤勉,大道却离得越来越远,渺茫得还没显出迹象,皇帝我心中对此疑惑不解。你们这些读书人,明了前代圣人的学问主张,现今都来到殿廷上,一定有十分深切的见解,皇帝我打算虚心地加以听取。

《三坟》以上,大道已难以用言辞来讲述明白;《五典》以来,常理正道方才显明。日月星辰在天上有序地运行,鸟兽草木在地上按时令生长,有关财物收藏和民众生计的六府三事都很妥当,四方各个部族都前来归服,百官各尽其职,万事都顺利正常,这不是圣明神奇的帝王所施布的功业与教化的效验吗?但人心和道心,无声无形,只用十六个字来做表述。那危险、隐微、精粹、专一的奥妙,不能用言辞来讲个明白吗?立下的誓言为什么又违背?盟会为什么又互相猜疑?习俗为什么不像远古结绳记事时期那样淳厚?治理天下为什么不像动用象征性刑罚民众就不犯罪时期那样容易?用政令来控制住民众,用礼法来约束住读书人,用《诗经》中《采薇》、《天保》所描述的内容治理内部和外部,整天忧愁、劳苦、害怕、恐惧,仅仅能把事情勉强办成。为什么称帝天下的人和称王天下的人,相差如此悬殊呢?或者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以损益,所行的大道各有不同了吗?等到按《周礼》设立六类官职,成为统治万民的最高准则,却不过强调治、教、礼、政、刑、事而已。难道在大道之外,又有法度吗?自此以后,用天理和人欲的

消失，检验世道的污浊与隆盛，常常是阴气污浊的日子很多，而阳气盛明的日子很少。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刑名家的主张，在王道中夹杂霸道的统治术，以及佛教、道教不合正统的异端学说，没有一丝一毫接近于大道，混杂得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但是专力用仁德教化人民的君主，不能没有上郡、雁门的警报；施布仁义给百姓看的君主，不能没有晚年对在轮台屯兵的忏悔；甚至有的君主没有积累仁义德行的长期举动，可依靠法规纲常、各项制度就足以维持住政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皇帝我为使上下都欢乐，早起晚睡，根本顾不上安宁片刻。大道行用很久了，可与政治却没融合在一起；推行教化很久了，但却没有成功。天灾相继而至，百姓生活不如人意，人才缺乏，读书人风气浮躁，国家财力枯竭，兵力弱小，隐藏在山泽的盗贼没有肃清，边防守备十分危急。这难道是大道不能够用来驾驭社会吗？或者是筹划裁制和推广施行还有不到之处呢？不止息就会长久，长久了就会有效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效验呢？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会长久，现在还能够经常做改变吗？你们这些读书人要翻来复去，仔细思考做回答，不要偏激，不要空泛，以此来符合皇帝我广泛地征求你们意见的心意。宝祐四年五月八日

文天祥　廷对策

文天祥(1236～1283)　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时年20岁。后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率军坚持抗元斗争。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后，坚拒诱降，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心迹。被押至大都(今北京)后，遭囚禁达三年之久。其间回击一切威逼利诱包括元世祖的亲自诱降，始终誓死不屈，直至从容就义。后人辑有《文山先生文集》，今犹行世。

臣对：恭惟皇帝陛下处常之久，当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会诸心，将三纪于此矣。臣等鼓舞于鸢飞鱼跃之天，皆道体流行中之一

物，不自意得旅进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论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当道久化成之时，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远之疑，岂望道而未之见耶？臣请溯太极动静之根，推圣神功化之验，就以圣问中“不息”一语为陛下勉，幸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阖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

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汉以降而道始离，非道之离也，知道者之鲜也。虽然其间英君谊辟，固有号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于行道之不力。知务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黄老；知施仁义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画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间，牵补过时，架漏度日，毋怪夫驳乎无以议为也。

独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传列圣之心，以会艺祖之心；会艺祖之心，以参帝王之心，参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间，臣知陛下不贰以二，不参以三，茫乎天运，窅尔神化，此心之天混兮辟兮，其无穷也。然临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计见效，犹未有以大快圣心者。上而天变不能以尽无，下而民生不能以尽遂。人才、士习之未甚纯，国计、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盗贼、兵戈之警所以贻宵旰之忧者，尤所不免。

然则行道者，殆无验也耶？臣则以为，道非无验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为迂；道之证效甚迟也，而不可以为速。维天之

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为治顾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于岁月之暂，而遽责其验之为迂且远耶？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则责躬之言方发而阴雨旋霁，是天变未尝不以道而弭也；赈饥之典方举而都民欢呼，是民生未尝不以道而安也。论辩建明之诏一颁，而人才、士习稍稍浑厚；招填条具之旨一下，而国计、兵力稍稍充实。安吉、庆元之小获，维扬、泸水之隽功，无非忧勤于道之明验也。然以道之极功论之，则此浅效耳，速效耳。指浅效、速效而遽以为道之极功，则汉唐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袭汉唐事耶？此臣所以赞陛下之不息也。

陛下傥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则与阴阳同其化，与五行同其运，与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虽充而为三纪之风移俗易，可也；虽充而为四十年圄空刑措，可也；虽充而为百年德洽于天下，可也；虽充而为卜世过历、亿万年敬天之休，可也。岂止如圣问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谨昧死上愚对。

臣伏读圣策曰："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超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实不外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天以澄著，地以靖谧，人极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圣圣相传，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之于精神心术，达之于礼乐刑政，其体甚微，其用甚广，历千万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浅深，证效有迟速，何欤？朕以寡昧，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志愈勤，道愈远，窃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术，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论，朕将虚己以听。"臣有以见陛下溯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质之臣等也。

臣闻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则道自道，天地自天地，圣人自圣人。合而言之，则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圣人亦一不息也。臣请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块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

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体也；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体则微，其用则广，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阴阳而道在阴阳，即无极太极而道在无极太极。贯显微，兼费隐，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地中无往而非水，天下无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则日月星辰循其经；地以靖谧，则山川草木顺其常；人极以昭明，则君臣父子安其伦。流行古今，纲纪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虽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

夫圣人，体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圣人立不息之体，则敛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则散于治人。立不息之体，则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则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验。立不息之体，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推不息之用，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犹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之间者，常久而不息，圣人之于道，其可以顷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渊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岂非乾之所以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无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

陛下临政愿治，于兹历年。前此不息之岁月，犹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岁月，犹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谓数十年间，我之所以担当宇宙，把握天地，未尝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验如此迂且远矣。以臣观之，道犹百里之途也，今日则适六七十之候也。进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画。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则适六七十里者，固所以为至百里之阶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则百里虽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无浅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为迂？道无速证效，行道者何可以迟为远？惟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惟不息，则能极道之证效。气机动荡于三

极之间，神采灌注于万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远举，请以仁宗皇帝事为陛下陈之。

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诏曰："祗勤抑畏"；庆历之诏曰："不敢荒宁"；皇祐之诏曰："缅念为君之难，深惟履位之重。"庆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庆历不息之心也。当时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禄胜人力，国家绥静，边鄙宁谧，若可以已矣，而犹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变，碎通天犀以救民生。处贾黯吏铨之职，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习；纳景初减用之言，听范镇新兵之谏，以裕国计，以强兵力。以至讲《周礼》，薄征缓刑，而拳拳以盗贼为忧；选将帅，明纪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虏为虑。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则与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尧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则可至天德，愿加圣心焉。

臣伏读圣策曰：《三坟》以上云云，岂道之外，又有法欤？臣有以见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证效，而亦意其各有浅深迟速也。臣闻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王之不已，武王之无贰，成王之无逸，皆是物也。《三坟》远矣，《五典》犹有可论者。臣尝以《五典》所载之事推之。当是时，日月星辰之顺，以道而顺也；鸟兽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来王，以道而来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盖无一不拜帝道之赐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阶岩廊之上，夫谁曰不可？而尧舜不然也。方且考绩之法，重于三岁，无岁而敢息也；授历之命，严于四时，无月而敢息也；凛凛乎一日二日之戒，无日而敢息也。此犹可也。授受之际而尧之命舜乃曰："允执厥中"。夫谓之"执"者，战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谓也。味斯语也，则尧之不息可见已。《河图》出矣，《洛书》见矣，执中之说未闻也，而尧独言之。尧之言赘矣，而舜之命禹，乃复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则其战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尧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尧之道化，不惟验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验于五十年视阜之时。

读“万世永赖”之语，则唐虞而下数千百年间，天得以为天，地得以为地，人得以为人者，皆尧舜之赐也。然则功化抑何其深，证效抑何其迟欤？降是而王，非固劳于帝者也。太朴日散，风气日开，人心之机械日益巧，世变之乘除不息，而圣人之所以纲维世变者，亦与之相为不息焉。俗非结绳之淳也，治非画象之古也，师不得不誓，侯不得不会，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礼，内外异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礼、曰教、曰刑、曰事者，亦无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穷耳。以势而论之，则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劳！栗栗危惧，不如非心黄屋者之为适也；始于忧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为安也。然以心而观，则舜之业业，即尧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业业；汤之栗栗，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无贰，成王之无逸，何莫非兢兢业业、孜孜栗栗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间者，无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无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为逸而王者之为劳耶？臣愿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则今日之功化证效，或可与帝王一视矣。

臣伏读圣策曰：自时厥后云云，亦足以维持凭借者，何欤？臣有以见陛下陋汉唐之功化证效，而且为汉唐世道发一慨也。臣闻不息则天，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汉唐诸君天资敏，地位高，使稍有进道之心，则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难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为欲所御；阳明不足以胜阴浊，而阳明反为阴浊所胜？是以勇于进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汉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虽然，是为不知道者言也，其间亦有号为知道者矣。汉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谓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议焉。先儒尝论汉唐诸君，以公私、义利分数多少为治乱。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天，不纯乎人，而出入于天人之间；不纯乎理，不纯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间；不纯乎阳明，不纯乎阴浊，而出入乎阳明阴浊之间。是以专务德化，虽足以陶后元泰和之风，然而尼之以黄老，则雁门、上郡之警不能无。外施仁义，虽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则轮台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虽足以

开真观升平之治，然而画之以近效，则纪纲制度曾不足为再世之凭借。盖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变。世道污隆之分数，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而已。

然臣尝思之，汉唐以来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杂伯，二曰异端。时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则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则文帝之心，异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杂伯累之也。武帝无得于道，宪章六经，统一圣真，不足以胜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罚之惨，其心荒也。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杂伯一念，憧憧往来，是固不足以语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资，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错辈刑名之说未尝一动其心，是不累于杂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俭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则后元气象且将骎骎乎商周，进进乎唐虞。奈何帝之纯心又间于黄老之清静？以文帝仅得为汉唐之令主，而不得一侪于帝王。呜呼！武帝、太宗累于杂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为杂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异端，是则重可惜已。臣愿陛下监汉唐之迹，必监汉唐之心，则今日之功化证效，将超汉唐数等矣。

臣伏读圣策曰：朕上嘉下乐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臣有以见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务，而甚有望乎为道之验也。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乐之勤，夙兴夜寐之劳，怅岁月之逾迈，亦欲以少见吾道之验耳。俯视一世，未能差强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为此不满也。陛下分而以八事问，臣合而以四事对，请得以熟数之于前。

何谓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为喜怒者也。熙宁间大旱，是时河陕流民入京师，监门郑侠画《流民图》以献，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图来上，料无一人以父母妻子迁移困顿、皇皇不给之状为图以进者。览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为之罢新法十八事，京师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间不容发，载在经史，

此类甚多。

陛下以为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今尚可谓之不见乎?《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谓之小乎?生斯世,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乐。而操斧斤,淬锋镅,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则腊雪靳瑞,蛰雷愆期,月犯于木,星殒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变,无怪乎屡书不一书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则民生既和,天变或于是而弭矣。

何谓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臣闻穷之所养,达之所施;幼之所学,壮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宁收落韵之李迪,不取凿说之贾边;宁收直言之苏辙,不取险怪之刘几。建学校,则必欲崇经术;复乡举,则必欲参行艺。其后国子监取湖学法,建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斋,使学者因其名以求其实。当时如程颐、徐积、吕希哲皆出其中。呜呼!此元祐人物之所从出也。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从古以来,其语如此。

陛下以为今之士习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庚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以之领郡邑,如之何责其为卓茂、黄霸?以之镇一路,如之何责其为苏章、何武?以之曳朝绅,如之何责其为汲黯、望之?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悠悠风尘,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浊滓横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寻之冲者,其有几哉?厚今之人才,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淑士之道,则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何谓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谨按国史:治平间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罢招禁军,训练旧有之兵,自可备御。"臣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

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是则弱矣,而又未免于贫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创一安边太平库,专一供军,此艺祖积缣帛以易贼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钱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转易之间,风采立异,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飞刍挽粟,给饷馈粮,费于兵者几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列灶云屯,樵苏后爨,费于兵者几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饰翠,宫庭之费则尾闾也。生熟口券,月给衣粮,费于兵者几何?而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戚畹之费则滥觞也。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费,重之以冗费,则财始瓶罄而罍耻矣。如此则虽欲足兵,其何以给兵耶?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强矣。

何谓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谨按国史:绍兴间杨么寇洞庭,连跨数郡,大将王瓌不能制。时伪齐挟虏,使李成寇襄汉,么与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飞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杨么,而荆湖平。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至于通虏寇,则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谓虏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则蜀帅策泸水之勋;窥

我淮，则淮帅奏维扬之凯。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无得弃去，则中国之技，未为尽出其下，彼亦犹畏中国之有其人也。独惟旧海，在天一隅，逆雏宄之者，数年于兹。飓风瞬息，一苇可航，彼未必不朝夕为趋浙计，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惧吾唐岛之有李宝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涛澜沸惊。区区妖孽，且谓有杨么之渐矣。得之京师之耆老，皆以为此寇出没倏闪，往来翕霍，驾舟如飞，运舵如神，而我之舟师不及焉。夫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我之胜兀术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挟之以制我，不武甚矣。万一或出于杨么之计，则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

曩闻山东荐饥，有司贪市榷之利，空苏湖根本以资之，廷绅犹谓互易。安知无为其乡道者?一夫登岸，万事瓦裂。又闻魏村、江湾、福山三寨水军，兴贩盐课，以资逆雏，廷绅犹谓是以捍卫之师为商贾之事，以防拓之卒开乡道之门。忧时识治之见，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发运兼宪，合兵财而一其权，是将为灭此朝食之图矣。然屯海道者非无军，控海道者非无将，徒有王璨数年之劳，未闻岳飞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泽之盗，恐不如此。长此不已，臣惧为李成开道地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

臣伏读圣策曰："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变则通，通则久，今其可以屡更欤?"臣有以见陛下久于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闻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陨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为《大易》之变通；《大易》之变通，即所以验《中庸》之不息。变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盖不息者其心，变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内而纵论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运无端，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天地之所以变通，固自其不息者为之。圣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圣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

臣尝读《无逸》一书,见其享国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间三君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严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宁也;文王之心,无淫于逸,无游于畋也。是三君者,皆无逸而已矣。彼之无逸,臣之所谓不息也。一无逸而其效如此,然则不息者非所以久欤?陛下之行道,盖非一朝夕之暂矣。宝、绍以来,则涵养此道;端平以来,则发挥此道;嘉熙以来,则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宝祐,十余年间,无非持循此道之岁月。陛下处此也,庭燎未辉,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无寐。圣人之运,亦可谓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来之不息者难;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难。昕临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隐,试一警省,则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经筵,学士云集,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试一循察,则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辍,则不息之纯心间矣。如此则陛下虽欲久则证,臣知《中庸》九经之治,未可以朝夕见也。虽欲通则久,臣知《系辞》十三卦之功,未可以岁月计也。渊蜎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执持。顷刻之力不继,则悠久之功俱废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于陛下者亦既略陈于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终复曰:"子大夫熟之复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详延之意。"臣伏读圣策至此,陛下所谓详延之意,盖可识已。夫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导之以直言。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虽然,奉对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于汉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闻大道之要为问。帝之求道,其心盖甚锐矣,然道以大言,帝将求之虚无渺冥

之乡也。使仲舒于此过言之则激，浅言之则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说，曰正心。武帝方将求之虚无渺冥之乡，仲舒乃告之以真实浅近之理，兹陛下所谓切至之论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区区英明之资，超伟之识，谓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笼驾八表，而顾如此语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与论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尝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汉比；而臣之贤，亦万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于圣问之所谓道者而得二说焉，以为陛下献，陛下试采览焉。

一曰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得以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今陛下之所以为公道计者，非不悉矣。以贵缘戒外戚，是以公道责外戚也；以裁制戒内司，是以公道责内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责外廷也。雷霆发郁，星日烛幽，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躐级，阁职超迁，亦以贵缘而得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亦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出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睿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心哉？宣、靖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

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二曰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臣闻直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颓靡。所以光明而张主之者，君子责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责；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气，则直道已矣。夫不直，则道不见。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谓之"凤鸣朝阳"，以为清朝贺。国朝君子气节大振，有鱼头参政，有鹘击台谏，有铁面御史。军国之事，无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马光犹得以殚守忠之奸，刘挚犹得以折李宪之横，范祖禹犹得以罪宋用臣，张震犹得以击龙大渊、曾觌。盖君子之气伸，则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

今陛下之所以为直道计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课，是以直道望谏官也；日有轮札，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转对，有请对，有非时召对，是以直道望公卿百执事也。江海纳污，山薮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谓比年以来，外廷议论于己有所未协、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圣意断之。不惟言及乘舆，上勤节贴，而小小予夺，小小废置，亦且寝罢不报矣。不惟事关廊庙，上烦调停，而小小抨弹，小小纠劾，亦且宣谕不已矣。甚者意涉区区之貂珰，论侵琐琐之姻娅，不恤公议，反出谏臣。此何等狐鼠辈？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来和事之讥，台吏至于重讫了之报。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

康定间，欧阳修以言事出，未几即召以谏院；至和间，唐介以言事贬，未几即除以谏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台谏之势日横为疑。呜呼！兹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倾身下士，宁以宰相受台谏风旨。弼之自处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启人君以厌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间，置看详理诉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余家。其后邹浩、陈瓘去国，无一人敢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鉴已。臣愿陛下壮正人之气，养公论之锋，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台乌府中，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无先于此也。臣来自山林，有怀欲吐。陛下怅然疑吾道之迂远，且慨论乎古今功化之浅深，证效之迟速，而若有大不满于今日者。臣则以

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书，直道不在台谏，是以陛下行道用力处虽劳，而未遽食道之报耳。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则陛下虽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所谓功化证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余年之工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

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陛下万机之暇，傥于是而加三思，则跻帝王，轶汉唐，由此其阶也已。臣赋性疏愚，不识忌讳，握笔至此，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激，亦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身处永不动摇的地位已经很久了，正当国家太平之际，把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行用的大道领会于心，到现在快三十多年了。臣下我等人在鸢鸟飞翔、鱼儿跳跃的天地里欢欣鼓舞，都是大道的本体流布播扬中的一个物件，自己没有料到能够共同来到陛下的殿庭，而陛下又鼓励臣下我等人讨论大道。大道在世上不行用已经很久了，陛下谈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神、人的福气，但臣下我不理解的是，现在已正是道体恒久、教化已成的年代，正是大道与政治融为一体的时节，陛下却怀有立志勤勉、大道却离得遥远的疑问而在那里感到歉疚，恐怕是已经获取到大道却仍像盼望大道还没有看见一样吧？臣下我请求往上追溯太极动静的根源，推究圣明神奇的帝王施行教化、建成功业的效验，专就陛下圣问中关于"不息"这句话来为陛下做劝勉，万望陛下试着听一听。

臣下我听说，天地与大道同样是永不止息，圣人的心念与天地同样是永不止息，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之中，成百上千上万种变化的消长盛衰，成百上千上万种事物的转移分合，哪一个不经由大道？所谓大道，就是永不止息罢了。大道隐伏在尚未分离的元气之中，藏匿在未经雕琢的自然之中，此时正是没有极限的太极的原始状态。从太级分离出天地阴阳，天地阴阳就运行不止，大道也运行不止；从天地阴阳扩散出五行，五行就流转不止，大道也流转不止；从五行扩散成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刚柔善恶，阳刚之道就造就出男子，阴

柔之道就造就出女子。天地之间生生化化不止息，大道也与它一起不止息。既然如此，那么大道永不止息，天地也就永不止息。天地不止息，本来就是大道不止息所造成的。圣人出世后，给天地立心，为生灵百姓立命，为已往的圣人延续断绝的学说，给万代开创太平世界，也不过是用永不止息的心念来充实自己。充实自己而提高自身的修养并统治别人，这就是永不止息啊！充实自己而穷尽事理，进而达到整治家庭，管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这就是永不止息啊！充实自己并从精神心术贯彻到礼乐刑政上，也是这永不止息啊！

从有《三坟》、《五典》以来，一直到周公制成《周礼》的年代，帝能够成为帝、王能够成为王的原因，都是从他们既定的心念一确立就不止息开始的。秦汉以来，大道才开始离去，并不是大道离去，而是深知大道的人太少了。虽然其中英明的帝王，仁义的君主，确实有号称稍稍懂得大道的，但又被推行大道不力而阻碍住。明白要努力用道德来教化民众了，却不得不被黄老学说限制住；懂得要施行仁义了，却不得不被自己欲望太多遏止住；懂得四年施行仁政了，却不得不谋划眼前的功效。上下二三千年间，拘牵于弥补而混过时光，填补缺陷而度过日子，难怪驳杂得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议论的。

只有我大宋皇朝，能一直达到今天的美好局面。陛下承传各位圣明先帝的用心来领会太祖的用心，领会太祖的用心来参取古代帝王的用心，来参取天地的用心。三十三年间，臣下我知道陛下没有三心二意，就如同上天的茫茫运行和神灵的微妙造化，这一心念的境地混沌开辟，是无穷无尽的。但身在帝位逐渐日久，遵循成法逐渐精熟，而各种谋划所收到的效果，仍然没有能够大快陛下之心的东西。往上说来，上天显现的灾异不能够彻底消失；往下说来，人民的生活不能够完全称心如意。人才和读书人的风气不特别纯正，国家财政和兵力不十分充足，以至于盗贼和战争的警报传来。这一切给陛下造成晨起夜睡都忧心忡忡的现象，更实在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那么推行大道，可能没有效验吗？臣下我却认为大道决不是没有效验的东西。大道带来的功绩和教化十分深奥，却不能把它视为很迂阔；大道形成的证验与实效十分缓慢，而不能把它视为

会很快。想到皇天的意志,深远美好而永不止息,这是天地成为天地的原因。道德是那样的纯正,纯正得永不止息,这是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治理天下,只是看他尽力做得怎样罢了,哪里在短暂的年月里推行大道,却一下子就责怪大道的效验是迂阔而又遥远的呢?臣下我期望于陛下的是效法天地的永不止息罢了。姑且用最近的事来说,就有陛下责备自己的言论才发布,连绵阴雨马上变成晴空无云,这是上天显现的灾异未曾不因大道而消弭啊!赈救饥荒的办法刚发布,京师万民都欢呼,这是百姓生活未曾不因大道而安定啊!论辩建言的诏书一颁布,人才、士习就多少变得浑厚了;招募军士、逐项统计收支的圣旨一下达,国家财力、兵力就多少变得充实了。安吉、庆元之战小有斩获,扬州、泸水之战建成克敌大功。它们没有哪一项不是在大道上忧心劳苦所产生的明显效验。但用大道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效来做评论,这些事情都只是肤浅的功效而已,短时的功效而已。把肤浅的功效、短时的功效一下子就当作大道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效,这是汉唐各位君主的用心。陛下施行帝道,就能称帝天下;施行王道,就能称王天下,却肯去沿袭汉唐的事情吗?这是臣下我称颂陛下不止息的原因。

陛下如果从不止息来进一步充实自己,那就能和阴阳同样地化育,能和五行同样地流转,能和天地生生化化的定律同样地无穷无尽。即使经过充实而像周朝经过三十六年的教化使商朝遗民彻底转变,也是做得到的;即使经过充实而像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四十年监狱空虚,刑罚不用,也是做得到的;即使经过充实而像周文王活了一百岁,经过后代再努力,把仁德施布到整个天下,也是做得到的;即使经过充实而像周成王通过占卜预测传国三十代,实际上又超过了七百年,直至亿万年蒙受尊重上天而获得的福佑,也是做得到的。哪里仅仅就像圣上策问中所讲的八件事能够慢慢得到治理就算到头了呢?臣下我恭谨地冒死献呈上愚昧的回答。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超越了没有极限的太级原始形态的玄妙,但实际上离不开日常应用事物的一般情况;植根于阴阳五行的幽深,但实际上却没有超出仁义礼

智、刚柔善恶的范畴之外。天得以澄清明亮，地得以安定宁静，做人的最高准则得以明确，没有一样不是通过这个大道来实现的。圣人一个接一个相传的，都是这个大道。由努力修养好自身到统治别人，由穷尽事理到整治好家庭，管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都根据精神和心术贯彻到礼乐刑政上去。它的本体很隐微，它的作用却十分广泛，经历了千秋万代而不能够改变它。但功业与教化有浅深，证验和效用有迟速，这是为什么呢？皇帝我凭借少见无知，却亲掌大政，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到现在已历多年，志愿更加勤勉，大道却离得越来越远，渺茫得还没显出迹象，皇帝我心中对此疑惑不解。你们这些读书人，明了前代圣人的学问主张，现今都来到朝廷上，一定有十分深切的见解，皇帝我打算虚心地加以听取。”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追溯大道的本原，寻求大道的功效，并且有所怀疑，因而质询臣下我等人啊！

臣下我听说，圣人的心念，就是天地的心念；天地的大道，就是圣人的大道。分开来讲，大道归大道，天地归天地，圣人归圣人。合起来说，大道是永不止息的，天地是永不止息的，圣人也是永不止息的。臣下我请求追溯大道的本原来讲论这个问题。茫茫天地，无边无际，浩大的元气，变化没有起点，人们心中的仁义礼智的本性尚未被赋予，人们心中的刚柔善恶的气质尚未禀受到。在这时，还没有人心，先有五行；没有五行时，先有阴阳；没有阴阳时，先有广大无边的太极的原始状态；没有广大无边的太极的原始状态时，宇宙太空还没有形状，虚寂显不出迹象，但在此之前就有了大道。在没有万物之前，大道就存在了，这就形成了大道的本体；有了万物之后，大道就流布开了，构成了大道的功用。它的本体很微小，它的功用却十分广泛：靠近人心，大道就在人心里面；靠近五行，大道就在五行里面；靠近阴阳，大道就在阴阳里面；靠近广大无边的太极原始形态，大道就在广大无边的太极原始形态里面。它贯穿显明和幽微，兼有光明和隐晦，包容大小，沟通外物和自我。大道凭什么能这样呢？大道在天下，犹如水在地中，地中没有一处不是水，天下就没有一处不是大道。水是永不止息的流动物，大道是永不止息的运作物。天因为大道而澄清

明亮，所以日月星辰都按正常的轨道来运行；地因为大道而安定宁静，所以山川草木都按各自的规律来存在和生长；做人的最高准则因为大道而宣明，所以君臣、父子都按既定的伦理纲常来行事。流行古今，纲纪造化，没有什么不是经由这个大道的。某一天大道止息下来了，即使是天、地、人也不能自立。大道不止息的功用，原来就是如此。

圣人是体察天地不止息的人。天地依靠这大道而不止息，圣人也依靠这大道而不止息。圣人确立不止息的本体，就集中在提高自身修养上；推广不止息的作用，就扩展到治理别人上。确立不止息的本体，就寄寓在穷尽事理等几项要下的功夫上；推广不止息的作用，就显现在整治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效验上。确立不止息的本体，就依据精神心术的幽微；推广不止息的作用，就贯彻到礼乐刑政的彰明上。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同天地成为天地的原因是一样的。大道在天地间，常久而不止息，圣人对于大道，哪里能够有片刻的止息呢？讲述不止息的原理的，没有比得上《易经》，没有比得上《中庸》的。《易经》中的大道，涉及天道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保持住世界的极为协调的状态。而圣人讲论效法天道，就把它归结为自强不息。《中庸》中的大道，涉及到周遍而广阔，静深有本源，仁德就像上天生长万物而没有声响、没有气味那样微妙。而圣人讲论德配天地，就把它归结为不止息就长久。上天刚强劲健、不偏不倚、纯粹而精妙的原因，也正是只在于永不止息这一大道罢了！所以效法上天的人，也只是凭借这永不止息。《中庸》高远光明、广阔深厚、悠远长久而没有止境的原因，也只在于永不止息这一大道而已。所以德配天地的人，也只是凭借这永不止息。用不止息的心念，行用不止息的大道，圣人也就是不止息的天地。

陛下执掌国政，希望天下大治，到现在历经多年了。在此以前的不止息的岁月，犹如从日出到午时；从今以后的不止息的岁月，犹如太阳从午时而居天空正中。这正是勉力施行大道、大有功绩的时候。陛下不要认为几十年里，用来担当起宇宙、把握住天地的东西，未曾不依仗这大道，可直到今天，大道的效验却如此迂阔而又遥远。依臣

下我看来,大道好比百里路途,现在是刚巧到达六七十里地的时候。要到达目的地的人,不能够半途而废;在路上正行走的人,不能够中途考虑停止。努力不懈地前进而不自己作罢,那么到达了六七十里的地方,原本上正是到达百里的阶梯。否则,自己在六七十里之间停下来,那么百里尽管很近,又哪里能半步就到达呢?大道没有肤浅的功业与教化,行用大道的人又怎能把深远当作迂阔?大道没有很快的证验和实效,行用大道的人又怎能把迟缓当作遥远?只有不止息,才能极尽大道的功业与教化;只有不止息,才能极尽大道的证验和实效。气机在天、地、人之间动荡,神采灌注在万物的最远处,总之要从陛下这一心念开始。臣下我来不及往远处举例,请求用仁宗皇帝的事给陛下做陈述。

仁宗皇帝就是永不止息的天地。康定年间的诏书说:"恭敬勤勉还要畏惧天道";庆历年间的诏书说:"不敢荒废懈怠";皇祐年间的诏书说:"遥想当好君主的艰难,深感登上帝位的沉重。"庆历年间不止息的心念,就是康定年间不止息的心念;皇祐年间不止息的心念,就是庆历年间不止息的心念。当时仁宗皇帝用道德来感动上天之心,用福禄来超过人力的代价,国家安定宁静,边境安宁静谧,似乎可以停止了,但仁宗皇帝仍未停止。至和元年,是仁宗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三年,仍在清晨露水中对天而立,来表示对上天灾异的畏惧;击碎通天犀来拯救百姓的生活。委任贾黯担当审官院负责选拔官员的这一职务,将吕公弼的名字写在殿柱上,以此来使人才储备充足,使读书人的风气变美好;采纳吕景初节减费用的建议,接受范镇改革兵制的意见,以此来使国家财力丰裕,使兵力强盛。一直到讲读《周礼》,减轻赋税,放宽刑罚,并牢牢把盗贼未息作为忧虑;选择将帅,严明纪律,并十分担心西夏、辽国的事情。仁宗皇帝的心念到了这般田地仍不止息,就与天地同样悠久了。陛下的心念,也就是仁宗皇帝的心念。范祖禹曾经说过:要效法尧舜,只须效法仁祖。臣下我同样说:要效法帝王,只须效法仁祖。效法仁祖就可以步入上天的德行的境地,希望陛下多加留心。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三坟》以上如此等等,难道是在

大道以外，又有法度吗？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仰慕古代帝王的功业与教化、证验和实效，也推想它们各有浅深、迟速啊！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行用大道的用心，只是一个永不止息罢了。尧的小心谨慎，舜的担忧害怕，夏禹的勤勉不倦，商汤的深深畏惧，周文王的从不停止，周武王的没有二心，周成王的不贪图安逸，都是这个东西。《三坟》显得太渺茫了，《五典》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臣下我曾用《五典》所记载的事情进行推究。那时日月星辰有序运行，有序运行是凭借大道啊！鸟兽草木正常生长，正常生长是凭借大道啊！有关财物收藏和民众生计的六府三事都很妥当，都很妥当是凭借大道啊！四方各个部族都前来归服，前来归服是凭借大道啊！百官都凭借大道而各尽其职，万事都凭借大道而顺利正常。普天之下，直到海角的一切生灵，大概没有一个不拜受帝道的恩赐了。垂衣拱手在朝廷上自我安逸，谁会说不能这样做？但尧舜却恰恰相反，考核官吏功绩的制度，侧重在三年一考核上，但却没有一年敢止息；向民众颁布历法的命令，严密在四季的确定上，但却没有一个月敢止息；对每天处理好繁杂政事的告诫时刻保持警惕，没有一天敢止息。这还是可以做到的。在传让和承接帝位时，尧对舜嘱告说："确实执守住那不偏不倚的尺度"。这里所谓"执"，说的就是十分小心地加以保持而不稍有松懈啊！品味这句话，那么尧的不止息就由此可见了。《河图》已经出现了，《洛书》也已经出现了，可执守那不偏不倚的尺度这种说法还没有人听说过，只有尧讲出来了。尧的话已经显得不精炼了，可舜传位给禹，嘱咐他时却又增加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这样三句话。在危险、隐微、精粹、专一中去察辨，他那种要十分小心地加以保持的思想又比尧更厉害了；舜的用心，那番不止息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所以尧的道德教化不只是在他七十年执政的时候获得到效验，舜的道德教化也不只是在他五十年视察各地的时候获得到效验。

读"万世可以永远依赖"这句话，那么唐尧虞舜以后的几千年中，天能够成为天、地能够成为地、人能够成为人的东西，都是尧舜恩赐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功业与教化是那样地深厚，而证验与实效却是那样地迟缓呢？自尧舜以后转为称王天下，原本也不是就要比

称帝天下更辛劳。当时原始朴素的习俗日益散去，各种时新的风尚日益兴起，人们心中的鬼主意越来越奸巧，世道变化交替不停，而圣人用来控制世道变化的举措，也与它一起不停止。习俗不再是结绳记事时代那样淳朴了，治理也不再是采用象征性惩罚那样简单了，军队不得不誓师，诸侯不得不会盟，百姓不得不用政令来把他们控制住，读书人不得不用礼法来把他们约束住。对内部和外部需要不同的治理，不得不用《诗经》中《采薇》、《天保》所描述的治理办法来进行治理，以致于按《周礼》设置六大官署和官员，突出强调治、政、礼、教、刑、事，原因也不过是要匡扶世道而不让它走入绝路罢了。用天下形势来评论，那么夏朝的治理比不上唐虞时代，商朝的治理又比不上夏朝，周朝的治理又比不上商朝。帝能够成为帝的举措，是多么的安逸！王能够成为王的举措，又是多么的辛劳！深深畏惧戒慎，不如无心帝位的人来得舒适；从一开始就忧苦勤勉，不如谨慎约束自己而统治天下的人来得安宁。但由心念来看，那么舜的担忧害怕，就是尧的小心谨慎；夏禹的勤勉不倦，就是舜的担忧害怕；商汤的深深畏惧，就是夏禹的勤勉不倦；周文王的从不停止，周武王的没有二心，周成王的不贪图安逸，哪一个不是小心谨慎、担忧害怕、勤勉不倦、深深畏惧的扩展呢？大道散布在宇宙中，没有一天止息过；帝王行用大道，也没有一天止息过。帝王的心念，就是天地的心念啊！这还可以认为称帝天下的人属于安逸，而称王天下的人属于辛苦吗？臣下我希望陛下探寻帝王的大道，必须要先探寻帝王的心念，那么今天的功业和教化、证验与实效，或许能够和帝王等量齐观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自那以后如此等等，也足以维持住政局，这又是为什么呢？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瞧不上汉唐的功业与教化，证验和实效，并且为汉唐的世道发出一声感慨。臣下我听说，不止息就成为天，止息就成为普通人；不止息就成为天理，止息就成为人欲；不止息就变得阳气盛明，止息就变得阳气污浊。汉唐各位君主天资聪敏，地位崇高，假设他们稍有进入大道的心念，那么直至与五帝三王相并列，也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无奈上天不足以控制住人，而上天却反被人所控制住；天理不足以支配住人欲，而

天理却反被人欲所支配住;阳气盛明不足以战胜阴气污浊,而阳气盛明却反被阴气污浊所战胜。所以勇于进入大道的人很少,被求取大道吓回来的人却很多,这是汉唐不能成为唐虞三代的原因吧?尽管如此,这还是针对那些不知晓大道的君主而言的。在三代以后也有号称知晓大道的,像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也不能说是不知晓大道的人,但对他们也有非议。先儒曾经论述汉唐各位君主用公与私、正义与眼前利益所占比例的多少作为太平和动乱的标准。这三位君主的心念,常常不纯粹是要成为上天那样,也不纯粹是要成为普通人那样,而是在上天和普通人之间出来进去;不纯粹是天理,也不纯粹是人欲,而是在天理和人欲之间出来进去;不纯粹是阳气盛明,也不纯粹是阴气污浊,而是在阳气盛明和阴气污浊之间出来进去。所以专心致力于道德教化的汉文帝,虽然足以造就后元年间太平和美的民风,但因被黄老学说限制住,因而匈奴入侵雁门、上郡的警报就不能不存在。施布仁义给百姓看的汉武帝,虽然足以达到建元年间的富庶景象,但因被个人欲望太多所遏止住,因而晚年对在轮台屯兵的忏悔就不可免掉。四年推行仁政的唐太宗,虽然足以开创贞观年间的太平盛治,但从眼前的功效出发做考虑,因而法纪纲常和各项制度就不能成为下一代皇帝的凭借。因为具有一分道心,原本就足以成就一分的事功;具有一分人心,也足以招致一分的世事变化。世道污浊与隆盛的比例数,也由天理和人欲消长的比例数所决定着罢了。

不过臣下我曾思考,汉唐以来成为大道拖累的因素,其中主要有两种:一是仁政夹杂着霸道,二是不符合正统的学说。历代君主在探求大道方面立有志向的,不陷入仁政夹杂着霸道,就陷入不符合正统的学说。姑且拿汉唐三位君主来说,汉文帝的心念是受了不符合正统学说的拖累,汉武帝、唐太宗的心念是受了仁政夹杂霸道的拖累。汉武帝在大道上一无所得,尽管效法表彰儒家《六经》,统一圣人的真学说,但不能够超过他在追求长生不老、大兴土木方面的私欲和四处用兵、使用刑罚的惨烈,这表明他的本心是奢侈的。唐太宗完全不懂得大道,后宫乱伦的羞耻,能当将帅宰相的自夸,晚年亲征辽东,最终不能战胜自己那刚暴的血气,这表明他的本心是骄纵的。仁政夹杂

霸道这一念头，接连不停地转动，这是本来就不能对他讲论坚持长久、永不止息这种大事的人。像汉文帝还稍有帝王的天资，稍有帝王的境界，完全用君子及长者的道德风范对待天下人，因而晁错那类大臣的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学说，未曾使他有一次动心，这是不受仁政夹杂霸道的拖累了。假如汉文帝把二三十年的谨慎节俭的心念转移到寻求大道上，那么后元年间的气象就将渐渐达到商周、进入唐尧虞舜时代了。无奈汉文帝的纯粹心念又夹杂着黄老学说的清静主张，所以汉文帝仅能成为汉唐之际的好君主，却不能跻身于五帝三王的行列中。哎呀呀！汉武帝、唐太宗被仁政夹杂霸道所拖累，君子固然不敢用五帝三王的事业来期望他们。汉文帝不被仁政夹杂霸道所拖累，却不能不被不符合正统的学说所拖累，这就更加令人可惜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把汉唐的史迹作为借鉴，必须首先把汉唐君主的心念作为借鉴，那么今天的功业与教化，证验与实效，将会超过汉唐好多倍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皇帝我为使上下都欢乐，如此等等，或许是筹划裁制和推广施行，还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吗？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思考今日的八项事务，并十分期望行用大道获取到效验啊！臣下我听说，上天的灾异降临，是由民众的怨气招来的；人才的缺乏，是由读书人的风气败坏而形成的；兵力的弱小，是由国家财力不足造成的；异族入侵的警报，是由盗贼导致的。陛下通过使上下都欢乐的勤奋，夙兴夜寐的辛苦，对岁月漫漫流逝感到惆怅，也是想因此逐渐看到自己行用大道的效验啊！俯视天下三十年，未能差强人意，而八方面政事的弊端却存在，臣下我明白陛下对此不满。陛下分别用这八方面的政事来询问，臣下我把它们归纳成四个方面来回答，请求能够在陛下面前仔细来做陈说。

什么叫做上天灾异的降临，是由民众的怨恨招来的呢？上天所看到的，是以民众所看到的为转移的；上天所听到的，是以民众所听到的为转移的；上天做出奖赏与惩罚，是以民众做出奖赏与惩罚为转移的。人心的苦乐，是天心随之而喜怒的根据。神宗熙宁年间大旱，当时河陕地区逃荒的饥民涌入京城，监门官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

把它献给神宗，并且说："陛下南征北战，大臣们都用胜利、大捷的图画来呈献，估计没有一个人把全家父母妻子流亡困顿、连紧张都紧张不过来的情景绘成图画来进献的。陛下观看臣下我的这幅图画，施行臣下我的建议，十天之内不下雨，就请用欺君之罪把我正法。"神宗为此废除新法十八事，京师大雨连下八天。上天与世人的感应，紧密得中间容不得一根头发。记载在经书史籍中的此类事情，是特别多的。

陛下认为现在人民的生活怎么样呢？现在人民的生活困苦啊！自从皇室的专用府库独自储藏越来越多，人民困苦了；自从各种宫殿台阁频繁营建，人民困苦了；自从屡屡让富家巨室交纳免役钱，人民困苦了；自从不断地在民间下等民户中摊派粮草，人民困苦了；自从贪官暴吏在所到之处把百姓当作家中的鸡和圈中的猪，任意吞食，人民困苦了。哎呀呀！东南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枯竭了！《尚书》中说："民众的怨恨哪里等它显现出来呢？还没产生时就谋求预防了！"现在还能说没有显现出来吗？《尚书》中又说："怨恨不在于有多大，也不在于有多小。"现在还能说是小吗？生活在这个年代里，做这个年代的百姓，事奉父母，哺育子女，也都想要各自实现自家的父母妻子的天伦之乐。但手持斧头，磨快刀尖剑刃，日夜想砍伐百姓命脉的鬼点子，滔滔如水，到处都是。既然如此，那么腊月雪舍不得降临来显示瑞兆，惊蛰的雷声到时候也不响起。月亮侵犯木星，流星掉下来变成石头，以至于天像下雨那样下土粒以及地震这类灾害，难怪屡屡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偶尔只记一次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持守永不止息的心念，赶紧寻找用来安定人民的办法，那就会人民生活变得和美，上天的灾异大概在这时就消除了。

什么叫做人才的缺乏，是由读书人的风气败坏而形成的呢？臣下我听说，没做官时所培养的品行学识，是做官后去施行的；幼年学习的东西，是成年后去使用的；现在在家提高自身的修养，是以后在天子的殿廷上来实行的。我大宋建国初期，各位元老曾把士习变厚重作为首要事务，宁愿录取试卷中出现不协韵毛病的李迪，也

不录取穿凿附会的贾边；宁愿录取直言不讳的苏辙，也不录取文辞险怪的刘几。建立学校，就必定要崇奉经术；恢复乡举，就必定要考察其人的品行和学业。后来在国子监又采取湖州州学的办学方法，设立经学、治道、边防、水利等学斋，让学习的人根据本学斋的名称来求得这方面的实际才能。当时像程颐、徐积、吕希哲都出自其中。哎呀呀!这是元祐时期重要人物所产生的来源。读书人风气厚重还是轻薄，与人才的关系最紧密，从古以来，此话一直这样讲。

陛下认为现在读书人的风气怎么样呢?现在士大夫家中有儿子并教育他，当他年幼时，就教他学会给经书断开字句，选择经书中不忤逆时俗崇尚，不对有关部门有震动的内容，让他掌握得滚瓜烂熟；等到他长大，又把写一手工整的毛笔字作为特长，把长篇大论作为学问宏富；到乡校去应试靠这个，在科举考试中比试高低靠这个，获取到官位和车马也靠这个。父亲兄长所教导和告诫的，老师和同窗所讲论辨明的，只不过是个私利罢了。他们当中能在流风世俗中摆脱出来而卓然自立的人，会有几个呢?心术在未做官之前已经败坏，那么气节在做官以后就可想而知了。用这样的人去做郡县长官，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卓茂、黄霸那样的人物?用这样的人去镇抚一路，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苏章、何武那样的人物?用这样的人在朝中做官，怎么能要求他们成为汲黯、萧望之那样的人物?对在权力大、地位又显要的官职上奔走钻营的人，不要再责怪了!对在权贵的门下投靠依附的人，也不要再责怪了!对像牛鼻绳、像马缰一样被人牵着走，如狗般苟且，如苍绳般营求，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的人，也不要再责怪了!风尘悠悠，苟且习俗靡靡，清新芬芳的气息消失停歇，浊泥渣滓横流。上天降下善心，使那执守常道的美德能在相互宰割接连不断的风口浪尖上萌生出来的人，能有几个呢?要使今日的人才众多，臣下我认为改变现在读书人的风气以后，才会达到。臣下我希望陛下执持不止息的心念，赶快寻找能使读书人完美起来的办法，那么读书人的风气一淳厚，人才就会在这时得到了。

什么叫做兵力的弱小，是由国家财力不足造成的呢？恭谨地查验我朝的正史：英宗皇帝治平年间，派使者去招募京畿、淮南士兵。司马光说："边臣请求增兵没完没了，朝廷招募士兵无止无休。官府仓库中的粮食、布帛数量有限，百姓的膏血也有尽头。希望停止招募禁军，训练旧有的士兵，自然能够守备防御。"臣下我听说古今各个朝代，能免于脆弱的人，必定不能免于贫困；能免于贫困的人，必定不能免于脆弱。一方面的利益兴了起来，另一方面的害处就隐伏下去了，没有两个方面都受到损害的情况。现在军队和财政却都受到损害了。自从修筑东海城而调动淮兵去防御沿海，因而两淮的军队就不足了；自从收复襄阳和樊城，把荆州兵并入进来驻防襄阳，因而荆湖的军队就不足了；自从汉水染上了蒙古人的腥膻气，在宝峰溅上了我大宋人的冤血，而正军忠义将士们在迁徙途中白白死掉了一大半，因而川蜀的军队又不足了；江淮的军队又抽调入蜀，又抽调去充实荆湖，因而长江下游的军队越发不足了；荆湖的军队又分兵策应，分兵镇抚，因而长江上游的军队越发不足了。国家用来自卫所依仗的力量是军队，而现在军队不足竟像这样，国家怎会不虚弱呢？

扶持虚弱而使国家归于强大，那么招兵的对策，在今天实在是有不能作罢的了。但召募正全力进行，军饷的需求就变得急迫，向仓部要，仓部没钱；向户部要，户部没钱；向兵部要，兵部没钱。除了每年交纳给异族政权的岁币银绢以外，没听说有制定一条办法替军队的粮饷做考虑的，这属于已经虚弱了，又不免于贫穷。陛下自出机杼，近来又创设了一个安边太平库，专门供应军需，这是太祖皇帝积贮缣帛来换取敌人首级的用心，是仁宗皇帝拿出皇室钱帛资助军事的用心。转变更动之中，风采立刻不同，以前的微弱状况能够变强大了。但转运粮草，发给兵饷，供应粮食，花在士兵身上的究竟有多少呢？而道观佛寺照耀湖山，大兴土木的费用却是大口子啊！布列战地军灶，像云彩聚集那样屯驻，先砍柴，后点灶，花在士兵身上的究竟有多少呢？而宫廷歌舞、金玉穿戴，宫廷的费用却是倾泄之地啊！设有生券和熟券这两种军用补助凭证，每月发放

衣粮，花在士兵身上的究竟有多少呢?而珠玉用斗量，用车装，侥幸取宠，希求恩赏，对后妃家族人的费用却是个窟窿眼啊!天下的钱财，专门拿来供应军需，那就没有不充足的了。只是又加上了各种虚浮的花销，加上了各种多余的支出，因而国家财富才瓶空而大坛子也不光彩了。像这样，即使想充足兵力，又用什么去供给士兵呢?臣下我希望陛下执持不止息的心念，赶快寻找用来节约财物的办法，那就会财政由此充足起来，兵力或者在这时就能够加强了。

什么叫做异族入侵的警报，是由盗贼导致的呢?恭谨地查验我朝正史：绍兴年间，杨么在洞庭湖造反为寇，势力达到数郡，大将王瓌不能制服他。当时伪齐政权依仗金国的力量，派游寇李成入侵襄汉地区，杨么与他往来勾结，朝廷对此感到是块心病，首次命令岳飞处置长江上游军务。不久就赶走李成，活捉杨么，而荆湖地区得到平定。臣下我听说，外部的异族不能成为中原的祸患，它们前来进犯，必定等待中原内部的变乱；内部的盗贼，也不能成为中原的祸患，他们起事作乱，必定要与外敌的入侵相呼应；盗贼竟然发展到勾结外敌的地步，就是心腹大患了。今日所谓的异族确实可怕了，但进逼我川蜀，我川蜀统帅建立了泸水大捷的功勋；窥视我两淮，我两淮统帅奏起了扬州大捷的凯歌。对方的狼子野心，固然不能靠一仗的胜利就让它收回去，然而致使他们一无所获，撤兵离去，这表明中原的技艺也不是全都不如他们，他们也仍然畏惧中原拥有能战胜他们的人物。只是旧海位于天边一角，势力还不大的逆贼在这里为非作歹已经有好多年了。飓风转眼间就会刮起来，一只小舟就能摆渡过来，他们未必不从早到晚为扑向浙江做考虑，但没有能够做到，是缺乏操舟的技术，对游水很生疏，害怕我大宋唐岛有李宝在那里镇守。但洞庭湖的烟雾水波沉寂后，浙西的湖水却波涛掀卷起来了。小小的盗贼妖孽，将被认为要像当年杨么那样渐渐地强大起来了。听京城富有经验的老人们说，这群盗贼出没不定，往来灵便，驾船如飞，运舵如神，而我们的水军却不如他们呀!东南最擅长的技艺没有比得上水军的，我们当年在金山战胜金兀术，凭的是水军；在采石矶致使金主完颜亮毙命，凭的也是水军。但今

天这群盗贼反而依仗这水上技艺来挟制我们，大宋武力不强简直到了极点。万一有人想出杨么那样的计谋，以前游寇李成没有在荆湖得逞的图谋，未必今天不能在浙江得逞。

往日曾听说山东接连发生饥荒，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贪图征收商税的好处，把苏湖的所有出产都拿出去给对方用。朝中大臣还认为这属于贸易活动。怎知其中就没有充任外敌向导的人呢?一个人登岸，万事就会像瓦块那样碎裂了。又听说魏村、江湾、福山三寨水军，兴起贩盐的税目，去帮助这伙势力还不大的逆贼。朝中大臣还认为这样干纯属用捍卫疆土的军队去做商贾的事情，用防边拓疆的战士去打开能充当我方向导的大门。所谓忧虑时事和懂得治国的见识，常常是这个样子。肘腋下的蜂虿，袖中怀里的蛇蝎，难道可以对此忽视吗?陛下最近命令转运使兼任提点刑狱，把军队和财政合在一起让他执掌全部权力，这是要施展一举消灭对方的谋划了。但屯驻海道的并不是没有军队，控制海道的并不是没有将才，可只有王瓌那样的好几年劳苦，却没有听到像岳飞八日就消灭盗贼的捷报。春秋郑国子太叔平定符泽的盗贼，恐怕不是这个样子。长此以往，臣下我害怕会给李成那类游寇开辟出活动的空间来。臣下我希望陛下执持不止息的心念，寻求用来消弭盗寇的办法，那就会盗寇祸难一肃清，边防守备在这时也能够宽松了。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不息就能长久，长久了就会有效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效验呢?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会长久，现在还能够经常做变更吗?"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在行用大道上坚持长久而对《中庸》、《易经》的格言深有感悟啊!臣下我听说，天永久不坠落是因为运行不止，大地永远不崩裂是因为转动不止，河水永久不腐臭是因为流动不止，日月星辰常常放出光辉是因为运行不止。天下凡是不止息的事物，都因为它坚持长久。《中庸》的不止息，就是用来形成《易经》的变通；《易经》的变通，就是用来验证《中庸》的不止息。变通上的坚持长久，原本上来自不止息上的坚持长久。不止息是那心念，变通是那行迹。那心念不止息，所以那行迹也不止息。在天地四方构成的六

合之内遨游并在六合之外纵论，生于百世以下却追想于百世之上，神妙变化是上天造就，天体运行没有尽头，阐发那隐微却看不到，充实到各处却不能穷尽。天地之所以变通，固然来自它那不止息；圣人在行用大道上坚持长久，也不过是效法天地而已。天地凭借不止息而长久，圣人也凭借不止息而长久。把不止息排除在外去谈论长久，都不是能够长久的原因所在。

臣下我曾经观读《无逸》一书，看到书中讲到的在位长久的国君有四位，其中有三位国君是最长久的。臣下我寻求他们长久的原因：殷中宗的心念，是庄严敬畏；殷高宗的心念，是不敢荒废懈怠；周文王的心念，是不能过度安逸，不能沉溺在打猎游乐中。这三位国君，都是不贪图享乐罢了。他们的不贪图享乐，就是臣下我所说的不止息。一旦做到不贪图享乐，它那效验就达到这样的地步。既然如此，那么，不止息难道不是能够长久的原因吗?陛下行用大道，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那样短暂了。宝庆、绍定年间以来，就涵养这大道；端平年间以来，就发挥这大道；嘉熙年间以来，就把握这大道。从嘉熙到淳祐，从淳祐到宝祐，十多年间，没有不是保持遵循这大道的年月。陛下在此过程中，庭堂的火炬还没有亮起来，臣下我知道陛下已在夜间就和衣等待着天明；太阳从天空正中转入了偏西，臣下我知道陛下仍然顾不上吃饭；夜间漏刻已经开始，臣下我知道陛下还让枕褥在那里闪光而未睡下。这圣人般的运作，也可以称得上是不止息了。但以前的不止息容易做到了，将来的不止息却更难做到；长久地不止息容易做到，越来越长而越不止息却更难做到。日出时亲临大殿，百官如群星分布，陛下的心念在这时确实会不止息了；但在暗室屋角只有自身一个人时，试作一番警惕和反省，是否也能做到不止息呢?每天驾临经史讲席，学士如云聚集，陛下的心念在这时确实会不止息了；但在宦官、美女围绕在自己身边时，尝试作一番巡察，是否也能做到不止息呢?在外表上不止息，本来就不能保证在内心里也不止息；在这方面不止息，本来就不能保证在那方面也不止息。时而勤奋，时而懈怠，时而兴作，时而停止，那么不止息的纯粹心念就出现中断了。像这样的

话，陛下尽管期望坚持长久就会有证验，可臣下我却明白《中庸》关于施用九种治国大法的治绩，却是不能够一下子就能看得到的。尽管期待变通了就会长久，可臣下我却清楚《易经·系辞》所列举的十三卦启示圣人进行发明创造，是不能够用岁月来计算的。身在华丽的宫殿中，需要内心清虚纯洁地应对外部事物的地方，这些全在于陛下自己来斟酌，自己来把握。一瞬间的力量不能接上去，那么苦于坚持长久的功效就全都废弃掉了。能不警戒吗?能不畏惧吗?

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的东西真是太详尽了，臣下我用来效忠陛下的建议也已经大体上在前面做陈述了。但陛下的制策在最后又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要翻来覆去，仔细思考做回答，不要偏激，不要空泛，以此来符合皇帝我审慎地征求你们意见的心意。"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到了这个地方，陛下所说的审慎征求你们意见的用意，大致上已经能够体会了。陛下从即位以来，未曾因直言而加罪读书人，不仅不因直言而加罪，而且用直言来引导他们。臣下我等人曾经恨没机会来到天子面前，倾吐我们平素所积累的话语。现在有幸被礼部选中，能够站在这玉阶方寸之地上，这正是臣下我等人披露肺腑忠言的时日。正打算明目张胆、正直勇敢地谈论天下大事，陛下却用不要偏激、不要空泛来告诫我们。空泛本来就不切实，至于激烈，那正是忠诚的抒发。陛下为何将空泛与激烈并论，而且讨厌激烈呢?讨厌激烈者的言辞，那是打算期待臣下我等人都归入唯唯诺诺吗?这样一来，臣下我是该做激烈者呢?还是该做空泛者呢?或者是迁就陛下的要求而姑且该做一个不激不泛者呢?尽管这样，在殿廷上奉旨对答而不激不泛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臣下我在汉代找到一个人，名叫董仲舒。当汉武帝策问董仲舒时，慷慨激昂地用想要听到大道的纲领作为询问。汉武帝寻求大道，心意也是特激切了。但大道要是从它那博大的意义上来讲论，汉武帝恐怕将要到那虚无飘渺的境界中去寻求了。假如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讲得过份，就会显得激烈；讲得浅近，就会显得空泛。董仲舒既不激烈，也不空泛，提出一种主张，叫做端正帝王自己的心念。汉武帝正准备在虚无飘渺的境界中去寻觅大道，董仲舒却把真实浅近的事

理告诉他，这就是陛下所说的恰切到极点的言论。无奈汉武帝自己仗持他那点儿英明的天资和超常的见识，认为自己足以凌跨整个宇宙，收拢驾驭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因而看到这样的言论并不重视，过后就把董仲舒任命为江都相，让他离京而去，于是同汉武帝一起讲论大道的，就另外有人了。臣下我压根就曾为汉武帝感到惋惜。堂堂我大宋天朝，本来就不是汉朝能够来相比的；而臣下我的才能，也赶不上董仲舒万分之一。但也不敢激烈，不敢空泛，如今切合圣上策问所讲的大道而得出两项主张，把它献给陛下，陛下试加采择观览。

第一项主张是：加重宰相的职责来开辟公道的大门。臣下我听说，公道在天地间，不能有一天被堵塞封闭住。使公道明显得到恢复又畅通无阻，这是宰相的职责。扶持公道虽然是宰相的职责，但主持公道，却是天子的事情。天子如果侵夺宰相的权力，那么公道就不复存在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枢密院被称作朝廷，是天子和他们共同商议国家大政、颁布重要政令的地方。政令不从中书省发出，前人把这称为“斜封墨敕”，这不是太平盛世的光彩事情。我大宋创建初期，三省的纪纲十分严正：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驳回，尚书省负责遵照执行，宫廷和政府事务，没有一项不由宰相统管。所以李沆仍能够烧掉册立皇妃的诏书，王旦仍能够阻止节度使的任命，韩琦仍能拿出未填姓名的补官凭证来驱逐内侍，杜衍仍能原封不动地把皇上直接下达的命令送回去来裁抑侥幸者。因为宰相的权力不可动摇，公道才有所依凭而确立起来。

现在陛下用来为公道做考虑的东西，并不是不周全了。拿拉拢关系来从反面告诫后妃家族的人，这是用公道来要求后妃家族的人啊！拿制裁来从正面告诫众宦官，这是用公道来要求众宦官啊！拿舍弃法律、使用成例来从反面告诫群臣，这是用公道来要求朝廷啊！真好似雷霆震落覆盖物，群星和太阳照亮幽暗处，天下人在这些方面都敬服陛下的圣明了。但有人认为近年来，朝廷任命官员事宜，有的在义理上有些不合适，在制度上有些不符合，这些都是用圣旨

来施行的。不仅东西二班诸司使的升补要亵渎陛下的手书，而且统帅越级提拔，殿阁馆职破格任用，也都通过拉拢关系获得到皇上的恩泽。不仅奸赃的洗刷，要烦劳陛下发布命令，而且选人得到职位，奸吏逃避刑罚，也通过不惜任何代价的钻营手段获得到加恩赐命。甚至里巷中琐屑的争打官司，衙役下贱人的谋求一官半职，也全部传到内廷，都由内廷直接下达命令去办。这是虮虱般微小的什么事情?可陛下却去亲自处理!大臣们几乎成了奉承旨意的官吏，三省几乎成了奉行文书的衙门。臣下我恐怕天下公道从此就堵塞住了。

仁宗景祐年间，罢废由皇帝直接下达命令，凡是诏令都出自中书省、枢密院。仁祖用来主持和张布公道的办法就像这样。如今提建议的人，仍把政事应当偶尔由圣上做出决断作为一种论调。哎呀呀!这也是韩绛当年告诉仁祖的言辞啊!“皇帝我压根就不怕自行处理政事，但不如先让大臣的考虑全都亮出来再去施行。”仁祖用来告诫韩绛的这两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现在又用韩绛的主张，诱使君主去剥夺中书省的职权，这是什么用心呢?宣和至靖康年间，创置御笔制度。蔡京坐在东廊等待，专门把奉行御笔作为职守。后来童贯、梁师成掌权，天地由此分裂了数代，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了。臣下我希望陛下加重宰相的职权，端正中书省的规制，凡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按照先朝的惯例，必须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那就天下幸运至极，宗庙社稷幸运至极了。

第二项主张是：收用君子来使直道的命脉延长。臣下我听说，直道在天地之间，不能有一天颓靡。使直道光明又弘扬持守它，这是君子的责任。匡扶直道虽然是君子的责任，但主持直道却是君主的事情。君主演变到使君子正气沮丧的地步，直道也就终结了。不正直，直道就不会出现。君子是直道的倡导者，直道一旦由君子倡行开来，前人把这称作“凤鸣朝阳”，来为国家清明做庆贺。我大宋皇朝君子气节大为振扬，有号称鱼头参政的，有号称鹘击台谏的，有号称铁面御史的。国家军政大事，在君子那里没有一样不能说。所以司马光仍能奏请斩杀国家奸贼任守忠，刘挚仍能挫败贪功

生事的大宦官李宪，范祖禹仍能使宋用臣得到惩罚，张震仍能排击龙大渊和曾觌。因为君子的正气得到伸张，直道才有所依附并倡行起来。

现在陛下用来为直道做考虑的东西，并不是不完备了。每月有布置下去的事目，这是用直道来期望谏官啊!每天有轮值上殿呈递的奏札，这是用直道来期望廷臣啊!有每五日按次序指陈时政缺失和朝廷急务，有官员请求奏对，有不按常规宣召臣僚入宫对答，这是用直道期望公卿百官啊!真如同江海能容纳污流，山泽能藏匿害虫，天下人在这方面都敬服陛下的海量。但有人认为近年来，朝廷上议论政事，有的和自己的想法不合拍，在感情上不忍去做的，就都请皇上来做决断。不只是议论涉及到皇上车马器用的，搅得皇上忙着让朝臣少上一些附有补充说明的奏札，连那小小的官职授予与剥夺，小小的规章废除与设置，也快要扣压下来不答复了。不仅事情关系到朝廷的，要烦劳陛下做调停，连那小小的抨击弹劾，小小的纠察劾奏，也快要一个劲儿地命令少来一些了。更严重的是，劾奏的意向涉及到让人鄙弃的宦官，论奏触击到卑微渺小的与后妃有亲戚关系的人，却不体恤公正的议论，反而把谏臣贬谪到地方上去任职。这是狐鼠类的一帮什么东西?可陛下却去亲身庇护他们!御史到了招来和事佬讥刺的地步，台吏到了只用完结作禀报的程度。臣下我担心天下的直道，从此被阻遏住了。

仁宗康定年间，欧阳修因议论政事而被贬到地方上去做官，不久就被召回，供职谏院；至和年间，唐介因议论政事被贬到地方上去做官，不久就被任命为谏官。仁祖用来主持直道的办法就像这样。如今提建议的人，仍把御史和谏官的势力日益骄横当作可疑事。哎呀呀!这并不是当年富弼忠于仁祖的本心啊!富弼降低自己的身份，尊敬读书人，宁可用自己身为宰相来承受御史和谏官望风捕影的奏劾。富弼对待自己那又是什么一种情形啊!无奈今人不明白富弼的本心，反而诱使君主去厌恶君子的言论，这是什么用心呢?哲宗元符年间，设立看详理诉所，而士大夫得罪的有八百多家。后来邹浩、陈瓘离开朝廷，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为天下事发出一句议

论。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了。臣下我希望陛下使正人的正气壮起来，养护公论的锋芒，凡是因为直言被调离朝廷的人，按照先朝的惯例，全部把他们召回到御史台、谏院中来，那就天下幸运至极，宗庙社稷幸运至极了。

大道行用，天下为公。周王的大路平如磨刀石，直如箭一般。自古以来，帝王行用大道的，没有不把这一点放在首位的。臣下我从民间来到朝廷，心中有话要倾吐，陛下心情惆怅地怀疑大道迂阔又遥远，而且慷慨谈论古今功业和教化的浅深，证验和实效的迟速，并好像对现今的情况大为不满。臣下我却认为这不是行用大道的罪过。公道不在中书宰相，直道不在御史和谏官，所以陛下行用大道，很用力的地方虽然劳苦，但只是没有迅速得到把大道当做饭食那样的回报罢了。果真让中书宰相能够用公道总揽朝政纲要，让御史和谏官用直道纠正官吏的邪恶行径，那么陛下即使在朝廷上只管端坐，无所事事，所谓的功业与教化、证验与实效，就能够立刻看得到，何至于积累三十多年的功力，却志向勤勉，大道遥远，渺茫得没有边际呢？

臣下我起始用“不息”这二字为陛下劝勉，最后用公道、直道为陛下献计。陛下在日理万机之余，如果能在这上面反复多加思索，那么跻身帝王行列，超越汉唐，就由此构成台阶啊！臣下我天赋禀性疏阔愚钝，不懂得忌讳，握笔写到这里，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是过于激烈呢，还是过于空泛呢？冒犯皇帝的威严，罪在不赦，只希望陛下留神。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陈明洁译〕

宋辽金元进士科御试试题辑存

〔已入前编者不录〕

1.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癸酉科

[三月十九日(试日);讲武殿(试所)]

未明求衣赋

悬爵待士诗

2.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乙亥科

[二月二十五日;讲武殿]

桥梁渡长江赋

龙舡习水战诗

3.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丁丑科

[正月七日;讲武殿]

训兵练将赋

主圣臣贤诗

4.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庚辰科

[闰三月十一日;讲武殿]

春雨如膏赋

明州进白鹦鹉诗

文武何先论

5.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科

[三月十五日;讲武殿]

六合为家赋

鹦转上林诗

文武双兴论

6.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乙酉科

[三月十五日;十八日;崇政殿]

颖川贡白雉赋

亨小鲜诗

玄女授兵符论

庭燎赋

淡交如水诗

7.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戊子科

[六月十一日;崇政殿]

一叶落知天下秋赋

堂上有奇兵诗

8.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己丑科

[三月二十一日;崇政殿]

圣人不尚贤赋

五色一何鲜诗

禹拜昌言论

9.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壬辰科

[三月四日;崇政殿]

卮言日出赋

射不主皮诗

儒行论

10.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科

[三月十七日、五月十八日;崇政殿]

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

崇德报功诗

为政宽猛先后论
贤为宝赋
膏泽多丰年诗

11.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乙巳科

[三月六日、五月十三日;崇政殿]

天[illegible]犹张弓赋
德　如毛诗
以八则治都鄙论
建用皇极赋
昭德塞违诗
汉文宣二帝政理孰优论

1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戊申科

[四月十二日;崇政殿]

清明象天赋
明证定保诗
盛德大业论

13.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己酉科

[六月二十七日;崇政殿]

大德曰生赋
神无方诗
升降者礼之末节论

14.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辛亥科

[十一月七日;崇政殿]

礼以承天道赋
神以知来诗
何以为大道之序论

15.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壬子科

[三月二十二日;崇政殿]

铸鼎象物赋

天险不可升诗

以人占天论

16.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甲寅科

[九月十五日;景福殿]

道无常名赋

冲气为和诗

天地何以犹橐籥论

17.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科

[三月二十三日;崇政殿]

置天下如置器赋

君子以恐惧修省诗

顺时慎微其用何先论

18.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己未科

[三月九日;崇政殿]

君子以厚德载物赋

君子居易以俟命诗

日宣三德论

19.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丁卯科

[三月二十日;崇政殿]

圣有谟训赋

南风之薰诗

执政如金石论

20.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庚午科

[三月十一日;崇政殿]

藏珠于渊赋

溥爱无私诗

儒者可与守成论

21.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甲戌科

[三月十八日;崇政殿]

房心为明堂赋

和气致祥诗

积善成德论

22.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戊寅科

[三月十七日;崇政殿]

富民之要在节俭赋

鲲化为鹏诗

廉吏民之表论

23.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壬午科

[三月十五日;崇政殿]

应天以实不以文赋　以"天应诚德,岂尚文为"为韵

吹律听凤鸣诗

顺德者昌论

24.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己丑科

[三月十三日,崇政殿]

盖轸象天地赋

日昃不暇食诗

天听君人之言论

25.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丁酉科

[三月五日;崇政殿]

民监赋

鸾刀诗

重巽申命论

26.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己亥科

[二月二十八日;崇政殿]

尧舜性仁赋

求遗书于天下诗

易简得天下之理论

27.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辛丑科

[二月十七日;崇政殿]

王者通天地人赋

天德清明诗

水几于道论

28.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癸卯科

[三月九日;崇政殿]

寅畏以享天心赋

乐通神明诗

成败之机在察言论

29.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乙巳科

智若禹之行水赋　以"明智之大、如禹行水"为韵

30.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庚戌科

[三月八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庭，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鬯茂，鸟兽龟鳖无所不得其惟性者。其富足以备礼，其知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此子大夫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德行赶不上众人，可却位居在读书人和百姓们的上面，所要和大家实现天下大治的办法，只管向各地黎民百姓以及他们中的贤人做访求，所以就把你们全部召请到殿廷，拿当前的政务来做询问。这哪里仅仅是考察你们这些士大夫的学问，而且要用来扩充皇帝我的见闻。大致上说来，圣人治理天下，都是做到文武百官恪尽自己的职守，一切政事符合固有的次序。有不推行的便罢，只要推行，就没有不成功的；有不变革的便罢，只要变革，就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农田得到开垦，水利得到兴修，草木长得顺畅茂盛，鸟兽鱼鳖没有不按它们的习性自由地生长的。社会的富裕，足以使礼仪完备地定立起来；人们的思想水平，足以使乐舞推广开来；国家的治理，足以将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你们这些士大夫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呢?当前的弊病，可以称得上是太多了。补救的对策，必定要有主有从；施行的恰切方法，必定要有先有后。这是你们这些士大夫应当心里很清楚的。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世上所讲论的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必定都会说要数唐尧虞舜和成周时代了，这从《诗经》、《尚书》所载述的那个时代的史事可以看出来。至于后世的贤明君主和忠正明智的大臣共同绰绰有余或勤勉不懈地营就一代的大业，尽管

还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总之在建成功业的缘由上，也一定存在着可以讲论一番的东西。把这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1.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癸丑科

[三月六日；集英殿]

制策曰：古之明王，求贤而听之，择善而使之。法不足以有行也，改之而已；人不足与有明也，作之而已。以守位则安，以理财则富，以禁过则听，以讨罪则服，以交鬼神则享，以来蛮夷则格，以上治则日月星辰得其序，以下治则鸟兽草木得其性。朕夙兴夜寐，心庶几焉，而未知所以为此之方。子大夫其各以所闻，为朕言之。朕即位于兹七年，行义政事之失，加于天下多矣。往者或不可救，来者尚可图也。以所见言之毋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圣明的帝王，求取贤才并听从他们的建议，选择优秀的人士并任用他们。法度存在着不足以再推行的地方，加以变革也就行了。人才存在着还不十分明智的情况，加以培养造就也就行了。靠他们去担任各种官职，朝廷就安定；靠他们去管理财政，国家就富裕；靠他们去禁阻犯罪，人们就听从；靠他们去讨伐叛逆者，各处就归服；靠他们去沟通鬼神，鬼神就享用祭祀的物品；靠他们去让少数部族称臣，少数部族就顺从；靠他们去掌管皇天方面的事务，日月星辰就按各自的轨道正常运行或在既定的天体位置上保持不动；靠他们去掌管大地方面的事务，鸟兽草木就按各自的习性发育生长。皇帝我夙兴夜寐，内心对此十分向往，但却不清楚像这样去做的有效办法。你们这些士大夫各自根据本人所闻知的东西，为皇帝我讲论一番。皇帝我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在按道义办事和政务上出现的闪失，可给天下带来不少了。已经过去的事情毕竟无法挽救了，但将来的事情还是可以谋划的。要把你们的看法讲出来，不要有什么隐瞒。

32.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丙辰科

[三月六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欲士之知德也,故造之以经术;欲吏之知政也,故迪之以刑名。欲民食足也,故本业而振贷之,为之除其徭赋而修地之利;欲兵之强也,故选将练卒,什伍丁壮,而教之旗鼓坐作进退之法。士亦知所学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辄流亡莩踣,而蛮夷之骄悖未艾也。意朕设施之方,有未善欤?不然,其故安在?朕闻先王之为民也,有礼以道之中,有乐以道之和,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本数末度,宜有可考而复用者,其详为朕言之,无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想让读书人懂得道德修养,所以就用儒家经典的大义来培养造就他们。想让官吏熟悉政务,所以就用刑法律令来启迪他们。想让民众食用充足,所以就鼓励他们务农并加以救济和扶助,为他们减免徭役和赋税,以便更多地获取到土地所提供的利益。想让军队强大起来,所以就选任将帅,挑选士兵,把壮劳力都按保甲制度组织起来,教给他们随同旗鼓站起坐下和前进后退的作战方法。读书人也知道该学习的东西了,可是忠诚信实、能够任用的人还挺少。官吏也清楚该持守的东西了,可是轻视政令、违犯法律的人还挺多。有一个地区发生了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四处逃亡,饿死在路上,少数部族的骄横背逆也没有止息下去啊!对此考虑起来,恐怕是皇帝我采取推行的治国措施还有不妥当的吧?否则的话,原因到底在哪里呢?皇帝我听说,古代的圣帝明王替百姓来着想,定有礼仪,把他们引导到不偏不倚的境地;设有乐舞,把他们引导到和睦的状态,致使天地保持固有的位置,万物都茂盛地生长。这方面的根本做法和细节处理,应当具有可以做些考察并重新施用的地方,你们详明地为皇帝我讲论一番,不要有什么隐瞒。

33.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己未科

[三月十一日；集英殿]

制策曰：上古人材之盛，莫如唐虞之际。以为司空，则水土平；以为稷，则百谷殖。以敷五典则从，以明五刑则服，至于器用利，动植和，礼乐成，出纳允，与夫内岳外牧相为倡应，以成天功者，凡以材也，兹非其盛欤！其次莫若周，然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则夏商之间与夫文武之后，材之不足，为可知也。夫天下之事常有余，而人材每不足。以不足之材，治有余之事，则彼圣贤之君作，而成功者孰与济也？抑其材虽不及唐虞成周之全，而得其杰然者，足以兴之欤？将其君自为之，而无待乎材之富也？不然，其所就安得与之班乎？自嬴秦至于五代，或君擅天下，或霸据一方，其所兴所为及乎所成之功，于传故可见也。子大夫其各以所闻言之。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上古人才雄盛，没有能比得上唐尧虞舜那个阶段的。让谁去担任司空这一主管土地事务的职务，洪水就得到了治理。让谁去担任后稷这一主管农业的职务，各种谷物就获得大丰收。让谁去推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准则的教化，人们就听从。让谁去宣明刺面、割鼻等五种刑罚，人们就慑服。直至兵器与农具都充分发挥作用，动物与植物共同生长，礼仪和乐舞完备定立，传布朝廷命令和听取到下面的反映全都真确属实，以及在朝廷上总领四方的官员和分布在各地的长官互相密切配合，成就皇天责成人间代替完成的功业，这一切靠的都是人才啊！这还证明不了那时人才雄盛吗？人才雄盛稍差一些的，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比得上周朝，然而在十名贤才中，有一名是周武王的母亲太姒，这也就只剩下九个人罢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在夏朝与商朝之间以及到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后，人才就不充足了。天下的事务常常多得管不过来，可人才又每每不够用。凭借不够用的人才去料理那些管不过来的事务，圣明贤能的君主在世上涌现出来了，可成就功业，又该由谁去与他共同实现呢？或许是人才尽管比不上唐尧虞舜和成周时期那样地齐备，但得到了特别杰出的人物，就足以使那君主兴盛起来吧？或者是由那君主一个人去操持，不需要等待人才

众多呢?否则的话，君主成就的功业又怎么能够与唐尧虞舜和周朝并驾齐驱呢?从秦朝一直到五代，有时是仁君统领天下，有时是霸主占据一方，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所成就的功业，从史书中仍然可以看得到。你们这些士大夫各自根据本人所闻知的东西讲论一番。

34.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戊辰科

[三月十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肇膺骏命，涉道寡昧，惧无以奉承太母之慈训而彰先帝休德，夙夜以思，乐得天下之忠言嘉谋，庶以济兹。今子大夫群至在庭，朕甚嘉之。盖闻天下灾祥，以类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变，以应斯事，若合符节。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职，广罹冻饥，饿莩踣者众。夫常寒之罚，久阴之异，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为政于兹四年，于是蠲天下逋负，轻征而散利，苟可益下，无不为者，而民力犹未裕也。捐今币之赐，廓信义之度，以安边柔远，而戎心犹未革也。岂所谓至恩者未可谓本务欤?特施设之序，或失其当欤?官之流，至多门也，举天下之职，不足以居其人;财之费，至无艺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为之出。将革之乎?或疑于伤恩。将因之乎?惧无以善后。必有至数，未烛厥中。先王之时，上之阴阳和，风雨节;下之稼穑茂，衣食充。官简而士贵，财通而礼行，四夷款附，边場按堵，又何修而至斯欤?夫切而不迫，缓而不迂，朕非求于空言也，盖将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开始承受统领天下的重大命令，但接触治国大道却很少又很不明了，害怕没办法承奉皇太后的仁慈教诲和弘扬先帝的美好德业,从早到晚都在深思,高兴获取到天下的忠正言论和美好的谋略，希望渡过当前的艰难阶段。如今你们这些士大夫一齐来到京师,聚集在殿廷上,皇帝我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听说皇天的奇异灾象，依据人间的同类表现才降示。古代擅长讲论天象的人，能够推求这种灾变，来与此类人事做对照，绝对地准确无误。自从去年冬天下大雪,直到今年二月仍不停止,人们绝大多数失

去了本业，大范围地遭受到饥寒的折磨，饿死在路上的人相当多。这类持续寒冷的惩罚，长久阴天的谴告，一定是有缘由才招来的，这其中的缘由到底在哪里呢？皇帝我执政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在此期间内，免除天下拖欠未交的赋税，减轻法定赋税的征收，把财利散布在百姓那里，如果事情对下面有好处，没有不去施行的，可百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仍旧还不充裕。全数对契丹人赐给每年需要的钱币绢帛，扩展讲求信义的度量，用来安定边疆，招抚远方，可少数部族的心念仍旧还没有彻底改变。这难道正属于人们所讲的：光靠施布最大的恩惠是不能够视为根本的解决办法的吗？或者只属于在筹划与施行的次序上存在着不恰当的地方呢？官员的种类，简直是太多了，把天下的所有职位全都拿出来，还不够用来安排那些该安排的人。财物的耗费，简直是个无底洞了，把天下的所有收入都计算进来，还不够用来满足那些支出。打算予以变革吧？可有人却在这样做会损伤朝廷对臣子的恩惠上提出疑问来。准备还照原样走吧？可又害怕没办法处理好以后的事情。但实际上一定有那最准确的定律，只是还没察看出其中那恰到好处的地方。在先帝时期，往上达到了阴阳和谐，风雨按时节到来；往下达到了农业兴盛，衣食充足。官员人数少，读书人地位高，财政活起来，礼乐被行用，四周少数部族都前来归附，边境地区一片安宁，这又是采取了什么措施而达到这种境地的呢？紧切但不匆促，舒缓但不迂阔，皇帝我并不是求取那空泛的言论啊，而是准备有所考索并加以实行，你们要竭尽心思来大力阐明它。

35.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

〔三月十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统，思所以仰奉太母之慈训，无忝祖宗之盛烈，若涉渊冰，罔知攸济，是用详延天下之士，咸造于庭，冀有所闻，以辅不逮，故虚怀而问焉，其悉心以对。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平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朕属当六圣之次席，造邦百年之休，寅畏以事上帝，哀

矜以临兆民,而岁报重辟,至以千数;或既贷之,又相随以就死也。乃至寒燠僭差,水旱为沴,况敢望美祥之沓至哉!彼何修而臻兹,今何由而反是?朕甚恧焉。夫舍乐成之业而事纷纷者,朕所不取也。端拱无为,游于岩庙者,朕所欣慕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朕之所恭闻也。然而贤鄙之未明,徭赋之未平,法令之屡更,戎羌之不诫,蛮徼之未清,颇欲革而正之,安得无扰而定也?农,先王之首务也,何道可以尽其力?礼,治世之盛典也,何时可以制其宜?何以使人不趋利而矜节,何以劝世不惮劳而奏功?古之典刑,必有切于今者,其用孰先?今之施设,固有戾于古者,其失孰大?抑又闻,患生于宴安而事藏所忽。地大物夥,孽芽其间。以天下之广,黎元之众,无乃有未萌而当豫防者乎?其消之弭之之术,又如何也?子大夫其具条之,勿猥勿并,务求其当;不激不谄,以适厥中。惟存之久者事详,得之深则理畅。其勉之哉,朕将亲览。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凭借微不足道的身躯,继承一脉相传的帝位,思索遵奉皇太后的仁慈教诲而不辱没我朝祖宗盛大基业的办法,就好像在深水与薄冰上通过,可却不清楚渡过去的窍门,因此尽数延揽天下的读书人,全部来到了殿廷上,希望能听到一些好建议,以便对皇帝我还没想到的地方有所帮助,因而虚心进行询问,你们要用尽心思来对答。曾经听说汉朝建立四十多年以来,孝文帝专门行用仁德教化,于是能够移风易俗,兴起礼法道义,每年仅仅审断案件几百桩,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地步。东汉章帝继承光武帝建武年间和明帝永平年间的国政,事情都按宽厚的原则来处理,世人仰赖他给天下带来的福庆。郡国所献呈的与神图天书完全符合的祥瑞吉兆多达成百上千处,这是何等地盛明啊!皇帝我正处在我朝六位圣帝的后面和建国一百年的吉庆时刻,保持恭敬戒惧的态度去事奉天帝,怀着哀怜悯惜的心情去统领亿万百姓,可每年上报的处以死刑的罪犯,达到了用一千来计算。有的已经对他从轻发落了,可又紧接着还犯死罪。直至天气持续寒冷或长久闷热,水灾旱灾构成阴阳失调的恶气,这还敢指望美好吉祥的兆象接连降现吗?到

底是干了哪些事情才陷入这种状况的呢？如今又该通过什么途径把它扭转过来呢？皇帝我对此感到万分惭愧啊！舍弃那百姓跟在我后面只管享受那成功的欢乐的大业，却去人为地制造出许多事端，这种治国策略不是皇帝我所要采用的。清静无为，只是每日在朝廷上闲游无事，这种治国方针才是皇帝我所仰慕的。皇天什么时候发过话呢？可春夏秋冬却交替到来，各种生物都自然生长。这是皇帝我恭敬地闻听到的孔老夫子说过的话。然而现今贤士和庸才还没区分得特鲜明，赋税徭役还不正常，法令屡屡改变，北方少数部族还不老实，南方边远地带还不安宁。对此很想予以变革，加以纠正，但怎样做既不显得搅扰而又得到解决了呢？农业生产，这是古代圣帝明王首先要做好的大事，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使百姓把力量都用在这上面呢？礼制，这是大治时代的盛大典章，到底在什么时机才能制定出恰切可行的规范呢？通过什么就会让人不朝私利奔去而重视节操呢？通过什么就会激励世人不畏惧劳苦而取得功效呢？古代的刑法，一定存在着仍然适合当今情况的内容，哪些应该首先予以采用呢？如今的治理措施，肯定存在着与古代相违背的地方，要数哪一项最为严重呢？不过又听说，祸患往往在太平的局面下产生出来，事变常常隐伏在不注意的地方。地大物博，难免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萌生出来。凭借天下的广大，黎民百姓的众多，恐怕也有尚未萌生但应加以预防的事情吧？把它消除掉、止息住的对策，又该怎样办呢？你们这些士大夫逐条来详尽地讲一讲，不要猥杂混乱，不要囫囵吞枣，务必力求妥当。不要偏激，不要献媚，正符合那恰如其份的要求。只有在心中积蓄了很长的时间，对事情才会了解得特透彻；体会到的东西很深切，道理就讲得特明畅。你们要努力做阐述，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6.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甲戌科

[三月十四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孳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徕于广殿，策以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

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于政而效见于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刓缺，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子大夫其悉意陈之，毋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想来，神宗皇帝秉受如神之明的德性，拥有虞舜和大禹那样的学识，在手扶小桌处理朝政的十九年以内，凡是礼仪乐舞和各种法令能够用来给天下带来好处的东西，十分完备。皇帝我考虑继承先帝的遗志，勤恳不懈，兢兢业业，从早到晚一刻也不敢忘记。如今广泛地延揽英雄豪杰，召请到大殿上，用当前的切要事务来进行策问，希望获取到最宝贵的言论，以便有所作为啊！是非得失的印迹，推行到朝政上，效验也就在当时显现出来。皇帝我登上帝位，差不多快十年了。恢复了词赋考试，可读书人还不知道进取；罢废了调节粮价的官吏，而农民还没富裕起来。应该直接摊派徭役或应该收费再去雇人充当徭役的主张各说各有理，于是徭役的法规产生了弊病。该往东做疏浚或该往北做疏浚的意见相对立，于是黄河的灾害就出现了。赐给疆土来安抚远方，可少数部族的侵扰还没有止息。放宽财利的限制来方便民众，可商人开展贸易的道路还不通畅。至于官吏数额杂滥众多，军事防备破损残缺，饥荒接连来到，盗贼还在增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行得通就继续照着做，行不通就要加以变革，只有恰到好处才最可贵。即使是圣人，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做法。你们这些士大夫用尽心思来做陈述，不要有什么隐瞒。

37.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丁丑科

[闰四月二十四日；集英殿]

制策曰：古之明王，以道揆事，以贤任官，人得以尽其才，法足以行其意，小大之分得，远迩之俗同。因之以辅志，而上无疑谋；劳

之以劝相，而下无拂心。以修在地之政，则省山而木兑，犹河而水翕。以协在天之纪，则日星顺其行，岁月得其序。至于礼备乐成，而告其成功。呜呼！何施而可以臻此欤？朕获奉宗庙，惧不敏明，无以章先帝之休德，故自亲政以来，嘉与卿士大夫修明厥绪，申喻朕志，累年于兹，而推原本旨，或未尽察，人自为义，泽不下究，此其故何欤？《书》不云乎！“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方今之务，所当损益应时而造者，必有其序。为之于未有，谋之于未兆，必有其几。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盖自唐虞至于周，更六七圣人，而后其法大备。今其书具在，可考而言也。然则孰戾而不合，孰可推而行之，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的圣帝明王凭借大道来考虑政事，依据贤能来任命官职，人们得以施展出各自的全部才能，法度足以使那最初定立的意图得到贯彻，上级和下属的既定区分各得其所，远方和近处的社会风尚完全一样。顺随它来辅正自己的心志，上面的人就不存在那类担心会碰壁的谋划。辛劳地去执行，用来劝勉辅助，下面的人就不存在逆反的心理。靠这来修明地上的政事，就会唤醒山峦，草木欢悦，大河顺流，诸水会合。靠这来与皇天的纲纪保持一致，就会太阳和星辰按照各自的轨道正常运行，一年四季交替到来。直至礼仪完备，乐舞形成，向皇天报告那成就的巨大功业。哎呀呀！采取什么治理措施就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呢？皇帝我得以奉守宗庙，但很害怕自己不聪敏又不贤明，没办法弘扬先帝的美好德业，所以自从亲身执掌朝政以来，很高兴地同卿士大夫修明那一脉相传的事业，申明并晓喻皇帝我的志向所在，到现在已有好几年了，可推究那既定的宗旨，有的人还没完全闹清楚，自己按自己的一套理论去行事，使朝廷的恩泽不能够彻底地施布到下面去。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尚书》中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谨慎地按照天帝的命令行事，时时处处都要多加小心。”如今的政务，应当加以减损或增益、适应时势需要进行更新的地方，必定有那固定的次序。在事情还没出现以前就做出部署，在事态还没显露出苗

头时就进行谋划，必定有那微妙的东西。这是你们这些士大夫应当了解的。从唐尧虞舜沿续到周朝，中间历经了六、七位圣人，然后那治国的法度才完整地确立起来。至今那些书籍都明摆在那里，可以进行考察并讲论一番啊!既然如此，那么哪些方面同现状相违逆而不切合，哪些方面又可以推广行用，把它们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8.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癸未科

[三月八日；集英殿]

制策曰：昔者圣人之用天下也，任之以道，立之以政，乂之以人，故敷五典则逊，修九功则叙，迪百工则厘，绥四夷则服。朕甚慕焉，而未知所以为此之方。永惟先帝盛德大烈，施及后世，博矣。追而复之，罔敢坠失。盖以恩睦族，故为之品制禄秩，而辨疏(亲)之等；以经造士，故为之众建师儒，而兴庠序之教。平其市价，通其有无，以修理财之政；明其功赏，复其境土，以宣御戎之威。彰善瘅恶，以明君臣、父子、兄弟之义。凡此于朕志，谓庶乎其可矣。然而道德之难明，风俗之不一，何也?仪刑缉熙，欲其效见有加，而泽被生民，赖及万世，则必有道，以致于斯也。子大夫其悉意为朕言之，无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的圣人筹措天下，靠大道来做指导，靠政务来形成格局，靠人才来实现治理。所以推广有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准则的教化，人们就顺从。修明九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务，就井井有条。训导百官，就个个尽职尽责。安抚四方少数部族，就都归服。皇帝我对此万分仰慕，但却不清楚做到这样的具体方法。深长地想来，先帝盛明的仁德和伟大的功业，延及到后世真是太广远了。追比并恢复它，决不敢有所失落。通过施布恩惠来使宗族关系和睦，所以就为他们制定了品级和俸禄标准，辨别亲疏的等级划分。专用儒家经典来培养造就读书人，所以就为他们广泛地设置师长，兴行起各级学校的教育。稳定

住市场价格，使物品在各地流通起来，用来修明财政管理的政事。对将士立下军功必定予以封赏，收复那些领土，用来播扬那驾驭四方少数部族的威势。表彰良善的人，使凶恶的家伙深深感到畏惧，用来宣明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纲常。所有这一切，在皇帝我想来，可以说大致上做得也差不多了。然而道德仍然不被人们所了解掌握，社会风尚仍然不完全一致，这又为什么呢?给天下做出榜样来，在学问上达到大放光明的地步，想使那效验越来越扩展，恩泽延及到所有的老百姓，使千秋万代都依赖它，一定存在着有效的途径与方法，以便最终步入这种状态。你们这些士大夫用尽心思为皇帝我讲上一讲，不要有什么隐瞒。

39. 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丙戌科

[三月八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稽成周之隆，以善养人而士由里选，以武禁乱而兵本于农，以八法、八柄建邦诏王，以九职、九赋、九式丰财裕民，格于上则七政以齐，达于下则万物以遂。去古既远，人之不明久矣。惟我神考，追法先王，作新其材，造之以学校；联比其民，教之以兵法。治官府，驭群臣，任万民，敛财贿而均节之，与周匹休。中更诋诬，改革殆尽。肆朕缵承，永悼先烈，夙兴夜寐，举而措之天下，累年于兹。好恶明而民未丕变，国是定而士未退听，法度彰而政未大成者，独何欤?岂缉而熙之者未究，遵而扬之者未至欤?子大夫其考周验今，推原先志，明以告朕。若夫古圣人辅相裁成而和同天人之际，都俞畴咨而坐视天民之阜，何施而可以臻此?其著于篇，朕虚心以听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考察周代的隆盛局面，运用良善去教育人们，而优秀的士子由所在的基层组织来推选。凭仗武力禁遏住动乱，而士兵扎根在农民中。依照官属、官职等八种管理百官的方法和爵禄赏罚等八种驾驭群臣的手段来组建邦国，告知天子，通过九种平民的职业、九种交纳的赋税和九种使用财物的规定

来扩大财富，使百姓充裕。扩展到天上，就使日月五星协调运行；遍及到地上，就使万物各得其所。距离古代已经太遥远了，人们对此根本就不了解，简直是时间太长了。只有我们的神宗皇帝，追比并效法古代的圣帝明王，培养提高那人才，就通过学校来造就他们。把众百姓按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就用作战方法来训练他们。整顿各级官府，驾驭群臣，使用万民，把财物聚集起来再均衡地进行分配，简直可以和周代相媲美。中间遭到了诋毁诬蔑，几乎全给废除掉了。皇帝我继承帝位，长久地为先帝的功业感到痛惜，从早到晚忙碌不停，把神宗皇帝的做法全部再在天下施行，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朝廷喜好和痛恶的对象已经很明确，但老百姓还没发生巨大的变化。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下来，可士大夫退朝以后还没有在下面都听从。法度已经明摆在那里，可政事还没大功告成，这又偏偏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使人们内心大明的东西尚未搞彻底，应当遵循并加以弘扬的事项还没做到家吗?你们这些士大夫要考察周朝的情况，验证当今的实际，推究先帝的志向，明晰地来告知皇帝我。至于古代的圣人辅助天地，剪裁成就万物而使皇天同人间的关系融为一体，任用贤才，听取建议而坐在那里只见众百姓繁衍生息，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也都写在答卷上，皇帝我虚心来听取。

40.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己丑科

[三月六日；集英殿]

制策曰：昔者先王治定而制礼，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化。礼之数五，施之七教，形之八政，有典有职，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然后小大贵贱之分定。乐之数六，文之五声，播之八音，有序有政，和邦国，谐万民，悦远人，动物□，然后神祇人物以和。朕嗣承祖宗休烈，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而继神考之志。子大夫以谓如之何而可以臻此?礼废乐坏久矣，去古悠远，矫拂其俗，非常之元，黎民惧焉。或曰三王不相沿袭，今乐犹古之乐，无事于改，则先王事神治人，移风易俗，终不可几欤?今乐成

而人未化，礼议而制未颁，其考古验今，为朕详言之，毋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的圣帝明王在实现大治以后才制定礼仪，在大功告成以后才创制乐舞。礼仪共有吉、凶、宾、军、嘉五大类，施布到父子、兄弟等七种人伦纲常上，体现在农耕、货币等八种主要的政务上，既有明文规定，又有专职官员，用来确定好亲疏关系，断定出难以讲清楚的行为，区分出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辨明正确与错误的东西，然后上级和下属、尊贵与卑贱的名分才定立起来。乐舞共有黄帝到周武王的《云门》、《大武》等六种，用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来组配，用金、石、丝、竹等八种乐器来演奏，既有程序，又有机构，用来协和各个邦国，团结起众百姓，使远方的少数部族心悦诚服，引动生物繁殖发育，然后天神地神、人类万物才和谐一致。皇帝我继承祖宗的丰功伟绩，加以承续，加以弘扬，用来追比古代圣帝明王的事业，继承神宗皇帝的遗志。你们这些士大夫认为怎样做就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呢?礼仪废弃和乐舞破损已经时间很长了，距离古代太遥远，违逆并硬行改变那原有的习俗，并不属于不可更改的本原，黎民百姓对此感到很恐惧。有人说，夏商周三代天子并不沿用前朝的礼仪乐舞，如今的乐舞和古代的乐舞一个样，没必要去进行变动。这样说来，古代的圣帝明王事奉神灵，治理世人，移风易俗，永远也没希望赶上他们吗?如今乐舞已经创制出来了，可人们还没得到化导；礼仪进行了讨论，可具体规定还没颁布。你们要考察古代的情况，验证现今的实际，为皇帝我详尽地讲论一番，不要有什么隐瞒。

41.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壬辰科

[三月十二日；集英殿]

制策曰：昔者明王以道御世，而已德化之。教以三物，纠以八刑，其民恭而不苟，逊而不争，亲而不怨，和而不乖，故道德一而民志定，分守明而礼俗成，是非取舍，皆当于义，而无有私智犯上。余风遗烈，虽衰世之公子，干城之武夫，伐柯之妇人，汉上之

游女，莫不好德，无思犯礼，勉其夫以正。朕嘉与万(民)共由斯道，夙夜以思，未知所以为之之方。朕若稽古，以善天下，去古绵邈，世流于末习，卑逾尊，下僭上，贵贱失分，强弱相陵，小大先后无复防范。忘义昧利，交相为瘠，习以成俗，士无操术，偷薄浮伪，朋邪罔上，无有忌惮，朕甚不取。夫易其俗，革其弊，以趋先王之盛，何修而可以跻及乎?传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汉之文帝，躬行节俭，身衣弋绨，而庶人屋被文绣，岂其习俗之久，有不能化欤?岂其施为舛戾，不足帅欤?子大夫其考古验今，为朕详言之。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的圣帝明王用大道来驾驭天下，用仁德来化导百姓。拿六德、六行、六艺这三条纲领来施行教化，拿对不孝、不睦等八种行为的惩罚条例来予以纠察，民众都恭谨而不随随便便，谦让而不争斗，亲近而不仇怨，和睦而不背逆，因此道德一致而百姓的思想就稳定下来了，各自的本分和职守区别得很清楚而礼仪习俗就形成了。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取用什么和舍弃什么，全都按符合道义来决定，没有要弄小聪明来凌犯上面的。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影响力，即使是处于衰败时期的贵族子弟，捍卫国家的武士，砍伐桑树枝条的妇女，在汉水岸边游玩的女子，没有谁不喜好道德的，根本想不到去违反礼制的规定，都用忠诚正直来勉励自己的丈夫。皇帝我很高兴同百姓们共同按照这一原则去做，从早到晚进行思索，但还不清楚怎样去做的办法。皇帝我考察古代的情况，用来使天下变得都很良善，但距离古代已经太遥远了，世上陷入了衰败时期的恶习，卑贱的人超越尊贵的人，下级凌驾上级，贵贱失去了既定的名分，强弱相互凌犯，大小先后不再有什么防范的规则。忘掉了道义，只知道私利，交相给对方造成灾难，习以为常，形成了风气。读书人没有执守节操的办法，苟且浅薄，浮华虚伪，结党营私，欺骗上面，肆无忌惮。皇帝我对此非常反对。改变这种习气，革除那些弊病，用来奔向古代圣帝明王的那种大治局面，究竟应该修明什么才可以赶得上呢?《论语》上讲：

你用正派做出表率来，还有谁敢不正派呢?就像西汉的孝文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身上穿黑色粗糙的帛制衣服，可普遍平民却在家中穿红戴绿，这难道是习俗延续太长了，就有根本无法化导的吗?难道是他的所作所为不对头，不足以充当表率吗?你们这些士大夫考察古代的情况，验证当今的实际，详明地为皇帝我讲论一番。

42.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乙未科

[三月九日;集英殿]

制策曰:古之圣人,以道莅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之不穷而物自化。朕昧是道,君临万方,夙兴夜寐,欲推而行之,神而明之,然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堕,相生相成,相形相倾。莫之能一,此道之所以难行;奸轨乱常,所以难化。如之何而解其纷,合其异乎?昔之言道者曰:天法道;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非阴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为,而曰生之长之,成之养之。道无名,而曰可名以大,可名以小。道一而已,其言之不同,何也?尧舜三代以是而帝,以是而王。由汉以来,时君世主莫或知此。朕方近述于千载之后,齐万殊之见,明同异之论,以解蔽蒙之习,未知其方。子大夫无流于浮伪,为朕详言之。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代的圣人凭借大道统治天下,坚持那不做人为干涉的事体，施行那不发号施令的教化，运用起来奥妙无穷，万物自动就化生。皇帝我对这种大道闹不清楚，辖领各个地区，从早到晚忙碌不停，一直想推行它，神妙地宣明它，然而人间万物有的是勇往直前,有的是跟随在后;有的是吸入,有的是呼出;有的是强壮,有的是瘦弱;有的是乘坐,有的是坠落。彼此生发又相互促成,彼此映衬又相互压倒。做不到完全一致,这是大道很难推行开的原因;内外奸恶的人搅乱常规，这是很难用大道化导好的缘由。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排解开那纷繁杂乱的情态,统一那歧异的东西呢?从前讲论大道的人说:皇天也取法大道;可又说:大道的最高本原来自皇天。大道本来并不是阴阳这两种事物，可又说一阴一阳就叫做大道。大

道本来不去进行人为的干涉，可又说使万物生长，叫它们成熟并养护它们。大道本来就叫不出名称来，可又说能用最大的一个什么词来称呼它，也能用最小的一个什么词称呼它。大道也就是那一个罢了，可人们讲论它却这样地歧异，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凭借这大道称帝天下或称王天下，但从汉朝以来，在位的君主没有谁真正了解这一点。皇帝我如今正在历朝历代的后面加以承接，统一那各种各样的看法，彰明相同或不同的论断，用来化解开蒙昧昏暗的积习，但却不清楚具体的途径与方法。你们这些士大夫不要陷入浮华虚伪当中，特为皇帝我详明地讲论它。

43.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戊戌科

[三月十六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惟昔之圣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以前民用。故黄帝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原阴阳之化，类万物之情，穷性命之理，以迪后世。尧舜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箕子叙《洪范》，协水火木金土，推而见之于貌言视听思之五事。左丘明有取于六气之说，则曰阴阳风雨晦明而已。前圣后圣，其揆一也；而其言其用之不同，何也？今岁戊戌，赫曦之纪，太阳主之，太过之年。过与不及，相为终始，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然五者相生相克，相沿相继，高下之相召，升降之相因，其变不穷。如之何可以财成其道，辅相其宜，使之适平，无有余不足之患，而和同无间乎？朕将仰观俯察，运于一堂之上，兼明天下后世，子大夫其详著于篇，毋略。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想来，古代的圣人主宰天地，掌握阴阳，用来替百姓的日常需要提前做好指导。因而黄帝首先端正皇天的纲纪，站在高处观望八方的边际，考察并设置掌管木、火、土、金、水的官员，究明阴阳的变化，概括出万物的情态，穷尽本性和命运的道理，用来启迪后世。唐尧虞舜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好历法，察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变化规律，统一处理好春夏秋冬和天地人这七项政事。箕子向周武王依次陈述《洪

范》，强调水、火、木、金、土的正常运转，进一步做推导，就表现在态度、言语、观察、闻听、思考这五个方面上。左丘明写《左传》，对六气的说法予以采用，就说六气是指阴阳、风雨、晦明罢了。降现在前面的圣人和诞生在后面的圣人，他们要说明的道理是同一个，可具体的说法和具体的施用却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今年是戊戌年，属于火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份，由最为旺盛的阳气来主宰它，属于太旺盛的年份。超过限度和达不到标准，这两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对超过限度的情况，要进行抑制；对达不到标准的情况，要加以振作。然而五行既彼此化生，又相互克制，既递次沿续，又递次承接，高下互相召引，升降递相持续，其中的变化永无止境。究竟怎么办才能够剪裁成就那天地的大道，辅佐协助那万物各得其所的天然状态，使它们恰到好处，不存在多余和不足的害处，和谐得没有一丝空隙呢？皇帝我准备仰观皇天，俯察大地，把它们运作在一座殿堂之上，同时使天下后世对此都很明了。你们这些士大夫要把自己的看法详明地写在答卷上，不要太简略。

44.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辛丑科

[三月十二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稽法前王，遹求先志，顾德弗类，永惟神器之大，不可为，不可执，故以道莅之，夙兴夜寐，惟道之从。祖无为之益，以驰骋乎天下，万世无弊者也。然为道在于日损，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则是无弊之道，损益随之。子大夫以为如之何而无损无益乎？朕粤自初载，念承百王之绪，作于百世之下，继志述事，罔敢怠忽。立政造法，细大不遗，庶几克笃前人之烈。推而行之，间非其人，挟奸罔上，营私背公。故庠序之教虽广，而士风凋丧；理财之术益多，而国用匮乏。务农重谷而饥馑荐臻，禁奸戢暴而盗贼多有。比诏有司，稍抑浮伪，事有弗利于时、弗便于民者，一切更张之，悉遵熙丰之旧矣。盖可则因，否则革，权时之宜也。揆之于道，固无损益，然当务之为急，则因革损益，其在今日乎？子大夫详延于廷，为朕言之，毋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考察并效法古代的圣帝明王,遵循并探求神宗皇帝的遗志,但自己的德性却比不上他们,深长地想来,重大的皇权很难运用,很难不偏不倚地执定,所以就用大道去统率它,从早到晚忙碌不停,只管以大道为转移。奉守无为而治所固有的益处,用来到处料理天下的事务,这是永远也不会出现弊病的做法啊!然而施用大道,在于每天都要减损。对事物有的减损了,还要再增益,增益了还要再减损,减损了再减损,一直到无为的境地。这表明,不存在任何弊病的大道,是伴随着减损和增益的。你们这些士大夫认为怎样做就既不用减损也不用增益呢?皇帝我从登上帝位的那天起,就考虑承接历代帝王的余绪,在各个朝代的后面重新崛起,继承先帝的遗志,接续前代的事业,决不敢松懈怠慢。定立起国政,制定出法度,大小各个方面都没有遗漏的,希望能够扩展前人的丰功伟绩。可在推行过程中却隔段时间就出现不合适的人选,他们心怀奸诈,欺骗君主,谋求私利,背叛公家。因而各级学校的教育尽管范围很广,可读书人的风气却衰颓沦丧。管理财政的办法越来越多,可国家的用度却很匮乏。重视并鼓励农业生产,可饥荒却接连来到。禁遏奸邪和平定凶暴,可盗贼却仍多处存在。接连命令主管部门,稍略抑制一下浮华虚伪的习气,对那些不利于时世和民众感到不便利的事情,全部加以改变,一律照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的原样去做了。这是因为行得通就继续照着做,行不通就加以变革,需要考虑切合时势要求的对策啊!验核那大道,原本就没有该减损或增益的东西,然而目前应致力的事情却是占首位的,这样一来,加以沿袭或变革,进行减损或增益,恐怕就在今日了吧?你们这些士大夫被全部延揽到殿廷上,特为皇帝我讲论一番,不要有什么隐瞒。

45. 宋徽宗重和六年(1124)甲辰科

[闰三月二十三日;集英殿]

制策曰:在昔圣人以道御气,以气御化,以化御物,而弥纶天地,经纬阴阳,曲成万物,因其盛衰奇偶、多寡盈亏之数,左右之纪、上下

之位而范围裁成之,道著焉。后世弊于末俗,浅闻单见,不足与明。朕承天休,宪法上古,思所以和同无间,以惠元元;然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数之不可齐也,久矣。夫天数五,地数五,而有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又曰一而成天,二而成地,三而成人。此天地之数错综之不同,何也?《易》曰:当期之日,凡三百有六十。《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内经》曰: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岁纪之数可坐而致,乃不一,何也?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传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数之不可胜穷、不可齐、不可一也如此,将何以原始要终,合其同异,一其旨归,通其变,极其数,以尽天下之道?朕将有所施设焉,子大夫详言之,毋忽。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在古代,圣人凭借大道去驾驭元气,利用元气去主宰化育,通过化育去支配万物,而统摄天地,措置阴阳,多方成就万物,依据那兴盛与衰落、单与双、多与少、盈余和亏缺的定数以及左右的纲纪、上下的方位去加以笼罩、剪裁而成就它们,大道也由此显出来。后世在衰败时期的风气中滋生弊端,听到的东西很肤浅,认识到的东西很单纯,没资格置身在明智的行列里。皇帝我承受皇天赐给的吉福,效法上古时代,思索那和谐得没有一丝空隙的治国方法,以便给黎民百姓带来好处。然而事物产生以后才有那相应的拟象,拟象形成以后才有那演算的数目,数目做不到整齐划一,这是由来已久的了。天数是一、三、五、七、九这五个单数,地数是二、四、六、八、十这五个双数,可也有人说,天按六六三十六构成代表太平的全年的降雨次数,地按九九八十一汇合成整体上的州数。还有人说,由代表阳气的那个"一"形成了天,由代表阴气的那个"二"形成了地,由代表阴阳交合之后出现的那个"三"形成了人。这是关于天地的演算数目的错综复杂的歧异情况,具体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易经》上说:满一年的天数,总共有三百六十天。《尚书》里说:把三百六十六天作为一周年。《黄帝内经》中说:七百二十气构成一年。全年的天数实际上坐在那里就可以数出来,但说法竟不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大道化生出元气来,元气化生出阴阳二气来,阴阳二气化生出交合而

成的和气来,和气化生出万物来。可解释经典的书籍又说: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符合万物的实际种类数目。演算的数目没办法穷尽,也没办法整齐划一竟像这个样子,那该凭仗什么去究明来龙去脉,融合起异同之处,归纳成一个主旨,阐通那变化,把数目推导到顶点,用来极尽那天下之道呢?皇帝我打算有所筹划部署,你们这些士大夫详尽地谈一谈以上的问题,不要太简略。

46.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壬戌科

[三月二十二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以凉薄之资,抚艰难之运,宵衣旰食,未知攸济。今朕祗承上帝,而宠绥之效未著;述追光烈,而绍开之勋未集。至德要道,圣治之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势未行。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不武。至若宗社迁寄,扈卫单寡,士狃见闻而专用私智,民习偷惰而莫之返本,子大夫所宜共忧也。其何以助朕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凭借仁德浅薄的秉性,操持艰难的时运,从早到晚忙碌不停,可还不清楚渡过难关的办法。如今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天帝,但安抚各地的成效还没突出地显示出来。接续并追比祖宗的宏大帝业,但继承并加以扩展的功勋还没建立起来。最高的德行和切要的道法,这是圣明治理的根本,可盼望至极却仍未得到。把财利分散到百姓那里去,轻微地征收赋税,这是仁德朝政首先应做到的事情,可迫于形势却仍未施行。设置科目来选取人才,可有人却认为是走走形式。停止战争来使民众得到休整,可有人却认为是武力不强。至于宗庙社稷转移安置在别的地方,中央直辖部队人少力弱,读书人局限在本身所知道的那点儿东西内,专门要弄个人的小聪明,老百姓习惯于得过且过,懒惰懈怠,不回到农业生产上来。这都是你们这些士大夫所应共同忧虑的问题啊!你们想用什么来辅助皇帝我拯救那眼看就要坠落下去的国运,重振使国家由衰落再度走向兴盛的大业,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7. 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乙丑科

[三月二十四日;集英殿]

制策曰:盖闻古先哲王,博采贤能而任使之,故治功昭著,名声流闻,邈乎不可以跂及,朕甚慕焉。今朕托士民之上,不敏不明,郁于大道,所赖以济者,惟真贤实能是望。然扶世导民,须德行也,乃或同于乡原;排难解纷,须智略也,乃或专于谋身。为政苟趣辨,则不修廉隅;摛文徒华藻,则不本忠信。平居下轻上爵,肆贪得之心;临事避剧就易,蔑首公之节。岂古之所谓德行智略、政事文章、心术节概,与今举异欤?将教化不明,狃于末习而然欤?子大夫学优而仕,于斯数者,其自处固已审,使风俗旷然大变必有术。悉之复之,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全都广泛地访求贤才能人,委任使用他们,因而治理的业绩十分显著,名声流传到后代,后代远远地赶不上。皇帝我对此十分仰慕。如今皇帝我身在读书人和众百姓的上面,既不聪敏也不明智,对治国大道了解得非常少,所依靠渡过难关的,只是全指望那些真正贤明和确有才干的人了。然而扶持世道,化导民众,需要有德行,可有的人竟和老好人一个样。排除祸难,化解纷争,需要有智谋,可有的人竟专为个人做打算。从事政务,暂且在议论一番上费点力气,可却不修明正直的品性。撰写文章,光是使用一些华丽的词藻,可却不把忠正信实作为出发点。平时自行把那获得的高官显爵让它掉价,放纵那贪得无厌的心念。遇到朝廷有事时,又躲开那难办费力的,专拣那好办省劲儿的,根本就不顾应把为公出力放在首位的节操。这难道是古人所讲的德行智谋、政事文章、心术节操,竟和今天完全不同了吗?还是教化不明,习惯于衰败时期的风气才造成这样的呢?你们这些士大夫学习得很充分了,就出来做官。对于以上几种表现,自己在对待它们时固然已经是很谨慎的了,同时致使社会风尚全面得到改变,也一定很有办法。要反复地细加思考,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8. 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

[四月三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盖既取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垂统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达通国体，咸造于廷，愿闻今日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骤，可以接东汉之轨迹。夫既抑臧宫之锐，谢西域之质，则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条贯，要兼创业守文之懿，视夏康周宣犹有光焉，固子大夫之则旧积也。其著于篇，朕将亲览。（按，策题原载《宋会要辑稿·选举八》。文中"达通国体"，"臧宫之锐"，"则旧积也"，《绍兴题名录》"达通"作"通达"，"臧宫"作"咸宫"，"则"作"所"字。）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观察自古以来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上兴盛的君主，没有谁能像东汉光武帝那样雄盛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王莽新朝那里夺回了政权，一方面又创立了东汉一代宏大的施治格局，雄伟地同西汉高祖前后连结，延续国运全都达到了二百年。皇帝我对此十分仰慕。如今你们这些士大夫通晓国家的事体，全部来到了殿廷上，希望能听到当今的治国大道应当加强或弥补些什么，就能挽回像晋朝和唐朝衰败时期的那种局面；还应当大力施行些什么，就能和东汉走过的道路并驾齐驱。东汉光武帝既已抑制了猛将臧宫等人请求讨伐匈奴的锐气，又拒绝了西域各国派子弟入朝做人质的要求，这就表明安抚远方的策略，施行起来必定具有主次轻重和先后顺序，但总之要把创建帝业和守护文治功绩的美德结合在一起，同夏朝复国的少康以及周宣王比起来，还要功业显赫。这类问题原本就是你们这些士大夫一向蕴积在心中的东西，把它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9.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

[闰四月十七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惟祖宗创守之宏规，举可掩迹三五，然而中遭厄

会，变起弗图，盖许国之臣无几，而自为谋者总总也。今朕乘中兴之运，任拨乱之责，所赖于有官君子，为至切矣。顾狃于闻见，小慧相先，谓了官事为痴，谓履忠信为拙，以括囊为深计，以首鼠为圆机，如此则国家何望焉。子大夫读先圣之书，通当世之务，其为究复何洒濯，可以华旧习；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虚伫，且以见子大夫入官之志，毋忽。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想来，我朝列祖列宗创立和守持的宏大治国规制，列举起来可以压盖住五帝三王，然而在中途遇到了劫厄交会的时候，事变从没想到的空当中突然发生，这是因为把一切都交给国家的臣僚没有几个，可光为自身做打算的人却多得很。如今皇帝我操持着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时运，担负着去除掉祸乱的责任，对身在官位的君子予以全盘依赖，也真是极为深切了。可大多数人却局限在自己所知道的那点儿东西上，互相比试谁会要弄小聪明。认为处理好公家事务纯粹属于呆子，认为践行忠正诚信纯粹属于笨蛋。把闭口不言看成是深长的保身办法，把首鼠两端看成是最圆滑的处事关键。照这样下去，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呢?你们这些士大夫研读古代圣贤的经书，通晓当今的事务，究竟应该再怎样去进行洒扫洗涤，可以使往日的习气焕然一新?怎样去进行陶铸冶炼，可以形成美好的教化?要把它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符合皇帝我虚心等待的愿望，同时也从中看出你们这些士大夫步入仕途的志向，不要太简略。

50.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

[三月八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承烈圣之休，偶中否之运，遗大投艰，罔知攸济，赖天悔祸，中外宁一。及间暇之时，延见儒生，博询当务，子大夫裒然咸造，其精思经术，详究史传，具陈师友之渊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无伪，心何治而克诚，不徒观子大夫之立志，抑国家收取士之实效，夫岂小补!其详著于篇，靡有所隐。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继承我朝各位圣帝的美好功业，可却赶上了由盛转衰的恶运，被赋予了重大而又艰难的使命，但却不清楚渡过难关的办法，仰赖皇天把降临的祸难收了回去，中外安宁，如同一家。于是趁偶尔闲暇的时候，就延请接见儒生，广泛询问应当大力去做的事情。你们这些士大夫聚集到一起，全部来到了殿廷上，要精审地思索儒家经典的大义，详明地探究史书上的记载，完整详细地陈述一番师友之间在学问上的传授与承接的关系，本人在志向上所追求仰慕的东西，行为该修明什么就不再存有虚伪的地方，心性该怎样整治就能保持真诚。这不单单要观察你们这些士大夫立下的志向，也是国家收取到选拔人才的实际效果，哪里仅仅属于微小的补益呢?把它们详明地写在答卷上,不要有什么隐瞒。

51. 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

[三月九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承祖宗之休德,临御丕图,于兹三纪,宵衣旰日,以求治功,志勤道远,未知攸济。今详延子大夫于廷,冀闻古昔之宜,以裁当世之务,其悉意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善为国者,仁以得民,义以制事,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无异道也。而《记》称商周尊而不亲、亲而不尊之异,议者乃有尚严者尊、尚恩者亲之说焉。史述齐鲁有举贤上功、尊尊亲亲之异,议者乃有齐政近商、周公治周乃所以治鲁之说焉。圣贤之为国若是,其不同欤?抑道初无二,而因时制宜有不可得而同者欤?施之当今,亦将有所取舍欤?汉七制,皆贤君也。太宗躬行恭俭,以德化民,宽足尚矣;而议者谓不若孝宣之严明。显宗法令分明,幽枉必达,严足尚矣;而议者(谓)不若章帝之长者。然则治道所尚,又将孰从而可欤?今世之当务多矣,吏道之未勤也,士风之未醇也,民力之未裕也。将宽以御之,则无以革偷惰之习;将严以督之,则惧其有苛察之失。伊欲风流而令行,实修而名立,比迹两汉而庶几三代,其何道以臻此?子大夫茂明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继承我朝列祖列宗的美好德业,统领天下,广大长远地做出谋划,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每日里早晚忙碌,谋求治理的功效,可用心勤勉,大道还离得很远,不清楚渡过难关的办法。如今把你们这些士大夫全部延揽到殿廷上,希望能听到古代的成功做法,以便处理好当今的事务。你们要用尽心思献上你们的想法,皇帝我仔细听取,进行询问。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依靠仁德去赢得百姓的拥戴,根据正义去处理事务,宽柔与威猛相互补充,国政由此而实现安和,并不存在着什么其他的举措啊!可《礼记》上却指出商朝与周朝一个看重等级关系而不讲求宗族关系,另一个看重宗族关系却不讲求等级关系的差异,议论国事的人于是就提出了崇尚严厉的帝王就注重等级关系、崇尚恩德的帝王就注重宗族关系的说法。史书上记载齐国和鲁国存在着一个任用贤才并看重功绩、另一个尊崇尊贵的人和亲近同族的人这种差异,议论国事的人于是又提出了齐国国政与商朝相接近、周公治理周朝便用那一套再去治理自己的封国鲁国的说法。圣贤治理国家呈现出以上的情况,这表明他们根本就不相同吗?或者是治国大道原本就没有两套,但因时制宜就出现了没办法全都相同的情况呢?把它们运用到今世,也有该取用或舍弃的地方吗?西汉的前七位君主,都是贤明的君主。太宗孝文帝亲自带头实行恭敬和节俭,用仁德来化导民众,就宽和这方面来说,足以让人推崇了,可议论国事的人却认为他比不上孝宣帝的严厉明断。东汉显宗明帝法令规定并执行得非常明晰,被隐瞒或受冤屈的事情必定会反映上来,就严厉这方面来说,足以让人推崇了,可议论国事的人却认为他比不上东汉章帝的和蔼宽厚。既然如此,那么治国大道所崇尚的东西,又该依从什么才好呢?如今该大力去料理的事务太多了,可官吏履行职责还不勤勉啊,读书人的风气还不纯正啊,老百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还不充裕啊!打算按宽和的方针去处置,但却没办法革除掉得过且过和懒惰懈怠的习气;打算按严厉的方针去督促,又担心会出现苛刻挑毛病的偏失。想做到纯正的风气四处传播,政令得到贯彻执行,实际的行为得到修明,美好的名声也确立起来,和西汉东

汉并驾齐驱，差不多赶上夏商周三代，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这种境地呢？你们这些士大夫大力阐明这一切，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2.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丙戌科

[三月九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宝，循尧之道，于兹五载。寤寐俊秀，始得亲策于庭。子大夫裒然待问，必有崇论远虑，副朕详延。盖闻唐虞之世，法度彰，礼乐著，不赏而民劝，画像而刑措，都俞赓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今朕夙兴昃食，兢兢业业，惧无以协帝华而绳祖武，若涉渊冰，未知攸济。间者设举荐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实材犹未出也；塞徼幸之门，申奔竞之禁，而公道犹未行也。广言路，恢治具，而纪纲未立；择守令，务宽恤，而民俗未裕。赃墨之刑非不严，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钱谷之问非不勤，而未能使国有积年之储。屯田以实塞下，或谓兵不如农；改币以赡邦用，或谓铁不如楮。岂为之不得其要欤？抑文胜而弊难革欤？何视古之弗及也？夫内修政事，宣王所以兴周；综核名实，中宗所以隆汉。考之方策，其施行之迹何如？子大夫通达古今，明于当世之务，凡可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者，悉陈无隐，朕将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凭借不聪敏的秉性，继承了帝位，遵循光尧太上皇帝的治国大道，到现在已经五年了。睡梦中都在思念优秀的人才，今天开始在殿廷上亲自主持策问。你们这些士大夫聚集到一起，等待朝廷询问，一定怀有高明的主张和长远的谋划，符合皇帝我广泛听取的愿望。听说在唐尧虞舜时期，法度彰明，礼仪乐舞盛行，不进行奖赏而众百姓就自行勉励自己，只处以象征性的惩罚而刑法就搁置起来不动用了。君臣彼此开导激励，不走下殿堂，天下就实现大治了。皇帝我对此十分仰慕。如今每天早早就起身，很晚才吃饭，兢兢业业，光是担心没办法像当年虞舜协助唐尧那样完成光尧太上皇帝赋予的重任，不偏离光尧太上皇帝的足迹，就像在深水和薄冰上通过，不清楚渡过去的办法。前些时候设立贤良方正的考试

科目,颁发征聘召请隐士的命令,可真正的人才却仍没有涌现出来。堵塞住侥幸当上官员的门路,申明投机钻营往上爬的禁令,可公道却仍没有贯彻执行开来。扩大议政献策的道路,张布开治理的措施,可朝廷纲纪却仍没有确立起来。择任太守县令,致力于宽和体恤,可民间的习俗却仍没有淳厚起来。对贪污受贿予以惩办的刑律并不是不严厉,可仍然没能使人人都践行君子的行为。对钱币谷物的过问并不是不勤勉,可仍然没能使国家拥有几年够用的储备。实行屯田,以便充实边境地区,可有人却认为单独军屯还不如寓兵于农。改革钱币制度,以便使国家用度充足,可有人却认为发行铁钱不如发行纸币。这一切难道都是加以施行却没抓住那关键所在吗?或者是追求做表面文章太厉害而弊端难以革除掉呢?为什么同古代比起来却赶不上呢?在内部修明政事,这是周宣王使周朝重新走向兴盛的原因;会综验核所任职位与应当取得的政绩,这是中宗孝宣帝使西汉再度强盛的原因。考察史书的记载,他们施行起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你们这些士大夫通晓古今,对当前的事务也很明了,凡是可以移风易俗和富国强兵的对策,都请详尽地陈奏上来,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3.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己丑科

[三月八日;集英殿]

制策曰:盖闻虞舜无为而天下治,周文王则日昃不遑暇食。汉文帝宽厚长者,务以德化民,而宣帝则严综核之政,以法绳下。此四君者,为道不同,同归于治。然而劳逸宽猛之宜,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薄,获承丕绪,循尧之道,兢业万机,罔敢逸豫,亦惟治古帝王是训是式,八年于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缺政尚多,虚文尚胜。敦朴以示化,而逾制者尚繁;钦恤以祥刑,而抵法者尚众。严入仕之涂,而铨曹犹未清;察长民之官,而循吏犹未著。至于士风之未厚,民俗之未淳,广储蓄而食未丰,蠲赋租而人未裕,有劝农之官而田不加辟,任观风之使而民或告冤,侧席幽人而贤才尚遗,伏轼勇士而猛将犹缺。屯田积谷,或以为兵不如农;择帅安边,或以为文不如武。救弊

之术，时措之宜，子大夫之谓讲闻也。其悉心以对，毋枉执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唐尧虞舜清静无为而天下就实现了大治，周文王忙于政务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汉文帝宽厚和蔼，务必用仁德化导民众，而汉宣帝却强化会综验核所任官职与取得相应政绩的朝政，用法度来约束臣下。这四位君主施行的治国之道并不相同，但最后却都实现了大治。既然如此，那么辛劳与安逸、宽柔与威猛各得其所，也是分别依从那时势的需要吗？皇帝我凭借浅薄的德性，得以继承我朝一脉相传的帝业，遵循光尧太上皇帝的治国大道，兢兢业业地处理纷繁的朝政，一点儿也不敢安逸享乐，治理也只管效法古代的圣帝明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然而仁德还存在着没做到的地方，信义还存在着让人不信服的地方，需要完善的政事还有很多，流于表面形式的作风还很严重。促进质朴来显示化导，可超越制度规定的人还很多；多加体恤来审慎地使用刑罚，可触犯法律的人依然不少。严格控制当上官员的途径，可吏部考察委任依然不清明；督察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员，可奉公守法的太守县令依然少得很。至于读书人的风气尚未纯正，民间的习俗尚未淳厚，扩大粮食储备而吃穿还不充足，免除赋税而人们还不宽裕，设有鼓励农耕的官员可田地却未增加开垦的数目，派出视察各地政绩的使者可百姓还有人喊冤。把席位空出来等待隐遁在民间的能人，可贤才还有被遗漏的；伏身在车前横木上等待勇士，可猛将仍然很缺少。屯田积储粮食，可有人却认为单独军屯还不如寓兵于农。选任将帅，安定边境地区，可有人却认为选派文臣还不如任命武将。补救弊病的方法，针对时势需要采取的合适对策，这都属于你们这些士大夫所说的讲论奏禀的东西。要用尽心思来对答，不要让主考官白忙碌一回，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4.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壬辰科

[三月十七日；集英殿]

制策曰：朕丕承大命，司牧兆人，寅畏严恭，惧德弗类，是以顺考帝王之宪，铺寻载籍之传，求其可师，以济于治。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显王。固本培基，则有务德之君；振旅治兵，则有雄材之鞏。习闻其号，亦观厥成，咸有所偏，未臻于极。若孝文之德，则罪不　，宫不女，惜露台之费，除租税之征，可谓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释斤斧之用，唯尚宽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厉之以武，不亦善乎？若孝武之功，则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百蛮向风，可谓盛矣。然而积尸暴骨，快心胡越，财略耗而不赡，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呜呼！文者，王帝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唐之太宗，实惟兼之。观其内平祸乱，外除戎狄，安堵黎元，各有生业，史氏所以称其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者也。瞻言清风，切所向慕。伊欲规其能事，跂其成绩，何修何饰而外户不闭，行旅不赍？何取何营而断狱几刑措，米斗直三钱欤？家给人足，厥道曷由？仁义功利，四者之宜，当安所施？子大夫习先圣之术，通当世之务，合志度义，其知之矣。其明以启告，朕悉意正论，毋枉执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继承帝位，统领亿万民众，对皇天虔敬戒惧，严肃恭谨，只恐怕仁德不像样，所以依次考察古代帝王的法度，全面探寻书册上的载述，求取那可以效法的地方，以便在治理上付诸实现。想那西汉前七位圣明的君主和商朝中宗、高宗、祖甲这三位显赫的天子，他们当中论起巩固根本和培植基础来，就有致力于仁德的君主；论起振扬国威和整治军队来，就有雄才大略的国王。对他们的名号已经听得很习惯了，同时也观察他们的成就，就都存在着偏失，并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像孝文帝的仁德教化，对罪犯不逮捕法办，对宫女不禁锢在深宫，痛惜修筑露台需要耗费的财物，免除赋税的征收，真可以称得上是仁惠了，然而对刑罚的施用不以为然，对武力的动用不屑一顾，只是崇尚宽厚，可那威势却没播扬出来。皇帝我认为像孝文帝那样的文治，能够再用武力来强化一番，不是显得更好吗？像孝武帝的功业，选任贤明的将帅，征讨不服从的地

区，匈奴远远地逃走，南方各个部族全都闻风归顺，真可以称得上是雄盛了，然而使尸体堆成山，白骨遮盖住荒野，对少数部族用兵感到心里非常痛快，天下的财富却几乎耗光了，根本不够用，战争由此而日益引发出来。皇帝我认为像孝武帝那样的武功，能够再把仁德作为根本，不是显得更好吗？哎呀呀！文治是称王天下或称帝天下的最锐利的工具，武力是文治德化的辅助物啊！文治所施加的东西越深切，武力所征服的范围就越广大。只有唐太宗才实际上拥有这两个方面。观看他在内部平定祸乱，在外部驱逐少数部族，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具有生存的本业，这是史官称述他功业仁德都隆盛，从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原由啊！这种富有远见的言论和清平的流风，正是皇帝我所深切向往和仰慕的。如今打算效仿他所施展开的本事，超过他所取得的成绩，究竟该修明什么和增饰什么才会家家外面的大门在夜里不用关上，出门不用携带任何物品呢？究竟该择取什么和筹划什么才会使案件审理几乎达到刑罚不动用的地步，一斗米才价格仅为三钱呢？家家充裕，人人富足，做到这样的途径该从哪里开始？仁德、正义、功效、利益，这四个方面的合适对策，应当怎样做部署？你们这些士大夫研习古代圣贤的治国办法，通晓当今的事务，心往一处想，揣摩那适宜的东西，已经胸有成竹了。要明晰地来禀告开导，皇帝我对纯正的意见正十分留意，不要让主考官白忙碌一回，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5. 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庚戌科

制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兴行，风俗醇美，邦本固而上下足，公道孚而赏罚明，熙熙乎泰和之治，朕甚慕之。盖由尧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条共贯，见于《典》、《谟》之盛。或者乃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何耶？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成，固未始敝精神于事为之烦。然舜孳孳汲汲，禹胼胝，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劳若是乎？舜乐取于人以为善，禹闻善言则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贤。用人之际，抑有异欤？朕自践祚以来，励精图治，监观前代，庶几有获。然稽古之志虽坚，而设施之效未著；求言之

心虽切，而谠直之风未闻。政事必亲，而或虑夫细务之繁；财用既均，而犹病夫浮费之众。吏员冗而莫革，民力穷而难裕，私情胜而议论弗平，虚文多而奸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于古而未能者，将何以致隆平之业，恢长久之策乎！子大夫抱艺待问，咸造在廷，其考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验者悉著于篇，朕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在古代称帝天下和称王天下的阶段中，教化兴起并盛行，社会风尚淳正美好，国家的根基十分牢固，上面和下面都很富足，公道深入人心，赏赐和惩罚非常鲜明，一片和乐的天下太平的大治景象。皇帝我对此万分仰慕。这大致上从唐尧虞舜到夏商周三代，是同一种治国大道在递相传授和承接，事理相通，脉络连贯。从《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皋陶谟》和《大禹谟》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来。然而有人竟然说：五帝在乐舞上不递相沿用，三王在礼制上不递相承袭。这是为什么呢？称帝天下和称王天下的人清静无为，天下就大功告成，原本就未曾在烦琐的人为筹措上耗费精神。然而像虞舜的勤勉不懈和忧虑不安，大禹的手脚磨出硬茧来，周文王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又为什么辛勤劳苦到这般地步呢？虞舜很高兴从别人那里听到意见，认为这非常好。大禹听到美好的言论就向他拜谢。都是这种态度，可有人竟然说：五帝神武圣明，他手下的大臣根本就赶不上；而三王无论大臣还是君主都很贤明，水平差不多。这样说来，五帝和三王在用人的时候，也存在着差异吗？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励精图治，考察并效法前代，希望有所收获。然而考察古代的心志虽然很坚定，可施行治理的功效却不显著。求取意见的愿望虽然很迫切，可忠诚正直的风气却没有听到。政事必定要亲自过问一下，可又担心这样做会陷入繁琐的小事中去。财政支出已经做好了安排，可仍对各种不必要的支出太多而感到头疼。官吏的员额大大超编，但仍未得到改变。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已经到了尽头，可却很难宽裕起来。私心占上风，而议论不公正，走形式的东西太多，而奸恶弊害更加严重。这都是皇帝我日夜加以思考，谋求与古代相同可却做不到的地方，这可怎么能实现隆盛太平的大

业，扩展那长远的谋划呢？你们这些士大夫身怀道艺，在等待朝廷询问，全部来到了殿廷上，要考察古代帝王的事体，斟酌古今合适的做法，凡是可以施行又可以取得效验的举措，全都写在答卷上，皇帝我要亲自观阅。

56.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辛未科

[五月四日；集英殿]

制策曰：厥初颢穹，实生兆民。孰总其群？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师。君治之，师教之，礼乐刑政之所由生，与其天下国家者，壹是以元元为命脉，凡议论所讲明，政事所设施，罔非为邦本计。夷考载籍，率与天并言之。明威视听，皆自我民。其不可轻者，固如此欤？三圣传心之要，不越执中数语，斯盖万世君师之大纲领，究其旨归，则曰非后何戴，非众罔守。然则一中妙用，固所以为维持固结之道欤？道之出有原，道之传有统，前圣后圣，同一揆欤？我国家诞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圣代光，绍明大宝，人斯无疆。我先帝迪畏天显，怀保小民，四十一年跻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绪，式克至于今日。盖其精神心术之妙，融会于《六经》之奥；《要语》一书，口传面命，其示轨范者在是。朕祗遹猷训，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贤才，以尚贤也。然召未能至，求未尽获，何以致信顺之助？训守牧，戒贪残，以布治也，然训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观？求牧与刍，当谨也。既不用姻戚，每选用贤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见田里之无愁叹。竭泽而渔，弗忍也。既力却贡举，且禁献羡余，宜有益下之说而尚闻郡邑之有征敛。义廪之发，恃以赈饥，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宽赋，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诸州之积负，损版曹之故额，俾纾急绝之扰，深寓省忧之实，而民未有慑志，势若中隔，泽不下流。历思之，汔不得其说，意奉宪者导之未明欤？岂吏罕廉平，则治道衰欤？将治生乎积，非可速成欤？抑习锢于玩，未易遽革欤？朕寅念先帝诒谋，常恐羞之，重为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经济之蕴，其据经以对，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最初的苍天，实际上化生出亿万民众。

由谁来统领他们这些人呢？于是就降生下君主。由谁来开导他们的迷乱想法呢？于是就降生下师长。君主来治理他们，师长来教化他们，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事就由此产生出来，那些由皇天授付给他天下国家的人，完全都是把黎民百姓作为命脉，凡属议论所要讲明的东西，政事所要安排部署的东西，没有不为国家的根基来做考虑的。考察那些典籍，一律都与皇天合并在一起做述说。皇天表彰谁或惩罚谁，观察什么和听取什么，都以民众的意愿为转移。对民众决不能轻视，原本上就是这个样吗？唐尧虞舜和大禹这三位圣人传授心治大法的要领，也不超过执守那最为恰切的尺度等四句话，这属于历代君主和师长的大纲领，探究那主旨所在，也就强调不是君主还去拥戴谁呢？离开了众人就守持不住。既然如此，那么对专一和适中的奇妙运用，原本就属于维系和团结起民众的办法吗？大道的出现具有那本原，大道的传授具有那统系，降现在前面的圣人和诞生在后面的圣人，都讲的是同一种道理吗？我们国家承受到天命，辖有九州四海，各位圣帝一代接一代弘扬前代的功业，继承帝位，世人在这个时期万寿无疆。我们的先帝畏惧皇天的谴告，关心爱护众百姓，在执政四十一年里，日益步入恭敬的境界，践行仁德，因而能够延续扩展那基业，一直垂示范例到今天。这是因为他那精神心术的妙用，和《六经》的深长义旨融会在一起。他亲自撰写的《要语》这部书，亲口来传授，当面做指点，宣示治国准则的东西全在这里面。皇帝我恭敬地承受重大谋略的训导，实行自己所理解的事项，召请年高望重的人，求取贤才，目的在于崇尚贤能，可是召请却未能够来到，求取却未能够全部求取到。究竟应该怎样做才会取得忠信顺从者的辅助呢？训示太守县令，惩治贪婪残暴的行径，目的在于推广开治理，可是训示却不一定就信服，惩治却不一定就改变，究竟应该怎样做才会使治理的面貌焕然一新呢？求取地方官吏，应当谨慎啊！既不任用皇亲国戚，又每每选用贤能优秀的人，本应出现使民生充裕的政绩，可仍然没看到乡间不存在愁苦的叹息声。把百姓的财物搜刮得一干二净，决不忍心这样干啊！已经大力取消各地进献土特产品，而且禁止献纳多余的钱币，本应出现给下面带来了好处的说法，可仍然听说郡县还有横征暴敛。义仓

粮食的发放,依仗它来救济饥荒,可侵吞的现象有的还没有避免掉。田租的免除,原本是用来减轻赋税,可苛细收取在有的地方还像老样子。至于对各州郡长期拖欠的赋税一律免除,减少登记入册的户口原数,使百姓受灾的困扰得到缓解,深深寄寓着体念民众忧愁的实际效用,可老百姓并没有感到真顺心的想法,情势就像中间被隔绝开来,朝廷的恩泽播布不到下面去。逐项思索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出合理的解释。想来是承奉朝廷命令的长官训导还不明了吧?难道是官吏很少有廉洁公正的,于是治理的方法就衰败下去了吗?还是筹划生计需要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呢?或者是习气被轻慢所禁锢住,不容易猛然间就革除掉呢?皇帝我恭敬地忆念先帝留下的谋略,常常害怕使它蒙受到羞耻,再度为它感到要戒惧啊!你们这些士大夫广泛了解古代的事情,通晓当今的事务,一向怀有经邦济民的志向,要依据经典来做对答,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7. 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丙子科

[十月初八日;元和殿]

日射三十六熊赋

幸燕诗

58. 辽道宗清宁中(1055－1062)

圣心独悟赋

59. 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丙午科

[八月;真定(今河北正定)安国寺]

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上皇谓宋徽宗,少帝谓宋钦宗)

策问:你们宋朝的太上皇昏庸无道,年轻的新皇帝缺少信义。

60. 金海陵王贞元二年(1153)癸酉科

尊祖配天赋

61. 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丁丑科

[七月二十日;宝昌门]

不贵异物民乃足赋

忠臣犹孝子诗

忧国如饥渴论

62.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癸巳科

[燕京(今北京)悯忠寺]

策女直进士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与否。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而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

策问女真进士说:贤才降生在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也都依赖贤才。每个时代未曾不降生下贤才,贤才也未曾不辅助那个时代。大致上说来,每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贤才,只在任用他们与否。像伊尹佐助商汤,傅说辅助殷高宗,吕望逢遇到周文王,都是从耕作、筑墙、钓鱼这些地方被起用的,可他们君臣的功业却异常突出,后世根本就赶不上。这是由于殷代和周朝的君主能够任用那合适的人选,使他们的才干全部都施展出来啊!我们大金皇朝凭借神明勇武平定天下,当今皇上通过文治德化安抚海内,文武并用,言论哪怕仅有一点点儿可取,也必定采纳,事情哪怕仅有一点点儿益处,也决不抛弃。选取人才的做法基本上达到极点了,可仍旧担心还有被遗漏在民间的贤才能人。如今打算全部获取到整个天下的贤才,并且任用他,致使贤才各自完全发挥出本人的才能,通过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63.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乙巳科

策女直进士曰：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兴教化，措刑罚，振纪纲，施之万世，何术可致？

策问女真进士说：帝舜时担任民事官的契全面推行关于君臣、父子等五种人伦纲常的教化，担任司法官的皋陶宣明刺面、割鼻等五种刑罚，因而刑罚搁置起来不再动用，家家都有资格受到封赏。如今打算兴行起教化，使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振作起朝廷的纲纪，一直延及到千秋万代，采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64.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丙寅科

日合天统赋

65.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乙卯科

制策曰：朕闻贤圣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无为，或不遑暇食，或宽仁恭俭，或力于为善。其所以致治虽殊，及乎民安物阜，风淳俗美，刑辟措而鲜用，颂声作于田里，制礼作乐，翕然大和，而麟凤龟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诸福之物，莫不毕至。虽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气之应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汉之文帝，唐之太宗，犹能致治如彼，况薄汉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虽久宁谧，户口虽甚蕃滋，而稼穑或伤于水旱，细民或致于阻饥，未能家给人足，时犹仰济县官，岂行仁义犹未尽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识今，知常而通变，毋迂阔于事情，毋乖戾于典则，明以对朕，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听说圣明贤能的君主治理天下，有的在自身修养上保持恭敬的态度而清静无为，有的忙于政务竟顾不上抽时间用饭，有的宽厚仁德又恭敬节俭，有的在筹划善政上下大力气。他们用来实现大治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达到了百姓安定，万物众多，风气淳正，习俗美好，刑罚搁置起来而很少动用，赞颂的歌谣在田间住处传播开来，制定礼仪，创作乐舞，全天下不约而同地一片

和谐，而麒麟凤凰、灵龟神龙、生长得很奇异的谷物、茎似珊瑚又枝叶均呈赤色的仙草、甘甜的晨露、甜美的泉水等象征吉福的瑞物，没有一样不降现出来。尽管称帝天下或称王天下的人所取得的美好业绩不单单表现在这些方面，但也是那时气做出的回应啊！虞舜和周文王的仁德教化当然是由来已久的了，可像西汉的文帝，唐朝的太宗，仍然能够实现像虞舜和周文王那样的大治景象，何况瞧不起汉唐两代而要不与他们站在同一行列的帝王呢！如今天下尽管长期安宁，户口虽然增长得特别快，可农业生产有时还被水旱灾害所损伤，老百姓有时还陷入饥饿的境地，没做到家家充裕，人人富足，经常还要依靠朝廷的救济。这恐怕是施行仁义还没完全收到那应该收到的实效吧？你们这些士大夫通晓古代又明了当今，懂得固定不变的准则又清楚依据时势该采取的灵活措施，不要对事情不切实际，不要对经典的主旨有所违背，明确地来向皇帝我做出对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66.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戊午科

制策曰：盖闻昔之圣人，垂衣裳以成无为之治。稽于《书》、传，任贤设教，品节备具，谆谆然命之矣。是无为者，始于有为也。事久则弊，唐虞之世历年滋多，不闻其有弊也。治莫重于定国体，尊国势。纲常之分严，风俗之化一，国体定矣；善恶之类明，赏罚之制宜，国势尊矣。帘远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逾越，国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记》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王道备矣。夫礼以防民，乐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则知所以儆之；知其困穷，则知所以振之。为吏习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继体守文，善论治者尤以为难。朕承累圣之丕绪，宵旰图治，罔敢暇豫，於变时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观乎会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论，以称详延之美，朕将有考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听说古代的圣人端正地坐在朝廷上，就形成了清静无为的治理。考察《尚书》和解说经典的书籍，他们都任用贤才，施布教化，各种制度规定一样也不缺，反反复复地对大臣进

行嘱告了。这表明清静无为是从有所作为开始的。什么事情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弊端,可唐尧虞舜在位时期,历经的年头很多,没听说那时也有弊端啊!施行治理,没有能比定立起国家的体统、张布开国家的威势更为重要的了。伦理纲常的等级区分十分严明,社会风尚的化导实现一致,国家的体统也就定立起来了。良善与邪恶的类属特清楚,封赏和惩罚的规定特公正,国家的威势也就张布开了。卷帘远远挂起,殿堂高高居上,这是上级和下级的区分啊!依据才能授予官职,谁也不许超越品级,这是国家的最重要的抉制手段啊!像以上所列举的情况,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做到呢?《礼记》上说:礼仪、乐舞、刑罚、政事,这四个方面相互贯通而不彼此违逆,称王天下的大道也就完整形成了。礼仪是用来防范民众的,乐舞是用来协调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刑罚是用来禁遏凶暴行为的,政事是用来使社会风气变得美好的。这四个方面应该把哪个放在前面来处理呢?从早到晚恭谨勉力,这是卿士大夫应当具备的德行。了解那些邪恶的表现,也就明白加以警戒的做法了;了解那些困乏穷窘的情况,也就明白予以振兴的做法了。身为官吏却司空见惯,无动于衷地根本就不知道去省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继承帝位,遵循先王的法度,擅长讨论治国的人对此认为最难做好。皇帝我继承各位圣帝一脉相传的伟大基业,从早到晚谋求大治,不敢安逸享乐,可百姓随同教化变得和睦善良,好像还存在着做得不够的地方。你们这些士大夫从融会贯通上做考察,斟酌古今的适宜对策,不要迂腐地讲来讲去,空洞地发表议论,以便符合朝廷多方面听取意见的良好愿望,皇帝我准备加以考查。

67.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甲子科

制策曰:朕闻自昔圣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达聪,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礼乐刑政之道粲然备具。禹成厥功,祗承于帝,精一执中,实圣圣传心之要。汤黜夏命,以克绥厥猷为本。武王胜殷,首访于箕子,天人之际明矣。《诗》之《访落》、《公刘》,《书》之《无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继志述事之业。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维我世祖皇帝,圣神启运,时则有同心同德

之彦，效谋输忠，故能混一区宇，治化旁洽。朕祗承丕绪，永惟帝王事功见于经传，悉遵而行之。时有古今，制宜损益，若稽世祖之宏规远略，垂统万世，夙夜寅畏，以图治安。然人才之列于庶位者，犹若未及；治道之达于庶政者，犹若未备。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行于今者何策，世祖政典之纲常、当今未尽举行者何事，宜悉心以对，以辅朕惟新之治。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听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刚登上帝位时的朝政整顿得特美好的。因而虞舜继承唐尧的帝位，明察四方政务，倾听各地意见，任命九种朝廷的主要官员，向十二州的长官做咨询，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事的施行办法鲜明地完全具备了。大禹建成他的治水功绩，恭敬地事奉帝舜，精粹专一，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落实圣人一个接一个地所传授的心治大法的要领。商汤革除夏朝的统治权，把确立起大道的教化作为根本。周武王战胜商朝，首先向箕子做访问，皇天和人事的关系就明确了。《诗经》中的《访落》诗和《公刘》诗，《尚书》中的《无逸》篇和《立政》篇，也只是述说周成王在继承王位的起始阶段，君臣交相修明道德，以便成就那继承先王遗志和政事的功业。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道理是同一个啊！敬思我朝的世祖皇帝，凭借圣明神武开启时运，当时又有同心同德的贤才献呈计谋，表达忠诚，因而能够统一天下，治理和教化广泛地深入人心。皇帝我恭敬地承接一脉相传的盛大基业，只想到帝王的事业和功绩在经书和解释经书的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全部遵循并行用它们。但时代存在着古与今，措施应当有减损又有增益。考察世祖皇帝的宏大规制和长远谋略，把国家命运传续到千秋万代，皇帝我日夜恭谨戒惧，谋求政治安定。然而人才分布在百官行列的，仍然像是还有被遗漏掉的人。治国之道贯彻到各种政务上，仍然像是还有不完备的地方。你们这些士大夫要用古代帝王畅行无阻又明明白白并且在今天可以行用的那些良策，世祖皇帝的施政大典做出确切规定而在当今尚未完全推行的那些事项，竭尽心思来做对答，以便辅助皇帝我国运一新的治理。

68.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丁卯科

制策曰:朕闻帝王之相承,质文之迭兴,尚矣。夫治在正俗,致俗之丕变,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兴起之,则四海之内,其应如响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政所以绍五帝之烈,垂百世之范,其为之纲纪枢机者,岂不在兹乎?继是而后,不遑论也。洪惟我太祖皇帝,龙兴朔土;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为,著之令甲,深仁厚泽,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矣。淳厖正直之风,笃实博大之教,兹非忠乎?上下等威,截然而不可犯;郊庙朝廷,粲然而有仪,兹非敬与文乎?然必审所从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谓敝者,果何在乎?今欲气感而声随,风移而俗易,必从一以为定乎?必择三者之盛而弃其敝乎?此朕所以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绩学明经,其于古今之宜,政事之要,方将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对,毋忽。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听说称帝天下的人和称王天下的人递相承接,质朴和文采轮番兴行,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治理的关键在于端正社会风气,造成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这就必定需要上面的人有办法确立方针来倡导兴行,于是四海之内就会像回声那样做出应合来。史官的载述说:夏朝的国政崇尚忠厚,可崇尚忠厚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众百姓变得朴野,所以商朝就用崇尚虔敬来代替。崇尚虔敬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众百姓事事都像敬奉鬼神那样做,所以周朝就用崇尚文采来代替。崇尚文采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众百姓变得奸巧浅薄。哎呀呀!夏商周三代的美好国政用来继承五帝的功业,给历代留下范例,构成它们的纲纪枢机的东西,难道还不正在这崇尚的对象上吗?从三代以后兴起的朝代,就让人没功夫去论说了。只有我朝的太祖皇帝,在北方崛起,世祖皇帝又统领了整个华夏地区。各项制度和文教措施,明确地写在施政的法典上。深广的仁德和厚重的恩泽,化育养护黎民百姓。那些使民间习俗一致又使民众思想稳定的

举措，简直太齐全了。淳厚正直的风气，诚实博大的教化，这还不属于夏朝倡导的忠厚吗?上下之间的等级威严，鲜明得绝对不许凌犯。在京师南郊和祖庙举行祭祀以及临朝听政，一派严整气象，都有礼仪规范，这还不属于商朝和周朝分别倡导的虔敬与文采吗?但是一定要审慎地对待该效仿三代的地方。三代已经不能够让它们再回来了，可史官所讲的消极后果，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如今打算各地同朝廷声气感应紧相随，社会风气得到彻底地改变，必定要效仿忠、敬、文中的一种作为标竿吗？或者是必定要择取这三方面的巨大成效同时要消除掉那些消极后果呢？这是皇帝我对端正社会风气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你们这些士大夫积聚学问，通晓经典，在古今的合适做法与政事的纲要方面正准备表达出来，等待朝廷任用，要竭尽心思来做对答，不要太简略。

69. 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庚午科

制策曰：朕闻伏羲、神农、黄帝之事见于《易》，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存乎《书》，皆圣人也。其号名虽殊，而治化则一。日月星辰之为天，丘陵川泽之为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为人，三极之道有以异乎?宗庙也，朝廷也，师旅也，礼乐也，佃渔也，耕桑也，时之所尚虽小有损益，其为治之具岂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可得而别欤?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畴，武王询之。文无异也，道无异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备矣，何以有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犹待于箕子?然则群圣之奥，有待于后世者，犹无穷乎?子大夫习之于师，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素有其说乎?朕诚以为非伏羲、神农、黄帝，无以为道；非尧舜无以为德；非禹汤、文武无以为功。心术之精微，制作之会通，子大夫其悉陈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听说有关伏羲、神农、黄帝的事迹在《易经》中可以看到，有关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绩保存在《尚书》中，他们都是圣人啊！尽管各自的称号不一样，

但治理和化导却相同。日月星辰构成了天象，山川湖泽构成了地貌，君臣父子和夫妇长幼构成了人际关系，这三个方面的活动准则存在着不同之处吗？宗庙祭祀，临朝听政，出兵作战，礼仪乐舞，捕鱼打猎，农耕蚕桑，每个时期对这六大事项的施行重点尽管略有调整，但在实行治理的对象上难道还有能替代这六大事项的吗？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为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之所以为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能够从原因上再加以区别吗？伏羲创制的八卦，周文王对它加以推演，大禹的《洪范》九条治国大法，周武王来向箕子做询问。这表明原始的图文并没有不同的地方，所显示的大道也没有不同的地方。可是伏羲创制八卦，把天地化生万物演示得相当完备了，为什么还需要周文王去做推演呢？周武王的内心，已经和神明融为一体了，为什么还要等箕子来做述说呢？既然如此，那么各位圣人的奥义妙旨还需要后世加以推阐的地方，仍然没有止境吧？你们这些士大夫跟从师长学习，从古代那里去做考索，在心中确有收获，对当今也很适用，恐怕一向就有这方面的主张吧？皇帝我确切地认定：不像伏羲、神农、黄帝那样，就没办法形成大道；不像唐尧虞舜那样，就没办法形成仁德；不像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那样，就没办法建成功业。心术的精纯微妙，制度定立的融会贯通，你们这些士大夫要详尽地陈述一番，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70. 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

[九月三日；翰林国史院]

(廷试蒙古色目) 制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为难，保天下为尤难。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于三代。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周称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启，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贤圣之君之众莫若殷，亦不过六七而已。其后惟汉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何若斯之难也？我祖宗积德累世，至于太祖皇帝肇启土宇，建帝号；又七十余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艰哉！顾予冲人，赖天地祖宗之灵，绍膺

嫡统，继承之重，实在朕躬。夙夜兢兢，未获其道。子大夫通今学古，其求启之所以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称贤圣，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由？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后，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称贤圣，继祖宗之盛？悉心以对，毋有所隐。

（廷试汉人南人）制策曰：朕闻《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盖事必师古，帝王之所尚也。昔之有天下者，曰皇、帝、王、霸。夫其位同，有庙社臣民同，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独其为号不同。然则曰皇、曰帝、曰王、曰霸，其名义可得而知乎？治天下者，为其事必有其功。载之简册，垂之来世，尚矣。《三坟》之书，少昊、颛顼、高辛氏之典湮灭无传，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征于今乎？唐虞以下载籍虽存，亦可以尽信而无疑乎？临乎亿兆之上，必有为治之道，始终持循，以成一代之理。皇、帝、王、霸其为道同乎，不同乎？传曰：为政以德。盖必行道，有得于心，然后可以措诸政。皇、帝、王、霸之德，其浅深纯杂亦可得而言乎？君心，出治之原也。皇、帝、王、霸其心之微，亦可得而见乎？是皆朕之所欲闻也。子大夫修业于家，殆有年矣。兹故详延于廷，以询所蕴。《书》曰：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又曰：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朕仰荷天明，承累圣之丕业，兢兢图治，其法祖宗者，固不待谋之子大夫矣。等而推之，皇、帝、王之心之德之道，何者可师，何者可取，其悉陈之，以副朕之虚仁。近世儒者以皇、帝、王、霸分而比之春夏秋冬，然则其所以为皇、帝、王、霸者，将犹气之周流于一岁，适然而然，初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天道循环，由贞而元，理之必至。苟以四时方之，则秦汉而降，固可以配皇、帝、王、霸而班之否乎？子大夫其为朕索言之，朕将有所鉴焉。

（廷试蒙古色目）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古人讲过这样的话：取得天下很困难，保住天下就更困难。自古以来，能够守执住已有的大业的君主，没有能比夏商周三代更雄盛的了。对夏朝，世上称述夏启做得到恭敬承顺，接续了大禹的治国大道。对商朝，世上称述曾有六七位贤能圣明的君主涌现出来。对周朝，世上称述周成王和周康王

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大治地步。凭借大禹治水的功绩，却只有夏启被世上所称述。凭借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业，却只有周成王和周康王被世上所称述。贤能圣明的君主顶数商朝涌现出来的人数多，可也不过就六七位罢了。三代以后只出了汉朝的文帝和景帝，可论起文帝和景帝的治绩来，仍然比不上三代那些善于继承先王事业的君主。为什么竟像这样地难办呢？我朝列祖列宗积累德业好多代，到太祖皇帝开始创建国家，定立了帝号；又经过七十多年，世祖皇帝才统一了天下，实现了至元年间的大治局面。这是多么地艰难啊！不过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仰赖天地和列祖列宗的威灵，继承并膺受一脉相传的帝位，承接先王大业的重任，实际上全在皇帝我的身上了。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可却没有获取到治国的大道。你们这些士大夫通晓当今事务，研习古代学问，要探求夏启恭敬承顺、商朝六七位君主被称颂为贤能圣明、周成王与周康王使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具体做法，究竟在哪里？汉文帝和汉景帝赶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原因，又在哪里？以及当今执守住已有的大业，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事情属于根本，哪些事情属于细枝末节，怎样就会使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被世上称颂为贤能圣明，继承好我朝列祖列宗的盛大功业？所有这一切，要竭尽心思来做对答，不要有什么隐瞒。

（廷试汉人南人）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听说《易经》上讲过，君子要大量记下前代的美好言论和行事，用来培养自己的道德。这是因为任何事情必定要效法古代，属于帝王所重视的一个方面啊！从前拥有天下的人，分别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他们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建有宗庙社稷和辖有民众臣僚也是一样的，握有赐给或剥夺爵位俸禄、决定免罪或处死的大权还是一样的，唯独所获得的称号不同。既然如此，那么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这类称号的具体涵义可以弄清楚吗？治理天下的人，采取了什么举措，必定会收到相应的功效，被记载在史书上，垂示给后世，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了。《三坟》这类书册，还有少昊、颛顼、高辛氏这些远古帝王的典籍已经亡佚失传了，他们的事业和功绩还可以考察出来并能与当今做印证吗？从

唐尧虞舜以后的图籍虽然还存在，但能对它们完全相信而不必怀疑吗？位居在亿万百姓的上面，必定具有那施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由始至终持守沿用，以便形成整个一个时代的治绩。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他们施行的治国大道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解释经书的《论语》上说：要依靠仁德来进行治理。这是因为一定要行用大道，在内心确有体悟，然后才可以施布到各种政事上。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他们德性的深浅程度和纯粹与驳杂的情况，也能够评述一番吗？君主的心念是拿出治国措施的本原。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他们心念的微妙之处也可以观察出来吗？这一切，都是皇帝我想听到的事情。你们这些士大夫在家中修明儒业，也有年头了。所以现在把你们全部延揽到殿廷上，询问你们心中所积累的东西。《尚书》中说：如今老百姓都在看着你能否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做法。同时又说：另外还访求并循用远古圣帝明王的治国大道。皇帝我往上肩负着皇天赋予的统治权，继承我朝各位圣帝的大业，兢兢业业，谋求大治，有关效法列祖列宗的事情，原本上就不需要再和你们这些士大夫做商量了。由此类推，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他们的德性和大道，哪些方面可以效法，哪些东西可以取用，你们要详尽地陈述一番，以便符合皇帝我虚心期待的愿望。近代的儒士把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依次比拟成春夏秋冬。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原因，也就如同时气在全年内流转一圈，本该那样才那样的，在开始时并不是同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存在着什么联系吧？天道运行，周而复始，由正常状态归向本原所在，属于必然的道理。如果用四季来做比拟，那么从秦朝汉朝以后，是否就固然可以同那些被称为什么什么皇、什么什么帝、什么什么王、什么什么霸的人相比配，而列在他们的后面呢？你们这些士大夫为皇帝我做番考索讲讲它。皇帝我准备有所借鉴。

71.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乙酉科

(廷试汉人南人)制策曰：朕惟隆古帝王之为治，莫不因郊丘以享帝，严宗祏以事神，所以报本始、崇孝敬也。朕荷天地之洪禧，缵祖宗之丕绪，盖尝洁币玉以祀穹祇，肃圭邕以奉社稷，虽诚意之上通，顾制作之当议。若稽典礼，祭天于地上之圜丘，祭地于泽中之方丘，而后世分祭、合祭之说，服冕乐舞之数，果同异欤？宗庙禘祫之义，祖宗昭穆之序，诸儒之论，何以折中欤？传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或以社为祭地；又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说何欤？今天下治平百年，制礼作乐，维其时矣。子大夫明古今之制，通礼乐之原，其详陈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书面询问的事情说：皇帝我想来，古代兴盛时期的帝王施行治理，没有谁不通过在京师南郊和北郊举行祭祀来敬奉天帝的，也没有谁不庄严地祭祀祖庙来事奉神灵的。目的在于禀报本原和起始，显示孝顺与恭敬啊！皇帝我蒙受天地赐给的盛大吉福，继承列祖列宗一脉相传的大业，曾经每年把币帛玉器备办得非常精洁来祭享天神，把圭璧清酒安排得十分纯正来奉祀地神了，尽管虔诚的心意传到了神灵那里，但有关礼仪规范还应当再加以议定。考察礼制经典的载述，在地上的圜丘这一处所祭天，在水中的方丘这一处所祭地，可后世关于单独祭祀或一起祭祀的说法，礼服礼帽和音乐舞蹈的规格数目，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呢？在宗庙分祭或合祭先王的义旨，始祖居中与子辈、孙辈分列北、南两侧的位序，对各个儒士有关这方面的论断，该怎样做出恰如其份的综合呢？《礼记·中庸》上讲：祭天祭地的大礼，是用来敬奉天帝的。可有人却认为祭社是祭祀地神。《孝经》上又讲：在宣布政令的明堂上也祭祀周文王，用来陪衬天帝。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天下太平已经长达上百年了，制定礼仪，创制乐舞，也正是时候了。你们这些士大夫明了古今的制度，通晓礼仪乐舞的来龙去脉，对此要详尽地做一番陈述，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姜慧杰　辑译〕